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二卷）

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ESP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二卷）

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



ISBN 7-5058-2886-X
F·2254 定价：1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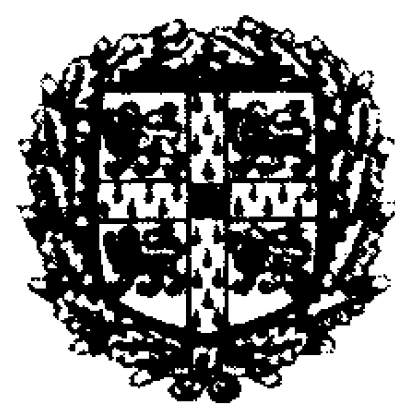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GENERAL EDITORS: M.M.POSTAN, late Professor of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D.C.COLEMAN, Professor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nd PETER MATHIAS, Chichele Professor of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剑桥经济史

M.M.波斯坦 D.C.科尔曼 彼得·马赛厄斯 主编
王春法 主译



VOLUME II
SECOND EDITION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UME II
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GES

EDITED BY
M.M.POSTAN
Late professor of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Universiy of Cambridge

AND
EDWARD MILLER
Fellow of Fitzwilliam College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二卷）
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

M.M.波斯坦 爱德华·米勒 主编
辛西亚·波斯坦 助编
钟和 张四齐 晏波 张金秀 译
王春法 赵海波 校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卷，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英）波斯坦等主编；钟和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1

书名原文：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SBN 7-5058-2886-X

Ⅰ．剑... Ⅱ．①波... ②钟... Ⅲ．①经济史—欧洲②对外贸易—经济史—欧洲—中世纪③工业经济—经济史—欧洲—中世纪 Ⅳ．F1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98521号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二卷）
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

M. M. 波斯坦　爱德华·米勒　主编
辛西亚·波斯坦　助编
钟　和　张四齐　晏　波　张金秀　译
王春法　赵海波　校订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印刷
河北三佳装订厂装订
787×1092　16开　60印张　1020000字
2004年12月第一版　200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5058-2886-X/F·2254　定价：118.00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Published by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he Pitt Building, Trumpington Street, Cambridge CB2 IRP
32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22, USA
10 Stamford Road, Oakleigh, Melbourne 3166, Australia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1952
Second edition published 1987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th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British Library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data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2nd edn,
Vol. 2: 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ges
I. Europe—Economic conditions
I. Postan, M. M. II. Miller, Edward, 1915—
III.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330.94 HC240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data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2—has title: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Includes bibliographies.
Contents—v. 1. 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 edited by M. M. Postan.—v. 2. 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ges, edited by M. M. Postan and Edward
Miller, assisted by Cynthia Postan.
1. Europe—Economic conditions. 2. Europe—History.
I. Postan, M. M. (Michael Mo ssey)ed.
II. Habakkuk, H. J., ed. III. Miller, Edward,
1915— . IV. Titl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HC240.C312 330.94 66—66029

ISBN 0 521 08709 0

译　序

(一)

所谓经济史，无非就是有关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过程的历史，是历史演进的经济方面，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活动的总称。但是，作为经济科学领域的一门边缘学科和基础学科，经济史又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的学科，它既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背景。没有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也就失去了依据和方向。

关于经济史在经济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似乎没有哪位经济学家会对此加以否认，而且许多国外著名经济学家也都精心撰写过经济史著作，如刘易斯关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研究、弗里德曼关于美国货币史的研究等等。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要进行经济学研究，有三门专业知识必不可少，即经济史、经济理论与经济统计，其中经济史最为重要。“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这是因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

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①] 麦克洛斯基更在1976年对经济史与经济科学的关系做了精辟入里的论述。根据麦的观点，经济史学科本身的实际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它可以提供更多的经济事实，更好的经济事实，更好的经济理论，更好的经济政策，更好的经济学家；而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学科的贡献是：更多的事实，更好的事实，更好的假设，更好的数据解释，更好的历史学家。[②]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繁荣，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即得益于战后初期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对经济周期史的研究以及对美国历史上国民收入账户的考察，美国经济史学家越来越多地使用经济模型和假设检验来研究经济史，从而使经济史的量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一相得益彰的结合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③]

遗憾的是，这样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迄今还远未建立起来。在日常生活中，许多经济学家往往对经济史的功能和作用缺乏清楚的认识，甚至有这样那样的贬斥经济史的地位和作用的现象，而真正将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的中国学者，至今还不多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无论是国内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还是世界经济研究，之所以迟迟不能取得较大进展的一个突出原因就是经济史研究的严重滞后影响了理论研究的深入。

（二）

就其学科体系而言，经济史学科可谓枝广叶茂，体系庞大。

①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
②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经济史”条。
③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经济史”条。

按其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可以有国别经济史、区域经济史、国际经济史（研究国际经济的兴起、崩溃与复兴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规律）、世界经济史（以世界为整体来研究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等；按其涉及的经济部门，可以有农业经济史、工业经济史、银行金融史、贸易史等；按其所研究的历史年代，可以有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当代经济史等；按其研究的经济行为主体，可以有企业史、企业家史、总统经济史等；按其研究的经济专题，又可以分为经济增长史、经济危机史、通货膨胀史、钱币史、经济政策史等等。事实上，我们所阅读的经济史著作，大体上都是按照这种学科分野来撰写的。

但是，如果从研究方法来分类，则所有的经济史著作大体上都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描述性经济史和分析性经济史。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主要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客观描述，所回答的主要是“是什么”的问题，即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方面是如何演进的？其轨迹如何？作用和意义如何？在这类经济史著作中，虽然我们也能够看出作者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乃至观察问题的角度上受到当时当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它们一般都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以及特定的理论研究方法，而是通过对经济活动的详尽描述来尽可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一般而言，由于描述性经济史著作是任何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也是任何严肃认真的经济分析的出发点，其学术价值也主要在于其对经济发展历史进程描述的客观性与全面性，因此，越是客观详尽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就越能够为更为深入的经济史研究和经济分析提供一个研究平台和检验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实验场，其学术价值也就越高。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论从史出是这类著作的共同特征。

与此相反，分析性经济史主要依据某种具体的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大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从而给出自己的解释，并以此证实或者证伪某种经济学理论。它们往往更强调特定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强调将理论

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实际上是更加强调以论带史。在这里，明确的理论依据、内在逻辑严密的概念体系、清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及严格的推理方法是这类著作的共同特点，其目的不仅仅是要了解经济史的一般演进过程，而且还要进一步解释某些经济事件在历史上发生的原因、内在的机理、具有的理论含义以及对于经济学理论演进的意义。在这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思堪称先驱。麦迪森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 也主要是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的：收入增长与收入差距、影响增长实绩的原因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后所附的大量表格主要是对这些经济分析的数据支持。事实上，在经济史研究中强调用经济理论去研究历史已经成为目前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趋势。

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而且两者之间也不存在此高彼低之别。没有一套符合历史发展真实的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分析性经济史，更不要谈高水平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由于描述性经济史也存在着对某些具体经济现象的深入分析和探讨，分析性经济史也需要对经济发展过程给出基本的描述，因此，具体到一部经济史著作究竟是描述性的还是分析性的，只能依据其基本倾向性做出判断。据此推断，我们可以说《剑桥欧洲经济史》是一部描述性经济史著作，尽管其中的许多作者后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以及美籍俄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隆等。

(三)

既然以应用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已是当前经济史研究的主流，而《剑桥欧洲经济史》又主要是一部传统的经济史著作，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选择这样一部著作介绍给国内学术界呢？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

① 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 1997 年版。

其一，正由于目前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分析性经济史，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版的世界经济史著作大都受过严重的“理论污染”，是试图从不同视角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加以解释的著作，而纯粹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却比较少见。即使是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这样的综合性经济史著作，也具有明显的制度主义色彩，充满了作者个人对经济发展历史进程的新制度主义式理解和判断。从推动经济史研究深入的角度来看，这固然不错，但是，这样的分析性经济史著作越多，就越需要一些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经济发展的真实历史过程，以便从中抽象出经济演变的内在规律，并据此对现有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观点进行证实或证伪的工作。这是因为，我们研究经济史，首先就要准确地知道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是怎样的，需要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客观的描述。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进一步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的，才能够对这样一个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以便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一种比较纯粹的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而不是以作者自己的眼光加以选取和解释的经济史著作。这样一种比较纯粹的经济史，事实上就是我们赖以进行研究的基础和标杆，也只有这种经济史著作，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经济理论实验场的功能，各种经济理论也才能够以不同的透镜来观察和解释这种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才能够真正还经济发展的历史以本来面目。我国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因而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深入。比如说，建国以来，除了樊亢、宋则行等学者主编的四卷本《外国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和三卷本《世界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著作以外，我们只有一些零散的国别经济史著作，如美国经济史、英国经济史、苏联经济史或者日本经济史等等，品种和数量都极为有限。近年来，国内学术界虽然也翻译了一些负有盛名的经济史著作，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布劳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

义》等，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样一些经济史著作仍然属于分析性经济史之列，因而无法给我们提供一部比较纯粹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

其二，《剑桥欧洲经济史》虽然名为欧洲经济史，但它所探讨和涉猎的范围绝不仅仅局限于欧洲，而是涵盖了世界各个主要地区的现代经济发展进程，包括美国、拉美、澳大利亚、东亚各国以及俄罗斯等国的现代经济发展进程，因而是一部事实上的世界经济史。我们知道，所谓世界经济史其含义基本有二：一是世界经济的历史，旨在探讨特定阶段世界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而这样一种作为人类历史新现象的世界经济孕育于地理大发现时期，形成于19世纪末期；二是世界的经济发展史，旨在探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规律，这样的世界经济史自有人类以来就已经出现了。就前者而言，宋则行、樊亢主编的《世界经济史》可为其代表；就后者而言，我们迄今还没有一部综合详尽的描述性世界经济史著作，而《剑桥欧洲经济史》恰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增长是从欧洲、特别是从西欧起源的，欧洲经济的发展过程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个世界的近代经济发展历程。因此，当我们以一种全球视角来考察和理解人类经济活动及其组织的演进时，欧洲作为人类先进经济活动的中心自然会首先进入我们的视野。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关注欧洲之发达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同样关注其他地区之为何不发达以及如何才能走向发达，关注欧洲之发达是否是建立在其他国家之不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关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或者说是否能够找到一种共同的繁荣之路。在这个意义上，《剑桥欧洲经济史》显然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它本身是研究欧洲的经济发展进程的，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欧洲国家，而是由此向外延伸至南北美洲、澳大利亚以及远东的日本、中国以及印度等，在欧洲国家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互动中研究和探索欧洲的经济发展规律，从而将整个世界纳入了欧洲经济史研究的范围，而将整个近代世界经济增长的过程视为欧洲起源并向全球扩散的过程，

这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仅如此。由于欧洲联盟是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欧洲经济的一体化正在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世界各国也都正在深入开展欧洲一体化历史与机制的研究，力求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寻求欧洲统一的深刻内涵。对于正在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的中国经济界来说，《剑桥欧洲经济史》这样一部具有全球视野的综合性经济史著作显然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借鉴。

其三，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实与理论研究迫切需要这样一部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是最近二十余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旋律，而目前中国也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变迁进程。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以制度创新和制度演进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受到广泛的欢迎与青睐，而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诺思等学者对历史上欧洲制度变迁的研究。在其代表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和所有权理论等，对西方民族国家经济兴起的过程及原因给出了自己的独特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统一。但是，经济史是丰富多彩的，使用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它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和判断。那么，诺思从制度视角所给出的解释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否能够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推动这种历史变迁的内在机制又是怎样维持运转的？除了诺思的解释以外，我们从那一段历史中能否找到另外的解释或者说启迪？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首先就需要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特别是制度创新与演进的历史做出尽可能客观详尽的描述，并在“知其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知其所以然”，进而由此确认诺思理论中的真理颗粒。惟其如此，学术界对以探讨历史上的经济制度变迁为主要内容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无疑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而《剑桥欧洲经济史》恰恰就是这样一部以欧洲从中世纪向现代经济转变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史著作。事实上，从《剑桥欧洲经济史》的总体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比较侧重于欧洲经济的崛起、特别是在此过程中的

制度变迁与政策调整问题，中世纪末期的欧洲经济及其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在其总体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这一部分恰恰是近年来西方学者非常重视而我国研究又极为薄弱的一部分。从编排体例上看，《剑桥欧洲经济史》不仅非常重视欧洲国家在中世纪的经济增长积累以及在这种转变过程中的制度变迁，而且将工业化及其随后的全球扩散置于一种自然延伸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从而可以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经济变革时期的制度演进过程与机理提供更加可靠与丰富的理论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了解欧洲经济史、特别是从中世纪到现代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史，也就不能完全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新制度经济学，在运用这些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实方面也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

(四)

《剑桥欧洲经济史》全书共八卷，是由著名经济史学家 M. M. 波斯坦等主编、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权威经济史著作，在西方学术界久负盛名。这部著作的策划工作始于战火纷飞的 20 世纪 30 年代，约翰·克拉彭爵士和艾琳·鲍尔是丛书的主要发起人，第一卷出版于 1941 年，第八卷出版于 1989 年，从策划之始算起，历时近 60 年。数十年磨一书，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可以说是比较少见的。

大体说来，《剑桥欧洲经济史》可以分为三部分：

其一，前三卷构成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探讨欧洲经济从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变，即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是欧洲经济而不是其他地区的经济率先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不同经济活动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其中，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探讨了农业与农民生活的转变过程；第二卷《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则探讨了欧洲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渠道与转变；第三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则分析了随着经济活动领域与重点的变化，经济组织方式与政府政策的

相应转变与调整。事实上，近年来非常活跃的新制度经济学就是通过对这一时期欧洲经济转变的重新解释而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的。

其二，第四卷和第五卷构成了该书的第二部分，其重点是探讨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对外扩张以及欧洲的工业革命。其中，第四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主要分析经济增长与发展赖以进行的外部环境，即人口增长、科学思想与成就、价格、贸易模式与贸易线路、劳动力供应、大规模公司的组建以及重商主义理论与政策等；第五卷《近代早期的欧洲经济组织》则主要分析工业生产的核心机制、信贷机制、国际贸易机制以及国家作为生产者、消费者以及财政当局的功能等。作者的这一内容安排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国家在现代经济中的突出地位早在工业化开始以前就已经确立了，仅仅从工业化自身并不足以回答为什么欧洲国家在长达三百余年的时间里一直支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其三，本书的第三部分由第六卷、第七卷和第八卷组成，主要研究和分析工业革命以来包括美国与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其中，第六卷《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经济发展：收入、人口及技术变迁》重点分析工业革命展开的外部因素；第七卷《工业经济：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则主要分析现代工业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如资本、劳动力以及企业家资源的供应等，并且主要是按国家展开分析的，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第八卷《工业经济：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发展》主要分析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演变。因此，大体上说，这一部分的三卷主要分析工业化的基础条件、增长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变化。

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一部欧洲视角的经济史著作，《剑桥欧洲经济史》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对此我们应予以注意。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是最先在欧洲、特别是在西欧发源的。无论是从工业化的国际扩散来说，还是从世界经济形

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欧洲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中都居于中心地位。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接受或者说承认欧洲中心论的合理性。欧洲中心论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我们必须加以批判，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应该拒绝接受欧洲经济发展进程所昭示的发展模式的普遍意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在强调各民族经济发展的独特性的同时，又往往忽略了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即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发端于欧洲的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所确立的制度安排、规则选择等至今仍然起着主导作用。承认这一点，事实上也就是承认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至于欧洲国家的这种中心地位客观上是否合理，是否增进了整个人类的福利，那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需要专门加以探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关注站在时代发展最前列的国家或地区，把它们作为自己模仿的榜样和赶超的对象，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也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把欧洲视为现代世界经济发育和成长的中心因而予以充分注意，是无可厚非的，这种做法本身也并不一定就是“欧洲中心论”的体现。当然，对于由于欧洲经济发展优于其他地区而形成的欧洲种族优越论，以及书本中可能隐含的种种欧洲殖民倾向以及作者出于自身立场、观点等对历史事实的不同理解甚至曲解，是应该予以注意和批判的。

（五）

本书的中文版翻译可谓历经坎坷，备尝艰辛。早在 1998 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就斥巨资向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购买了《剑桥欧洲经济史》（八卷本）的中文版权，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王春法博士组织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方面则由卢元孝编审负责编辑事宜。双方在多次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严格的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在随后四年多的时间里，由于主译人员的调整及其工作岗位的变化，而且翻译及编辑加工的难度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致使译稿完成的时间一再延迟，以致在原定的2001年12月这个最终出版日期之前，我们不得不致函剑桥大学出版社，请求推迟出版时间，并得到了理解与慷慨允诺。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同行们，没有他们的理解与帮助，这样一项文化工程的命运是难以逆料的。同时，我们也要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参与这项工作的各位编辑，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这部著作是难以完成的；感谢各位主译人员，在市场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他们能够甘于寂寞，勇于承担起书稿翻译的重任，从而为中国学术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种精神又是何等的可贵！最后，我们还要特别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的领导，没有他们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气魄，这样一部宏大的经济史著作是不可能在中国面世的。目前，中国经济史学界正在经历一场声势浩大的“融入世界”运动，如果本书能够对此有所助益的话，则幸莫大焉。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们一直未放松对译稿质量的要求，但是，翻译出版这样一部大型的经济史著作，还是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比如说，原书所引文献涉及大小语种数以十计，古今雅俚，纷繁复杂，其中部分虽经多方努力而无法翻译者，只好照录存疑。又比如，由于本书所涉及人名、地名繁多，时间跨度甚大，个别人名、地名因卷而异的情况也恐难以避免。另外，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稿中其他错误也在所难免。所有这些都希望读者不吝指教，以期未来再版时加以改进。

王春法

2002年9月于北京

前　　言

新版《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基本上符合已故的马歇尔·波斯坦爵士的计划，而且大部分内容也在他生前得到认可。他的主要目标是对1952年第一版进行补充，第一版因受到完成时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环境的制约而有很多不足。其中最重要的几点包括：缺乏对东欧贸易的研究，缺乏对欧洲亚非贸易方面的研究，并且在"背景"主题中，缺乏对中世纪欧洲的铸币和通货的研究。这些空白现在得以填补。但波斯坦爵士计划中的特别重要的一章没能完成。他计划本卷应讨论中世纪的水陆运输，而且还希望能亲自撰写这一章，遗憾的是，他去世前未能如愿。由于出版准备耗时已久，仓促安排他人来完成先生的遗愿，势必进一步拖延本版的面世。因此最好的办法看来就是放弃，而更特殊的原因是有关贸易航线和航运的史实已经包含在有关主要贸易区的章节中了，并且通常以相当详细的方式被研讨过。

除在第一版基础上增补部分章节外，近年来考古知识的迅速积累告诉我们，有必要对从野蛮时代到罗马时代欧洲的贸易和工业做一番重新考察。本版对所有来自第一版的章节都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只有关于石材建筑的那一章例外。不可避免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在30多年前参加初版的编撰者都看到了这个新版本的问世。除马歇尔·波斯坦爵士外，第一版的作者像G.P.琼斯、R.S.洛佩斯、E.M.卡勒斯—威尔逊，还有戴维·L·克拉克都在这一版的准备过程中过世了。此外，对于其他提供和修改书目的作者，我们在卷首目录中都有标明，并在此致谢。本版的讨论范围扩展到东欧，这也产生了一些特定的问题。由于疆界的变化，

1945年后许多地名有了现在的通用名称，虽然它们的旧名更为大家熟悉。为清楚起见，在行文中有时把两个名称一并给出，索引也力图表明两者可以替代使用。

本卷的安排，像第一版一样，有些地方有重复，还有不少地方有交叉，但删掉它们却无疑会对作者的贡献造成损伤。再一次指出，和第一版一样，本版各章的作者之间在观点上存在诸多差异，编者也无意对此进行调和或掩盖。在这方面，这一卷反映了由马歇尔·波斯坦爵士在第一卷前言中简洁阐述过并自始至终坚持的编辑原则。“剑桥史是由那些值得尊敬的历史学家们的个人贡献汇总而成的，剑桥史编辑的整体宗旨，须将这种个人解释的差异视作理所当然。在经济史系列中，这些差异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史学家所利用的事实和理论比更古老更坚固的历史研究分支所用的事实更具有临时性。因此，权威牢驻的经济史版本非常少见……而由于少有成见，经济史的研究做得更好了，截然对立的观点间相互冲突的刺激，使近年的经济史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到现在的编辑接手时，本卷的编辑工作已进入了后期准备阶段。因此，在它的准备过程中得到了种种本书编辑所不直接了解的帮助，由于无法逐一列举，编辑只能在此一并致谢。另一方面，编辑也得到剑桥大学出版社同仁，尤其是威廉·戴维斯先生的慷慨帮助；最首要的还是要感谢辛西娅·波斯坦女士，她不仅对本卷的内容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为保证本卷出版的连续性提供了帮助。

E. M.

1986

目　录

图　　目

第一章

从野蛮欧洲到罗马时代的贸易和工业

1.1 绪　论

贸易和工业在欧洲大陆上的历史可持续追溯到最初生活在这里的原始人。那是在100万年前，当时的欧洲现在看来几乎无从认得：那里有着我们陌生的地貌、不同的气候以及奇异的动物和植被。在人类的知识和不断积累的经验中，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欧洲，欧洲是一系列变化的存在，它的每个环节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实际上，欧洲的环境是后期贸易和工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资源，而对欧洲环境的细致认识则是人们在欧洲各部分持续累积经验的结果，这些经验都毫无例外地被集体存储在欧洲居民的文化传统中。也许我们可以说，人类总体并未取得什么进展，欧洲也不过是以自己钟摆型的轨道绕之波动。不过，这显然并未道尽实情。为了使其分支能够融入不同的生存环境，人类的祖先不断地在生理上和文化上进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用以征服自然的那些物质的和社会的人选装备数量不断增加，人类也正是借此才得以使自身越来越多地摆脱了自然的束缚以及环境变动带来的影响。

初看起来，把对贸易和工业的考察追溯到智人时代（甚至人类是否形成正式的语言都还值得怀疑）似乎并不合适。但是，使用最原始工具的类人猿已经开始了复杂的经济活动——有对时间和角色做出详细分配的策略，以便把各种生存技巧和采集过程与为共同体提供食物和装备并确保其延续结合起来。即使在这种最早期的环境中，人类在反复使用一些特殊技巧开发利用各种原材料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在一定范围内收集、分配并进行商品交换。许多考古材料都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这些情况。

不过，以我们在当今环境中习惯了的非常特殊、非常模式化的方式来想[1]像人类共同体在古代社会对经济活动的关注和思考，确有不妥，这是错置时代之误。我们甚至可以大谈一群狒狒的经济战略，这无可厚非，但把经济战略这类观念赋予狒狒的活动很难说是明智之举，因为此类观念只是现代人类自身精神活动的特定产物。在分析古代欧洲社会的经济、细查它们的商品贸易或者手工业组织时，我们必须时时牢记不要用习惯了的对当代工业经济的特性和不对称性过于强调的短暂观点来回顾历史，以免造成对历史的曲解。正是这种文化上的曲解使我们把功能性和非功能性的交易极端化，把功利性的行为和仪式化的行为分开，最要命的是去虚假地探寻各种文化现象背后的“经济目的”，须知文化现象中各集团活动的目的本来像穗状花序一样是多层的。虽然愈是接近我们当前的时代，类似的曲解会变得愈少，但无论是在试图了解中世纪庄园经济，还是在对4 000年前的新石器村庄做类似的考察时，这种曲解作为一个扭曲的因素并没有两样。我们必须记住在其他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资源的开发、生产的过程、通过交换后的分配以及财富的观念，只是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信念，有意识地对这些活动的其他方面进行强调而已。这些限制其内部活动的文化模式是不同于我们的，因而那些活动也不能完全用我们自己熟悉的经济、贸易和工业观念来解释。

为了对古代欧洲的生产和交换的背景有个较准确的了解，我们必须十分仔细地利用近似人类学的模式而不是现代经济学所用的更正规的模式；实际上，利用动物行为学、社会人类学和经济学①诸模式混合而成的复合模式可

① 把人类学的方法运用于经济理论，参见G. 达尔顿（Dalton）主编的《部落和农民经济》（纽约，1967年）；R. 弗思（Firth）：《新西兰毛利人的经济》，第2版（惠灵顿，1959年）；D. 卡帕兰（Kaplan）：《经济考古学的形式和实体之争：对它的更广泛含义的反思》，《考古学西南月刊》，第24卷（1968），第228～251页。考古学的方法，参见D.L. 克拉克（Clarke）：《分析性考古学》（伦敦，1968年）和由他主编的《考古学的模式》（伦敦，1972年）；E.S. 希格斯（Higgs）主编的《经济史前史论文集》（剑桥，1972年）和《古代经济史》（剑桥，1975年）。【1】（注的尾码为英文版脚注序号，英文版脚注序号以章为单位。——译者注）

能是必要的。在头100万年的前3/4岁月中，欧洲类人猿的活动更适于用这种复合模式进行分析；在其余的25万年里，社会人类学能在更大程度上解释这些变化，剩下的千年，正规的经济因素将主导这种模式化的活动，但是三种因素仍然共存。在这些因素之中，我们应该恰当地加入偶然的和随机的成分，它是任何现实的解释模式必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方法表明，用现代的术语对古代的行为作一个预言性的类比未必就不合适——它说明了这种潜能——用现代经济学的数学分析方法对原始经济进行分析也不是完全不合适。这些手段只不过表明古代活动的哪些方面能让我们现代人的心智较快地掌握，与此同时，确立另外一些不可简化的方面，对它们的解释必须寻找在这个环境中的其他因素。我们所能做的是尽可能地把史前的数据延伸到一个由行为、文化、经济和随机的模式组合而成的理论框架中去，轮流用其中的一个因素去控制其他的因素，由此找出在某一特定的环境下最能胜任的模式，并且从模式之间的差异中学到一些东西——这是一种智力回归的分析方法。 [2]

既然我们对当代的工业和贸易理论十分熟悉，因此所需做的主要是扩展其中的某些方面，使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这些行为的要素能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不是说我们的文化网络和结构与古代欧洲有着实质性的差异，惟一的不同可能在于联结方式选择的重点差别明显。在人类社会中，人们过去和现在的分布都由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网和叠加其上的社会关系网联结而成。亲属集团可以合作生产、分配和消费商品，或者在其他的活动中联手。然而与此同时，单个的成员与非血缘关系的集团因年龄背景、社会地位、娱乐伙伴、礼仪团体、宗教组织、军事团队、政治派别、交易伙伴不同而发生各不相同的相互联系。所有这些相互联系的网络在人口数量有限的人群里具有扩展互惠性特殊义务关系的作用。生产和消费可以在这个网络中得以控制，饥荒和自然灾害可以通过合作去克服，新的优势可以通过与其他人共享发展成果而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在社会地位和声望方面也是互惠互利的。内部的冲突倾向于消解不同派别之间形成的一些关系，因此，有利害关系的旁观者会缩小和修补这种破裂的关系。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经济活动和交易伙伴关系是社会、宗教、心理和物质文化关系的组成部分，并且后面的这些因素从来不曾与假定的“纯粹”经济考虑分开过。 [3]

对社会义务的静态网络的分析就说这些，但文化是一个具有变动不居的内容和不断变化的内外关系的动态系统，其活力的很大部分是与商品在系统内的流通紧密相关的，同时，任何时候这个社会网络中个体间的关系，是与商品在这段时期内的分配状况相联系的。文化系统以许多方式涉及在由社会

组织控制的分配流内的商品流通。比如，在大多数共同体内，个人在社区里每日、每周、每月、每季、每年和生命周期活动的主要规范被恰当的仪式有选择但鲜明地显示出来。在这种仪式中，特定的商品以连续的周期消费、制造并散布开来，比如赠与生日礼物、老人和有社会地位的人士的徽章、成人象征、彩礼、嫁妆、婚宴、礼物交换、宗教牺牲和捐赠、公共税收和丧葬必需品等。在这种条件下，商品的消费和展示有着明显的向外交流的意义，不仅仅有严格意义上的功利目的，还有许多其他的目的；特别是以一种复杂的象征主义的形式来重申个人在当时社会网络中的相互等级、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这是一种修饰过的长幼强弱顺序。这种其价值在于象征性装饰的商品种类繁多，可供人们进行独特的随机的选择。但是在一个社会地位和名望关系构成的复杂组织中，对相互角色的持续定义、维持和实现甚至在最现代的经济活动中也是一个问题。

被一个社会所认可的任意的交换单位，是在一个品类更多的商品流通系列中被选择出来的特别一部分重要商品的子系列。有些商品可以向任何方向自由流通，其中那些最受欢迎的产品被选出来作为交易媒介——它是耐用的商品，并且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但它并非稀缺和变化不定到不能通过社会组织维持稳定流通的程度。这些交换单位可以是实用的、可消费的或不可消费的人造的或天然的物品：最受欢迎的商品是贝壳、牙齿、长牙、毛皮、羽毛、皮革、珍珠、手镯、(动物或鸟) 颈部的彩色毛圈、金属块、斧头、蒲席、织物；可消费的物品比如猪、牛、羊、烟草、盐、山药、香蕉和谷物。【4】用食物作为交换媒介乍一看有点奇怪，但是它们非常耐用而且只是在绝对必须时才消费；从这方面来说，活跃的食物交易与营养需求可能没有本质的联系。新石器时代酋长的谷仓，斯基台人王公的马群，凯尔特贵族的牛群和米诺斯统治者的橄榄油库，这些不仅是潜在的食物而且代表实际的资本财富。①

但是，除了用于自由流通和作为交换媒介的商品外，还有第三类商品，它是绝不能作为交换媒介的——它是特定阶层或精英人物的象征性标志，通常是精雕细刻工艺繁复的手工艺品（显然花费了大量劳动力、剩余食物、珍稀资源和材料）。这些很奇特的象征身份的物品的存在——不能通过自由交换而获得——构筑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屏障，使得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不管多么

① J. G. D. 克拉克：《石斧和扁刃的交易》，载《经济史评论》第 2 套丛书，第 18 卷（1965 年），第 1～28 页；克拉克：《分析考古学》，第 94～95 页；T. G. 哈丁（Harding）：《维蒂亚兹海峡旅行记：对新几内亚贸易系统的一个考察》，载《美国人种学协会专论集》（西雅图，1967 年），第 44 页。【2】

富有都不能“买到”它们。但是，名望地位本身，不管是由严格规定的标志来象征，还是由普通物品的大量盈余来显示，都有能力发挥它的影响，而且一般说来是社会权力的源泉。在所有的社会，名望和地位都是一种可变现的商品，是一种资本形式，因为它可以赢得借贷，也可以赢得对探险活动的资助和义务以及条约的担保。新几内亚的“大人”依靠对进口雄性野猪牙和新月形贝壳的贮藏，不仅显示了他的地位并赢得与之相称的尊重，而且也是他赢得归顺者、术士和船主为其服务的手段。欧洲青铜器时代早期的奥恩贾蒂兹酋长（Aunjetitz chiefdoms）也同样凭借大量占有进口的琥珀块、彩陶珠子、青铜锭和武器来赢得对他社会地位的认可和获得专业人士充作随员，而且迈锡尼王公也依靠他的财富来获得村民对他的顺从并为他的投机买卖所用的昂贵器械和设备作担保。

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人类学模型勾画出了广泛存在的“库拉（kula）”①贸易圈的交易方式，其中物品流通的主体是一些有助于增加交换伙伴在当地的地位和能够加强他们的伙伴关系的珍奇但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同时差不多是附带地偶尔促进了某些“实用”物品的额外流通。总之，我们注意到在欧洲最古老的社会里某些商品被交换，原材料被以特殊的技术定期开发，[5]但是这些活动的背景与我们用贸易和工业这些词语来思考并对它们做出推断的背景有很大不同。毋庸惊讶，我们发现各种商品在史前欧洲的广阔地域中流通，但它们的流通并不是由个人进行的长途跋涉完成的，涉及的倒不是有经济“效用”的商品，而是装饰性的小玩意儿或炫耀性的武器。在这种背景下，与我们关于实用贸易的观点更相一致的商品也在生产和流通，而且对这些后来成为交换媒介商品的清晰记忆使得它们在欧洲的词汇中得以保存——盐（薪金），一把铁屑（古希腊货币系统德拉克马），铁锭（罗马人和意大利其他各族人民使用的一种笨重的青铜铸币，以阿斯作为价值单位），牛（金钱的），土地（费用），谷物。但是这些“有用”的商品仅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它们也几乎不能成为现有交换系统形成的原因。

因此，在野蛮时代，欧洲的贸易和工业的历史基本上变成了我们难以认识的活动的历史。按照人类学的分析模式，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从属于文化的恰当功能，其运作仅是为了满足自身基本需要。按现代经济模式，社会被特意重构以使其经济部门发展到极至——这种重组常常对该社会的大部分人造成伤害，但是对其他人显然有利。单单这一方面就应该足以使我们抵制下面

① 土著语。美拉尼西亚群岛东南部特罗布里恩德岛居民的交易制度。——译者注

一种颇具诱惑力的观点，即把从人类社会从原始的安排到现代结构转型看做一个稳定的、简单的、向前且向上的、每个阶段前后相连的单向进化过程，也应该足以帮助我们抵制住把欧洲经济史写成如下方式的强大诱惑：耕作的村民代替了猎人，金属代替了石器技术，剩余物供养城市，城市国家变成了民族国家，与此同时矿井挖得越来越深，社会变得越来越好。唉，由于来自考古学的信息是如此独特，如此难以理解，在这种夸张的勾勒和本章内容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欧洲经济发展的道路比任何可能提出的形式都要复杂和不平衡得多。欧洲一直是一个居民有着很大差异，土壤、道路、发展的障碍物、动植物和气候方面错杂纷呈和由各种相互交叉的宏观和微观环境组成的错综复杂的地区。在最粗浅的层次上，我们将反复比较地中海地区和温暖的中欧和针叶林的北欧的不同发展模式——这种比较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类人猿和灵长类【6】动物原始的定居需求。欧洲的文化发展和多元化遵循一种相互交叉的多样化类型，它是与大陆的差异性相适应的。经济的发展既是互相作用的也是累积的，既是不连续的也是分散的，既是波动的也是趋同的。以前的发展中心周期性地成为边缘，边缘又成为中心；旧时的遗存突然成为新的发展的有利基础，繁复的经济模式周期性地暴露出它对进一步发展的无能为力。这种模式是一再呈网状发展的模式（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在许多方向上寻求发展）中的一种；我们充其量只能追踪某些经济变革和贸易条件的不同发展轨迹，指明它们尤其是对局部的但却是决定性的临界点所做的持续贡献。

众所周知，复杂系统的特性是，不相关因素的持续引入和积累会接近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临界点，系统本身就不能毫无改变地存在下去。与此同时，把新的要素或条件引入这样的环境，将导致不能预料的结果或能力——新的发展潜能——的出现。现在，我们大致可将史前欧洲的文化系统视为被锁定在与其他不断变化的社会及不断变化的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中的一些动态的信息和活动系统。这些系统各自的社会的、经济的、宗教的和心理的结构肯定差异巨大，但它们却都是在各自的地域环境内有着众多网络联系的复杂系统。因此，一点也不奇怪的是，在史前欧洲的经济发展模式中能够辨认出某些明显的临界点，这些临界点在很大程度上暗示了贸易和工业的成长。①

这些在考古记录中被推定存在的临界点可以通过一系列要素的共现得以证实，不过，这些要素既不能在单个时点上共现，也未能在全欧洲的地理范

① 克拉克：《分析考古学》，第77~81页。【3】

围内共现。单个的要素必然有先前的发展轨迹，它是不断引进和整合这些要素和条件的累积结果，这些要素和条件共同标志着让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新经济能力的出现。虽然这种新经济能力最初通常局限于地中海地区，但是同期许多这样的持续再生系统随后产生的回振在大陆越来越广阔的范围内都能感觉到。这些用以共同确定广义上的经济临界点存在的要素，必然包括许多不 [7] 同的方面——环境的、社会的、宗教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技术的。正是这样一个由不断变化的因素组成的复合体所具有的十分丰富的多样性，才使得它们不断得到强化的影响更为有力。不幸的是，考古记录给予我们的仅是关于这些具体影响的没有规律的信息，并且在某些重要方面根本就没有信息。考古学家仍然特别倾向于忽视当时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因素——事物如何成为它们现在的样子，这对进一步发展的限制性影响，以及由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或军事的领导人掌控局势而带来的有利影响和灾难性后果——所起的催化作用的重要性。

下面，我们将以这些临界点为依据把欧洲经济发展的过程划为若干阶段。当然，临界点的选择是依据当前我们对贸易和工业的兴趣来确定的。我们对后期临界点的了解要比前期那些详细得多，因为有更丰富的考古材料和大量当时的文字记载。对于后来的时期，我们会多少有些力不从心地试图去评估在早期显然被遗漏的政治和历史因素。相反，旧石器时代在时间上是那样漫长，环境差异是那么大，而我们所了解的却是那么少，它在经济记载中作为无特征的独块巨石出现，它主要是我们无知的一个纪念碑，并且在研究中总是被我们以尽可能短的空间内以极快的速度被掠过。然而，对那样一个漫长的和变化万千的时代，把它的经济或社会设想为同一的，或是认为它缺乏变化，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发展速度的加快似乎并不完全是一种幻觉——类人猿数量的增加，人工制品的种类、对环境的控制和政治单位规模的呈指数级数增长，就是这一特征的明确显示。但是，我们必须再次记住这个总趋势是由许多动荡的、波动的和不连贯的单个文化的发展组成的；没有一个群体的发展始终居于这条发展曲线之巅，实际上，处于发展高峰的中心地区的不断转换是引起我们分析兴趣的特点之一。

我们用以界定这些临界点的各种要素及其累积影响将在每个被粗糙界定的时间段的开始处做出简要勾勒。与这些过渡性临界点相关的日期仅是以与欧洲有关的碳辐射检测数据为基础的一个粗略的指示器；必须仔细地把它们与相邻地区，特别是南部和东方更早出现的类似的临界点和要素相区别。

这样，最有意义的临界点可以用来界定出六个前后连接的时期，在每个 [8]

不同的时期，欧洲的经济模式以及相关的贸易、技术和工业潜能可以大致确定为：

1. 约公元前 100 万 ~ 前 6000 年：　采集和渔猎经济；
2. 约公元前 6000 ~ 前 2000 年：　农耕经济；
3. 约公元前 2000 ~ 前 1400 年：　爱琴海网络和早期青铜技术时代；
4. 约公元前 1400 ~ 前 1200 年：　迈锡尼网络和发达的青铜技术时代；
5. 约公元前 1200 ~ 前 600 年：　殖民网络和晚期青铜技术时代；
6. 约公元前 600 ~ 0 年：　殖民帝国和前工业铁技术时代。

1.2 采集—狩猎—捕鱼经济：约公元前 100 万 ~ 前 6000 年①

欧洲人类社会的开端被弄得越来越复杂，一方面这是由于“人类”一词的不确定特性；另一方面是由于自然人类学家现在想要了解的这些生物的马赛克似的长期进化，即使在欧洲也是这样。现在似乎更有可能确认地中海欧洲确实处在最早的类人猿发展范围内——这样也就强调了将欧洲内地和地中海北岸区划分开来的这条重要的生态边界。几种最早的高级直立猿，也就是我们所知的最早的原始人，现在可以追溯到中新世的晚期，即公元前 1000 万年，当时已在地球的中纬度上广泛分布，活动在从地中海和非洲到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的广大地带。这些原始人中的大部分已发展到双足能走路，双手能自由地活动，也许常常利用未加工的木棍和石头作为击落水果和坚果、挖掘根茎以及杀死昆虫和小动物的工具；这些能力甚至处于今天的许多现代猿猴的能力范围之内。

早期原始人集中分布在中纬度地带并非出于偶然——地球的中纬度是植物生长最繁茂的地区，是太阳光和光合作用最多的地区。动植物的丰富提供【9】了一个多样化的非常适于生存的生态小环境——从树林顶端到地表之下，从热带草原到山区草地，大量种类庞杂的早期“猩猩科类人猿（pongid）”和原始人群体曾利用这些环境生存，这一地带栖息环境的多样性由此可见一斑。早期原

① 有关总体研究，参见 F. 波德斯（Bordes）的《旧石器时代》（伦敦，1968 年）；J. M. 科勒斯（Coles）和 E. S. 希格斯的《早期人类的考古学》（伦敦，1969 年）。有关环境和生存方面的证据，参见 K. 巴策（Butzer）：《环境和考古学》第 2 版（芝加哥，1971 年）。至于类人猿的进化，可以参见 D. 皮尔比姆（Pilbeam）的《人类的崛起》（纽约，1972 年）。【4】

始人的牙齿和头盖骨的结构同样反映了它们对这些多元资源的灵活追求，这些资源提供的是一种杂食性的食物结构，不过对植物类还是有所侧重——主要是叶子、嫩芽、根、水果、种子、坚果、昆虫和小动物。这些食物能被前臂能抓能握的五指送到嘴里，由还不专业的犬牙包住使之不掉出来，由门牙撕咬，并由有力的、结构相对简单的臼齿来充分地咀嚼。人类早期的工具包括手和脚，有指甲的手指和脚趾以及有着各种功能的嘴。人类最初的手工制品在许多方面是对这些自身的和遗传的生存工具的简单的物质性的模仿和扩展。

由原始人化石提供的考古资料证据与这种食物结构类型并不冲突，尽管在原始人的食物中，肉的质量和重要性还不确定。许多学科的调查表明，肉的重要性比我们想像的要小，尽管它是原始人食物中一个重要的和经常的组成部分，但是它的量从没有占大部分也没有占主要地位。对现代的饮食结构所做的观察表明，在中纬度地区，种类繁多的可食用植物构成了人和猿类食物的主体；只是在靠近北冰洋和南极洲的地区，由于光合作用弱植物类成分不足，动物和海洋食物才主导了人类的饮食，并代替了驯鹿（deer）肚里和苔藓和鱼类食道里的浮游生物。

在一些“大宰杀（big kill）”的遗址，我们可以看到，在被肢解的大型食草动物骨架周围散乱丢弃着各式各样的石制宰杀工具。这类考古证据很容易给人以误导。我们必须考虑到还有一些其他的证据，如蔬菜、木头和编篮等，尽管它们已经因腐烂而消失。为获得蔬菜和昆虫食物，除了手、牙齿和少量的木棒和利器外基本上不要更好的工具，然而为了屠杀、去皮、取内脏、宰割和对动物尸体做其他加工——特别是对付大野兽——就必须使用一系列专用的人造石制工具。其他的证据也一起表明，人造石具与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之间的关联是不对称的，它更多地反映了捕获、宰割和进一步的工具制造情况，而原始人活动的主要内容——对叶子、茎、根、水果、种子、坚果、昆虫、老鼠、蛇、蜥蜴更为持久和强烈的需求，即使有，也很少能够通过石制工具的留存情况反映出来。【10】

综合上述两方面做出一个均衡的估计很是不易。现在，依然从事采集—狩猎—捕鱼活动的部落只残存在一些自然环境非常特殊的边缘地带；并且，对肉、捕猎技巧和家畜数量在“文明”意义上的强调通常又与其在相关文明饮食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殊无相称。这两类状况的存在都使恰当平衡的估计工作变得更为困难。但是，人类粪便的化石和少量残存的木制挖掘棒、收割用的弯钩（crooks，harvesting）和棍棒这一系列证据再加上早期的具有广泛用途的手镐的设计都表明，挖掘比大规模的捕猎更有可能是原始人正常的职

业。为了矫正这个长期以来的错误，我们将采用采集—狩猎—捕鱼者这个名词，而不是传统的错误的归类狩猎—捕鱼—采集者一词，因为它对狩猎的过分强调是有问题的。①

工具的利用，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原始材料细致入微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像旁遮普的腊玛古猿那样分布广泛的中新世晚期的原始人。但是，手工工具的制造——它需要大脑有更大程度的符号处理能力和预测力——也许发展得更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天然工具的改进。到更新世的早期，约公元前100万年，许多土著的非洲人已习惯用双脚走路，除了脑容量和大脑结构的复杂性有所发展外，他们更少地用专门的颚，在手的结构方面也有了一些改进；这些变化完全可能是与工具制造的广泛发展同时出现的。澳洲土著人有可能部分地在欧洲的地中海进化，虽然主要是在这一地区的南端。被认为是澳洲土著人的石器在地中海地区的多处地点被发掘来，其中包括地中海岸的罗克普伦—盖普—马丁的瓦朗特洞、意大利（Italy）的蒙特—比格利亚，可能还出现在罗马尼亚和西班牙的一些遗址中。但是，在更新世时代的中期，也就是在约公元前60万年，直立智人的种群已进化到几乎与当代的智人难分上下。可能正是直立的智人首先成功地渗入了欧洲内地，从地中海【11】和黑海的海滨开始到达外围的不列颠（Britain）、德意志（Germany）、法兰西（France）和匈牙利（Hungary），从而开始了对周边环境的渗透。

对“欧洲外围”的渗透主要受冰川时代（Ice Age）——即约公元前100万~前1万年——气候的周期性变动的影响。冰川世纪持续了几十万年左右，它使“类地中海”环境深深渗入中欧。木兰在藤蔓缠绕的山毛榉和角树的混合林中开花，大象、河马和犀牛悄悄地侵入弱小的像狒狒样身材的澳大利亚土著小矮人的领地，但是不久，这里就成为有着更加复杂的手工工具和标枪箭镞的健壮的直立智人的捕猎区域了。

在这个时期以及同样漫长的冰川期中，北方冰冠的扩大和冰川向阿尔卑斯山的聚合，使得周围环境的不断变冷，欧洲中纬度地区类人猿的“自然居住区”逐渐南移。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浑身长满毛的犀牛和驯

① 对现代狩猎者和采集者的考察，可参见M. G. 比切里（Bicchieri）主编的《今日狩猎者和采集者》（纽约，1972年）；M. A. 乔奇姆（Jochim）：《狩猎采集者的生存和定居》（纽约，1976年）；R. B. 李（Lee）和I. 德沃（Devore）主编的《人类和采集者》（芝加哥，1968年）。以另一种眼光看种植食物的意义，可参见D. L. 克拉克的《新石器时代的欧洲：它的经济基础》，收录于G. 德（de）、G. 西夫金（Sieveking）等的《经济和社会考古学的问题》（伦敦，1976年），第449~481页；C. 维塔·芬泽（Vita-Finzi）和E. S. 希格斯的《巴勒斯坦的卡梅尔高原的史前经济：集水盆地的遗址分析》，载《史前社会专刊》，第36卷（1970年），第1~37页。【5】

鹿在吃草，而麝香鹿踩在覆盖着苔藓的霜雪覆盖的冻土带上，或者踩碎了小短柳树、极地桦树和矮松树；在温暖的地区，野牛和马群穿过零星地点缀着树木的大草原，迅速地迁徙。在这些严寒的时期内，至少在最初，原始人似乎已经撤退到地中海岸边了，缩在他们传统的居住生态环境中，把欧洲内地放弃给了新的居民。后来，在里斯冰川末期即约公元前20万年，以及整个沃姆冰川（Würm glaciation）时期即约公元前8万~1万年，矮小的原始人社区第一次成功地开发了陌生的北欧冰带南部的冰土环境。在这些边境社区中，狩猎活动肯定起着一个非同寻常的作用。对微观环境的灵活控制、利用皮袄、使用火、遮了帐篷的公用壕洞、掩护起来的洞穴，所有这一切使得他们在不那么严酷的气候区，如比较适合居住的大西洋沿岸的法兰西和冰川边缘的波兰，存活下来。对草原和冻土地带耕作上的适应，包括利用裁制的毛皮衣服，最终帮助更新世晚期的原始人渡过了沃姆冰期，并在原居住地也就是中欧存活了下来。实际上不管到哪儿，他们再也不怕冻了。原始人最终突破了限制他们定居区的生态界限（ecological threshold），利用同样的手段，他们随后能超越任何边界——靠的同样是耕作带给他们的适应能力。

在约公元前4万年的沃姆冰期的间冰段，智人最先作为一个发达的直立类人猿在近东和东欧出现。考古资料告诉我们，相伴而来的还有一个被广泛【12】传播的技术转变过程，即从靠片状光滑石块起火到靠石块的坚刃起火——这种坚刃可以装在组合工具中。但是这些发展花了几千年才实现，而且许多伴随着智人的“发明”早有先例。骨头、鹿角，可能还有木材手工制品被集中在一起生产，但是这些东西都早已被站立的类人猿用过；丧礼仪式使用红赭石、食物和器具成为一个惯例，但长期居于洞穴的智人也使用它们；大规模的集体捕获大型食草动物被组织起来，但是自阿舍利时代（Acheulean times）以来已被经常实行；油漆雕刻艺术已经十分繁盛，但是很久以来就运用于木器上和用动物毛皮做的帐篷的墙上，就如匈牙利塔塔地区的穆斯利亚人那些上漆并雕刻了的器物所显示的一样。① 几乎毫无疑问，智人已能够使用正式的语言进行沟通，但即使是这种发展，也可能追溯到直立的类人猿出现之时。只是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加强，对偶然事件记录的保存，我们自己的种族优越感和在少数几个地区发现的极端本地化但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组织证据组合在一起，才使我们不恰当地强调从居于洞穴里的智人向一般智人过渡的意义。但是，旧石器早期标志着各种原始人基因差异的出现，这些差

① 波德斯：《旧石器时代》，第110页。【6】

异即使在现代人类的不同人种间都依然存在。

原始人的群体组织——也许在百万年前，或者在更新世时期——可能伴随着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环境也是这些组织发生周期性波动的背景。各类不同的种群随着后期类人猿的发展进一步出现差异，尤其伴随边缘群体对陌生生存环境（比如对地中海北岸欧洲温和的森林、草原和冻土地带）的成功适应变得尤为明显。除了在非常有利的滨海地区，或许还包括地中海海滨，不同种群为了在一年中轮流地利用季节性的收获物，必然沿着大面积的领土做周期性的迁徙。那样的社区在社会组织、职能分配、经济战略、领土面积、轮种计划等方面都有差异，不仅数量上有从几十到成百【13】上千的差异，社区与社区之间、季节和季节之间也有差异。有可能在资源更丰富的地区和季节，血缘社区能暂时地聚集在一起，形成有着非常发达而且精细的社会组织的巨大部落。但是这毕竟是不寻常的情况，虽然它们似乎时不时地在多多涅、乌克兰、中欧和地中海欧洲一两个环境适合的地区盛行。因此，一点也不奇怪的是，人们能够在这些有利的地区和时期内找到许多标志着官衔、名望的饰物和摆设用的器具和商品，因而也就可以发现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关于珍稀和吸引人的物质和资源的交换系统。

成百上千的海贝、动物的牙齿、野猪的长牙、化石和象牙片都被打了孔缝在或缀在精英人物的帽子或衣服上，或者串成弦月形间隔非常整齐的盘状项链绕在权威人物用毛皮裹着的肩上。受他约束的成员也一样通过复杂的装饰物和精心制做的骨头，也许还有各种木制的长矛和棍棒，来显示他们的职位或官衔；这是自己社区内重要的手工制品的极端精致的翻版。各种色彩斑斓的石头被收集起来，人们也注意到了它们的产地——包括琥珀、辉绿石、色彩绚丽的碧石和石英晶体，还有红、黄、黑赭石。在华丽的皮衣或羽毛上装饰贝壳和牙齿，脸被涂成了十分鲜丽的红色或黄色，这些旧石器时代晚期和马格达林时代的狩猎酋长和巫师，在执行仪式时，必定以一种能给人留下鲜明印象的装扮出现，因为他们要靠这些仪式传播人与自然世界关系的观念并使之神圣化。

地中海和黑海的贝壳被运到几百英里外的乌克兰旧石器晚期遗址所在地，并运到匈牙利的穆斯特利亚遗址、法兰西奥瑞纳和梭鲁特遗址。法兰西南部马格达林时期文化社区的人们特别多地穿着打孔的海贝制作的华丽服饰——这些海贝主要是从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带来的象牙贝、浮游生物贝、轴状贝、牵牛花贝和海菊贝。实用型的商品也在同样有限的领土范围内流通。手工制品所需要的独特的理想的硅石原材料通常专门从特定的地层和产地获

得。斯洛伐克（Czechoslavakia）的黑曜石和放射虫类化石，在比如波兰的奥瑞纳和茨温齐内克，都有使用。从维斯图拉河中部斯文切乔恩采来的片状白色燧火石，在奥瑞纳和塞勒廷恩时代，在半径约120英里范围内被广泛运用。从西里西亚（Cilicia）来的波罗的海燧火石被摩拉瓦亚旧石器晚期的部落所用，在离通往南方的喀尔巴阡山山口100英里以远的冬季遗址上也可以找到。从施蒂里亚的焦油井中挖出来的沥青（bitumen）在中欧被广泛地用于制作工具柄和防水。匈牙利的穆斯特利亚和奥瑞纳遗址，比如在巴拉沃尔吉尔和克克斯格尔吉尔发现的黑曜石，似乎采自100英里以外的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 Mountains）的黑吉尔利亚矿层中。大普雷斯格莱（Grand Pressigny）燧火石在法兰西的奥瑞纳和格雷维特亚时期的社区中广泛分布。① 因此很显然，欧洲的石头和燧火石已在特定的范围内为人熟知；我们也可以设想对这一时期的主要技术所需的原材料也是如此。肯定无疑的是，其他功能的商品也在同样有限的程度内流通——冰冻地带狩猎所获的毛皮和羽毛，大草原野兽身上的毛皮、角、鹿角，木材、树皮，还有木头架上的树脂。 [14]

从残存的贝壳、颜料和特殊石头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当时出现了一种持续进行的交易模式——这些物品的分布通常局限在半径不超过100英里的范围内，经常比这要小得多，只有极少数例外。这有力地说明，必须将原材料和商品的运动置于流动的采集—狩猎—捕鱼群落（band）的环境下，这些群落每年肯定沿着他们广阔领土上的生态圈移动。在这样的条件下，一种资源或采石场的产品的分布地点，通常很可能同时又是连续性地作为许多部落边境领土交叉的中心点，而且群落本身有可能在一年的不同季节里开发这些资源。既然范围为以120英里为半径的采集—狩猎—捕鱼的领土对这种最新的群落而言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那么在旧石器的欧洲发现这种类似大小的资源分配单元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在更广分配范围内进行交易的案例极少，它们基本上可以被解释为边境上的礼物交换和几个领土交叉的群落对公共资源的同时也是连续性的开采。根据这个简单的模式，后者因此能够成为一个以240英里为半径的分配单元——在这方面可能与从多瑙河到乌克兰的喀尔巴阡山黑曜石的分布情形相吻合。

就领土模式而言，我们也许能区别从加龙河（Garonne）迁到比利牛斯山的群落，他们春天随着野牛迁徙，秋季回来的时候带着从伊斯托利兹采来

① J. G. D. 克拉克：《史前欧洲》（伦敦，1952年），第182～183页；K. 贾兹泽维斯基（Jazdzewski）：《波兰》（伦敦，1965年），第37～47页；L. 维特斯（Vertes）：《匈牙利的莫斯特文化》，载《更新世与现代》，第10期（1959年），第21～40页。【7】

的辉绿岩和矿产。其他的群落总是从多尔多涅流域（Dordogne，valley）向西到达大西洋岸边去捕鱼和海豹，回来时带着毛皮、贝壳和橙黄色的用脊椎骨穿成的珠子；有些群落则尾随北方的兽群在春天迁徙到北方的卢瓦河、巴【15】黎盆地的新鲜草场和东部的奥弗涅（Auvergne）高地——回来时带着巴黎出产的化石贝壳、普雷斯格莱的大燧火石和来自奥弗涅岩石上色彩斑驳的赭石。有可能，其他集中于地中海岸的群落总是带着海贝向北进入多多格恩以北的塞文山脉（Cevennes），他们也许在春秋时节从在地中海冬季基地出发的。① 摩拉瓦亚人差不多也有相同的模式，春季他们向北跋涉到西里西亚平原，带去捷克的打火石、斯提尔人的沥青和匈牙利的黑曜石制品，秋天回来的时候穿过摩拉瓦亚门，带的是波罗的海的燧火石、琥珀块和北方的毛皮。

通过这种方式，采集—狩猎—捕鱼群落总是在他们的领土上来回移动，以固定的周期来连续利用那里的物质和生物资源，并且随着可供利用的资源的季节性变化以一种有节奏的家庭分散和聚合的方式改变着群落的结构和规模。几乎是偶然的，原材料和商品总是在某些特定地点进行收集，并伴随着或在家族群落的年度迁徙中流通；或许时不时的，有些商品可以通过与他们边界上其他群落的交换得来，其中绝大多数是以礼品交换的形式进行，部分是象征性的商品，部分是有用的外地商品。很自然地，它们是那样的珍贵、色彩鲜艳和奇特，以至于精英人物首先要把它们作为象征和标识他们社会地位和职务的一部分进行珍藏和展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喜爱的商品的长距离流动总是直接受到更烦琐的礼仪和社会地位角色的驱使，而这些礼仪和社会地位角色是较为先进地区的经济所能够支持的——酋长和副酋长、家族首领、狩猎首领、巫师和精神医生、部落的官员和有技术的准专家，这使他们在多多格恩、摩拉瓦亚和乌克兰部落聚会时处于有利的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然资源丰富的领土能够支持起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结构，它有着异常丰富的社会分层，每个头衔都有着特征鲜明的徽标，所有这【16】些一起刺激了为满足他们需求的礼品交换系统。②

---

① A. 勒诺伊—古尔汉（Leroi-Gourhan）："Les Fouilles d'Aroy-sur-Cure(Yonne)"，载 Gallia Préhistoire，第4期（1961年），第3～16页；P. 莫顿（Mouton）和 R. 乔夫约（Joffroy）："Les Gisements Aurignaciens des Rois à Mouthiers（夏朗德）"，Gallia，附录 IX（1958年）；L. 普雷德尔（Pradel）："La Grotte Périgordienne et Aurignacienne du Fontenioux, commune de Saint-Pierre-de-Maillé（维埃纳）"，《法兰西史前史学会公报》，第49期（1952），第413～432页。关于最近的讨论参见 P. G. 巴恩（Bahn）：《冰川后期法国西南部的季节性移民》，载《考古学杂志》，第4卷（1977年），第245～257页。【8】

② 作者在准备写作本节旧石器时代商品的过程中得到了保罗·维尔金森的帮助，听取了他的建议，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9】

1.3　农耕经济：约公元前6000～前2000年[1]

后冰川时期即约公元前10000～前6000年的条件，重新给中欧和北欧带来了森林覆盖的景观，茂密的植被代替了草地、大草原、冻土带和在其中生长的大型食草动物，与这种环境相联系的则是小规模的分散狩猎。采集—狩猎—捕鱼群落对这些变化的反应是他们在社会结构和经济方面更加分散和更低程度的专业化——灵巧的个人以弓箭追猎森林中的鹿，代替了群体公共的围猎和野外的矛和投枪的技巧。在地中海欧洲，这些后冰川时期的改变并不是太剧烈，实际上，几乎无法觉察外部世界正在朝一个更干燥的气候条件变化的普遍趋势，也觉察不到边缘山区和高地地区的波动。因此，地中海的采集—狩猎—捕鱼者显示出对旧石器时代和相互联系的中石器时代技术的显著延续性，这些技术在地中海岸的有利地带还在大量地使用着。

标志着欧洲最早的简单农业经济的建立的分水岭是我们将要讨论的一系列事件和变化的综合。采集—狩猎—捕鱼仍然与以前一样在生机勃勃地进行，它们都超出了农业定居者的活动边界，实际上成为农业社区中重要的亚文化活动。石器技术仍是手工工具制造的基础，欧洲旧石器时代的主要资源分布地图仍然是开发的主要框架；在每一个地方，土著的采集—狩猎—捕鱼群体的延续性在某种程度上都能被证实。

但是，从公元前第七个千年开始，南欧不断地与新的社会文化单元融合，它们逐渐地重新形成大部分欧洲人的社会、经济、宗教和心理的结构类型。约公元前6000～前4000年这2 000年内，农民从森林覆盖的欧洲的一边，边砍伐边燃烧，不断地开辟道路到了另一边。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分布着网状的村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史无前例的，除了大陆上一些非常适合于土著生活的领地外——在那里，经济稳定和潜力是无可比拟的。人口分布的基础是谷物农业，它有家畜饲养的支持并像从前一样从采集—狩猎—捕鱼获得平衡；烧毁森林所用的石锛和火、鹿角和鹤嘴锄、陶碗和储存用的坛子是这个时期的主要手工制品。斯堪的纳维亚冰冠的逐渐退化和它周边冰 【17】

---

① 综合性研究，参见S. 皮戈特（Piggott）的《古代欧洲》（爱丁堡，1965年）的第2章；A. C. 雷弗鲁（Renfrew）：《前文明时代》（伦敦，1973年）；H. T. 沃特博尔克（Waterbook）：《史前欧洲的食物生产》，载《科学》，第162期（1968年），第1093～1102页；D. 科林斯（Collins）：《欧洲的起源》（伦敦，1975年）。【10】

川气候系统的逐渐消失为欧洲新发展的分水岭提供了一个背景。随之而来的在冰川时期之后的理想期在地中海以北的欧洲迎来了一个大西洋气候阶段——一个温暖、湿润的时期，年平均温度大约为2℃ ~2.5℃，比流行并持续了差不多3 000年——约公元前5000 ~ 前2000年——的气温要高。这段理想的温暖期大致在约公元前4000 ~ 前3000年，带来了包括橡树、榆树、宜母子树和赤杨混合的高潮期，几乎没有中断地从喀尔巴阡山延伸至北海，中间只是偶尔地被主要河流系统和阿尔卑斯山蜿蜒的大道所遮断。

农业边疆从地中海岸边向北部针叶林边缘的扩展，对随后的欧洲经济发展而言，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过程。这个新的复杂的经济战略序列中的独立因素从最初出现的地方进一步向东扩展——像一个椭圆形的球，包括了安纳托利亚（Anatolia）和伊朗高原。① 这两个中纬度的巨大高原，有着多雨的山地边缘和适宜的气候，大部分地区布满延绵的草场，草场上到处都是食草的野兽，其间生长着一些零星的橡树、雪松和阿月浑子树带。在这些野草中就有着谷物的祖先——双粒小麦（emmer）、单粒小麦（einkorn）、大麦、粟和燕麦；在草原和树林里的食草动物中有家禽的祖先——绵羊、山羊、猪和野牛。高地的草木区上的树也包括许多果树——柠檬、阿月浑子果实、野葡萄、无花果、苹果、梨等等。在这个地区的西北翼，安纳托利亚的谷物——野单粒小麦——逐渐散播到邻近的地中海岸的巴尔干欧洲和希腊（Greece）。在高原的南部，双粒小麦和燕麦在零散的作物中可以看到，它们沿着黎巴嫩山脉温和中纬度分布，可能向南一直延伸到西奈半岛。正是在这个高原及其周边地区，采集的食物供应开始一点点地增加，这不仅是因为有了篱笆的保护，而且包括为了收获在小块土地上生长的野生植物种子而进行的反复播[18] 种，以及对产水果和坚果的树木的保护和繁殖；为了对抗艰难时期，人们发展了捕获活的雌性动物和它的幼子并把它们圈进栏里的技术；最简单的保存食物供应的办法是使之存活。在有限但差异很大的领域内，采集—狩猎—捕鱼者由于有了这些补充性的园艺和家畜饲养活动，因而逐渐地能够使它们的食物供应不管年成的好坏而趋于稳定。

最初零星的区域性食物管理试验发生于约公元前19000 ~ 前6000年，主要是在以草原为主的地区及其周围，北欧冰盖气候系统崩溃以及某些较边远地区周期性干燥气候对此起到了推动作用。南部地区采集—狩猎—捕鱼者

① K. V. 弗兰纳里（Flannery）：《美索不达米亚早期食物生产的生态学》，载《科学》，第147期（1965年），第1247 ~ 1256页；P. J. 乌凯（Ucko）和G. W. 丁布尔比（Dimbleby）主编：《动植物的培养和开发》（伦敦，1969年）。对农业起源的另一种看法，参见希格斯的《经济史前史》。【11】

数千年来就已经季节性地收获或研磨种子、水果、坚果和准家产的带荚的种子，包括谷物种子、紫苜蓿、裸麦和亚麻种子，还有野生的续随子、柠檬、阿月浑子果实、橡子、豌豆、黄豆、小扁豆、紫云英和葫芦巴、野葡萄、无花果、苹果和梨。在同样广阔的内陆地区，由于河流和湖泊资源很少，鱼、贝和其他水生蛋白质普遍缺乏，这有助于采集者—狩猎者对猎获家养动物的祖先——绵羊、山羊、牛（cattle）和猪——的重视。回顾起来，有可能分辨出有很鲜明的区域性和地区化的采集—狩猎—捕鱼者群落经济，这种经济由于不同种类准家畜的组合而稳定化——这里特色是绵羊、山羊和燕麦，那里是山羊、豆荚和果木，还有别处的牛、猪和单粒小麦。到了第七个千年，群落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加上经济战略和本地群落主要食品构成的趋同条件，稳定地形成了基于主要产品组合的广泛农业系统的有限系列——绵羊、山羊、猪、牛与双粒小麦、单粒小麦、大麦、谷物、加上豌豆、黄豆、小扁豆、还有苹果、梨和坚果，并通过连续的采集—狩猎—捕鱼而使这个系统达到平衡。大量半独立的地区赖以维持生存的支柱，就这样逐渐而连续地融入到少量平衡的经济系统中去，在这些系统的内部，这些支柱又成为新的更广泛的复合战略的主要支柱。采集—狩猎—捕鱼的三角平衡现在成为一个稳定的多角形，其中增添了崭新的农业资源种类，并有能力使人口密集的长期定居点每年可以生产有余的食物。

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也许更早些，在欧洲第一次发现了农业定居者的明确遗迹。这些定居点只出现在巴尔干地中海地区，这里紧邻安纳托利亚高原，被紧紧局限在新驯养动物的野生祖先所占领的生态小环境中；这个地区的领土极有可能完全处于主要发展区的范围内，但这还不能得到证明。在马其顿和保加利亚人位于色雷斯的肥沃平原上，从西北安纳托利亚而来的定居者已经不断地扩展为一个真正的村庄网络，这些定居者住在长方形的平顶房子里，用彩陶容器盛放稀粥和熟肉。塞萨利平原——经由从沃洛湾延伸的一串岛屿连接，直接与南安纳托利亚相连——现在开始涌现出无数的小村庄，尽管他们种植单粒小麦、大麦、豌豆、蚕豆、黄豆和小扁豆，饲养绵羊和山羊，并且也像安纳托利亚和伊朗高原地区一样栽培水果和坚果，但他们还不知道使用陶器。 [19]

然而，欧洲的生态特点与地中海台地和海滩十分相似，无法不经过适应性改变就能容纳人类的大规模进入。这里的地层扭曲变化，在地中海盆地北岸边界形成了一道由一系列大致连续的雄关峻岭组成的边缘，山岭的另一面陡然下落连接着一条窄窄的海滨平原。这个链条的纬度，以及这里的降雨和

降雪一起把适度的中欧和阿尔卑斯山生态环境触角延伸到了地中海边缘。保加利亚人的色雷斯平原、马其顿和塞萨利被陡峭险拔的高原和山地包围，使生长在温带的欧洲落叶橡树带处于阿尔卑斯山山毛榉、冷杉带之下，因而整体上与中欧动物种类差不多——鹿、山地羊、野牛、野猪、熊和狼。土著的欧洲采集—狩猎—捕鱼者群落的领土范围占据了欧陆地表的大部分，但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这种占领密度也就微不足道了——除了沿地中海、大西洋和波罗的海海滨地带外，在那些地方海陆资源是互补的；有很好的证据表明在后面这些地区，古代人们由于农业的积累在持续不断地重新装备和改变着自己。

再向北，越过中欧生态圈的地中海外层，是更加艰难的环境带，它们以一个更宽的对角线带阻断了匈牙利大平原的东北出口。在这条对角线带上，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只要越过多瑙河 40 英里就可到达小喀尔巴阡山。这条天然的马其诺防线的雄伟特点对地中海的农民来说，由于常年比现在更湿润的大西洋气候而显得复杂了，而整个地带及其以远的地区都被这种气候所控[20]制；同时也是因为其孤立的生态因素的复杂性不断加强，这些生态因素为他们提供一个累积性的深度保护。这个地带的东北分布着的是欧洲的冻土和黏土，它的冬季漫长而多雪，年降雨丰富，夏天短暂而多云，分布着原始的落叶橡树林，历经数千年——大量 3～10 英尺粗的倒伏的、死亡的、衰败的树干纵横交错地倒在一起，更与地下潮湿的深厚的未被啃啮过的森林枝丫杂混在一起。这种原始森林在今日的欧洲已不复存在，但它对世代相传的农民是一个帮助，无情的烧毁使得这种原始森林到中世纪晚期最终消失了。土著的采集—狩猎—捕鱼者总是住在森林里或常常从森林穿过，森林是他们可以良好地循环利用的环境；对利用土地的耕地农民来说，森林是一个怀有敌意的妖怪，必须用斧头砍倒用火烧尽。不足为奇的是，直到今天，欧洲农民的民间传说仍然被友善开放的村庄和吓人的森林之间的强烈对比所主导，森林中有着危险的居住者——从狼、熊到神秘的巫师和一伙伙的小森林人；年轻的看林人作为社区传说中的英雄，他的社会经济意义也许类似于今天俄国拖拉机手所享有的地位。

地中海耕作社区只是散布在欧洲最南部的边缘，利用但并没有在品都斯山脉和巴尔干山丘的高地定居。第七个千年的村庄沿着河流和海岸扩展它们的网络，因为在那里定居者总能得到作为重要供应的食物，而且联系也很容易。他们沿着大山脉的边缘向内陆迁徙，沿着肥沃的河谷和地中海微观环境移动，一直沿着多瑙河逆流而上，经马里查、卡拉苏和瓦达河延伸得很远。通过利用地中海生态环境向保加利亚（Bulgaria）和马其顿低地边远地区的

这种渗透，许多农民群落无须进行剧烈的文化调整就可融入匈牙利大平原。但是，这些在东北匈牙利边境的社区和在巴尔干—塞尔维亚高原河流之源的社区，逐渐被迫越来越密切地以一种不那么强烈的发展形式与中欧动植物相互协调。在那些过渡地区，他们逐渐确立了对欧洲资源的最初认识并有了基本的知识。在盖房上，木料逐渐代替了黏土。为适应大西洋湿润的气候，屋顶建成了脊状；为了对付森林环境，也发展了一系列石斧和石锛。适合于制锛和手工工具的石头很快成为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资源。无疑，有关获得奇石、木材、可吃的根茎、樱桃、坚果动植物的知识可以从土著部落那里获得，因为定居农民正逐渐地转移到他们中间。 [21]

在多瑙河东岸贝尔格莱德地区的列彭斯基·维尔发现有一处河边村落——碳测量表明它公元前4950±150年的遗址——可以非常有力地说明这一时期农民村落的状况。这个有着30～35间不规则四边形房屋的村庄，坐落在呈梯形的山脉上，山脉下有一个漩涡，这个遗址就是因此而得名。这个漩涡，它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资源所在地——它把表层水和食物吸到深处，在那里经常有吃得饱饱的鲟鱼、鲶鱼和鲤鱼在游动，村民就用网或叉捕这些鱼。在陡峭的多瑙河流域（Danube，valley）里，村民的状况深受小面积的花园样大小的农地的限制，但这些可以由它的有利条件来抵消，那就是它紧邻河流资源并有高出他们住址300～700米的石灰岩悬崖可以利用。结果，石灰岩的峡谷在一地就集中了多瑙河的独立资源和微观环境：浅滩、海滨台地和村落遗址温暖气候，中等斜坡适合温带的森林和动植物和山顶的温凉气候。这个地区的区位战略也反映了谷物种植这样的“庭院园艺业”在列彭斯基·维尔经济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大量的鱼骨、野猪、野牛、鹿和小型食肉动物的遗存充分地反映了遗址附近的资源区有垂直分层状结构的自然资源区。①

到第五个千年时，类似的小村落沿着地中海海岸和海岛排成了行，从爱琴海和亚德里亚海到西班牙、法兰西和北非的海岸。这些海岸村落严重地依赖丰富的沙丁鱼、金枪鱼、贝类和地中海的海豹，作为对小块土地提供的谷物和绵羊、山羊的补充。许多这种海岸村落似乎说明了手工制品和技术的存在和相对流行，这些手工制品和技术将埃皮鲁斯（Epirote）—亚德里亚、法兰西—意大利和伊比利亚（Ibero）—毛里塔尼亚的采集—狩猎—捕鱼者

---

① J. 纳德里斯（Nandris）：“Lepenski Vir”，载《科学》杂志，（1月号，1958年）；R. 特林翰（Tringham）：《东欧的狩猎者、捕鱼者和农民》（伦敦，1971年）。【12】

部落相互联系了起来。到第六个千年末时，向欧洲内地的渗透稍微慢下来
[22] 了，乡村网络迅速地延伸到匈牙利平原的边缘。乡村沿着巴尔干河流网络而排列，呈链条状展开，向北从色雷斯和马其顿沿着瓦达河，顺摩拉瓦河到多瑙河，并从那里向北沿着排水系统良好的克勒什延伸开去。沿着这条微弱的联系线，大量从爱琴海的斯普第拉斯运来的贝壳被手把手地交换成用筒状的贝壳珠子做成的项链，或用整个的贝壳切割制成的手镯；这可能是地中海与欧洲商品大量的双向交易存留下来的无声踪迹。①

对巴尔干高地的渗透，已使农民对欧洲非典型的陆地过渡带生态气候圈的动植物有了某些方面的了解。但是，从匈牙利西北部的分水岭到真正的中欧生态环境，需要坚强的农民在该地区坚持整整 5 000 年，以便在社会、物质文化、农民的作物和家畜方面成功地进行适应和转变，进而使他们以一个稳定的一体化的文化形式出现；他们能渗透到中欧的环境里——这里是重新加固的冰川土壤、浓密的落叶林，寒冷的冬季和温热的夏季的最前沿的边境了。拓荒者的渗透很显然是由克勒什网络的西北边境而来的多瑙河农民完成的。通过紧密地组织成小小的血缘社区，这些拓荒者在清除黄土坡的森林的过程中，开发了刀耕火种的锄头农业技术，并在他们的整齐宽广的木头房屋周围周期性地利用最好的排水良好的冰川冻土的最初肥力。牛和其他的家畜很少，它们有可能被关在茅草的走廊里以度过严寒的冬天。仔细挑选和广泛交换的坚硬的火成岩石锛是农民应对挑战的标志；这个挑战之所以能成功地被克服，很大程度是由于精选的土地、谷物、家畜的微妙结合并且利用了巧妙的战略才能实现。这个巧妙的战略是定居的稳定性和反复地对新土地的开发，再加上用火和石锛对付森林的社会化组织的集体努力。

人们喜欢的黄土地最初出现在一些较长的狭窄地带，是从已大面积撤退的欧亚冰盖表面冰积岩的岩尘部顺风吹来的。因此，差不多是偶然的，这些
[23] 肥沃的已被排干的土壤形成了一个窄窄的不连续的居住带，它从乌克兰延伸到巴黎盆地，另一条线从伊朗到黄河（Hwang-Ho）。在不超过两三百年的时间内，多瑙河农民沿着一直到北海的整个黄土带，扩大繁衍了他们的村庄。在同一时间内，其他类似的村落，利用近似的经济战略，从伊朗向东扩展进入中国的西北。

人们往往将农民对欧洲大陆的渗入与欧洲拓荒者在丛林覆盖的北美的开

---

① N. J. 沙克尔顿（Shackleton）和 A. C. 雷弗鲁（Renfrew）：《按照氧的同位素的分析对新石器时代的贸易路线的重新排列》，载《自然》，第 225 期（1970 年），第 1062～1065 页。【13】

拓活动进行比较。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拓荒者都表明文化的适应是生存的关键，最初的欧洲农民发现，那些稀散的但非常适应环境的土著采集—狩猎—捕鱼部落那里有许多东西可学。特别是关于森林技术，采集—狩猎—捕鱼的规划，地方资源和欧洲动植物的特性等。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坚硬的岩石产品，各种色彩鲜艳的赭石和制造工具用的尖利的硅石，已为当地土著熟知，并在处于游动状态的群落中广泛分布。现在，我们有一个较为静态的农村网络背景．这个网络维持着一个积极从事伐木活动的相对密集的人口；这个背景要求通过精心调整的交换机制来更集约地开发和定期分配商品，而且其范围比单一群落的地域及其简单增加要大得多。这种现象在欧洲史前的诸阶段都存在。

石头、沥青、燧火石和各色赭石的开采已被一些采集—狩猎—捕鱼部落广泛采用，甚至在这些早期的环境中，在第六个千年以前就已有浅矿井的有限开采。泽尔坦（Szeletian）采集者似乎已从匈牙利洛瓦斯附近的“染料”矿坑里采集了相当数量的软赭石色素，这是大约公元前35000年的事，可与之媲美的是波兰卡缅纳流域赤铁矿的染料；[①] 有意义的是，这两个遗址证明，在没有绘画存留下来的一些地区，旧石器时期的人们就已大量开发彩色染料。旧石器时代的部落已经在法兰西的普雷斯格莱大高原和贝尔凯雷（Belcayre）高地的狭窄浅层矿坑里开采燧火石，而后期的采集—狩猎—捕鱼部落则从比利时沃姆松的采石场开采石英，从波兰中部的科朗斯科（Cronsko）矿洞中则采燧火石圆块。[②] 在后一个遗址中，为了开采巧克力色的燧火石，几百个洞被掘到10英尺深的黏土层；矿块在那时（约公元前5600～前5000年）面积很大的工作台上被粗加工成型。现在看起来，在后冰川时期北欧森林的较大采集—狩猎—捕鱼部落中似乎可能经常利用浅洞和矿坑。这一地区更为集约的新石器采矿活动表明，这个地区的文化延续性中有一种以上的成分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经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Ertebolle period）一直延续到第四个千年的使用漏斗—烧杯的农业文化初期。【24】

但是，即使采集—狩猎—捕鱼部落修饰最好的采石场，也仅仅代表几千年里每年光顾一次的累积结果，这是他们在他们领土上围绕着资源的运动不断加强的过程；活动主要但不完全是为了满足相关部族的直接需求。相反，新石器时代矿井的开发，形成了一个较为先进的准专业阶层，他们由人口不

① 贾兹泽维斯基：《波兰》，第56～57页。【14】

② 克拉克：《史前欧洲》，第182～183页；D. 德·索恩维尔波德斯（de Souneville Bordes）：*Le paléolithigue Supérieur en Périgord*（波尔多，1960年）；贾兹泽维斯基：《波兰》，第56页。【15】

断增加的农村社区供养，是在开发森林而对斧头和石锛产生了极强需求的压力下产生的。在采矿中心有几百个矿坑，可以通过白垩层挖掘到30~60英尺，这些矿坑包括瑞典的马尔默和丹麦附近、比利时的斯庀恩斯、英格兰（England）的格赖姆斯墓地（Grimes Graves）和伊斯顿（Easton）高地到波兰的科杰米摩基。在地中海，人们也从位于西西里（Sicily）的蒙特塔布托和阿普利亚（Apulia）的大陆矿址的深层石灰岩矿道中采掘燧火石；这些供应也通过流通着价格昂贵的黑曜石的里帕里、意大利和爱琴海诸岛有限的交换网络得到补充。① 在大部分集约采矿的中心，有证据表明它的组织性和它的产量高于狩猎—捕鱼部落的简单矿坑。为了简化采矿的过程，人们从远处运来了原材料——要求有几百个幼鹿角制成的镐，利用特别坚硬的采矿斧和大锤，而且也需要大量油脂用于盘状灯照明，更不用说楔、棒槌、铲和筐了。在诺克福格里米斯坑道的两个坑洞中修复了不少于244个弃置的特别坚硬的鹿角锄。为了开矿，特别坚硬的火成石也需要进口——在格里米斯坑道利用了康沃尔郡的绿石工具，在克热摩基（Krzemionki）利用了西里西亚辉长岩和玄武岩做的鹤嘴锄、槌、锛、大锤。[25]

在那样的采矿中心，人均加工半成品的产量可能已经达到好几千件，而且，单单在赫斯普里赫尔人的挪威岛采石场里，估计已开采出可装20 000船左右的绿石。② 组织和重新分配的程度显然大大地超过了只满足本地社区所需的程度。对资源的定期性开发很显然已转变成由邻村的准专家至少每年进行一个较长时期的准备和开采的活动——为了安全起见，常在旱季进行，也许是20或30个男女换班挖4~5口深井。虽然只有少部分人参与，但必须大规模地组织供应，开采出来的矿块必须用碎石锤加工成能做工具的薄片，这样就要反复地利用他们特殊的加工技巧。最后，为了交换其他的商品，这些燧火石、黑曜石和石块必须分销到一个广阔的区域。

对这成千上万作为剩余品的刀刃、岩心、斧和锛的分配方式充分地证实了更广泛地开发深层矿井活动的意义。过去采集—狩猎—捕鱼部落参与分配的单元涵盖100英里左右，呈稀疏分布的状态，现在经常发现大量的“加工”产品呈非对称的扇形分布状态，一般从同一资源中心延伸二三百英里。很显然，这些工场中心发展了一套相互调整的分配模式，这样每个地区都能从几个中心得到供应，虽然经常有一个中心占主要地位。这个复杂的供应渠

① 克拉克：《史前欧洲》，第174页。【16】
② 克拉克：《石斧和扁刃》，第1~28页。【17】

道只有在一个非常活跃并得到很好组织的相互联系的礼仪性商品交换圈的背景下才能得以维持。这些交换圈也才将在两个方向上流通其他的商品——猪、狗、斧头、贝壳、牙齿、野猪牙、赭石、沥青、毛皮、羽毛、琥珀、珠子、手镯、坛罐、黑曜石、铜饰物、用来炫耀的器具、精选的手工制品和谷物。石斧和铜制品的分布类型是极为有趣的，主要是因为它们是各种欧洲商品连续而不断扩大的交流贸易网的仅存架构。

因此，“新石器时代是自给自足”的假定，假如非要这么假设的话，也仅仅在相对意义上可以接受。此时欧洲的商品流通在数量上不可能很大，也不关乎生计，但是这个由交换伙伴、农村市场和资源中心组成的复杂网络，成功地把地方商品分销到远远地超出了从前限制的边界；因此，商品的这种 [26] 新的流动有助于填补逐渐定居的村落不断扩大的需求。这种流动偶尔地但是十分有意义地扩大了许多新的手工制品和原料、风俗和游戏、传说和宗教信条、以及其他与在这个交换网络中正常的商品流动没有直接联系的稀奇物品的传播。这种流动的动机是展示和消费部落民一生中连续的“礼仪通道”所需的商品。这种流动的构架是不同文化间包括脚夫、小船等短途移动方式在内的礼物交换网络。这种流动的结果是广泛的贸易网不断扩展，在这种创新和商品的快速传播过程中，数百个原本互不相干的社区联系起来了，随之而来的结果是相互获益；这种流动极大地提高了领土潜力，这种潜力从前只存在于边际环境中，现在却在各个方向上与有着更稳定产量的各地区结合在一起。

1.4　爱琴海网络①和早期青铜技术：约公元前 2000 ~ 前 1400 年

在整个第四和第三个千年里，欧洲农业部落继续锄地割草、狩猎和捕鱼、采集和贮藏，而服务于定居部落的交换网络也逐渐代替了过去到处流浪的采集—狩猎—捕鱼部落的老式森林生活。甚至北方针叶林里的定居者也对新的生存方式有些适应了，而在西面，差不多每个大西洋岛屿都成了定居社区的家园。这样，欧洲多种多样的生态环境不断地在这种多样化的文化马赛

① 综合的调查，可参见 M. 吉姆布塔斯（Gimbutas）：《波罗的海东南岸的居民》（伦敦，1963 年）；皮戈特（Piggott）：《古代欧洲》，第 3 章；A. C. 伦弗鲁（Renfrew）主编：《文化变换的解释》（伦敦，1972 年）。【18】

克中得到了反映，从地中海沿岸的农业渔民到集体耕种的斯堪的纳维亚森林砍伐者的血缘部落，从阿尔卑斯山农民的湖边木屋到建造在巴尔干土墩上的坚固的木和黏土结构的村落都是如此。但是，在这个时期有历史意义的发明开始出现了，开始还局限于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区，但很快就通过村庄网络的相互交流传到了内地。铜的冶炼，包括简单的砷合金的生产，在约公元前3500年以后逐渐地成为巴尔干村落中心的重要特点，虽然这种新的矿物在[27]中欧和北欧价格一直比较昂贵而且数量极其稀少，这种状况直到约公元前2500年后阿尔卑斯山的萨克森—图林根和波希米亚（Bohemia）矿藏被开发出来才结束。① 一项有着深远影响的创新也在同一时期传遍了这些地区——那就是简易犁的出现。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犁普遍地代替了鹤嘴锄成为欧洲农民主要的耕作工具，从而迅速地改变了一个人能耕作的土地的数量，增加了对土地和剩余物的需求，使人们对土地、财富、遗传和亲属义务的态度有了革命性的改变。简易犁、牛扼、用牛进行拖拉、带轮的交通工具、雪橇、铜合金技术的传播再加上不断发展的亚北风（sub-boreal）期的干燥条件，在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后，彻底改变了中欧。

与此同时，在埃及（Egypt）和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这个时期的重要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影响了他们自己及其近邻的经济和社会类型。绵延的城镇开始显现出一种更高程度的中央组织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的倾向；城市部落社会逐渐发展成地区性的城市国家，它们依赖生存的基础是城邦周围半月形的零散村庄的剩余产品。这些城市中心政治利益的范围不断扩大使他们开始确立乡村界限，这又不可避免使争夺边境资源的边境冲突成为大河谷地冲突的经常性原因。在不断地征服和被征服、组织和重新组织的相互调整中越来越大的政治单元开始出现，他们重新分配由于村民灌溉和犁耕农业而来的不断扩大的剩余食物。到约公元前3500年，在城市和城市、城邦和城邦之间竞争性冲突已充分发展了。到约公元前3000年，由于不断的分分合合，大的城邦和领土的王国已初具规模了。美尼斯——上埃及的国王——征服了冲积平原的各邦，统治着从尼罗河的第一大瀑布到地中海的广阔土地；在美索不达米亚，指挥着铜剑方阵和战车的乌尔、拉格什和伊利都国王为暂时的优势混战不已，直到公元前24世纪阿卡德的沙公（Sargon）建立起了他短命的帝国为止。

---

① 最近的讨论，可参见A. 谢拉特（Sherratt）：《早期欧洲冶金业的资源、技术和贸易》，载西夫金等编：《经济和社会考古学问题》，第557～581页。【19】

新的社会和政治单元在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Euphrates，valley）的出现有着广泛的影响。零散的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部落城镇的出现已经有二三千年了，但是它们在规模大小、组织程度或者潜能方面还无法与新的城市和新的城市国家相比。“文明”和文明化已来临了。新的城市中心出现的主要目的是以最优的经济生产为城市管理者和他们的国家获取更大的势力；在这个权力竞争的世界上，只有最有权势的人才能保持独立。处于焦点地位的城市中心从四周不断地吸收剩余资源，中央当局组织它的办事员和官员，用他们的文字和印章来标识、计算和重新分配储存的剩余物并把它分配到专家和手艺人手中，结果生产出了更多的消费品和更复杂的手工艺品。城市是镶嵌在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村庄网络上的一个巨大的不断扩大的单元。原材料被引进，复杂的社会和物质产品被产出，但是因为权力和名望在占有这些复杂的新产品上起着中心作用，这些产品大部分成为寺僧和国王的官僚的财产。庙宇和宫殿不仅成为政治和宗教权势的中心，而且成为重要的工业中心，而把城市的边缘留出来作为贮藏原材料和成品的仓库，同时也作为契约手艺人的工作场所；这些建筑物同时也是城邦内的财富和财政中心、商业银行、军火库、谷仓和为城邦保留各种物品的仓库。宫殿和庙宇是税收城邦的工商业中心，它们的这些功能一直保存着，直到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衰亡后商人阶层和自食其力的资本家兴起为止。 [28]

这些事件似乎与欧洲第三个千年的部落民社会相距太遥远，但是产生这些新的政治机构的后果，深深地影响了小亚细亚并且越过地中海对欧洲的外围产生的影响，而且其间接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了直接接触的影响。新的城市和城市国家新网络在现存的简单农村网络基础上扩大，而农村在许多方面基本上没有改变。这种新现象差不多是一场亚文化革命（subcultural revolution），在这场革命中，某些阶层能从农村群落中获取更大的收益。这些新的政治力量因而依赖资源和原材料的不断供应。起初，大部分食物需求能从本地得到满足，但是对某些战略物资的需求现在就使有效的商业组织成为必要了，这就需改变以前通过礼品交换一点一点进行的做法——正规的贸易是解决这种需求的有效办法。在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冲积河谷，这种战略性原材料主要包括为造战车、货车、船舶和建筑所用的巨大木材，为造生产工具和武器而需要的金属。数量巨大而供给稳定的铜成为必需，后来为造青铜又增加了对锡的需求。这时，锡的航运逐渐地具有了战略和政治意义，就如现代钨对钢铁装甲武器、近来的石油供应和铀的贮藏一样重要。 [29]

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王朝为了供应对敌战争所必需的原材料，组织了更大的跨地区的陆上和海上运输。① 起初这种供应的组织大多不是以连续的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双边贸易的形式进行的，他们更多的是以每年到原材料产地进行军事远征的形式出现。假如这个原料产地位于几个主要城邦的边界，那么此地将有可能成为一个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必争之地。要是资源所在地区的人民不友好的话，它就会定期遭到袭击和抢劫；假如他们比较务实的话，就会满足远征军的要求，结果该地的精英阶级就可以得到大量的官职和财富，并且也会得到和平。这样，皇家的礼品交换就成为用政治经济手段来达到双方都有规定义务的外交协定，同时，相互联系的精英人物在文化上的交汇已到以通婚的形式予以认可的程度。在和平的条件下，这些远征就交由有武装护送的职业商人来完成，他们是由驴队和两轮车组成的正规商旅。当地的统治者经常要求这些商人住在城镇的某个限定的区域，由此出现的商人区也就提供了商业银行和旅社所需的地区设施。因此，住在这些偏远城市的地方权贵，就能利用经过其领土的交通路线，向过往的商品征税并收取什一税，这实际上扩大了他们自己王朝和城镇的财富和政治力量。

因此，这个不断衍生的贸易网络，对于在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人口众多的部落城镇和酋长国之间形成并聚集许多小的缓冲邦国和王朝有着普遍的影响。这样大邦国的经济活动似乎助长了野蛮的赫梯王国的崛起，它的最早王朝是约公元年前 2000 年以库苏拉城市为中心的比特汗纳和安尼塔斯（Anittas）；而且对于富裕的城市国家黎凡特的阿勒颇、阿拉拉赫（Alalakh）、拜波洛斯、塔色斯、卡尔基米什（Carchemish）和乌加里特也有类似作用。除 [30] 此之外，这个网络还延伸到最早的科诺索斯宫殿国家和克里特平原上的马里亚和费斯托斯，以及铜资源丰富的塞浦路斯（Cyprus）的阿拉塞亚。即使在安纳托利亚和欧洲最边远的地区，默默无闻的特洛伊二世和多拉克（Dorak）王朝似乎已经统治着许多很小的边境国家，这些国家在海峡的一岸包括利姆诺斯、伊姆波诺斯、特那多斯、加里波利（Gallipoli）和特诺德，在另一岸包括博斯普鲁斯（Bosporus）——一个横跨安纳托利亚和欧洲的蛮族王国。即使在这些城市文明的边缘之外，在阿尔戈斯（Argos）湾的勒尔那、在科派斯湖（Copais，lake）上的奥科美诺斯、帖撒罗尼迦平原上发现的迪米尼（Dimini）也有着规模较小但十分堂皇的希腊勒尔那铜器时代

---

① J. 波特诺（Botteró）、E. 卡辛（Cassin）和 J. 维科特（Vercoutter）主编：《近东：早期文明》（伦敦，1967 年）；J. 梅拉特（Mellaart）：《近东的最古文明》（伦敦，1965 年）；《亚述国际集刊》（伊拉克，1976 年），“伊拉克”卷第 39 辑（1977 年）。【20】

的小王国的官邸，在保加利亚人色雷斯平原上发现的伊捷诺文化的遗址要小一些。公元前2000年，最伟大的超级帝国将其力量强行实施于大量王国和自由城市国家的马赛克似的不断扩大进程之中，在遥远的边界上镶嵌着或大或小的城市或非城市部落酋长国——这是一个部分地由大国的组织所促成的复制模式。①

我们只有在掌握了新贸易活动的规模和范围并将其与以前的贸易活动相比较之后，才能把它们对欧洲的间接重要性看得更清楚。大约在公元前2350年，阿卡德的沙公为了帮助他的商人到达普鲁斯，领导了一次向北进入安纳托利亚中部的远征，回来时经由白银山脉（托鲁斯）和雪松山脉（阿曼努斯）返回。与此同时，这个国王还可以炫耀他南部的贸易网，从蒂尔姆恩（巴林，Bahrain）、马坎（波斯湾）和美鲁哈（阿曼湾）来的船只停泊在他的美索不达米亚宫前的海港；这样，沙公的贸易网络直接吸纳的商品来源于半径1 000英里内的地区，而间接的来源肯定要超过这个范围。由300头驴（donkeys）和一打牛车组成的商队旅行500英里是常事，走一趟有时能运12.5吨锡——这就足够生产125吨合金铜所需，或者装备一整个小邦的军队。早期王朝的法老总是定期组织远征，到西奈半岛获取铜、到黎巴嫩去获取木材。单是公元前2650年，法老斯内福鲁组织的一次到拜波洛斯的远征就带回了40船西洋杉木。黎凡特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原料产地，同时成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争夺的中心；斯内福鲁海上远征前30年，即公元前2680年，拉戈西的国王圭第亚也在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远征中在同一个地方征集木材。由于经济利益及势力范围的交叉，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庞大帝国就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军事和政治的冲突中，其高潮是埃及对从西奈到拜波洛斯的整个叙利亚海岸线的征服，当时埃及处在第12世王朝（公元前2050～前1900年）的法老统治下，时间大致与苏美尔帝国的第三王朝（公元前2150～前2000年）相当。【31】

公元前2553年，即使在遥远的托罗德，多拉克的国王也能够从法老沙胡热那里得到一个以金镶底的王座——这也许是作为一个外交礼物间接通过塔尔苏斯或拜波洛斯得到的，因为商品的航运都要经过这些中间港口。② 在

① 参见S. 胡德（Hood）:《克里特诸文明》（伦敦，1971年）；R. W. 哈钦森（Hutchinson）:《史前的克里特》（哈蒙德斯沃斯，1962年）；S. 洛伊德（Loyd）:《安纳托利亚的早期山地人》（伦敦，1967年）。【21】

② J. 梅拉特：《多拉克的皇家财产》，载《图解伦敦新闻》（1959年11月18日）。多拉克的发现并没有因此被所有的权威所证实和接受。【22】

特洛伊和多拉克王国的边境之外，毛驴组成的沙漠商队甚至可能每年跋涉到设防的保加利亚台地上的野蛮国家去装运羊毛料、黄金、木材和一些珍奇的小物品。在更远的地方，现在一些部落酋长国也在沿多瑙河和中欧邻近地区零星地崛起，酋长丰富的随葬物和他们散见于各处的作为个人财富的铜和金库表明了这一点。这些酋长国是经济剩余、有利的地理位置和来源于爱琴海的间接刺激的最初产物，而爱琴海地区是利用犁、铜器、牛车、雪橇和独木舟的有效的农业经济在政治上的产物。酋长国刺激了对本地铜、金和锡资源的开发，组织起了一个交换网络，从北面带来的是木材、毛皮和其他的产品，来自南部的是精巧的彩陶珠、金属容器以及标志身份地位的武器。

中欧奥恩捷特兹和图姆鲁斯酋长国的崛起和他们短命而不稳定的联邦是与欧洲精耕细作的谷物和畜牧农业的兴起直接相关的；人口更加稠密和经济组织也更加复杂化，这些都刺激了产品和商品在一个更加中央集权的部落结构里重新进行分配。在这个背景下，再加上早期的铜器技术的出现，金属制品差不多完全成为显示社会地位和官衔的工具，也是酋长和他的家人和亲戚及依附于他们的手艺人阶层的标志。炫耀性的铜武器、黄金和琥珀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博得了尊敬，甚至已有的少数铜工具也只是用于生产更多的器具，以便进一步使拥有这类生产手段的所有者声名显赫并加强他们重新分配公共剩余物的权力。这种社会后果——尽管以特殊的文化差异显示出来——是一个倾向于使精英人物更加富有更加有权势的累积性循环，刺激更多的亚[32]文化的专业性和差别的产生，因此促进了文化阶层的普遍繁衍和社会分化。

使用犁的深耕农业生产了剩余产品，精英人物因而可以对它们进行重新分配；精英人物用这些剩余产品来交换武器、小饰物和他们的工匠所用的工具；精英人物因此变得更有权势，他们从更多的村落捞取更多的剩余产品，也雇用更多的懂技术的人。一个有犁的男人能使许多女人从耕作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家庭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剩余的布和剩余的食物，专业的铜匠和木匠的产品，和人类通过自身的努力犁出来的土地一起增加了财产的多样化。财产本身使直系血缘关系的重要性增加了，因而使家族集团内的继承模式正规化，并且很快成为一个重要的复杂的机制，它把财产限制在部族内部一个界限日益明确复杂的阶层范围之内。

复杂的仇恨和友好的系统很可能已经形成，它同时能够确保商品贸易、金属供应、手艺人、商人和商队的安全，而在没有血亲关系的前提下，为了追求贵重的产品，人们能容忍进行大规模的海上抢劫、抓俘虏、掠夺、战争和谋杀。财富占有的重要性的增加，使把男性俘虏作为矿工和奴隶或把女性

俘虏作为织工和手工匠在经济上有利可图，这可能在掳掠并因而在居住地的防守和武器的升级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实际上，“英雄社会”的所有传统因素现在都出现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和金属利用的文化在功能整合上不断强化——部落酋长国、社会化分层的阶级和阶层、处于依附地位的技术人员、详细的财产继承法则、家族血缘、敌友格局。[①] 毫无疑问的是，尽管其形式存在区域差异，而且还有各种残存的古代社会类型，但是欧洲酋长国的崛起证明中央协调的重新分配的社会开始出现，在这类社会里，作为有着重要社会意义的礼品交换活动，越来越多地得到有重要经济意义的有组织的贸易活动的补充。[②]

精细的铜器技术和维持它的社会机器在欧洲的传播，一方面是通过技术的扩散和社会内部的重组，另一方面是通过部落沿多瑙河的迁徙。在喀尔巴阡山—苏台德环状山系的南部，现存的文化普遍地采用了公元前1800年普罗托—奥恩捷特兹的巴尔干—安纳托利亚陶艺和手工制品，其中包括表面烧烤光滑似金属样的陶器、锡、铜、双阀模（bivalve mould）、铆牢的金属工具，轻巧而细长的剑、匕首、头盔、戟和衣服上的别针。在盆地北部，这些发明主要说明了已有社会阶层文化交流的加强，以至于奥恩捷特兹的金属风格广泛地传播到这种特定文化严格限定的边界之外。当地的酋长似乎很快就对他们境内的金属矿进行了开发，而且是深矿井的坑道开采、熔化、浇铸与一个有效的分销网络相联系，这个网络中贮存有大量在铁匠铺中用来熔化和重新铸模用的铜锭转矩和锭条。在这样的背景下，仅位于奥地利边境上阿尔滕堡（Altenberg）的一个仓库就有1 000件奥恩捷特兹铜转矩。[③] 【33】

相互敌对的酋长国之间的争斗留给我们一系列金属储藏，从种类各异的丰富的武器、小饰物、废料、金、琥珀、锡和彩陶贮藏到从矿业中心向外辐射开来的路上废弃的金属锭条仓库。很显然，区域性青铜技术流派是对职业性的阶层分工的继承，他们由相互联系的青铜师傅来培训。区域性的青铜门派不仅在伊比利亚矿区、北意大利、阿尔卑斯山、波希米亚、摩拉瓦亚、萨克森—图林根、布列塔尼（Brittany）和海卑诺—苏格兰盛行，而且由于贸易网络重新分配的能力，没有金属矿的地区也能维持重要的青铜制造流派——比较著名的是丹麦的青铜传统和不列颠的威塞克斯流派。

---

① J. R. 古迪（Goody）：《非洲和欧亚大陆的继承、财产和婚嫁》，载《社会学》，第3卷，第1期（1969年），第55～76页。【23】

② E. R. 瑟维斯（Service）：《古代社会组织》（纽约，1966年）。【24】

③ V. G. 柴尔德（Childe）：《史前的多瑙河》（牛津，1929年），第233页。【25】

因此，公元前2000～1400年欧洲的构架是由复杂的政治酋长国的崛起、有限但能干的区域性青铜技术网络、除铜以外还对许多商品进行交换的有效的贸易社会组织以及社会进一步分化和亚文化的繁衍等共同构成的。在地中海，列强的扩张继续进行，而宫殿经济和城市国家的外围发展被由沙漠商队和车马队组成的陆上网络和由穿梭于爱琴海、黎凡特和埃及的相互交叉的海上网络联系在一起。沿着欧洲地中海的海滨，帆船航行第一次允许并刺激了地中海东西盆地之间通过第勒尼安（Tyrrhenian）海相互联系的三角地带而直接联系起来。在意大利、西西里、撒丁（Sardinia）、利帕里（Lipari）和马耳他海角的海岛和岩石上，异国风味的坚固的城堡现在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与之一起出现的还有改进了的铜冶炼和异域的制陶传统，这种传统直接与希腊、塞浦路斯、基里拉迪和克里特的地方器皿相联系。这些第勒尼安[34]（Tyrrhenian）中心似乎已经与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通过巴利阿里（Balearic）和北非海岸发展起一种辅助的联系。至此，由捕鱼、绵羊和山羊饲养、燕麦和橄榄、葡萄和无花果园组成的地中海混合经济似乎最终形成了。无疑，这极大地有助于更密集的人口布局和对地中海岸的开发。

与此同时，在完全不同的中欧环境里，亚北风暖候期的开始必定加速了本地人对森林地形的适应，有助于地中海文明向北更迅速扩展。铜和青铜工具的出现使人们现在能够建造更有效用的平板船、牛车和犁，以至于在航海中对风能的利用几乎与把牛作拖拉工具的利用一样重要。单单一艘船或一辆牛车就能装载至少1吨的货物，长途航运每小时可以运行几英里，而这在以前，要50个以上的挑夫不停地换班才能完成这样的航运量；现在，一个人不用两天就可以犁完的地，在过去需要一班女人挖掘一个星期。在铜器时代的欧洲，农业部落能够以更少的人力比他们的祖先耕作更多的土地，生产更多的剩余物，使男人和女人的劳力能解放出来用于其他的专业技能，包括进行更多的商品贸易，而且比他们的祖先走得更远更快。

1.5 迈锡尼网络①和发达的青铜技术：约公元前1400～前1200年

假如我们的研究框架不是特别集中于欧洲的经济发展，那么把迈锡尼时

① 综合研究，可参见M. 吉姆布塔斯（Gimbutas）：《中欧和东欧的青铜时代的文化》（海牙，1965年）；皮戈特：《古代欧洲》，第4章；W. 泰勒爵士（Lord W. Taylour）：《迈锡尼文明》（伦敦，1964年）。【26】

期从约公元前2000～前1200年地中海发展的总背景下分离出来的理由就并不充分或者说没有理由。但是，从一个欧洲人的角度来看，如果把它仅作为随后一系列事件的分水岭，那么，我们有许多理由把这段时期突出出来。在这个时期，希腊大陆加入到由城市酋长国、宫廷经济（palace economy）和互相交叉的海上网络组成的相互联系系统之中，因而成为欧洲文明的中心，它的权力、文化、强大和突出的地中海地位均是如此。从政治上讲，强有力【35】的证据表明，操希腊语的迈锡尼人在公元前1450年占领了科诺索斯的克里特王国，由此开始了一个带有侵略性特征并且有着十分强大的陆上联系的王朝。在科诺索斯，这种转变的标志是把旧的A线形文字系统改成用来书写希腊文的B线形语言，引进在陶器（米诺恩二世晚期）上书写的"宫廷体"文字，而且还在风尚、武器和马车保留大陆特点。随后，迈锡尼希腊人的利益不仅包括以前由克福第尤岛民占有的爱琴海制海权——以前是由克里特人领导的——而且把他们的商业冒险扩展到涵盖东部地中海的整个盆地，从第勒尼安到黑海。这样，它就在欧洲大陆建立起一个城市文明，拥有从意大利到多瑙河三角洲的广大地区，得到了从未开发的欧洲获取原材料的巨大商业利益，并以此代替了极端昂贵、极有竞争力并在政治上卷入其中的近东集市。

在希腊以外，这种分水岭的标志是埃及帝国的充分扩张和不断发生的冲突——在法老图特摩西斯三世时（公元前1450年）它的边界推进到幼发拉底河——以及在图德哈里亚斯二世（公元前1460～前1440年）统治下实力不断上升的赫梯帝国（Hittite Empire）。虽然从这些列强整合的意义上讲，它们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帝国，但是迈锡尼城邦偶尔也会以松散的联邦形式共同起行动，它们组合在一起当然构成了当时"世界"上的第三大重要力量——这是第一个获得这种政治意义的欧洲文化。在更遥远的欧洲内陆，野蛮人的酋长国和部落正在获得与迈锡尼制铜技术和军事装备大致相当的技术，也开始形成有一定规模的不稳定的政治联盟。阿尔卑斯山、波希美亚和喀尔巴阡山区发达的冶铜技术现在建立在一种规则的、较深的矿井坑道的基础上，它生产出了大量的铜，把以前有限的炫耀性武器和严格限制的工具系列扩展到一个包括范围更广的铜器时代，这些铜器也许能为所有较高阶层的部落民得到。历史上第一次，青铜代替石头成为日常工具的主要原材料，伴随着许多石斧加工场、采石场和矿井的停工，许多燧火石工具制作技术下降了；从前重要的资源中心现在不再重要，从前不重要的阿尔卑斯山、波希米亚和喀尔巴阡山山谷现在却成为向外辐射的铜网络的中心。【36】

欧洲青铜生产和分销的规模加速发展到一种产业化的程度，尽管其高峰是在随后的约公元前1200～前900年达到的——当时是瓮棺墓地文化时期。但是，人们已开始通过深打坑道和用木材支撑的隧道来掘取地层深处的矿藏。人们放火烧裂矿石，然后再由一队队的矿工用专门的青铜鹤嘴锄和石槌和锤挖出来。残片被用小橇车拖到地表，后来改用镳铲，在那儿，矿物被粉碎，研成粉并用带木槽的转轮分开；矿物被炙烤熔化以蒸发不纯物；最后，在用皮风箱鼓风的碳炉坩埚上熔化。据估计，在一些提洛尔遗址，这些坑口活动需要180个工人或奴隶来开矿、进行地表提纯，切割搭撑的木材、燃烧木料、水槽、管子、建筑和手工把手之类。单是所需的木材每年就要消耗掉当地19英亩森林；这一活动进行了几个世纪后，必然极大地扩大了在山地森林线上裸露的草地，结果是进一步刺激了河谷农民对这些不断扩展的资源的季节性开发。①

在坑口，坩埚生产的青铜被人们以面包状铜锭的形式带到金属匠的加工地，重铸成棒条或圆圈型。考古人员发现了成堆的此类铜棒或铜条，数量达到700～1 000件。② 珍贵的锡则经由其他路线从喀尔巴阡山、波希米亚、布列塔尼、康沃尔和加里西亚转运到这些金属铺里。但是人们对锡的需求量很少，除了不断扩展的生产和需求同步增长外，还因为行游商人为了重新恢复一部分需要重铸的原铜而小心地收藏碎铜和旧工具。他们在离开工匠中心后的旅程中，用实物交换新铸工具和武器，并收集一些碎铜来铁匠铺交换新铸工具。因此，考古挖掘出来的金属工具窖藏，通常是不同质地的新旧工具的混合，更不用说作为交换收集的其他杂物，也许还有其他腐烂了的了无踪迹的有机物商品。铁匠自己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中变得越来越专业；金匠使用小青铜锤在精巧的砧子上工作；剑匠生产具有相当美学价值和优良功能的刀[37] 刃，它们被一捆一捆地广为买卖；薄铜板金属匠娴熟地提起和铆牢铜壶、罐子和锅，而村里的金属匠则生产大多数通用物品，特别是铸造大众所需的斧、镰刀、小刀、针、小饰物，并对各种东西进行日常修理。专业化的进程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继续，许多新的"生活方式"由于亚文化的手工业品的一再出现而特别突出。越来越有组织的贸易路线的能力，普遍地反映了独木舟、拖车和牛车的使用范围，现存窖藏的规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二三

---

① V. G. 蔡尔德：《罗马时代前野蛮欧洲的贸易和工业》，载《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卷，第1版（剑桥，1952年），第1章。【27】

② M. 艾伯特（Ebert）：*Reallexikon der Vorgeschichte*（柏林，1924～1932年）。【28】

百件物品是普遍的，后来的甚至更大——比如，[1]在波罗格那的普拉托第法兰西斯科的一个窖藏里就发现了14 800 件铜器和碎铜。如果一个社会要求有这种产量，能够维持这些专家，维持和保护重要的贸易畅通，那么它必定也会包括和迈锡尼城邦差不多复杂的政治组织。

随着欧洲社会进入到一个比较而言是有文字记录的时代，我们能用牌匾上记载的资料来丰富纯粹的考古记录。[2] 迈锡尼城邦似乎已经包括直径大约25～35 英里的领域，这样，从它的中心城市到它领域内的任何角落，从它的领域的一端到另一端差不多都在一天的旅程内。城邦的领域处于这些城市遗址中，城市多是设防的，把它们的意志施加于一个分散的村庄网络之上，它们自己则被位于中心的王朝家族松散地控制着。皮罗斯王朝拥有美深尼亚大部分地区，它在行政上被分成两个省：邻近省包括9 个围绕着皮罗斯首都的附属城市，边远省包括围绕着美深尼亚湾的 7 个城镇。同样，科诺索斯——在约公元前 1200 年，很显然是整个克里特中部的中心——是一打以上城镇的领主。

最大的市镇包括一个国王的宫廷工厂和他的直系亲属的府第，这些建筑被依附于他们的家臣、马夫、警卫、手艺人和奴隶的简单住所包围，这些人的房屋成为延伸许多英亩的外城或“下城（lower town)”。在国王的统治之下是封建领主的外围城镇，每个领主都在它们的地区首府内有随员和比王宫规模小一些的官邸。有些领主就是国王的亲戚，但有些代表的是其他王族的利益，因而也代表了一个长期潜在的不稳定根源。国王通过他的武装部队的总指挥和装备齐整的骑士来实施他的统治；各种传说有力地说明了“武装部队的总指挥”是国王比较年长的亲人，通常是国王的叔伯，因而是一个有经验的弄权者，在危机状态或在年幼国王即位时他们有能力作为中央的摄政者。“骑士”显然是来自有地产的家庭中的年轻人，他们是战争的主人，能够提供得起与他们的官衔相称的昂贵的战争装备。 [38]

但是，城邦社会的下层保持着简单的村庄网络，由一村之长和手艺人、农奴阶级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人身关系上隶属于国王或神。至少有一些劳动力是奴隶和边境冲突中的俘虏，他们没有社会地位，只算是抢劫者的“财产”。年轻的妇女从这方面来说特别有价值，因为她们拥有各种技能——手工制作、纺织、繁重的劳动并能生产奴隶后代。关于贵族英雄争夺

---

① 蔡尔德：《贸易和工业》，第 21 页。【29】

② L. R. 帕尔默（Palmer)：《迈锡尼希腊文书的解释》（牛津，1963 年）；M. G. F. 文特里斯（Ventris）和 J. 查德维克（Chadwick)：《迈锡尼希腊档案》（剑桥，1956 年）。【30】

被击败的敌人的良好装备和为精良的战马和女奴隶进行的争斗，荷马时代的画面似乎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方式铭记了这种社会风尚。

迈锡尼城邦代表了公元前 1450 ~ 前 1200 年欧洲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这些复杂的组织标志着不甚协调的城市和部落酋长国在一个中央有着有组织的财政收入的城邦范围内的结合，这样的城邦允许一种苦心经营的文化发展，仅次于列强的大都会和政治帝国。迈锡尼王朝似乎把一套针对政治阶层的税收义务系统强加于以前血亲网络的义务基础之上。这些古老的部落模式在希腊的边境地区和村庄以及村庄首领所处的下层社会继续存在，在迈锡尼城邦衰落之后仍然存在了下来，并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又重新出现于乡村。

迈锡尼经济的主要产品似乎是大麦、小麦、无花果、橄榄油和绵羊。皇家作坊利用这些和其他的产品加工和贮藏油，羊奶和奶酪；织染布；用草药加工软膏；贮藏干燥的食物；保存和重新加工金属品；扩大对进口商品的囤积；维持一个有武器和车马配件的军械库，它们被整齐地盖了戳并在军需官的仓库记事牌和表格上做了登记。正是对宫殿账册记载的单位规模的研究使[39]我们可以想像出城邦经济的潜力——64 580 升小麦、9 000 升无花果、5 520 升橄榄油、10 157 只绵羊、380 匹毛料。① 这些大陆产品和其他商品那时可用来换取稀缺物资和外国商品，特别是塞浦路斯的铜。亚述的锡是从奇里乞亚（Cilician）的零售商那里来的，埃及的金从克里特（Crete）得来，象牙从叙利亚得来，葡萄酒和油是从各岛来的。琥珀也是进口而来，主要是来自爱奥尼亚（Ionian）的海滨；显然有一部分来自西西里，一部分经由亚德里亚海的北部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但是其他的琥珀供应可能是从黑海一点点地运进来的——它们来自罗马尼亚的布祖、俄罗斯的基辅和高加索的矿藏。但是，迈锡尼琥珀贸易的重要性被夸大了，其夸大的程度与过分扭曲迈锡尼对欧洲铜器时代中期直接影响的程度相当。②

迈锡尼城邦正常进口的商品似乎来自一个相对受限制的海外网络。几乎所有的进口商品都由季节性循环的远征得来，它向东穿过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到达加勒比海岸、罗德岛、吕基亚、西西里和北叙利亚，然后

---

① 上引书，第 214 页，克诺索斯第 87 号；第 219 页，克诺索斯第 94 号；第 198 页，《皮洛斯全集》；第 322 页，迈锡尼第 228 号。【31】

② 对迈锡尼与欧洲联系的最近讨论，参见 K. 布兰尼根（Branigan）：《维塞克斯和迈锡尼：对一些资料的重新考察》，载《维尔特郡考古杂志》，第 45 期（1971 年），第 89 ~ 107 页；A. C. 雷弗鲁（Refrew）：《没有迈锡尼的威塞克斯》，载《雅典英国学派年鉴》，第 63 期（1968 年），第 277 ~ 285 页；雷弗鲁：《前文明时代》；A. 斯诺德格拉斯（Snodgrass）：《迈锡尼、北欧和放射性碳对其时间的确定》，载《大西洋考古》，第 1 期（1975），第 33 ~ 48 页。【32】

经由塞浦路斯、克里特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回来；整个航程达 1 400 英里，从希腊起航也许需要 2 ~ 3 个星期，回来也需要差不多同样的时间。正是沿着这条路线我们发现了迈锡尼商业和政治活动发展的痕迹：最初在基克拉迪，接着在克里特的中部，然后到了罗德岛，最后到达塞浦路斯。迈锡尼商人在主要外国港口的一些限定区内建立起了一系列的商人区，从安纳托利亚北部海岸线山脚的加勒比米勒丢斯岛到通往盛产锡和象牙海岸的克罗特斯（Crontes）入口处的叙利亚阿尔米纳（Al Mina）。以牛皮包裹着的铜制铸块的巨大窖藏沿着这个海上链条散布，比如盖利多尼亚（Gelidonya）海岬和尤波尼亚的凯姆港之间的废船坞，比如建在路边的王室国库，其中一个位于克里特的最东端的卡托扎克诺，王室仓库里的叙利亚象牙与那些铸块堆在一起。

类似的锭条和象牙出现在黎凡特挑夫的肩膀上，他们轮流坐在来自塞浦路斯的库里姆的铜三脚凳上休息。[①] 实际上，有大量的证据说明黎凡特人像迈锡尼人一样沿着这个网络航行：荷马史诗中的腓尼基人因而可能被认为生活在更古老的时期，他们与传说中与他们打交道的亚该亚人（Achaean）一【40】样属于古老的民族。人们在 50 多个迈锡尼文明遗址中发现了叙利亚—奇里乞亚的印章和黎凡特小饰物的错杂集合，包括从底比斯宫殿的印章石到便宜的小型铜铅合金太阳神圣像（Baal mascots）——这也许是一个给航海带来好运的吉祥物？盖利多尼亚的废船坞使风暴神所引起的潜在的危险公开化，它也证明带着吉祥物的叙利亚—奇里乞亚人在航行中从事一些这样的贸易，也在迈锡尼圣船的甲板上进行——这是一种新型的船只，据说是由阿戈斯的亚细亚达纽斯人引进的，因而可能是从叙利亚—奇里乞亚的阿丹那滨海的丹那恩斯引进的。

没有一个单独的发现像已经提到的废船坞一样能如此充分地阐明那时海上网络的特点。航船显然是被阵风吹到盖利多尼亚海角的，风能使船开动，但不能使之持续航行——这是早期狭长船的航海弱点，圣·保罗生动地描述过他从马耳他离开的亲身经历。盖利多尼亚海角是罗德和塔尔苏斯间的吕基亚海岸上最有名的危险地带，赤身潜水者在仔细挖掘水下残骸时发现过它底部的残片。[②] 这种船是小型的木帆船，大约 35 英尺长，12 英尺宽，也许在船尾装有一个轻便的船舱。装载的货物有大约 1 吨重的铜锭和大量铜屑，或

① S. 卡森（Casson）：《古代塞浦路斯》（伦敦，1937 年），第 128 ~ 129 页，第 8 段。【33】

② G. F. 巴斯（Bass）：《水下考古学》（伦敦，1966 年）；G. F. 巴斯：《吉利冬亚海角：一艘青铜时代的沉船》，载《美洲哲学学会》，第 57 期，第 8 页（1967 年）。【34】

许还有半英担重的锡锭。货物被认真地装在船的中部，55 磅的牛角形铜锭和小锡条被保护性的粗织物包藏着；青铜碎片和新铸造的青铜器单独地放在柳条筐内保存；重物用灌木包裹为的是在恶劣的天气里能使船身不至于受到内部的碰撞。一个极为有趣的事实充分地说明，在甲板上有一个或几个金属匠，这种推断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船上的纯铜和锡、青铜碎片和没有修整的新出模的青铜工具混合装载在一起，在船中间有一个石垫砧，还有两个加工用的石椎和一个青铜的模块以及砂岩磨光器——那是用打磨器具的——还有一个刻了重量的横杆，这也许是在制作各种铜合金时称量锡对铜的比例用的。

盖利多尼亚船主也许点着油灯占据着小小的船后仓。他随身携带着自己【41】的青铜尖刀和他的叙利亚—奇里乞亚圆柱形印章和 5 个封缄货物以防贼的甲虫形护符（Scarab），还有几块托鲁斯（Taurus）水晶——也许是让顾客观看的货样或者是私人的营利性投资品。其余的小班船员也许睡在甲板上，也许我们可以想像他们把蹄骨做成押宝的骰子，他们的饭碗里还有吃剩下的鱼、家禽和橄榄油。大量的青铜制木材加工工具可能说明木匠已成为船上重要的专职手艺人，他有工具箱，里面装有斧、锛子、圆凿、半圆形的凿和刀。青铜标枪可能是对付海盗的武器中的一部分，甚至也可能说明对贵重的货物有一两个护航队。虽然按当地的标准，盖利多尼亚的狭长的船绝不是一艘珍宝船，但它肯定非常值钱。1 吨铜和半英担锡能生产 50 件青铜头盔、50 件青铜甲胄、500 杆长标枪和 500 柄剑；这就足够武装皮罗斯的司令官和他的 16 个封建领主及其直系亲属，还可以装备 500 个骑士，实际上这就是皮罗斯邦的整个武装力量了。凑巧的是，皮罗斯宫殿的记载保存了这个国家处于警备状态时储备的青铜锭的数量；它们的储量加起来超过 1 吨，大致相当于盖利多尼亚沉船上的货物量。①

一只船装运着可能与王宫或者皮罗斯国家所贮藏的战略青铜等量的青铜，这一发现引起了本章中另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我们或许还记得，即使在约公元前 1900 年，一个亚述沙漠商队在从亚述到卡帕多西亚的旅行中能够重新出口 12.5 吨埃兰（Elam）人的锡，用的是 200 只驮畜。这种商队是向西北把锡运送到安纳托利亚的卡尼什的正规商业网络的一部分，再从那里把大部分的锡向西重新出口到叙利亚—奇里乞亚的海滨城市，迈锡尼“商

---

① 文特里斯和查德维克：《迈锡尼希腊》，第 356 页，皮罗斯第 256 号。【35】

人”从这些港口把锡运回到迈锡尼城邦。[①] 目前这种状况不足以说明迈锡尼城邦锡的供应量经常不足——迈锡尼青铜窖藏的缺乏说明了它们的再利用系统的有效性，而且从单个的亚述沙漠商队一次供应的 12.5 吨锡足够所有 12 个迈锡尼城邦锡的储存这一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出口和转口贸易确实表明锡在一般情况下是充足的，但非常贵重，这种供应对处于迈锡尼干预范围外的政治形势十分敏感；与叙利亚—奇里乞亚当权者的外交——通常是不利于赫梯利益的——必定是迈锡尼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 [42]

从理论上讲，迈锡尼城邦经济显然是自给自足的，铜和锡以及等级社会为了标识他们的官衔和地位而用的许多奢侈品除外。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海岸的人民以高价零售这些必需品。因此，迈锡尼海上冒险家为了获得更加便宜和更可靠的特产和珍奇供应，不断地开发欧洲海岸线，从策勒尼安海到多瑙河三角洲。这些迈锡尼远征的影响对中欧文化而言，基本上是外围的和非直接的，但是人们在通往金属丰富的意大利海岸的许多南部遗址的路上经常发现迈锡尼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坛，而在一些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海滨窖藏中则可以发现爱琴海——安纳托利亚风格的短剑、匕首和彩陶珠。

在多瑙河三角洲，受维滕堡和蒙特鲁文化交叉影响的一些酋长国的富裕酋长控制了中多瑙河的商品向海岸、爱琴海及安纳托利亚的小饰物和发明向喀尔巴阡山以外的文明地区的互惠流动。马车和马车具显然是这样的发明，它很快就成为像奥托曼尼部族那样的中欧文化中的酋长阶层的必备之物。马车具的一个有趣的特征是在马勒带、马车镶嵌图案和马鞭上刻上非常受人喜爱的“干草堆”图案，从欧洲到爱琴海都是这样；也许在匾牌上的波状“干草堆”图案说明迈锡尼也有类似的情况。[②] 现在还不清楚这种图案的起源，但是通过奥托曼尼和维滕堡的彩陶和青铜器变化，我们发现它们与南巴尔干的古梅尔尼扎和沙尔卡扎的手工制品图案有着某种联系，这就表明这种利用形式，这种图案和马匹可能是通过色雷斯的著名马匹牧场传到迈锡尼的，而不是相反。但是，一般而言，人们可以把迈锡尼在东南欧海岸的商业活动与阿拉伯商人在公元 9～12 世纪在东非海岸进行的贸易相比拟。

晚期迈锡尼海上网络发展的意义可以根据它的总体经济和政治背景做出比较好的评估。起初，迈锡尼酋长国只不过是联系爱琴海诸岛人们、克夫丢人海上网络的野蛮获利者，其中，克里特在公元前 1600～前 1450 年占主导 [43]

---

① J. C. 加丁（Gardin）：《在计算机的模拟下重建古代东方的经济网络》，载 D. 海默斯（Hymes）主编：《考古学中的计算机应用》（海牙，1965 年），第 378～391 页。【36】

② 文特里斯和查德维克：《迈锡尼希腊》，第 408 页。【37】

地位。希腊大陆城邦的兴起似乎在迈锡尼征服克诺索斯人和克里特于公元前1450年臣属于独立的迈锡尼王朝时而达到了顶点。大约与此同时，迈锡尼商业殖民地开始出现并侵入了以前的克里特商业网络——米特丢斯、罗德岛、特尔阿查那、拉丝沙姆拉、拜波洛斯、吉泽尔、莱利迪和尼罗河三角洲。自约公元前1400年后，科斯（Cos）和佐泽卡尼索斯岛（Dodecanese Islands）都处于迈锡尼霸权之下，在罗德岛和塞浦路斯岛上建立起更多的基地，这样就引发了更大程度的沿叙利亚—西里西亚海岸的商业进入。希腊大陆及其群岛因而能形成一个互惠的网络。这个网络能很好地为资源不足的各地提供资源，它的地理位置非常有利，能把黎凡特和塞浦路斯的商品运往东南方，把安纳托利亚和黑海的商品转运到东北方，把意大利—西西里的资源运送到西方。但是不应把迈锡尼网络的扩张想像为协调良好的帝国事业。至少在起初，它可能只不过是迈锡尼各王朝的年轻王子们对克里特立脚点的争夺，在史诗所记载的著名的、充满了冲突的远征中，他们只是偶尔地、暂时地统一行动。实际上，荷马史诗——及其对爱琴海相当准确的知识和对墨西拿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以远的海岸和海岛的相当模糊的了解——似乎准确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的航海历史，它是一种以中世纪的行吟诗人的方式，利用水手的传说来修饰的古老而著名的故事。

1.6 殖民网络和青铜技术晚期：约公元前1200～前600年

迈锡尼时期标志着相互联系的城市、税收国家经济的近东网络扩展到希腊半岛，因而把欧洲的边缘与世界上的两大帝国——赫梯和埃及帝国——以及繁忙的贸易城市黎凡特联系起来。迈锡尼王室经济的中央集权和文官阶层代表了城市文明边界的重要扩展——一个城邦、王国和军事帝国组成的世界——因而也是欧洲内陆由图腾氏族、部落和部落酋长国组成的野蛮世界的[44]萎缩。但是迈锡尼王朝的精英成为统治阶层，它的亚文化——建立在部落社会之上——是市区之外散布于农村地区的村庄下层；这个部落社会在希腊古典时期仍是一个运作良好的系统。

公元前1200～前1100年左右的那个世纪成了一系列重要事件的分水岭，这些事件使文明世界转型并直接促成中欧部落民的进化。从历史意义上讲，仅以一系列政治事件来代表这种改变是非常吸引人的做法，但是在这里

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真正的分水岭被整合成相互作用诸因素的多面体，并由拥有巨大权力的经师所注意到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逐渐地得到显示。这个世纪见证了赫梯帝国的衰亡，迈锡尼城邦的分裂和埃及帝国被推回到自己的边境线内并遭袭击，还有从特罗德至加沙广阔土地上的人口重新定居。东地中海处于骚乱中，西地中海的殖民入侵狂热地开始，它以整个社区的定居代替了以前的商业据点。

在中欧，相反的事实表明有部族联盟的发展，可能还有些王国的规模和财富发展到了当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东欧，有迹象表明新的重要的社会经济结构以一种新奇的模式和富有潜力的方式出现——马背上的骑士的田园牧歌式的社会。然而在中、西欧和北欧青铜时代的晚期，技术的发展使青铜的生产达到了顶峰，这不仅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还提供了各种金属工具，并在不经意间传播了冶铁学的最初知识，这是随着赫梯帝国的崩溃而释放并传布开来的。这些地区性青铜技术的交换网络在当时达到了北极圈的边缘，深入到北部和东部的针叶林区。在其核心区，考虑周全的酋长国提供集市，确保深层矿井的劳力供应，维持源源不断的牛车和挑夫流、独木舟和平底船流，以便利主产品和小饰物的互易和循环。为了用毛皮换取青铜和谷物，即使在极边缘地带，那些在挪威森林和西伯利亚针叶林里的狩猎—捕鱼—采集者部落的生活也在不断地调整，伴随着这些古代部落组织变化而来的是完全意义上的酋长国的发展，个人财产和领土拥有权的增加，更多的炫耀设施和更多的进口精美装饰。【45】

在当时，共同改变地中海面貌和中欧文化的主要因素似乎包括气候趋势、骑士田园经济的兴起和大国政治环境的耦合。这些因素本身是相互联系的，并且必定受到许多其他起作用因素复杂得多的相互作用的调节。在地中海的城邦中，这些发展威胁着统治复杂经济的精英阶层和下层农民之间不稳定的平衡。异乎寻常的灾难产生的后果，加之瘟疫和对提供赋税的无止境的义务，容易产生不安定和较小规模的人口流动，这种流动反过来又导致内部的不稳定。这种社会不稳定又因为对外军事行动而严重恶化，因为城邦内处于敌对的皇族之间的相互冲突更强烈，最终演化为一种由机会主义的武装部队总司令领导——也就是由统治者的兄弟或叔伯或者一个敌对的派别领导的内乱。创建西地中海新殖民城镇的传说反复描述这样的难民，他们逃到斯库拉岩礁和卡律布狄斯漩涡以外的“新世界”寻求全新的机会和资源，首先是到达金属资源丰富和土地肥沃的意大利，但不久就去了北非和法兰西的南部，最终到达西班牙的“黄金国”。

在中欧，有事实表明，外部压力比起内部人口不断增加所扩大的经济能力来，作用要小一些，人口的增加不断产生更大的更复杂的政治组织。当时使东地中海不安定的气候因素肯定对中欧和北欧有利。野蛮的酋长国本身迅速地聚集于至少是最初的国家组织里，其中心处于以木栅栏设防的小镇，它们位于零散的农业部落共同体的中心。这种小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早期出现于多瑙河盆地的中下游，不久就扩散到上游，到达土地肥沃矿产丰富的阿尔卑斯山河谷地区，以及同样富有的波希米亚和波罗的海的维斯杜拉河谷的湖泊和溪流间。这些属于瓮棺墓地时期文化社区（culture group）的城镇占地2～15英亩，有200～300间木结构的房子，拥有也许500～2 000人，由一个酋长和他的随从统治，他们的居住地或者是定居点的一个设防的府第，或者是附近的单独的邸宅。把这些城镇与中世纪同样大小的木结构城镇以及与迈锡尼南部的自治城镇类比，同样是合适的。除在组织的程度、整体大小和建筑方面不同外，这些瓮棺墓地时期的城镇反映社会组织基础性质的有效性，只比迈锡尼略微差一些，其在许多方面都保存下来并发展成中世纪的类型。当它们分别在迈锡尼的匾额和中世纪的编年史中重现时，这些社会类型的相似性是很显然的。我们可以把已经讨论过的皮罗斯城邦比喻为1219年的沃尔海尼亚王朝的波罗的海省，它由5个大公统治，他们都居住在约15英亩的木结构自治城镇的设防府第中；并由16个地方公爵进行管理，他们则住在2～10英亩的小镇中更小的宅第里。①

【46】

中欧富裕的酋长国和最初的国家组织即王国模式的不断扩张，主要与瓮棺墓地时期文化社区的地方性文化相联系，它的命名来源于居住地附近稠密的火葬墓地。这个文化社区的“扩张”也许最好被理解为一系列组成因素的影响——作为被相似的社会环境中相似的人民所不断采用的扩张的社会类型不断蔓延的物质诱惑物，并被部落人口的移动和邻近部落的趋同性相互影响（convergent acculturation）所补充。这些过程传播的社会类型，它们所代表的经济类型和随其传播的种族集团，有助于晚期历史上出现的欧洲许多文化类型的产生；这种欧洲历史风景的许多要素在公元前约1200年就已经出现了。

因此，导致东地中海衰败的因素主要是中欧文化的影响和它们在西地中海及以遥远的欧洲海岸殖民的后果。气候因素被理解得最少也最难做现实的估计。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说约公元前1200～前600年还处于约公元

① 吉姆布塔斯：《波罗的海东南岸的居民》，第171页。【38】

前2000～前800年这段温暖而干燥的亚北风气候结束期，与约公元前800～前400年潮湿而寒冷的准大西洋气候开始期之间相交叉的时期。这种转型似乎伴随着存续时间短暂但对地区十分重要的波动，正如气候变化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种证据也是依环境而定的、不平稳的、不可靠的，但它的绝大部分表明了一种对普遍趋势的可能性的估计。这个推论的依据是希腊的内陆地区和安纳托利亚半岛在约公元前1250～前1000年遭受了异常严重的周期性干旱（drought）（大致与欧洲内陆的异常温和气候相一致）——这是一种伟大的文化繁荣的背景，也许与大草原游牧骑士的崛起有关。不管我们接【47】受这种气候证据与否，但至少有证据支持这一时期希腊内陆和安纳托利亚是干旱的，在一些地区伴随着饥荒、瘟疫和小规模的人口向降水更稳定的沿海地区移动。① 虽然必须着重强调这种公认的证据不能作为当时事实发生的原因，而仅仅是作为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这一因素在有些地区重要，但在其他地区就未必如此。

广为引用的第二个因素是西部大草原上骑马牧民经济的兴起和它们对一系列为新融合的经济活动所允许的独特小生境（peculiar niche）的不断渗入。这里，证据也是不完全的，也难以解释得清，但作一些澄清是可能的。可获得的证据表明，肥沃的蓬士斯草原最初被从事复合耕作的各种农业村落占据。家畜在这种草原环境下很繁盛，地方的野马群肯定在约公元前2500年就仅作为"无角"牲畜的另一个变种而被驯服。约公元前2500～前1500年，从高加索（Caucasus）一翼来的定居的游牧部落不断地扩展到大草原的东部，似乎控制了大部分用于牛车或战车的畜群。无论如何，东西草原的各部落可能已经从事一种稳定的乡村经济，这种经济使在村庄周围草原饲养家畜的人同在肥沃的土地上种植谷物和水果的人之间相互依赖。这种活动一直持续到近代哥萨克（Cossacks）人的村落，正如希罗多德（Herodotus）所证实的，从来没有一个历史时期草原仅被游牧的骑马民族所占领。

到约公元前1500年，马已被用于拖拉战车，但除了马夫和信使使用外，其他的人很少骑乘。但是，在约公元前1500～前1200年，大量的马鞍和马勒的使用已经把草原环境改变了许多，骑马民族的到来使大草原某些印第安农民转变成为草原上的野牛狩猎者。鉴于骑在马上很舒服而且可以控制，马背上的猎人现在能轻易地控制大量的兽群，并不断地开发更广阔的草场。按照一种社会类型的细胞分裂法，在社会亚文化之间的劳动分工现在成为各自

① R. 卡彭特（Carpenter）：《希腊文明的不连续性》（剑桥，1966年）。【39】

分开的专业经济间的一种独立的文化共生关系；乡村与在它各个间隙活动的骑士继续共存。在喀尔巴阡山这一翼，似乎有一些本地的辛梅里安、色雷斯[48]和弗利吉亚的部落，他们不断地适应未开发的草原，这些草原在干燥的准北方时期断断续续地从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姆（Dobrudjam）经保加利亚的色雷斯，一直延伸到马其顿和塞萨利。这样，到约公元前1200年，一群骑马部落分散在色雷斯平原上他们的农业部族中间；一支军事上强大但是缺乏组织的力量在北部安纳托利亚与色雷斯平原草场上势力对敌。

在探讨弗利吉亚人对北安纳托利亚的渗入前，必须概略地说一下相关的背景，这是约公元前1250~前1100年世界各帝国的政治环境，也是促成随之发生的事件的第三个因素。这种环境是随作为传统的重要战略原材料、特产和奢侈品来源角色的黎凡特城邦——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的统治者所共同利用——当时被迈锡尼王国所占领而开始的。随着公元前1460~前1220年间赫梯帝国的繁盛，黎凡特逐渐成为赫梯国王和埃及法老进行权力斗争的中间地带。在约公元前1286年那场非决定性的卡叠什战争期间，这种冲突达到了顶峰，在这场战争中，赫梯国王穆瓦塔利斯大规模地集结他的同盟者和从安纳托利亚海岸来的雇佣兵，以对抗拉梅塞斯二世和他的封臣及助手的军事远征。

作为追求其南部帝国梦的有用基地，后期赫梯国王把他们的帝国重组为两个省：在后方的本省包括赫梯本部和由王室总督控制的首都哈图萨斯（Hattusas），而前方的省包括南部安纳托利亚，它是军队和作为总司令的赫梯国王的军事基地。这种不平衡的态势表明北方能被轻易地控制，因而国王和他的部队遵循一种南下扩张的政策。但是很快，帝国首都哈图萨斯遭到北方的卡斯基部落的洗劫，西部的附属国阿尔萨瓦（Arzawa）和阿苏瓦（Assuwa）在他们的迈锡尼化的海滨邻居吕迪亚（Lydia）、卡里亚（Caria）和吕基亚（Lycia）的帮助下起来造反。公元前1275年，由于国王不理政事，其叔父篡夺王位，经过一场简短的内战后，成为哈图西利斯三世（Hattusilis III）。新的赫梯国王们现在为巩固他们的本部而战，连续组织了对叛乱地区的军事远征，其中包括大约在公元前1260年迈锡尼对特洛伊的远征时期在特罗德发起的一次战役。

在亚努万达斯四世（Arnuwandas）统治时期，北部和西部的局势再次迅速恶化，而且这次是比较协调一致的行动，西面由附属国和它们的联盟"海岸民族"进攻，北部由卡斯基人和缪西吉人进攻——他们是穿过博斯普[49]鲁斯海峡的弗利吉亚骑马民族，也许与卡斯基人有关系。约公元前1230年，

阿扎瓦被吕迪亚附庸国的国王马都瓦塔斯强占，这次行动得到了阿塔利西亚斯（Attarissiyas）——滨海的阿海亚瓦的一个王子的帮助——阿海亚瓦可能是卡里亚以米利都（Miletus）为中心的一个亚该亚（Achaean）国家。更北的阿苏瓦地区被卡斯基和弗利吉亚的骑马部落占领，现在处于米达斯王子的控制下。但是弗利吉亚骑马部落史无前例的军事优势和赫梯联盟内部的混乱不久就使这股新力量转而反对阿扎瓦和吕迪亚、卡里亚和吕基亚沿海民族；由于赫梯帝国的武装部队要保卫首都哈图萨斯周围的领土，因此没有什么能阻挡入侵者的蜂拥而入和难民的暴乱。在他们第一个据点建立后的100年内，弗利吉亚的缪西吉部落巩固了西安纳托利亚，甚至袭击了北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并与拥有5个酋长国并统领20 000骑兵的亚述国王提格拉·帕拉萨一世直接冲突。

赫梯帝国的粉碎，对经济上相互联系的黎凡特、埃及和迈锡尼希腊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公元前1227年，“来自各地的北方人”乘船袭击了尼罗河三角洲，这些人包括在卡迭什战争中赫梯的许多海岸同盟——吕基亚人、阿希亚瓦人（Ahhiyawans）、也许还有撒丁人（Sardians）。这第一次浪潮的代表者可能是由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沿海居民最初进行的成功叛乱而产生的军事冒险家和一些惟利是图的海盗——他们拥有安纳托利亚—爱琴海最新时尚的装备（各部落并不一样）：鸡冠状头盔，板状的胸甲，爱琴海短剑，圆形的骑兵和步兵盾；有意思的是后期的希腊传统把这些军事发明归功于卡里亚（Caria）和吕基亚。

但是，与公元前1196年的第二次袭击相比，第一次袭击产生的影响不大，也许这相当于弗利吉亚对安纳托利亚海岸的全面入侵并乘胜前进到西南海岸。这次由北方组成的船队直达黎凡特海滨，并辅之以由马车和男人、女人及坐在牛车上的孩子组成的陆上部队——整个民族都动员起来了。埃及的书吏这样记载：

> “海滨人联合起来了，他们离开自己的土地，他们的人民分散各处。他们从赫梯、库德（Kode）、阿扎瓦和塞浦路斯一直向前，没有一个地方能挡住他们的进攻。他们在叙利亚扎营，他们使那里的人民妻离子散，使那里的土地破坏殆尽；他们以火开路，一直向埃及挺进。”

埃及帝国军队被迫撤退到三角洲，在那里，拉梅西斯三世成功地抵挡住了入侵，但把巴勒斯坦丢弃给了入侵者。各种难民在巴勒斯坦海滨和塞浦路斯的部分地区定居下来，在那里，他们成为非利士（Philistine）人，成为继 [50]

帕勒塞特人后迈锡尼化的“海滨人”联盟占主导地位的集团。

不幸的是，迈锡尼的衰落并没有在他们的刻写板记录中载明，我们必须依靠考古材料，并由石板的间接暗示和后来的传说来补充。但是考古材料勾勒了两个严重的痉挛期，第二次的结果比第一次更具关键：约公元前1230～前1200年的第一次动乱和约公元前1130～前1100年的第二次剧变。在第一个痉挛期，迈锡尼城邦网络由于许多主要城堡包括迈锡尼、蒂莱恩斯、米第、皮洛斯、戈拉（Gla）、齐古尔里、普罗西姆纳、伯巴提（Berbati）、克拉库和其他城邦因大火和破坏而陷入严重混乱状态，但是并没有被外族入侵的证据。陶器的分布表明与之相关的人口从内陆向外，朝向伊奥尼亚群岛和伊庇鲁斯（Epirus）的西海岸移动，也向东朝向罗得岛和塞浦路斯迁徙；这种迁徙也许与希腊内陆不断变得干燥有关系。在第一个痉挛期，大多数政治中心被毁坏和废弃，但迈锡尼城堡的外城被毁坏后幸存下来了。第二个痉挛期在约公元前1130～前1100年，它以迈锡尼完全被毁坏、匆忙修建的横穿科林斯（Corinth）地峡的防卫性城墙被放弃和伯罗奔尼撒文化决定性的改变为标志——不再有文字记录，不再有宫廷官僚，它采用色雷斯原生模式，这看来是一个部落农民组织在底层的复活。个别的城堡例如雅典幸存了下来，但是独立的中央组织迈锡尼城邦网络却永远被毁坏了，它的统治阶级变得毫无能力。①

迈锡尼后期的石碑上的标志仅能用于推论大动荡在城邦系统内大致属于什么类型。迈锡尼城邦似乎是建立在宫廷和城镇之上的财政构造物，它资助和组织并与其他城邦和帝国在一个相互适应的国际网络中进行贸易——这个网络建立在通过货物交换财政岁入的基础之上。除对农村剩余进行征收以获得岁入外，迈锡尼希腊的村落在许多方面超出了从雄伟的王宫进行统治的王朝的亚文化边界。村落网络提供了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在面对激烈变动时显【51】示出非凡的稳定性；外贸可能波动，君主和封建领主抢劫城镇和宫廷，但是农村建构在一种坚忍的连续性上。除强索岁入外，国家的管理很少关心农村的组织。赋税是非常重的，在歉收或灾年就难以提供剩余；假如这些灾难与外部动荡和混乱相伴而来，那么，为了支撑他们的行政管理系统和组织防务，统治者总要征调更多劳力，征收更多的物品。这样做的结果是进一步导致了农民的不满；随着储备不断减少，在灾难和失望的边缘，那样一个灾难相互作用的累积系统，假如相关条件一起作用的话，带给这个国家的将是内

① 卡彭特：《希腊文明的不连续性》（剑桥，1996年）。【40】

部暴乱和外部入侵相互交织的混乱状态，这种局势不可避免地被敌对王室的机会主义干涉所恶化；同样的模式似乎勾勒出了引起赫梯崩溃（已有描述）的一般要素。①

最后，我们可以求助于荷马时代幸存的史诗般传说的启示，虽然我们必须记住，像撒克逊人的编年史一样，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对其祖先和新上台的上层阶级提供一种体面的解释。但是，这些传说需要对事实加以扭曲以讨人欢心，而不纯粹是编造谎言，由其推断的迈锡尼时期的画面是完全合理的。

有意思的是，史诗描述了在多立斯时期（Doric period）前大约10代人的一段历史，不管如何具有传奇性，它们的结构总是相同——“赫拉克里兹人之子”彼塞德部族和突然发迹的“作为泰耶斯蒂兹人和阿特雷兹（Atreids）人之子”比罗皮兹家族之间的争端；赫拉克里兹人回到了本该属于他们的领土暗示了多利的入侵和一个完美的结果。一般而言，这些传奇描述的是因统治阶层由联系相对较少的皇族组成，因此处在不同统治中心的王朝陷入了一个家族盟友和敌人不断变化的模式。

传说表明，入侵的比罗皮兹王朝在迈锡尼篡夺了彼塞德人的地位，后者不断地策划伺机恢复在伯罗奔尼撒的权力——恢复皮罗泼斯王国。同往常一样，作为泰耶斯蒂兹人和阿特雷兹人的比罗皮兹皇族本身争夺在迈锡尼的继承权，直到阿特雷兹人的竞争者奥雷斯忒斯人被驱逐到他们祖先所在的亚洲海岸为止，然而泰耶斯蒂兹人的后代统治着迈锡尼。那时的史诗与一个动荡的时代相联系，它与第二次痉挛隔了两三代，正是这两三代被厄运所拖累——“与命运做斗争”。第一次大动乱是奥雷斯忒斯人回来并对彼塞德人的根据地发动了广泛的复仇斗争。奥雷斯忒斯人之子那时正遭受接连不断的恶兆、灾难、饥荒和瘟疫，仅赫拉克里兹人（Heraclids）由于与他们的塞萨利盟友多利人结盟才得以胜利回归，他们长期反抗驻扎在伯罗奔尼撒的第撒蒙尼斯国王的战斗才算结束了。被两三代人分开的两次痉挛把我们带到两个考古学上的大变动期：约公元前1230～前1200年和约公元前1130～前1100年，它们之间相隔约100年，但从史诗上看却相隔300年。【52】

我们不应对古代史诗的任何细节都相信，但是传说大体上是可信的，并且与来自石碑的推论、考古材料和赫梯帝国的衰落事实十分吻合。似乎有些迈锡尼城邦合作起来对特罗德岛发动了机会主义性质的远征，也许还一起与

① F. C. 贝利（Bailey）：《种族和经济前线》（曼彻斯特，1957年）。【41】

安纳托利亚海岸的其他部族战斗过，时间约在公元前1260年，当时正是赫梯的外部附属国和它的海岸联盟处于大范围动荡的时期。在进行这些远征的空隙，政治竞争引发的不稳定也产生了针对泰耶斯蒂兹王室的一次政变，这事发生在阿特雷兹人从他们的著名海外远征回来后不久。紧接着，被驱逐的阿特雷兹人的竞争者奥雷斯忒斯人回来了，重新夺取了迈锡尼并继续发动对敌对的彼塞德人的根据地的进攻；这段时期与第一个主要动荡期即约公元前1230~前1200年大致相当。内战与同时起作用的经济因素和内部混乱一起，颠覆了迈锡尼霸权的不稳定平衡，同时代的赫梯和黎凡特的商业网络遭到破坏，这导致政治经济状况迅速恶化。也许，我们可以随意地把围绕奥林匹斯的多利部落的不稳定和赫拉克里兹人反对塞萨利的圣托尔斯人的传统英勇行为归于经常抢劫的色雷斯—弗利吉亚"骑马部落"分支在最南边活动的影响。无论如何，王朝的阴谋，经济上的困难，内部的混乱和灾荒一起导致了迈锡尼城邦商业网络的破坏，其速度就像它们对赫梯帝国的瓦解一样快。

东地中海城邦的衰败大约与中欧酋长国和部落联盟的扩张时期相当；就经济剩余、青铜技术、社会组织和武器制造等方面而言，中欧与地中海欧洲当时处于大致相当的水平。瓮棺墓地文化时期繁盛的社区已经扩展到迈锡尼[53]世界的马其顿和意大利边缘；从这些地方来的部落雇佣兵和军械士甚至已经小规模地卷入这些爱琴海没落王朝的纷争中——显然，在保护迈锡尼王国和他们的西部海上联盟时，这些人是带着锋利的剑、叶状的枪矛和突起的盾牌而来的。在这些向中央扩展的瓮棺墓地文化时期的人民外，是大西洋和伊比利亚的一些零散部落，他们居住在边缘地带使用的青铜技术和武器样式都是早已在中欧地区过时了的。但是，不断扩大的瓮棺墓地文化网络中心的发展似乎带来了一种局面，那就是内陆欧洲的金属资源不断地为瓮棺墓地文化所有的瓮棺墓地工具的生产和分配做出贡献，形成了一个集中的"共同市场"。这种状况似乎逐渐使大西洋和伊比利亚海上文化越来越依靠逐渐通行于这个偏远的"自由贸易区"内的金属供应；不列颠、爱尔兰、布列塔尼、加利西亚（Galicia）和西班牙因此在同一个网络内交换商品，网络的外围包括丹麦和撒丁，与他们交换的主要有锡、铜、青铜、金银加工品。

这种"大西洋青铜时代"是在约公元前1000年后最先作为西地中海与大西洋之间一种重要的经济联系而出现的，并在约公元前900~前300年通过在最南端遭到腓尼基人组织良好的惟利是图的海军的渗透而达到顶峰。后来，大规模的金属商业交易似乎刺激了"中间人"的发展，伊比利亚王国像塔特索斯国王阿甘索尼奥斯（Arganthonios，king of Tartessos）一样建立在

这种重组分配的经济基础之上。腓尼基人沿欧洲海岸的贸易加速了野蛮时代的欧洲向更复杂的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正如阿拉伯和葡萄牙的奴隶、象牙和金属贸易刺激了非洲的加纳（Ghana）、马里和桑海、伊费、贝宁、津巴布韦、巴航哥和达荷美国家的发展一样。

大西洋海上网络也许只在从地中海引进帆船和有龙骨的狭长船以后才开始有效地存在，在大约公元前900年也许还在腓尼基人的控制下。在南大西洋水域帆船的出现现在允许建立在有经济意义的规模上的正规的、长途的、双向的贸易。即使这样，零星的证据表明大西洋海上网络建立在一个相对适中的、季节性的、短途的只在两个相邻的中心之间通行的基础上——从不列颠到布列塔尼再到加龙河，从加龙河到加利西亚，从加利西亚到塔霍河，从塔霍河到加迪斯（Gades）和塔特苏斯。也许直到约公元前450年迦太基人海米尔科和约公元前310年马塞利亚人皮西亚斯进行了长途的探索性航行后，船长们才开始试图航行这条贸易通道的全程。[54]

大西洋网络所拥有的商品的特点在特色青铜加工品的分布和由科莱尤斯（Claeus）、迈达克里图斯（Midacritus）、海米尔科（Himilco）、皮西亚斯（Pytheas）和其他早期没留下姓名的船长们的早期航海记录中保存了下来。看来，陶器、盐、青铜餐具、油、葡萄酒被运到北方换取爱尔兰的铜、金和青铜，科尼什和布雷顿的铅、锡、琥珀和毛皮——这些东西是从赫里格兰德（Heligoland）转运来的——还有从各港口运来的谷物、奴隶、皮革和狗。再一次，我们幸运地拥有从这个网络的不同国家打捞起来的两只船上的零散遗物。其中一船上的一部分货物是从南西班牙韦尔瓦（Huelva）的奥德尔（Odiel）河河口打捞起来的，其中包括被紧密地堆作一团的青铜工具、武器和金属残片，另一部分货物是青铜剑、斧、匕首和伊比利亚的工具，还有一些爱尔兰、法兰西和撒丁风格的和约公元前700年塞浦路斯风格的腓尼基扣针。另一只船的残骸来自同一商业网络的东翼，由来自贝济耶（Béziers）的潜水员发现，其位置在靠近纳博商业中心的莱昂斯（Lions）湾。这只船装有760件青铜工具、武器和小饰物，还有半吨多的铜锭（也许来自伊比利亚或撒丁的铜矿）；这船货物经测定时间为约公元前800年。① 爱尔兰手工制品，包括大锅和金项圈因其他大西洋伊比利亚人的贮藏而有名，而大西洋青铜因几个撒丁人的贮藏而与散布在从韦尔瓦到黑德亨基斯特堡的撒丁风格相辅相成；同样，普遍刻有浮雕的青铜盾牌和带角或带冠的头盔，也把爱

① 巴斯：《水下考古学》，第87页。【42】

尔兰、西班牙、撒丁和丹麦联系起来。这些船的残骸表明，航运主要由本土王国如维内蒂亚和塔特苏斯的熟练海员操纵，但是他们自由地在各地航行并进入腓尼基中间人掌管的港口。因此，腓尼基—伊比利亚的贸易是一个广泛的贸易网络的一部分，这个网络连接大西洋欧洲海岸和地中海诸城邦的集市，航运的商品数以吨计。

腓尼基人殖民网络的扩展和有效利用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扩大了大西洋贸易，并把它的社会经济影响在欧洲外围的部落民中传播开来。黎凡特[55]港口的腓尼基海员是古代世界中最有经验的海员之一，他们是与航海历史一样古老的海上传统的继承人。迈锡尼人给这些青铜贸易者取的绰号是“红皮肤”，盖利多尼亚沉船残骸提醒我们，东地中海海上航运的大部分可能都掌握在黎凡特人手中。迈锡尼人在黎凡特和塞浦路斯港口都有其商业区，但是他们的海上网络主要是补充黎凡特人的海上网络，其中心位于安纳托利亚的爱琴海岸和意大利及西西里的伊奥尼亚海岸，它仅从外围探察利用欧洲通过多瑙河入海口进入亚德里亚海和进入第勒尼安海的可能性。但是，迈锡尼城邦在约公元前1100年衰落的同时也失掉了集市、财政资助和社会环境，这些曾刺激了迈锡尼年轻的投机性王室对竞争性商业开发的投资，他们急于资助自己的王朝同党上台；绝非偶然，史诗中大商船的船员都由贵族组成，或者他们的冒险成为依附于他们的宫廷诗人反复吟唱的主题。由准迈锡尼商船进行的个别贸易肯定在继续，但是其经营的规模和胆量一定随着支持他们——具有竞争力的迈锡尼精英——的集市的缩小而缩小。

腓尼基的商人因此能够利用他们的迈锡尼竞争者在西北部消失的机会，穿过已被迈锡尼航海家标画出的西西里海峡迅速地占领爱琴海集市。早期腓尼基人在西地中海的开发探索也许可追溯到约公元前1100～前1000年，他们逐渐在北非海岸标绘锚地，并因此提供了列普蒂斯、迦太基（Carthage）甚至海格立斯之柱之外的加迪斯的传统“创立”日期。考虑到对西西里海峡的既有知识，北非海岸良好的供应能力以及这些地区人民和伊比利亚人民之间早就存在的海上联系，腓尼基人向西的快速扩张是可以理解的。到公元前10世纪，西地中海的南部半弧成为腓尼基人的内海，它被新城市和有文化的西部西西里、撒丁、巴利阿里定居点所包围，这些定居点连成一个港链，一直延伸到卢森图姆的阿夫季拉（Almeria）海港、阿布杜勒·马利克，终点是大西洋的前哨加迪斯和塔雷所斯海岸的奥诺巴。

早期腓尼基人的探险绝不限于后来成为迦太基人联盟主要中心的西地中海南部半弧。越来越多的材料表明，在埃特鲁斯坎人（Etruscans）和迦太基

人之间的联盟只是过去在约公元前 1000～前 900 年间两者亲密关系的一种延续。腓尼基人早期从南部的迈锡尼基地扩张到商业中心（该中心实际上是在埃特鲁斯坎与拉丁的海岸以及撒丁与西西里的四周）之后，似乎已经从第勒尼安海撤退了。埃特鲁斯坎从维朗诺瓦（Villanovan）部落出现后转变成最初的国家组织联盟，它集中于新的意大利城市中心，周围是腓尼基人在普里卡姆和其他地方的贸易港口。这种所谓的“东方化”艺术风格标志着埃特鲁斯坎城邦从古兰诺瓦半岛崛起，它实际上是腓尼基“艺术新发明”华丽的折中混合物的明显特征，在从黎凡特和塞浦路斯到希腊和克里特岛的地带都有发现。腓尼基人的玻璃、象牙、珍宝、金银碗、青铜器具和扣针出现在更富裕的埃特鲁斯坎酋长国，它现在能用大量的来自储量丰富的维图朗尼亚和波普洛尼亚的铜和铁来支付。这些乡村似的吉兰诺瓦酋长国在约公元前 800～前 500 年迅速崛起，包括 12 个著名的埃特鲁斯坎联盟和第勒尼安海洋政权。因此，埃特鲁斯坎和塔特苏斯酋长国是对西地中海殖民扩张的间接产物；毫无疑问，它甚至超出了这些海滨城邦，对更遥远的地区也产生过类似的政治影响。 [56]

腓尼基人及后来的希腊人入侵西地中海是一种新现象；它并不局限于建立小小的商业“专区”，而是在一个先进的有文化的殖民城市网络中建立完整的社区性永久居住地。腓尼基殖民者开始把这种城邦国家的复制类型扩展到西地中海的海滨，并建立起一个殖民的海洋政权，把全部冶铁技术和所有文明城邦的要素引进到地中海的意大利、法兰西和伊比利亚的欧洲部落民族。这种在约公元前 900 年由腓尼基人对大西洋海上网络南端的渗透，最终把欧洲外围的经济纳入到地中海市镇的市场之中，这个过程由于希腊人的殖民定居和在约公元前 750～前 600 年与凯尔特语的法兰西和印欧语系的意大利的贸易，以及约公元前 600～前 300 年对埃特鲁斯坎阿尔卑斯山的殖民与中欧的贸易而迅速加强。

1.7 殖民帝国和前工业时代的铁技术：约公元前 600～公元元年

这个时代一个标志性的变化是欧洲“地中海化”进程的加速，这个过程持续到近代，直到北方工业国家的经济优势使这股潮流得以逆转为止。界定这一欧洲文化加速转型的临界点的要素包括：准大西洋气候的波动，欧洲 [57]

对纯铁冶炼技术的采用，欧洲城市中心的发展，地中海城邦对欧洲事务的政治经济干预，以及地中海利用铸币和现金的市场的出现。这些变化的分布和意义在各处是不平衡的，南部比北部更明显一些，但是它们一起预示了欧洲部落社会的结束和封建民族国家的来临。

准大西洋气候波动很快就代替了温暖而干燥的青铜器时代准北方气候，进入了我们欧洲现在的气候类型。这种波动使得约公元前 800 ~ 前 400 年以一个相当严峻时期开始，那时甚至比现在更冷更湿。山毛榉和角树代替了南方的橡树林，在流动更快的凉湿空气笼罩下，中欧和地中海欧洲的农业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在遥远的北方，这种气候波动使富饶的河谷草场成为沼泽地，其蔓延使河谷草场名存实亡；更贫瘠的冰川冻土很快就退化为沙荒地，大西洋海岸的森林也最终消失了。在斯堪的纳维亚、不列颠和阿尔卑斯山的高山内陆，森林线与其鼎盛时相比后退了大约 600 英尺；这样，在有利的条件下，有些地区进一步变成了季节性迁徙或狩猎的牧场。在中欧低地，肥沃的土地由于使用铁斧和牛犁而不断地从森林中开发出来，然而再向北，酸性的德意志荒地发展成它们现在的模样，其延伸成内陆的希伯诺—斯堪的纳维亚沼泽地和小池塘。随着在斯堪的纳维亚耕作条件的退却，在挪威和斯堪的纳维亚山地集中狩猎、设陷阱、放养驯鹿的机会扩大了；在欧洲各地高山谷地的农民，不断发展这种季节性利用裸露山地草场的技术。简言之，有记载的欧洲习俗开始从既存的更古老的类型中显现出来。

在准大西洋气候条件下，中欧和地中海欧洲的大部分凯尔特人（Celts）土地开始繁荣起来，然而横跨日耳曼海的条顿地区却遇到人口增加、可用耕地面积缩小和地力减退的限制，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一度推进到北极圈的边缘农业边界，现在又往南回撤了很多，条顿部落面临着领土调整导致的日益严重的问题。然而，凯尔特部落向西扩展到莱茵河和埃布罗河之间的繁荣土地，向东进入了巴尔干；条顿部落则到东南部去寻求生存空间，越过易北河进入斯拉夫的领土南波罗的海森林。这样，斯拉夫人被夹在不断扩张的条顿人、凯尔特人和斯基台人之间，于是被迫去侵食自己波罗的海东邻的领土。气候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开始出现并最终一起刺激了北方人口在大迁徙时代大范围的重新配置。

【58】

约公元前 800 ~ 公元前 500 年，欧洲部落民对铁技术的迅速采用有助于青铜器时代晚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类型进一步瓦解；过去的中心现在成了边缘，从前的边缘现在具有了中心的意义。欧洲内陆在高质铁矿储量方面远比地中海沿岸地区丰富，因此西欧和中欧反而变得比巴尔干更富裕；曾经与

地中海地区建立起的大致平等，现在被有利于中西欧的局面牢牢替代。新的战略资源使野蛮人的土地具有更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并最终由于煤炭的出现而实现。钢铁在当时提供了更便宜、更丰富、更耐久和更锋利的武器和工具，而青铜加工品转变为装饰物和餐具。昂贵的青铜制品被更具平等色彩的钢铁器具所代替；即使犁、鹤嘴锄和铲当时也能用铁制造了，便宜的铁钉或夹子能自由地用于更复杂的结构上。而且，新的铁器和犁刀能够更大量地开垦更肥沃更多黏性土壤的冰川期欧洲辽阔的未开发土地，而集中在薄薄的石灰岩和砾岩的表层活动的旧青铜器时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过去拥有青铜装备的精英特权集团继续作为拥有铁器装备的新社会精英，但是普通大众的军事和经济能力不再像原来那样紧紧地被酋长似的中心人物控制；铁成了自钻石取火和石器技术以来最“民主”的原材料。这种在部落力量内部平衡发生的亚文化转变，其重要性绝不亚于作为欧洲重要的农业和经济中心的领土转变。在欧洲部落内部广泛存在的社会不稳定在这时成为一个同部落间的不稳定一样有意义的因素。年轻的贵族和武士现在能更容易地一起篡夺部落的权力了，甚至完全分离出去作为抢劫者和雇佣兵游荡于文明社会的边缘，这使老一代人大失所望。酋长国和王国倾向于成为寡头，部落的解体开始了，部落式“自由人”的出现当时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差不多都有可能了。 [59]

重要的铁技术沿着一条广阔的通道传播到欧洲，在经过长时期的渗透后，铁器仍是昂贵和特殊的金属，仅适合做装饰用。铁器在普通炉温下不易熔化，因此它不能用生产青铜工具所用的大规模生产技术来铸模——让人困惑的是铁如果软的话就没有用，硬而脆的话则会达到一个难以控制的点，它既可以锋利和明亮，也可以钝和锈蚀；对控制铁的特性起作用的因素要求对它有一个新的理解。尽管早期安纳托利亚人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且赫梯人很快就理解了用于匕首和短剑的薄铁刃锋利的原因，但是，这些铁器的生产从约公元前2000年一直到赫梯衰亡的约公元前1200年间都是非常有限的。传统上，赫梯帝国的衰亡和它的边境部落的四散总被认为是铁技术从地中海传播到欧洲的起点。但是，现代的证据表明在铁技术被兴趣迥然不同的青铜工匠真正赏识之前，铁就已逐渐扩散开来，这两者之间存有非常明显的时间间隔。

到青铜器时代中期结束时，铁的知识肯定传到了多瑙河东部，这从约公元前1300年加诺维（Ganovce）的奥托曼尼遗址中出土的铁柄青铜匕首上可

以看出来。[1] 现代材料表明在较早的"进口时期"安纳托利亚铁器被作为礼品赠送给远方的当权者，甚至被这些接受礼品的人重新分配给他人——铁在约公元前1500～前1200年可能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巴尔干、迈锡尼希腊和克里特、黎凡特和埃及。在铁器进口和对进口铁器重新加工的早期，即在约公元前1200～前1100年，多瑙河中游地区引进了铁制的饰物和铁丝镶嵌的图案，与此同时或稍早，相同的特点也经由海上传到了意大利大陆。但是，在约公元前1000～前800年，本地铁的生产开始出现，它在许多武器和工具上逐渐代替了青铜，这些工具最初只是一味模仿青铜器；巴尔干、多瑙河河[60]谷、希腊和意大利当时开始开采和熔炼他们自己的矿藏。在西部，腓尼基人的贸易据点在约公元前900～前800年把铁制品引进到南伊比利亚半岛，有些关于铁金属的知识从那里传到了大西洋海上网络。但是在大西洋的西部和西徐亚（Scythian）的东部，由于本地的青铜供应充足，青铜武器和工具的生产在这些地区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

有助于欧洲部落王国政治经济转型的第二个因素是欧洲自身城市中心的发展。讨论当时城市的定义是很费时间的，但是，大致说来，我们可以把早期城市归为四类：头两类在风格上是地中海式的，后两类的发展一方面是本地土生土长的结果，另一方面也间接受到地中海刺激的影响——欧洲的廷巴克托和贝宁。在离殖民地很远的地区，早期木结构小镇的土坯墙和木栅栏在欧洲的部落地区（单个酋长国的节点）不断增加。它们占有的山堡很少超过25英亩，而且房屋不密集，人口可能很少超过2 000人，大部分空间是留给牛、难民以及用作园地。它一般在一个土坯墙内，占地面积大约是住房面积的两倍。但在这一时代的末期，更大的木结构城镇也就是"城市"出现了。但房屋仍不密集，延伸50～200英亩，建在斜坡上并由线形的土墙保护着；极端的例子像多瑙河上游的克尔海姆和海德格拉本（Heidegraben），分别占地1 500英亩和3 500英亩。这些城市通常是王国联盟的中心，除了拥有王室大厅和铸币厂外，它们有可能容纳2 000～10 000居民，包括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其外围通常是防守严密的军事区，这对保护城市很有必要。但是，为了防止被这时欧洲中心城镇的规模弄昏头脑，我们不仅应该把它们与殖民地城镇对比，而且也应该与许多地中海城市对比，这些地中海城镇占地200英亩，房屋十分密集，并且大城市首府占地400英亩，大多有3

---

① R. 普莱纳（Pleiner）：《铁器时代：历史中的一个概念》，载R. W. 埃里克（Ehrich）主编：《福来克斯塔弗讨论会文集》，1969年，第13页及以后。【43】

万左右的居民。

近东的城市网络现在以一种持续的上层建筑的形式沿着地中海欧洲的海滨延伸，并以一种断断续续的网格状形式拓展到欧洲内陆。这个网络中心是波斯帝国和它的都市，它的西边被小小的城市联盟和联邦所包围，比如希腊人、迦太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的城市联盟。再远就到达伊比利亚、凯尔特、色雷斯和西徐亚部族王国的本土城镇。就欧洲边缘而言，在海滨殖民的最重要机构之一是希腊海上同盟。腓尼基和埃特鲁斯坎继续享有制海权，同时刺激了希腊殖民活动的复兴。 [61]

早期希腊的殖民活动继续采用迈锡尼模式，在约公元前 750 ~ 前 700 年，拥有了在安纳托利亚海滨和西西里南意大利海滨的伊奥尼亚定居点。希腊人仍以迈锡尼人为榜样，进行探险式的航行，从两个主要的贸易区向东北方向进入黑海，向西进入西地中海。在黑海，约公元前 700 ~ 前 600 年在色雷斯、盖加塔和西徐亚的沿海地区建立了一系列早期的殖民地，它们具有战略性，建在深入内陆运送产品的河口，一般沿海岸航行一两天就建一个。最重要的中心如潘蒂卡派、奥尔比亚和托密斯很快就成为富有的城市，它们与几百英里外的欧洲纵深地区也有着经常的贸易关系。

潘蒂卡派位于克里米亚（Crimea）适宜种小麦的地区，在亚速海（Azov, Sea of）的入海口，通过顿河伸入到遥远的莫斯科，沿海岸线靠近金属储量丰富的高加索。奥尔比亚建在布格河（Bug, river）与第聂伯河（Dnieper river）的交汇处，希罗多德的信使非常熟悉从那儿到基辅有大约 40 天的航程。作为黑海最北的港口，奥尔比亚正好位于最初出现波罗的海贸易的地方和大草原、落叶林以及针叶林资源离海最近的地点。奥尔比亚商人十分熟悉大草原上的西徐亚母马挤奶人，在喀尔巴阡山淘金的阿加泰西人（Agathyrsi），在南部波兰沼泽地的穿狼皮的斯拉夫·诺里战士，甚至也知道在遥远的针叶林中设陷阱以捕获毛皮的人的事情。希腊的葡萄酒、油、陶器、珍宝和金属制品大量逆流而上，远至基辅，而琥珀、毛皮、皮革、漆、金、奴隶、小麦和马也顺流而下到达海岸，然后在海上网络系统里重新分配。类似产品被运到托密斯，它位于整个多瑙河贸易的战略性出口处。为避开多瑙河三角洲危险的沼泽地，托密斯殖民地巧妙地建于南岸，蜿蜒的多瑙河河道在那里靠海最近，这样，货物可以轻易地沿海岸搬运 50 英里到托密斯，从而省去了 250 英里危险的三角洲沼泽地航程。到约公元前 300 年，运送罗得岛葡萄酒和油的双耳罐向内地的传播路线与萨索斯银币的分布路线相一致，虽然这些银币集中在铁门南部中间商的手中，但它们远达蒂萨河和毛罗什河。 [62]

在黑海的这些殖民地常常一起给希腊大陆供应大量的重要物资，如谷物、盐、铁锭、皮革、木材、奴隶、船上用的焦油、腌肉、腌鲟鱼和金枪鱼，还有奢侈品如蜂蜜、琥珀、珍贵的毛皮、喀尔巴阡山和高加索的金和色雷斯的银。

在西地中海，希腊人从本土或在8世纪从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据点出发，靠阴谋和暴力手段挤进了高度竞争的集市。尽管迦太基联盟已经包括了所有北非的腓尼基人城市、西西里的西部、撒丁岛、巴利阿里群岛和被吞并了的塔特苏斯王国，但约到公元前450年，仍通过从伊比利亚基地出发的汉诺（Hanno）和海米尔科航线各自对直至塞拉利昂的非洲海岸和远至布列塔尼的欧洲海岸进行探险。在北部，埃特鲁斯坎联盟正处于顶峰期，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着从埃帕尼亚和亚德里亚海岸到阿尔卑斯山山脚的广大地区。希腊殖民者熟练地篡夺了迦太基人与埃特鲁斯坎人的贸易，与此同时，还挑拨和暗中帮助拉丁部落反对他们的大领主。在迦太基和埃特鲁斯坎联盟间插入的楔子成功了。公元前535年，他们的联合舰队在靠近科西嘉附近的阿莱利亚（Alalia）被腓尼基人击败，而且，接连几个世纪锡拉丘兹的专制君主成功地控制了当地的海上和陆上运输。靠着这些手腕，希腊人顺利地渗透入迦太基人的伊比利亚南部殖民地和埃特鲁斯坎人的利古里亚西部殖民地之间的中间地带。约公元前600年，腓尼基人在马塞利亚迅速地建立了一处重要的殖民地以控制罗讷河的贸易。到公元前500年，在繁荣的马塞利亚人的慷慨的支持下，希腊城镇带从尼斯一直延伸到阿里罕特。甚至在更早的约公元前640年，萨摩斯的科莱尤斯人（Colaeus of Samos）就已经成功地平稳通过了海格立斯之柱，回来时满载伊比利亚的银。但是，尽管其他马塞利亚船长也像约公元前300年的皮西亚斯一样重复着海米尔科到不列颠群岛的航行，但随后迦太基人占领了南西班牙，这迫使他们把注意力放在通过陆上到达吉伦特河（Gironde）和卢瓦河的大西洋三角洲和罗讷河的源头的贸易，并以此来打破迦太基人对大西洋的封锁。

总之，希腊在狮湾的定居点类似于在黑海采用的殖民模式——一连串的海滨城镇周密地布置在河流的天然出海口和深入内地的路线上。地中海的奢侈品和制成品当时不断地流入内地以换取从遥远的凯尔特领地边界运来的谷物、皮革、羊毛、铁、锡和奴隶。但是，马塞利亚希腊人和埃特鲁斯坎人的竞争性商业冒险在阿尔卑斯山欧洲地区冲突激烈。埃特鲁斯坎人扩张到阿尔卑斯山山脚，并巩固了其与多瑙河上游凯尔特部落的古老贸易——进口的是盐、锡和琥珀，出口的是珠宝、青铜酒器、葡萄酒和油。大约与此同时，马

[63]

塞利亚商人看来已经从罗讷河谷的源头与阿尔卑斯山同一地区建立了商业联系，贸易战似乎不可避免地在地中海的军事基地和内地的商业基地同时展开。

索恩河、塞纳河、罗讷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的源头交汇的三角地仅有100英里宽，这里成了吸引各种希腊和埃特鲁斯坎奢侈品的竞争焦点。玻璃、珊瑚、黄金珠宝、精致的意大利金属器皿、酒器、希腊陶器、油和葡萄酒当时涌向这个关键地区的部落据点，这里的酋长们控制了从塞纳河而来的不列颠和布里多尼的锡、从莱茵河而来的贝尔吉卡（Belgic）[①] 的铁、从多瑙河河谷而来的琥珀、盐和铜等所有这些物品在当地分销的权利。在多瑙河上游霍纳堡（Heuneburg）的一个据点里，[②] 突然兴起新奇的具有希腊本土风格的堡垒型砖围墙——这显然由某个希腊设计者设计的；同一地区的其他遗址也显示出酋长的高贵富有，因为他们的随葬物中有罗得岛的大肚酒瓶和南意大利酒器。但是在卡珀尔、维尔辛根、格拉奇维尔（Grachwil）和伯纳的大量富人中，塞纳河上游维克斯的凯尔特王后的坟墓是最突出的。[③] 这个不知姓名的王后躺在一辆散架的马车上，脖子上是希腊—意大利金项圈，大量的青铜和琥珀饰物围绕着她，一张完好的南意大利产的青铜桌子上放有阿蒂卡的酒杯。在墓地的一角立着一个与王室身份相称的进口品，那是一个巨大的青铜螺旋型双耳喷口杯，5英尺高，精雕细刻，也许是最优秀的塔恩廷作坊里的产品。这个维克斯双耳喷口杯，以及相随的酒器和金项圈，也许是在与埃特鲁斯坎的商业竞争中有特殊意义的马塞利亚外交代表团的礼品的一部分；一个价值不菲的王室礼品受托从最好的南意大利作坊带到马塞利亚码头，然后历尽艰险航运至塞纳河上游，并可能由一个由商人使节组成的代表团朝贡，他们急于继续这种他们赖以谋生而且马塞利亚也十分需要的贸易。【64】

关于地中海向欧洲渗透的一幅引人入胜的画面由此出现了。有确凿证据表明，那时的地中海商人—探险家行驶在大西洋海岸线上，进入到伊比利亚的深处，沿着罗讷河进入欧洲的联系枢纽，从埃特鲁斯坎穿过阿尔卑斯山山口进入凯尔特本土，沿多瑙河到"铁门（Iron Gates）"，利用第聂伯河向北到达基辅，再沿着亚速海到达顿河的河口。这些远征不是爱享乐的希腊文人

---

① 现在的比利时及附近地带。——译者注

② W. 金米奇（Kimmig）：《多瑙河上游的早期凯尔特人：在霍纳堡的考古发掘》，载 R. 布鲁斯—米特福特（Bruce-Mitford）主编：《欧洲最近的考古发掘》，第32～64页。【44】

③ R. 乔夫诺伊（Joffroy）主编：《维克斯的宝藏》（巴黎，1962年）；J. V. S. 梅高（Megaw）：《维克斯的古墓》，载《考古学》，第40期（1966年），第38～44页。【45】

的工作，也都很少在其杜撰的荒诞故事中提及，这些成就多数是无名的海盗、投机商人、贪财的手艺人、变节的土匪、处于文明边缘的亡命之徒的成果；殖民世界的机会主义者注定不为人所知，除非他们回来时带回的财富能使他们通过贿赂的手段成为贵族，就像萨摩斯的科莱尤斯所做的那样。这些混血的边境居民很少有文化，穿的衣服是希腊人和本地人衣服风格怪模怪样的拼合，殖民时代的艺术作品详细地描述过这种服装，但仅是古典喜剧中的玩笑而已，这些人向欧洲南翼深入约300英里，而且，同希罗多德谈起过他们深入内陆的40天的航程。

对南欧大多数河流的渗透过程并不相同；相反，贸易商品经常显示出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的情形，大量精美的物品神秘地集中在一些非常遥远的探险所及的边缘地带。最奢侈的礼品和最好的葡萄酒注定是朝贡给远方的国王和酋长的，因为这些人基本上控制了受人喜爱的欧洲商品的流动和重新分配权。文明世界最精美的物品总是出现在遥远的凯尔特精英的宝藏中，比如在维克斯、拉索伊斯山、卡姆普杜查特柔（Camp du Chateau）和霍纳堡，或是出现在遥远的克拉约瓦（Craiova）和阿吉吉洛尔（Agighiol）的盖托—色雷斯贵族的金库中，或者偏远的切通姆莱克（Chertomlyk）和库尔奥巴的西徐亚王族的财产中。

经过这种对中欧深入的商业渗透后，希腊殖民城市的铸币出现在欧洲各处。起初，这些钱币仅被视为合适的金银块，但是慢慢地，它们作为某些有限制交易中介物的方便性就变得明显了。最早的地中海钱币在约公元前700年由吕迪亚的国王铸造，也许是用于给不能用实物做佣金的雇佣兵支付的特殊目的——许多早期铸币的目的均是如此。但是这些早期的铸币并不是最早的货币——它们仅是除了各种铁扦、铁条、铁锭、金银块和项链、青铜圈、斧头、甚至矛头外另一种用于流通的交换媒介。货币的优点在于适宜的交换单元的标准化、能够根据发行当局的印章分辨其真伪；至此，一个现金流通的集市经济可行了。铸币的生产从吕迪亚王国那里迅速传到邻近的伊奥尼亚城市，到约公元前600年，希腊海上同盟的许多城市已经铸造出它们自己的货币。有些特别可靠、数量充足而且成色也高的铸币很快就赢得信誉并作为国际流通手段——比如，波斯的“射手”、科林斯的“小马驹”、雅典的“猫头鹰”和马其顿的“菲利比（Philippi）”。但是，大部分铸币只在一个非常有限的地区集市内部流通。

[65]

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盖托—色雷斯人和西徐亚人很快就对希腊商人的铸币熟悉起来，在欧洲部落城市中经常发现称量铸币的秤。用于支付军事

人员薪酬、给作战部队提供必需品和普遍用于雇佣部落雇佣兵的铸币在每次对欧洲的军事冒险后也会蔓生更多的铸币：从波斯在公元前515年对达契亚（Dacia）和西徐亚的入侵、马其顿国王约在公元前450～前350年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远征，到自约公元前450～前300年埃特鲁斯坎人、希腊——意大利人和锡拉丘兹人对凯尔特雇佣军的雇佣和在约公元前400～前200年迦太基人对伊比利亚中部的侵袭。到约公元前300年，中欧普遍熟悉了货币交易。在那之后不久，法兰西和中欧的凯尔特人开始铸造精心模仿的菲利普斯（Philippus）硬币和马塞利亚（Massilia）铸币，而与此同时盖托—达契亚人（Geto-Dacians）除模仿马其顿的系列铸币外，也模仿拉里撒和萨索斯的铸币。同样，北伊比利亚人根据希腊恩波里昂（Emporion）的德拉克马铸造有铭案的货币，而南伊比利亚人则模仿巴基底亚迦太基人的银币。这些货币起初是对地中海货币原型的精心模仿，甚至还有简单易懂的铭记，有的记载最初的产地，或者更有意义的，介绍发行王朝或部落的名字，由此也可证明这些欧洲人对地中海字母和语言越来越熟悉。相同的证据也表明，最早的部落铸币（其边缘裁切得整整齐齐，而且铭刻也非常精致）是由地中海的本土工匠为当地的酋长设计和生产的。也许，同样的地中海背叛者帮着当地人与贪婪的商人谈判，并对各种事务提出建议：从最好的葡萄酒和餐具到防卫问题，甚或那些早期的工匠，他们制造的地中海饰物刺激了伟【66】大的本土艺术风格的崛起。但是，在学习铸币技术和学会欣赏地中海以叶子形状为基础的艺术后，部落工匠以一种诡异而细致的方式把它们接受下来。铸币技术和艺术形式都没有衰落，它们只是被转变而已。

欧洲本土的货币主要在某些部落王国有限制的集市内流通，它们的分布清楚地表明不同部落联盟的范围。这些地区性货币可能给集市经济中的内部生产和各种商品的零售以极大的经济刺激，同时有助于加速非部落化，因为它不断地替代以前以相互义务的方式完成的商品交易。随之出现的欧洲封建城邦经济在许多方面代表了这些早期变化的进一步发展。封建经济拥有一套具有再分配机制的系统，该系统介于部落社会和税收国家货币经济再分配系统之间。乍一看这个封建再分配机制似乎建立在非常烦琐的正式等级制度的基础上，以个人义务和服务来换取土地。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为了把这些理论上法定的义务迅速且方便地转变为金钱的或其他的等价物，对这些义务的精确评估和法定化已在很大程度上形成。最终，欧洲的制度根据早就被取代的古代义务仅在仪式上将部落依附关系精心确定下来，为了把古代的社会类型运用于建立在财政、税收、铸币和加工城镇基础上的经济形式，在这

里，“X等于义务”的演算被“X等于现金等价物”所代替。

但是，欧洲最早的部落铸币不可能以在整个地中海货币集市中已流行起来的非常先进的方式使用。至少在最初的时候，这些部落铸币——铸上了王室所在城市的神秘标识——可能服务于非常有限且得到严格规定的部落内部目的，因此，它们的分布也有限。这些有限的交易具体是什么现在只能进行猜测，但是在北欧，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一个传统，就是把这些小量发行的部落铸币作为酋长或国王礼物的象征性财富奖章，授予拥有者以地位和支持，一般以财富的占有形式流通于为部落和王室提供服务的社会阶层，仅当必要时才用它来换取物质商品。也许我们应该在这一背景下来理解洛尔纳奇特的[67]“冬节”典礼故事，这个阿维尔尼的国王从他的战车上亲自给他的部落民分发金银铸币。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以货易货、依附关系、杀手酬金、彩礼、嫁妆、朝贡品和税收的可接受的交易媒介长期以来一直是传统的商品——牛、谷物、盐、铁、工具、武器或衣服——我们不知道铸币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替代它们。

在这个结束时期所跨的时间段内，中欧所有的边疆部落都被地中海强国的商业和政治机构所渗透。这种渗透在社会和文化的许多层面上进行，并在从西迦太基的伊比利亚到希腊的凯尔特，从埃特鲁斯坎的拉蒂亚到希腊的伊利里亚、色雷斯和蓬士斯的广阔边界上继续下去。但是这种广泛的亚文化相互渗透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地中海商人冒险家对有限地区的直接渗透；莱茵河和多瑙河南部的整个地区都直接或间接地暴露在大规模的新刺激之下，在更遥远的北方的一些地区也受到较小的影响。当时，野蛮的雇佣兵、工匠和奴隶为地中海强国的军队、工厂和城市服务。相反地，地中海的冒险家、谋士和工匠也为蛮族统治者服务，并向他们介绍文明世界的文化知识和其他享乐与成就。在更直接的层次上，文明的波斯、马其顿、埃特鲁斯坎、马塞利亚、迦太基的军队和那些野蛮的西徐亚人、色雷斯—哥特人、凯尔特人、利古里亚人和伊比利亚人的军队无疑相互作用——西徐亚人和凯尔特人所从事的战争能够击败古代世界最精良的野战部队，并各自长久地占据南法兰西、北意大利、安纳托利亚的加拉提亚（Galatia）和沿海的蓬士斯。甚至在较为间接的层次上，这种相互作用在刺激社会的、物质的、经济的、宗教的、政治的和艺术的新发展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这种发展并不完全是单一因素所能做到的。这种集中的亚文化动荡不仅沿着地中海文明和酋长国之间的整个地理边界扩展，而且在纵向上沿着从爱好奢华的精英阶层到依附他们的工匠、从生产剩余品的部落民和雇佣兵到从事工业的奴隶和俘虏的整个社会边界继续

下去。

但是，纯粹用地中海渗透程度的不断加深来描述欧洲经济发展是不很真实的。欧洲的经济发展，同历史上非洲的经济发展一样，实际上是因殖民干预和它的影响而转型的，但是这种因此而转变的类型在这些变化开始很久之前和在其消失很久之后就已是欧洲的类型。在地中海对古代欧洲的影响和殖民对非洲历史的影响之间进行大致类比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特别是在把它与部落酋长国的崛起、城市发展、非部落化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它们最初是不稳定的）联系起来时更是这样。【68】

我们注意到古代欧洲的这种转型，从约公元前2000～前1400年欧洲商品对地中海城邦仅是经济稀罕品开始，经约公元前1400～前600年欧洲商品的重要性增大但仍属次要的阶段，到约公元前600年欧洲商品成为扩张的地中海经济中虽小但关键的因素，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后一个时期是从充分利用沿南欧海岸的城市殖民基地及其在部落王国政治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增强且远远超过邻近地区开始的。这种外部的殖民刺激，加上铸币和再分配货币经济发展的作用，加速了更大的王国和酋长国联盟的形成（集中在功能越来越复杂的城市和小城镇）。在各地，进口的物品和迁入的工匠刺激了欧洲新的但显然是土洋混合的艺术风格的发展，它们最初呈现出其地中海赞助人（部落精英）亚文化装备和徽标的特殊外形。与此同时发端的伊比利亚—迦太基的塔特苏斯、希腊—凯尔特的拉坦诺、色雷斯—哥特和希腊—西徐亚艺术风格是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这一时期的艺术产物。

正是在约公元前600～0年这个转型期，西班牙、法兰西、北意大利和喀尔巴阡山的金属资源，第一次成为地中海世界不可或缺的、需求按指数增长的物资。同时，伊比利亚、凯尔特和西徐亚的谷物、腌制的肉和鱼、羊毛、皮革和奴隶，成为工业不断扩展和农业不断收缩的地中海城市的重要供应来源。这种局势的存在很快就使主要的地中海强国觉得再无法容忍如此重要的欧洲资源的供应因不太友好的暴君的反复无常和政敌的冒险拦截而出现波动。但是，欧洲的希腊人对近东更好的资源和诱人的挑战更感兴趣，他们在商业方面追随亚历山大对印度本土的征服，尽管仍坚定地守护着他们的凯尔特和蓬士斯谷仓。迦太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开始意识到并在军事上利用与他们相邻的边界地区（在伊比利亚和北部意大利）的欧洲贸易路线。但是这些发展被罗马的崛起粗暴地打断了，这个前希腊同盟的意大利傀儡当时开始利用它的中心位置和埃特鲁斯坎、迦太基与希腊对手间的分歧牟利。【69】

在意大利的希腊殖民者的默许下，以及在凯尔特人约公元前410～390

年穿过阿尔卑斯山关口的毁灭性袭击的帮助下，罗马很快推翻了它的埃特鲁斯坎领主。后来，在约公元前278年由罗马领导的拉丁同盟的迅速扩大，这对希腊—意大利城市是一种警告，提醒他们应在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的领导下采取联合行动，但是这些行动失败了，新兴的罗马政权没有被粉碎，机会主义者迦太基人在西西里的活动受到干预。约公元前210年，罗马人吞并了锡拉丘兹人的西西里和马塞利亚人的高卢（Gaul），作为补偿向它们提供保护使之免受迦太基人领土不断扩张的威胁。约公元前200年，迦太基大战最终以罗马军团的胜利、迦太基的投降和罗马对伊比利亚的占领而结束。希腊随之在约公元前146年没落，地中海欧洲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从这个宽阔的滩头阵地出发，罗马军事机器势不可挡地扩大——约公元前70年西徐亚人战败，约公元前50年北高卢陷落。到奥古斯都统治时，罗马兵团在公元9年驻防的新边境已推进到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古地中海世界的殖民联盟当时被这个欧洲超级军事帝国（它是东方的亚历山大帝国和波斯的亚该亚帝国（Achaemenids）在西方的继承者）所吞没。此后，罗马边界南部脱尽部落痕迹但处于依附地位的欧洲人，也成为这个巨大的财政国家的纳税成员。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前线北部发展成一个新的贸易区，新的野蛮酋长国在混乱不安中相互竞争；再往北是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往东是匈奴人（Huns）和安息人。欧洲德意志帝国和斯拉夫王国、中世纪的封建民族国【70】家、殖民势力的复兴和工业铁器时代的大企业组织即将来临。①

① 作者向安德鲁·谢拉特博士对本章手稿的审阅致以深深的谢意。【46】

第二章

西罗马帝国晚期的贸易和工业*

公元301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颁布法令限定国内商品的最高价格。当时，“人们对抬高价格毫无节制，对财富饕餮无厌，其状况甚至不因供应的充裕和年成的丰盈稍有缓解。”价格法意在匡正时弊，是这位皇帝在审析了时代罪恶的上述原因后（以极其浮夸而委婉的拉丁语）颁布通行的，其影响波及帝国上下，一时受累者众。这条法令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其结果（是非常细微的），还不如说在于它象征着一个转变，一个从300年前奥古斯都（Augustus）建立统治以来地中海世界生活的转变——自由、私有的经济让位于国家控制的经济。为了组织生产和贸易，人们发明了新的机制。严格的管制取代了各种形式的自由联系。曾一度仅满足于为商人提供便利，为他们充当“守护人”的皇权，如今正试图控制商人们的整个生活以及他们往来各处时的一举一动。

这个转型过程包罗万象。它渗透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卷

* 本卷第一版出版后，于1966年对本章进行修改，10年后又做了一些补充。

入的地区也不仅限于意大利这个帝国的最初核心。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帝政的最早时期；但不幸的是，这个新框架形成的关键时期却正是整个罗马历史上最模糊的时期之一。由于缺乏可靠的文字资料，3 世纪的经济史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借助考古学来重构，或从后来的证据如法律文献来推断，或通过与早期的状况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建立的体制相比较而推论。因此，毫无疑问，对帝国晚期贸易与工业的考察必须从帝[71]政开始。

2.1 早期帝国的繁荣

把地中海东部几个历史悠久的省并入共和国给西部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当然，基本上说来——整个古代均是如此——无论是对乡村还是对城市和城镇的居民而言，农业一直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据估计，农业对社会财富的贡献大约是贸易和工业的 20 倍。不过，大量涌入的希腊人和叙利亚人——起初他们大多是奴隶，很快就有大批人获得自由人身份——对这个时代的生产技术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同时，新的标准建立起来，东方原产物品的进口刺激了人们对更精致商品的需求。意大利工业的特征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仍是小企业主导。工人或做临时工或在私人作坊工作，这种作坊经常是后厂前店，里面同时出售自己制作的产品。这种模式很自然地表现为许多不同的形态。有时，雇主把自己的材料如布、金、银交给合适的工人制成服装或装饰品。但是，大量证据表明工匠是自己提供原料，并且有时还把加工的成品拿到集市上出售。沿街有排着店铺和摊位的集市，街边和公共浴室有流动的小贩，这些都以作坊生产的大量存在为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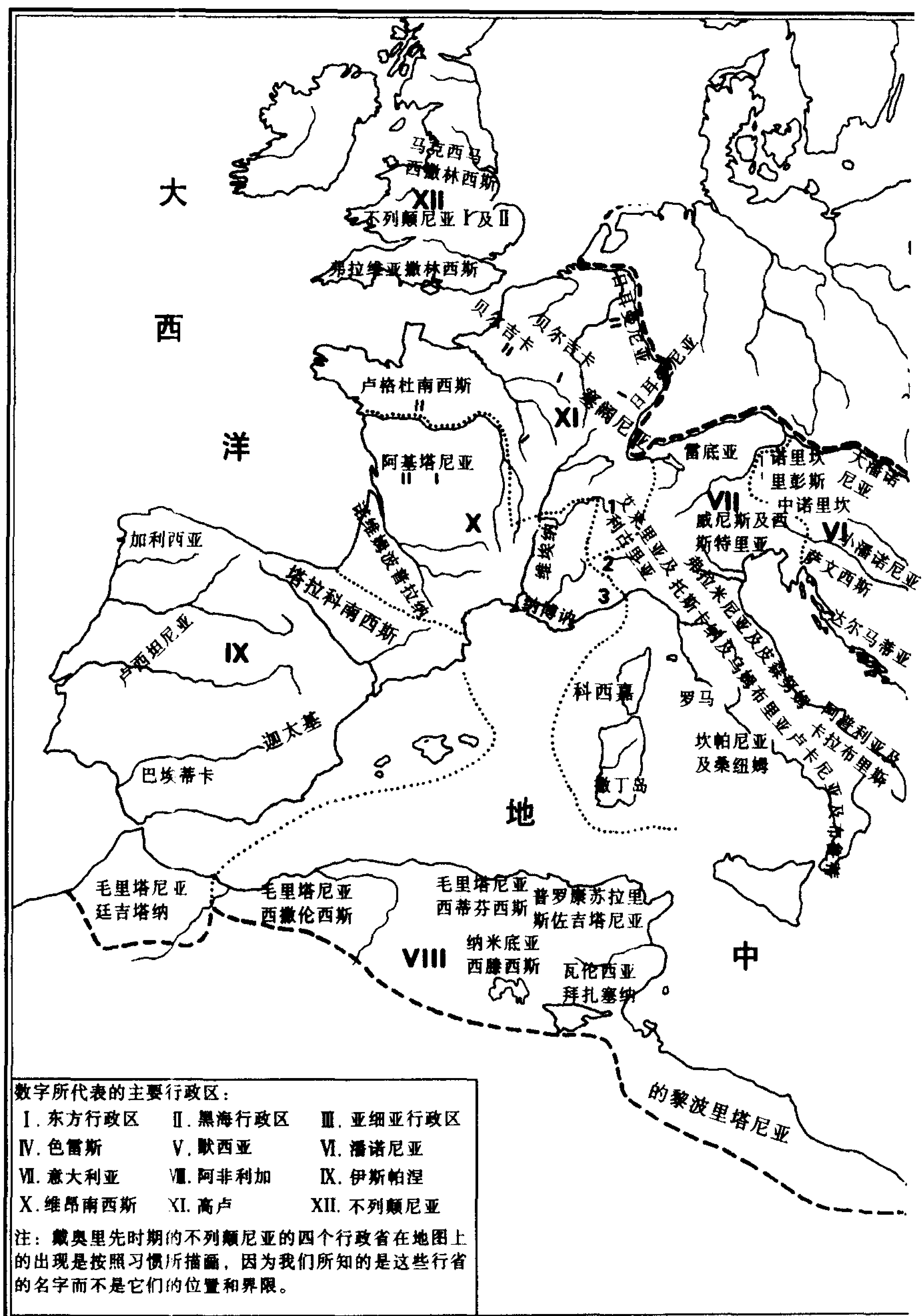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大规模工业有所进步，借助于奴隶劳动有的已发展到接近工场这样的规模；尽管古罗马对贸易抱有偏见，但碑铭显示也有上层阶级参与组织公司，随时承包公共甚至私人建筑，偶尔也投机收购、修复以及再卖掉残坏的资产。通常，从事这种获利活动的人的社会地位比较模糊。非常突出的例子是多米蒂（Domitii）公司，公元 50 ~ 150 年间，它在意大利的砖厂生产中确立了垄断地位，是罗马历史上惟一一个以工业财富获取政治声名的例子。这个公司的发家史可追溯到公元 64 年罗马那场大火后产生的需求；由带有印记的产品判断，有 53 个奴隶、22 个

自由人及其他22个社会地位无法确定的人在那里工作，实际被雇用的人数肯定远不止如此。到公元155年，多米图密鲁砖厂（Domitian brickworks）雇用的工头就不少于46个，多米蒂家族的财富有助于奠定与它有姻亲关系的安东尼王朝（Antonine dynasty）的基础。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例子，如普拉附近法萨那的盖厄斯·利卡尼厄斯·巴苏斯陶场，主要生产储运伊斯的利亚橄榄油的陶罐，并且至少使用了50个奴隶；卡尔维雅·克里斯皮尼拉，一个尼禄宫廷中臭名远扬的女人，就用这种罐装橄榄油及葡萄酒出口，这可由意大利东北部及潘诺伊亚发现的油罐上的印记得到证实。卡普阿（Capua）的青铜业一定是有高度组织的；我们已知工作在庞培纺织棚里13个女奴的名字。在罗马有两个帝国早期的大工场，一个是再加工纸草的，另一个加工西班牙红铅。但是总的说来，这些大企业的存在并不普遍，在整个古代都是这样。帝国政府所需的铅管主要由一些小公司承包生产，工业组织的主要形式是私人的个体经济或一些承接不大合同的小公司。 [74]

自由人、由奴隶解放出身的自由民及奴隶之间的劳动分工随产业部门而异。相关知识赖以建构的铭文的价值我们也无法总能轻易确定。不过，可以估算出在罗马帝国头两个世纪的企业所有者和企业家中，奴隶出身的自由民远远多于自由人，其比例是2:1，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形，但比例小些。劳动力主要是奴隶，也有些奴隶出身的自由民，这些人是在有关条文规定下尽到一定时期的义务后而被解放的；赚自由薪金的人在意大利非常少，一个关于韦斯巴芗（Vespasian）① 的故事曾提到他们偶尔也有使用，据说他反对用省力的提升机器，理由是“我必须养活我的穷人”——对这个说法也许不能太当真，因为帝国解决贫穷的办法是慈善事业而不是靠公共工程。帝国早期对各种产业劳动力的使用没作任何限制。在自由契约体制下，人们经常从日出工作到日落，有利可图时还使用童工。工资有时按天，有时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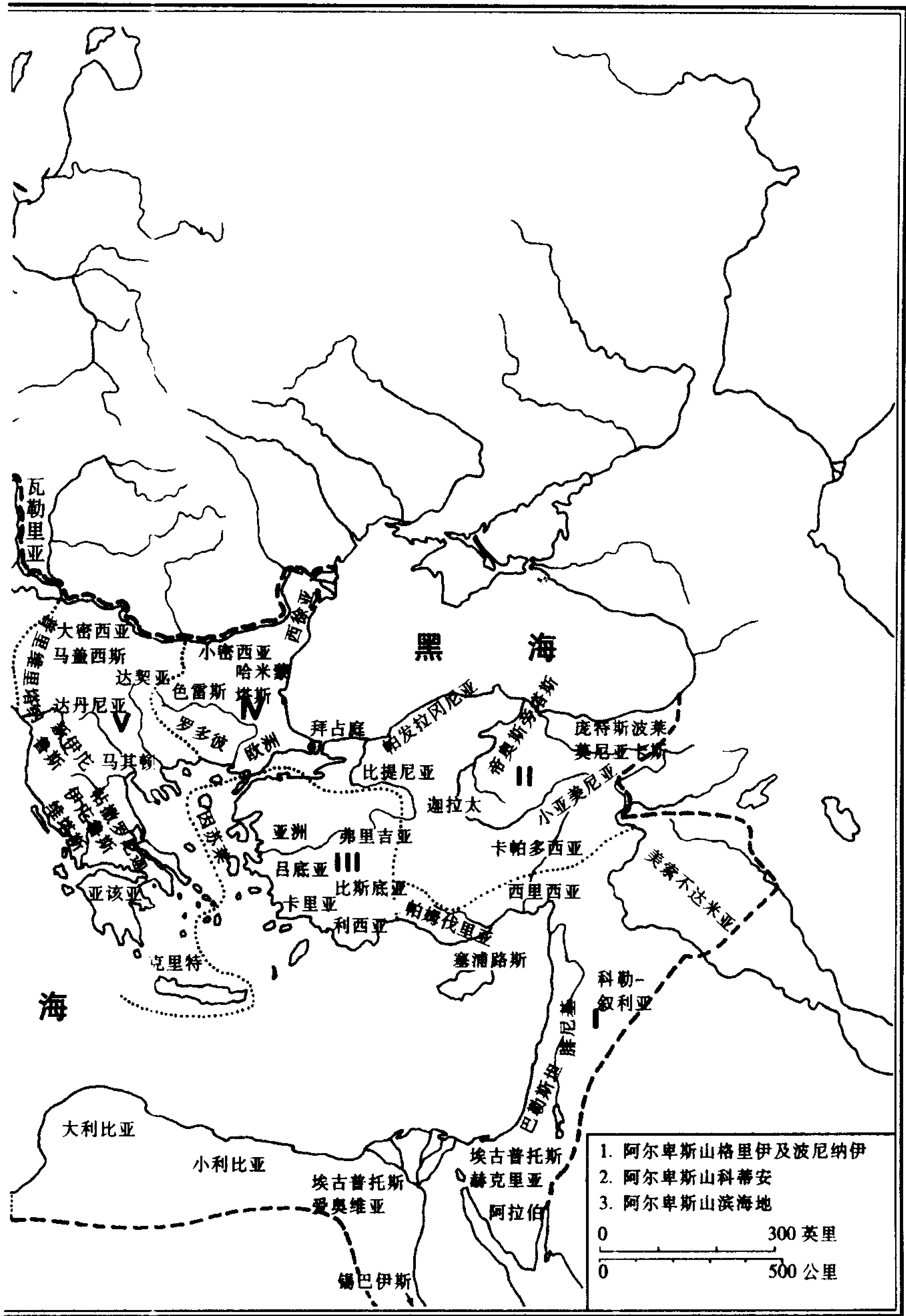
那么，奥古斯都王朝的建立对生产和贸易的主要影响是什么呢？它从根本上加速了经济活动，扩大了贸易，提高了生活水平。当普利尼提到每个女佣都有银镜时，或许有点言过其辞。但帝国在第一阶段，无疑享受到了秩序安宁——和平、优良的公路和安全的海上交通系统——带来的好处。意大利商人阶级崛起，这些人有些是自由人出身，有些是由奴隶解放出身，他们率先投入了对西部行省的开发，尤其还拓展了批发贸易——而 [75]

① 韦斯巴芗（9~79年），罗马皇帝，给罗马带来了繁荣。他对军队进行了改革，营造了大罗马圆形大竞技场，也是艺术的热心资助人。——译者注


大
西
洋
马克西马
西撒林西斯
XII
不列颠尼亚 I 及 II
弗拉维亚撒林西斯
贝尔吉卡 II
贝尔吉卡 I
卢格杜南西斯 II
阿基塔尼亚 II I
XI
雷底亚
诺里坎 里彭斯
大潘诺尼亚
中诺里坎
VII
威尼斯及西斯特里亚
VI
萨文西斯
达尔马蒂亚
X
维埃纳
纳博讷
1
2
3
加利西亚
塔拉科南西斯
IX
卢西坦尼亚
迦太基
巴埃蒂卡
科西嘉
罗马
坎帕尼亚及桑纽姆
撒丁岛
地
中
毛里塔尼亚 廷吉塔纳
毛里塔尼亚 西撒伦西斯
毛里塔尼亚 西蒂芬西斯
普罗康苏拉里斯佐吉塔尼亚
VIII
纳米底亚 西滕西斯
瓦伦西亚 拜扎塞纳
的黎波里塔尼亚
数字所代表的主要行政区：
I. 东方行政区　II. 黑海行政区　III. 亚细亚行政区
IV. 色雷斯　V. 默西亚　VI. 潘诺尼亚
VII. 意大利亚　VIII. 阿非利加　IX. 伊斯帕涅
X. 维昂南西斯　XI. 高卢　XII. 不列颠尼亚
注：戴奥里先时期的不列颠尼亚的四个行政省在地图上的出现是按照习惯所描画，因为我们所知的是这些行省的名字而不是它们的位置和界限。

【72】

地图 1　戴克里先


瓦勒里亚
大密西亚
小密西亚
达契亚
色雷斯
哈米蒙塔斯
达丹尼亚
罗多彼
欧洲
马其顿
拜占庭
黑　海
帕发拉冈尼亚
比提尼亚
迦拉太
小亚美尼亚
卡帕多西亚
亚洲
弗里吉亚
吕底亚
卡里亚
利西亚
西里西亚
塞浦路斯
亚该亚
克里特
海
科勒-
叙利亚
美索不达米亚
大利比亚
小利比亚
埃古普托斯
爱奥维亚
埃古普托斯
赫克里亚
阿拉伯
锡巴伊斯
I
II
III
IV
V
1. 阿尔卑斯山格里伊及波尼纳伊
2. 阿尔卑斯山科蒂安
3. 阿尔卑斯山滨海地
0　300 英里
0　500 公里

【73】

统治下的帝国

这总被罗马人认为是值得敬仰的。西塞罗（《百官表》第1卷，第150~151页）写道，“小规模经营受到鄙视，但如果它涉及面非常广泛，从世界各地大批进口商品，并且诚实地买卖，那么它就无损名誉；非止如此，如果商人满足于或者相当满足于所创造的财富，从港口生涯中退身到自己的庄园，一如他由大海重返港湾，我认为，最值得尊敬”。西塞罗在同一段落的前面，表达了他对手工劳动的鄙视，认为那是低下的。这是共和国贵族的典型态度，也是那些满足于把手工劳动交给奴隶去做的贵族的态度；只要帝国仍继续保持这种态度，经济的发展就不会令人满意。奥古斯都革命产生的暴发户倾向于将累积的财富投资于土地而不是工业或贸易；这些行业大部分由奴隶解放出身的自由人和外国人从事，他们自古以来就被瞧不起。我们发现，公元436年，西奥多修斯要求必须“清除”公众服务中银匠及珠宝商的“影响”，这些人竟试图寻求更好一点的岗位。

因此，意大利仍然保持共和体制下建立的寄生特征，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变。以后将看到，西塞罗（Cicero）所说的大商人是进口和配销货物给零售商的人；这个定义反映了意大利与地中海世界其他地区联系时的功能。但不应夸大意大利经济的这个方面。斯特拉波描述到装满谷物的埃及船从普特奥里回来时，销售一空，普特奥里是服务于富庶的坎帕尼亚（Campania）地区的一个繁荣的出口港。但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描述给人误导，普特奥里一直到三世纪早期都是一个繁荣的贸易城市，尽管地方贵族略微转向土地并且把它作为一种财富的累积形式。普利尼宣称，印度、中国以及位于二者之间的阿拉伯国家每年从罗马帝国收到大量的金币。在印度，甚至在[76]锡兰（Ceylon）和中国发现了大量的金币就是这一观点的证据。大致可以推测，这些金币是用来购买奢侈品的——舞女、鹦鹉、乌木、象牙、珍珠及宝石、香料、香水、丝绸及药物——这些都是从远东运往罗马的。但现在也有证据表明，随着和印度贸易往来的增加，从那儿进口的物品——特别是胡椒粉、宝石、平纹细布——开始用铜、锡、酒、玻璃和毛织品来交换，而不是用贵重金属。另一方面，意大利帝国在1世纪和北方与西部不发达的行省有着繁荣的贸易往来。非洲、西班牙、高卢、德国、多瑙河地区及不列颠都是意大利铜、玻璃、陶器的市场，这些贸易为阿奎莱亚（Aquiliea）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阿奎莱亚是许多商品的转口地。从这儿，巴比、斯塔提（Statti）的贸易商行向海外输送商品，把意大利的商品向北运至多瑙河，往东运至伊斯的里亚用来交换奴隶、牲口、兽皮、松香、沥青、蜂蜡、蜂蜜、奶酪及诺里库姆的铁和羊毛。

意大利的其他地区在帝政（principate）早期也是很繁荣的。坎帕尼亚的青铜制品和玻璃制品、亚雷蒂厄姆的陶器、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雷亚的南部及波河流域的北部（那儿也生产亚麻布）的纺织业都曾一度非常繁荣；整个半岛上曾有程度可观的当地贸易及商品交换。但这些贸易逐渐地减弱了。意大利缺乏和东方国家竞争的能力；一旦新的西部行省发展起来，它们就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很快超过了意大利。到2世纪，意大利的海外贸易就微乎其微了。

意大利经济生活的衰退与北部和西部的行省有关。在那里，帝国的建立不仅是个促进因素，更是一项创举。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优点及城市生活被带到了这些新的地区，开化的生活方式的影响遍及罗马兵团所经之处。这个过程开始的时间其实要早得多。共和国的后期，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就曾一度像个小意大利，它们有富饶的橄榄林及广阔的葡萄园。恺撒大帝的征服把罗马文明带到了英国海峡、莱茵河及北高卢，被并入帝国后，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始呈现更为发达的迹象。居住着工匠、商人的新城市不断在各处涌现，它们是罗马文化的中心。当然，用现代标准衡量，这些城市的规模确实不大，甚至与以前的亚历山大或安提俄克（安条克，Antioch）相比也是如此——尼姆和图卢兹，奥顿（Autun）和特里尔的人口从来就没有超出5万，[77]面积不过500~850英亩——但无论如何，它们确是文明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的重要传播中心。西班牙也一样，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有所发展。根据斯特拉波的说法，除了波河河谷的帕塔维厄姆，加迪斯有比其他城市更多从事贸易的商人。

新行省或新边疆地区罗马化的最初阶段通常伴随着军队的出现而到来，军队监督着城堡、港口、桥梁和道路的建筑，为此目的，他们经常建造自己的砖厂，并且开辟自己的采石厂。克桑滕和纽斯的陶器、维森奥和美因茨附近的灯厂均可追溯到奥古斯都时期，都是由当时的军团建立的。第二阶段则是意大利商人的到来，他们既服务于军团也附带为当地人服务。随之，殖民地和集市，例如坎波杜纽姆（阿尔高的坎普顿），涌现出来；不久以后，由于对本地工业的刺激，第三阶段到来了，在这一阶段，殖民地区发展了自己的经济。这一发展的直接后果是对意大利产品需求的减少，由此，工业的地理布局从意大利转而向其他行省拓展。

这个趋势最容易由优质彩陶（terra sigitlata）的生产史得以追溯，这种陶器几乎出现在所有重要的罗马遗址中，塞满了许多地方博物馆的展柜。我们发现，大约在共和国的末期意大利不同的生产中心都生产彩陶，其中包括

罗马本地，普特奥里，重要的是还有埃特鲁斯坎的亚雷蒂厄姆；逐渐地，到奥古斯都时代，亚雷蒂厄姆加速发展，占领了大多数市场。其产品出现在帝国的每个行省，尤其是西班牙、北非、北高卢及日耳曼。作坊似乎已经很大，生产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而组织的；就我们所知，科尼利厄斯·帕布利厄斯作坊有58个奴隶。有时也可看到某个奴隶被解放后成为独立作坊的所有者。但是，生产中心很快就开始转移。位于边界附近的摩得纳的产品开始出现在高卢遗址。不久，从拉格劳费森克（阿维让）和几个其他的小中心如巴纳萨克（Banassac）（罗泽雷）和蒙唐（塔恩）来的同一个牌子的高卢彩陶出现了，并且开始供应阿奎塔尼亚（Aquitania）。从泰比里厄斯元首统治开始，拉格劳费森克产的陶罐到达莱茵河和利伯河上的霍尔特恩（Haltern）地。在它1平方公里见方的陶器场，花瓶生产数以千计，到公元40～[78] 70年完全控制了市场。在高卢和日耳曼到处可发现这些花瓶。在当时的营地遗址——托努斯的霍夫海姆（Hofheim in Taunus）和符腾堡的爱斯林艮（Aislingen in Württemberg）——实际上只发现有拉格劳费森克陶器。不列颠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陈列着伦敦发现的1 000多块碎片；在屋大维统治时期，其中有些甚至到了苏格兰。它们从纳博讷出口到西班牙，在那里与亚雷蒂厄姆的衰落的陶业竞争，它甚至还被出口到意大利。

但是，到屋大维元首统治时，拉格劳费森克鼎盛期也过去了。巴邓南部遗址中发现的一些碎片开始显示出另外一种风格，它可追溯到勒朱克斯，这里有几百孔窑窖，地处克勒蒙特费兰德以东17公里，并且离阿列河（Allier）不远（便于航运）。这些陶场起源于前罗马时期，大约在公元75～110年达到顶峰。到此时为止，意大利完全丧失了对海外市场的控制。即便在弗拉维统治时期，意大利惟一出口的陶罐也只到达北非；在庞贝遗址，人们发现了一个未曾打开的柳条箱，里面的陶器多半来自高卢——高卢成了一个如此强有力的新竞争中心。但高卢陶器的主要市场是莱茵河及多瑙河的军事地区，在不列颠也有一些。因此不久后，该产业进一步东移到了日耳曼。

在古代，陆地运输速度缓慢、成本高昂。将一台轧油机从苏伊萨运至25英里外维纳夫鲁姆的卡托农场需花72塞斯特西斯（sesterces），是其成本的14.5%；运到75英里外的庞培则要290塞斯特西斯，是其成本的73%。在戴克里先时代，运一马车价值4 800德纳利斯（denarii）的大麻行程240英里的花费是物品本身价值的两倍。因此，陆地运输廉价或笨重的物品，费用高得让人望而却步，这种状况进一步持续了近500年都未得到改善。这说明了为什么像高卢这样拥有良好的河流航运的国家有很大的优势，也说明了

制陶业为何东移至日耳曼。大约在公元100年，勒祖人在阿尔萨斯（Alsace）的海里根堡（Heiligenberg）建立了一个繁荣中心，其后不久，梅斯东部25英里的福尔克蒙特—切梅尼（Faulquemont-Chémeny）的陶器就到了莱茵河、摩泽尔河、莱茵—多瑙石灰熔岩地区以及日耳曼的其他地区。公元83年，一批平民陶工占据了美因茨和斯特拉斯堡间的一处陶窖——它是边境驻军向法兰克福附近尼德河与莱茵河交会的赫德恩海姆（Heddernheim）推进时丢弃的；公元125年，海尔根堡的另一群人也加入其中，此后直到哈德良和安东尼时期，莱茵察（Bonn）陶器占据了整个莱茵河市场。最后，[79] 大约在公元170年，当马库斯·奥利利厄斯将部队调防到多瑙河沿岸的危险地区时，莱茵察的陶器工人就迁移到巴伐利亚的沃斯滕道夫。莱茵河畔的工场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的外敌入侵；与此同时，在高卢，分散化的进程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许多地区在当地生产彩陶（sigillata）的仿制品，它们应该和一些陶场旧址有些模糊的联系。这些新产品的市场范围很小，其风格、效率或组织也无法与勒祖和拉格劳费森克媲美。然而，也有其他一些类型的陶器，很有价值，并且受人喜爱，如比利时的通格雷斯生产的黑色陶器及英国宁河（Nene）流域和附近的柯切斯特（Colchester）生产的带灰边及花纹的陶器——这种装饰风格让人想起凯尔特人的图案。

其他部门向边境地区的转移情况大致与制陶业相类。这是几个相关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的几个原因——如运输成本，与边防驻军紧紧相联系的市场吸引力——前文已有提及。另外，正像我们看到的，高卢良好的水路使它能够与大西洋和地中海取得便利的联系。高卢产品在技术上也优于亚雷蒂厄姆：陶坯烧制得更坚实，镀釉也更光洁。还有一个因素是意大利国内市场的发展，这是一个工业发展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在1世纪，意大利上层阶级开始将制作的桌上器皿目光转向贵重金属，穷人当然只买得起便宜的陶器。少数偏爱红陶的人仍然喜欢用拉格劳费森克及其他高卢地区上生产的上等产品。

毫无疑问，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足以解释制陶业为何迁往新处。但另外还有一个因素，高卢的生产组织也优于意大利。在拉格劳费森克出土的陶器碎片上发现了约40处粗糙的刻迹，刻迹记载了在一次烧窖中不同种类花瓶的数量，它们分属不同陶工名下。这个清单表明一些独立的技工在共用一个窖炉，而他们在陶器上的签名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自由身份；还有证据显示他们还互换模具，因为我们发现有几个作坊生产的罐子很相似。问题是窖由谁经营。是否为当地的诸侯——如T. F. 维塔斯，我们发现他是蒂琼地区的自

由铁匠和砖石匠的赞助人——还是陶工们自己集体拥有？后一种看法可能性
[80] 大些。有证据表明这种自由劳动者的合作形式是古代凯尔特人传统的延续。在高卢—罗马晚期的陶器上也发现了类似制度的迹象。

在群体合作的框架下以这种方式工作的自由劳力与意大利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花瓶上的签名表明那里的陶工多是奴隶。实际上，在亚雷蒂厄姆，公元25年存留下来的132个工人的名单中，有不少于123个是奴隶。这种反差本身就解释了为什么制陶业会迁移到高卢和罗马的日耳曼。

然而，高卢—罗马陶器的历史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相反，在帝国的最初两个世纪，这些行省经济生活的所有部门都出现了类似的扩展。勤劳而聪明的自由人将古典技术运用到肥沃的土地上并且很快就得到了报偿。高卢主要生产农产品。肥沃的加斯科涅（Gascony）平原上生产的粮食从纳博讷航运至奥斯蒂亚，里昂地区内河上的船夫将收获的谷物沿卢瓦河和塞纳河畔经萨恩和让那河运至阿尔勒的收货人手中。或者，北方的农产品经埃斯科河（Escaut, river）和默兹河为莱茵河畔的军队提供补给。高卢在供应罗马方面只扮演了一个很小的角色，但在阿尔勒（Arles）曾有土产品税的财政检查官（*procurator annonae*），这并非毫无意义。

除稻谷外，这个行省还出产大量的木材、橄榄油及葡萄酒。这里大部分仍是森林覆盖，木工将木头制成木筏，顺流漂到宽阔的河道并最终出口到罗马，那里有800~900个公共浴室，要消耗大量的木材。普罗旺斯的葡萄园在共和国时期就非常著名。到普利尼时代，葡萄园沿罗讷河谷延伸，而且维也纳葡萄酒也档次颇高。*Apérififs* 葡萄酒，无论是纳博纳人（Narbonese）用芦荟苷熏制的，还是用维埃纳（Vienne）酒经松香泡制的，在罗马均享有盛誉。不过一种来自高卢的葡萄酒在晚期罗马帝国的头两个世纪，还不大可能对意大利葡萄酒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实际上，里昂的酒商是向高卢发售从意大利进口的葡萄酒的。同样，大约到公元150年，里昂的商人也在向高卢地区发售产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橄榄油；有证据表明、自那以后，高卢本地开始出口这些重要商品。

罗马人的到来也推动了工业的发展。普利尼将羊毛制品与亚麻说成是整个高卢的出产。但基本上它是一项本地产业，虽然斯特拉波提到凯德西的一
[81] 家工厂可能也雇用过亚麻工人。北方的纺织业异常繁荣，这里有充足的羊毛供应，在东方莱茵军团的出现刺激了特里尔的出口贸易。越来越多的矿山得到开采；采石场的开发与城市建设有直接关系。许多矿场属于国家，由帝国地方财务长官组织，以订约承包的方式开发。确实是这样，不仅在比利牛斯

山的大理石采石场是如此操作的——有助于西南峡谷的文明化，创造了鲁德冈努姆·康文纳鲁姆（圣伯特兰德·德·康明格斯）的繁荣，也为加龙河的各港口带来了兴旺——而且对瓦勒弗兰切（阿维让）附近的银矿，或许还有为约多伊克斯—塞弗雷斯的梅勒带来文明和富裕的含银的铅矿，也都是这样操作的。其他的属于自治市或归个人管理，如有文献提到的修女梅米亚·索山德里斯，她是公元226年里昂的一段碑铭上提到的一组*ferariae*的主人。还无法确定这些*ferrariae*是单纯的铁矿还是包含铸造厂，这个词可能包含以上两个含义，因为通常矿石就是在矿场附近被熔化并带到一个长长的棱形模具中铸造。铁匠一般在当地独立的小作坊工作，尽管偶尔也有像在蒂琼的T. F. 维塔斯代理处发现的一群铁匠共同工作的情形。不过，高卢的矿产资源并不丰富，尤其是贵金属。在某些领域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高卢发现了铜锡伴生矿，在罗马人到来以前，在阿莱西亚（Alesia）也开采银铜伴生矿；虽然卡普阿的铜器直到大约公元100年在西部市场仍占有主导地位，但此后它必须面对来自高卢和日耳曼的竞争。直到今天这些铜器在沿莱茵河下游、大不列颠、匈牙利、自由日耳曼、塞本布尔根的遗址当中都有发现。尤其是阿登纳北坡，靠近斯托尔堡的格雷森尼奇菱锌矿的发现导致了黄铜器具的生产。与青铜比较，其价格更加低廉，并在某些方面的技术上更为先进；格雷森尼奇也许是著名的黑莫尔桶（Hemmoor pail）的发源地，它们在自由日耳曼的一些遗址中的发现可以追溯到从公元150年到4世纪。自由日耳曼也吸收来自高卢的铜器；来自日耳曼遗址中的许多茶托（*paterae*）和筛子可能都是在莱茵河领地的艾森堡和另外一个工场——L. C. 奥塞利奥，它位于瑞士的尼永——生产的。

高卢的玻璃器皿生产很快也成为意大利的一个竞争对手。据普利尼称，约在公元50年，玻璃工人从意大利迁到高卢，在阿尔勒和里昂有作坊。但玻璃工人的迁移并没有就此停止。和彩陶生产的情形相似，玻璃器皿的生产也继续向北向东传到莱茵河地区。公元100年，在比利时的那幕尔、在特里尔、在沃尔姆斯、在科隆都在进行这种生产。科隆很快就成为玻璃器皿的主要中心，供应除意大利外的整个西部行省。最后，珠宝匠、银匠、金匠在所有大城镇定居下来，特别是在纳博讷和里昂。他们主要是东部的自由民，比如吕迪亚的金匠，他们的名字在阿文切斯的碑文中看得到。 [82]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由于在莱茵河、多瑙河及自由日耳曼以远的广阔的平原和森林地区驻扎军队，日耳曼边界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古罗马军团对贸易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就如彩陶和玻璃器皿一样——它对工业本身有着

极大的吸引力。军饷和帝国的行政管理使得边境进口奢侈品非常容易，当然还进口本地不能生产的必需品——如特种葡萄酒、油和橄榄、纸莎草（papyrus）——也没有相应的出口。由于这些便利，罗马日耳曼（Roman Germany）变得富裕起来，很快就脱去了殖民地时代的早期特征。沿着西日尔曼和瑞士的交通线很快发展起一批以贸易为基础的定居点，那儿的湖泊和河流得到了最充分的开发利用，以至于公元 100 年，罗马军团放弃它在巴塞尔附近的奥古斯特营地时，这一地区的繁荣仍然得以维持。再往东，贸易方向主要在阿奎莱亚以南，以诺里库姆的铁矿来交换意大利的制成品；从多瑙河上奥地利低地的卡农塔姆，古代的琥珀贸易路线向北穿过摩拉瓦亚重重关隘、维斯图拉河河曲处的卡利兹和奥塞尔斯克到达桑兰德。这条路线在普利尼时代就已经很有名了，直到 3 世纪中期仍在继续使用。但在它西部的波美拉尼亚，市场逐渐被高卢和莱茵兰所侵占；而在波希米亚，1 世纪的墓地中埋有大量的罗马商品，但是在 2 世纪墓地中日耳曼本地商品逐渐多起来，最终在 3 世纪占主导地位。

边防的加固对不列颠的经济也有影响。但是不列颠只是一个偏远的边省，它直到很晚才进入帝国的势力范围——克劳狄（Claudius）在公元 43 年入侵——作为殖民地它长久以来一直是为制成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材料的供给之处。斯特拉波列举了它的出口品，像小麦、牲口、铁、兽皮、奴隶及猎狗；还有牡蛎和胸针（2 世纪早期很短的一段时期内）。相应地，大不列颠进口军队必需品（在大不列颠驻扎着 3 个军团及其附属机构）及大量的彩陶，其中大部分通过泰晤士河运往伦敦。伦敦地区出土的大量彩陶和一只装运彩陶的船舶残骸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这艘船在 2 世纪后期在惠齐塔布尔附近的普丁潘暗礁搁浅。然而，彩陶从未取代过本地陶器。本地陶器（占在英国发现的陶器碎片的 96%）开始有许多不同品种，后来发展到由几个大的中心生产种类较少的几个优秀品种。不列颠经济生活的特征与早期莱茵边境的侵占史相似，部队在满足自身对制成品需求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里有几个军团的陶场，在登比郡的霍尔特（Holt）生产的陶器具有罗马风格，另外还有军团铁匠。在道劳科赛（Dolaucothy）的金矿及大部分铅矿是国有的，由帝国检察官管理，也许有奴隶在那儿工作。铜和锡被熔铸成青铜，事实上，青铜雕饰直到 2 世纪早期都具有地方特色。随着 3 世纪康沃尔的开发，白蜡成为乡村别墅主人的奢侈品，而他们买不起银器。但是，这已把我们带到接近罗马帝国晚期的情形，而那时却正是不列颠经济的鼎盛时期。

[83]

总体来说，不列颠的经济发展一直是落后而持缓的，尽管从1世纪后期开始，这个行省除了葡萄酒和油类外，大体上能够做到自给自足。有铭文说明不列颠和大陆的贸易联系——与波尔多、美因茨、西兰；在不列颠的索尔威湾上的鲍恩斯（Bourgneuf）有个祭坛，它是一个要去哈德良长城（Hadrian' Wall）以外的地方冒险的商人为自己祈祷生意成功而建的，这本身是一个与苏格兰沿岸存在贸易联系的生动说明，这种联系一直延续到4世纪，用来交换的商品是玻璃、胸针、莱茵河的陶器，而北方的商品是奴隶、牲口、皮革、毛皮等。和爱尔兰的交易是断断续续，无足轻重的：商品由爱尔兰人的船只航运，一些发现表明爱尔兰人对罗马铸币最感兴趣。

普利尼写道，高卢和西班牙在谷物、油、酒、马和金属的生产方面相差不多；但西班牙在茅草（做绳子用）、玻璃石、精制染料上更具优势，那里的奴隶头脑灵活、干活卖力，人民也更强壮热情。整体上说，这是一个公正的总结，只是对高卢的性格和进取心的归纳有点不公正，并且没有把西班牙在矿藏方面的优越性考虑在内。金、银、铅、锡、铁、铜、朱砂、水银、矿物染料、大理石和盐在西班牙都有含量不同的矿藏；在别处，普利尼对这里[84]矿藏的丰富大加赞赏（可能是高估了高卢的前景而不是低估了西班牙的成就）。现代权威估计，新迦太基每年可生产$8\frac{1}{3}$吨银。普利尼和斯特拉波都对罗马人在西班牙应用的金属提炼技术留下了详细记载。有时可通过表面冲洗得到黄金，还有的地方在山里打深井来采金；最终，还是长隧道“战胜了造化的巨大”，这些隧道挖得很深，并且有加固措施；当准备就绪，将拱形支撑物移开，整个山的一边便轰然倒塌，然后从几英里外引水，急泻到裸露的土地上冲洗即可获得黄金。狄奥多托斯（Diodorus）提到用阿基米德螺旋泵（Archimedes' screw）来抽取低井中的水，至少发现有9个这种器具，每个能将水提到1.5码以上。还有的用克特西比乌斯泵（Ctesibius' s pump）及几种不同的抽水轮子提水。

从泰比里厄斯（Tiberius）时期开始，大多数矿井由帝国政府管理，有时也通过签订合同转交给公司管理。西萨普的大朱砂矿就是由西萨普南西斯会社经营的，但更多的是国王通过地方财政长官对开采保持更为紧密的控制。如西纳莫里纳伊比利亚附近的矿井就是由一个叫做蒙蒂斯·马利安伊的地方财政长官管理的，他负责将铸块送到奥斯蒂亚，在那里另外一位叫做马萨·马里安亚和他一样的地方财政长官负责接收。也有可能这些地方财政长官在奴隶和囚犯的帮助下直接管理矿井；有时，他们也将工作交给或大或小

的承包人团伙。尤其在哈德良（Hadrian）时期，行政当局喜欢的制度，有点让人想起同时代在管理宗主国占领的北非大部分庄园时所用的管理系统。矿井直接交给一些小的私人合同者开发；从葡萄牙南部维帕斯卡（阿尔茹什特雷尔，Aljustrel）来的两份文件说明了这套系统在实际中是如何运作的。第一份文件通常被称作《维帕斯卡金属法》（*Lex Metalli Vipascenis*），也许可追溯到弗拉维安（Flavian）时期，它包含了一些具体的规则。这些规则制定得十分详尽，是检察官为矿井和矿井周围独立于自治市的村庄制定的。残[85]留的部分铭文列出了村庄各种经济活动以垄断形式承包给独立承包人的条件：财产的拍卖（及与其相关的营业税的收集），制鞋、理发及漂洗布都要有特许，它们都是以垄断的条件出租出去，并以明文规定的处罚来防止对这种垄断的侵犯。地方浴室——在一个以开矿为业的村庄很重要——也以租约的方式运作，开放时间（日出到中午为女性用，下午1时到8时为男性用）、入场价格及承包人的其他义务都有明文规定。文件还包括其他一些有趣的内容，比如村里的教师可以免除一般的税赋。第二个文件可追溯到哈德良时期，它包含了开采矿井活动的一些帝国的规范，规定了承包者（他们是作为小人物恪尽职责）的义务。从铭文上可清晰地看到，砂矿一部分归国家，一部分归承包的矿工。这套制度一直延用到罗马帝国的后期。我们知道一些矿井和採石场使用囚犯和强制劳工，但主要的矿井还是由一群联系紧密的自由工人开采，他们的职业世袭，尽管这可能出于自愿而非被迫。

除金属矿（大多未经加工就运往海外）外，西班牙还出口许多产品，工业的农业的都有，特别是南部的贝蒂卡。水果、蜂蜡、沥青、药及染料都经常从这个岛的不同地区出口，图尔德塔尼、科尔多瓦（Cordoba）、卢斯塔尼亚的萨莱西亚的羊毛还出口到意大利。大多数是以原材料的形式卖出，但西班牙也有产自贝蒂卡的斗篷的出口，几个城镇的织工和染工的碑文验证了马提雅尔①和尤维纳利斯②提到的这种说法；如在伊伯利亚有杂拼花布棉被和毡制品的制造者。

西班牙的另外一项重要并且特别的产品是鱼子酱。它主要有两种类型，*muria* 及更为珍贵的 *garum*。估计 *muria* 是从一种浸酸的海水金枪鱼中提取的液体；*garum* 则是从鲱鱼或鲐鱼的内脏和血液中蒸馏出来的汁液，随后将其放在阳光下发酵几个月。马拉卡商人在罗马出售这种美味里最有名的一个

① 古罗马诗人，因警句及诗集闻名。——译者注
② 古罗马讽刺作家，以揭露讽刺贪污腐化闻名。——译者注

品牌：联合鱼子酱（*garum sociorum*）。尽管这个商标似乎另有所指，并没证据表明存在对生产或销售的垄断。

总的说来，贝蒂卡是这个国家最富裕也是最繁荣的地区。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river）流域是惟一有多余小麦出口的地方；贝蒂卡还出产两种重要产品——橄榄油和葡萄酒。在罗马台伯河大货场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做蒙特特斯塔西奥，那儿的碎陶器片堆积如山，有140英尺高，周长达3 000英尺。从对其样品的分析可以看出，它们主要是2世纪西班牙双耳罐【86】的碎片。在所有其他西部行省也发现了类似上面雕刻的图案特征的碎片，如在奥格斯堡（Augsburg）、布雷根茨（Bregenz），从瑞士到荷兰的莱茵河流域，在约克和伦敦以及高卢和北非的各地都发现了这种碎片。这些双耳罐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长颈的，装葡萄酒；另一种是短而宽颈的，装油。还有一些也可用来装谷物，但毫无疑问，大多数是为了便于输运而装酒和油的。它的主要制造中心是贝蒂卡的阿斯蒂基（Astigi）和阿尔瓦。据估计，蒙特特斯塔西奥有大约4 000万个双耳罐，每个容量11加仑以上。这些数字表明西班牙的生产者在2世纪成功地占领了意大利的市场（也说明了他们在帝国其他西部行省的成功），他们是通过低价或高质量的葡萄酒和油达到这个目标的。

蒙特特斯塔西奥的碎片还给我们提供了运货人（shipper）的信息。有点奇怪的是，这些人似乎不是西班牙人。他们有3个字组成的名字，这表明他们是自由民，尽管明显许多人是奴隶解放出身的自由民，也许克劳狄法令使他们获得了完整的公民权，这条法律给运货人（*navicularii*）提供特殊的权利，如造一个容量为10 000莫第的船只，① 它服务于政府的谷物交易达6年整。从地中海各地来的运货人好像参与过西班牙贸易，他们在经常合伙经营；但有证据表明在贝蒂卡的油商与高卢的纳博讷人间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如有一个罗马骑士，他被描述为一个贝蒂卡的油商及罗马商人的资助者，而在另一处碑铭中又被描述为萨让的一艘船的主人和本地船主行会的资助者。总的来说，给人的印象是高卢商人比西班牙商人在某种程度上进取精神更大；高卢商人越来越占据西部的贸易，就像叙利亚和希腊主导东部及以远的贸易一样。

西部的其他行省，西西里和非洲，主要是罗马的粮仓。外地谷物的正常进口是一条生命线，没有它，首都无法生存。每年埃及送500万蒲式耳，非【87】

① 那样大的一个容器能装3 083立方英尺，这就大约相当于31吨（净重）。【1】

洲 1 000 万蒲式耳，西西里也许送 200 万蒲式耳谷物①到奥斯蒂亚，从那里，谷物由帆桨驱动用于远洋航行的小型船舶或用可能由奴隶（虽然，4 世纪后，有证据表明是用牛）拖拉的驳船经台伯河运到罗马的。向一个也许有 100 万居民的大城市提供粮食是个巨大任务，是自奥古斯都之后的国王尤其关心的问题。这项任务由私人发货人通过订约承包完成，政府不断给他们发放一些特权。如克劳狄，他不仅仅满足于像奥古斯都和泰比里厄斯一样规范和平息上升的物价，而且还在奥斯蒂亚建了一个新的港口，用一条运河把它与台伯河连接起来，他还颁布法令授予那些从事粮食航运的人特权；这样，运货商因遭遇暴风雨蒙受的损失在经过确认后，就可按其社会地位获得补偿。向奥斯蒂亚输运粮食很重要，这可由稍后一段时期描绘与其相关的一系列景观的镶嵌画得到证明，它们保存在所谓的"Piazzale delle Corporazioni"上，即剧院后面一个大的廊柱（portico）上，由奥斯蒂亚地方的官员管理。这些镶嵌式拼图可追溯到公元 196 年康茂德皇帝重建该画廊后，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许多观众的职业，这些人经常在演出的间隙光顾那里，以之作为一个社交中心。这些建筑物上残存的铭刻给我们提供了与非洲、撒丁岛、高卢和亚历山大相关发货人在这儿经商的信息；但我们的记载并不充分，也许还有些其他的人，包括从西班牙、西西里来的运货人。

在西西里，堪与小麦生产相媲美的是其牲畜饲养；尽管有证据表明西西里的葡萄酒、矿产品、毛织品（锡拉丘兹可能生产一种犁）内部贸易也非常繁荣，并且西西里商人也从墨西拿②向奥斯蒂亚发运粮食，从奥斯蒂亚运回陶器，但西西里从未在早期罗马帝国的贸易中起过重要作用。它只有大庄园，属于一些在元老院没有职位的土地贵族，这些地产的大小经常相当于一个小公国。不过，这些城镇直到 3 世纪都很繁荣，这就意味着本地工业和零售业很发达。如卡塔尼亚（Catania），我们知道它是精细羊毛中心，也是一[88]个有采矿工人和造船工人的城镇，它从 16 英里以外的利科蒂亚通过 3 层引水管带来淡水供应，还拥有一个剧院和一个可容纳 15 000 观众的圆形大剧场，五六个浴室，和一些其他的庞大而辉煌的公共建筑。尽管缺乏充分的记载，这些成就表明当地经济生活的繁荣，虽然仅是地方性的。

非洲的工业也不太突出。这个行省的重要性当然在于它的粮食出口，还

① 对那些数据的讨论，是有争议的，参见 T. 法兰克（Frank）：《古代罗马的经济调查》（巴尔的摩，1933～1940 年），第 5 卷，第 218～220 页；V. 斯克拉穆查（Scramuzza）：上引书，第 3 卷，第 338 页及以后。[2]

② Messina，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北部。——译者注

有橄榄油——它是至少自恺撒时代以来当地第二重要的商品。在北非的几个地区还发现了榨油机；我们有一个 2 世纪由“非洲的谷物和油商”为帝国谷物供应长官所做贡献的证据。因此，令人好奇的是，没有更多关于制陶业的证据。不过有充分证据表明陶器灯厂的存在，这意味着本地陶器逐渐取代了意大利陶器。从蒙特特斯塔西奥带回的样品来看，其中仅有 15 片的特征表明它们肯定是非洲生产的。这个行省内部的贸易是小规模的、地区性的，城镇集市是其主要的销售的中心。还保留了一些对工业的记载，如有铭刻提到了恺撒里亚（Caesarea）银匠及迦太基和其他城镇的织工。由本地绵羊生产的羊毛加工成的布是非洲惟一享有国际声誉的产品；只有布业工人已经广泛组成了行会——这通常是繁荣的工业的标志。另一个较为重要的贸易——也是这个省的上流社会显示财富的一种措施——是马赛克的制造。已经发现了2 000多件，许多有非洲风景，其中绝大部分的手艺很一般。没有任何材料谈到马赛克和陶业工人组织过行会，这证明这两个行业的技工主要是奴隶。另外，奇怪的是，在贝蒂卡也缺乏行会存在的证据。在这里和非洲，也许有一些特殊的本地条件或传统不利于通常的工业和贸易的组织。

总之，以上细节描绘了西部和后来发展的罗马行省的大致图景，作为一个整体，无论是它的规模还是它的成绩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片从苏格兰低地到幼发拉底河，从黑海到阿特拉斯的广阔土地上，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权下组织了一套单一的经济体系。① 从公元前 31 年建立帝政开始，罗马帝国差不多享有近 250 年的和平。它的人民从战争的威胁和军役中解脱出来，受到一个规划良好的边界和多达几十万驻军的保护，因此，能够积极投身于和平、农业、贸易和工业活动之中。 [89]

当然，他们没有与外界隔绝（虽然这直到此时还不那么重要）。前面已提到，它同自由日耳曼和北部存在贸易往来；从 1 世纪末开始，安息至远东，骆驼商队从事的商品贸易数量逐渐增加。罗马对这种贸易征收很高的关税——公元 1 世纪为 25%——但也有证据表明它通过巴克特拉（Bactra，即巴尔赫，Balkh）和安提奥齐 · 马吉亚纳（即梅尔夫，Merv）和中国汉朝（Han dynasty）有贸易往来。中国的记载表明，有一个叫甘英（Kan-Ying）

---

① M. I. 芬利（Finley）在《古代经济》（伦敦，1973 年，第 33 页及以后）中指责说这样的简单陈述在时间上是本末倒置的；帝国的不同部分在社会结构、土地占有、劳动力的组织上有如此大的差异以至于划那样的一个阶段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而且，他认为，罗马阶级社会的上层感兴趣的是社会地位而不是投资，他们的理想是农业的自给自足，而不是从贸易中获取财富。对他的这篇论文的一个批评与贸易和工业有关，参见 M. W. 弗雷德里克森（Frederiksen）的论文，载《罗马研究期刊》（下称 JRS），第 65 期（1975 年），第 166 ~ 168 页。【3】

的人收集了一个地方的许多信息，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叙利亚。也许在2世纪，商人梅斯·蒂希亚尼斯到过塔里木盆地（那里发现有关于希腊罗马的物品），但是，与远东的交往主要是经海上进行的。一个希腊的船长希帕鲁斯（Hippalus）发现了季风，那是奥古斯都公元14年去世前的某个时候，这一发现极大地缩短了航海到印度的时间，此后，在16周内就可从普特奥里到马拉巴尔海岸，一年内可完成到印度的往返航行。到该世纪末，南德干（Deccan）商人已熟悉了西方商人。2世纪期间，希腊人曾穿越锡兰和苏门答腊岛航行到越南和卡蒂加拉（可能是现在的河内，Hanoi）的湄公河三角洲。中国的记载表明，那些人号称是的安顿（马库斯·奥雷利厄斯）的使者，他们在公元166年到黄河边的洛阳宫廷拜见了汉桓帝。印度以远的贸易总是非常稀少，对罗马本身的经济状况没有太大的影响。

帝国早期繁荣的是在政府的最小干涉下获得的。皇帝通常把生意交给私人，只是偶尔加以保护性的干预。因为有对销售和营业的课税，国家财政直[90]接得益于贸易的繁荣。关税，包括沿东部边境和行省之间的站点征收的税（出于这个目的，西班牙高卢和多瑙河被认为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地方性的货物入市税和在主要干路上固定站点征收的过路税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但还不至于形成对贸易的障碍。税率因时间和地区而异，但它从不是沉重的负担——尼禄为了刺激贸易的发展，早期曾尝试废除关税和5%的营业税，但失败了。这些税承包给合同人，他们在1世纪是骑士阶级，随后，从哈德良时期开始、奴隶解放出身的自由民在帝国检察官的管制之下也可以从事。

然而，除需缴纳这些税收外，贸易完全由私人控制。在罗马化的过程中，宽阔的公路遍布于帝国西部。在边界和罗马军团之间，行省中心如里昂和罗马本身都建有快速交通，这对帝国的有效控制十分重要；贸易路线与军团路线一致，甚至经常沿着同一方向。即便罗马赖以生存的谷物供应，也由私人运货人经营，这些商人因与政府签订了合同就可以得到特权而受到鼓励。因此，私人商人得利，而帝国当局在海上巡视，保护公路和贸易路线，以保证贸易发展的和平条件。海港、码头、灯塔、运河——连接莱茵河和北海或者红海和尼罗河的运河——都是公共支出修建的；国家建立旅馆，水按计划供应。实际上，在罗马帝国早期的整个经济领域都是按自由企业的一般规律运转，几乎只有矿场例外——泰比里厄斯提出了一个政策，把矿场的所有权集中在皇帝手中。尽管如此，开发仍不时由合同公司进行，或者像在维帕斯卡一样，由许多组小承包人在政府的特许下开发。

这套经济体制的突出成功（不是任何有意识的政策的结果）及显赫成

就不应掩盖其严重缺陷。尽管在西部地区，城市有了非凡的增长，但不要忘记，许多城市的规模非常之小。大部分人口还是居住在农村，即使在城市发展已有很久历史的东部也是如此；在高卢、西班牙、日耳曼和不列颠，这一比例则更高. 这些人的生活与罗马文明和贸易只是有着最表面的接触。城市有精致的建筑，广场、澡堂、圆形剧场、马戏场、雕塑、凯旋柱和拱门，法庭、庙宇和节日、宴会及罗马生活的极端外向的随身用品。对城市生活的这种描述更倾向于是夸大了舒适的城市居民在辛劳的农民之间的差距，尽管那些奢侈品也只有通过努力才能享受。另一方面——财富的增加是通过关键性的技术进步得到的——这不仅要求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还接受一套与古代上层阶级制定的有关社会和经济目标不同的观念。这一时期也不是没有取得技术上的进步，但是除了一些新的机械设备——比如齿轮、螺旋桨、旋转式磨盘及依其改造的水磨机、吹炼玻璃、建筑混凝土、空铜铸模以及公元400年发明的带阀的风箱（它首次使完全的熔炼成为可能）——之外，帝国的技术水平从未超出过后古典希腊时期①埃及的水平。陆地运输仍是笨重、缓慢而又昂贵。罗马人从未学习用马颈轭（collars），这使驮畜拉着四轮车一点都不憋闷，牛也常常被用来运重物，平均1小时走不到2英里。海上航运虽然便宜，但也慢。许多船都是低吨位的，船长通常沿着海岸缓慢前进，不断把水和供应品带到甲板上，或者在抛锚地过夜，就像希腊和腓尼基先人在600年或1000年前所做的那样；冬天一般不出海或很少出海。圣·保罗的历险经历了失事和相当的不适，他雇用了3只船走完了从巴勒斯坦到罗马的全程，这次冒险经历重现了许多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的经历。 [91]

最后，以上描述的图景只有在不被看做静止的条件下才算是真实的。宽松的体制——或者说是一套不存在体制的体制——给了经济发展免受控制的自由，使得国家机构显得相对仁慈——主要出于对经济的漠不关心，并由此导致西部新被并入的行省（正如更早的希腊化时代②的东部地区一样）取得了切实的经济成就。然而，正是这套体制，仅仅经过100余年的发展，就彻底转变成了自己的反面——帝国后期对经济的严格控制。这种转变是如何产生的呢？特别是，是否有可能在旧秩序中找寻到孕育新秩序的种子呢？ [92]

---

① 从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到奥古斯都登基期间。——译者注

② 指希腊文明史的第二个时期，始于马其顿统治，止于兼并埃及；第一时期为自由城时期，止于亚历山大；第三期为帝政时期。——译者注

2.2 3世纪的危机和通货膨胀

从西弗鲁斯·亚历山大到戴克里先的50年是模糊的50年。由于哥特人入侵北部边境以及波斯人侵略东部，帝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加利努斯（Gallienus）是运气不佳的瓦勒里的儿子和继承人，其父成了波斯人的俘虏，并死在他们手中。在他的统治下，高卢暂时从帝国分离出去，意大利受到阿勒曼尼人（Alemanni）的侵犯，而希腊受到赫鲁利人（Heruli）的侵犯。只是在一系列行伍出身的皇帝的不可思议的努力下——像"哥特人征服者"克劳狄，战胜分离的沙漠国家帕尔迈拉（Palmyra）女王芝诺比阿（Zenobia）"复原轨道（restitutor orbis）"的奥勒利安（Aurelian），以及恢复莱茵河和多瑙河边境的普罗布斯（Probus）等——帝国才得以继续生存。即便如此，代价也相当惨重。

西部城镇遭受严重灾难，特别是高卢，由于巴高达（*Bagaudae*）即土著扎克雷（*jacquerie*）的兴起而陷入更严重的蛮族蹂躏，佩拉的鲍里努斯将这些人描述为"私生的青年、狂暴而疯狂的专门谋杀贵族的武装者混杂而成的一个卑贱的群体"。几个世纪以来，开放城市在莱茵河边境驻军的保护下成长并繁荣；一旦设防破坏，敌人就长驱直入，通过边境行省烧抢掠夺。实际上商人和小工匠已经消失了。从波斯图姆人起义反对加利努斯时起，城镇相对于其人口而言是过大了，现在缩成城堡，从勒利安（Aurelian，270～275年）统治以来，这些城堡少有超过70英亩的，通常是更小。因此波尔多非常大，其周长2 275米，面积75英亩，斯特拉斯堡的新兵营有48英亩，南特、鲁昂和特洛伊斯各有40英亩，而博韦、图尔兹、雷恩各25亩，而森里斯仅17英亩。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奥顿（奥格斯托杜努姆），在被泰特里库斯的高卢军队攻陷和被巴高达人掠夺时面积为500英亩；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I）the Great，emperor］将其重建，面积为25英亩。

规模的下降至少意味着人口数量减少。在某些地方，如斯特拉斯堡，市民仍生活在罗马兵营之外，在必要时随时向兵营求助。但斯特拉斯堡是一个军事化城镇，是随军钱商和第八军团的中心，直到近代都是如此，因此一般说来不能把它看作高卢城市的典型。到3世纪中期，由于侵略和掠夺，高卢[93]大部分城市的人口数量开始下降。但不幸的是，我们缺乏评估人口衰退程度

的手段，[①] 特别是生活在陆地上的人口，我们也没有把握说在高卢正确的在别的地方也正确。很明显，侵略、大屠杀、内战征兵在许多行省都造成了影响。瘟疫和饥荒也是人口数量下降的因素，但罗马帝国的人口几乎稳定，虽有很高的死亡率，但往往弹性很大，很快就补偿了瘟疫和饥荒造成的人口数量减少。导致人力短缺的原因更可能是来自政府压力的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对可纳税人口数量下降的一个反应，但国库的强征税及边境军队需求的增加，本身就使情况变坏。因此，尽管人力实际短缺，但不能肯定是因为对劳动力和资金需求的增加，还是由于可得的劳动力供给数量的下降，或二者兼而有之。但可以解释说，这种短缺在3世纪前就已明显存在。在马丘斯·奥雷利厄斯时期，用野蛮人的俘虏来填补帝国人手的空缺成为权宜之计；奥古斯都意在鼓励出生率的立法，如果不是有必要或至少还起些作用，其效力也不会持续3个世纪之久。

这种让野蛮人在帝国内定居的做法到3世纪还在继续，我们听说该世纪在帝国的边境是查马维（Chamavi）和弗里西（Frisii）[②] 部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也同样地让法兰克人（Franks）定居在边境。高卢的恢复伴随着这种定居，首先是获救的高卢人，接着是野蛮人的俘虏。4世纪，这种情况继续且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野蛮人被带入边省，他们在罗马长官控制的殖民地定居下来。现代法国的许多城镇或乡村，如勃艮第（Burgundy）、塞麦兹、阿莱恩、阿勒曼尼说明了它们最初是勃艮第人、塞麦兹人、阿兰人（Alans）或阿勒曼尼人的一些群体到这里定居的。因此3世纪危机的一个后果是西部行省的逐步野蛮化；在评估这一时期的贸易和工业的产量和质量时，必须记住这一点。

尤其要指出的是，3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的环境动荡不利于远程贸易，这加【94】强了对地方生产和自给自足经济的强烈需求。混乱时期给财政系统增加了新的负担，这个系统实际上没有创造出可转让的支票信用机制，差不多所有交易都靠铸币进行。古代差不多没有等同于现在的有限责任公司；因此，个人承担风险，利率也相应地很高，不可能积累大规模企业活动所需的资本。因此经常有人尝试减少风险和开支，在与上文已经讨论过的许多其他动机的共同

① 人口衰减的程度，以及人口衰减作为帝国衰落的一个因素的意义，曾经被争论多次。与A. E. R. 博克（Boak）在《人力短缺和西罗马帝国的衰落》（伦敦，1955年）中认为的人口大幅度下降是这种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的观点相反，芬利在《罗马研究期刊》（1958年）第156～164页中有自己的观点；也可参考琼斯（Tones）：《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第1040～1045页。【4】

② 参见本书索引 Frisia，英文版第971页。——译者注

作用下，手工业者不断被吸引到新的市场和原料中心。而且，我们知道，正如在高卢，当自由劳动力比意大利奴隶劳动更有效时，这种进程就自然加速。

如此多的古代工业以奴隶劳动为基础，这个事实之所以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作为一种制度，它受到了罗马和平的不利影响。1世纪以来，可以得到的奴隶开始减少，尤其到3世纪和4世纪，景况尤甚。皇帝们考虑结束国境内战争和清除海盗；这些目标都相对成功地完成了。战争和掠夺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尽管通过边境还不断有奴隶流入，但数量已越来越少（正如西曼查斯评论的，"奴隶容易买到，价格也还可以"）。提洛岛奴隶市场的黄金时代——就像斯特拉波记载的那样（或许有点夸大），"这个岛一天可输入并卖走成千上万个奴隶"——现在已经一去不再复返了。当时，在帝国疆域内禁止把罗马公民变为奴隶。虽然听说可以通过许多途径逃避相关法律，而且早期罗马帝国人道主义的增长使得许多奴隶可以订婚成家，但可得到的额外人口不足以填补这个缺口——特别是奥古斯都（Augustus）[①]统治早期以来，尤其是帝国的后几十年，人道主义感情不断增长，加之从公元58年《谷物法令》以来首都所有的居民都可以随便买到谷物，导致了大量地释放奴隶，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做限制性的立法。奴隶少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得不到劳动力；实际上有迹象表明，政府对于自由人的态度在发生变化。西塞罗曾用轻蔑的口吻写道，"作坊无耀事（There is nothing noble about a [95] workshop）"。但到君士坦丁时期，工匠被授予了免除公共义务的特权，为的是让他们有空闲时间来提高技巧。不幸的是，这个心态的改变太迟了——正如它所发生的一样，而实际上仍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因为有证据表明，君士坦丁时期的经济和政治义务体系已经开始运作。与此同时，任何的中央集权和把工业集中于意大利的努力已都不再是对经济现实应该做出的反应。产业集中会卷入大量资本，深化劳动分工，同时还会带来企业管理费用的大幅下降。但在帝国统治下——即使假设他们对这些因素或对那样的目标有较大的兴趣——设备仍然很简单，只是很少的几样工具加上个人的简单技巧。迁徙非常容易．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制陶工人会从亚雷蒂厄姆搬到格劳费森克（Graufesenque）繁荣的制陶厂。

在帝国的前150年，西部行省的发展有两面性。就它导致的原始土地上新生产力的解放而言，它是进步的。但同时它也导致了行省之间贸易的倒退。从克劳狄开始，明显形成几个大的区域，它们彼此之间不完全独立，但在各

---

① 原名屋大维（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译者注

自范围之内（也许包括了几个行省）贸易数量尤高。此时，西班牙、日耳曼，某种程度上还有不列颠（虽然不列颠是个例外）以高卢为中心组成一个区域；而非洲的行省从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到昔兰尼卡组成了另外一区；意大利和西西里及科西嘉和撒丁岛组成了第三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边界被迫不断地后撤。最后（仅西方而言），雷蒂亚与诺里库姆和另外一个多瑙河行省潘诺尼亚和大夏（以后还有俄罗斯南部）一起成为一个区域，到2世纪末，它通过阿奎莱亚贸易与意大利紧密联系起来。此时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在所有主要方面能够自给自足：粮食、酒、油、盐、玻璃、纺织品、黄铜器及陶器。与这种独立相反的是意大利的衰退。半岛越来越寄生于帝国的其他地方，依赖它们以税收的形式维持国家的行政事务，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皇帝的私人地产；随着3世纪帝国宫廷从罗马撤走，这个支柱也瓦解了。逐渐地这种经济联络被打破。3世纪中期以后，这些大区之间进一步瓦解。如西班牙的蒙特特斯塔西奥双耳罐最晚可追溯到257年。完全可以推断，加利努斯时期日耳曼人对西班牙的入侵极大地削弱了对奥斯蒂亚繁荣的酒和油的出口贸易。[96]

3世纪的这种紧张状态和经济的普遍倒退在铸币史中得到了反映；这是影响贸易特点和水平的另一因素。的确，其重要性不应被夸大，因为在罗马世界，在城市直接影响之外的地区尤其是北部行省，使用铸币作为交易手段并不是普遍或是基本的，而且国家发行铸币也并非出于经济目的。皇帝铸币，最初是想给士兵和官员分发薪金，提供必要的资金来作为一种缴纳税收的手段，使用铸币便利了贸易是偶然的，即使有益，也只是财政运作的一个副带效应。奥古斯都曾试图通过建立黄金和白银的联系使铸币规范化，规定重1/40磅的金币奥里斯（*aureus*）与1/84磅重的银币德纳利斯之间的兑换关系为25:1。但不久，财政压力导致了这个单位铸币重量的变化，根据普利尼的说法，奥里斯被尼禄（公元54～68年）减为1/45磅，而德纳利斯被减为1/96磅，现存下来的几个样品可推断出的重量，金币为7.29克，银币为3.4克，这证明了他的说法。尼禄还将银德纳利斯的含银量减为90%，后来图拉真（98～117年）将其降为85%，马丘斯·奥雷利厄斯（161～180年）将其降为75%。有人认为银含量的改变是为了补偿黄金价值的下降并维持二者的比例。实际上，卢奇安的资料表明，在庇护统治时期（138～161年），这两种币的兑换比例一直没改变。除了迫于财政紧张，其他原因很难解释为什么尼禄会把金币和银币的重量同时减少。铸币纯度的降低看来也是为了溶解政府的财政压力——主要是为了抵消图拉真在达契亚和安息的战争花费和他的

继任者在东部和北部战争的大量开销。[①] 塞蒂穆斯·塞佛留斯（193～211年）是第三个进一步将银的含量减少的皇帝——他还提高了军队的支出——很明显也是出于同一政策。卡拉卡拉（211～217年）再一次增加军团的薪金，为了满足这个支出及新的安息战争——在他统治的最后4年——发行了新的银币，安托尼涅努斯（*antoninianus*），其重量相当于1.5 [97] 个德纳利斯，但价格却为2个德纳利斯。他还将奥里斯的重量轻微减少，而自尼禄将其重量减为1/45磅以来，其大小和含金量就基本上保持了稳定。

尽管铸币中金和银含量的不相称性在增加，但有证据表明，直到塞弗努斯·亚历山大时期（222～235年），1金奥里斯等于25德纳利斯的比例一直没变过，[②] 这期间没有很大的价格增长。但从238年马克斯米努斯死后，很快就发生了通货膨胀，这可能是由于人们认识到德纳利斯含银量减少的程度所致，并没有流通数量增加的原因。[③] 238年以后，银币的质量发生了灾难性的恶化，直到与镀银的黄铜差不了多少。在阿拉伯的腓力（Philip the Arab）时期（244～249年）来自努比亚（Nubia）的碑文表明，奥里斯与德纳利斯的比例为1:40，而普佩努斯和巴尔比努斯（Balbinus）（公元238年）曾恢复过安托尼涅努斯，并很快用它取代德纳利斯作为标准的“银”币，但它一直贬值直到奥勒利安统治时期（公元270～275年），含银量只有最初的1%。大约从这时候起，价格曲线就陡直上升，直到公元280年后，真实的薪金水平才算赶了上来。奥勒利安发行了一种新的铸币，含有青铜的合金银币，曾取得短暂的成功，而他的继任者可能减少了它们的面值。

奥里斯在公元3世纪也并非未受影响。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波动后，其重量减为卡鲁斯时期（公元282～283年）的1/70磅，其后不久，在294年戴克里先（284～305年）将其稳定在1/60磅，并将其作为一套包括金、银、铜银合金及铜币的普通货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整个帝国通行（包括一

---

① 参见迈克维茨（Mickwitz）的《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货币与经济》（赫尔辛基，1932年），第32页及以后，A. H. M. 琼斯的《罗马经济》（牛津，1974年），第191～192页。【5】

② 对这一主题的探讨，M. H. 克劳福特：《罗马世界的兴衰》（柏林—纽约，1972年）（此后简称 *ANRW*），第2卷，第2章，第566～567页。与海克海姆为在《克里奥》（1933，第26章，第96页及以后）中的在科默多斯时期有通货膨胀的观点相对的有A. 帕塞里尼（Passerini）：'Sulla pretesa revoluzione dei prezzi durante il regno di Commodo', *Studi G. Luzzatto*, I（米兰，1950年），第4页及以后。认为在西弗里时期有通货膨胀的参见T. 皮卡里（Pekárg）：《公元161～235年罗马货币和财政史研究》，载《历史学》，第8卷（1959年）第460～463页。【6】

③ 对这个产生分歧的观点，参见皮卡里：《公元161～235年罗马货币和财政史研究》，载《历史学》，第456～457页；R. P. 顿坎-琼斯：《罗马的不列颠学派论文集》，第33辑，1965年，第232页。【7】

直都有自己铸币的埃及）。除了单位币值较大的奥里斯，他还发行了一套新银币阿根特厄斯（argenteus），为 1/96 磅，并效仿奥古斯都，也制定了金、银币及其他基本金属的换算比例。但后者的价值显然被高估了，因为在 301 年，也就是戴克里先颁布价格法的同时，他还发布了一道有关通货的法令，[98] 宣布银币（毫无疑问金币也一样）的价值是贬值的德纳利斯（到此时为止是惟一的计算单位）的两倍。① 采取这种措施说明了官方对现存的两种通货间比例的确认，就像接受既定的运行价格机制一样，与此同时他还大胆地推行统一的价格控制。此时，或稍后的 294 年，德纳利斯开始被称为索利杜斯（Solidus），这个名字一直延用到拜占庭时期。

309 年，君士坦丁（公元 306～337 年）将索利杜斯减为 1/72 磅（4.55 克），但是他继续按戴克里先的 1/96 磅的标准铸造阿根特厄斯。银币的大小最终减小了，在 348 年减为 1/144 磅，396 年为 1/240 磅。4 世纪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但此时很少铸银，在 400 年已完全停止了；直到一个世纪之后在野蛮人的王国才重新出现了银币。尽管如此，直到 11 世纪索利杜斯都没改变。有人认为索利杜斯不是真正的铸币，因为在商业交易或储存到国库时经常是称其重量，而不管其面值，并且人们用青铜来换取银币时，通常说是在买卖索利杜斯换钱。然而这种观点一直没有引起太多重视。因为有人指出，② 在 1879～1889 年间，将英国金币付给英格兰银行时也是这样的，那时的金币无疑是确切意义上的铸币。

帝国继续铸造青铜和铜银合金铸币作为零钱使用，既然只是作为代用货币，当政府面临财政压力时，它的大小（和真实的价值）不断地下降；到此时，因为现存货币的重新定价，德纳利斯已只被作为一个计价单位使用，没有任何铸币的币值与其相当。君士坦丁在 307 年将戴克里先系统的努姆斯（nummus）合金币的重量减小，到 310 年又减了一次，4 年后减到了戴克里 [99] 先时期的 1/4。当它于 301 年出现在戴克里先法令中时，如前所述，72 000

---

① 对戴克里先的货币改革，参见 K. T. 厄里姆（Erim）、乔伊斯·雷诺兹（Joyce Reynolds）和 M. H. 克劳福特：《罗马研究期刊》，第 61 期（1971 年），第 171～177 页；克劳福特：《罗马世界的兴衰》，第 2 卷，第 2 章，第 577 页及其后。货币改革和价格法令的颁布也有所讨论。在埃扎尼发现了后者的一个新部分，说明了一磅黄金的价格是 72 000 德纳利斯，而一磅白银的价格是 6 000 德纳利斯，这就表明在戴克里先时期黄金对白银的比价为 1:12，这与奥古斯都时代不相上下。但是，货币法令——它颁布的日期是 301 年的 9 月 1 日——意味着黄金磅的价格以德纳利斯来计算比这要高，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通常把价格法令的时间定为 301 年 11 月到 12 月，因为黄金价格突然下降到 72 000 德纳利斯然后又陡直地上升难以解释。那么有可能的情况是，两个法令同时在 301 年 9 月颁布，在价格法令中黄金的较低数字反映了一段时期内价格的汇兑差额到法令公布时已经不在了。【8】

② 参见 C. 迈克维茨：《公元 4 世纪罗马银币体系》（赫尔辛基，1935 年），第 3 页。【9】

个德纳利斯兑一镑金的比率已经算是很低了（相当于1 200德纳利斯兑一个苏勒德斯），随之而来的这一数字的迅速提高表明，4世纪有一个非常之高的通货膨胀率。埃及的证据表明，无论用德纳利斯还是名义上的德拉克梅（drachmae）（它相当于1/4个德纳利斯）来计算，都表明324年1苏勒德斯值4 350德纳利斯。①

政府为什么默认如此比例的基础金属货币的通货膨胀呢？对此我们只能猜测。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已成功地通过金融手段积累了足够多的金和银，政府可以用这些金属来推行一种稳定的货币，而无须再用贬值的德纳利斯——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不用它来给士兵发薪金，因为士兵的报酬以实物支付（参考后面的第107页）。因此政府根本无意维持基本金属货币的稳定，即使有也只是偶尔为之，并非真心诚意地想通过发行更好的铸币来矫正业已发生的通货膨胀。也许政府没有意识到，铸造越来越多的青铜货币而收税时又不收回，这只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通胀的进一步加剧。

这种通货膨胀对罗马人民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呢？这与现代的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同。当然，价格相对于贬值的货币而言是上升的，但不总是立刻显现出来。另外，帝国的农村及边境地区，特别的是西部行省，仅偶尔用铸币；对他们来说，物物交换和自给自足的经济足以抵消货币贬值所造成的影响。那些靠薪金生活的人更容易受到影响。一旦通货膨胀，其实质薪金的提高往往落后于价格，3世纪的通货膨胀对减少士兵的薪金和国家雇员的实际薪金和薪俸肯定有长期的影响。② 结果这又导致税收和国家项目的支付用实物而不用现金，并导致了新的慈善基金的突然耗竭，而这是罗马帝国早期都市生活的突出特征。[100] 但在古代，积蓄不会一夜之间就消耗一空。由于德纳利斯的贬值是由银的含量下降，更老的或更优质的货币仍维持以前的价值（或者等同于相同的物品），或者经重新定价币值相当于已经贬值的新铸币的几倍；碑铭表明，旧铸币和新铸币有鲜明的差别。因而窖藏货币——是一种最普遍的储蓄方式——仍维持其价值；因此，遭受损失的是那些按照协议将钱借出去并规定了固定归还数目以及那些在新比率建立以前就接受贬值货

---

① *P. Oxy.* 1430。对罗马货币的历史和3、4世纪通货膨胀的分析谁都没有把握，部分原因是把记载中的铸币名字与现在的种类一一对应有困难，部分因为相对价格的波动，这种波动不仅发生在黄金和白银之间，也发生在这些金属与青铜或银与铜锡的合金间；我们也不能充分地理解货币政策，假如它存在的话。这里，可以参考A. H. M. 琼斯引用的书目，尤其是《经济史评论》，第2辑（1953年），第293～318页（在《罗马经济》重印时有所增订，第187～227页），还有《晚期罗马帝国》中相关的叙述（牛津，1964年），第1卷，第438～448页。【10】

② 参见琼斯：《罗马经济》，第208页及以后。【11】

币的人，而不是公共雇员。然而，通货膨胀造成了商业生活的不稳定，租赁的增加反映了这一点，租出时可以用实物而不用钱，并且保证在短期内付清利息。君士坦丁的一句评论（*Cod. J.* v. 37，22）说贷款不是安全的投资方式，就证明了这种不确定性。我们的证据主要来自埃及，但是这个相同过程的影响在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也是类似的，在贸易中引入危险因素会限制其发展并使之本地化。类似地，对罗马帝国最初3个世纪不同时期铸币流通量的分析表明，从塞弗里（Severi）时代开始情况有了一个相当大的改变，整个罗马帝国的流通体制从差不多是统一的状态变成了一种各个行省间的随便的、明显是无组织的混乱状态，这意味着维持一个统一的帝国货币体制的努力是失败的。①

通货膨胀可以被视为政府面对维持帝国机器遭遇财政困难时的反应。特别是在3世纪，维持官僚机构的成本及不断收买从野蛮人中招募的军队的人心所需支付的费用很高，这个沉重负担耗尽了行省的资源，沉重到它们再也无法承受。为了增加军团薪金，塞普蒂默斯·西弗鲁斯和卡拉卡拉（Caracalla）削减了国家的年度财政开支。但是人口一直在下降，技术基本上停滞不前。对这个问题，皇帝的选择有限：他们可以出售公共财产或将私人财产充公（这些财产属于富人，他们很容易被指控为叛国或谋反）【101】或将货币贬值；在不同的时期，他们都采用了所有这些方法。后者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尽管是权宜的解决办法。因为尽管贬值货币迟早要按金重新定价，但它们的价值相对于实物有所下降，支付政府官员和军队的庞大开支可以使用新货币。在危机时期，任何可以减轻财政负担的措施对皇帝都有吸引力。

必须在这个背景下考虑戴克里先于301年颁布的价格法。在埃及、克里特岛、昔兰尼加（Cyrenaica）、希腊和小亚细亚零零散散都发现这份著名文件，② 证明了其引言中的叙述：所有类型的服务，商品和运费的最高限价在整个罗马帝国通行（尽管它在各个行省实施主要依靠总督的能量和意识）。引言还明确地暗示了法律制定的目的，这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引言抱怨道，

---

① 对这一点，我要感谢M. K. 霍普金斯（Hopkins），他非常友善地把他还未发表的有关这个论题的论文让我参考。【12】

② 另外，记载有关古罗马圆形剧场的大理石和牲畜的希腊文残片在意大利的比托兰诺已经被发现，但是它似乎并非出自意大利；参见J. 宾根（Bingen）：《古希腊通讯简报》第78卷（1954年），第349～360页。【13】

"士兵的奖金和薪水买一次东西就用完了，全世界对军队的贡献落入了可恶窃贼的腰包"。皇帝主要考虑的是士兵的薪金能满足其需要，并阻止上一世纪的价格上涨重演，显然价格上涨后，士兵会要求薪金进一步提高。这个法令尤其详细地列举了食物和男女的各种服饰；如它列举了84种不同的羊毛及2 000多号亚麻布；帝国的东半部有5个不同的麻布中心，每个中心生产9种不同质量的产品。这个事实的意义将在下面讨论。这里可以认为食品的价格比埃及纸书中提到的类似商品的价格以黄金计算时都要高得多。简言之，戴克里先的最高限价是很高的，因此，不可能严重干扰正常贸易。但是它们可以阻止军队和宫廷附近物品价格的上升。

这个法令是个失败。根据拉克坦提乌斯的说法，集市上货品紧缺，使得物价较以前有所升高，"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就可能导致严重的流血事件"——或者由于暴徒聚众闹事，或是国家施以死刑惩罚。这个法令在罗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实际又是封闭的经济体制下能否成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它给了我们有关晚期罗马帝国的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信息。尤其是它提出了3个问题：政府义务增加是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一个本质特征；政府运作货币经济的程度；晚期罗马帝国行省之间贸易往来的程度和特点。

[102]

2.3 政府干预和经济衰退

一个像戴克里先法这样的法令是完全不适合早期罗马帝国的经济情况的。然而，有证据表明希腊化时代有几个希腊城市通过立法固定价格，相比之下，罗马政府直到此时仍认为贸易自由讨价还价是理所当然的（并得到了官方的肯定）。但自帝政时期始，劳工组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希腊化世界，自由商人、手工工业者及专业工人通常都有自己组织的行会，其功能部分带有宗教性，部分是社会性的。通过他们的捐助，给行会成员提供葬礼开支并给定期的宴会提供补助；行会有时维护和控制其成员的职业地位，尽管它不像现代工会那样规定薪金。也许是受到了希腊影响，被称为"执行委员会（*collegia*）"的类似行会，在罗马蓬勃发展起来了，在共和期间，它们受到怀疑，并因被看做政治动乱的根源而屡遭禁止。但皇帝们认识到他们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手段而控制工人。

"执行管理委员会"的发展可以通过运货人（*navicularii*）方便地得以追溯，运货人是为帝国首都供应谷物的运货人，他们是帝国尤其热心关注的对

象。克劳狄皇帝（Claudius, emperor）给他们的特权得到了以后皇帝的肯定；但从哈德良时代，发货人被坚决要求只有在把大量资产用于为国家服务时才可以获得经营特许。曾有一度，这些特权被给予私人发货人。从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皇帝时期的一段碑文中可以看出，阿尔勒船主称赞他们"杰出和最正直的资助人"，即谷物供应检察官，这表明了行会的重要性。马丘斯·奥雷利厄斯规定任何人不许同时属于两个执行管理委员会；《文摘》（*Digest*）上的一条信息可追溯到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时期，它特别声明特权是给提供服务的个人而不是不加区分地给【103】行会成员，这说明行会正在逐步地被纳入国家机构的范围内。有证据表明，2世纪末期，在罗马有各种特权行会，包括从事粮食贸易的发货商、铁匠（甚至在晚期共和国他们还有消防的义务）、油商、面包师，"谷物测量者"及猪商；在200年，阿尔勒的5个发货人行会罢工要求提高运费。

不幸的是，由于缺乏资料，行会在3世纪的进一步发展状况是模糊的。《奥古斯都历史》（*Historia Augusta*）中《西弗努斯·亚历山大的生活》谈到，这位皇帝（公元222～235年）建立了所有酒商、羽扇豆商、军鞋制造商及所有手工工业者的执行委员会，并且他还给了它们法律顾问，并分配给每个行会自己的法庭。不幸的是，《奥古斯都历史》是不可靠的，这段摘要反映的也许是4世纪的状况。所有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到了戴克里先时期（公元284～305年）行会已不再是由享有特权的成员自愿组成的实体，而是一个被控制的组织，其成员被固定在所从事的行业，并将这种义务传给财产的继承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经常被看做是一种荣誉，他们拥有老手艺人顾问委员会，包括房地产、房屋地基，还有技术设备。他们有资助人及宗教派别，其成员可以免许多税，退休的会长经常冠以荣誉头衔。但是这种尊重的背后掩盖了严厉的监护，行会逐渐被整合进统一的国家体系，他们中越来越多的成员被迫为政府卖力。395年以后，西部行省颁布一系列法令，禁止行会成员离开其行会和他们的工作，某些职业——如面包师，必须在行会内部通婚。

典型的模式可以通过运货人的情况得到说明。克劳狄曾给他们当中每一个建有载重为10 000莫第（modii）船只并用它为政府征收的实物税（*nanone*）提供运输服务的人发放特许权。4世纪，任何拥有这个吨位船的人必须听任国家的调遣，但作为补偿可免去一笔可观的赋税。326年，君士坦丁给这类船主免除了所有赋税，并命令中有点夸张地宣称这个特权"适应于全世界各个年代的所有船主"。这些特权在334年及337年又再次得到

[104] 肯定。380 年，格拉先给了发货人以骑士（*equites*）的封号。但这仅是问题的一面。因为，与此同时，待遇与个人财产的联系实际上已经有效地把 *navicularri* 固定在从事的职业上；这样，其财产继承人必然也就有了从事这个职业的义务。

发货人的职责是招集船员为政府组织航运，在那时，这是义务。他从政府得到一定比率的补偿，这在 334 年被君士坦丁规定了，因为发货人给君士坦丁堡提供供应，其比率是用实物支付一船货价值的 4%，并给予其相当于货物价值 1/1 000 的黄金，这是为了保证他们有热情履行其职责，并不让"他们遭受损失"（*Cod. Theod.* XII. 5. 7）。遗憾的是这究竟标志着发货人地位的提高还是下降，从戴克里先法令颁布以来，都无法决定，因为尽管新近发现的文件残片有对财政物品运输费用的规定，但它显然比运送一般的货物低，可我们从文件的内容无法具体确定要低多少。但到 5 世纪早期，在 412 年和 414 年，*navicularri* 将谷物从非洲运到罗马的报酬仅为商品的 1%。一系列的规定限制发货人，确保使他——更准确地说是船长，航海的管理者（*magister navis*）——不能以货物做投机、在港口延迟交货或做非法交易，所有这些都是犯罪，都要判处死刑。任何一次船只失事都会成为帝国怀疑的口实。必须进行调查，全体船员都要受到严刑拷打。如果一切正常，船长必须沿最短的途径到达目的地，在那儿他会收到一张凭据，从他开始服务的两年（以后减为一年）之内必须呈回。在这段时期所余的时间内，他必须回到自己的港口，但可按自己的意图运输其他货物，并无须担心别的征用。除发货人外，我们经常听到大群有特殊功能的辅助性行会，他们同样在政府的控制下——驳船夫、船坞工人、捻船人、压运者、潜水员、搬运工、量米工，将货从奥斯蒂亚运到罗马驳船上的船员，将燃料沿水上带到罗马的许多澡堂的 *lintrones*。所有这些人的职责都作了严格的规定。

政府对发货人的特别关注是由于他们给罗马提高供应的重要性。为满足公务人员的俸禄和自由分配，每年都要 3 600 000 蒲式耳谷物（14 400 000

[105] 莫第）；另外，国家也有义务向首都其他人员提供廉价谷物，因此每年的进口达到 17 000 000 蒲式耳（参照 87 ~ 88 页）。在奥勒利安（270 ~ 275 年）统治前的某段时间，面包代替了谷物，面包师行会在图拉真统治时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此时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但到 4 世纪，他们被完全组织起来为政府服务；因为这个工作艰辛而又乏味，规则制定得非常严格。与发货人的情况一样，财产与行业相关联，必须同时继承。如果一个人同时是发货人与面包师财产的继承人，那么他就承担两项义务；而且，无论地位如何，一旦和

面包师的女儿结婚，就得从事这个职业。面包师有责任从政府粮库收购谷物，在自己的地窖中磨成粉，烤成面包，在罗马各街区的固定地点销售。4世纪广泛采用的水磨机代替了人或畜力，我们知道在罗马建立了一个独立磨粉工人行会，其总部在贾尼卡卢姆脚下；这仅是功能分工的一个例子，说明像在面包这样重要的产业，部门的细分进一步带来了二级附属行会的出现。

但是，政府并不干扰谷物贸易。橄榄油从共和国晚期以来都是零散销售，到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之后才变得有规律。有两个橄榄油商的分别与贝蒂卡和非洲做交易。类似地，当猪肉在罗马的销售正规化时，猪肉商行会在3世纪也承担了官方义务。这些 *suarii* 必须从意大利土地贵族的手里收猪——这是土地贵族所纳赋税的一部分，猪肉商把它们运到罗马屠宰，并将肉送到有权享用的人手中。在下文中我们会谈到，在成长起来的新的税收系统中，纳税人可以把实物税折算成现金缴纳，猪肉商就可以用这些现金在罗马或罗马附近公开的集市上购买同等数量的牲畜。

罗马帝国后期，大多数西部行省也有同样的行会组织，市政当局控制执行管理委员会的运作，市政府代表市议会行使职权。议会成员比行会成员有更高的地位，向后者发号施令，代表罗马负责其实施。尽管这些与人们日常饮食有关的行会提供了最早最典型的政府控制的例子，但绝不是惟一的。到 [106] 4世纪，差不多所有的行业和职业都组织成立了行会，有记载表明，有旅馆主人行会、陶器行会、鱼商行会、银匠行会，还有国家企业的公共雇员行会，这些仍将在后面讨论到。

戴克里先试图在整个帝国规范所有价格的壮举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做出的。然而，即便在戴克里先时代，经济体制显然也不完全是国有化的：它更多的是受控制的私营企业的衍生物，是早期罗马帝国不受控制的私营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大多数工业和商业财产仍然归私人所有。但在早期关系中，私人在某段规定时间内用自己的财产担保受国家管束，但约6年合同期满后，他们又成了自由人。此时，国家将财产与其职业相联系，行会成员为了自己财产的所有权，被迫为政府效劳。国家也补偿他们的收入损失；但4世纪后，这种安慰（*solacium*），或如官方定义的，这种安抚，越来越多地以实物支付的形式出现。

为什么发展起这样一套准计划经济，这是一个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毫无疑问，不同的生产和销售部门有自己不同的原因。但是，整体上说来，政府似乎承担责任。因为大众必须吃饭，商品必须生产和销售，私人企业仅靠其本身，已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在政治生活中也明显出现同样的迹象。3世

纪危机时，财富普遍受损，这使得没几个人愿意承担市政府机构越来越重的责任。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后，政府机关成立了世袭的议员等级职位（*curiales*），这些人已失去大部分的进取心，但仍然用自己的私有财产赞助市政活动，也负责税收并通过当地的行会（*collegia*）为地方提供供给。

因而，无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还是从地方上讲，养活帝国的大部分人口成了一项公共责任。这就像我们所知的，大多数并不是靠货币来完成的。然而这种发展的程度必须严格界定。因为特别是4世纪，普遍认为在帝国的广大【107】地区，衰退的经济使得帝国当局和平民不愿意用钱，而代之以一个物物交换的系统，所有支付，包括工资和税收，都以粮食、衣料及其他日常用品进行，而不是用那时不值钱的货币。这表明，在3世纪动乱的压力下，罗马帝国退回到了"领地经济"。大土地贵族的庄园里有各种行业的工人，他们追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有人认为，这个体制反映在戴克里先制定的税制上，在这个系统中实物支付起主要作用。

确实，罗马的许多地区在各个时期没有铸币作为交换手段仍然运转良好。但这种普遍倒退到物物交换的论点很难与戴克里先价格法提供的证据相吻合。这个文件准确地列满了许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表——而且是来自帝国各地的商品——从这个文件中我们看不出有从货币经济倒退到物物交换的现象。而且，前文已表明，3世纪的危机和混乱并没有严重到把货币逐出流通的地步。即便通货膨胀也仅仅使规定以地方土产品（*natura*）来支付的合同数量稍有增加，而在这些地区，这种合同一直都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也许是从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193～211年）开始，[①] 军用物资的供应成了行军路线所经行省的普遍责任。为军队供应的特殊定货（*indictio*）在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它规定了物资供应的细节，这种实物形式的课税称为实物税（*annona*）。当戴克里先推行他的新的双重财政税收系统时——可耕地面积（*iugum*）和耕种所需单位劳力（*caput*）合并成一个按人头和按面积计征的混合税制（*capitation* 和 *ingatio*）（见卷2，第2版，第113～114页）——他使这种每年征收的实物税（*annona*）成为重要特征，并将其已产生的深远影响强化并长期化。

首先，用地方土产品缴税（*natura*）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运输问题。每年需向国库交大量的油、谷、肉、布等，这就要求在罗马的主干线建立公共仓

---

① 参见 D. 范·伯切姆："L' Annone militaire"，载《法国国家考古协会论文集》（1937年），第177页及以后。【14】

库。而且，陆地运输艰难而昂贵，这就导致了经济生活的逐步分散化。实物的支付，比如食物分配或者军队制服的供应，直接与某些相邻省的产出相联系，以避免长途运输给国库加重负担。政府雇员以凭单形式领薪金——它可作为到邻近指定公共仓库（*mansio*）领取谷物、酒或油的证据。薪水因职位而异，按单位计算［也被称为薪俸（*awnonae*）］，每年每单位相当于60莫第（15蒲式耳）。 【108】

付给公共雇员的薪金，无论是文职还是武职，实物支付的形式在通货膨胀时期十分受欢迎。① 这笔费用是帝国开支的主要项目。很自然，这个过程会激起不满。对于士兵或一般官员人员来说，以实物而不以贬值的货币来发薪金是个很大的优势，但为了以产品支付薪金，实物首先必须转到国家的手中；这对农业人口以产品征税（*natura*）最为有效。这样的考虑看起来似乎使得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创立②（戴克里先后来发展了）了一套体制，首先保证给军队以及后来帝国官员提供满意的供应，因为整个帝国机器的存在靠的就是他们。

以实物付薪金对农民和行会成员均有影响。农奴制的形成，使得农奴（*colonus*）受制于土地，每年以土产品缴税（*natura*）使土地贵族要亲自负责整个地产上的出产。行会成员也发现，新的税制度正越来越多地限制他们的自由。用实物收税导致了严重的运输问题。这个任务交给了行会。长期以来皇帝喜欢利用行会的义务服役系统，而不是建立新的帝国管理机构。这个政策导致的困难可由陆地运输得到说明。就像发货人被政府强行雇用来从海上航运税收产品一样，陆地财政物品的搬运，首先是征用地位低下的赶驼人，后来又用公共驿站来完成。尽管在4世纪叫它公共路线（*cursus publicus*）——更早时为运输马车（*vehiculatio*）——但它实际上也是在征用体制下运作的。 【109】

有两种速度。私人旅行者用的马和骡每天分别行驶差不多50英里和25英里，而牛拉车每天走6~7英里。路线顺着主要的国家公路延伸，每行驶6英里左右就有马厩，在此换马以加快速度。更长的间歇达到15英里，则建有寓所（*mansiones*），旅行者可以在那儿住宿，与这相关的是经常需要加

① 参见迈克维茨：《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货币和经济》，第176页及以后。【15】

② 对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突然引入的这套系统，参见范·伯切姆（Van Berchem），"l' Annone militaire"，第117页及以后；而他的观点被A. H. M. 琼斯所质疑，参见《从亚历山大到贾斯蒂尼安的希腊城市》（牛津，1940年），第329~330页，第94~95注和《罗马经济》，第197~198页，第27注。他追溯了一个征用逐步增长的过程。至于这个系统的发展是由于238年以来货币贬值的观点，参见克劳福特：《罗马帝国的兴衰》，第2卷，第2页，第571页及以后。【16】

固防盗用来盛放税收物品（*annona*）的仓库。4 世纪，这一整套组织由声名显赫的男长官（*vir illustris magister officiorum*）控制，他有权强迫与都市议会有关的家族成员监督驿站的寓所，包括负责尽快邮寄物品、保持供应、保护附近的乡村人口使之不受任意的征用行为所累；如果安提俄克的利巴尼奥斯的证据典型的话，附近城镇的手工工业者及店主被迫提供设施及代替破损的设施，还要亲自到这里充当厨师、清洁工、服务员。绝大部分服务都是通过这种不受欢迎的方式取得的。马厩由被迫充服徭役的工人建造；牲口是公共财产，而且每年要更新其中的 1/4，这都要通过征用的方式取得。另外，熟练的邮政工人、马倌、赶骡人、老兽医及木工（修四轮马车）都是世袭公共奴隶，他们可得到衣物及一份配给，但无薪金。

显然，这个系统会造成极大的困难和不公。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当军队很快从一个前线转到另一个前线时，运输补给系统很容易瘫痪。大量的肉、油、衣物、木料的目的地也许必须在短时间内改变；或者所需的物品本身也可能改变。和平时期需要建筑用的石材，此时急需的是砖头或建造抛石机（artillery）用的木材。当这些混乱给行会造成不可忍受的负担时，其成员经常为避难弃责而逃。为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就形成了一个通过法律手段将他们束缚于自己的职业的习惯。从这以后，行会成员必须从事不变的行业，【110】为政府履行职责，并可得到名义上的抚慰。

3 世纪罗马帝国从一套自由放任的体制演化成了一套由政府控制的体制，私人企业只能在国家严格规定的权限范围内活动。这一演变把人口中数量相当庞大的一个群体排除在货币经济之外——他们庞大的需求无法通过使用货币得到满足。然而，尽管货币的重要性被削弱了，这种趋势的影响不应被夸大。

首先，货币并非没能在财政范围内履行职能。实物税（*annona*）的供应，无论是以混合税制（*iugatio-capitotio*）的形式，还是以西部省份其他变形了的形式征收，都仅对那些以土地为生的人适用，对其他人口来说，他们以金和银纳税。如参议员除了用地产上的产品纳税外，还需缴纳超级税（一直持续到 450 年），也被称作 *follis* 或 *collatio glebalis*，而且在皇帝登基和 5 年大庆时都要献上一定数量的黄金 *aurum oblaticum*。类似地，各个城市的长官和议员有义务贡献这种 *aurum oblutilum*——最初在理论上是作为庆祝某些特殊活动而自愿赠送的礼物，之后，在 364 年的一个法令中被规定为强制捐赠。最后，君士坦丁还推行了一种特殊的税——Collatio lustralis——它严格适用于商业阶层，但后来扩展到包括高利贷者，旅馆主人，妓院老板，实

际上涉及到每一个有收入的人（但农村手艺人、医生、教师、油漆工、下等牧师是明确要免除的）。这种税每5年征一次，以某桩生意涉及的资本数额为基础来征缴，那些资本特别少的人都计征一个最低数目的定额税。372年以后，该税只能用黄金来支付。这个所得税，就如它通常所称的一样，498年在东部已经废除，但在西部，如卡西奥多努斯所说明的，一直持续到6世纪——存在的时间比帝国的寿命还长。它大多用来支付国王在重要场合的排场和作为部队所要求和得到的捐赠。缴税人感到非常艰难，佐西马斯和利巴尼奥斯说，有许多父亲为了凑足税额甚至（无视法律）让自己的孩子做娼妓或沦为奴隶。

所有这些税收——除了实物税之外都以金和银来支付——在君士坦丁建立的金币系统中都有反映。而且4世纪，开始采取一个埃及早在213年就采用的惯例，即实物税逐步演变为以金而不是用实物本身缴纳的税，金代替实物（*adaeratio*），也出现在政府雇员的薪水中。325年，君士坦丁特别禁止用金替代实物来支付实物税。但在364年及365年，允许某些政府雇员包括多瑙河沿岸的士兵，可以9个月领取实物薪金，3个月领取金。389年在伊利里亚用黄金代替实物已成为一个普遍的习惯；这个决定导致了各种官方命令规定的不同的计算比率。5世纪，这个习惯更加普遍。423年，霍诺里厄斯和西奥多西厄斯使它成为支付官员薪金的一个强制性措施，这意味着建议军队也采用这种办法。其应用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同年的一条有关军队支付的法令，规定5/6的黄金给第一线部队，其余的1/6给帝国工场的织工——他们要为年幼者和部队提供军服。用这种方法，货币被更年轻的、责任更轻的部队滥用的情况就被阻止了。最后到了439年，军队及官员全都被迫接受用黄金代替实物来支付薪水。 [111]

与黄金代替实物有关的有争议的中心议题是兑换比率。把实物税折算成黄金可以通过一个固定的比率也可以通过物品当期的市场价格来确定，而市场价格既可以是赋税征集当地的，也可以是罗马本地的。324年，土地贵族原来必须用生猪缴纳的赋税（交给来自罗马的那些负责供应猪肉的商人（*suarii*）），现在可以按当地价格折算成同等数目的黄金交付。但是4世纪后半期，放猪人成功地呼吁反对这种规定，这有可能使他们蒙受损失，因为罗马附近的猪肉价格要比地方集市价高；因此公元367年，罗马的价格取代了地方价格成为以黄金替代实物的基础，喜欢用实物付税的人照准，但需加征1/20的数目以弥补到罗马的运费。实物税的接受者、军队、政府官员和公共部门雇员是一方，交纳实物税的土地贵族是另一方，他们之间也存在利益

冲突。对前者来说，如果他们的薪水用实物支付，损失的可能性会更小；但如果用钱付薪金的话，他们关心的是保证在物价上涨时其购买力不会下降。因此他们更愿意在居住或驻扎的地方以当地的市场比价用黄金代替实物来交易。另一方面，土地贵族从自愿采取的按固定的比价的以黄金代替实物中得利。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自主决定在什么情况下用何种更为合算的方式完成纳税义务。政府的危险是两头落空，而承担损失。最终，政府设计了[112]一套灵活的税制系统，罗马财政检察官在每个季节会制定一个固定比率，以黄金代替实物（*adaeratio*）就成了强迫性的。这套系统在5世纪前几十年充分发展，实际上导致了土产品税的结束，尽管土产品税仍是以金缴纳这种税收计算的基础。

这样，限制了货币经济范围的以实物纳税的形式，经过两个世纪的时间被从有着庞大数量的日常用品市场（尽管其范围也有所缩减）中清除。不过，也有证据表明，许多大土地贵族的实力在通过殖民制度（institution of the colonate）得到增强之后，开始部分地把自己庄园与外部市场独立开来，并接受一部分实物作为地租——如谷物、酒和其他农产品——有的甚至在庄园正常的农业活动外进行一些工业生产活动。《西奥多西亚法典》对商人作了重要区分，一种商人购买是为了卖出，他们有商店，光顾各类集市，一般是靠贸易所得谋生；另一种是出卖自己地产上的产品。前者当然得付所得税，而后者仅按地产面积和雇工数量来缴税（人头和土地面积税）。如此一来，那些在自己地产上开采铁或银铜矿，建立车间和冶炼场，生产工具、装饰物的人，即使产量超出了其家庭日用所需，仍可以免除进一步的税收，而这些税是城镇的竞争者必须支付的。

工业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与农村的房舍及庄园相联系，这得到了考古发掘的验证。如在肯特的达伦斯（Darenth）的豪宅展示的遗物中有一套乡村的漂洗和染色设备，那里有许多大水槽和一系列的热炕，规模大到处理几个织布作坊的布织品——这些作坊也许就在邻近的土地贵族家里。对于同一趋势，高卢提供了一些乍一看给人印象更加深刻的例子。最引人注目的是比利时那幕尔行省的安塞伊发掘的豪宅。它的围墙的周长为650米，可追溯到1世纪中期或后半期。城墙外，在豪宅的东部有约20座建筑，至少有一半是工业用途，有铸造生铁的火炉，铸造场，用来造铜和上釉的作坊，还有用来酿酒的、制陶的、制马鞍和加工皮革的。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小物件，纽扣、铃铛、发夹，都很平整并上了釉，还有戒指、手镯、钥匙和箱[113]包。如果认为这些工业仅仅是为了满足庄园自身需要的话，其规模可谓远远

超出一般人的想像。比这更大更壮观的——如果不要把工业的范围界定得过于严格的话——是在图卢兹稍南的马特雷斯·托罗萨勒斯平原奇拉甘发现的一个庄园。这个庄园的设施在奥古斯都时期及4世纪间不断得到重建，在安东尼时期达到鼎盛。庄园周围有与其紧紧相邻的约80个规模稍小的建筑，至少其中的一部分表明有用于家庭手工制造的迹象，那里发现了纺织机的压垂物和其他一些时常会用到的工具。不过，从奇拉甘庄园留存下来的物品看，并不能假定这里和安塞伊一样存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工业活动。但无论如何，高卢富有的阿康尼家族（Aconii family）——应该是这个庄园的主人——不大可能仅为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庄园的普通活动雇用400多侍从。而且，无论是在奇拉甘还是在安伊塞，经济实力看来都是在社会普遍地向庄园经济转化发生之前的100~200年间就已达到顶峰的，这可能说明，大庄园——在共和时代后期就有提及——可能从1、2世纪以来一直都是罗马帝国经济的重要特征。最近的调查表明，希腊和意大利在当时的情况都确是如此：在希腊，许多古代的城镇都被并入了罗马皇家或私人的庄园之中；南意大利在帝国早期一度出现的经济繁荣，也有时（虽然绝不总是）与庄园的发展和乡村经济的繁荣相关。

文献资料部分地揭示了庄园的工业化问题。帕拉丢斯（Palladius）在他经常被引用的篇章中（第1章，第6节，第2页）建议，土地贵族的庄园里应该有铁匠、木匠、木桶工，以防止过勤地派人进城耽误农活。这并不意味着土地贵族试图与城镇脱离联系，只是说庄园里应该有人能够处理相对简单的活计，这样就可以避免要频繁派人到城镇里寻求帮助。庄园里的这类手艺人是被固定雇用的，因为要不断处理随时出现的紧急情况，他们难得空闲。因此，帕拉丢斯提到的状况不应被过分看重，尤其是他自己也给出了许多庄园依赖城镇市场的暗示。总体来说，发展出专门的工业分工活动的庄园只应被视为例外。一般来说，帝国晚期庄园里的奴隶不会被训练成专门的工人。【114】应该可以想像庄园里能够找到木匠、安装工、编绳工、织工；帕拉丢斯就看到过铁匠。但似乎明显的是，任何更加复杂的事，土地贵族必须求助于城市或招揽流动的白铁匠和其他工匠来帮忙。即使庄园出产原材料的话，一般也是在城镇加工；那里发现有奴隶的短袖衫、斗篷和毡制毛制品，尽管庄园也纺纱和织布。城镇还有陶器、金属容器、更粗致的篮子和绳子以及四轮马车。

国家工场过度地侵犯了私人经济的活动领域，这在西奥多西厄斯和查士丁尼的《法典》中都有提及，尤其可以从贵族记录簿（*Notitia Dignitatum*）中列举的帝国官僚机构（尤其是在西部行省）的一些高官和部门得到了解。

贵族记录簿的这种形式可以追溯到5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尽管我们所用版本的底本极有可能是在395年编辑的。早期罗马帝国部队的需要是由部队工场来满足的，如砖瓦的生产。在莱茵河边境沿线这种例子非常多，在克桑滕和纽斯及美因茨附近的维森诺都有军用陶场，那时都在晚期帝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控制之下。帝国工场是被控制的私人企业的补充，国家还在许多地方建有军火库、纺织场、染坊。这种新发展的时间还无法准确决定，《奥古斯都历史》将其追溯到西弗鲁斯·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但不可靠；尽管它们可能在3世纪晚期发展起来，然而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说明它们在戴克里先之前就已经存在。

负责帝国西部工场的高官是定居罗马并给教堂大量施舍的著名人士（*vir illustris comes sacrarum largitionum*），在他之下是私人工场的检察官，这些官员的活动被紧密地控制着。法典经常所作的制裁表明，这些人一贯是既想欺骗国家，又想敲诈地方居民。他们的任期有限，事先要交保证金，并在任期结束后上交账目。有文献提到，帝国的西部有四种工场：纺织场、亚麻布场、印染场以及主要用金或银线绣花的刺绣（embroidery）场（尽管在东部是374年稍后点，这些工场由相关的长官控制，在西方，它们也许生产装饰着金或银的官员穿的青铜盔甲）。这些刺绣场由副臬司管理，它们也许从属于相邻纺织场的检察官管理。另外，还有两个女工坊，它们各自由皇帝专门派出的另一个私人管家单独控制，因此在某种特殊意义上可看成皇帝的私人财产。最后还有由那些有名的高官控制的各式各样的军工场。

[115]

纺织工场设在西米厄姆（米特罗维卡）和巴格达（Baghdad）之间的巴塞亚那、在西米厄姆当地、在爱奥维亚、在伊利里亚；在阿奎莱亚和米兰；在罗马；在卡努西厄姆和弗努西亚，这两个地方都因精细未染色的斗篷久负盛名，也把质量较差的材料染上便宜的紫色染料作成短袍；在迦太基（公元380年起的西奥多西亚法典中提到过这里有“我们工场的奴隶”）；在阿尔勒、里昂、里姆斯、图尔奈、特里尔和奥顿；以及位于不列颠（*Britannis*）的温塔（Venta），（可能是温彻斯特），靠近索尔斯伯利平原和汉普郡唐斯①地带的绵羊饲养场。② 有两个私人工场一个在特里尔，另一个所在的城镇，可能是维维耶。仅提到两个亚麻场，一个在维埃纳；另外一个在拉韦纳。在塔伦图姆，西撒岛（伊斯特里亚，Istria附近）上萨伦纳、在塞拉卡

① 唐斯（Downs），英格兰南部有草的丘陵地。——译者注
② 其他的可能性是卡文特和诺里奇附近的凯斯托。【17】

塞、杰尔拜山（Girba）（北非的塞尔特斯），在巴利阿里群岛、在法兰西南部的土伦和纳博讷，有染色作坊。在北非有几个染坊，它们由同一个地方财政官控制，也许位于迦太基。在阿尔勒、里姆斯、特里尔有刺绣场（*barbaricaria*），它的管理可能与这些城镇的女工坊（*gynaecia*）有关。

这些工场的选址似乎由两个因素决定：接近原材料，以及供应部队的方便程度。由于运输困难，工场必须建在边界附近但又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巴塞亚那、西米厄姆、特里尔、图尔奈都符合这些条件。而且，文献中有工场迁址的记载，如从萨伦纳迁到巴塞亚那或从奥顿到梅茨，搬迁的目的似乎是为了离部队近些。尽管法兰西和西班牙的西南部具有许多便利条件，但在这些行省没有毛织品工场，这也许就是由于它们离边防军很远的缘故。类似地，帝国在西部的军工场都建在伊利里亚、北意大利和高卢。在伊利里亚的西米厄姆、阿奎昆（阿尔特—奥芬）、劳里亚昆（洛尔希）和卡农图姆 【116】（Carnuntum）生产盾牌；西米厄姆和萨伦纳生产各式武器；意大利的维诺纳、克里莫纳（Cremona）生产盾牌、康科迪亚（Concordia）生产箭，蒂西努姆（帕维亚）生产弓、卢卡生产宽剑；高卢的阿金顿（阿盖托马古姆——除非它被读做斯特拉斯堡）生产各种类型的武器，马孔生产箭，里姆斯和埃米恩斯生产宽剑，特里尔和埃米恩斯生产盾牌，特里尔还生产抛石机（artillery），以及苏瓦松生产一些记载不明的武器。

因此，鉴于早期罗马帝国的军队作坊的先例和后期帝国的状况，可以确切地认为它们是为了满足军队和官僚需要的——但这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为集市生产的。我们可以看到，戴克里先的法令非常详尽地列举了各种服装，在一个地方它标明了士兵的短披风和束腰外衣的价格，这种外衣被称为“制服”（*indicfionalia*），它可能是“帝国的法规中所规定的类型”的意思。有人认为这些衣服是帝国工场的产品，而且那些工厂的检查官在价格制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可能的；另一方面，此处标明的价格也许仅仅是一个独立工匠以这些实物纳税时的价格。不能以此来类比染场把它们出售给公众时的价格，因为紫色染料不像纺织品，它是帝国的一项垄断产业。

这些工场是否是现代意义上的工场，也就是说工人集中在同一屋檐下工作，以及是否妇女工场、纺织加工场等词指的仅是在官方指定的条件下雇用他们在自己家里工作的一群手工工业者的集合，① 这些都不能明确。有证据

① A. W. 帕森（Perrson）：《罗马帝国的政府和手工业》（伦德，1923 年），第 91 页。【18】

表明，4世纪库齐库的织工和铸币工人是在分散的村舍系统中工作的。然而不能因这一个例子就把问题一般化；不过下述事实对认为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工场这种传统观点更为有利，即，其中的工作艰苦而又枯燥，越来越多地是由强制劳动来完成，需要严格监督。尤其是在染场，原材料包括人尿及可能已经死了6个月的一种水生有壳动物；在那里劳动的大部分是奴隶和罪犯。法律频繁地规定将基督教徒（Christians）和其他犯罪分子发配到羊毛作坊和染场劳动，以此作为对他们的惩罚。公元336年，一个里辛尼亚努斯家族的儿子在逃跑后被逮捕，戴上镣铐就被送到了迦太基的纺织场。并且，365年在米兰颁布有一条法令：任何自由出身的妇女只要与纺织奴隶结婚就必须成为织工，除非她在结婚前公布了有关其地位的详细情况。这让人想起其他类似的规定：面包师女儿的丈夫必须成为面包师。实际上可以推测行会成员和帝国工场的雇员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并且要世袭。380年，法令禁止帝国铸币场工人的子女与本阶级外的人通婚。为防止铸工逃跑，都在胳膊上打了烙印。法典对窝藏织工逃犯者给予严厉惩罚。

[117]

帝国作坊里的雇工，像织工、铸币场工人、染工、武器场里的工人，可以像战士一样领取实物薪金；他们的胳膊上也像战士那样烙了印记以便确认。军工场工人的地位比其他工场的都高，他们的工作被描述为是在执行军务；行装搬运工负责运输军队的供应，也被作为军事化的武装部队对待。这些帝国工人的地位无法明确。尽管这种地位是奴隶性质的，优西比乌斯（Eusebius）把纺织工人恰如其分地描述成“国库的奴隶”；但实际上他们更像固定在其职业上的自由人，与那样一个作为奴隶的社会集团相比，他们的地位常常让人羡慕。不过，进一步说，他们形成的却是一个被排除在货币经济之外的庞大群体。

但是货币经济从未完全消失，尽管税收系统和帝国雇员的薪金以实物支付。价格法令就是4世纪初这种经济存在的一个证据；另外，整个帝国后期的情形还可以通过教堂神父们留下的书写材料进一步确认，从他们写作的背景可以推测，当时的交易确是通过使用货币进行的。4世纪和5世纪的著作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在这两个世纪，有钱节余的富人往往把钱借给别人以收取利息，也许通过银行借给需要钱的人，有时也借给穷人，当然也借给商人。人们经常说起土地贵族在实物匮乏时获利，而担心年成太好——这是市场影响价格的一个明显证据。借贷者的主顾包括城里的穷人，也包括那些因没有土地饮食甚至面包都要从外面购买的富人。另外还有为自己劳动或拿工钱为别人劳动的手艺人：一些在家劳动，另外一些在外巡游找活干。

[118]

城市里有一个非常活跃的食品及日常用品零售市场，所有这些都要用钱支付。其他证据也印证了相同的情形。如瓦勒里安家族的一个富有成员梅勒妮，她的府第在罗马的西莲山上，其财产遍布罗马西半部，价值120 000索利杜斯；在404～417年间，她成功地卖掉了这些财产，主要是为了获取黄金，后来又把从穷人那里敛来的钱发还给他们。这些举措在一个经济活动倒退到物物交易的经济中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实际上，在第4和第5两个世纪，尽管政府控制了所有大规模的工商活动，大多数省依旧拥有繁荣的小工业，它们掌握在私人手工业者手中，当然以行会的形式来组织。而且，政府也只是对一部分商品实行了国家垄断。从戴克里先开始，没有了行省铸币（除了埃及），铸币生产完全收归政府铸币厂。另外，惟一真正被政府垄断的是精细产品紫染（369年法令规定由国家保留）及紫色镶金边衣服（*paragaudas*）的制造。起初这些垄断商品都不属于国库，但慢慢形成的一些政策最终使得这类穿着只限制于皇宫之内。除此之外，在最不可能的领域也允许私人竞争，我们甚至听说，在4世纪末期，里巴比厄斯的一个叫做撒拉修斯的朋友可能在安俄提克拥有一家武器工场。小工匠，所得税的缴纳者，在帝国各地广泛存在。价格法规定工资按时计，或按件计。计件工资有的包括食宿费用，有的没有，它最可能代表一个独立工匠从一个短期顾主那里所能拿到的最高数目，而不是大规模工厂里的工人能够拿到的工资；从记载的稀有金属价格可以判断早期罗马帝国的工匠如金匠、珠宝商自己买材料，并且某种程度上是为市场生产。但是，当这种独立活动与政府强制性的义务相联系时，而且所有的工匠都被迫加入行会并以金缴纳税收时，他们艰难的处境就很明显了。从技术角度讲，他们是自由人，但他们的地位之低下由以下事实可以看出，那时他们的名字通常只由一个字构成，而罗马人常引以为荣的名字都是由3个字组成的。【119】

当工匠为自己工作及在集市出售他们的商品时，他们使用货币。但这种货币是通货膨胀时贬值的银和青铜，所能获得的数量也因省而异。我们知道，政府铸币是为了军队及军事需要而不是为了贸易，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西班牙在帝国晚期时无铸币厂，必须依靠高卢南部的货币流通；也解释了除296～307年短期内在迦太基有铸币厂外，非洲为何不得不从意大利获取货币。不过仅从这个角度，却不大容易解释为什么在不列颠这个边境行省几乎没有铸币（296～324年在伦敦有一个铸币厂）。也许是偏远的地理位置使得人们对这个无利可图的省缺乏兴趣。然而，即使在那些有充裕铸币供应的地

方，如君士坦丁堡，也不是没有问题——在那里流通的苏勒德斯（*solidus*）[1]单位币值很大，无法用来支付小规模的交易，因而不得不依靠青铜铸币。政府在整个4世纪不断努力增加黄金的供应。如在365年瓦伦丁尼安和瓦伦斯颁布法令，任何勘探金矿的人都可离开原来的行业，不过必须每年向国库交8盼金，后来改为7盼。这个条件可能并不怎么有吸引力，因为376年时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以防止矿工逃避艰辛的劳作跑到哥特人那里去避难。两年后，又制定了一条法令，对高卢和意大利试图逃到撒丁岛的矿工施以严惩。而且，有材料反复谈到探金者隐匿原有身份去务农而后被逮捕送回原处。

4世纪经历了西曼查斯所描述的严重经济危机；不过到西奥多修斯时期，政府显然有足够多的黄金和白银，可以任意用来（但主要是黄金）铸造许多小币，作为小规模交易的安全通货。黄金的来源不是太清楚，但无疑有一部分来自探金者，也有一部分来自异教徒的庙宇或对东方的战争，但这些大量的黄金毫无疑问表明了帝国将黄金和白银吸引到国库的一贯政策。到5世纪，除了供给罗马和君士坦丁的谷物继续采取征用的方法外，东部的货币经济已经完全恢复［也因为黄金代替土产品（*adaeratio*）在税收中逐渐替代了土产品税］。在西部，战争和政治压力更加尖锐。而且4世纪后政府没[120]能提供更多的银币，这导致在特雷米西斯（*tremissis*）（一种金铸币，相当于1/3苏勒德斯）和小额贬值铜币之间缺乏任何方便的货币单位，因而阻止了真正的货币经济的恢复。不列颠4世纪的窖藏银币表明，它相对于黄金而言占绝对的优势，这也说明了该行省黄金的短缺。从大约400年开始，小额货币就从不列颠和多瑙河地区消失了。实际上，407年后，不列颠再没有接受过新币，原有的货币往往被贮存起来而不是花掉。到430年，货币作为一种交易手段在不列颠已成为过去。在其他西部行省，货币经济的恢复也由于其他稀有金属的相对不足而受到阻碍。整体而言，经济被极大地削弱了，而且大土地贵族权力的增长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至少在罗马西半部，自然经济是个事实。从戴克里先起，实际上两种经济共存。普通人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大部分可以通过公共分配得到满足，再加以自由集市用贬值铜币进行的小买卖补充不足（5世纪缺乏新发行的货币，铜币又有所增值）。与此同时，一套安全的金币在小部分银币辅助下在富人中流通，并一直延用到4世纪末（哥特人和汪达尔人5世纪晚期恢复其铸造和流通）这使得像奥索纽斯这样的土地贵族在装修房子时，能从世界各地买到所需的奢侈品。

---

① 复数 *Solidi*。——译者注

这样，由价格法带来的第3个问题就出现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帝国西部行省之间的贸易往来保持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主要是因为很难决定手头这些零零散散的证据到底有多大分量。在那些信息缺乏的地方，任何证据的幸存与消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因而很容易夸大我们所拥有的证据的重要性。但在卡里亚的阿菲罗蒂西斯发现的拉丁版戴克里先法典中的一部分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些新的线索，并给4世纪初广泛盛行的地中海地区日常用品贸易提供了新的决定性的证据。

这些来自卡里亚的文件第一次给我们提供了海上航运的费率情况。到此时为止，根据法令能够得知的惟一费率是四轮马车、骡子或骆驼跑不同的路段的费用标准；可折算出，每100磅重的货物、每英里的运输费用为 $1\frac{1}{3}\sim1\frac{3}{4}$ 德纳利斯（不包括车夫的工资）——这个费率抑制了远距离陆地运输的发展。如用四轮马车运1 200磅的小麦每英里的花销为20德纳利斯。每 *castrensis modius* 小麦的成本为100德纳利斯，因此，假定每意大利（在普利尼数据的基础上）莫迪乌斯（modius）为22磅，那么用四轮马车运输价值5 450德纳利斯或者2 725德纳利斯的货物——这取决于重量单位卡斯特任西斯莫迪乌斯与意大利莫迪乌斯是一样的，还是后者标准的两倍——[①]这样，仅是经过270（或135）英里的路程，这批货物的成本就会增加一倍。所运商品的价值越低，陆地运输的不利就越明显。海上航运的新费率则提供了一副不同的景象。政府规定了在5个出口地区的约75条航线的运送每卡斯特任西斯莫迪乌斯的商品的最高限价，这5个地区大部分在帝国的东半部——亚历山大、奥里恩斯（也许还包括诸如奥龙特斯地区佩里亚的塞勒塞亚港）、亚洲、非洲、尼科美底亚（在比塞尼亚）——及地中海的各地，总共有30种物品列明了固定的终点和费率，而且没有理由认为其他的航运路线不是如此。【121】

这些零零散散的文件证明了一个崭新而重要的结论。价格法可能在许多方面反映的是帝国东部而不是西部的状况，因为它在提到东部港口时都直接提具体的港口名称，但西部只提其所在的行省。这个费率本身与陆地费率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最高价格为100德纳利斯的1卡斯特任西斯莫迪乌斯小麦，从奥里恩斯到卢斯塔尼亚的运费仅为26德纳利斯。运一船货物走完

① 这个相互矛盾的论题，参见S. 劳弗（Lauffer）：《戴克里先的价格法令》（柏林，1971年），第213页；R. 麦克马伦（MacMullen）：《戴克里先的法令和 *castrensis modius*》第41卷（1961年），第3～5页，他指出 *castrensis modius* 的更大数字会产生法令中更可接受的货物的最高价格。【19】

地中海全程，运费仅是其最高价值的26%，这样的话，远程贸易就是可以接受的，即便是在为承担的风险提供充分津贴后也是如此；[①] 另外，由法令可以推测日常用品的贸易绝不仅限于当地。几条河流上零碎的费率数据有助于丰富这幅相当规模的地区之间的航运图景，从不列颠、高卢和非洲来的产品在3世纪晚期就被运到地中海沿岸各地。《帝国风貌概览》（*Expositio fo-* [122] *tias mundi*）为我们呈现了同样的景象，它的拉丁文译本是由一个来自亚历山大或安提俄克（Antioch）[②] 的希腊人在公元350年左右编就的（该书描述了当时罗马帝国的状况）。但概览提到的有关东部行省的信息比西部的更丰富；尽管书中可能有特里尔帝国宫廷的资料，但许多对高卢和西班牙的描写似乎反映的是更早期的情况。对过去几世纪帝国西半部贸易的评估必须建立在不同行省存留证据的基础上；它谈到了帝国从早期的繁荣状况走向了明显的经济倒退的境地，尽管公路、港口、地中海水路仍然存在，而在地中海地区只有在随着汪达尔人对非洲的侵犯后海盗才真正成为一件麻烦事。

尽管野蛮人和巴高达人（*Bagaudae*）（参见第93页[③]）给高卢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它仍继续生产纺织品。除帝国工场外，戴克里先法令还提到高卢的服装；以及特雷维里和阿姆比尼、比图里吉人的斗篷。我们还听说过5世纪阿特雷巴特斯的羊毛，阿奎塔尼亚的亚麻斗篷。而且，至少有一个行业——玻璃，取得了超过早期皇帝统治时期的成就。高卢的玻璃制造模仿意大利，是在普利尼时期被引进的（参见第82页）；不过，只是到了2世纪中期，制造技术才取得突破性进展，当时在布旁、普瓦图、文德伊、卢瓦河—英菲里尤尔、阿戈讷（Argonne）、艾弗尔高原（Eifel）都有玻璃工场，尤其重要的是科隆的工场。这一世纪取得的技术进步导致了一种精细的透明玻璃的生产，这种玻璃上面经常装饰有几何图案，甚至有神秘的风景，及角斗士的格斗之类的图案。君士坦丁时期颁布的各种法令保护并给玻璃工人和金银丝细工以特权，条件是要他们把技艺传授给自己的孩子。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弥补3世纪技工所受的创伤，等于是给玻璃行业一个补贴。整个4世纪这个行业一直都很繁荣，特别是在加利亚的贝尔吉卡（Belgica），特里尔附近的军队和宫廷极大地促进了此处的生产。这期间的产量很大，但产品的特点难以评说。它们的形状以金银容器为基础，仍然非常好；并发展出了更

① R. 顿坎-琼斯在《罗马帝国的经济》（剑桥，1974年），第367～368页中指出，列出的一些有关海上贸易的数字与小麦的成本不相符合，也非常不经济；但是这并不改变总体情形。【20】

② 也译作安条克，古弗里吉亚地区的城市。——译者注

③ 英文版页码，即本书的边码，全书同。——译者注

精致的工艺，如在两块玻璃之间镀金和油漆。另一方面，玻璃的总体质量下降，并且以后的样品呈微黄或微绿色。

早期的玻璃业似乎还使用外国人。比如一段铭文谈到有一个迦太基公民——一个非洲人——他的名字朱利叶斯·亚历山大，在高卢做玻璃工。其后，在 275～380 年的大约 100 年间，规模更大的弗朗蒂努斯（Frontinus）工场似乎使用奴隶劳力，生产单一的桶式玻璃瓶。弗朗蒂努斯的总部也许在科隆，但从公司样品的分布情况看，它也许在布隆和博韦附近设有分公司。但不管这项工业的成绩给人的印象多么深刻，不管它的产品类型有多么的专业，它不曾达到早期陶场的规模。玻璃器皿是贵族用的，而不是农民或小工匠及商人用的，尽管有一部分出口到了亚洲及斯堪的纳维亚，它仍是一种奢侈品。阿戈讷的烧陶业并没有复兴，虽然出现了一种陶工用陶轮而不是用模具制作的崭新装饰——这往往是广泛的商业复兴出现的证据。铭文资料的缺乏使得任何结论的一般化都非常危险。不过，相关文字资料的这种糟糕的状况却正是普遍倒退的征兆。早些年充满活力的高卢航运业似乎已经消失了。4 世纪文字提到过非洲、西班牙、埃及的承运人，但没有来自高卢的；新发现的价格法的一些片段有对东部港口贸易路线运费的规定，不过它只是证明了阿尔勒（Arles）和纳博讷大商业中心经常有东方的商人光顾。类似地，也没新的材料表明有负责高卢河航运的行会。这些以前由行会从事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转到行李搬运工（参见第 118 页）和法兰西及瑞士河流湖泊中军事化的小船队手中，我们仍然只能靠猜想。 [123]

再往东是罗马日耳曼，这里也有类似的明显倾向。特里尔的法庭及边境军队促进了玻璃在高卢、日耳曼和科隆这些地区的销售。由于类似的原因，罗马帝国后期曾发展很慢的多瑙河地区，经济也繁荣起来。价格法提到了雷蒂亚和诺里库姆的布及"多瑙河地区的斗篷"；在有纺织工业存在的伊利里亚，可能也已建立了国家工场。但是边境贸易越来越受到政策的限制。戴克里先法典中谈到毛皮——特别是狸和貂皮——表明了和北部贸易往来的开端。但从 4 世纪早期开始，禁止出口铁和铜给野蛮人；374 年的一条法令不仅禁止出口黄金，还有点天真地要求"无论在何处发现野蛮人手里有黄金，可用诡计将其骗来"。大约与此同时允许与野蛮人进行贸易的地点受到严格限制；如对哥特人，仅允许开放多瑙河的两个贸易点。不久以后，我们发现武器、酒、谷物、油及鱼子酱都不允许通过边境。这些限制无疑阻碍了与北方进行的本身就为数有限的贸易；413 年帝国宫廷从特里尔搬到阿尔勒，这是对当地贸易发展的又一重击。有证据表明，那时的一些富人丢下一片片荒 [124]

茺的土地逃到南部，那里很快就退化到自由日耳曼时期的经济水平。

相反，在4世纪，不列颠则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小阳春。这部分是因为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不断得到发展，也因为这个岛屿躲过了先前100年发生的最大劫难。现代证据表明，早期学者夸大了4世纪的城市衰退。不过有一点依然是真实的，就是庄园的繁荣与西部欧洲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在高卢，3世纪早期本地装饰技术特别是珐琅艺术及本地风格的出现预示了4世纪及后期野蛮人的风格。3、4世纪不列颠的技术与凯尔特风格有区别，相反，我们有许多标准物品，如胸针，有一些也许是从大陆进口的，但其他的肯定是本地的仿造品。凯尔特艺术并未被埋没，而是维持下来，创造了一种罗马—凯尔特的综合物，其中有一些绝好的技法，特别是在雕塑和制陶方面。

由于阿尔比努斯（Albinus）和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期间的内战对高卢制陶业的破坏，公元200年后不久，不列颠就基本停止了从大陆进口彩陶。它们被——尽管规模要小得多——莱茵河地区的玻璃和陶器取代。但从大约150年开始，本地陶场开始生产出精细的陶器。在整个英国都发现有来自宁河流域的上好的卡斯托陶器（Castor ware），这些陶器直到3世纪都在生产。但本地也生产许多其他种类的陶器，如萨摩斯岛上居民生产的不成功的仿制品。有些还与军队签订合同以确保销路。这样的一个中心在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但最广泛使用的是用粗糙纹理镶嵌的黑色容器，它以发黑光而出名，可能是产于斯塔福德郡，不过生产工场的具体地点从未得以确定。像多瑙河的行省一样，不列颠也发展了纺织业。可以肯定温塔的帝国工场是给不列颠军队提供军服的；但戴克里先法令中有关不列颠斗篷的资料表明有一定的斗篷出口贸易。也有证据表明，4世纪英国有谷物出口，但无法确定它到底是一种普通的商品贸易还是一种缴纳国税的形式。类似地，帮助重建奥顿的不列颠工人也许是自愿去高卢的，但更可能是强迫劳役。总体说来，不列颠经济的趋势与其他地方一样，4世纪是朝着地方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这个省的经济更为平衡，由此也能够更多地保留自己创造的财富。基本商品如谷物、纺织品及贵重物品如珍珠、大理石出口数量略有增加。考古发掘表明，这时的庄园里几乎没有外国产品；前面已提到（参见120～121页），这里没有铸币场而银币的窖藏又特别丰富。也许很大程度上是地理原因，它是一个自己静静繁荣的时代，直到帝国当局的忽视和军团的撤离为这个省的惨遭蹂躏、庄园毁坏以及萨克森人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125]

西班牙则继续享有另样的繁荣。许多遗留下来的晚期的路程碑表明，维持道路系统做了大量工作，这些活动，特别是西北部，也许与加利西亚金矿

的重要性有关。但是这些公路也服务于内部贸易，毫无疑问如同英国一样，主要是服务于小贩们的需要。但是埃尔切（Elche）教堂的犹太人（Jews）集会和埃尔维拉议会（Elvira，Council of）教规，规范了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贸易和社会联系，这意味着到3世纪末，西班牙的犹太商人已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群体。毫无疑问，出口仍然存在。即便到4世纪，高卢的奥索纽斯仍接受巴塞罗那（Barcelona）的礼物如橄榄油和鱼子酱（*muria*），由此亲自见证了"联合鱼子酱（*garum sociorum*）"这一老品牌的再次出现。《帝国风貌概览》除了认为博学多识的西班牙人给当地带来了荣誉之外，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它的橄榄油、鱼子酱、猪油、衣服、茅草——足以满足全世界之需。它的驮畜——假如这个文献可信的话——也很有名；但未提到赛马，尽管朱利安曾送过一匹给君士坦丁作礼物，并且西曼查斯和维格蒂厄斯都歌颂过它们。戴克里先法令还列出了塞雷塔尼（Cerretani）的火腿和西班牙的毛线；尽管由于某些已知原因在西班牙没有帝国纺织厂，但巴利阿里群 [126] 岛有染场。西奥多西亚法典中有证据表明，君士坦丁堡建立前后，即324年和336年，西班牙的谷物作为赋税运往罗马。西班牙也以相当大的规模继续进口商品，包括彩陶及其他来自非洲的器皿，来自东方的奢侈品，来自罗马的石棺。有证据表明，在内战及外敌入侵的冲击下，这个省的景况急转直下。西班牙无铸币场，在矿区流通的铸币就更少了，不过那里发现有帝国晚期的货币，一些片面甚至铸有西奥多西厄斯（Theodosius，378～395年）和霍诺里厄斯（Honorius，395～423年）的名字[1]。我们不了解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况，甚至当阿维努斯（Avienus）说西部著名的加迪斯港口变成废墟或者当奥索纽斯描述伊伯利亚、科尔多瓦和塔拉科仍很繁荣时，我们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们。

西西里——根据《概览》的记载——出产无尽的羊毛及驮畜。那里满是富有且博学多才之人，他们同时会讲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埃特纳（Etna）的斜坡上种植着优质葡萄；塞拉卡塞和加泰尼亚的马戏场也很著名。实际上这个省一直是初级产品的生产中心，4世纪后期还有谷物运往罗马，并饲养远近闻名的用于角斗士格斗、马戏团和邮政服务的马匹。西西里和以前一样进口陶器；在塞拉卡塞和卡马里纳（Camarina）发现了非洲4世纪生产的陶灯，这表明它与纳博讷高卢和东部行省有贸易往来。当地生产花砖，也从非洲进口。这个岛以其稳定的气候、美丽的风景和有名的古董而吸引了大量的

---

① 西罗马帝国最后两位皇帝，说明铸币的铸造时间已近帝国末期。——译者注

游客；但是他们吸引的主要是最富裕的阶级，议员，他们被禁止访问其他的行省，他们几乎不能构成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总之，西西里是一个以大庄园和牧场为主的地区，这些庄园牧场及在那上面殖民的主人（*coloni*）决定了城镇外居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

君士坦丁堡建立后，罗马的供应主要来自于非洲。直到100年以后被汪达尔人征服，这个行省——与毛里塔尼亚一起——主要是作为首都的仓库。它的人民，根据《概览》的说法，非常狡诈。他们的主要热情集中于观看角斗士格斗，他们中很少有好人，根本不配在这个富饶的国家生活。毛里塔尼亚的人更糟糕，他们的习惯及生活方式野蛮原始，是少数几个仍向外供应[127]奴隶的地方之一。我们通过《概览》也了解到，非洲的橄榄油“足以供应全世界”（这句话在这部著作中多次重复，其实不该如此强调），而且盛产水果及驮畜。该书没有提到非洲的羊毛制品，尽管据说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出口衣物；但是这里有由某个地方财政官控制的一个在迦太基纺织场和几个染厂，《奥古斯都的历史》和价格法都提到非洲生产的地毯、斗篷、亚麻束腰外衣，这些事实可以相互印证。

北非的重要采石场到3世纪显然已经荒废，因为在320年君士坦丁颁布了一条法令允许任何人在那里开采大理石——这条政策以后扩大到几个东部省。采石工的缺乏是帝国晚期提供生活必需品的自由劳动力日益不足的一个例子。在潘诺尼亚的弗鲁斯卡—戈拉（Fruschka-Gora）采石场，由罪犯构成的劳力主要是基督徒 *damnati ad metalla*，5个技术监工管理着大约620个奴隶，这些监工被称为“智者（philosophi）”，这名字有点不大合适。军队给他们道义上的支持。毫无疑问，在北非也试过同样的制度，类似的情况在西米苏斯这样城镇的采石场也有过。鼓励私人从事这种职业，这个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显示出人口数量的减少。的确，即便在汪达尔人统治下，迦太基仍是西部最大的城市之一。圣奥古斯丁（Augustine, St）和《概览》的作者都提到过一条著名的银匠街，即 *vicusargentarjorum*。但总体上说，这个省从来没从238年叛乱镇压后的掠夺中恢复过来，这次叛乱使戈尔狄安（Gordians）登上了帝国的皇位。这次有产阶级的起义被卡普连努斯这个努米底亚的总督所粉碎，他发起的运动很有可能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之后，也就是4世纪，一些多纳图斯派（Donatists）异教徒的更极端支持者形成了一些游荡帮派，反对者称他们为“游方僧（*Circumcelliones*）”。他们明显很穷，根据圣奥古斯丁的说法，他们是讲迦太基语的；他们支持佃户反对土地贵族，债务人反对高利贷者，奴隶反对的主人，他们用暴力对付敌人，烧毁他

们的房屋。这种运动很不寻常，是一种带着强大社会潜流的宗教异端。① 这些游方僧让我们想起巴高达人，后者继续活跃在高卢，在戴克里先到瓦伦丁尼安三世（425～455年）期间叛乱过3次。他们还渗入西班牙。据我们所知，巴高达人不带任何宗教色彩；但这两个运动都代表了被压迫阶级绝望的报复。4世纪目睹了非洲城镇的日益衰退。3世纪末期，戴克里先试图通过政府直接干预及对元老院成员发号施令以恢复城市繁荣，但冲击和挫折太大了，没有证据表明4世纪西部各行省的经济曾经有过像样的恢复。 [128]

但意大利是个例外。罗马继续处于最高统治地位，这反映在戴克里先法令的一部分中，它将罗马列为从东半部港口到达西部目的地的城市之首；但其作用在帝国早期就确定了；罗马继续得到国家税收的供应。在戴克里先统治下，意大利被分成两个主教教区，南部可免除土产品税，但要负责给首都提供肉、酒、木材及沥青等。相反，北意大利需付土产品税，其行政中心在米兰。这个岛的普遍衰退在帝国早期就已表现出来，现在，甚至一些以前曾相当繁荣的城市，如普特奥里和塔拉西纳，也加入到了接受国外供应的行列。许多乡村土地抛荒，公路毁坏，到4世纪中期，土匪泛滥，以至于在364年，7个行省的牧羊人及土地贵族都不准使用马匹。到该世纪末，在最富的地区之一坎帕尼亚有500 000尤吉拉（*iugera*）的土地未耕种。450年法令提到，饥荒迫使人们将孩子卖为奴隶。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根本无法繁荣；而且，实际上，意大利在帝国的商业活动中长期以来扮演的都是一个被动角色。在4世纪早期，意大利的葡萄酒还小有名气。戴克里先价格法列明了皮塞思、蒂布丁塞丁、萨伦丁及法勒先这些美酒的价格；当然，这不必然意味着它们有广泛出口。同一文件还有证据表明存在马西人和梅萨安人制作的火腿的贸易，和皮卡人制作的香肠的贸易。以上所列商品的数目并不太多，《概览》对这个名单做出了补充；书中有栩栩如生的描写，说卡拉布雷亚的谷物田野既是罗马富人的家乡也是罗马城的食品室，不过这正让人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它可能和4世纪中期的实际状况没有什么联系。有证据表明，那时意大利惟一的制造产业和毛纺织相关。看来，老中心依然活跃；听说有毛纺产品来自卡努西厄姆和马蒂纳（以出产轻斗篷闻名），集市上还满是来自塔伦图姆的羊毛和羊毛制品。在这些城镇中，卡努西厄姆是帝国纺织场所在地；其他纺织场位于米兰、阿奎莱亚、弗努西亚和罗马。塔 [129]

① 关于古代的异端暗含着多大的社会和民族目的这一问题，琼斯曾充满怀疑地讨论过。参见《罗马经济》，第308～329页。【21】

伦图姆的紫染作坊位于意大利羊毛的第二大产区。北意大利也因建立在那里的帝国武器工场而享有一段时期的繁荣（参见第116～117页），但几乎没有独立的经济生活。随着时间在4世纪的不断推进，可以推断，政府对行会行使的权力不断增加；这种权力随着5世纪哥特人的入侵，以及非洲谷物供应的中断，并最后随着汪达尔人的征服而终止；可资参考的资料越来越少，资料的意义也更加含糊。意大利的“执行委员会（*collegia*）”有没有在西部帝国的衰落中存活下来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公元10世纪在拉韦纳仍有行会；但因这里受到了东部的强烈影响，它们更可能是重现而不是5世纪以来的残存。

2.4 总　　结

有关贸易和工业的记载稀少，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帝国西部最后一个半世纪的经济衰退。大的企业，大的中心区的供应，军队、城市官员，都由政府接管，即使在黄金代替实物税的不断增长并很大程度上导致实物税的结束后，它们仍是国家的义务；因为尽管现在以黄金和白银付税，但依然是帝国当局采购商品并通过其控制的公司监督商品的运输及销售。税赋的压力很大，以至于独立的大公司无法生存。但认为晚期罗马经济下独立的个人经济已完全消失是错误的。零售业一直很繁荣，特别是手工业者自己制作并出售商品的形式仍然存在。而且，批发商并没有消失，尽管其活动范围缩小了，风险增加了。价格法表明，4世纪初在省际间有繁荣的贸易往来，其中既有日常用品也有后期贸易中作为更明显的目标的奢侈品。

但是，整体而言，远程贸易基本上是为满足富人需求的。但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生活在庄园里的大土地贵族在许多基本生活必需用品上是自给自【130】足的，其他商品则从巡回劳动力处购买及从本地集市获得，他们的财富花在从帝国范围内各处所能得来的稀有物品上。通过殖民机制（institution of colonate）的建立（它本身是引入土产品纳税的一个附带结果）获得了更多权力的大土地贵族与帝国行政当局的分歧是使帝国西部分裂的一个因素。西部比东部更无组织更无活力，被农民起义（巴高达人及“游方僧”）弄得更为支离破碎也更加贫穷，缺乏像君士坦丁新首都赋予东部那样的坚强壁垒。这样，西半部越来越衰弱，并逐渐瓦解成法兰克人、哥特人、汪达尔人和伦巴第人（Lombards）的王国。

随着帝国的瓦解，大部分以其存在为基础的经济活动也消失了。其余的部分——城镇和地方集市的小匠人和商人、流动技工、庄园或修道院周围的村庄以及为了满足富人需求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奢侈品贸易——被保留下来，它们成了中世纪欧洲新的经济形态的基础。【131】

第三章

拜占庭的贸易和工业

3.1 拜占庭帝国的经济政策及组织

拜占庭的经济史与其他中世纪国家的经济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进化既不像西欧各国的历史，朝着现代经济稳步前进，也不像阿拉伯帝国的历史：幅员辽阔但联系松散，资源丰富但从未得以充分利用。拜占庭是一个管理精细的国家，地缘广阔但物产并不丰富，它试图尽最大可能把权力集中于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这个城市的规模和有组织的活动在中世纪的世界里是独一无二的。

拜占庭的历史可分成几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从君士坦丁堡建立到7世纪阿拉伯的入侵，这是一个罗马帝国历史的延续期。国王仍拥有帝国东部的行省，他所面临的问题类似于他的前人。接下来的一个阶段是帝国领土的缩小期，起先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后来逐渐进行了调整，并在10世纪及11世纪早期达到高度繁荣。接着是东部再次遭到入侵及西部遭到军事和经济入侵的时期。在这期间，拜占庭明显恢复过，可很快就又走向衰落，直到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Crusades）占领。尼西亚帝国的建立及

1261年君士坦丁堡的失而复得表明它再次出现复兴；但帝国的最后两个世纪是在贫穷和衰败中度过的。

综观各历史阶段，拜占庭政府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首先是构建并保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系统。戴克里先以后的皇帝一致认为罗马衰落的原因是缺乏统一性和对行省控制不力。戴克里先认为罗马帝国太大，仅有一个中央无法对其进行统治；他设想得有2~4个中心。君士坦丁的新首都【132】便于进入也利于防守，西部行省落入野蛮人手中使得集权更为可行——尽管受到叙利亚和埃及的反对（因为它们都有自己的大都会）。直到阿拉伯征服使其领土进一步缩小才使集权得以完成，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不但集市型的城镇与首都的联系比西部更加紧密，而且村庄与集市城镇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农村的大部分供应也依靠城镇了。① 良好的交通使得联系成为可能。拜占庭人民维持并改进了他们领土上的罗马公路系统，并拥有一个繁忙的商业性海运系统。同时，管理很有弹性。地方政府享有相当的自治和责任；但他们受到中央政府官员的定期审查，中央通过薪水的发放进一步控制他们。② 这套体系运转得不错，直到10世纪后期出现了一位非常富有、甚至可以藐视中央政府的行省贵族，③ 以及11世纪后期突厥人的战争使交通破坏，这个系统才开始出现问题。

政府的第二个目标来源于第一个。就是使君士坦丁堡的人丰衣足食，日子舒坦。一个如此集权化的国家，首都的混乱很可能严重破坏整个管理系统。因此必须尽一切手段保证廉价食物及必需品的稳定流入，这样，除了在毁坏圣像的几个皇帝统治时期外，通常的情形是行省得做出牺牲。

政府的第三个目标是通过税收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以支付维持行政系统和一支主要由雇佣军组成的军队的开销，并且还要建立一个巨大的金库。在拜占庭人民的眼中，一个好的皇帝应是在去世后留下一笔庞大财富的皇帝。黄金是一种必需的储备，它可以应付民族危机并支持帝国铸币系统的运作。政府也知道可以通过规范黄金的流量来控制价格。

为达到这些目的，拜占庭政府颁布相关的法律和条令，这些都影响到它的臣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府的控制与其说是现实的，还不如说是潜在

---

① 参见《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2版，第211页。【1】

② 一些难以驾驭的或边境省份的官员的薪俸，从他们所收集的税收中得来。这就有效地刺激了他们收税的积极性。那样的行省更容易受到检察官的光顾，以确保没有勒索或腐败的事情发生。【2】

③ 参见《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2版，第215页及以后。【3】

[133] 的。它没有系统的政策，而是出于管理目的。如果行政管理不要求实施这些规则，它们就是静止的。戴克里先法典规定子承父业，这条规定在整个拜占庭的历史上一直都有，但从来没有证据表明它曾确被实施过；官方规定不得在帝国境内做无限制的迁徙或不断更改居住地，这也似乎总是被人忽视。《拜占庭圣徒的生活》（The Lives of Byzantine saints）给我们提供了普通市民生活方式的最好证据，该书给人的印象是政府很少干预私人生活，除非在饥荒、内乱或战争时期。即便是利奥六世汇编的控制君士坦丁堡行会的规则《官员书》（*Book of the Prefect*），[①] 表明的可能也只是国事理想的一面而不是现实生活。

拜占庭当局从没考虑过它的贸易收支。帝国的出口对他们而言是政治性的，而不关乎他们的经济利益。实际上，罗马时期以来，更多的是进口商品而不是出口，平衡由黄金来支付。这表明帝国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黄金的获取。罗马帝国在生活必需品方面能自给自足，但必须从东方进口奢侈品，如丝绸、宝石和香料。在交易中，黄金及少量的白银流到了东方。这些黄金主要来自努比亚，罗马人过去曾到达那里；如果外交条件允许的话，也可来自高加索和乌拉尔。但帝国内的黄金储备在逐渐减少。而且，出口到波斯的黄金会退出流通，因为波斯人用银作货币而把金作为装饰品或作为一种财富的储存方式。与此同时，由于罗马铸币的不稳定性，帝国内的个人和机构开始储藏稀有金属。君士坦丁大帝的改革，通过恢复信心，释放了这些储藏的一部分；但新成立的基督教机构想建立自己的金库，这抵消了上述改革的成效。与此同时，4、5 世纪由于野蛮人入侵俄罗斯平原和非洲及 6 世纪与波斯的战争使得黄金不那么容易得到了。到查士丁尼（527 ~ 561 年）统治时期，这种状况开始向政府敲响了警钟。

但可以肯定，有一定数量的黄金来自帝国的西半部。那里野蛮王国的建[134] 立并没有对地中海的贸易造成很大的影响——除了 5 世纪中期非洲汪达尔人用他们的舰队进行海盗活动这段时期之外。新的统治者及臣民渴望得到东方的奢侈品，对此他们主要用黄金来支付，因为出口很少。但是这种贸易主要由叙利亚及埃及的商人用自己的商船来进行。黄金几乎完全流入叙利亚和埃及，仅有一小部分以税收形式流到君士坦丁堡。一些用于亚历山大和安提俄克的帝国铸币，更多的是进一步流到东方换取亚洲的商品。还有一些流到了叙利亚和埃及的教堂和修道院的金库，因此也就退出了流通。直到 7 世纪，

---

① 参见下文第 154 页及以后。【4】

埃及和叙利亚远比君士坦丁堡周围的行省富。新的首都为本地商品和进口奢侈品提供了市场，但那里的工场难以与亚历山大形成竞争。出口到西方的玻璃、高质量陶器、珠宝及纺织品是埃及生产的；亚历山大拥有当时主要的造船厂。造船用的木料来自黎巴嫩；黎巴嫩港口，特别是贝鲁特，也造船。而且远东贸易经由埃及和叙利亚到达地中海。阿拉伯香料，其中最重要的是熏香，由沙漠商队从阿拉伯半岛南端运到阿卡巴（Akaba）湾，从那里通过巴勒斯坦南部到达地中海或向北经过外约旦、大马士革（Damascus）、奥昂特斯山谷到达安提俄克。远东的香料如胡椒和丁香及一定数量的中国生丝由埃及商人经由海上带来，他们驾驶着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的船只，利用季风从马来亚或锡兰穿过印度洋，经由红海到达位于苏伊士海湾的克莱斯马（Clysma），再从那里到达亚历山大。一位驻克莱斯马的帝国官员监督贸易，每年他要亲自到印度各地方去一趟。驾着阿比西尼亚船的埃及商人可以从东非获得黄金、象牙及鸵鸟羽毛。① 与波斯的贸易，绝大部分由中国的生丝和制成（made-up）丝组成，主要经过伊拉克（Iraq）到达安提俄克，而君士坦丁集市的丝绸，可能是通过波斯北部和亚美尼亚（Armenia）到达位于黑海的特拉布宗而来的。【135】

3.2 阿拉伯人入侵叙利亚和埃及之前的拜占庭经济

尽管叙利亚和埃及反对君士坦丁堡政府所采取的宗教和管理上的不公平对待，并由此引发了政治问题，但5世纪仍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世纪。527年登基的查士丁尼皇帝国库富裕足以让他完成非常铺张的公共工程政策并实现野心勃勃的对外扩张。不幸的是，与波斯人的战争业已开始，其原因主要是帝国对由波斯人控制的丝绸价格的不断上涨所引发的不满。战争时断时续，但越来越残暴，历时一个多世纪。北叙利亚在战争中遭受的灾难尤其巨大。它与波斯的贸易往来被中断，并且成了波斯军队的第一个攻击目标。540年，安提俄克被占领；526年和529年的两场大地震及随之而来的大洗劫，给了它沉重的一击，之后再也没有恢复元气。查士丁尼试图通过外交谈判维持与阿比西尼亚的贸易联系，主要是想开放红海，保证非洲黄金的供应。但

① 埃及—阿比西尼亚贸易被科斯默斯·英蒂科普卢斯特斯（Cosmos Indicopleustes）在他的《基督教地形学》中描述过，这部著作完成于公元530年，目的是证明世界是扁平的。【5】

在他的统治结束之前，阿比西尼亚在阿拉伯的自治领地不复存在，布莱迈人对努比亚的入侵使其努力落空。中亚突厥帝国的建立为中国生丝绕道波斯向北开辟了一条新的路线，但在突厥帝国在该世纪末瓦解后又被关闭。然而，沿着这条路线，基督教派的教士将蚕卵隐藏在他们的空棒中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在那里开创了丝绸业，后来成了拜占庭的骄傲。与此同时，西部的黄金储藏也在逐步枯竭，而在查士丁尼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战争后进一步减少，这场战争消耗了金库的大部分。

查士丁尼以后，帝国的政治和经济衰退在继续。7世纪早期，在菲克斯统治时，整个行政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菲克斯在发现自己无法从他的敌人手中脱逃时，故意在一次海难中将帝国的财宝沉没。这使他的继承者赫拉克留斯在波斯战事再次吃紧时一度无法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波斯人统治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15年，吞并了所有的金库。他们占领了埃及，尽管他们似乎很少干预其经济。为了维持他的政府，赫拉克留斯靠的是接管君士坦丁堡和安纳托尼亚的国库。最后他在战争中成功了，波斯的大部分皇室财富落入了他的手中，而他把这部分的财富用来支付来自教堂的贷款。除此之外，他还从重新征服的叙利亚和埃及行省搜刮钱财。大量的财富在战争中流失，如今许多黄金再一次闲置于教堂的财库中。630年，流通的黄金比两个世纪以前要少20%。

[136]

紧接着波斯战争，阿拉伯旋即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征服完成得如此轻而易举有其经济原因。叙利亚商人曾从波斯购买商品把它直接卖到西方。他们痛恨向一个不那么相干的君士坦丁堡政府缴税——这个政府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除了将他卷入战争。埃及商人主要关心的是红海路线。当阿比西尼亚代替阿拉伯在那里执掌政权时，他需要和阿拉伯人交朋友。埃及也是一个盛产谷物的国家，君士坦丁堡从那里获得谷物，黄金的缺乏使得价格下降，这伤害了农民。在波斯占领埃及期间，君士坦丁堡被迫在周围开垦谷物地，埃及谷物已经失去了主要市场。和叙利亚一样，埃及人痛恨君士坦丁堡推行的高税政策。阿拉伯则一开始就向其臣民征收特别低的税；当他们的帝国从印度扩展到大西洋时，他们提供的资源和市场比拜占庭大得多。但沿地中海的运输现在已倾向于走陆上，沿北非海岸，因为阿拉伯人没有控制海上。叙利亚商人的海运业是自腓尼基人时代以来最具活力的，现在衰退了，并且再也未能恢复。

3.3 8~12世纪的贸易和工业：重新调整和繁荣

在失去了叙利亚和埃及后，拜占庭的经济史才真正开始。帝国此时成为一个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整体。真的是难以想像出一个更好的中心了。这个城市几乎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三面环海，敌人舰队很难进入，尽管热爱和平的航海者和商人很容易来到这儿。这里还有最便利的连接欧洲和亚洲 [137] 的陆桥，也是黑海的出海口。因而它扼守着世界上两条重要的贸易路线的交接点。只要供应可靠，大城市的食物需要就可毫不费力地解决。从6世纪到12世纪后期，这个城市的人口几乎维持不变，假如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郊区和马尔马拉海岸都计算进去，粗略估计，其人口大约是800 000。① 这个大城市的人口包括皇室成员、庞大的官僚队伍、中央教堂组织成员、大量的修道士、律师、医生、世俗的教师、小店主及零售商。园丁的小块土地分布在城墙之内，工匠和工场工人中有许多都是外国血统的奴隶，有些穷人得到国家和教堂的照顾住在那里，还有一些生活在棚户区或者干脆无家可归。10世纪以前，没有世袭的贵族或上层中产阶级。直到投资于土地成为可能前，家族财富很少延续多久。没有人因觉得自己地位高贵而不愿去经商，虽然9世纪的一个皇帝西奥菲努斯在发现他的皇后是一只商船的分成主（part-owner）时十分震惊。帝王家族是不应卷入商业的。

拜占庭花了一段时间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阿拉伯征服者和亚洲移民切断了帝国的黄金供应，只有严格控制流通拜占庭的货币才能维持其价值。8世纪早期的外交活动继续向乌拉尔地区打开大门。哈扎尔人（Khazars）的王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商业的突厥部族，7世纪在里海（Caspian Sea）的北部建立起来。哈扎尔汗雇用了拜占庭的技工，为他们在亚速海的沙克尔建造了一座石头城，因此乌拉尔黄金开始流入拜占庭。几乎与此同时，它再一次与高加索金矿建立了联系，当时那里的金产量正在逐步缩小。8世纪晚期，毁坏圣像的诸皇帝的反宗教政策使得大量教堂的财富流通起来。但帝国的主要金源此时由阿拉伯人自己提供，他们经西班牙从西欧，经由伏尔加河从北欧进口

① 城市围墙内的人口可能不超过600 000。可参照P. 查兰尼斯（Charanis）所给出的各种估计的讨论，《对拜占庭帝国的人口的考察》，国际拜占庭研究第13次会议，主要论文，第16卷（牛津，1966年）。7、8世纪，人口出现了轻微的下降。到8世纪末，由于突厥人占领了安纳托利亚引来大批难民而急剧膨胀。【6】

原材料，用黄金支付从而使西欧和北欧的贵族能用黄金购买拜占庭工场的奢[138]侈品。到9世纪，帝国重新有了巨大的黄金储备，能再一次从东方大量进口。

与阿拉伯人的战争使得远东贸易走更北的路线。这条穿过突厥斯坦到黑海的路线，在哈扎尔王国统治时是畅通的——这个王国的繁荣从8世纪延续到10世纪。① 在这期间，哈扎尔人的首都——位于伏尔加下游的伊蒂尔(Itil)——是一个集市，在那里可以发现各族商人。从伊蒂尔发往欧洲的商品可以走克里米亚的港口切尔松，而从北方的出口可以到拜占庭，在这儿，希腊船只将其运到君士坦丁堡。这是获取中国商品的主要路线，就拜占庭而言，这些中国商品几乎全是生丝。印度和马来亚的商品，象牙、宝石和香料一般经阿富汗和波斯而来，到了波斯，沙漠商队还可以再添上地毯和制成丝(made-up silk)。亚美尼亚商人在波斯购买商品将其运到特拉布宗，希腊船商再从那里购得这些产品。阿拉伯和拜占庭的直接交易起初非常少，不过埃及的棉花似乎没有阻断地到了君士坦丁堡。但在9世纪末以前，叙利亚和巴格达的纺织品从安提俄克的港口圣西米恩进口或经小亚细亚从陆地进口。

直到9世纪晚期，从北部进口的奴隶和毛皮，从俄罗斯大草原进口的蜂蜡，从波罗的海进口的琥珀和干鱼，都被地方商人运到切尔松，在那里再由希腊商船买走。9世纪初，俄罗斯人控制了所有的这些贸易。巴尔干半岛及中欧的商品，如塞尔维亚的矿物及特兰西瓦尼亚盐，通常经陆路运至帖撒罗尼迦，然后从那里运到君士坦丁堡。也从西欧进口少数的奴隶、木材、武器，以后还进口毛料。这些商品的大部分还是经由威尼斯集市而来。

从黑海到君士坦丁堡的商品被海关人员拦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处，即在西让，在那里缴纳10%的从价税。从地中海和爱琴海来的商品在达达尼尔海峡的阿拜多斯（Abydos）或加里波利斯（Gallipolis）也缴付类似的税收。对亚洲商品的征税，在特拉布宗，阿塔里亚（Attalia），西西里的瑟鲁[139]西亚都设有征税站，而经陆上安塞拉（Ancyra）设有类似的机构。帖撒罗尼迦的海关官员控制了巴尔干贸易。② 直到6世纪晚期，关税组织还由君士坦

---

① 哈扎尔人的历史仍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许多的矛盾都是由早期其真实性令人怀疑的文献而起的。参见D. M. 邓洛普（Dunlop）:《犹太哈扎尔人的历史》（普林斯顿，1954年）和Z. 安科里（Ankori）:《拜占庭的圣经派信徒》（纽约，1959年）。关于KHAZARIS在国际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参见W. 黑德（Heyd）:《黎凡特贸易史》（莱比锡，1936年），第2卷，第48~49页。【7】

② 图章的证据表明在不同的时期在黑海的梅塞姆布里亚、德维尔图斯、赫拉克莱亚和克拉索恩特，在克特的爱琴海的科林斯、安德罗斯、罗德岛和半岛，在南安纳托里亚海岸的塞莱昂和克里科斯，在再次被占领后的安蒂奥奇，偶尔也提到许多其他的城镇的官员，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只处理货物入市税。参见H. 安通尼亚蒂斯—比比科（Antoniadis-Bibicou）:《拜占庭的关税》（巴黎，1963年），在该书中有更充分的讨论。【8】

丁堡的贸易伯爵控制。后来它就开始了地方分权、地方关税官员，集市官，被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自治权。8世纪末，皇后埃仁（Irene）允许自由进口；但这座城市在贸易上的优势并没有平衡帝国赋税的这种损失；她的继承人恢复了这些赋税，设立了新的检查站以防止从西面或南面的进口商在阿拜多斯港口登陆逃税。这尤其适用于奴隶贸易。因此不管在哪里出售奴隶，都要加征2个诺米斯玛[①]（约合30金法郎）的特别税。

要对这些贸易的数量或价值做出估计不大可能。我们不知进口税收占到帝国财政收入多大的比例。[②] 它们一定在预算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但如果埃仁不借助于它们的帮助也能维持政府，它们就起不到很大的作用。她可能想到了随之而来的降低价格和刺激贸易可以带来更多的直接税收，有理由认为在她统治时期进口贸易稍微有点滑坡。无论如何，她的尝试再也没有重复过。在进口商品中，花费最大的是进口生丝。即便在君士坦丁堡和希腊建了养蚕场后，生丝商人和衣着讲究的人购买的大部分原料还是来自国外。各种各样的成品布，特别是绸缎和织锦，一样大批进口，尽管本地也有相当数量的生产。还有贵重的商品，如象牙和珠宝可能只是少量进口，因为帝国宫廷外只有少数人能买得起，对毛皮的需求也只限于富人。另外，还进口大量的香料。香料行会授权销售的商品包括许多种如胡椒粉、肉桂和麝香鹿（musk），都来自东方。拜占庭的医学论文，如西米恩·塞思在的论文提到 【140】 各种印度香料如肉豆蔻、姜及丁香都极易在君士坦丁堡买到。奴隶贸易从来就不是大规模的，教会不支持这种贸易。在矿场和宫殿作坊工作的大多数都是战俘。

帝国的出口少之又少。东方只购买拜占庭工场少数几种产品，如镶嵌用的玻璃及一些染料和香料，如来自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ian）半岛的胭脂红（cochineal）和来自爱琴海诸岛的乳香。西部和北部给顾客渴望购买任何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奢侈品。尽管这种贸易给帝国带来了黄金，但当局并不十分鼓励。他们更喜欢让其产品因为相对稀少而具有珍贵的价值，并保有某种神秘感。最好的丝绸是禁止出口的。它们偶尔离开这个国家，只是在作为礼

① *nomismata*，单数 *nomisma*，苏勒德斯币（Solidus）的希腊文名称，参见“附录”。——译者注

② 估计帝国的总税收每年在800万~5 000万诺里斯马。证据是那么缺乏，以至于任何的计算都带有猜测的成分。它肯定足够大到使一个节俭的国王建立一个巨大的国库。在阿纳斯塔修斯一世这个专业意义上的金融家和平统治27年后，到他死时国库中留下了320 000磅黄金。里根·西奥多拉，在她856年退休时，在国库中留下了109 000磅黄金。巴西尔二世，尽管在他统治时进行了大量的战争，他也留下了20万磅黄金，还有一堆堆的宝石和贵金属。但是，他们的这些储藏都很快就被后来者浪费掉。【9】

物送给国外权贵的时候，仅此而已。质量差一些的丝绸可以出口，但出口供应从未满足过需求。亚麻布和棉花则大批出口。10 世纪后，伯罗奔尼撒地毯在西方非常流行。应用艺术品、珐琅、雕刻象牙及滑石石瓷等，虽然对其需求总是很盛，但由于价格过于昂贵因而无法大批进口。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一样，要在同样的收税站缴纳同样的税。海关的检查非常严厉。奥斯曼一世的大使，克里莫纳的利厄德普兰德，发现他的外交地位虽然允许他免税出口日常用品，但绝不允许他带出禁止出口单上列出的丝绸。

从东方进口的大量商品似乎又直接被再出口到西方或北方。对其所征缴的过境税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东方国家与拜占庭进行的大部分贸易和帝国内部的所有沿海贸易都由希腊船只完成。他们完全垄断了黑海，航运所有来自切尔松和特拉布宗的商品。这种垄断一直持续到 9 世纪末，其后俄罗斯开始发展自己的贸易而哈扎尔的贸易开始衰落。从此以后，俄罗斯平原的商品每年由俄罗斯远征队顺第聂伯河沿保加利亚海岸运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为了发展与俄罗斯的友谊，也为了鼓励这种贸易，帝国在 907 年签订的一份协议里允许注册的俄罗斯商人【141】免税进口他们的商品，这条协议几年后又重续了一次。① 与此同时，希腊人在西方的贸易中失去了垄断地位。到 10 世纪，拜占庭在意大利首都巴里（Bari）有了自己的海运商队，而其附庸城市阿马尔菲（Amalfi）与它的商人在君士坦丁堡的殖民地的联系正在稳步增长。但是危险的竞争来自威尼斯，它本身也是一个附属城市，然而这时候，还是对它的帝国宗主非常老练地表现出尊重。到 10 世纪末，威尼斯已有一支非常庞大的舰队，它不仅承担着西部帝国与中欧和拜占庭的贸易航运，还提供定期的旅行和邮政服务。不过，希腊船只仍航行到意大利。928 年西部皇帝奥托二世在斯提洛被穆斯林击败后商人们设法营救他，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经陆路进口的商品似乎通常由外国商人带入。在君士坦丁堡每年都有叙利亚公司销售叙利亚物品，也销售横穿小亚细亚通过伊拉克运来的印度商品。为了方便穆斯林访客，这座城市还建有一座清真寺。在君士坦丁堡及帖撒罗尼迦可发现来自巴尔干国家的人，他们把产品卖给行会组织。在这里，没有不鼓励外国人来访的。缴纳进出口税的正是他们，而不是拜占庭人。不过在参观访问这个首都时，他们的生活受到限制和监控。一经过达就必须向

---

① 当俄罗斯贸易由于南部草原被波洛斯金人（Polovtsians）侵略在 11 世纪衰落后，这种减免似乎也消失了。【10】

相关市政当局汇报自己的情况。分给他们住的是特别的宿店，即所谓的米塔塔，任何人在这座城市逗留的时间都不许超过3个月。这些规则适用于普通的穆斯林，也适用于西欧的商人。之后，主要的意大利城市在君士坦丁堡设立了领事馆，领事馆的官员在帝国当局的同意下承担着他们居民的监护权。俄罗斯人被认为更野蛮，对他们另有安排。他们可免费居住，免费洗澡，但被安置在郊区，没有护卫就不允许进入城墙内。保加利亚商人必须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商品进行登记。这样的事发生在君士坦丁堡；9世纪晚期，一个腐败的大臣将登记处移到帖撒罗尼迦，这极大地扰乱了保加利亚的贸易，以至于它的国王发起了一场战争来加以纠正。

尽管因战争发生偶有中断，拜占庭对外贸易的规模在11世纪后期国际性的动乱发生之前仍有增长。政府很少做出鼓励，只是在攸关自己的财政或是为了获得黄金和帝国工场所需的原料时才进行干预。为了外交利益或为了【142】维持君士坦丁堡的秩序，商人的利益应该做出牺牲。

内部贸易的组成主要是供应君士坦丁堡所需的生活必需品及保障市民对舒适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养活这个城市人口的谷物大部分在小亚细亚种植，并通过离谷地最近的港口运来。如果亚洲收成不丰，也可从其他省运来弥补。1073年亚洲饥荒期间，政府就从希腊和伯罗奔尼撒半岛收购了100 000莫迪（modii）（650 000公斤）的谷物。在突厥人占领安纳托尼亚的大部后，色雷斯开始供应谷物——它过去主要是饲养牛和猪的，这些牲口被成群地赶到城市的屠宰场。羊主要来自比希尼亚（Bithynia）高原。水果和蔬菜的种植是在本地和尼科梅蒂亚湾的非常隐蔽的海岸。博斯普鲁海峡富产鱼类。渔夫要买执照，执照的收益用来支付圣索非亚灯塔照明用的油钱。帝国的各个地区都有香料和调味品，如来自诸岛的乳香，奇里乞亚的番红花，比斯迪亚的香口胶。本地生产的布补充伯罗奔尼撒半岛生产的不足。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安纳托利亚生产地毯。塞柏和科林附近的农场源源不断地供应生丝。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爱琴海的亚洲海岸种植亚麻，它们被运到君士坦丁堡来加工成成品布，并且用伯罗奔尼撒半岛染料和克拉桑特的明矾来染色。其他大城市，如帖撒罗尼迦和特拉布宗为了保持它们相当大的人口也需外地的进口来补充本地生产的不足。

除食物外，货物被从一个省运到另一个省时在目的地要缴纳人市税，但皇室和军队的货物不受这一限制。农用机械及私人用品可免税，修道院也可得到免税的特权，通常船长的私人货物也可以享受这一特权。

商业性的海运业被控制得非常严格。管理它的规则被编成一部法典，即

《罗得法典》(Rhodian law)——因为在早期罗马帝国时期罗得似乎有最好的海运法规。从8世纪到13世纪，这部法典断断续续地一字不改地重新颁布。它给我们提供了拜占庭航运业组织的一些信息。每艘船都有一个船主或雇主，他与船长是截然不同的，尽管一些船长也可拥有或雇用他的船。不过一旦航[143]行开始，船长就完全控制了该船。他的薪金是一般海员的两倍，地位稍次的成员（大副、木匠和舵手）是船员的1.5倍，而厨师是船员的一半。当遭遇窃贼或货物被仓底的水损坏时，船长要负全责。他必须保证船体合适能保护货物。丝和麻需要特别地看护。在危机时，船长有权筹措贷款以获得船上所需的一切必需品。商人经常与他们的商品一块航行。因此，旅客有权加入任何有关是否抛弃货物的讨论，尽管最后的决定有可能是船长做出。他们不得不将值钱的东西和黄金存在船长那里，否则船长对损失不负任何责任。当因海难或其他原因导致货物丢失时，船主要按照物品的不同进行补偿。如果是白银则付价值的1/5，黄金、珍珠或干丝则付1/10，如是丝绸弄湿了赔付的比例便要更小。不值钱的货物，如谷物或油就不必承担这个责任。每个旅客可拥有不到3立方肘尺（cubit）① 的空间；妇女少些。每天淡水的供应都是定量的。

船运的定价是每1 000莫迪（modii）50个金币（约750金法郎），莫迪显然是一种容量单位，它是以1莫迪（6.5公斤）谷物为基准，如果使用到一定期限就只值30个金币。在海运保险出现之前，失去一条船对船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海上旅行非常危险。只要在头年10月到第二年的3月封海，海难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但是在黑海和爱琴海任何季节都有可能遭遇暴风雨——前处几乎没有暖和的抛锚点，后者则有暗礁和急流。船只失事特别多。相比而言，海盗并不是常有的危险。在黑海几乎没有海盗，但爱琴海无数的岛屿都比较适合他们生存。824年到961年，克里特岛是撒拉逊海盗的总部。即便是港口也有海盗，他们切断船缆，盗走船锚。防火有不同的警告。甲板上惟一允许点火的地方是厨房。旅客尤其不允许自己炸鱼。基于这些危险，投资航运业是非常具有投机性的，商人一次成功航行的赢利非常大。因此政府允许航运业的贷款利率比普通的高一些。拜占庭中期，利率为每年16.66%。这个比率是否高到可以吸引投资者是值得怀疑的。消除这个限制也许有利于拜占庭航运业的发展，特别是当来自西方的竞争变得激烈时。

① 一种古代长度单位，自肘至中指端，长约等于12～22英寸。——译者注

君士坦丁堡是主要的商品交易中心。为了便于监督，每个行业都占有自己的某个区，销售条件也由不同的行会条约来规定。君士坦丁堡的集市全年都特别忙，尽管冬季海运停止时贸易活动会减少，特别是当风雪堵住色雷斯和小亚细亚的道路时，它差不多就停止了。其他城市每年都有自己的集市，其中帖撒罗尼迦的圣德美特里厄斯集市是非常著名的。它每年在 10 月 20 日开放，而在圣德美特里厄斯日（10 月 26 日）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关闭。到 11 世纪，它已经是每年都举办一次了，一直到突厥征服前夕都很繁荣。在这几个世纪，它是近东最大的集市。12 世纪早期的一位讽刺作家将它描述成繁荣的顶峰。① 这个集市位于城墙外的露天平原，有两排长长的帐篷带，两边的街道与它们互相垂直。大部分科林斯湾和维奥蒂亚（Boeotia）的丝绸就是在这里交易的，也就是这里，巴尔干的农产品和喀尔巴阡山脉的皮革和盐找到了它们的市场。穆斯林商人带来了叙利亚的锦缎和埃及的棉花。意大利商人主要是来购买。近东的贸易内容在圣德美特里厄斯的集市中都得到了体现。帝国内再没有其他城市有如此大规模的集市，尽管特拉布宗的集市到夏季四处都是各民族的商人，而安提俄克在 969 年被拜占庭帝国征服后是希腊和穆斯林商人的主要集会地点。 [144]

3.4　13、14 世纪的贸易和工业：衰退

到 11 世纪末，拜占庭贸易（Byzantine trade）开始经历一系列灾难性的转变，从此再也未能从中恢复过来。由于塞尔柱征服了小亚细亚，夺取了君士坦丁堡谷物的主要供应源和拜占庭实力基础的大量农业人口，从而改变了整个拜占庭经济。与小亚细亚无休止的战争干扰了它的陆路甚至沿海贸易。与此同时，诺曼（Norman）人对南意大利的征服导致海盗入侵繁荣的希腊半岛，这严重地威胁到帝国在欧洲的所有行省。同时，意大利邻海城市增加了其商业舰队并一步步地侵占东部市场。最后，塞尔柱人毁坏了通往东方的朝圣道路这威胁到基督教社会；并引发了西欧的宗教狂热。这种情感爆发与殖民本能和诺曼人（Norman）的野心结合起来导致了我们所谓的十字军运动，它革命性地改变了黎凡特的贸易，对拜占庭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 [145]

---

① 蒂马里昂（Timarion），一个匿名人士模仿的卢奇安的对话。参见 J. H. 托泽（Lucian）：《拜占庭讽刺文学》，载《希腊研究期刊》，第 2 卷，1883 年，第 235 页及以后。【10ᵃ】

1082 年，已被与亚洲突厥人和巴尔干地区野蛮侵略者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皇帝亚历克赛（Alexius）一世，还不得不在伊庀鲁斯抵抗诺曼人的进攻。他被迫屈尊向威尼斯寻求海上和财政帮助，当时威尼斯的亚德里亚海的政策同样面临诺曼人侵略的危险。1092 年，亚历克赛颁布《金玺诏书》（Golden Bull），其中谈到了这笔贷款的归还安排。在帝国一系列拥有非常重要港口的城市，除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及黑海沿岸的少数港口外，威尼斯人可以自由贸易而不受海关人员的干预。换句话说，任何其他商人，不管是希腊籍还是外国的，仍须缴 10% 的税，而威尼斯人则可免税进出口商品，他们还接管了阿马尔菲人在帝国的货栈和其他的设施——此时，阿马尔菲完全被诺曼王国吞并了。

亚历克赛也许没能预见其行为的后果。对他来说，免除威尼斯人的纳税义务，也许是解决财政不受债务所累的最简单方法，同时他认为拜占庭在与土耳其和诺曼人的战争中损失了许多商船后，对贸易的这种刺激将有利于拜占庭的制造商。他没有认识到这个让步对海运商队的重建是多么大的损失，尽管没有俄罗斯船航行的黑海似乎有足够的空间。可麻烦接踵而来。亚历克赛的儿子约翰二世及他的孙子曼努埃尔一世都想撤销这种让步，但当威尼斯采取敌对行动时又不得不恢复。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也不可避免地强烈地要求类似的特权。1111 年，亚历克赛将比萨商人的税率减到 4% 并允许他们进驻君士坦丁堡。1155 年曼努埃尔一世统治时，热那亚（Genoa）也得到了类似的特权，不久，他们缴纳 4% 的税率仅限于在君士坦丁堡适用，在所有其他港口，除了黑海北岸的两个港口外，他们在各处都能自由经商。这两个港口是罗西亚和马特拉察，它们是出口顿河和里海干鱼的地方。皇帝不愿意看到其臣民如此重要的饮食依靠外国人，更不用说他自己的美味鱼子酱了。给比[146] 萨和热那亚让步周期性地被撤销，然后又不断被迅速恢复。

结果，航运业差不多完全落入意大利人之手。即便是黑海的贸易也很大程度上落到了热那亚人的手中。一个较大的意大利人社区在君士坦丁堡发展起来，据估计在 1180 年超过了 60 000 人。起初，意大利人居住在当地人口中间并且和他们通婚；但当数量越来越多时，他们就逐渐把妻子和家庭接出来，并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他们被称为中产阶级（burgesii），这个词语是从希腊语“商人（Bourgeois）”转来的。他们沿着金角湾（Golden Horn）居住的每个区里都有码头和教堂，每个区由自己的官员管理。这些官员以西方的方式向国王表示敬意，整个区域要缴许多税，具体数量往往带有任意性。确实，这种向外国商人直接征税的方式，可以很好地补偿税收岁

人的损失。

十字军的圣战对拜占庭贸易影响巨大，但并未马上显现。起初，君士坦丁堡在圣战的主要路线上，十字军骑士的往返，尽管对拜占庭的保卫工作提出了挑战，但给这个城市带来了新的购买者。第一次圣战的成功导致已向欧洲商人关闭5个世纪的叙利亚港口重新开放，由此东方商品不必再穿越帝国领土，经海路便可到达西欧。起初，这并没有造成显著的影响。意大利人定居在十字军的城市，鼓励来自内陆的来访者。但圣战的骑士们向沙漠商队征收过重的税收来维持他们在城堡的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到了努埃德丁（Nured-Din）和萨拉丁（Saladin）统一阿拉伯之后，它的贸易才得到恢复和发展，而只有到了十字军建立的国家被缩小到叙利亚海岸而世俗的贵族被好战的喜欢涉足商业的条顿骑士团安排在边境作守卫者后，十字军的港口才得到繁荣。从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记载明显可以看出，对12世纪时的意大利来说，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比其他所有的十字军的港口加到一起还要大。由于中亚的变动及乔治亚（Georgia）王朝的发展，——在12世纪末撒玛（Thamar）女皇统治时到达顶峰，远东贸易主要走波斯北部到特拉布宗的路线。圣战的一个更直接的后果是恶化了东西方基督教的关系。

12世纪中期，君士坦丁堡似乎仍然非常的浮华繁荣。犹太旅行者图德拉的本杰明在1166年或1167年对君士坦丁堡商业活动的繁荣以及各族商人的众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自己的商店里看到了“来自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梅蒂亚、波斯、埃及、巴勒斯坦、俄罗斯、匈牙利、帕特辛那西亚和保加利亚（伏尔加河上游的黑保加利亚）、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Lombardy）和西班牙”的商人。他认为只有巴格达可与这里媲美。他补充道，皇帝曼努埃尔仅从君士坦丁堡就可以得到20 000磅黄金的税收。而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税收来源于外国居民和商人。 【147】

但不久之后，拜占庭商业活动的衰败就变得相当明显。曼努埃尔皇帝铺张庞大的政府开支，以及他执政后期的军事灾难耗尽了他的积蓄。意大利不同社区间的竞争导致了这个城市骚乱不断，库房被摧毁，贸易也被中断。竞争扩展到了海上，每个意大利城市都有海盗舰队，他们伏击邻近的船只，一起袭击希腊的船舰。曼努埃尔没有能力培养一支强大的舰队来制服他们。1180年他死后，其遗孀——十字军的一个公主——摄政，采取了亲西方的政策，这就更加剧了君士坦丁堡人对希腊人的愤怒，他们终于在1182年推翻了她的政府，并大规模地杀戮这个城市的意大利人。许多人被杀害，他们的居住区被烧毁。意大利各城市要求巨额的赔偿，并通过侵袭帝国的海岸来

支持这一要求 在这个世纪结束之前，它们的商人又回来了，重新享有以前的许多特权。但这激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希腊人和拉丁教堂的互不信任加剧了这种不满，以至于难得片刻的安宁或信任。损失可能最大的威尼斯人采取了更剧烈的行动。他们无法忍受帝国政府反复无常的不友好行为。他们嫉妒热那亚人与拜占庭比他们更好的关系——这使得热那亚人占据了黑海贸易的大部分市场。他们希望控制整个拜占庭政府。这种机会随着第四次十字军的东征而到来。由于这时的十字军欠了他们的债，因而答应与合作，他们终于成功袭击了君士坦丁堡。一个拉丁帝国（1204～1261年）就这样建立起来，威尼斯享有最大的特权。

这个短命的拉丁帝国的经济史可谓是威尼斯历史的一部分。各个希腊王朝所采取的贸易政策非常适合他们各自的地位。尼森皇帝控制了小亚细亚西部，试图自给自足。约翰·维塔泽斯（1222～1254年）皇帝在其任期的大部分期间禁止所有商品从外国进口，并且不鼓励出口。他的国土不与当时任何重要的贸易路线搭界，但它们能给其土地上的居民提供所有的生活必需【148】品。奢侈和浪费行为总是被嗤之以鼻。当从家禽饲养中获利时，约翰仅能给他的皇后买一顶新的王冠。特拉布宗这个大康尼努斯的皇帝（Comnenus, Grand），其领土所处的位置较佳，因为其首都仍然是通过波斯北部的沙漠商队所经路线的终点——这条路线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变得越来越重要。由于进入其领土的沙漠骆驼队和与沙漠骆驼队有往来的船只大部分属于热那亚人，对它们只征收很低的关税，从而刺激了贸易的发展。这使他自己富裕，人民丰足，尽管在他的国土资源匮乏，银矿是惟一的财产。伊庇鲁斯（Epirus）的专制君主，似乎也拥有一个非常繁荣的本地贸易，当埃皮鲁斯（Epirotes）赶走法兰克侵略者后，帖撒罗尼迦（Thessalonica）帝国建立起来了，直到它落入尼西亚人手中后，它的动乱的历史才告结束，不过它一直是个繁忙的贸易中心：圣德美特里厄斯集市年年举办，从未间断。

1261年，拜占庭人收复了君士坦丁堡，但这个重建的帝国几乎没有什么国际贸易。这个城市是在热那亚人的帮助下重新收复的，因而热那亚人是主要的受益者。他们可以自由出入拜占庭各港口。在金角湾对面的佩拉，他们建立了一个贸易点，而把君士坦丁堡本身的贸易都吸引过来了。13世纪晚期及14世纪黑海贸易的高度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蒙古帝国，而热那亚拥有贸易中的一多半。他们在北岸的卡法和塔纳建立起殖民地，并在特拉布宗享有优先权。很快，威尼斯商人在帝国所有港口也可以免税贸易，他们在君士坦丁堡也有一小块殖民地，但是这些特权都是在热那亚人享有之后才取

得的，因此威尼斯人扮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他们不能平静地接受这一点，因而在这两个意大利大港间有着无休止的纷争，这不利于和平贸易。比萨还不在这个竞争之列。它的商人在帝国各港口进出口时必须缴2%的税，这一税率适用于与帝国有贸易协议的其他城市的商人：如佛罗伦萨（Florence）、安科纳（Ancona）、纳邦纳以及西西里诸城镇。加泰罗尼亚人（Catalonia）征缴的税率是3%。安德罗尼卡三世大幅提高了税率，纳邦纳人缴税率是4%，这已经是当时的特殊优待了。佩拉是东方商品的主要贸易中心，商人往往在此购买后把货物重新出口到西方；但威尼斯人和比萨人更喜欢在君士坦丁堡而不在热那亚的殖民地购买商品。因为穿越金角湾的贸易是自由的，价格也一样。[149]

然而，还有相当多的拜占庭商人在从事海运，他们主要做沿海贸易。在拜占庭各港间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在发货港须纳税，就像他们是从外国进口商品一样。因此本地贸易不合算。希腊船只不纳税。君士坦丁堡和帖撒罗尼迦的谷物商人此时往往还自己购买船只来进口谷物，通常是从国外进口，然后在季度末销售出去。14世纪帖撒罗尼迦的运货公司是一个重要的组织，也许比君士坦丁堡的同类组织还重要。这种海运业一直持续到帝国衰落之后。通过土耳其人的重重封锁进入金角湾的最后一艘船是1433年的一艘希腊船，它满载西西里的谷物。拜占庭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港口，如默森布里亚或者默内姆尼西亚，都有自己的内贸船只，但色雷斯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产品，如因默内姆尼西亚而命名的马尔姆塞的葡萄酒，是意大利船装载出口的。特拉布宗帝国似乎没有任何海运业，毫无疑问，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缺乏能防止冬季风暴的港口。特拉布宗自身也只有一个受北风影响的抛锚地。准独立的伊庇鲁斯专制君主有一支小小的商业船队。

大量的税收规则迫使帝国在各港口雇用一支庞大的海关人员队伍，以便甄别每艘进港船只的国籍并估量其货品的价值。在佩拉，也许在君士坦丁堡也一样，还需缴一系列的费用，按照吨位和体积的标准征税。拜占庭海关人员受到严格监督，不允许有贪污行为。但是异常复杂的规则鼓励了必须缴税的侨民走私。纳邦纳人在这方面尤其臭名昭著。

在14世纪前，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两岸，奥斯曼土耳其建立起来。15世纪早期，在占领君士坦丁堡后不久，他们到达了博斯普特斯海峡的亚洲和欧洲海岸。不可避免地，他们利用其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对过往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税，甚至有时将海峡完全关闭。这种增加的负担对热那亚人来说太重了一点。但只要君士坦丁堡还是一个基督教徒的城市，就有外国商人进入金

角湾。君士坦丁堡的没落完全结束了所有的贸易，黎凡特一度也关闭了其贸【150】易。幸运的是，欧洲人的进取心驱使他们很快发现了通往远东的海上航线。

3.5 贸易和工业组织：官员书和行会

在中世纪人们的眼中，君士坦丁堡有一个大工业都会的气象。旅行者会被其充满活力的工业、建筑工程、家具厂和陶器作坊所吸引，同时还会被一个大城市生活必需的其他工程所打动。奢侈品工业尤其突出。其中，丝绸业是最著名的。自罗马帝国早期以来，大量的生丝进入帝国，然后在君士坦丁堡加工。查士丁尼以后，日益增长的家庭生产丝绸补充了生丝的不足，这些丝绸是从首都及其周围和某几个省——尤其是希腊半岛的农场——养殖的蚕得到的。但是帝国生产的丝绸似乎永远满足不了需要，其进口在整个拜占庭历史中一直都有。① 在君士坦丁堡，丝绸被整理、纺织和染色，在把它加工成成品后投放到市场。亚麻也在君士坦丁堡也有加工，但它从马其顿或本都或别的地方的亚麻场运到时，似乎是已经纺织过了的，在首都只是做较高级的染色和最后的加工处理，这就使得它与本地产品有明显的不同。棉织品也在君士坦丁堡加工，但数量非常少。尽管他们也大量进口粗布来满足穷人的需要，首都的拜占庭人从来不为优质布发愁。似乎每家都可以制造自己的毛料服装。

金属工业仅次于丝绸业，它也非常有名。甚至更为奢侈昂贵。金盘和银盘的生产规模相当大，但数量是受控制的。更精细的工艺是景泰蓝似的镀釉，大马士革人的准宝石和珠宝雕刻，包括象牙雕刻，需求量很大；但由于加工材料的价格昂贵，技术水平要求高，所以供应有限，但营业额一定相当大。这里也有很大的玻璃厂，制造马赛克镶嵌物，也做家用。这个城市的第三大工业是武器工业。这个产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国家垄断的。特【151】别是拜占庭化学武器的秘密被严格地保守着；制造希腊火器（Greek Fire）肯定要雇用许多工人。

一些省有自己的工业。在塞浦路斯，有黄金加工，其产品在君士坦丁堡有极大的销量。很早以来，希腊岛就加工锦绣。到9世纪，伯罗奔尼撒就加

① 布里（Burg）和安德列德斯（Andreades）认为，到6世纪末拜占庭就可以生产自己的丝绸了。但是《罗德法典》和《官员书》（约公元900年）以及其他的偶然的证据说明，丝绸绝大部分仍然靠进口。【11】

工毛料和亚麻布。帕特雷的丹内里斯拥有一家特别大的地毯厂。到 11 世纪中期，底比斯和科林斯湾生产大量的丝绸，都用本地出产的蚕丝加工而成。但其质量却被认为要比首都的差。在塞尔柱（Seljuk）入侵以前，许多小亚细亚城镇都生产陶器并有出口，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屈塔希亚陶器。帖撒罗尼迦有毛料厂，在帝国晚期，它的地毯也非常有名。

工业组织分成两类，一类由国家或私人权贵控制；另一类由行会控制。综观整个拜占庭史，皇帝是帝国最大的工业家。蚕吃的是皇帝的桑树，产的丝再加上一些进口丝，都是在其辖区的不同厂房里进行着从理丝到纺织各个阶段的加工。女工负责最初的工序，男工负责最后的工序。这些工场所用的染料都是专用产品。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充分地使用紫色骨螺；似乎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将金银丝线织到丝绸中。成品多是一些有图案的锦缎，它的设计颇费了一些工夫。最好的锦缎给皇帝和皇后做衣服，或者可能作为礼物送给外朝官员。其他的则给宫廷贵族或行政官员的上层人士做制服。更低阶层的制服显然由政府在城市的布市上购买。我们还不清楚官员的制服是否要向皇帝付费。也许它们是政府提供的额外津贴，因为帝国的丝绸场并不考虑赢利。相反，它的意图似乎更多的是阻止最好的拜占庭产品进入市场。通过让其成为稀罕物，皇帝将它们的价值抬升到一个不适当的程度，从而抬高它作为礼物的分量。皇室加工场在君士坦丁堡早期就已经建立起来，那时的皇帝希望把丝绸业完全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尽管遭到了普遍的反对，查士丁尼的政府还是完全控制了这个行业，这时原材料的价格过高，迫使私营商人出局。【152】但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它似乎又有所放松。此后，只有最好的丝绸才受帝国的控制。皇家工场的工人被组织成 3 个帝国的或“公共”行会：“布商”、“染工”和“镶金工”。每个行会都有一名官员（Prefect）来掌管；而整个监督则由城市官员下属的一个办公室来维持。

武器工业，正如我们所知，是帝国的另一项垄断产业，而这显然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没有一件产品投入市场，也不希求从它的制造中有所图利，这就是兵工厂的情形——它往往位于皇宫附近。铸币是帝国的又一垄断行业。大部分金银块，尤其是金块，依靠进口，但也有许多来自帝国内的矿藏，这些都是国王的财富。不需用于制造武器或铸造货币的金属则被出售赢利。最好的珠宝，特别是最好的珐琅制品，似乎与最好的锦缎一样宝贵，它们都是在皇宫作坊里生产的。但这里的管理不是太严格。如果宫殿负责最好的珠宝工作，肯定是因为皇帝个人有足够的资金支付这个昂贵的行业。

帝国作坊的劳动力是奴役或半奴役性的。矿山由战俘及他们的后代或是

从北欧和俄罗斯大平原购买过来的一批批非基督奴隶开采。在闺房（gynaeceum）里工作的妇女似乎也被束缚在她们从事的工作上，直到她们失去劳动能力。专业性更强的劳动主要是由奴隶解放出身的自由民进行，尽管偶尔有能力的奴隶也加入其中。通常，即使是自由人的后代也要从事父亲的职业，除非劳力有剩余；有时也可通过成为牧师或修道士而得以摆脱。

皇帝也许是君士坦丁堡惟一的大劳动力雇主。由于政治原因，人们认为如果私人在那里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是不明智的。在一些行省遗存的资料不多，但工业似乎完全是大权贵利用家奴来从事的。在农村地区，由于集市可能很遥远，而自由劳动力比较难得到，只有有资本的人才能经营一门生意。8 世纪，精修圣徒（the Confessor）① 圣西奥菲勒斯的父母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奴隶在爱琴海诸岛的庄园上劳动；一个世纪后，寡妇丹内斯在她的地毯及其[153]他作坊中有 3 000 个奴隶在劳作。也许正是拜占庭工业对个别资本家的这种依赖才使得其历史发展显得断断续续。富裕的家族成员可以得到制造和销售丝绸的特许权。但以后，科林斯湾和底比斯的丝绸工业似乎更多地以合伙为基础，而不是使用奴隶劳动。大修道院有自己的作坊生产蜂蜡和油，而圣山修道院（Mount Athos）和比泰尼亚奥林匹斯（Bithynian Olympus）修道院还出产木材。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修道士是不该拥有奴隶的；但每个修道院都有一些世俗的仆役在帮忙，他们的薪金特别低。在更大一些的行省城市，如帖撒罗尼迦，似乎既有工业资本家又有合作行会。

工业资本家公司和行会作坊的区别在于奴隶劳动。在君士坦丁堡，所有较小的生产者都组成行会，“私人”行会与皇室作坊的“公共”行会相对立。这些行会与西部行会不同，尽管许多规矩大致相同。但它们不是为了其成员的互利和维持所在行业的发展。相反，尽管它们是起源于类似的罗马组织，在拜占庭时期被帝国当局用于控制城市的工业——尤其是出于财政目的。控制行会的官员所属的部门是在市政府机构内，幸运的是，900 年左右利奥六世颁布的指导各官员的条例现在存留了下来。它不包含新的条例而是既往条例的一个缩略；它给我们提供了君士坦丁堡工业生活的最清晰的图景，尽管它提到的所有控制不大可能连续不断地付诸实施。②

① （在基督教早期受迫害时）公开表明信仰的基督教徒。——译者注

② 现代历史学家，比如安德列德斯、迈克维茨和洛佩斯等倾向于低估政府控制的严格性以表示行会的发展更多地遵循的是西方的路线。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并没有坚持要求所有的行会成员都得加入他所在行业的行会。但是政府的潜在控制在规模上却是西方无法比拟的；行会的规则事关帝国的立法。【12】

在《官员书》提到的工业中，丝绸业占有大部分的篇幅。它极端地专业化。生丝，无论是进口的还是从本地村庄收集的，都给生丝商买走，他们也许不用出城就可以买到。商人集体购买集市上出售的生丝；他们每个人都要在基金中参股，按其参股份额的大小而分不同比例的丝；但显然有可能私自从巡游各地的进口商那儿买到丝。生丝商将丝零卖给经授权的买者，买者或是在家加工，或交给生丝的整理者，因此看起来他是一个不必要的中间人。但他对政府的价值在于他要按照他所经手商品的多少缴纳一定的税，这种税由行会的师傅负责收集。[1] 丝绸整理工的任务是洗、捻、对折和缠绕，也许大多数情况下还要纺织，他们或者以某行会集体的名义从生丝商人行会那里以约定的价格购买，或者个人从私人生丝商处购得，这些商人每诺米斯玛可获利润1米利亚里森（*miliaresion*）[2]，即8.33%。他们所需的丝绸量需要在市政当局去登记；他们不能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到哪里购买就去哪里购买，爱买什么就买什么。尤其重要的是，严禁丝绸整理工向外零售自己所买的生丝。[154]

《官员书》中没有提及任何丝绸织工或裁缝行会。整理工一定也是织工；裁剪和制作成衣的工作由染工或由丝绸商人来做——他们都有各自的行会。许多纺织和剪裁的工作也由顾客在家完成。对服装的染料及裁剪有许多限制，尽管利奥六世撤销了其中的大部分——理由是他认为国王作为风格的裁定者是不合适的；但对皇室工场的保护仍然非常多，这就使得行会的产品无论如何都难以与它竞争。丝绸商仅零售其成品。但是要保证不让外国商人或未经允许的人购买在禁止之列的出口产品，这也是他们责任的一部分。还有一个购买外国成品丝（主要来自撒拉逊）的商人组成的行会（*prandiopratai*），行会成员与叙利亚的进口商作生意。在叙利亚居住10年以上的人，即使不是行会的成员，也可从中分利。

尽管有这些限制，行会的相关功能从未有过清晰界定。一个丝绸染工可以从生丝商处购买生丝，显然也可以零售成品，尽管不允许他成为丝绸业商人行会的一员。加入行会一般要缴10诺米斯玛，但染工的入会费只需缴3诺米斯玛，入会申请人必须有5个行会成员证明他有资格加入。触犯行会规则的人遭受的处罚一般是鞭刑、髡刑（shaving）及没收财产。每个行业都必须把它的加工品放在固定的地方并接受当局的检查。如果奴隶的主人愿意[155]

---

① 原文被破坏以至于不能解释这种税的税率。[13]
② 复数 *miliaresia*。——译者注

为他担保并为他缴纳所需的资本，他就能够成为行会中的一员（但是似乎不能成为丝绸整理工行会的成员）。很显然，奴隶主完全可以控制一个奴隶，即使他已是行会的一员。他们也许是家奴，因为一般认为行会成员在他们的行业中雇用了自由劳动力。工人每月都签订合同，因此有可能提前一个月支付薪金。怂恿工人破坏合同的行为被严格禁止。有一些丝绸商叫做 *metaxarii*，他们并不加入行会。政府给予他们特殊的保护，毫无疑问，他们要缴纳特殊的税收。

亚麻行会——布业中惟一提到的另一个行会——也有类似的规则，但亚麻商人是零售商而不是制造者。在《官员书》提到的其他行会中，当局认为最重要的是金银条商和银行家行会。前者包括珠宝商、金匠及高利贷者。他们不仅必须在开业时提供兑换诺米斯玛的零钱，而且还要提供币值的估价服务。他们的职责还包括：保证不让贵重金属因落入外国人手中而流出国境；他们自己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每次购买黄金不能超过一磅。借钱的利率严格限定。在查士丁尼时代，金银条商可获得规定的 8% 的利率，而私人借贷者仅能获得 6% 的利率。但到了 9 世纪，6% 就变成了每一磅黄金 6 诺米斯玛，即 8.33%，而行会的 8% 相应地升至每一磅黄金 8 诺米斯玛，即 11.11%。银行家行会的功能还不清楚。在查士丁尼时期，"*trapezitai*" 这个名称被赋予了从事公共服务的政府兑换官员，《官员书》分配给金条商银行性质的工作，但并没有分配给政府兑换官员任何的具体职责。

公证员行会的地位更多的是属于法律史而不是经济史讨论的范围。但我们也许会注意到，公证员被要求给他的秘书支付其薪水的 1/12，无论他赚了多少。其他行会的薪金支付都要考虑日常生活的必需花费。香水商卖香水和染料，也卖香料——它已是中世纪饮食的必需部分。不过，有规定要求，他们只能销售大宗购入的商品，零售用杆秤购入的小宗商品则是杂货店的生意。还有药剂师行会，但 10 世纪前已被并入香水行会。其他大部分商品是从进口商处买到的，为了便于监督，这种交易只能在某些固定的日期进行。[156] 蜡烛商和肥皂商是另外两个独立的行会。前者主要从国外当然也从修道院购买原材料，然后作成蜡烛。他们还经营照明灯用的油。肥皂商只关心肥皂的制作，其入会费是所有行会中最高的，除需给帝国财库缴纳 6 诺米斯玛的税，还要另给帝国服装加工场（*vestiarius*）缴纳 6 诺米斯玛。皮革业有 3 个行会："剥皮行会"主要准备原皮，"鞣皮行会"和销售成品的"鞍工行会"。皮革行会在需要时为皇帝工作，无论皇帝所给的报酬如何。这是由制革业在武器工业的重要性导致的。

在所有与食品有关的行会中，食品店行会是最大的。授权他们除了销售一般的食品外，还销售青菜、家禽、腌鱼、土制陶器、瓶子和钉子——所有这些都称着卖。食品业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杂货商每销售1诺米斯玛允许有2米利亚里森的利润，即16.66%的利润。屠夫及宰猪的人各有行会。前者主要经营牛肉和羊肉。为了买到更便宜的羊，他们非常希望前往桑加里厄斯河以远的某地去购买从小亚细亚赶来的羊群，而不是在首都附近的城镇如尼科梅蒂亚等着别人送货上门。羊的主人如果亲自把羊群赶到了君士坦丁堡的话，就得在固定的地点以固定的价格出售——绵羊和羊羔是分开的，它们都要上税①——或者卖给某些得到授权的屠夫。牛似乎也是从首都以外购买的。宰牛时政府官员必须在现场，每宰一头他们都要过目。另一方面，宰猪者必须在君士坦丁堡的公开集市买猪。鱼贩子特别多，鱼在旺季时是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食物，在城市的几个集市上都有出售。他们也可以从码头或抛锚的船上的渔夫那里买鱼。但腌鱼是禁止买卖的。面包师行会有特殊的权力，它对城市的福利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一个师傅被要求去履行公共义务。面包师买谷物并亲自将其磨成粉。他们允许每诺米斯玛获利1克拉薪（*keration*）和2米利亚里森，2米利亚里森被算作劳动力成本，1克拉薪是净赚的，刚超过4%。面包房必须是石头建筑以减少火灾的危险。旅店主也有行会。他们是惟一被授权的葡萄酒商人，但葡萄酒不一定非要在店里消费，下午8点关门。任何与食物有关的行会在食品匮乏时都不得囤积，否则将受到严厉的处罚。不容易腐烂的食品，如干鱼不许卖给离城而去的人。【157】

还有一种由 *bothri* 组成的行会，他们经营其余的各类禽畜。通常的情况是购进的牲口要比屠夫所需要的多；该行会的人就可以把它们卖给私人。

《官员书》还谈到有关建筑承包人和建筑业的专门人员，如木匠、砖石匠、锁匠及漆工的规章——尽管这些人中似乎没有一个组织了自己的行会。承包人往往——但并不是不变地——就是一个建筑业的师傅。建筑工人如从事了某一行业就不允许从事另一行业的工作。合同不能改变，除非经政府官员重新评估。如某一座石建筑在10年之内倒塌了，承包者就得自费重建，除非其原因是上帝所为。如房子是泥砖做的，承包人的责任期是6年。

大部分行会位于城市某一特定区域，主要是从帝国宫殿到圣使徒教堂中间大道的沿街建筑。屠夫和鱼贩子各有自己的集市。然而杂货商——为了公众的便利——散布于整个城市，面包师可能也一样。香水行会邻近帝国宫殿

① 税率未被明确提及。【14】

的青铜大门，以便芬芳的香味能飘送到雕刻在大门上的“我主”圣像鼻中。另一方面，（有旅行者说）制革区恶臭难闻，有身份的人没有谁敢住在附近。行会在某些特定区域的集中很自然地便利了官员的监管。监管通常非常严格。当商品的价格和利润在行会的商品目录中没有说明时，官员可就当时的环境进行规定。所有度量衡都要加盖官员印章并做定期检查。所有违约或者老板与雇员之间对不良行为的抱怨都由官员办公室处理而不是到行会法[158]庭，小贩与顾客的争执也一样。官员还要保证影响行会的带有宗教特点的条款得到服从。星期日关门得按规定执行：但从命令被不断重复的频率可得知规则一定经常被破坏。甚至在14世纪早期我们就知道，皇帝安德罗尼卡二世也想重新推行这一命令。在主要的节日，商业活动也要停止。在星期日及节日，旅馆8时前不能开门。肥皂商在斋日或其他假日不许用动物的脂肪。金银条商必须报告圣物的销售状况，以防止任何分散的圣物外流——走私这类物品能获得巨额利润，因为西欧的君主和教会随时准备出高价把早期基督教圣徒的遗物买走。

对于行会的管理官员我们知之甚少。负责公证行会的官员（*primicerius*）在帝国的官僚等级中地位显赫。似乎在所有丝绸行会的头目之上还有一个官员，《官员书》偶有提及也将他与皇室丝绸作坊的总监相混淆。外国成品丝商人的行会之上往往有一个总督（*exarch*），由于生丝商为数众多，因此监管生丝商的总督并不止一个。剥皮工人、鞣皮工人、制鞍工人都由一个总监（*proslates*）领导。在每个鱼市都有一个掌管鱼商的总监，猪屠夫也有一个 *protostates*，旅店主有 *proestotes*，这些词很可能是总监的变体。文献中没提到过其他行会的头目，他们或许存在。总督的职位高于总监。也许布业的所有行会有一个总督，而食品供应的行会有一个总监。这些官员通常由市政官员任命，也许是在行会推荐的基础上选出的，但他们的薪水是行会给的。官员自己雇有两级检查人员——监督（*episkeptelai*）和监察（*epoptai*），以及地位稍低的传令官（bullotai），他们的责任是盖章及检查度量衡是否标准。在官衔上，前两个职位在总督之上，而传令官在总督和总监之间。商业机构行会的官员是代理人（*symponus*）或者叫估税员，有时称为元老院成员（legatarius）。他负责所有进出口产品的注册，并且负责关税。他的另外一项责任是保证外国商人或地方行省商人在首都停留的时间不超过3个月。每个行会都有自己的代理人，这些人多数是总代理人（cheif *symponus*）派驻到具体行会的代表。

我们还不清楚对学徒的身份和期限是否也有明确的规定。学徒肯定是存

在的，这点我们可以从零星的材料看出来，但他们在学徒期间有些什么明确的规矩或学徒期限多长确实都没有提及。尽管戴克里先法典中子承父业的规定肯定已有所放松，但很明显的是，一般情况下一个家庭至少要有一个儿子继承家族的事业。这自然就解决了师徒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不同行业的劳动【159】力问题也一样模糊不清。如我们所知，一般认为丝绸业的制造者或商人按月雇用一个或几个自由女劳动力，而面包师也雇用劳动力。对家庭事务的考虑就更少了。但整个问题都与奴隶制交叉在一起。在整个拜占庭时期，教堂的不满蓄积得越来越多，要求减少甚至废除奴隶制。但家奴在拜占庭直到其统治末期都是存在的，尽管到12世纪他们的数量变得非常少并且几乎全由战犯充当。家奴比国家奴隶的地位高，如果他们做错了事，通常的处罚是把他们沦为国家奴隶。工业主和商人可以把自己拥有的奴隶使用到商业活动中。如我们所知，奴隶也可以拥有自己的作坊，至少在布业是这样。不过在上述情形下，主人要为他提供资金上的帮助，他则定期回报主人一定比例的利润；最终他有可能用所存的积蓄将自己赎为自由人。君士坦丁堡有大量手艺人为女性，这一事实被外国旅客特别提到。最初，大多数女工，特别是皇室作坊的女工，被拴在工作上毫无希望逃脱；一个男人若娶她为妻，也要被降到同样的奴仆地位，他们的孩子也是一样。这个规定可以追溯到查士丁尼时期，以后逐渐放松了。到12世纪，帝国的作坊使用的也许主要是自由劳动力。实际上，到9世纪，我们还听说工人更愿意进入皇室的作坊，因为那里提供有安全保证。

对君士坦丁堡其他繁荣的行业，如船上的商贩（迈克尔五世就是一个船上小贩之子）、殡仪业人员或渔夫，我们都所知甚少，因而也无法对其组织状况做出描述。在紧急情况下，渔夫、船主及船员都可能被召集来履行公共义务。

不存在失业的情况。对商品的需求基本上是稳定的，许多商业活动仅是为了满足本地市场，因此很少受各种波动的影响。如果发现任何有劳动能力的男人失业了，行会就会把他交给度支官，他能在面包房或在集市花园里为他们找到工作，这些工作满足了城市慈善机构的需要。皇帝利奥三世在《短诗选》（*Ecloga*）中写道："懒惰导致犯罪，其他劳动者的剩余产品应该【160】给体弱者而不是给强壮者。"有时收成不好会导致谷物短缺，穷人生活困苦不堪。这时，官员就会出面干预使价格下降，不足的供应由政府用以应付紧急情况的库存来提供。当奈斯菲鲁斯二世利用短缺来垄断整个小麦市场并把它卖给面包师行会获利时，每个人都被深深地震怒了。体弱的穷人由大的慈

善机构照顾，这些机构有的由国王或贵族创建，他们提供大量的财富捐助，并且制定了严格的管理条例，因此也由国家控制；其他的慈善机构由修道院组织并管理。修道院因为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在整个拜占庭的历史上臭名昭著；但实际上它们发挥了几个有用的功能。它们给各阶层的孩子提供教育，它们开设医院，并给老年人提供救助。拜占庭的官员或商人也许赚了不少钱，但他们不会轻易投资。当他们退休或当他去世时，他的遗孀经常会发现自己成了社区的累赘。修道院给这样的人提供住所，在那里他们可以有所信仰或有闲情从事一些学术研究或有益的户外活动如园艺。因此，修道院在拜占庭社会经济生活中是有其价值的。对富人来说还有另一种安度晚年的保障，他可以买一个爵位，价格因爵位的不同而不同，但每个爵位每年都要交最初价格的 2.5%。

主要由于政府对利率的规定，首都似乎没有任何人因贸易致富，尽管一个有进取心的商人只要在从事商业活动，他就可以活得很舒适；但他死后留给他的依靠者的可能只是赤贫。行省的其他城市监督就差些。在港口，如帖撒罗尼迦，由地方官员监督海关贸易，登记进出口，他们也许还努力使价格稳定。这以后，大约是 13 世纪，有了商人成立的贸易公司，为的是在对抗那些达官显贵时进行自卫。因此，帖撒罗尼迦社会比君士坦丁堡复杂。除了拥有土地贵族外，还发展形成了由商业巨头及船主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与【161】小店主、手艺人势不两立，并且最终引发了一场奇怪的民主运动，即有名的狂热者暴动（Revolt of the Zealots）。这种运动更接近西欧的运动，而不像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任何运动。在拜占庭帝国后期，在所有的行省城市普遍有一种要求自治的趋势。具体的细节还不清楚。在许多情况下，城市落入本地贵族的掌握之中，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一些权力机构来控制价格和地方税收。

在拜占庭，地方行省和政府部门拥有巨额的财富，在政府机关，许多职位的薪俸都非常丰厚。① 梅里塞尼——拜占庭第一个崛起也是最后一个消失的家族——其财富来源于君士坦丁堡的庄园，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它在 6 世纪赫赫有名。但是它是例外。至 9 世纪为止，帝国没有哪处乡村逃过了外敌入侵或造反部族所带来的周期性毁坏。然而，一旦土地成为一种安全投资，有进取心的地主，像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寡妇丹内斯这样的人，就

---

① 根据拜占庭的记载，个人资产数目最大的是塞洛尼卡的大主教西奥菲勒斯（Theophanes），此人以贪婪闻名。1038 年，人们发现他的金库中有 3 300 磅黄金，主要来源是非法利用教堂的基金。5 年后，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亚历克赛（Alexius），一个同样无耻的牧师，留下了 2 500 磅黄金。两人的财产最后都被充公。【15】

开始在自己的庄园上建立工场，或像卡帕多西亚的菲拉雷特斯一样，个人进行大规模耕种。在困难时期，土地或许卖得非常便宜，有眼光的投资人就会得到报偿。在10、11世纪的拜占庭，许多富有家族的祖上是一些成功的士兵或政府官员，他们或是由于皇帝的赏赐而得到了一块政府的封地，或是把他们自己的部分薪水投资于土地，由于管理仔细，租金或地方产业会很快提升不动产的价值。小心谨慎的官员很少有赚钱的机会，但是，由于收入的限制，他们也将非法所得投资于土地而不是托付给商业性的公司。土地并不是常常都容易到手，豪富对土地的渴求是帝国政府最担心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不解决将是帝国的灾难。但在那时，给投资者提供可替代的途径是不可想像的，因此除了投资土地，少有财产能够延续一代以上。甚至在一个富人拥有非常驯服的管理者时，他的虔诚也使得他在死前要解放这些人。私人资本的这种流动性通常反映在帝国的社会组织上。与西欧截然相反，贵族社会对任何新富都是开放的，贵族和贸易的关 [162] 系在君士坦丁堡从未中断过，即便是在以后几个世纪的行省里，在如帖撒罗尼迦和特拉布宗这样的城镇，特别是在受法兰克影响的地方，有文化传统的土地拥有者家族开始藐视暴富的中产阶级。

3.6　铸币、价格和税收

商人科斯马斯·印戴奥蒂科普勒厄斯特斯（Cosmas Indiocopleustes）在6世纪写到，帝国的繁荣有两个原因：基督教和铸币。宗教期待给人们带来现世的回报，好的铸币的价值正是无可置疑的。君士坦丁大帝规定把1磅黄金作为货币制度的基础。诺米斯玛（*nomisma*），也就是金币，起初称为苏勒德斯（*solidus*），13世纪之后又称为海披伦（*hyperpyron*）①，与1磅黄金的兑换率固定在1/72。铸币和铜币的比价起初是可变动的，但大约在500年，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将诺米斯玛分成12米利亚里森，也就是24卡拉蒂亚（*keratia*），而1个米利亚里森又被分成12福勒斯（Pholles）。银币与黄金有一个固定的兑换率，1磅银相当于5诺米斯玛，这个比率直到中世纪晚期都没变。诺米斯玛包含一定数量的金，价值约为15法郎，理论上其纯度为24克拉。现存的样品比这个理论数字稍微低点，重量介于4.30～

① 其他处写作 hypereron，可参照。——译者注

4.32 克之间。政府试图维持一个很好的黄金储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通过调整其发行的货币数量来控制价格。拜占庭对铸币的价格非常谨慎。想让皇帝名声扫地的历史学家经常指责他试图将货币贬值。奈斯菲鲁斯二世被攻击为引入了成分不足的诺米斯玛，即特塔特伦（*tetarteron*）①；但引入特塔特伦的意图似乎是给刚从萨拉森人（Saracens）手中夺取过来的新省提供一套价值等同于他们所用的撒拉逊第纳尔（dinar）的货币。②

在君士坦丁九世统治时期，由于挥霍浪费，货币贬值开始了。他发行了5种类型的诺米斯玛及两种类型的特塔特伦，每种的真正价值都在逐渐降低。他的继承者西奥多拉、迈克尔六世、埃萨克一世和君士坦丁十世似乎将[163]诺米斯玛保持在君士坦丁九世的最低水平，即大约为18克拉，特塔特伦为17克拉。在罗曼努斯时期，又有轻微贬值。另一个不利条件是，同一次发行的铸币，含金量竟然不一。迈克尔七世时，贬值加速了，到奈斯菲鲁斯三世时，诺米斯玛降到了8克拉的低水平，而这时特塔特伦已经消失了。③其继位人亚历克赛一世康尼努斯（Comnenus）试图通过收回贬值的货币来恢复局势，但由于财政需要他被迫发行了含一部分铜的诺米斯玛，价值为金诺米斯玛的2/3。他坚持税收的缴纳必须用金诺米斯玛，而他用贬值的铸币支付政府的花销。他成功地重建了金库，但不足以使他恢复铸币。财政的计算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诺米斯玛与1磅黄金的比价仍是1:72，而实际情况上它从未恢复到以前的水平。贬值铸币进入了日常的流通，外国债权者一般主张以马歇尔拉塔（*michaelata*），即以迈克尔四世时的铸币支付，这是最后一种含有适量黄金的铸币。④

诺米斯玛，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海披伦⑤，一开始就有轻微的贬值。第一次十字军战争时，它可兑换15个法兰克人的银苏（*sous*）。1156年热那亚将其价值定在10银苏，1157年为9.5银苏。1204年，它可以兑换3个英格兰人的银苏，即大约14.60金法郎（francs）。但在黎凡特，英格兰苏不易兑换，并且比相应的金属价值更便宜。1228年，威尼斯给尼西亚人皇帝的海

---

① 复数 *tetartera*。——译者注

② 这是格里尔森在他的《诺米斯玛币、特塔特伦币和第纳尔币》（'Nomisma, tétartèron et dinar'）里的解释。这一观点似乎比洛佩斯在他的《10世纪拜占庭的危机》中的观点更可取。可参见这两篇文章的书目；也可参照H. 阿魏勒（Ahrweiler）："Nouvelle hypothèse sur le tétartèron."，*Zbornik de l' institute byzantin de l' Académie Serbe*，第8卷，1963年。【16】

③ 参见格里尔森所绘制的表格"拜占庭时期各种金银币的贬值"。【17】

④ 马歇尔拉塔一般被认为是迈克尔七世时的铸币；但是由于这些都已贬值，它们肯定是迈克尔四世时的货币。在迈克尔五世短时间统治期内没有发行什么货币。【18】

⑤ 用海披伦是不太准确的，但通常它的意思就是诺米斯玛。【19】

披伦的定价是 11.81 金法郎，但到了 1250 年，它对法国货币的兑率要高得多。这是因为尼西亚人为了换取黄金将农产品卖给土耳其人。那时它的价格为 16 克拉，实际上它的价值应该更低一点。1261 年，海披伦为 15 克拉，1282 年为 14 克拉。到 1310 年为 12 克拉和 12 克合金，这种贬值在继续。到 14 世纪中期，即便在君士坦丁堡，商人也喜欢用威尼斯或热那亚的达克特，因为海披伦已丧失了国际信誉。

很难肯定拜占庭时期的货币购买力和一般的价格水平。960 年谷物的价格，在奈斯菲鲁斯二世投机谷物市场以前，为每莫丢斯（*modius*）3 卡拉蒂亚，这与希腊 1914 年 7 月份的价格大致相当。其他食物大约比 1914 年希腊的价格便宜五六倍。950 年左右，君士坦丁堡两条牛的价格为 8 诺米斯玛，比 1914 年要便宜 6 倍；马大约便宜 4.5 倍。但丝很贵，其重量可以与金的重量一对一。似乎到了 7 世纪末，其价格一直都在走低。8 世纪，在伊索里亚人统治时，货币储藏有所增加，这也使价格水平有所升高。9 世纪早期，奈斯菲鲁斯一世通过减少货币的流通数量来制止价格的继续升高；价格似乎一直到 11 世纪都没变，此时，政治灾难、铸币贬值及意大利货币的不断冲击开始起作用。到 14 世纪，谷物价格大约是 10 世纪的两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小亚细亚的谷物地其时掌握在土耳其人手中的缘故。 【164】

拜占庭的生活消费由于重税而提高了，税收比那时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重。农村需付家庭税（*epibole*）。① 而城镇居民需缴卡普尼康（*kapnikon*），这是一种家庭税，9 世纪早期为每个人头 2 米利亚里森，后来肯定有所增加。还有一种人头税——凯发里兴（*kephaletion*）——但它似乎只对非基督教徒和外国人征收。还有一种叫地产税（*aerikon*），是查士丁尼引进的，直到 9 世纪仍存在。它也许是一种对城镇地产所征的税。② 奥古斯都还推行了一套遗产税，即对继承旁系亲属或朋友的财产征的税。奈斯菲鲁斯一世还引入了一种针对土地自然增值的税，这部分增值因被列作一种财富，国家自然也该有份。但实践证明这种税收很难估算和征集，因此不久就被废除了。非直接税包括各种通行税、进出口税、集市税、港口税、注册费，一度还征收一种印花税。税收的征集是非常有效的，逃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收税官是一种有名望的政府官员，他们受到严格监督以防止贪污

① 对农村征税是以村庄为单位的，*allelengyon* 的征收是巴西尔二世开始的，它强迫富裕者补足农民的贫困。*allelengyon* 被罗曼努斯三世所废止。在一些落后的地区，税收仍以实物的形式征缴。强迫保加利亚农民以货币的形式支付税收引发了保加利亚 1040 年的暴动。【20】

② 对 *aerikon*，不同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没有一种解释令人完全满意。【21】

腐败。他们难免是不受欢迎的人，然而就我们所知，他们很少有贪污的，尽管有时他们也有被指控为了提高他们的佣金而抬高财产的估价的行为。但是在帝国后期，有一种逐步采用分包形式征税而不再直接依赖政府力量的趋势——税官的数目自然有所下降。到12世纪，在帝国由于土耳其的[165]入侵解体后，这种趋势在各省变得相当普遍。毫无疑问，这增加了敲诈勒索的机会。对某些商品所征的海关税有时承包给帝国官员或他们的亲信。似乎很少有人反对这一点，除非包税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过分地损害贸易。这样的事也是有的，利奥六世的朋友，即征收对保加利亚贸易税的官员，就为了自己的利益，把这种贸易从君士坦丁堡转到帖撒罗尼迦。在危难时期皇帝可以继续额外的征税，如城墙修复税就是利奥三世为了修复城墙而附在城市建设税加征的1/12；他可以对其臣民实施强制性的贷款而增加自己的收入；对被贬黜官员的处罚一般都包括对其财产没收充公。另外，皇帝可随心所欲地将大量的黄金，还有土地分给受宠的官员；他也经常将黄金作为外国当权者或封建重臣的津贴。

3.7 结　　论

由于资料不充分，拜占庭经济的许多方面我们还不了解。颁布的法令和行政手册提供了一些细节。圣徒的生活和丧葬礼仪致辞中对人物的生平的一些简单勾勒告诉了我们帝国社会生活的一些情况。但拜占庭的历史学家更关心宗教事务和个人政治，对经济事件关心较少。而且，尤其是10世纪晚期以来，他们几乎都成了厌恶技术用语的文体学家——因为找不到与这些词对应的文雅的古典词汇。因此他们对经济问题的描述含糊不清，经常给人以误导。这种心理上的抵制纯粹是学术上的。每一个拜占庭人对工商业都还比较尊重。对家族渊源的自豪感从未抑制尽力致富的欲望。即便在拜占庭后期的土地贵族中，也很少有人傲慢地轻视商业活动，贸易是西方封建家族的典型特征。而赚钱总是一项非常令人尊敬并且值得投入的事业。

拜占庭经济的整体图景表明，它是一个家长制的国家，虽没有完全的计划经济的概念，但政府享有类似的合法权利，尽管绝不用以经常性地干涉其[166]臣民生活的具体细节。它的主要错误在于，为了眼前的利益或纯粹的政治目的而武断地牺牲帝国的长期利益；税收太高，这只会削弱其统治；它也没有

为资本投资提供任何有用的帮助。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在那个时代算是开明而毫无偏见的观点；对老人和不幸者的福利的真正的关心；它在统治的7个世纪内努力维持一种稳定货币的决心；此外还有它赋予君士坦丁堡的那种超凡的行政和商业中心地位。【167】

第四章

欧洲中世纪的贸易：北方

4.1 贸易概况

4.1.1 商品

北欧的国际和区际贸易及它的主要加工业与中世纪的传统情形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横跨西欧大陆的贸易，或者直接连通欧洲大陆和北部及东北部地区的贸易，并不能引起一个现代读者像谈论南欧贸易时那样的浪漫感觉。后者给西欧带来各种奇特的物品：胡椒、生姜和其他的东印度（Indies）的香料，丝绸、织锦和挂毯，甜酒、香橙、葡萄干、无花果和柠檬。商人因而被引诱到近东和中东神秘的土地，他们来到拜占庭和叙利亚，通常也到达非洲，有时甚至到达中国。这种贸易是运用骆驼队、单仓平底船和帆船的贸易，也是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的冒险家和商人贵族从事的贸易。这就是通俗作家们所了解的中世纪贸易，也是那些坚持当时的贸易以奢侈品为特色的严肃作者们心目中的贸易情形。

北欧的贸易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与东方和地中海的商品并没有很大的联系，在6～10世纪这个时段的不同时期内，商人和战士把商品从欧洲的最北端带到拜占庭，再把拜占庭的商品重新出口到北欧。更经常的情况是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商人航行到英格兰和佛兰德（Flanders）的各港口，他们携带的是各式黎凡特和东方产品。更经常的是——实际上在整个中世纪——意大利商人和北方人，也即德意志人、佛拉芒人（Flemings）、英国人和法国人，混杂在一起，分布在中欧和北欧各大国际商业中心：12～13世纪在香槟，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在布鲁日，15世纪在日内瓦（Geneva）、安特卫普（Antwerp）和伯根诺普—朱马；在那些地方，商人们与意大利人做生意，用他们的商品换取意大利的产品。【168】

然而总的来说，在北欧经济生活中，这些联系是次要的。整个北欧及北欧和其他国家的贸易主流是与北半球的产品相一致的，相对传统教科书中所说的奢侈品和华丽服饰而言，它们是更粗糙、更大宗的，而且全然是更加不可缺少的日常产品。这种奢侈品贸易即使对南方也不总是真实的，因为食物和原材料也进入地中海的贸易范围。但是，使南部贸易更有特点的并不是大宗的必需品，而是与之联系的奢侈品。相反，北欧的贸易差不多专门集中于必需品。

在那些起源于北方但流通于北部欧洲的奢侈品中，毛皮也许是惟一值得提及的。当地产的普通毛皮——英格兰、低地国家和法兰西的兔毛，农民穿的山羊和绵羊毛皮，可能被视为一般大众贫困的生活的必备品。但是珍稀和贵重的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毛皮——狐狸皮、熊皮、海狸皮、紫貂和白貂就不一样了。它们是礼仪性的商品，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它们相当于中世纪早期元老院的紫袍，中世纪后期意大利的织锦和东方的丝绸，是官位和身价的象征。它们在欧洲贸易中变得那样重要以至于到13世纪末它们成为汉萨同盟商业和财富的主流。

但毛皮只能算是个特例，因为北方贸易的主要产品是更大宗的、更便宜的生活必需品。占主流地位因而也最持久的是食品贸易。正是日耳曼人在西北欧居住的条件使得有些地区在他们的发展早期就不得不依靠粮食进口。在整个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大部分地区无法种植他们所需的食物。从大移民的早期起，相当多的人住在莱茵河口的沼泽和沙地——7世纪时叫弗里西亚（Frisian）国——在正常年份种植的谷物都不足够养活他们自己。中世纪晚期，就是自12世纪中叶后，西北海滨地、佛兰德、布拉班特（Brabant）和荷兰（Holland）的手工业人口不能依靠当地的农业

人口来养活。照15世纪晚期的描述，那时的荷兰人仍然主要靠奶制品、禽【169】类和鱼类生活。再往西南看，法兰西的大西洋海滨，是富饶的加斯科涅土地，它主要产酒，而不得不从外部进口他们所需的食物。[①]

使满足这些需求成为可能的原因是在与食物短缺的地区相邻的地方，同时存在着剩余食物的输出。在9世纪以前的莱茵河河口和后来繁荣的佛兰德和荷兰，如果在它们的腹地没有谷物生产地的存在，他们能否养活自己是值得怀疑的。在中世纪早期，来自上游富饶的农业生产地区的粮食顺莱茵河而下，服务于下游地区。在中世纪后期，部分谷物来源于邻近日耳曼莱茵河的农业地区（格利得斯、朱利奇和格列佛），但大部分来源于法兰西北部。萨穆和塞纳河谷地是北欧的谷仓。塞纳河下游的农业剩余产品主要供应南部，养活巴黎，但是肥沃富饶的桑特雷、维曼多斯和卡姆布雷西斯的小麦，不仅经由奥塞河到达巴黎，而且经由谢尔德河到达佛兰德，经由萨穆到达鲁昂甚至海外。爱米恩斯、阿贝维利和圣瓦勒拉成为法兰西和低地国家谷物贸易的中心，这种贸易一直持续到15世纪末。在整个中世纪的早期，特别是在13世纪，英格兰是食物包括谷物的出口国。再往后，另一个更重要的谷物产地出现了。作为日耳曼人对易北河以远地区殖民化的结果，大量新的农业资源被开发出来，自13世纪末以来，东德意志和波兰的黑麦流入西方，到14世纪初，波罗的海的谷物开始供应佛兰德的食物集市，也就是到那时，它把英国的粮食从斯堪的纳维亚的集市上排挤出去。[②]

但是，谷物仅是横穿大陆和北欧海上航运的基本食物中的一种。欧洲奶业和牛奶贸易的历史是经济史上一个被忽视的主题，但黄油和乳酪作为国际贸易物品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很明显，有几个专门生产黄油的地区，那里的黄油出口到别的国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波兰的南部，还有小部分出口到了英格兰。在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的历史记录中，黄油突然出【170】现，这对一些历史学家来说意味着北欧居民的饮食结构有一个突然的改变，这是由植物油被黄油替代所引起的。但在英格兰，牛奶工业的高潮是在1300年左右——这时兰开斯特的伯爵们在他们的兰开斯特和约克郡的领地上放牧着大群的奶牛，这时，伊普治、波士顿和林恩以吨为单位出口黄油和乳酪。

---

① 转引自J. E. 尼尔迈耶（Niermeyer）：*De wording van onze volkshuishouding*（海牙，1946年），第34页。【1】

② W. S. 温格（Unger）：《中世纪荷兰的谷物贸易和谷物贸易政策》，载《经济学家》（1916年）。还有Z. W. 斯内勒（Sneller）：*Bijdragen tot de Vaterlands. Gesch*，第6卷，第2章（1925年）。【2】

更重要的是鱼，因为在中世纪鱼的消费量很大，当时有许多海上渔场。在欧洲所有的河口和海滨，都可以看到大批的鱼在运进运出。中世纪早期，布列塔尼（Brittany）和诺曼底（Normandy）的渔夫有时甚至带来鲸和海豹的肉。但是非常大的国际渔业基地相对来说是很少的。那样的一个捕鱼基地被英格兰渔夫大规模地开发出来：那就是诺福克和林肯郡的海滨鲱鱼场。它的中心，特别是雅莫斯及其渔业郊区戈尔勒斯通，以英国的鲱鱼基地而出名，然而在英国的食物供应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雅莫斯的熏鲱鱼是否在国际贸易极其出名是值得怀疑的。更具国际声誉的是斯堪的纳维亚的渔业，那里是以白鲱和鳕鱼干著名。从挪威开始，这种"白色"食物加工技术或者用盐保存食物的办法，传播到其他国家，中世纪绝大部分鳕鱼干的供应正是从冰岛（Iceland）而来。往南，莱茵河河口在整个中世纪成为另一个渔业中心，6、7世纪弗里斯兰人一定在这些河口水域捕获许多的鲱鱼，并把它们出口到西北欧各地。但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尤其可以肯定的是13世纪后，最重要的欧洲捕鱼基地，同时也是最繁忙的腌鱼业和鲱鱼贸易中心是斯堪尼亚的波罗的海渔场，它离现在的瑞典南部海滨不远，在13和14世纪之交它变得十分有名，到1527年，每年仍有90 000多吨鱼在那里腌制。但到那时，尼德兰，即今日的荷兰北部海滨的鲱鱼场，作为主要的渔业供应基地，开始与斯堪尼亚渔场竞争。

不难把北欧国家进入国际贸易的其他主要商品列举一下。12、13世纪的英格兰从它的东部郡（主要是伊普治）出口腌猪肉。中世纪后期，蔬菜，尤其是大量的卷心菜、大蒜、洋葱和洋葱种常常来自法兰西和低地国家，苹果——诺曼底的良种苹果——来自诺曼底各港口。到中世纪末，蛇麻草和啤酒开始从荷兰和德意志出口。啤酒的贸易地位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历史学家有时把它作为荷兰在15世纪崛起的主要原因。 [171]

但是，除了谷物和鱼外，没有其他的食物比葡萄酒对中世纪人们的饮食而言是那样不可缺少，销量那样大。显然，在北欧和不断扩展的法兰西和德意志地区，酒被大量地饮用。在11世纪的《阿尔弗里格的讨论会》（*Colloquim of Alfric*）中，阿尔弗里格（Alfric）不饮葡萄酒是因为他没钱买酒的缘故。4个世纪后，在阿金库尔战役中，亨利五世（Henry V）不允许他的战士饮较烈的香槟酒庆功，因为他们喝淡啤或一般的啤酒长大，不习惯浓烈的葡萄酒，但是最底层以上的其他阶层的士兵都饮用葡萄酒，大体而言，英格兰的葡萄酒的销量也增加了。

葡萄酒在国际贸易中的意义不仅在于消费的数量，而且在于它的生产条

件。在几个世纪的发展历史中，葡萄酒的商业化生产，曾经在欧洲各地遍地开花，但后来逐渐集中在几个葡萄种植高度专业化的地区。英格兰和低地国家现在被认为是最不适宜的地方曾经有葡萄园。在法兰西本土，一些有名气的葡萄酒在各地发展起来。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波因图、加斯科涅、勃艮第（奥格诺斯）和马赛等三四个地区——自罗马时代以来它们就都是繁荣的葡萄栽培地——的葡萄酒，不断增长并控制了国际需求。在叙述葡萄酒比赛的13世纪的《寓言诗》（*fabliau*）中，一个英国教士被迫品评了大约三四十个地区产的葡萄酒。在排除了一打左右不足取的葡萄酒后，他离开比赛场地到了阿根特勒、穆伦特、奥格勒、索松斯、艾皮奈的北部葡萄园，这里出产各种盖恩和里茅辛酒，尤其是安格勒姆、圣特斯、波尔多和波因图酒。最终得奖的是中世纪酒中最为贵重的产自塞浦路斯的葡萄酒，行吟诗人真的是有天才的预言能力，他更喜欢沙贝利和博恩白葡萄酒。但是被最普遍饮用的葡萄酒，"在全英格兰，在布里多尼人、佛拉芒人、诺曼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挪威人和丹麦人中被饮用，其中赢利较多的是拉罗切利的葡萄酒"。

要是《寓言诗》在一个世纪左右后完成，那么其中的葡萄酒产地的名单可以删除许多地区，而且也将可能把拉罗切利作为加斯科涅后的第二个能【172】赚取英镑的葡萄酒产地。到14世纪初，这两个地方已经能供应大部分进入国际贸易的葡萄酒。但是波因图和拉罗切利的产品大部分进入法兰西的其他地区和低地国家，而加斯科涅的红葡萄酒主要进入英格兰，并在这两个国家间形成了一个紧密而持续的联系。

由于葡萄酒贸易，这两个国家形成了一个互补的经济系统。葡萄酒是加斯科涅的主要产品，但它在食物和主要织物方面不能自给自足，而英国是欧洲葡萄酒的一个主要进口国（1415年，进口量超过400万加仑），有时能够给加斯科涅供应谷物——在丰收的年成用它自己的谷物，在歉收的年成就把从波罗的海进口的谷物出口到该地。

虽然"法兰西"酒在国际间的大量流通超过任何其他的品种，但其他国家的葡萄酒也占据一定份额。从西班牙和东地中海国家来的甜葡萄酒经常流入北欧国家：马姆赛（一种白葡萄酒）、维马斯卡德（一种红葡萄酒）和其他的酒。最重要的是莱茵河河谷的葡萄酒。它们是6、7世纪弗里西亚商品中的特产之一；它们也是科隆商人（11世纪末12世纪初他们大量地来到这里）进口到这个国家的主要商品之一。德意志商人在有东部谷物交易前在斯堪的纳维亚出售的正是莱茵的葡萄酒。

有关食物的贸易就谈这么多。它的交易量大而且也不可或缺，但是无论在价值上还是在数量上，基本原材料的贸易都可以与之竞争。在这些原材料中最重要的当然交易量也最大的是木材。木材资源不平衡地分布在欧洲——差不多是所有的地区，除了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外：在佛兰德、在尼德兰甚至在英格兰的南部。通常，随着人们开始在西欧地区定居，森林就让位于耕地和牧场，这时它的木材也变得稀少起来。但是即使在北欧那些林木保存较好的地区，正如这个国家的部分地区一样，硬木仍然占主导地位，适合于造船和标准的房屋建筑所用的"高大的木材"不得不由水上运来。在这个贸易系统中，水运比原生林的生态分布更重要。那些生长于远离可通航的河流和海港的木材，正如英格兰中部地区的西部和北部的木材一样，通常难以转运到本国的其他地区，就是运到了其他地区，它的价格比从经海路进口的木材花费更高昂。

木材因而是水上贸易一项重要物品。在早期的几个世纪，即从 11～13 世纪，木材主要出口地是斯堪的纳维亚和德意志南部产林地；但到了 14 世纪，随着波罗的海的开发，木材贸易像谷物贸易一样在方向上和数量上发生了改变。包括俄罗斯、波兰和立窝尼亚（Livonia）的东欧广阔的针叶林现在可以开发利用了。从 14 世纪中叶开始，从波罗的海更多的是从但泽运来的东部木材，几乎从西方集市上把其他品种的白木驱逐出去。波罗的海的松柏、紫杉和冷杉，偶尔还有一些桦树，以原木和锯板——壁板和 *klaphdz*——的形式，成为汉萨进口到本国的主要产品之一，也成为吸引英国商人到波罗的海地区的主要动力之一。在 15 世纪的某些时期，船舱和整条船而不是造船的材料都从普鲁士出口。从波罗的海运走的一些木材可能来自一些遥远的国家。赢得克雷西（Crécy）和阿让库尔（Agincourt）战役的船只可能来自喀尔巴阡山地并通过匈牙利和普鲁士运到英格兰。①　【173】

东欧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开发并不仅仅带来了木材。俄罗斯是中世纪沥青和油漆最重要的产地，中世纪晚期用的油漆差不多全是波罗的海地区生产的，虽有一小部分来自波尔多和贝恩。俄罗斯和波兰的林地也能生产碳酸钾，这主要是由燃烧木材获得的。

工业的原材料主要是羊毛。纺织业是第一个，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是惟一一个由中世纪的手工业发展而成的大工业（grande industrie）。它也是第

① 赫希（Hirsch）：《条顿骑士团统治下的但泽贸易及手工业史》（莱比锡，1858 年）。对挪威木材出口的一个可比较性的，虽然是一个夸大了的考察，可参见 A. 巴格（Bugge）的 *Den Norske Traelasthandels Historie*，I（希恩，1925 年）。【3】

一个把整个欧洲转变为专业性的加工地区的工业活动。在南欧，这种专业性的工业中心在佛罗伦萨出现，织布中心在香槟（Champagne）[①] 和南法兰西也可以发现。不过主要是在北欧，在西北角上，正是在那里，一个完全建立在布业基础上的工业社会形成了。

谈到工业社会，这个词用复数形式也许会更准确一些。当中世纪接近尾声时，北欧几个相邻的地区一个接一个地被工业化了，所有这些工业活动——虽然总是在改变但从不曾中断——在进口羊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有[174]些羊毛来自法兰西中部地区，阿托斯织布业的最初繁荣主要建立在奥弗涅和塞文（Cevennes）山脉的羊毛的基础上。但是最重要的羊毛中心，在13、14世纪超过其他地区的是不列颠的产地。到13世纪后半叶，英格兰平均年出口量达到了30 000袋以上，也就是大约1 100万磅。其中部分出口到意大利，但是大部分出口到北方——先是在低地国家，后是在英格兰本土，而且程度不断加深——加工成布。

这样，布就成了一个非常值钱的而且是最重要的“完全机械加工”的出口品的典范。早在7世纪，我们就听说有英国布出口到加洛林的弗朗奇亚(Francia)。在7世纪及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我们在资料中发现其中偶然地提到弗里斯兰地区有布匹的运输情况，这些布可能是当地或紧邻的周边地区生产的，也可能来自英国，只是通过此处在大陆地区分销。在9、10、11世纪，其他地区产的布也进入当时的国际贸易网中。但只是从11世纪末开始，佛兰德布（Flemish Cloth）才开始超过欧洲其他的布，到13世纪末，它已被出口到那时人们所知世界的最遥远的角落。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它成为用以交换波罗的海国家出产的谷物、毛皮和木材的主要物品，并成为日耳曼在诺夫哥罗德、里加和列日地区影响力的一个主要支柱。当14世纪晚期英国和荷兰布开始大量出现大陆上时，它自然跟随佛兰德的出口流入，但逐渐地在所有最古老贸易路线上代替了它们。像佛兰德布一样，英、荷出产的布匹不久就出现在所有的被文明化了的世界——匈牙利、俄罗斯和亚洲的东部国家，当然在离本土更近的国家也有发现。

与布相比，其他的纺织品，虽然也被各阶层的人所穿戴，但在北欧地区的贸易中并不占很重要的地位。丝绸和其他的来源于拜占庭、意大利和东方的奢侈织物在整个中世纪从南而来。更重要的是北方生产的亚麻和亚麻织品。欧洲生长亚麻的湿润而温凉的地区与养羊的地区明显地分开。一般的土

① 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地区，以盛产香槟酒闻名，通称香槟酒。——译者注

地并不适合高质量的羊毛的出产，正如欧洲的白垩岩高地和盐渍地养活了最大和最好的绵羊但不适合亚麻的种植一样。因此，在低地国家、法兰西的西北部、波兰和俄罗斯这些生产亚麻的地区和生产羊毛的英格兰、法兰西的中部和西班牙地区之间，存在广阔的地理分界线。然而，在有些地区，这两种织物即使不是相互排斥的话，也是相互竞争的。没有别的地区像在佛兰德那样竞争得厉害。【175】低地国家的部分地区非常适合亚麻的生长，实际上在整个中世纪它们都在种植和加工。但是从11世纪末开始，制造和穿戴羊毛衣料传播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对一个观察家来说，这种改变可以视为亚麻和羊毛之间的一场战争。在11世纪一个诗歌性的小册子里，这个无名的小册子作家把这个问题定义为一场 *ovis et linis*（羊毛与亚麻）的冲突。结果，亚麻成为佛兰德的次要的出口品之一。14、15世纪一些亚麻产品从那里出口到英格兰，但是在这时，大量的亚麻的进口来源于其他的产地；绝大多数来源于法兰西的北部和德意志汉萨同盟控制的中东欧地区。大部分造帆的布和造绳的大麻从布列塔尼经波罗的海地区运来。

但羊毛和亚麻，并不是北方纺织品制造商所需的惟一原材料。其他的辅助性的制造布的材料进入北方贸易，主要是靛蓝和茜草这两种中世纪最普通的染料。在北欧地区这两种产品的贸易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一些靛蓝来自意大利，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用威尼斯人的大帆船运来。英国所用的靛蓝大量地从图卢兹经波尔多运来。但是14世纪前，皮卡丁是靛蓝工业在北方的主要基地，阿米恩斯和科比的经济繁荣和商人的声誉正是建立在靛蓝基础上的，许多外来的染料，特别是非常珍贵的和价格高昂的绿色染料来自葡萄牙，更贵重的深蓝染料来自东方。在用于织布的其他材料中，明矾、黑皂主要来自西班牙，碳酸钾主要来自东欧，它们都很重要。

碳酸钾，虽然是波罗的海木材工业的一种产品和织布原材料，但可能应归入北方贸易里另一类重要的商品——矿物中。现代的基本矿物——煤，在整个中世纪——可以肯定的是在13世纪——都在诺森博兰郡生产，从那里经海运到伦敦和低地国家。从13世纪开始，煤的开采也在海诺尔德也许还在威斯特伐利亚和其他别的地方进行。

矿产品中最重要的就是盐了——中世纪食物的基本成分，肉类保存不可缺少的物质，大量的腌鱼贸易的支柱。【176】盐既可以从矿井里开采获得，也可以从盐锅里蒸发获得，两种盐工业生产的地区中心在整个欧洲都能找到。9世纪威尼斯经济的崛起主要是随着地方盐供应的发展而兴起的。再往北，是东阿

尔卑斯山的盐矿，它在史前就已经开发，在中世纪末期再度复兴。在英国，伍斯特郡的盐矿，在整个中世纪一直在开发。但为了北欧贸易的目的，最重要的盐产基地是陆勒堡的萨克森低地，更多的是在法兰西的大西洋海滨的布尔讷夫（Bourgneuf）。陆勒堡的盐矿方便向波罗的海和荷兰出口。但到了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陆勒堡的盐矿像许多其他的欧洲盐制业一样，相对于西法兰西而言在重要性方面有所下降。吉伦特河口和奥莱龙岛的浅水和泥沼地——主要在布尔讷夫——形成一个产量巨大、范围宽广的天然盐场。它们在很早时候就被利用，但是直到中世纪晚期才开始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前来购买。在15世纪前半叶，关于布尔讷夫的文件材料已经非常丰富，我们发现北方的大盐船经常光临此地。汉萨同盟的“海湾船队”每年都要往返这里几次，荷兰和英国的船队和商人也经常大批地到这里。至此时，海湾的盐不仅进入了北方的贸易也进入了北方的政治。盐盗（Klondyke）的非法滋事引发了国际冲突和争端，“海湾路线”的安全在整个15世纪一直成为汉萨同盟最头痛的事情，至少导致了一次战争的爆发——英格兰和汉萨在15世纪中期的战争。[①]

在北方贸易的年鉴和航海日志中，金属的进出口相对不太重要。贵重金属的开采，特别是银的开采，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它的产品在欧洲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仅将它看做一般商品名单上的商品。但是银条并不是惟一在起作用的金属。许多地方都开采铁矿石，在整个中世纪差不多每个大国都熔炼铁。但重要的中心仅有三四个，一个是威斯特伐利亚，其他的在萨克森，在比利牛斯山的巴斯克国家，最重要的是在瑞典。令人怀疑的是，是否从12世纪以来的一个时期，瑞典高质量的铁——在中世纪文字记载中曾以“王紫萁（osmund）”名之——并没有出口到其他的北欧国家或地区。我们在提及瑞典12世纪的史料中发现过它，在13、14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对瑞典贸易的记录也有发现，在英国14、15世纪的海关记载中也有发现。瑞典的铁是中世纪铁中价格最高也最具国际声誉的。

【177】

在其他的金属和金属产品中，铜，大多产于瑞典和匈牙利；铅和锡，主要产于英国和德意志，都由汉萨商人销售到整个北欧和西欧。其他的各种金属也一样，它们主要在里奇、迪南（Dinant）和科隆生产，还有英国制造的白蜡——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股贸易潮流，虽然与谷物、羊毛和木材相比较

① A. 阿加兹（Agats）：《汉萨的海湾贸易》（海德堡，1904年）。至于盐对泽兰的意义，参看H. J. 斯密特（Smit）在*Bijdragen*一书中的观点，第6卷（1930年）。【4】

并不丰富，然而却十分重要，足以引起商业条约的缔造者和立法者的注意。

这个北欧贸易商品的目录几乎可以无限地继续下去。各种欧洲产的商品穿过或者再次穿过北方国家的边界，缴纳通行税。从低地国家来的砖，从科隆来的剑和盔甲，从佛兰德来的织锦和油画像，从法兰西和低地国家运来的书本，从普鲁士运来的木版祈祷文，从俄罗斯来的蜡和蜂蜜，从科隆和布拉班特来的线和花边，从布鲁日（Bruges）和加来（Calais）来的鹰，从德意志各地来的用来灌制枕头的羽毛。但是并不是由于这些商品，不管是奢侈品还是小玩意，北欧商品贸易才有它自己的特色。它的主要的特色是大宗贸易，它的有特色的商品是生活和工业的必需品，它的经济功能是以真实的经济纽带把北欧人们联系在一起——这种纽带是如此重要，没有它，许多地方的生活将很困难，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

4.1.2　数量

商品分类不可能完全，而且鉴于它被局限在贸易的主要分支内，因此不能充分地代表所有的商品。最重要的是，它不能充分说明中世纪贸易的复杂性。欧洲各地区依赖相互的产品流通，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从劳动力的地区分工中获利的程度，远远地超过仅仅用一个商品列表显示的程度。尽管远程贸易有着许多的困难，商业交换还是在中世纪逐渐形成了一个紧密而复杂的网络。在佛兰德、意大利和后期的荷兰那样已经成型的完整的工业社会，主要原材料和食物一样要依赖进口，这已经是一个熟悉不过的事例。虽不熟悉但一样有特色的是啤酒出口，先是从德意志西北，后是从荷兰，在这两地是用从海外进口的谷物发酵啤酒的。要解释这种多边贸易的复杂性，没有什么能比各种次要商品的贸易更好的了，它们穿过并再次穿过一道又一道主要的贸易交通线。在15世纪同一个时间段里，我们发现英格兰通过切斯特（Chester）和布里斯托尔（Bristol）出口谷物到爱尔兰；通过东部港口进口波罗的海的粮食；从扬茅斯出口红鲱到荷兰地区各国（Holland of all countries）并从每个港口进口白鲱，出口麦芽和淡啤酒，进口黑啤酒；出口柴薪和树桠，进口其他各类木材；出口雪花石膏做的圣像，进口木刻圣像；进口蜂蜡，出口动物脂肪；出口白蜡，进口荷兰陶器。虽然这些贸易的数量都不大，只处于附属地位，但它们对欧洲经济地理的形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178]

虽然这些事实有说服力，但是它们不能完全代替所缺乏的统计材料。然

而，它们可能足以证明北欧居民通过从外部购买商品满足自身需求的程度有多大，它们甚至可能支持这样的假设，即这种贸易的数量肯定非常之大。因为大宗商品除非被大量地进出口，否则就不值得，必需品经常性的远程贸易预示着出口国依赖进口国经常性和实质性的匮乏，就像进口者依靠海外供应商稳定而大量的供货一样。

这种普遍的结论在各处能被随机抽取的数据来证实。数据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充分的有关英国贸易的报告——其他地区的情况留待以后讨论——很清楚地显示，在14世纪上半叶，它的出口的价值有时不少于250 000英镑，如果以14世纪最后10年的通行价格计算，相当于150万夸特小麦或250万夸特的燕麦。汉萨的芬德税（*Pfundzoll*）——对海上进口品征战争税——的证据表明，在14世纪70年代，有材料可证的汉萨各主要港口每年可征税的【179】海上贸易超过300万吕贝克马克，相当于那时的600 000英镑。①

虽然未必就更精确更中肯，但更具体一些的，可能是少数现存的进出口商品的数据。我们知道斯堪尼亚渔场在年成好时所腌鲱鱼的数量可以高达120 000桶，在腌鱼季节进口24 000桶盐。在15世纪初的有些年份，荷兰经由萨穆路线进口的谷物可达到230 000夸特。14世纪初从波尔多出口的酒每年可达100 000桶（大约相当于2 500万加仑）。② 1334年，一些英国商人获得向波尔多出口50 000夸特谷物的特许证。英国有关的资料表明13世纪晚期、14世纪早期英国有时出口35 000～40 000袋，相当于1 500万磅的羊毛。在14、15世纪年成好的时候，英国出口50 000块布，每块布相当于28码，佛兰德的布镇在繁荣的顶峰时，其产量可能至少3倍于此。③

相同的估计有可能被用来说明许多其他的地方和其他的商品，但是不管其如何变化，它们无法、可能也无需转换为确定的数量。被写入贸易史的数字看似精确，但大都具有欺骗性，有些数据至少可以说是模棱两可的；但即使是不模糊的，也差不多处于孤立的状态，不能用做进行整个贸易的准确计算，更加无法用于社会收入的估计。1297年在一份由高级教士和男爵提交的奏章中，令人确信地提到英格兰的羊毛相当于整个大陆产量的一半，这个

---

① 1370年由斯蒂达所列的4个汉萨港口海上出口的价值接近150万马克。W. 斯蒂达（Stieda）：*Revaler Zollbücher*，这一段和前面段落的其他的德意志的数据来自G. 莱西纳（Lechner）：《1368年汉萨的芬德税》，第57～58页。【5】

② 见表4；也可见古尔让（Gouron）：《吉耶纳海军部》，第47页。【6】

③ 见表3，第242页。【7】

陈述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大陆的整个产量是多少？同样重要的是，有资料表明，英国在 13 世纪出口的价值也许相当于大约 100 000 农业劳动力的年收入。不过，即使这个数据大小准确估算恰当，除非与英国的整个人口或者与英国的各阶层的收入分配相联系，否则它就没有任何意义：这个问题仍是漆黑一团。 [180]

充其量，这些数据能起的最大作用是以一种佐证的方式形成一个大致的印象，即中世纪的贸易量是巨大的；它们所能起的最小作用是使轻视贸易在中世纪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的观念失去根据。无疑，与 19、20 世纪比较，处于顶峰时的中世纪贸易是十分渺小的。但是为什么要与 19 世纪比较呢？而实际上是为什么要比较呢？就我们所知，19 世纪贸易的记录在世界的经济发展中有可能仅是一种失常状态。有人认为在这个世纪，生产要素——土地、劳力、资本——在地球上的分布比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的分布更不均匀。结果，与可流动资源特别是资本更平均地分布的情况相比，地区间贸易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就要大一些。以此类推，资源的国际流动尽管使贸易在总量和总的价值方面有所提高，却正在慢慢地改变贸易的相对重要性。但是即使这种结论连同它所有的含义都不被接受，仍然真实的是，19 世纪国际贸易量是如此大，以至于相比较而言，17、18 世纪和 13 世纪时的贸易显得缺乏重要性。假如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坚持把一个世纪与一个世纪相比较，假如他们把中世纪与现代社会的早期，即 16、17、18 世纪相比较的话，他们所受的没有可比性的攻击要小一些。在这种比较下，中世纪欧洲国家的贸易（这种观点是表象上的并不是数值上的），比如说与 17 世纪相比，是既小也大：即 15 世纪小于 17 世纪，而 13 世纪大于 17 世纪。

但那样的比较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不仅商业交易的量总是一个模糊的猜测，而且即使它们能被准确估计，它们之间也不可比。从这一点来看，比努力估计外贸量的努力更有意义的是表明中世纪贸易地点的清晰的历史事实——专业化经济的存在，城镇的数量和相关的财富，国王和国会对贸易和航海的重视程度，为了贸易而不惜发生政治和军事冲突的热情。中世纪贸易的地理和政治意义将单独讨论，但是在考虑数量这个问题时必须记住这一点。沟通佛兰德和英国的毛纺贸易不是经常比英法间政治上的王朝的或文化的联系更强吗？加斯科涅对英格兰的葡萄酒贸易导致的政治忠诚不是比种族、语言和距离的邻近所能导致的更强一些吗？12 世纪，英国进口的中断能够在挪威西部导致灾难。14 世纪早期，法兰西北部的动乱能引起低地国家的饥荒。14 世纪与英格兰的冲突能在所有的低地国家导致失业。15 世纪 [181]

从布尔讷夫返航的运盐船队遭受的抢劫，能在北欧国家形成重大危机。

相隔遥远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某个贸易分支的主要特色或许与实际交换的商品数量不相对称。16 世纪中叶，托马斯·巴纳比（Thomas·Barnaby）这个煤炭贸易的热心鼓吹者评论说，“法国对煤的依靠就如鱼离不开水；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纽卡斯尔的煤，它就不能进行钢铁加工，不能进行金属的加工，不能进行葡萄酒的加工，不能使金属匠工作，不能造枪，不能进行要用火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加工和生产”。中世纪，煤的出口也许比 16 世纪要少。法国人还是纽卡斯尔煤码头上的稀客，他们直到 1500 年才经常到那里去。在法国人到达之前，在年成好的时候，佛拉芒人和西兰岛上的人从英国进口的煤不超过 10 000 吨。然而，即使那时也和 19 世纪一样，煤是大宗的有赢利的货物，没有它，航运费用的支付就无法维持，航行也就不能进行。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战争期间，一些国家比现代国家更容易受贸易封锁的连累。禁运和经济抵制容易被用作政治武器，这本身就是人们对外贸的依赖的证明：实际上是对外贸易的分工极其专业化的证明。

4.1.3 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中世纪贸易的范围比困扰着商人的各种阻碍更显突出。要是阻碍像历史显示的那么强大的话，中世纪的贸易将不能进行。然而阻碍无疑是十分巨大的，在边界线上、河流道路上、城镇集市上和海港上，各种税费多如牛毛：【182】商人所需承受的负担差不多像法兰西在柯尔贝尔和卡洛纳改革前夕、或者像德意志在被拿破仑征服前一样繁重。

英格兰也许是北欧最大的只收取少量税收的地区。假如需要缴通行税的话，它们总以过桥税或过路税的性质缴纳。像后来所征收的公路税，主要用来支付建筑的费用或维护道路或桥梁的费用。一般而言，国王的政府除非为了换取真正等价的道路服务，很少批准征收过路税；在批准之前或之后也通常对过路税及其使用情况做调查。

与这些交通服务费也就是后来所谓的过路费相比，过境费——建立在长久以来沿袭的权利的基础上，不管提供的道路服务如何，都要作为一个传统的收入来源进行征收——并不是许多。它们与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后的法兰西和德意志类似的税费相比较，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在那里，即使在最好的时候，没有一条主要道路是减免税收的。因此，就是在 13 世纪从佛兰德到法

兰西的繁忙的国际陆路上也必须通过无数的收费站，其中的几个，像法国边境上巴普姆收费站，法兰西北部一些道路上的佩让恩、内森、库姆皮埃根和科里派恩维罗伊斯收费站，大抵是不可避免的。出巴黎后，在国内道路上分布着地方性的收税站，在通向莱茵河上游和阿尔卑斯山主要关隘的东北的边界线上，也必须在收费站缴付路费。更重要的是，在卢瓦河、萨穆河、奥斯河，罗恩河和加龙河上有数不清的收费站。宣称 14 世纪末沿卢瓦河有 130 个收税站有点夸张。但众所周知，卢瓦河上的收费站的实际情况是，在随后的 25～30 年增长的数目与在前 50 年相当。加龙河和罗恩河并不比卢瓦河更自由，即使在 15 世纪晚期的塞纳河，对航程在 200 英里以上的谷物所征的税超过其销售价格的一半。

德意志的情形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因为这个国家既有像汉萨同盟通往东部的主干线这样相对免费的主干线，也有把这些干线与内地联系起来的征税更重限制更严格的线路。保存下来的德国河流沿岸的收费清单也许夸大了课税的实际量，但是不管怎么打折扣，它们仍是令人难以应付的。13、14 世纪之交，传说沿着威悉河有 30 多个收费站，沿着易北河（Elbe，river）至少有 35 个。13 世纪中期，沿着奥地利境内的多瑙河的上游有 4 打以上的收【183】费站，美因河上有一打。但是最出名和最被招人痛恨的，从贸易的观点来看也是最具危害性的，是莱茵河上的收费站。根据最近的统计数据，12 世纪末沿莱茵河有 19 个收费站，13 世纪末大约有 35 个或更多，到 14 世纪末大约有 50 个，15 世纪末有 60 个以上；绝大多数属于德意志西部基督教王公。一个英国的编年史作家托马斯·威克斯在 13 世纪中期写道：再也找不到一个比“条顿人的极度疯狂”更好的词来描述莱茵河上的税收系统了。①

国内税收的总量繁重而且不断增加，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在中世纪即将结束的几个世纪国内贸易逐渐陷于停滞。与此同时，同样重要的是不要误解它们对商业的影响方式和导致的后果。总的来说这个系统是过于繁重了、也太混乱了，它在各处的征收超过了贸易进行所能承受的限度。然而，莱茵河、美因河和易北河的主要收税点的收入足以值得让其所有者，特别是基督教大公们为保持它们而奋斗，因此大致说来假定的前提是它们并没有完全阻碍贸易。虽然莱茵河收费站的所有者要价过高，某些城镇，首先是科隆的贸易，在河流的大部分地区保持了相对的自由。虽然到中世纪晚期，从北德意志下来的谷物最终弃水路而走陆路，木材仍然顺流而下到达荷兰。易北

① *Annales Monastici*（分卷系列），第 4 卷，第 222 页。【8】

河也一样，因为温迪斯城镇的商人从来没有停止过使用河流，他们利用易北河航运产于美格登堡以远的大宗贸易产品，也沿河航运鱼和盐。

一般认为主要的通行税落在地方交通上，因而加强了地方经济的特色化和自给自足。它们对远程贸易的主要影响是抬高了地方进口产品的价格、降低了可出口的剩余产品的地方价格。这样就相应减少了为出口而进行的生产，也使进口市场变得狭窄。但是，除非能以比目前所能更为仔细的方式考[184]察地方的价格，否则我们无法知道在各个贸易领域这种降低幅度有多大。总的印象是，在有时使工农业产量减少的这些因素中，去往远方集市的高额通行税相对而言并不重要。中世纪农业具有或不具有生产供出口的剩余产品的能力，更多的取决于气候、土壤、季节，尤其是社会结构之间的差异，而不是价格分布上的差异。相同的观点不适用于工矿业产品。许多工业产品的供应受成本的影响很大，对纺织品、金属工具和奢侈品的需求显然是非常有弹性的。有助于提高最终成本的一切因素，都必定限制它的产量和销售的规模。但是由于一些原因（后边还要加以详细评述），远程贸易并不总是受地方税收的很大影响，一些税收可以免除，绝大部分可以逃避。

从区际和国际贸易的角度看，在边境线上设立国家或王室的税收站或者国际征税站，比如巴普姆的那些，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切实有效的。但是就其特性而言，这些税费通常并没有高到需要削减的地步。最高的税是14、15 世纪晚期的英国羊毛出口税。这些税，也就是关税和补贴，有时高达每袋 2 镑乃至 2 镑 13 先令 4 便士，此外，还要加上在英国港口缴纳的 1 先令的各种地方性收费，还要加上在加来（Calais）征收的 6 先令 8 便士关税和对意大利出口羊毛特别征收的税。这样，整个关税估计达到优质羊毛在加来的价格的 20%。税收结果使英国羊毛出口受到损害，极大地刺激了国内布业的生产，但它从来没有阻止羊毛的出口；即使它有可能导致这样后果，程度也肯定是较轻的。对布出口税收的税率是 1 先令到 2 先令 9 便士，也就是按价征收1.5% ~4%的税，并不比自由贸易时代的 19 世纪征收的印花税和注册税高出多少。各种进口品要支付每英镑 3 便士的税，通常还要加上 1 镑抽 1 先令的税。对进出口产品征收的额外税加起来是很小的。地方税，比如对船只征收的靠港税或对商品征收的过境税，一地与一地各有不同，总的说来，税收对远程贸易打击较轻，这并不像从地方税收单上显示的那样。在 13 世纪的辛克港口（Cinque Ports），对它们最重要的进口品葡萄酒征的税从每桶 2 便士到 4 便士不等。在南安普顿，征税的标准是 1 镑抽 2 [185]便士；在温切斯特，对羊毛的税率是每英担征收 1 便士。但是在所有这些港

口，大多数来自英国其他城镇的商人和商品由于持有王室特许状而免除了地方通行税，或者根据城市间的协定减免一部分。但在像扬茅斯那样的港口，免除并不普遍，地方税有可能从每块布2便士，到每桶葡萄酒4便士，对鲱鱼征收的最低：绝不是一个过高的标准。毫无疑问在以征收地方税为手段来加强对本地居民控制的外国港口中，税收有可能比英国港口高得多。在从各葡萄园通往波尔多港口的各条通路上，对过往行人征收的各种税是如此之高以至于阻止了他们从生产者手中直接买酒。但是波尔多本地的关税并没有高到阻碍葡萄酒的出口。

远程贸易所缴纳的绝大部分税收和过境税不像地区内贸易那样重的确事出有因。在权力中心过多且彼此不协调的地方，比如在莱茵河上，征缴的税收的总量实际上可能超过国际贸易所能承受的限度。然而，即使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税收高得超过了这种限度，贸易也只不过是改道而已。

其他的贸易通道总是存在的。考虑到对中世纪贸易线路有那么多的误解，重要的是只要记住形成一条线路的不是它的物理性质——铺的是柏油或是不动的铁轨——而是一个各方面方便条件的综合，主要是政治和社会条件：沿途居住和贸易的便利，安全的保证，最主要是在关税和其他各种税收方面的相对自由。地理和物质的条件当然很重要；高山只有走关隘才能通过，河流只有经过浅滩或可通船的地方才能跨越。一般说来，中世纪运输者尽可能地在可通行的河流和宽敞的古路上穿行，这些路许多是罗马时代建造的，其中许多路段都是由人工修建和维护的。在地理所允许的限度内，人工的便利——比如像桥这样的便利设施——能够被复制并在多处兴建，而且其位置能够被改变。在一个著名的法令集中，查理曼不得不下令说，假如在塞纳河上的12座桥将要被重建的话，他们将被依旧址而建而不能移至新址。在欧洲的桥梁史上，这种情况不止一次被重演，在《大宪章》（Magna Carta）的条款中，规定不是不能强迫任何人在原来没有桥的地点建桥。当我们在后期的司法审理的记录中发现当事人辩护说，正在讨论的桥梁仍然应建在它现在的地方，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证明仍然得保住现有的桥梁，但前提并非是无根据地认可桥址的永久性。【186】

对桥来说是这样，对贸易线路上一些人为设立的社会性机构更是如此。它们能被组合或再组合成一个横跨欧洲表面，由双股、三股、多股线组成的相互联系的纽带。这样在中世纪，在以英国到佛兰德为一边，以地中海为另一边的两地之间，至少有一打以上可以相互通行的路线，商人可以自由地选

择。首先，可以在主要的陆路和海路之间做选择，海路直到13、14世纪晚期法兰西国王采取行动关闭了香槟线路以后才变得重要起来；但后来它们的作用就十分突出了。中世纪最后的一百年里，大量出口到意大利的英国羊毛走的就是这条道路，然而14世纪早期热那亚羊毛进口商在米兰对羊毛缴纳通行费，15世纪米兰的商人在热那亚也要为他们的羊毛交付通行费。在这些陆上线路中，意大利人和其他的与南方做生意的商人大规模地改变了通过佛兰德和法兰西的商路。其中最重要的是佛拉芒河上的主要线路，这些路完全或主要的是走陆路的。13世纪除了一些辅助线路外，有两条动脉——阿拉斯和杜埃（Douai）——穿过佛兰德到南方；在中世纪晚期，从布拉班特到法兰西至少有7条比较重要的线路：那是一个横穿法兰西北部的线路网络，其中大部分在库姆皮埃根和特洛伊斯汇集，从那里辐射开来通往巴黎或所列图（Sauliea）、第戎（Dijon）和东南方的其他地区。马克·布罗克（Marc Bloch）注意到巴黎和奥勒恩斯间的几条线路，但是粗略地考察一下法国内部的贸易就会发现，巴黎和布热斯特、巴黎与里列，巴黎和鲁昂、巴黎和拉让奇勒它们之间都有一些变通的路线，有些是顺着法兰西的主要河流，另一些则主要经陆路。①

同样，从东向西横贯大陆的路线也有多条。像黑尔威格把德意志北部从威斯特伐利亚的杜特穆德到易北河上的美格登堡或巴多维克（Bardowiek）一分为二，并成为通往斯拉夫东部的惟一交通的时代随着12世纪消逝了【187】（假如那时是这样的话）。13世纪和以后的几世纪里，在布鲁日和波罗的海之间至少有4条洲际线路：南部的海路；两条经吕贝克和曼斯泰和斯特林的两条古老的陆路；最后还有经奥德（Oder）河畔的法兰克福的南路。历史学家已经发现在波罗的海岸的德意志港口和东南欧之间至少存在6条主干线；两条向北，一条通格涅兹诺和波森，另一条经卡里兹和弗罗茨瓦夫；南部4条：分别经桑多米尔，经克拉科，经里窝和奥普兹诺；其他的道路网络通往或在波希米亚以远，在匈牙利境内或其周围。②

洲际贸易的可行路线，不管是辅助性的还是竞争性的，如此之多以至于会使许多满怀希望的初学者对列一张详细的表格或绘制一张包含一切的地图

① H. 洛伦特（Laurent）：《法国的荷兰呢绒厂》，第48页及以后.第246~253页；阿曼德·德罗西（Armand Deroisg）：《北欧评论》（1939年），第40页及以后；F. 安伯汀（Imbertin）：《编年史》（1939年）；和M. 布罗克（Bloch）的补遗，上引书第416页。【9】

② 赫希：《条顿骑士团统治下但泽贸易和手工业史》，第178~180页及其他各页。G. 考斯特（Köster）：《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历史研究》，第48卷（1936年），第120页及以后。【10】

的努力归于失败。在这个迷宫里，贸易在必要时要选择它的路线并作些改变。禁运令和特产法的历史是一个旧有的路线被放弃和新的线路被开辟的连续的历史。假如有些贸易干线因过多的关卡和限制被关闭（就如通过法兰西的香槟路线由于法国王室伤脑筋的政策被关闭一样），另一些由于利益各方的谈判达成的自由贸易条款就会被开通。13 世纪布拉班特的早期发展一般归结于布拉班特王室富有远见的商业政策；由于自由贸易条约，中世纪晚期利用从比利时经由洛林的东部干线成为可能，这些条约从 14 世纪的 50 年代一直持续到 15 世纪的 60 年代都没有中断，尤其重要的是米兰和哈布斯堡的鲁道夫之间着眼于减免从巴列到布拉班特的通行税和各项费的协议的达成。威尼斯商人一度开辟了经过纽伦堡的通往阿尔卑斯山的巴伐利亚商路，把它作为到达法兰西的另一条路线，这条路也是由王公的减免苛捐杂税和准许更大的商业自由的协定而产生。

远程贸易的自由因而在本质上是路线选择的自由。因此，它也是不完整和不稳定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比不上维多利亚自由主义的蜜月时期欧洲所享有的真正的自由。因为不仅新选择的路线有时比被迫放弃的路线花费更昂贵，并且整个交通缺乏持久和稳定性而且它经常是不安全的。贸易所依【188】据的政治状况经常会改变，王公的手段和目标经常是不负责任的，尤其要命的是战争往往会随时爆发。战争对贸易的破坏性影响不可低估。在各地，战争需求的刺激也许为贸易的某个分支注入了膨胀性的消费；但是总体来说，战争意味着征税、强迫性借贷、通货混乱和物质灾难。与所有通行的观念相反，中世纪的冲突可以与现代全面战争的模式非常接近，因为中世纪的王公，为了战争的战略上和财政上的一时之需，通常也会同样毫不犹豫地牺牲长期的经济的繁荣。与其说仅仅由于被法兰西合并这一事实，不如说是由于菲利普·李·贝尔的战争战略和战争财政损害了阿托伊斯的布业、法兰西的过境贸易和香槟集市的繁荣。正是爱德华的战时财政给英国毛纺业带来了灾难，也给意大利在英国的投资带来了灾难。正是汉萨同盟的战争政策及其意外事故在 15 世纪差点儿破坏了德意志人在东佛兰德的地位。

此外，在战时及战争所涉及的范围内，抢劫和海盗盛行。海盗行动和沿陆路和水路的抢劫有时可发展成一个主要灾难，因此，它现在无疑成了中世纪历史的主题之一。文献的记载充满了由对公海上的船只和货物的抢劫所引发的抱怨、申诉和反申诉，因此，毫不奇怪，在近代对中世纪贸易的记述中，海盗行为显得非常突出。

也许对海盗的注意有些太过。假如在陆路上对商旅队的袭击是经常性的，在公海上的海盗行动就不是这样。一般地讲，在中世纪的背景下，它并不比战争更具有持久的特征。在欧洲的有些地区，在英格兰的西南海岸，在布列塔尼的西海岸，诺曼底的峭壁沿线，毫无疑问还有别的地方，能够发现在海上生活的人们，有时从事海盗活动。但是中世纪历史上记录的许多海盗行为不是常年从事海盗活动的专业的海盗所为，而是有沦为海盗的商人，他们有时是由官方授权的武装私掠船主——他们或被他们的王国逼迫从事这种[189]行为，或者是生意难做时转为海盗的，或者通过海盗行为弥补他们和他们的同胞因敌人的海盗行为而遭受的损失。每当英法之间的战争爆发时，海盗和武装民船穿行于英吉利海峡袭击英法的船只；结果，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实际上差不多有 150 年，布列塔尼和诺曼底这一边和英格兰南部海岸这一边的海上贸易被减为小而不稳的涓涓细流。在 15 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各处的海盗横行，北海乱成一团，在 14 世纪早期，盎格鲁—佛拉芒关系不稳定时，有时会有大规模的抢劫。但在战争并没有肆虐时，在海盗活动的基地以外的地区，海上贸易的主要航线大都是畅通的。

在陆上，惟一真正的补救办法是加强王国内的和平。在王国强大到足够保持线路的安全的时候和地区——就如 11、12、13 世纪的佛兰德和香槟，15 世纪的勃艮第，14 和 15 世纪早期的普鲁士和立窝尼亚一样——商贸在平时和战争时都畅通无阻，这些国家的财富增长是以那些不太稳定的国家和线路为代价的。在德意志，路线的安全有时由于城镇的行动得以加强。中世纪晚期汉萨同盟的往东的路线差不多完全没有海盗和抢劫的危险。13、14 世纪城市间的治安联合行为受限制较多，整体上来说不太成功，由于地方王公的帮助，也偶尔在西德意志的河流沿线发动反对江洋大盗及捣毁他们的老巢的斗争。

但在公海，贸易的安全差不多是商人及他们船主自己考虑的事情了。在公海航行是非常昂贵的，而且经常要沿着既定的路线行驶，他们的船一般都有护航队。英国的羊毛航运由精心组织和控制的两支很大的护航队护送，每年有两次。德意志和荷兰到布尔讷夫运盐的船一般也结伴而行，航行到波罗的海的英国运布船也是如此，在西方和但泽之间定期往来的普鲁士和荷兰的船只也一样。这个体制肯定是有效的，因为很少有大护航队的船只遭抢劫。航行到英格兰和低地国家的威尼斯船队遭抢劫的事一年也几乎没有一件；从[190]英格兰主要羊毛港口出发的大的羊毛船队也没有遭抢劫的；在所有的从大西洋经狭海（Marrow Sea）到波罗的海的大船队中，第一次被袭击是在 1449

年汉萨同盟的海湾舰队遭英国人抢劫。简而言之，海盗比起其他的贸易骚扰来是中世纪贸易的一个更为明显的特征，仅仅是因为中世纪特别倾向于战争。在和平占得上风的时代和地区，贸易也就畅通无阻了。

4.1.4 交通

不管是在战时还是在并非特别危险的线路上，道路的危险性必须加入到贸易的成本中。但是在大部分年份特别是在和平年份里，它们绝不是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也不是流通的高支出的原因。商业销售肯定是一项昂贵的服务，但是——通行税除外——成本的主要成分无疑是运输。运输并不像有时被描述的那样原始，但是像前铁路时代所有的运输一样，它需要大量的时间、设备和人力。

在陆路上，商品由马和牛来运送，但不一定是大量货物。中世纪英国和别的国家的搬运服务由两部分组成：马的驮运（实际上有时用人背）和马车的运送；但是英国庄园的记录使得这些问题更清楚，对大宗货物或者长途货运来说用的是马车，假如合适的话就用船。在有些地方，比如过山隘，驮畜也许是惟一可能的运输方式，13世纪末期热那亚和爱斯提的商人穿过阿尔卑斯山到香槟的贸易显然利用了马。但是一般而言，大小不同的各种马车队构成了中世纪商队的主体。13世纪佩让恩（Péronne）的贸易关税表明，地方贸易是由搬运工人（*colliers*）——中世纪的苦力——来进行的，他们推着手推车和其他的小型的交通工具；有些地方贸易用驮马。但是大量的贸易运输是由一种两轮车（*bronnette*）完成的，根据1327年的记述，它能够装一包，也就是13块布；还有四轮的厢式小车（*carrette*），它的载货量是两轮车的2～3倍。

佩让恩的马车与农民在农业中日常所用的工具并没有什么实质差别，因此，农民的手推车是中世纪交通的主要手段。在所有保存下来的地方上的大宗货物交易记录中，特别是石头、砖、木材和木炭之类的货物，都能发现他们是用马、马车或者牛和牛车运输的，一般雇用和征召附近的农民去干这些事。但是农民的车驾，按它的特性而言是季节性的，不能满足全年贸易的需要。因此，并不奇怪的是沿着主要交通路线的正规贸易常常掌握在专门从事运输的人并且是公共运输的人手中。英国史料记载着13、14、15世纪旅行各地从事公共运输的人的状况，他们从南安普顿到温切斯特和牛津；从科茨沃尔兹经陆路和河流到伦敦；从中部山地到剑桥（Cambridge）附近的斯托 [191]

桥集市；从温切斯特和牛津到约克郡和泰恩河上的纽卡斯尔。在伦敦那样的城镇里有一种“手推车经纪人”的职业，他们在推车者和货主之间充当中介。有时，整个的农村地区以推车运输为业。14世纪中期，从佛兰德到巴里转运羊毛者大部分是阿尔萨斯人（Alstians）和萨诺伊斯人（Saarois），在通往南部的布拉班特线路上往来的主要是来自洛林的车主，贝尔恩的车主则大多往来于图鲁兹到大西洋海港的陆上运输线。

如果道路像18世纪的阿瑟·扬所描述的那样难以通行，用车进行的贸易就不可能很普遍。按照现代的标准评判，那时的道路差得无可比拟，许多地方道路只是泥路，天气不好时无法使用。但是如果下结论说，每个国家的道路都是“自然形成和得以保持的”，或如博识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所认为的，中世纪的道路只是很简易的路，难以把田野和田间小路分开，那么这种概括有点太低估了。① 布罗克所引用的很早的某地方的例子也许是真实的：在佛罗都德的故事中的乡村道路，圣西奥杜尔夫是不让其被犁耕的。但另一面，在13世纪的柴郡（Cheshire）这种说法在哪怕一条道路上也不适用。因为，当该郡的罗伊尔奇斯特修道院建修道院时，农村的马车从8英里外的爱丁斯布里采石场运石，跑了成千上万趟，许多马车夫每天都奋力来回两趟——大约30英里的路程——有时要连续地进行几个月：那还是冬季。

这种概括对主要路线更是不适合。人工平整和排水（drainage）的主干【192】道并不普遍；由人造碎石铺就的路面肯定十分稀少。然而，通往许多城镇的道路经常被铺平，在广阔的乡村，人工路基也常有发现。论起源，它们大多是罗马时代建的，尽管中世纪道路做了许多改变，但只要有可能，罗马时代的道路仍在利用。在英格兰，古罗马的道路是中世纪道路系统的主流，在尚存的14世纪地图上的主要道路与10世纪或更早期没有多大差别。就这方面来讲，它们与4个世纪以后的道路也没有太多的不同，这些道路的路面是否更差也并不一定。除了中世纪手推车普遍比后来的马车更轻外，这些道路的地基比18世纪“更新”。金属车轮很少使用，伊丽莎白时的立法者认为，那种车轮对路面的破坏性很大。②

---

① C.T. 弗劳尔（Flower）：《中世纪法律中的公共工程》，第2章，第16页（塞尔登出版公司，第11卷，1923年）。【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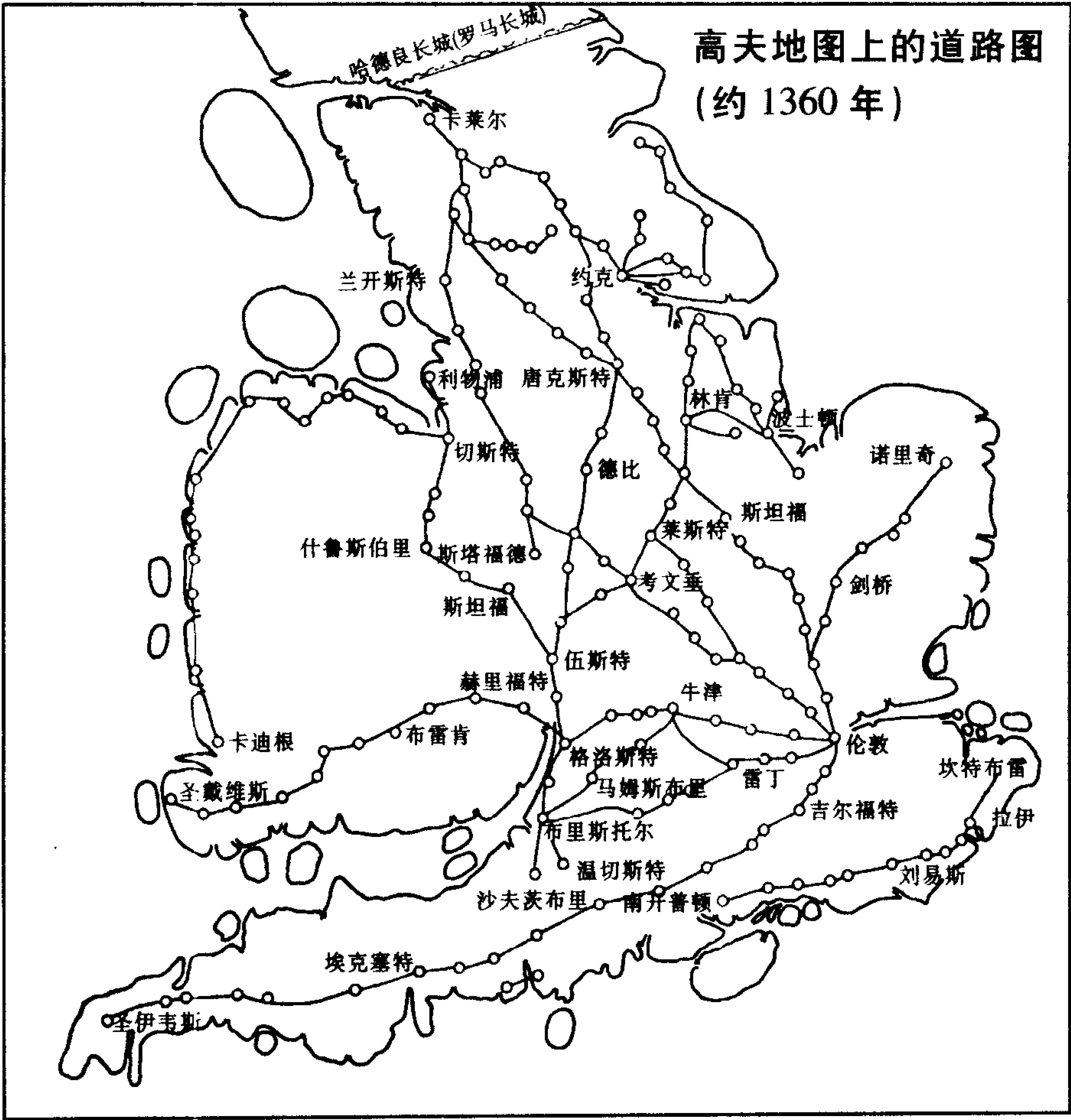
② K. 兰普雷克特（Lampreeht）在他经过详细考证了的有关莱茵河道路的附录中［《德国中世纪经济生活》，（莱比锡，1886年），第2卷，第236页及以后］强调了中世纪早期继续对罗马道路的使用；但是这些证据并不支持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水道代替了罗马道路这一结论。【12】

有可能在英国、法国的部分地区和低地国家，路面的平整和干湿程度维持了一个较好的水平，远远超过仅是一条小路的标准。在许多欧洲国家，道路立法和道路检查是不规则的，处于初步阶段。然而，像马克·布罗克所认为的那样，说道路没受到特别的立法和控制并不完全准确，即使在法国这样的国家也是如此。地面公共事务立法观念在13世纪已是法国立法理论的一部分，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它并不被非常地重视。在英国，留存的资料更加丰富，它包含无数的对破坏和侵蚀道路或忽视维护责任的犯罪行为的指控。这些指控不仅是道路失修和被忽视的证据，而且也是维护它们的法律和行政条文的证据。因为，在民法中，就像布拉克顿所定义并由王室法庭实施的一样，对王道（King's Highway）的定义不仅包括军事线路而且包括通向港口和集市的所有道路，对它们的破坏和阻塞是反对国王的犯罪行为。而且，法律和习俗把维持良好的可通行的秩序交由领主和城堡主负责。

法律并不总能实施，这也许被视作当然；在某种时候，法律和执行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在英国，道路的维护工作一般局限于排水和维护水沟，除非是涨水或被阻塞时，否则道路不能认为不可通行。而且，14世纪晚期和15 [193] 世纪，这个系统是与封建采邑和封建赋税连在一起的，有可能受到劳役抵偿金和地主普遍地削减他们的投资的影响。皇家护城和护堤官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阻止了桥梁和主要海堤和城墙的坏损，但是不能期望而且实际上也无法指望对道路进行一种有效的全国控制。

然而，假如在有些方面，日常实践失去法律理想，而在一两个方面，法律理想有时又没有赶上实际成就。许多城镇铺设它们的道路，并且征收一种特别的铺路税。通过荒原和沼泽的道路通常包括堤道、路基，这样就会花费大量资金去建造和维护。波士顿附近的经由荷兰的桥的堤道由30座桥组成；通过加拉斯通布里附近塞奇默的道路是由石头建成的，其地基是由橡木梁支撑的灌木和榿木枕木。

有些道路工程是由王室主持的。法国国王有可能忽视执行道路立法，但是，英国13世纪的材料保存了由王室自己从事的道路和桥梁工程的记录。在英格兰，王室在准备军队远征时经常从事大规模的工程，就像1277年那样，罗吉尔·摩特姆被任命扩大和拓宽通往威尔士的道路和关隘，1283年，皇家特遣队受命把通往威尔士的关隘加宽到一箭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道路工程都是国家努力的结果。宗教机构、市政府、领主和私人赞助者都做出了贡献。荷兰大堤实际上是由一个宗教团体完成的；加拉斯通布里堤道实际上是由另一个宗教机构维护的。在1398年通过日德兰半岛的斯特克里兹运河



[194] **地图 2　高夫地图，复制于《英格兰历史地理》**
（H. C. 达比主编，剑桥，1936 年）

是吕贝克支持陆路交通用以与经松德湾的海路竞争的努力的一部分。同样，1332年，繁忙的根特镇忙着修复通往巴黎的森里斯区的道路，它被修复成原来的样子，这是一个依靠通往法国的交通路线的社区出于自我利益的有远见的行动。历史没有保存那些无名砖石匠（有些作者认为他们可能是金属匠）和赞助人的名字，这些人到1237年建起了一条穿过绍勒讷(Schöllenen)峡谷的道路和桥梁，从而开通了哥特哈德关，这样就开通了一条连接意大利和欧洲的新线路。但是，所有欧洲国家的文字都提到了以遗嘱或其他的方式，为建设和改善交通的几十甚至几百项慈善捐赠：这些捐献对欧洲主要交通系统起的作用像市政府和王室所起的作用一样大。【195】

大体上说来，与桥梁和堤道有关的私人的事业和私人的善行如此之多，以至于一个公共工程史学家得出一个结论：尽管罗马人都有道路意识，但他们打算从河流的浅处过河，中世纪人与他们不同，他们主要有桥梁意识。该作者引用桥梁在古代封建义务中所起的作用，也经常提及一种为维护桥梁而征的地方税。[1] 假如他愿意的话，他还可以引用英国建桥和修桥的证据和严格地实施维护桥梁的法律义务的史实。如果说这种概括有某种道理的话，那也许可以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罗马人在利用牵引驮畜方面的低效率联系起来。罗马人用马背运送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货物，而中世纪用的是马车。

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大部分桥梁，首次被提到是在12、13世纪，这说明在那个时期完成并完善的地方道路系统补充了古罗马残留下来的服务于中世纪经济和社会的特定需要道路网。地方道路系统的发展与农村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清楚的：中世纪欧洲的无数的地方道路与经济发展的普遍运动相联系，主要是因为它们服务于经济的目的。

其他可以用来替代车轮上的交通的主要方式并不是驮畜而是驳船和轮船。各处都有史料说明短途海运一度变得出奇的贵，但是一般而言，中世纪和现代一样，水上航运比陆上更便宜；这正是为什么水上航运能够承受那么多的国家重税的原因之一。大宗货物比如木材和煤的长途运输只有通过便宜的水道运输才合算。矿煤被称为“海煤”，这不是因为它是在海边开采而是因为它经河和海来到南部的。水运费用的低廉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英格兰的东南部，从波罗的海和挪威进口木材比从中部山地的西北进口更便宜，它也解释了在建筑英格兰南部的教堂和监狱时为什么要从诺曼底进口石材。【196】

① C.T. 弗芳尔：《公共工程》，第19页。【13】

尽管中世纪的船只较小并且航海方式昂贵，海运仍然便宜。中世纪航运一般是沿海岸航行。不知是因为航海主要靠测深，还是因为公海被认为是危险的，船主喜欢紧紧地依岸而行。只要有可能，他们就离开海沿着内陆水道航行，荷兰作为一个贸易中心对中世纪的海员来说十分重要，他们喜欢从东到西航路上的河流和运河上的较浅和受保护的水域。沿着相同的航路向东和向西，只要有可能的话，船员就在海岛之间和看得见陆地的浅水区域定期往来。只要这些办法还在通行，海运肯定就相对昂贵，因为它在海岸线被陆地中断的地方总要重新装卸货物。吕贝克和汉堡（Hamburg）是从布鲁日到但泽路上的两个半路装卸货物的地方。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和鹿特丹是荷兰水运的两个终点，也是另外两个有相同功能的港口。在像布鲁日这样的海港，正好位于被淤泥充塞的河口，有大量的重新装卸货物用的驳船。起重机——它们在大量的港口中都能被发现——减轻了劳力的负担，但是并不能完全取代人力。

随着中世纪接近尾声，航船的大小和航海的方法可能有了改进。还没有谁完成过中世纪造船史，虽然我们对中世纪船只的技术史知道得较多，但仍然是不完整的。但就目前的知识得出结论，显然在中世纪晚期比早期更多的建造了轻快商船，鱼鳞式外壳的船只被逐出航行北海的主要贸易线。热那亚和西班牙的大帆船，虽然未必是一种更大的船，但却是一种更快的船，自东向西并不常超过佛兰德和南英格兰的港口，但到中世纪末，它主导了英格兰的西部路线和地中海的海上贸易。而且，在中世纪的后期，威尼斯大划船一年一次来到南安普顿和布鲁日。但是北方海上新商船的主流仍是速度较慢船型较大的本地船只。英国运羊毛的船只与荷兰和汉萨同盟运葡萄酒的船队，航行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它们是典型的较小的比较笨的船只，经常承担一二【197】百吨（有时达到四五百吨）的运量。

不管是由于指南针的广泛使用还是对航海要素知识的不断增长，中世纪晚期的海员比以前更经常地到公海上去航行。那样的航行，自古以来只是爱尔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英国商人到冰岛去做生意时偶尔为之，但从经济的角度看，不完全是靠海岸航行的最重要的事实是绕过松得海峡通往波罗的海的道路，它也许是由西兰岛的海员在14世纪中期的某个时候开通的。直通的航路和更大的船只有助于船费的降低，正是靠着降低的船费，荷兰人在15世纪中期建立了他们的海上霸权。

除此之外，还有内河航运。内河航运的典型是易北河以东的国家，更多的是奥德河（Aude，river）以东的国家——立陶宛、波兰和加里西亚。在

西斯拉夫人中，整个社会——村庄和地区，依靠宽阔、缓慢的河流为生。在几个世纪中，立陶宛和斯拉夫农夫和渔民发展了一种非常适合于木材和其他大宗货物航运的河运系统。通常的航运是由一种木筏——斯拉夫木筏——一个大的木材平台能够搭起临时性的帐篷，装载大量的货物和大批的木材。因此，东部河港像托恩、考那斯和布里斯特—里托维斯克有很重要的意义。在东欧的贸易记录和德意志和斯拉夫王公的贸易协议中，河流和堤堰的重要地位很明显。

有疑问的是西方的河流是否也一样重要，但是它们的确在各处形成了横穿大陆的航线的重要通道。塞纳河是法国西北部的一条重要的贸易干线，是主要的谷物航运河道之一，并主要由巴黎和鲁昂河边贸易者的竞争性的公司所控制和提供服务。萨穆河和奥斯河在谷物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在前面已有提及，斯海尔德河和默兹河自古以来就服务于佛拉芒人的贸易。有时，欧洲的许多大河，比如德意志的莱茵河、美因河、威悉河和易北河，法兰西的卢瓦河、让恩河和加龙河承担着大多数繁重的远程贸易的任务。如果说他们不总是如此的话，如果说尽管水道更经济，而贸易有时却倾向于远离水道，那么问题就在于那些以攫取通行税为业的领主。已经有资料表明河流通行税有扩大的普遍趋势，也表明有时有些河流，主要是德【198】意志的河流，几乎被商人和船主抛弃。然而在中世纪晚期它们并未被抛弃。贸易减少了，但从未停止。

在英格兰，河流比欧洲其他国家更自由，它是英国路线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泰晤士河、利河、斯涛河、湾河、塞文河、爱文河、汗伯河、特伦特河、约克郡奥斯河、威森姆河和其他的河流都是延伸到内地的繁忙的贸易干线。虽然在15世纪，科茨沃尔兹的羊毛一般由驳船运往向西不超过亨利（Henley）的地区，但沿泰晤士河一直可以航行到牛津郡。诺丁汉通过特伦特和汉伯与海相通。与奥斯和福斯戴克（Fossdyke）相连，特伦特形成了一个从约克到波士顿的水上网络。汉伯也是一个巨大的水上服务系统，服务于远至约克和贝弗利的地区。其他的更小的河流和它们的河口都与主要河流相连接，这标志着英国的内陆港口在中世纪繁荣起来。

在英格兰，在佛兰德，在德意志北部河流最北的流域，水路基本上得到连续有效的维护。在我们读到的资料中，当然有过磨房和鱼堰阻挡了水路，还有那些被允许修建的泥堤，但一样有疏浚河道和对堤坝的修理，还有对忽视照看水道和阻碍河道的行为进行的处罚。实际上，在英国，频繁的抱怨表明，中世纪人希望从水道上得到什么，也间接证明了人们对他们发现的交通

便利条件的使用。但即使在英格兰这个河流利用较好的国家，大多数的贸易是通过既走陆路又走水路或主要是走陆路的方式进行的。然而这并非仅仅是因为水路可能被忽视或被阻塞。河流的流向并不总是贸易进行的方向，甚至对那些走水路的商品来说，或许还需要走陆地支线。弯弯曲曲的河流也意味着走水陆比走陆路要长，在某些水域内，航行也许受洪水或浅滩或河岸变化不定的限制。这些困难加上水上航行本来就缓慢的速度（尤其是逆流而上时），使得走水路特别费时间。在陆路和迂回的海路之间，也许人们更多地选择陆路。因此，在中世纪晚期，南安普特和伦敦之间大部分的货物转换是经陆路，但是这种对陆路的依赖没有阻碍伦敦成为最大的对地中海进行贸易【199】的外港。回过头来看，中世纪贸易在交通方式方面似乎非常多样——公路、海路，河道。画在地图上的这个网络也许比实际上更突出，因为对运输系统的最终检验不是靠它在地图上的密度而是靠它对成本的影响；成本无疑要比不明真相者眼中密集的路线和准路线所显示的要高很多。平均成本实际上是多少？历史学家无法做许多猜测，但是即使能够做这种猜测，是否值得去做也值得怀疑。中世纪贸易成本最鲜明的特点是它的无限变化性——它的这种变化性使为系统整体找到一个平均值的努力遭到扭曲或误导。只要稍微地考察一下运货和各种收费就会发现，在完全相同的时间内，相同长度的有着类似自然性质的路线上，价格方面也会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不利于贸易的时间和政府提出不利条件的路线上，各种收费可能非常高，实际上是使人不敢问津的。当然，不言自明的是这种高昂的费用不能用来代表沿主要交通路线的平均价格，因为在课税严苛，或者交通条件很差或者由于战争和海盗的活动而不适于开展贸易的路线上，商人是很不活跃的。取而代之的是，他们频繁走的是那些航运相对容易和便宜的路线。从理论上说来，要是商人的路线选择没有限制，要是潜在的贸易路线得到使用，有可能使贸易的实际成本要低得多；但是，实际上，在中世纪贸易的主要航线上来往的商人，在绝大多数时候寻找的路线是价格相对便宜的，或者至少没有昂贵到超过生意人的对边际效益的追求，没有对商品的供求造成严重限制。

汉萨的几个城镇残存的几个航运价格的数据表明，中世纪后半期的运费非常低，河运因关税和各种通行费太重而受阻时，把谷物贸易转向陆路完全有可能。相同的结论也可以从英国的材料中得出，而这些材料能充分地更近乎统计地证实这种看法。庄园的表册和其他的遗留下来的记叙表明，在农村，马车的存在使得运费较低。1278 年，一次代表国王的从鲁丹经奇斯特到麦克尔斯菲尔德的漫长而昂贵的运输，大约走了 70 英里，平均价格是每

辆两匹马的马车每天6便士。别的地方的平均价格是每辆马车每天3便士到4便士。索罗尔德·罗杰斯估计由普通搬运工进行的长途服务，还要承担货物受托人的法律责任而且必须进行装货和卸货，来回一趟运费是大约每吨每英里3.5便士。但是农民的马车的价格比这要低得多。根据索罗尔德·罗杰斯的说法，农民的马车在中世纪任何时候都能雇到，如果一天一个来回的话，那每吨每英里的价格是1便士，即使在16世纪价格革命后，价格也并没有太大提高。一个地方历史学家收集了15世纪的诺福克（Norfolk）地方马车的价格，而这些价格往往比索罗尔德·罗杰斯价格还要低。根据这个费率，14世纪中期50英里以上的运费（如果是羊毛的话）达不到货物价值的1.5%，谷物大约是15%。 [200]

如果顺着已建立的和常规的海上路线航行，运费则更便宜。15世纪，一桶加斯科涅葡萄酒运到荷兰或爱尔兰费用大约是每桶8先令，不到它在波尔多的出厂价的10%，在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运费相对于出厂价的比例较一个世纪前要便宜。15世纪从伦敦到加来的羊毛的航运成本包括护航费大约是每袋4先令，也就不到伦敦或多佛（Dover）的出厂价的2%。然而，从纽卡斯尔到南部，比如说到低地国家，一船大约400磅的煤运费是2先令，因为一船大约200吨的货物（其中大部分是贵重物品），在15世纪中期从卑尔根（Bergen）罗普—祖姆到伦敦，运费大约是20英镑，也就是每吨净重所费是2先令。

这样的费率并不是很高，这可能较充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按照现代标准）在那活跃而基础较好的贸易线路上（比如英国羊毛出口到低地国家或者加斯科涅葡萄酒出口到英国）销售利润并不是十分高。根据现存的羊毛合同和15世纪的一份契约［维特斯的诺姆布雷（*the Noumbre of Weyghtes*）］中的数字，有可能估算出羊毛从生产者到国外购买者这一过程中转手的平均费用。总的包装成本、从中部山地运到伦敦的运费、关税和津贴（后者以较低的英国费率计算）达到每袋大约2英镑13先令4分。此外还必须加上从伦敦或另一羊毛港口到加来的运费，包括护航费（这在15世纪的后半叶达到每袋4先令，大宗的货物不到两袋是6先令8分）。在15世纪后半叶，英国出口者出口一袋高质量科茨沃尔兹羊毛的平均成本是8英镑，这样整个花费将到达内地价格的40%，而运到加来的成本就达到11英镑了。一袋科茨沃尔兹的优质羊毛在布鲁日和加来的销售价会在12~13英镑间，这样，优质羊毛的名义利润（nominal profit）就是每袋1~2镑。由于重量和损耗 [201]

的差异而形成的各种津贴和额外费用也组成了隐性的赢利的部分。[1]

也有可能较精确地估计出加斯科涅葡萄酒的销售成本。我们知道，在14世纪后半叶，波尔多附近的葡萄酒价格是9个里弗，5里弗用于购买葡萄、造酒和经纪费，1里弗10苏用于到波尔多的运费，2里弗10苏用来支付关税（波尔多的商人和特权商人可以免除这项支付）。到英国的南部和东海岸港口的运费在每桶2里弗10苏到5里弗之间，还须在英国的港口付各种赋税达1先令6分。这样，在英国城区的价格达到14里弗（也就是5英镑），加斯科涅葡萄酒在伦敦的批发价不会超过这个数字。考虑到路线的长度和葡萄酒从加斯科涅的生产者到英国葡萄酒商间要几经转手，附加费绝不会像后期葡萄酒贸易所盛行的那样与航运和转手成本不成比例。[2]

对北方贸易的其他“常规”项目的考察也许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波罗的海的木材、斯堪尼亚的鲱鱼、布尔讷夫的盐。15世纪前半叶，但泽的盐的价格一到盐湾舰队的船上就是原来的两倍，在英国1449年袭击盐湾舰队时，商人宣称这是布尔讷夫盐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它与来源于萨克森和其他附近盐矿的盐在价格方面竞争。航运和转手的花费显然不是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202】 另一方面，没有享受相对自由和便宜的交通路线的贸易，有时由于路上的大量花费而缩减。而且即使是受惠的贸易，比如英格兰的羊毛或是加斯科涅葡萄酒的贸易，战争和贸易冲突也有时会阻碍正常的贸易渠道，因而大大地增加成本。但在正常年份，比如在15世纪的头20年，在英格兰的各港口，波罗的海的木材的价格也是其在波兰产地的两倍，在1437年和1438年，当英格兰和但泽间的贸易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中断后又重新开放时，在英格兰的价格是非常高的，航运成本和利润不是一般的高。壁板（wainscoting）在波兰每100件不到2马克，但到了但泽就是5马克了，到扬茅斯就是24马克了；造弓的木棍（bowstave）在但泽每100件是14马克，但到了英格兰就是51马克；厚模板（plank）在但泽大约是10马克，到英格兰就成了35马克。[3] 同样地，在15世纪中期和后半期，英格兰和加斯科涅之间的关系由于战争和法国的占领而被破坏，加斯科涅葡萄酒就不得不绕道中立

① “*The Noumber of Weyghtes*”，大英博物馆 Cotton，Vespasian E. ix；E. 鲍尔（Power）和 M. 波斯坦（Postan）：《15世纪英国贸易研究》（伦敦，1933年），第70~72页。【14】

② R. 保图克（Boutruche）：《单一社会的危机》（巴黎，1947年），第151页，注1；佛朗西斯科·米歇尔（Francisque Michel）：《波尔多海上贸易史》（波尔多，1867~1870年）第1卷，第123、127页。【15】

③ 赫希：《条顿骑士团统治下的但泽的贸易和手工业史》，第8章。【16】

国和中立的中间人，航运和转手贸易的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极大地降低了在波尔多和英格兰的价格，实际上把英格兰的葡萄酒贸易降低到没有实际价值。即使在英国的毛纺业中，成本在别处都不像从羊毛生产者到加来的批发商的线路那样低。这样，15世纪把羊毛送到意大利的意大利商人和英国商人会发现交通和其他的费用很高。开始，在英格兰的意大利商人为了躲避加来的特产法，必须偷偷摸摸地进行贿赂以得到许可证，也不得不支付高得多的出口税。航运也是更贵。根据15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对国王花费的记录，运到意大利的国王的羊毛，由大划航运到威尼斯的每袋费用相当于3英镑3先令4便士——这比经陆路费用要低得多——对出口者来说每袋羊毛整个成本大于14英镑。那时在威尼斯出售的羊毛大约是每袋20英镑，每袋赢利5~6英镑，比路途较短和路线更安全的本地产品赢利要多得多。

总之，中世纪的交通，像其他的贸易活动一样，受不稳定及不确定的政治局势的影响比受运输服务的低效所要付出的代价要大。尽管运输服务是无效率的，对人力和其他的资源造成了浪费；但是中世纪的工业和农业也是如此。按照现代的标准，商品的制造和种植费用要比它们被送到消费者手中的费用高得多。更抽象地说，在中世纪，贸易成本相对于整个成本的比值可能比现在要低，这不过是说，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对经济的促进要比相应的交通和运输的改进要大得多。假如是这样的话，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中世纪人发现贸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也解释了为什么贸易在中世纪的经济中起那样大的作用。假如能够加以显示——这似乎是可能的——在中世纪末期，地方税收、战争和海盗变得更混乱，更难控制，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中世纪贸易的一些长期性的趋势。这些趋势将是我们在这章的后半部分要讨论的内容。【203】

4.2 扩张时代

4.2.1 起源

一般而言，进入北方贸易是地方的农产品和工业产品，通常它们的买卖数量相对于当时的生产而言是非常小的。从这一点来看，地区之间贸易的主要潮流相差不大，但在地方集市的运作方面却有重要的不同。国际贸易的商

品是大宗的，并且跨越较长的路途，但是区际和国际贸易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线，二者都依赖城乡地方生产的剩余品，都随着人口和生产的总体扩大而增长。

这样看来，解释北方贸易的“起源”并不需要任何与西北国家经济普遍发展本身没有内在联系的特别原因。地区间贸易，像产生它的地方贸易一样，在欧洲社会的历史上或多或少是本地的。史前时期的人们就已熟知这种贸易，中世纪早期的人们没有理由必须重新了解它的必要性和便利。资料已经显示，北欧部落组织在选择他们的居住地时就接受了区际贸易的存在这一事实。否则的话，就难以解释他们为什么故意要移民到莱茵河河岸的水涝的【204】平原、挪威的海湾和高地以及不列颠的沼泽地；也难以解释在中世纪早期大部分欧洲国家出现了专业的牧民、渔民、烧炭匠、制盐工和矿工的专业性的社区组织。当然，有人会争论说，早期的中世纪定居者在后来发展为专业化经济的地区也曾艰难地维持了生活必需品的自给自足。但有些地区——像莱茵河河口的捕鱼区、英格兰北部的羊毛生长区——在中世纪早期就非常地专业化了；地区的专业化意味着地区间的交换。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专业化的社会才是进行交易的社会。有些贸易即使对从事各种耕种业和对高度自给自足的经济都是必要的。因为，无论如何自给自足，在蒙昧时代，大片土地或者西北欧的内陆村庄从来就不能完全独立于外部的商品供应，或者不受内部劳动力分工的影响。几乎没有农村能自己生产盐、铁和自身所需的一切纺织品。而且，不管乡村经济如何封闭，并不是所有的住户都是完全自给自足的。从中世纪最早的几个世纪以来，农村和大片土地上就存在着手艺人——金属匠、陶匠、有时甚至是木匠和织工。在农民耕作者当中，存在着不得不靠卖苦力去赚一点钱的小农，也存在着有剩余物可供支配的殷实的农民。地租通常以现金计算和支付，其历史比历史上最古老的庄园文件还古老；而工资很少完全以实物的形式支付。为了缴租，农民必须出卖他们的产品；不管工资何时开始以现金支付，赚取工资的人都可能在集市上把它们花掉。实际上，一个对中世纪农业的无偏见的研究者不可避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如果没有集市和交易的存在，中世纪村庄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个结论，就其本身而言，带有假设性，但它足以把举证的责任从那些认为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一定的贸易的人身上，转到那些否定它在任何历史时期（与史前时期相区别）都存在的人身上。

就这个意义而言，中世纪贸易根本没有“崛起”过；但它无疑在伸缩。在6～7个世纪的有文件记录的历史中，进入欧洲集市的商品量起落不定；在其他流通地区也是这样。但是，中世纪贸易的地理范围总起来说在地图上【205】比较容易弄明白，北方贸易在数量上的改变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说仍是一个谜。中世纪贸易的数量方面的有关证据是如此稀缺以至于可以毫不奇怪地发现，历史学家仍在它的规模和经济增长的时间方面有分歧。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们仍然认为贸易的发生情况与现存的证据分布紧密地相联系。中世纪早期贸易记录的缺乏被用来说明贸易活动本身的贫乏，同时14、15世纪材料的丰富被用来说明贸易在中断了几个世纪后又增长起来。虽然在处理单个地区时，历史学家有时无法把那些具体情况同这样一个线性发展趋势协调起来，但当谈到西欧贸易的整体情况时，他们一直用一条线来说明商业发展的整个过程，从贸易基本上消失了的蒙昧时代开始稳步上升，一直到贸易极大地丰富繁荣起来的16世纪。

最明显的是这个过程的出发点。历史学家多少有点想当然地认为，蛮族的入侵意味着罗马帝国的经济文明的完全断裂。罗马的贸易突然消失了，随着它的消失，欧洲经济陷入了一个“自然”的状况，对所有的制造和交换一无所知。在后期的梅罗文加（Merovingian）国王的统治下，日耳曼社会被认为进步较快，进行了一些贸易，初步开始了定居的城市生活，但这种前进直到所谓的加洛林复兴时才开始真正地变快。可不久，贸易一度被诺曼人和萨拉森人入侵和9、10世纪的封建混战阻止。但到了11世纪，边界的压力消除了，经济发展和事业繁荣没有中断，一直持续到“地理大发现”时代。

因此，这样画出的线是笔直而连续的——对现在的史学家来说是太笔直太连续了，以致他们无法使自己相信整个欧洲这种连续性的贸易扩张是从中世纪结束的那几个世纪发展而来的，对此后文还会更多地谈到。这种怀疑确有理由。有关起点的旧的看法受到攻击，很可能由于受到两个相互交战的而且没有必要联合的历史派别的联合进攻而被摧毁：这就是多普施派和皮尔恩派。阿方斯·多普施和他的追随者，把他们的论点建立在对文献材料（主要是《塔西佗历史》）的解释和最近的考古材料的基础上（主要是罗马遗迹【206】的开掘），对日耳曼入侵者的原始野蛮性的观念和罗马的物质文明的完全断裂的观点都予以攻击。多普施毫无困难地表明在恺撒和塔西佗之间的150年间，日耳曼社会已经拥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经济文明的绝大多数特性，包括对铸币的利用和对贸易的依赖。他也不相信蛮族人对他们居住其中的罗马帝国的物质结构完全破坏的描述。旧罗马帝国城镇里的生活是衰落了，但并没

有完全消失。梅罗文加时代，继承了罗马的一些商业活动，一直继承延续到把它融入加洛林时代的上升运动中。

但是有为加洛林和梅罗文加时代之间的贸易存在连续性的看法，皮尔恩的梅罗文加贸易的观点与多普施的观点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他也觉得比较容易说明在整个梅罗文加时代，西欧的罗马行省的经济生活没有被中断而是在继续，如果说有所削弱是可以的。同东方的商业联系仍在继续；叙利亚的商人和他们的商品在整个欧洲流通；马赛仍是欧洲进入地中海和黎凡特世界的门户。最终确实发生了一种断裂，但根据皮尔恩的观点，它并不是发生在蒙昧时代的开始，而是发生在加洛林时代。8、9世纪萨拉森人的入侵和穆斯林对地中海地区的统治中断了欧洲与南方的商业联系，然而在北方，经济生活——包括一般的城市生活——在北欧海盗的劫掠和征服的压力下衰落下去了。

因此，两种观点的差异主要集中于加洛林时代所起的确切作用，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论点的主要方面显然是能与8、9世纪的突然断裂的理论相反的。与东方的商业联系和贵重奢侈品的交易也许受穆斯林的征服和那时普遍的不稳定影响。但是经济活动——定居、移民、农业生产——继续扩展；在欧洲贸易的历史上，欧洲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比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削弱更紧要。因为正如上面所表明的那样，北方贸易更多的是依靠北欧自己的生产，而不是依东地中海的条件而定。因诺曼人袭击事件而重现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也许干预了各种经济活动，但是，最新来自法兰西北部的材料表明，入侵所造成的破坏和毁灭并没有中断像阿拉斯（Arras）那样的城市生活的连续性。在不列颠这一方面，大量的材料不仅表明早期横跨海峡的贸易在发展，而且表明它在整个蒙昧时代所起的作用从未中断。

【207】

然而，不管对加洛林中断的结论最终如何判定，几乎无可怀疑的是，4~7世纪的发展是延续的。在欧洲，在罗马人的王朝和蛮族人的王朝之间没有发生一个剧烈的中断期，同样几乎不可怀疑的是从10世纪末开始，贸易像一般的经济生活一样，进入了一个快速和普遍繁荣的时期。

4.2.2 增长

从10世纪开始，中世纪贸易的发展过程就已能够通过变化的数量和扩展的地理范围两个方面进行追溯。从这两方面来看，贸易一直增长到14世纪的某个时候。中世纪的贸易量和生产量在增长，但是数量的扩张并不是它惟一

的特点。在这个时期，北方经济也可以说形成了，因为在这时它的单个的地区、它的贸易路线和它的商业联系，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单一的贸易区。而且，在这段时期内，贸易区逐渐地向东扩展，把整个中欧和东欧包括进去了。

贸易量的不断扩展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它是如此地普遍并包容了一切，以至于对它的人口和农业的发展历史的一段叙述，比对范围狭窄的贸易史的一部分的叙述更容易一些。因为，农业和定居所能表明的扩展迹象最为明显。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自13世纪开始，庄园的档案能提供出类似的统计数据的信息，产量的增长至少可以向前追溯一个世纪之久。但在别处，就像在1209年温切斯特主教辖区的土地上一样，产量在13世纪早期就那样高，以至于历史学家能透过这些后期的数据，辨明11世纪及此前更早的增长的大致轮廓。

我们所知的11、12、13世纪的遍及西北欧的定居点和人口情况可以极大地加强这种印象。英格兰和易北河以西的大陆很快就住满了人。在英格兰，把《末日之书》（Domesday Book）中的人口数据与12世纪和13世纪早期的庄园调查作比较，将后者与1279年的《百年手册》和更后的庄园档案作比较（虽然那样的比较肯定是粗糙且比较容易的），将表明农业资产极大地丰富了，可耕地迅速增长。法国的材料绝大部分是修道院的，来源于10、11世纪的勃艮第、诺曼底和其他地方；德国材料来源于莱茵河流域、威斯特伐利亚、萨克森和荷尔斯茵的南部；尤其重要的是来源于佛兰德的材料告诉我们，相同的人口增长和耕地扩大的事实。【208】

到12、13世纪之交，这个过程发展到足够充分，使剩余的人口打破到此刻为止古老而且人口相对过密的土地的界限，涌到易北河以东的新的“殖民地”上。在各处——像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的阿拉斯、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的佛兰德、可能还有12～13世纪之交的香槟部分地区、在13世纪的德意志西部的部分地区——人口是如此充足以至于要通过普遍工业化来解决经济问题。后面将要说明，在这一时期大部分地区工业将崛起——阿托斯和佛兰德（也许还有香槟）的布业，科隆、列奇和迪南的金属业；英格兰、海诺尔德、东法兰西和南德意志的铁、煤、铅和锡。但即使在这一时期，工业化的欧洲地区城镇由于农村的剩余人口也得到了巨大的和不断加强的增长。

整个西欧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城市化的。在整个大陆，大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它们中绝大部分在这一时期增长很快。在佛兰德和北欧，现存的地貌材料（主要是早期地图）揭示了中世纪城市

扩展的主要阶段，表明了不断扩大的定居区怎样将郊区包容进去而使之成为市镇区，并通过城堡的不断扩大而扩张。在别处，特别是在英格兰和法兰西的中部，城市成长缺乏一手资料，但是依然有说服力。在这时的农村记录与文献资料中，城市被认为是充满机会的地方，农奴可能逃到那里去寻找自由和财富。在11、12、13世纪的绝大部分较大的城镇，机会几乎是无限的，这间接来源于普遍的移民自由——这种自由直到中世纪很晚的时候还没有被【209】加以规定和限制。

农业和工业的产量增加，人口的增长，必定导致贸易的扩大，也足以导致贸易量的扩大。其他的有利发展更纯粹的是商业上的，更直接地与贸易进程相联系，也都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之一——银块的流入——可能在其中起了重要的、肯定也是明显的作用。贵重金属供应的不断增加和它们不断扩大的流通，有时可能影响商品的价格（下面就会详细地讨论到）。它们也不时影响工农业的投资，因此可能进一步刺激价格和生产。

最近，历史学家特别强调黄金作为一种国际结算手段所起的作用。正是马克·布罗克第一次注意到黄金在东西方贸易中所起的作用，也正是他第一次把国际贸易的早期历史的阶段性与世界黄金的分布联系起来。其他的研究者也补充布罗克的论点，说明罗马帝国的国际贸易是多么地依靠自己用黄金支付东方商品的能力。在帝国最后的两个世纪，黄金的供应减少了，罗马对东方商品的购买力也削弱了；然而在梅罗文加时代早期，在西方也可以得到充足的黄金，这就使法兰克的社会可能利用已经开通的与拜占庭和黎凡特的商旅渠道。但随着穆斯林的征服，世界的黄金供应急剧地重新进行分配。穆斯林征服者不仅获得了储备的贵重金属，而且获得了对新开采的黄金矿床的垄断。耗尽了黄金的欧洲与东方的商业逐渐衰落下去。这种衰落一直持续到10世纪，直到千年之交时穆斯林国家才开始进口欧洲的奴隶、金属品、木材及其他的商品，数量之大足以改变黄金的走向。东方的黄金再一次进入流通，东西贸易重新开始，由此，整个欧洲的经济生活恢复了。①

这种论点，不管在细节上有多少值得怀疑的地方，它大体上能得到相当【210】多的证据支持，可以认为是一个解释得通的猜想。然而，即使它能被进一步的研究证明，它仍然不能充分解释北方贸易的进展情况。直接依靠黄金供应

---

① M. 布罗克（Bloch）：《中世纪的黄金问题》，载《经济社会史年鉴》（1933年），第4页及以后。M. 隆巴德（Lombard）：《7～11世纪的穆斯林》，载《经济社会史年鉴》（1947年），第143页及以后。在英国1343年发行的金币被认为是中世纪第一次有实效的黄金铸币，尽管早在数百年前亨利三世就铸过金币。【17】

的贸易只属于来往于东地中海的部分。它们无疑在许多方面触及了北方的经济生活。北欧和西欧作为一个整体现在已可能共享（假如“享受”这个词合适的话）一个积极的贸易收支，结果黄金现在流入许多供应原材料的国家。意大利的弗罗林和达克特，也许还有拜占庭和阿拉伯的金币现在增加了地方货币资源——主要是银——而且开始铸造金币。但是比意大利供应给拜占庭和黎凡特黄金更重要的是不断扩大的贸易所创造的真正财富。绝大多数的财富掌握在欧洲的商人手中，现在能被用来对工业和贸易进行投资。它的主要受益者无疑是意大利，尤其是它的大商业城市，但投资和繁荣从那里辐射到中世纪欧洲的边缘国家，而且也许大陆的每个部分都未能逃脱它的影响。

然而，对北欧贸易的影响可能只是间接的，黎凡特的开发对欧洲原材料和制成品的需求增加相对较小（金属材料是主要的例外）。中世纪早期，奴隶是伊斯兰世界需求最大的商品，假如我们相信最近的研究的话，正是对奴隶的需求启动和维持了黄金从东方的流入。但是奴隶贸易对北欧的经济如果说有所触动的话，其影响范围是非常小的。在蒙昧时代即7、8世纪，贸易大都掌握在犹太人和叙利亚人手中，他们载着货物、穿过俄罗斯、波兰、德意志西部到达西班牙及其以东的国家。他们可能在欧洲各处形成了商业中心；我们知道凡尔登作为一个奴隶贸易的中心，那里的商人居民有可能参加了这种贸易；从西欧整体来看，它仅是一个位于它的领土外围的中转贸易站，并没有带来多少东方的黄金。后来，从11世纪开始，欧洲产的其他商品比如布，向东挺进；从北方进口的原材料被加工为意大利的制成品，出口到了黎凡特。然而这样出口的大陆商品的总量还不够重新调整欧洲同穆斯林的贸易收支，也不足以支持北方的商业繁荣。【211】

十字军东征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吗？十字军是欧洲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的观点，是经济史中被十分重视的观点之一；另一个受到重视的观点是：征服了圣地，北方世界就朝他们得到黎凡特财富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这种观点有多大的真实性以及它是否是有真实性，这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属于地中海贸易的历史问题。但是十字军东征的影响必须在这里提到，尽管只是十分的简短和模糊。

关于十字军东征的经济史著作还没有出现。在它完成之前，在十字军东征的经济平衡得到研究之前，很难说它们的影响到底是加大了意大利和黎凡特的黄金向欧洲大陆的流动，还是相反地耗尽了大陆的贵重金属。更有可能的是，这种黄金的涓涓细流经常改变方向，有时相反的运动使彼此

相互抵消。圣地的占领也许在一开始带来了赃物和赎金，1204年洗劫君士坦丁堡就是这样；另一面，赎金有时必须支付，赃物却转到了穆斯林手中。我们知道单单理查一世（Richard Ⅰ）的赎金就值50 000袋羊毛的价格，比一年的出口还多。类似的，十字军东征并不仅是对西方支付手段的耗尽。派遣十字军的国家用税收和摊派资助他们；参加十字军的贵族在自己的国内用尽各种办法集资，但是主要来源还是从国外得到的贷款。这些集资的办法一定有助于使储存的黄金和白银流动起来，这样就间接地加速了流通，从整体上影响了价格和经济活动。然而，它们一定也耗尽了北欧的整个黄金供应，因为，它把贵重金属从大陆欧洲送往意大利和黎凡特。教会为了支持拉丁国王进行的征税、朝拜圣地的航行、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和医院骑士团（Hospitallers）的军事和宗教活动，必定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增加了大陆与意大利及东方的贸易赤字。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十字军没有刺激欧洲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刺激，正如它实际上产生的效果一样，一定来源于更普遍的因素，绝不仅仅是金银的输入。假如北欧感受到了这种刺激，它必定存在于意大利商人日常的贸易活动中并通过它们不断扩大的商业和财政活动实现。在这种复兴中，金块起了作用，但是并不是通过它在国际结算中的作用而起作用，而是作为国内流通和投资的结果而起作用。这里再一次指出，黎凡特的货币仅仅是一个支流，也许只是一股巨大的流通量中的一个小部分。尽管意大利人给香槟、佛兰德和英格兰带来了一定数量的黄金（主要是他们自己的铸币），但流通量最大的贵金属并不是来源于黎凡特或拜占庭，甚至也不是主要来源于意大利。更重要的是，它不是黄金。

【212】

在整个中世纪，特别是在早期，用于铸币和每月支付的贵重金属是银。北欧的铸币直到13世纪的后半期仍然主要是银。直到中世纪末期白银都居于主导地位。铸币厂的证据，比如英格兰皇家铸币厂的记述和残存的名簿或是城市的铸币厂和货币，清楚地表明白银不仅占了既有货币储量的大部分，而且占了新增加金属的大部分。黄金和金币在国际交换中更普遍一些，这主要是因为黄金更便于运输，在价值方面也更稳定。而且，那时金币的数量很少——主要在意大利——因此也免除了银币因种类繁多而对欧洲的白银流通的影响。因为这些及其他的原因，意大利商人在13世纪的香槟集市清账时或在北欧的其他地区与意大利商人做生意时，倾向于以金币计算的方式支付。同样，英国和法国皇家支付意大利银行的债务，也经常以达克特和弗罗林来计算。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意大利银行实际上发行了相等数量的黄金现

币，而可信的证据表明以金币计算的贷款，比如弗雷斯科巴尔蒂（Frescobaldi）贷款给爱德华一世和巴尔迪（Bardi）贷款给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通常用银和实物的形式支付和归还。在北欧比较活跃的其他民族的商人的国际支付手段中，英镑和马克（英国人和佛拉芒人的货币），无论是作为结算还是作为支付单位被最普遍地利用。因此，即使黄金在国际支付中占主要地位是事实，在北欧它也并非完全取代了白银。

因此，流通的金属主要是白银，12、13世纪流通的白银数量有可能增加了。不能肯定地说这种增加有多大，但显然这种增加有几个方面的根源。一些新的白银无疑来源于新近开发的矿藏。虽然在整个蒙昧时代，银币在欧洲被铸造。欧洲的主要银矿，在匈牙利、萨克森和哈茨山脉（Harz Mountains）以及别的地方，直到10、11、12世纪才充分发展。但是矿藏并不是惟一来源，也不可能是增加的银的主要来源，因为即使在中世纪早期，流通的银币量不仅靠新开采出的矿银，而且也靠对存储的银块的利用。显然，十分可能的是12世纪的经济发展使以前没有流通的窖藏的、匾额上的和装饰用的银投入了使用。这样大量的出窖的银锭组成了白银的大部分，而这可由遗嘱和铸币厂的记载清楚地加以证实。【213】

因此，不管是通过中世纪早期与黎凡特的联系而流入一些，还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流入，输入的金银块不能解释中世纪贸易的复活和增长。其他的一些货币因素也许更重要，但是即使是它们没有也不能起决定作用。它们对贸易的影响一般通过价格水平的变化而传递；而且即使是变化的价格也只有一个有限的影响。

价格问题与货币流通紧密相关，至少在意大利是这样。我们现在知道，在中世纪早期，也就是在13世纪以前，有些价格变化非常大。就是从文献提及它们时起，它们就开始经常变化，也就是英格兰从12世纪中期开始，别的国家从13世纪中期起直到14世纪前25年，食物价格显然在稳定上升。目前只有英国的早期价格的资料得到了收集。总体的收集和排列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但是所罗尔德·罗各斯和后来的贝维尔奇爵士的档案人员和历史学家小组已能够用一种类似统计的方式分析他们的数据。

以百分比来表示，1150年的价格大约是14世纪前25年的30%，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内，价格上涨了大约3倍。而且，价格上涨并不是从1150年开始的，就目前比较少的材料显示，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如果兰普雷克特收集的德意志的西南部的数据可以信的话，从8、9世纪到10、11

世纪，价格稳步上升，并一直持续到13世纪早期，当然它并不如英格兰那[214]样剧烈。然而，兰普雷克特的数据也表明，在12世纪后半期和13世纪前半期间价格至少上升了50%。[①]

这是一次真正的价格革命。然而考虑到它的经济影响，我们不应把它和后几个世纪发生的价格革命相提并论。这很重要，因为这次价格变化的影响并不是普遍或广泛的，对此，我们不得不一再提及。

表4-1　　英国小麦的价格，1160~1339年[②]

(20年平均)

时期	以英格兰货币先令计算的小麦价格（每夸特）	以每格令白银计算的小麦价格（每夸特）
1160~1179	1.89	534
1180~1199	2.60	744
1200~1219	4.33	1 082
1220~1239	4.19	1 047
1240~1259	4.58	1 144
1260~1279	5.62	1 404
1280~1299	5.97	1 491
1300~1319	7.01	1 734
1320~1339	6.27	1 547

农业产出必然会对谷物价格长期内的这种上升做出反应，不过具体影响因地区而异。在欧洲葡萄酒和谷物生产地区，农村经济是一种作物经济，即使在某些有可耕地的地区，比如法国的西部和北部，特别是在英格兰的南部，土地继续被大面积的经营，主要为集市而生产，农民也将其产量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投入市场。哪里商品率高，不断上升的价格必定对产量和销量有利，并起着刺激作用。实际上，英国农业社会史学家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的高价和农业产品的商业繁荣，在某种程度上是持续存在的大规模农业经营的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农业繁荣对其贸易产生了影响。当经济作物的种植

① 兰普雷克特：《中世纪德国经济生活》，第2卷，第512页及以后，特别是第612~613页的表格。【18】

② 得到已故贝弗里奇爵士的慨允。【19】

扩展，更多的农产品进入集市；随着农业财富的增加，各种贸易的机会也增 [215] 加了。至此，价格的影响已经十分清楚了。尚不清楚的是，那些农业生产主要掌握在农民手中的地区是否受到同样的影响。还不明白的是，手工业商品、手工业原材料和手工业地区受价格变化的直接影响有多深。历史学家更不清楚非农业商品的价格是如何变动的，假如它们有所变动的话。证据非常少，而且难以解释。就目前所有的材料显示，像布和铁这类商品的价格上升并不像食物上升得那样急遽和连续。一些商品像煤和木材的价格也许下降了。

这样，12、13世纪的价格运动有可能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有时这个词被用来描述所有主要商品的价格水平大约在相同时期内的变动情况。假如是这样的话，可能性就如它实际所发生的变化一样，不是货币的原因。国外的黄金流入，比前者更重要的白银的供应，以及比白银供应量本身还要重要的它的使用和流通，都不能成为这时重大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在这个转型中，贸易的扩展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无须以这种不可知的解释来结束价格问题的讨论。即使价格运动不能通过金银的作用来解释那时的商业繁荣，它们仍可能揭示出其他的也许是更起作用的原因。尤其急遽的连续的食物价格变化没有与其他的价格的类似变化同步，使得人们多少可以肯定相关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也在上升，这也再一次显示了相对于土地而言人口压力的增加。

这里不是讨论中世纪土地和人口的普遍问题的地方；就它们与贸易史相关而言，它们将被放在后一部分继续讨论。在这里，所有能获取的材料，特别是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材料都表明，地租、地价和对土地和房屋的侵占的罚金是在上升的，它们在规模的变化上与关于“人口压力”的猜想充分一致。在这方面，价格讨论仅会把本章的讨论带离主题，使讨论的中心由增长转移到黄金和货币这两个引起增长的原因上。贸易的增长是因为欧洲扩张。欧洲大陆的土地承载着不断增长的人口；人口的增加，结果就是意味着农业生产的增加、工业的发展和整个地区被工业化。农业欧洲的财富增加和地区经济 [216] 专业化意味着规模更大、发展更好的贸易。

4.2.3 职业商人

数量上的增长，绝不是扩张时代的中世纪贸易史惟一重要的变化，它与其他一些现象相伴生，这些现象很少是物质上的，更多的与人类的生存状况和行为方式相关。

其中之一是专业贸易的扩展。总的来说，职业商人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一开始是微不足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重要。无疑，肯定存在着专门的贸易。我们知道在梅罗文加时代前夕，叙利亚人和犹太人到过高卢，在西欧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形成外国的商人居住中心区，与19世纪的欧洲东部国家的犹太人城镇差不多。8、9、10世纪的犹太行商从东方到达西欧，指望能在那里找到他能与之做生意、共同居住和祷告的信仰同一宗教的人。我们通过圣格列高利知道，当国王冈特拉姆进入奥勒利安（Orléans）时，人们用叙利亚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致欢迎词，据此可以推断在6世纪，这些都是奥勒利安商人的母语。

然而应该指出，最初的商人社区并不是没有操拉丁语的商人。关于本地商人的证据很少，但并非完全没有。确实，我们可能对奥森纽斯了解的那位名为费罗的商人，以及对波尔多的尤费让或者巴黎的尤比斯都所知甚少，图尔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谈到过后面的两人——他们的名字像他们的时代一样仍然属于罗马。但是从7世纪开始，关于本地商人的记载越来越多，而且材料的可信度也更为明确。国王达戈贝尔特就是在7世纪建立了圣丹尼斯集市，在那里经常有法兰克人、弗里斯兰人和萨克森人（或许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光临；我们还知道，在同一世纪法兰克商人旅行到斯拉夫和阿瓦尔人的土地上。

一些本地商人无疑财产殷实，像图尔城的克里斯托弗，我们知道他做奥勒利安葡萄酒的投机生意，但是大体上，他们肯定是不重要的小人物，是沿街叫卖外国货的小贩。他们交换的商品肯定是一些中世纪庄园和农村需要的【217】小小的奢侈品：香料、丝绸和其他的新奇的装饰物。因为当直接买卖本地生产的农产品和手工制品时，商人的服务并不总是必需的。在中世纪欧洲，就像我们今天的农业地区一样，一般的生产者能够卖掉他们自家生产的东西（鸡蛋、乳酪、母鸡、蔬菜、牛奶、牛甚至谷物），不需要专业商人的帮助。同样，在手工业被组织成小手工作坊，商品的生产和订购都是小规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没有商人的中介也可以相互交易。不仅是农村的铁匠和陶工，而且城市里的屠夫、面包师和制蜡工，他们自己都可以卖掉他们的产品。即使在中世纪晚期，工匠和商人之间的差别仍是模糊的，人们普遍出卖他们自己生产的商品。

而且，商人的贸易并不局限于纯地方性的交易。庄园的产品通常运到很远的地方，中世纪早期的庄园贸易有时就掌握在庄园主自己手中。一些庄园是如此之大，其出产的商品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买卖，

然而我们不能草率地认为他们总是如此。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早期的修道院的“谈判人”（*negotiatores*）在中世纪的贸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是修道院的贸易代表，常把他们的产品卖到远方集市，有时在那里为他们的社区做一些必要的采购。但是，对“谈判人”这个词，不必太拘于表面的词义，有些就是僧侣和庄园的办事员，但有些可能是专业商人，他们以修道院的名义行动，并在它的保护下从事贸易活动——正如13世纪英国的“国王的商人”在国王的授权的保护下从事贸易一样，只不过后者在方式和规模上完全是专业性的。

不过，中世纪贸易中，教会之外其他的非专业或不完全专业性的贸易更为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某些半农业的社区的商业活动。没有什么能阻挡捕鱼的和航海的西兰岛和莱茵河河口的社区为追求集市和商品而冒险离开家乡到很远的地方。海洋本身并不能满足他们的所有的需要，但却能让他们在寻找顾客和供应时，高兴到哪里就到哪里。同样，挪威的海湾既不能养活也不能在全年为所有的人提供住所，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止挪威的农民在海上漫游，光顾外国的领土。以这种方式进行的遍及全欧的许多贸易，可以说是由【218】业余的商人完成的。

因此，有大量的非专业性的贸易：在中世纪早期比晚期更多。实际上，历史学家有时描述的中世纪的贸易“崛起”时期，也许仅指那个有利于业余贸易的环境消失了，而专业商人阶级发展传播开来的时期。

一些类似的非专业性的贸易即使在中世纪晚期也能发现。修道院修士就可以作为商人，只要他们能从大量而长期的商品生产中得到收入。在12、13、14世纪，英国的修道院不仅经常把它们生产的羊毛卖给外国商人，而且经常供应收集来的羊毛，也就是他们从周围农村收上来的羊毛。我们还发现在整个中世纪都有英国的贵族涉足毛纺业；加斯科涅的乡绅插手葡萄酒的贸易；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贵族——丹佛的和布列塔尼——保持着贸易和从事海盗活动的船只。类似的，从事航海的西兰岛、荷兰、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半岛上的社区，在从事捕鱼和航运的主业之余，也从事小额的贸易，并偶尔在海上行劫。

但是，一般地说，中世纪后期的条件比初期对业余贸易者来说要不利一些。许多中世纪的城镇，有些商品的产量不久就超过了本地的市场潜力。法兰西北部和佛兰德的主要以布业为主的城镇生产的布，法兰西和德意志的一些城镇生产的金属——仅举两个突出的例子——开始为远方的未知的需求大量生产；不管这在什么时候发生，当小生产者不能卖出他们的产品时，商人

的中介服务就变得不可避免。

更重要的而却不大明显的是农村的类似发展。封建社会和法律不久就使村落里的普通人不可能身兼农业和贸易两职，大规模的领主经济也消除了庄园商人存在的可能性。在英格兰，毛纺业的记录可能显示了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羊毛生产地区的社会变化呼唤一个新的商人阶层的出现。随着小的牧羊人数目增加，专业的羊毛商人开始介入羊毛生产者和羊毛出口者之[219]间。对谷物商和鱼贩的历史研究还没有像对羊毛商人的研究那样充分；但是在那里更有可能会发现一个类似的联系。

经商作为一种专职的发展在城市的崛起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城市的历史，它们的出现和数目的增加，不属于本章讨论的范围。在这里提到的城市的增加只是作为中世纪经济普遍繁荣的一个证据，除非它与贸易活动的社会转型相联系，否则就无须再次提到。无疑，这种联系是存在的。许多历史学家现在同意，城市数量在10世纪后的两个世纪扩大和增加的原因就是贸易的增长。但无论是出于逻辑还是出于历史，贸易的扩展和城镇的出现之间绝没有必然的联系。挪威人就可以证明，没有城镇一样可以从事积极的贸易活动；一点也不能肯定7、8世纪作为贸易的中心提到的多尔斯塔德（Dorstad）和一些其他的地方是中世纪和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它也许仅是捕鱼者和航海者的集中的定居点而已。只是到了中世纪末期后，大部分英国羊毛的贸易才掌握在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商人的手中，绝大部分工业掌握在那些既会纺纱又会织布而且还有一些农业收入并且实际上住在农村居住区的人手中。

确实，只要手工业和贸易仍是农业的附属，并仍掌握在农民、渔夫、土地贵族或教士手中，就没有必要也少有机会来发展商业和工业城镇。中世纪鼎盛时城镇的发展之所以成为必然并真正不可避免，不仅是因为贸易的扩展，而且因为封建社会的条件使得贸易的发展很难掌握在农村阶级手中，贸易的追求很难与其他农业职业相同。当生活和它的所有职业都完全专业化的时候，当战争和政治成为领主和不动地产所有者的专有职业时，当农业成为准奴隶的农民的专职时，贸易也一样职业化了。挪威海湾的农民，弗里斯兰的渔夫，修道院地产上的僧侣代理或者加洛林大地产上有特权的办事员能够经营各种贸易的时代一去不再复返。贸易不断地演化为专职商人的职业，工匠以一种职业的方式进行买卖。

[220] 这一变化对城镇的影响是显然的。为了使之成为职业并全年进行贸易，

商人和工匠必须废除限制他们自由行动和与封建社会下层自由联系的条条束缚和责任。他们的住房和用作商铺的房屋，必须免除重压在土地占有使用权上的负担，他们的交易必须依据更适合于商人和商人交易的法律来判断，而不是封建的习俗和普通法。因此，中世纪城镇的基本功能，就像封建海洋中的一个非封建的孤岛，它们在11世纪大量出现——这个世纪在贸易发展的同时，封建秩序也成熟了起来。由此，特许状和特权（它们只不过是免除封建规则的凭证）在城镇起源和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这种特许状使乡村中产生了城区，城堡的郊区演化为城市；这种特许状还在向完全城市化进展的过程中不时介入城市社会。崛起的城镇因此主要是一个政治和法律的现象，即使它的主要功能仍是经济方面的。①

这个论述显然是充分的，尽管乍眼看来它显然与历史学家最近对中世纪早期城镇社会历史的发现相冲突。对所谓的贵族家族的不断扩大的历史研究表明，中世纪城市上层往往是由在城镇的历史发展的早期拥有土地的家族发展起来的，当房租和城镇的地价上涨时他们就发了财。具体而言，这个过程可能在地区与地区之间有所不同，但总的看来，不同的城镇比如11世纪的阿拉斯、12世纪的巴塞罗那、13世纪早期的吕贝克，似乎遵循相同的模式。在它们历史的早期，政治和经济权利完全或部分属于城市地主或者他们的后代。实际上，在中世纪城镇中，地产的利益是如此普遍和明显，以至于像桑巴特这样的归纳型社会学家，能够把他的中世纪资本主义的理论，整个地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同时可发现，上涨的房价是中世纪手工业和贸易的原始资本的主要来源。

用如此普遍的并且如此简单的词语来陈述这个理论，实际上可能很难与城镇作为专职的商人阶级的活动场所这样的印象联系起来。但是“贵族”的历史难道就如此简单划一？最初，在北欧并非各处的城市地主都是城市所在【221】地的最初主人的血统上的后代。中世纪早期的一些城镇在属于它们的封建大领主的土地上生长起来，不管这种大领主是国王的还是大的家臣的。在有些城镇，封建领主继续把地产进行分封、继承、完全出售财产所有权从而转移了他们的收入（英格兰的土地保有权，法兰西的完全土地保有权）。但在有些地方，特别在西欧的乡村中心——较晚时期的人工基地——封建创立者有时

① 这一结论并不受农业继续在小城镇的经济活动中起作用，通常是很重要的作用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的影响。不管小城镇是如何地与农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把它与纯粹农业地区是区别开来的，是作为其核心的商人和手工业者。【20】

不仅保持对所有权的特权，而且也对收入保有特权。在英国的自治市和其他国家的有些城镇，比如在波尔多，城址的土地保有和城市的使用一般是在城市周围所有的庄园主之间分享。这一事实刺激了几个德国和英国的律师——其中就有梅特兰——提出著名的城市起源的驻防理论（garrison theory）。

只要是在土地掌握在封建主手中而且这种状况仍在继续的地方，城市所有者不断上升的利润就多半与城市市民无缘。然而，即使在12世纪城市居民拥有或掌握大部分地产的城镇，他们的地产也大多是来自于后期的投资，而非对早先地产的继承。吕贝克集市著名的历史，就像容格解释的那样，也许可以真正证明伟大的吕贝克家族是从一小部分参加该城的建设并拥有集市用地的人繁衍而来的。但是相同的历史也清楚地表明，吕贝克城市地主来源于威斯特伐利亚的商人家庭，他们冒险进入地产的投资仅仅是他们对易北河以远地区系列重大商业投机中的一部分。

总之，在中世纪早期的城镇中，贸易投资和地产投资之间的差别比较明显。不仅投资于城市地产和城市地租的自然地主要是中世纪商人，而且相反的过程——投资于贸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城市地租——同样是很普遍和简单的。欧洲服务于投资目的商业合伙关系在法律上自中世纪前以来就不陌生。康孟达（*commenda*）式的不参与具体运作的合伙，在11世纪的意大利城镇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歌德里克（Godric）的生活，这里要再一次提到的，表明在11世纪的英格兰，商业合伙是一个既成的惯例。商业合伙关系，尤【222】其是投资者不参与具体经营的合伙类型使得城市财富能被大规模用于外贸，即使这种财富正好是来源于地产。

实际上，在这种把财富用于到远方发投机冒险财，是中世纪城镇和与之相联系的农村相比的一个更鲜明的特征。皮尔恩认为，11、12世纪北欧贸易的典型代表是他所谓的“早期资本家”，但是他们应该更精确地被描述为从事大规模海外贸易的商人。他们留在文字记录里的踪迹还比较模糊，但在各处，皮尔恩能够从早期材料的迷雾和沉寂中分辨出早期资本家飞驰的身影。举个例子，他甚至能为一个从事广泛的投机和贸易的商人描绘出一个与原物一样的绣像。歌德里克是11世纪和12世纪之交英格兰的一个商人，开始时是码头工人，后来成为一个专职的商人和一个合股经营的成员，到死时成为一个圣徒，这是令人鼓舞的一生。

这个时期的商人不同于小贩，虽然他们中肯定有部分人也做过小贩，他们也不同于更稳重和不冒险的并在后期垄断了贸易的城市居民。他们的主要兴趣点不是地区集市的日常贸易，他们的这种不感兴趣，在城镇的宪章中得

到显现。只要他们形成统治集团，城镇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就会成为一个扩张、自由移民和相对自由的贸易类型。我们有关自由移民和自由贸易的直接证据当然是很少的：留下的文献资料非常少也许正是自由贸易的特点。但是，要是定居点和地方贸易像它们在后来那样受控制，城镇和它的人口不可能像我们所知的那样增长。因为增长和扩张是这个时代的象征。

4.2.4 不断变化的边界

不断扩大的和职业化的贸易显然也有地理和政治意义。实际上，中世纪贸易的经济地理和它对国际政治的卷入，差不多比这个主题的任何其他方面都研究得更充分，理解得更好。因为不像贸易史的其他方面，不断变动的边境和不断出现的贸易路线的历史是由战争、政治、移民开发组成的，因此能被大量的文献很好地解释清楚，难怪贸易史学家给予它们足够的注意。

但是，这种注意绝非毫无道理，因为中世纪的贸易的政治和地理特点不【223】仅是突出的，而且是重要的。当贸易增长和衰落，新的地区开发，旧的地区衰落时，北欧的整个权力平衡被改变了。在中世纪生活中，没有什么比地区间贸易在欧洲的公侯国的兴衰，也就是在它们的政治、军事和航海权力中所起的作用，更能说明它的重要作用。

经济地理单纯的政治意义也许最明显地表现在中世纪贸易的初期。历史学家多少有些想当然地认为，梅罗文加时期和加洛林早期北欧贸易的一个地理特征是它从罗马帝国的世界经济中的退出。罗马帝国的衰落意味着在6世纪高卢、布列塔尼和莱茵河流域，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世界其他部分，不再保持像3个世纪以前那样的关系了。与意大利和地中海的经济联系，并没有完全中断，但是贸易无疑变得更地区化了。在帝国繁荣的高峰期，就是在公元2个世纪，罗马帝国形成了一个以都市化的意大利的需求和政策为主导的经济系统。无须说，在各行省之间和各行省内都各自进行着贸易，但认为在帝国的鼎盛时期，所有的道路都通向罗马是错误的。然而，大致说来，罗马贸易的主要浪潮形成了一个协作性的系统，每个行省都做出了明显的有时是十分专业的贡献。这个系统在罗马时代的末期开始分裂，在473年最终消失了。[1] 5、6世纪，地区间的贸易运动，正如它本来的面目一样，适应北部不同地区变化的需求和机会，不再是帝国网络的一部分，或者

---

① 上引书，第121～131页。【21】

由帝国商人主宰。

在这里有几个例子。3、4 世纪时，不列颠向莱茵河上的罗马军团出口粮食。在梅罗文加时代，这种向莱茵河下游的出口并没有停止——就如我们知道的一样——但它们不是由罗马军团的需求支配而是由莱茵河流域的人们需求所主导，而且这种贸易的组成这时也许是金属件和布匹，这两样物品在罗马时代常是运到别处销售。另一个例子是北海渔业。在帝国时代的高峰期，罗马商人从乌特雷查特（utrecht）在莱茵河三角洲和帝国很远的南部省【224】份之间进行活跃的渔业贸易。在梅罗文加时代，鱼在继续出口，但是它现在出口到许多别的地方，包括法兰西和德意志的南部，而且是由地方商人航运的。同样，佛兰德的、弗里斯兰的也许还有英国的布，过去也许是用来供应罗马军团的，现在也被转运到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的地方。①

北欧贸易不断地方化并远离罗马帝国的中心地区，这一图景完全是与我们所知的叙利亚商人的活动和从马赛不断地进口东方商品相一致的。叙利亚商人和马赛港口交易的也许是东方的奇异的商品。现在变得越来越地方化和分散化的贸易，主要成了北方突出的大宗生活必需品的贸易；地区间的交易网络正在出现和形成，不过不是由叙利亚商人，而是由其他的和更地区化的中介集团形成的。

关于中间人，最早最突出的是弗里斯兰人（Frisian）。他们的重要性来自于拥有的独特地理位置优势及其领土的地理局限。弗里斯兰从辛克发尔河口（即现在的茨温）沿着北海海滨一直延伸到威悉河河口。这块土地不肥沃，但它可通行的河流网络与大海衔接，在岛屿之间有保护得很好的航道，使得这里非常适合捕鱼、航海和水上贸易。在这里，大部分商品集散在莱茵河老河口的多尔斯塔德：一个以拥有 40 座教堂而闻名的城市。事实上，它是否是一个大城市或仅仅是一个渔业和贸易村落的集中点，这还是一个需由考古学家来决定的问题，但它是那样重要以至于在许多有关弗里斯兰贸易的早期材料中都留下了痕记。后来，特别是 9 世纪，它的重要性很快失去了，部分原因是受到了诺曼人的破坏，但主要是由于河床改道到瓦尔。由于这种改道，瓦尔河上的蒂尔镇代替了多尔斯塔德的位置，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多尔斯塔德的部分贸易和它的政治重要性大多让位于乌特雷查德。

---

① 按照皮雷恩的观点，这种情形可能直到 8 世纪才有可能发生。参见 F. 弗考特伦（Vercauteren）：*Civitates de la Belgique Seconde*（布鲁塞尔，1934 年），第 451～452 页。【22】

从这些中心出发，同时从作为一个整体的莱茵河三角洲出发，一个完整的道路网络系统朝各个方向辐射开来：往英格兰、往高卢和法兰西的西部、往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当我们阅读8世纪的历史，比如贝德（Bede）的作品时，就会发现伦敦是一个商业中心，许多外国商人住在那里，我们必然首先想到弗里斯兰人，因为贝德明确地在另一处提到了弗里斯兰商人。在许多提到8、9世纪的海外贸易的和海外商人的材料中，弗里斯兰人总会出现。利厄德格，8世纪一个行游的法兰克传教士，谈及在伦敦的弗里斯兰商人时也谈到了阿尔昆（Alcuin）的弗里斯兰人。【225】

我们对他们与南部的贸易知道得较多。他们进入法兰西西部的主要地点是奎脱维克（靠近现代的伊脱布勒斯），从那里，他们进一步到达鲁昂和法兰西西部的内地。8世纪前叶的某些记录表明，他们活跃在圣丹尼斯集市，那时该集市是法兰西最重要的内陆集市。他们与南方的绝大多数贸易也许是沿莱茵河进行的。顺莱茵河而下，他们从阿尔萨斯运来谷物和酒；溯莱茵河而上，后者把布、鱼和其他的商品带去换谷物。他们在莱茵河的主要市镇，像在科隆（Cologne）、杜伊斯堡、杜塞尔道付夫附近的赞坦，沃姆斯建立据点；但美因茨也许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这个市镇位于莱茵河航线与南部、东南部航线的交接点上，从那里，多瑙河平原和黑海地区的贸易进入西欧的商业流通中。

他们与斯堪的纳维亚的贸易假如不是更充分的话，也是更古老的。考古和文字材料表明，斯堪的纳维亚的贸易由来已久。这种贸易主要掌握在斯堪的纳维亚人自己手中，但是他们的有些贸易一度掌握在弗里斯兰人手中。9世纪的一部关于圣安斯卡路留斯（Anscarius, St）（该人是一个在丹麦和瑞典从事传教活动的传教士）的传记，通过附带的细节，揭示了弗里斯兰人的商业活动。安斯卡路易斯人显然与弗里斯兰商人一起航行到舒勒斯维奇，从那里再到比尔卡这个波罗的海的瑞典人贸易中心。

这就是弗里斯兰人贸易的地理范围。然而，绝不能错估弗里斯兰人在其中起的作用。他们是主要的中介人，但是他们并不占垄断地位。他们出口的商品并没有留在弗里斯兰甚至也未必就经过该地。在我们发现的贸易的路线上，并不只有他们。虽然在盎格鲁—撒克逊贸易中他们十分活跃，但他们没有垄断它，把英国商人排除出去。同样，弗里斯兰人与西法兰西的贸易似乎也十分积极，但我们知道法兰西和它的邻居之间也有直接贸易，这些贸易许多是掌握在本地商人手中的。【226】

更独立更重要的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北欧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在9～10

世纪的经济史中，可以说挪威人留下的痕迹比前一个时期弗里斯兰人留下的痕迹更深。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像弗里斯兰人一样，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地理条件使然。像弗里斯兰人一样，他们不得不在公海上，在外国的土地上寻找生机，简单的原因是他们的土地不能养活他们。在许多地方，在丹麦的东部，在瑞典的南部，在挪威的南部，人们能够在整个中世纪过着与西欧其他地方的农业社区基本上没有差异的生活。但是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有些地区，社会成员除了是农民还必须兼职做其他的行当——在一年的部分时间内，他们生活在农田上，另外的时间则在海上漂游或航行到遥远的河流去。

有些人去海上做渔夫，有些是做强盗、冒险者、殖民者和征服者，还有些去做商人；实际上，他们中大部分人一会儿是渔夫，一会儿是商人，一会儿是征服者。如历史书上所说的，他们大部分是北欧海盗，但是经济史家认为，在作为北欧海盗远征开始前很久到停止海盗行为后很久，他们一直是贸易者。

北欧海盗（Vikings）远征从8世纪的第一个25年开始，但考古材料显示，在斯堪的纳维亚与西欧国家之间，自史前时期就开始了一些贸易。即使在北欧海盗的战争的最坏的时期，不仅在他们的定居点之间，而且在斯堪的纳维亚和非斯堪的纳维亚的居住地之间仍存在着大量的纯商业性交易。前面已提到的圣安斯卡路易斯的旅行，就发生在著名的多尔斯塔德被北欧海盗烧毁之后。当乘着弗里斯兰人的船航行时，他在舒勒斯维奇碰到了丹麦人，这些人显然带着纯粹的、和平目的前往多尔斯塔德。

因此，我们不必让海盗时代的混乱蒙蔽了以正常方式进行的普通贸易的历史。它是普遍的和平常的，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许多当时的材料对它绝口不提。我们对这些抢劫的主要证据来源于北欧的英雄故事，而英雄故事仅是关于英雄人物的故事。甚至，即使在这些故事中，我们也能发现了以和平和正常方式进行贸易的线索。它们有时谈到非常纯粹和单纯的商人，也提到没有抢劫目的的远航。我们知道，斯堪的纳维亚人不仅建造用于抢劫目的的快速的攻击船只，而且建造速度较慢的空间较大的用于商业贸易的货船。可能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商人专门从事贸易而不进行抢劫性的远航。因此，就我们所知，与所有北欧国家进行贸易的哥得兰岛（Gotland）人，并没进行有北欧特征的远袭，即使我们发现他们偶尔参加北欧的战争。

【227】

这样考虑后，斯堪的纳维亚的贸易形成了我们所知的在弗里斯兰人领导下的北欧贸易联系网络的一部分。但在某些方面，它在西北欧贸易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于弗里斯兰人、盎格鲁—撒克逊或是法兰克人。首先，斯堪的纳维

亚的贸易在弗里斯兰人开始衰落时达到最高峰。其次，它在范围上远远超过北方贸易原来的范围。在他们的航海中，挪威人侵入西至格陵兰岛（Greenland）和北美海岸，东至博斯普鲁斯的广阔地区；他们向西的扩张，对欧洲贸易没有多大意义，然而他们向西的航行却有极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他们在西北欧和波罗的海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且他们也建立起横穿东欧大陆的重要的陆上通道。

波罗的海和它周围的陆地直到11、12世纪仍处在西方贸易的范围之外，正如它仍处于基督教文明之外一样，但它们正好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范围之内。斯堪的纳维亚人穿过层层的大海到达波罗的海各岛，从那里到达今日的梅克伦堡、波美让尼亚、普鲁士和立窝尼亚的波罗的海海滨，他们显然与那些海滨的居民、与斯拉夫人和乌戈尔——土耳其人间保持着一个活跃的商业联系。

我们对10世纪以前的波罗的海的贸易和航海知之不多。居住在波罗的海海岸的斯拉夫部落沿海岸航行和贸易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亚穆勒，位于奥德河河口的伍林岛上，是斯拉夫贸易中心的遗址，在传说中记载了在相同或附近遗址上有一个古代波罗的海的海港，即斯拉夫人的维纳塔（the Vineta of the Slavs），在编年史中是“贵族的城堡”，那是大商人的宅第和巨大财富的存储地。像其他传说中的海港一样，传说维纳塔被海吞没，像其他的庄园一样，在厄运降临时它会撞响淹在水中的钟。我们并不知道维纳塔是否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城镇，但我们知道，其他的编年史描述过西斯拉夫人的城镇——奥佩恩和海德哈布——并不比一个由篱笆和泥巴造的小屋的组成的聚【228】集地好多少。也不能肯定维纳塔是否曾经常有斯堪的纳维亚人光顾，但肯定的是，在斯拉夫东北边界附近靠近吕贝克的地方，斯堪的纳维亚人拥有他们的商业定居点——这在编年史中被称为热日克，另一个定居点特鲁所（Truso）在离现代的西普鲁士埃尔布隆格的不远的地方出现。但是，在所有他们建立在东斯拉夫边境的这些城镇和定居点中，没有谁比诺夫哥罗德（Novgorod）更有名，持续时间更久。诺夫哥罗德，是爱尔姆湖上的一个古老的城市，它扼守从波罗的海到俄罗斯的腹地的贸易线路的西部终点站，很早以来（也许是自8世纪以来）就吸引了斯堪的纳维亚贸易者前来，而就我们能够确定的材料，在10世纪的时候，那里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点。①

但斯堪的纳维亚人进入俄罗斯并不一定停留在诺夫哥罗德。8世纪以

① W. 沃格尔（Vogel）：《1100年前后的海上商人》（1935年），第181页；上文载考特（Koht）教授纪念文集；参见F. 罗依格（Rörig）：《汉萨历史散论》（1933年），第22页及以后。【23】

前，在鲁维克领导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是“俄罗斯”部落的统治者。在他们征服俄罗斯前后，他们经常越过通往东方的欧亚大草原，从波罗的海出发，沿着涅瓦河和大西洋，他们驾船通过俄罗斯东部的分水线，然后沿河向东和东南航行到黑海和亚速海。拜占庭是他们的目的地，在那里他们作为雇佣兵服役，作为商人经商，他们至少对这个大城市进行过一次抢劫。但拜占庭也许不是他们接触到的惟一的东方土地。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进入了横跨奥克先的巴克特利亚地区，或者进入了跨里海的波斯行省。但是他们必定至少进入了亚洲大草原的边缘，并与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哈扎尔人和保加尔亚人（Bulgars）做买卖。

这样，斯堪的纳维亚人提供了一个连接北欧和远东的经济联系——这个联系在8世纪与东方的直接海上联系被切断后变得更加重要。他们连续在几个世纪里扮演着这样的角色。12世纪，他们在俄罗斯、波兰和立窝尼亚的中心仍然活跃，在12世纪后半叶还光顾乌特雷查德，13世纪到达英格兰东部海港。但到那时，他们的贸易活动已被欧洲其他地方的商业活动所掩盖，[229] 不久在上升的日耳曼浪潮的压力下完全消失。

斯堪的纳维亚人运气开始背转，日耳曼浪潮涌现并吞灭了他们，这一个过程恰与欧洲经济和贸易扩展最快的时期重合。11～13世纪世界的扩展经历已经讲述过，意大利人在启动和维持它的活力中所起的作用也讲述过，然而尽管意大利人的刺激和他们在绝大多数大陆国家的内部贸易和财政中所起的作用，两个贸易地区——北部和南部——仍然多少有点泾渭分明。它们之间巨大的不断增长的交易有时掌握在意大利商行手中，这些商行在英格兰和法兰西和低地国家有分支机构。但是大部分交易可以说是在边境进行的——在那里意大利人与西北欧的商人会合，并将北方的商品和意大利的进口品转手。

在两个商业圈交接的边境地区，有一处位于法兰西中部和东部，其首要所在就是香槟。香槟大集市的发展历史将在别处讲到。这里要说的是，香槟在12世纪作为一个交汇点出现，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在香槟和波罗易斯伯爵的统治下，他们的国家是最早从封建和平中获利的欧洲国家之一，这种和平在11世纪就代替了以前的封建无政府状态。它的人口和产出增加了。正如现在可能说明的那样，布业在这个过程的早期就开始繁荣起来。但对它的中介地位发展最有利的条件，是它作为古代的道路的交叉点的便利的地理位置，从地中海到北德意志的边界，从佛兰德到法兰西的中部和东部的路线，都在这里汇集古代的城镇，特洛易斯（Troyes）、廊格雷斯

(Langres)、雷姆斯（Rheims）和拉恩（Laon）都正好位于横穿大陆交通线的焦点上，因而一方面为意大利和普罗旺斯，另一方面为德意志和低地国家的商人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聚合点。正是在这点上，大香槟集市在12世纪崛起，并在13世纪真正发展成为贸易的神经中枢。

使得香槟贸易的汇合如此重要的是，各股商业潮流汇成了一条宽阔的河流。在本章不可能对所有这些进行描述，也不能详细地追溯它们各自的渊源。其中南部的贸易支流——从地中海国家流来的——是其中最重要的，但是它的发展超过了本章论述的范围。从法兰西中西部地区发源的西部贸易，[230] 也许是本章主题的相关部分，但是对它研究得较少，而且乍看起来似乎不值得研究。因为，可能认为法兰西的北部和西部的每个主要地区都得到非常好的供应，以至于它们能够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不必依靠国外的供应和市场。但认为只有贫穷国家才需要从事国际贸易的观点，绝不应拘泥于它的字面含义，实际上也不要对它太认真。法兰西较富的省，也许因为它们的富裕，有大量的盈余需要处理。皮卡第和诺曼底有谷物剩余，差不多中部和西部的每个省都有葡萄酒可供销售，此外还有奥弗涅和塞文山地的羊毛，西北的亚麻以及其他农业地区的特产。随着中世纪的往后发展，法兰西成为一个人口密集的国家，在它的早期历史上有着罗马血统的城市和历史渊源较短的城镇开始吸引来自这个国家各地的移民。到13世纪，巴黎已有30 000居民，是欧洲最重要的城市之一，10~13世纪，不仅具有地区意义而且还有国际意义的城市在各处涌现——其中有些，比如阿米恩斯和奥勒利安，都是大省的商业都会；其他的，比如鲁昂和波尔多，是大河或海洋的港口；比如里勒、查特雷斯和波热斯，是纺织品和金属工业的中心；比如巴黎，是综合性的城市。

一个如此繁荣的国家不可能保持一种自给自足的原始的田园生活。实际上它也确非如此，这可由我们所拥有的法国贸易的材料得到证明。这些材料表明，光临法兰西北部——圣丹尼斯、波罗根、查特雷斯、康佩根的集市——的国外的主顾，在香槟集市出名之前就到了这些地方。法兰西的北部港口，7、8世纪的爱塔布勒斯（奎托维亚），11、12世纪的拉卡维、鲁昂、巴弗勒（Barfleur）和其他的城市，再加上中世纪晚期无数的其他的港口，在残存的记录中都十分突出。在英国的记载中，进口靛蓝的阿米恩斯和科贝的商人也属于最早光顾伦敦的外国客之列。

但是，假如按照香槟集市的记录，法兰西这种贸易显然处于相对不重要的地位，原因是到13世纪末期（这时文件材料已经比较充分了），更商业

化的地区的商品（英国的羊毛，佛兰德的布）居主导地位，然而法兰西与[231]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开始受开普廷国王的领土征服影响，也受到随后的工业冲突、战争征税和军事行动的影响。

相比较而言，更充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发源于北部和东北部的贸易流。它由大量的支流汇合而成，后者发源于一个它本身注定要取代香槟而成为南北汇聚点的地区。

这个地区就是佛兰德。佛兰德像香槟一样，有着不同寻常幸运的政治起点。在中世纪的大黑暗时代，贝尔吉卡的塞丘恩达南北两个部分遭遇了不同的政治命运。南部，是塞纳河和马恩河的下游地区，在加洛林时代陷入封建无政府状态，并且当它处于蒸蒸日上的法国的开普廷统治时正好脱颖而出。在11世纪之交，它在法国国王统治下有过一段短暂的经济繁荣，因为正处于一个开普廷扩张的边界，它不十分适合于积极的贸易和工业。北部贝尔吉卡的塞丘恩达也一样不适合，但由于一个幸运的事件，低地国家西南的封建采邑和男爵领地在10世纪早期被并入一个强大的佛兰德公国。在他们的统治下，低地国家的大部分，从阿拉斯到根特，在欧洲的别的部分之前就享受到了和平和秩序。在伯爵的和平保护下，艺术繁荣，商业兴盛，城镇兴起。

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也一样十分有利。它位于北海海岸，适合于各方的海上贸易；它也一样有可通航的河流穿越，特别是舒尔德河，河口有着保护良好的港口。然而佛兰德的工业既受它的地理位置便利的影响，也受它的地理位置的局限。在佛拉芒人和平的保护下，人口增长，土地产量却相对较小。佛拉芒人进行大规模的内部移民，在围海造田的基础上进一步围海造田，沿着海岸和主要河流的航线建立大堤。到12世纪中期，他们以排涝和优质佛拉芒人的开垦系统而闻名全欧。佛拉芒人在组织新的定居点方面的自由和经验——他们带着这些荣誉受日耳曼王公的邀请进入易北河以远的新的土地。然而无论是内部殖民，还是移民，都无法解决他们的人口问题，问题[232]的解决之道正是人们通常采用的办法，即工业化。

到12世纪中期，佛兰德成为北欧最先进的也许是惟一的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它是主要的布业中心；伊布雷斯、根特、都艾（Douai）处于北欧最重要的城镇之列，与服务于它们的布鲁日商业港口一起，到12世纪末成为佛兰德有名的四雷登（Four *Leden*）。在13世纪，它们开始争夺王公的政治权力，在14世纪继续这种争夺。

佛兰德也拥有其他的工业和贸易。但直到14世纪末并没有一个其他的行业的重要性可以与布业相当，布成为佛兰德商业的主流。布也是吸引世界

各地的商人到佛兰德的力量，这逐渐地促使布鲁日发展成另一个国际商业中心，它是香槟集市的竞争者并最终取其地位而代之。布鲁日重要性主要在于，它在12、13世纪之交发挥着英国羊毛和英国商人进入大陆起点的作用。不久意大利人就来这里寻找英国羊毛和英国主顾，但是到13世纪末，日耳曼人在布鲁日奠定了佛兰德布出口者的地位，他们还是意大利进口品的主要买主和东欧食物和原材料的主要供应者。

到此时，日耳曼人开始主导北欧的国际经济。13世纪真正是他们的世纪，但是他们在欧陆经济中的重要性至少在100年前就开始显现出来。

最终以日耳曼人为主导的贸易范围，像以日耳曼人为主导的语言和文化一样，从北荷兰的东部边界和洛林一直延伸到欧洲中部的心脏地带——后来也到了东欧。但是它的中心，特别是在开始时，是在莱茵河地区。12、13世纪，从莱茵河流域辐射开来的所有贸易路线和所有的文化影响——它的建筑、它的工艺和它的神圣的艺术——逐渐地集中于一个城镇，那就是科隆。

关于科隆的早期历史笼罩在许多相互矛盾的迷雾之中。无疑，城市的核心是从罗马时代存留下来的，作为一个行政中心和一个主教的宅第所在地，科隆在整个蒙昧时代就保持了城市生活的特点。它也许还保持了经济的功能，因为它在10世纪就拥有了常年的集市，在这之前很久就有了定居的商人和工匠。到11世纪末，科隆就成为一个贸易和手工业的中心，它的两个集市——一个在复活节，另一个在8月——建设得非常好，并以它的财富和权力而闻名。12世纪早期菲雷辛的奥托（Otto of Freising）在作品中断言，当时日耳曼或高卢没有一个城镇像科隆那样富有；凯斯特巴奇的塞萨里尤斯，是一个编集神秘故事的西多会修士，他谈到科隆时用就像后来欧洲书本中谈到纽约惯用的笔调一样，说肯定是科隆空气中一种什么特殊东西能够使这里所有的人都能发财暴富。 [233]

科隆的有些财富来源于手工业制成品：纺织品（主要是亚麻、布和纱），特别是金属制品。它的铃铛在13世纪闻名于欧洲，其他的铜制的手工艺品也一样有名。科隆的一个师傅，圣潘塔伦的弗雷德里克，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金属匠之一。然而，科隆财富的基础仍是商业而不是工业。城市的主体部分位于莱茵河河谷。主要由于腹地的增长，曾是欧洲贸易的中心的河口地区，现在不再占有原来的重要地位。三角洲的许多贸易现在取道科隆并最终被控制在科隆商人的手中。在这一时期开始时，尤特雷查德的商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沿着莱茵河做生意，但是最终科隆驱逐了它的竞争者，成功地

占有了河谷大部分的贸易。12 世纪，我们发现它的商人在南方像奥地利和卡林蒂亚，还有奥格斯堡和拉蒂斯邦很活跃——后者一度还卷入了多瑙河地区的经济生活。

无须说，沿莱茵河谷的土地并不是科隆商业联系扩展的惟一地区；这正如与科隆联系的莱茵河流域不是在欧洲大陆商业的发展中起作用的惟一地区。另一个这样的地区是佛兰德。佛拉芒人的许多贸易是同英格兰和法兰西和南欧的贸易，在他们商业扩展的早期阶段，尤其是在 12 世纪，佛拉芒人显然经常光临科隆集市，也到莱茵河上游和萨克森一直东至易北河地区。但在 13 世纪随着佛拉芒人贸易的衰落，科隆逐渐成为佛兰德和德意志中部、南部之间的主要贸易中介。在 13 世纪的一段时间内，他们甚至成功地侵入【234】了盎格鲁—佛拉芒人的毛纺业间，在英国羊毛生产和佛兰德的布制造者之间充当中介人。

另一类似的地区在莱茵河以西，莱茵河和马斯河之间。德意志人通常把这个地区称作马斯兰德，它的贸易是建立在它的城镇的工业基础上的：修伊、纳穆、列奇和蒂纳德。修伊和列奇生产的布部分供出口，但它的主要工业是金属业，蒂纳德尤其以它的金属制品闻名。

莱茵河以东地区的活动及其更大的未来的潜力几乎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莱茵河和威悉河之间的领土，通常叫作威斯特伐利亚，此处是一个重要的农业出口源地，也是东南地区金属开采的重要矿源。然而威斯特伐利亚的历史命运不在于本地产品的出口，也不在于它位于德意志的西部。自法兰克时代以来，该地区就作为进一步向东的走廊。好几条重要的东西交通线穿过该地，最重要的是有名的赫尔维奇（Hellweg），其起点是杜斯堡，从鲁尔和利普间通过，穿过多特蒙德（Dortmund）和索斯特，最后经威悉河到达萨克森。在这条线上，威斯特伐利亚的城镇在东欧的贸易发展中起着领头作用：正是由于有这些城镇的人，东欧的贸易不久就落入了日耳曼人手中。

威斯特伐利亚东部的专业化主要是科隆人的错误所致。由于向西面对着来自科隆的权力阻碍，崛起的威斯特伐利亚城镇自然地转向那时还是处女地的东部。科隆商人在东方像在德意志城镇一样活跃，但他们尚不能宣称在那里享有在其他地方享有的压倒性的经济特权。因此，一点也不奇怪的是，威斯特伐利亚城镇在对东方贸易的探索时期占有领导地位，在东方形成最早的贸易据点。我们发现，他们在工程项目中占有极大的份额，从吕贝克到里加的整个东北欧的城市殖民和城镇建设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关于威斯特伐利亚的一些论述，也适用于东部紧邻的地区，那就是萨克

森。萨克森，正如在12世纪的文献所说明的那样，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历时长达4个世纪，到12世纪成为日耳曼本土的一部分。像威斯特伐利亚一样，它最初进入欧洲贸易系统是由于它的矿产资源，到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时，哈茨山脉已迅速成为欧洲大陆最重要矿区，是铜、铅和金银 【235】 贵金属的主要产地。手工业围绕在戈萨拉（Goslar）周围，作为一个矿业中心的戈萨拉，其名声超过——假如不是掩盖的话——位于那里萨克森和霍亨斯托芬的皇帝宫廷。不过，戈萨拉并不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商业城镇，原因仅仅是在萨克森，就如在威斯特伐利亚一样，最繁盛的商业活动是它的商人向东进行的商业活动。萨克森特别适合这些活动。中世纪早期，也就是在完全为帝国同化前，它像一道屏障挡在通往东方德意志的路上。现在，这个屏障成了一个走廊。然而，在我们的时代开始的世纪——11世纪和12世纪早期——正常的经陆路的交通在易北河的交叉点停止了——主要在巴多维克，但也在美登堡和一些更小的地方——12世纪末和整个13世纪，德意志贸易的前线一直向东移，来自萨克森边境城镇的人们参与了这个运动并从中获利。

东扩实际上是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它的开端可一直追溯到法兰克时代。从6世纪左右开始，拉丁—日耳曼的西方文明开始扩张到中欧商业腹地；欧陆上的整个经济平衡逐渐转向东方。在梅罗文加时代的早期，法兰克国家和社会的焦点在高卢，但6、7世纪它从莱茵河左岸移向了右岸。在5～11世纪中，莱茵河和威悉河之间的土地很快地就被开拓，它那里的人口很快来此定居，此时，查理曼（Charlemgne）成了皇帝，他的国家的东部和更纯粹的日耳曼部分能够大量地给他提供权力和军队。不过，这种转换一经完成，进一步的东向运动再次开始，威悉河以远的萨克森土地处于法兰克的征服和同化下。一般认为对法兰克人而言，获得萨克森是一种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因为假如他们想把自己从被德意志人入侵征服的另一股浪潮下挽救出来的话，他们必须控制萨克森。实际上查理曼组织的萨克森远征是否只是一种对战争的预防，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自很早以前他们可能就已成为一个危险源，萨克森的土地是一个吸引人的目标。传教士的行动为他们的军事征服做了很好的准备，商业冒险和贸易定居伴随前后。不久，萨克森 【236】 完全地成为西欧的贸易区的一部分，到11世纪初，它又成为向同一方向进一步前进的起点。这次轮到的是波罗的海和易北河以东的温迪西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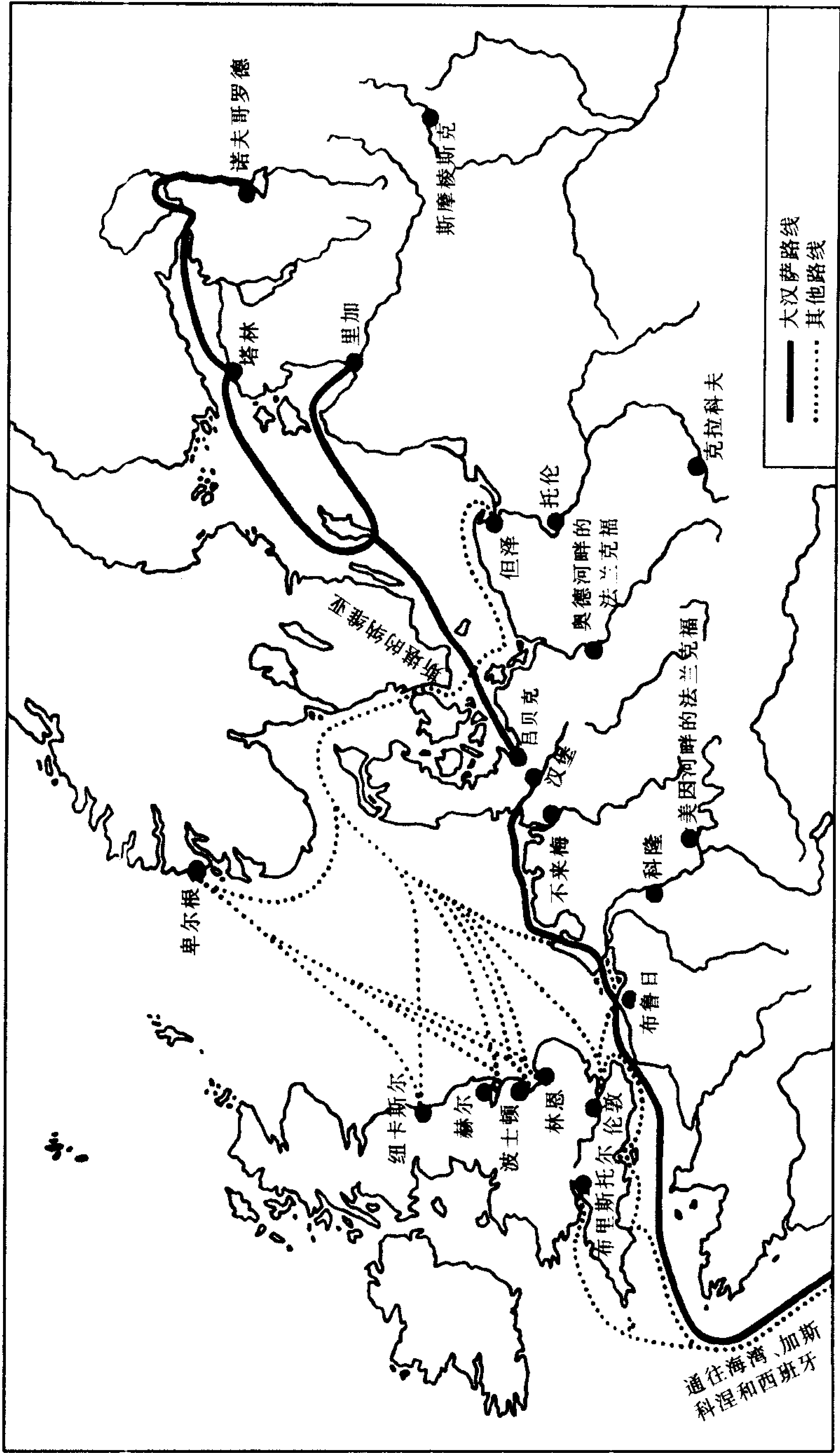
这个过程的最后阶段也是它最重要的阶段。它以绝大部分由王公领导的对斯拉夫土地的征服开始，继之以大规模的定居点和殖民地。殖民工作结束

前很久，它就给欧洲带来了根本的改变，尤其给是德意志的商业。由商人进行的而且是为了商业目标进行的城市殖民化，在有些地方甚至领先于由骑士和农民进行的农村殖民化。并不是所有寻找斯拉夫集市和资源供应的威斯特伐利亚商人都在易北河一线上停下来。他们并不经常冒险进入温迪西（Wendish）腹地，他们只是偶尔进入波罗的海地区。由于有斯拉夫王公的允许，他们开始在通向诺夫哥洛德和斯摩棱斯克的主要路线上建立贸易据点，诺夫哥洛德和斯摩棱斯克是进入中世纪的俄罗斯的两个主要据点。在斯勒斯维奇，这个斯堪的纳维亚海路到达波罗的海的东部的起点，威斯特伐利亚的商人在12世纪早期建立了类似商行的机构。在同一条海路的下一段，在哥得兰岛的维斯比，它们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内立足。但是从其后的发展来看，他们建在斯拉夫地区吕贝克的据点最有意义，这个城镇开始建立的时间是在12世纪初期，甚至可能早至11世纪之末。由于有温迪西王公的自由政策，他们至少在12世纪的20年代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永久的据点。但是在30年代后期，荷尔斯泰因的阿道尔夫征服了该地，焚烧了城市，1143年，新的吕贝克建立起来了，这次是一个完全的德意志城镇。

吕贝克成为别的新镇模仿的对象。在东北边境，德意志商人在13世纪之初就建立了里加镇，以后这里成为他们在立窝尼亚贸易的中心。在12世纪末维斯比的贸易据点，整个镇发展成一个德意志港口和强大的据点，13世纪初汉堡镇发展成了一个可与日德兰半岛东面山脚下的吕贝克相媲美的城市。

在新一代德意志城镇中，没有哪个能比得上吕贝克。不久它就吸引了以[237]前经陆路到巴多维克的贸易，取代舒勒维奇成为穿过东波罗的海的航海的起点，并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和陆根岛上建立了渔场，还与伯根和瑞典腹地进行着不断扩大的交易。逐渐地，旧的陆上通道和旧的斯堪的纳维亚海上航线已废止不用了，与东方进行的大部分贸易被迫走沿着波罗的海南海岸穿过日德兰半岛的山脚的路线——在这条路线上，吕贝克占主导地位。

第一代的德意志新城镇出现不久，紧接着就出现了第二代城镇，其数量也更大。吕贝克是第一代威斯特伐利亚城镇的女儿城，在一代或两代后又成了其他东方城镇的母亲城。它紧连着东部，还有东南部，有助于什未林（Schwerin）、维斯马和罗斯托克斯和许多其他的小镇的建立。再往东，出现了里加的姐妹城，多尔帕特（Dorpat）和里维尔和普鲁士的主要城镇（但不包括但泽）。在威斯特伐利亚城镇和吕贝克的带动下开始形成的整个德意志城镇链，实际上到13世纪末得以完成。



地图3　大汉萨联盟路线，复制于《15世纪英格兰贸易研究》（鲍尔和波斯坦主编）

【238】

这些新城镇有双层功能。第一是它们把西部的土地与斯拉夫商品源地连接起来：毛皮、蜂蜜、油漆、沥青、木材和黑麦。这主要是一个波罗的海的贸易，俄罗斯是它的主要资源来源地和市场。第二个功能是作为新的殖民地的商品的输出地，不来梅（Bremen)，特别是汉堡从威悉河和易北河地区得到谷物并把它出口到西方。吕贝克和汉堡成为波罗的海西部的渔业、易北河的盐业和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森林产品的中心。不久以后，普鲁士的城镇像玛丽埃堡、埃尔布隆格［Elbląg（Elbing)］、索恩、哥尼斯堡，后来还有但泽（Danzig)，成为普鲁士、立陶宛和波兰西部的谷物和木材贸易的出口地。

对北欧整体而言，尤其是对德意志地区而言，东部城镇和经过这些城镇的重要贸易线路的崛起，有着深远的、差不多是革命性的意义。它改变了整个北欧贸易的内容和方向。西北的工业国家尤其是佛兰德现在提供了市场和新的非常充足的重要货源。英格兰一直依靠斯堪的纳维亚的木材，现在也开始进口大量的而且是数量不断增加的波罗的海的木材。它也开始买进——有时是为了它自己用，有时是为了再出口——大量的波罗的海谷物。其他的森林产品——油漆、沥青、碳酸钾，还有毛皮和蜂蜡——现在来自东德，或者来自德意志开发的斯拉夫土地。佛兰德此前都一直由北法兰西和南德意志供应谷物，现在也开始得到波罗的海的谷物了。德意志现在能够向以前依靠从不列颠进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出口食物了。【239】

所有这一切给德意志东部的城镇带来财富和权力，标志着德意志商业崛起的最后阶段的完成。它们对东欧集市、食物和原材料的占领，使它们在整个北欧受到欢迎甚至已变得不可或缺。它们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赢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低地国家施加经济影响，还在英格兰赢得了特权。不久，经济强权得到了政治组织的支持，日耳曼城镇合并成为一个拥有强大的海上、军事和政治势力的汉萨同盟。

随着汉萨同盟的正式建立，北欧贸易的东扩可以说是完成了，历史又揭开崭新的一页。非常矛盾的是，汉萨同盟在14世纪60年代的正式建立并不是德意志扩张的进步，因此也并不标志着欧洲贸易和德意志权力的历史新阶段。它标志着东扩——实际上所有的东扩——的结束和欧洲经济史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4.3 收缩时代

4.3.1 萧条

伟大的商业扩张并没有持续到中世纪晚期，也并不是注定要不间断地与16世纪上升的经济运动连接。欧洲的发展在有些地方慢了下来；有些地方则完全停止。历史学家有理由把中世纪晚期的两个世纪，即14、15世纪，尤其是14世纪后半叶和15世纪前半叶作为一个发展受阻的时期，甚至可说是一个"世俗"的萧条时期，这种萧条是在前面几个世纪"世俗"的扩张后出现的。

这种收缩，就像前面的扩张一样，根据资料做出一些论断比进行具体估量要容易一些。能够形成综合统计的可靠数据在中世纪晚期的文字记录中像在12、13世纪一样稀少。单就英格兰而言，在中世纪晚期，有国家海关账【240】目的记录，而且有足够的材料存留了下来，可以为英国的外贸历史提供一个广阔的统计背景。但是即使是英国的海关账目，也是在一段时期内比其他的时期更完整更可靠。它的14世纪的数据也没有15世纪的数据全面，除了葡萄酒、羊毛和布外没有得到别的连续的或可比较性的数据。后者由格雷(Gray)教授列了表，他是以间隔大约10年取一个数据，并以取两年的平均值的方式来制表的。15世纪的数据在别处已经充分地做了分析。这两个统计在表4-2和表4-3中得到显示：

表4-2　14世纪后半期从英格兰出口的羊毛和布匹（年平均）[①]

年　份	羊毛（袋）	呢料（注3）
1353~1355	—	3 040
1355~1357	—	7 485
1357~1360	35 840（注1）	9 346

① 这些数据已在E. 卡勒斯—威尔森（Carus-Wilson）的《英国14世纪毛织品出口的趋势》中得到校正和补充，载《经济史评论》第3卷，1950年，第2期，但是它所展示的整体趋势是一样的。【24】

续表

年　　份	羊毛（袋）	呢料（注3）
1366 ~ 1368	26 634（注2）	14 593
1377 ~ 1380	21 627	15 449
1392 ~ 1395	19 359	43 072

注1：1357 ~ 1359 年—2 年的数据。
注2：1367 ~ 1369 年。
注3：这一栏的数据稍微低估了它的总量而略夸大了它的增长率，因为他们没有把精纺毛纱和其他的同类便宜的布包括进去，而这在早期更重要。

数据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对这种下降的记录惟一的例外是 15 世纪 30 年代中期各种进出口的商品的价值的提升，这也许反映了在与汉萨进行激烈的经济冲突时产生的进口的高成本；尤其是在这一时期内布出口的高水平。后者在 14 世纪后半叶上升，在 1380 ~ 1395 年以十分快的速度增加；但它们不久就从顶峰跌到平均大约 30 000 件宽幅的细毛织品，在随后的 25 年内，就是围着这个数字波动。在 1437 年与汉萨签订所谓的沃拉瑟条约以后的 20 年，英国与中欧和东欧进行了积极的贸易，布的出口大大地上升到平均值以【241】上，超过 500 000 件，但到了 1448 年，它们再一次下跌到 1437 年以前的水平，在 15 世纪的最后 1/4 个世纪基本没有变化。

表 4－3　　英格兰 1399 ~ 1482 年期间应征税的商品的进出口

（在 3 年期内求平均）（注1）

年　　份	羊毛的出口（袋）	宽幅细布的出口	葡萄酒的进口（吨）	各种进出口商品的总量（以英镑计算）（注2）
1399 ~ 1402	15 023	27 760	—	—
1402 ~ 1405	10 864	24 502	6 237	60 887
1405 ~ 1408	14 221	29 315	6 220	187 439
1408 ~ 1411	14 393	30 718	13 696	150 368
1411 ~ 1414	14 447	25 108	12 113	124 313
1414 ~ 1417	14 131	29 488	17 063	136 683
1417 ~ 1420	14 778	28 366	10 975	145 192
1420 ~ 1423	13 893	36 359	5 168	135 994
1423 ~ 1426	13 959	42 665	3 591	109 049
1426 ~ 1429	15 437	38 417	6 821	129 420
1429 ~ 1432	9 749	40 641	8 940	119 691

续表

年　份	羊毛的出口（袋）	宽幅细布的出口	葡萄酒的进口（吨）	各种进出口商品的总量（以英镑计算）（注 2）
1432 ~ 1435	8 294	39 693	9 950	14 675
1435 ~ 1438	2 353	40 814	6 097	113 275
1438 ~ 1441	9 101	56 097	10 509	127 221
1441 ~ 1444	9 776	55 976	11 748	130 452
1444 ~ 1446	9 279	52 482	12 275	106 168
1446 ~ 1448	7 654	53 669	11 000	121 795
1448 ~ 1450	8 412	35 078	9 432	91 456
1450 ~ 1453	7 660	38 928	7 424	91 001
1453 ~ 1456	9 290	37 738	6 826	82 553
1456 ~ 1459	7 664	35 059	4 072	59 089
1459 ~ 1462	4 976	31 933	4 190	65 503
1462 ~ 1465	7 044	25 855	7 074	57 449
1465 ~ 1469	9 316	39 664	5 942	93 942
1469 ~ 1471	7 811	27 610	3 411	53 421
1471 ~ 1476	9 091	43 129	4 729	115 475
1476 ~ 1479	7 502	51 889	6 887	120 333
1479 ~ 1482	9 784	62 586	6 927	179 340

【242】

注 1：1444 ~ 1446 年、1446 ~ 1448 年、1448 ~ 1450 年以及 1469 ~ 1471 年是以 2 年期计算的；1465 ~ 1469 年是以 4 年期计算的，而 1471 ~ 1476 年是以 5 年期计算的。

注 2：这些数据不包括通过汉萨德（by Hansards）的各类出口。

关于欧洲的其他部分，很少有统计材料，除了一些地方进出口的数据或是反映更重要的贸易运动的偶尔的测量系列外。前者最有名的也许是汉萨的海上贸易税（*Dfundzoll*）的报告，这是一种在 14 世纪后半叶和 15 世纪由汉萨主要城镇征收的税。不幸的是，这种报告并没有以一个连续的系列的方式存在下来，因此也就不能显示一种有说服力的趋势；除了吕贝克 1368 ~ 1369 年的数据外，它们呈现在历史学家面前的不是一种完全有用的形态。目前所能得到的序列最长的是汉堡的数据，该数据序列表明，海上进出口从 1362 年的 250 000 吕贝克马克上升到 1371 年的 374 000 吕贝克马克，接着到 1400 年再次下降到 336 000 马克。[1] 不过，这些数据也许夸大了汉堡贸易的上升而低估了它的下降，因为海上贸易税经常在紧张的国际关系和海战时加征，在这些非

① W. 斯蒂达（Stieda）：*Revaler Zollbücher*，第 57 页及以后。【25】

常时期内，平时经由松德海峡的大量贸易，为了安全，改走经由汉堡的陆路。

另一方面，单个的贸易材料所覆盖的商品和地理范围是如此之广，以至于可以弥补普遍计量的不足。虽然就统计的狭义来理解，没有多少材料是统计资料，但它非常充足而且变化多样，可以显示出主要的经济趋势。

这种趋势和这种趋势所表现出的事实也许主要与农业和工业产出而不是与贸易有关。但是不必将这种差异看得太严重。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们把重点放在了欧洲手工业和农业产品在北欧的贸易上。事实表明，欧洲的生产有可能衰落下去，或者至少停止了增长，同样有很好的理由来推断，商业交易也一样慢下来了，甚至停滞了。

很显然，有关农业生产的证据是最丰富的，虽然也是最难解释的。14、15世纪的记录中有大量的农业危机的表面现象存在。自10世纪以来，战争比以前任何时候更经常、更连续；在1348～1349年，巨大的瘟疫席卷了欧洲，在14世纪后半叶至少又发生过两次。农作物、建筑物、设备，还有农业历法，注定要遭殃，产量注定要下降。而且，农业经济正在经历一个重新调整的过程，它减小了农业生产和贸易的规模。

【243】

可耕地在各处都在缩小，在大块土地上，特别是大领地（demesne）上的农场，这种缩小最为迅速。14世纪在法国各地仍存在那样的大地产，到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就到了它们结束的时候了。在英格兰，大地产在规模上比欧洲别处存在得更多，这种转变尤为激烈。

当然，大地产收缩的面积不能用来作为农业衰落的一个精确的指标。然而即使经过矫正并大大地打出折扣，它们仍然能证明这种大衰退的存在。但是大地产失去了的土地并没有被佃户获得；土地衰退的迹象十分明显，无论是在大地产上还是很久以来就被佃户耕种的土地上，土地都在退出耕种处于修耕状态。理论上，每英亩的产量或人均产量应该上升，但即使单位产量在15世纪上升了（没有证据表明确实是这样），总体产量也注定要下降。

而且进入地区贸易主流的产出越来越少。大地产的衰落也标志着商业化的生产衰落。无疑，在英国，一些大地产继续由相当多的佃农经营，但是普遍来说，农民租佃的增加和扩大是以将农业商业化的大地产为代价；农民土地所有者必定消费他们产量的绝大部分，这要比准资本家的大地产农场主消费的量要大得多。

在13世纪初温切斯特主教区的32个采邑，有大约1 750夸特麦子出售，差不多全都向采邑外的地区出售。这个数量达到总产量的48%，“净”

产值的 82%（减掉种子后的产量）。一个世纪后，产量（也就是相对于种子的“净”产）大大地提高了，销售量相对于总产量上升为 70%。14 世纪初兰开斯特公国的 6 个威尔斯郡封地各种谷物的净产量（包括买来的大约 75 夸特，但除去约 525 夸特种子）大约是 1 330 夸特，其中出售的达 1 208 夸特。实际上，产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必定包括了老作物的遗留。在汉格堡伯爵威尔斯郡的地产上（这片大地产直到 15 世纪仍存在），谷物的销量也达 [244] 到这个百分比。1448 年在汉格堡的温特杜恩——斯托克地产中，112 夸特净产量中有 97 夸特被用于出售。

但是不能期望在农民的土地上有这样大比例的谷物出售，尽管部分农民的土地商业化程度很高。在一般的意义上稍做估算，表明在上层农民（the virgater）的土地上每年种植谷物的面积达到每户大约 15 英亩（《百年史册》记载 1229 年的剑桥郡（Cambridgeshire），平均一个佃农以上等级的农民每年耕种的土地，是 7 英亩），这时，麦子的产量，留出种子的话，每英亩不超过 6 蒲式耳，平均每户农民可到集市出售的剩余是非常少的。因此，即使耕作的土地保持相同，土地转到农民手里也将不可避免地减少可出售的谷物量，随之也减少谷物交易的总量。

如此一来，地区间谷物贸易的规模也就减少了。城市食品供应的证据表明，交易量在收缩，有时在范围上也缩小了。我们知道，伦敦在中世纪晚期比早期的供应来源要小得多，并且变得多少有些依靠本土的农业剩余。也有证据表明其他的重要的英国城镇的粮食供应不仅变小了（这可能也由于城镇的人口的减少），而且有时更加地方化了。因此，食品供应和粮食贮存越发地成为城镇的一个首要任务，这个当务之急在重要性上超过了欧洲大陆上许多大城镇的城市政策。

乍一看，低地国家的谷物贸易并没有出现那样的收缩，在那里从遥远的波罗的海来的海上供应似乎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那里，也肯定有紧缩。波罗的海向低地国家的出口在重要性方面的增加，很有可能仅仅是因为法国谷物的供应源枯竭了。从萨姆河河谷和塞纳河下游的出口，虽然绝不能说是枯竭，但是实际上不像也不能像它在 14 世纪中期那样充足。英法战争，英国占领诺曼底和皮卡第，由于过苛的通行税导致的河上贸易受阻，这些因素注定要中断这种贸易流动；也有其他的更普遍的农业衰落的迹象。因此，我们发现在 15 世纪的某些年份诺曼城镇从波罗的海进口粮食不是偶然的，历史记载中还偶然保存了关于一只汉萨运粮舰队在 1450 年到达塞纳河 [245] 河口的报告。

在一些这样的例子中，东德意志和其他的波罗的海地区是仅有的物资丰盈的地区。那么，东欧的谷物生产和贸易逃脱了这种在别处盛行的萧条吗?在某种程度说，有这种可能，因为它们继续生产大量的可供出售的剩余品以供应荷兰和挪威并保持东西欧贸易的流动。但是，即使这种流动从没有停止，它也不如14世纪那样充足。不存在汉萨谷物贸易的综合统计数字；我们所有的数据主要局限于普鲁士骑士团的谷物交易，它既不充分也容易引起误解。但是，所有间接的证据都表明，德意志农业在15世纪绝大部分时期内是不景气的。在14世纪东德意志农业发展的最高峰和16世纪骑士领地(*Rittergütter*)大规模商业农业的蓬勃时期之间至少有一个世纪的间歇。在这个间歇期内，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梅克伦堡和普鲁士到处都是废弃、萧条的房屋，冷清的村庄，所有这一切都与小农式的农业经济的困难有关。但是大规模的生产单位也经历了一段经济困难时期，因为劳动力变得稀少而昂贵，谷物价格下跌。当这个世纪过去后，地主在波恩莱格的政策中寻找并找到了一个修补办法——这是一个剥夺农民土地并强迫他们在大地产上劳作的政策。但是这个运动直到15世纪、16世纪之交才开始进行。从1400～1475年——这是大概的日期——地主发现他们过去的繁荣一去不复返了，而新的繁荣并没有如期而至。因此，如果说15世纪波罗的海在西方的供应仍然与以往一样显得充足，不是因为供应增加而仅仅是因为需求萎缩，这种推断难道是出于想像吗?

几乎毫无疑问的是，主要消费区对谷物的需求正在减少，在一些主要的地区的贸易集市、较大的城镇和北欧的主要工业区，居民人数减少了。这个过程细说起来比大致看来更复杂。虽然如此复杂，但几乎无可怀疑的是它对[246]谷物集市的影响。在主要消费区谷物的需求显然缩小了，在全欧无数的地方集市上情形肯定也一样。

绝不能低估地区需求的重要性。在讨论中世纪早期的章节中，我们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用于销售的那部分食物，这些食物能养活没有足够的土地因此不能以自己的生产来满足自身需求的村民、采邑上的佣人和工匠。这个阶级包括农业劳动力、农村工匠和各种小农，他们总在农村生活，但数量时多时少。在许多国家——显然包括德意志和英格兰——这个阶级在中世纪晚期缩小了。随着农村人口的直线下降和对领主的土地和占有其他更大的地产新机会出现，无土地的人的数量，或者说英国农村的无地劳动力的数量与人口的普遍减少不成比例。随着农业劳动力和小农数量的下降，地区消费的购买力也肯定要下降。

正是因为需求的下降，才使得生产的减小和销售的减少没有导致慢性的食物短缺，更没有导致急剧的食物短缺。整体而言，在中世纪后期，制作面包用的谷物比以前更充足了，在 14 世纪的第二个 1/4 世纪特别充足，这时价格比第一个 1/4 世纪下降了 20%。不久就是不断的坏收成和低产量，并伴随 1348 ~ 1349 年非常高的死亡率；但是在英格兰和在国外，随之而来的是“丰收的七十年代”。按照几种欧洲大陆编年史，1375 年的收成是 14 年中最好的，接下来的 4 年也是那么好，一部阿尔萨斯编年史记载，人们“因丰收而累得精疲力尽”。1377 年，英国面包的价格达到 30 年中的最低点，1395 年，在斯特拉斯堡，谷物是如此丰富和廉价，以至于面包师以半便士面包来代替“标准”的 1 便士面包。面包再也没有这样充足过，但是相对充足的时期在 15 世纪的欧洲各地时有发生，以至于历史学家有理由把整个时期作为一个农业价格低廉的时代。最重要的是，在 15 世纪的第一和第三个 1/4 世纪里，德意志的西部、低地国家和法兰西和英格兰的部分地区是供应相对于需求而言接近顶峰的时期。

充足时期的这种反复出现产生了与价格紧密相连的一些问题，对此下文将再次讨论；但此处提到这些问题只是针对一种不合逻辑的推论。谷物贸易 [247] 和可耕地的下降有可能伴随有食物充足的迹象，但不应由此做出判断。另一方面，在农业生产的其他分支内，产量的下降和停滞并不总是与需求的下降相一致，富足的迹象也许没有减少。这样，由于某些还没有得到充分解释的原因，动物食品的供应——特别是黄油——相对于需求更少了，这比谷物的供需之差更大，它们的价值下降得更慢，甚至是上升了。但是这可能属于本章另一部分讨论的范围。

这里讨论的动物产品的分类当然不包括欧洲最重要的工业原料——羊毛。英国海关数据无可置疑地表明，羊毛的贸易在衰落。上面的表 4 - 2 和表 4 - 3 表明英国的出口——西欧最重要的也是惟一向佛兰德、荷兰、意大利出口高质量羊毛的国家——开始从 15 世纪前半叶平均每年出口 35 000袋下降到 15 世纪后半叶的大约 8 000 袋。当然，把这种衰落归因于产量的整体下降是错误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英国同期的布业产量大有增加，消费的羊毛比例比以前更大。实际上，羊毛消费从外国转向英国本土的布业加工者，这种变化是如此明显以至于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仍用下降的羊毛出口的数据说明英格兰的布业生产的上升。但是，这种观点，现在已不能再得到很好的支持了。H. L. 格雷和一些别的人已证明，英国的布

产量的最高峰也不可能解释羊毛出口在14世纪中期的高峰和15世纪后期低谷的差别。

供应的下降，和其他的贸易困难一起，也一样可以解释葡萄酒贸易的混乱情形。我们对莱茵河上游也就是摩泽尔的葡萄酒的出口的命运所知不多，对拉罗查勒的情形几乎更是一无所知，但是对南部的状况和最重要的葡萄酒地区加斯科涅地区知道得相当多。这个地区不仅经历了这个时代普遍的经济困难，而且也感受了英法战争的军事行动的直接影响。有时，仅仅只有波尔多和它的近邻逃过普遍的破坏。葡萄园的损失在14世纪出口的统计中得到【248】了真实的反映。这种衰退，只是在14世纪最后10年被中断了一阵子，15世纪又重新开始。15世纪中期，法国对加斯科涅的占领导致了对英贸易的完全中断，这几乎剥夺了加斯科涅最重要的消费者；对英出口，在30、40年代平均达8 000～10 000吨，有时甚至超过在15世纪初的情况，在50、60年代下降到几乎不超过5 000吨。直到15世纪80年代英国商人才开始再次大量地出现于波尔多的葡萄酒集市，直到90年代英国对加斯科涅葡萄酒的进口才恢复到60年前的水平。见表4-4：

表4-4　　14世纪波尔多葡萄酒的出口①

（年平均）

年　份	吨
1305～1307	95 650
1308～1309	102 724
1310～1311	51 351
1328～1330	81 366
1335～1337	45 315
1348～1350	9 675
1352～1358	19 681（仅包含其间5年的数据）
1363～1370	22 111（仅包含其间6年的数据）
1372～1373	14 373
1374～1379	13 297
1379～1381	7 842

当然有可能在欧洲的有些地区，这种不规则并且可能在缩减的葡萄酒供

① 14世纪葡萄酒进口的数据来源于M. K. 詹姆斯（James）的《中世纪葡萄酒贸易研究》（牛津，1971年）。【26】

应因啤酒供应的上升得以补充；用蛇麻子制成的啤酒是衰落的中世纪的重要产品。自14世纪中期以来，在德意志北部的许多城镇（尤其在汉堡）以及在荷兰北部的城镇，啤酒产量连年上升。但是，历史学家不十分清楚中世纪各个地区各个社会阶层的消费情况，因而也无法判断在多大的程度上啤酒真的可以取代葡萄酒，或者在多大的程度上，啤酒只是取代了浓啤酒和其他档次更低的饮料。

残存的资料也同样无法准确地说明其他食物贸易的状况。对布尔讷夫湾的盐贸易，我们知道得最为详尽。现有的材料表明，在15世纪，至少这里【249】的产量和贸易是在增长。不过，资料并没有充分而连续地说明四五十年代海盗和战争的影响，我们对其他地方，比如卢伦堡、西兰岛或德意志的盐出口也知道得不多，因而不能夸大盐湾贸易而认为其他地方的贸易可能在下降。从英国产盐地来的证据表明，那里的生产至少说是停滞不前的。主要产盐中心罗斯维奇和美德维奇的封建农场，税收大部分（尽管不是全部）来自盐锅，它从1301年的168英镑降到1347年的130英镑再到1368年的90英镑。间接证据——缺乏数据——表明，盐业生产的低迷此后至少又持续了一个世纪。[①]

国际盐业的衰落还有一个尽管间接却更具普遍性的迹象，这就是鲱鱼贸易的兴衰——它是制盐业最重要的主顾。斯堪的纳维亚的渔业在15世纪仍很活跃，直到下一个世纪或一个半世纪才最终衰落下来；但是它不再发展并经常因战争和年成不好而萧条。在15、16世纪之交的好年成鱼在这里的捕获和腌制数量还像从前一样地多。法尔斯特波（Falsterbö）是绝大部分斯堪的纳维亚渔业的集中地，1537年那里至少腌了100 000桶（大约10 000吨），这个数字比1368年在同一地方腌的鱼少了20 000桶。但在这一段间隔期的有些年份，鱼的捕获和贸易量仅相当于1368和1537年数量很小的一部分。汉萨同盟和斯堪的纳维亚国王之间反复发生的战争，以及佛兰德和英格兰的政治冲突，不断地影响渔业和出口。也许渔场自身也开始显示出鱼源枯竭的迹象，在1411年、1412年、1416年和1425年有对坏年成的抱怨的记载。在20年代后期，战争既中断渔业也中断贸易，但结果却是一件隐藏的好事，因为随着和平的来临，产量又恢复到1432年和40年代中期的最高水平。但是，到15世纪中期，对捕鱼无收获的抱怨又变得频繁起来，之后，

① H. J. 修伊特（Hewitt）：《中世纪的柴郡》（曼彻斯特，1929年），第118～119页。【27】

这种状态经常间隔一段时间就又再次出现。①

渔业贸易的上述状况——如果是真实的话——与这时重要的采掘业有着鲜明的相似性。尤其是采矿地区，经历了一个旧式经济学家描述的利润快速【250】缩小的时期。这些征兆是地方性的，抱怨也不是长久的；此时欧洲矿业的许多分支，可以说，“按时”发生一个不景气的时期，而不管同时期内手工业和贸易整体情况如何。它们迟早要为前一个半世纪的快速和长期的开发付出代价；对许多矿井来说，14、15世纪是它们遭殃的时候。到那时，煤层已枯竭了，而在其他地方继续开采所遇到的技术问题已超出了中世纪所能解决的范围。

从这点来看，最典型的就是欧洲银矿开采的历史。在所有开采银的地区，不管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都开始显示出矿源枯竭的景象。英格兰的德比郡（Derbyshire）和德文郡，法兰西的波伊图和马斯弗的中部，也许还有意大利的撒丁，矿源都在中世纪晚期逐渐耗尽；但是，最明显最重要的是银矿开采在它的主要中心中欧和东南欧的衰落。匈牙利的银矿自8世纪以来就被开采，12、13世纪达到了顶峰。萨克森的矿业尤其是拉姆尔斯堡的矿业，自10世纪开始就是欧洲的主要的银和铜的矿源，到13世纪它的产量和繁荣的高峰就过去了。弗赖堡的矿业是十分重要的，它在12世纪崛起，到14世纪初达到发展的最高峰；梅森、蒂罗尔、卡林西亚（Carinthia）的银矿开发，尤其特兰西瓦尼亚和位于伊（Huy）格罗和阿尔滕堡的波希米亚的富矿的发展，差不多是同时代的，奇里乞亚（也许还有摩拉瓦亚）银矿的开发要迟一些。到14世纪中期，差不多所有这些地区的采矿业都进入了一个萧条期，直到15世纪后半期才走出这种萧条。水是银矿开采最大的敌人。地下作业达到的工作层处于地下水泛滥的危险中，为处理地下水的问题经历了无数次的实验和无成果的努力，直到50年代晚期哥得的马丁·克劳斯（Claus，Martin of Gotha）的实验解决这个问题以后，萨克森的采矿业才在【251】规模上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②

---

① D. 沙费尔（Schäfer）：*Das Buch des lübeckschen Vogts auf Schonen*（哈勒，1887年），第39页及以后。【28】

② 参见第十章，第721页；伯哈德·纽曼（Berhard Neumann）：《金属，历史，矿藏》及其他作品，全书各处；E. 瑞尔（Reyer）：《锡》，第66页及以后；L. 刘易斯（Lewis）：《锡矿》第33页及以后．；C. 纽伯格：*Goslars Berghau bis 1552*，第55页及以后，第78、106页；A. 威赫曼：*Jahrb. d. Gesellschaft für Lothringische Gesch. u. Altertumskunde*（1905年），第3页，第56页及以后；路德维格·贝尔（Ludwig Beck）的《铁的历史》（不伦瑞克，1891～1892年），该书与数量完全无关，但其第1卷中的中世纪部分（第643页及以后）有力地支持这样一种印象，即中世纪晚期铁和钢的使用总体上是有发展的。【29】

银业开采的兴衰得到了很好的记录和研究。这是因为中世纪欧洲的整个流通依靠正是银的供应，而且价格水平不可避免地与这种供应相关。历史学家因而对银比中世纪欧洲的其他的矿业部门知道得更多一些。但是，可能除了铁外，中世纪绝大部分的矿业和金属贸易经历了与银一样的变迁。铜在萨克森和匈牙利被作为银的伴生矿得到开采，它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瑞典的铜产量因为开发时间较晚发展得相当慢，也许有一个比较平缓的历程。另一方面，英格兰的锡业——也许是欧洲矿业中最古老的——也在 14 世纪晚期和 15 世纪收缩了。至少在这种产业面临着类似的繁荣之前有一次这样的经历。13 世纪早期，德文郡的古老矿藏已经显示衰竭的迹象，锡业不得不进一步向西移至康沃尔。14 世纪轮到康沃尔锡业中心遭殃了，它的产量从 14 世纪 30 年代的每年 132.8 万重量单位降到 50 年代中期的不到 50 万重量单位，14 世纪末一度又恢复到了 160 万重量单位，但不久它又衰落下去并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大概低于 90 万重量单位——在整个 15 世纪都是这样。其产量直到进入 16 世纪才达到并超过黑死（Black Death）病之前几十年间的水平。这种衰落在其他重要的产锡地区，在波希米亚的津恩伍德和阿尔滕堡没有表现得那样明显，持续时间也没有那样长，但是在那里上升的趋势在 15 世纪前半期也被中断（胡斯战争，Hussite wars 是主要原因），产量直到 70 年代才完全恢复。[1]

只有铁业似乎逃脱了这种不景气。首先，它更分散，也比其他的矿业部门更依靠地方的条件。有可能也是由于那时对各地手工业的发展起破坏作用的混乱和战争刺激了枪支、大炮和各种武器的制造，在主要的铁加工地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战争繁荣。因为至少在两个欧洲富矿的源地——瑞典和巴杨恩—贝尔巴鄂（Bilbao）矿——产量继续保持在与过去没有多大差异的水平，其差异是如此之小以至于没有引起当时的评论家的注意。在欧洲大陆 【252】 上，许多其他的重要铁中心——甚至在贫矿的洛林地区——铁业在 15 世纪后半期经历了一次技术发展——熔炉建得更好更高，更多地用水来驱动风箱并使用铁锤——这表明铁业的发展。这种发展在时间上有多近、在范围上有多普遍、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战争需要——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有待解决。

对工业部门的这种归类——不管其上升或停滞——不提到布业这个中世纪最重要的手工业就不能算完整。当然，这里并不是阐明它在中世纪晚期的类型的最佳地方。假如将欧洲视为一个整体，中世纪后期将显示，布业既在

---

① 参见第十章，第 720～723 页。【30】

上升又在下降。当它在佛兰德（还有可能在法兰西）衰落时，它在别处繁荣。14世纪，布拉班特布业的繁荣似乎要归因于佛兰德。14世纪中期，英国布业向前飞速发展，在14、15世纪之交达到顶峰；15世纪荷兰的布业，尤其是雷登的布业，开始前进。我们知道许多更小的布业中心这时的发展也较突出。但是，除非有一个统计调查，否则就无法表明是否新的地区的手工业的活跃能够抵消它在佛兰德的衰落；综合数据是缺乏的。但是，从原材料供应的下降判断，布业，尤其是供出口的高质量布的产量，也必定降低了。在佛兰德、布拉班特和荷兰，高质量的羊毛这时最重要的来源是英国，而英国毛纺业却呈下降的趋势。

布业的历史是整个中世纪后期贸易和手工业历史的一个缩影。当时许多其他行业的记录，一样由于地方性的对立的运动而处于支离破碎和混乱的状态。整体而言，欧洲经济的上升和下降是不规则的，这是经济学家所谓的短期波动——它打断了连续的下降的趋势。尤其重要的是，14世纪最后1/4个世纪和15世纪的第二个1/4个世纪标志着英国和其他国家经济的复苏，不管这种复苏是多么突然、多么短命。然而，就更广的意义来看，欧洲贸易在中世纪晚期经历了一个足够长的波谷时期——有时长达一个世纪以上——[253] 有理由认为这是一个“长时段”的衰落。

现在人们对这种不景气的认同是普遍的，但是对它的解释都有许多种。这种萧条是否足够“普遍”，也就是能普遍地适用于十分广泛的行业范围，并因此能够找出一个能够解释其发生的共同因素呢？有些原因无疑是偶然的和靠不住的；厄运——是地区性的暂时的——在每一种主要的贸易和工业的记录中都会发现。胡斯战争对波希米亚的矿业造成了影响；加斯科涅的动乱干扰了葡萄酒的贸易；斯堪的纳维亚战争中断了斯堪尼亚鲱鱼的捕捞和腌制业；玫瑰战争可能干扰了英国的出口；暴动明显地影响了佛兰德的布业贸易。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有时多个偶然会重合，但未必有很深的联系。有些历史学家可不愿意把这些仅仅视为一系列的偶然和巧合，他们的这种看法是可以被谅解的。

它们无疑有偶然和巧合。然而，有些事件，即使是孤立地看待，在进一步思考后也会感觉它并非完全出于偶然。如果认为汉萨和丹麦国王之间的军事和政治冲突实际上是由前一个世纪汉萨势力在斯堪尼亚渔场和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渔场的大规模扩张造成的，或者认为正是由于前一个世纪的工业增长才酝酿了佛兰德的社会战争，这种观点并不显得过分牵强。在全欧各地与

深井作业的困难和地下水淹没的严重危险做斗争的矿工们，其活动看似彼此毫不相关，实际上却更非出于偶然，而是更确实的植根于此前时期的扩张。在一个不是纯经济的领域，有可能把重要的贸易线路的逐渐受阻（在别处已经介绍过）解释为中世纪后期法兰西和神圣罗马帝国逐渐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相互冲突造成的或多或少无法避免的后果——前者是地方习俗的加强，后者是中央王朝的衰落。

但是，对共同原因的猜想并非仅仅是建立在这些考虑上。更为重要的是应揭示出一些类似于能够解释中世纪早期上升运动的深层因素。首先，便是物价。正如12、13世纪的扩张伴随着全欧的物价陡直上升一样，14、15世纪的下降也伴随着价格的改变，这种改变同样是连续的，尽管可能并不引人注目。有些变动趋势上文已经谈到；在这里必须更仔细地考虑它们。谷物的价格系列是历史学家最易收集和研究得最普遍的，它表明全欧的价格用稳定的交换媒介来表示是下降了或停滞不动。由已经过世的贝弗里奇（Beveridge）爵士和他的小组收集的英国小麦20年的平均价格的变动方式如下（见表4－5）：【254】

表4－5　　以20年为期的小麦价格

年　份	小麦价格以先令计（每夸特）	小麦价格以白银格令①计
1300～1319	7.01	1 734
1320～1339	6.27	1 547
1340～1359	6.31	1 372
1360～1379	7.55	1 508
1380～1399	5.57	1 113
1400～1419	6.37	1 188
1420～1439	6.65	1 107
1440～1459	5.56	926
1460～1479	6.02	812
1480～1499	6.40	852
1500～1519	6.91	920

可见，除了受连续坏年成影响的1360～1379年的时段外，当时小麦的价格有一个下跌的趋势，小麦的银价几乎是没有中断地连续下降。在同样的

① 格令（grain），一种很小的重量单位，等于0.0648克；亦为珍珠的重量单位，等于0.25克拉。——译者注

早的时期，具有相同代表性的可比较的外国价格并不能得到。被非常普遍地使用的两份材料——哈瑙尔（Hanauer）对阿尔萨斯和德阿文内尔（d'Avenel）对法兰西的收集——都经不起仔细的分析，也不能支持任何可靠的历史结论。这两个系列所能产生的只是一个模糊和笼统的印象。

然而，我们不应过分轻视并排斥一些普遍的印象，尤其是它们碰巧与其他的和更可靠的证据一致时；这种印象之一是大陆上的价格——以银为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英国价格表现出来的趋势。这种夸大显然归因于当时的通货困难，因为虽然英国铸币保持相对稳定（直到1344年，英国货币中银的含量仍为246银衡镑，随后逐渐地减少，到1461年下降为133.20银衡镑），14、15世纪法兰西和欧洲大陆许多别的国家银贬值很厉害。这种贬值如此快速和连贯，以至于不管当时的价格上升多少，也不能与之保持同[255]步。根据最近的权威说法，佛兰德的伯爵一度故意控制他们的通货以使那里的生活和薪金价格落在国际价格之后。

然而，不管法兰西和阿尔萨斯的价格趋势如何被夸大，它们运动的方向与其他的更可靠的系列的趋势相同。后者应该可能包括佛兰德1375年以来的价格系列，它由国际价格委员会收集。该资料表明，当时的小麦价格在1375～1425年间相对稳定，然后在15世纪第二个25年，有个暂时的陡直的上升，在接下来的25年内又相当陡直地下降。到15世纪第三个25年末，小麦价格比1375年高出大约9%，比1400年高出大约5%。在同一时期，以银衡量的价格显然是下降了。见表4-6：

表4-6　　低地国家小麦每年的平均价格[①]

（价格指数：1375～1399年=100）

年　份	当期价格
1375～1399	100
1400～1424	104
1425～1449	138
1450～1474	109

① 关于佛兰德的价格，我要感谢已故的贝弗里奇爵士的慷慨相助。这些数据来源于印刷材料，主要来源于H. 范霍特（Van Houtte）的《价格史资料》。哥尼斯堡的价格（表4-7）来源于佚名收集的9世纪中期的谷物价格，它被记录在普鲁士教会的档案中，引自W. 艾贝尔（Abel）的《农业危机与农业经济状况》（柏林，1935年），第32～33页。【31】

佛兰德数据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与世界价格的联系。低地国家是谷物的重要进口国，它们不只从一个遥远的地方进口，通常从整个波罗的海进口。它们因此对欧洲生产和贸易的普遍趋势比英格兰这样相对自给自足的国家对价格更敏感。从这一点来看，即使我们对同期谷物主要出口地，也就是波罗的海东部地区的价格变动的数据拥有得并不多，但也值得引用。19世纪中期在一个佚名者以普鲁士骑士团的哥尼斯堡记录为基础编辑的资料中，以银为单位表示的裸麦的价格显示出一种与西方谷物价格惊人的相似。15世纪哥尼斯堡的裸麦价格变动如表4-7所示。由于15世纪地方货币的过度贬值，"当时"的价格实际可能上升了，但是这种上升相较于马克的过度贬值来说可能是和缓的。 [256]

表4-7　　哥尼斯堡的黑麦价格

（价格指数：1399=100）

年份	价格（白银）
1399	100
1405	89.29
1432	85.32
1448	79.81
1494	49.84
1508	36.48

如此连贯的价格运动一定会对经济生活产生明显的影响。农产品价格的下降正好伴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陡直上升，这样必然减少了大地产耕作的利润，削弱了各地为市场进行的商品生产。由于缺乏对奢侈品和准奢侈品的贸易的统计资料，因而很难说它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影响。上层阶级的购买力和他们对商品的需求是否随着工农业利润的下降而下降呢？

一般来说，这种相互关系是可能的，但是价格影响是否比这更进一步，是否它也导致主要手工业的萧条？这需要大量的其他方面的考虑。首先，它依靠价格改变的普遍程度，也就是说价值变化对中世纪商品的整个范围是普遍适用的。它也依靠中世纪生产者对价格刺激的敏感度；尤其是那些其收入依靠"经济作物"的农业生产者的敏感度。

整体而言，这些证据在两点上并不支持把价格作为萧条的主要的，虽然不是惟一的原因的假说。我们对中世纪的价格的知识主要局限于谷物，但有可能得到其他的系列证据表明价格的下跌是特殊的、部门性的。因而，它并不表明布的价格或铁的价格或实际上别的商品的价格一起下跌，或者与农产

品的价格下跌的比例一样。尽管在托罗德·罗各斯的庞大的资料收集中，数据是那么多样并且难以详细比较，但是它们给人的鲜明的印象是，手工业品【257】的价格绝不与谷物价格的变动同步。建材价格一直上升，一直到14世纪中期，在1370~1425年间才多少稳定下来，此后以一种比谷物价格要慢的速度下降。纺织品的价格（在这个收集中是最不可靠的）显然在1375~1440年间是下降的，之后才上升。铁的价格在14世纪下半期上升很快，在15世纪有较慢的下降，1475年的水平比1350年高4%。用小麦蒲式耳表示，14世纪后半期铁的价格指数，从14世纪前半叶的100增到1351~1360年的159和1389~1400年的352。

因此，各类商品的价格并没有一起改变。即使在农产品内部，各类作物价格上升和下降的时间和幅度也与小麦有所不同。尽管可能就托罗德·罗各斯收集的各种家畜和畜产品的价格做出判断，但它们的价格和小麦价格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

价格用银表示可能会夸大其下降的程度，但是这把这两个系列之间的差异表现得很明显。畜产品的价格用当时的通货显示实际上是上升了，在1401~1425年比1351~1375年高出许多，在1451~1475年并不比一个世纪前低多少。实际上，以当时的价格来计算，1351年后的系列继续前两个世纪开始上升的趋势，并且至少又持续了125年。哈瑙尔对阿尔萨斯的数据的收集，不管多么不足；戴维尔收集的法兰西的数据，不管多么另类，但是却足以说明在西欧的其他地区，这两个系列至少像在英格兰一样有差异。把哈瑙尔的1351~1375年的银价作为100，我们发现1400~1425年谷物的价格下跌到64，同时畜产品的价格跌为87。哈瑙尔的银价，并不是那时的，从此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但当谷物的银价指数在1350~1450年从100下降为71时，畜产品的价格保持在100。在随后的银价崩溃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法国铸币的贬值），谷物价格指数到15世纪末最低跌至40，但畜产品的价格仍保持在54到56，比谷物价格高40%左右。

类似的——不是更可靠，但是同样有意义——大多数畜产品的资料差不多可以从每个欧洲大陆国家得到，但是这些数据中没有哪种价格比黄油的价格更有意义并且得到更好的研究。黄油贸易对不知情的人来说有点微不足道，不足以作为这样的讨论的基础，特别是不足以作为对中世纪经济整体进行讨论的基础，然而即使是在一个较小的规模上，其价格指数的变动也可以【258】被证明具有十分广泛的意义。因为黄油是一个在广大领域内流通并能够支配国际价格的商品；更重要的，它是一个进入大众消费的准奢侈品。当我们知

道这一时期一个普鲁士的劳动力每天的收入相当于30公斤裸麦时，就没有必要知道阿尔弗雷特·马歇尔所谓的对面包需求的弹性，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推断出不管其价格多贵，农业劳动力现在富得也可以奢侈地享受一点黄油了。黄油的价格因而对供需的改变高度敏感，它作为一个集市的晴雨表比更必需的食品的价格更敏感。因此，黄油的价格和谷物的价格如果比任何其他的商品的价格的差异更大就会显得非常有意义。在所有主要的供应点——荷兰除外——瑞典、挪威和波兰西部，无论是以当时的通货还是以银价计算，14、15世纪黄油价格上升急剧。其中以在挪威的上升最剧。在那里，黄油价格经历了大约七八十年相对平稳的价格上升后，到14世纪60年代突然上升了10%，到1400年上升了33%。在15世纪，价格继续飙升；到1457年，竟高于1400年的200%，随后10年又下降到1400年的100%。另一方面，从波罗的海进口的裸麦的价格变动相对较少，假如不是有所下降的话。裸麦和黄油价格的类似差异在瑞典和普鲁士也是一样，尤其是在波兰内地，普鲁士的海港从那里进口大部分黄油。在克拉科，裸麦的价格指数在1398～1450年从33降到10，但同期的黄油价格从10上升到33，也就是3倍有余。① 【259】

表4-8　　英国畜产品和小麦的价格

（价格指数：1351～1375年=100）

年　份	小麦	畜产品和家畜
1351～1375	100	100
1376～1400	71	88
1401～1425	70	99
1426～1450	70	89
1451～1475	55	76
1476～1500	53	68

从现代的观点来看，黄油的价格运动背后的准确原因并不比它与谷物价格运动不同这一事实更有意义，它比其他的价格系列更充分地证明，把一个显然只局限于谷物的物价趋势一般化是多么的危险。实际上，即使在谷物贸

① 朱利安·佩尔克（Julian Pelc）：*Ceny w Krakowie w latach, 1369－1600*（勒沃，1935年），第127页及以后；另一组黄油的价格，可参见J. 施赖纳（Schreiner）：*Pest og Prisfall in Senmiddelalderen*（奥斯陆，1948年），第82页。【32】

易中，价格的影响也并不与生产和贸易的变化有十分明显的联系。然而，在绝大部分欧洲国家，当以银计算的价格下跌时，以当地的通货表示的价格却在上升，像在法兰西的大部分外省和德意志中部这样自给自足的地区，最起作用的是当期价格，因为生活花费、薪金比率和农业赢利的波动是与当期价格相联系的。在英格兰，价格在14世纪的第二个25年内的中断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的下降的趋势既不连续也不明显——并不比早期上升的趋势更连续和明显。代表英国物价的长期运动趋势的，可以说是建立在25年变化平均值的基础之上的曲线，差不多是水平的；实际上，1500年的物价比14世纪第一个1/4年的物价高出10%。这一时期的最低价——1450～1475年的价格——仅比1300～1325年的价格低20%。以银计算，英国物价下降得更急剧；不过即使这样，其降幅也未超过25%；从1340～1440年这一世纪，每夸特小麦的价格从1 372银衡格令下降到1 107。就是在这一百年（1340～1440）间，英国的农业减产最多，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要改变。

因此，这个时代的经济变动尤其是商业发展的趋势与谷物价格变动的规模并不相称。这奇怪吗？谷物价格的改变能影响生产和贸易的惟一方式是导致上市商品的供应更大或更小。但是，本章的前面部分已经强调过，农业价格绝不是惟一的，或者也不是主要的经济刺激的手段。农业生产者过于自给自足，以至于不能从直接的商业考虑来安排生产和支配他们可出售的剩余产出；在中世纪的后期，这种自给自足的成分增加了而不是下降了，或者相同的是，对价格敏感的农业生产者的比例比以前更少了。因此，为探询中世纪晚期物价下降的趋势的主要原因而从谷物价格中寻找，比为解释早期的上升趋势而去从谷物价格中寻找，更没有道理。

这种疑惑由于货币因素的不稳定进一步加强。为什么物价看起来能提供【260】一个明显而吸引人的解释呢？原因之一是，初看上去它们能比较容易地被用于说明当时贵金属供应的变动情况。从欧洲银矿开采得来的银供应逐渐衰竭，这时银矿开始进入衰竭期。戈萨拉地区银的供应在13世纪减少了，从中欧和东欧其他的矿区来的银，也在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减少或者完全停止了。这也是地方银缺乏的证据。实际上，英国王室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1344年、1346年、1351年、1412年和1461年进行重新铸币，目的是期望解决当时铸币的含银量与短缺的供应和银价的上升间的矛盾。

现在，这种观点看来已被普遍接受。但是，它与价格下降这一现象间的联系，并不如初看上去那样明显。首先，有一个纯粹的对时间和地方考查的历史困难。价格运动并不简单地与采银开始下降的时间相一致，也很难说它

们与产银地之间存在地理上的联系。戈萨拉的开采在13世纪已经萧条了，别处的银矿开采在14世纪中期才达到最低点，但价格的下降直到14世纪前半叶的某个时候才开始，此后好久才开始变得普遍。15世纪50年代，银又开始从萨克森流出，然而，如果以银计算，商品价格是较低的，至少在英格兰，价格下降一直持续到1480年。而且，价格变化在离新的银矿最近的地区比在别处并不更早、更明显；很难从克拉科、阿尔萨斯、荷兰和挪威地区的价格系列的差异中分析出人们熟悉的同心波动的后果，一般情况下，通过这种同心的波动这些矿区的投资和雇工方面的下降，能在整个欧洲传播矿业萧条的影响。

还有一些更为普遍的观点，其中有些在讨论13世纪价格上升时已经提及。首先，新银矿在高峰时期每年的增加量并不如银供应的其他可能的或实际发生的改变大。到1300年或1320年，这是大陆矿区的银供应明显下降的时间，欧洲全部的银储备，比较于每年的产量，必定是十分巨大的，因为它已经把以前数量庞大并且不断上升的产出积存了至少两个世纪，也许是3个世纪。当这个存量相当于它每年增长量的200~500倍时，国际银价更多地受银的利用方式的影响，而不是受它当时从矿井出来后的流量的影响。由于利润较低导致的手工业和农业的投资下降，金融技术的变化，通货转入王室和它的士兵手中，对银带扣和纽扣需求的增大，所有这些现象中的每一种都可能也应该对银价产生一样的影响，而且至少像新的银块供应的改变的带来的影响一样大。【261】

关于白银供应的假设更加令人难以接受是，即使矿区开采的新金属影响了白银的国际供应，其程度也不足以决定单个国家的白银供应。各个国家依靠国际贸易得到贵金属，因而在中世纪晚期的国际贸易结构中，有些国家赢得了较大的平衡而有的国家没有；贸易收支的变化与银矿开采的增减并不同步。据粗略计算，15世纪英格兰的贸易在有形贸易账户上在50 000~150 000英镑间波动，平均大约相当于英国外贸总值的一半，超过重铸货币年代铸币厂进出铸币价值的两倍。如果14、15世纪，如果羊毛和谷物出口一旦下降，那么，这种下降带来的亏空，是难以通过对羊毛的高额征税、英国布出口的增加、佛兰德布进口的近乎停止来弥补的。所以，持续不断的白银进口就有了充足的理由，15世纪的诗歌《糟糕的英国政策》（*Libel of English Policy*）的出现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在诗中，见多识广的作者是这样描述普鲁

士（Prussia）[1] 进口的：

银盘个个货真质实，

他们买进的数大量巨，

都产自波希米亚、匈牙利。

在贸易的恢复时期，比如14世纪最后的25年和15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即这首诗写作时，贸易的平衡和银块的进口不仅在与那时的整个贸易相比，而且在与前几个世纪的贸易收支相比都大大地上升了。确实，这种可见的平衡有可能被教会的什一税所吞没，并且经常被战争和国外的驻军的花费消【262】耗，但是，所有这些意味着，银从这个国家的流入流出是因为战争和国外产品上的花费，而不单是银产量的改变。[2]

这样就有了价格波动，而且其中许多伴有重要的后果；但它们不能完全归结为货币的原因，而且它们不是普遍的。价格变化不是统一的，而是主要局限于谷物。在这里就要谈到一个因素，它在中世纪早期就以相反的方向变动，这就是人口。在一个广泛而且主要是理论的基础上，人口的下降与我们资料所显示的所有现象相一致，它将不会招致其他一般的解释所容易招致的反对。当人口下降的时候，许多边缘地带的土地完全有可能被废弃，食物将在更好的土地上生长。相对于食物生产需求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数量，并且相对于食物的需求，“供给变得更充足，价格也更便宜。因此，”完全有理由期望，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供应的丰富很少与更小的产量和更低的价格伴生。可以说，人口的下降对价格有一种选择性的影响，它将有助于减缓大量生产带来的生产成本上升，从而降低农产品的价格——或者，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讲，可以避免边际产出的急遽下降——但对边际产出不存在递减的商品，大多数工业产品，不存在什么影响。同时，银的人物均拥有量会提高，这将抵消银矿供应下降带来的影响，甚至可以抵消经济学家描述的“流动资产的紧缩性变化”的作用——历史学家把这种变化称为金属储藏倾向的提高。它将有助于提高大量人口的有效需求，也就是刺激他们对食品和其他商品的开支，因此，导致对需求波动特别敏感的准奢侈品的价格更高、供应

① 从前后文看，疑为英国之误。——译者注

② 如果用黄金的话这个问题会更加复杂。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在14世纪的中期、甚至在这之前，引进金铸币．意大利和拜占庭的黄金和金币通常用于国际结算。白银的价值，不管它在地方上是不足还是过剩，因而都要受白银和黄金的兑换率的影响。这两种金属的价值通常与官方的或铸币厂的交换条件不符，银脱离或进入铸币是很经常的。当这种变化发生时，就如贵金属供应的任何改变一样，足够影响地方白银的丰歉。【33】

更多。

所有这些都是理论，就像所有其他的理论一样，乍一看显得太简单不能适用于中世纪无限多样的情况。但是，这些观点完全是从纯粹描述性的证据和纯粹经验性论证中产生的，实际上它最初是被中世纪历史研究家记录下来的历史事实，而那时的研究者对这些现代人口理论可谓一无所知。为了更明确地说明，收集一些证据可能是值得的，即使这意味着超出了本章主题的严格的范围。 【263】

最熟悉的证据来源于表明人口减少的地形记录，尤其来源于中世纪晚期空旷的房屋和荒废的田地。在英格兰，既没有对早期的殖民经历也没有对晚期的人口减少的历史进行仔细研究以得到统计估算，但是处理国外资料的历史学家正好有非常数量化的头脑；假如他们的结果可信的话，整个中世纪晚期弃耕的土地和财产占以前所有的土地的很大一部分。在德意志西南部的威斯腾根，14、15 世纪之交抛荒的土地如此之高，在有些地方可以超过地产的一半。最近的估算表明，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地产荒芜的比例也差不多一样高。①

无须说，抛弃耕地的证据倾向于放大它所反映的人口减少的程度。但是假如放弃土地的原因不是因为人口短缺，假设随后发生了土地的重耕和重占，那么，由于人力的短缺仍有相当的土地未被占据或定居。而且，这种人力短缺显然是普遍的，也就是说不局限于农业领域。与人们有时想像接受的观念相反，农村的人口下降不是向城镇移动的结果，因为城镇的人口也一样在减少。在英国，古老的自治市——北安普顿郡、林肯郡——充满了对贫穷的抗议和由于人口减少而对降低王室税收的要求。一个德国历史学家估计，北德意志城镇人口在 14、15 世纪至少减少了 20%，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城镇估计不至于这样，但在那些城市生活数据得到仔细研究的城镇——波尔多、鲁昂和阿拉斯——人口收缩的程度至少表明是一样明显。佛兰德的人口减少前面已经提到。 【264】

人口减少，不管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当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大多是不连续的，有时被新增的人口所弥补；实际上，有些增长是如此猛烈，以至于在缺乏数据时有可能给人一种人口的不平衡已得到成功地矫正的印象。这

① 维尔海姆·阿贝尔（Wilhelm Abel）：《中世纪的荒村》（斯图加特，1955 年），第 5～31 页；施瑞恩纳：*Pest og Prisfall i Senmiddelalderen*，第 58～63 页及其他各处。关于德国荒村的量化分析，参见海因茨·勃兰特（Heinz Pohlendt）：《德国中世纪荒村的蔓延》（哥廷根，1950 年）。第 2 和第 3 章。【34】

样，当大部分英国城镇人口在1350年下降时，在伦敦、布里斯托尔和南安普顿，还有两三个别的港口的人口却保持稳定，有可能一段时期内在英格兰东部、约克郡和英格兰西部的生产布的城镇和农村的人口却是增长的。同样，在15世纪，当法兰西、佛兰德、德意志的中部和北部的城镇衰落时，尼德兰（荷兰）的北部和德意志的南部和东南部的人口可能上升。

这是一定程度上的矫正，但是这种程度不能被夸大。从生产的布的数量来判断——每年大约50 000块布——在英国，从事织布业的工人在它的顶峰期不可能超过25 000人，如果有这样大的话。① 在国外，荷兰的布业在规模上还不足以补偿别处手工业的衰落，正如它的城镇还没有增长到能平衡佛兰德和法兰西城市人口的衰落一样。同样，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的发展还处在初期，还远远不能抵消汉萨经济繁荣的下降。

在地价的下降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人口下降的证据。在法兰西的许多地方，地价持续下降，尽管以当时的通货计算，麦价在上升。在巴黎附近的圣日耳曼—德斯—普雷斯的地产上，租金连续地从14世纪后半叶的每阿庞（*arpent*）84分下降到15世纪中期的55分并进一步下降到七八十年代的30分。瑞典、丹麦和挪威的地价——租金和资产价——在整个时期内都在下降，而且是以一种显然超过谷物价格下降的速度在下降。

最后，还有薪金方面的证据。因为当农产品下降的时候，工资上升了。工资上升的数据将在全欧发现，目前所得最完整最可靠的工资数据是由贝弗里奇爵士发表的有关的温切斯特主教区的采邑上的工资变化情况。这一资料表明，在1300～1350年间，实际工资上升了两倍：这是一种由劳动力短缺带来的生产下降而引起的工资的奇怪上升。【265】

因此，除非等到新的与之相反的证据出现，中世纪后期工商业的萧条必须用数据的下降来解释。劳作的人手更少了，吃饭的嘴也更少了。这未必就让个人的生活更差；实际上，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北欧的劳动人口那时比以前更富裕。然而整体说来，欧洲变得更小更穷了。它的贸易和工业的下降只不过是这个大陆经济紧缩的表现之一。

4.3.2 管制贸易

贸易的这种长期的不断缩减在从事贸易的人身上留下了印记。商人的

---

① 有几种途径来计算这些数据。最简单的是从布价和生产成本来计算。参见M. 波斯坦：《有关人口衰落的一些农业证据……》，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2卷，1950年，第232页。【35】

经济地位，实际上连他们的行为都改变了；没有什么改变比这种伟大人物的消失更典型更与时代一致了。假如中世纪早期工商业发展的典型形象是皮尔恩所描述的商人冒险家，那么中世纪后期的典型代表是稳重的中产阶级。当然，在许多大城镇还可以发现有富人。尤其是英法百年战争产生了战争资本家和投资者的小集团，当时像15世纪法国的雅克·科尔（Jacques Coeur）的职业和财富仍然是孤立的和短暂的；因为这不再是大投机家游走于西欧，建立城市，开辟新的贸易航线，建立新的贸易帝国的时代。这类人完全绝迹了，直到文艺复兴开始才重新复活，在这个时代里，韦尔泽和富格人在德意志崛起，新一代的投资家出现在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所。

15世纪商人的新类型是由几个不同的古老因素组成的复合类型。其一是商人转变为资本家；这种类型本身和它出现于历史舞台的过程，当然比中世纪晚期更古老。中世纪各个时期的商人，在发财后都倾向于退出活跃的贸易。退出后，英国更大数量的商人通常放弃他们与城镇和与城市的关系，到农村做绅士去了。在欧洲大陆上，他们更经常地选择呆在小城做食利者。他们也可能作为不参与具体经营的合伙人，加入其他人活跃的贸易活动中；他们有可能购买城市的不动产和出租地，认购市政府和其他的公共债券，有时也进行私人贷款。[266]

退出后过食利者的生活的倾向，不难得到解释。海外贸易的实质困难并不总是与发财的机会成正比。当国外市场变小时，发财的机会也就更少了。同时，有可能因资本太少无法赢得厚利。就可能做出的判断而言（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足够考察），15世纪英国隐名合伙人投资的期望利润率年平均正好超过10%。而中世纪后期也为人们投资于财政困窘的市政府和国王提供了新的机会，而且这种机会在不断增长，而投资回报率也与投资于海外贸易一样高。

因而，投资下降这一过程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也并不神秘。这种情况在中世纪已经出现在许多富裕的城市。当我们发现13世纪中期的阿拉斯（Arras）的统治阶级大部分是由投资北欧的市镇和王公的资本家组成时，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1世纪晚期到12世纪，在欧洲布业和远程贸易里充当急先锋的许多家族，现在已赚了大钱，他们开始在贷款中追求一种更平静的生活和更少冒险性的职业。像阿拉斯一样，其他的城市也开始从积极贸易的位置退出而仅从事借贷业。正因为如此，阿拉斯很早以来就成为对北欧其他地区进行信贷的金融城市（因为它的手工业早就开始了），这一点已得

到很好的研究；但是一个有着实际眼光的历史学家将不难发现，在一个或一个半世纪以前就经历了扩张和繁荣的许多城镇，在中世纪晚期也经历了像阿拉斯一样的经历。佛兰德商人从事贸易的积极性的消失的秘密很大程度上有可以在食利者阶级的增加上找到答案。早期那些到异域做生意或者做呢绒业雇主的人，现在退向更平静的职业：在布鲁日从事经纪和旅馆业，在各处进行消极的投资。

中世纪晚期，这个过程变得更普遍，或者说，变得更分散。尽管如此，这仍不足以解释商人社会的完全改变。它只解释了新的中产阶级（*bourgeoisie*）的一部分，还有其他的部分并未得到说明。最重要的是，仍然有一些人是在商业性的职业之中而不是之外寻找并找到了安全。他们以一个更小的规模、在一些组织保护较好的集市安全地进行贸易。

【267】

北欧商人在中世纪晚期的社会地位在整体上比别的时代别的地方的商人更低。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这种使意大利的大城镇的商业与汉萨城镇的商业明显不同的社会差异。中世纪晚期，大部分意大利人的外贸和金融掌握在像弗雷斯科巴尔蒂、巴迪、彼卢兹、美第奇（Medici）、戴蒂尼等大的商业银行家族中，汉萨城镇的贸易却都掌握在大量的小人物的手中。不过，这种差异在地理上不像在时间上那么大。中世纪早期，也就是大的汉萨城镇建立时期，历史记录中充满了大家族野心勃勃从事重要事业的行为。在一些像科隆这样的城市，中世纪晚期仍能发现大商人和大投机家，例如向爱德华三世贷款的里姆堡的泰德门（Tidman），或是在15世纪中期想要引导科隆与汉萨同盟分裂的格拉德·冯·维塞尔。在德意志北部的其他地区，不再能找到那类记录。但这并不是因为大的家族完全消失了，在汉萨各地仍有卡斯托普（Castorps）和瓦伦多普（Warendorps）这样的大家族。只是他们已不再像当年在新开辟的易北河以远的土地上开创事业时那样在汉萨贸易中举足轻重。

现在，大部分贸易掌握在拥有中等资产的人手中。作为中产阶级，他们寻求安全并在合作、合并以及众多伙伴中找到了安全。正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汉萨同盟在它们的势力范围内的许多外贸中心保留了他们的工厂或商栈（*Kontors*），也就是有着大量定居人口的代理处或分场。他们的货物被护航队护送着到达布尔讷夫湾，到达英格兰的东海岸和布鲁日。正是他们的贸易在德意志城镇内被下面这类公司性质的机构照看着——比如吕贝克的卑尔根家族公司和舒恩家族公司以及在科隆的英格兰人家族公司。

英国的发展在分界鲜明的时期更显著。在爱德华三世早期，正处于百年战争的开始和爱德华重大的财政行动的时期，资本主义和准资本主义因素在

英国的生活中发展强大。像德·拉·波尔（de la Pole）兄弟，代表的是英国商人阶级的上层，现在从供应军需、组织安排和传送国外的支出、管理国王对羊毛所征的赋税中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他们的经济力量和他们对英国羊【268】毛的垄断在30、40年代达到了顶峰，这时他们形成了几个辛迪加，能向王室贷款并垄断整个英国羊毛的出口。但是，爱德华在50年代的破产导致了他们的分裂；而他们的分裂意味着整个社会秩序的消亡。在这个世纪的最后25年内，加来中心商行（the Staple of Calais）最终形成了，它主要由大量的小人物组成——这些人在15世纪由塞莱（Cely）的三代人来代表。有身份的富裕的商人，虽然是毛纺业中最高层的人物，也不能占到英国羊毛出口的1/50甚至1/100。无须说，非常富裕的个人并没有完全从英国贸易和金融领域消失。查理二世的战争惹恼了不来梅人和里昂人；布里斯托的贸易中值得称道的是罗伯特·查达尔和威廉·坎宁（Canning, William）。在15世纪的伦敦有迪克·威廷顿。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在15世纪的这些人中并没有一个像13世纪伟大的伦敦王朝时代的人那样典型。他们也许不那么富有，他们的数量肯定更少。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不再主导国家的贸易。与王室和外部世界相关的毛纺业的经济和财政权力，现在不靠个人的财富和影响而是依靠公司组织的力量——加来中心市场商行。

中心市场商行不是惟一的。英格兰的“普通”商人，专门从事于羊毛以外的各种商品的进出口，现在第一次像冒险商公司一样出现在档案中。此时，这个名字已经过时了。英国的普通商人向遥远的陆地和海洋冒险时已经是14、15世纪之交了，比冒险商公司的建立至少早了两三代。正是在15世纪，英国贸易结束了其在地理和量上的扩展，这时绝大多数的商业冒险的机会已经消失了，商人自己冒称与他们不再相称的名字。他们的公司名声鼎盛时正是15世纪接近尾声时，它是由财力平平的成员的集体权力和力量组成的。

公司贸易实际上是中世纪晚期的典型特征。中等财富的人联合在一起与【269】富者单独干相比，能干更大的事业。在后来的岁月里，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公司贸易能够服务于巨大的商业投机目的。类似的公司在中世纪早期也可能存在。13世纪佛兰德的大资本家在伦敦不是通过汉萨城镇的汉萨同盟在运作吗？科隆的巨头在同期的英格兰不是也通过类似汉萨机构确立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吗？但在中世纪晚期，公司行动和公司支持成为中产阶级公司的主流。有了它的支持，许多人能从北欧贸易中获利，没有它，北欧的商人就不能成功地运作。公司能保护和限制它们控制的贸易；没有获得集体的权威

的认可，它们不能把集体的权力授予它们的成员。由于这个权威，它们现在可以规定个体企业的规模和方法，定下严格的规定对价格和信贷、销售的条款、与代理商的关系以及对后者的选址和行为等加以规范。

随着个体企业范围的收缩和对公司组织的依附的加强，它们的方法和组织也改变了。这里不应讨论有关中世纪商业技术，但有一个事实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个体企业规模较小，但数量众多，迫使它们采用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意大利和德意志南部的大商号的经营方法。可以说就是更不能独立自足了。单个的在国外做生意的英国公司，或是在英格兰做生意的汉萨公司，或是在安特卫普和布鲁日做生意的荷兰公司，并不总是完全通过自己专有的渠道进行活动。一个大的意大利商号可能利用雇员和同伙来为自己服务，与之相对照的是一个典型的汉萨公司，因为太小不可能维持一个较大的长期的雇员组织，总是努力尝试和利用多少有些独立的代理和中间人的服务。当然这种差异不能分得太明显。大多数在佛兰德做生意的英国商号也派出它们的长期或短期的代表，在卑尔根、伦敦和别的地方意大利商人积极准备着做意大利客户的代理人。但是从整体上讲，北欧的工厂、公司，还有规模更小的个体企业的机制有利于驻外代理和具有外国因素的专业化职业的更大发展。

而且这种公司的发展趋势，不仅在国外与外国打交道时而且在国内从事[270]地区贸易时，都一直保持着。国内的市政府开始投入更大的热情从事属于它们城区的商业活动，这是一个城市规章和城市立法堆积如山的时代。参加地方贸易的权利和外贸的主要分支机构都被加以界定和限制，进入是被限制的。垄断实际上是城市规章的主要目的和前提，也成了城市政策的指导目标。在英法，只有王权，在德意志的北部，只有与其他城镇的政治联系，才能阻止整个欧洲破碎为一个由若干规模小但经济独立的地区（均由垄断的城镇控制）组成的松散的集合体。即使在英格兰、法兰西和汉萨的北部，许多城镇垄断的和公司的利益也十分突出。

城市经济实际上开始接近于教科书对中世纪城镇的虚构：一个很小的地区及其农村带（rural belt）组成自给自足的单元，在它的内部，贸易和工业被分成平均的份额并且由法律来规定。为什么历史学家被误导，把这种虚构作为中世纪经济的代表性式样呢？这是他们对公司城镇规划的经济比对更自由和更少规定的贸易知道得要多的缘故。正是这种规定和控制才产生了许多文件资料，因而在历史上得以长存，而这与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并不相称。

14、15世纪城镇的公司及其垄断特征遮掩住了因鲜有文件记录而被认为并不存在的更自由的贸易以及更自由的城镇活动。即使在中世纪也有

“开放”的城镇和开放的贸易。因为我们知道，北欧的大商业城镇——布鲁日、安特卫普、卑尔根—奥普—祖姆——是自由的港口，在那里允许外国人进入，外国人的贸易几乎不受任何限制，除了居民法和中介法外的法律的限制。自由度更高的贸易的较大或较小的要素在大的商业区（像伦敦）以及以航海为业的地区（像米德尔堡）也可以找到。然而，总起来说，标志着新秩序的并不是这些城镇，而是像但泽这样的城镇，它最终甚至把其他的汉萨同盟的城镇排除出地方贸易；在卑尔根，德意志商人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严密的高度规范化的贸易垄断；在鲁昂和巴黎，那里的地方公司对它们的经营领域十分警惕并一心一意地为之奋斗；在法兰西和德意志还有无数其他的小镇，都沉浸于这种管制良好的僵化中，直到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征服才开始觉醒。

中世纪城市这种垄断和限制性的经济，当然与城镇内的政治和社会变化 [271] 有关。在标志着14世纪北欧城镇历史的政治斗争中，上升的政治派别是手工业行会，他们代表着主要根植于地区集市的小商人的利益。在德意志的许多城镇，在维斯马（Wismar）、罗斯托克（Rostock）、不来梅，实际上包括吕贝克，手工业行会的势力在14世纪后半期和15世纪初上升，把在市政府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的后代扫地出门。相同的革命在别处也发生过——14世纪佛兰德的起义实际上属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和外交主流。除了佛兰德，别处的大部分运动都失败了；在民主政府建立起来的城镇，他们往往几年后就被驱逐，再次被贵族世家的代表所取代。即使在其成功的地方，在其成功的时期内，他们所重新建立的是显赫家族的政治权威，而不是恢复那些曾经使其获得荣耀的条件。前面已经谈到，大家族自身也不再与过去一样，它们主要是地主、食利者、公共官员或其他的仅在名字和个人家世上与他们周围的中产阶级不同的商人。资本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了或者说还未来临。

4.3.3　汉萨同盟

商业萧条，以它在所有的地区变种，影响了整个北欧，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这注定要影响欧洲贸易的政治历史，尤其注定要影响那些对商业变动极为敏感的地区的经济政策。

德意志北部比欧洲其他地区受影响的程度要大。可以很自然地认为，在人口和商业停止增长的时候，德意志贸易的地理范围停止扩展，它的最前线应该停止移动。但泽是德意志城镇建立者的最后一个伟大的基地。在14世

纪开始后，在东部斯拉夫没有建立其他的重要城镇和新的商业据点。日耳曼人最新和最东的定居点——在奥德河和多瑙河上游以远——注定要在一个他们没有同化的文化中和他们从没有完全征服或者整合的经济中成为一个孤立
[272] 的绿洲。

因此，德意志扩展结束的时代应该也是导致德意志中世纪晚期历史上最重要的组织——汉萨同盟——形成的时代，这并不如它所看起来那样矛盾。乍一看，同盟是那么神奇那么先进的一步，以至于很难从其中看到衰败的迹象。然而，从经济和地理事实来看，它象征着在洲际贸易中最盛行的一种集体保护的趋势。因为在14世纪后半期，德意志商业差不多达到了地理扩张的鼎盛时期，此后的德意志城镇急于保住现有的地位，而不能进一步向远方获取新的地位。从这点来看，它只不过是一个联盟，是德意志城镇间为了维持他们在欧洲前一个时代的经济变化中赢得的贸易地位而以政治行动建立起来的联盟。

因此，同盟的崛起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事件；它的早期发展主要是一个立法的过程。它的起点是德意志商人在国外的联合组织。德意志商人在维斯比和伦敦的组织是这种联合组织的早期形态。实际上，这个词首先是在英格兰使用，"汉萨"用来标明贸易协会的商人的权利。到13世纪初，这个词不再用于英国城镇享有特权的区，而只局限于外国商人在伦敦的组织。[1] 这样，13世纪由布鲁日领导的许多佛兰德城镇形成了一个伦敦"汉萨"，在英国政府面前代表其成员，并保护他们的利益和特权。另一个这样的组织是科隆的"汉萨"，它最终发展为一个斯蒂亚德汉萨（Steelyard Hansa），由所有或差不多所有在伦敦贸易的德国商人组成。[2] 1303年的《商业特权法》，它极大地扩展了外国商人在英格兰的特权，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被德意志人作为在英国要加强特权地位的法律基础，把德意志北方的商人作为一个单个的整体来对待。自那以后，英国商人就只知道阿列曼尼人（*mercatores ale-*
[273] *manniae*），而科隆人在伦敦的汉萨就成为德意志人的伦敦汉萨了。而且在爱德华二世（Edward II）时，汉萨商人获得了宝贵的关税豁免权，这使他们比其他外国人，实际上也比英格兰本地商人，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斯蒂亚德

---

① 对这个词的演进的近似的讨论，可参见R. 多赫德（Doehaerd）：《"汉萨"一词的语义》，载《北欧评论》，第33卷，第129期（1951年）。【36】

② 可以推出，但没有明确地被证明，从起源上论有两个德意志的汉萨，一个是科隆的；另一个是伊斯特林斯的，后来就合二为一了：参见M. 温鲍姆（Weinbaum）的"Stalhof und Deutsche Gildhalle zu London"，《汉萨历史丛刊》，1928年（卢卑克，1929年）。【37】

汉萨的公司机构获得了广泛的自治和司法权，并在伦敦市政府分享权力。总之，汉萨人在英格兰的特权使德意志人处于一种特权和自治的地位，可与后来的“特权（Capitulations）”条约相比。

但是，英格兰并不是德意志北方商人惟一拥有公司机构和特权地位的地方。在北欧几乎没有重要的商业中心，在那里，一些德意志人的城镇不能总是获得商业自由的优待，也不能组织类似伦敦德意志人汉萨这样的公共组织。在这些公共组织中，最重要的是德意志人在这条重要交通线路的终端建立的代理站：在布鲁日和诺夫哥洛德。

德意志人在布鲁日的商栈（即 *kontor*），其历史不如伦敦的汉萨那么长，但它逐渐发展成他们在国外的主要贸易站。商栈建立时，布鲁日正将进入它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随着商栈的崛起，佛兰德自身活跃的贸易衰落了，但奇怪的是，布鲁日的重要性随着它的城区的衰落而增长。在 13 世纪和 14 世纪早期，也就是佛兰德工商业发展的高峰期，布鲁日已成为佛兰德重要的经济中心，是四个 *Leden* 之一，但与其他的三个不同，在那里从一开始起商业就比手工业重要。它的布业远远落在根特、伊布雷斯和杜埃的后面；它也没有其他重要的手工业。但是在商业上，布鲁日一开始就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分工。它的地理位置不便于内贸：远离斯科德特（Scheldt）主干道而位于主要内陆交通线的边缘。但它作为一个在低地国家和英格兰之间重要的商业航运港口却非常方便，它的贸易随着佛兰德的布业越来越依靠英国羊毛供应而扩展。

起初，很显然正是与英格兰的联系把德意志人吸引到布鲁日。德意志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讨论，但总的来说，他们似乎认为在佛兰德扎根前很久，德意志人就习惯去英格兰。正是因为布鲁日成为盎格鲁—佛兰德的贸【274】易的中心，它才成为德意志—佛兰德贸易中心的。但是由于德意志人在那里，不久它就不只作为盎格鲁—佛兰德贸易的交接点，而且具有了许多国际商业中心的特征。布鲁日，德意志人和英格兰人习惯前往的海港和大集市的所在地，现在也成了港口和集市，不列颠人、诺曼人、西班牙人，后来还有意大利人都去那里做生意。随着布鲁日变得日益重要，汉萨商栈吸引的德意志人的贸易比例越来越大。在这期间，它的特权、它的联盟组织和它对汉萨贸易的垄断就成为德意志汉萨城市间的突出问题，即使不说是焦点问题的话。

第三个重要的德意志外贸的中心，北部和东部的城镇的商人在那里享受重要特权和拥有一个公共组织，就是诺夫哥洛德的“Petershof”。诺夫哥洛

德是重要的路线的终点和德意志人在俄罗斯进行贸易的重要中心。在中世纪早期，斯堪的纳维亚人、尤其是哥得兰人，可能是第一批在诺夫哥洛德建立商栈的人，在那里拥有一个"Hof"，也就是带旅馆和仓库的货场（yard）。最终，"Hof"转到德意志人手中，并成为一个德意志商人对诺夫哥洛德贸易的公共组织所在地，它受与俄罗斯王公签订的条约的保护，享受他们在别处驻外商栈所拥有的大体类似的自由。

除了在布鲁日、伦敦和诺夫哥洛德的三个主要公司外，汉萨商人还在像作为英国"条约港口"的林恩、波士顿、赫尔和布里斯托尔这样的小地方拥有前哨，或是在威尼斯遥远的代理机构——"Fondacho dei Fedeschi"——另外还在挪威和瑞典的城镇，尤其是在卑尔根的市政机构中拥有更长久的投资。而且，他们曾在低地国家建立临时的公司组织，德意志商人在困难时正好把他们的活动转移到那里。这样一个享受特殊的条约权利和宝贵的商业特权的商业站点网络，经常经由完全被德意志商人垄断的路线联系起来，这个网络形成了一个商业系统，其内部联系的紧密程度，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为之前的欧洲所不能及。

这个系统的主要架构在14世纪初就已存在，但那时这个系统像后期的[275]非正式帝国一样，它的团结和统一应归因于经济因素而不是政治联系。因为，从理论上看，在国外的公司组织仍然是孤立的和独立存在的，也就是属于在其中贸易的商人。从行政和司法的角度来看，汉萨同盟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前叶的崛起，只不过是一个非正式的系统逐步转型成一个正式的系统，把一个个孤立的公司——德意志商人的汉萨——转变成一个单一的城镇联合体。可以说这种转化是如何发生的已经清楚了，无须更多的解释。一样清楚的是城镇联合获得一个永久组织的过程，"家乡"城镇偶尔举行聚会讨论由它们在国外的商人提出的问题，这种会议在14世纪中期可能举行，而且事实上也举行过几次。将它们比较长久地结合在一起所需的只是适当的时机和一个果敢的领导。两个条件都在中世纪的后半期成熟了，这时佛兰德正酝酿着危机，与丹麦的紧张关系加深，最终导致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汉萨战争。

在冲突开始的1367年，各个城镇在科隆聚会，形成了一个颇具雏形的正式联盟，不仅拥有了一个持久的组织，而且还形成了共同的财政基础。联盟在战争中存活下来，1370年结束冲突订立施特拉尔松德和约（Peace of Stralsund）的日子因此被视为汉萨的诞生日。而且，在这些冲突，尤其在与丹麦的冲突中，吕贝克作为城镇的领导和进行袭击的先锋崭露头角。从这以

后，它被看做汉萨内外团结的守护者和政策的倡导者。

这就完成了汉萨同盟崛起的行政和制度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最重要的部分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制度的。它是经济的，在同盟的制度演进背后，经济过程并不是团结和力量不断增加的过程。相反，促使城镇联合的必要性起源于当时的经济地位总体上的危险的恶化。

汉萨同盟内部关系的改变有可能很便利地被首先考虑。一旦汉萨在与丹麦的战争中完全成熟，这个新生的同盟内部本质上的不团结就暴露出来。过去汉萨统一的经济基础是他们在垄断重要路线方面共同的利益和他们为自己在外国市场赢得的共同特权。在利用这种垄断并享受特权时，他们是作为经济联盟而不是竞争者，在这种非竞争性的联合中，吕贝克起一个凝聚的机构作用——这个角色非常符合它的历史和地理条件。德意志的城镇殖民主要归功于吕贝克的开创精神，在易北河以东的许多城镇差不多都是作为它的殖民地崛起的。在早期，由于社会和个人的联系，它们的这种关系会注定继续永远持续下去。吕贝克也由于它在从波罗的海到北海的路线上的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施加强烈的经济影响。只要船运继续沿着海岸线和内陆水运系统进行，进出普鲁士的商品就不得不卸下走陆路穿越日德兰半岛，这样必须通过吕贝克。不管普鲁士和立窝尼亚城镇的贸易增长多快，吕贝克总要从中获利；只要吕贝克继续不可缺少，没有其他的城镇可能挑战它在东部贸易中的崇高地位。 [276]

但是这种地位不能永远维持下去。到 14 世纪后半叶，吕贝克开始失去它在过去的地位，尽管它还没有完全失去大部分特权。首先，它与其他城镇的社会联系变弱了。殖民运动在 14 世纪末就无力继续了，在这之后，吕贝克完全停止了向更新的城镇派送移民。单在普鲁士，城镇继续增长，但它们明显从普鲁士自身吸引城镇人口。因此，在吕贝克仍然记得它是波罗的海城镇的母亲城时，那些城镇已开始忘记他们是吕贝克的女儿城。第二，吕贝克不再是东西航线不可缺少的人口。14 世纪后半期祖伊德泽人(Zuiderzee)——无论是来自坎彭（Campen）、代芬特尔（Deventer）还是祖沃勒(Zwolle)——广泛利用人所共知的通往东部日德兰岛周围的直接航线，即所谓的（*Umlandfahrt*）；他们的先例不久就被西进的普鲁士人仿效，也被东进的英国人和荷兰人遵循。在这些普鲁士城镇中，但泽在四五十年代发展成普鲁士的一个主要的城市；一开始，但泽人就喜欢直接走海路到佛兰德和英国去做生意。最终吕贝克也逐渐失去普鲁士和立窝尼亚贸易中的重

要的份额。到14世纪后半叶，不仅普鲁士和立窝尼亚的城镇在没有吕贝克的帮助下学着与西方进行贸易，而且也在开发它们自己的内陆时获得了一个不断增长的份额。它们离把各自的地区作为自己独有的地区的时候已【277】经不太远了。普鲁士城镇这时已开始拥有对维斯图拉河（Vistula）贸易的垄断，并以此来反对汉萨的其他成员；里加（Riga）也将对戴维那（Dvina）提出同样的要求。

立窝尼亚和普鲁士城镇集团经济上的排他性是其萎靡的一个征兆，其影响将被所有的汉萨城镇所感觉，但只有吕贝克感觉不到。单个地区集团的政策以不断增长的力量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最强大的是普鲁士，汉萨城镇的力量不仅来自城镇的地方经济利益，而且也来自条顿骑士团的独特的位置。条顿骑士团不仅是普鲁士的缔造者也是其统治者，他们组织普鲁士进行征服并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王公对其各省施行统治。不同于德意志许多其他的统治者，骑士团的统治非常有效：它的行政管理高度中央集权而且组织得非常好，它的城镇从没有像德意志其他地区的城市那样享有独立权力。因此当汉萨出现时，它不得不作为一个参加者接受普鲁士的城镇，而且接受普鲁士整个国家，也就是说接受条顿骑士团和它的最高统治。

对汉萨同盟来说，与条顿骑士团的从属关系无疑是一个政治力量的来源，因为最高统治者在国际政治中拥有一个不容轻视的地位，它的加入在地区性国家中给了汉萨一个正式的位置。用当时的法律用语，最高统治者是联盟的保护者；有点像汉萨帝国的王公。不过，条顿骑士团的排他性是它衰弱的根源。这种纯粹的排外的表现没有哪处像在条顿骑士团的商业企业中表现得那样明显。它大规模地从事包括谷物、木材和其他商品的贸易。它拥有一个复杂的商业组织，总部设在马里恩堡和科里格斯堡，拥有统一的商业船队，在普鲁士和欧洲其他的大中心拥有驻外商栈。在所有这些贸易中，条顿骑士团非常像汉萨城镇的竞争者或者是它们自己城镇的竞争者。而且，它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势，以一种最有利于它们自己的商业利益的方式，规范内部贸易。

对普鲁士孤立的属性就说这么多。另外一个有着强烈的自身利益的集团是汉萨的西翼，特别是莱茵城镇与科隆。后者继续在荷兰和英格兰找到它们活动的主要领域。只要汉萨采取措施反抗英格兰和荷兰，科隆的商人总会对此进行阻挠，即使放弃它的汉萨成员（Hanse in）身份也不愿意在与西方的【278】贸易中遭受损失。

在整个15世纪，利益和政策与保持汉萨的团结直接相关的似乎仅仅是

汉萨中部集团的城镇，特别是吕贝克领导的所谓的温迪西城镇。但即使在这里，吕贝克也要坚持自己独特的利益。它决定保存自己作为一个走廊和中西交通航线的不可缺少的中介，并为汉萨的统一而奋斗，这主要是因为统一是维持现状的惟一措施。它不断地努力制止东波罗的海和北海的直接联系，并因此在与荷兰及后来与英格兰的冲突中特别地好战，因为这两个国家广泛地利用经过松德海峡的直线海路。换句话说，吕贝克奋力维持的不是汉萨本身，而是以其港口为中心的特别的汉萨：对这种态度，其他的城镇非常了解并经常抵制。

这样，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汉萨城镇集团的主要组成上，政策差异在不断扩大。这种差异的根源主要是出于前面已经描述过的地区利益差异。但是，在像普鲁士、立窝尼亚或莱茵这些城镇形成的地区性的结伴主义背后，可以发现一些经济退缩和倒退的迹象——后者按字面意义来说是一个新的不利条件下的倒退。

倒退的一些征兆将在不断增长的城市排他性中找到。关于14、15世纪它的普遍传播已经描述过，但是哪里也比不上德意志北部能够更清楚地表现这种朝着地方保护主义的转变。在德意志发展和扩张的几个世纪里，在市政政策中，几乎没有谈及可能被称为保护或排他的趋势。德意志人以极大的信心扩展他们的贸易，似乎不害怕竞争对手。在早期与俄罗斯和英格兰签订的条约中，外国人被给予在德意志各地贸易的自由，波罗的海被视作一个公海。城镇内部政府与这种自由贸易的精神相一致。它主要掌握在奠基者贵族世家手中：一个扩张主义或冒险主义的家族，他们对他们的城市的内部贸易相对关心较少，一般情况下允许外国人在他们中间贸易和定居。

到1370年施特拉尔松德和约签订时，这种自由时代结束了。手工业和商人行会的力量变得非常强大。前面已提及过许多城镇的造反。当小中产阶级运动的潮流衰落后，甚至那些掌握在旧家族手中的市政府，也很容易满足地方行会把外国人驱逐出城镇集市和周围的农村地区的愿望。有些城镇甚至开始实施反外来人甚至也反汉萨同盟的法律。【279】

汉萨城镇的社会变化当然是一个长期过程的地区性反映，整个欧洲也经历了这一过程。但同时它更多地反映了一种经济变化而不是一种社会变化，而汉萨尤其如此。城镇转向它们自己的区域内贸易和保护地方市场的原因是，他们在别处的机会要么减少了要么受了严重的威胁，因为自14世纪中期以来，北欧的国际地位变得越来越对德意志人的贸易不利。

前面已经谈到过，永久的汉萨同盟形成的直接机缘是斯堪的纳维亚对汉萨城镇利益的一种威胁。这种威胁从起源上来说不是经济方面的。它来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各王国的一个政治运动，没有预示到这会发展成一种竞争性的经济力量。然而，此后汉萨在全北欧尤其在斯堪的纳维亚所遭受的困难非常有特点，完全值得更密切的考察。

在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可以说是一个经济真空。本地的商人阶级要么消失了要么还没有出现。然而，统治阶级急于吸引他们所能吸引的任何贸易，而且，由于太弱小，它们的国家不能抵制德意志人的赤裸裸的剥削。汉萨在中世纪很早的时候首先在斯堪的纳维亚出现了，13世纪科隆商人到那里做生意，也可能12世纪就去了。但是，只有当德意志人开始进口他们的剩余的谷物时，他们才能利用这个地区的整个贸易，并在那里获得一个压倒性的特权地位。在14世纪中期时，德意志人控制了三个地区的经济生活，代替了本地人的商业和航运，除了英国人外，没有别的可以害怕的对手或竞争者。

在瑞典，他们控制了它的财富的主要来源——矿产。他们在瑞典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到15世纪初，他们从自己人中任命了一半市政府的官员。【280】他们对挪威也进行同等程度的渗透。在13世纪时，挪威人仍在积极地从事商业和航海，但是到13世纪末，德意志人快速地侵入到他们的贸易领域。我们发现，他们不断扩展自己对奥斯陆、图斯堡、特隆赫姆，特别是对卑尔根（Bergen）的控制。卑尔根是挪威的主要贸易城镇，从冰岛和其他的挪威岛屿以及它的北部省份来的产品在该地进行贸易，挪威有价值的出口产品——鳕鱼干和鱼油正是来源于这些地区。在卑尔根，而不是在其他的斯堪的纳维亚城镇，德意志人建立了国中之国，在那里拥有他们自己的法律和司法权。

他们在丹麦的权力更为本地化。德意志人在每个丹麦城镇定居，他们的法律在国家法院内代替了丹麦的法律。不过，他们活动的主要地点是松德海峡的北岸，这是个有名的斯堪尼亚海滨渔场们。一段时期内——一个半世纪——斯堪尼亚是北欧渔业贸易的中心，商人们在斯堪尼亚的周期性的聚会使它也成为一个其他的商品的交换中心。难怪东德意志人把斯堪尼亚作为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绝不仅是重要）的经济领地。

在14世纪后半期，这种如此宝贵特别是如此强大的地位，突然间衰落下去。

1340年，沃尔德马·阿特达格（Waldemar Atterdag）登上丹麦的王位，

不仅开始统一斯堪的纳维亚王国，并填补德意志城镇由之建立权利的政治真空，而且以他的征税政策，直接侵吞了汉萨的特权。德意志人被迫为应对这种征税政策的直接威胁和统一的斯堪的纳维亚的逐步威胁而斗争。战争的结果是1370年的施特拉尔松德和约的胜利签订及与之相伴随的是汉萨同盟的正式成立。

因此，同盟的初次登台是成功的。作为政治武器，它在随后的100年或150年的战争中证明自己，也一样是十分成功的。1474年的尤特雷查德条约，结束了一个世纪与英格兰的类似的冲突，尽管证明同盟充分拥有外国的特权和如1370年战胜它的敌人一样的优势。然而，虽然同盟在直接的政治行动中是成功的，但它在努力阻止继续形成北欧贸易革命的经济、政治力量的长征中，注定要遭受失败。面对沙皇力量的崛起，它不能保护自己在诺夫哥洛德的地位；不能在与由于布拉班特和荷兰的支持而力量不断上升的北欧新贸易中心的对抗过程中保住自己的位置；不能保住它对东方路线的垄断；实际上不能保住这条路线，这条路线最终被其他的通过南部大陆的路线所挑战并最终被取代。尤其重要的是，它不能阻止两个重要的竞争对手——英格兰和荷兰的势力的上升，它们注定在16、17世纪要代替汉萨取得北欧的经济领导地位。 [281]

4.3.4 英格兰的挑战

西方强权扩展至原来德意志人垄断的地区是在14世纪后半叶才取得突破的，而且似乎汉萨最初最为关心的就是英国人的威胁。英国在北方的商业活动在整个14世纪一直在积聚力量，在14世纪末达到了顶点。然而，最需要解释的不是这种挑战这么早就降临，而是这种挑战为什么不在更早的时候降临。因为在整个中世纪，英国就是西北贸易区的最主要的部分，英国商人在进出本国的路线上的贸易活动就一直十分活跃。

英国的地理位置让它非常适合在西北欧洲的贸易中担任重要的角色。英国海滨通过较窄的海峡就很容易到达，尤其需要记住的是，中世纪也像现代一样，海路整体上说来比陆路更有效益、更便宜。而且，英国海岸不仅容易到达，而且值得到达。在中世纪大部分时期内，英格兰给高度专业化的地区供应部分欧洲国家缺乏的食物和原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讲，英格兰在中世纪的经济可以像过去很多时候那样，被描述为殖民地经济。

像近代的殖民国家一样，英格兰可能在有些方面落后于靠近它的大陆国

家，那时的出口产品正与殖民地的名称相符，可以被归入所谓的“初级产品”的类别。在英国历史上，当然有些制成品在那里加工并卖给外国人，在中世纪的后期，完全或部分加工好的布成为英国贸易的主流。但是，直到14世纪后半期，仍是矿产品、羊毛和食物维持着英格兰的贸易，并使与英【282】国的联系在欧洲经济生活中变得那样不可缺少。在欧洲历史的早期，英格兰就供给欧洲别的国家和地区以原材料，主要是锡。有很好的原因可以让人相信，直到13世纪末期英格兰仍是一个重要的食品、谷物和畜产品产地，正是这些使它对低地国家非常重要，对斯堪的纳维亚不可缺少。尤其重要的是，它的草场上的羊毛真正使得低地国家和意大利的高度专门化的布业经济得以发展。直到14世纪晚期，英格兰在欧洲贸易中才不再仅仅充当原材料的提供者的角色。但只要英国还起这种作用，它就注定要吸引外贸和外资，而且规模比别的地区要大，也注定要在西方世界的商业命运中起着突出的作用。

因此毫不奇怪，来往于英格兰的商业航行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可能或不可能的是，腓尼基人为了寻找锡没有经常光顾西方国家，但极有可能是，青铜时代的由爱尔兰和英格兰本地产的金属制造的铜器，被出口（还有可能再出口）到大陆。[①] 甚至在罗马人占领这个国家之前，他们都可能进口了不列颠开采的矿物：斯特拉波（Strabo）提到的金、银和铁。另外一个很有道理的猜想是，英格兰的南部是它的邻省高卢的一个谷物来源地。斯特拉波提到前罗马时代从不列颠出口的小麦，几个世纪后，罗马的作者提到有从大不列颠运到莱茵河流域的小麦。尽管另有一个作者——阿米亚鲁斯·马塞林鲁斯把这一船船的小麦描述为实物税，而可能的情况是英格兰有大量的供出口的小麦剩余。[②]

在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s）人入侵这段长长的中断期里发生了什么，它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它是如何结束的，对此我们均一无所知。不过，一旦这种黑暗结束，有了文字资料可资借鉴时，提到英格兰与大陆的商业联系的材料又出现了。各种来源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材料证明，它进出口的商品非常广泛，其他残存的盎格鲁—撒克逊考古材料也证明了这点。国王爱特尔雷德（Ethelred）制定的伦敦通行税表明，在10、11世纪时，伦敦经

---

① S. 皮戈德：《维塞克斯的早期青铜时代》，史前史学会记录汇编，1938年。【38】

② 按照R. G. 科林伍德（Collingwood）和J. N. L. 迈雷斯（Myres）的在《罗马时代的不列颠和英格兰定居地》（牛津，1937年），第243页，以小麦税的形式的出口规模是很大的；但是这些从边省大规模出口的小麦税是通常所谓的为出口所生产的剩余品吗？【39】

常有佛兰德、诺曼底和北欧的商人往来，其中明确提到有来自法兰西和德意志帝国的商人。① 那时，英格兰显然是在中欧和北欧的贸易范围内。从不列颠运来的有食品、原材料，一段时期内还有奴隶，以及布，在查理曼写给奥发（Offa）国王著名的来信里，他抱怨英国布的质量在不断下降，这就证明布贸易由来已久。有的历史学家更进一步认为，所谓的弗里斯兰布，虽有大量的大陆资料提及它来源于大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它是由弗里斯兰商人销售到大陆的盎格鲁—撒克逊布。② [283]

不管这种独特的猜想是对是错，毫无疑义的是，弗里斯兰在那时的盎格鲁—撒克逊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贝德（Bede）谈到居住在约克和伦敦的商人，还有其他的并非间接的提及弗里斯兰人的参与。然而不仅有弗里斯兰人。首先，也有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英国的政治史中，与挪威的联系主要是战争、移民和征服。但是，毫无疑义的是，即使在丹麦人侵过程中还是在之前，他们一直都习惯到不列颠的岛上去做生意，挪威人甚至在赢得抢劫者和入侵者的名声后，仍到这里来进行贸易。我们也发现有丹麦人在伦敦、约克和埃克塞特（Exeter）定居。另外还有大量零散的斯堪的纳维亚与盎格鲁—撒克逊进行贸易的材料，不仅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而且也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在爱尔兰和冰岛的定居地。③

诺曼征服没有中断与欧洲的商业联系，但是若非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也只是增加了这种商业联系。对挪威的贸易显然没有中断，而且在 12 世纪仍很活跃。在思维尔里尔传说（Sverrir's Saga）中，思维尔里尔国王在一篇演讲里盛赞与英国人的贸易，他说英国人带来了小麦和蜂蜜，上好的面粉和布匹。这篇演讲的日期是 1186 年，但是这种感情一样适用于 100 年前后的事。在 13 世纪和 14 世纪早期，不断有资料提到有从挪威到东昂里亚地区一些港口，大多是到来昂（Lynn）和亨伯（Humber）港口④的商船，装载着北方的典型产品：木材、鱼和鱼油。但是除了与佛兰德的联系外，那时英国和低地国家经济上的伙伴关系发展得非常快，而这是欧洲中世纪经济非常有 [284]

---

① 大英博物馆，科顿，泰特斯，A，第 140 页，此处引自《汉萨同盟文献汇编》，第 1 卷，第 2 期。【40】

② C. J. 克卢姆克（Klumker）："Der friesische Tuchhandel zur Zeit Karls des Grossen u. sein Verhältnis zur Weberei jener Zeit"，*Jahrbuch d. Gesellschaft f. bildende Kunst etc. zu Emden*，XIII（1899）。【41】

③ A. 布格：《诺曼人》（哈勒，1906 年），第 130～131 页，还可参见同一作者的 *Den Norske Traelasthandels Historie*（希恩，1925 年），第 47～48 页。【42】

④ The Great Red Book of Lynn，书中各处；《挪威外交》，第 9 卷，第 102、159、201 等期；参见布格：*Den Norske Traelasthandels Historie*，第 138～186 页。【43】

特点的事。[①]

这种伙伴关系建立在羊毛交易的基础上，英国的草场终年较湿润，四季常青，白垩质的底土层，再加之含盐的空气，是理想的草场经济所在，尤其对绵羊的放养很有利。因此，在凯尔特人和撒克逊时代早期，牧业主导了这个岛屿的生活，家畜是农业财富的主要来源，是价格的标准单位和资本形成的形式。在整个中世纪，牧场继续在内部殖民和定居农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英格兰的边缘地带主要用于放牧，即使在森林覆盖满是大石头的黏土河谷，也放养着成群的猪。12、13世纪当人口增长时，更多的土地被开垦，许多英国的天然牧场，比如科茨沃尔兹高地、南丘地区、林肯郡荒原，也就是索默塞特沼泽地，可能都被开垦以耕种谷物，主要是燕麦。不过，一旦人口减少，边缘的"边界地带"只要合适就再次成了草场。另外还有些地区，比如汉普郡（Hampshire）和威尔德郡的低地，约克郡和兰开郡的高地，切郡、斯诺普郡和赫里福德郡（Herefordshire）边界处的威尔谢，湿润的草场，在整个中世纪都一直没有受到侵犯，牛羊随着人口和定居地的扩大而增长。牛，尤其是绵羊，在英格兰极好的土地上也可以看到，在那里，它们在盛行的复合耕作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使土地变得肥沃，它们补充来自耕地的收入；实际上，土地系统整个的耕作方式的调整都是为了配合农村放牧牛羊的需要。

因此很自然地，尽管木犁对草地偶有侵犯，但在中世纪早期，羊毛产量应该是一直在增长。这种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大规模的商业投资，它的质量在多大程度上由于选种而改进，我们还不能知道得十分清楚。清楚的是，12、13世纪佛兰德和意大利的金融家（他们是惟一的正好留下文字记录的人）对羊毛生产者进行长期投资。但是那时，英国羊毛集市已经处于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它在欧洲的突出地位已经建立起来了。至于选种，有很好的证据表明，中世纪牧羊人已经懂得遗传因素的重要。他们仔细地让良好的牲畜进行交配；他们进口良种的公羊，比如林赛（Lindsey）羊。[②] 是否由于育种的原因使英国在中世纪早期的羊毛整体上得到改进还很难说。到14世纪初，有些地区的羊毛质量已出了名。威尔士的沼泽地，是赖伊兰德

【285】

①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梅罗文加和加洛林时期英格兰和佛兰德之间的商业联系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参见P. 格里尔森：《英格兰和佛兰德在诺曼征服前的关系》，载《皇家历史学会学报》，第4辑，第23卷，1941年。【44】

② H. 霍尔（Hall）主编：《温切斯特主教辖区的卷筒卷宗》，1903年，第8、40、76页。【45】

(Ryeland) 绵羊的原产地，它的稀疏草场上出产质量好而且短的羊毛，售价最好；科茨沃尔兹荒原、林赛和林肯郡的凯斯蒂文沼泽地出产的是长而优的羊毛，这些地区是“老林肯羊 (old Lincolns)”的产地。

羊毛的出口随着羊毛的产量而增长。从国外来的羊毛商，差不多在早期提到的商业贸易中就很突出。到12、13世纪之交，我们发现佛拉芒人大量地收购羊毛，并因此卷入到与国王和贵族的复杂交易中，他们中有一个叫威廉·凯德 (Cade, William)，是一个在12世纪中期很活跃的佛拉芒人，他留下了短暂但十分辉煌的商业和投资交易记录。但像他这样的人，显然不止一例。已经说过在13世纪初，佛兰德城镇在伦敦形成了一个类似公司组织的机构，佛兰德汉萨，它代表佛兰德商人，有可能为他们提供共同的居住地和重要的商业服务。那个时代的一些更大的佛兰德商人，布瓦恩布莱克、彼得·德·阿金特，在英国的文献中也像在他们家乡的历史记录中一样留下鲜明的记录。他们是最纯粹的资本家，是进行大规模投机的商人，是雇用一大群家乡人的雇主，是给英国修道院、布业大亨和巨商提供大量资金的借贷商。①

虽然佛拉芒人很重要，但他们并不是惟一重要的，在后来被羊毛吸引到英国的商人中，他们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13世纪后半叶，德国商人——首先是科隆人，后来是汉萨人——在英国贸易中和羊毛出口中很是活跃，不【286】过大部分贸易份额最终由意大利人获得。意大利商人怎样以及他们为什么首先来到英格兰是一个说法有些矛盾的问题。当12世纪接近尾声时，意大利人出现在整个西欧，在法兰西、在英格兰，没有有说服力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会有来自伦巴第和意大利的中部的冒险家决定到英国来试运气。但几乎无可怀疑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吸引到英格兰尤其是被吸引到英国毛纺业中来是由于他们碰巧被交付处理的一些财政事务。许多来自意大利中部的商人，在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来到英国，首先主要是作为罗马教廷的征税人而不是作为商人或贷款人。在个人间的金融交易和在给王室的贷款中，仍然是犹太人而不是意大利人最活跃（实际上金融是那时英国犹太人的惟一职业）。但也正是由于教皇税收才使这些意大利税收征集者必然地卷入到了对毛纺业对个人以及对王室的信贷中。税收所得必须汇兑，而羊毛是这种汇兑所能采取的最明显的形式。一些基督教的缴税者实际上付实物来缴纳他们的税收，

① H. 皮雷恩：《伦敦的汉萨佛拉芒人》，载《比利时皇家学会公报》(1899年)；乔治·埃斯皮纳斯 (Gorges Espinas)：*Sire Jehan Boinebroke*（里尔，1933年）；G. 德普特 (Dept)：《1147～1216年英国的佛兰德商人》，载《北方评论》，第12卷，(1926年)。【46】

尽管这种交易可能披上了货币的形式的外衣。在他们的羊毛交易中，意大利商业银行家注定要非常靠近——正如事实上证明的那样——王室的财政。出口许可证，免除各种税收和获得各种王室的好处都必须谈判，都要付报酬。尤其重要的是，经意大利银行家和征税者之手的财物，其数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引起了贫穷国王贪婪的眼睛的注意。在亨利三世（Henry III）统治时，一些教会税收实际上是为英国王室的利益征收并进入王室金库的，并且不是作为贷款而是作为直接礼物。①

这样，毛纺业和王室财政不可避免地纠缠到一起，这种纠缠非常有力，以至于到13世纪末把意大利商人提升到了英国毛纺业的垄断位置。到13、14世纪之交，意大利的大商号里卡第、弗雷斯科巴尔蒂、巴尔迪和佩鲁兹主导了英国羊毛的出口，在有些年份完全垄断了出口，并整个控制了王室【287】的关税。

意大利人的这种位置最终被本地商人的辛迪加替代，最终完成这个任务的是英国特产公司。在中世纪最后一个世纪的贸易中，英国本地商人控制了绝大多数的毛纺业，也控制了其他进出口贸易的大部分。对一个急于记录民族权力演进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个结局实际上可能作为一个成功的行为，对阿奇迪肯·坎宁安（Archdeacon Cunningham）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来说也是这样。他们高兴地看到英国商人逐渐在英国贸易中获得了一个突出的位置。早期的创业精神和领导权力属于外国商人，属于佛拉芒人、汉萨人和意大利人，但是英国人，即使很慢的话，也是好的学习模仿者。到14世纪中期，他们已经学会了经商的各种技巧。这样，已完成任务的摩尔人（Moor）终于可以被辞退了——是爱德华三世完成了这种辞退——英国商人最终得以确立并开始享受他们已能胜任的领导权。

但是，这种叙述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信。作为一门社会技艺的贸易观念是人类在逐渐的历史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它有可能自然地传给相信不断进步、而且把当时的商业视为文化的最高形式和成就的一代人。当代的历史学家，在与考古学家与社会学家相来往时会发现，很难把贸易作为复杂文明的一个很突出的特征。贸易的过程本身足够简单，可以让中世纪各个发展阶段的人

---

① W. E. 罗德斯（Rhodes）：《在英格兰的意大利银行家和他们对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二世的贷款》，载T. F. 陶特（Tout）和J. 泰特（Tait）主编：《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历史论文集》（曼彻斯特，1907年）。C. 约翰逊（Johnson）：《14世纪意大利的一个银行世家》，圣阿尔班斯和赫特福德郡建筑与考古学会译，n. s. I（圣阿尔班斯，1903年）。A. 萨波利（Sapori）："La Compagnia dei Frescobaldi en Inghilterra"，载《中世纪经济史研究》（佛罗伦萨，1947年；新版本，第2卷，1955年）。【47】

民去实践。决定贸易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发展中所占准确位置的是作为整体的历史背景——他们的法律和习俗，他们的财富分布，他们进入流通资本的路径，还有时代的政治环境。既不是中世纪英国的法律，也不是资本的提供不足，以至于阻止英国商人在英国贸易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一次提及英国或者盎格鲁—撒克逊商人的记载也许像提及在英格兰的任何商人一样古老。我们听到撒克逊人，它一般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他们参与梅罗文加王朝的圣丹尼斯集市、查理曼时代的鲁昂和托罗伊斯集市、并在8世纪早期定居马赛。在给奥发国王的信中，查理曼许诺在保护英国商人方面"与古代①商业惯例一致"。在9世纪的罗马，外国的定居商人中也许有盎格鲁—撒克逊人，但总的来说，谈及9世纪英国贸易和英国商人的材料很少，因为这在英格兰和欧陆都是一个混乱的时代。10、11世纪谈及海外的英国人更常见，其中的一则材料表明，在1050年英国人航行到了波罗的海。盎格鲁—撒克逊城的证据显示，本地商人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最后两三个世纪就已存在。【288】

偶然保存下来的一位被称为芬查勒的圣歌德里克（St Codric of Finchale）的商人的生活经历也许能够表明，本地商人并非全是服务于本地市场的小贩。我们提到的这名商人跨越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末期到诺曼征服时代早期，他的个人生活资料被皮尔恩（Pirenne）非常突出地使用。12世纪末到过尤特雷查德的英国商人也许是羊毛商人，盎格鲁—诺曼的文献反复提及英国羊毛商人，他们的数量随着英国贸易的记录的累积而增加。1273年，与佛兰德的敌对导致了一次对羊毛出口的王室禁运，结果带来了出口许可证制度的建立；对残留的许可证的收集表明有一大批本地商人从事毛纺业。②

总的来说，英国13、14世纪贸易和金融存留的资料记载着大量的巨商的名字，他们要么在英国出生，要么在英格兰长期定居并在英国贸易的每个部门起了很大的作用。作为国王的商人，他们或者有时向国王贷款，或以各种金融和商业能力服务于国王，管理他的战争经费，组织向国外汇兑资金，为王室和武装部门供应货物，或仅仅把大量的进口商品提供给国王。在12、13世纪，有德·韦利斯、德·哈维赫尔斯、芬克斯、费兹·阿兰兹、

① 哈顿（Haddon）和斯塔布斯（Stubbs）：《议会》，第3章，第496页。也可参见G. 雅可布（Jacob）：《阿拉伯人在北欧—波罗的海的贸易》（1887年），第112页；A. 道普斯克（Dopsch）：《加洛林时期的经济发展》（魏玛，1922年），第2部分，第194~195页。【48】

② A. 肖比：《1273年以后英国的羊毛出口》，载《社会经济季刊》，第4期（1908年）。【49】

德·康克尔斯、巴辛斯、巴兰兹、布克尔兹、德·洛克斯来斯、阿斯韦克斯、德·路德罗斯：一个很小但强有力的阶级，他们不久就获得了世袭贵族[289]的权力，控制了伦敦的市议会，在英国贸易的各个重要的部门都很活跃，在地产和典当业中拥有大量的投资（格雷格里·德·洛克斯莱（de Rokesley, Gregory）曾一度控制了伊来主教这样的大人物的抵押品）。这个阶级不知不觉就变成了14世纪中期的金融寡头——德·拉·波勒斯和他的伙伴们。

完全真实的是，直到14世纪中期，英国商人才成功地建立起对毛纺业的完全控制，并从整体上在英国贸易中占据特殊的地位，但是这种发展并不像一个人从学徒到结业的过程那样是逐步平稳地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事件，每一次同类的事件在英国历史上都会给英国商人一个相应的位置。起作用的原因是百年战争早期王室的财政危机。

不足为奇的是，毛纺业和毛纺业者陷入了14世纪的财政混乱之中。每年的羊毛产量并不像贵族的请愿书所说的那样代表国家的一半的财富；但无疑代表了国家可卖的产品，也就是现在被称为农村主要“经济作物”的很大一部分。因而，对虎视眈眈地寻求现金或者能够很快换成现金的物品的国王来说，毛纺业显然有很大的吸引力，羊毛注定要成为王室财政的显著目标。在14、15世纪，对羊毛的征税增加了。除1275年规定的每袋6先令8分的“旧规矩”，1303年的“新规矩”还要对外国人征收3先令4分。在14世纪，国王不断强迫不愿授权对羊毛加征高额的税收的议会出局。到14世纪，对羊毛的税收加征成了惯例。除此之外，对英国本地人出口的羊毛，整体关税上升到每袋40先令，而对外国人上升为53先令4分。但是，如果事先不与控制和管理毛纺业的下议院交涉好，这种新税制是不能建立的。[1]

毛纺业因此也卷进了王室的债务中。每年由羊毛产量代表的财富经常被王室用来做短期贷款的抵押。查理一世的赎金就是用海外毛纺业的所得抵押来的贷款支付的，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以这种形式进行的贷款抵押变得十分普遍。1297年，爱德华一世（Edward I）为了资助他的远征队，在英[290]格兰抢先购买，然后在国外出售8 000袋羊毛。这种措施被后来的爱德华三世大规模地利用，更不顾及羊毛商人和养羊人的利益。

这样，毛纺业不可避免地被引入爱德华三世有名的战争财政的阴谋之中。每一次危机过后，接着的是对毛纺业进行重组，而每一次重组都向对特产市场的垄断更进一步。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危机导致了对意大利利益的破

---

① E. 鲍尔：《英国中世纪的毛纺业》（牛津，1941年），第63～103页。【50】

坏。意大利人在毛纺业和王室财政中所接受的委托，在爱德华三世时达到最高点。因为在他统治的最初13年或15年中，特别在1327～1340年紧张的战时财政中，佛罗伦萨人的巴尔迪家族，1336年以后佛罗伦萨的佩鲁兹家族，供给国王大量的钱财，国王则主要以税收，大部分是羊毛税收作保。但是结果，英格兰和别处的金融运作耗尽了他们的资源。只要他们不停地贷款，他们就还能在英国毛纺业中保有他们的特权。可一旦他们的流动资源开始衰竭，正如1343年所发生的那样，国王就不可避免地拒绝还债。到1346年，这两个商号在英国的商务降到了即将消失的地步，有一段时间，佛罗伦萨银行家不得不从英国毛纺业而且彻底地从英国舞台上退出。

意大利商人的位置首先被更富有的英国羊毛商人和银行家联合占领，这种联合，差不多由相同的商业大亨集团组成的，一般由威廉·德·拉·波尔（de la Pole，William）和他的伙伴领导，在1345年的四次时机中，他们三次联合。一系列大笔贷款（高达100 000英镑），都以羊毛关税做抵押，这些贷款用于加来之围和克雷西战役。结果，他们获得了对英国羊毛出口的实质性的垄断。在几年之内，所有的羊毛出口除了获得许可证之外都被禁止，只有参加这个联合集团的成员才准许出口。

到1349年，这些辛迪加也获得如巴尔迪和佩鲁兹同样的命运，王室的拖欠不仅导致了德·拉·波尔集团的暂时衰落，而且导致一个系统性的改变。现在，国王不得不转向一个更大的羊毛商人团体，为了这样做，它又一次碰到亟须议会对加征更高赋税做出许可的问题。结果，他以重要的妥协获得了加征和贷款。1351年的议会批准3年的羊毛加征税，交换条件是废除各种垄断，但是，最终废除的垄断并没有授予英国中心市场商行的垄断多。【291】这个商行成为经常以羊毛和羊毛关税做抵押的贷款的主要来源。

把出口集中到一个中心市镇并不是什么新方法。在13世纪的第一个25年，类似的中心市镇就已经存在，那时，为了实施他1294～1297年对羊毛的强征贷款，爱德华一世把他自己的羊毛和商人的羊毛引导到多德雷赫特，然后到安特卫普：这两个城镇都位于他需要战争资金的地方的附近，但是，这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的中心城镇。它是放任型而不是强制型的，也没有创造一个垄断性的中心市场商行。在1313年，当中心市镇固定在圣奥姆（St Omer）的时候，政府就曾经有过使之成为强制型的尝试，但那时这个系统仍然是变化的、实验性的。1316～1326年，这个中心城镇在国外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1326～1337年，它两次通过海峡有选择性的到了几个英国港口，但在很短的时间内，这种贸易一度又是自由的。但自

1337 年后，尤其自 1350 年后，这个贸易组织很快就朝着垄断性的英国中心市场商行的方向发展。

然而，这个发展过程却是以从对垄断的一个彻底偏离开始的。资料表明，议会在 1351 年规定，作为对羊毛加征的替代物，所有这些垄断都应该消除。与这种规定相适应，在 1357 年实施的《中心城镇条例》剥夺了外国人自由购买和出口羊毛的自由，只许英国人从事出口贸易。这种规定没能持续多久。这对在议会中有很深的势力的养羊人是有利的，但对英国商人十分不利，因而也对他们的贷款能力不利。这个系统在 1357 年开始被破坏。到 1361 年，英国中心市场商行实际上垄断了英国人对北欧羊毛的出口；到 1399 年，它在加来稳固而长久地创办起来。即使那时，意大利人在王室的特许下仍可能进口部分羊毛，他们这样做的条件是要把它带到意大利出售，不得与低地国家的羊毛集市上的中心市场商行的商人竞争。那时，英国的垄断在那里还没受到挑战。

垄断符合组建英国中心市场商行的大部分羊毛商的利益；它符合布加工者正在不断上升的利益，因为它使国内和国外集市上的羊毛价格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尤其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国王。对羊毛出口的关税和加征是他所能采取的最安全的形式，一个享有这种贸易垄断权的特许公司，相对于一系列公司和辛迪加，是一个安全得多的贷款来源，后者在百年战争的早期一个个走向破产。【292】由于有 1446 年的《定金法》（Act of Retainer），商行与王室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由此，公司经营羊毛的关税和加征税，作为回报要支付加来驻军的费用和某种其他的固定费用，国王一方面要归还他过去的贷款；另一方面要将超过一定产量的剩余转入国库。利益惟一受到影响的是养羊人；这可能是羊毛产量下降的一个原因。

因此，英国对毛纺业的垄断是一个政治和财政政策的产物，它并不是英国贸易“进入新时代”的象征，也并不意味着英国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个新阶段。它是连续的对王室政策进行立法的结果，是国王和商人讨价还价的产物。而且，它并没有导致英国商人掌握的毛纺业数量的任何增长。假如我们相信前面提及的 1273 年王室出口的许可证的数据的话，[①] 英国人在那时羊毛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没超过总量的 1/3，大约为 11 500 袋，是由 280 个出口商共同出口的。到 15 世纪中期，大约相同数量的特产出口商出口了8 000～10 000袋。英国对羊毛的垄断程度上升了，然而羊毛的出口数量下降了。

---

① 参见第 289 页。【51】

与英国经济发展史更密切相关的是布贸易和葡萄酒贸易的发展。英国葡萄酒贸易在许多方面来说是英国贸易中最古老的一部分，也是英国商人从一开始就占优势的部门。英国进口外国葡萄酒的证据——主要是法国——可以追溯到诺曼统治早期或更早。在昂杰文人（Angevins）的统治下，英格兰发现自己在政治上与加斯科涅联系紧密，那里是欧洲的主要葡萄酒的生产地，这样的联系也刺激了加斯科涅的葡萄种植业，在英国商人面前展开了一个巨大的不断扩展的领域。大量——一段时间内不断扩展的——葡萄酒被英国商人从加斯科涅进口，这些进口主要由英国商人进行，尤其是那些布里斯托尔商人。作为交换，加斯科涅不得不进口来自英国或经由英国的食品、布匹和其他的各种商品，它们中的大部分由英国商人和英国船只运来。这种贸易在14世纪初时达到了极点，有些年份，英国从那里进口的葡萄酒达2万桶。

中世纪后期，英国贸易史上最突出的一个事件——就英国在波罗的海的势力而言，它比其他任何一件事情都更重要——是由英国布的出口造成的。英国本地能够生产一些布，而且总是有些被出口。在前面已经提到过，7、8世纪英格兰就曾向法兰西出口布。在一个挪威的传奇中提到，在10世纪末，冰岛的进口商品中就包含英国的布匹。[1] 在英格兰的某些产地也有过描述，12、13世纪的文献记录中仍被提及。但尽管贸易活跃，其贸易量并不大，比起以佛兰德的布贸易和英格兰的羊毛和葡萄酒贸易来要小得多。但是，14世纪后半叶，布业迅速发展成可以与英国工业和贸易的任何其他部分竞争的部门，并最终超过了它们。 【293】

这种增长背后的原因在别处也描述过。布业的生产建立在城镇的范围之外，这样能更好地降低成本，并利用机械力，主要是水力。佛兰德的动荡和从那里移民英格兰的工匠给英国手工业增加了额外的熟练劳动力。对某些比较贵重的布的保护来源于对佛兰德进口的禁止。从本文的观点来看，最重要的是在布业增长和毛纺业的财政状况的变化之间肯定存在一种联系。羊毛出口的屡屡中断和无组织化，刺激了布业的竞争性。尤其重要的是，每袋2英镑10先令的出口关税，相比较于外国布，极大地降低了它在国内生产的成本，还有可能的是，英国羊毛的垄断有助于提高外国布生产商进口的羊毛的价格。由于这些因素，英国布生产一直增长，直到15世纪90年代，英国出口有时超过50 000件，大约等于10 000～12 000袋羊毛，而价格却两倍于此。

由于英国布的出口是如此之大，英国整个外贸的特点和英国从事外贸的

---

① 布格：《诺曼人》，第132页。【52】

商人的行为注定要随之发生改变。只要英国的出口主要由羊毛组成，就无须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市场和顾客。羊毛是毛纺业的原料；它的顾客是外国的布加工商；惟一重要的布加工中心不仅高度地区化而且非常近，主要在低【294】地国家。另一方面，成品布必须在潜在消费的主要中心卖给潜在的消费者，换句话说，也就是卖给欧陆及更远的男女大众。因此毫不奇怪，羊毛特产商能够在加来做成他们的生意，而无须到布鲁日以远的地方去冒险，而英国布商却必须各处出击，首先到东欧集市，因为以前在那里佛兰德布有过销售。我们发现在 14 世纪 80 年代大量的材料谈到，在斯特拉斯森德和但泽有英国人。在但泽，他们到 90 年代就扎下了根，到 15 世纪第一个 1/4 世纪，他们已拥有一个定居地和一个代理处。到那时，在挪威的贸易港口卑尔根也有一个英国公司，在那里卖出的是英国的布和其他各种商品，买进的是挪威和冰岛产的东西，主要是鱼。极有可能，在斯堪尼亚渔业中心的国际集市上也有英国的一份。[1]

英国人在波罗的海的出现使汉萨彻底明白了英国人挑战的危险。不幸的是，对盎格鲁—汉萨关系和对波罗的海的和平来说，英国人渗入北方市场真正开始了它最不吉利的时代。正当外国竞争威胁汉萨的繁荣和团结的基础时，英国商品开始频繁地往来于东西交通线上。正当地方市场的保护和地区垄断成为市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时，他们开始在但泽打下了基础。他们在汉萨系统的出现将产生一个重要的冲突，无论如何在 14 世纪晚期和 15 世纪早期的背景下，这注定要导致一场残酷和绝命的争夺。

开始，这种争夺朝对英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主要因为那时英国的动力得到了国内的强力支持，而对手德意志人却没有。在英国的城镇，从事波罗的海贸易的相对较小而专业的集团，从城市主流观点中寻找到了支持，它们是强烈反对汉萨的。对他们来说，这些城镇是他们反对所有外国人、威尼斯【295】人、热那亚人、佛拉芒人还有汉萨人的强大靠山；但是汉萨人成了最恰当也最容易对付的目标。他们独特的财政特权和他们在伦敦市政府的骄人地位——一个城中之城——注定要招致更多城市的恐外情绪。反汉萨的运动把那些惟恐被从普鲁士城镇的贸易中排除出去的商人与那些急于把汉萨人从英国城镇的贸易中排除出去的商人联合在了一起。共同的敌人产生了共同的利

---

① 这些和随后的许多盎格鲁—汉萨之间关系的事件，可参见 M. 波斯坦：《英格兰和汉萨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载 E. 鲍尔和 M. 波斯坦编辑：《英国 15 世纪的贸易研究》（伦敦，1933 年）。【53】

益，骚动背后是英国城市各阶层的大众的拥护。

最初，这次运动也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在15世纪早期的条件下，政府，特别是下院，很容易对这种反汉萨利益的压力做出反应，并理解他们的动机和语言。这个时代的仇恨由于百年战争的爆发，被转化为民族的自豪感；时代的社会变化也有助于把英国政府的官僚阶级和上层商人阶级联系在一起。而且，伦敦市政府在15世纪已发展成一个有效的议会游说使团，甚至地方城镇有时也选出特别的代表"以敦促国会反对汉萨的特权"。难怪汉萨把议会视为主要对手，从来不期望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和妥协。

上院和国王枢密院的政策不那么明朗，因为单个的议员和高级教士有时会保护汉萨商人使之免受下院的仇视和报复，在汉萨的通信中经常提到这些人是他们在英国惟一的朋友。然而，只要枢密院能理解和服从于这种存在的现实，它对汉萨政策的潜在设想应该与商人阶级没有多大的不同。当权贵的个人和集团的利益没有多大的牵连，当对汉萨和好的态度没有被在佛兰德和法兰西的军事政治事件所影响时，枢密院都尽最大努力支持商人在波罗的海的要求。

在这种支持下（而且只要能得到这样的支持），惟利是图的主动出击显然非常有力，实际上是一次接一次的成功。14世纪80年代的一次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对英国商人有利的方式结束，结束这种冲突的1388年条约确认，英国人"自古就有的权利"进出汉萨和普鲁士领土，并有在那里定居以及不受干扰地经商的自由。15世纪头10年内的另一个条约结束了一个类似的冲突，英国人获得了进入普鲁士和在那里贸易、定居、置业等权利。在【296】这个条约的保护下，英国商人在但泽建立了一个繁荣的代理处，它有着公共的组织、公共的房屋和一个对它的成员有惩罚权力的总督。当30年代困难再次出现时，主要是关于英国在但泽公司的地位和特权，1437年的条约不仅给予英国商人进出境、贸易和定居等旧有的权力，而且允许英国商人像汉萨商人在英格兰拥有的一样的特殊的财政上的豁免权。英国商人因此得以免除在100年或更早之前加在身上的各种税收义务。

每次英国商人都从汉萨城镇的不团结中获利。即使但泽人十分仇视在他们之间的英国商人，普鲁士骑士团甚至还有但泽内部的某些利益集团也十分重视与英格兰的贸易，正是他们这些人想要结束不断的冲突。同样，汉萨的西翼，尤其是科隆，没有参加在波罗的海与英国的争夺，它总是愿意妥协。即使是吕贝克、其立场也不像以往那样一贯强硬，有时它也和英国言和并对英国的要求做出让步。

有了这样的帮助，英国的前景实际上是十分光明的。对某些汉萨人来说，来自英国人的危险对自己有种让人弄不懂的预见性。正因为如此，英国的威胁显得比它实际上的更大，也比荷兰人的威胁更紧急更吓人。可是，单单这一点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汉萨的反对力量在这个世纪中期得以加强，为什么吕贝克在支持反英政策过程中摇摆不定。它被英国的海盗打得很惨，它日益害怕普鲁士和西方海上联系的影响，总的来说，它在保护汉萨对主干线的控制方面开始采取进攻性的态度。与此同时，英国的压力减弱了。这并不纯粹或主要是经济因素的影响。英国布的出口在中间几十年衰落了，这种失败本身并不是由于英国商业攻势的失败。为什么后者会失败，其原因更有可能在这个世纪的中期的政治混乱中找到。

随着玫瑰战争的临近，枢密院完全成了贵族各派争夺的工具，而不再能[297]支持英国人反对汉萨的要求。兰开斯特晚期和约克早期政府经济政策也并未执行崭新的完全不同的原则。英国布业最可怕的衰落是它不再受任何原则的启发。国王枢密院内外有势力权贵的私人机构被给予自由的特许权，国家的政策服务于强势人物的掠夺目的。不仅商人不能依靠英国军队的潜在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本身也成为一个掠夺性的海战和海盗行为的惟一工具。袭击汉萨船只不仅来得容易而且收获颇丰，枢密院不仅对这种公海抢劫不加以制止，而且它自身就直接间接地与这种扩展有关。正是主要由于枢密院权势人物的资助，才导致 1449 年在布尔讷夫湾对汉萨船只的第一次袭击，而 1458 年的第二次袭击不是别人正是沃里克（Warwick）自己领导的。这种海盗行为的发生有助于加强吕贝克的反英政策，加固汉萨同盟的团结，导致使北海的整个贸易和航海陷人混乱的海战状态。同时，尽管有激烈的海战，枢密院的各派在他们的国内的争夺中并不是反对利用汉萨的帮助的。

最终，爱德华四世（Edward IV）与汉萨同盟达成了一个私人交易，结束了英国与汉萨的冲突。在这个交易中，汉萨帮助爱德华四世装备那支使他得以重返英格兰的远征军，作为交换，他们在 1474 年原封不动地收回了他们原来的特权，而不必给在波罗的海的城镇中的英国人以任何特权。他们立刻进人在 15 世纪前半叶在英国经济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呆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到都铎时代。他们在英国外贸中所占的份额不久就超过了以前的最高历史记录。他们在 1406～1427 年平均每年出口的布达 6 000 件，1438～1459 年每年达10 000件，1479～1482 年，他们的出口远远超出 13 500 件。

英国商人想要获得任何利益和好处只有来源于和平的恢复和汉萨贸易的重开。但是，他们与中东欧的集市建立直接联系的努力遇挫，直到伊丽莎白

时代他们才恢复过来。他们在那里扎根的机会由于普鲁士的政治改变而进一步减少。那时，但泽在波兰国王的统治下，在政府事务和经济政策中几乎享有完全的自治。在实施与英国签订的条约过程中，它提出把英国人与其他外国人同等对待。英国商人自己也不再要求原来完全意义上的平等，因为至【298】此，波罗的海贸易不再对他们那么重要。无论是因为与丹麦的连续冲突导致的松德海峡的关闭，还是因为战时英国贸易的重组，英国商人与但泽的直接贸易衰落得很快。但在16世纪前半叶有几次，30多只英国船在但泽港停泊，在敌对停止后的3年，只有12只英国船到过这里，1497年，当松德海峡通行费的登记处重新开始运行时，没有一只英国船通过该地。迟至1503年，仅有21只英国船通过松德海峡，直到1547年，英国开往波罗的海的船只才能再次与荷兰相比。

英国失败的影响远远超过在但泽建立一个代理处的失败。这次失败的直接影响差不多中断了英国贸易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市场达两代人之久，并把所有的英国商业导入一股小小的溪流流入低地国家。波罗的海的贸易不再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一些间接贸易通过布拉班特的集市进行，另一些由荷兰人和汉萨人经营。随着波罗的海贸易的结束，波罗的海商人的时代也结束了。直到16世纪中期与波罗的海直接联系的重新出现以及伊斯兰德公司（Eastland Company）的崛起，英国商人才再次在波罗的海建立了自己的“利益”。

英国与普鲁士联系的中断碰巧与许多其他的外国机构从英国贸易中撤出同时发生。在挪威，汉萨自15世纪初就加紧了对卑尔根贸易的控制，并击败了英国商人重新恢复他们地位的所有努力。卑尔根的贸易的中断开始把英国商人直接送到了冰岛，但是这种新的创业，不管本身有多重要，仅够抵消英国贸易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毁灭。它使英国陷入一种与丹麦的慢性冲突中，使得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丹麦—挪威水域最终关闭了对英国的贸易和航海。虽然不是长久性的，但更具有破坏性的是英国对加斯科涅贸易的中断。这种联系在英国的经济生活中是如此悠久如此重要，但在百年战争的结束时期却被破坏直至完全中断。法国对加斯科涅的重新占领结束了英国布业的繁荣出口，并完全终止了英国葡萄酒的出口。甚至一度无法得到加斯科涅的红【299】葡萄酒，除非是通过低地国家的中立的集市。

这样，在失去他们贸易区周围最远的市场后，英国商人不得不把他们在海上和在北欧的商业冒险局限于低地国家；“冒险商公司”，是一个到佛兰德和荷兰做生意的商人的公司，吸收了英国大部分贸易和大部分英国商人。

这种集中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商业领域。英国布业史学家也许会发现，在英国布贸易集中于荷兰和英国的布生产集中于未染和未加工的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无疑，英国在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初出口的大量布完全是由染过和加工过的布组成的。但是那时，随着外围市场的衰落，英国的出口商与消费者主体失去了直接联系，他们不得不做出调整以使自己适应一个仍主要由本地布业厂商控制的市场的贸易。暂时妥协的办法是增加未染和未加工布的出口，并把它们卖给佛兰德和荷兰的染匠和加工者。这些实际上是都铎统治时英国布出口实现巨大扩展的条件，借此英格兰和低地国家的合作互利得以重新恢复。

4.3.5 荷兰的崛起

与英国的挑战相比较，荷兰的成熟相对晚些，但是它的这种并不显眼的开端，从荷兰人的角度看，却是一种被掩饰了的幸运。英国人的袭击快速而成功地展开，汉萨人，尤其是普鲁士人，曲解了这种并不真实的威胁。在15世纪下半叶，还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这更加重了德意志人的恐慌。因为，毕竟在15世纪初，英国是一个第一流的军事强国，它有着很长的成功侵略的记录，在普鲁士的估计中，它已经开始显露出某些建立帝国的先天的倾向。但泽人不是在1410年就评论过么？假如允许英国人在普鲁士定居贸易的话，他们不久就要吞并这个国家，就像吞并波尔多和加斯科涅一样。【300】正是因为英国的危险出现得如此明显，才使首先是普鲁士而后是汉萨同盟一起倾全力反对它。

荷兰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它的崛起不归因于政治行动，而在早期历史中纯粹是经济行动。在汉萨作为一个整体感觉到它的威胁前，荷兰人就巧妙地进入波罗的海的贸易；他们植根很深是由于它们在经济和地理上的力量——最终是海上的威力——而这不是汉萨的政治和海上措施能够轻易抵消的。因此他们的挑战的矛盾在于：它最终变得如此强盛，正是因为它开始时是那样弱小。

荷兰在中世纪后期所谓的商业崛起如此不明显的原因在于，它是一个地区发展而不是国家发展的产物。我们称之为荷兰的国家至少由4个在地理上不同的地区组成，每一部分都有着它自己的经济史：西兰、弗里斯兰、南荷兰和北荷兰。在所谓的蒙昧时代，莱茵河三角洲是北方贸易的中心。后来在中世纪，三角洲地区以尤特雷查德为首，仍然作为谷物、鱼和葡萄酒贸易的

中心而非常重要。在同一时期末，以多德雷赫特（Dordrecht）为首的南荷兰也一样显示出相当大的商业活力，最北端也一样：最北端的城镇包括坎彭、代芬特尔、祖沃勒、格罗宁根（Groningen）。这些城镇与汉萨有着松散的联系，这对它们很有利。但是到14世纪，重要的商业中心开始出现在之前还是相当落后的地区：西兰岛和荷兰的北部。正是在荷兰北部的发展才意味着我们讨论荷兰的崛起，也正是荷兰北部的发展才意味着对汉萨贸易的最大打击。

这种发展的准确情形还不太清楚。荷兰的历史学家有时把阿姆斯特丹的崛起以及由之产生的荷兰北部其他地区的崛起，与德意志人经由荷兰的水域通往佛兰德和英格兰的过境贸易联系起来。根据这种观念，新堤坝阻止了从北方进入荷兰河流系统，这就必须把货物换到更小的船上。阿姆斯特丹在北方进入堤坝系统的入口处崛起，鹿特丹在南方，但是其他的荷兰城镇也开始参与这种贸易，到14世纪末期，荷兰已经兴起，与汉萨展开了竞争。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来看，荷兰北部贸易的增长部分是由于这个国家的内部贸易，部分是由于在他们的一些城镇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海上贸易的发展。就像荷兰 [301] 别的部分一样，北部荷兰和西兰岛的南部拥有自己的船只，他们自古以来就从事贸易——他们是被迫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水运的丰富，另一方面是周围地区片面的经济发展使食品的长期流通成为必须。但是在早期，荷兰人的最远的航程可能也只局限于英格兰和佛兰德，14世纪后期他们转向波罗的海。荷兰人向东的原因之一也许是在日德兰周围建立了日耳曼人的公司。但是主要的原因是，在荷兰的经济开始扩展时，其他方向的海上贸易受到了限制。

它们的经济扩张，虽然有2或3个世纪之久，但到了15世纪才加快了速度。13世纪荷兰完成了防止他们被大海吞噬的筑堤系统。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农业、养牛和手工业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15世纪，原有的布业迅速繁荣。当14世纪末时的一些事件扰乱了佛兰德的工业主时，荷兰人与英格兰一起，上升到欧陆布业生产的领导的地位，15世纪中期，不列颠成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布业中心之一。在布业生产发展的同时，其他的产业也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啤酒酿造和渔业。15世纪，荷兰也成为西欧鲱鱼供应的主要来源，它的腌鱼被运到远至像南方的巴列（Bâle）这样的地方。而且，工业和贸易由于15世纪勃艮第的菲利普统治下的统一和在他统治下的长期的和平而获利。

主要因为他们的经济增长是这样的渐进式，以至于他们在波罗的海的出现几乎没有被当时的人们注意到。显然，他们进入汉萨的势力范围主要是作

为航运者，直到中世纪末他们在波罗的海才很活跃，既作为航海者又作为商人。在有些路线上，他们运载着汉萨的货物，因此对有大量的大宗货物需要航运的城镇来说十分有用，比如里加、雷瓦尔和但泽。同样，也由于这样的形象，他们是最不受吕贝克欢迎的人。吕贝克是第一个起来反对荷兰人的，15 世纪吕贝克支持汉萨抵制荷兰的一切行动。差不多由于同样的原因，普鲁士不想与荷兰人竞争，有几次努力制止反荷兰的计划。

【302】荷兰人的渗透与他们成功地与汉萨战斗的经过，在此处不能详细讲述。到 15 世纪 20 年代末，荷兰人在东部的进展已足以引起汉萨政治家对它的警觉，也产生了第一次严重的冲突。事情起因于 1417 年，吕贝克和其他的温迪施城镇提出了这一问题，他们努力通过汉萨会议对荷兰的贸易进行一些限制，但在封闭波罗的海对荷兰的贸易这个问题上，他们未能得到普鲁士城镇的一致认同。不过，这仅仅是业已来临的许多荷兰—温迪施之间冲突的第一次。逐渐地，冲突成为长期的，许多年来，和平很困难地维持，靠的仅是短暂的休战协定。1437 年的休战协定没有重续，正式的战争状态就从 1438 年持续到 1441 年。正是在这次战争期间，荷兰人向外部世界展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在此前 50 年有了多么快速的增长。结果，汉萨不得不让步，尽管有一系列看起来政治性的胜利，1441 年的和约的签订承认了荷兰在波罗的海贸易的自由。

战时荷兰的抵制力量，从某种程度上，对德意志人城镇来说是一种启发。但是，导致汉萨失败的更多是其内部的利益冲突，而不是荷兰的力量。每次当温迪施城镇努力反抗荷兰人时，普鲁士都不愿支持反对荷兰，而且汉萨的西翼，尤其是祖德西、坎彭、祖沃勒和代芬特尔，在它们对汉萨的效忠与他们在荷兰的商业利益之间摇摆不定。结果，一些城镇与荷兰人单独签订了协定，这就打破了汉萨防守的链条。每次温迪施城镇建议对荷兰人采取反对行动时，这个故事只稍微修改就又重演，所有的反对荷兰的积极措施都没有起作用。

使荷兰人特别难对付的是，每当汉萨对其他外国势力采取进攻性的政策，结果往往使自己受到损害。在他们努力制止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汉萨人不断地采取措施，可是不管其最初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最终只是有助于增加荷兰的贸易。15 世纪采取了几个这样的措施。在 50 年代，荷兰贸易由于汉萨封锁佛兰德而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推动，这时大量的汉萨贸易转给了南德意

【303】志人和荷兰人。60 年代和 70 年代，笨拙的汉萨政治家，由于他们的短视和

积极保护布鲁日的“贸易中心城镇”（staple）政策，给荷兰人提供了最好的机会。采取这种“贸易中心城镇”政策时的环境是那样有趣，很值得更详细地加以描述。

经过上文我们曾谈及的发展过程之后，布鲁日在15世纪上半叶成了汉萨海外市场中最有价值的一个。它是德意志布贸易的中心和东西交通干线的终点站——这条主干线在这里分道通往法兰西、意大利和南部的伊比利亚。但是在15世纪，布鲁日开始逐渐失去它的这种有利地位。这有佛兰德政治方面的原因，但也有经济上的原因。首先，布鲁日与海相连的水道兹文（Zwin）淤塞了，清淤和筑堤也无济于事。其次，15世纪，佛兰德工业转向不利于布鲁日的方向发展。部分由于布拉班特政策的结果，部分由于佛兰德西南的衰落，经济领导权转向了东北地区，尤其是转向布拉班特。而且，随着布拉班特贸易和手工业的增长，布拉班特的旧的海港，安特卫普和它的卫星集市贝亨奥普佐姆（Bergen-op-Zoom），开始挑战布鲁日作为布和毛纺业中心的地位。不久，它们也开始在别的领域竞争。像布鲁日发展成汉萨通往波罗的海主干线的重要的西端一样，安特卫普那时也发展成一个更近更具有竞争性的路线的端点：一条是经洛林通往南方的道路，一条是经莱茵河河谷、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奥德河上的法兰克福通向东欧的道路。这些路线的出现是出于一系列的诱因，但可以把它们的繁荣归于荷兰人以及德意志南部城镇那些追求一条绕过汉萨垄断的路线的商人们的开创精神。汉萨人对北方贸易控制得越紧，外国人开辟其他道路的决心就越坚决。

对吕贝克来说，旧有的路线对它比对任何其他城镇都更有意义。吕贝克是对维护汉萨交通路线最感兴趣的城镇，而且除此之外，它也是与布鲁日的商栈在百年间结成的利益网络联系最紧密的城镇。但是，它采取的保护布鲁日的措施注定要失败。它们也得不到汉萨其他部分的支持，而且，它们进一步瓦解布鲁日的经济地位。这在所谓的“贸易中心城镇”政策中得到特别真实的反映。为了恢复布鲁日在汉萨贸易中的地位，汉萨在15世纪中期制【304】定了一系列的规定，由此贵重的商品和汉萨垄断的商品像蜂蜡、毛皮、金属、斯堪尼亚的鲱鱼，在它们向北销售到佛兰德的别的地方和低地国家之前，必须先进口到布鲁日。而且，所有的布，不管它是产于佛兰德还是产于荷兰，当它出口到东方之前，也必须带到布鲁日。汉萨甚至曾经做过完全排除荷兰布的努力，迫使每条装载大宗货物的德意志船停靠布鲁日，即使这些货物是直接销往英格兰或西部汉萨城镇的。无须说，这种维护贸易中心城镇地位的政策只会南辕北辙。汉萨贸易不可能在必须转道一处业已衰弱的中心

的同时，维持它在过去的规模。所发生的是关于集市的规定尽管得到强有力的推行但不能实现目的；就它们被强迫遵循而言，它们使汉萨的贸易衰落了，而刺激了德意志南部和荷兰城镇的贸易。汉萨人自己开始越来越经常地访问安特卫普城镇和荷兰城镇——阿姆斯特丹、梅德勒堡、哈勒姆（Haarlem）、德尔伏特和维尔——并不断地从布鲁日撤退。甚至佛拉芒人也开始把他们的布销售到贝亨奥普佐姆（Bergen-op-Zoom）和安特卫普，从那里荷兰人把它们带到阿姆斯特丹，此时它已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布贸易中心了。

1447 年，汉萨会议撤销了有关贸易中心城镇的规定，但已太迟，因为它们已经产生了所能产生的一切危害。到这个世纪末，布鲁日开始呈现死气沉沉的面貌，安特卫普和卑尔根（Bergen）成为北欧主要的商业中心，荷兰取得了不可撼动的地位。荷兰人此时到远至布里斯劳和克拉科去做生意，普鲁士城镇也开始以惊慌的眼光看着他们进入波兰。我们拥有 1495 年松德海[305]峡通行收费站最早的报告，即有名的《松德海峡通行费》（*sundtolls*），这份资料显示，荷兰船只占了过往波罗的海船只的大部分。

第五章

欧洲中世纪的贸易：南方

5.1 初期的500年

5.1.1 基本趋势

透过严重不足的文献资料，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中世纪前半期的欧洲南部就像是处于罗马帝国繁荣的高峰和中世纪商业革命（Commercial Revolution）后期的更高峰之间的一条长期萧条的波谷。它的开端就非常令人悲观。476年，一小群蛮族人夺取了罗马帝国残存的最后一片领土。此时的这片土地上，传染病蔓延，遗传性不育肆虐，地力几近耗竭，人口因上述原因而大幅下降，显得稀稀落落。人们饱受着财政和政治专制的折磨，军事上的失败导致情绪低落，末日即将来临的预言更使人们整日惴惴不安。商业严重削弱，交通被破坏，铸币稀缺而贬值，集市上销售的手工业和农业产品越来越少，除极少数最富有的个人外整个社会的购买力被严重侵蚀。以前，大地繁华，忙碌的城市和精耕细作的良田稠密交织；此时，荒芜的田野间只稀疏

地散布着一些实际上是自己自足的庄园地产。

这种危机不仅局限于欧洲南部——也许最深层的原因要追溯到自2世纪以来影响整个欧亚大陆温带地区的气候的不利变动——但是它并不是在各处都是不可避免的。罗马帝国的东部省份的城市和商人长期以来曾经大大地超过了他们的西部对手，在476年后有一个明显的恢复，因为大多数的蛮族人定居在西部，从而缓解了东方的压力。结果，入侵者的胜利减轻了西方战争和赋税的影响；但是蛮族人并不拥有使下降的经济重新上升的足够多的人口、效率和关注，他们的惰性比他们的影响更有害。替代罗马时期痛苦煎熬的只是通货的无情紧缩和生活标准的普遍下降。并非所有的都是灾难，商业也并没有结束。但是只要劳动力仍然长期不足，它就不能上升。劳动者的技【306】术萎缩，工具不足，难以生产他们最基本的必需品，同样也难以为他们粗鲁的主人提供较好的食品和可以让他们在集市上购买的一些物品。直到10世纪，当文件的迷雾中出现确定无疑的好转的迹象时，贸易水平和生活质量显然仍离罗马鼎盛时期很远。

然而回顾既往，中世纪前半期也可以被视为一段为期太长的休耕期，通过衰败和调整，它为更有活力和更为平衡的经济结构铺平了道路。即使在黄金时代，罗马经济也是处于一种适度稳定的而不是狂热的增长状态，贸易也显得冷落。它被过分的农业上的投资所影响，被政府的垄断、苛捐杂税和过高的交通费用所阻碍。它因流动资本和信贷的匮乏而奄奄一息，因奴隶和无产阶级无力购买他们所需的一切而削弱，为帝国各地存在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所限制。在中世纪早期，罗马遗传下来的债务和财产毫无例外地都被销蚀了，只是时间和程度不同罢了。在拜占庭帝国，变化更快，但不如西部的蛮族人那样彻底：虽没有放弃它的偏见和控制，但政府给了私人创业和国际贸易一些回旋的余地；没有放弃仍然有用的工具和技术，商人尝试使用更小更快的船，更轻更不容易破碎的双耳罐（木桶代替了双耳土罐），更有弹性的商业合同和其他有帮助的改革。伊斯兰商人在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内以及由于无政府主义的部落文化和专制的黩武主义特有的混合所引起的利弊各半的情形下，带给了地中海更多新奇的变化。西方在从分裂朝重建的过程中走得更慢了，但这一过程一旦发生，它受过去的影响就要小得多。几个世纪的困难减少了政府的贪欲，显示了拜占庭和伊斯兰新的风俗的价值，使得奴隶制成为一个过时的制度，培育了一种勇于进取的自信自强的商人。10世纪西方仍然不如东方发达，但它正在快速地追赶。

一个令人沮丧的开端，一段长期的萧条，也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结束：

这种简单的概括是无可争论的，但却很难以此为基础详加描述。我们必须对那些本无条理的信息残片，也许并未实施的法律，影响仅限于欧洲一角的偶然事件，可能仅是作为修辞练习的描述以及或许纯粹是误解的陈述做出仔细的梳理。追溯事物的发展总是很困难，当证据不连贯时，一个创新从最初的【307】萌芽到得以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其过程会变得无法理解。量化的数据，即使在统计学产生之后也是那么令人怀疑，当我们必须把它们扩展到它们所谈到的内容之外时就变为纯粹的猜想。这就说明了有关中世纪早期贸易热烈的讨论没有结果的原因，所持观点的差异直到现在仍让学术界振奋不已。一些称颂被赋予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梅罗文加人、伦巴第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蛮族人统治时期的衰落。加洛林人尤其值得赞扬：阿尔芬斯·多普斯科（Dopsch，Alfons），主要从地方贸易的规章来讨论，强调查理曼的政治和经济重建计划的相关性。然后，亨利·皮尔恩把分析重点转到国际贸易，指责阿拉伯人破坏了地中海的商业统一，迫使查理曼退回到闭关自守的大陆经济中去。最后，马里斯·伦巴德评论说，大量的阿拉伯人以黄金输入换取欧洲的原材料，导致了经济的复活。当把参加讨论者的观点与他们言论的夸张成分分开时，史实上就添加了许多新的事实，但是辩论不得不逐渐地沦为悬而未决。

但绝对数量这样的指标，仅仅是经济史的一个方面，绝不会在各方面都是最具启发性的。查理曼的军队比拿破仑的军队人数少或保罗执事的读者少于皮尔恩的读者并不意味着查理曼和保罗执事不重要：他们所处的那种孤寂而艰难的环境不仅没能使他们销声匿迹，反而扩大了他们的影响。中世纪早期我们会偶尔提到“富”商：他们只是比其他同代人突出，因此当时大众的标准不容忽视。另一方面，想要在图表中划出某个确定的时期的经济变化就要进行某种纵向的量化比较。我们不知道在各个活动领域残存的证据的累积数字和平均质量，与贸易自身单独的直接证据相比，是否可作为商业活动升降的一个更加可靠的指标。中世纪最初的200年内，更稀少的文字记录和更原始的手工艺品见证了几代人的停滞不前，他们显然只能将罗马过去的一些残存维持下去或最多从拜占庭得到一点启示。这种状况在7世纪后期和8世纪初达到了最低点：有几十年——南部欧洲的每个部分并非完全相同——对之没有任何的记载，就像人们太累了除了休息外不能做任何事情一样。然【308】后才有文字和碑铭的逐渐重新出现；它们给人的印象一般并不深刻，但是其语言和风格，即使只在努力复制更古老的旧例时，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10世纪时唱诗班的声音变得更响亮——假如不是更令人愉快的话，同时新奇事

物充满了每个角落。

从文化到商业上的想当然的推论通常是欠考虑的，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可以从更近的信息源得到一些证实。极其重要的是，自2世纪晚期一直到7世纪反复发生的传染病吞没了大量的人口；在742～743年最后一次大爆发后，慢慢地不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一直持续到1346年黑死病的流行。在加洛林时期肥沃的农村地区人口增长的数据开始出现，也许这与一个有利的气候波动有关；但是它们被伴随着加洛林王朝垮台而来的战争和饥荒而大大抵消。无论如何，这种增长雪球滚到足够大还是需要时间的。此外，享有特权的加洛林人地产上的谷物收获几乎只是两倍于种子的投入，其对贸易的微弱刺激不可能产生多大影响，而且他们的管理者被劝告说，“无须从外部要求或购买任何东西”。但是商业复苏的特别机会在意大利边缘上出现，在那里，一些较小的海港因为有一个不是特别落后的内地的支持并且受拜占庭和穆斯林的影响，一点点地达到了政治和经济自治。10世纪加速的人口增长最终改变了过去长期发展的潮流。

这种对基本趋势进行重建的尝试既没有接受任何有关贸易量大小的悬而未决的冲突性的理论，也不完全拒绝任何理论。某些前加洛林统治者试图给古代经济至少一丝新活力的努力不应被否定；但是这种经济不可能被冻结，它需要活力，而蛮族的西方却不能提供。阿拉伯人的第一次袭击（特别在7世纪）产生了短暂的混乱和破坏，但他们不能也没有想过迫使外国商人离开地中海。9世纪，查理曼努力使他的帝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自给自足，但他无意在周围建立一张铁幕。无疑，这3个自足的经济体制的形成，重心在内地（亚琛、巴格达，某种程度上还有君士坦丁堡，并不在地中海的中心而是在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之间的中轴线上），倾向于淡化他们的跨海联系；他们相互间经常的对抗也倾向如此。但是来自这3个不再环抱地中海的【309】帝国的产品的不断增加的差异使得这些联系更宝贵；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漏洞必然产生，由此，极端需要的商品能够在两帝国之间进行交换，海关官员假装没有注意到它们是被列在禁止出口的名册上的。这种贸易的数量不可能很大，但它以高风险提供了高利润。它对新型的商人产生了启发性的影响，他们将使商业成为一种更加独立和更有声望的活动，而不是老式的生活在政府官员和在土地所有者的阴影下的那种活动。

中世纪早期的贸易在质量和风格上——商人的类型和职业、商业技巧、交换的商品和形式、海陆交通——能够得到很好的描述，但不好用数量来测定。对这些话题做一简单概括——其中的一些将在其他的章节和卷册中专门

论述——这些概括应该在下一个部分做的详细的编年式的概览的前面。铸币、物物交换、信用提供了质与量之间的转换。事实上，铸币是惟一相当连贯的存留下来的确切的证据；它们的重量和成色可以检查，它们的购买力偶尔可以从销售的记录中推导出来。但是它们不能提供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所要求的准确的量化答案。铸币可以受与贸易需求不相关的政治和心理动机的影响；而且，已经发现的铸币，主要是窖藏的，它既不是一个确切的典型代表，也不占实际流通的固定的百分比。尤其重要的是它们仅是三种可能的交换方式中的一种，也还有看不见的所谓的物物交换和信贷。后两者，在中世纪早期，特别难以测量。

但是，罗马在鼎盛时期已发行了各种不同面值的金、银和铜币，每种能服务于特定数量的贸易。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铸币种类的丰富一方面是繁荣和支付平衡的象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它的作用已无法替代：在交易中诉诸于物物交换是比较难的，信用除非在高利贷消费贷款方面，在其他方面也很少使用。那些蛮族人的国王，如果继承的是一个业已耗绝的国库和一种由于长期的危机而失去平衡的铸币，迟早会放弃几乎所有面值的货币，除了一种：特雷米西斯（*tremissis*，相当于金币 *solidus* 的 1/10）。黄金对于一个通过铸币炫耀他自己的权力的最高统治者而言是最合适的象征物，铸造一个特雷米西斯要比铸造同一价值的几个银币花费要少。国王们不选择成色很足的金币，可能意味着他们意识到在一个贫穷的经济体制中其单位币值可能太高了；他们没有提供小额的零用铸币，这表明为大众服务不是其主要的【310】考虑。贵金属的购买力可能攀升得太高，以至于仅仅一个特雷米西斯就有可能给一家人买几个月吃的食物；不知道在零售商店的小规模的日常交换中用的是哪种支付方式，实际上，那样的商店是否存在本身也无法确知。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草率地做出结论说，铸币只作非商业的用途（除了贮存财富、缴纳贡金或支付罚款、装饰项链和手镯，也作为衡量其他货物的价值）；假如它们失去用于买卖的主要功能的话，就不存在铸造硬币的动机了。

伦巴第人的商业经济和组织最靠近拜占庭（它仍是一个使用足金苏勒德斯币（solidi）和活跃贸易的国家）他们逐渐贬值特雷米西斯，但是一直保持铸币到法兰克人入侵；西哥特人也一样，直到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为止。但是，梅罗文加国王到 7 世纪晚期变得太软弱太漠不关心以至于无法把铸币掌握在自己手中。地方官僚、高级教士和自主经营的高利贷者接管了铸币，他们中断了特雷米西斯并代之以更轻的贬值的银币。传统上，许多日耳

曼人和斯拉夫人更喜欢银而不是金，因为银的购买力比金低10倍（在与铜合铸后就更低），新型的铸币对中等规模的交易更方便，虽然对最小额的交易并非如此。但是加洛林人又倾向于重新肯定他们对铸币的权力，恢复铸币的购买力。因为查理曼掌握了伦巴第人的铸币厂，在那里罗马原来的金特雷米西斯仍然生产，人们也许期望能使之（或者是纯金币 *solidus*）成为他们的货币恢复的基石。但这将要增加与拜占庭帝国的冲突，因为拜占庭帝国宣称只有自己有铸造金币的特权；而且银在那时不仅在法兰西而且在英格兰和西班牙迎来了鼎盛时代；因此，他选择银币，该银币在重量及合金方面也比从前的更好。然而，他的计划早早地破产了，银币（denarius）铸造的权力再次丢失给地方，银币的成色加速下降。10世纪，德涅尔（denier）币的白银成色严重下降，变得只对相当小的交易才有用，与此同时，从拜占庭和阿拉伯金币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废止的本地的特雷米西斯，并作为大宗交易的载体。同时，价格开始如脱缰的野马般上升。

即使不考虑另外一个数量方面的争论，该争论必然会引致一个无法达成【311】共识的问题——铸币的绝对数量及其与国际收支平衡的可能联系——人们也很自然地倾向于把长期存在的价格紧缩视为这样一个信号：即使是对中世纪早期萧条的经济而言，大量流通的货币仍显不足。这也许是真的，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商业是停滞的，日常购物实际上不存在，货币流通十分缓慢并且断断续续。只有少数职业商人总是需要现成的铸币的供应；大多数人发现把无须马上花掉的钱储存起来会更安全，若是能够把它们换成中世纪早期人们喜欢的奢侈的珠宝和闪闪发光的圣物则更令人欣喜。结果，货币不必要“流动”，也不必像谷物、牛、马和其他的能立即消费的商品那样可以即时获得并容易交换。我们会碰到要求用食物或用货币支付的记载，哪个方便就使用哪个。在基督教的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和里昂领地上，在10世纪更精确地谈到了另一种方法，银索勒德斯的标准等价物是一只羊或一莫丢姆（*modium*）谷物。在意大利的北方，固定大小的面包圈（*panis de cambio*，一种可用来交换的面包）价值相当于金币的几十分之一，这样就弥补了可用于小规模交换的铸币的缺乏。但是用实物支付，不仅由于缺乏现金而使用，而且由卖者的喜好而定。768年，一个意大利铸币者（也就是一个铸币生产商）用28索勒德斯买了一块土地。从事这类生意的人说来应该倾向用现金支付，但他只给了15索勒德斯的现金。为了平衡，他交出一匹马——也许只能过后再到集市上去买一匹。9世纪铸币降低的成色使一个法兰西北部的修道院给行游的乞丐德涅尔而不是食物；10世纪铸币快速的膨

胀驱使意大利的商人再次要求以实物而不是以现金支付。

即使实物支付和现金贮藏与过去的学者所谓的“货币经济”或“交换经济”（与自然经济、实物经济相反）的遗风并不矛盾，他们肯定也会减慢商业活动的速度。假如信用从高利贷消费贷款转向商业投资就会产生相反的影响；罗马文献的相关记载并不辉煌，尽管如此，中世纪最初几个世纪的情形似乎也无法与之相比。在罗马帝国，货币借贷和银行储蓄主要是银行家和银匠的事，但乔治大帝为了使最后一个罗马的银行家免于破产被迫进行干预，从那时起，Argentarius 这个词仅指银匠。法兰西、西班牙、偶尔还有意大利的议会不断地对高利贷者进行温和的攻击——他们真的是普通的高利贷骗子吗？不过，伦巴第法律规定，有息贷款是合法的，在一件发现于法国南部、源于 11 世纪有关罗马法的意大利著作的原文中，列举有各种形式的贷款：用实物的、用现金的，还包括商人对商人的贷款。至此，银行家这个词有时被用作高利贷者或商业交换者的同义词，在意大利和法兰西的词根中重新出现。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银行家对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这可以由里摩治的圣伊洛（他是金匠—铸造金币者、多哥伯特王的大臣、主教和圣徒）时代得到证明，这种重要性不仅在于他们通过铸币获得赢利，而且还取决于他们寻找到的放贷机会。9～12 世纪，他们的数量和财富在不断增长。在一个普遍的文盲时代，这些钱商往往都是有文化的人，他们与世俗的和教会的官员来往，在血统和职业上他们是普通人，却与贵族通婚，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授职斗争和自治成邦共和国出现中起了一些次要作用。但他们不处在商业革命的前沿，这就导致人们认为他们即使贷款的话也主要不是为了商业投资的目的。 [312]

也许商人获取信贷和帮助的正常途径是与其他商人联手。罗马法对贷款和资本合伙契约的基本安排在做了一些调整后生存下来：贷款努力掩盖它的利息的收取，看起来像个慈善行为；海上贷款将利息作为保险费使用而使其正当化（借款人在由于无意所致的货物出事时将放弃他的权利）。合伙人是完全的团结一致，对风险和利息完全分享，它自出现之日就倾向于流入家族庇护，因此有特殊的兄弟或叔侄的合伙。此后，也许作为非正式的习惯在无法追溯的时代就存在的，新的协作和合作关系，在 7、8 世纪的拜占庭和伊斯兰的法律中出现了，这在 9、10 世纪的威尼斯和南意大利的文献提到过；这种转变表明，尽管有政治和宗教冲突，地中海式的商人合伙仍存留下来了。相互信任是种束缚力量：最简单的新合同是一个商人为另一个商人运送货物（并与之做生意？）时所做的保证，表面上没有关于报酬的条款，但却包含着对回报的预期；最古老的“新”的合作反映了希腊法中抛弃货物的方

[313] 式，是同船的航行者之间订立的，是按照事先决定的比例分享一次共同冒险的风险和利息的协定；最灵活的形式是在海上贸易中由一个为了分享利益而承担所有投资风险的高利贷者和一个为了分享小部分利润而承担所有的劳力风险的作为管理者的借款人的合伙（*commenda*）；保证书、共担风险同享利润的协定和无限责任的兄弟合伙，随着商业的发展，首先过时了，但是利润共享的有限责任将成为中世纪晚期商业活动（前者在海上；后者在陆上）的中心，像现代经济中的公司一样。

差不多在同时，新的合同、新型的既适合于商业又适合于战争的船只的出现，对不再死寂的地中海的挑战做出了反应，但不幸的是它们被拜占庭—伊斯兰争斗所撕裂，被海盗抢劫所利用。它们的名字，大部分来源于希腊语和阿拉伯语，这表明了它们的起源；但是西方人选择和重塑了一个仅满足他们的适度需求的外国模式。平底大船（galley），是10世纪拜占庭的辅助战船，后来经由西方所做的一系列改进，成为地中海贸易和海战的王牌船只。造船的经历表明，在长期的冲突中获利的只是中立方。当拜占庭和穆斯林政府往他们的海员身上加了一系列的封锁和反封锁的束缚还有战争的税收和损失的负担时，威尼斯和阿马尔菲（Amalfi）海员实际上没有受到他们的政府的限制，因而与双方和西方内陆发展了贸易。犹太人也一样；但他们没有自己的旗帜和船只，因此他们依靠的是陌生人的不可信的善意。10世纪，叙利亚人和希腊人从西地中海的商业活动中完全地撤退，并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的国际贸易中面临意大利方面的竞争。

据说阿拉伯人给了海上远程贸易沉痛的一击（皮尔恩的观点），或者相反，他们使之上升（伦巴德）。真实情况可能是一种折中的看法：战争和海盗不是贸易的有利环境，但没有战争能毁坏贸易，海盗也需要抢劫船只。在绝对数据缺乏的情况下，所有的能弄清的只是贸易目标的一些改变。在制作书籍方面，埃及的草纸（即纸莎草，papyrus）被更便宜更耐久的羊皮纸代替很久，但在罗马传统仍然盛行的地区，它仍被进口并被用作官方的公文用纸。梅罗文加大法官官厅在7世纪晚期就淘汰了埃及草纸，但是教廷仍然坚[314] 持使用，直到它在埃及的制造由于竞争被中断为止。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橄榄油由于以木桶代替了双耳罐装载，航运起来变得更便宜了，不过由此引起的口味的改变使它失去了一些顾客；蛮族人喜欢用黄油来烹调而不介意制蜡的硬脂的气味。另一方面，拜占庭（后来是伊斯兰）的丝绸和紫色织物的吸引力和声望，由于作为宗教和政治权威的象征功能而被提高，面对各种流行而不改变。对香料的需求也一样，因为它们具有做食物调料、储藏剂、药材

和颜料的许多用途。无疑这些物品的供应经常不正常，但是短暂的稀缺只会提高它们的价值而不会影响它们在奢侈品贸易方面的中心地位。

在中世纪早期最后几个世纪中，奴隶和战争原料这两个相互作用的贸易部门的价格上升得可能更快了。在这两方面，政府反对重要物资的出口的抗议由于道德方面的不安而不断加强；但是政府没能阻止那些渴望发财的商人，他们对财富的欲望盖过了对其他世俗的担心。由于逐渐把经济和道德价值观念从奴隶制转向农奴制，西方长期把奴隶的价格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725 年，一个在米兰出卖的法兰西男孩的价格是 12 金苏勒德斯，然而那时一匹好马能卖到比这高 1～3 个苏勒德斯的价格。在同一时期，未受训练的奴隶在乌马亚德哈里发那里可卖到 100 第纳尔，一个通诗文的奴隶值 600 第纳尔（超过 500 苏勒德斯）。通常，价格昂贵的奴隶不用做农场劳力，但她/他们在闺房和部队中都是不可缺的，白人奴隶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仍有很大的需求；实际上，直到中世纪早期结束前，沿着基督教世界的海滨进行的抢劫再次发生，这应该与填充由于贸易供应不足而造成的短缺的渴望有关。同期，西方商人从衰竭中的国内集市转向异教徒的边疆，在那里他们可能抓到囚犯并毫无不安地把他们卖掉——甚至对不信教者也是如此——因为不信教者的灵魂实际上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正是此时，在“完全不自由”这个意思上，斯拉夫语中的“sclavus”一词代替了“servus”。穆斯林也一样羡慕各种西方武器的质量，特别是法兰克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剑，当他们的储藏开始衰竭或者离地中海地区太远时，也越来越需要从欧洲进口木材、铁、锡、铜和漆。不管遭到多大的反对，这种与敌人的贸易给西方人提供了满足他们对奢侈品的进口的最好机会，也为海上商人积累了原始资本，他们后来正是从敌人手中费力地夺取了对地中海的军事和商业控制。但是，【315】不能想像得太多：伊斯兰和拜占庭的资料表明最迟到 10 世纪，它与南欧的贸易从经济角度上讲远不是重要的。

然而，造成发达与不发达的商业之间的差异的，并非奢侈品和战争物资的远程贸易，而是日常用品的日常交易。事实上，问题的关键在于中世纪早期西方交易效率上最严重的缺乏，比如罗马道路未加约束的毁坏，沿途的小旅馆和城镇里小商店的实际消失，当局倾向于把任何卖一匹马甚或一柄斧头的陌生人当做贼，盐差不多是惟一尚存的贸易对象（威尼斯把它在商业上的最初发展归之于盐泻湖），所有这些都表明交易便捷性欠缺的严重程度。从这些和其他的现象进行推断，一些学者对中世纪早期的情形采取了最模糊的观点。他们宣称，在那个时代人口稀疏的土地上，在每个大庄园、修道院

和村社，人们自给自足，他们生产自己需要的食品和农村生活不可缺少的简单工具。结果，大部分城镇失去稳定的集市，成为缩在城墙内的一个小块地方，严重地依赖他们的城墙内和邻近的耕地上的产品，并用他们不稳定的贸易和手工业产品的赢利为不可知的将来储存一些东西。职业商人的供应满足的是非常状态和对奢侈品的需求，小贩提供节日的珍品，其他的交易在生产者和生产者之间进行。

这样一幅朦胧的图画并非全无根据的臆想，对于落后地区和灾难时期尤其如此，但是，它没有将某些地方非常活跃的商业活动和南方大部分地区对城市传统的保存，以及人们在艰难的环境下的顺应力和适应性考虑在内。对城市的保存和复兴的考察在这里不宜详细论述，但一些例子是有用的。米兰和帕维亚（Pavia）都未能逃脱人口普遍衰退的命运，但均以一种降低的规模在波河河谷维持了经济的领导权，并与从黎凡特到英格兰的广大地区保持着商业上松散的联系。阿尔勒（Arles），高卢从前的首都，在罗马的竞技场城墙内被强占了一段时期后，再次成为罗恩河谷的贸易和航海中心。奥维耶多（Oviedo）和莱昂（León），基督教徒远征的跳板，重新获得了在托莱多（Toledo）和科尔多巴（Cordoba）丢失给穆斯林的一些贸易。两个全新的中心，威尼斯和阿马尔菲的出现，抵消了阿奎莱亚（Aquileia）和波朱利（Pozzuoli）的衰落。[316] 自给自足也许是众望所归，但即使是那些最大的庄园也几乎不可能真正做到，城市更是如此。因此，当商店因为缺乏日常顾客而消失时，定期的集市形成了。这种情况司空见惯，以至于在早期稀缺的史料中没有提及，新的集市到加洛林时代才开始被注意到，那时它们需要官方的同意和授权。它们的进步可从皮亚森扎这样的例子得到说明，该地在819年只有一个持续一天的集市，到872年或873年增添了3个持续8天的集市，896年建立了第五个开放17天的集市。在像帕维亚附近的每周的集市上，901年一个商人可以花6分钱租一个摊位，无须特别的许可，有可能到中世纪晚期都是这样，最后，10世纪更丰富的文献提到许多城市的商店；有些可能只是随时移动的营地（有时候，西班牙语称商店为Tienda，即“帐篷”的意思），但是有些商店在大的宅子里，而且有可能在那里扎了很长时间。

旅行和交通可能十分困难，但绝非不可能的事。正式的小旅馆通常被接待付费的旅客的私人商号代替，至少在意大利是这样；我们无须把一个德意志主教发的牢骚太当回事，他抱怨意大利的旅馆经常使他们的顾客中毒并且总是不断地催促付账。另一方面，由教堂或由世俗的基金会赞助的旅馆或客房为过往的朝拜者和其他的过路人提供免费的或非常便宜的帮助；商人能暂

住在那里，许多朝拜者是有名的走私者。在罗马的道路无法通行后，一些慈善机构或兄弟会也对建造道路或桥梁感兴趣。昂贵的碎石路对主要诉诸驮畜的交通来说并不必要，特别是到中世纪早期结束前马蹄铁被使用后——更不用说在一个人也被作为驮畜来使用的备受压迫的社会里；任何小路都可以走。尤其重要的是公路的废弃导致内地和沿海航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这种运输的主要工具是驳船的体积非常有限的小艇。盐、谷物、酒、油和其他的物品因此得以转运到很远的地方，这通常由小的生产者本人或大生产者的代理人来做，他们在集市上出售产品，这样就成为业余商人，就连专业的工匠也在自己的住宅或市镇集市上出售他们的产品。波河、阿尔诺河流域（Arno，valley）、特霍恩河、奥德河和它们的支流成为贸易的主要路线，通过公路和运河与莱茵河、美因茨河、卢瓦河、加龙河和其他流入大西洋的河流连接起来。装满了铁的船只以极危险的速度沿中部和东部阿尔卑斯山的溪流顺流而下，[317]即使是瑞士山脉的小瓦伦湖、东威尼斯悉尔河的沼泽湿地和亚平宁山脉（Apennines）的斯卡尔腾纳的多石河床，也都成为船员通行的道路。

我们不该忽视这种并不显著的分支贸易的重要性，也无须从那些由盗贼或海盗起家的虔诚商人的传记故事中获得任何提示。的确有许多商人向宗教机构慷慨地捐赠，但这不是特殊的忏悔罪过的形式。我们也不该把附属于一个基督教或世俗赞助人的地方商人和航运者仅仅看作农奴，他们是供应商和商业管理者，当某些修道院委托他们所称的“我们的商人”去买卖他们所定义的“我们的必需品”时，他们只不过是在遵守教会法规的规定和加洛林牧师法令，这些法令授权商人们进行买卖并得到对他们的船只、驮畜和马车的通行税的减免，明确规定的条件是他们只航运教士和他们的仆从的个人消费品。但是最大的和组织得最好的修道院在组织生产的同时还注意可换取其他物品的剩余品的生产。10世纪，桑塔·朱利亚（在布雷斯歇）把原丝带到帕维亚的皇家集市，在那里，1磅卖到5索勒德斯。在米兰的圣阿姆波罗多的修道院，在各种商务中都雇用有银行家和商人，他们中有些人涉嫌高利贷；反过来，这些高利贷者和商人也利用他们与修道院的关系牟取私利。要是世俗的业主的档案像法兰西和意大利的宗教机构的档案保存得一样完好的话，我们可能会对土地贵族和商人（*negotitatores*）间的互利关系有更清楚的认识：8世纪以来零散的意大利资料表明，有些商人娶了贵族的女儿、购买土地，并积极地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再一次地，我们将相信现有文档的多少或许与事实的本相不仅仅有一个偶然的联系；所有的其他的象征表明，城市化和商业化在意大利比在别处更快更早，虽然它们在形式上与欧洲南部

的其他部分差不多相同。

当然，商人很少，贸易也不多见；但是物以稀为贵。罗马皇帝雇用职业商人和航运者，以国家控制的价格来供应和航运政府与军队所需的食品以及其他物资；但是当各种商品比较容易得到时，他们也没有什么理由要去破坏或保护他们的供应商，在帝国最后的危机中，帝国除了努力使代理机构像平【318】常一样供应外，没有找到更好的医治国内供应减少的药方。普通的非武装的商人不容易获得蛮族人的国王的信任；然而普里斯卡斯和所罗门——两个受雇于梅罗文加国王的犹太商人——还有和他们信同一宗教的、受雇于"虔诚的路易"的"皇家商人"萨拉戈萨的亚伯拉罕（Abraham），一起为朝廷供应商品，作为交换，他们也在商业活动中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路易对里昂犹太商人的宽大使该城的主教阿戈巴尔德（Agobard）十分震惊。但当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在 877 年授予所有的"交易人最珍贵的荣誉时"，也就是把诺曼人的贡物交给他们一定的份额时，可能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奥斯曼的皇帝走得更远：轻率地颁布特许证，对来自许多城市（意大利的和德意志的）的所有商人给予集体保护，这样就没有人可以在路上给他们设置障碍。也许这些许诺既不是十分有效也不是完全免费的，尽管特许中没有具体提到商人需要付出的代价；但是他们对整个商人阶级表示了罗马帝国从未有过的尊重。

两个意大利文献作为对未来的早期趋势的象征值得特别注意。750 年，爱斯图尔夫（Aistulf）这个伦巴第的国王，并排列出 3 个有产者阶级（土地所有者）等级和 3 个买卖者阶级，他们有义务成为骑兵或步兵，并提供与他们的财富相称的武器。每个阶级，无论是地主还是商人都要承担相同的义务，惟一的差别是后者可以选择以现金来完成。尽管爱斯图尔夫的军队被矮子丕平的军队完全打败，商人在中世纪早期能被视为与地主的地位对等的人这一事实仍是非常特别的。829 年，朱斯蒂尼亚诺·帕特西帕齐奥，这个威尼斯的总督，在他的遗嘱中不仅提到不动产和宝物而且还有一笔数目较大的海上商业投资——1 200 镑银。威尼斯那时并不是蛮族人和前封建社会的西方的一部分，而是拜占庭帝国的一个自治地区；但按照拜占庭的法律，对一个贵族和一个统治者来说，投资于贸易是一件不荣誉也不合法的事情。总督亲自做出以一个商人的身份去碰运气的榜样，这比一个骑在战马上的伦巴第商人更让人感觉奇特。但是在揭示意大利早期发展的因果关系时，似乎有必要把焦点从基本趋势方面转向在中世纪早期南欧的各个部分的事件发生的时【319】间顺序。

5.1.2　发展概述

在西罗马帝国正式分裂后，没有发生突然的改变。蛮族人在完成征服后不仅停止了以前的破坏性活动，而且还努力保持旧的机构，甚至不问这些机构的好坏。他们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用激进的手段来医治致罗马帝国于死地的经济和社会病根。他们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压迫性的贸易税收，虽然他们使之不那么有效，他们也没有特别努力去打破庄园。西部没有像拜占庭帝国那样取消销售税，也没有像稍后拜占庭农地法所显示的那样复兴了自由农民制。东部帝国来的商人继续加紧对西欧和西北非的商业活动进行控制。希腊语词汇——*catoaplus*，*catabolus*——指的是蛮族帝国的一排船坞和即将靠港的船只。因为拜占庭的皇帝通常与这些国王关系较好，东方的商人在各处都畅通无阻。

在汪达尔征服后不久，非洲显然开始向君士坦丁堡和罗马运送油脂。迦太基商人继续前往西班牙，拜占庭商人依然在迦太基保持着自己的势力。待到乔治大帝时代拜占庭在非洲和意大利恢复势力后，每年都有几条从迦太基开往罗马的船只。6 世纪晚期，西班牙南部也成了拜占庭的一个保护国，这就使东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间的直接交通重新成为可能。在科尔多瓦有一个希腊殖民地；其他的希腊商人“从东方乘船而来”。两个城市都在西班牙境内，都位于流向大西洋的河流上。7 世纪有迹象表明拜占庭的船已到达英格兰。希腊的圣徒传记曾谈及有一条亚历山大教堂的船只运载谷物到英格兰，并在那儿装上锡，直到近来这条信息仍被认为没有史学价值。但是在英格兰东部出土了一条盎格鲁—撒克逊船只，船中载有拜占庭的银具，这一发现给刚刚提及的那段传奇性的叙述带来了未曾预料的印证。但之后不久，西哥特人再次征服了西班牙的南部，这肯定使大西洋与东部地中海之间的直接联系被迫中断。

法律文本也许是提供有关西哥特人西班牙贸易的信息的惟一来源。我们发现国王努力控制铸币并保存罗马发行的遗留下来的货币。我们也知道商人在王国的陆路上和河道上装载着金、银、衣服和各种装饰物，这些都是由跨【320】海的商人进口到那些海边城镇的。假如我们以西多纽斯（Sidonius）讲述的 5 世纪的商人故事做出判断，这个阶层的人或属于为海外商人工作的运货者或属于自食其力的小商人。有可能猜想跨海商人，主要是东方人，比本地商人属于一个更高的阶层。西哥特的国王对这些“海外商人”征收重税，但也努力清除设在他们路上的障碍。但是国王的保护不包括犹太人，在所有较大的城市中，都有不少犹太人。一系列限制他们活动的法律在爱加扎（Egi-

za）国王（687～702年）时达到了顶点，在他在位时，犹太人被禁止到达船坞或者与基督教徒贸易。难怪几年后，犹太人欢迎阿拉伯人的入侵。但在结束对伊比利亚半岛的论述之前，我们必须回想起来自乌吉尔和巴塞罗那的基督教商人，在西班牙的马奇，与位于西班牙哈里发王国的科尔多瓦和其他的城市保持联系。在有关的资料里特别提到的奴隶是这种贸易的惟一对象。

在地中海沿岸的法国，贸易更为活跃，尤其是在法兰克国王从哥特人手中夺得普罗旺斯以后，这里成了最大的蛮族国家通往南部海洋的主要出口。甚至仍掌握在西哥特人手中的纳邦纳（Narbonne）也因为靠近法兰克的边疆而获利。在普罗旺斯，不仅马赛（Marseilles）和阿尔勒而且更小的中心像奈斯和奈宁也在5～7世纪通过海路与意大利、西班牙、非洲和黎凡特保持联系。他们出口奴隶、布和木材。他们进口加沙和费勒诺的香料、葡萄酒，进口橄榄油、米、椰枣、无花果、原书纸、毛皮和丝。这些商品大量的经由水运和陆路从海滨发送到梅罗文加的法兰西的最边远的地区。我们也听到，716年国家之间的交通依旧是通过马车和船只进行的。许多罗马桥梁被破坏，但它们被像阿尔勒那样的浮桥替代。在像罗德兹和邻近城镇这些更小的中心也组织地方性的贸易。在那些更大的中心，商人有着永久的居住地和商店，但只要哪里有一点商业机会，他们就会迅速地赶到哪里。东方人在批发贸易上比本地商人在数量上更多一些。当一个法兰克国王进入奥勒利安时，他受到用拉丁语、叙利亚语和希伯来语表达的欢迎，直到今日那里仍是法国的一个语言都会。

地中海法兰西——当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吞并郎格多克【321】（Langedoc）和查理曼时，其领土得到增加——在8世纪初以后并没有失去商业上的重要地位。可靠的资料不止一次地提到意大利的船只在9世纪停靠过马赛。而不太可靠的资料提到，查理曼统治后期在阿尔勒有各种各样的阿拉伯加工品，也提及在纳波恩海滨挤满了非洲、犹太人甚至布雷登（Breton）（或不列颠?）的船只，而且似乎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博索（879～887年普罗旺斯的国王）时期的一个章程把对希腊人和这个港口城市的其他外地人征收的通行税授予阿尔勒教堂；921年这种授权得到博索的儿子认可。在9、10世纪，特霍恩（可能还有普罗旺斯港口）被凡尔登商人用于到西班牙出卖奴隶。我们惟一能够确信的是，从法兰西的北部到西班牙的路线是在经法兰西到罗马路线上的里昂附近分叉的；奴隶和朝拜者在分手前走在同一旅行队。里昂就是许多犹太人的故乡，他们拥有犹太教堂和奴隶，能够得到酒和其他的奢侈品充足供应。

但是，似乎无可怀疑的是，加洛和早期开普廷法兰西逐渐地远离它自己

的地中海海滨，转向内地发展。在促使这种逐渐地改变发生的诸种可能的原因中，我们必须认识到7～10世纪晚期逐渐恶化的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地区性战争和外敌的入侵的重要性。同样的灾难也影响了意大利—拜占庭城市与伦巴第内地的贸易，但并没有使其中断。也许衰败的一个更具体的因素是在法兰西和东方政权之间缺乏正常的外交关系。战争没能消灭走私。互惠的贸易条约和有利的关税对贸易的充分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即使在蒙昧时代，在通过边境时，在穆斯林国家、拜占庭帝国、伦巴第的意大利和加洛林帝国的主要集市上，护照都是必要的。当查理曼与科尔多瓦和巴格达的关系达到顶峰时，在阿尔勒有穆斯林的商品被提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普罗旺斯的国王与君士坦丁堡谈判有关结盟的问题时，希腊人才出现在这个城市。一般而言，只有犹太人才能在法兰西和非基督教的地区间来来往往，因为他们没有特定的国籍，在政治上没有危险。虽然有针对他们的歧视，但是他们的权势更多地帮助他们而不是损害他们。在加洛林的法兰西，他们在商业上如此了得以至于在教科书上经常地把生意人划为两类："犹太人和其他的商人"。

这并不意味着从东边涌来的商业潮流没有到达法兰西，而是它们必须走弯曲的路线。9、10世纪一个新的经济体——天主教欧洲——逐渐出现，代 [322] 替了更古老的地中海。与拜占庭和穆斯林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住在边境附近的居民和准许进入东方集市的商人：斯拉夫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意大利—拜占庭人而得以维持（7世纪法兰克商人，主要是贩运奴隶的商旅队前往斯拉夫和埃瓦地区进行贸易。查理曼建立起从多瑙河到北部海滨一系列边境前哨，在那儿他的臣民能够与斯拉夫人进行贸易）。边境前哨随着天主教欧洲的扩展一直向东移动。10世纪，波兰人、俄罗斯人、土耳其人、穆斯林和犹太商人到布拉格去购买奴隶、毛皮、锡和其他的欧洲的物品，无疑也在那儿出售东方商品。这种陆上的旅行，速度慢、费用高而且经常被战争阻断。经由伏尔加河或第聂伯河和波罗的海的斯堪的纳维亚河上和海上路线虽然更长，但也便宜一些。经地中海、波河河谷和陡峭的阿尔卑斯山关隘的意大利—拜占庭路线是最短的，可能也是最便宜的。

毫不奇怪的是，法国与东方的贸易因路线的改变而遭受损失。但是由于这种崭新路线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商机，德意志西部、南部大河的城市获利最多。美因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地方商人装载着谷物顺美因河而下到达该城，马格德堡的商人把易北河河口附近的巴多威克与美因茨联系起来。866年前弗里斯兰商人定居在美因茨最好的房子里。他们不仅把他们国家的纺织品带来了，而且也带来了在斯堪的纳维亚或者在罗马购买的东方的物品。其他

的物品也被斯拉夫商人进口到这个城市。犹太商人从德意志中部得到盐，很自豪地把一些直接从巴勒斯坦进口的商品带到了美因茨。一位西班牙旅行家在973年来到美因茨，他在那儿惊异地发现了印度香料。这些香料有可能是由当地商人在意大利—拜占庭城市购得：一个美因茨富商，利厄特弗雷德，被奥斯曼一世任命为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他经由威尼斯到那儿。显然，这不是他第一次走这条路。他所在的城市在欧洲的中心，能够很方便地使用从东方到波罗的海、欧陆和地中海的供应路线。德意志、瑞士的城市中心靠近南部，这肯定是因为受了意大利—拜占庭城市重心的吸引。法兰西南部也一样。我们知道的大量的关于阿尔卑斯山南北的资料都提到意大利人是主要的——【323】假如不是惟一的——向大半个欧洲供应东方物品的人。

意大利最终开始利用它作为大陆欧洲和地中海盆地的中心位置的优势。在中世纪第一个500年内，尽管有频繁的政治军事事件，意大利还是发生了富有成果的转变。这个拥有还算富有的农民和农场主的国家，在罗马时代曾不得不依靠东方人维持他们贸易，甚至不能为他们过度发展的首都供应足够的食物，现在却走上了成为第一个商业和工业发展的国家的道路。在转型期结束前，迈出了一个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但却十分有意义的一步。意大利—拜占庭商人差不多完全代替希腊人和叙利亚人成为东西地中海贸易的中间人。

这种转型最初是缓慢的。犹太人、希腊人和叙利亚人在东哥特人统治时仍占据着意大利的商业。政府从王国的非意大利省份和从非洲大量进口谷物和其他的食品，其进口的商品比出口的商品数量要大得多。人们怀疑的是，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市政管理、手工业行会和税收制度是否真的是一种恩惠，因为这种沉重的结构曾经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的崩溃。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是罗马时代的公路一直得以保存下来，即使它造成了对内河航运的弃置。由于西地中海——除非洲之外，非洲在这时也是由友好的汪达尔人统治——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东哥特人的内湖，海上贸易因而得到了改进。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上来理解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这种夸张，在他的想像中，把罗马过去的贸易置于港口中心，把威尼斯海岸的渔夫转变为“想要穿越重洋的”海员。我们也不要过分信任一个编年史作家，他说到商人蜂拥而入来享受西奥多维克的良好秩序；在其他有关这段据说是富足时期的材料中也提到过乡村的强盗和城市里的武装团伙。

无论如何，西奥多维克时期的任何恢复由于希腊—哥特人的战争（535～553年）和伦巴第人的入侵（568年）的恐怖的劫掠也已化为乌有。在无法无天的伦巴第人的“政权空白期”，情况也许更糟，但不久之后却是一段相

对和平稳定和缓慢的经济恢复期。不过伦巴第人还是不能从君士坦丁堡人手中夺取对大部沿海地区和对海洋的控制权。沿着"罗马"属地的空壳，居民被迫转向通过海上贸易获得生活资料——因为他们不再能从丢失的内陆获得。格列高利大主教（Gregory the Great）的书信显示出拉韦纳（Ravenna）【324】的商业贸易的重要性，并提到差不多从3月到10月初，每月有无数船只离开那布勒斯和罗马开往各岛、非洲、普罗旺斯和黎凡特。

3个世纪后（约875年），当穆斯林和诺曼人的抢掠发展到极点，半岛处于无政府状态时，第勒尼安海的航行季节略微缩短了。船只，通常为了安全组织起来由护航队护送，航行的季节从4月至9月。有些遭到敌人的袭击，有些也袭击敌人并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到达友好的海滨。那布勒斯和罗马那时不如阿马尔菲和加埃塔（Gaeta）重要。那些由群山包围的小海港的码头证明这种阻隔恰好刺激了海上商业扩展。不久，萨莱诺这个"伦巴第"城市放弃了国家间的平等，承认拜占庭的领导权以寻求新的财富。再往东，亚德里亚海南部"罗马的"巴里，因为有一个较广的腹地，在选择农业和贸易之间仍然犹豫不决。最终，由于靠近巴尔干的海港，从那儿，*Via Egnatia* 可从君士坦丁堡到达杜拉佐（Durazzo），天平还是倾向了贸易一端。拉韦纳，这个古老的政治和海上都会，继续繁荣。再往北，沿着威尼斯小岛的边缘从科马乔奥到格拉多（Grado），一个以捕鱼为业的部落转变为一个以经商为主的民族。到10世纪晚期和11世纪早期，一个伦巴第作者以极大的好奇指出，威尼斯人"不耕地、不播种、不收获葡萄"，但是有钱购买他们需要的谷物和酒，并用他们的物品——盐、香料和丝做交换。

这些群体的繁荣，正如我们所知，大部分建立在同他们的拜占庭领主和他们的穆斯林和伦巴第邻居的三角贸易的基础上。拜占庭帝国坚持罗马后期的旧例，并以之指导边境一系列的市镇的外贸活动，外国人没有通行证是不许进入边境的。假如得到准许到达君士坦丁堡，他也要在通行证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交易，而且必须到国家规定的地点食宿。一长串禁止出口商品的名单——奴隶、黄金、战争物资、基本的食品、为皇帝和他的宫廷保存的贵重的织物——对外国人也像对本国人一样设置繁多的限制，*kommerkion* 这个单词，意思是对国际和国内贸易的一系列税收。但是拜占庭提供了很多吸引人的手工艺品、香水、香料以换取它所需要的更简单的物品，在其绵延的海上和陆上边界进行走私并不十分困难。意大利—拜占庭城市完全可以作为合法【325】贸易的边境集市，但对走私也十分方便，而且免除了对外国人的许多限制。威尼斯人常因为战争、航运和国家邮递而出借船只，他们在达达尼尔海峡得

到更低税收的优待；阿马尔菲人，因为他们不可靠的忠诚，没有得到此等待遇，但仍然像拜占庭共同体的边省居民一样过境。我们希望更多的来源于拜占庭的资料保存下来，但是我们现有的少量资料清楚地表明，当时存在一个持续的且不断增长的贸易关系，而且显然有着一个有利于帝国的收支平衡。

在穆斯林世界里，意大利—拜占庭商人肯定被作为不友善的外国人对待，在那儿，对贸易和外国人居住的限制要少一些，但与拜占庭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除了存在少数像在古开罗对阿马尔菲人的袭击（996 年）那样的例外之外，他们没有遭受过涅斯特利教派的维齐尔的旧式压迫。他们主要进口香料、香水、象牙、织物和食油；他们出口奴隶、木材、铁、木器和铁器，所有这些都可能在反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中被使用。但是，只有威尼斯的总督十分努力实施禁止这种贸易的法令，最好的时候也取得过短暂的成功。南第勒尼安的海港时常与穆斯林的政权联合起来。9 世纪，教皇约翰三世或者利用逐出教会的威胁，或者提供在罗马的关税豁免再加上10 000 银曼卡（*mancusi*）[①] 的礼物，试图战胜那布勒斯的主教、阿马尔菲和加埃塔的地方统治者，但是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教皇用来书写反穆斯林呼吁的草纸和曼卡都来自穆斯林。反对来，突尼斯穆斯林的使节们登上威尼斯的护航船，帮助进攻一只西班牙穆斯林的护航船；然后这些使节组成使团去劝说西西里的拜占庭总督续定协约，以保证两地公民相互之间的贸易权利。在这种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交互纠缠中，意大利—拜占庭城市追求后者极少受到官方政治姿态的负累。阿马尔菲人由于自己亲穆斯林的立场，不管在拜占庭遭受了什么损失，都可以通过他们在非洲与西方和拜占庭的贸易中获得的利益而得到补偿。

意大利—拜占庭与伦巴第王国以及后来征服伦巴第王国的法兰克之间存在经济地理上的联系，前者是没有腹地的城镇，后者是没有沿海的内陆，两者在商业上存在不可避免的相互依赖。后来，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也逐渐征服了海滨地带，不过两者之间的原有联系并未发生实质性地改变。伦巴第和【326】法兰克的统治者很少与拜占庭和穆斯林友好相处过，他们也没有处于一个赶上意大利—拜占庭贸易中心的更好发展的位置。除食物外，后者在相对不发达的内地发现了铁和木材，这能支付向穆斯林世界进口的费用，而且剩余的钱还可在对拜占庭贸易时有用。到 8 世纪早期，在拜占庭皇帝和伦巴第国王之间缺乏正式贸易协议的前提下，处于利厄德普兰德国王统治下的地方政权

① 单数 mancus，参见“附录”。——译者注

主动地对沿波河到克拉蒙纳航运油、盐和胡椒粉到克里莫纳的意大利—拜占庭的科马乔奥水手减少通常为10%的外贸税收。这些日常家用的各种食品实际上是这种贸易丰富性的见证：盐大量地从意大利—拜占庭的盐湖蒸发而来，油大量地来自非洲，胡椒粉小量地从君士坦丁堡或亚历山大进口而来。对威尼斯人发出光临帕维亚这个伦巴第的首都的邀请也归结到同一时期（也许是对利厄德普兰德国王自身）。结果，一些伦巴第商人进入拜占庭在意大利的领土——边境线没有明确地划分——但是迟至10世纪，他们并没有允许在拜占庭首都建立商栈。

意大利--拜占庭港口的商业繁盛一度由于加洛林人直接与君士坦丁堡、科尔多瓦和巴格达王室的谈判而受到威胁。也许查理曼与哈伦纳阿—拉沙德的条约（我们对之几乎没有准确的了解）仅仅涉及到朝拜者的旅行。但这些朝拜者，有可能利用在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救济院（*xenodochia*）附近的集市，在那儿，任何人如果在一年内付两块金币，就能买一个摊位出售自己的商品。813年，查理曼与拜占庭皇帝不为人知的条约显然给了每个帝国的公民进入另一个国家的所有的陆路和水路的权利，同时允许他们进入各自首都里由国家控制的集市。但这一条约（πάkTov）是失败的，在批准后差不多立即就被废除了。因此，加洛林人，在无望弥合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分歧之际，把813年条约允诺给整个拜占庭帝国的互惠条件完全地转给了威尼斯。这似乎是840年法兰西--威尼斯条约的根源，通过罗塔尔皇帝的传播和随后的确认和改善，该条约为威尼斯超过在西方贸易中意大利—拜占庭其他的海港的绝对地位打下了基础。在随后的日子里，阿马尔菲、那布勒斯和加埃塔与穆斯林开诚布公的合作最终使这些城市被剥夺了在拜占庭帝国的特权地位。其他的意大利— 【327】 拜占庭城市，如科马乔奥、拉韦纳和一些伊斯特里亚海港，被伦巴第或法兰克人征服。伊期特里亚对他们的法兰克统治者的抱怨表明这种征服的意义：“我们被自己的邻居威尼斯或达尔马提亚人（Dalmadia）嘲笑，也被从前的主人希腊人讥讽，（我们不能）对外国人友好。”看到科马乔奥被摧毁并被迫向威尼斯屈服，为了保持原来的一些贸易，最终伊斯特里亚请求威尼斯表示希望成为它的保护领地。甚至拉韦纳也开始衰落，尽管10世纪出现的一个商会（*schola*）——这也许是一个罗马时代的残存，也许是中世纪西方资料中提到的最早的商人“行会”——说明它曾有过更强的生命力。

到11世纪的早期，威尼斯通过武力和外交手腕在东西贸易中间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地位。它实际上独立于君士坦丁堡，尽管它一直还享有拜占庭公民的权利。威尼斯与所有的穆斯林的政权保持着外交关系，与意大利国王和

西方皇帝保持平等的交往。它还与北意大利的一些地方政权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保证威尼斯人沿从阿尔卑斯山发源的主要河流进行的贸易享受低税待遇。加上伊斯特里亚城，几个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城市和海岛——以前是在拜占庭帝国范围内——为了躲避斯拉夫的占领，接受威尼斯的宗主权。随着达尔马提亚的生丝作为贡物的流入和允许外国人以像在拜占庭首都的商馆一样的条件进入当地由国家控制救济院，威尼斯成了西方的小拜占庭。

威尼斯未来的竞争对手热那亚，在11世纪早期正开始从大约642年伦巴第人征服后的长期萧条中恢复过来。征服者摧毁了它的城墙，使得沿海的公路和穿过亚平宁的公路被废弃。在3个世纪中，我们只听说过一次护航船队在从罗马去往普罗旺斯（878年）的路上在热那亚停留过，而且它不是商业船队。一个在934年或935年的袭击过它的穆斯林船队发现，这里主要是一个渔夫和农民的地区，只有很少的商人以及教会的和世俗的地主，他们一定非常失望。但是，这次袭击引起了一个强烈的反应；这个地区联合起来，从政府获得了特权，并为商业和战争准备好了自己的船队。

比萨，在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统治时，发展得越来越好。它是王国内主【328】要的第勒尼安港口，距离王国存留下来的公路干线很近，而且离托斯卡纳的省会卢卡和由国王松散控制的惟一岛屿科西嘉都很近。伦巴第人显然给予比萨一定范围的自治，并保护外国人群体（无疑是意大利—拜占庭人）。在法兰克人统治下，它继续得到希腊奴隶的供应，也向拜占庭的撒丁岛派遣船队，还可能与君士坦丁堡建立了直接联系；像热那亚一样，它成了穆斯林袭击的一个目标，但袭击都被击退。

意大利内地的城市似乎也比其他的蛮族国家保存了更多的活力。到中世纪早期结束时，它们的社会网络和政治行为与意大利—拜占庭城市有很多共同之处：相当多的贵族、自由商人和手工业者居住在城墙内，从事许多的地方行政性质的事务。另一方面，在拜占庭的影响下，中央政府也卷入了对经济的控制。有关这些情况的信息主要来源于一个对10世纪情况的描述，但有些描述内容显然可追溯到伦巴第的中后期。在帕维亚，像许多其他城市一样有商人和银行家在内的基本的职业和行业，这些均由皇家的官员控制下的长官领导。国家对所有在王国河流中发现的金拥有所有权，管理铸币厂，按照模仿拜占庭制定的伦巴第法惩罚伪造货币者。在波河航行的外国船只在首都帕维亚有它们的停留地。来访者会发现那里只是一个空荡的集市，而不是繁华的中心，他们在那儿扎下了营地，除非经允许否则不能进入由来自其他城市的教会机构在该城建立的住房。一个伦巴第官员，与拜占庭的长官类

似，监督交易的进行并从意大利—拜占庭的织物、香料、镜子、油盐的进口商中收取贡物。为了控制经大陆来的商人，在从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的任何一条道路上都设有海关机构。在这些边境前哨里，外国商人不得不停下来接受检查，并在那里缴纳进口马匹、奴隶、锡、剑、亚麻和大麻10%的关税。盎格鲁—撒克逊人，由于有特殊条约的保护，仅在每3年一次地付一笔比较大的现金和实物贡礼。

然而，国家对贸易的控制说明国家对维持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感兴趣，自然这种控制未必是件好事。在意大利，它的效率更加低下，与拜占庭相比害处更甚，因此也更令人难以忍受。早期加洛林人在意大利的所见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努力把其中某些方面扩展到他们帝国的其他部分，可是还没来得及使之发挥作用他们就已经失去了权力。加洛林之后的意大利国王努力使这种控制运转了一阵，但最终屈服于那里自治市的不断增加的主动【329】权，比起阿尔卑斯山以外的继承加洛林传统的封建贵族来，这是他们对商业需要做出的更好判断。

5.2 商业革命时代

5.2.1 在经济前线的商人

从10世纪中期到14世纪中期，南欧的令人惊奇的经济生活浪潮在西方文明史中标志着一个巨大而不可逆转的转折的发生。这是一个漫长的把欧洲从不发达转变为充分发达的过程的第一个时期，它把人均生活水平提高到超过罗马顶峰时期，财富分配也较以前更为平等。在最低的社会阶层，它解放了本国的基督教奴隶，也给予了农奴政治上的权利。虽然矛盾但并非毫无逻辑的是，它在这里给了城市自治以力量，在那儿又加强了君主制下的统一。它影响法律和宗教、文学和艺术，促进了各个阶层的教育和交流，在它的极盛时期，它使它的一些商人在从英格兰到中国的整个欧亚大陆（Eurasia）上有做生意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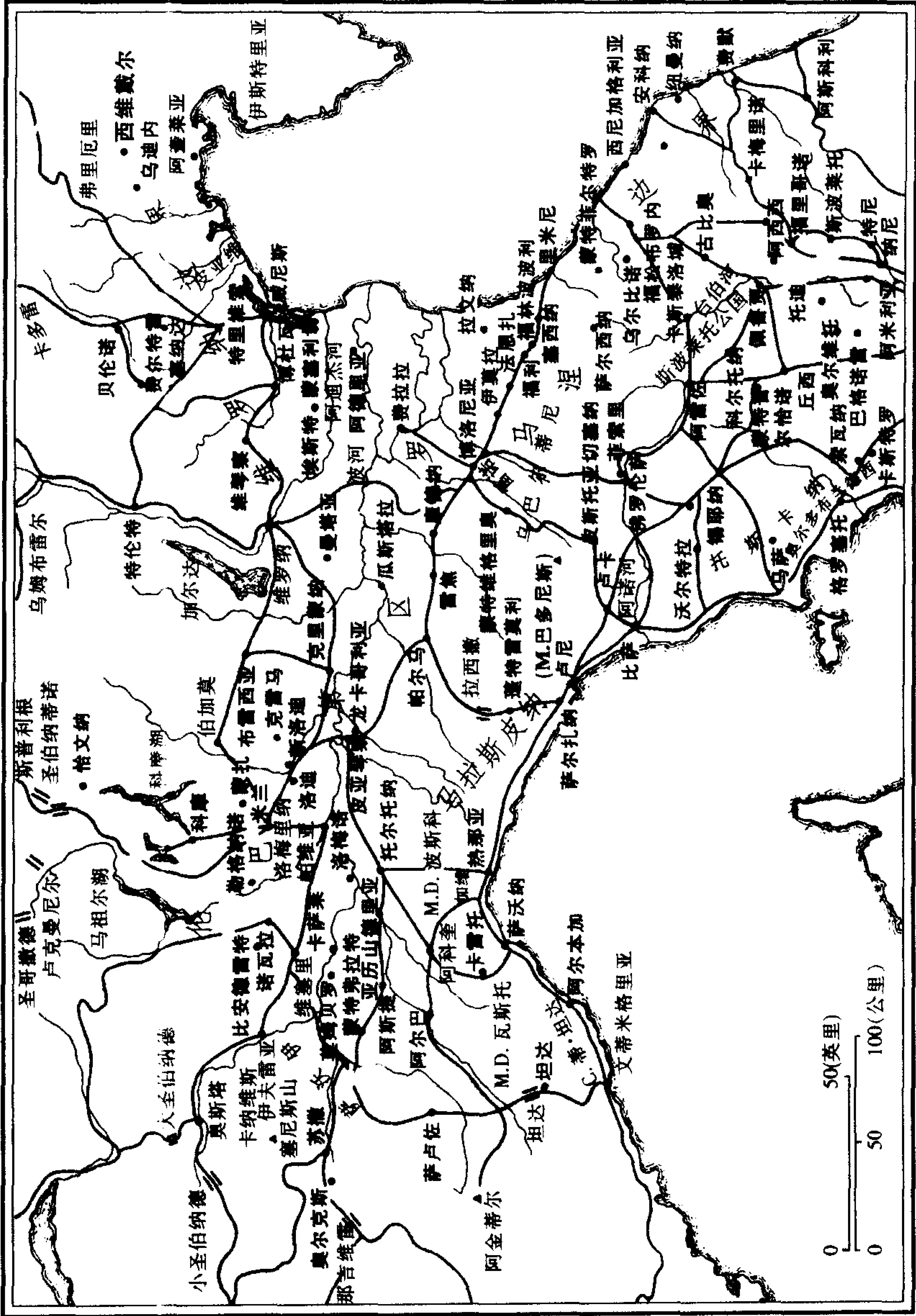
这次浪潮的遥远渊源，一定在中世纪早期后半部分有了最初的涌动——它是在瘟疫消失、人口开始缓慢的重新增长后，在几个世纪没有开发而且可能受有利的气候波动的刺激的土地上发生的。10世纪晚期，充足的人力可能打破这个缓慢的低生产和低消费的恶性循环，这样就开始了4个世纪的农

业增长。农业是基本的，是绝大部分人口的职业和收入的来源。但是单单它的进步难以打破在旧时建立起的经济限制，除非经济发展的领导权从那些喜欢消费而不喜欢投资的人手中转到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愿意推迟消费的人手中。商人没有必要比富有的地主更贪婪，但通常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更专一、更专业，商人成为可被恰当地称为商业革命（Commercial Revolution）的时代的催化剂。

这种转变已经酝酿良久并伴随着商人阶级（上层，也许包括下层）在〔330〕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方面实质性的改变。不管希腊一罗马鼎盛时如何繁荣，商人没有获得土地阶级那样的权利和地位。保持停留在中间阶层，他们最好的处境是成为城市中的二等公民，最坏的是在他们自己的家乡像居住的外侨一样，永远的从商业中退出并为了地位而置地。中世纪早期他们的数量和发财的机会减少到极限，但相同的现象使剩下的少数人的智力、组织和进取性增强了。从艰苦的学徒生涯中熬出头并在多元化的商业革命的过程中，商人重新塑造了形象：他们不太在乎赞誉而在乎自治，不太在乎安全而在乎机会。他们熟练地调整以使自己适应所处的那个分裂而且战端迭起的社会。他们中有一些是较低的封建贵族的成员或过去曾是。无论出身如何，他们都知道商业是一种危险的冒险，资本和劳动不得不承担相同的经过计算的风险（来源于战争也由于贸易），同伴必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被选定。为了换取特权，他们总是保证对更高的权威进行效忠，但通常他们的野心没有渗透进封建和教会的等级制中，那些阶层需要商人的服务，然而不愿意放弃对商人的偏见。商人的最终的目标在 13 世纪早期的阿尔卑斯山到台伯河之间的整个意大利得到充分实现，在沿法兰西和加泰罗尼亚海岸的地方得到了部分地满足，他们成了自己城市的主人，并使城市成为主权国家的中心，使那些地方的农业从属于贸易。在别的时期和别的地方从未有过这样多的为商人治理的并为商人享有的政府——这是进一步谈到“商业革命时代”的原因。

商业化必须发生在工业化之前：只要手艺人没有足够的机器，他们就不能像商人一样以积累资本和吸引低成本信贷来赢得充足的利润。对商业革命赖以进行的商业方法和手段的分析留待以后，现在，我们必须比较仔细地描述一下欧洲南部的商业革命从起飞到高速的发展的进程。意大利有最古老的，最多和最具有启示性的记录；它是差不多所有的起飞的前驱，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起了一个类似英国在工业革命早期那样显著的作用。而且意大利在整个商业革命期间一直保持领导地位，在这一时期末，甚至还在一些部门引〔331〕领了并加速了整个进程。因此，注目这个国家是有益的，同时，随着分析的

5.2.2　商业化的进展



地图4　12世纪的北意大利

展开我们还会指出在南欧的其他部分是落后的，而且即使在意大利，既有主流的富裕也有其他部分的落后。对商业化动力的分析将按时间顺序分别从地方贸易、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这三个方面独立展开。结论部分将努力阐明这些宽泛的归纳，并主要集中于商业革命鼎盛时期的地方和地区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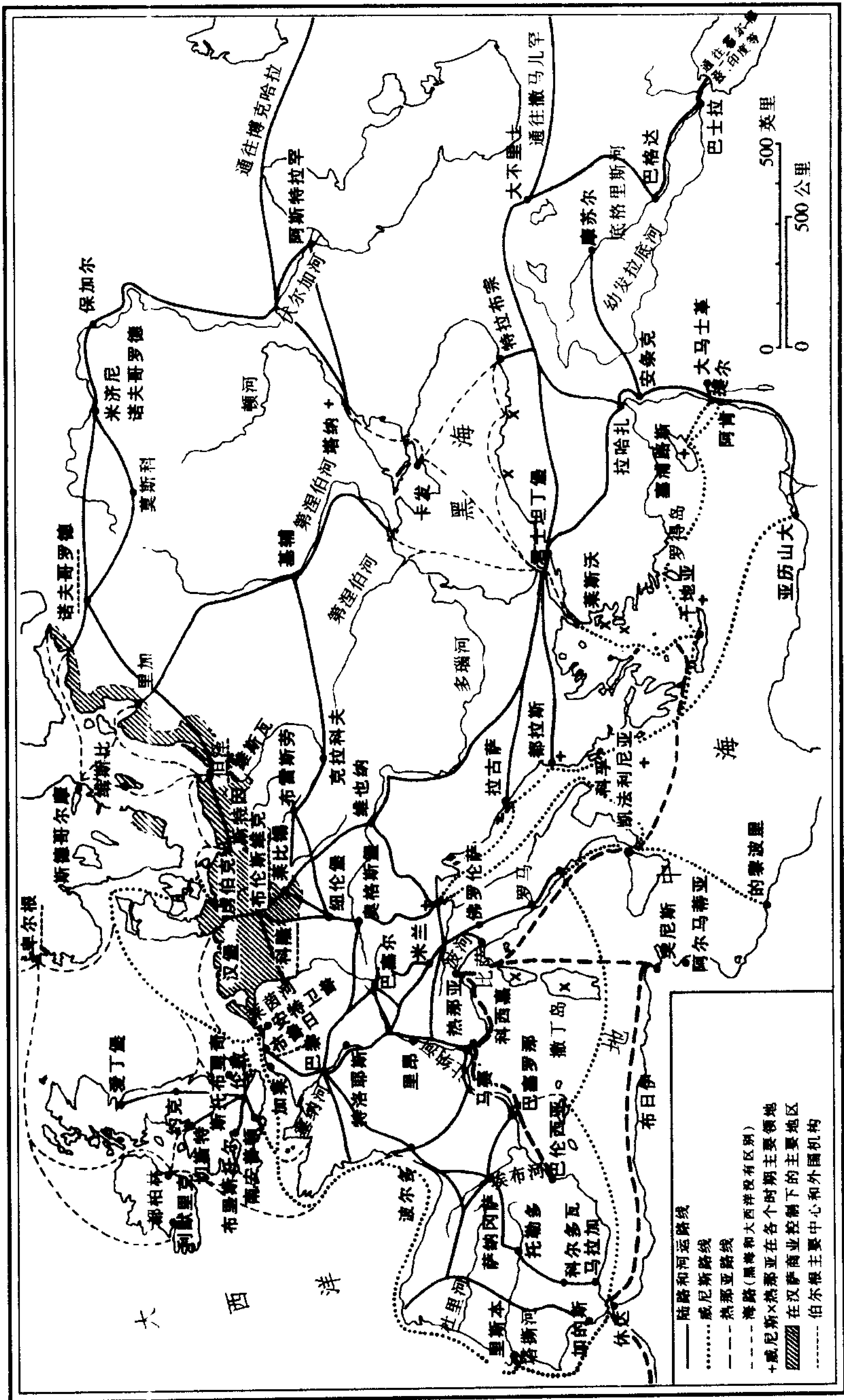
1. 国内市场的扩大

地方贸易不像远程贸易那样显而易见，但有着更强的扩展和收缩的潜力。它是中世纪早期衰落的最大受害者；它的恢复与生产力的不断上升和不断增加的人口的需求相联系，即使它不像远程贸易那样快速地形成大笔财富，但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人口史的研究在近二三十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仍然因可靠资料的缺乏而不能被准确地了解。即使这样，我们仍能较肯定地知道各阶层的人口的增加在整个商业化时代都是稳定而且可观的。最初，只有少数人卷入了商业革命，即使在这一转变达到高潮时许多人仍从事农业。然而商人阶层的增长，不管在绝对数量上是多么地小，也足够改变整个社会的特性。让我们来追溯这些从事商业的团体，看他们是如何卷入其中的。

大的贵族家庭的家长要么使除长子外的其他人放弃继承，要么分割祖先遗传下来的地产直至将其“无限细分”。这样形成的没有土地但却渴望土地的骑士成为战士的一个很大的来源，他们热衷于军事冒险并因此扩大了天主教欧洲的商业边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源于非地中海地区，虽然有些是意大利人、南法兰西人或加泰罗尼亚人。然而，这些战士仅仅是开辟了新的贸易基础，而不是直接从事商业活动。当他们从事的运动结束时，我们对他们的兴趣也就该停止了。

更重要的是那些大量繁衍的等级更低的贵族家庭，他们住在城镇或郊区，不过拥有的地产并不足以让他们作为一个体面的封建贵族维持生活。在许多伦巴第城镇，北部和中部意大利城市子爵后代和主教的后代以及其他的【333】小贵族的后代加入了中产阶级上层反抗德意志统治者、穆斯林入侵者和其他共同敌人的斗争。他们联合起来在 11、12 世纪为城市赢得了政治自由和经济机会。经商是那些封建资源不足和那些发现自己处于自由商业领袖地位的人走出的自然的一步。同时，贵族成员在意大利—拜占庭城市的商业活动中起了一个突出的作用，在他们的领导下这些城市已经或正在获得独立。但这不是什么新事物，因为在那些地方，商业总是包括贵族的大部分人口的一个职业。另一方面，离意大利越远，贵族在这股浪潮中的参与程度就越小。马



地图5　13世纪的主要贸易路线

[334]

赛、蒙波利埃和巴塞罗那的子爵保留了封建主地位，他们对商业感兴趣仅仅在于他们能够征收过路税。确实，在南法兰西和加泰罗尼亚许多处于贵族最底层的土地所有者成了早期的商人。但是还弄不清的是，他们是因为拥有地租而成为商人，还是因为他们在贸易过程中累积了大量的钱财而成为贵族。第二个过程可以通过后来发展起来的那些城市的文件而较容易地理清。14世纪的里昂大约有10个非贵族家族一年又一年地为年轻的地方共和国提供执政官。最终，他们进入了较低的贵族阶层，离他们几个世纪一直在争取的封建贵族头衔仅有一步之遥。

然而，是一般的商人和普通人而不是贵族在意大利和别处充斥于商人阶级的各个阶层。早在1068年，米兰的非贵族商人与住在城里的贵族就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非贵族的商人形成了自治城邦赖以建立的各个层次的私人协会——在有些地方是在11世纪以前，有的地方是在12世纪和13世纪。不久他们就统治城市，似乎城市是他们自己的财产，自治城邦（commune）的政策成了他们商业利益的表现。在米兰他们的霸权直到1198年才受到更低阶层的挑战；在别处，很长时间以来，他们一直是惟一的主人，在有些城市他们从没有与别的集团分权，他们的个人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因强有力的关系纽带而受到限制。它的成员以家庭为单元通常被共同的政治和[335]商业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也有家族的联合——通常聚合在某些党派下，教皇或皇帝党，“白”或“黑”——但是他们所创立的商人行会，在自治城邦成立后很久才出现。在锡耶纳、波洛格纳和别的地方，他们与银行家的行会同时形成，在许多海滨城市和在一些重要的内陆中心（比如阿斯提）从来没有任何形式的商人行会，这也许是因为商业直接或间接地是绝大多数人的职业。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比萨、马赛、蒙波利埃和其他的海港，海事领事并不是某一集团的首领，而是受委托负责港口和航海警事的市政官员。别管是以这样还是那样方式，差不多每个人的生存所需都来自于海上。

当商业活动吸引了城市人口中越来越多的阶层时，财富而不是出身开始成为阶级划分的主要基础。在许多意大利城市，至少有一些商人是由中世纪早期商人们一代接一代地遗传下来的，但也有些人是贸易的暴发户和新秀。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无法查明他们的祖先究竟是谁，因为对普通人而言，家族名字直到很晚才开始使用。在12世纪初，一个热那亚的公证人在抄录许多模糊的家族姓名时——它们通常来源于讥讽或淫秽的绰号——放弃了这个任务，只是简单地加了一句：“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他们的名字难以记录”，许多绰号注定传给了一些热那亚大商人的后代。威尼斯差不多秘密地存封了贵族商人的名

单（1297年），并把新老的“党派”家族并列为“贵族”。马里派诺人宣称他们是伟大时代的贵族后代，实际上只是来源于一个资深商人或一个手工业师傅。在许多其他城市，贵族仅成为一个社会划分，它只能继承某些间接的经济权利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法律特权。佛罗伦萨自治城邦自由地授予富裕商人和店主以爵位，这些人在受封后也模仿旧贵族在农村添置地产，在城市建立自己的豪宅，同时（1293年），加入某一商业、手工业或专业性的行会成为拥有公共职务的前提条件。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在一些城镇，贵族出身的人在努力赢得下层的支持时，总是坚持把自己当做普通人看待。在北部和中部意大利之外的地方，贵族和商人的明显的界限并没有消除，但是在越来越商业化的地区变得越来越淡薄。比如在马略卡，贵族和中产阶级被合为一个阶级，这些享有荣誉的人住在城里通过剥削使农民屈居其下。【336】

商业最终也为某些手工业展现了新的地平线，这些手工业现在成为城市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主要力量。可以肯定的是，在许多小的工商业中心，由手艺人集团统治的城镇的出现仅仅意味着许多商人并不比普通的行会首领更富有。蒙波利埃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那儿许多最低等的手艺人的代表被选为执政官是很平常的事。但在像佛罗伦萨、卢卡、波洛格纳和米兰这样的城市，惟一能在政治中获得地位的手工业通常是那些能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手工业，即能为出口进行生产的纺织业和冶金业或者能为大众消费的商业比如肉店，它们的数量受法律限制，但是城市继续增长。这些获得了与商人和银行家平等地位的师傅，并不是普通的工匠，而是企业家，他们把来源于商业和金融业的一些资本投资于手工业。他们的繁荣最终依靠的是能消费和制造产品的下层行会成员和手工业劳力的人数的增加。正如我们所见，在这些大众为更好的生活条件和为了参与所谓的“人民的政府”（这一称呼的准确性令人怀疑）而奋斗时，我们也许十分惊奇在多大程度上商业化意味着所有人的富足。工资确实是上升了——在1194～1228年，北意大利的砖石匠的工资显然翻了一番——但是铸币的贬值有时把他们的真正所得减为一个非常少的数目。然而13世纪的资料中明确地提到人们的生活标准在不断地上升。商业革命，并非不像工业革命一样，拉大了极富与极贫之间的距离，而是从整体上改善大多数不能超越他们地位的人的命运——更不用说农业剩余品快速流入灾区，这就使饥荒从常发性的转为特殊性的。

然而，商业革命最大的好处是能为每个人从一个阶级爬到另一个阶级不停地创造新的机会。可以肯定的是存在着尖锐的波动和危机，假如我们能收集完整的商业统计数据，我们将可能称之为商业周期。但是人口增长在继续，同时，

国内市场继续扩大，这就创造了更多的新的机会。学徒成了师傅，成功的手艺人成为企业家．新面孔在商业和信贷领域获得了成功，商人和银行家扩大了他【337】们的事业。中产阶级在表面上永不衰竭的繁荣中变得越来越富有。

这种发展也受来自农村持续的移民的刺激，在农村，人口也在不断地增加，也越来越易受城市的影响。一个学者曾经说——也许有些夸大其词——意大利在12、13世纪城市居民的名字表明其2/3左右起源于农村。整个村庄不管是农民还是地主，逐渐地与附近的城镇连为一体。经过几代，新秀也许能跻身于显赫的家族间并赢得一个位置。在但丁诞生的佛罗伦萨，领导白教皇党的塞奇家族来源于西弗河谷；在13世纪早期马赛最大的商人曼杜埃尔家族来自尼米斯附近的村庄。但是大部分移民位于低等阶级之列，他们为主要的手工业、为码头和航运机构提供廉价的劳力，最好也不过是成为小店主或较低档次的手工业师傅。

是业已存在的城市商业阶级吸纳新成员的能力，而不是城镇提供的政治利益，决定移民的规模。虽然，阿拉贡（Aragon）人的农奴在王国的城镇定居一年就可以获得个人自由和市民身份，但在那儿，城镇的发展却很缓慢。14世纪即使在格罗那和巴塞罗那的附近，农奴制仍然广泛地存在。与这相反的是，“发恶臭的农奴”蜂拥而入意大利的城镇。与北欧的中产阶级欢迎移民来加强城市的力量不同，意大利的市民总是觉得本身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征服孤立无援的封建等级，并按照贸易的特定部门的需要来管理移民。他们破坏了城市围墙内的皇宫般的府第和乡村封建主的城堡，然后将农奴转化为自由民——没有政治权利——并让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继续住在原来的地方并为城市生产便宜和充足的食物。他们的需求，通常还有他们对农业的个人兴趣，刺激了他们在农村的经济活动，一方面引进了改进的方法以确保主要食品的产量不断增加，一方面加强为手工业所需的原材料的生产，比如里纳哥巴的亚麻，卢基的丝，托斯卡纳地区的藏红花，阿布鲁齐（Abruzzi）的羊毛，撒丁、易北河和阿尔卑斯山地区的金属。土地的利润增加，结果使农民能从城市购买更多的产品。文字材料表明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农民很少拥有体面的衣服．但他们的必需品仍然足够。货币经济，在中世纪早期的意大【338】利农村并非不为人所知，而到14世纪在农村差不多与在城市一样盛行了。这种小小的农业革命也传到意大利南部，普罗旺斯和加泰罗尼亚，但只局限于较小的规模。

商业革命本身渗入了更小的中心。尽管有关农村生活的文字材料甚是不足，我们还是可以在最小的城镇看到商人、店主和主要行业的手艺人。实际

上，水的便利和离矿藏较近使一些部门远离主要城镇。在贝加莫（Bergamo）和布雷西亚（Brescia）北部的矿谷，工匠和武器生产者制造的精品被城市的批发商出售，在法布里亚诺（Fabriano），清澈的小溪使这个小城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造纸中心，手工业开始在几个小城镇繁荣，其中有些现在仍然有名。漂洗厂和差不多所有的船坞并不建在重要城市里。一个三流的利古里亚海港诺利，在13世纪有地方的贵族、商人、银行家、船主、布商、梳毛工、织工、漂洗工、染工、毛皮商、蹄铁匠——虽然有这些，内地交通的不利条件还是使但丁把寻找一条到诺利的小路所遇到的困难比喻成攀登炼狱所遇到的超人困难。类似的景象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达尔马提亚和普罗旺斯和别的几个地中海国家的小中心也可以碰到。

郎格多克和加斯科涅在内陆，旧的城市较少，一些新的农村定居点承担了城镇的功能。14世纪早期，波尼斯兄弟（Bonis brothers）——他们是蒙陶班（Montauban）的定居点的商人与银行家——从事的贸易的规模与许多城市大商人的相当，他们保存了一本最好的账本，该账本是1 500年前从非意大利地区传下来的。许多新的贸易中心也从空阔的土地上以及撒丁和科西嘉崎岖的海岸上崛起，有些是热那亚或比萨城堡发展而成的。但在意大利、普罗旺斯和加泰罗尼亚的大多数地区，老城市的数量太多，而且太强大，以至于不能容纳新的竞争对手的发展。在波河（Po）河谷的亚历山德里亚（Alessandria）是由伦巴第联盟建立来反对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的坚强的堡垒，是惟一一个起源于罗马的众多大城镇之外的新城市。

商业革命不可避免的方向是经过城市经济转向大都市经济。但是，这个过程即使在意大利也远未完成。当它们完成对自己的农业地区的征服后，意大利自治城邦相互之间开始了内部的竞争，这是为了争夺主导权或仅是为了生存空间，因为发展的机会虽然很大但不是无限的。斗争的武器包括禁运、海上抢劫、[339] 破坏港口、歧视性的关税、建立新路以代替旧的公路和运河。最终，有些城市的地位上升到顶峰，在经历了几次反复后，得以加强，然而有些——包括曾经辉煌的城镇帕维亚、拉韦纳、锡耶纳和比萨——不得不退居二线。其他城市只有无望地尾随，但是即使是最小的城镇通常也保持某种程度的自治，作为周围农村地区的集市，作为沿途交通的驿站和有些高度专业化的手工艺的故乡。因此，它们继续增长，然而逐渐地失去了演化为大城市的人口和资金。我们不能把更小的中心想像成是与主要的商业潮流断开的。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国际贸易与地方贸易比较起来，总是相对地更重要一些。正是许多自治城邦的地盘太小才使得它们不可能作为自给自足的单元存活，即使采取一系列我们谓之为

"前重商主义"的措施，也难以维持一个成熟的经济。

当在城市经济和国际大都会经济间划定界限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商业的深度而不是广度。不仅"大城市"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的小城市的食品也来源于遥远的地区，同时把自己的商品出口到各地，接待来自其他城镇的侨裔，也把自己的侨民派往辐射欧洲和地中海的地区。使"大城市"特别突出的是贸易的广泛影响，它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使城市内的所有其他活动都相形见绌。不是居民的数量而是它们的精神产生了这种差异。然而巴黎这个天主教欧洲最大的城市和大王国的都会，并不是一个商业都会，我们只需翻看13世纪的热那亚公证人的财产登记册（Cartulary，是一些记事册）就会发现在这个"大城市"追求商业利润的热浪有多高。男男女女，寡妇和老处女，老老少少，贵族和仆役，有产者和手艺人，世俗的人和教士，各色人等都间接地或直接地卷入了商业活动中。实际上，每个公民都在平底大船上、驮畜商队中、集市上和殖民地方面有自己的一份，他们与银行家、手艺人一起投资或者在政府的证券市场投资——不管它是好几千镑还是只有几分。那些没钱用来投资的就出力，也期望从商业运作中得到回报。

在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之外的地区，情形就有所不同。城市发展较慢，【340】不能获得或保持充分的自治。然而当所有的自治城邦的政治能量集中起来支持经济的扩展时，封建贵族和君主通常为了追求政治野心或为了增加他们的收入，忽视了在他们统治下的城市的最大利益。但是，有些统治者模糊地采取了"前重商主义"的政策，使用封建力量并把来自内地农业的收入用之于贸易。罗伯特·盖斯卡特（Robert，Guiscard）和罗杰二世是这方面的先锋。在他们的统治下，意大利南部的意大利—拜占庭海港和穆斯林西西里经历了从东方贸易前哨向崭新的主权王国的输出口岸的困难转变。它们处理得非常好。农业繁荣，工业得到促进，并有一个辉煌的，短暂的海外扩张。但到12世纪末以前，一系列的外族入侵和内部混乱导致了衰落，这也许与南意大利相对贫瘠的土地有关。为了建立他们的权力和发动狂妄的战争，国王征收苛捐杂税，越来越依赖热那亚、比萨和佛罗伦萨的海员、商人和银行家。逐渐地本地商人被限制于地方贸易，而北部和中部意大利获得了对国际贸易的控制，那里从西西里、阿普利亚和坎帕尼亚进口的谷物要多于这些地区能安全出口的谷物数量。霍恩施陶芬（Hohenstaufen）和安格文（Angerin）政权也陆续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恢复王国的经济，然而它们或者太软弱或者太迟了。弗雷德里克二世的经济政策尽管精心计划，但由于鼓励季节性牲畜移动而对农业造成了沉重打击。但是，巴勒莫和那布勒斯大城市的

辉煌和墨西那和特拉里海港的繁荣，到13世纪中期时有了明显的衰落征兆。晚祷战争（the War of the Vespers，1282～1302）把王国一分为二，使南部的衰落无可挽回。但人口继续增长，这种增长并没有与之相对称的生产的增长，这样只可能导致贫穷。

同时，普罗旺斯和郎格多克的人口的大部分已处于开普廷安格文的统治下，也结束了能与意大利匹配的商业增长时期。10、11世纪的匮乏的史料显示出阿尔勒是普罗旺斯的主要城市。它在罗马时代晚期非常重要，在中世纪早期陷入了普遍的萧条，不过后来重整旗鼓并成为一个后加洛林时期的包括法兰西东南大部地区的小王国的首都和代名词。这个王国并入康拉德二世的帝国（Conrad II，emperor）和其后的封建分裂并没有阻碍这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只要【341】海岸仍面临穆斯林的侵袭或内部贸易仍主要通过水路进行，它所处罗恩下游的重要位置就仍是一笔重要的财富。12世纪早期阿尔勒与比萨和热那亚一起，是康伯斯特拉大主教为反击穆斯林的进攻而寻求海上帮助的3个城市；到13世纪，它成为一个自治城邦，但强盛时期已过。马赛这个海滨的最好的港口，占据领导地位，充满了作为大都会的自豪。1250年是它的顶峰时期，它的海上贸易远至黎凡特，但仍以西地中海为中心，它虽然比不上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地位，但可以与比萨相媲美。然后，安朱的查理征服了马赛、阿尔勒、格拉斯（Grasse）、尼斯和其他繁荣的普罗旺斯城市，并由于使这些城市卷入背运的海战而损害了它们的国际关系。但是地方贸易继续活跃地发展。纳邦纳和郎格多克人的中心更是不幸：它们的早期增长在商业革命高峰时受到遏制，首先是阿尔比根西亚十字军的灾难，接着是开普廷努力把所有的贸易转到爱格斯—莫特斯（Aigues-Mortes）——它是圣路易在乌烟瘴气的罗恩河三角洲建立的港口，也是腓力三世建立的尼米斯集市，纳邦纳迅速地衰落下去了；到1320年，它的海港完全淤塞。爱格斯—莫特斯残存下来了，但是它的贸易大部分被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的商人掌控。

老普罗旺斯和郎格多克海港的衰落给新的海港蒙波利埃带来了发展机运。12世纪初，蒙波利埃的领主和热那亚人达成的限制它在本地水域外发展贸易的协定使它受到伤害，但14世纪在阿拉贡和梅杰卡的保护下更加自由了。地方贸易和与西班牙的关系也帮助图卢兹更适度地发展；但是13、14世纪加泰罗尼亚新星巴塞罗那的上升为这个地区的远程贸易的竞争者留下的空间非常有限。巴塞罗那的贸易，在10世纪晚期相当重要，与把这个城市作为对封建贵族的制衡力量的君主权力同步增长。最初人民只对纺织作坊有些兴趣对商业的兴趣不大，但在阿拉贡的詹米一世国王（1243～1276

年）和他的后来者统治下，王国的整个资源被用于陆上和海外的扩张。加泰罗尼亚商人在整个新征服过程中被授予特权，皇室的大使让他们在远离王国边疆的地方获得了公民权。这样正是巴塞罗那，这个最近才引人注目的地中海的港口，就如詹米国王自豪地宣称的，“每一天都肯定在扩大，因为那【342】么多的船只向它开来”。14 世纪初，加泰罗尼亚人是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最强有力的竞争者，在梅罗里亚粉碎了比萨的舰队后，加泰罗尼亚人从比萨夺得了热那亚人留给这个不幸的城市的大部分贸易。

然而即使加泰罗尼亚也远远地没有达到中部和北部意大利的商业上的重要地位。也许对西班牙、法兰西和意大利的南部本地商人阶级没有完全发展的最好说明是犹太商人和高利贷者所占据的地位，尽管对他们有严厉的法律限制，有时甚至是集体大屠杀。比如在马赛，不允许在一条船上有超过 4 个犹太商人乘坐。根本不让任何有犹太人的船只开往亚历山大。然而马赛的公证合同说明犹太人在海外贸易是成功的，他们承包或购买了向航海和工业征税的大多数权力。在阿拉贡王国，强盗袭击非常频繁，犹太人甚至人数更多更有影响。与这相反的是，在意大利的中部和北部，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麻烦，但他们的经济力量是微弱的。

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在发展上的差异也可以根据它们城镇的大小来判断。可做比较的最早的可靠数据，是在 14 世纪前半期所做的田产普查，然而黑死病突然中断了这持续了差不多 400 年的上升趋势。不同的历史学家在与当时的其他文件做参照时对这个统计数据就有不同的解释，即使对绝对数量有些怀疑，但是不同城镇之间的比例还是可以准确地计算出来。根据似乎是最好的估计，加泰罗尼亚的人口在黑死病之前大约是 600 000 人，也就是每平方英里 42 ~ 43 人（贝罗齐，也许这个数据有点偏低）。在 1328 年法兰西肥沃的土地上差不多有 1 000 万 ~ 1 700 万居民，每平方英里超过 100 人（洛特、马克·布洛克）。同时，那布勒斯山地王国也有与之差不多相同的人口密度，人口总数为 3 300 万（艾吉迪、贝罗齐）。1328 年佛罗伦萨的疆域内至少有 33 万居民，也就是每平方英里超过 200 人（巴巴加罗、贝罗齐）。但是在中伦巴第，这个密度偏高。然而，明显的事实是城市的大小——即使是从事商业的公民的比例在各处也并不相同。米兰和威尼斯都有接近 20 万居民（巴巴加罗、卢扎托）；佛罗伦萨、热那亚也许还有巴勒莫和那布勒斯大约有 10 万【343】人（卢扎托、多伦、卡利），许多小的意大利城市有几万人。这些数据，就其本身而言是低了点，但是假如我们考虑到意大利之外的地方只有巴黎超过 10 万人时，它们就显得非常突出，纳邦纳有大约 3 万人（波特），阿拉斯，

这个北方贸易的主要中心之一，人数也只勉强超过2万（莱斯托克考伊）。

2. 海外扩张

我们曾注意到的中世纪早期的许多事实已预示，意大利人将在商业革命中取得支配地位——意大利—拜占庭商人作为天主教欧洲与穆斯林和拜占庭世界之间的中间人地位的上升，拥有地产的意大利—伦巴第商人的财富，以及康孟达和委托合同的投资方式在前一类商人中的传播，贷款收息的投资方式在后一类商人中的扩散。当时机到来时，人们也准备好了。生产者和消费者数量的不断增加给贸易增添了持续的动力。

但是，这种解释并不完全。中世纪后期，威尼斯已经在几个世纪中获取了大量的利润，但是南方的意大利—拜占庭城市却在普遍繁荣的中衰弱下来。帕维亚，这个伦巴第人的大都会，成了一个三流的中心，然而米兰，它的更小的竞争对手，却成长为一个大城市。在中世纪早期，像热那亚和佛罗伦萨这样的城市，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后来也跃居前列了。我们必须把意大利人口的持续增长既作为一个刺激，也视为一种限制。法国在本土找到了足够的土地以安顿人口的过分流入；西班牙人分布在重新征服中抢劫来的土地上；德意志人在东方殖民地居住。但在意大利，就我们从不充足的证据判断，大部分的边缘地带都在早期就被开垦占用，12世纪后已很少建设城堡了，新土地的开发只有通过昂贵的灌溉和无情的毁林开荒来完成。农业耕作方法改进了，但是气候条件限制了轮作系统的发展，如果说南部有些省出口谷物，那是因为农民以坚果和水果为生——就像今日许多人仍然做的那样。可能除了米兰这个例外，意大利所有的北部和中部的大城市必须从远方国家进口粮食。除了科西嘉和撒丁，附近没有可供移民的土地了。然而从整体上看，北部和中部意大利不仅是人口最密集而且也是欧洲最富有的地区。商业才是他们开发的边界。

从10世纪晚期到14世纪早期，意大利参与了天主教的对外反击，除了作为一项宗教和政治事业外，这实际上还是一个商业边界的扩展运动。意大利的海滨城镇通过独自或与封建军队一起为“上帝、荣誉和黄金”而奋战，取得了绝对的海上霸权和横跨地中海的长年贸易的阵地。他们靠抢劫敌人积累了资金，同时增加了货款规模并向十字军供应船只。他们把已学会享受东方奢侈品的前十字军战士及其朋友（这些人听到过东方的财富和神奇）转变为自己的顾客。但是，战争只是商业扩展的手段之一。奥德赛式的商人探险伴随、取代并超越了伊里亚特式的辉煌业绩。通常，勇敢的赤手空拳的先驱者的个人开创精神所取得的成就要大于血腥的战争；外交压力以及有些时 【344】

候的教会工作也是如此。即使在那些以征服开路的地方，与从前的敌人保持和平和合作对最终获利而言也是必要的。一个穆斯林作者充满哲理地阐述道："战士忙于战争，人们忙着和平时期的贸易，这世界属于掌握它的人。"一个天主教大主教坦诚地宣称与埃及人的贸易"总是给我们带来利益和荣誉"。然而毕竟是在同不同信仰的人打交道，一种模糊的不安仍存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正如在放高利贷（获取商业利息）的商人内心深处的焦灼一样。尽管天主教和非天主教徒之间在宗教和种族对抗的宽容方面有了稳步的进展，但这类褊狭，尤其是在那些从未有过海外经历的狂热信徒的煽动下，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一个破坏性因素。

正是一系列的军事冒险——它成为普遍的天主教反攻的先驱——使得那时两个微不足道的城镇，热那亚和比萨，发展到商业的极盛。自从被伦巴第征服以来，热那亚即使有任何国际贸易的话也是非常少的，即使 10 世纪的比萨，也主要是一个农业而不是一个商业中心。最早的袭击不可能像有些学者提出的看法一样，是以为基督徒的商船"开辟公海"为目标，因为威尼斯、阿马尔菲或拜占庭的护航队从没有停止过在地中海水域的航行。最初，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只是想捣毁穆斯林强盗的老巢，这些强盗不仅使他们的土地荒芜，有时还袭击他们的城市。随着穆斯林势力在科西嘉和撒丁岛最后的据点被清除，他们实际上完成了最初的任务（1015～1016 年），这时，他们决定继续突袭，并把袭击活动迅速地扩展到整个西地中海。他们也拓展自己的贸易，我们知道 1065 年时黎凡特已有热那亚的商人舰队。1088 年，比萨人、热那亚人和一些南意大利人加入了教皇资助的部队，实际上这可以称之为十字军的彩排。他们袭击了阿马赫迪耶这个穆斯林在北非的最坚固的据点，并把这个城市转给诺曼王（他拒绝了），后来他们又把它交还给当地的统治者，条件是支付一笔赎金并免除基督教商人的所有通行税。热那亚和比萨到了它们的黄金时代。在 12 世纪中期以前，它们超过除威尼斯之外所有的意大利—拜占庭海港。到这个世纪末热那亚超过了比萨，追上了威尼斯。

[345]

这种特殊的转变绝对是成功地对原始资本的商业利用的结果，这种资本主要来源于地方农业和自然资源，也是把存款自由地"投入使用"的结果，沿用的还是中世纪的投资模式。我们从 12 世纪的一些例子中可以知道这些投资的增长是多么地快。有 3 个索塞特（*societa*）和康孟达合同的账目——是 1156～1158 年记录的——表明 3 年内，热那亚子爵的后裔在没有离开他的城市的情况下使他的投资 250.4 盾变成了原来的 3 倍。他的外出合伙人，一个没有投入任何资本的"新手"赢得了大约 150 盾的分红。同期，一个

威尼斯商人（也是一个店主）进行海外贸易时，在支付完各笔贷款43%～50%的高息后，还可以积累相当一笔财富。有成千上万类似这样的冒险。热那亚现存最早的公证簿包括了1154～1164年间部分年份的资料根据记载仅在叙利亚一地的投资就超过10 000盾，对亚历山大的投资数量与此相仿。

威尼斯人用他们泻湖里的盐作为"原始资本"；热那亚人和比萨人的资本肯定主要来源于农业上的较小的财产再加上战争赃物。比如我们知道，在1101年热那亚人曾帮助十字军围攻和劫掠恺撒里亚这个巴勒斯坦人的海港。他们给军官保留了丰富的奖赏，并把战利品的15%用于酬劳船主，其余部分在8 000个水手和战士间进行分配，每人得到48索勒德斯和两磅胡椒粉。这样，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成了小小的资本家。3年后他们利用这些资本的时机来到了，这时耶路撒冷王国为进一步酬谢他的联盟，把恺撒里亚的1/3赠给他们，并完全免除了各种过路费。在11世纪早期，规模更小但类似的袭击给了热那亚和比萨人冒险的强烈刺激，他们开始对穆斯林世界财富有了清楚认识也明白了建立自己的船队和从事贸易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原始资本。此后，贸易使原始投资大量增加，他们逐渐把注意力从抢劫转向获得税收的减免。[346] 最后，在他们建立自治的和永久的海外定居点时已开始追随意大利—拜占庭的商业传统。这最后的一步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因为它意味着当欧洲的大部分贸易仍然在集市上断断续续进行时，在地中海贸易已是在进行连续性的流动。

第一批意大利殖民地是11世纪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好多年在君士坦丁堡、安提俄克、耶路撒冷，也许还在一些非洲港口建立的。作为永久的居住地它可能正是在拜占庭和穆斯林对外国商人的定居限制被逐渐废止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但是自治和关税豁免肯定是由于得到了正式的批准。它们中的一些自治和关税豁免肯定不是由于战争或战争的威胁而得到，而是通过和平的协议得来。在12、13世纪，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在沿地中海岸建立起广泛的贸易站点。"热那亚人是那么多，散居在世界各地——只要他们在哪里定居，就在哪里建立起另外的热那亚"，一个13世纪的方言诗人这样写道。意大利、法兰西南部、加泰罗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甚至一些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的内陆城市也开始往海外派遣移民，但是他们的商业殖民地较少，太分散或太地区化以至于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个殖民化的过程在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早期达到了顶峰。至那时，意大利的商人已经深深地侵入三大洲，开辟了新的路线并转向了殖民帝国主义。

最初，绝大多数定居点很小。它们有时集中在一座大的建筑物，即*fonda-*

co（来自阿拉伯语*funduk*，“土地”、“庄园”的意思）或者是一群建筑物里，商人到那里存货，在那里缴纳各种赋税，完成交易，做祷告，按照他们本土的法律生活，并由自己的官员管理。他们觉得那儿更安全更自由，而给他们指派*fondaco*的国家发现监视他们也更容易了。相同的考虑导致威尼斯为德意志人建立一个*fondaco*；作为回报，许多德意志南部的城镇为外国商人提供住宿，以防止外来人插手地方贸易。在地中海，这种*fondaco*制度只在西北非洲、穆斯林的西班牙和埃及继续流行了一段时间。晚至15世纪，所有在亚历山大的天主教商人都不得不在他们的*fondaco*中度过夜晚，而外面的门被上了锁。但在十字军的国家，贸易的据点从一开始就是由小片的果树园和耕地组成的城市大片区域。在拜占庭帝国，意大利殖民地也迅速扩展到更大的地区。[347]到12世纪晚期，有大约10 000个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定居，这个数目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有了极大地增加。13、14世纪，意大利的自治城邦，单个的意大利“殖民地建设者”（我们不能说他们是“帝国缔造者”，因为殖民地从来都不是十分大）以及加泰罗尼亚军事冒险家，征服或被赐予了大片的领土，其中包括田地，有时还包括使用地方农奴或雇用劳力的矿井。

但是，殖民地的重要性不必与它的大小成比例。它更多的与那里可资利用的商业化的内陆资源和定居者在那里所能享有的特权相关。实际上，在早期的殖民“定居点”很少有真正的定居者，贸易据点更多的是被作为前进的基地而不是独立的单元。绝大多数居民是年轻人，他们到殖民地去赢得经验和资本，然后返回家乡。有些人是行商，他们在殖民地通常停留几个月或几年，这要根据他们的生意而定。再往后，大量的商人在殖民地扎根后并发展他们自己的利益、理想和他们独特的性格，不过也很少不像家乡商人那样成为坐贾。他们与后者合作，不是作为代理机构，而是更多地作为独立的商人，并接受短期的康孟达式的合伙、海上贷款合同和票据兑换。

没过多久，意大利和其他信仰天主教的地中海商人就完全转变了他们的国家与高度文明但已消沉的穆斯林和拜占庭世界的关系。意大利人控制了海洋和最大的船队，在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脉找到了可建造无数新船的木材。在许多殖民地，他们获得了完全的关税豁免权或至少是相当可观的减税，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地方商人仍然要支付满额的税收。他们的资本和商业组织，尽管在12世纪初仍不起眼，但是在具备知识、创造性和勇气这些无形但是对任何成功都不可或缺的素质的人的手中，迅速地发展壮大。这些商人的旁边是自由的手艺人以及远离祖国以海为生的自由人，他们的后面是一个正在快速增长的大陆。难怪意大利人实际上垄断了地中海的货运和客运，

从穆斯林和拜占庭人手中不仅接管了所有的跨地中海的贸易，而且在北非和黎凡特殖民贸易中的份额不断增加。他们不断扩展的商业、金融和航海活动有力地刺激了欧洲年轻的手工业和近东的陈旧的手工业的发展——但是后者，通常在经历了最初繁荣后总是倾向于衰落。让我们举一个典型的例子。【348】12、13世纪，意大利出口毛料和一些叙利亚的亚麻产品。最初，这种交换似乎有利于东方人，他们的产品也许不够充足但更昂贵。逐渐地，意大利人因为他们的不断扩大的需求使得叙利亚人转向大规模生产，但代价是质量和品种在某些方面的降低。同时，他们逐渐地增加了法兰西、佛兰德和伦巴第布对黎凡特的出口。而且，意大利丝生产者如此成功地模仿和改进东方的式样，他们最终成为一个欧洲的主要供应者，而且到14、15世纪，在黎凡特的意大利的丝织物甚至可以与东方丝绸相媲美。

尽管如此，假如我们能重建12世纪和13世纪早期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贸易收支，我们也许仍会发现欧洲并未处于债权人地位。可以肯定的是，在与殖民地紧邻的内地进行的贸易中，出口大于进口的趋势在继续增长。意大利人在参加穆斯林和拜占庭世界的地方贸易时，在航运和商业方面的利润情况也是如此。但这些盈余不能完全平衡由于对香料、生丝、毛皮和其他的远东、非洲和东北欧的产品进口不断地增加而产生的债务。从殖民地到这些国家的陆上和海上航线都仅对穆斯林和拜占庭商人开放。拜占庭皇帝禁止从黑海来的外国生意人，埃及的苏丹宣布对超过海岸线的贸易实行垄断，西北非洲的统治者，使用保持沉默的办法，使意大利无法得知黑非洲的金矿所在地。不过后者并非一个严重的阻碍，因为西北非洲非常不利的收支平衡迫使海岸的穆斯林生意人交给意大利人相当数量的塞内加尔金沙。这些金沙和德意志南部的金矿有助于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在与埃及人和拜占庭中间人做生意时达到支付平衡，他们垄断了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开罗和红海以远的远程贸易。①

12世纪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并没有过多的憎恨东方的垄断者【349】对他们的诸多剥削，因为他们自己也垄断了欧洲方面的这种贸易。天主教欧洲内部的最终消费者所支付的高价让两个垄断集团都获得了大量的利润。但

① 如果把这个研究再进一步，我们会有趣地发现穆斯林是以一种什么样的途径来解决与中国、印度和非洲的明显不利的贸易收支的。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种平衡并非真正地不利。塞内加尔的黄金开采者用他们宝贵的金沙来换取盐和铜，而这两者在穆斯林的北方都非常充裕。印度从阿拉伯进口马，从穆斯林的东非进口象牙。中国大量进口器皿以至于贸易收支处于越来越不利的状态，被迫以支付现金来解决这种状态。到了11世纪的中期，每年的象牙、珠宝、香料等的进口花掉了中国人53 000多个“计算单位”，到了1175年，一下就超出了500 000个“计算单位”——差不多是10倍了！【1】

是，当意大利购买者数量增加，而且其他的天主教商人进入这种竞争时，第一组垄断者——意大利人或拜占庭人——就会提高价格。欧洲内部的最终消费者无法承受这种价格的提升，意大利人无疑还有他们的普罗旺斯和加泰罗尼亚竞争者，不得不靠降低他们的利润。在热那亚，胡椒粉的价格，在12世纪中期是4~5盾，一个世纪后仅增加到6盾多一点。甚至这种表面上的提价也因热那亚镑在金属含量和购买力方面的下降而有所抵消。利润的下降也能通过热那亚在13世纪中期的一系列康孟达合同得到说明。这些合同的纯利从非同寻常的50%——这是非常高的，但考虑到风险也不为过分——降到不足9%；还有些合同表明一些生意是赔钱的。威尼斯的文献也表明相同的趋势。在这一时期的意大利文献资料中，对东方垄断者的憎恨越来越常见。

同时，穆斯林的反攻重新点燃了十字军东征的星星之火。萨拉丁团结了内叙利亚，和埃及，一起把十字军赶入海中。即使在它的高峰时期，耶路撒冷王国也仅仅是在黎凡特有个立锥之地。它的在贸易上依赖与内叙利亚搞好关系，而叙利亚本身并不像埃及那样有良好的商业基地。由第三次东征军重建的“耶路撒冷王国”仅仅是一条狭窄的沿海地带。它完全依靠意大利的海军防卫而生存。为了保持这个地带，它甚至不包括圣城，意大利人经常从事反埃及—叙利亚的战争。尽管不情愿，他们也不得利用教皇的命令以禁止向埃及出口战争物资，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因此，为了购买香料不得不出口更多的黄金。这种状况在穆斯林的黎凡特和君士坦丁堡恶化时，拜占庭和西方旧有的冲突也增加了。在随之而来的无休止的冲突中，意大利人可能像拜占庭人一样经常犯错误。但是拜占庭皇帝走了极端，他鼓励或默许暴徒抢劫了富裕的意大利人，在拜占庭的社区，还有些商人惨遭杀害。意大利以海为生的各界越来越感到，只有征服埃及和拜占庭帝国才能立即解决军【350】事和商业问题。征服为十字军国家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基础，这将打破来自黑海和“印度”的商品的涓涓细流通过的瓶颈。

这些希望也许刺激了威尼斯人和许多封建主，正是带着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教皇的明确授权），他们开始了反对拜占庭皇帝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① 这时十字军的东征并不是十分成功，因为小亚细亚掌握在希腊人手中，他们没有控制与巴勒斯坦的陆上交通。但是在欧洲的胜利，使封建军队大发其财，

① 在我看来，认为是威尼斯人在最终关头迫使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偏离起初的目标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即使确是如此，放弃反对穆斯林的战争，转而去用一个被囚禁的合法君主取代篡夺者的目标也并非必须要到谴责。十字军自己对拜占庭帝国的瓜分只是在复位的君主被另一个篡夺者杀害后才开始的。【2】

因为这次东征所掠夺的土地和赃物比第一次要多得多；它使威尼斯在爱琴海获得了最宝贵的海岛并在每个重要海港获得了重要的城区，而且它使黑海对这些拉丁商人开放。希腊的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所留下的所有东西都被摧毁；也许下层的劳工和农民的命运改变不大。威尼斯55年的商业霸权（1204～1261年）结束了，这时热那亚人帮助拜占庭皇帝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于是继威尼斯人之后成为帝国的特权剥削者。一个拜占庭历史学家悲哀地写道，"拉丁人不停地增加他们的赢利和他们在海上的权力，然而希腊人却越来越衰弱"。14世纪早期，在热那亚的郊区比拉完成的贸易量大约超过拜占庭首都的15倍。君士坦丁堡挤满了来自天主教小型中心的商人。马赛、蒙波利埃、纳邦纳，巴塞罗那、安科纳、佛罗伦萨和鲁古撒（达布罗弗尼克）都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殖民地，有些商人甚至来自西班牙、英格兰、德意志。黑海海滨点缀着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殖民地。热那亚人较容易地把殖民地公民的身份授予拉丁人、希腊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但是威尼斯人的嫉妒排斥所有的外来者。

1218年，在君士坦丁堡被征服过去14年后，征服埃及成了另一次十字军运动的主要目标——这次是由教皇使节领导的，人力主要由来自3个主要海港的公民组成。达米埃塔（Damietta），这个埃及第二好的海港失陷了。西方商人立即逃离圣地，涌入达米埃塔。但是这次远征是一个失败，达米埃塔一下子就陷落了。后来弗雷德里克二世以与埃及人达成了协议，想努力重建耶路撒冷王国，但这种努力被教皇的阴谋破坏。第二次袭击埃及的远征，[351] 由圣路易领导，曾短暂地重新收回了达米埃塔，但最终以灾难结束。因为埃及既不能被征服也不能与之交好，商业和军事常识要求撤出圣地。随后几年采取的防御性措施，都主要是宗教仇视引起的。当最后的灾难降临时，商人逐步把生意转向塞浦路斯岛和西里西亚人在亚美尼亚的天主教小王国。因此，1291年叙利亚最后一个海滨桥头堡的失去并没有导致突然的灾难。惟一遭受的灾难由教皇引起的，他禁止与埃及进行任何贸易。这种"经济封锁"对威尼斯和热那亚造成的灾难要大得多，因为加泰罗尼亚人最终放弃禁运，在亚历山大获得了一个突出的地位。其他的加泰罗尼亚人在1311年攻占了雅典。1282年，西西里成了阿拉贡人的。所有这些对意大利人来说都是威胁，但还不是重大的挑战，因为加泰罗尼亚的商人阶级仍然很弱小。

但是，埃及的重要性，被13世纪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减弱了——蒙古人征服并统一了大部分的亚洲和俄罗斯南部。穆斯林世界再也没有从这次沉重的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辉煌的城市被夷平，人口减少。然而对于幸运地避开了蒙古战争恐怖的西方商人来说，随后的蒙古人统治下的和平，展现了

无限广阔的地平线。穆斯林世界东部的中心；俄罗斯和土耳其的腹地；远东的土地——在那儿最大的城市，最宽的河流，最大的草原和高原都，火药、煤、纸币和印刷在那里是日常用品，那里还是丝绸和香料的发源地——所有这一切都向每个人敞开。

当大钦察汗帝国转变成4个占地广泛的松散联邦时，西部的波斯汗和金帐汗国（Golden Horde）的友好态度把意大利的大商团吸引到那里。莱亚斯、特拉布宗、卡发［Caffa（Kaffa）］、塔纳、叙利亚和西西里海岸，还有黑海和亚速海的其他海港都成为淘金之门，由此就进入了一个至此依旧封闭的大陆。塔布里兹和阿斯特拉罕（Astrakhan）对12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人来说像君士坦丁堡一样熟悉。热那亚的先锋乘坐他们在殖民地建造船只穿过里海和波斯湾。有些商人走得更远，甚至到了突厥斯坦，进入东部的可汗国和中国。1260～1269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经陆路到达北京。1275年，年轻的马可·波罗受到忽必烈的接待。在他经由海路回去并在那【352】本不朽的书中描述“印度”的神奇之前，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向远东进发。1291年热那亚的维拉尔蒂兄弟经由海路到达印度，他们从直布罗陀海峡“向西”航行。我们不知道假如他们在哥伦布和达迦马航行的两个世纪前就获得成功，世界历史会是如何一种情状。但事实上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命运似乎刺激了其他的意大利人取道陆路到中亚、印度和中国。到14世纪早期，佩古洛蒂，这个佛罗伦萨的商人兼作家，说从克里米亚到北京的路“十分安全”。中国丝绸现在经由热那亚和托斯卡纳中间地带到达英国集市；在意大利，它的售价是在中国进价的3倍，这很容易就产生非常丰厚的赢利，但从资本投资和长途运输所需要的时间来看，当时的赢利并不为过，尤其是从里海地区来的丝绸，就近就能买到，在意大利只卖得一个稍高的价钱。这就使得欧洲商品出口成为必要，这将给东向的旅行带来利润；宝石、活马、机械钟和人造喷泉，精致的亚麻和毛料。到14世纪40年代，进出口基本平衡。几十个热那亚商人和一小部分威尼斯商人经常把大量资本投放于来往于中亚、印度和中国的贸易；有些人在那儿还建立了定居地，这就使远东成为意大利一个崭新的有前途的边界。

东方的财富和远东的贸易似乎使西地中海的直布罗陀海峡以外的商业机会相形见绌。北非经济在强盗和沙漠的袭击下的直线衰落，把几乎所有的沿海贸易转到欧洲商人和船长手中。这些人把从自己大陆的甚至东方的手工艺品带到突尼斯、博吉和休达（Ceuta），在那儿购买羊毛、兽皮、蜂蜡、靛蓝、明矾有时还有谷物，但通常不是油，因为非洲不再有剩余油出售。投资

和赢利都非常少。这就使非洲成为逐渐走下坡路的商人团体（如比萨、马赛和墨西拿的商人）的避风港。可以肯定的是，有些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仍继续光临，但他们似乎对到达神秘的帕罗拉这个中世纪的黄金国更感兴趣，就我们现在所知，它是一个塞内加尔两条河流间的岛，黑人淘金工在那儿用贵重的金沙换取一点点盐、铜和其他的必需品。黄金国不可能找到，但是为了找到它也导致了重大的开发。我们了解到在 14 世纪早期，一个热那亚商人住在寨吉尔马撒，它位于撒哈拉的深处，还听说另一个热那亚人发现一个加纳利群岛（Canary Islands）中的一个黄金国并在那儿建立一个城堡。[353] 意大利船只现在更经常地沿大西洋海岸航行到摩洛哥。12 世纪他们的终点站通常是塞那，从 1250 年后，被更靠南的萨非代替。

这些商人无畏地通过直布罗陀到达摩洛哥，但在沿着北大西洋的欧洲海岸转向北方的时候仍然有所犹豫，这一事实只能从伊比利亚西部国家的商业机会太少而不值得努力这种考虑得到解释，同时经陆路抄近道可以更快地到达法兰西和北欧的大西洋海岸。无疑，这就把复杂而贫乏的卡斯蒂利亚和纳瓦尔的远程贸易交给了地方商人和船只进行，养活了从拜扬纳（Bayonne）到科伦纳的北方海岸线的许多海港；铁矿和其他的地方资源有助于比斯开湾（Biscay，Bay of）和坎塔布连的城镇得到一定程度的繁荣。但是，直到 1232 年这种缓慢而破坏性的重新征服的速度还是倾向于遏制而不是提高经济发展。然而，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和穆查的快速征服却是一个转折。卡斯蒂尔通过其南方的出口，更自由地呼吸着地中海和大西洋的空气。从热那亚、皮亚森扎、比萨、卢卡、科摩（Como）和马赛来的商人涌入西维尔，1248 年，它成为凯斯提连，在那儿他们遇到了来自葡萄牙、英格兰、法兰西和德意志的商人。为有特权的外国商人分别建设了特别街道和一个新郊区。凯斯提连的羊毛、毛皮、明矾和水银的出口攀升到新的高度，布和奢侈品的进口也增加了。

假如不是更早的话，1277 年出现了新的进展。热那亚的平底大船开始沿加的斯和塞维尔到达法兰西、佛兰德和英格兰。他们高高的船体可与马略卡的平底大船相提并论，使停靠在拉鲁切尔、加来，南安普敦和伦敦的北方船只相形见绌。最后，意大利商人成功地试验出更大更坚固的帆船，它们能减少在沿路停靠附近的港口时所走的弯路，能朝北方法兰西和英格兰的目的地直接驶去。香料、明矾、谷物、酒和其他来自地中海地区和远东的物品被用来交换佛兰德的布、英国的羊毛和其他的东西。一些商人寄递了大笔的汇款以刺激他们的有前途的商机。14 世纪中期前，英格兰和佛兰德成为热那

亚和威尼斯按计划派出的一年一次的航行的一个经常性的停靠地。地中海商人没有努力把他们的贸易延伸到波罗的海，在那儿他们不得不与汉萨商人竞【354】争。这种竞争对意大利人来说本不可能是一个限制性的障碍，但是北部海域的鱼和波罗的海的谷物对那些能获得南俄罗斯的鱼和谷物的航海者来说都不具有吸引力。布鲁日的两个海港，纽卡斯特尔和斯鲁伊斯（Sluys），是这些大船能赚到钱所能到达的最远海港。

热那亚海上贸易的征税报告反映了海外扩张在它最后也是规模最大阶段的影响。这些资料显示，海上贸易在 1274～1293 年间有 4 倍以上的增长。在随后的一年，进出热那亚港口需要缴纳税金的各类物品价值为 3 822 000 盾。这个数字（不包括经海路的免税贸易和经由陆路进行的重要贸易的数量）就其本身来说不是很大，即使我们考虑到这一时期内热那亚的价格状况——1 蒲式耳谷物的价格是 3～5 索勒德斯，1 条好牛的价格是 4 盾，一块佛兰德（Flemish）布的价格是 6～14 盾，1 把热那亚曲柄剑值 9 分。但这大约已是腓力·奥古都（Philip Augustus）统治下的法兰西君主国的收入的大约 7 倍，是吕贝克最好年份（1368 年）海上出口的差不多 10 倍。① 必须提到，在 1293 年后不久，热那亚商业进展受内战的影响尤为严重。1334 年的税收报告表明，贸易额只有1 806 000 盾。但在同年，佩拉税收报告上登记的海上贸易的价值大约是1 648 000 盾。30 年后，类似的文件表明，热那亚在亚历山大殖民地的海上贸易大约是1 000 000 镑。当时，有方言诗人赞颂道，像亚历山大这类“其他的热那亚”的贸易规模已经发展到接近其宗主地的水平。

3. 陆上扩张

海上贸易扩张的地图比较容易描绘，主要集中于优良的海港：较小的海港也差不多利用相同的基本路线，航运的也是相同的基本商品，虽然交换的量不是那么多、运程不是那么远。而陆上贸易缺乏统一，它朝各个方向扩散，交易着种类丰富的商品，提供给各种中心足够的虽然不是平等的机会。以海埃雷斯、伊维萨（Ibiza）、塞图巴尔和拉罗切尔为中心的盐贸易区，【355】以加斯科涅、罗恩河谷和卡拉布里亚为中心的酒贸易区，还有出产各种质

---

① 比较建立在对德西蒙尼（热那亚的金镑）、肖比（巴黎的银币）和格劳托夫（吕贝克的马克）这三种货币的贵金属含量的估计上，并假定 13、14 世纪金和银通行的比价为 10∶1。但比较没有把下列因素考虑在内：金银比价的变动，各处同期铸币所用的金属与合金的差异，金属购买力的变化及其他影响精确比较的因素。在研究地中海贸易的规模时，把它和其他地区进行比较是有益的。不过，作者深知在不同时间、地点和货币之间的这种比较是无法做到绝对准确的。【3】

地的木材、金属、染料、纺织品的地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发展。信贷也一样：最强大而有创业精神的商人银行家“公司”由意大利人建立，卡霍和卡吉克的郎格多克人在较小的规模上也参与了，但是他们不如犹太高利贷者那样完全深入地渗透到欧洲未落后的和边远的地区，犹太人为不安全的地位所迫，到非犹太人竞争最小的落后地区寻求市场。实际上所有南欧的贸易中心都派出一些人到巨大的香槟集市，但是其他地区性而不是国际意义的集市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来自边远城镇的商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人殖民地最终在佛兰德和荷兰形成，他们的同胞也到过英格兰中部。但追溯这些和其他的商业联系，将占大量的篇幅，并将使纲要淹没于细节之中；而且在许多方面，材料都不足。我们对意大利人的活动知道得最多也最详细——尽管不像在海上贸易中那样占统治地位，但他们的陆上贸易相对伸展得更广泛并更经常地出现在领先地位。因此，再一次聚焦于他们似乎是合适的。

然而，意大利人在中国和撒哈拉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中世纪早期开始过程的一个产物，他们向欧洲内陆的渗透才是一种新趋势。10世纪大体上是北方商人到意大利或法兰西的南部去与这些地中海世界的商人交换货物。但中世纪后期，穿过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数量和重要性都逐渐地超过光顾地中海世界或在那儿定居的北方人。我们听说，早在1034年就有来自阿斯提的商人通过塞尼峰到达法兰西。40年后，教皇格列高利（Gregory）七世指责法兰西国王，因为后者从光顾他的集市（或许是圣丹尼斯集市）的意大利人手中抢占了“无数的金钱”。12世纪，香槟集市位于走最短的陆路从地中海到北海的路途的2/3处，成为南北商人主要的集散中心。这些集市的重要性在13世纪继续增长，并没有受到意大利人开始在大西洋航行的威胁，但它在14世纪最初的10年或20年后急遽衰落。在这段时期前很久，意大利商人也与其他的集市建立了联系，差不多在法兰西、佛兰德和英格兰的每个重要城市定居。更小的商人去德意志、匈牙利和波兰。到12世纪晚期，北意大利人尤其是来自阿斯提、皮亚琴察、米兰和克里莫纳的意大利人，也许超过了托斯卡纳人和罗马人。13世纪托斯卡纳人居领导地位。首先是塞纳，其次是佛罗伦萨占领了最突出的地位，卢卡保持第三位，皮斯托亚紧随其后。在海滨城市中，只有热那亚移民较多，但是所有这些主要的内陆中心，甚至像桑吉米格纳诺这样的小镇，都经历了但丁悲伤地抱怨的“因为法兰西被遗弃在床帏间”的那种怨妇似的悲哀。确实，到13世纪末期，这种大撤退就像海外殖民地的情况一样，在许多时候纯粹只是一个暂时的特点。 【356】

散居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意大利人，在数量上比海外的人口要少一些。但是他们的活动是如此多样以至于他们不能被简单地描述。移民从事一个或几个下面的职业：被雇用的划桨手、海员、造船者、商船的船长和舰队的司令；纺织生产者、矿井企业家、铸币厂的指定负责人，意大利和东方商品的进口者和布、亚麻和羊毛的出口者，谷物、酒和盐这些大宗产品的贸易商，服务于下层的当铺老板，服务于中产阶级上层、较大的教会和世俗的封臣和君主的高利贷者和供销代理人，关税的征集者和税收的征收人和服务于教皇和英法国王的银行家。他们的地位有的可能像佛罗伦萨的弗兰泽兄弟［“莫齐（Mouche）”和“别奇（Biche）”］一样高，这两个人当上了美男子腓力（Phlip the Fair）的财政代理人，成为金融奇才，直到腓力为了平息受通货膨胀打击的人们的愤恨而牺牲他们。这部分意大利人也可能像热那亚人安托尼诺·佩撒格诺一样受到宣扬，他在爱德华二世时是“国王的商人”，衣服的承办人，康沃尔矿业的承包人，加斯科涅的管家和一个被他称之为热那亚的城堡的建立者，同时他的兄弟列诺德是葡萄牙的海军司令并在这个国家获得了封邑。然而，这些意大利人的地位也有可能像来自齐里（一个离图林很近的小城镇）的放贷者一样低，他们与犹太人为垄断北方各城镇的小额高利贷而竞争，北方的合法利率比在他们国家允许的要高。而且，一个海外的意大利人可能是一个大商人银行家公司的成员，可能是一个在他到黎凡特的旅途上却改变方向到了香槟集市的大商人，可能是一个同时为意大利和北方的国际贸易商运货的航运代理人，还可能是一个带着自己小包的孤单的冒险者或一个努力自谋生路直到他的党派重新在他的家乡执政的杰出的政治家。来自加斯科涅和图卢兹的商人掌握了大部分法兰西酒对佛兰德和英格兰的出口业务，但在所有的其他国际贸易分支机构中，意大利人在财富、数量和才智方面远远地超过其他的南方群体。【357】

虽然这些意大利人的兴趣和背景各异，他们的命运直接或间接地与他们最有权势的同胞即教皇的国际影响相关。可能并非出于偶然，伟大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为意大利人的利益而写的书信，是关于法国集市上的意大利人的第二个最早的证据。教皇的信件为意大利人大开方便之门，其他有价值的联系来源于每次十字军东征时经常为十字军的教士、骑士和王公提供金融和航海服务等附带收益。最后，教皇委托托斯卡纳公司把在全欧收集到的什一税转移到意大利。正是因为充当教皇的代理才使得卢卡人的斯科查卢皮公司的雇员来到遥远的格林兰岛，在那儿贡物以“海豹皮，鲸骨和鲸肉”的形式支付。所收集的钱很少以贸易的形式进行投资，因为元老院（Curia）立刻

需要现金。但是意大利人承担了任务，并从全欧所获的现金中获利。他们也代表教皇从事一些商业活动。1336年4月，佛罗伦萨的阿亚奥力（Acciaioli）公司的阿维格农（Avignon）分公司收到一个紧急命令，航运谷物到贫穷的亚美尼亚人那里。它把这个命令传达到那布勒斯和巴里的分公司。4月底，7 000多吨谷物被订购好，而且用来把这些赈灾物资转给在东方的天主教前哨的船只也准备好了。这样，非常矛盾的是，教皇的慈善行动和教皇对国家君主的至高的道德和政治权威的一种最伟大的措施都成了意大利国际商人和公司的经历，而他们自中世纪早期以来就蔑视教会反对高利贷的教规。这种“罪恶”的活动，使教皇能够在自己的国家任意支配世界上组织得最好的金融集团。同样，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与异教徒和叛教者进行的由来已久的贸易提供了信息、船只和金钱，而没有这些教皇根本就不能策划十字军东征。

与罗马教会的联系对意大利人来说并非是绝对的福音。这种联系诱使他们更深地冒险进入一些天主教的王国，在那里不仅没有自己的海军保护，也不能享受自治的政府，并要比地方商人支付更为繁重的捐税。为了平息从事极端危险而且饱受痛恨的借贷活动带来的不安，他们常加倍努力地扩展更为“健康”的国际贸易活动，与教会的特殊关联进一步鼓励了他们这种本性的倾向。世俗统治者的喜好也曾带来同样的效果。可以肯定的是，许多意大利公司并没有屈从于贷款带来的高利息的诱惑，而是遵守严格的商业活动。即【358】使这些公司非常深地从事银行业，它们也从没有放弃贸易活动，实际上，他们不断地把贷款投资于公共当局，并以此作为赢得商业优势的杀手锏。那样的优势在经济非常强大的地区没有遇到反对。佛兰德和布拉班特最大的手工制造业组织和北方经常光顾大集市的最富的商人并不害怕意大利商人，意大利商人以香料、丝绸和用途广泛的染料来换取这些人的布和亚麻。但是，在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不仅东方商品的出售者而且佛罗伦萨和米兰的羊毛买主由于在竞争中压倒了地方小手工业者和羊毛商人都会激起当地人的强烈反对。国王的官员和地方政权都采取各种保护性的措施以阻挡外国人对当地市民独占领域的蚕食。

法国和英国国王的善意经常保护意大利人，就像曾保护犹太人一样。但这是一种存在危险的保护，它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敌意、充公和驱逐等命令所代替。已经付款的货物被任意没收，无法支付提前许诺给教皇的费用，有时单方面拒绝清偿债务，这些问题给天主教国家的托斯卡纳人商人银行家带来的危险比航行在暴风雨的海洋上和与穆斯林、希腊人做生意的地中海商人

所冒的危险还要大。所有在 13 世纪和 14 世纪早期涌现出来的那些笨重的公司（部分是由于利息贷款而发的财），现在都破产了。它们的倒闭既损害了合伙人也损害了存款者。然而，银行的破产并没有损失所创造的全部财富。有些合伙人成功地隐藏了部分利润。而且，公司进口的原材料给国内成百上千的手艺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最终许多信用被创造出来——信用在黄金稀少、贸易繁荣的时候特别宝贵。

德意志南部是欧洲惟一重要的黄金生产地。是不是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它比法兰西和英格兰受意大利深入的影响更小？还是更主要是因德意志南部城市的小规模的商业和商业立法的独一无二的排他性所致呢？确实，这里使外国人处于不利地位的条款和迫使本地商人之间相互平等的条款似乎比南欧的任何地区更严格一些。这种政策的结果能够从直到 14 世纪规模依旧特别小的城镇和在商业范围的逐渐缩减中观察到。原来从黎凡特到多瑙河或波希米亚的亚麻的供应失去了意义。尽管我们听说 12 世纪基辅的拉蒂斯邦人，黎凡特的德意志人（甚至还有 13 世纪的布拉格商人）依然要靠威尼斯人供应香料。而且北德意志的城市，科隆，把它的贸易发展到南德意志，占领了多瑙河贸易的拉蒂斯邦部分。【359】

但是，地方贸易在纺织业和冶铁业方面也取得了部分进步。多瑙河贸易，虽然在世界经济中不再突出，但仍在继续增长：估计在 1295 年有15 000 吨商品通过林茨的海关。维也纳（Vienna）、帕索、纽伦堡、乌尔姆、康士坦茨、谢弗哈森和其他的城市也取得了相当程度的繁荣。他们的商人掌握着德意志南部与意大利的大部分贸易；他们到威尼斯、维罗纳、特兰托、米兰或热那亚出售带去的金属、木材和亚麻，带回东方的产品和许多其他物品。他们的活动，虽微不足道，却预示着一个光辉的前景——这一前景后来由纽伦堡和奥格斯堡的巨大增长得以实现。但是到 14 世纪中期，德意志南部更多的是一个被忽视的角落，而不是意大利商业帝国广阔的边境内的一个重要的竞争者。

5.2.3 中世纪贸易的黄金时代

黑死病爆发前的 100 年是考察商业革命的成就和局限性的一个最好时机。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文献相对丰富，即使对南部的天主教欧洲的不发达部分也是如此。有些资料包括了相当可靠的数据，尽管这对推断和归纳而言还显得不够连贯，不过作为显示商业革命的规模大小的指标还是十分有价值。总体说来，这一时期内（1245～1345 年）包含了 400 年商业加速发展

中的高潮部分。它也表明一些消耗的迹象，特别是在后期——1297～1345年，有一系列的银行倒闭、强度加剧的战争和累积如山的债务，还有一些地区逐渐出现森林滥伐和土地肥力耗绝等状况——但所有这些对继续进步并未形成明显阻碍。① 增长的动力在每一步都产生出它的缺陷和不平衡，但它又靠转移阻碍、发现新的渠道和改进它的物质和精神设施来修正自己。这也是【360】直到1345年商人们一直在做的，他们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把手工业者和农业阶层也纳入其中；他们承受着眼前尚可承受的困难和折磨，就像后来那些现代工业革命的制造者们一样，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行为会给将来的世界带来何种巨大的影响。至少在表面上，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时期经济状况的好坏起伏与工业革命时期由繁荣和萧条构成的连续数百年的螺旋形周期非常类似。实际上，在热那亚，它丰富的文献资料能够使我们回溯到比别处更深远的历史，那样一个周期早在12世纪中期就被假设存在。一个世纪后的另一个周期也有很充分的文献记录。1248～1254年的一个有利事态导致了过分的扩张和海军重建，纺织品生产，商业投资，信贷和铸币；这一切伴随着1255～1263年银行业的失败和政治上的动荡，之后，一个新的更快的加速发展开始了。但是另一周期发生在大约1300年（扩张，大约从1280～1298年；收缩，大约1299～1320年）；证据还没有被充分地研究，但它有可能支持这种假设：即无论是在1345年的热那亚还是在别处发生了怎样的减退，这个快速发展过程曾不止一次地进行了周期性的调整。

不必重拾中世纪是否存在真正的资本主义的陈旧讨论（它更多的是一个语义学而不是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我们能够轻易地看到商业革命的许多方面，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一个现代世界的革命：货币和实物资本稳定积累；对信贷运用的不断增加和逐步地把管理者从资本拥有者和劳动力分离出来的趋势；不断提高商业技巧与同行业其他商人竞争的努力；大规模扩展集市的行动计划；商业利益提升到国家事务的重要地位；尤其重要的是，在商业活动中想赢利的欲望成为压倒性的动机。另一方面，这些现象在一个更小的规模上发生，影响更少的人，也远远不如现代世界那样鲜明。而且中世纪反资本主义的宗教理论比今日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为人接受。确实，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比如合股公司在中世纪还找不到。

地中海欧洲在中世纪后期的贸易似乎仅仅在与中世纪早期或与古代商业

①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14世纪早期肆虐于欧洲西北部的巨大灾难在南方并没有发生。在那里，人口过剩和食物不足是老问题，但是商人总是在饥荒年月从粮食剩余地区进口食物。【4】

作比较时才比较巨大。可以肯定的是，资本和货物的流通是以几何级数增加[361]的，而货币、信贷和交换经济决定性地压到了经济孤立。然而在14世纪早期它们的绝对量仍然很小，不仅仅因为欧洲的整个人口是不到5 000万而不是1亿，而且因为大量的地区可能几乎没有被新的商业浪潮打湿，也许是因为下层的购买力发展得太慢而使普通人的需求不占很大的分量。意大利之外的贸易主要依靠上层的需求。1304~1307年间，在纽伦堡的霍尔兹苏赫尔公司（Holzschuher company）445名顾客中，有2/3属于贵族或教士，他们的购买量远远超过小中产阶级。在意大利，中产阶级不断上升的购买力也许在量上和价值上超过了上层阶级。但中产阶级只是一个数目非常小的群体，并且可能对商品的质量和耐用性比对数量和价格更感兴趣。大约在1338年，当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乔万尼·维拉尼——他是佩鲁茨大公司的一个雇员——注意到，由于采用了更好的羊毛他的城市生产的布在价格上翻了一番，他十分高兴，不过他并没有看到价格上升使当地的布产量从每年的100 000匹降到70 000~80 000匹带来的危害。

似乎没有十分合理的理由去怀疑维拉尼的数据，尽管它们受到了质疑。数据确切地表明了大规模生产的存在。然而假如我们考虑到呢绒业是天主教欧洲最大的出口品，而佛罗伦萨在14世纪是主要的生产中心之一，而且根据维拉尼的统计，不少于30 000的佛罗伦萨人以此谋生时，这些数据对一个现代读者来说简直就是太低了。当然，欧洲的大部分人口除了可能在星期日，都是在使用家纺的布。当我们从手工业产品转向主要食物时，我们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一些更大的城市和人口更密的地区从遥远的国家进口谷物，但是南部的大部分居民除了在灾年外，依靠的都是地方的产品。

贸易规模相对较小也许是运输革命不充分的原因，也可能是结果。确实，在3个划时代的创新——马掌、马颈轭和平底大船，三者都是东方世界对天主教欧洲的礼物——之后，技术改革在继续，这为商业革命开辟了道路。后期，指南针、星盘、标记锤和其他的航海发明使远航变得简单了，同时法国国王用长方形的石板，伦巴第人利用圆石头改进了泥泞地区的路面。[362]但是这些和其他的改进对自11世纪或10世纪以来一直沿用的极端缓慢和微弱的交通措施的速度和能量并未带来实质性改变。商业革命中没有什么改进可以与在工业革命中先后出现的如同其命脉的铁轨的使用、螺旋桨推进器、内燃机和飞机相比拟。因此，必须集中精力于更好地利用现有的运输工具，扩大和改进现有的交通系统，组织更有效的更密集的流通。尽管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十分大的进步，但它几乎不可能有一个革命性的影响。尤其是廉价大

宗的货物，几乎不能承受长途运输的成本，除非走水路——走海路特别有利，缓慢的帆船花费是平底大船的1/3，而它装的货物是平底大船的4倍，或者由人或马牵拉，经运河航运。这类交通方式几乎没有什么改进。直到16世纪，米兰的商人议会仍认为，从米兰顺水而下到威尼斯用18天仍是一个合理的时间（这段路程大约200英里，以经常走的内陆航运路线计算）。让我们回顾一下943年的情况，根据克里莫纳的利厄德普兰德的说法，那时驾驶快船仅用3天就可以走完从帕维亚到威尼斯大约同样距离的路程。

缺乏很好的沟通，这与大多数国家的面积较小不无关系，也与有些国家严重的地方主义有关，这样导致货币的混乱，人身的不安全和关税系统的专断。中世纪的早期以来，这些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有些铸币比其他的有更广泛的流通而且贬值也不那么厉害，但直到13世纪中期，还没有一种铸币有一个稳定的价格或在各处被接受，拜占庭的金币海披伦（*hyperperon*）除外。13世纪后半期意大利独立的金币使得海披伦在国际集市被格诺伊恩、弗罗林和达克特代替，但它并没有消除地方铸币的混乱无序。而且，尽管中世纪晚期城市和民族的战争也许比早期的战争稍微少些，但是影响的地区更大，而且更经常以对敌人的经济资源的系统性的破坏为目标。在海上，意大利主要海港之间的战争几乎不断。假如一个商人想要一点点安全，他经常要像中世纪早期那样，加入一个护航队或商旅队。不管走到哪儿，他都必须面对另人烦恼的限制。比如在许多国家，除了特殊情况，都不允许黄金和主要食物的出口。通行税很高，除非某个城镇的商人得到了一个特殊的协议，允许减少或免除这些税。税收的征缴使商人处于海关官员的掌握之中，虽然有【363】时后者可能由于收受贿赂把他们的货物税降低，但有时榨取的数目可能要比应缴纳的多得多。一只船漂泊在海上时没有通行税要缴，但它会处于风暴的威胁之下。一旦抵岸，商人就可能被捕，原因是在他出发后战争爆发了，或者地方政权已颁布了"报复"商人所在国的所有公民的命令，命令颁发的理由可能只是商人所在的国家有一个公民欺骗了该国的一个公民。报复对贸易的害处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只作为一种最后的措施，但是它们不可能被扫除，只要侵犯者的祖国没有让他赔偿损失。在1296年，只有热那亚建立了一个专门处理公民诉讼的特别法庭。非人道的抢劫失事船只的财物的习惯仍然存在，即使它被所有的文明国家认为非法。安茹（Anjou）的查理一世在1270年对跟随自己的十字军也实施这一惯例，最后，在蒙古国家和霍尔木兹（Hormuz）的穆斯林公国，旅途中死去的商人其货物政府会予以没收。

这些和其他的风险阻挡了原来的商业伙伴关系发展成更灵活有力的集聚

资金的措施。海外航行的商人在几个世纪内继续主要利用康孟达的形式，它只能在短期内使定居方——他们提供资金但不管理——商旅队方——他们进行管理但不提供资金——结合起来。实际上，假如不是仅在理论上，对第三方的义务只局限于投资的数量。康孟达的短期性使各方只能得到一个有限的机会，甚至相互间的信任还远远不是完美的。假如第一次经历是那么让人满意，没有什么能阻止相同的各方反复地加入同类的康孟达。然而，商旅队那方也永远不能期望续借，他们不得不尽可能快地结束交易回到家乡，或者把集资者的资金寄还。另一方面，走陆路的商人主要采用 *compagnia* 的合伙形式，它可以在几年内联合大量的成员，这成员既提供资金又提供管理，轮流地旅行或留在家乡。每个伙伴由于整个公司的债务无限地对第三者承担义务。以前的 *compagnia* 实际上正如它的名字所显示的，是吃同样的面包为共同的祖产的增加而工作的同一家族的成员的非商业的联合。*compagnia* 合作【364】形式的集体责任可能就源自该词本义上的传统，但是当“同桌共饭”的伙伴成为没有血缘关系的商人时，毫无疑义第三方反感与一个公司的成员打交道，除非所有的合伙人分担与后者打交道的完全责任，这样的话，责任仍是无限的。因此，任何合伙人都可能由于一次失手的投机而完全毁坏了其他人，风险随着新加入公司的成员数量的增加而增加。①

当时主要的商业合同都无法包含模糊的期限和有限的责任，不过这两点优势特性也存在于当时其他的形式的投资中，尤其是在公共投资中。一个小心谨慎的投资者总是在无数的贷款中挑选一家由最大的公司发行的股票来购买。股份想留就留，想卖就卖，只要价格较高。另外一种保守的投资形式是不动产。商业能与国家竞争而地产仅仅会提供很大的利润。但是很大的利润的获得仅仅是在价格保持在一个高水平时。高价格又使它难以卖给普通人，这就减少了交易量。很显然我们现在已结束了这个恶性循环，回到了最初的出发点。

然而，这个循环并不是完全地封闭。所有对商业发展的控制都由于前面描述过的市场不断扩展的连续冲击而松弛。这种扩张使得进步成为可能——假如以 19 世纪的动力来测量的话，这是一个缓慢的进步，但从一个较低的起点和几何级的上升来考虑，却是一个很快的进步。由于一方面刺激了消费，一方面刺激了生产，商人—中间人—企业家不断地把昨日的奢侈品转变为今日的日常用品、明天的普遍的必需品。我们眼前的景象至此仍是十分朦

① 在这里我们不能讨论改进了一些公司协议的特别条款，也不能讨论其他的有更小的意义和更窄的流行范围的商业合同。后者中的有些合同有着通行的合同所缺乏的便利。【5】

胧。现在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当商业革命在13世纪中期到14世纪中期达到它的顶点时，中世纪贸易的积极方面。就我们的考察来说，小城镇的小贸易可能比大都会里的大商业是一个更好的开端。我们将记住中世纪早期在村庄与村庄之间的地方贸易或者城镇和它的农村腹地之间的贸易比长途奢侈品贸易更加稀少。因此农村和准农村地区的商业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比国际贸易的增长更加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

在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绝大多数农民与南欧别的地区的许多农民能够以现金缴租，这个事实本身是“商业化”的一个重要的显现。但不幸的是，【365】我们缺乏农村地区商业化活动的较清晰的图景，这不仅是因为大多数学者的注意力专注于辉煌的远程贸易，而且由于农民的买卖通常是以口头形式达成，在文字记录中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仅仅是在城镇的公证人的卷宗中偶尔有条目表明，在意大利许多地方农村居民不仅完全熟悉货币经济而且对简单的商业合同也并不陌生。但在法意边界的尼斯地区，在13世纪晚期，物物交换的痕迹仍然十分明显。一个皮亚森扎商人在与农民打交道时，不得不坚持他们应该“以硬通货而不是实物来支付”。十分有意义的是，一般的商店和本土的店主及商人也出现在意大利中北部大多数的村庄中，然而在法兰西，流动的商人仍占主导地位——但他不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贩。他的生意扩展得大到使他也担心外面的竞争者的侵入。14世纪，我们首先听说在普罗旺斯有一个布商的总行会，由一个头衔不低于“国王服饰商”（*roi des merciers*）的商人领导。在15世纪中期以前，类似的行会差不多在法兰西所有的地区组织起来，从香槟和法兰西岛屿（Ile-de-France）到博洛伊斯和道菲内。一般而言，从他们每到一处都关心住宿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是行商。

M. U. 特拉尔，一个佛卡尔基耶（Forcalquier）的公证人和布商，对他的了解将使我们在商业等级的考察中迈上了更高的一层。他居住的城镇是由建在一座高山的一个斜坡上的一群房子组成的，俯临普罗旺斯河谷的尽头。无论是从阿维格农到蒙特吉内维的主要道路，还是坐船可到达曼诺斯克的杜兰斯河，都不穿过弗卡尔奎尔。“弗卡尔奎尔的”伯爵自己实际上住在曼诺斯克。今天，弗卡尔奎尔有大约2 500居民，在中世纪有多少呢？也许只有几百——不超过一个庄园的人口。麦特雷·特拉尔把布卖给这数量不多的人和附近村庄的居民。那些以信用购买布的人他会把名字记录在一个原始账本上。1331年5月，有36条记录；有些是用希伯伦语写的，因为许多犹太人在这个最小的普罗旺斯村庄做生意或放贷款。布主要来自附近的郎格多克，但有些也是由圣丹尼斯、鲁昂和普罗文思制造的。弗卡尔奎尔提供什么做交

[366] 换？也许是贫瘠草原上的牛、野兔，对它们的保护如此重要以至于每两年才打一次猎，也许木材也是交易的物资。这种交易的数量虽少，但是对一个在像艾克斯（Aix）——一个更大的城市——那样经常整天收不到任何通行税的地区来说，却是十分有意义的。

现在，让我们转向一个稍微大一些的城镇，博尼法乔（Bonifacio）——另外一个新的贸易获利者，它是1195年由一个热那亚公民在一块能够俯瞰科西嘉和撒丁之间海峡的大岩石上建筑起来的。在最早的科西嘉博尼法乔居民中，有一个叫里古利·博纳帕特的人。但我们对他不感兴趣。我们将停留在制革匠阿曼诺的商店上，他在1238年过世。当一个有关他的财产清单被列出的时候，发现那里库存有947件山羊、羊羔、鹿、牡鹿、狐狸和紫貂皮，还有14整块布和两捆辨不清产地的毛料，12条裁剪得更小的呢绒，2.5块丝绸，60块粗麻布，一块来自蓬特雷莫里的粗斜纹棉布（它是阿尔卑斯山北部的一个小城），一些酒，一些胡椒粉和其他的物品。阿曼诺购买房产并通过合伙从26个小的投资者那儿得到1 507盾。他死得太早而不能看见他的小镇发展成一个活跃的商业中心，这个中心在它第一个百年庆典之前就已经与西地中海每个重要的海港和海峡两岸的崎岖的内地保持了很久的联系。因为博尼法乔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工业，它的资源主要是从内地来的盐、毛皮和乳酪。小规模的海盗行为与正常的和平贸易都是令人愉快的选择。在1287年签订的一个正规的商业合同中，我们有博尼法乔商业精神到底走得有多远的极端的例子，一个“小姐”被雇在外做“仆人和女管家”。

不必把分析的范围扩展到其他的次要的比博尼法乔和弗卡尔奎尔大一些的市镇，仅上述例子就已经提醒我们这类小的交易中心是怎样的重要。成百上千个乌冈·特拉尔和阿曼诺们可能只购买几千块布，但是他们部分地填补了由于大都会销售机构的微弱而在中世纪贸易中留下的罅隙。最有企业精神的地方商人有可能某天移民到大城市成为大商人。其他的人仍模糊不定，但珍贵的小船把大城市的廉价手工产品与被遗忘地区的剩余农业产品做了交换。

交通条件较好的其他地区把它们的剩余产品带到中等大小的工业城市的集市上。我们对这些集市知之甚少——同样不仅因为资料的不足，而且因为[367] 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它们不值得注意。许多集市像它们在中世纪早期一样不重要，但是有些却迅速地发展壮大。这样的集市很多，比如帕尔马是一个专门交换布和牛的集市——这是自1126年以来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两种主要的交换产品。相比之下，帕尔马在远程贸易方面就不那么重要，但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繁荣的城市。它的农村集市能提供许多的资源，这使得帕尔马能在商业

城市购买贵重产品并建起辉煌的大教堂。这种贸易也不仅仅局限于短期集市，在波河下游河谷的次要城市有 8 个连续的集市不断地进行交易，在那里，便宜的大宗货物由河谷或运河运来。在整个意大利，城镇和它的行政区在商业上是独立的。

在意大利、普罗旺斯和加泰罗尼亚，地方集市潜伏着更大的商业浪潮，但是在法兰西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这个王国的中心——它是最重要的，这里有许多中等规模的城镇和人口稠密的自由农民阶级，但没有商业大都会和大的本地商人。甚至在巴黎两个意大利人在 1292 年的每年应课税的收入票面价值分别是 5 625 镑和 4 700 镑，远远超过最富裕的巴黎中产阶级皮埃尔·马歇尔，他的可应税收入是 2 900 镑；那时有 4 个意大利人的收入都超过 2 500 镑。然而法兰西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在卡斯蒂利亚（Castile）、葡萄牙和阿拉贡同样的现象也发生过。城镇并没有失去它们的农村特征；许多城镇，实际上今天看来就像农村。当不是专门作为行政和军事区时，它们经常是低等级的手工业品与稍微低于一般的农产品的交换中心。然而在整个伊比利亚半岛，我们可以看到交易点和集市——包括每日举行的集市（*azogue*）——的逐步发展，食物和粗布是那里主要的交换品。在德意志的南部，城镇通常从事远程贸易，但它们以生产粗斜纹棉布、餐具和其他的主要供农村地区消费的产品为主。这可以解释人口 1 000 以下的“城市”数量是如此之多的原因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更大的城镇（极少有人口超过 10 000 的）小商人能够相对富有。

接着我们必须考虑专业的商人，他们生活在许多海港和道路枢纽，比如从阿普利亚的巴勒塔或曼弗雷多尼亚到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或阿里斯拉，还有加斯科涅的里布纳或波尔多，这里仅提几个这样的地方。它们给商业城市的行商和大公司的驻地代表机构提供了大量的主要的产品，作为交换，他们 [368] 获得便宜的伦巴第或郎格多克粗斜纹棉布的大量发货或一些香料。他们的商业有如此好的组织以至于他们能耐心地等待直到农村的产品在经过一段缓慢的旅行后用平底大船、骡子或者由农民背到他们的仓库。他们经常预购下一年的收获物，尽管教会禁止期货交易。他们也像大商人一样知道如何与当地官员打交道，而这些官员的职责是禁止某些主要产品的出口和向某些商品征收苛重的通行税。“是否记得”，佩古洛蒂写道，“假如你对海关官员尊敬并给他们一些什么，……他们总是把你的货物的价值估计得比它们的所值要低。”他也谈到君士坦丁堡这个很大的谷物和贵重物品的市场，但他关于墨西拿、拉罗切尔或三明治说的也一样。

正是通过这些程序，大城镇才获得了大部分的工业原材料和与它们相邻的内地不能提供的基本食物。一些谷物、羊毛、酒和差不多所有的丝绸、棉布和极好的染料来自黎凡特和非洲，但是最重要的食物和原材料供应地是在欧洲本地。更大的城市的需求远远不止是一个小数目。维拉尼的数据似乎相当准确，估计佛罗伦萨的每日谷物的消费超过 1 300 蒲式耳。差不多 2/3 来自不属于该市的地区。佛罗伦萨人一年要吃掉 4 000 头牛、80 000 只羊羔和 30 000 头猪。他们喝完 2 500 万夸特酒，也就是说男人、女人和小孩每周 1 加仑。米兰和威尼斯消费更大。然而米兰的土地特别肥沃，威尼斯的产量要比佛罗伦萨的低得多。马赛出口它的行政区内生产的酒，但不得不进口谷物。巴塞罗那也一样，教皇在阿维尼翁（Avignon）的厨房差不多把罗恩和阿尔卑斯山间的整个地区的家畜都扫尽了。城市人更挑剔的胃口从不断地购买手艺品中得到满足，比如巴黎的象牙、里莫奇的搪瓷器、威尼斯的玻璃器皿和镶嵌艺术品。

手工业原材料的消费特别重要，不仅在大都会而且在中等规模的城镇也是如此。意大利的铁和木材资源得到了开发，但这还不够。伦巴第的金属匠和意大利海滨城市的造船者从德意志和法兰西进口部分原材料。棉花主要来自黎凡特。卢卡在 1337 ~ 1340 年期间每年进口大约 165 000 磅丝绸（主要来自突厥斯坦和中国）。对欧洲丝绸业的最大的中心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很低的数字，但我们必须考虑 1317 年的一场革命已使许多手艺人被迫流放。[369] 14 世纪卢卡人利用水力加速他们的头梭工场的产量。这是采用脚踏织布机以来最重要的技术创新，前一种织机在 12 世纪就已在拜占庭帝国和西欧使用过。为了好好利用这些织布机，可能除了在小一些的郎格多克和西班牙中部加工中心完全由它的相邻的腹地提供羊毛外，工业城市通常不得不从远方进口羊毛。在意大利，差不多每个地区都生产羊毛，但是在伦巴第城镇另外还从法兰西、北非和叙利亚进口羊毛，那里的布的产量在南欧是最大的，尽管质量并不是最好的。优质的西班牙羊毛直到 13 世纪的最后几年被英国羊毛代替之前仍提供佛罗伦萨生产者所需的大部分。甚至在 1223 年，当这种羊毛的使用还未普遍风行时，44 个在英格兰的意大利商人出口 8 000 袋（大约有 1 325 吨）；但是这个数量的羊毛仅能用以生产 24 000 块布——只是意大利总量的很少一部分。在随后的几年，对英国羊毛的需求增加了许多倍，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也加速了。

城市市场的扩大导致了富裕的布商、香料商、丝绸商和水果商、屠夫、面包师傅和其他的整买零售的专营商人集团的发展。他们地点长期固定的商店极大地代替了每周的集市和作为手工业者向大众销售的渠道的生产作坊，

至少在较大的意大利城市是这样。在更小的城市，帕维亚，4个主要广场上的长椅子仍然比商店多，但它们也有了可被称作购物中心的永久特点。在一个像热那亚那样的商业大都会，商店至少到12世纪中期消除了长凳。没有太贵或太便宜的东西一堆堆地出售的。我们碰巧得到一个玻璃商的资料，他购买了100个搪瓷坛子，还有一个珠宝商一次就卖掉了111个贵重的戒指，169件蓝宝石和黄宝石，348块硬石，59件珍珠，132件刻有浮雕的宝石或贝壳，其中一个上有个圣十字架。个性化的商标和邮购被引入不同的领域。信用购买和分期付款很普遍。银行账号不仅用于商业操作而且用于日常生活。在1253年的一个月的现存的文献中，我们碰到有房客把房租存入他们房东的账号上的记录，一个城市雇员委托一家银行用现金支付他的薪金，一【370】个农民把钱存入银行以等待支付9个月后到期的债务。此外，还有无数有关海上和陆上贸易的记录，对货币兑换和公共贷款的股份投机，购买、出售和抵押房地产、高利贷者的欺诈行为、造船、建房和其他行业的合同，看到这些，你也许会对13、14世纪早期的商业都会的热闹生活有一些印象。

当然，所有商人的最高层是大商人——进出口商人、国际银行家、手工业主和“殖民地的初创者”。也许他们有9/10来自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平衡差不多主要由以下的人创造，普罗旺斯、郎格多克和加泰罗尼亚的海上商人；加斯科涅、图卢兹和拉罗切尔的葡萄酒出口者；西西里和阿普利亚的谷物出口商；奥尼斯和多瑙河上游地区的盐出口商和瑞士和德意志南部的亚麻出口商。意大利大商人的财富可以从弗德里柯·康奈尔那样的例子窥见一斑，这个威尼斯商人宣称他的应税财产是60 000镑（1379年），还有萨利姆本·撒里姆贝尼，这个锡耶纳商人银行家为了赢得战争（1260年）向他所在的城市提供了236 000西恩的贷款。① 撒里姆贝尼和科纳家族的豪华的府第至今犹存，证明了这些商人的人文主义，他们中许多人是文人和学者的好朋友。中世纪最大的商人通常是一个很活跃的政治家和国内外战争的顽强斗士。但是他对故乡、家庭和家族的热爱并没有阻止他的漂泊不定，他总处在一种活跃的状态中，直到岁月不饶人时他仍离开舒适的家到外面漂泊，只要那里的商机可能在召唤着他。

---

① 显然通过*compagnia*或者康孟达（*commenda*）的合同形式所能集中的资本比任何个人的财富都要大。在许多与热那亚商人签订康孟达契约的公证人之中，菲力波·马格纳维卡在1227年9月后的3年总额达到25 352盾。按照维兰尼的数据，佛罗伦萨的巴尔迪和佩鲁茨公司借给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的金额总数达到1 365 000弗罗林，这个数字的相当的正确率被阿曼多·萨波里所证实。我们缺乏数据来评估13世纪和14世纪非意大利合伙人的财富，但是可以假想这个数字要低得多。【6】

不像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商人，中世纪晚期的大商人总是把触角伸向各个领域，既进行大规模的交易也从事零零碎碎的买卖。当然，一个现代的大亨可能嘲笑他的中世纪先驱的商业技巧、资本和信贷的相对小规模。他也许在他的工作中不会乞求上天的帮助，因为他的旅行效率不靠风鼓起船帆或太阳晒干泥泞的路面。但是谁能说再过500年，将来的商界巨贾不会嘲笑我们时代的商人的商业技巧、资本和交通手段呢？数量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但是如果不考虑总的时代背景，数量也就失去了意义。对资本和速度的限制不仅对大商人是存在的，而且对其他同时代的人也存在。难怪一个威尼斯商行的信差在4天内跑完了到佛罗伦萨的路途——如果是驮畜的话，那也得走22～25天——当时他使人吃惊的程度比一个现代商人坐飞机而大多数普通人坐火车或汽车尤甚。而且在中世纪，从参与每一种贸易都有大风险角度看，绝对专业化是不明智的，如果批发经营很快地耗绝了自己的机会，零售业就不能得到刺激。

【371】

让我们把对商业方法和技巧的讨论留给他人而转向对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商品进行简单的考察。商业的主要轴心继续从西北转向东南，从东南欧洲转入穆斯林和拜占庭国家，正如在中世纪早期那样。西方的纺织品和东方的香料（主要是调料、染料和药品）在各种交换量不断增加的商品中占据了第一位，至少在价值上是这样。佩古洛蒂在14世纪早期在“香料”这一名称下列出了不少于386个种类。他把许多西方的原产产品，以及铜、胶和棉花等物品，这些很难被视为香料的东西都包含在内。但东方的“香料”通常价值更高、包含的种类也更广。佩古洛特开出的价格表包括了11种糖（其中至少9种来自黎凡特），7种胭脂染料（来自巴尔干、普罗旺斯和西班牙的不同国家）和23种生丝（主要来自中东和远东）。对西方的纺织品而言，法兰西的北部、比利时和英格兰是重要的中心，都有一种或多种贵重的呢绒按它们的名字命名。更便宜的毛料和含棉纺织品主要来自伦巴第的城市、朗格多克、比萨、塞纳和德意志的南部。亚麻多来自香槟、瑞士和德意志的南部。最好的亚麻是西方惟一值得运到远至北京的产品。但是大宗货物，通常被运到地中海、黑海和从萨菲到纽卡斯尔和布鲁日的大西洋的任一目的地。比如威尼斯，除了出口贵重的纺织品和“香料”外，也同时出口皮革、毛皮、盐、谷物、油、铁、铜、锡、水银、木材、水果、肥皂，牲畜以及屠宰后的肉和奴隶，地中海船主的一个次要但不可忽略的收入来源是旅客航运。朝拜者支付不多，但他们对最差的“膳宿”也毫无抱怨，而且他们为数众多。穆斯林的朝拜者也是像基督教徒一样的好顾客。在需要大规模地航运十

【372】

字军时，较大的海港间竞争十分残酷。马赛为了争夺市场，在1268年把到巴勒斯坦头等、二等、三等票的价格分别降到了60、40、35索勒德斯。假如有人可以到甲板上马厩里睡觉的话，他只须付25索勒德斯。

到14世纪早期，商品和乘客规模流动的增加已导致了海陆交通设备的重要改变。不同种类的船只，从速度快但很窄的战船，到速度慢但很宽敞的*navis*航船，都被用于不同的货物的航运。然而在战时，即使最坚固和最快的装载着轻而贵重的货物的船只也不可能通过各种封锁，在正常时（也就是，只有小规模的战争和海盗威胁时）通常有战舰护航的装载大量货物的船队也是相当安全的。在这些更大的平底大船上，把轻而贵重的货物与更重的货物混合装载可以降低运费。一船这样的货物价值有的超过200 000达克特，有时一个商人的货物就能装3船。更重更大的平底*taride*船差不多像*navis*船一样庞大，它们经常装载着谷物和鱼从黑海起航。同时，对通往英格兰和法兰西的货物航运而言，较大、较坚固也较快的帆船——大帆船（*carrack*）——获得了独立的企业家的青睐，在这种船上专业的劲弩手（arbalesters）（后来是炮手）代替了相当数量的作战水手，这样依靠一条船自己的力量就能单独穿过比斯开湾到达北方的目的地。这种船的使用传到了地中海，但在这里，它们的短处暴露得更明显：在路上错过了地方贸易的机会，需要满载才能赢利，所依靠的雇佣兵的热情和专长均抵不上以一部分工作作为在航运中参股的海员。护航队和适应能力更强的帆船比如小船继续起重要的作用。到14世纪末，威尼斯派的护航队差不多完全由相对少数的海船组成，他们大量承担运输叙利亚和塞浦路斯棉花的航运业务。正规的护航队在热那亚和威尼斯还得到政府津贴和监管，每年按计划发往地中海、黑海和北大西洋各地。通常他们仅从2月或3月起到9月或10月才开船，但是热那亚人在13世纪早期成为冬航的先锋，威尼斯人不久也紧随其后。尽管当时最大的*nares*海船也都很小，但船只和航行次数的增加部分弥补了吨位的不足。 [373]

陆上交通从没有克服它比海上航运更昂贵的障碍，不过它在经常有人往来的路上现在也变得更安全一些了。然而，商人仍得与商队一起才敢沿着某些经常被强盗骚扰的路线行走，比如从特拉布宗到塔布里兹的路线，在别处他们没有护卫就可以走，或者可以把货物委托给兴旺的航运代理机构。集市和通行税关卡的竞争导致了关税的大量减少和道路的改善。比如，我们应记住在瑞士山地居民和法兰西货运马车夫为了争夺横穿大陆的商业流动而进行的艰苦斗争。11世纪在波河河谷和莱茵河上游间的大多数航运是经过阿尔

卑斯山中部关口——尤其是塞普帝默尔——尽管货物在最陡的地方必须脚夫用肩扛或用手推车推上去。12 世纪这种运输逐渐地转到经过香槟、罗恩河谷（或者就通过罗恩河）、普罗旺斯海港，远至萨沃纳或热那亚和亚平宁山脉的海港的路线。这条线路是原来的 3 倍长，但是它避开了阿尔卑斯山，极大地利用了便宜的水运。13 世纪通过绍勒讷峡谷的桥梁已能使骡车通过圣哥得兰岛，这也部分恢复了阿尔卑斯山的贸易运输。那时，法国的车夫和船夫开始降低运价。1318 年，佛罗伦萨的德尔·本公司进口法国布时发现，从巴黎到马赛的陆路比走从马赛到比萨的海路每英里所需支付的成本还要低。虽然这个例子有些特殊，但它却表明自 13 世纪中期以来发生的一个意义深远的转变，那时（就如所计算的）经从奇维塔韦基亚到热那亚的海上每航运 100 磅货物花 3 索勒德斯，经马赛到普罗万（Provins），这段路程稍长一些，同样的重量的所费却是 80 索勒德斯。但是瑞士并没有放弃斗争。1338 年后，在旧塞普蒂默尔关口建一条可供小马车通行的路的工程开始了——这在阿尔卑斯山是第一次。

所有可获得的关于 14 世纪早期的交通、通行税、商业习惯和贸易量的【374】数据给人的印象是，在我们所谓的远程贸易“内”、“外”地区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如果不考虑像纳瓦尔和巴尔干半岛核心区这样的“被遗忘”的地区，在那里商业活动是很少的。“外层”是大风险大利润的边境地区，在那里，好运气几乎像管理一样重要。比如在亚洲腹地的旅行，尽管有佩古洛提关于塔纳—北京（Tana-Peking）路线令人宽慰的描述，仍然需要不一般的耐力和勇气。1338 年，威尼斯商人乔万尼·罗雷达诺准备与他的兄弟和 4 个其他的伙伴去德尔菲（Delphi）①，他的家人和教区教士恳求他停止这种冒险。结果他死在途中，两个伙伴也死去了。这种冒险最初蒙受了损失，但由于德尔斐（Delphi）苏丹的慷慨大方，最终获得了 100% 的赢利。但这对罗雷达诺的妻子来说难算一种安慰，她后来隐居于修道院。

不过，在远程贸易的“内层”地区，商业行为已不再是一种冒险。这里形成了一个高度竞争性的市场，成功主要依靠效率、速度和差不多精确地对运费、通行税、集市条件和路上花销的计算。即使根据现代标准来判断，投资也算比较安全，但赢利通常一般。路程长短并非总是划定“内”、“外”地区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战争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使得贸易极端危险，即使是在一个商业都会的大门口进行交易也是如此。同样，在美男子腓力统治下法

① 原文 Delhi（德里），下同，疑误，根据文意和索引文。——译者注

国的金融和政治的变化对国际商人而言，巴黎较之于北京是一个更不安全的地方。但一般来说，“内层”地区包括地中海、黑海整个海滨地区和从休达到萨菲以及从贝扬纳到伦敦和布鲁日的整个大西洋海滨地区，还有人口稠密的意大利的中北部地区、香槟、法兰西岛屿、佛兰德和布拉班特。

在某些商业领域，商人靠形成垄断性的康采恩和卡特尔联盟来努力减少或消除在“内层”地区的竞争。1255 年，一个热那亚和威尼斯人联合控制了在塞尔柱安纳托利亚的明矾的生产，并能挑起人为的价格抬高。1283 年，威尼斯政府命令所有的威尼斯商人形成一个卡特尔来购买亚历山大的棉花和香料。1331 年，圣琼·但格里、波尔多、里布纳和拉罗切尔的葡萄酒商人联合制定针对佛兰德伯爵的条款。当然，手工业行会在许多方面行使着卡特尔的职能。尽管如此，生产成本和它的销售价格间的边际效益继续在缩小。14 世纪早期，德尔·本公司在佛兰德购买布，在佛罗伦萨加工并在那里销 [375] 售，在香槟集市或在意大利南部集市的售价只比它们的买入价高 11.70% ~ 20.34%。仅靠有效的管理——和加工者的低工资——才使得这家公司赢得 7% ~15% 的利润。根据单独一家公司的数据就把问题一般化当然是很危险的。然而，这个公司绝非特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留意当时的银行存款、政府贷款和不动产投资的利率已从 13 世纪早期通常的 20% 甚至 25%（在意大利）降到了 7% ~15% 这一事实，做出推断。显然，海外贸易中的赢利波动的幅度会更大，但是其平均水平似乎并没有离下降后的数字相差太远。

边际利润的减少和交易量的极大增加促进了商业技巧的发展，也慢慢地削弱了行商对坐贾的优势。一个可以被称作“合理化”的过程使得商人不仅可以安全地度过严重的与增长俱来的危机，而且能达到新的繁荣高峰。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变化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称之为 13 世纪晚期和 14 世纪早期的“商业革命”。但是，这种革命至少进行了 3 个世纪，不仅在商业技巧方面，而且在许多其他的领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转型。13、14 世纪在管理方面的改进其作用可以与工业革命时铁路、发电机和柴油机的发明相比。它们使得已经非常火热和巨大的经济扩张在速度和动力上又有增加。它们把商业革命从它自己的巨大所造成的窒息中拯救了出来。

但是，我们不能假设 14 世纪的坐贾能够比行商（例如原来的康孟达）更好地把握商业机会。二者都适应了时代的特定条件。在一个小竞争大赢利的环境中，行商除了个人的舒适外，拥有所有的有利条件。因为是他直接经营商业活动，那些把资本委托给他的人不得不几乎盲目地接受他的决定和他的账目。他不与任何人分享自己投资的利润，但却有权享有无数通过康孟达

方式参与投资的合伙人的25%的收益。我们清楚地知道他常常占有超过应得的合法份额。但是人们继续把钱交给他，就像今天在经济繁荣时人们纷纷【376】去购买新股票一样，因为他们觉得即使最鲁莽的和无耻的行商在赚得足够的钱发财的同时也总会让他们获益。然而，随着竞争的加剧，当筹措一定规模的资本需要同许多人分享收益时，旅行的成本就变得太贵，让行商无法承受。这时坐贾尽可能地接管了远程贸易的管理和通过他自己的雇员组成的分支机构和海外的委托代理机构进行贸易。他努力获得更充分的账目并靠通信来进行紧密的跟踪。这样，他就可以节省要付给行商的份额，但他必须建立一个笨重的管理机构，而这个机构只有在商业活动连续和密集时才能坚持下去。这个精力充沛但更不灵活的成熟的肌体代替了那个瘦弱但灵活的年轻的肌体。

考察必须到此为止了。我们是以对两个低微的商人乌戈·特拉尔和制革匠阿曼诺的素描开始的。让我们以两位巨贾的肖像来结束吧，他们是贝尼德托·扎卡里亚和达蒂尼·弗兰西斯科（Datini，Francesco）。前者是一个行商，一个大贵族和海员。后者是一个坐贾，一个白手起家，在内陆城市土生土长的人。通过这两个人可以总结出中世纪商业巨子最好的特征。他们差异极大，但是两种感情使他们类似：一种是中世纪般的宗教虔诚，另一种是很“现代”的赢利的热情。

贝尼德托·扎卡里亚，在1240年前的某个时候出生，是热那亚子爵的十兄弟姐妹中的一个。这个家族的大多数人都像他一样积极地从事商业和政治。他单单作为一个司令和外交官的成功就能使他成为所在时代的最显赫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梅罗里亚的司令，在那儿热那亚打败了比萨的海军，他在马扎莫萨指挥卡斯蒂里人的船队粉碎了摩洛哥人；他以风趣的法语起草了对英格兰的“大陆封锁”的计划并帮助美男子腓力去执行它；他在叙利亚征服了的黎波里，目睹了它在占压倒优势的埃及军队下的失陷，后来他又玩弄了一个组织妇女十字军重新夺回那里的歪主意；他也从事大规模的和小打小闹的海盗活动，为许多宫廷执行重要的秘密使命。让我们把精力集中在他作为一个商人的活动上。他有着那个时代典型的折衷主义特征，他从事香料、餐具、布匹、亚麻、毛皮、盐、谷物和其他的货物的贸易，在外汇、公共贷款和不动产方面投机。但是使他与众不同的是他开发利用他从拜占庭皇【377】帝手中得到的两处采邑的方式。这两个采邑之一是奇奥斯岛，那里每年生产的乳香价值16 000盾。奇奥斯（Chios）是世界上惟一生产备受黎凡特人喜爱的这种香草的地方。后来的记录表明，每年他都要把多余的产出销毁掉，因为进入流通的货物用不着增加多少就会大幅降低销售的价格。

更重要的是佛塞亚岛的明矾矿，处于贝尼德托·扎卡里亚和他的一个兄弟共同拥有另一处的采邑上。明矾是染业不可缺少的材料。佛塞亚的明矾质量是世界第二，最好的是小亚细亚北部的霍罗尼亚。扎卡里亚在发展自己的佛塞亚矿时通过政治阴谋使得所有霍罗尼亚的出口从市场上消失，然后把霍罗尼亚的明矾和自己的明矾一起出口。几年后，一个新的有 3 000 居民的新城新佛塞亚在矿井附近崛起，它的年产量是大约 700 吨。矿物在海滨的旧城加工。在一个记录下来的例子中，扎卡里亚以 3 000 盾的价格卖出了 33 吨加工好的明矾，免费送到布鲁日。他用自己的船把明矾销售到各国，利用他所有的政治和军事技术来扩大它的市场。在热那亚，他的家乡，他拥有一个染料商号并投资于佛罗伦萨布的生产。他的商业的一些副产品表明了绝对的垂直和水平的一体化，这包括在克里米亚建立的一个旅馆，短时期控制普尔托·桑塔·马里亚（西维尔的新海港）以及有史以来首次被记载的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英格兰的航行。1307 年扎卡里亚在他的宅第死去，这时尽管年事已高他还正准备另一次商业冒险。4 年后，亨利七世（Henry VII）的妻子皇后玛格丽特在扎卡里亚的后代宅第中度过她生命中最后的日子。她的驾临使得这座一个真的商业帝国建造者的宅第更加“帝王化”了。

描述达蒂尼·弗兰西斯用不着像描述大名鼎鼎的扎卡里亚那么多的文字。达蒂尼生于 1335 年，是佛罗伦萨附近一个很小很富裕的小镇皮拉托上一个客栈老板的儿子。13 岁他成了孤儿开始跟着一个佛罗伦萨商人作学徒。不久他就离开了这个无望的职业到阿维格农定居，做了一个商业雇员。28 岁，他建立了一家拥有 800 弗罗林资本的公司，他占有其中一半的股份。47 岁，他回到佛罗伦萨成为一个富人，但仍渴望增加他的财富。他在 75 岁去世，他把差不多所有的 70 000 弗罗林捐给了慈善事业，尽管他有一个大家庭：他的许多孩子是私生的，他还给合法的妻子创立了一个托管基金，他对【378】公共事业的慈善表明了他的宗教感情，不过，一个怀疑论者也许会认为是他的良心不安一直在困扰着他，才使他这么干的。达蒂尼的最大的生意是武器工业，百年战争期间，这在阿维尼翁肯定是最赚钱的。但他也像扎卡里亚一样是个折衷派。我们知道他从事银行业、国际贸易、布的制造和染色、丝绸加工业和有其他的商业活动——所有这一切通过由他完全或部分投资的大量的小公司进行。他在阿维格农、热那亚、巴塞罗那、瓦伦西亚和马略卡有长设的旅馆（*fondaco*）分支机构，与他通信的人分布在西欧和黎凡特各地。他的账本表现了单一记账转向复式记账的整个变革过程。接受他捐赠地产的慈善机构至今犹存，而且保存着他公司的各种文本。账本的数目超过 500，

他与雇员及其他联系人之间通信超过300 000封。一些信件表明，达蒂尼与当时杰出的文人和学者保持有亲密的友谊。但是达蒂尼谨慎地停留在政治之外，而政治给那么多商人，有时包括扎卡里亚，带来了那么多灾难。

扎卡里亚生活在中世纪贸易最辉煌的时代，但达蒂尼却是在黄金时代过后才发的财。我们讲述他的故事，仅仅因为他的方法与14世纪早期的许多商人的类似。但是使他成为一个孤儿的灾难——黑死病——所导致的危机比给像他一样的坐商所带来的困难要严重得多。

5.3 中世纪的衰落

5.3.1 危机的规模

接连不断的战争并遭受侵略，难以承受的税收和通货膨胀，反复发生的大瘟疫，日趋严重的生态破坏，也许还有非常不利的气候反复，当然还有一个从人口增长到人口衰落的倒退：在这种条件下，西罗马帝国及其贸易已经衰落、崩溃。1000年后，一个类似的（假如不是完全相同的）多重灾难打击了西方及更远的国家，差不多在整个世纪（1346～1453年）无情肆虐，接着，在经历了整整40年的战争之后再次发生，并持续了16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由于比罗马帝国更强大更有弹性，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没有崩溃；但它的经济比50年前的许多历史学家所认为的要更深、更持续地承受了创伤。[379] 当然他们不能也没有忽视这些灾难；但他们对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和文学辉煌，对一些君主和世界开拓者的征服，对富人的奢侈消费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他们倾向于不再考虑世界的震动，似乎它们是孤立的震动，很快就会被一个永远有弹性的和飞速发展的社会所吸收。

事实的真相是，在积极活跃地应对持续而来的灾难的同时，商业革命也耗竭了自己的动力。无疑，它的基本结构和技巧被保存下来，它的很大一部分物质成就被抢救或恢复（尤其在15世纪晚期的间歇期内）；但是一个机会开放的时代的恢复力未产生预期的效果，社会动力衰退了，保守比增长成为一个更可取并令人向往的目标。当本卷的第一版提出这种观点时，它仍然是模糊不定和非正统的，而现在，把衰落的中世纪和上升的文艺复兴作为一个经济萧条来解释已成为一种多数人所持有的看法。不过，这种观点并未完全驳

倒少数博学的对此持更乐观态度的人的意见。这种观点，包括了从中世纪到现代经济早期的整个转型时期，与本章在时间跨度有部分重叠，但是它的更广泛的意义必须被我们记住。实际上，观点间的差距已经缩小了：基本的趋势——在1346年前有一个顶峰，一次波槽可能持续到1453年（直到结束时仍有一个稳定化的趋势），1454～1494年间歇期间有第二次高峰，之后又是第二次波槽——这不再引起争论了。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存在着标准的尖锐对立，在萧条中间存在繁荣的孤岛，在恢复边缘有一个停滞的堆积。具体的争论实际集中在恢复的效果上，也就是说，是否第二次高峰低于、等于或高于第一次；这个问题只能以量化的办法来处理，而量化的手段必须要获取不仅有关第二次而且还有关于第一次高峰的精确信息，可是这方面的文献更少了。

除了在人口领域，其他领域相关的近似数据都无法满足这种数量对比的要求。在经历了4个世纪的增长和至少一个世纪的免于饥荒之后，南欧的人口在黑死病第一次爆发时遭受了沉重的损失：大约有1/3的人死去，这还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估计。对于那些以一种腹股沟腺炎的形式感染它的人来讲，死亡率大大超过50%都是正常的；对以较少见的肺病形式感染它的人来说，死亡率超过90%。随后的爆发，以15年或20年为一个间歇期，灾难性要小一些，这也许是由于在早期瘟疫生存下来的人获得了免疫功能，也可能是【380】因为病毒随时间流逝而有所削弱，可以肯定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对病人更有效的隔离。逐渐地，人口倾向于稳定在1346年最高峰的2/3或3/4，也许在1454～1494年间再次有了更大的增长，因为这时战争停止了，梅毒也不再是另一个主要的杀手。据称，在一个更低水平上的稳定是对早期人口过分膨胀的一种必要缓解；但是几个世纪的商业革命在生产力的增长方面比人口方面更成功，没有证据说明假若不出现由灾难、战争和饥荒构成的马尔萨斯式的刹车，人口就不能继续增长。在消费能力依然微弱，机械化程度很低的时代，人力资源的供应是一个十分关键的资源；所以工业革命前的作者通常都以人口密度来测量一个国家的财富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对第一与第二次高峰进行比较时，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数量数据比人口数据更零碎，但这些数据比人口数据表明的经济收缩更为明显。比如在佛罗伦萨，美第奇商业银行家公司在15世纪大部分时间内都是欧洲的最大的商业企业，其资本数量和雇员人数比14世纪早期这个城市的第二大公司彼尔兹公司要小得多。这种收缩的意义由于呢绒业更大的收缩的证据而得到加强。呢绒业在那时是最大的雇主，而且很少受到资本和劳力需要更少的丝绸业的良好业绩的影响。无论如何，佛罗伦萨的第二次高峰似乎比别处来得更早去得

也更早：在15世纪后半期，美第奇公司衰落并垮了下来。乔万尼·鲁塞莱，是继美第奇后的第二首富，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损失，他退出商界，全心全意致力于艺术品收藏。在15世纪晚期，征税的发包记录再一次表明，当时的海上贸易量大约是1344年的1/3～1/2；如果这个估计可信，几乎就可以否定第二次波峰的存在，不过，马赛在同期的同类数据也表明了一个大致相同的下降，上述估计的可信度也由此得以加强。第二次高峰在威尼斯和米兰城邦更能够感受得更清楚，它们都极其需要1454～1494年的党派停止争斗，因为它们把其资源以令人吃惊的高比例投资于战争（在1377～1381年和1431～1441年威尼斯政府分别以强迫贷款的方式把纳税人手中的钱卷走了1/4～2/3）；但【381】是和平的主要受益者是农业而不是贸易。在米兰，惟一可靠的增长是武器工业和为宫廷进行的奢侈品的生产。威尼斯的恢复期一开始就因索兰佐银行在1453年的倒闭而遭到破坏，在结束时又因为加佐尼（Garzoni）和利波曼尼的银行的倒闭而受到影响，中间还经历了一次昂贵的反土耳其（1463～1479年）的以失败告终的战争。佛罗伦萨、热那亚、米兰和威尼斯是商业革命的“四强”，它们的兴衰极大地决定并反映了欧洲和地中海贸易的基本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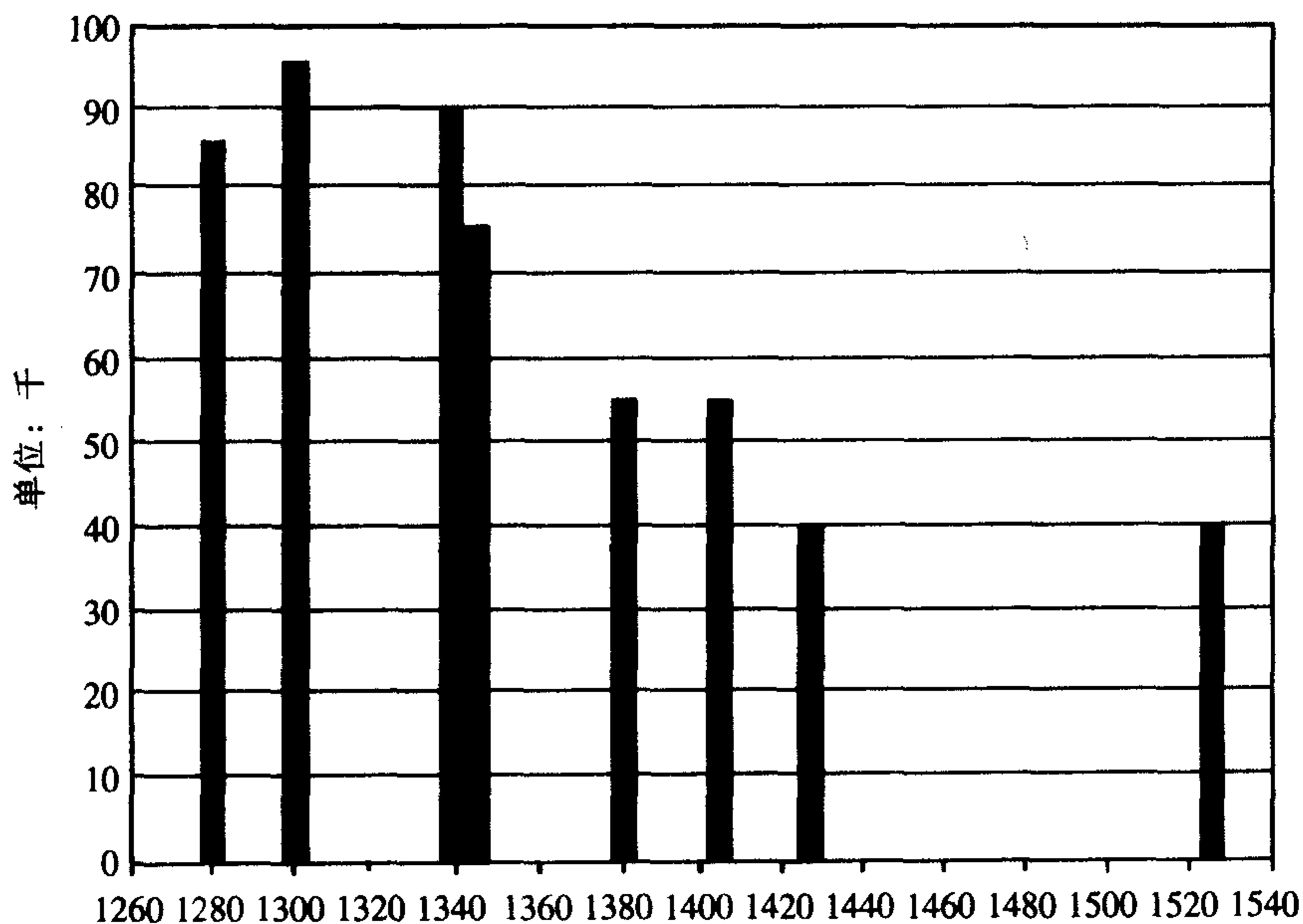


图1　1280～1530年佛罗伦萨记录的人口数

（牧师和乞丐没有包括在内）

资料来源：复制自R. 洛佩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三个时代》，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

有一种观点认为，15 世纪晚期出现的一批新生的规模较小的贸易中心——大多数在意大利境外——其发展足以抵消原有的商业机构的衰败；但实际上没有数据证明它们的第二次高峰确实超过第一次，即使确实如此，我们仍不能仓促接受新的发展能够弥补原有更古老更强大的商业力量的损失这样的说法。假如认为新生力量的出现作为一个未来的趋势是十分重要的话，每一个时代也必须以它的现实为基础来做判断。 [3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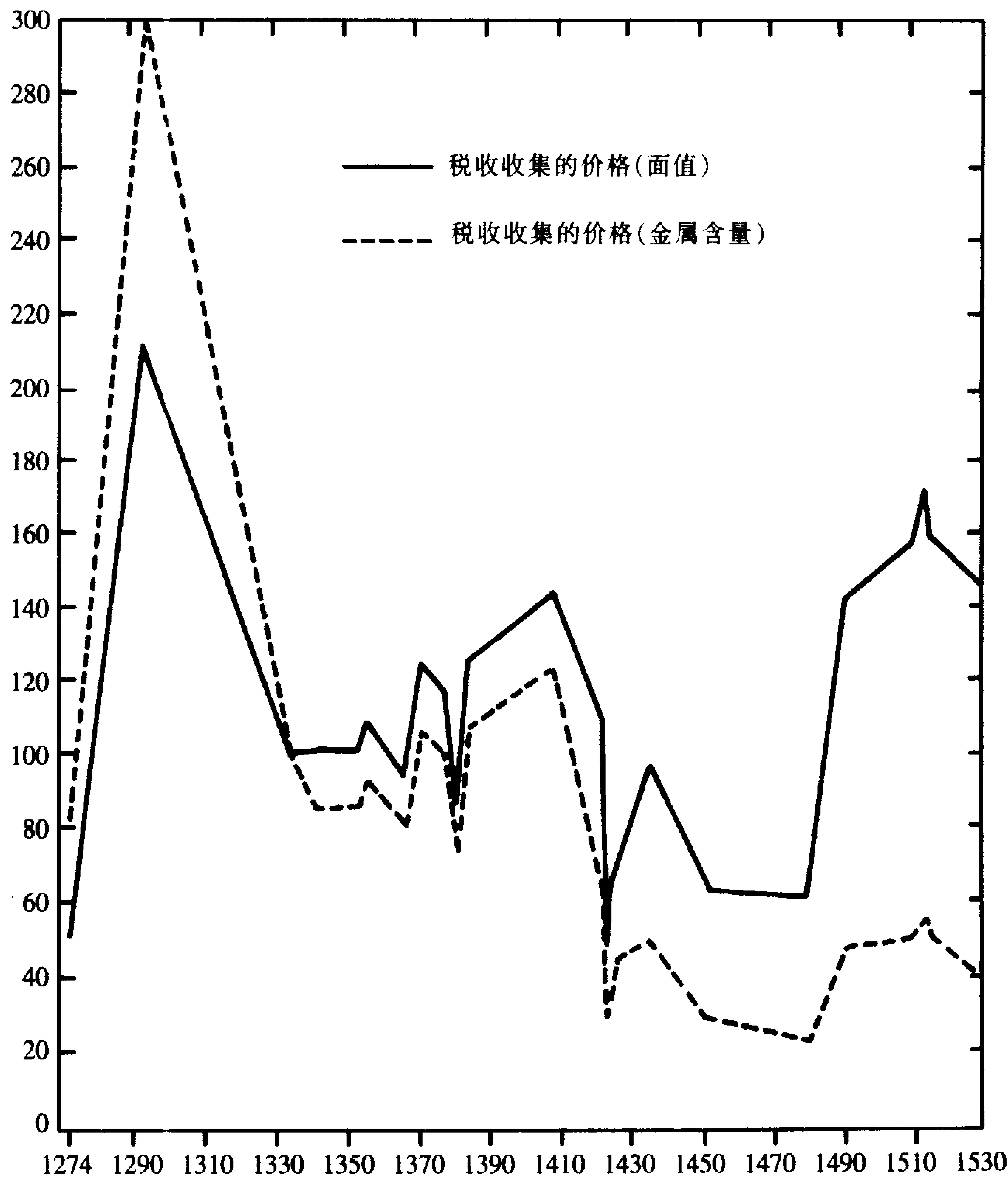


图 2　对热那亚 1274～1530 年海上贸易的预测（1334 年为 100）

资料来源：复制于 R. 洛佩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三个时代》，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

贸易在质量、方式和范围上的改变比完整性和可靠性都有保留的统计能够传递更清晰的信息。如下文所述，南欧贸易的东部前线逐渐从中国退到地中海边缘，甚至丢失了意大利商业殖民地的安全掩护所；由于无法再轻易从东方获取，一些商品只好通过西方自己开发生产以寻求补偿——格拉纳达【383】(Granada）和卡拉布里亚（Calabria）的丝绸，拉丁姆的明矾，马戴拉的糖，西非的野胡椒粉和奴隶——但是替代品经常比原来的贵而且不令人满意。仍然难以抵消的是，人口的减退和被灾难袭击的大众的贫苦导致的国内市场的萎缩；商人仍然能够也确实刺激了上层阶级的消费习惯，但是为了抓住剩下的中层和下层顾客，商人不得不提供更便宜的物品并割舍部分利润。逐渐地这不仅影响了他们在经济上的盘算而且影响到他们的精神态度和生活方式。有的商人在大肆的投资和赌博中挥霍掉自己的资本，有的退出商业经营，努力投人农业和不动产；也有人为了追求权力和社会地位而投资或对书本和艺术品进行投资，差不多在整个南欧，商业倾向于集中在日益缩小的商号中，他们对谨慎的欣赏甚于勇气，看重财产甚于劳动。它没有忽视重要的大宗商品和普通布匹，但更倾向于奢侈品。

近来有这样一种看法，即使 14 世纪中期的灾难事件没有降临，商业上的这些变化仍会发生。确实，黑死病之前在佛罗伦萨就确实有过一个人口的轻微下降，早在 13 世纪中期在热那亚的阿尔卑斯山就发生过造船木材的短缺，在 1346 年之前全南欧土地贫瘠，过分放牧，人口过分密集或荒废土地的现象遍地都是，战争和苛捐杂税、银行倒闭、货币混乱和短程贸易利润减少都大范围地反复发生（虽然没有像西北欧在 1315 ~ 1317 年因食物短缺而产生的巨大灾难)。最近，本杰明·凯达对成千上万份合同和广泛的文字资料进行了考察，结论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的信心在潜意识里在不断下降，1346 年后变得更低了，而且在这之前的几十年也并非不是如此。他们的船主逐渐放弃了原来世俗的昭示吉祥的名字（比如财富、幸运、快乐）而代之以圣人之名来求得神的保佑；他们的投资更多是出于回避风险而非商业冒险的赢利；他们不再把成功归于个人的聪明和勇气而主要是归于神的帮助。但是我们不能把一个成熟的经济的过分紧张的最初象征——它在连续不断地增长几个世纪后需要一些调整——与完全萧条的各种征兆混为一潭。只引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听到来自塞纳的许多抱怨，在 1346 年之前的 80【384】年间，它承受了严重军事失败、在公共支付方面的 10 倍的增长、最大的银行的倒闭等一系列灾难，然而它仍在进行贸易和战争，并在最后的 10 年斥资建设了两个建筑来纪念它的辉煌，好政府阿姆布诺吉奥·罗雷泽蒂壁画和

兰多·蒂·庇厄的新大教堂工程——以使它的对手佛罗伦萨的大教堂黯然失色。是黑死病杀死了罗伦泽蒂并永远中断了大教堂的建设。

实际上，14 世纪中期的危机让所有的商人绝望的说法有些夸大。在北欧，战争的花费和不寻常的消费将产生严重的现金短缺，尽管随着人口的减少人均占有量应该增加；在意大利也偶有短缺，但是对现金更精确的控制降低了这种影响。为了走出经济风暴，一个佛罗伦萨人的贸易手册在 1442 年提供了下面的良方："永远不要急于向稀缺的地区汇款，也不要从丰富的地方撤资……但是为了在那些稀缺的地方卖到高价拥有现成的资金，应该事先汇款……因为你必须考虑到丰富会紧随稀缺而来。"对那些缺乏现金的商人阶层而言，杜布罗弗尼克（拉古萨）的小册子《论商业和理想的商人》是一个充满热情的贡献，他在 1458 年提出以下颇富英雄主义色彩的良方："当一个热那亚人由于命运不济而贫困时，他就成了一个海盗，对许多加泰隆人而言也是如此；佛罗伦萨人则会自力更生地成为经纪人或某一行业的工匠。"在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 5 年之后，上述说法只是见证了许多顽强而普遍的与一切不利条件抗争并仍坚持不放弃商业决心中的一个。1453 年后 40 年的恢复期加强了这种决心，使人想起了"稀缺后丰盈"的判断。

尽管如此，选择 1453 年作为以罗马帝国崩溃为开始的一章的结束看来也还是合适的。无疑早就预期到的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没有产生一个经济激变——与土耳其人做生意总是有可能——但它标志着地中海从它的贸易中心位置的下降，而这只是它最终把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转给北欧一系列事件中的第一步。

5.3.2 地中海为贸易中心的最后世纪

历史的最大悲剧之一是 1348 年的黑死病，它撞开了事先已有其他凶兆的萧条的大门。不少于 35%，有可能多达 65% 的人口死于这次瘟疫。死亡【385】率在意大利不高，但是对这个国家城市的命运最重要，因为城市是商业扩张的先锋。在城市化程度最深、农业人口发展得最密的地区，通行税也最重——这意味着经济世界的乳酪被撇去了。黑死病也不是这类灾难中惟一的一种。这种瘟疫反复地发生，使一代又一代的增长化为乌有。

9、10 世纪自蛮族人的最后的一次袭击浪潮以来，战争持续的时间更长，破坏性也更大了。法兰西的百年战争，卡斯蒂尔和南意大利的内战，雇佣兵的抢劫与北意大利和南德意志的无数地方性战役完成了自瘟疫开始的破

坏性工作，又为饥荒的发生作了准备。其他的无法估计的原因——其中我们可能必须将生育控制包括进去——阻止了经济的快速恢复。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16、17世纪前再也没有达到过1300年那样繁荣的水平。比如佛罗伦萨的人口，从1338年的110 000人降到1351年的45 000～50 000人，在1380年只增加到70 000～75 000人，可到了1526年仍然是70 000人。意大利北部的小城墨德纳，1306年大约有22 000人，到1482年大约只剩下8 000～9 000人（多伦）。苏黎世（Zürich），我们没有它在黑死病发生之前的数据，在那里1350年有12 375人，1468年只有4 713人了（克勒—艾谢尔）。1367年蒙特皮里尔有22 500人，到1379年降为5 000人（盖梅因）。法兰西战争是比黑死病和后来的瘟疫更坏的灾难，而且最终把犹太人驱逐出这个王国——他们被指控传播疾病——这整个地扫除了一个虽小却很有用的商业团体。对德意志来说，足以记起在1348～1350年后的14世纪后半期仍有14次主要的瘟疫。只有加泰罗尼亚有一个短期的恢复。事实上，在14世纪中期后它的商业发展达到了顶峰。在1359～1369年间有地产的家庭数量从86 895增加到95 258。但这个数字在1378年跌到77 973，到1497年低于60 000这一基准（范德洛斯）。

一个当代的作者把黑死病的传播归因于钦察人蒙古汗对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殖民地卡发（Caffa）发动的“细菌战”。他说，这个蒙古汗，努力要打破被围居民的抵抗，为此把死于这种瘟疫者的尸体用弩炮发射到城墙上。[386] 城市虽然守住了，但是返回的殖民者把这种病带到了西欧。假若确如他所说的那样，卡发的围攻［在这之前的塔纳（亚速海）有一场对意大利商人的集体屠杀］就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这是整个蒙古国家的状况突然恶化的事例。钦察人与卡发媾和了，但是几年后他去世了，之后蒙古就处于无政府状态。意大利人在波斯可汗国蒙受了更严重的打击，在那里他们的利益曾经在几十年内增长到他们在拜占庭帝国几个世纪所获得的一样大。1339年阿布·萨义德可汗的死标志着这个对外国人最友好的国家的分裂。塔布里兹这个最重要的城市，被一个暴君夺取，他屠杀和抢劫那些信任他的许诺的人。同样的灾难在突厥斯坦汗国内也发生了，它是以在首都阿尔麦莱（Almaligh）对欧洲人大屠杀开始，以整个国家的崩溃结束。只要在中国仍有友好的蒙古可汗，一些意大利商人就会继续通过走曲折的线路来实现到达这个国家的愿望。但是，中国可汗也被内部的混乱所瓦解，并在1368年被民族性的明政权推翻。新的统治者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心思穿过亚洲大陆或印度洋这段漫长的路程与欧洲保持联系。15世纪，中国战舰和商人的帆船的确向西航行

一直远至阿拉伯海岸，不过这些船并没有到达欧洲商人经常到达的海岸。

现在，由于蒙古统一亚洲而向西方人开放的无限机会已不复存在了。远东的商品，再一次，必须通过埃及的瓶颈和穆斯林中间人才能获得。威尼斯从1323～1345年没有向埃及派过一次船队，现在也不得不请求教皇取消禁令，请求苏丹缔结一个新的商业条约。教皇只把个人护照颁发给能支付高额费用的人，苏丹也高兴地开始对基督教商人进行剥削，其程度比至此为止的任何手段都要剧烈。为圣地的最后堡垒而进行的苦苦斗争和随后而来的欧洲人为了蒙古市场而放弃埃及，使得容忍的幼芽枯萎了。而且埃及本身由于自身的暴政和为了生存既反蒙古人也反基督教徒而进行的两场战争的消耗而贫穷，它的船也不再航行到亚丁（Aden）以远的地方。印度的船只把远东的货物运到这个港口，这无疑增加了埃及人的成本，在15世纪，甚至还有中国船来到这儿。为了给自己财政和商业上的萧条寻求一点补偿，埃及人开始迫不及待地利用地理上的垄断位置对与欧洲的贸易进行大肆盘剥。【387】

随着埃及财政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在亚历山大的欧洲商人不得不以更艰难的条件进行贸易。到14世纪晚期，由他们必须支付的各种赋税累积几乎可达商品价值的100%。1428年，苏丹从埃及私商手中接管了对胡椒粉出口的垄断，在亚历山大，它的价格从80第纳尔提高到130第纳尔。更坏的情况还在后头。1480年，威尼斯商人拒绝为买1斯波塔（*sporta*，合大约480磅）胡椒粉支付110达克特，因为集市上它只卖到50达克特，苏丹把他们禁闭在旅馆（fondachi）里2天3夜，然后把他们拖至海关，直到他们为这批胡椒粉支付了70达克特最后才放他们离开。这事发生在当时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的支持、并在亚历山大拥有两处领土外的旅馆而享有特别对待的威尼斯商人身上，可想而知，其他商人团体的处境一定更差。只有相互的依靠和恐惧才能阻止一种很紧张的关系破裂。苏丹需要基督教商人购买它的商品，也从经验中知道，他们是不能激怒威尼斯的，否则就面临严重的军事报复。威尼斯和其他的商人需要穆斯林提供给他们东方的货物，也从经验中知道，埃及能够被打击但不能被制服。因此，尽管有持续不断的冲突，威尼斯在亚历山大的商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虽然可能不像所宣称的那样大——通常以不完全的统计为基础，而且对1346年前的数据少有提及。

更不祥的阴云进一步向北方聚集。从14世纪早期开始，奥斯曼土耳其一直在侵蚀拜占庭在亚洲的领地。1352年，他们在热那亚人的帮助下获得了一个立足点——因为热那亚人在反对威尼斯人时需要战略联盟。在14世纪结束前，他们在与热那亚联盟关系没有破裂时差不多征服了整个巴尔干半

岛，然后与威尼斯人交锋。虽然他们不必对外国贸易和外商表示敌意，但他们肯定不喜欢让西方人保持拜占庭衰弱时从其手中抢劫的特权。在这儿正如在埃及一样，商人试图采取绥靖政策，因为这样比战争所费要轻得多。有些殖民地甚至以纳贡的办法来求得免受袭击。但是，当奥斯曼土耳其开始封锁君士坦丁堡时，欧洲不得不进行反击。此时，在亚洲腹地出现的帖木儿击败了土耳其人，他得到西方人甚至包括遥远的卡斯蒂尔国王的称颂——这个国王还向他派出大使。尽管他的军队的到达给意大利的殖民地带来了破坏，但帖木儿似乎像是又一个成吉思汗（Chinghis Khan），通过破坏来恢复和平、通过他们臣服的广大领土上的和平来恢复商业。但是征服者在 1405 年死去，土耳其人继续前进。这些对君士坦丁堡商业造成影响的事件的复发，可以从对热那亚人的帕拉郊区的海上贸易的征税报告得到判断。它们从 1334 年的 1 648 630 盾降到 1391 年的1 199 046盾，到 1423 年的 234 000 盾。假如我们把热那亚镑的重量和购买力的不断缩小也考虑在内，这种下降会显得更明显一些。[388]

这样，东方市场的收缩和国内市场的萎缩使商业革命逆转的趋势成为可能。情况对南欧商人向北欧的扩展也并不有利，因为北欧也遭受了瘟疫和持续的战争煎熬，而且，前一时期的商业革命使相隔遥远的地区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因而使得他们更加互相依靠。国际货币市场的波动——比如热那亚镑的下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着广泛的反应，因为绝大多数信用和商业操作卷入了外汇交易。可以肯定的是，银行家和商人都在努力预测这种趋势：比如在 1265 年，一个塞纳商人从托尼斯向他在伦巴第的同胞提出警告，说法国货币在意大利的价格可能下降，因为安朱的查理正在准备一次远征。再到后来，当商业边际利润和利息继续下降时，汇率难以预测的变化已能使一个本来成功的商业操作难逃失败的命运。

尽管那时从未存在过一个“统一的世界”，但确有一个灵敏的世界市场，它对远方国家的危机能做出迅速的反应。比如，地方困难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佛罗伦萨布业下降如此剧烈，以至于 1378 年造反的织工要求业主应该保证至少每年24 000 块布的产量——这还不到 1338 年产量的 1/3。在诸多原因中，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蒙古汗国崩溃之前，威尼斯和热那亚出口佛罗伦萨布的波斯市场现在丢失了；百年战争前作为奢侈品的巨大消费者的法国贵族的贫穷；战前作为基本原材料英国羊毛的出口的缩减；与战争密切相关的佛罗伦萨最大的两家商人—银行家公司巴尔迪和佩鲁茨的破产。也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现，与佛罗伦萨手工业之间存在联系的其他的更远地区发[389]

生的事件也导致了它的衰落。世界范围的不景气必定形成了动荡的社会背景，这在14世纪后半期，搅动了从伦敦到塞洛尼卡[①]，从马略卡到佛罗伦萨的整个欧洲，使之受到影响，尽管在仔细地观察任何一个动乱时，我们只能察觉到它的地方性原因和地区特点。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全欧洲的萧条，因此，我们必须要用全欧洲的原因来解释它。尽管中世纪的最后一个世纪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但透过一系列杂乱事件发现一条主导性的线索不是不可能的。

也许，最具误导性的因素——对此14世纪的人比我们更容易受到误导——是紧随最初灾难而来的一波明显的繁荣。虽然这些灾难很可怕，但它们打击的是一个能做出积极应对的强壮肌体。在黑死病之后，在百年战争的开始阶段、1350～1357年的热那亚—威尼斯—加泰罗尼亚人的冲突和其他更小的冲突之后，有一个对商品需求的明显增加。死亡自动地增加了人均货币的拥有数量，并引发了人力的短缺。靠工资过活的人能够要求更高的收入——假如不是以购买力而是以货币的形式——负债者和佃农发现，缴纳他们所负的债务变得更容易了。从农村来的一股新的移民潮满足了城市对劳力的需求，还没有获得自由的农民用钱购买了自由。农民为购买自由所支付的费用使领主增加了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购买力。后者能支付更高的工资是因为他们的销售更多了——不仅对地主而且对劳苦大众和其他由于通货膨胀而有余钱去花费的人。大众消费的增加减轻了竞争，在黑死病开始前的最后几年，这种竞争曾严重地限制了商业利润。

不幸的是，这种源于通货膨胀和能生产的劳动力减少的繁荣，并没有持续多久。即使它的基础更坚固，瘟疫的复发和战争的连续性和反复性也能使其提早结束。当各阶层的劳动力都得到比较充分的满足并能确保为缓慢却稳定收缩的市场充足生产时，领主和手工业者在工资方面被“击倒”了。工人、小手工业者和小农们绝望的暴动无法扭转这种潮流。农民至少没有失去他们的个人自由，但是城市下层阶级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景况与黑死病之【390】前相比每况愈下。正是他们承受了工业家采取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措施来补偿销量缩小而造成的负担，在纺织业尤其如此。通过对工人更严密的监视，对技术错误处以罚款，雇用更多的女工和培养来自农村非熟练的劳力，在生产的最初阶段采用外包生产的体制，以及招揽由于经济危机和政府不稳定而被从佛兰德驱逐出的手工业者，意大利布商得以勉强度过困难时

① 希腊中北部海港城市，紧临塞洛尼卡湾。——译者注

刻。但是，生产过剩自商业革命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灾难。欧洲各地的行会逐渐加强对成员数目的限制，新入会的成员现在只能享有有限的生产机会。

在商业领域，黑死病前就已开始的"合理化"进程大踏步前进了。随着在黎凡特的许多集市对欧洲商人的关闭和欧洲的集市的逐渐迟钝，引用15世纪的一本商业手册上的话说，供货数量的主旋律变为"仅是他在目的地所能出售的那么多"。人们也不总是能够买到所需的东西。靠海上和陆上冒险就能迅速发家的时代结束了。只有那些坐贾才能制定长期计划，因为他们有无数雇员和委托代理人的帮助，可以耐心地等待投资带来的难得的利润。在意大利，5%～8%被认为是商业贷款中比较合理的利率。难怪商业把资本和人力让位给了其他形式的活动。虽然银行的规模扩大了，方法改进了，但它们把资本的更大部分用于向游手好闲的上层阶级贷款，也更经常地向交战国提供贷款。比如热那亚人的债务投资，在30年内增加了10倍。而且越来越多的商人退出商业领域投资地产，或把大量的钱用于奢侈性的消费，成为新的"中产阶级贵族"的成员，他们很高的生活标准在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的《朝臣》中有描述。可以肯定的是，这并非一种新的趋势，不过比以前加深了。它留给商人阶级持久的差距，因为除了借助战争赢利外，新人很少有发财并代替旧商人成为新贵族的机会。同时，地方共和这个意大利商人阶级最高权力的体现形式，现在也被暴君推翻了，并被置于自私自利的寡头统治之下，或是被内战撕得四分五裂。[391]

这种状态危险地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加强了商人和工业主基本上只讨好一部分富裕消费者的倾向。丝绸在那些布生产衰落的中心出现，这是一种朝向奢侈手工业发展的很有意义的说明。其他的使人振奋但令人警觉的象征还包括手工业品的进步和无比辉煌的宫殿的建设。在佛罗伦萨，虽然纺织业衰落，人口减少，但美第奇家族在15世纪拥有的钱财高达500 000达克特。除了少数极端富裕的家族外，2/3以上的纳税者在1399年的纳税额不超过1个弗罗林，有3 000个穷人在1428年因收入太少而不能纳税。恶劣的经济趋势和统治寡头的敌视使这些无产者的日子比在商业革命开始阶段更加难过。在资本主义发展得更缓慢的城镇，下层阶级的前景也并不比无产者更光明。1424年，巴尔有22.5%居民没有最低可纳税资本，即10弗罗林；到1453年，这个比率上升至32%。与之形成对比的是，5%的人口拥有这个城市半数以上的财富。即使在上层，不平等也越来越深。在威尼斯这个到中世纪末期仍是欧洲最富裕的城市，7个富裕的商人贵族在1329年做的一次纳税申报表明，每人的财产达140 000～240 000达克特，差不多有400个

贵族的财产在 12 000 达克特以上。但是 800 个贵族由于只有 1 200 ~ 12 000 达克特而生活在体面的贫困边缘，成百上千的人收入比这更少，无疑属于贫穷之列。与政府关系好并得到其帮助最多只能使很少一部分贵族重新夺回他们的财富，但是大多数家族衰败了，地位越来越低。在法兰西，百年战争在带来普遍的悲惨的同时也带来了加剧的不平等。如果说宫廷经常要显示豪华，如果说一个叫贾克斯·科尔的人聚敛了 500 000 金艾卡斯（*ècus*），那么，肯定有大贵族每年花销不超过 20 克朗。多数农民和手艺人的处境更是令人震惊。

但是，假如这些事实有助于让我们不再简单地将 14 世纪晚期和 15 世纪早期作为从 10 世纪晚期开始的经济扩张的延续，我们也必须十分谨慎不要过分强调这幅图景的黑暗一面。尽管不利条件的组合阻止了商业前进的车轮，但是整个商业革命期间在商业技巧方面的进步并没有失去。实际上，必要的萧条是更大的改善和合理化准备时期。即使商人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392】他们向南在非洲，向北和东北在欧洲开辟了新的疆土。而且，从前落后的一些南欧国家也已感到了商业革命的冲击力。最后，甚至最大的灾难也是某些人赢利的源泉。

比如，战争会刺激武器贸易。我们知道，达蒂尼的财富就是以阿维格农的武器贸易为基础建立的。在发达的丝绸生产出现之前，米兰甚至发现金属冶炼业也可以补偿呢绒业的衰落。我们听说在 1427 年单是两个米兰的武器制造商，假如遇到紧急状态，就能在几天之内提供 4 000 名骑兵和 200 名步兵的装备。由著名的米萨格利亚武器厂商生产的一套普通的盔甲，批发价是每件 200 镑。

在法兰西，混乱扫除了普通大众的微小的福利，而少数人的保险箱堆积了史无前例的财富。一个来自布尔日（Bourges）的商人贾克斯·科尔，他把蒙波利埃作为他的第二故乡，地中海贸易成为他的重要活动，他爬得比谁都高跌得也比谁都快。许多比他知名度低的人也发现，战争是比和平贸易更容易获利的累积资本的途径。图卢兹的琼·阿米奇（Jean Amici）与军官勾结做从英国虏获战利品的交易；鲁昂的珍马歇尔通过各种非法投机和公开与英国人合作的方式累积了大量财富；吉尧姆·德·圣扬获取暴利的手段是以膨胀的价格向巴黎富人卖肉。其他的商人或靠为王室提供商品或靠帮助法国国王为其羊群剪毛致富。一些人一旦觉得他们的财富可与封建贵族相当就知道如何从商业中隐退。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图卢兹的伊撒尔奎尔家族，他们也许是农民出身，但是他们以管理犹太人被充公的财产和在其他方面为国王服

务而发财。不久他们就觉得继续干货币交换、买卖草料和其他低贱的货物这样的事有失尊严。他们购买土地，成为朝臣，只同地方贵族交往。这种态度直到18世纪在法国商业界仍很普遍，即使在今天也不特殊。但是也必须强调，在百年战争期间法兰西王国对任何想大规模地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来说没有多少前途，甚至地方贸易这个法兰西商业经济的主流，也经常由于交通的[393]受阻和缺乏可出售的剩余品而受到损害。

财富，即使在英法战争不同阶段的间歇期其失去也比得到快得多，花在奢侈品上的消费也比在生产上投资的多。人口的下降迫使一些工业中心不理睬行会的规章而鼓励熟练和非熟练的手工业者的移民，但是总体的短缺不能得到补救。香槟集市在南方人与布鲁塞尔和英格兰建立直接联系时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性，当国际交通穿过德意志以追求更安全的路途时也绕过了它；圣丹尼斯古老的集市被废弃了好久；里昂的集市为了与日内瓦竞争在战争结束前不久建立起来了，但是发展得较慢。靛蓝贸易和组织良好以利用水利磨房的公司给了图卢兹及其周围地区新的发展推动力，但是地中海海港并没有从挫折中恢复。显然，1378年的纳邦纳，其人口不超过1 000人。由于与英格兰的联系，一些在14世纪飞速发展的大西洋海港——波尔多、拉罗切尔，鲁昂——在战争比较多时相对的富足，但是它们的财富几乎与南方贸易的历史没有任何关联。

只有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像法兰西一样彻底地为战争所困扰。在巴尔干地区，拜占庭之后出现了一些斯拉夫国家，这些国家的商业一度出现非常活跃的增长，增长很快被无情地中断，不过，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个主要作为土耳其人和基督教西方的中立中间人的海港：达布罗弗尼克。它的角色让人想起中世纪早期的威尼斯；但是达布罗弗尼克的商人从不能也永远不会去用军事控制海上，他们也不能从他们残破不堪的内地找到任何像威尼斯在中世纪中期从发展的意大利得到的经济支持。对这个小达尔马提亚人的城市来说，能在两个更大的邻居，土耳其和威尼斯之间展开自己的旗帜已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加泰罗尼亚的起点要早得多，它还拥有更多的人口和军事资源，并从威尼斯和热那亚两败俱伤的战争中获益，这就延长了并有可能增加了它在1346年后的商业繁荣。加泰罗尼亚人实际上能够在几年内把所有的其他欧洲商人挤出西北非洲的商业之外，他们在黎凡特成为意大利人的重要的竞争者。最初，他们的方法和精神明显地落后于时代。他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芒塔纳，一个“殖民地的开拓者”，用带着对中产阶级社会有点鄙视的口吻[394]说“他们不知道荣誉的含义”。水手和海外定居者有着早期十字军的粗鲁、

野蛮和无法无天脾性，但却没有后者深沉的宗教信仰。加泰罗尼亚的法律仍然对那些不能向债主还清欠款的货币兑换商处以死刑（death penalty）；在1360年，一个不幸的兑换者在他的银行门前被砍头。狭隘的、保护性的立法阻碍了巴塞罗那在中世纪末的发展，最后使瓦伦西亚获得了更多的国际客户。但是商业的技巧取得了飞速进步，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意大利。有位学者发现，1332年巴塞罗那的一份合同更类似于现代的两合公司而不是同期意大利最常用的康孟达合同或 *compgnia* 合同。加泰罗尼亚的银行体系由较小的资本支持，但它发展得很好：巴塞罗那的公共银行出现的时间早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公共银行。14世纪中期的犹太人——梅杰卡绘图员所绘的地图与稍早时期的热那亚和威尼斯的绘图员所绘的一样精确。纺织和陶器生产已是相当发达。

但是在加泰罗尼亚的海港中没有一个曾建立起像威尼斯和热那亚那样宽广的商业网络，它们的衰落在15世纪前期就已经明显了。1387年它们把在黎凡特这个雅典的公国的主要基地丢失给了佛罗伦萨的阿亚奥力家族。不久后，它们又把对西北非的准贸易垄断丢失给意大利城市。它们的衰弱可部分地归因于长期松散的纪律，但首先是它们人口数量过少的缘故。巴塞罗那的人口在14世纪似乎不超过30 000～35 000，而且大部分是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并不经商的人。瓦伦西亚和帕尔马就更少了，犹太人、托斯卡纳人和热那亚人在他们的贸易中占有一个较突出的位置。这些城市的腹地并非由商业活动繁忙的城镇组成（就如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腹地一样），那里是一个由贵族和农民组成的有待发展的王国。14世纪——某种程度上直到今日也是如此——加泰罗尼亚海岸像一个泥草建筑的镀金表面。

加泰罗尼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这时葡萄牙和卡斯蒂尔，最初是在一些热那亚军官和商人的帮助下，正在开辟大西洋南部和西部的路线——这些路线注定要为它们在世界文明史中赢得杰出的地位。直到14世纪晚期，葡萄牙为数不多的远程贸易的大部分转向了北方，特别是转到佛兰德、英格兰和诺曼底——这超过了本章的论述范围。但在15世纪，航海家亨利王子改善了那些沿西非海岸的著名航路，这就使得一些葡萄牙海员和商人得以依靠从阿拉伯商人手中购买帕罗拉的金沙或通过购买及虏获黑奴而累积了一定数量的资本。毛里塔尼亚海岸附近的阿尔吉恩小岛成为这种官方资助的远征的主要堡垒，但是它也面临着更先进但更孤立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的竞争。葡萄牙人也在亚述尔群岛和马戴拉登陆，从那儿引进了甘蔗。诺曼冒险家在卡纳里的一些地方建立了基地，这里在14世纪已经有热那亚和葡萄牙人来 【395】

过，并曾以卡斯蒂里国王的名义进行统治。

上述功绩和其他的胜利一起成了世界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然而这些成就对葡萄牙和卡斯蒂里贸易的直接影响小得令人吃惊。虽然最近的研究对这个国家在中世纪后期的进步有了新的认识，但它们没有驱散卡斯蒂尔和葡萄牙总的来说人口很少和欠发达的印象，这两地的收益也不能弥补全欧洲范围的危机对他们的影响，而且危机还由于对犹太人和穆斯林少数群体不断恶的态度有所加重（尤其是在卡斯蒂尔）。农业在各地都占突出地位，而且它劳力短缺。葡萄牙主要向北欧出口盐、油、软木和酒。另外，它的渔业养活了相当多海员，其商业技巧比卡斯蒂尔更新。卡斯蒂尔比葡萄牙更大，可它对国际海上贸易的开放程度更低，这里有着各种更丰富的植物和矿产品，但只有其中两种的生产有多余可供出口。15 世纪，卡斯蒂尔几乎是不正常地发展起了高质量羊毛的生产，这些羊是由本地羊和非洲美利奴羊杂交的。最大的享有特权的牧羊人公司——梅斯塔公司，在 1447 年拥有 2 694 032 只羊，在这个王国内差不多每两人就有一只羊。然而英格兰这个以前最大的羊毛出口国，为了提高它的纺织业，减少了羊毛的出口，卡斯蒂尔选择了相反的发展路线；这样它征服了意大利的羊毛市场，但却完全错过了成为最大的布匹生产和出口地的机会。铁，是卡斯蒂尔另一张（也是更老的）王牌，也是巴斯克（Basque）的特别财富，在 1293 年出口大约 4 500 吨，主要面向北欧，并在随之而来的更艰苦的时代里维持了一个较活跃的增长率。到 15 世纪，许多巴斯克的商船经常航行到地中海。对这个边缘地区来说，把它的发[396]展速度传递给王国的其他地区是不可能的——在这些地区商人阶层特别少，由一些被伤害的犹太人危险地控制着一些关键的位置。一个有创新精神的商业社会是无法临时拼凑而成的：当探险能赢利时，葡萄牙和卡斯蒂尔不得不转向德意志、意大利和其他的外国商人那里寻求资金和经验，它们从没有很好地弥补因着手太迟而导致的劣势地位。

15 世纪，发展最快的地区在欧洲的心脏。德意志的南部和瑞士的小镇，商业和手工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首先是纽伦堡，还有奥格斯堡、乌尔姆、巴尔、朱里克、斯特加尔、日内瓦和其他许多的城镇。小城拉芬斯堡的“大商业公司”，于 1380 年左右建立，在 21 个国外中心像毕尔巴鄂、佩斯特、威尼斯和布鲁日都没有分支机构。拉蒂斯邦似乎在 1380 年左右达到它的顶峰后开始走下坡路；维也纳，在强大的哈布斯堡保护下快速发展，夺取了部分贸易，奥格斯堡和乌尔姆的一种粗斜纹棉布使拉蒂斯邦制造的“米兰”粗斜条棉布相形见绌。德意志北部的黄金时代在 15 世纪中期后来临，但是在

1447年仍然有类似孔斯坦塞（Constance）的芒德普拉特叔侄那样的人，他们与米兰、热那亚和西班牙做生意，累积的征税收入达到132 424镑。

让我们稍停片刻来考察一下纽伦堡快速发展的情况。假如只从最杰出的商业公司，霍尔兹苏赫尔公司的账本来判断，在14世纪早期，这个城镇还没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性。公司的顾客是纽伦堡的居民，也就是居住在方圆30英里内的人们。他们大多数是买佛兰德布的贵族和中产阶级或者犹太人，他们以平均94%这样高得吓人的利率借进高利贷。我们也许会好奇，犹太人向那些从他们那里借贷征收的利息是多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比纽伦堡的合法利率43%要高，43%的利率在佛兰德也是被普遍接受的，但比在许多伦巴第的城镇允许的要高出2～4倍。纽伦堡在这一时期（1304～1307年）生产亚麻和铁器，不过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出口中心。然而到了1332年，它的居民已在69个城市享有关税豁免权，之后不久，由它制造的武器就被西班牙、意大利和佛兰德提到。纺织品生产也加速了。在威尼斯，来自纽伦堡的商人逐渐地追上了所有的其他德意志城市的商人。15世纪早期，纽伦堡商人与吕贝克的委托代理机构建立了联系，并且还在很多时候跑到这个汉萨同盟的大海港去居住。他们把波罗的海的鲱鱼进口到扎尔茨堡，把波兰的【397】牛运到美因河（Main）畔的法兰克福。在15世纪中期以前，他们把贸易扩展到了东普鲁士，不久就到了立窝尼亚。这样就与汉萨商人在其势力范围内展开竞争。他们把东方的香料和西方的纺织品销售到意大利大商人很少到过的内陆。纽伦堡成了一个东中欧与莱茵河流域、地中海和北部海域之间的陆上交通中枢。

一般认为，德意志人的贸易浪潮是基于他们超人的技能，但事实的真相是，到15世纪末德意志人的商业技巧比起意大利和加泰罗尼亚人来还相当原始。甚至在后来，虽然奥格斯堡的大银行家利用的资本比佛罗伦萨公司在早期利用的要多，但他们几乎没用更现代的办法；而且他们更狭隘地坚持把不属于他们家族的人排除在重要岗位之外的传统。普遍的国际状况也许是德意志南部资本主义崛起的更主要的原因。战争和与黎凡特连续不断的贸易逆差增加了对贵重和非贵重的金属的需要，而这些是德意志南部和奥地利的主要资源。而且，商业革命传至中东欧，从波兰到匈牙利，这使德意志南部处于一个不断扩大的前线的大门。最后，法国的混乱和意大利以及佛兰德的灾难阻挡了经由莱茵河谷或西阿尔卑斯山横穿大陆的交通，使通过东阿尔卑斯山的路线成为可能的最佳选择。位于勃伦纳关隘意大利那一面的城市的进步——维罗多、特兰托、波尔扎罗、美拉罗——是这种趋势的进一步证明。在

14世纪前，很少有意大利的大商人认为值得渗入德意志集市，这一状况为远程贸易商这个相对不大的群体在从莱茵河上游到多瑙河下游和阿迪杰（Adige）河上游的每个城市提供了增长空间。一旦新的机会来到，这些人早已经准备就绪。

认为意大利在中世纪的最后一个世纪已经失去了它的黄金期是错误的。尽管有着我们所描述过的那种不断增加的困难，意大利城市仍以它的辉煌使所有的外国客人头晕目眩，来自意大利的商人和银行家仍高居来自世界其他【398】地方的商人之上。商业技巧的不断进步和资本的不断集中使意大利大商人的影响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弱了。文艺复兴时意大利的经济条件完全可与1870年后英国的状况相比。其他民族的进步逐渐从意大利手中夺取了它对远程贸易的差不多是绝对的垄断，但这种进步也创造了新的领域，商业先驱者们累积的资本和经验能够在这些新领域中被利用并获得利润。假如所有这一切意味着衰落的话，意大利人和它的新竞争者都没有充分地意识到。

银行业、海上贸易、手工业和农业一起在这个商业革命的摇篮中繁荣。美第奇银行在1430～1480年这段时间是欧洲最大的金融机构。它的活动遍及欧洲各地、黎凡特和北非，不仅进行金融活动而且还有奢侈品和大宗产品的贸易，控制了一些纺织业工场并垄断了明矾矿的开发。许多佛罗伦萨和意大利中北部城市的其他银行也有着巨大的资本和世界范围的商业联系。另一方面，威尼斯，作为一个商业中心肯定超过热那亚，无疑是西方世界的第一大港。大量精确的统计数据——来自多哥·托马索·莫塞尼戈提供的1423年的官方报告——估计，威尼斯在亚德里亚海之外的海上贸易仅出口一项每年就达1 000万达克特，进口也一样多。1/4以上的出口是与米兰公国进行的。这个公国的首都和其他的城市——在这方面科默占第一位——通过威尼斯出口的布就有48 000匹。更便宜的粗斜纹棉布，曾是伦巴第大多数城镇的特产，现在仅在克里莫纳一处是个重要的行业了；不过，单这一个小镇的出口每年就有40 000匹以上。即使假定这个数字稍有夸大——考虑到许多布也通过热那亚或阿尔卑斯的关隘出口，而且德意志商人还直接来伦巴第的一些城镇购买——其生产的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但是，丝绸正在变成一个比呢绒生产更重要的产业。从突厥斯坦和中国进口原材料的减少并没有令意大利人气馁，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发展了养蚕业。意大利北部，至今仍是欧洲最大的生丝产地，这时还没有获得重要地位，虽然它的农业在一段时期内远远超过其他欧洲国家。许多从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来的丝，经由墨西拿海港【399】运到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生产者手中。这些地区也生产一些棉花和少量的

糖，这样，黎凡特的供应越来越困难这个最初不利的条件，结果却转为他们的利润来源了。藏红花曾是黎凡特的特产，但到了13世纪也在阿拉贡和托斯卡纳东部种植，这时差不多完全只从意大利购买了，阿布鲁齐这个山地省成了最大的产区。正是由于这种贸易，小城阿魁拉迅速地发展成一个大商业中心，经常有北意大利人、德意志人和达尔马提亚商人前往。

意大利人并不满足于发展国内市场，他们继续向海外扩张。在西欧的每个重要城市，从里斯本和卡迪兹到伦敦和布鲁日（后来，是安特卫普），意大利人迅速地建立起定居地，这些定居点既可作为国内公司的代理也是那些欠发达国家的商业的促进者。这样，意大利人就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了他们以前很少去过的地方。在德意志和奥地利，意大利人凭借自己的资金、组织机构和商业技巧与当地从事银行业和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展开竞争。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王国，这时第一次完全地进入了商业经济圈，意大利人把西方贵族和中产阶级早就熟悉的衣饰和食品方面的奢侈品引入这些国家。他们承租盐矿、铸币厂和海关税收。即使这些意大利人成为外国的公民，他们也总与自己的祖国保持紧密的联系，许多人在退休后又回到故乡安度晚年。在黎凡特和非洲这些他们扩张的最古老的地区，他们还根据变化的环境对贸易方式进行了调整。因为这些殖民地不再是与远东直接贸易的跳板，意大利人加强了对当地资源的开发并部分地把他们的商业活动从奢侈品贸易转到便宜的大宗商品上来。在非洲和高加索，他们不得不学习如何与那些从未用过欧洲生产的精美产品的欠发达的民族进行贸易。这样做确实有利可图，尽管某些失望也是在所难免。1447年，一个热那亚人带了一些质量上好的布到达塔亚特绿洲这个撒哈拉沙漠的深处。他希望把这些布卖出去以换得一些好的黄金国的金沙。但是黄金国还在更远的地方。塔亚特的黑人却是全身赤露！这个不幸的开拓者不得不把非常糟糕的消息告诉给他的债权人，在信中他描述了自己的不幸。但是几年后，一个佛罗伦萨商人——他并不是寻找黄金国，却在尼日尔的蒂姆布克图发现了销售价格低廉的伦巴第布的非常好的市场。

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15世纪意大利人个人的开拓精神，他们在非洲的周围和内地没有海军力量和国家政权干预的支持，不得不认真对付葡萄牙和卡斯蒂尔的新的殖民野心。尤其是葡萄牙，虽仍向意大利海员提供工作并 [400] 赐给采邑，但在他找寻通往印度的道路时主要依靠的还是自己的臣民和他们自己定的计划。尽管在黎凡特，许多意大利的殖民地与它的宗主国脱离了关系；但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力量仍然停留在地中海南部和黑海，而且其实力

即使不能说是未受到挑战，也还是可靠的。并且它的古老的与某些高加索地区交易的主打项目仍是十分赢利的：意大利商人带来了盐和粗糙的衣服，这些都是被当做钱使用的，带走鱼子酱和奴隶，这些东西与埃及交换时比黄金更宝贵。但黑海大部分的贸易既不是与落后的民族也不是与那些破败的拜占庭城镇进行的，贸易的对象是年轻的、新出现的东欧国家。卡发，这个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准独立的自治领地的繁荣首都，作为佩古洛提所称“很安全”地通往北京的道路的起点，已失去原来的作用，不过它已成为东南欧最活跃的商业中心，常有金帐汗国的鞑靼人、俄罗斯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光临。在它的人口中，来自世界各地者的数目可能接近 100 000。黑海的西南部是巴尔干半岛的海滨，在这里，多瑙河下游的热那亚殖民者与居住在希腊的威尼斯人和来自达布罗弗尼克和扎拉的商人为了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不断发展的商业展开竞争。对威尼斯人而言，希腊本土和它的爱琴诸岛具有新的价值，他们还重新推动了马尔姆塞、克里特和塞浦路斯的葡萄酒出口。

然而，到了 1453 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了君士坦丁堡——其实，这个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和最后堡垒很久以前就失去了它的商业重要性，但是它的声望不减，依然扼住黑海入海口，控制着从欧洲通往亚洲的最短路线。它的衰落表明，地中海不再是意大利商人控制的内湖，也没有一个意大利政权会全力以赴地去恢复自己在这里的控制地位。经济史中不存在突然发生的变化：意大利仍是经济强国，而且随后一个世纪崛起的另外两个强国，土耳其和西班牙，在本质上也是地中海和南欧的；但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贸易确实[401] 从 1453 年开始就已显露出衰落的征兆。

第六章

亚洲、非洲及中世纪欧洲的贸易

6.1 绪　论

6.1.1 伊斯兰地区贸易的显著特征

中世纪的伊斯兰地区与西欧比起来，是一种高度城市化的文明，它将工业活动中鲜明的地区特性、农业生产和文化生活结合在一起；其经济中心与成功而又受尊敬的商人相联系，与穆斯林世界不同地区的开拓者相联系。它的文明起源于边界之外的地区——基督教徒的欧洲，香料群岛及黑非洲——有许多重要的可以带来财富的基本商品。实际上，伊斯兰地区在经济上对非穆斯林地区的依赖导致了一种新的竞争者的产生。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商业共和国的航海成功使基督教徒早在1200年就获得了对地中海地区的控制。西欧基督教商人繁华社区的产生只是增加了伊斯兰地区的贸易重要性，因为伊斯兰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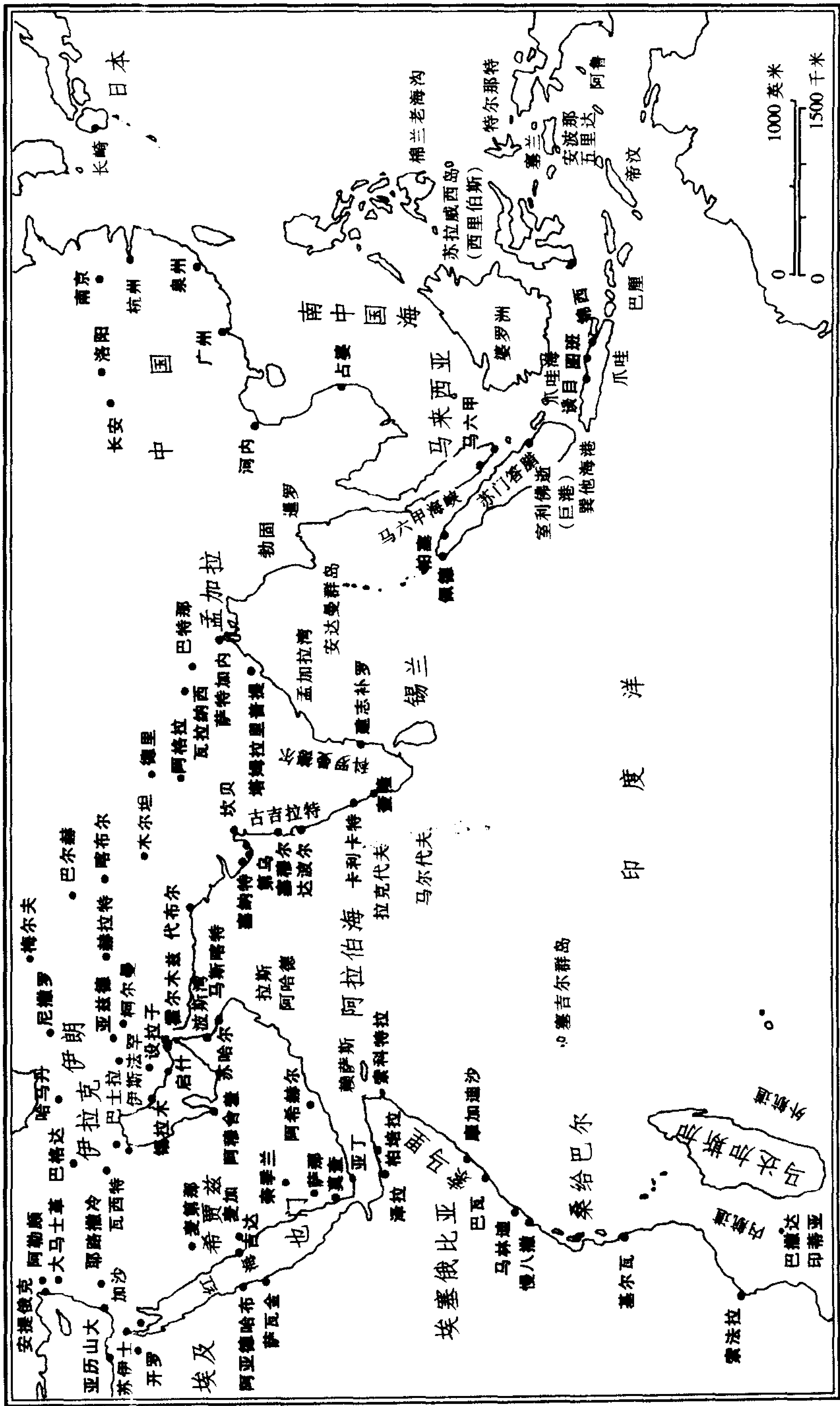
是非洲黄金和印度尼西亚（Indonesia）香料运至拉丁西方世界的新的需求中心的主要通道。换句话说，通过伊斯兰地区通向欧洲的贸易历史，成为穆斯林贸易发展的主要特征。在中世纪晚期，埃及、安纳托利亚、伊拉克也都是西方商人所需要的奢侈品的重要消费者。但贸易甚至贸易组织越来越随着西方的脉搏而变动。因此，富有的埃及香料贸易集团即卡里米（Karimi）商人之所以富有，部分是由于他们在亚历山大及其他大港口的买卖满足了西方对东方香料的需求。

本章力求探索主要的贸易路线，即向欧洲输入黄金和香料，而将纺织品和奴隶输出欧洲的路线。这并不是否定伊斯兰地区内部在整个中世纪的贸易的持久活力。开罗（Cairo）、巴格达处于西方商人的遥控之下；但是即使在【402】13世纪他们处于受意大利人控制之下以后，他们仍然受制于西方人。这时的西方人学到了如何将欧洲商品向东方市场“倾销”的技术，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下，处于衰退中的穆斯林纺织业被扼杀了。[1] 而且，地中海贸易收支逐渐向西欧倾斜意味着北非的黄金在到达埃及、叙利亚、伊拉克这些穆斯林中心之前就被意大利和普罗旺斯的城市吸走并积累起来。伊斯兰纺织业的窒息，黄金往基督教王国的转移，以及绕道穆斯林领土通向香料地区的贸易路线的发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计划好的——是这样一些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基督教商人试图控制异教敌人的货物运输。

伊斯兰边境之外强权的出现无法解释中世纪穆斯林贸易的所有困难。伊斯兰城市文明是对多个世纪的希腊、叙利亚和犹太专门技术的继承，包括从大西洋到马来亚的一个巨大的已知世界，与从前的欧洲外围地区比较起来，它在商业上是落后的：西方拉丁语国家的许多方面如贸易方式、海运技巧及工业技术都超出了公元1100年和1350年伊斯兰的水平。西方的航海语言，以及较少程度上的贸易术语，受阿拉伯和波斯的强烈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人们很容易把这种优势的丧失说成是拜占庭和意大利舰队在中世纪地中海地区成功的结果。更进一步，这种航海优势的丧失本身就反映了穆斯林地区在航海技术上缺乏持久的兴趣——注意，不要将具有罗曼蒂克色彩的现代帆船与在艰难条件下在地中海航运的重船相混淆。相应地，穆斯林纺织业的衰落似乎表明了伊斯兰地区在技术进步方面的投资比西方拉丁语国家更为谨慎。[2] 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发现，在伊斯兰国家很少有组织得很好的、稳固

① 关于这种现象，现在可以参阅伊利雅胡·阿斯托（Eliyahu Ashtor）的最后证词《中世纪晚期黎凡特的贸易》（普林斯顿，1983年）。但是，该书的出版是在本章完成之后。【1】

② 但是，现在认为农业改革的规模被低估了，参见A. 沃森（Watson）：《早期穆斯林世界的农业改革》（剑桥，1983年），第5页。【2】



地图6 印度洋的贸易港口和城市

【403】

的、具有政治影响的商人王国，而同期在意大利的自治城邦中却有很多这样的家族。偶尔，在中世纪晚期的埃及有些卡里米商人家族的财富和影响会持续两三代；这样的家族收益多样化，经营小工厂或购买城市地产。但在穆斯林世界，没有任何人可与欧洲的城市贵族相比，后者在城市政府中享有发言权，与本地贵族有血缘关系，并且在贸易、工业、政治活动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尽管伊斯兰地区城市很富有，但城邦很少，那些在政府拥有重要地位的商人大部分是城市公务员——埃及马木路克（Mamluk）王朝晚期的官僚，印度科拉宫廷的穆斯林就是如此。意大利城市的大家族给它们经商的成员提供经济保护，并且提供了远远超出商界的广泛的行政职位，而这是伊斯兰城镇的流动社会难以匹敌的。[①]

【404】

这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因为伊斯兰城镇是“蘑菇似的增长”——异常快地增长——的产物。在7世纪不到30年的时间里，巴士拉（Basra）居民从零增到20万人。伊斯兰城市如开罗、巴格达或科尔多瓦的商人阶级都不是本地的，就像缓慢增长的，通常有着罗马血缘的西方城市的商人上层阶级一样。从波斯迁移到西班牙的移民刺激了丝绸工业的增长，新的产品和工匠生产者分布在整个伊斯兰地区，这说明地方主义已被破坏，也是自希腊时代的城市扩张以来融入广大地区的表现。就像意大利自治城邦的地方主义一样——是一种以地方为基础的爱国主义，有着强烈的地方根源——它是与对手竞争的强大驱动力。伊斯兰地区地方主义的缺乏使得城市没有商业上的侵略性。它难以与11世纪比萨人的狂热圣战相比。地方主义缺乏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政府干预。马木路克人对贸易感兴趣的原因是贸易占了其国库税收的主要部分；但他们从来没有建设性地为他们的臣民考虑扩大贸易机会，并且从长远角度来看，他们的政策破坏了埃及香料商人的商业力量，比外部竞争还甚。在同时代拜占庭和西西里也可看到类似的现象。因此，伊斯兰地区显然缺乏自治的和武装良好的贸易城市，这一点反映在它们对贸易的态度比西欧更为被动。

【405】

克劳德·卡恩（Cahen，Claude）指出，对剩余生产缺乏兴趣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商业观的一个重要特征。他将这种商业观定义为“投机”和

① 这些思想来自A. 尤多维奇（Udovitch）的论文《没有银行的银行家：穆斯林世界中世纪的商业、银行业和社会》，该文收入由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研究中心编辑的《现代银行业的黎明》（纽黑文，1979年）一书，第255～273页。【3】

"获取"型。① 他使用前面那个词的意思是商人试图以可接受的低价格买进商品，然后以极大的利润卖出去。后者的意思是国家和富人阶级只想从贸易品中获利，而这些贸易就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准和权威（首要是武器）；他们对以贸易和工业作为就业来源不感兴趣，甚至对把它们作为可与进口奢侈品或必需品来竞争的商品来源也不感兴趣。这样的一种经济之所以能正常运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伊斯兰中部地区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黄金供应——在撒哈拉商路上获取黄金是非常便宜的；这个巨大的财路销蚀了发展本地生产中心的兴趣。当将西方的显著改变与伊斯兰的停滞相比时，卡恩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尽管意大利城市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筹资容易的经历——因为它比较容易获得白银储藏——但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文字记载中，甚至在1200年以前，我们就可清楚看到已经用工业品来替代金银条的出口。② 而且意大利北部、普罗旺斯、佛兰德的商人阶级对轻松生活并不看重，而是致力于供应皇宫及城市顾客而不是增加他们本国的国内奢侈品。西方商人在一个从商业上讲更为贫穷的环境中形成，他们比穆斯林商人更具有冒险性和试验性。③

在这点上，不应认为伊斯兰世界商业扩展的能力由于虔诚——也就是遵循伊斯兰的教规，反对高利贷——而受到特别限制。事实上西方商人也经历过同样的限制，他们受到罗马教廷的限制，东西方犹太商人也受到著名的犹太教拉比的规制；三大宗教的商人都知道教规存在着漏洞，这就使得各种信贷交易成为可能。④ 11世纪末，在突尼斯以金币换银币而获利的交易非常活跃；这实际上是为马里凯特（Malikite）教派的穆斯林法所禁止的，但就如罗丁森所言，"每天都有人违犯教规"。伊斯兰世界的非穆斯林经常发现遵循穆斯林的商业惯例比较合适，后者在损失承担的比例问题上，比犹太法律 【406】

---

① C. 卡恩（Cahen）：《中世纪晚期穆斯林世界贸易衰落简论》，收入M. A. 库克（Cook）主编的《从伊斯兰崛起到现代的中东经济史研究》（伦敦，1970年）。【4】

② 比如，参见M. F. 马扎乌伊（Mazzaoui）：《中世纪晚期：1100～1600年意大利的棉纺业》（剑桥，1981年）。【5】

③ 那么，为什么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其他的西方人想要发财？实际上这仍是一个没有解决、而且基本上没人考察过的神奇现象。在意大利早期自治城邦占统治地位的贵族世家中，从贸易中获取财富被视作一个巩固他们在上层社会里地位的手段；在许多的城镇中，财富提供地位，对那些追求声望甚至政治地位的人而言尤其如此；对城镇里的穷人而言，以投资贸易的方式赢利显然是有意义的，因为那样的赢利可以保证他们在灾荒年月或危机时候渡过难关。但是对那些领导了自治城邦的商业扩张的人而言，他们所要求的是地位而不是较好的生活。在马木路克统治下，富裕的穆斯林商人没有参与政府中央机构的希望，这种中央机构被控制在战士奴隶（slave-soldier）的手中；地位是通过支出而不是通过使用政治控制显示出来的。【6】

④ 比较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方法，参见M.格里斯—赫钦森（Grice- Huchinson）：《西班牙的早期：1177～1740年经济思想》（伦敦，1978年）。【7】

更为便捷。犹太哲学家梅蒙尼德斯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他针对埃及犹太商人的质问回答说，为了支付利息而延期付款不违反律法：不仅不该反对它，而且这是维持大范围内的人民生计必要的。[①] 认为中世纪穆斯林商人在钱的使用方面较之当时的基督教或犹太同行不是那么"资本主义"式的，这是新穆斯林护教论者一厢情愿的观点。[②]

穆斯林商人商业技巧熟练，但在伊斯兰地区以外不具有冒险性。中国有穆斯林商人的主要居住区，他们还航海到印度洋，远至马来亚。但不应认为伟大的地理学家如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是穆斯林企业精神的典型例子。出于对地理学和动物学的好奇，穆斯林和犹太学者注意到了远东，但普遍缺乏以贸易为主的实际调查。马可·波罗带给西方关于奢侈品的性质和起源地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蒙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但比香料商路上穆斯林商人所获得的信息更为具体可靠。拉丁基督教徒对非洲西海岸和大西洋岛的探索比自迦太基的腓尼基人以来的任何人都更彻底与成功，尽管西非一度是庞大的伊斯兰帝国向北延伸至西班牙的一部分。因此，在 1291 年维瓦尔蒂兄弟在寻求到印度群岛的航线之前没有阿拉伯人做过此事。穆斯林商人一直对他们所拥有的贸易路线感到满意，这并不奇怪。也没有一个野心勃勃的集团试图探【407】索绕过伊斯兰领土——穿过撒哈拉，沿红海而下或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到达东方和南方的重要商路——基督教的西方除外，这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在那里，那样的发现被认为是对伊斯兰的潜在冲击。因此，穆斯林往往满足于他们的成功。

与这一系列现象相联系的是在世界的边远地区穆斯林社区的发展方式。中国从 8 世纪起就有穆斯林商人定居，但中国的穆斯林逐渐地越来越关心本地的贸易和供应。尽管古代的丝绸之路一直维持着，往西可以到达粟特及伊朗人的土地，中国的穆斯林并没有作为一个新的规模国际贸易商阶级而出现。伊斯兰商人很少，无法与神秘的拉达尼特犹太人相比。他们的沙漠商队散布在从塞纳河盆地和西班牙中部到中华帝国的整个欧亚大陆。他们的后代，尽管有些逊色，也能从 11 世纪的老开罗犹太人中找到他们的影子。[③]

---

① S. D. 戈伊坦（Goitein）：《地中海世界：开罗格尼扎一世文献中所描述的阿拉伯世界中的犹太社会》，第 1 部分，见《经济学基金会》（伯克里/洛杉矶，1967 年），第 197 页。【8】

② M. 罗丁森（Rodinson）：《伊斯兰和资本主义》（伦敦，1974 年）；但是，与这令人遗憾的诽谤相反的有 N. 帕查（Pacha）的：《11～14 世纪马格里布贸易》（突尼斯，1976 年），或由 B. 路易斯叙述的观点：《被记住、被恢复和被创造的历史》，普林斯顿，第 84～85 页。【9】

③ 参见 E. 阿什托（Ashtor）：《10～15 世纪地中海经济中的犹太人》（伦敦，1983 年）。这是一本论述资本重要性的论文集。【10】

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商人与殖民者试图定居在如西班牙南部、西西里和巴利阿里之外的欧洲土地，但是他们从未成功过。9、10世纪普罗旺斯加固的定居地是暂时的，尽管它们的商业重要性可能被低估了；意大利南部的穆斯林曾居住在这儿，但很快就消失了。西西里的穆斯林到13世纪早期就从地图上消失了。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萨的记载很少提及到意大利港口的穆斯林商客，尽管比萨有托斯卡纳贵族与突尼斯酋长通婚的证据。真正的穆斯林在欧洲的出现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特征：这是作为西方进口或复制东方产业的结果所提供的一笔结实的遗产——西班牙、西西里还有后来卢卡的丝绸工业都有一些伊斯兰的渊源，欧洲的棉花和亚麻布业也一样。①

很显然，“穆斯林贸易”这个术语是不恰当的术语，因为它把宗教和经济两种类型的活动混在一起，而实际上它们是彼此独立的。穆斯林世界的贸易是由犹太人、帕西人和科普兹人，希腊东正教徒，印度人以及穆斯林承担的；而且某些集团还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埃及的科普兹修道院曾一度起过中转站的作用，奴隶在这里被阉割，在他们被运到大的奴隶市场之前得到康复的机会。犹太商人作为基督教欧洲与穆斯林世界中间人的活动前面已有提及。印度商人渗入到很远的伊斯兰地区——波斯海湾和红海入口处。中世纪晚期，穆斯林实际上只控制一条可以真正称为穆斯林商人保留地的贸易路线，它将“被保护人民”及其他非信徒排除在外：这就是从埃及东部的艾巴达港口到亚丁海峡的红海路线，还有穿过麦加和麦地那（这实际上对非穆斯林是不开放的）沿着阿拉伯海岸而下的路线。实际上维持穆斯林贸易控制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性的：担心12世纪70年代雷劳德·德·查蒂农试图干涉到麦加朝圣路线的事件重演，也害怕伊斯兰中心受到直接威胁。只是到15世纪，穆斯林商人才开始向已知世界边缘地区的贸易伙伴输出他们的宗教信仰：后面将要讨论的马六甲的马哈拉贾人的转宗（conversion）。侵略性的伊斯兰主义不是中世纪伊斯兰贸易的特征；在黑非洲，穆斯林商人和平地服务于异教徒的皇宫的需要，并且尊重他们与传统主义和多神论统治阶级之间泾渭分明的差别。【408】

本章将尽可能地使用“伊斯兰”或“穆斯林”术语以表明伊斯兰信徒从事的贸易。相应地，用“伊斯兰世界的贸易”来描述那些生活于或进入属于穆斯林政府的土地的商人进行的贸易。一般不用“阿拉伯”贸易这个术语，因为很明显，许多穆斯林商人不是阿拉伯人而是柏柏尔人（Ber-

---

① 参见马扎乌伊：《意大利的棉纺业》；沃森：《农业发明》。【11】

bers)、土耳其人、伊朗人、印度人、马来人或索宁克人（Soninke）。

6.1.2 研究伊斯兰贸易史的可能途径

对伊斯兰世界的贸易或通过这一地区的贸易给以相关解释的企图，往往由于学者们所被迫依赖的材料的特点而归于失败。[1] 19世纪早期出版的斯特鲁夫对伊斯兰地区贸易路线的研究将旅行者的传说、地理及编年史的信息联系到了一块，这样就可能得到主要贸易路线的粗略地图；但人们对变化的过程注意得较少。海德（Heyd）在9世纪晚期出版的黎凡特贸易史介绍了一【409】些非常宝贵的西方资料，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威尼斯和热那亚人的观点；穆斯林世界的贸易生活很少受到重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一些重要的新资料才进入人们的视野：于戈伊以敏锐的眼光对开罗格尼扎信函（Genizah letters）的发现；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展现的维也纳纸草书；以及许多有关马格里布经济状况的穆斯林法官的司法判决书。对有关税收和农业小册子的研究，尤其是克劳德·卡恩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对贸易活动与农业体制之间联系的了解。中国的原始资料描述了香料群岛的地理特点和贸易方式，对这些材料的关注扩大了地理学家的视野。马来亚和黑非洲编年史学家的历史著作也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在穆斯林重要贸易中心——福斯塔德或赛拉夫——的考古工作给11世纪及以后中国和埃及贸易（Egypt trade）联系的文字资料提供了佐证。对穆斯林铸币及纺织品进行的认真考察揭示了这些地区经济的优点和弱点。因此，伊利亚胡·阿什托（Eliyahu · Ashtor）教授对西方一系列档案资料如布拉托的达蒂尼信件和一些东方资料的研究，在理解中世纪黎凡特贸易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在这里，我们力图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些"新"资料，而相对有限地利用更传统的地理文献。格尼扎信函和司法判决书经常是更清楚更准确地阐述了地理学家及朝圣者的第二手报告或通过朦胧的记忆讲述的东西。因此，1154年在西西里罗杰二世的宫廷制作的伊德里斯（Idrisi）世界地图，充斥着对北非经济状况自相矛盾的叙述——这是由一位不太有名的阿拉伯地理学家将新旧资料很不成功地混在一起的产物。这篇有关伊斯兰贸易报告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没有注意到穆斯林舰队在地中海和其他地区的历史。伊斯兰贸易的历史——例如阿奇博尔德·路易斯的观点——被认为是穆斯林航海史的副产品：这个观点建立在有关地方战争对商人

[1] 进一步的参考书，可参见本书第905页上的参考书目。【12】

的流动自由产生影响这一不可验证的假设基础上。

另一个偏离常规的做法是过于强调1000年以后的时期。这段时间许多新的资料都阐述得很清楚；这个时期也是伊斯兰地区日益成为奢侈品通向西欧的通道，而且西欧和伊斯兰的经济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时期。黑非洲及香料群岛的贸易资料在大约1300年以后更为丰富，因此穆斯林贸易线路终端的作用在中世纪晚期可以看得很清楚。【410】

6.2　早期伊斯兰贸易：650～1000年

6.2.1　内部变化与活力

伊斯兰继承了一笔丰厚的商业遗产。叙利亚、埃及及美索不达米亚有着漫长的商业繁荣历史。大马士革和亚历山大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得益于其处于几个黎凡特贸易路线交叉口的地理位置。但是阿拉伯人征服后产生的新城市在7世纪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库法（Kufa）和福斯塔德（Fustat）（它们最初含义是“壕沟（Ditch）”，而这正好解释了其命名的由来）这类修建有筑防的营地，成了远离家乡的手工业移民和转变成定居的阿拉伯统治阶级的贝都因（Bedouin）[①] 游牧民族的聚集点。伊朗、叙利亚、北非旧秩序的破坏导致了人口的大规模移动，极大地改变了前希腊和撒克逊人土地上的种族成分，并且决定性地将生产中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8世纪的巴格达或福斯塔德居住着阿拉伯征服者，波斯和叙利亚移民，犹太商人和手工业者，还有来自附近山地或沙漠地区的人们——他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即使不是因为信仰的话，至少语言是统一的，因为阿拉伯语是大多数伊斯兰地区的共同语言。城市内部生产的扩张，没有不可渗透的边境，以及共同语言的应用，所有这些都刺激了遥远地区的商品交换。

还可以采纳另一种观点。6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在手工业生产和人口上经历了一次衰退，特别是在城镇内。拜占庭的乡村，至少在叙利亚和埃及非常繁荣，以色列内盖夫发掘的大农场表明了这一点。地中海贸易不断萎缩，黎凡特从事农业的人口又慢慢增加了。这种转变的原因之一是6、7世纪早期

① 贝督因人是指在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和北非沙漠中游牧的阿拉伯人。——译者注

爆发的一系列瘟疫，它使东地中海地区城市的熟练劳动力大幅度减少。伊斯兰的急剧崛起扭转了这个局面。阿拉伯军队从叙利亚和圣地的过境导致了拜占庭工程师精心维护的灌溉工程被废弃；前贝督因人在拜占庭土地上定居意味着农业技术实实在在的衰落；乡村人口向新城镇的迁移加剧了这种衰落。【411】阿拉伯游牧民族传统——他们照管着大批的羊群——破坏了沙漠植被脆弱的表层，导致了严重的枯竭，因此伊斯兰世界的城市化反映了拜占庭前行省的经济基础的迅速破坏。①

人口的流动对城市技术有很重要的影响，假如对农村影响不大的话。8世纪叙利亚丝绸工人居住在西班牙南部，他们奠定了这个长盛不衰的工业部门的基础。因此，波斯纺织工人也将其技术往西带到了埃及和马格里布。个别城市因其工业发展而声名远扬；摩苏尔、福斯塔德因布料而闻名；大马士革和托莱多因为武器而出名。它们因之而出名的技术又是从更东的地方进口而来的；在大马士革和托莱多，甚至造剑者的原料都是从遥远的地区进口的。换句话说，区域特产可以脱离原料的生产中心而繁荣。到11世纪，各地的相互合作已经是很常见的事了，一个地区供应材料，另一个地区进行加工：西西里和突尼斯纺织工业的合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8～11世纪的伊斯兰世界的特征是，以原材料运往专业化手工业中心而成品通过穆斯林地区运出这些中心。到10世纪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埃及和西班牙的城镇能互相仿造产品，夺取经典生产中心制造的专业化商品的市场。波斯伊斯法罕的纺织品在安提克也可以制造；当西班牙和埃及制造商贴上引人注目的商标兜售本地产品时，“西西里纺织品”也就失去了部分意义。

有两个因素——地区专门化和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交通便利——极大地刺激了穆斯林城市一流产品的远程贸易，如纺织品、金属品、陶器和皮革。为了服务于大城市的庞大人口，长途食品贸易发展起来了：小麦是巴格达和开罗的主要食物——尽管匮乏是经常的——但突出的是，这些城市成功地养活【412】了自己。特别成功的是穆斯林城镇边缘集市化菜园的扩大，它提供了非主食

① 沃森的《农业的创新》（第5页）努力消除对阿拉伯游牧部落导致生态恶化的指责，进一步指出了阿拉伯农业的显著成就。但重要的是要把中东游牧部落暴乱的第一阶段（在整个突尼斯，班努山地人的暴乱一直持续到11世纪）和后期的主要发明创造阶段（比如在摩尔人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区别开来。参考M. 布雷特（Brett）：《艾弗里基亚作为10～12世纪撒哈拉贸易的集市》，《非洲历史杂志》，第8卷，1972年，第489～506页和D. S. H. 阿布拉菲亚（Abulafia）：' L' attività commerciale genovese nell' Africa normanna：la città di Tripoli'，*Atti del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sulla Sicilia normanna*（巴勒莫，1973年）。布雷特的观点（而不是我的观点）与沃特森的观点有相通之处。但是不幸的是，关于圣地被毁的争论到现在已发展成现代政治的一个争论焦点。【13】

供应的额外途径：巴勒莫的葱（10世纪嚼着葱的居民因强烈的气味使伊本·霍卡尔不堪其苦）；埃及和西班牙的新鲜蔬菜，比如朝鲜蓟（artichoke）和菠菜。到10世纪末，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苦橙子传到了叙利亚、西西里和西班牙，用本地蔗糖将其果皮和果汁混到一块就成为美味可口的糖果。[①]这些水果和可口商品不光是针对一小群贵族消费者；人们还将其包装运到海外销售。尽管由于阿拉伯人的侵入导致农村衰落，但在伊斯兰世界的城市四周仍是精耕细作的和高产的果菜园，它们的主人引进最有效的灌溉技术及梯田方法。在中世纪，伊斯兰拥有如此独特的城市文明，以至于最成功的农业创新都发生在城里或其边缘地区。当然某些昂贵的食品只能以高价从很远的地区少量进口。在中世纪早期，主要的宫廷还不是东方香料的重要消费者（尽管印度尼西亚香料非常受欢迎）；但到10世纪，哈里发喜欢巴格达制做的一种由面粉、肉、香料混在一起的沙琪（*sanbusaj*）的味道：

用肉桂和芸香调味佳哟；
也可再加一把胡荽（coriander）。[②]
接着再加一点点丁香，
上好的生姜和最优的胡椒粉，
再来一把孜然芹和没药（murri），味道就是好哟。[③]

正是在这一时期，向通往阿马尔菲和威尼斯的香料海运路线又重新建立起来了。

伊斯兰世界的一个重要经济特征是对中心地区——埃及、伊拉克——黄金和白银复本位制货币的依赖。7世纪末期，哈里发阿布德·阿尔·马立克的改革促进了穆斯林地区的黄金流通：他引入了穆斯林设计的金第纳尔，代替了仿照拜占庭风格的含稀有金属的早期货币。新的第纳尔比希腊金币纯度【413】稍低些，结果第纳尔排斥了拜占庭的诺米斯玛。商人喜欢用诺米斯玛作为储存的手段，而把低劣的阿拉伯货币作为交易手段。然而，整个贸易界都能接受的伊斯兰货币的成功创造，依靠的是贵重金属的良好供应；但第纳尔和它银辅币，主要是用来自伊斯兰世界边缘地区或更远的地方如非洲和高加索的

---

① 沃森：《农业的创新》，第42～50页和其他各处用图说明了这些运动。他提到当甜味汁甜的橙子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味道苦涩的橙子还有一些吸引力。在罗马时代，圆佛手柑是地中海种植的惟一柑橘类水果，它在犹太礼拜仪式上还起了很大的作用。【14】

② 原文为Corriander，疑误。——译者注

③ A. J. 阿伯里（Arberrg）：《巴格达的菜谱》，载《伊斯兰文化》，第8卷，1939年；比较C. 罗登（Roden）：《中东的食物名册》（伦敦，1968年；哈蒙德斯沃斯，1970年），第101～102页。【15】

金属制造的，但穆斯林商人对于它们的开采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在伊斯兰世界内，直到10世纪或11世纪仍有很好的黄金供应：埃及的统治者图伦尼兹利用了古代法老埋藏的财库；埃及和叙利亚的修道院被迫将财库开放——不仅仅是铸币，还有地方基督教徒保存的珍贵物品。莫里斯·伦巴德把这些教堂财库视为穆斯林统治者的贵金属宝库，在8、9世纪时一遇到经济危机就加以利用。他指出在西方拉丁世界也有类似的用途，如法兰克人查尔斯·马特尔（Charles Martel）就是这样。[①] 一般来讲，金的供应比银的供应更易保证，因为西班牙的白银很快就耗尽了，伊朗北部和高加索的银矿又处在动荡地区。这意味着黄金的价格相对银来说偏低；10世纪，在伊斯兰世界的中央地区黄金和白银比价为1:8。在某种程度上，与意大利和西欧的贸易往来缓解了白银的供应问题：11世纪以来，撒丁和日耳曼的白银进口数量不断增加。但当伊斯兰世界的银严重流失到印度统治者和斯堪的纳维亚海盗王手中时，欧洲的白银开始流入东方。在1000年左右，伊斯兰地区银的流失速度比其获得的速度还快。

伊斯兰世界之外穆斯林白银的贮藏只是降低了其作为一种小规模商品交换媒介的易得性。伊本·库达达在9世纪的记载说，银币甚至金币的日常使用在小村庄都是非常明显的。用钱付税是常见的，尽管在埃及整个中世纪实物税一直占主导地位。在艾尔·哈卡姆（al-Hakam）二世统治时期科尔多瓦的哈里发的财库收到了总共4 000万第纳尔，而在他登基时已经有500万第纳尔（250英担黄金）的财富。尽管西班牙的摩尔人从犹太人和基督教徒【414】的过境税和农地税中得到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但其中大部分是贸易税收：在城门口、市场和对往来于河流上的船舶征税。换句话说，早期伊斯兰统治者大量的收入证明，有大量贵重金属作为货币流通，也证明了地区间贸易的规模和成功。

6.2.2 对外联系

1. 拉达尼特人时代

研究早期伊斯兰贸易必须考虑亨利·皮伦尼的观点，他认为穆斯林征服

① M. 伦巴德：《伊斯兰的黄金时代》（阿姆斯特丹，1975年）从 *Islam dans sa première grandeur, VIIIe - XIe siècle*（《伊斯兰的鼎盛时代：8～11世纪》）（巴黎，1971年）转译而来。【16】

叙利亚、埃及和北非，以及法兰克征服意大利之后，地中海就是一个封闭体系。① 皮伦尼认为，西欧与伊斯兰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到8世纪时缩小为涓涓细流。他指出西罗马与东方非常活跃的商品贸易，如香料、纸草、葡萄酒、纺织品的买卖已经消失了。阿斯托继续支持他的观点，他认为穆斯林和拜占庭舰队之间无休止的冲突使得自由航运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谈到有关撒拉逊强盗军队埋伏着等待拜占庭商船前来（或者从相反的方向）以及洗劫海岸城市并掠夺赃物②的描写。对这种观点的批评会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即希腊和阿拉伯船袭击商船的资料并没有说明地中海海上贸易仍然在继续——没有，这一点可以肯定。中世纪晚期有大规模的商业运动，但只是偶尔的，甚至是不可预料的。马赛和几个意大利城镇的基督教徒的船只曾经航行到马格里布、埃及和叙利亚港口。阿斯托也指出9世纪穆斯林海军曾经航海登陆到阿普利亚、西西里和克里特；他也强调穆斯林强盗与政府的冲突时有发生——这也为814年西班牙摩尔人占领亚历山大所证明。但是，同一世纪阿马尔菲、那布勒斯及其他南部意大利港口也一直在积极地从事着地中海与拜占庭、埃及和马格里布之间的贸易；正如威克姆所言，阿马尔菲靠9、10世纪"差不多持续地支持阿拉伯人侵袭意大利海岸而建立起了自己的地位"③。这使我们明白了阿拉伯舰队制造的困难和可能抓住以此重建跨地中海贸易的机会。拉丁【415】世界及伊斯兰世界的边界贸易没有停止过，但到9世纪大多数贸易中心都衰落了；即便是很成功的阿马尔菲，也不能在欧陆与黎凡特之间建立强有力的经济纽带。而且，伊斯兰贸易衰落产生的后果不应低估。尼罗河三角洲和叙利亚海岸城市的人口减少了——希腊东正教的居民潮一般涌向君士坦丁堡，穆斯林则远离海岸而选择更安全的居住区。

但是，某些商人团体的确促进了西欧和东方有限的奢侈品贸易。萨拉森人强盗在弗雷瑞斯和普罗旺斯海岸建立起定居点，这里的居民在贸易和工业方面非常活跃。马赛城有一个特别大而人人尊重的犹太社区，它保持着埃及和叙利亚的开放联系。但这种联系最著名的证据则是另一犹太商人集团，拉达尼特人。④ 伊本·库达达描述了这些勇敢的旅行者是怎样将西班牙和法兰

① H. 皮伦尼：《穆罕默德和查理曼》（伦敦，1939年）；也可参见R. 霍奇斯（Hodges）和D. 怀特豪斯（Whitehouse）：《穆罕默德、查理曼和欧洲的起源》（伦敦，1983年）。【17】

② E. 阿斯托（Ashtor）：《中世纪近东社会经济史》（伦敦，1976年），第102~104页。【18】

③ C. 威克汉姆（Wickham）：《中世纪早期的意大利：中心权力和地方社会，400~1000年》（伦敦，1981年），第150页。【19】

④ E. 阿斯托：《拉达尼特人概观》，载《瑞士历史评论》第27卷（1977年），第245~275页。【20】

西内地与近东、亚洲中部及中国南方联系在一起的。必须承认，拉达尼特人就是8、9世纪经常出入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斯（Louis the Pious）宫廷的犹太人。他们显然与叙利亚基督教商人一起在从事着经商的事业，后者自梅罗文加以来，一直向北欧皇室供应少量的东方珍贵物品。莫里斯·伦巴德指出，犹太人与叙利亚人有区别：他认为叙利亚很早就繁荣了，并且专门从事着把东方奢侈品向西方出口的活动；犹太人在他们之后，他们专门把毛皮、武器，毫无疑问还有奴隶向东部口岸出口。① 这种差别似乎有点牵强：因为拉达尼特人也进口东方香料、香水和药品——这些药物构成了中世纪早期受人尊重的犹太和叙利亚内科医生药箱的一部分。我们不清楚的是，西方文献中提到的“犹太”商人是否应该理解为，按宗教或血统来说，他们都是犹太教徒。*犹太人*和*叙利亚*就成了方便表述的术语，它们在描述某种商业活动而不是对某个单独商人的出身做准确描述时有点近义。就犹太商人而言，他们也许得益于出现在重要贸易路线上的希伯来社区，这些社区有些——在布拉格、印度科钦以及中国南方的某些地域——可能是拉达尼特人或早期犹太商人建立的。在拉达尼特人的贸易路线中，有一条经过罗讷河（它们的名字是由拉丁语 *Rhodanus* 而来）到达普罗旺斯港并横穿埃及；然后沿着红海而下到达印度。商人可沿另一条路线到叙利亚北部；从安提克出发向伊拉克前进，然后在那里从海上到达波斯湾，再从那里达到印度西北部、锡兰和远东。但是，从印度到中国的最后这一段的正常路线是经陆地而不经过马来半岛。另外一条向东的路线则穿过布拉格到保加尔王国，再到中亚、伊朗北部，然后就沿着古丝绸之路的后一段到达中国。拉达尼特人沿这条路线东行也许获得过哈扎尔人、突厥人的帮助，他们的统治者在8世纪信仰犹太教。最后，似乎还有一条走南地中海的路线，从西班牙沿着非洲海岸到达巴勒斯坦，然后通过大马士革到伊拉克、伊朗和通往印度的各关口。

【416】

就如我们所知，拉达尼特人出口一些西方产品，如皮革和武器。伊斯兰世界对“法兰克”剑的需求很大，这既是因为只有有限的铁供应来满足伊斯兰技术的需求，也是因为北欧铁和钢的制造技术非常先进。而更重要的商品是东欧、讲土耳其语的中亚和非洲之角以及不断遭海盗侵袭的地中海沿岸的奴隶。9世纪末赞吉奴隶在伊拉克南部叛乱的规模说明了奴隶进口的规模——这里指的是从非洲进口的奴隶。11世纪西班牙南部的萨卡里巴或斯拉夫王朝是由东欧奴隶的后代建立的，他们是摩尔统治者买来做贴身侍卫

① 伦巴德：《伊斯兰的黄金时代》，第212页。【21】

的。到961年，在科尔多瓦有13 750个男萨卡里巴。实际上，西欧的奴隶贸易到10世纪已经有很大的发展，尽管黑奴不太普遍——部分是因为赞吉灾难的结果。甚至埃及和叙利亚也得到了大量的一船一船运来的斯拉夫奴隶。现在很清楚拉达尼特犹太人在奴隶贸易的组织上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主要基地也就是奴隶贸易的基地。在北欧的凡尔登有个重要的阉割中心，尽管西班牙也“自产”太监。布拉格作为一个大的奴隶市场而繁荣起来，就像伊朗北部的城市——撒马尔汗和布哈拉（Bukhara）——一样。奴隶的命运因其身体特征——如肤色、相貌及体力——而异。强壮的土耳其和斯拉夫奴隶从军；切尔克斯（Circassian）奴隶因其美貌而著称，这里的姑娘经常充做闺房仆人。英俊的小伙子往往沦为有鸡奸行为的王子们的财产。赞吉人的命运不怎么好，他们在伊拉克南部的沼泽地带做清洁工和挖掘工。当869 【417】年赞吉的奴隶被迫叛乱时，他们要求的不仅仅是解放，而且要拥有自己的奴隶。

拉达尼特人在9世纪似乎处于一种衰落的态势。这部分地反映了西欧宫廷态度的改变：他们更加敌视奴隶贸易，① 也敌视在宫廷中出现的受宠的非基督徒团体——里昂爆发的阿戈巴尔德反对犹太人运动就是明证。更重要的是9、10世纪意大利跨地中海贸易的逐渐复兴。本土商人阶级首先开始在南意大利出现，然后在意大利北部及莱茵兰也跟着出现；最后的标志是莱茵兰犹太人在第一次圣战后特别富有，虽然他们在圣战中曾遭受恐怖的大屠杀。欧洲贸易的复兴（马赛和巴塞罗那除外）是基督教贸易的复兴，犹太人实际上被禁止大量聚居于某些贸易中心，特别在是热那亚。因此11世纪后期或12世纪的犹太商人比起拉达尼特先人所能活动的范围更小。如果他住在埃及或西班牙，那么他几乎不会对深入欧洲大片陆地的贸易感兴趣。他们所知的大多数地区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甚至君士坦丁堡也不是犹太人喜欢的贸易中心。

拉达尼特商人并不是惟一在1000年以前就达到发展顶峰的犹太人。9世纪，伊拉克和埃及的犹太人银行家受到哈里发人的高度赞赏；尽管后来犹太宫廷银行家也出现了，比如在蒙古人控制的伊朗，但他们似乎难以与9、10世纪大的贸易王朝相竞争。费什尔形象地将巴格达的一个家族公司描述为“约

---

① E. 阿斯托："Gli Ebrei nel commercio mediterraneo nell' alto medioevo（第10～11节）", *Settimane di studio del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 alto medioevo*, XXVI: *Gli Ebrei nell' Alto Medioevo*（斯波莱托，1980），454－6，重版于E. 阿斯托：《10～15世纪的犹太人和地中海经济》（伦敦，1983年）。【22】

瑟夫亚伦有限公司，总部设在巴格达"[①]。宫廷银行家是基金周转的大师，使用支票或信用证；他们是忠实的仆役，他们供应和增加国库收入的能力给统治者留下深刻印象；当统治者缺钱时他们能提供数目相当大的贷款。确实有一些反复无常的统治者强索这种贷款，构成对当地犹太人迫害的潜在威胁。在埃及，亚凯布·布·基里斯甚至获得过很高的官位，尽管其代价是皈依伊斯兰教。公元983~984年，他的私人财产至少有200 000第纳尔。很显然，这些银行家除在远程贸易上非常活跃这一事实外，这种富有而且可以提供巨额贷款的金融家出现在宫廷，刺激了皇室对奢侈品及高质量武器的需求。[418]

2. 瓦兰吉人之路

9世纪，出现了一个成功地从东北欧引进皮革及铁制品的商人集团，他们的成功可与活跃的拉达尼特人在同类商品上的活跃交易相比拟。斯堪的纳维亚和东斯拉夫商人将波罗的海与俄罗斯、大保加利亚、黑海、里海和咸海联系起来。他们沿着第涅伯河、顿河和伏尔加河建立了新的市场。他们不费力地从一条河的上游到达另一条河的上游，使后来的地理学家伊德里斯认为咸海向里海供水而里海向黑海供水。但是事实是非常充分的：瓦兰吉和俄罗斯商人定期造成阿塞拜疆（Azerbaijan）、科瓦里兹，当然还有君士坦丁堡一米格尔加德这样异常杰出的“大城市”。他们也很了解突厥人的大都会保加尔（Bulgar），那里仿照阿拔斯王朝的模式铸造了相当好的银币。伊本·库达德巴（Ibn Hurdādbeh）说明了这些商人贩运的是什么样的商品。

> 罗斯人（Rus）属于萨卡里巴（斯拉夫）部落，他们从遥远的萨卡里巴旅行到罗马海，在那儿出卖海狸皮及黑色的狐狸皮，也出售剑。罗马王子（拜占庭皇帝）要占有他们商品价值的1/10……在他们回去的路上，他们由海路到萨马卡斯这个犹太人的城市（法纳戈里亚，黑海），从那里返回斯拉夫人的国家。或者他们沿着顿河到斯拉夫人的河流（伏尔加河），穿过哈扎尔人的首都伊蒂尔，这儿统治者要征取他们商品的1/10作为税收。他们从里海上船，朝着他们计划好的海岸地点驶去。用骆驼将商品从贾简或雷伊（现代的德黑兰）运到巴格达。斯拉夫宦官在那儿给他们做翻译。

① W. J. 菲谢尔（Fischel）：《中世纪伊斯兰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犹太人》，《皇家亚洲协会专论》，第22卷（伦敦，1937年）。【23】

他们自称是基督徒并缴付诸如人头税等税种。[1]

另一位阿拉伯作者如伊本·法德拉恩进一步说明了俄罗斯与其伙伴的贸易活动。在他们之间异教的习俗还保持着——如伊本·库达德巴所说的，他们"自称"是基督教徒——他们的土地少有穆斯林商人进入。更多的是瓦兰吉人及俄罗斯人寻找从保加尔到巴格达的各个地方穆斯林买主。

在瑞典发现的巨大的伊朗银币窖藏及沿着瓦兰吉贸易路线的遗址可以看出这些活动的影响来。北方人从伊拉克和伊朗购买有限的穆斯林商品，而他们出口到穆斯林地区的是数量巨大的森林产品，如蜂蜡、金属和皮革。伊朗对毛皮的需求量很大，主要用于防冻。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人从出售这些商品中得到了许多白银，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工艺品——银装饰物，如银带扣、小碗和花瓶或者珠宝——还有金条返回。在瑞典，东方艺术品是富裕商人或成功战士财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变回到贵金属或者熔化加工成本地的奢侈品——这是许多伊朗第赫姆（*dirhem*）的命运。相比之下，在瓦兰吉人的金库中发现的金币不多。这部分地反映瓦兰吉人的贸易方向——穿过伊朗和里海的富有银矿的地区——但他们很少将穆斯林的第纳尔熔化[2]成北方的装饰品。 【419】

在10世纪时白银向北方的流失还可忍受；但到11世纪在伊朗出现了银荒。这种紧张状况导致了北方贸易路线的衰落：很简单，只要瓦兰吉人对穆斯林纺织品、陶器及其他非金属制品不感兴趣，伊拉克和伊朗就买不起大量的进口毛皮、刀剑和奴隶。另外这条贸易路线成了大草原政治变革的牺牲品。罗斯的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国家的扩张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罗斯开始与其竞争对手卡扎尔人和大保加尔为了控制领土而互相竞争。毫无疑问，瓦兰吉和斯拉夫商人再也不能像古代一样自由地选择进入伊朗的贸易路线。11世纪，库曼人和佩切涅格人（Pechenegs）侵入黑海地区以及塞尔柱突厥人对拜占庭的入侵进一步降低了河运路线的安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出现了过去由瓦兰吉人经营的某些商品——武器、奴隶——的其他欧洲供应商。意大利商人在试图进入伊拉克或伊朗时所冒的风险要小得多，但他们来到东方时口袋都是满满的白银，而返回西方时就空空如也。与贸易路线转向地中海相联系的另一个重大改变是：伊拉克的经济衰落以及尼罗河谷作为伊斯兰世界贸易中心的崛起。 【420】

---

① 《伊本·库达德巴所经过的路线和省份》，C. 巴比尔·德·梅纳德（Barbier de Meynard）主编（巴黎，1865年），第264页。【24】

② 见后，第七章，第483页。【25】

6.3 埃及的鼎盛时期：950～1500年

6.3.1 伊拉克的衰落

埃及经济鼎盛时期与其在希特·法蒂玛（Fatimids）统治下从巴格达逊尼派哈里发的统治下分离出来相一致。北非大多数国家和叙利亚都承认法蒂玛的宗主地位。一个强大铺张的埃及朝廷的出现刺激了本国和外国商人的胃口：对丝绸、香水及其他贵重物品的需求增加了。而法蒂玛战争的需要给木材、铁、沥青及其他军用物资的供应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武器贸易转向威尼斯、比萨、热那亚和它们的西方对手——令人惊讶的是，在埃及的文件中首次提到热那亚商人的时间与法蒂玛家族权力的崛起时间相一致。[①] 尽管教皇谴责给异教徒供应武器的商人，但这种交通只是在11世纪及12世纪才成长起来。到1171年，比萨人非常乐意给撒丁人供应海军物资。而埃及经济崛起的较重要因素是西欧银矿的供应；这缓和了埃及白银的短缺，但也有相对较少的白银渗透到了白银短缺的伊拉克及其他伊斯兰地区。西方人也推动了跨红海的香料贸易的发展；可能的是，12世纪以后红海贸易的蓬勃发展证明西方对药物、染料及东方调味品的需求。但由此产生的一个负效应是从印度出发的另一条海运路线逐渐衰落，这条路线沿波斯湾一直延伸到伊拉克。赛拉夫和启什岛逐渐丧失了其重要性。亚丁成为东方香料的主要交易中心。当然，过低估计穆斯林国家对东方香料的需求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法蒂玛以前印度贸易偏重于或可能主要是东方香料，对香料的重视反映了西方的口味至少与穆斯林是一样的。换句话说，通过埃及从东到西的贸易路线诞生了，其存在的理由并不完全因为是供应伊斯兰的消费中心，而是因为新朝廷及西欧城镇的庞大需求。[421] 奇怪的是，埃及将其在11世纪和12世纪的经济成功部分归因于伊斯兰在西地中海被比萨、热那亚、威尼斯和诺曼、

---

① S. M. 斯特恩（Stern）：《从法蒂玛的大法官法庭而来的有关意大利商人的原始文件》，*Studi orientalistici in onore di G. levi dell Vida*，II（罗马，1956年），第529～538页。有些有关波斯与埃及的证据由伊斯兰的陶器中反映出来，这些陶器被镶嵌在中世纪比萨教堂的正面或塔顶上；11世纪，绝大多数的陶器都来源于埃及，虽然它所达到比萨的路线还不太清楚。戴维·阿布拉菲亚：《比萨的彩陶和中世纪的经济：一个历史学家的视角》，载《意大利考古论文》第4卷，《剑桥讨论会》，第4部分，（牛津，1985年）。【26】

卡斯蒂利亚海军以及十字军军队所打败的缘故。

表 6-1 穆斯林金第纳尔的成色标准

铸币数来自	成色的百分比											
	低于 90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946 年后的伊拉克	7	1	—	—	—	—	—	—	—	—	—	—
891～969 年的叙利亚	2	1	1	2	4	1	2	2	1	—	—	—
法蒂玛的埃及各个统治期												
阿尔—阿米尔 1101～1130 年	10	1	2	—	1	3	—	8	3	9	8	40
阿尔—哈菲兹 1103～1149 年	—	—	—	—	—	—	—	—	—	1	2	22
阿兹—扎菲尔 1149～1154 年	—	—	—	—	—	—	—	—	—	—	—	8

法蒂玛的经济实力可从埃及金币的质量中得到最清楚的反映，它在 12 世纪时纯度很高（见表 6-1）。埃伦卡鲁兹分析了伊拉克和埃及第纳尔的纯度，以下数据表明了前者的衰落及法蒂玛国家的崛起。①

这些数据也表明了法蒂玛的埃及从黑非洲获得黄金供应的努力是何等的成功。尽管这些黄金有一部分流到了北非的城镇，还有一部分在西西里和西班牙铸成货币，但大多数往东流入埃及，在那里形成了一道货币屏障，限制了黄金流入伊拉克及其他穆斯林地区——这种作用在讨论西方白银的时候已经论述过。

埃及的复兴也有赖于本地的生产者。税收非常之重，但对粮食生产和地方工业产品的直接干预很有限——没什么可与中世纪后期马木路克战争机器相比拟，为了资助主要战争计划，它经常利用埃及人的经济活动。换句话说，不是为了特定目的比如武器制造来指导工业生产。哈里发的纺织车间无意与成千上万把目标瞄向埃及公众和外国消费者的小工场相竞争。②

【422】尽管埃及经济繁荣，伊拉克却经历了严重内乱。10 世纪的农民起义，11 世纪突厥人的入侵，还有本地的分裂主义，所有这一切都给阿拔斯王朝国库增加了负担。征税变得非常艰难，军用花费非常严重。阿拔斯王朝不得

① A. 埃伦卡鲁兹（Ehrenkreutz）：《近东货币史研究》，《东方的经济和社会史杂志》，第 2 卷，1959 年，第 144、256 页；同前一作者，《十字军时代流通在埃及的金币成色标准》，载《美国东方协会杂志》，第 74 卷，1954 年，第 164、166 页；阿斯托：《社会和经济史》，第 176、194 页。【27】

② H. 拉比（Rabie）：《伊斯兰纪元 564～741 年/公元 1169～1341 年埃及的财政系统》（伦敦，1972 年），第 72～132 页。【28】

不将第纳尔贬值。917 年在阿尔穆米科塔蒂尔当政时，第纳尔贬值到含金量为 85%，尽管在他统治后期涨到了 90%。到 11 世纪，含金量为 90% 的货币非常普遍，银库枯竭。而且，城市的瘟疫以及对农村的忽略导致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农业与工业生产的下降。实际上，当大部分叙利亚沦于法蒂玛手中时，这个地区没有参与尼罗河地区的经济成功。由于放弃土地，农业体制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城市骚动，要求自治。可能只是在十字军统治时期——当时叙利亚在西方香料贸易中起到类似埃及的中介作用——他们的财富才得到恢复。经济繁荣中心从伊拉克转向埃及的过程与西方商人在地中海和黎凡特市场占主导地位紧密联系。

6.3.2 开罗的犹太人

1. 证据

埃及优势地位的上升时期可以从在福斯塔德（老开罗）教堂库房发现的几百封商人信件（开罗的格尼扎信函）中得到清晰地说明。这些信件详细地描述了贸易路线和商业方法；他们列举了商品类型和价格；其他类型的格尼扎（Genizah）材料，如嫁妆的内容和犹太教的疑难解答等，补充了经济生活方面的数据。格尼扎材料中不仅仅包括信函，还有判决书及开罗犹太人的祈祷书。准确地说，因为其他地区的犹太人经常光顾福斯塔德，还因为它自己的商人去印度、也门、西西里、突尼斯和其他地方，所以开罗格尼扎信函提供了埃及领土之外贸易活动的准确信息。同样的，格尼扎信函的特点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正如戈伊坦所说，一个格尼扎是一部文档的反面：一部错乱的文本集很容易被湮没遗忘而不是以一种有序的形式保存下来。① 这些文档是在乱堆里发现的，大多数被撕裂了或损坏了；因此，很少文档有准确的日期，尽管残存的大多数商业信函在时间上都可以追溯到 11、12 世纪。【423】格尼扎信函几乎无法构成一个编年顺序，这使经济史学家很为难：经济变化的问题单靠格尼扎的文字是无法解决的。而且，格尼扎信函反映的仅是伊斯兰世界一个贸易社区的经济生活。在福斯塔德的本·埃兹拉聚会的犹太人是格尼扎犹太人，也是拉巴尼特或举行正统的巴勒斯坦礼拜仪式的犹太人；但是在老开罗和新开罗也有犹太教徒（即使现在仍然有）以及举行“巴比伦”

① 戈伊坦：《地中海社会》，第 1、7 页。【29】

重礼拜仪式的犹太教徒；有迹象表明，还有许多本·埃兹拉犹太人并不从事其他的埃及人——卡莱特人、"巴比伦"犹太人、科普兹人、穆斯林——必须经营的范围广泛的商业企业。格尼扎商人似乎很少参与谷物贸易，或与摩洛哥、西班牙黎凡特人、法兰西南部和拜占庭的贸易。巴比伦犹太人的礼拜仪式在西班牙普遍采用，但他们可能要活跃得多。① 福斯塔德的犹太人是真正的专家，但除了说明他们的业务范围与其他埃及商人不同外，也不能反映别的——很显然，他们最为关注的是香料及亚麻贸易在10世纪和13世纪给尼罗河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从那个意义上讲，他们处于埃及和伊斯兰世界经济组织的中心。而且，福斯塔德犹太人似乎拥有相当的商业灵活性，直到1150年及以后一直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力量维持了下来。要解释这种灵活性也许是危险的。在福斯塔德犹太人的小型社区生活与戈伊坦所称的"乱哄哄的，无自治机会的穆斯林社会"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在法蒂玛国家内部，独立的犹太司法管辖区和社区官员有助于在犹太人间建立统一的自治"共和国"，尽管它仍处在严格的控制下；而穆斯林被剥夺了这样的自治。犹太人和穆斯林在对待家庭生活以及妇女在家庭以及商业中作用的态度方面有着重要的差别。② 福斯塔德犹太人的广泛阅历使他们作为商人比非犹太商人在商业中拥有更稳固的地位，因为犹太人有来自家庭方面强有力的支持；而且，地中海分散的犹太社区仍旧维持着远距离通婚，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大的单一区域，它的成员有共同的商业利益。 【424】

格尼扎的这些文件提供了有关伊斯兰地区如何作为中介人将东方香料及贵重物品运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关键线索。格尼扎商人作为中间人有详细的记录存留了下来——尽管还有遗漏；只是当地中海落入基督教统治者之手而且西方对东方的奢侈品的需求加强时，福斯塔德的文献才变得异常丰富起来。但由于有遗漏，对待格尼扎资料的最明智方法是简单地描述它所揭示的贸易路线、商品、商人阶级，而这并不要求把材料按时间线索进行一番梳理。

---

① 也有这种可能性，即遵循巴勒斯坦人礼拜仪式（是现代德系犹太人和意大利礼拜仪式的前身）的犹太人与某些地区保持着经济联系，比如像以色列本土，而这种联系比与巴比伦犹太人的礼拜仪式这种宗教联系更紧密——（可能是现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和许多东方礼拜仪式的先驱），他们与西班牙也有密切的联系，参见戈伊坦：《地中海社会》第1卷，第18～21页。但是这仅是一个假设而已。【30】

② S. D. 戈伊坦：《地中海社会》第3卷，《家族》（伯克里/洛杉矶，1978年），第312～332页。【31】

2. 福斯塔德犹太人 950～1150 年间的贸易路线与商业方法

格尼扎商人对连接埃及与突尼斯、西西里及叙利亚海岸的航运路线特别熟悉。这些重要交通路线还有连接地中海重要港口及其附属港口的较短海路作为补充；另外，沿着北非海岸深入到很远的撒哈拉内陆里还有很长的陆路交通网。这些路线的主要交汇点是突尼斯的阿尔—马蒂亚——当然，格尼扎资料集中于 11、12 世纪，也清楚地反映了阿尔—马蒂亚在格尼扎资料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作为 11 世纪中期的政治和贸易中心，这个城镇在屈服于突尼斯之前从凯尔文手中夺走了地方首要城镇的地位。[①] 其他突尼斯城镇如斯发克斯通过阿尔—马蒂亚进行主要的海运贸易，尽管只是偶尔有寻求纺织品与橄榄油的埃及商人光顾。通过一两个主要港口进行的这种小型贸易是否表明从中等城市所进行的远程贸易的出口量不足以让大船来光顾，这还无法说清。福斯塔德商人发现主要通过在大港口进行交易可以很容易地对各地来的商品进行一番比较，在大的港口他们可以发现北非的各类产品：油、纺织品、珊瑚、天然纤维。在这些港口他们可以与处于第二个层次的本地商人、犹太人和穆斯林保持联系，这些人掌握着小城市和乡村的生产，并把地【425】中海海岸看成他们的视野尽处。

格尼扎贸易的另一个特征是福斯塔德犹太人扮演了商业贵族的角色。他们喜欢快速旅行，甚至避开相当重要的港口——例如，的黎波里——直奔最有名的城市。因而，在西北非洲亚历山大与布日伊（Bougie）有直接联系，并有快船直达西班牙南部——丹尼亚（Denia）和塞维尔。在合适的季节交通非常拥挤。11 世纪来自亚历山大的一封信写道：在夏末“到今天为止从西西里岛来了 10 艘船，每船装载了大约 500 人”[②]。的确，格尼扎有许多描述旅行延迟及受挫的信件——翻船、强盗、政府干预——但它记载的是不很常有的事情，从埃及往西的路线在整个 11 世纪非常顺利。往北至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的路线受到战争的严重影响。北叙利亚开来的船似乎经常绕开巴勒斯坦港口，尽管在格尼扎的信件中大约提到 14 个叙利亚港口，其中包括劳戴斯、提尔、阿卡和阿斯卡朗。埃及犹太人与穆斯林一起，带着坚果、树胶、黑提子沿着叙利亚海岸到尼罗河流域进行贸易。

---

① 布雷特：《作为一个集市的艾弗里基亚》，第 347～364 页；比较 A. 莱泽：《马蒂亚：伊斯兰考古学探索》（巴黎，1966 年）和他更短的《马蒂亚》（突尼斯，突尼斯广播公司，1968 年）。【32】

② 戈伊坦：《地中海社会》，第 1 卷，第 315 页。【33】

北方的路线特别重要：它们是通往君士坦丁堡长途航运的一段。戈伊坦提到有封信描述了从埃及通过贾菲、罗德岛和奇奥斯到君士坦丁堡的一段航程，但他怀疑“这段旅行走的并不是通常所走的路线，可能是由于军事行动而偶尔发现的”①。实际上，即便是“快”船紧靠海岸行驶也是正常的，因此无论是塞浦路斯还是克里特都没有得到埃及发货人与商人的密切注意。

格尼扎信函还提到了向东通往红海与印度的路线。就像突尼斯是在遥远的西方经商的商人的最大过境站一样，也门是那些去往印度的商人的集中点。但是，到也门的人不如到突尼斯的多：因为人们认为红海不易到达，而印度商人据说更蛮干，有点冒险精神。一位博恩（阿尔及利亚）商人着急在预定日期以前收齐在福斯塔德的债款；因此很显然他通过埃及到也门。一旦收完债，他就调头前往马格里布。一个债权人抱怨道：“如果我知道他只是向西去，我一个子儿都不会给他”②。面临破产的商人往往逃到红海港口【426】艾巴达，因为这儿比起地中海来他们不易被发现。这条向东去的路线与西去的路线紧密相连：商品由来往于马格里布和亚丁的同一群商人航运。大约1100年，犹太法学博士在开罗法庭审判了一个关于将西西里制服运往也门的案件。同期，一个住在亚历山大的波斯犹太人经营着叙利亚、突尼斯、索科特拉和东印度以远生产的草药以及西方基督教地区生产的珊瑚和大西洋的龙涎香。11世纪的先锋商人纳雷·B·尼西姆（1045～1096年）从埃及向西西里和突尼斯出口亚麻，从西西里和西班牙进口丝绸，从远东进口漆、靛蓝、巴西木然后再向西出口，并且经营宝石（绿宝石、珍珠、龟甲），这些宝石大多数来自东方。因此，很明显，旧开罗的犹太人并不进行通常所谓的专门化，比如说印度贸易而不是西西里贸易；他们分散在几个地方经营，广泛扩展其业务；他们把印度洋贸易路线和地中海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是，印度贸易专门化的确发生了；似乎越来越经常。戈伊坦试图从格尼扎信函之外来对这种改变进行猜测。他说在11世纪，伊斯兰地区的商人至少是福斯塔德的犹太人统治着地中海和印度洋的贸易路线。当意大利人将地中海贸易集中在自己手中时，埃及的犹太人开始把注意力逐渐转向红海和印度；到13世纪，穆斯林卡里米商人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垄断了东方贸易并服务于到埃及的意大利人的需要；红海成了穆斯林的海。卡里米人获得了广

---

① 上引书，第214页。【34】

② 上引书，第42页。下面的还可参见S. 谢克德：《格尼扎资料的一个尝试性书目》（巴黎/海牙，1964年），第200页。【35】

泛的政治优惠；与他们相比，福斯塔德犹太人在开罗和亚丁宫廷就没什么影响。因此，13世纪福斯塔德的犹太人被迫集中于埃及地方贸易。福斯塔德社会的伟大时代结束了。实际上在1200年左右以后，与10～12世纪晚期的大量商业信函相比，记载非埃及人事件的信函差不多从格尼扎信函中消失了。10～12世纪的格尼扎信函涉及的是从安达卢西亚到印度各地的贸易状况。

通过描写连接福斯塔德和非洲其他中心的陆地路线，这些格尼扎信函展示了这种趋向更加地区化的贸易集团的转变。特别重要的是通过沙漠到红海艾达巴（Aydhab）的贸易路线。有信件谈到曾有一支由500只骆驼组成的【427】商队装着东方香料及贵重物品从红海运至开罗，还有无数从阿拉伯半岛返回的穆斯林朝圣者。① 另一条陆路贸易路线将埃及与的黎波里塔尼亚、突尼斯——最后还有摩洛哥——联系在一起。一个名叫缪萨·B·阿一马贾尼的人沿着这条路线旅行，在许多小城镇经商。他会离开一支商队做生意，然后等待新的护送队；或者他会与其他商人组成一个小分队，而不是寻找沙漠商队——如果一个商人要到离主要贸易路线较远的一个更小的中心，这种旅行方法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开罗犹太人一般不喜欢陆地旅行，考虑到他们喜欢海上旅行，很容易看出意大利在地中海的优势曾使他们痛苦不已。陆地旅行很慢，到达目的地的日期比航海更难以预测；土匪比海盗更危险；对犹太人来说，在安息日旅行还有问题，这种习俗在木板船上不适合。因此，人们通常倾向于将货品托付给陆地上行动自由度更大的穆斯林同伴——就如跟着穆斯林朝圣旅行队可以免受犹太人所遭受的虐待一样。更成功的是福斯塔德的犹太人利用内地水路的尝试。船只穿过尼罗河向南一直到达开罗，驳船交通特别拥挤。情况好时，从福斯塔德到亚历山大所用的时间不到一周。而且河上航运明显比陆地或海上航运更多地受到政府干涉。埃及统治者把尼罗河作为一个非常理想的税源，沿岸都设有征税点。一封格尼扎信曾提到一位沿河而来的商人来到福斯塔德时的失望心情；船只被迫在新开罗一个不是靠站的地方停靠下来，收税人登船收税。② 必须承认，连接开罗与亚历山大、达米埃塔和罗塞塔的水上通道至关重要，它是将东方商品运到地中海市场的通道。格尼扎犹太人的富裕不足为奇：他们的家乡城市老开罗与新开罗都是长途香料路线的重要中心。

格尼扎信函包含了伊斯兰世界贸易惯例的宝贵信息。虽然以此来概括犹

---

① 参见戈伊坦：《地中海社会》，第1卷，第276页。【36】

② 参见戈伊坦：《地中海社会》，第1卷，第295～301页。【37】

太人的贸易实践、把格尼扎人的一些证据应用到穆斯林或基督教徒是危险的，但很显然的是，所有埃及人，更不用说突尼斯和西西里人，都有某些共同习惯。一个犹太人在给梅蒙尼德斯的信中说：

> 大约15年以前，我正好旅行到西西里。有人向我吐露说 $1\frac{1}{3}$ 昆塔（*qintar*）的靛青花了他 $37\frac{1}{3}$ 第纳尔。这不是绝无仅有的事。我不知道给我的货物属于 *qirad*（一种类似于西方康孟达[1]的合伙合同）货物还是承运货物，如果是 *qirad* 的话，是否遵守穆斯林或犹太法律。[2]

【428】

虽然犹太人与穆斯林习俗有差别，但在达成一个贸易协议后这种差异就有时又可以忽略不计。至少清楚的是，单个商人是很少的。即便一个靠自己资本经营的商人也试图结伴旅行：要找一个专业同伴。特别是，他们还有对短期法律协议的偏爱，因为它可以保证每个参与者的权利，应克服不正常的信托关系，因而可以避免风险和利润不相称的危险。在 *qirad* 合同中，一个伙伴提供资本，另一个出力，分享利润；也有这样的协议，几个合伙人投不同的股，按照所提供的劳力与投入的资本进行最终分红——这种协议有点类似于同时期热那亚的索塞特（*societas*）。1162年的一份法庭记录记载有个商人投了总额150第纳尔中的55第纳尔，希望分得全部利润的1/3；他的目的是带着一船丝绸商品到埃及乡村销售。[3] 还值得一提的是，11世纪末期还有原始的保险方法，比如可以以年轻孩子的名义对贸易进行投资，而不冒资本流失的过分危险。但有必要对这样的一种观点提出警告，即认为这些商业方式是被出口到西方的；尤多维奇介绍了西方的康孟达是从伊斯兰的 *qirad* 借鉴过来的证据。[4] 这些贸易方法简单，没被复杂的法律搅乱，它们可在地中海不同的地方同时形成。实际上，真正的相似点不是在西方康孟达和东方的 *qirad* 之间，而在于康孟达与商业租赁之间，就如意大利的佃农与埃及的农民类似一样。

很明显，没有单独的“格尼扎商业法”。梅蒙尼德斯本人也反对这一说法，他的证据是谚语“入乡随俗”的另一种说法。他说合伙关系把一个国家

---

① *qirad*，是一种合伙合同，规定货主与船东之间的关系是合伙关系，而不是货主与承运人之间的航运关系，*commenda* 与 *qirad* 类似。国内著作多将 *commenda* 译为康孟达，*qirad* 尚未见相关译名——译者注。

② 上引书，第183页。【38】

③ 参见戈伊坦：《地中海社会》，第1卷，第173页。【39】

④ A. L. 尤多维奇：《西方康孟达的起源：伊斯兰、以色列还是拜占庭?》，载《反射镜》，第37卷，1962年，第198~207页。【40】

的公民与这个国家的风俗联系在一起，除非协议另做规定。在格尼扎合同中，很少按照犹太法让旅行的合伙人对损失负责——这可以用实际条款来解释：【429】代理人一般比老板年轻，并且不如他的支持者那么富有，而且很简单，他没有多少资本可以来弥补损失。穆斯林所遵循的是 *qirad* 惯例，因此投资者要承担损失。在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合同中写有具体的规定，但通常没什么效果：

> 我听说我的伙伴去了大马士革，尽管我曾告诉他不要离开兰姆尔，所有的买卖应该通过商人代表西巴（Siba）来进行。①

可见，投资者从福斯塔德社区、外国犹太人和穆斯林区选合作伙伴；但仍有优先顺序。这个顺序首先是同一家族成员签订的贸易合同——对埃及与突尼斯犹太人而言，这可能就意味着是定居在开罗或突尼斯的商人与他们在亚丁和巴勒莫的亲人间的贸易往来。福斯塔德纳雷·B·尼西姆与塔赫帝家族的凯鲁万有紧密的关系——这个家族本身就是阿尔及利亚人的祖先。纳雷在西班牙也有亲属；这个家族的贸易与定居范围涵盖了伊斯兰地区的许多地方；从安大路西亚到亚丁。但与那些把家族的财产存起来的中世纪威尼斯人相比，格尼扎犹太人并不常把他们的生意放在同一个家族公司里做。但是像意大利一样，也有非亲属间的伙伴关系，而且，与非犹太人间的伙伴关系更为经常，它经常服务于某种目的，比如使用穆斯林沙漠商队的路线等。

3. 格尼扎的商品及其价格

据说，福斯塔德犹太人经过埃及的过境贸易非常活跃，他们在供应国内所需的埃及商品方面也非常活跃。另外，他们还经营埃及的工业产品，特别是棉布和加工或未加工过的亚麻。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格尼扎私人商品的贸易是如何波动的。其他资料表明到 1200 年，埃及的纺织品出口数量有所下降；但格尼扎没有提到他的意大利竞争对手是如何成功地将其有竞争力的商品打入近东的。但是，格尼扎商人确实对伊斯兰其他地区——西西里、突尼斯和其他东方国家——的纺织品保持强烈的兴趣。他们特别从事着丝绸业的贸易，格尼扎提供了有关 11 世纪丝绸价格的重要信息。跟着戈伊坦考察一下福斯塔德的几种“典型”商品如胡椒粉、丝、亚麻的价格是很值得的。【430】每种情况下的价格变化都说明了某种特殊性。

胡椒粉的价格通常变化不大，但是考虑到西西里较高的运费和几经转手的中间人，可以预知西西里与埃及的价格不一样；下面的价格（每 100 磅）

① 戈伊坦：《地中海社会》，第 1 卷，第 178 页。【41】

指的都是埃及的价格，除非特别标明的以外：

11 世纪 20 年代（?）	每 100 磅 15 第纳尔
11 世纪 50～60 年代	"官方价格" 22.5 第纳尔
11 世纪 50～60 年代	23.75 第纳尔
1063 年	25 第纳尔
11 世纪 50～60 年代	33 第纳尔，因为欧洲人的需求上升
1064 年	35.25 第纳尔
11 世纪 50～60 年代	36 和 38 第纳尔——后者是"卖给欧洲人"的价格
11 世纪 50～60 年代	37.50 第纳尔，西西里的价格
1100 年	62 第纳尔[①]

尽管胡椒粉有不同的等级但很少有资料将它们区分开来，但对丝绸而言，有必要看看由质量决定的重大价格差异。11 世纪 30 年代到 11 世纪 50 年代，丝绸的确有"标准"价格，每 10 磅丝绸的价格为或接近于 20 第纳尔。但西班牙的高级丝绸在尼罗河的廷尼斯每 10 磅值 33 第纳尔，如 1075 年以后的状况就是如此。同一地方的丝绸类型与价格都不一样。1047 年，西西里丝绸在突尼斯卖价为每磅 2.5 第纳尔，但优质产品有可能达到 3 第纳尔，质量差一点的还卖不到地中海的平均价 2 第纳尔。戈伊坦认为丝绸是一种投资物品而不仅仅是一种交易商品。格尼扎时期和以后的埃及中产阶级企图利用丝绸价格的波动来额外赚一小笔。

与丝绸相比，亚麻是成批卖的。丝绸的价格以磅有时也以 10 磅为单位；但亚麻的单位更大——100 磅或更多。不幸的是，戈伊坦并未认真地将加工的与未加工的亚麻区别开来。但他强调大量的亚麻以原材料的形式出口到西部加工，这也许是正确的。他说"突尼斯和西西里是 11 世纪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埃及提供主要原材料亚麻"，这夸大了西西里的作用，对当时纺织品的生产组织与规模的图景有点言过其实。[②] 但福斯塔德的犹太人在亚麻生产的各个阶段都涉足其中。从埃及农村亚麻的种植及经营，到突尼斯和西西里（在 11 世纪 40 年代提得很多）的亚麻销售，再到对亚麻成品零售，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原麻的市场价比生丝的市价波动更大，但边际收益可能更 【431】

① 戈伊坦：《地中海社会》，第 1 卷，第 221 页。【42】

② S. D. 戈伊坦：《开罗格尼扎文献中的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Archivio storico per la Sicilia orientale*，LXVII（1971 年），第 10～13 页；比较 D. S. H. 阿布拉菲亚：《两个意大利：诺曼底的西西里王国和北部自治城邦的经济联系》（剑桥，1977 年），第 47 页；和阿斯托："Gli Ebrei"，第 447～449 页。【43】

大。在一定程度上，亚麻对格尼扎商人的重要性是11、12世纪亚麻对埃及经济重要性的反映。埃及的亚麻有22个种类。缪卡达斯早在10世纪的晚期就指出，廷尼斯工业中心每天的征税额高达1 000第纳尔；H. 拉比指出——尽管这个数字有所夸大——这意味着埃及统治者从纺织工业获得了一笔收入。① 11、12世纪，由于从印度进口一种很不同的纺织品即棉花，导致了亚麻工业的短期膨胀。在尼罗河地区有棉花种植园，西西里规模更大。亚麻与棉花混纺的纺织品在整个地中海都有名，被称为"福斯塔德布"，即粗斜纹棉布。纯棉生产的规模是否很大还不清楚；但人们使用棉絮生产纸张，这些纸张12世纪中期从亚历山大出口到热那亚和其他港口。② 格尼扎纸商一次可从埃及向突尼斯送成千上万张纸。因此，没有哪个纺织业部门——丝绸、亚麻和纸商织品——没有格尼扎商人的大规模参与。

格尼扎犹太人首先是香料和纺织品业的专家，他们开辟了通过埃及的商道，这样法蒂玛统治者就可以对他们进行征税，因而这些商人有助于加强国家财政的力量。但11、12世纪，政府和贸易路线再也不垂青埃及中产阶级商人。从西部和中部地中海进口商品成为意大利人的保留项目，意大利商人对埃及经济的重要性从他们继续受到的欢迎上可以看出，尽管他们积极支持圣地的基督教统治者，而这些统治者又是法蒂玛和阿尤比德人新的危险的敌人。从印度通过红海的进口贸易成了埃及穆斯林、卡里米人集团的专利，他【432】们从受宠于萨拉丁而获利，并且被鼓励赶走犹太或科普兹竞争对手。开罗的犹太人对海外贸易不是太热心，如前所示，许多人热衷于本国市场；许多人从老开罗转到新开罗之后就从格尼扎记录中消失了。而且埃及犹太人与他们的同宗者——甚至有血缘关系——之间的古老纽带在地中海的每个角落都被西方发生的灾难性事件粉碎了。贝督因人袭击突尼斯，诺曼人征服西西里，圣战者和意大利人夺取叙利亚海岸，所有这些都破坏了犹太人所依靠的贸易路线；更严重的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圣战时西欧对犹太人进行了可怕的迫害，同时遭受迫害的还有支持安达卢西亚的穆瓦希德（Almohads）征服者的原教旨主义者。早在1107年，无数欧洲犹太商人，更不用提西班牙与西西里的犹太人，都到福斯塔德寻求保护，以逃脱他们在家乡所遭受的商业和宗教磨难。

---

① 拉比：《财政系统》，第80页。【44】

② M. 阿马里（Amari）："Nuovi ricordi arabici su la storia di Genova"，*Atti della societa ligure di storia patria*，第5卷（1873年）。著名的档案《热那亚的乔凡尼手抄本》从12世纪起就写在埃及的纸张上。【45】

不仅仅是犹太商人感受到了这股冷风。地中海的意大利舰队在向西西里和圣地进军过程中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更靠北的贸易路线。这条路线绕过亚历山大，因而有利于提尔和阿卡（Acre）。与此同时，欧洲的纺织工业由于得益于先进的技术及更加积极的销售方式，也开始供应埃及。尽管格尼扎犹太人特别熟悉的原材料继续运出埃及和西西里，但它们越来越多地在伦巴第纺织机上加工。欧洲的成功是如此的有力，以至于埃及亚麻及西西里棉花被加工成意大利服装并泰然自若地取代了格尼扎的老家的名字；这些意大利粗斜纹棉布被卖回给其名字来源地的居民。

6.3.3　1150～1350 年间埃及的商业和政府

有关"后格尼扎"时代贸易活动的最清楚的证据来源于埃及政府的记载——官方或准官方手册，它们记载的是法蒂玛和阿由比德后期的税收和财政政策。从 12 世纪晚期后，埃及统治者越来越多地参与贸易，这一事实增加了这份资料的价值；特别是，他们从香料业中看到了一种可以提供战争经费的资金来源。这种态度本身就改变了埃及贸易方式的特点，这些方式将要在后面简单地作一讨论。在这些有关商业和税收的册子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高级财政官员马克祖米于 12 世纪后期写的《贸易税征收手册》。[1] 在两种 【433】 意义上讲，这都是关键之作：它以个人知识为基础，报道了马克祖米时代所征收的耕种和贸易税；并且它给后世的作者如 15 世纪的马克里斯提供了信息，因而对将来讨论政府参与贸易的情况有重要影响。

马克祖米提到，经过埃及各港口的主要商品往往控制在意大利商人手中。不幸的是，他对亚历山大的评论保存得不完整；但即便对达米埃塔和廷尼斯，他的明细表也比格尼扎商人的详细目录要丰富得多。换句话说，马克祖米的著作清晰地表明了福斯塔德犹太人的确忽视了埃及贸易的重要部门。他当然提到了达米埃塔和廷尼斯出口商品中的亚麻布、棉花及香料，而且还提到了鱼、鸡（来自达米埃塔）、盐、枣椰、调味品（来自廷尼斯）——尤其重要的是——还提到了亚历山大和达米埃塔的明矾。有趣的是，他在资料

① C. 卡恩：《马克祖米手册中的中世纪埃及地中海港口的关税和贸易》，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第 7 卷，1964 年，第 217～314 页；C. 卡恩：《一篇未问世的关于法蒂玛—阿由比德时期的财政论文》，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第 5 卷，1962 年，第 139～159 页；C. 卡恩："Contribution à l' étude des impôts dans l' Egypte médiévale"，上引书，第 5 卷，1962 年，第 244～278 页。【46】

中提到的进口商品可与格尼扎信函中提到的相比较。丝绸和锦缎被销售到达米埃塔和廷尼斯，而且廷尼斯还接受羊毛供应；两个港口都得到了金和银；亚历山大还有珊瑚、油及藏红花。更显著的是，所有三个港口都进口木材；马克祖米还提到了亚历山大和廷尼斯进口铁。埃及在战争物资供应方面的重要性已经谈过了。卡恩指出马克祖米提到了两种类型的产品：那些瞄准大规模国际贸易的产品以及外国船只上供商人与海员消费的产品。不幸的是，马克祖米没有说明他所提及产品的来源；而且几乎没必要说明“出口”商品包括许多通过红海进口或者甚至再出口的那些港口进口到埃及的商品。

马克祖米商人社区是由穆斯林、非穆斯林的希腊和拉丁访客混合而成的。有资料表明穆斯林商人乘坐穆斯林及希腊或拉丁来客的船只穿过地中海。对西西里商人可减少税收，这也许反映出许多西西里人仍是穆斯林，也反映出罗杰（Roger）二世与哈里发·艾尔—哈菲兹（Caliphar Hafiz）曾经订有贸易合同。令人不解的是他也提及了享受税收减免优惠的撒丁岛商人，这也许指【434】的是居住在撒丁岛海岸的前撒拉逊居民，尽管他们不可能在11世纪的波斯征服中生存下来。相比之下，以前安提俄克和劳迪西亚这些拜占庭领土的商人——也许是基督教徒——贸易税负担就比通常要重一些。[①] 这些商人集团经营的几个主要港口是达米埃塔、廷尼斯和亚历山大，但也使用罗塞塔和纳斯塔努这两个港口——往往是因天气或者其他紧迫原因要求登陆时使用。卡恩发现马克祖米有关廷尼斯和达米埃塔的描述不适用于13世纪，那时埃及大陆贸易还集中于亚历山大。廷尼斯在12世纪曾遭到圣战者的侵袭，甚至也许还受过诺曼人统治的西西里的侵袭，这个城市很快就丧失了其作为纺织业中心的重要性。达米埃塔一直引起了外国人的兴趣，尽管它也是反对埃及作为贸易中心的圣战的基地。它在尼罗河地区及叙利亚的城镇贸易中一直是重要的中心港口。

《手册》及其同类资料表明了政府干预贸易的程度：这点比较有趣，因为从税收数字中可对贸易大小作一粗略估计。萨拉丁的大臣埃尔—法蒂尔(al-Fadil）说，在犹太纪元587年间（即1191～1192年），光亚历山大的库姆斯的税收就达到28 613第纳尔；伍一税是在尼罗河三大港口对基督教徒

---

① 在热那亚公证人兰布托·蒂·桑布塞托的剧目中几次提到过来自前安提俄克行省的希腊商人，或至少是东正教的商人，这些剧目是在13世纪晚期的塞浦路斯完成的；也许这些商人有100多年前成功的先驱：V. 波朗尼奥主编：*Notai genovesi in oltremare: atti rogati a Cipro da Lamberto di Sambuceto*（1300年7月3日～1301年8月3日）（热那亚，1982年）它的续集是由R. 帕文尼（Pavoni）主编，（热那亚，1982年）。【47】

征的进口税。其名字的意思是“1/5”，但对某些物品或商人群，可高可低。拉比指出，如果埃尔—法蒂尔的数字正确的话，它就“代表了萨拉丁时期埃及税收的相当一部分”；它也说明了单是通过地中海港口就有100 000第纳尔的进口。[1] 没有必要具体调查这些港口复杂的税收结构；但有趣的是某些本地生产的或进口的香料税收特别高——芫荽、葛缕子、八角、小茴香——因为这些税收可产生巨大的国库收入。到12世纪后期，政府加大了征税的强度，为了将收入最大化而违反了协定的原则。例如，扎卡特（*zakat*）从技术上讲是为了应该得到帮助的人征收的税：穷人、皈依者、破产者、圣战的志愿者，还有扎卡特本身的管理者。但是到1200年征税政策“成熟”【435】前，政府征收的税经常比法令规定的高2.5%（从技术上讲，不应该对不到一年前得到的商品征税），并且对免税人如朝圣者收税。1181年一群从也门到埃及去的卡里米商人支付扎卡特税时发现他们已经连续4年违犯规定。萨拉丁时期主管税收的财政部门，迪万—艾尔—扎卡特每年要获得50 000第纳尔的税收。后来扎卡特变成了对店主的库存征税。直到13世纪后期，马木路克苏丹卡拉旺认为这个惯例严重侵犯了贸易，才决定一举废除扎卡特。[2]

政府对生产的兴趣扩张更深。耕地税，即卡拉吉（*kharaj*），它依农作物的不同而比率不同：亚麻是3第纳尔，而棉花和本地香料则少些；蔗糖和靛蓝均高于平均水平。从田地到车间，亚麻都要上税，直到萨拉丁减轻了纺织车间税。在经济影响很严重的情况下，就会废除某些税收，而当皇室需要资金时就会重新征收。萨拉丁废除了糖制品和糖果的税——最明显的是出口到亚洲和欧洲的糖——但14世纪早期马木路克们又重新开征这种税。政府对明矾的生产特别感兴趣。在意大利人获得进入安纳托利亚内地的常规途径之前，埃及在12世纪是明矾的主要来源地；埃及统治者垄断了这一行业。斯特拉斯堡的布查德（Burchard of Strasborug）告诉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埃及的“明矾是为了国王的使用而收集的”[3]。欧洲人对明矾的需求就像欧洲人对纺织品的需求一样增加，因此13世纪晚期以前，小亚细亚发现明矾并没有减少埃及明矾的吸引力。伊本·马马提解释说，阿由比德时期政府利用明矾以解决因进口木材及其他原材料而产生的债务问题。如果政府从一个

---

① 拉比：《财政系统》，第91~92页。【48】

② 拉比：《财政系统》，第99页。【49】

③ C. 卡恩：《Phocée之前的明矾：十字军时期伊斯兰——基督教经济史的一个环节》，载《社会经济史评论》第41期（1963年），第433~447页。【50】

商人手里买了商品，那么这种商品的价值比商人将商品作为一个整体支付的伍一税，也就是值5抽1的税高，伍一税不是直接征收的；相反，政府付给商人的是商人需付伍一税与政府要求的其商品价值的差价：明矾是2/3；黄【436】金是1/3。其他受国家控制的商品，从商业记载可知的包括盐、泡碱及黄金，这在法老的坟墓有很多发现。国家的绿宝石矿产也有相当大的商业意义：10世纪，政府起初只按比例抽取发现的绿宝石，但到14世纪则全归政府了。出口绿宝石给统治者带来了巨额利润，尽管事实证明不值得信任的矿场管理人是老练的走私者。

从法蒂玛时期起，由一个政府机构即马特加（*matjar*）来管理政府垄断商品并且购买政府所需的产品和商品：开始是小麦，后来是明矾、木材、铁、铅和肥皂。[①] 马特加有权强制将丝绸、明矾、铅及橄榄油的买卖转给政府；但也有其良性的一面；因为即使自由市场价格很低时，政府也以保证价格购买商品。对战争物资——木材和铁——的重视是明显的。但是腐败开始很猖獗，马特加官员开始将木材卖给个体商人，因此当国家需要战争供应时，政府不得不将本是自己财产的木材购买回来。马木路克时期，即大约在1310年，苏丹对马特加的控制更紧了，使其成为他们的私人财产。

埃及政府干预贸易生活的方式与地中海其他国家类似，这些国家拥有活跃的、能干的官员和有效的战争机器：西西里王国或拜占庭都处于鼎盛时期。[②] 政府对经由埃及的贸易的保护仅次于对战争用品供应的保护。对亚麻征收重税表明政府抓住了赚钱的机会，它不关心主要产品重税所带来的后果——廷尼斯也有同样的现象，在那里，纺织工业税收负担十分沉重。与此同时，通过埃及的商品流动给政府创造了资金，而这就可以直接用来资助战争费用。

6.3.4 1150～1500年间的卡里米商人

12世纪末期，埃及商业活动中出现了一股新的力量，他们在也门、印【437】度及邻近的大马士革有商业利益。“卡里米”商人吸引了历史学家的极大关

---

① 拉比：《财政系统》，第92页。【51】

② 要做一个比较，可参照H. 安东尼亚蒂斯—比比科的《拜占庭关税研究》（巴黎，1963年）；D. S. H. 阿布拉菲亚：《在罗杰二世及他的继任者统治下的王室和经济》，丹巴顿橡树丛书，第37卷，1983年；J. 利赖—史密斯：《拉丁叙利亚的政府和外国商人中的朝圣客》，收入D. 巴克主编的《中世纪东西关系》（爱丁堡，1973年）。【52】

注，菲谢尔列举了14个以“卡里米”这种名字而出名的商人，而威特和阿斯托则进了一步，他们把以这个名字而出名的人扩展到大约50个红海商人。① 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财产、家世还有——差不多无一例外地——他们的宗教信仰都可以确认。而且，人们对“卡里米”这一词的起源与意义逐步达成了共识。这个词最可能的解释是，它从起源上讲是一个泰米尔语，卡雅姆（*karyam*），意思是“商业”或“事务”；无论如何，它完全有可能是一个外来语，因为在12世纪的文本中为“卡里姆”，没有任何冠词。后来卡里米与之有广泛的接触的印度商人采用它，并且是以诸如“这里的阿拉伯人为卡雅姆”这样的形式来使用它的。到1200年，它完全转化成为穆斯林商人的某种荣誉头衔。与此同时，卡里米取代了犹太人与科普兹人竞争者，获得了远远超出早期几代印度商人的财富与影响。

戈伊坦发现格尼扎信件中的资料不是“卡里米”而是“卡里姆”，意思（就如它的字义所体现的一样）是护送队，12世纪在埃及与印度之间定期往返。这种护送队通过多条路线进入印度洋——有时通过亚丁，但是偶尔通过东非港口，沿途经过阿拉伯岛。他猜测路线也许年复一年地交替改变；尽管卡里米以后的经历表明，如果这条路线改变了，那是因为也门苏丹甚至埃塞俄比亚（Ethiopia）人尼格斯在红海路线上制造了政治困难。戈伊坦指出12世纪的卡里米因其优秀的陶器而著称；有一封信提到说“像这样的货品在卡里姆（甚至）是找不到的”；而且卡里米护送队运送了大量的货品：

> 就卡里米而言——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我的连襟马鲁兹寄自萨瓦金的一封信告诉我有3 000担货物，并且乘着我们的犹太商业朋友卡里米的船向家乡驶去。

这封信可追溯到1120年代或稍晚些。戈伊坦对印度通信人的分析清晰地表明这一事实，即有许多其他的商人在没有形成护送队的情况下穿行于卡里姆路线。② 【438】

包括许多犹太商人在内的商人护送队的图像，到1181年当卡里米（与

① W. J. 菲谢尔：“Über die Gruppe der Karimi-Kaufleute（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Orienthandels Ägyptens unter den Mameluken”，载Fr. 罗森豪尔（Rosenthal）、G. 冯·克鲁鲍姆（Von Grünebaum）、W. T. 菲谢尔（Fischel）：《阿拉伯研究》，第1卷（《东方研究》，第14期，罗马，1937年），第67～82页；W. J. 菲谢尔：《马木路克埃及的香料贸易》，《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第1卷，1958年；G. 威特（Wiet）：《马木路克苏丹时期的香料商人》，载《埃及史杂志》，第7期（开罗，1955年），第81～147页；E. 阿斯托：《卡里米商人》，载《皇家亚洲协会杂志》，1956年，第45～56页。【53】

② S. D. 戈伊坦：《有关卡里米商人的发源的新的观点》，载《东方经济社会史杂志》，第1卷，1958年。【54】

卡里姆相对立）出现在阿拉伯文献中时已经模糊了。那年有关卡里米的一份资料提到了必须交4年的扎卡特。大约在此时萨拉丁给予卡里米商人以保护，格尼扎商人的旧秩序开始瓦解。卡里米人——在这种意义上就像印度商人享受苏丹的保护——从此在整个红海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地位到15世纪开始才有大幅度下降，首先是苏丹巴斯拜（Barsbay，sultan）（1422～1438年）统治，后来面对葡萄牙的反对。整个卡里米时期，这些商人的主要利益是从东方到埃及的香料贸易；但他们也经营许多马特加商品，如木材、小麦、面粉、大米、武器及纺织品。卡里米是来自印度和东方的武器的一个主要来源，类似于意大利是西方的主要武器来源。而且，他们经营的范围比福斯塔德犹太人广泛，犹太人很少经营大宗食品。但是相比之下，卡里米在选择贸易路线时更为保守。他们在亚丁建立了一个终点站，限制它们的东进运动。1289年，也门苏丹在亚丁自己的船上安排了一个宴会，邀请卡里米及所有在港口的印度船长参加：这个事件似乎表明，印度承运人大规模地控制了从亚丁到其家乡的航海活动，尽管卡里米控制了红海到埃及的航海。另外，1289年的宴会表明卡里米之间存在有航运企业，他们不仅仅是商旅。

卡里米商人是否拥有一个公司实体——或者说一个行会组织——这个问题特别难以回答。在开罗、福斯塔德、亚丁、亚历山大、吉达、奎斯、扎比德和塔亚兹，即沿着红海和尼罗河路线，都有卡里米货栈。这些货栈可以说是卡里米商人的一个中心指挥站。有资料表明商人有共同的团体，“他是卡里米首长”；“他属于卡里米商人”；但是，不应该太多地强调这些对其地位的比喻性描述，就如那些文学资料所做的那样。假如卡里米间有什么界限的【439】话，那么这些界限是财富、名声、职业地位。因为，首先，所有卡里米似乎都是穆斯林。在13世纪后期很活跃的伊本·卡苏尔是犹太人的儿子；另外一个卡里米则有一个科普兹人的父亲。但他们本身就是或已成为穆斯林。阿斯托试图表明存在犹太卡里米，但其确切证据来自于一个更早的时代，即格尼扎信函中所知的卡米姆运送队。另一方面，阿斯托将卡里米的特点定义为完全的航运者。“卡里米人因共同的职业利益而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我们可以确信最富有最有威望的卡里米经常决定要讨论的问题，也就是他和这个组织中的一些杰出的成员把问题交给政府，而且他的权威为所有卡里米所认可”。[①] 阿斯托正确地反对这种假设即此时西方出现了这样一种社会组

① 阿斯托：《卡里米商人》，第52页。【55】

织——行会条例及类似的规则——肯定折射出东方的一些习惯。

卡里米贸易繁荣的一个原因是埃及——肯定还有也门统治者——从卡里米的关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润。有一个专门任命的管理者来看管卡里米贸易的税收，那就是卡里米贸易监护官。在经过一系列强盗侵袭后，埃及政府派军队在红海保护卡里米船队——换句话说，卡里米值得保护。12 世纪 70 年代，雷劳德·德·查蒂农（Châtillon, Raynaud de）对红海的调查在整个红海贸易路线历史中引起极大的反响。而且，埃及政府还和也门的拉苏里伊德王朝建立了良好关系。最好的是，14 世纪马木路克们从也门获得了对其宗主权的承认；其他时期，卡里米充当使者的作用——这个特征象征着马木路克们在财政上对卡里米商人的依靠以及卡里米人在皇宫享有很高的威望。

卡里米享有很高威望的原因是他们给埃及中央政府提供贷款。卡里米将剩余资本用于高利贷；他们的一些客户特别重要：如也门统治者塞内加尔国王曼萨·穆萨（Mansa Musa）曾在 1323 年经过埃及（尽管证明他是个十分糟糕的债务人）。但马木路克们对卡里米银行家就并不总那么友好。当 1300 年蒙古人威胁马木路克时，当叙利亚 1352 年暴乱时，当帖木儿在 1394 年志在必得地挥师西征时，都有强迫卡里米提供贷款的事发生。有趣的是，同一【440】个苏丹既颁布慷慨的保护宪章，同时又强迫卡里米提供贷款：1288 年卡拉文带领了一些显赫的大马士革商人到开罗并对他们处以罚款；然后又迫使卡里米贷款给大马士革，因为大马士革没有那么多钱。但是通常是由于战争开支的需要而要求商人们提供贷款或朝贡。伯汗·阿尔—丁·阿尔—马哈里（Burhan al-Din al-Mahalli），也门的大使，在 1403 年帮助支付了亚历山大的国防开支。虽然卡里米贷款给苏丹的证据极为清楚，很显然卡里米也借钱给更小的客户。马克里斯提到过卡里米与基督教徒的交易，前者投资 20 000 第纳尔作为资本。

尽管有关卡里米的商业利益还可以谈很多，但是商人被转变成或自身转换成卡里米的过程是个谜。许多卡里米出身非常卑贱。伊兹·阿·丁·阿巴德阿·阿齐兹·本·曼苏尔开始谋生时是一个下等的裁缝，而阿·马哈里也是由穷而富的。有一个例子——如扎基尔·丁阿布·巴克拉尔·卡鲁比——我们知道他是个穷商人——由于从叔叔那儿继承了一笔巨大的财富而变富。卡里米的出身显然也是多样化的：有来自埃塞俄比亚和土耳其边界的穆斯林。比较典型的也许是巴德尔·阿尔丁·哈桑·本·苏文德阿·马里基的一生；他经过法律培训并且在 1387 ~ 1388 年继承了一些钱；他开始经常往返于埃及和也门之间。到 1425 年去世时，他已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由于卡里

米主要专长经营香料贸易，该行业利润特别可观：从亚丁到埃及可达100%；而且只要到达埃及，实际上就获得了将商品卖给意大利商人的保证。另一方面，风险是非常高的，尤其在印度洋，既有强盗又有岩礁，因此消耗了利润。12世纪一个“前卡里米”商人阿布阿巴斯·阿尔—海贾兹在印度洋一次就损失了10艘船，幸运的是，另外第11艘装有中国瓷器和芦荟木的船没有损失。仅此一次就可以补偿他损失的财产而且有余。

某些卡里米的低下出身并不妨碍短命商人王朝的诞生。一些大卡里米的儿子与其他卡里米通婚。阿斯托指出，卡里米并不试图破坏贵族等级而成为暴发户。他认为他们内部的通婚是因为缺乏一个马木路克家族，或者至少没有一个固定的杰出家族社区。但是，卡里米可以获得进入马木路克苏丹内部圈子的特权。阿·马哈里也许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过程。他以岳父的名义经[441]商，他的女婿是一个有名的法官；他出使过也门和埃及，与苏丹关系非常近；但他的儿子浪费掉了他家产的大半。有趣的是他不仅仅是一个商人：他拥有价值50 000第纳尔的房产，他把这份财产的一部分捐给宗教学校。伊本·缪萨拉姆的生涯也类似，尽管他的出身非常模糊。他的婚姻很好，他给每个儿子留了20 000第纳尔；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印度商人；他还拥有自己的房子和土地。卡里米拥有城市地产、糖厂、仓库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的利益是非常多样化的。但与同时代处于相应地位的意大利商人不同，他们对获得房地产没有强烈的兴趣，而且他们完全处于一种相反的贸易风气的控制之下。

这样一种风气在15世纪的埃及非常流行。政府果断支持卡里米商人以对抗印度商人；抛弃印度商人的原因与早期宠爱他们的原因不无类似之处——马木路克们要钱。没有迹象表明马木路克们本身对臣民的经济繁荣有兴趣，除非考虑到帝国非常穷，无法维持他们的战争花销。巴斯拜的统治标志着一个马木路克政策的新转变，政府更加直接地干预香料贸易，卡里米的影响相应减少。1438年苏丹禁止卡里米直接将商品在亚历山大卖给印度商人。政府对香料和糖实行垄断。因此政府可以固定的价格将商品卖给欧洲人。从卡里米商人手中的强买有利于阻止非法库存或其他一些不利因素。与此同时，巴斯拜极大地增加了红海的安全，并使吉达成为东方货品登陆的重要基地。将重点放在吉达——即一个马木路克控制的城镇，它有着有效的税收制度——这降低了亚丁作为埃及和印度之间的首要贸易中转站的地位。诚如达拉格所

说，“亚丁流失了大量的财富”①。马木路克们能够利用也门的拉苏里伊德王朝的弱点，坚持经过也门的埃及贸易应该不受干预，即使不利用亚丁。

15世纪，马木路克苏丹的财政变得越来越困难。国家决定直接干预香料贸易，由一个新建的商人骨干小集团进行监管，它的任务主要是满足苏丹自己的需要。苏丹委托商人以他们的名义买香料。死于1444年的阿尔一基拉尼，阿里，受托以5 000第纳尔购买香料，而且仅此一项就为苏丹获得了12 000第纳尔的利润。因此，香料业此后就由政府的“商人之王（*malik al-tujjar*）”监督，他是负责红海和印度洋航运的政府官员。政府商人卡瓦贾斯（*Khawajas*）在15世纪成为财政官僚的信托团体；私人卡里米商人将地盘让给了更受宠的后继者，后者的商业生涯又与公共服务联系在一起。另外的一个事件助长了卡里米的衰退。马木路克政府与也门以东的统治者接触越来越多。14世纪中期开罗与锡兰的外交关系的建立有很重要的意义。巴斯拜与德里统治者建立了联系，后者对伊斯兰是陌生的，因此对遥远西方的伊斯兰心脏地带十分感兴趣。巴斯拜时期，礼物、贡物及对马木路克宗主权的大致承认也传达到了开罗和汉志。15世纪初中国船只出现在东非沿岸，这也许刺激了马木路克们更进一步考虑他们在印度洋的政策，因为他们担心中国会与之争夺对贸易路线和印度王公效忠的控制。 【442】

马木路克那时试图重建东方香料贸易，但他们没有太认真地考虑卡里米的利益。马木路克们不关心维持几百个印度商人的繁荣问题；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保证印度贸易继续存在，以便给政府带来资金。

6.4　穆斯林在远东的贸易

6.4.1　600～1511年间的室利佛逝和马六甲

从地中海到达远东的两条路线——陆地经过中亚、海上绕过印度——在不同时期都繁荣过，而且这两条路线很少直接竞争。这个事实反映了亚洲内部重大的政治变革——宋朝时期中国的分裂，蒙古人在钦察汗时的崛起，某

① A. 达拉格（Darrag）：《巴斯拜统治期间的埃及：825～841/1422～1438》（大马士革—贝鲁特，1961年）。【56】

些明朝统治者对海洋扩张的态度等。相应地，西亚、东南欧和俄罗斯大草原【443】上蒙古人的征杀导致了远东古代陆上贸易路线的破坏与转向。大体而言，当中国（或蒙古人）的政治控制扩张到西方——突厥斯坦——时，当波斯、近东和地中海东部较为安宁时，陆地路线的确开始繁荣。晚期罗马帝国具备这些条件，当时的丝绸之路将货品运往东方并通过萨珊波斯将3、4世纪的三大帝国中国、波斯和罗马联系起来。拜占庭丝绸工业的发展是以东方手艺人披露的工艺秘密为基础的，伊斯兰在前罗马和萨珊土地上的崛起导致了陆地贸易路线的衰退；远东丝绸在地中海失去了其作为最有价值产品的地位，这就不足为奇了。

5、6世纪远东的独立发展慢慢产生了海上贸易路线。中国南北朝的分离使外国人到中国南方不很容易，至少从陆上前往更不容易。而且中国南方统治者开始对亚洲海岸外的野蛮人越来越感兴趣，试图要他们承认中国南方朝廷的宗主地位。这种承认本身促进了商业关系：爪哇和其他朝贡岛国送给中国大量的产品，尤其是香水，以示对其宗主权的某种程度的承认，中国皇帝反过来非常慷慨地送给他们大量的礼物，价值与接受的朝贡物相当。在这些货品的流通中，苏门答腊的马来人地区和马来亚半岛有特别的意义。

从7～14世纪，室利佛逝（斯里维查雅）的马来人国家在马来西亚海峡繁荣起来，成为印度洋与中国海间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它拥有只能称作天然的商业实力。从印度到中国的船只在马来半岛的狭长地带受阻；有个港口正好位于船只所必经的路线上，巨港就是这样，它是室利佛逝的首都，可能扼东南亚交通系统中心之咽喉。而且，由于东南亚季节的变化，开往中国的船只不得不在马来西亚地区停留几星期。但巨港的成功不仅仅是被动的。马来人本身的航海技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甚至在室利佛逝出现以前他【444】们就曾大量参与本地的印度尼西亚香料贸易。但马来商人最杰出的成就也许是给中国人带来了大量产品，而这些商品在5世纪前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如室利佛逝东部的印度尼西亚诸岛的松香、安息香及其他香料。沃尔特斯认为这些香料代替了从阿拉伯运到印度洋的松香——因为著名的乳香和没药的昂贵价格和遥远距离使得其在与那些质量稍差的但仍为大家所接受的印度尼西亚松香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① 实际上，早在公元500年，印度的安息香在远东就比西方的没药更走俏。沃尔特斯还说在室利佛逝有一个

① O. W. 沃尔特斯（Wolters）：《早期印度尼西亚的商业：对斯里维查雅的起源的研究》（伊萨卡，纽约州，1967年）。【57】

地方用苏门答腊松树脂搀真正的阿拉伯乳香而制作香料。室利佛逝替代印度香料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无论是假的还是真的。巨港忽然成了重要的贸易中心：是想要把西方商品带到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一个落脚点，是乳香松脂及其他东印度香料的国际仓库。宋朝的一个作家描写了乳香贸易：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作家的写法，他将这种贸易看成中国渴望带给中国海岸的一种单向的联系方式：

> 阿拉伯人用船将货物带到室利佛逝进行交易。在室利佛逝往往会大量的这种香水。每年都有船从室利佛逝到达广州或泉州。在这两个港口，水上官员都要检查香水的总量并确定价值。(Ch' ên Ching, *Hsin tsuan hsiang p' u*, quoting the lost *Hsiang lu* of Yeh The' ing-kuei.)

有关室利佛逝实力的更多证据可从中国有关资料中得到，它提到了前往宋朝宫廷的大使，如在988年和1178年使节朝拜的情况。尽管室利佛逝也试图巩固其在本地的地位，并且在1000年，左右与爪哇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约1000年），它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南印度统治者科拉·拉詹德拉一世（公元1025年）的威胁。坦乔庙宇的碑文记载了科拉·拉詹德拉的入侵，这表明了室利佛逝政权沿着苏门答腊和马来西亚海岸的广泛扩张——也许甚至远至尼科巴群岛（它在碑铭中是纳卡维拉姆，而在马可·波罗的传记中就是尼库维兰），那里也许给室利佛逝进过贡。阿拉伯的资料之所以对室利佛逝感兴趣是因为其他的原因。① 10世纪末马苏蒂写道，即使最快的船在两年内也不能来回室利佛逝。它的产品包括：樟脑、芦荟、丁香、檀香水、小豆蔻及其他香料；在这里，作者也许将室利佛逝与其他印度尼西亚岛屿混淆了，这些岛屿中仅有几个岛才承认王公的政权。但关键的一点是：阿拉伯是从巨港和苏门答腊获得这些珍贵香料的，甚至马来人也只是室利佛逝和真正生产香料和香水的远东更原始地区间的中间人。 【445】

尽管巨港②横跨马来海峡，占领了制高点，外国船还是可以偶尔躲过室利佛逝（Sri Vijayan）的税收而直接驶过。赵汝适（Chao Ju-Kua）在1225年写道，圣佛齐（San-fo-ch' i）

> 控制了外国交通必经的海峡，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无论是哪

① P. 惠特来（Wheatley）：《金色的赫尔松：对公元1500年以前的马来半岛历史地理的研究》，（吉隆坡，1961年），引用了所有的这些资料。【58】

② 巨港（Palembang）印度尼西亚苏门达腊岛东南部港口城市，又音译作巴邻旁。——译者注。

个方向。如果有商船不经停那里而驶过，就有船只按预先安排的方式发动侵袭。为了达此目的，那里的人民不惜一死。因此这块土地就成了重要的海上中心。[1]

因此，不足为怪的是，乘船而来的阿拉伯商人很少深入到这以远的地方，甚至也看不到要到苏门答腊以远的地方的原因。同样地，他们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其他部分的了解也是很粗浅的——无论是马来西亚的北部还是更小的贸易中心，如特马塞克（新加坡），他们都没有光顾过。写于10~12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地理著作重复了有关室利佛逝的众所周知的常识；如编纂于1150年代的伊德里斯报告，充斥着确定或不确定的事实、时代错误甚或常识性错误。人们非常希望将修道士与美人鱼强加于有关远东奇异小岛的描写之中，这反映在水手辛巴德的传说中：

次日我们出发，爬过巨大的山地，在峡谷中看到了许多大毒蛇，最后我们来到一座较大的岛上，岛上有个硕大的樟脑树园。每棵树可供100个人遮荫避雨。当家族的人想要樟脑的时候，他们就用一根长铁丝在树干的上部钻孔；树汁，也就是液态的樟脑就会流出来，他们就将其装在瓶子里，像搅拌橡胶一样地搅拌；这样树就会枯死成为木材。而且，岛内有种野生动物，叫犀牛。它的姿态像掌舵一样，还有水牛围着我们，……这是一种惊人的动物，角又大又厚，有10腕尺长，头在中间，中间有两条裂缝，很像人。

【446】 （《辛巴德的第二次旅行记》，R. 伯顿）

但阿拉伯商人对马来西亚的锡矿和苏门答腊珍珠业有一些了解，伊德里斯对其进行了描述。

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在1200年前室利佛逝就达到了繁荣的高峰。鼎盛时期的巨港是世界性的，甚至鹦鹉都会讲几种语言。但1178年，周去非(Chou Kü-fei)发现爪哇比三佛齐更富有；一个现代权威G.科德斯(Coedès, G.)正确地评论道，根据婆罗浮屠和其他爪哇庙宇的实物残余假设爪哇比巨港（其中世纪残存很少）更繁荣是错误的。但是沃尔特斯分析得更深：他认为室利佛逝并没有经过如大家普遍认为的那样剧烈的衰退。他指出，中世纪后期马来亚的几个新兴经济强权——主要有特马塞克（Temasek），之后在15世纪的马六甲——都是由宣称自己是由室利佛逝皇室后裔的一些王朝统治的。同时，王朝权力的更迭还是一个权力中心从巨港经占

[1] 上引书，第298页。【59】

碑（Jambi）和特马塞克到繁荣的马六甲新首都逐渐转移的过程。换句话说，到13世纪晚期巨港已过了繁荣期，但它不是没有替代者：早在1079～1080年占碑就是与其竞争的政治中心；但从室利佛逝到马六甲王室血统及贸易生活的连续性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室利佛逝一直“没有衰落”[①]。

但它的确衰退了。室利佛逝内部的变化有来自国外的原因。强大的爪哇王国和北苏门答腊自治国家开始与室利佛逝政府争夺贸易路线，就像商人自己所做的那样。爪哇的辛格哈拉尔斯王国统治了整个北苏门答腊，并且从婆罗洲部分地区、马鲁古群岛和半岛接受朝贡。14世纪满者伯夷（Majapahit）的爪哇王国有了更大的影响。但是这些考察并不能解释室利佛逝的衰退。阿拉伯商人仍拥有寻求香料群岛产品的西方顾客。卡里米商人此时仍异常活跃，并且在印度洋贸易中非常成功。导致室利佛逝诞生的过程同时也带给室利佛逝埋下了衰退的种子：中国有关野蛮世界的观点又一次发生改变。13世纪末准确地说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在元朝（蒙古人）的统治下中国从南中国海向亚洲扩张；这时通往西方的道路可以沿一条新的经北方的陆路到达，从长城延伸到里海或黑海；当时大胆的西方商人进入泉州及其他中国港口，甚至建立意大利人居住区。所有这些导致了通过马来海峡向西延伸的印度洋商路的衰退。【447】但它并没有使印度群岛与中国大陆的贸易衰落，相反，这种贸易却繁荣起来：贸易现在直接从爪哇、西里伯斯岛和其他香料岛往北进行，而不是集中于室利佛逝首都单一交易中心；从中国大陆而不是从印度尼西亚通向西方的贸易路线开始开通。这种转变的影响在整个伊斯兰贸易区及更远的地区——曾遭受衰落之苦的亚历山大，都感受到了，其衰落程度不亚于巨港。另外，南中国海给中国独立的航海者带来了更多的贸易机会，他们的船直接航行到香水和香料的供应地。结果，中国本身成为一个香料市场，吸引了来自基督教和穆斯林地区的商人，而在12世纪及13世纪早期，中国往往将获得的香料用于国内消费，外国商人则在马来亚以远的地方经营。在野蛮的元朝的灰色统治下，中国国内对香料和香水的需求大大下降了。了解这些发展对卡里米和泰米尔商人的影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印度洋的贸易路线。

尽管这些变化非常剧烈，但它们对室利佛逝的影响并不是永久的。蒙古帝国的分裂意味着14世纪中期时陆地贸易路线不再安全。无论如何，西方商人变得不再那么富有冒险性。1368年明朝的建立促使中国重新考虑南海

---

① O. W. 沃尔特斯：《室利佛逝在马来历史上的衰落》（伦敦，1970年）。【60】

问题，中国皇帝又采取了宋朝时期的南下政策。15世纪初，大臣郑和（Cheng Ho）航行到印度洋，使中国获得了西至非洲之角国家对中国宗主权的承认。① 这股重新焕发的活力从几个方面促进了马来亚贸易。首先，郑和效忠的皇帝——永乐皇帝——是个篡夺权位者，他试图证明他的权威至少与那些杰出的先辈一样，一系列的朝贡使他名声大振。其次，这位皇帝想要把南中国海发展起来的私人贸易更稳固地操纵在国家之中。王庚武（Wang Gung-wu）认为这一政策是镇压随贸易而来的强盗行为的努力，但这位皇帝【448】可能希望从这种贸易中获得税收，其财政动机不可忽视。② 最后，永乐皇帝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他的父亲汉武帝（Hung-wu, emperor）在1389年死之前实施的财政政策，开始把目光投向南方，希望与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诸国结成同盟。

这个政策与那些国家重要的或意义深远的发展相一致。可能的情况是，即1403年前不久，印度冒险家拜里迷苏剌就在马来海峡创建了一个小而强有力的基地，当时中国宦官尹庆（Yin-k' ing）在控制马六甲时发现了他。帕拉莫思维拉的身世被披露出来了。他是14世纪繁荣的贸易与政治中心麻喏巴歇（Majapahit）一位公主的丈夫。据说他出生于巨港；但在起义反对爪哇统治后，他向北逃跑，首先到了特马塞克（新加坡），然后到了他自己的新基地马六甲。马六甲穿上了中世纪早期的室利佛逝曾穿过的外衣。沃尔特斯指出，永乐皇帝的政策并不直接有利于马六甲，尽管它也像其他几个印度岛国家一样承认明朝的宗主地位。但中国的原则是对各诸侯国平等对待。因而只有中国船队到港口的时候，贸易才会兴旺起来——但沃尔特斯认为："这种贸易是不正常的，取决于永乐政策的延续性。"③ 因此，马六甲作为一个贸易基地的成功不应该归功于其奠基人，而应归于后来的统治者——这些人承认中国的宗主权，而且接受了另一个束缚即穆斯林信仰。明朝远征到1436年马六甲统治者皈依伊斯兰教时遂告结束并成为历史。这个行动也许是试图吸引西方的穆斯林商人到马六甲，尽管我们考察了一些地方细节，而且应该强

① 王庚武：《明朝早期与东南亚的关系》，收入J. K. 费尔班克（Fairbank）主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剑桥、马萨诸塞，1968年），第34～62页；T. 费勒斯（Filesi）：《中世纪时中国与非洲的关系》（米兰，1962年）。【61】

② 王庚武：《中国历史上的"公""私"海外贸易》，收入M. 莫拉特（Mollat）主编：《东方及印度洋地区的商会和贸易公司——第八届海洋史国际研讨会》，贝鲁特，1966年（巴黎，1970年），第215～226页；同一作者，《1403～1405年中国和马六甲关系的建立》，收入J. 巴斯廷（Bastin）和R. 鲁尔文克（Roolvink）主编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研究：纪念理查德·温斯特德爵士的85岁寿辰文集》（牛津，1964年），第87～104页。【62】

③ 沃尔特斯：《室利佛逝的衰落》，第157页。【63】

调室利佛逝王朝和马六甲王朝的衔接上，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想像的。

沃尔特斯的观点对那些认为马六甲一开始是并且天生就是东西方之间的一个重要港口的人提出了重要的警告。但通过确认马六甲历史上那个比较早、不很繁荣的历史阶段，沃尔特斯使人们更加相信15世纪马六甲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唐·阿方苏·德·阿尔布克尔克（Don Affonso d' Albuquerque）的一个很明显的目标就是他要以葡萄牙名义控制印度贸易，就像他在1151年做的那样。马六甲的成功不是以本地资源为基础：吉打洲的锡【449】矿也只是逐步地纳入城市控制下；本地食物供应缺乏；邻近的统治者不愿意提供物品给一个看似寄生居住地的地方。马六甲的实力，更多的是在东西方海运贸易复兴时其在海峡所处的位置。为了生存，它必须依靠贸易，或服务于贸易；并且它成功地获得了食品供应，因为它有钱支付进口所需。这些钱是他们自己贸易的产物——港口税、市场通行税等。为了保证这份收入，马六甲人将其控制扩大到了附近的海岸，并派船巡逻，迫使商船进入马六甲。惠特来评述道："就像在室利佛逝时代一样，马六甲海峡成了私人海洋。"①马六甲力求垄断这条贸易路线。葡萄牙作者汤姆·皮雷斯在描写他的国家的新征服者时，对马六甲及其历史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他说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人们说84种语言，但他也提到1509年马六甲有大约1/4的商人是古吉拉特印度人。②

马六甲，像室利佛逝一样得益于东南亚的季风变化。如果是来自西方的驶往中国的商船，就被迫在马六甲等待有利的季风；如果是从中国而来前往西方的商船，也得在那里等待有利的季风。几乎没有直达的通道。汤姆·皮雷斯解释道：

> 马六甲是一个为商人建造的城市，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城市都合适；季风一结束，其他活动就开始了。马六甲被包围在中间，不同国家间从事贸易和商业的成千个成员都必须进入马六甲。③

这种贸易包含了与印度和红海的远程贸易以及寻找古吉拉特人（Gujaratis）和卡里米所珍视的贵重商品的与香料群岛间的地方贸易。而且，马六甲靠附近的大米养活自己，加工本地布如印度尼西亚的蜡染花布，并且经

---

① 惠特来：《金色的赫尔森》（*Golden Khersonese*），第306～320页。【64】

② 汤姆·皮雷斯（Tomé Pires），见A. 考特萨奥（Cortesão）：《解说东方：从红海到日本，1512～1515年在马六甲和印度游记》和《弗兰西斯科·罗德里格斯笔记》，黑克鲁雅特协会，第2套丛书，第39～40页，（伦敦，1941年），第285～286、212～214页。【65】

③ 汤姆·皮雷斯：第286页。【66】

常得到中国天然的及加工过的丝绸、金属制品、大葱及香水。许多中国贸易都有定期的帆船护航队，回去时装满了胡椒粉与香料。王庚武认为，中国与马六甲建立关系起源于1403年由南印度的穆斯林商人带人中国宫廷的信【450】息。① 这个观点特别有意思，因为它表明，古吉拉特人在创建马六甲中的作用不可低估。沃尔特斯也许过多地强调了马六甲纯粹的马来人；在某种程度上古吉拉特人是有经验的航行者，他们在马六甲崛起之前就知道中国的贸易。从这个意义上讲，1436年马六甲在其统治者转换前就已经是一个伊斯兰城市。也许古吉拉特穆斯林与其他印度商人的作用有很大区别：惠特来认为古吉拉特人"垄断了马六甲贸易中最肥的部分"②，而科罗曼德尔商人控制着马六甲贸易的更大部分。东方的香料通过印度商人转到了卡里米和卡瓦贾手中，最终到了威尼斯、佛罗伦萨及其他西方人手中。阿尔布克尔克的征服使这条贸易路线的神经中枢处于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下。

6.4.2 东向的贸易路线

通往西方的香料贸易路线的终端比中间阶段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部分是由于范·利乌尔对东南亚贸易特征与意义所进行的探索。③ 尽管阿拉伯商人很早就知道通往印度群岛的路线，但他们在中世纪后期是否继续大量地航行于锡兰以远地区还不清楚。用绳子绑起来的印度船只轻而防水，载着那些西方穆斯林穿过东印度洋；但这些船较之来自中国到马六甲的帆船更容易损坏。1200年左右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当时伊拉克与远东联系紧密，此后仍保持联系，但不是直接的而且还是间歇性的。早在8世纪，就有阿曼和巴苏拉的阿拉伯人访问中国的记载，而在波斯海湾的奥博拉直到9世纪才繁荣起来，成为印度洋贸易的中心。此后，在波斯湾的赛拉夫出现了一个新的贸易中心。有资料表明，约在916年，有商船从赛拉夫航行到印度，尽管赛拉夫人也航行到亚丁和桑给巴尔。孟买附近塞缪的穆斯林首领就是赛拉夫人。一个特别有名的赛拉夫商人是拉米西特（Ramisht），他在12世纪30年代非常活跃；他知道印度港口，并和中国做生意——他的一个代理人每年从广州

---

① 王庚武：《明朝早期的关系》，第34～62页。【67】

② 惠特来：《金色的赫尔森》第315页；比较，沃尔特斯：《斯里维查雅的衰落》，第154～170页。【68】

③ J.C. 范·利乌尔（Van Leur）：《印度尼西亚贸易和社会：亚洲社会和经济史论文集》，海牙—万隆，第2版，1967年。【69】

(Canton) 带来价值50万第纳尔的货物。1138年，拉米西特给麦加神庙提 [451] 供丝绸覆盖物——用的当然是中国丝绸。[①]

到13世纪中期，赛拉夫由于波斯湾其他地方的竞争而衰落了。也门人促进了波斯湾启什岛的利益；在13世纪启什岛反过来又被霍尔木兹代替，有些启什社区的先锋向东到达印度，在那里他们在政府里谋求到了相当高的职位。从霍尔木兹出发，有一条被广泛使用过的贸易路线，它通往印度次大陆西北角的坎贝湾 (Cambay)[②] 和更南的科钦印度。人们经常需要在坎贝湾 (Cambay) 等候西南方向的季风；实际上，从红海经坎贝至马六甲最好是利用一年半的时间。汤姆·皮雷斯发现“没有马六甲，坎贝湾 (Cambay) 就无法生存；没有坎贝湾 (Cambay)，马六甲一样也无法生存”；东非、波斯湾和红海商人想抵达的是坎贝湾 (Cambay)。[③] 人们在那里组成了贸易协会以探索前往东方的贸易路线；一般来说，他们把印度纺织品带到了马来亚，尽管珊瑚和加工好的铜也是最好的商品。另一条路线向东将孟加拉与马来亚联系起来；孟加拉商人在穿过马来海峡前，往往在缅甸南部的勃固 (Pegu) 活动。

在这里没有必要具体考察由于也门人反对马木路克们或蒙古人试图阻止红海路线而造成的贸易中断。1288年的一封信表明马木路克们非常欢迎也门、印度、中国商人进入叙利亚和埃及，但这些努力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印度洋贸易路线的奥秘是它的分散区位：每个社区——卡里米人、古吉拉特人、马来人和中国人——都有其自己发展的区域，他们在这些区域里往往都控制航运，而且穿过这条路线的大多数商人是本地主要商业团体的成员。只是在葡萄牙侵入后才导致了这种贸易行为的剧烈改变。

6.4.3　在中国的穆斯林贸易

有必要简短地提一下中国对穆斯林商人的吸引力。早在唐朝，穆斯林商人就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重要的定居区；大食，也就是阿拉伯人 [它来源于“打德吉克 (Tadjik)”这个词，但相当不准确]，是其中的一个分支。还有波斯人，这个词甚至包括了印度尼西亚人。有资料表明早在5世纪萨波 [452]

---

① S. M. 斯特恩：《赛拉夫的拉米西特：一个12世纪的百万富翁》，皇家亚洲协会，1967年，第10~14页。现在也可以参见霍奇斯和怀特豪斯的《穆罕默德、查理曼和欧洲的起源》；也可参见S. 迪格比：《印度的海上贸易》，《剑桥印度经济史》，第1卷（从1200~1750年）（剑桥，1982年），第125~159页。【70】

② 坎贝湾，阿拉伯海的一个入口，位于印度西北部海岸。——译者注

③ 汤姆·皮雷斯，第42~47页。【71】

(*Sa-po*) 就访问过中国；他们可能是塞巴 (Sabaeans) 人，他们带着阿拉伯的乳香和没药 (myrrh)。阿拉伯人留给中国一笔很大的伊斯兰遗产，中国现在还有大量的穆斯林就可证明这点。到12世纪，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开始源源不断地给朝廷提供物资供应；他们拥有相当大的船只。1136年，蒲罗新 (P' u Lo-hsin) 或阿布·哈桑 (Abu' l-Hasan)，委托建造一艘帆船。在随后的一世纪，蒲寿庚 (P' u Shou-Keng) 担任了重要贸易中心泉州的海运贸易专员。他的女婿巴兰 [Bahran (Folien)] 拥有一支由80艘船组成的船队。罗君庞 (Jung-Pang Lo) 教授描述了13世纪后期富有的阿拉伯人是怎样给正在交战的宋朝和蒙古提供船只的；一些阿拉伯人拥有的船只看见过蒙古人袭击日本、爪哇和印度支那——那可能是1981年在日本海滨发现的船队的一部分——那显然是忽必烈汗侵略船队的一艘。但在设计和构造上，阿拉伯拥有的船是中国式的；从中国到西印度洋不是阿拉伯商船畅行无阻的坦途。另一方面，阿拉伯人也对中国海岸的港口建设做出了贡献：他们在温州建造了码头；在宋朝时，广州穆斯林的尖塔被进港船长用作灯塔。[①]

罗君庞认为宋朝与元朝时期中国穆斯林商人的私人动机对中国海上贸易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这些穆斯林不再是新的来客，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穆斯林，是唐朝与宋朝时期商人定居者的后代，而不是新的血统。这些商人不再向西方寻找商业关系，也不仅仅是印度洋贸易或丝绸之路贸易的专家；他们还是本地、中国海 (China Sea) 及贸易的主人。

不过中国的工艺品是沿着海上贸易路线到达西方的。考古发现表明在那里这些物品最受欢迎；在阿普利亚的卢塞拉的弗雷德里克二世宫殿里人们发现了青瓷；在福斯塔德和赛拉夫，大量的中国陶器得到了确认。[②] 但还不清【453】楚的是，中国的陶器是被视作珍奇或古董收藏，还是穆斯林地区富有的消费者购买产自中国窑和金属加工场的最新产品以作为最时髦的物件。11世纪及以后埃及工匠对中国陶器的仿制表明西方穆斯林对中国产品的羡慕。但是，认为这种模仿说明有关中国商品贸易数额巨大的观点是错误的。迈克尔·罗杰斯认为，在12、13世纪中国的奢侈品是礼品或战利品运达西方的。

---

① 罗君庞 Lo Jung-Pang：《10～14世纪中国的航运和东西方贸易》，收入莫拉特主编的《东方及印度洋地区的商会和贸易公司》，第167～176页；比较王赓武在同一卷书中的作品；也可参考G. F. 赫德森 (Hudson) 的《亚洲中世纪的贸易》，收入D. S. 理查兹 (Richards) 主编的《穆斯林和亚洲贸易》(牛津，1970年)，第159～167页。【72】

② G. T. 斯坎伦 (Scanlon)：《埃及和中国：贸易和模仿》，收入理查兹主编的《伊斯兰和亚洲的贸易》，第81～95页；D. 怀特豪斯："Ceramici e vetri medioevali provenienti dal Castello di Lucera", *Bolletino d' Arte* (1966)，第171～178页。【73】

波斯或埃及仿制品的生产时间与中国原型——比如，唐朝的小雕塑——的生产时间之间有时有很长的滞后。13世纪波斯制陶工将中国的花边加到他们的器皿上，但这些源于范围广泛的中国工艺品，如金属制品，而不是已知的中国陶瓷。罗杰斯认为："中国陶瓷和青铜由于稀少而珍贵，因此或多或少被较好地模仿了，但是它们绝不属于奢侈品之列。"①在福斯塔德（Fustat）发掘了大量的唐宋元明陶器，尤其是青瓷，而且14世纪晚期蓝白分明的陶器颇为有名。

福斯塔德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与埃及之间几乎没有贸易往来。它只不过是卡里米（Karimis）和古吉拉特人从事更重要的香料贸易的一个副业。13世纪晚期及14世纪，中国的丝绸往往通过另一条路线即陆路运到塔布里兹，然后穿过安纳托利亚到达黑海和君士坦丁堡。甚至泉州的意大利商人也有兴趣在香料贸易上尝试一下，就像他们在中国物品上获得好运那样。值得一提的是，15世纪晚期及16世纪早期的出口商首先想去的是香料群岛，然后才是重新到马可·波罗曾经经过的亚洲大陆的城市。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奇怪的。马可·波罗和穆斯林作家都知道香料群岛，但他们顶多只是到达了其西部边缘。由于缺乏对香料群岛任何准确的描写，哥伦布将伊斯帕尼奥拉岛和古巴与东印度相混淆是可以理解的。【454】

6.5　1050～1500年间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的贸易

6.5.1　塞尔柱与蒙古突厥人

安纳托利亚在穆斯林世界贸易中的作用仍然有待研究。人们往往认为对拜占庭边境领土安纳托利亚的征服给拜占庭帝国沉重一击，因为这导致了人口稠密、相当繁荣的行省的丢失。当然，塞尔柱突厥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继承了一块正在孕育繁荣的地区。11世纪晚期及12世纪，塞尔柱领土迅速扩张，通过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重要贸易路线往外延伸。小亚细亚地区一股重要的新兴力量的存在使得外国商人、特别是意大利人开始探索进入塞尔柱土地

① M. 罗杰斯（Rogers）：《中国和伊斯兰——马什里克的考古证据》，收入理查兹主编的《伊斯兰和亚洲贸易》，第67～80页。【74】

的路线：西方商人不愿意他们的某一地区与对他们的船只和商队有敌对行为的地区相邻，也不愿意供应他们商品。12 世纪采用的慎重方法在 13 世纪初期发展成为贸易条约；这些贸易条约就导致了利用安纳托利亚所提供的贸易机会的意愿。① 意大利人发现土耳其是他们以前在地中海各地所购买商品的一个很有前景的来源地。他们尤其对明矾感兴趣：安纳托利亚的明矾闻名于托斯卡纳购买者聚集的阿勒颇（Aleppo）市场；进一步向内陆推进以到达产地的愿望由此产生。②

突厥人不是只提供贸易协议，而是用别的方式以直接鼓励来访商人。他们工作非常努力以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定居，并且他们开始在这些城镇进行生气勃勃的房屋建设。13 世纪早期科尼亚和锡瓦斯成了一个繁荣的聚会之地，意大利商人、伊朗商人，有时还有特拉布宗的希腊商人和叙利亚与埃及的穆斯林纷至沓来。沿古代安纳托利亚的贸易路线建立了宿店或商队旅社。工业生活生气勃勃：在阿克塞雷（Akseray）和土库曼人的村庄繁忙地编织着大量厚重的纺织品，包括结节地毯——很可能是突厥人给安纳托利亚带入了先进的地毯织造方法。银、明矾、铁得到了开采，它们都吸引着东西方的外国【455】商人。安纳托利亚的羊毛非常有名，土耳其牧羊人生产的羊毛量超过了拜占庭。因此，与 10 世纪及 11 世纪早期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贸易还不是那么重要。相反，到 13 世纪这里变成了重要的生产中心。卡恩评论说拜占庭时期小亚细亚的贸易特征与塞尔柱小亚细亚有明显的不同：有关拜占庭时期的贸易，他写道："就它穿过其领土而言，它虽经过了这个国家但与它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利害关系。"③

旧的沙漠商路有它的目的地，一个是君士坦丁堡，另一个就是叙利亚的穆斯林区、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它们都有支线通向高加索。但是到 12 世纪末期，这些路线使用得更为频繁了，并且产生了新的支线。叙利亚人迈克尔提到了 400 位波斯商人是怎样消失于安纳托利亚大雪之中的——那是一支很大的旅行队。1204 年，特拉布宗希腊帝国的产生进一步刺激了贸易，特拉布宗吸引了威尼斯人及其他商人，并将外国船引向安纳托利亚黑海海岸。

---

① M. 马丁（Martin）：《1220 年塞尔柱—威尼斯的协定》，载《英国历史评论》，第 95 卷，1980 年，第321 ~ 330 页。【75】

② 想要知道证明 13 世纪意大利商人在阿勒颇所拥有的商品诸藏的证据，可参阅比如 D. S. H. 阿布拉菲亚的"番红花和十字军：圣吉米格纳诺、比萨和耶路撒冷王国"，收入 B. Z. 克达（Kedar）、H. E. 迈耶（Mayer）、R. C. 斯梅尔（Smail）主编的《*Outremer*：提交给约书亚·布罗尔的对耶路撒冷十字军王国的研究》（耶路撒冷，1982 年），第 230 ~ 232 页。【76】

③ C. 卡恩：《前奥斯曼时期的土耳其》（伦敦，1968 年），第 163 页。【77】

尽管塞尔柱与特拉布宗的政治关系不是太好，但它仍从这些靠船为生的商人身上得利，这些商人穿过内陆到达锡瓦斯以寻找白银、坚果及东方奢侈品。锡瓦斯特别繁荣，因为它位于几个贸易路线的交汇点上，下可至幼发拉底河，上可至本都（在萨姆森），往西通过安卡拉和单调的安纳托利亚高原而后到达博斯普鲁斯和君士坦丁堡。甚至在1204年前，俄罗斯商人就到了塞尔柱帝国的这一地区。第二个主要的贸易中心是位于锡瓦斯更南的科尼亚。1201～1202年，它有两个巴扎（集市），一个"旧"巴扎和一个"新"巴扎的；塔布里兹和土著土耳其商人经常光顾这里。第三贸易中心是安塔利亚（Antalya）港口，它是土耳其进入地中海的主要入口。它的繁荣吸引了野心勃勃的托斯卡纳冒险家阿尔多布兰迪尼（Aldobrandini），他在1205年夺取了它并进行了短期的统治。由于与塞尔柱的贸易协议，1220年威尼斯人在安塔利亚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是安塔利亚也拥有本地商人社区；他们在黑海及奇里乞亚很有名，在那里，利昂亚美尼亚基督教王国是东安纳托利亚城镇和塞浦路斯、叙利亚和埃及的中间地带。科尼亚、安塔利亚与奇里乞亚有水路相连，这些地方的旅店——甚至建立在遥远的乡村——大大地便利了黑海向地中海的商旅活动。 [456]

塞尔柱统治者的铸币提供了土耳其经济约在1200年进入了一个繁荣期的证据。事实上，早期的塞尔柱统治者仅发行非常有限的铜铸币，12世纪晚期在吉里奇·阿斯兰二世时才有第一枚银币，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才出现金币。因此，从用于小规模贸易的铜币转向国际贸易所使用的稀有金属是一个进步，尽管铸币更具有塞尔柱特色——它放弃了拜占庭的原型——但仍作为可接受的货币进入了市场。在某个有很好的银矿供应的地方出现本土银币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13世纪金币的出现则代表了塞尔柱中心地区的黄金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这说明了巨大的贸易利润，因为安纳托利亚金矿特别贫乏而富有银矿。这时期土耳其对西欧处于类似的贸易地位：它出口白银，但得到黄金。

1243年，塞尔柱安纳托利亚落入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繁荣没有停止。意大利来客仍然在锡瓦斯和厄辛简购买丝绸和羊毛布；阿克塞雷的地毯仍然很讨人喜欢。但是，蒙古人的征服促进了通过安纳托利亚与更遥远地区的交流——一直到高加索及波斯北部的城市；外国商人有时不经过土耳其贸易的典型中心，如锡瓦斯，而直接从特拉布宗或西西里到达阿塞拜疆。因此，在拜占庭时期，这个地区的地位开始逆转，只是作为一个通道而没专门人为它前来。而且，新的比较容易通行的从黑海北部穿过俄罗斯大草原到

中国的东方贸易路线的开通分散了小亚细亚的一部分贸易；但是到13世纪末期，俄罗斯金帐汗国与波斯艾尔可汗的斗争意味着进入伊朗最安全的路线是通过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诸侯国，它们承认艾尔可汗的宗主国地位。来自艾尔可汗王国的商人向东到安纳托利亚，甚至搭乘意大利商船——毫无疑问更多的是到塞浦路斯和埃及而不是热那亚或威尼斯。因此，蒙古统治期间，安纳托利亚的贸易繁荣并没有急剧衰落，贸易的部分重新转向土耳其现有城市的损害也没有那么大。

因此，蒙古统治以某种代价带来了一定的利益。它带来了额外税收；但反过来贸易路线受到保护。铸币被改革，引入了新的第纳尔；安纳托利亚铸[457]币厂是新货币的主要来源，在整个蒙古都被接受，或者至少在艾尔汗（Il-khans）国的各自治领地是这样。但是安纳托利亚边界上的小土库曼国家逐步开始走自己的路，发行了多种自己的货币。蒙古人推行纸币（1294年）的尝试遭到了强烈的抵抗。

在13世纪，安纳托利亚对外国商人有特别的吸引力。它成为明矾贸易的重要国际中心：到13世纪末期热那亚扎卡里亚试图控制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出产明矾的地区。尽管产地不在意大利人的手中，热那亚人在1346年对奇奥人的征服保证了西方城市比较容易获得腓卡亚的明矾。再往内地，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明矾在阿勒颇和奇里乞亚也有市场。13世纪，一个叫桑吉米格纳诺的商人消失于“土奇亚（Turchia）”，而他更为谨慎的同伙没有越过穆斯林叙利亚一步；他寻找的也许是明矾。更难估计的是同一时期安纳托利亚与伊朗关系的重要性。粗略地看一下塞尔柱安纳托利亚的文化——它的艺术和建筑——就知道波斯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强大；土耳其和波斯陶器某些风格的酷似表明了陶器贸易的活跃。当到安纳托利亚的西方来客越来越不愿意踏上这条到塔布里兹和波斯的路线时，这些接触在14世纪获得了额外的价值；因此在诸如纺织品和陶器等商品的供应上，他们更加依赖于土耳其中间人。

活跃的明矾贸易以及与伊朗的紧密联系的确表明在塞尔柱仍然继续有大量的本地商人存在，他们是连接卡拉海达和安纳托利亚内陆到腓卡亚、奇里乞亚和黑海贸易的枢纽。1219年阿卡丢失后，这些贸易路线更加重要了。意大利商人在圣地不受欢迎，他们将黎凡特贸易的大部分集中在塞浦路斯，并且学会依靠通达土耳其南部、叙利亚北部和埃及的海路，以此获得安纳托[458]利亚产品、东方衣料和印度群岛香料。可以认为，14世纪早期，突厥本地商

人至少对这些重要联系的某些部分起着关键的作用。①

6.5.2　1250～1500年间伊拉克的经济困境

蒙古统治时期安纳托利亚相对繁荣，甚至可以与塞尔柱的高峰时期相对照，但还必须同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蒙古统治的影响相对照：这就是伊拉克。我们知道，在1100年以前埃及在经济重要性方面超过伊拉克的地位已经建立起来了。不过美索不达米亚贸易的衰落并不剧烈，至少在12、13世纪是这样；它是一个缓慢连续的过程，其中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低地与香料商人的伟大贸易路线之间的联系逐渐松散。十字军征服叙利亚和圣地实际上可能促进了某些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工业发展：从摩苏尔和巴格达的优质布料——地方特产，就像最早的一种薄而细的棉布——被带入了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而在这些地方还可找到阿卡的拉丁人。另一方面，这种贸易联系在13世纪晚期崩溃了，1291年后在马木路克们统治下阿卡开始急剧衰落；但困难甚至早在1258年就出现了，那时蒙古将军旭烈兀征服了巴格达并且将伊拉克作为艾尔可汗的一个边疆省。繁重的税收，大屠杀及大规模的移民消耗了伊拉克城市的经济元气，并导致农业生产率的严重下降。14世纪中期，巴格达的大部分被放弃了；而且，哈里发从前的首都不再是大宫廷的中心，它曾吸引了许多远方而来的奢侈品并对地方市场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但是夸大蒙古征服所导致的罪恶是错误的。阿斯托指出，蒙古胜利后，有些商业企业繁荣了而不是倒退了：计量单位标准化了；进行了货币改革，富商如艾迈德·阿德·J·阿里哈桑·乌德里成了新统治者的银行家。② 但是伊拉克贸易方向发生了改变，巴格达商人往东通往伊朗的艾尔可汗宫廷，经陆路通过科瓦里兹到达中国。在这一程度上说，伊拉克商人是13世纪后期蒙古统治下的获益者。

但是，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或叙利亚的联系被切断了。艾尔可汗与马木路克们之间的相互怀疑阻止了商人在他们领土上的自由往来。如果伊拉克商人希望得到大量埃及和红海产品的话，他们必须要到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或其他与尼罗河路线相联系的交易中心。与此同时，塔布里兹这个艾尔可汗的【459】

---

① 安纳托利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的证据可以从艾登和门泰斯模仿那不勒斯的银币铸造得到进一步的证明：P. 格里尔森：《那不勒斯省：其货币类型的传播》，见《法国古钱币学会100周年展览书目》（1865－1965年）（巴黎，1965年），第43～56页；现在也可参见，E. 扎卡里亚都，《贸易和十字军：1300～1415年的威尼斯的克里特和艾登和门泰斯的阿拉伯酋长国》，拜占庭和后拜占庭研究学会藏书，第11卷，威尼斯，第142页。【78】

② 阿斯托：《社会和经济史》，第249～267页。【79】

首都开始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而异常繁荣起来，在那里很容易买到东方香料、波斯丝绸和奴隶。塔布里兹榨干了波斯湾所有的印度尼西亚香料；这些香料现在直接运到塔布里兹而不是巴格达、巴士拉及其他古代贸易中心。结果塔布里兹吸引了西方商人的兴趣，艾尔可汗热烈地鼓励他们的到来。[1] 跨过座座高山，绕过凡湖（Lake Van）的贸易路线与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紧密相连；而且，既然意大利人在奇里乞亚安居乐业，他们对艾尔可汗给予的贸易条约做出反应就没什么奇怪的——1320 年当威尼斯制定贸易条约时，它仍很关心波斯。而且意大利欢迎的不仅是在伊朗的贸易机会，而且还包括向北向东辐射开来到达中国和印度的整条贸易路线所带来的贸易机会。14 世纪初期，就有意大利人去德里。热那亚人试图在里海建立船队并且鼓励艾尔可汗阿尔衮（Il-Khan Arghun，1284～1291 年）袭击亚丁，切断联系埃及与印度的路线以保护自己的利益。[2] 尽管热那亚的计划没成功，但艾尔可汗国确实能以不同的方式对红海贸易进行干预。14 世纪初期在波斯海湾的霍尔木兹建立的一个自治国，成了印度商品运往塔布里兹的一个前哨据点。因此一些东方香料从亚丁和尼罗河分流——也从传统的波斯湾路线分流，即从启什岛向巴士拉、沃西特和巴格达这一路线分流。

通过塔布里兹的贸易路线到 14 世纪中期时就过了其高峰期。这部分是因为威尼斯、热那亚和托斯卡纳人对塔布里兹给予的权利缺乏响应——这本身反映了经济萧条开始笼罩着基督教欧洲的一些城镇。[3] 而且，当 14 世纪 40 年代托斯卡纳将军掌握政权时，波斯丧失了吸引力，蒙古统治下的和平的最后的余光也熄灭了。1368 年后，中国的非蒙古王朝把目光从中亚和蒙古商路转移到东南亚海上支配权。显然，远程贸易路线的衰落并没有使商人对伊拉克和伊朗的本地产品丧失兴趣：威尼斯商人仍然去土库曼自治领地，【460】并且出现在 15 世纪的巴士拉和巴格达。波斯湾珍珠仍然有特别的吸引力。霍尔木兹一直从印度尼西亚诸岛与伊斯兰中部地区之间的海运中获益。连接阿塞拜疆与伊拉克和阿勒颇或大马士革的贸易路线交通繁忙，尽管土库曼和马木路克恢复外交关系促进了伊拉克与埃及之间的贸易往来。波斯的生丝与纺织品特别有名。但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伊拉克继续将其商品运向东西方贸

---

① 仍然可以比较 B. Z. 克达：《危机中的商人：热那亚和威尼斯人与 14 世纪的萧条》，New Haven，1976 年。【80】

② J. 理查德（Richard）：《西方在印度洋和加勒比海的航海》（12～15 世纪），载《东方和印度洋的商会和贸易公司》，第 353～363 页。【81】

③ 克达：《危机中的商人》，第 118～130 页；阿斯托：《社会和经济史》，第 275～276 页。【82】

易路线，但它不再横跨主要贸易路线；伊拉克位于从波斯到奇里乞亚和黑海的陆上商路的南面，而位于海上航运路线的北部，这条海路仅擦其边界而过。阿斯托评论说："伊拉克在近东贸易中份额的不断下降导致了城市的萎缩。"① 除此之外，伊朗充满活力的纺织品生产者的竞争损坏了伊拉克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曾占领的主导地位。

城市的萎缩不仅仅是因为贸易路线的转移。1347 年淋巴腺鼠疫的到来摧毁了巴格达。在其他地方，由于 14 世纪晚期及 15 世纪一波接一波的鼠疫也使得人口无法恢复。15 世纪 70 年代，威尼斯访客乔萨法特·巴巴罗(Giosafat · Barbaro) 将巴格达描述为"曾经著名的城市现在很大程度上被毁坏了"。但惟一可能的猜想是这种鼠疫对老的人口中心美索不达米亚低地是否比对其上游的波斯和阿塞拜疆的破坏更严重。当然，战争也加剧了伊拉克的衰退——最明显的是 1401 年帖木儿在巴格达的大屠杀。伊拉克的困难可能比伊朗或西部其他地方的困难都要深重，因为伊拉克除了经历鼠疫，它还有个无能的政府。从瘟疫中活下来的新富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并没有让它再度繁荣起来，就像西欧的部分地区那样。在黑死病之前，伊拉克工业已经严重失调，这可能是因为伊朗的纺织中心从市场对高中档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中获利的缘故。美索不达米亚以外地区对伊拉克商品的需求不复存在。即便是著名的巴格达纸——纺织工业副产品——也失去了市场，因为近东其他地方和意大利法布里亚诺的竞争者生产出了同样质量甚至更好的纸。【461】

伊拉克经济的衰落表明 14、15 世纪整个穆斯林地区存在广泛的经济危机。近东在 1300 年前已经丧失了其相对于意大利、加泰罗尼亚和佛兰德纺织厂的技术优势；甚至近东的农业技能都下降了，而这种农业技能却在伦巴第、荷兰以及其他西方地区找到了发展的基础。马木路克、蒙古和托斯卡纳军政府的高压政策严重抑制了技术创新并且，限制了投资机会。为了支持开罗或塔布里兹宫廷脆弱的财政，富裕商人的财富被定期充公。结果，商人把精力集中于产业可预期收益的直接贸易企业，而且他们往往将其大部分资本用于商业投资。穆斯林世界国家垄断的不断增长使得投资私人所有的制造场没有吸引力，因为许多生产部门归政府管理，并且原材料的供应如珍贵染料需要通过许多政府机构协商才能得到。因此，商人强烈地倾向高消费——维持较高的生活标准而不是把资本积累下来以发展新的重要项目。富有的商人又吃又喝，非常逍遥，因为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也许苏丹会抢走他们的货

① 阿斯托：《社会和经济史》，第 277 页。【83】

品，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另一办法是——马木路克的卡瓦贾们所选择的道路——加入公务员的行列，但这也意味着（腐败行为除外）用来进行私人投资的资金不容易积蓄。

M. S. 托罴罗以后，不耐烦的基督教作家认为如果贸易关系终止的话，穆斯林世界可以被扼杀——这当然是指武器贸易，还有香料贸易，正是这种商品使沿途的王公致富。实际上，葡萄牙在没有穆斯林中介的情况下成功地使黄金贸易转向基督教欧洲。这些作者与实践家没有看到的是：他们可以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让苏丹和将军窒息伊斯兰世界的贸易。

6.6 非洲的穆斯林贸易

6.6.1 1050～1200年间马格里布危机

就像埃及是东方商品运到基督教西方的通道一样，它也是西北和中北非洲的一个商站，它把遥远的南部的商品——比如马里金矿的产品——穿过撒哈拉转运出去。从两个意义上讲，马格里布城市的繁荣是因为撒哈拉的黄金：正是由于可以得到黄金才使基督教商人光顾阿尔—马蒂亚、布日伊、休达及其他港口；而廉价黄金的易得性和优质金币的流通促进了内陆市场的繁荣。11世纪晚期也许达到了繁荣的高峰期，当时野心勃勃的热那亚和比萨舰队为了在阿尔—马蒂亚建立贸易基地而发生了激战，农业也开始繁荣，城市可以以低成本从周围的乡村获得食物供应。① 相比之下，12世纪晚期及13世纪就没有这么成功。实际上，北非的经济问题部分地是因为这个地方容易获得黄金的结果。意大利商人成功地获得了在马格里布收购非洲黄金和倾销欧洲产品如纺织品的特权，这导致了阿尔—马蒂亚及周围黄金的贫乏：奇怪的是，黄金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过马格里布到达意大利和西班牙，而北非人自己都看不到也买不到这种自己最钟爱的商品。西西里国王似乎也从非洲城市“吸取”黄金，用于铸造他们自己有名的货币；他们反过来给非洲供应小麦，而小麦以前是非洲农村的主要产品，但此时不再是了。北非内部激

[462]

① H. E. J. 考德雷：《1087年的马蒂亚战役》，载《英国历史评论》，第92卷，1977年，第1～29页；布雷特：《艾费里基雅集市》，第489～506页。【84】

烈的政治斗争——法蒂玛宗主权的被否决，来自遥远的西部的穆拉比人（Almoravids）威胁，以及西西里诺曼人的侵略都导致了更大的困难。

学者们已普遍将11世纪阿拉伯对马格里布的侵略列为毁灭北非繁荣的灾难之一。巴努·希拉尔（Banu Hillal）人和巴努·苏莱姆（Banu Sulaym）人、贝督因游牧民被法蒂玛运到西方，这一方面是为了压制否认埃及宗主权的马格里布酋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埃及摆脱不受欢迎的窘迫地位。实际上有些证据表明法蒂玛希望游牧人在马格里布制造混乱；没有人否认巴努希拉尔人及其联邦改变了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的面貌。1154年左右伊德里斯在为西西里罗杰二世所写的文章中描述了新的耕种者阿拉伯人是如何代替柏柏尔人的。柏柏尔农民放弃土地意味着灌溉工程被弃置；农民对北非的【463】不利环境所拥有的微弱优势迅速消失了。实际上，土地还由于其他原因在退化：撒哈拉沙漠在各个方向推进，河流干涸；无论如何11世纪时农民的水利工作似乎难以维持下去了。突尼斯的农业生产率急剧下降；12世纪中期经常有饥荒发生，而且，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北非对外国小麦供应的依赖更严重了。从最初的农业繁荣到这种状况的转变对这个地区的贸易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最近而且产量最丰富的小麦产区是诺曼人的西西里，北非城镇用大量黄金来购买雷格诺的小麦，因而加速了北非黄金的外流。巴努希拉尔人入侵的真正受益者不是法蒂玛哈里发——他对马格里布的权威没有任何增加——而是西西里国王，一个基督徒统治者，实际上穆斯林法理学家认为以那样一种规模与他做生意实际上是不合适的。①

希拉尔人的入侵也影响了一些大的城市。贸易中心从凯鲁万往西转移到了地中海，11世纪后期又转移到了阿尔·马蒂亚，以后又转到了突尼斯。某种程度上这是为了给一组新的行游商人——意大利商人社区——提供住处，他们想要的是黄金、皮革和羊毛；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家在伊斯兰世界的商人，诸如福斯塔德犹太人，也聚集在阿尔—马蒂亚。凯鲁万的衰落使得以那里为目的地的黄金商队重新改变方向；如今他们直接奔向伊斯兰之外的海岸并卸掉他们的商品以供出口。这些商队呈扇状散开，到达休达和的黎波里之间的许多港口。马歇尔·布雷特将商路的这种新分布与希拉尔人的入侵以一种新颖的方式联系了起来。他反对通常公认的这种观点，即巴努希拉尔人切断了往北非运送黄金的贸易路线，结果导致了经济灾难。布雷特认为这

① 显然，他的观点与马歇尔·布雷特是不同的，这在《艾费里基雅集市》中有所解释；参见我的“L' attività commerciale genovese nell' Africa normanna”。要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考C. 维塔—芬兹：《地中海河谷地》（剑桥，1969年），该书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85】

种转变是非常复杂的：黄金继续运来，但不是到达凯鲁万；凯鲁万黄金贸易的前首领，非洲腹地的伊伯蒂阿拉伯人的地位现在摇摇欲坠。希拉尔人本身不是黄金商人，但是没有一个群体能够继续主导黄金贸易。这个解释特别有【464】吸引力，因为意大利的文献记载表明热那亚和其他商人对休达、布日伊和其他西北非港口的兴趣在增长，而在12世纪末期之前他们在这些港口的贸易活动还相对较少。①

一个重要的曾被忽略的系列文件《法学家的裁决》或者说伊斯兰法官的判决，说明了11世纪末期及12世纪北非的情况。这个文件提供了有关贸易协议、商品及突尼斯海岸贸易中心的有关信息。很显然，早在1091～1093年，突尼斯对西西里谷仓的依赖就不断增加。那段时期的法学家裁决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与基督徒控制的西西里做生意是否合法，即便这种贸易是关于生活必需品的贸易。法官认为如果不与异教徒接触，安拉会为他的臣民提供物资——问题是穆斯林商人打破了界限，继续以触犯神的方式与敌人经商。类似地，与异教徒做生意只会增加异教徒的力量："如果我们去他们的国家，他们国家商品的价格就会上升，就会把集中于我们手中的大量的钱集中到他们的手中；他们会用这些钱与穆斯林打仗，夺取穆斯林的土地"。但在半个世纪内，显然没有任何别的选择：进口西西里谷物，也不反对出口橄榄油或纺织品，但反对以黄金支付，12世纪40年代的法学家裁决解释了这种支付是如何实施的。商人组成一个协会以购买西西里的粮食，以穆拉比人和的黎波里纯黄金的第纳尔支付。西西里铸币厂的首领将黄金熔化，添加1/4同等质量的白银，重新铸成合金币称为西西里塔里（*tari*，意思是新硬币），或1/4第纳尔。铸币厂的师傅则为铸币厂——因而也可能是为了皇室国库——保留了足够多的铸币塔里，其重量与他用在合金中的银相当。因此非洲商人的进口黄金又以低得多的纯度转回到他们手中：幸运的是，西西里塔里含661‰的纯金，而非洲黄金的纯度达到1000‰。北非商人以戒指、镯子及其他珠宝的形式将金条送到西西里，然后拿到市场上出卖。也许通过这【465】种方式，商人避免了铸币厂主人在交易时经常遇到的痛苦经历。②

法学家的裁决有力地证明了北非城市与地中海伊斯兰其他地区之间的紧

---

① 布雷特：《艾费里基雅集市》，我认为在这里比较有意义。【86】

② 该引文的出处，参见H. R. 伊德里斯（Idris）：《齐里王朝时期的东方柏柏尔》，2卷本，东方研究所出版物，阿尔及尔文学和人文科学学院，第22期（巴黎，1962年），第2卷，第661～663页。我在我的文章中进一步地讨论了这些材料："Maometto e Carlomagno: le due aree monetarie dell' Italia medievale, dell' oro dell' argento"，载R. 罗曼诺和V. 图西主编：*Einaudi Storia d' Italia*, *Annali*，第4卷（都灵，1983年），第242～243、253页。【87】

密联系。1000年左右，常有船只从突尼斯出发到亚历山大去出售货物。凯鲁万和阿尔--马蒂亚商人到达远至马六甲的地方去做生意。一份关于死于1141年的阿尔马扎里的冗长裁决中包含有一个商人的账目。他带着珊瑚和丝绸，从北非到亚历山大；他卖出这些商品是为了买进靛蓝、亚麻、丁香、麝香、花缎（damask）及女人的面纱。这些物品经比泽塔（Bizerta）运到了突尼斯，靛蓝则卖给了印染者。他们与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也有联系：安大路西亚商人从中地中海买进珊瑚、羊毛及蜂蜜——前者是美利奴羊的远祖，后者是世代西班牙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产物。阿尔及尔是12世纪早期的一个重要的交易中心，尽管在后阿尔马扎里时代失去了对布日伊的优势；它的优良的港口只是在16世纪才又一次变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迹象表明，西班牙摩尔人，像西西里诺曼人一样，与北非发展起一种相当有利的贸易关系，它通过阿尔及尔、布日伊当然还有休达将黄金从撒哈拉抽走，然后将其送入它的货币工厂。①

6.6.2　苏丹的黄金

迄今为止，我们只提到了撒哈拉的黄金供应。很明显，只要粗略研究一下地中海地区穆斯林统治者的财政状况就会发现，他们在吸纳撒哈拉黄金方面是何等地成功。阿布杜勒·拉赫曼三世时期的安大路西亚分裂主义，征服埃及和马格里布的法蒂玛战争都使得获得非洲内陆的财富更容易了。在尼罗河和科尔多瓦，人们铸造高纯度的金币，这就以最清晰的语言表明了新的哈里发希望从巴格达独立出去，并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货币基础，而这种经济活动直到11世纪都还不是伊斯兰财富的真正核心。金第纳尔使这个时期从表面上看成了伊斯兰的“黄金时代”。后来的帝国在其战争中，都由于存在把黄金往北转移的贸易路线而受益：摩洛哥和西班牙的阿尔莫拉维茨和穆瓦希德都铸造特别纯的铸币，我们知道，它受到西西里铸币厂主的特别青睐。

直到11世纪，戴贾里德（Djarid）（突尼斯南部和阿尔及利亚东南部）的伊伯蒂阿拉伯人控制着撒哈拉边缘瓦格拉基地的黄金流通。因为贸易路线多样化并开始向西推进，新的重要中心出现了，它们给西班牙及西北非港口提供黄金供应。早在11世纪，西吉尔马萨就被伊本·哈奇尔称为西马格里 【466】

① 伊德里斯：《柏柏尔人的东方》，第2卷，第666~672页。【88】

布与沙漠南部王国“苏丹”之间的重要贸易据点；这位作者描述了他在西吉尔马萨看到的一笔值42 000第纳尔的订单。[①] 他们在西吉尔马萨的收入一度是马格里布的法蒂玛政府收入的主要支柱。但是到了12世纪中叶，西吉尔马萨已过了它的鼎盛时期；然而，就像伊德里斯指出的，尽管南部摩洛哥仍然是许多撒哈拉商队的目的地，12世纪的穆瓦希德人侵导致供应不再平稳。这也许是因为穆瓦希德的权威没有像他们祖先的帝国那样向南扩张得如此之远。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早期是一个 *morabitina* 统治下的和平时期，穆瓦希德狂热者切断了与那些政体——穆斯林的或基督教的——不合的地区之间的关系。

穿过撒哈拉有三条主要路线到达生产黄金的地区：从西吉尔马萨和西马格里布往南；从阿尔—马蒂亚、突尼斯和邻近的中心往南；再一条就是从埃及经过今天乍得（Chad）的村庄往西延伸的路线。最后一条路线到12世纪似乎已经过了盛世时期，但在14世纪又复兴了。伊德里斯将沿埃及到苏丹的路线描述为丧失了以前重要性的沙漠地带。另一方面，当马里国王曼萨·穆萨1324年出发前往埃及和麦加时，到埃及去的路线似乎又恢复了；16世纪的列奥·阿非利坎努斯也知道它。也许希拉尔人的入侵给往东的路线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但促进了向西的贸易活动。所有这些路线只有在“航行”专家的帮助下才能通行：列弗蔡恩把撒哈拉描述为不友好的“海洋”，有许多“孤岛”，那就是绿洲；这儿很少有路标——实际上，这里的景象每天都在变；最好的“航海家”不仅要通过观察环境，还通过闻土辨别位置。考古学家的许多发现不算稀奇：12世纪的一支迷路的商队就曾葬身沙漠。[②]【467】

沙漠之外是城镇，商队在那里获得黄金。马格里布的黄金商人没有进一步向内陆迈进到真正的黄金生产区——这里有一种香料贸易的类似物，撒哈拉南部城镇起着像巨港或马六甲那样的作用。即便是本地的统治者也非常谨慎，避免在采金区进行直接干预；马里国王试图将其政治控制扩张到产金地区，但遭到了淘金者的顽强反对，他们不愿为新主人劳动。加纳和马里统治者试图通过税收和施加某种王权获取黄金贸易之利：所有的大金矿都留给统治者，商人只允许经营金砂。黑非洲统治者极愿保护穆斯林商人，甚至连他

---

① N. 列弗蔡恩：“Ibn Hawqal, the cheque and Awdaghust”，载《非洲史杂志》，第9卷，1968年，第223～233页。【89】

② T. 莫诺德：“Le Macden Ijafen: une épave caravanière ancienne dans la Majabat al-Koabra”，载《首届国际非洲考古学研讨会论文集》（福特拉米，乍得，1969年），第286～320页。我也感谢剑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的戴维·菲利普森博士提供的这一参考资料。【90】

们是异教徒都不在乎。对加纳前王朝首都的考古挖掘证明了11世纪阿尔—巴克雷对这座城市的描述；商人居住区与皇城分开；实际上穆斯林贸易城市比其异教同行的皇城更华丽。前者拥有宽广的石头房子；用玻璃称称量黄金并且发现了来自地中海的陶器。列弗蔡恩评论说："穆斯林城镇并不仅仅是本地城镇的附属，甚至可能比后者更重要"。① 但到1400年，黄金贸易集中于撒哈拉南端：廷巴克图成为黑非洲伊斯兰贸易的中心。廷巴克图在15世纪也非常繁荣：利昂·阿弗里卡纳斯提到过那里有安大路西亚风格的清真寺院，尽管整个南部撒哈拉城镇用烧制的瓦盖房是从马格里布借鉴过来的。

有关这个地区繁荣的更为明晰的证据表明，开罗与汉志居民的行为方式完全不同。1324年曼萨·穆萨从马里到麦加的朝圣引起了有关黑非洲有无穷无尽的黄金的传说进一步扩散。到达开罗时，这位马里国王沿街散发黄金；结果导致了严重的短期通货膨胀，因为成千上万磅黄金一下子涌入埃及经济之中。曼萨·穆萨非常奢侈，等他从麦加回来时就发现没钱了，于是向卡里米商人贷款——这些商人，就如我们所知，等候还债的时间比他们预期的时间要长得多。曼萨·穆萨访问埃及的另一个影响也许是埃及与马里直接 【468】 贸易往来的复兴。热那亚商人安东尼奥·马尔范特1447年来到涂亚特，他描述了埃及商人去那里做铜及其他商品的生意，而不是黑人的黄金。阿斯托将重点放在中世纪晚期埃及与黑非洲的直接贸易路线上，因为沿着这条路线贸易的商品避开了地中海商人与统治者——如加泰罗尼亚人和阿拉贡人——的干预。② 当然他们的想像力以及有关葡萄牙人的传说被有关苏丹金矿的传说大大地激发了。

除了黄金以外，黑非洲的另一种特别重要的商品是奴隶。在整个中世纪，西班牙、西西里、那不勒斯都从非洲获得了大量的柏柏尔人与黑人俘虏。甚至直到15世纪，那不勒斯仍是一个主要的奴隶"消费者"。在穆斯林地区，特别是摩洛哥，黑奴在贵族家里很受信任，他们在基督教地区往往干一些家庭事务，或者像在瓦伦西亚那样干农活。③ 从卡斯蒂尔犹太司库唐·撒母耳·阿布拉法耶（Don Samuel Abulafia）（1320～1360年）家中拥有80个黑奴这一事实可以判断，拥有奴隶也是威望的象征。④ 北非送来的

① N. 列弗蔡恩（Levtzion）：《古代加纳和马里》，载《非洲史研究》，第7卷（伦敦，1973年），第25页。【91】

② 阿斯托：《社会和经济史》，第324～331页。【92】

③ C. 维林登（Verlinden）：《中世纪欧洲的奴隶》（两卷本，布鲁日，1955年，和根特，1977年）；J. 希尔斯（Heers）：《中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奴隶和仆人》（巴黎，1981年）。【93】

④ H. 格雷茨：《犹太人历史》，英译本（费城，1894年），第4卷，第121页。【94】

奴隶经常以马来交换。10 世纪末期一份突尼斯法学家的裁决表明，同一个商人既经营马又经营奴隶，当利昂·阿弗里卡纳斯约在 1500 年左右访问黑非洲时，这两种商品之间仍有联系；在波努（Bornu），用奴隶换马是常见的，每匹马可以换 15～20 个奴隶，尽管波努也有许多黄金。北非商人发现自己服务于有效的战争机器：马匹帮助了战争，波努战争因而往往非常成功；而在战争中俘虏的奴隶又远远超出了波努的需求。[1]

撒哈拉南部城镇不仅仅是黄金和奴隶的来源。在 13 世纪中期，马卡里家族通过特莱姆森买卖苏丹的皮革、象牙、可拉坚果（kola nut），还有黄金。他们将北方的布料送至南方的瓦拉塔，那里有兄弟俩将这些商品卖给撒哈拉商人。另一个兄弟，以西吉尔马萨为基地，主要是制定计划与提供信息，将价格表送给他在特莱姆森和瓦拉塔的兄弟。马卡里兄弟在其他方面也很活跃：他们在西吉尔马萨—瓦拉塔路线上打井，以保证商人的通行更加便【469】利。这是一种非常富裕的伙伴合作关系，经营的是黑非洲的标志性产品。但也有更廉价的苏丹商品在撒哈拉以北地区出售：布匹——比马里王子从地中海进口的布更粗。作为回报，马格里布商人出售两种特别重要的商品：铜和盐。对盐的需求可从艾尔—巴克雷所称的 1067 年加纳盐进口税仅是盐出口税的一半可以看出来。我们在撒哈拉发现的失踪商队带了大约 1 吨的条形铜。玻璃、珊瑚、锡、铅也运向南方；在非洲的某些地区，对贝币（cowrie shell）也有很大的需求。他们来自东印度群岛，在非洲和远东被用作交易媒介。那支迷路的商队也带了很多这种贝壳。他们大多是通过红海与埃及运送过来的。

非洲的黄金，单纯从数量上讲在中世纪是独一无二的。1252 年前的拉丁西方很少有黄金货币是用非洲黄金铸造的，前面已经提到 12 世纪埃及的铸币非常优秀。[2] 能得到非洲黄金有助于保证地中海沿岸的穆斯林对伊拉克、伊朗或拜占庭的经济优势。而且，在 1200 年后，它有助于缔造地中海的基督教徒海岸的经济成功，并且使意大利与加泰罗尼亚人在经济上起着决定性的主导地位。不足为奇的是，航海家亨利及其继承者可能已经寻求获取非洲黄金的新通道，并且骗取了埃及传统的黄金来源。

---

① 列弗蔡恩：《古代加纳和马里》，第 174～178 页。【95】

② 更准确地说，西西里的诺曼国王的铸币厂获取黄金的惟一证据是有关非洲黄金的：阿布拉菲亚："Maometto e Carlomagno"，242～243. 也可参考 R. S. 洛佩斯：《追溯黄金：1252 年》，载《经济史评论》，第 2 辑，第 9 卷，1956 年，第 219～240 页。【96】

6.6.3 东非贸易

与西非与马格里布、埃及和西班牙联系紧密不同，东非将目光从地中海转向别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离开了伊斯兰世界。中世纪早期的大量奴隶供应给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沼泽地，但9世纪他们参与赞吉叛乱证明了他们的不可靠性。伊德里斯与其他地理学家将松木与铁列于东非的出口产品中，这些产品不仅仅出口到伊斯兰地区，而且也大量出口到印度——优质武器的故乡。大米从基卢瓦运往亚丁。当然犀牛角特别受欢迎——但它在远东比在伊斯兰世界更有名。伊德里斯描述了扎巴吉人——显然是室利佛逝人——是怎样到达东非海岸的；有些现代权威如奇蒂克认为这样的长距离联【470】系是不可能的，但马来商人冒险至遥远的西方则不是不可能的。[1] 索马里是乳香的生产地，那里在13世纪与14世纪似乎就与亚丁建立了紧密的贸易联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到15世纪时，穆斯林商人对东非的兴趣极其有限。考古学家发现在15世纪的肯尼亚遗址上几乎没有什么发现，而埃及和叙利亚的发现却是让人鼓舞的。也许阿拉伯从红海运送的主要是易腐烂的商品如纺织品与食物，这些东西没有什么考古痕迹留下。当然在很早的时候，非洲之角从远至印度的地方获得大米、小米、酥油、糖浆、纺织品以及芝麻。甚至穆斯林地理学家在通往东方——印度及以远——的土地上也要比他们在东非的收获更多。

另一方面，这幅图像提供了东非与南亚通过古吉拉特中间人进行连续不断的大量贸易的证据。关于桑给巴尔，赵汝适在1225年所做的描述是很有启发的：

> 层拔（桑给巴尔）国位于印度古吉拉特以南海洋中的一个岛上。西面是高山。居民是阿拉伯族，信大食教。他们穿着蓝色的外国产的棉布，红色的皮鞋。每天吃的是粗磨粉、烤饼以及羊肉……这个国家生产象牙、黄金、龙涎香以及黄色的檀香。每年古吉拉特人和大食人沿着海一船船地运送白色棉布、陶器、铜、红棉到这个国家并在那里进行贸易。

与远东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肯尼亚海岸发现了大量14、15世纪的

① N. 奇蒂克（Chittick）：《东非与东方的贸易》，载《伊斯兰与亚洲的贸易》，第101～103页。但是伊德里斯有可能把斯里维查雅人混淆成在那里做生意的人。【97】

中国瓷器；郑和航海至非洲表明想与中国进一步巩固政治与贸易关系的剧烈渴望仍在加强。柯克曼评论说郑和的航行是卓越的，但印度人的接触显然不足。[①] 印度西北部的坎贝湾与非洲的贸易特别活跃。柯克曼甚至认为，15世纪东非海岸的房子与清真寺的拱形门也许是脱胎于印度原型——换句话说这种关系不仅仅是一种随便简单的贸易联系。更有说服力的是在桑给巴尔和表6-2列出的其他贸易城市发现的铸币证据。在基卢【471】瓦和桑给巴尔发现的大量的铜币表明东非的本地贸易也很活跃。1506年11月20日戴奥戈·德·阿尔坎科瓦（Diogo de Alcançova）写给葡萄牙国王的一封信表明，15世纪对进入基卢瓦的商人所携带的黄金和毛料税收沉重。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另一位葡萄牙作者则强调彭巴岛、马非亚和桑给巴尔统治者的"生活非常奢侈"，穿的是坎贝的衣料。

表6-2　　迄止1959年4月在东非发现的铸币的原产地

发现的地点和铸币数量

铸币的原产地	马非亚	桑给巴尔	彭巴岛	基卢瓦	索马里
马木路克	—	—	—	2	6
蒙古	4	—	—	—	—
不明身份的穆斯林	20	3	15	—	—
中国：唐	—	4	—	—	1
宋	9	185	—	—	16
明	—	—	—	—	6
锡兰	—	—	—	—	4
南印度（13世纪）	—	—	—	—	1
印度（巴马尼德）	—	—	—	—	1

资料来源：G. S. P. 弗里曼·格伦维尔，载《非洲历史杂志》，第1卷，1960年。

随着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到来，从马林地到卡利卡特的贸易路线又有了新的意义，东非游离于重要国际贸易路线之外的局面戛然而止了。

① J. S. 柯克曼（Kirkman）：《肯尼亚海岸作为印度洋的贸易和文化中的一个因素》，载《东方及印度洋地区的商会和贸易公司》，第247~253页。【98】

6.7 结　论

在这里不可能讨论中世纪穆斯林世界贸易的各个方面。无论如何，这个世界的边界是变动的：西班牙人出去了，巴尔干人进入了。但很清楚的是，有些城镇如10世纪倭马亚王朝时的西班牙、12世纪法蒂玛王朝时的埃及的繁荣明显超过了中世纪晚期的穆斯林城市。这种衰落不仅仅是因为意大利、加泰罗尼亚和北欧纺织中心高效有力的竞争者。早期的穆斯林统治者在贸易路线上采取相对节制的态度——他们对贸易路线的榨取比较温和，这与晚期埃及的马木路克们或蒙古人、伊拉克与伊朗的土库曼人的强烈财政需求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人访问穆斯林港口的频繁程度，以及他们与西方的贸易量在13世纪稳步增长，14世纪反复一阵后，15世纪又恢复了活力。尽管穆斯林世界作为印度尼西亚香料群岛或非洲内地金矿与拉丁西方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断上升，但这不应被解释为穆斯林内部持久商业活力的象征。工业生产下降，城市衰退，乡村孤立。西方商人访问穆斯林地区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要付出什么，而在于他们要从伊斯兰边缘地区马里、马六甲获得什么。 【472】

穆斯林贸易的根本问题是伊斯兰国家商人对剩余资本投资所采取的态度。统治者的反复多变——就像命运的变化一样——是众所周知的，以至于对工业的长期投资非常少，商人公司很少有能经历三代的。所有这些表明缺乏一个基础牢固的商人贵族阶层——他们能决定他们所居住的城市的利益，将财富和权力传给后代。在这个意义上，中世纪穆斯林商人没能留下持久的历史遗产。 【473】

第七章

1200 年前东欧的贸易和手工业

7.1 绪　　论

几乎没有必要指出中世纪早期的贸易和手工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形，它与中世纪晚期和现代复杂的经济活动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我们手头的资料和历史学家的理论工具还不能完整地解释东欧中世纪早期的经济生活的模糊形式。那些现存的文字资料主要告诉了我们远程贸易的情况。但是在过去的 40 年，这些文献资料又因为考古发掘而重新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它显示出古斯拉夫人日常生活的一些零碎的片段。在这些发掘中较典型的发现揭示了他们生产和消费的各种物品，这有助于我们得出某些有关它的基本结论，即使不是数量上，至少也是质量上的一些结论。

早期的商品和手艺人的交换经常在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献中谈到。但是，在所有社会和经济方面，自给自足和交换经济的分界并不是很明确的，历史学家在考察那些远古的历史时被迫使用的一些术语也并不总是十分确切。

至少直到11世纪末，东西斯拉夫人民过的基本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散布各处的较小的人群，住在大森林中开垦出的地带，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生产内部消费的产品上。这个地区的人口较之其他欧洲国家有多么稀疏，可以从对公元1000年的估算中得到一个大致的概念：每一个俄罗斯人对应的是4个中欧人和11个以上的西欧人。但是在那时和以前，这个小小的人群并没有阻碍商品的交换。同类的经济单元（部落，有领土的社区，农庄和其他的定居类型）能生产某些剩余，但这种剩余，或是因为更好的收成，或是由于渔猎而获得惊人的收获，或其他的因素，它既不是事先计划的也不是该经济单元所必需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的个人或家族能存在的原因。在社会上层随心所欲地拿取了他们所想要的 [474] 产品之后，其他与他们状况类似的成员就能相互交换商品。随着社会分层的继续，形成了一个贵族阶层，国家组织也出现了，交换的范围和深度就增长了。因此，原始的国际贸易披着阶级现象的外衣。有时其他因素也有助于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创造新的经济单元，如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科沃布热格，因为那里盐的储量较丰富，而在西北欧形成的经济单元是因为那里有丰富的动物毛皮。

这种商品的交换通常是双边的，也就是说，通过物物交换。但这不是商品流通的惟一方式。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抢劫、朝贡、统治者间的礼品交换、彩礼和赎金。罗马帝国衰落后金属货币的重现导致外贸系统中出现了另一种支付形式。但是我们可以假设在7~10世纪间，农产品和家畜饲养以及手艺人的手工艺品在国内的经济中仍是物物交换，只有那些给上层阶级（部落和家族首领和王公）消费的物品——而且也不是他们的日常必需品——才需要金属铸币。通过这种方式，奢侈品、金银首饰、金银块和其他明显为了显示主人社会地位的东西能够获得满足。不久，金钱也用来代表政治权力：根据《古俄罗斯纪年》，伊兹亚斯拉夫·拉罗斯拉维奇王公“带着很多财宝前往波兰，由于有了它的帮助，他将找到战士”。我们知道商品和金钱经济的第一个阶段——至少在地方层面上——在摩拉维亚是从9世纪中期开始的，在波希米亚是从10世纪开始：在这里各种不再有本质用途的商品偶尔也代替了货币（例如，小铁斧、一束亚麻、松鼠皮和盐块），而与此同时，铸币被用于外贸支付。

两个系统——封闭的农业经济和商品货币经济——以各种变化的形式和不同的比例共存，这种比例我们今天不能完全地鉴别出来。文字记录中也没有过多地提到它们。因为有相当多的钱币学证据，货币商品经济从某种程度

上更易于研究。正因为这样，比较其他交换形式和以物物交换形式进行的商品交换总量来，历史学家倾向于过分地看重货币支付的意义。还有更进一步[475]的趋势是，相较于内贸，历史学家过分强调外贸的作用。内贸虽然主要是一种地方商品的交换，但毕竟是普通人生活标准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在地方交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紧邻的地区（土著的生产）手艺人制造的手工艺品，从10世纪中期后开始在斯拉夫国家不断增加，这与我们对早期城市中心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一样。但还不清楚的是，这些商品是手艺人专门为公开集市生产的，还是它们作为被迫向贵族缴纳的贡品后由贵族将它们投入流通的。

在这个共存和相反的交换系统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加上经济生活的另一方面。在类似的小规模农村环境基础之上，有部落的发源地或早期斯拉夫国家的地方省，在其上运行的还有更大的范围，就像欧洲大陆一样大，是由像穆斯林中亚和拜占庭这样遥远的地方经济上强大的一极所主导。

在这些我们对它们的理解还远非完整的复杂、相互重叠的系统内，却有一些稳定的地区，尽管我们能看出它们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一些变化。一些经济迹象的持续只是几十年（例如，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商业和军事扩张），但是另外的——比如地方集市的城镇对它的农村外围的影响——则持续了几个世纪。了解了一个系统如何地叠加在另一个系统上之后，我们就能辨明在商业和手工业发展中的三个主要阶段。

在时间顺序上，我们的序幕在远程贸易的特点已经辨明后才拉开，也就是，在8世纪末当阿拉伯商人已开始渗入东斯拉夫人的土地上时才开始。我们有更早一些的考古资料可以证明更古老的接触一直可以追溯到斯拉夫人在5~7世纪的移民，我们的资料也涉及桑斯或苏瓦尼的萨摩人，他们在623年“为了同叫做温德斯的斯拉夫人做生意与其他的商人结伴而行”（弗里德加，第四章，第48页）。萨摩后来成了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统治者，他与在经济和政治上控制多瑙河通往拜占庭道路的阿瓦斯（Avars）展开斗争。但一直到9、10世纪得到巩固的摩拉维亚、波希米亚、波兰和俄罗斯斯拉夫国家才发展起一个积极的外贸系统。他们能够提供正常的很畅销商品的供应：不仅有战俘或是土著人的奴隶，而且还有很有销路的毛皮、蜂蜜和蜂蜡。这些商品大部分是王公的纳税人的实物税，但是它们也能不支付任何经[476]济补偿就被征用。11世纪初，这种贸易经历了严重的衰退，特别是那些直到那时仍接受穆斯林白银直接供应的地区更是如此。西斯拉夫人的土地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稍早一些，在10世纪后半期，第二个阶段——也差不多是

一个过渡性的时期——开始了。同时，随着阿拉伯商业开始衰落和与西欧贸易的加强，这个国家和贵族开始把大量的贵重金属贮藏起来，主要为上层社会利益服务的地方贸易和手工业中心开始在斯拉夫国家得到发展。

我们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是从 11 世纪中期开始，在东方银币断流和西方银币供应下降后贸易经历了一个重建的时期。为了减轻危机，贮藏的白银不得不投入流通，使用非货币支付的方法也开始出现。随着商品种类的越来越多，新的商业联系建立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斯拉夫国家地方手工业者开始发展，这些活动逐渐地渗透到农村。到 12 世纪，西斯拉夫的农业已紧紧地与货币商品经济联系在一起。我们对这些发展的考察必须在西斯拉夫国家 13 世纪城市扩展开始和蒙古人灾难性的入侵完全控制东斯拉夫之前结束。

所描述的图景的地理界限有些不够明确。它们大致与中世纪早期被东西斯拉夫人占领的地区重合：这个地区从多瑙河的中段向北到波罗的海，从西边的易北河向东一直到伏尔加和黑海。这里没有包括也属于地中海经济一部分的南斯拉夫地区，但把波罗的海和匈牙利包括进去了。

7.2 8～12 世纪中欧和东欧的远程贸易

关注中世纪贸易起点的欧洲经济史学家，长期以来把注意力放在远程贸易上。特别是他们对都与中亚和拜占庭做交易的东西欧之间的联系感兴趣。在近 50 年这个常新的地中海主题以及亨利·派伦写作的有关穆罕默德和查理曼的辩论性论文，一起被作为中世纪早期波罗的海研究和讨论的主题。有篇文章提出要将注意力转向穆罕默德、查理曼和鲁里克。根据这篇论文，欧洲在阿拉伯征服后的地中海贸易中遭受了损失，鲁里克和他的瓦兰吉人是对此补偿的象征。他们的贸易和军事扩展，就我们所知，在国际交换中开辟了一个北欧海盗时代。波罗的海据说成为一个轴心，在其沿岸经济生活发展成一股比地中海国家更高的浪潮。【477】

在本章中重新提出中世纪早期波罗的海的贸易问题，特别是对有关它在后加洛林王朝时代刺激了西欧的城市生活和贸易的理想主义观点提出挑战并不离题。许多学者已经发表了有关这个主题的思想，所有那些被北欧海盗时代欺骗的人都要好好地读读这些著作。但是撇开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贡献不谈——当然这无疑是相当重要的——斯拉夫国家和人民也需要我们从理性的

角度对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活力加以注意。10、11 世纪早期的斯拉夫城镇是对它们的生产和文化活动的强有力证明。

这种远程贸易的大致经济地理轮廓通过当时穆斯林地理学家的著作可以为我们所知，同时有些细节可以由穆斯林铸币在欧洲的分布得到补充。重心要放在东方，放在这些从 9～11 世纪早期就是斯拉夫商品的主要消费者的穆斯林帝国，放在南方，放在拜占庭。这使俄罗斯成为主要贸易经纪人和其他斯拉夫和波罗的海国家的票据交换所。与这种繁忙的贸易流通相比，西穆斯林帝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在 9、10 世纪这种贸易经西欧或威尼斯到达一些西斯拉夫国家，甚至通过一个细密的陆路网络与东方贸易联系起来。关于波罗的海贸易的不同特点和与斯拉夫国家和西欧的交易联系发展，我们将单独讨论。

7.2.1 地处斯堪的纳维亚和中亚之间的东欧

斯拉夫国家与其近邻及远邻贸易的根源是其贸易伙伴的不同经济和社会【478】特点。在斯拉夫世界的早期，它有极具精耕细作特点的农村经济，与阿拉伯集市的贸易是被准殖民地类型的商品需求所刺激。阿拉伯人需要无限的森林产品供应，穆斯林世界第一位的需要是奴隶。东斯拉夫国家和它们的北方乌戈尔族边界在它们建立起强大的政治系统时就能够满足这种需求并组织这种交换。

穆斯林世界的这种需要得到统治贵族迅速的回应。为了改善他们的军事地位和减轻对消费和炫耀的需求，他们寻找外国工艺的武器和奢侈品。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与东方交换的特点是物物交换——也就是用产品交换产品——这只是贸易的一部分，更重要得多的是它成为东方白银进入东北欧的主要通道。想一想从东方来的穆斯林商人居然能够与住在咸海和里海之滨的游牧部落和来自遥远的北方的芬兰（Finland）部落（乌戈尔族和维斯族）进行物物交换，这种贸易的特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物与银的交换是非阿拉伯人组织者的特殊需求的结果时，也是不会错的。

把东欧的经济财富与穆斯林贸易和手工业中心分开的几千公里距离能被许多商人和中间人的技巧和能力所克服。对与穆斯林亚洲的联系来说，最重要的似乎是来自花拉子模（位于里海、咸海、阿姆河和波斯之间）的商人。从 8 世纪起他们就是与东欧贸易的阿拉伯先锋，在东欧他们被称为科维里西（Khvalisi）。在往事纪年中，里海被称为科维里西霍耶莫耶。9～10 世纪花

拉子模成功地垄断了东欧与巴格达伊斯兰世界各国的贸易，他们开始接管毛皮和奴隶（包括太监）贸易。他们沿着伏尔加河深入到特别是卡马河上的哈扎尔人和保加利亚人那里。他们与匈牙利人和 10 世纪就居住于帕诺拉的花拉子模人中的一个分支关系很友好，这些人像伊兹梅尔兹人（Izmailits）或卡利兹一样，保持着他们商业上的作用和伊斯兰宗教。

西线伊斯兰贸易的出口最初在里海的东南海滨，经陆路一面与中亚另一面与巴格达联系。走海路，或既经海路也经陆路，行人和商品可到达伏尔加河的河口。伊本·法德兰（公元 922 年）说穿过伏尔加中游的大草原，很容易到达保加利亚和卡马河。另一个作者伊本·艾尔·法奎（Ibnal-Faguih）说从俄罗斯到伊斯兰国家的长途旅行有时可以走直道：操斯拉夫语的商人在里海海滨登船上岸，从那里骑骆驼到巴格达，在巴格达斯拉夫土著人给他们做翻译。但是，那么长的驮运距离是很不同寻常的。作为职业商人的花拉子模人与两个来自伏尔加的土耳其部落发生了接触，这两个部落的兴趣是从政治和经济上开发利用他们所征服的领土。 【479】

这些部落中的第一个——哈扎尔人——在 9 世纪初皈依了犹太教并建立起一个多部落但相对弱小的帝国。这个帝国位于高加索、多瑙河下游、第聂伯河和伏尔加之间的土地上。9 世纪和 10 世纪早期，它也包括一些斯拉夫部落（基辅的波兰人、塞弗里安斯、拉戴米奇斯、维亚泰切斯）。哈扎里亚（Khazaria）的首都伊蒂尔（阿蒂尔或哈姆利）位于伏尔加的下游，从 9 世纪起它就成为一个通往俄罗斯和以远的过渡站。那里也有瓦兰吉人、斯拉夫人、穆斯林人、犹太人和异教徒商人的殖民地，他们在那里还有自己的法官。哈扎里亚的卡干（Khagan）对从他领土上过境的商品强征什一税。

在卡马河和伏尔加河中游上的保加利亚人也是中间商人。他们在 10 世纪初开始信仰伊斯兰教，并从哈扎尔人手中解放出来，他们的首都保加利亚起了类似伊蒂尔的作用。一位 10 世纪的穆斯林作家因为他们经手大量的白银而称他们为“银色的保加利亚人”。他们控制了从东北欧到伊蒂尔和伊斯兰国家的最繁忙的路线。

走伏尔加河有两条不同的路线：经陆路，要花一个月的时间；经水路，溯流需两个月顺流只需 20 天。也有一条从伊蒂尔到基辅的陆路，有差不多 20 个中转站，另一条是经顿河上瑟克尔和克里米亚的刻松（Chersonesus），从克里米亚把商品比如原丝带到拜占庭，俄罗斯对里海的远征利用了这条路。

哈扎尔和保加利亚两个国家，被伊格的儿子俄罗斯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摧毁，俄罗斯得以更紧密地控制伏尔加河贸易并直接得到这些商品。但直到

蒙古人征服前，保加利亚和萨钦（也就是伊蒂尔的后来者）都还分别控制在哈扎尔人和保加利亚人手中。这种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家转向东部代表了至少100年来瓦兰吉人努力的顶峰，这种努力大约在公元800年开始，是以在波罗的海的东部海滨、佩普西湖艾尔曼和拉多加湖上建立的第一个堡垒和【480】商人村庄为开端的。这些商业活动与掠夺和征服同时进行；在里海和黑海上第一次被提及的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可以追溯到公元840年。

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扩展，就瑞典而言，并不采取迅速征服东方领土或对外国的大规模殖民的形式。在东斯拉夫土地上，瓦兰吉人建立起一个可资利用的战士商人（warrior-merchant）系统，它由驻在制高点堡垒里的训练有素的军队维持。他们对把通往阿拉伯世界的伏尔加航道和通往拜占庭的第聂伯河控制在自己手中感兴趣。他们靠着在一些现存的部落国家中维持一个不同的王朝并保持管理良好的军事和财政机构而与斯拉夫地方贵族保持着联系。我们听说过在9世纪中期基辅的阿斯科尔德和德尔王公，也听说过在诺夫哥罗德的鲁里克，他更有可能是拉多加的；鲁里克的儿子伊格（Igor）被公认是罗斯王朝的奠基人．它的首都和大公是在基辅。一个强盛的王国建立起来了，它接管了外贸，结束了不同瓦兰吉首领的任意远征并执行一种扩张政策。后者在10世纪虽然与瑞典的联系没有中断，但他们变得越来越斯拉夫化了。

但在更早的时候，也就是9世纪，与巴格达伊斯兰国家和中亚联系的兰吉人的贸易系统，控制了从波罗的海到伏尔加河的主要线路，也控制了“从瓦兰吉人到希腊人”的拜占庭线路。这些线路的第一条是由一个北俄罗斯的公路网络组成，它以爱沙尼亚（Estonia）和拉脱维亚和芬兰湾为起点，经由许多的水路和陆路分支穿过位于波罗的海和里海之间低矮的分水岭，最后到达伏尔加河的上游。在这一广袤的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和阿拉伯的进口品已经被考古发掘出来。偶尔也有地方村落的名称来源于瑞典语中表示商业和交通功能的词语。也有一些词语来源于我们所知的古俄罗斯的科技术语：*vaeringi/varyag* 最初的意思是一个商人行会里一成员，或是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概称；*kylfingr/kolbyag* 指行会里的年轻人；*byringe/buringe* 指“航运帮手”。这是瑞典和伏尔加河上游之间有组织贸易的一个证据，这种贸易所交换的产品有一些是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出产的，但主要是由开发整个东北地区森林的人民生产的产品。瓦兰吉人——他们在阿拉伯课文里被称为阿【481】鲁斯，以示与斯拉夫（萨卡里巴）相区别——从一开始起就得到后者的帮助，9世纪中期，斯拉夫语言开始在伊斯兰世界的贸易中被作为一门国际语言。

他们交易的是什么呢？东斯拉夫人提供质量相对较高的、少量的森林产

品比如毛皮（特别是貂皮和狐狸皮）、蜂蜜和蜂蜡。进口到花拉子模的小牛皮，按照俄罗斯语给取了阿拉伯名字；马皮也有需求，俄罗斯也出口亚麻。我们也知道他们出售的还有琥珀和武器。重要性稍逊但航运起来一样容易的，是奴隶。对此，从 9 世纪起伊斯兰东方国家文献中有太多的论述，他们的职业之一是成为王室卫兵。

伊斯兰集市巨大的需求显然不能由这些进口来满足，虽然有一些证据表明琥珀从伊斯兰再出口到中国，因而有少量的中国丝到达斯拉夫人手中。从穆斯林世界来的是香料、珠宝、铁器、半宝石、珠子和贵重的纺织品，考古学家在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海滨发现了这些物品的踪迹。

但是，这种交易的研究者长久以来就意识到贵重金属，特别是白银已经大规模流入伊斯兰的商业活动中，白银的绝大部分是通过卡马河上的保加尔而进来的。甚至有的人猜想与斯拉夫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贸易可能是一种单向的商品交换：东欧的产品被用来交换各种形式的东方白银——德赫姆、银条、银块，装饰品也被打破用来做交易，在这些交易中白银是按重量来计算的。11 世纪中期后的波斯历史学家阿加德兹给我们留下了比他所生活的时代更古老的信息，那就是卡马河上的保加利亚人“把德赫姆给斯拉夫人和阿鲁斯人，因为这些部落卖东西只收铸造的德赫姆”。我们知道一些物品的既定价格：在 10 世纪的保加利亚集市上，一件貂皮的售价是 2.5 德赫姆（1 德赫姆相当于 2.75 克银）。在俄罗斯，一个奴隶的成本大约是 100 德赫姆，但在他到达伊斯兰国家后售价可能是成本的 3 倍。

来源于伊斯兰世界的大量白银散见于俄罗斯北部的广大领域和波罗的海沿海地区（大约在 1 600 ~ 1 700 处发掘地找到了 200 000 ~ 300 000 件铸币，而这只占整个流通量的一小部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它被伊斯兰世界广泛地用来资助与斯拉夫和波罗的海世界的贸易。但是，需要对这个事实进行一些解释：这种流通只局限于银德赫姆，在地中海尤其在阿拉伯世界它们主要采用复本位制甚至是三本位制（包括铜币），以金第纳尔为主。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在于金对银的比例，在西方是 1:12，在拜占庭是 1:18，在伊斯兰则在 1:12 到 1:17 之间波动，可到了东北欧则从来不超过 1:10。这样，金的出口并不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特别是对阿拉伯东部世界而言，在那儿银的使用总是很普遍——这与以下事实不太符合，即作为一个流通单位，金第纳尔太贵重，因为甚至连银第纳尔在这些国家的某些交易中也必须敲碎使用。【482】

在俄罗斯和俄罗斯以远的地方发现的 9 世纪当作财富窖藏的穆斯林银币主要来源于伊斯兰世界最初 6 个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其中最多地来自哈

伦·阿·拉希德王朝。由此可见，它们在投入流通后好久才传到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钱币学家在这种滞后中看到了伊斯兰人与斯拉夫人做生意时获利的另一途径：他们送给西方的是不再流通的旧铸币，而买回来的是在实际流通中其价值远远超出其表面价值的德赫姆。直到10世纪，由萨马尼德人用从他们自己的本地银矿中开采出来的银铸造的银币，在用于支付欧洲的贸易时才没有时间差。

白银——斯堪的纳维亚需求的主要物品——通过毛皮和奴隶交换，通过向花拉子模人和保加利亚商人征收关税，或通过对哈扎尔人、保加利亚人和伊斯兰世界边界上的人进行抢劫取得赃物而转到了瓦兰吉人的手中。银的主要流向，正如阿拉伯硬币的贮藏地所显示的一样，是瑞典和哥特兰岛。为了安全起见，由瓦兰吉战士商人带到那里：根据推断的数据，在瑞典和哥特兰岛有520个有名的窖藏点。但银在流动的路上被抽空：在哈扎尔有18个，在保加利亚有20个，北方部落在佩姆有28个，在基辅有45个窖藏点。在俄罗斯北部特别多（280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有65个，全都分布在从瑞典通往里海的主要路线上。假如这些数据的比较值反映了9世纪和10世纪贸易的真实比例，那么很容易看出瓦兰吉人在进行其最初的开发活动的同时，也在向沿线的国家提供银，特别是对俄罗斯北部。斯堪的纳维亚的银也供应其他的波罗的海国家，这从在易北河下游、奥德河、维斯图拉河和尼曼河发现了520处阿拉伯的银币窖藏得到证明。一些贮藏还真是很大：在缪罗发现有重42公斤的11 000枚铸币，而在维里凯卢基发现有100公斤，其他超过100枚以上的窖藏都是旅行者埋下的。【483】

考古发现已使这种贸易的时间鉴别相对容易。它从9世纪早期开始，至9世纪中期到达高峰，在11世纪中期开始减弱。东方学者把这种衰落归根于一系列的原因：中亚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危机；那里银矿的耗绝或关闭；哈扎里亚的被毁灭；保加利亚被俄罗斯征服；最后还有商路受大草原的游牧民骚扰。虽然这种交流在后来重建起来，正如12世纪的阿布·哈米德所描述的那样，但交易量再也没有像在物物交换时那样大。

以前这种贸易方式停止的主要原因是银荒，而这种银荒，从10世纪末期开始扩展到整个穆斯林世界。我们在这儿不能讨论是什么原因导致银从东方消失——而差不多同时——在西方则是金的回归，但这两种现象被认为是缠绕错杂在一起的。最有趣的假设是，前面已提及的在东方（包括拜占庭）与西方（包括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金与银的比例的不对称产生了把西方的金吸引到东方和把东方的银吸引到西方的这样两种相同的力量。根

据这种解释，欧洲的金荒因而是同一现象的反面。对我们主题有意义的是大量白银被逐渐转向邻近的地区，部分可能转到印度和中国，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转向了东欧。它的数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阿拉伯银矿的产量，即使考虑到因为战争而丢失或者由于技术和政治原因没有被利用，也不能抵消这种大规模的流出，虽然这种流出只持续两个世纪。把越来越多的硬通货注入一种很不利的商业平衡，是造成银荒的一个原因。

显然，穆斯林国家更强烈地感觉到这种矛盾，特别是由于被贩运进来的奴隶更少了。后者在斯堪的纳维亚—阿拉伯人耗绝了它们的资源后能够重获生机；然而在维亚蒂默·斯维亚托斯拉夫之后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里，这种商业变得越来越没有地位。在俄罗斯边远地区没有发现这种贸易扩展的任何考古痕迹。重要人物住在城堡里，他们属于统治阶级，集中了大量的财富，就像基辅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亚罗斯拉维奇所贮藏的一样，他在1075 年向德意志特使炫耀他的财富。“他们看到大量的金、银和丝织品后说：这没什么，因为那是死钱”(《古俄罗斯纪年》)。 [484]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斯拉夫国家自身不断增长的生产潜力，它们从10 世纪中期开始靠自己的手工业来满足对一些奢侈品的需求。同时，萨克森银矿的发现导致西方的货币不再影响东欧，因而赶走了伊斯兰铸币。

东方贸易，虽然在规模上要小一些，在 11 世纪仍集中于基辅，直到 12 世纪它再一次向北经伏尔加河路线到达维拉蒂默—苏兹达尔罗斯，而伏尔加河与亚洲和高加索相连。保加利亚仍是一个中转站，1226 年俄罗斯在那里签订了一个为期 6 年的条约，这是在蒙古人入侵前的最后一个条约。它规定保加利亚商人，在出示适当的密封文件的条件下，只能在城镇进行贸易，而不能与庄园的官员或与农村的农民进行交易；作为互惠的条件，俄罗斯商人能在保加利亚居住并做生意。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是雄鹿、羊皮，贵重的金属制品，像镶嵌着乌银的铜瓶和由城镇手艺人制造的盔甲，还有来自农民朝贡的亚麻。波罗弗查恩斯游牧民很想得到俄罗斯的铜镜。另一个方向上流动的是香料、宝石和少量的东方工匠的手工商品，这些宝石的波斯名字在现代的俄罗斯语言中仍有保存。

7.2.2　地中海的斯拉夫奴隶

那么斯拉夫人与伊斯兰西部交易的是些什么呢？9 世纪中期，只是一小部分贵重物品经过欧洲的心脏穿过西班牙、法兰西和德意志，或者通过威尼

斯，然后从那儿到达遥远的伏尔加河河口的斯拉夫土地上。

巴格达的伊本·库达德巴在他写于9世纪中期后的“道路和王国篇”中讨论了这种贸易的结构和所谓的拉达尼特商人（阿拉达尼亚）的作用。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名字的最可能来源是波斯语“拉丹（rahdan）”，意思是向导：“他们讲阿拉伯语、波斯语、罗马语、法兰克语、西班牙语和斯拉夫语，他们四处旅行：从东到西，从西到东，走路，也坐船。从西方，他们带来太监、女佣、年轻的小伙子、锦缎、海狸皮、紫貂皮和剑。”他们所走的两条主要贸易路线，伊本·库达德巴提到过，一条是走海路，一条是经陆路，这也表明他们的活动集中在地中海和黑海，而且还与印度人有联系。“有时他们也经罗马（意大利），穿过斯拉夫人的土地，然后到达哈姆利【485】（伊蒂尔）这个哈扎尔人的城镇”，从那里他们由里海、大夏和特兰索克先纳到达中国。拉达尼特人从东方带来了肉豆蔻、樟脑、桂皮和芦荟。他们虽然刻意淡化在奴隶贸易中的角色，但文字材料显示的却正相反。没有理由怀疑是犹太人维持着与——经过仍在沉睡着的欧洲——阿拉伯另一端的经济联系。从11世纪中期美因茨的拉比爱胡达·梅尔·哈—科恩的著作中，我们知道犹太人在11世纪初的热梅希尔很活跃，这是一个位于从俄罗斯到波兰和匈牙利的路上的殖民地。

拉达尼特人肯定也是斯拉夫与东欧贸易的中间人，虽然并非惟一。大部分商品贩运的地方只到达德意志和意大利，而且就在那里被消费掉。奴隶的情况又不同，因为在这些国家的农业结构中，他们对奴隶的需求很少。另一方面，斯拉夫的奴隶出口到西班牙和非洲得到了广泛的证实。他们在这些国家被使用于军队、家务劳动、手工作坊的帮手中；而且对他们的需求量也很大。在阿布杜勒·拉赫曼三世统治时期斯拉夫奴隶的数量上升到14 000。斯拉夫的警卫和太监构成了行政层的一部分，在10世纪后半期和11世纪初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除了大量的穆斯林资料外，9世纪里昂的阿戈巴尔德（Agobard），10世纪克里莫纳的卢特普兰德和圣阿多尔伯特的莱夫都提到了美因茨、弗顿和里昂向西班牙的奴隶出口，他们是在这些地方被阉割后才出口的。在早期的斯拉夫城镇中，布拉格因其奴隶集市而闻名，这种奴隶集市到10世纪甚至还包括基督教囚犯。这就推翻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这些奴隶全都是法兰克或萨克森贵族在他们的抢劫中捕获的战俘，像马格拉夫·冈塞林（Guncelin），他的家庭成员被其他的贵族俘获作了奴隶（希特玛尔，第6卷，第54章）。新的斯拉夫国家的强大统治者也出卖他们的臣民。

我们在讨论中必须排除 7 世纪的萨摩国家，关于它我们知之不多，因为他们的发展很快就被阿瓦斯超过。9 世纪摩拉维亚人是第一位的。那时他们控制着多瑙河与从意大利北部到伊斯兰世界和以远的交通的连接点。在对斯塔雷·梅斯托、米库尔塞西和其他一些封建贵族的城堡的考古发掘中已经发现了数量惊人的以珍宝形式出现的黄金。部分黄金可能来自于拜占庭的商业和非商业交易（送给王公及其封建贵族的礼物）。但仍有一个问题，即其中的一部分是否并非来自威尼斯，它最早的出现可归根于向穆斯林非洲出口奴隶所换得的黄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捷克、波兰和匈牙利国家最早的社会结构中有大量的奴隶，这种奴隶贸易的踪迹可以从 12 世纪的资料中找到；极有可能的是，摩拉维亚人在国外集市上也出卖他们的奴隶。 [486]

这一时期斯拉夫奴隶在地中海集市上的数量可从两个语义中得到证明。在 9 世纪的阿拉伯世界里，单词 *Saqlab*（复数 *Saqāliba*）被广泛使用来代表奴隶。在拉丁语的西方，单词 *Sclavus* 和它在各种语言中的派生词，差不多同时也变得普遍起来。它可能起源于北意大利的 *Sclavi*，这是斯拉夫人的词汇。

对西方奴隶贸易的支付手段与对中亚的贸易支付形式有所不同。伊斯兰货币在其中实际上没有起作用，西班牙和非洲铸币在西斯拉夫国家的使用也极少。拉达尼特人和他们的商人所使用的交易方法不同于俄罗斯和波罗的海贸易的组织者。

另一方面，两个事例在时间顺序上是类似的。拉达尼特人的鼎盛期也结束于 10 世纪末。没有理由去寻找货币混乱的原因。决定性的因素似乎是欧洲经济的整体觉醒，斯拉夫国家也是如此，在那里，早期城市开始供应封建领主消费的大部分进口品。炫耀财富和奴隶贸易与更大民族国家的出现正好重合；而这一时期的终结在东西斯拉夫的土地上也是同时的。但是，必须指出，外贸的发展和斯拉夫国家的建立浪潮同时涌动，这意味着历史学家有时把政治生活的觉醒这个因素看得太重。问题的实质更复杂，在斯拉夫部落中既有社会和政治的变化，更不要说农业的变化也在起作用。其中一个变化是野心勃勃的部落贵族的出现，他们在对外扩张中找到了一条建立自己社会地位的道路。所有这些现象在 7 世纪和 8 世纪开始出现，这使得大地产的形成成为可能。贸易路线的开通是这种改变的另一个刺激因素，由于吸收其他种族的因素和通过外贸开辟政治扩展的路线，它有助于巩固斯拉夫统治阶级的地位。但是，这些国家的命运并没有受到这种贸易的命运的限制。 [487]

7.2.3 拜占庭的召唤

现在让我们考察远程贸易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在通往拜占庭的方向上。对东斯拉夫和西斯拉夫的部分地区而言，这种贸易是由基辅罗斯奠基的。只有摩拉维亚在与拜占庭打交道时是独立的；这种交易在10世纪时由匈牙利所继承。

从俄罗斯和拜占庭的原始资料中，我们能重构出这种贸易的性质和它的组织，一直到交通的每个细节。这种贸易和伏尔加河口的交易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在它的后期发展中，这种贸易显示出了强烈的差异。史料称这条道路“从瓦兰吉人到希腊人之路”，它从波罗的海经芬兰湾，沿涅瓦河到拉多加湖或沃尔霍夫、伊尔门（Ilmen）和罗维特——或坐船走里加湾和戴维纳，然后经第聂伯河顺流到达黑海；第聂伯河上悬岩峭壁间的大瀑布既有斯拉夫语的名字，也有瑞典语的名字；为了绕过它，船只被迫被搬运到陆上，甚至还要冒被大草原的游牧民佩切尼格人袭击的危险。在沿着黑海海滨航行后，商人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君士坦丁堡。这种航行大约要花10天。俄罗斯在第聂伯河、德涅斯特河和多瑙河河口获得了一个做掩护的港口，就像在第聂伯河上的奥勒西，或多瑙河河口的凯维一样。10世纪时，拜占庭的关税是在第聂伯河的河口缴纳的；刻松——在俄罗斯的科森，位于克里米亚的西南海滨——是北方一个防守很好的为整个帝国服务的商业中心；在988～989年将其征服后，维拉蒂默大公把铜马和其他的艺术杰作从那里带到基辅。俄罗斯和拜占庭对顿河上的特木塔拉汗展开争夺，因为它是通往高加索和特拉布宗的一个重要港口。

这个时期，一群瓦兰吉冒险家开始采取行动了。从9世纪开始，他们建立小规模的军事—商业殖民地，进而渗入斯拉夫腹地直到基辅的地区。他们发现在那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政治组织，而与地方部落贵族的联系有助于他们把这个地区纳入对拜占庭的贸易和政治扩张中。

9世纪中期，一个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的王朝走上了基辅的斯拉夫部落王公的道路，而这有助于组织起一种交易活动，交易的商品品种类似于发往阿拉伯国家的商品。在君斯坦丁·波菲罗格尼图斯的著作中（《论帝国管理》第9章）中有一段描述了冬天从东斯拉夫人那儿征收的实物地租，而[488]这就是俄罗斯统治者出口到拜占庭的商品。基辅的臣民——德雷维兰斯（Drevlans）、德雷格维奇（Dregovichs）、克莱维奇斯和塞弗里安斯——不仅

提供贡物还提供航运：每条用一根大树挖空制成的船配备了一班船员，其中大部分是斯拉夫和乌戈尔奴隶。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称这种出口是一个国有的事业。据可靠资料显示，911 年和 944 年俄罗斯和拜占庭王公之间签署的条约对这种奇怪的贸易有所说明。武装部队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乘坐俄罗斯船巡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按照帝国对外贸的严格控制征收贡物。

这些条约中的第一个条约由奥勒格王子签署（我们不讨论 907 年的文本，因为它被认为是后来几个文本的汇编），它废除了 *ius naufragii*，建议对遇难的人和物进行帮助，解决了对非法行为所该负的责任；它保证对战俘的交换，使俄罗斯人在拜占庭入伍成为可能，并鼓励对逃跑的奴隶进行追查。944 年，伊格王公与拜占庭王朝签订了另一个条约，包含很细节性的贸易条款。它负责以信函的方式向拜占庭政府通报发出的船只的数量。俄罗斯商人必须住在圣嬷嬷修道院区，每月得到食品供应。他们只许在春秋接待访客，而冬天就不可以。他们必须根据他们的籍贯进行登记：基辅、契尔尼戈夫、佩里亚斯拉夫。他们须由一皇室官员做引导，一组一组地每组不超过 50 人从指定的城门进入。他们买的每样东西都是免税的，到 10 世纪末期，经官方交涉后，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俄罗斯社区，它还有自己的东正教堂。

早期斯拉夫国家军事政策背后的动机之一是，他们想扩展这些商路并确保对它的财政控制。《古俄罗斯纪年》虽然在后来即 12 世纪早期完成，但它很好地说明了中世纪早期的气候，揭示了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格维奇王公想离开基辅，把首都移到多瑙河的掠夺性的动机。“在 6477 年（公元 969 年），斯维亚托斯拉夫对他的母亲和大臣宣称：呆在基辅令我不快。我想住在多瑙河上的佩里亚斯拉夫，因为那儿才是我的土地的中心。那里财富应有尽有：希腊人的金，华丽的布匹，葡萄酒和各种水果；还可以得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银和马；从俄罗斯得到毛皮、蜂蜡、蜂蜜和奴隶。”

作为交换，俄罗斯在君士坦丁堡购买地方特产，特别是昂贵的丝绸锦缎，它们在俄语中通常叫 *pavoloki*。为了拜占庭商人的利益，944 年的条约限制俄罗斯商人所能花费的钱数不能超过 50 苏勒德斯（左罗特尼克）。在那时的君士坦丁堡，两段丝绸就相当于一个奴隶的价格，一个年轻奴隶的价格是 10 苏勒德斯。俄罗斯奴隶贸易商人在 11 世纪有一个专门的贸易点。一个俄罗斯商人一次最多只能从帝国购买 10 段丝绸。 [489]

俄罗斯从君士坦丁堡得到的金银部分是作为对他们出售商品的回报，部分是作为政治礼物，还有一部分作为支付在帝国军队中服役的瓦兰吉战士的

工资。907年，拜占庭支付俄罗斯军队的工资为每人12银马克，总量相当于6 400公斤白银。1043年，逼近君士坦丁堡的俄罗斯舰队要求大约1 740公斤黄金作为赎金，这相当于帝国年收入的6% ~7%。

9世纪，甚至在10世纪，这些黄金经俄罗斯转到瑞典成为战士和商人家庭中的收藏。斯德哥尔摩考古博物馆金碧辉煌的哥特兰岛藏金屋是这种交易的最充分证明。但是，从10世纪中期开始，部分黄金在运往第聂伯河的路上，落在王公和俄罗斯贵族手中，他们聚敛了世俗的和教会的金银餐具和珠宝。从11世纪起在俄罗斯南部就有拜占庭的金苏勒德斯。可以肯定的是，一些黄金在用于购买奢侈品时回到了黑海。

但是，似乎俄罗斯—拜占庭贸易通常是一种双边的商品交换，交换双方的经济潜力基本上是平等的。但是，即使是基辅这个有着普遍需求的大国的首都——拜占庭商品的主要买主——它的大部分出口品也不是由自身生产，而是来自俄罗斯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北部。这很好地说明了拜占庭金币为什么只流通到了基辅而银币却向北传得很远。

一般而言，拜占庭金币——偶尔有9世纪发行的，但可能到10世纪才到达斯拉夫国家——并没有在这种贸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其他的一些铸币［君士坦丁·波菲罗格尼图斯（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913 ~ 959年）王朝和约翰一世齐米斯克斯（969 ~ 976年）的银米拉雷西亚］仅在北俄罗斯可以见到，它们经斯堪的纳维亚到达波美拉尼亚、大波兰和马佐维亚。这些米拉雷西亚的出口因为其名义价值不同而受到妨碍：在10世纪的拜占庭，它的价格是本身所含金属的内在价值的两倍。【490】

以双方的汇率进行贸易而且双方都保持支付平衡，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联系延续了那么长的原因。它们甚至没有因为拜占庭从11世纪初开始的白银危机而中断。即使在经常受佩切尼格人的后代波罗弗查恩斯游牧民威胁的第聂伯河路线上也没有中断过。它的最终衰落是因为经意大利的城镇到黑海开通了新的路线，但即使如此它也一直维持到1204年希腊帝国垮台和13世纪第二个25年蒙古人带来的大灾难时才最后结束。

在这种初期的准国家拥有出口贸易后，与拜占庭打交道的商人于11世纪开始逐渐得到解放。他们在基辅建立起一个公司，1069年它试图对王公施加政治压力。12世纪在君士坦丁堡有一个相当大的俄罗斯殖民地，它位于城内，与靠近金角湾的“40殉教者教堂（the Church of Forty Martyrs）”接壤。10世纪，除了奴隶外俄罗斯还出口蜂蜜和蜂蜡；11世纪和12世纪的资料进一步丰富了它的内容——紫貂、顿河的鱼子酱、熏鱼和海象牙雕。在俄

罗斯王公的保护下建立了一个专门的交通机构，负责通往哈里奇（Halich）的“索尔尼（Solny）”路（也就是盐路（Saltroad）），通往顿河的“扎罗兹尼（Zalozny）”路（这个名字可能来源于在河岸的柳树），还有经第聂伯河、瓦尔纳和梅塞姆布里亚的“希腊人的”道路。12 世纪哈里奇公国也有自己的沿普鲁特河到多瑙河河口的道路，并与拜占庭保持着活跃的贸易联系，在这个世纪初它甚至成为拜占庭的保护国。

与此同时，（11 世纪到 12 世纪）萨洛尼卡每年开办的 10 月集市，成为对俄罗斯贸易的第二个集市，在这里有来自顿河和多瑙河的葡萄酒、咸鱼、鱼子酱和蜂蜡出售。我们从图德拉的本杰明（Benjamin of Tudela）（12 世纪晚期）中了解到，奴隶贸易远展至亚历山大。圣山修道院（Mount Athos）在这里起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作用。12 世纪初在这里建立起了俄罗斯克希鲁古修道院，拥有自己的港口和仓库。12 世纪它被称为圣潘特雷蒙或俄罗斯修道院，它的部分供应来自俄罗斯，比如像纺织品和地毯这样的动产。俄罗斯朝圣者的行程并不仅仅局限于圣山和君士坦丁堡；我们看到有一篇文章记载说赫古梅诺斯·丹尼尔（Daniel, Hegumenos）和他的同伴在 1106 ~ 1108 年前往耶路撒冷。

我们也有关于住在基辅圣伊利亚斯教堂的希腊商人详情的记载。他们中有些人来自刻松，带来了马赛克、硫磺、黄金制品、玻璃、丝绸、天鹅绒、[491] 锦绣、葡萄酒、香料、水果、剪好的毛皮（例如摩洛哥皮）、礼拜式花瓶、衣服还有偶像。在 1106 年的诺夫哥罗德也可以看到他们。希腊工匠在基辅干活，他们在珐琅、陶器和制造玻璃方面特别有名。

7.2.4 波罗的海贸易和斯拉夫人

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组织从波罗的海到中亚和希腊世界的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包括他们在波罗的海范围内的活动。他们为从亚洲和拜占庭运到西方的商品提供了桥梁吗？或者波罗的海只不过是一个单一的经济区，它形成东西道路链条的最后的一个环节，而这条道路并不像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国家满足自己的需求所要求的道路一样重要？第二个假设可能是最好的，虽然《古俄罗斯纪年》中这句“乘帆船经戴维纳到瓦兰吉和从瓦兰吉到罗马”意味着有人可能绕行过大陆，并到达了西班牙和君士坦丁堡。

中世纪早期的波罗的海贸易的开始并非从斯堪的纳维亚人出现在东欧算起。而是开始于在这之前的 7 ~ 9 世纪日德兰半岛的莱茵河河口和瑞典之间

一直保持着的联系。9世纪后半期完成的《安斯卡里的历程》（Vita Anskarii）提到这条路上的三个贸易中心：弗里斯兰的多尔斯塔德（Dorstad），丹麦的海撒布（Haithabu）（赫德拜（Hedeby））和瑞典的伯卡（Birka）。书中谈到一个处于斯拉夫交通要冲（第19页）的城镇，那可能就是沃林（Wolin）。808年有一个叫雷里克（Reric）的斯拉夫集市［可能是瓦格里亚的施塔加德（奥登堡）］，后来丹麦人为了海撒布的利益把它给毁掉了。维塞克斯的国王阿尔弗列德（Alfred）的特使伍尔夫斯坦于887～890年经海撒布到达维斯图拉河的河口，在那里他发现了普鲁士领土上一个叫特鲁索的集市［现在是在埃尔布隆格附近的德鲁泽诺（Družno）］。考古发现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丰富了有关这个贸易中心的早期城市生活的情景。考古学家已经查明了其他的一些中心，像在弗里斯兰海岸的栋堡，位于奥斯陆湾的斯科林格萨尔，或者伯卡和斯德哥尔摩之间的莱罗·赫尔冈。

瑞典人沿着东欧的河流和伏尔加河流域开辟的道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这个方向。在同一时期内，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西支切断了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道路，虽然他们没完全关闭它，但是马拉尔湖（800～975年）上伯卡的商业生活，显示出与【492】西方的联系比与穆斯林东方的联系要弱一些。甚至在10世纪初海撒布港转到瑞典人手中的几十年里，瑞典人手中掌握的穆斯林白银也没有转到西方去。

因此，10世纪整个波罗的海地区是一个从东方贸易中吸取的货币接受者，而不是一个真正与西方经济联系的促进者，事实上从9世纪晚期开始，瑞典和日德兰半岛变得日益自闭而成为一个死角，当他们贮藏的钱停止了流通后，部分白银处于闲置状态。

有人可能会问，是否由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出口能力才吸引了如此大量的金银。实际上这些贮藏，至少部分是由非经济活动而产生的。一部分财富通过开发当地森林而积存在俄罗斯北部，而其余部分财富则可能转到了这种贸易组织者的家乡，以此作为亲人的礼物或作为他们自己贮藏的财富。无论如何，穆斯林白银引入波罗的海盆地引发了它内部的贸易。在邻近瑞典的一些国家发现了少量的德赫姆。在挪威和丹麦只有大约60枚硬币被发现，但斯拉夫和波罗的海部落对瑞典储存的白银吸收得更自由一些：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发现了65处窖藏地；在普鲁士发现了20个；整个波兰是255个（波美拉尼亚143个，大陆波兰112个）；在易北河上的斯拉夫人有41个。阿拉伯铸币的储量在奥德河下游和维斯图拉河（也就是10世纪波兰国家形成时的祖地）是相当惊人的。穆斯林铸币的流入年代也很有趣。它们在9

世纪中期开始大规模进入。在日德兰这些贮藏的高峰时期是在920～930年，从那以后开始迅速地衰落，在波美拉尼亚这种衰落直到960年才开始。由瓦兰吉人活动引起的外部白银流入在时间上整体来说持续了大约100年。

为什么瑞典人能给波罗的海沿岸的南方人，主要是斯拉夫人提供白银？一种原因可能是这个地区能给瑞典人提供他们自己消费和再出口的商品。最近有人提出这种产品就是食物——谷类、牲畜、蜂蜜——早期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有可能缺乏这些产品，而斯拉夫的农业和牲畜饲养业却恰巧能够提供这些东西；因为有斯拉夫人陶器的考古踪迹——特别是容器比如储存蜂蜜的容器——在瑞典人的考古发掘中有所发现。这些国家的斯拉夫中间人有可能购买了这些食物并把它转手给了瑞典的海员。

在不否定这点的情况下，接着让我们考虑一些其他的、更大的可能性，[493] 这些已在斯拉夫国家在经过瑞典积聚阿拉伯财富的角色中体现出来。除了琥珀外——其实琥珀并不是这些商品中最重要的——它们的手工艺品（陶器）出口，波美拉尼亚的井盐、毛皮和奴隶的出口也是可能的。波美拉尼亚和波兰领土上的政治状况——部落国家的存在——使得这些商品的传输和贸易的不断重组在9世纪比较容易进行。从10世纪初开始，形势改善得很快。

在奥德河的河口，即它的东段的兹瓦纳河（Dziwna，river）经什切青湾入海处，在一个离公海有一段安全距离的位置，于9世纪前半期建立起一个叫沃林的斯拉夫城堡式的城镇和港口。不来梅的亚当写道：*ad civitatem Sclavorum guae Jumme dicitur*（II，约27～28年）。它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资料中叫乔姆（乔姆斯堡）。10世纪中期后，它成为与海撒布、伯卡一样重要的城市。在那儿进行多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个早期城镇的遗址，它有着典型的斯拉夫物质文化特征。类似的定居点在科沃布热格（9世纪）也有发现，它的居民也利用盐锅并出口盐；在卡米恩也一样；在什切青（从10世纪开始）亦是如此。

与此同时，进行远程贸易的易北河上的斯拉夫人的第一批城镇定居点也出现了——这表明了在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发生了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改变。一些主要部落城堡地的中心地区已经可以辨认，像瓦格里亚领土上的施塔加德（奥尔登堡），离海撒布有两天的路程，被不来梅的亚当视为商业化的海港，在11世纪被老吕贝克超过；在奥波德里特的梅奇林（梅克棱堡），它有维斯马港，港口位于离北部海滨5公里处；拉多哥斯克，一个异教徒的中心，位于拉塔里人的土地上；乌兹纳姆（乌瑟多姆）在皮恩河口，皮恩河是奥德河三角洲的另一条支流；布雷纳（勃兰登堡，Brandenburg）在哈夫兰地区。9

世纪，在桑比亚半岛上，普鲁士的商业中心威斯基奥滕经常有瑞典人光顾。在维斯图拉河的沼泽河口，即位于海湾的东部靠近现代埃尔布隆格的地方，在9、10世纪建起了普鲁士港口特鲁索（德鲁泽诺）；海岸线后来改变了，正由于这个原因，还由于联系维斯图拉河上游波兰国家的重要性，导致了10世纪后半期的格但斯克（Gdańsk）（即但泽）这个位于三角洲西海岸的斯拉夫港口和城镇的兴起。

[494] 这些贸易中心对白银的兴趣比对在奥德河三角洲、波美拉尼亚和波兰中部定居的兴趣小得多。在沃林、卡米恩、什切青周围有一条白银窖藏非常集中的地带，其中13个窖藏只有阿拉伯铸币，这些货币可能是经瑞典而来。从963年开始，奥德河下游的土地进入了波兰公国的政治活动的范围，包括力求以军事力量获取远程贸易的利益。对波兰窖藏地的一项研究表明，从10世纪开始，在格涅兹诺（Gniezno）周围崛起一个强大的中心，它吸引了地方贵族和王室战士所窖藏的白银；窖藏集中于第一个波兰国家北部的事实表明了它与波罗的海的经济联系。即使这种联系的最初动机来源于斯堪的纳维亚一方，但在波罗的海的南岸也就是沃林并没有发现瑞典人政治活动的足迹。这种商业联系的不断发展与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肯定还有普鲁士籍海员在波罗的海的海盗活动增加同时展开。瑞典人和丹麦人在9世纪和10世纪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面，在陆地上，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权贵参与了波罗的海贸易。波兰公国在9世纪建立起来，到该世纪末就控制了奥德河和维斯图拉河盆地。它的统治机构是本地的，虽然有时也用外国模式，比如财政系统。

10世纪末波罗的海贸易发生了重要的改变。阿拉伯白银停止流入的后果在波罗的海南岸不久就有了体现；最后一个阿拉伯铸币贮藏地可追溯到10世纪末期。从西方流入的白银代替了阿拉伯铸币的位置，它们是来自丹麦海撒布的铸币，还有英格兰和爱尔兰的铸币。10世纪在西斯拉夫出现的英格兰铸币很容易由进入丹麦的“丹麦金（Danegeld）”① 被再出口到波罗的海来解释。英格兰与波美拉尼亚也就是与波兰之间的任何贸易联系似乎都不可能。但是，一种英格兰铸币——爱特尔雷德二世（Æthelred II）的一分的铸币——成为勇敢者波列斯拉夫（Boleslav the Brave）在1010年左右铸造的波兰硬币的设计样板。

分布最广的是德意志人的钱。一旦马格亚人侵的危机过去，萨克森贵族

① 古时英格兰为向丹麦朝贡或筹措抗丹军费而征收的一种年度税。——译者注

就开始猛烈地入侵斯拉夫人在易北河的土地。在哈尔茨山地发现了大约 965 处银矿，这使得铸币成为可能，德意志的铸币源源流入西斯拉夫人居住的地方。在德意志内部对金钱的需求不断增长的同时，他们对萨克森和弗里斯兰铸币厂生产出口铸币也有了明显的需求，这些铸币的生产不仅供给德意志与易北河的斯拉夫人和波兰做生意所需的货币，而且为这种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有证据表明西方货币大规模流入波罗的海导致了白银价格的下 [495] 降，这又进一步扩大了穆斯林的白银危机，排挤了它的“贵重”货币，只要那些像铸币厂和银矿这样的地方更倾向于制造西方的货币。西方货币侵入的地区包括日德兰半岛、俄罗斯北部和整个波兰，还有易北河流域的国家。

但是很难推翻这种印象，即这种货币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于伊斯兰的货币。当然，它有助于把斯拉夫商品吸引到德意志，但在发展地区贸易和货币经济的过程中，它与捷克和波兰货币一起起作用。虽然比在俄罗斯早一些，但从 10 世纪中期起，捷克和波兰经济也面临着在它们发展的下一阶段所面临的问题。远程贸易仅使一小部分贵族获利，但到此时它的发展还远远没有达到满足需要的程度；它还需要基础更广泛的对内对外贸易。

假如说中欧和东欧的早期甚至原始贸易的历史图景在宏观经济领域还相对容易鉴别的话，波罗的海海岸和大陆的对外贸易的转型似乎有着不同的特点，因而需要更多详细的分析研究。但已有研究我们可利用，比如汉萨同盟到来之前瑞典经济的研究，诺夫哥罗德的西方贸易起源研究，像波美拉尼亚、波兰和易北河城镇的商业和生产功能的研究等。这些研究给我们勾画出了有关 11 世纪和 12 世纪波罗的海贸易的情景。

早期的沃林和其他城镇定居点的起源，必须在远程贸易中追溯其发展。但在各地它都与地方手工业生产的崛起紧密联系。11 世纪，波罗的海沿岸城镇不仅成为贸易的中心，而且是手工业的中心（木材加工、玻璃制造、非铁金属和铁器的锻造、角器的加工、木工、制陶和造鞋），但在城镇定居的人们仍靠农业、牲畜饲养和捕鱼为生。

波美拉尼亚的权贵们（primores）住在这些城镇里，正如《圣奥托的传记》（*Lives of St Otto*）对他们在 12 世纪后半期的多姿多彩生活所做的描述一样，他们既从事贸易（其中也有奴隶贸易），也从事抢劫。斯拉夫军队在 11 世纪和 12 世纪中获得了军事上的优势，但在 12 世纪后半期，丹麦人成功地镇压了斯拉夫人的海盗活动。这是导致沃林的经济重要性衰落的众多因素之一。对此，不来梅的亚当在 1072～1076 年写道：“celeberrimam prestat [496] stacionem Barbaris et Grecis qui sunt in circuitu”，“urbs illa mercibus omnium

septentrionalium nationum locuples nihil non habet iocundi aut rari。”（第 2 卷，第 22 页）我们由此知道从汉堡到沃林走陆路要花 7 天时间，从沃林到大诺夫哥罗德走海路和陆路要花 14 天时间。11 世纪，原有的奢侈品贸易形式继续存在，产于诺夫哥罗德的毛皮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主要来自于萨克森的一小部分白银为试图开发易北河流域、波美拉尼亚和波兰的出口机会的商人提供了活动经费。白银再次集聚起来，不过这次来自西方，它表明了经济过程是多么相似。窖藏白银的数目增加了，通常位于早期的城市定居点附近。

随后一个明显间隔期直到 11 世纪末才到来，这时窖藏金属的数量下降了，而到 12 世纪前半期，这种窖藏现象彻底消失了。这可以用从国外流入的白银停止和地方交易增加来解释，由于这两个原因，所有能得到的白银都投入了流通，本地统治者自己开始大规模铸造货币。

波罗的海的城镇，不管是像丹麦的卢恩、罗斯基勒或是瑞典的锡格蒂纳这样的斯堪的纳维亚城镇，还是上面提到的斯拉夫城镇，都在 11 世纪晚期开始把它们自己的手艺人的产品投入当地的市场，可能也投入了远程贸易之中。他们自己组织开发农村的内地森林，进行牲畜饲养。在易北河的土地上，集市围绕着管理该地区的城镇而建立，比如在 1128 年的德明（Demmin）即存在一个集市和旅馆的网络，并向王公缴税（《易北河》第 2 章，第 5 页）。在吕根——直到 1165 年阿科纳的异教寺庙衰落时——税收是缴纳到教士的财库中的。12 世纪集市也以 Vicus 之名而存在。在西波美拉尼亚，由巴姆堡（Bamberg）主教奥托组织的基督教传教团，穿过什切青一周开市两次的集市（在 12 世纪的后半期），附近地区的农民从田间小路去赶集。同时，什切青商人在卡米恩和吕根做生意，可能一年两次参与鲱鱼的捕捞。什切青在地区贸易增加时，有一个比孤立的沃林更加广阔的腹地，因此获得了一个相对其对手的领先地位，因而在 12 世纪成功地瓦解了后者的长途贸易。当地的生产条件完全有能力保证科沃布热格的贸易发展。当奥托主教到达那里时，许多居民都在旅途上忙着交易；12 世纪，这个城镇盐的生产扩大了，财政也得到重组，它们甚至给西里西亚（Silesia）和大波兰提供食盐。那个地区的大多数商人是与土地联系紧密的斯拉夫人，但是我们也知道在 11 世纪，在梅希林有萨克森和丹麦商人，在老吕贝克有萨克森商人。12 世纪后期，在格但斯克也许有来自吕贝克的德意志商人。12 世纪和 13 世纪之交的文献表明，这些城镇在地方王公的法律统治下，而外国商人在王公的特殊保护下有单独条款加以管理。

[497]

考古发掘和文字资料都显示出新的远程贸易商品种类。比如 12 世纪的英国

布和佛兰德布、波罗的海鲱鱼，莱茵河的玻璃器皿和陶器，在格但斯克出现的瑞典铁器等。就出口而言，13世纪第三个25年什切青的海关税则列举出来自波美拉尼亚相同的传统商品：小牛和马毛皮、绵羊和羊羔皮；海狸、水獭皮、紫貂、狐狸皮；鹿、蜂蜜和蜂蜡。这些货物的重要性日渐增长。

从考古遗址中我们知道了西斯拉夫人海上交通的情况；他们的船只从来没有像斯堪的纳维亚的战舰那样大。除了小型渔船外，我们知道船只是多桨的，上面配有战士，较窄但速度较快，长约11～13米，宽约2.40米，载重约3～5吨，这种船来自韦巴和格但斯克的路上，货船长11米，宽5米，载重10吨；这两种类型的船都使用帆。在12世纪晚期（首次提到是在1210年）一种产于弗里斯兰的小船，由萨克森商人驾驶着出现在波罗的海。这是一种两倍于最大的斯拉夫货船的帆船。波罗的海帆船的速度能从较早时期（9世纪）阿尔弗雷德国王的笔记中推论出；他的船员伍尔夫斯坦从海撒布航行到特鲁索，走了7天7夜（大约有365海里），大约每小时走2.2海里。类似的速度——每小时走2.4海里——可以从11世纪从沃林到诺夫哥罗德需走14天而推算得出。从那以后，弗里斯兰小船的速度提高了1倍，从而开辟了一个汉萨霸权的时代。

瓦兰吉贸易衰落后，东斯拉夫人建立起大诺夫哥罗德作为他们与波罗的海联系的主要中心。它在10世纪中期建立起来（最早的树木年代学数据可追溯到953年），是进入俄罗斯贸易路线的交汇点。它的竞争对手是波洛茨克、维捷布斯克、斯摩棱斯克、普斯科夫，后者从属于诺夫哥罗德。钱币学证据表明从11世纪和12世纪之交起，德意志银币开始渗入了北俄罗斯（在北方有122处发现而在南方只有7处），并如在波罗的海海滨一样，代替了阿拉伯银币。这种贸易的主要中介是日德兰半岛（这里有一个维斯比的城镇，名字叫"波罗的海的眼睛"）和波罗的海的东海岸。在德意志征服之前，里加作为塞姆加尔的一个港口而建在这里。在12世纪，诺夫哥罗德和西方之间的贸易在编年史中得到了充分地描述；似乎这与整个波罗的海贸易量的改变也是重合的。 [498]

与北德意志在12世纪30年代的联系可由从俄罗斯到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的朝拜者予以证实：在12世纪的遗址中发现了诺夫哥罗德一个名叫艾尔亚·路德格钦的人的十字架，上面雕刻有俄文。但是我们也听说约在1158年不来梅第一次航行到诺夫哥罗德，1188年弗雷德里克一世给吕贝克的特许状中也提到过俄罗斯商人。这一时期实际上是汉萨商人与波罗的海和诺夫哥罗德罗斯贸易的重组时期，而这种重组在他们的手中很快就成为一种垄断。

来自瑞典、日德兰、不来梅、吕贝克的外国商人居住在诺夫哥罗德不同的街道上，他们有自己可做仓库的天主教教堂，就如德意志人的圣彼得教堂一样。帕拉塞维教堂也有一个诺夫哥罗德商人单独与西方进行贸易的组织。我们知道他们从诺夫哥罗德去过罗斯基勒、锡格蒂纳、石勒苏益格和吕贝克；我们也听说过在此期间发生的战争和贸易冲突，比如1188年当诺夫哥罗德宣布关闭与西方的贸易时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1189～1199年间诺夫哥罗德与德意志和日德兰商人签订了一个条约，重申了双方传统的和平贸易保证。1229年在斯摩棱斯克签订了一个类似的条约，其中包含了有关法律和信贷的详细规定。

诺夫哥罗德贸易的基础是什么？交易商品的宽泛归类（来源于西方的商品包括建教堂屋顶用的铅；葡萄酒；豪富餐桌上的香料；来自莱茵河流域和利摩日的瓷釉）不应该模糊这个事实，即蜂蜡特别是毛皮不久就在北俄罗斯的出口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像从西方进口的银一样。诺夫哥罗德作为一个贸易中心所形成的独特经济在12世纪就已初具规模。这片人口稀疏【499】面积广袤的土地主要通过北方部落的政治控制而得到开发。各种毛皮都有需求，但是，白松鼠毛皮特别受欢迎，他们的种类和质量经仔细检查后，以40（*sorok*）或1 000为单位捆在一起。有些地方供应蜂蜡，后来按石（是一圆形物）和桶出售。1137年，诺夫哥罗德为控制北部戴维纳腹地和佩乔拉甚至远至白海的广大地区而继续战争，在12世纪又为乌拉尔山而战；它征服了卡马盆地一直到维亚特卡和切普扎的广大地区。征服尤格拉和桑莫耶德斯使它与不知道使用铁的人们发生了联系，与那些人做生意时不得不通过手势进行，因为，正如俄罗斯的编年史所说，他们不能“理解我们的语言”。

7.2.5 斯拉夫人与西欧的陆上贸易

来自西欧的商品除经波罗的海外还有几条路可以到达斯拉夫国家。在转送途中，它们经过易北河流域的斯拉夫人、摩拉维亚人、匈牙利人和巴尔干斯拉夫人的土地，经波兰或匈牙利到达基辅罗斯。我们前面已讨论了犹太人和来自中欧的其他商人到达尤姆马亚兹伊斯兰国家的商路（见485～486页）。

西斯拉夫国家的考古资料表明，8世纪只有少量来自法兰克国家的商品到达它的边界地区。805年蒂永维尔法令集规范了这种交易，指定了法兰克和斯拉夫商人会面的地点如巴多维克、石勒塞尔（Schlessel）、马格德堡、爱尔特、哈尔施塔特（Hallstadt）、佛切海姆、班贝格、拉蒂斯班（雷根斯堡）和洛尔希，并禁止武器出口到阿瓦斯人和斯拉夫人手中；也有一些信

息是有关法兰克国家向东方出口盐的情况的。俄罗斯的使者 839 年在英格尔海姆参拜了虔诚者路易，这可以证明瓦兰吉人与加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之间的联系。在 9 世纪晚期，拉芬尔斯特坦的关税价目表提到东巴伐利亚（Bavaria）出现了"肯定从事着商业活动的斯拉夫人"，尽管不完全确定，他们被认为是来自俄罗斯和波希米亚的商人。通过这个海关的男女奴隶都要接受检查（根据关税的价目表，后者是前者价格的两倍）；还有马以及通过驮兽航运的蜂蜡、食物等。从其他的资料中，我们知道奥不诺底特斯和捷克人还出口马到西方；毛皮和羽毛也有出口。西方则供应来自莱茵河流域和多瑙河的剑，上面刻着制造者的名字（乌尔夫伯斯、英格尔雷特等），有一些是经陆路而来，一些是经波罗的海而来。在波兰和匈牙利，有一些关【500】于瓦兰吉人和凯尔芬格斯曾在那里出现的珍贵证据，但他们当时的身份可能是雇佣兵而不是商人。

10 世纪时贸易联系开始繁荣，这时双方在全国范围组织他们的外贸。这一时期，多瑙河路线由于马格亚人的定居而关闭了，而地中海贸易仍处在初期阶段。在德意志，巴多维克、马格德堡、哈利（Halle）和雷根斯堡成为异常突出的贸易城镇；而布拉格是它们的竞争对手，它建立了一个买卖俄罗斯、匈牙利、巴尔干和波兰奴隶和其他商品的巨大集市。在喀尔巴阡山的北部还有克拉科，经此可以通向基辅。斯拉夫的出口，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的进口，虽然具有像从前一样的特性，但肯定有更多的内容。

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期，德意志人在贸易方面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如同我们在波罗的海地区所见的一样，他们想要使汇率成为单方面的，并以白银来购买商品。目前所知的 1 210 处发现中已经出土了 200 000 件德国的迪纳里厄斯，其中包括在波兰的 88 个遗址出土的 84 000 件；其他较集中的地方是日德兰（200 处发现）、瑞典（78 处）和俄罗斯北部（122 处），所有这些地方都与波罗的海贸易路线相联系。如果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23 处）、匈牙利（3 处）、俄罗斯南部（8 处）、易北河的斯拉夫的南部地区（88 处）做一比较，则波兰与帝国陆上联系的活力就显而易见了。但波兰像瑞典一样，倾向于把白银囤积起来而不投入流通。铸币流入的高峰期是在 11 世纪中期，它主要来自萨克森的铸币厂。但由于白银的普遍危机和波兰本地货币交换的危机，这种流入到该世纪末突然中断。11 世纪 70 年代，后来的公国开始使用早期贮藏的大量铸币。

与此同时，有证据表明西方与波希米亚和波兰之间的贸易肯定有某种限制。编年史家盖鲁斯·阿农尼毛斯（Gallus Anonymous）在 1116 年写道：

"regio Polonorum ab itineribus peregrinorum est remota, et nisi tran seuntibus in Russian pro mercimonio paucis nota"。这种过境贸易也对波兰和它的权贵们特别有利，他们利用奢侈品的流入为自己服务，这部编年史以及奥波莱、格涅兹诺和克拉科的考古发掘都证实了这一点，在那里还发现了丝绸、象牙制品、漆器、白银、货币和无花果籽。恢复这种贸易路线是在 12 世纪中期，与大规模的经济侵略和德意志对易北河东部地区的殖民有关。俄罗斯的航运【501】线仍在继续使用，就如我们从希伯来文学中所能推论出的那样。它也证明了这条交通道路的存在。从科隆和美因茨经雷根斯堡和布拉格到克拉科和基辅，再往前到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甚至远到巴格达，这条路线上有着小规模的殖民活动，有时甚至还有犹太人区，就如 12 世纪基辅的情形一样。雷根斯堡作为 10～12 世纪一个特别的东方贸易中心的重要性也为德意志史料所证实。它的商人经常旅行到基辅，并在那里住一些时候，与其母国从事金钱交易，就像哈特维格（Hartwig）在 1178～1180 年与他的债务人圣爱默拉姆修道院所做的一样。可能是以犹太人的信息为基础，阿·伊德里斯，一个西西里岛的地图学家，知道几个在国际贸易中很重要的波兰城镇的名字其中有什切青、桑托克、弗罗茨瓦夫、克拉科、谢拉兹、格涅兹诺、桑多梅日。

除了传统的森林资源出口外，俄罗斯手艺人还生产一些产品，像用沃尔西尼亚板岩制作的便宜纺锤或用青铜制作的 encolpion，最初可能是匈牙利生产的。基辅贸易的匈牙利分支集中在爱斯泰尔戈姆（Esztergom）和其他城镇，它们在 12 世纪因为金矿和铜矿开采而繁荣起来，并在经巴尔干到达拜占庭、经克罗地亚到达威尼斯、沿多瑙河到德意志城镇的道路上占有重要地位。基辅罗斯的出口品和再出口品，特别是来自哈里奇公国的那部分，经水路沿布格河、纳维河和维斯图拉河贯穿过波兰；布格河上的城堡城市多洛希齐恩，人们发现有大约 3 000 个罗斯王公的铅印——这就证明此处曾有一个海关，商品由此从俄罗斯卸运到波兰船只上。在 12 世纪，波兰的尼乔沃海关账单上列有运载盐、牛、布和奴隶的船只和马车。12 世纪的哈里奇公国利用德涅斯特河和普鲁特河继续向南进行食盐贸易，而从匈牙利进口马和铜。

7.3 10～12 世纪中欧和东欧地方市场和手工业生产

最迟到 10 世纪后半期，两个有鲜明特征的经济系统并存于易北河流域【502】的斯拉夫国家，它们就是波兰和波希米亚。其中之一是地方集市系统，在

10 世纪末应农民的需要而产生，到 11 世纪得到加固，只是因时间变化而有所调整。当然，另一个系统就是远程贸易，它为一小部分统治阶级供应他们所需的奢侈品。我们已经知道当伊斯兰的白银供应萎缩后，这种以金属为基础的贸易是怎么垮掉的，我们也知道 11 世纪的新形势——萨克森白银的出现和消失——怎样改变了这种运动。

有两个原因导致我们难以描述这两个相互交叉的系统的改变。第一是钱币学解释的问题，虽然它是我们知识的主要来源。第二是我们的经济术语问题，这些术语来自对在性质上迥异于中世纪的后期现象的考察，它们很不贴切，不充分，不准确：它们是否能被合理地应用到这个时代是一个一再出现的难题。但假如历史学家继续用现代经济史的术语，这仅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有必要继续对他的资料提出新的问题的缘故，但很不幸，他们并不总是能满意地回答这些问题。

7.3.1 10～12 世纪的货币流通

让我们首先讨论 10、11、12 世纪斯拉夫国家金属货币流通的具体特征。最明显的现象是储藏财富的数量，在波兰至今发现的大约 465 个窖藏地中，共发现有 220 000 件银器。就时间上来分析，俄罗斯和波兰一样可以把大部分窖藏归结为 10 世纪和 11 世纪的特征。波兰、捷克和俄罗斯的钱币学家对其含量进行分析，得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结论。

必须把这些窖藏与个别发现的铸币来作比较，这些孤立的货币或者被它们的主人丢失，或者埋在坟墓里，或者发现于其他部落的遗址中。可能的情况是这些储藏和孤立的铸币来源于不同的经济活动范围，尽管这些经济活动之间是互相关联的。

让我们记住储藏银器的两个经济方面。从动的角度上来说，他们的功能是交换媒介；从静的角度上说，它们的功能是作为一种财富的储藏手段。这些东西，主要由大量的阿拉伯德赫姆和西欧铸币组成；也有各种银饰，后来还有银条、银棒和银戒指。所有这些东西——银币、银饰和银条——经常都 [503] 被敲破，银币被敲成半个，1/4 个甚至更小。11 世纪，银饰和银条开始消失，窖藏逐渐变成了对银币的储藏，主要是西欧或本地发行的银币，保存的是整个银币而不再是修剪过的银币。10 世纪银饰的货币功能是毋庸置疑的；银饰物上切下的小块证明了人们多么地不顾这些银饰的艺术价值而乐于将其化作形状不一的银块以便重新用做支付单位。很显然，在奢侈品

的商品交易中，重量是决定白银流通的最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铸币没有在城堡和郊区内的遗址中出现，却集中在附近的秘密窖藏中。而住在这些地方的工匠和佣人并不使用这些铸币：只有贵族和商人兼战士才用。

但是，正是财富被储藏的事实，表明了这些窖藏物品的静态意义。毕竟窖藏的基本功能是它能跨越时空对这种储藏的价值进行转换。作为主人手中白银的一种窖藏形式，一个窖藏处的总量与白银在既定时间内的流通条件有关，其目的主要与将其重新投入使用的前景有关。我们不可能接受这一理论，即窖藏不是出于经济原因——比如，因为宗教信仰要求人们为自己来生而节省或出于心理安慰的需要。窖藏的目的肯定能在投资并掩饰财富的个人的经济或政治生活方面找到。

我们可以试着分辨出波罗的海斯拉夫人窖藏形成的三个阶段：第一是直到10世纪中期；第二是从10世纪中期到11世纪晚期；第三是从11世纪晚期一直到它们消失。10世纪中期以前的窖藏看起来不过是野蛮的远程贸易的副产品。它的产生主要受到相对数量较少的商品并主要是奢侈品的刺激，以及不规范且不断改变的交易价值的推动。交易集中于一小部分人——地方酋长和战士兼商人手中，窖藏的最终目的是利用流通着的穆斯林白银，一当机会到来就以这种可兑换的储藏去购买昂贵且供应不规则的奢侈品。因为它[504]们并不总是随要随有的，这些储藏的白银通常躺在地下没被动过或被变成佩带的首饰。从9世纪末开始，经10世纪到11世纪，波罗的海金匠都在忙着把进口的白银打制成物品，而它们正是贵族社会地位的象征。

从10世纪中期开始，储藏内容出现了有意思的改变，这正如波美拉尼亚的情形一样。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饰物被打碎成越来越小的重量单位以用于小规模的交易，这种交易规模虽小，但又大到要使用白银支付。普通德赫姆的重量从2.7~3.55里尔白银不等，9世纪和10世纪早期时不需要再小了。到10世纪后半期，铸币却是太重太贵，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它被打碎成那样的小块。另一方面，这种萨克森铸币厂生产的欧洲便士是一种作用更大的支付单元，假如完全敲碎的话，它可以被分成1/2或1/4。储藏的主人似乎考虑到他的财产的流动性，它们的用途也通过对外贸易而增加了。

但是有迹象表明，这种发展不仅得到了远程贸易而且也得到了地方集市的刺激。后者供应的商品不仅量大而且种类丰富，并且随着交易数量的增长而具有了永久性特征。孤立的西方铸币在11世纪中期之前开始出现在城堡的集市上（在波兰占发现的10%），在该世纪中期的坟墓里也有发

现。这可以视为铸币在内贸流通中更加广泛的迹象。最后，我们可以认为，对这种交易的参与范围更广泛了。这时它也包括了一些农产品和手工产品。但是，波兰和俄罗斯的大贵族仍然主导着这种贸易，继续消耗着从西方流入的白银。

最后是白银窖藏历史的第三个阶段：它在11世纪末明显衰落了。在这里我们不能同意一些钱币学家的判断，即窖藏的数量多意味着那时物资丰富而较小的窖藏意味着那时的物资稀缺。似乎假设众多的窖藏与货币的有限流通有关，更合理一些，因而窖藏减少现在是国内流通更广泛的结果。众所周知，地方集市的扩展对金属货币和其他形式货币的需求是巨大的，我们将再回到这个问题。白银的有效流通要求增加铸币的数量——西斯拉夫人是通过他们自己发行的货币解决这个问题的。大约在10世纪中期，波希米亚组织【505】了铸币工厂。100年后，布热季斯（Bretislav）拉夫一世进行了货币改革，改革的基础是周期性地发行新货币，这给他带来正常的利润。波兰的第一套铸币上面有梅什科的名字（梅什科一世，992年去世），但极有可能直到勇敢者波列斯拉夫统治时，这种铸币的规模都很小。易北河斯拉夫人的第一套铸币是由亨利·布里比斯拉夫（1127～1150年）铸造的，他是斯托多兰人的王公。这些白银部分来自波希米亚的矿藏和西里西亚和克拉科之间的边区；部分也来自进口，虽然11世纪末在穆斯林资源耗绝和德意志铸币厂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出口能力削弱后，进口非常困难；最后还来源于窖藏白银的出土。满足贸易需求的钱币供应增加了，流通速度也提高了。所有这些趋势削弱了人们对财富储藏的积极性，即使贵族也开始把窖藏白银拿出来使用而不再作为珠宝窖藏了。11世纪末和12世纪的新窖藏一般由很快就从流通退出的铸币组成。在俄罗斯情况显然不同，因为它没有自己的铸币厂，尽管甚至在这里，储藏贵重金属——实际上也就是储藏货币——的目的是进行以白银为基础的大宗交易。

地方市场的货币化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上面所谈到的时间顺序适用于金属（也就是白银）货币。但是，城市中心的发展是在金属货币普遍地用作市场交换的媒介之前，在斯拉夫国家，这种金属货币不是惟一的货币，虽然它的地位肯定是最重要的。

965年易卜拉欣·伊本·亚奎布（Ibrahim-ibn-Yaqub）注意到在布拉格人们用一种网状细布作为支付手段。他也谈到了某些食物的价格。10只小鸡能卖一个银第纳尔（1.2～1.5里尔银），而一条亚麻布只能买到一只小鸡。我们如何解释这种流通中介？显然，这是一种货币的替代物。在讨论它的经

济意义时，必须指出，即使在中世纪末期，布的价格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贵的：在克拉科集市，4 只鸡的等价物可能是一腕尺布。这很接近伊布拉欣的布价，即一只鸡的价格相当于一块手绢大小的布的价格，也就是大约相当于 1/4 腕尺布。但重要的是伊布拉欣使得我们有些人忽视了这一事实，即那时织的布是网状细布，由此可以推断出普通的布在早些时候就已当成一种价值标准，语言学家认为斯拉夫动词“支付”来源于 *platit*，而 *placic* 等同于 *plat*，意思是一小片布。这些布片因此可能是一种贬值的布的利用形式，当以“布标准”为基础的交易足够大时，这种形式就产生了。但是，这离符号形式的货币——准确地说，是一种纯粹的脱离于它的真实价值的名义上的价值——还有一些距离。这种观点得到捷克钱币学家结论的支持，他们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 10 世纪和 11 世纪的布拉格商业活动和同期的钱币发现很少、很不成比例这一事实。金属货币的价格过高可能解释这一事实。只有富有的外国商人在交换贵重商品时才有可能使用它作为媒介进行交易。在郊区集市，情形又是另一回事，交换或是完全自然状态的（物物交换），或是通过这种布片的中介（商品对货币商品）进行。那样的交易包括小规模日常买卖。

这种非银的商品货币的使用似乎在 100 年前的摩拉维亚和波兰的南部也很流行。考古发现了 500 件形状像斧头样的铁器，但它并没有加工好，而且用的是一种低质且不适合于做工具的铁。把它作为货币的替代物同样是一种可能的假设。它的价值在于它所来自的那个时期——9 世纪——当时城市生活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因为摩拉维亚贵族斯塔雷·梅斯托和米库尔塞西壮观的城堡几乎还称不上发达的城镇。假如布和铁作为货币商品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价值标准和流通媒介这一假设被接受的话，它将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把有组织的地区贸易的开端提前到白银作为货币普遍使用的时期以前；在这一个时期斯拉夫农业部落和他们的领主在把白银作为奢侈品交易物的同时，还有另一种形式的交换，即价值较小的本地贸易。这种思路将对现在关于自然经济的观点进行修改，并把对今日不发达国家农民经济的研究成果更广泛地运用到中世纪早期。

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俄罗斯、首先是诺夫哥罗德，呈现给我们的是另一种非金属货币：这就是有着充分的内在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毛皮。最近我们看到了 12 世纪旅行家阿布·哈米德·加纳提（Abū Hāmid al Gharnāti）（死于 1169 年或 1170 年）的记载。其中他描述了俄罗斯用剪切的毛皮做支付手段的习惯，“这些毛皮对任何人都没有用”，但却被 18 件一捆地捆着，上面盖

[506] [507]

有王公的标签。这种强制货币的意义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使用具有完全内在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毛皮作为商品流通媒介引发了很多疑问。人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是相互矛盾的。虽然相对说来有许多外国货币的俄罗斯，出于威望的考虑，它也发行自己的铸币，但这仅仅是在维拉蒂默大帝（金左罗特尼克，重约4里尔）和智者亚罗斯拉夫（金银币，重3里尔）统治时期是如此，在这之后，除了特木塔拉汗的公爵奥勒格·马歇尔在11世纪末偶有发行外，几个世纪都没有再发行铸币。我们怎么来弥合俄罗斯在11世纪和14世纪之间有着众所周知的内外贸易而没有自己的货币的缺口？我们又怎么解释有白银从汉萨同盟流入诺夫哥罗德的记载而在这个城市的考古发现中铸币却相对缺乏的矛盾？最后，我们又如何来解释俄罗斯有着发达的货币单位系统但却没有自己的货币这个矛盾呢？

似乎首先必须把这个时期延伸到11世纪末，因为外国白银在俄罗斯市场上的充足供应给了它作为价值标准、流通媒介和价值储藏的真实功能。可以肯定的是，毛皮在白银之前出现，后来又两者共存，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它主要是作为一种日常用品和日常用品—货币进行交换的价值标准。根据来自俄罗斯的有关金钱的单词：除了普通的斯拉夫词语支付外——就我们所知，这个词来源于 *plat*（1块布）——还有另外的价值标准像库纳（1件貂皮），还有维维里查或维克沙（1件松鼠皮），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动物毛皮作为货币商品的流通状况。

但是，从12世纪开始的第二个阶段，似乎导致了白银流通领域的分裂。如同在诺夫哥罗德一样，从外部进来的白银或者在僧俗的宝藏中被冻结，或被这个城市国家的贵族在私人支付时使用。两种金属，特别是更普遍流通的白银，都被用作记账和重量单位。在12世纪，这个系统的安排如下：最大的单位格里弗纳（马卡）在俄罗斯南部重68里尔，而在北部重约51里尔，它又被分成20诺加塔、25库纳、50雷扎纳和100维克沙。第二大单位是诺加塔，相当于2.46克白银，也就是1.25库纳、2.5雷扎纳和5维克沙。第三大单位是库纳，重1.97克，它值2雷扎纳、4维克沙，最小的单位是维克沙，含0.49克白银。白银的重量近似于相应铸币的重量。 [508]

12世纪，在流通中出现了圆形的银币、六角形的金块和其他有固定重量的金属币，通常相当于1个科隆马克（154克），这表明他们被用作对西方商人的支付手段，或更可能是来自西方商人。它也可能在俄罗斯内部比较大的交易中流通使用。但是仍有许多的疑团未解。比如说，我们还根本不能肯定：即这个货币系统单位在什么程度上仅白银的重量系统，它在什么程度

上能被用来决定商品而不是银的价值。

这一点至关重要。12 世纪和 13 世纪的俄罗斯国内市场上，各种形式的象征性货币都在流通。最具特色的是我们已谈到的留有王公官员印记的一捆捆松鼠皮，虽然在诺夫哥罗德这点得不到证明，而仅为南部和东部的俄罗斯所证实。但是流通的需要刺激了其他形式的代用货币，比如以捆计算的有完全价值的毛皮（例如 40 件毛皮相当于 1 索罗契卡）或单件毛皮。我们还可以假设某些本身贵重但已完全或部分地没有实用价值的产品可能也承担了地方货币的角色（如以 *puzy* 为单位计算的一定量的海盐、希腊坚果、琥珀或货贝等）。学者们现在正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考古发掘的证据。

即使在一直有自己的铸币厂或有外币供应的西斯拉夫人中，12 世纪和 13 世纪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在这儿，当市场变得日益繁荣时，抵消白银同期性短缺的需要导致了代用货币的复活或出现。海尔蒙德（Helmold）在描述 12 世纪的吕根岛时说："Porro apud Ranos non habetur moneta, nec in comparandis rebus nummorum Consuetudo, sed quicquid in foro mercari volueris, panno lineo comparabis"。在中世纪的波兰，王公的官员征收的罚金用毛皮依以下价值顺序缴纳：白貂皮、松鼠皮、黄鼠狼皮、貂鼠和狐狸皮。13 世纪，农村人用松鼠皮支付什一税，而松鼠皮在波兰大约也相当于一种货币商品，当时还存在一个叫马卡库纳鲁姆的货币单位，4 个这个单位的货币等于 1 个马卡阿根蒂，与在俄罗斯一样；但同期库纳（波兰库纳）可能不仅意味着貂鼠（Mustela Martes Lin），而且就像拉丁语中它的同义语 asperiolus 一样，它还指小的野兽，包括松鼠皮和松鼠。我们知道在俄罗斯 1 个格里弗纳等于 25 个库纳，后来又等于 50 个库纳；1 个波兰马卡库纳鲁姆可能也是这样。[509] 每 1 个库纳可能值大约 2 克白银。而且，在克拉科，在整个 13 世纪，"cum nigro arento et pelliculis de capitibus asperiolinis communiter forisabantur"（*annales Cuiaviae*，约 1305 年）指的是非金属货币的一种特殊流通形式，与在俄罗斯一样。

这似乎证明波兰也像俄罗斯一样，除了用作制衣的毛皮——这种毛皮具备的是作为实用商品的性质——之外，另外仍有流通毛皮，它仍保有它固有的价值但不是作为商品使用，这就使得它在市场上的供应不是无限的。与通常关于这种货币的原始特性的观点相反，它可能只能在大城镇中产生和流通，因为在那里较容易维持一个需要政府干预和某种程度的社会性支持的制度。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非金属货币仍在流通，代用货币不得不具有商品的所有特征。

在 12 世纪的俄罗斯，一条面包能用最小的货币单位维克沙买到（大约重 0.49 克白银），这就足够提供一个人一天的饮食所需。因此，它似乎与最低级的市场交换相一致。它的度量标准也表明了它的流通范围：地方市场和它的农村和手工业者基地。在同一个流通区域内中世纪波兰的另外一种货币也被用来作为货币单位：这就是库扎，它的意思是一块盐，它是一个真正很小的单位，因为它被用作支付 300 粒盐的罚款，这也是对违反波兰旧法的最轻最低的惩罚。

对各种代用货币的研究某种程度上使我们了解到关于货币在地方市场流通中的一些知识。就我们所知，这种货币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并且扩散到了小贩和市场商品的生产者手中。

7.3.2　西斯拉夫国家的手工业、城镇和集市

能给地方集市发展速度加快的这一时期一个较准确的日期吗？对此我们必须针对各个斯拉夫国家分别做出回答，而对一些国家而言，目前的研究成果无法做出任何成熟的回答。

让我们把这一突飞猛进的时期在摩拉维亚、捷克和波兰领土上的表现做一番描述，并把它与作为地方和远程贸易中心的城镇的出现联系起来。近年来，有关城镇起源的文字资料因为考古发掘的材料而得到补充，考古发掘表明早在 9 世纪基本的城市生活就已存在。此前已有一个甚至多个酋长居住其中的，有一系列城堡存在。在摩拉维亚，大的城堡—城镇在 9 世纪就已建 [510] 立，遗址发掘中发现了一组组的贵族住宅，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小礼拜堂（其中 Mikulčice 有 12 个）和墓地。这些墓地根据它所埋藏的物品可以进行归类：在斯塔雷·梅斯托，大约 1.6% 的墓地中有大量的黄金；大约 29% 就要少得多；另有 10% 仅有小刀，剩下的（约占整体的 53%）则根本没有任何陪葬品。这种比例基本上符合这个城镇居民的社会和文化分层：贵族周围是战士和仆人，也有工匠和享有各种自由程度的农民，包括奴隶。这种城镇或城堡的经济结构建立在一个地方商品消费的基础上，同时还有用超经济手段和奢侈品贸易带来的外国商品。9、10 世纪，上面提及的波罗的海港口与它们的居民，似乎都是依靠这种外贸生活。有些本地贸易——不论是否强制性的——必定曾经存在，但它的两个部分即远程贸易和地方贸易却截然不同且仅有松散的联系。对集市的真正需求来源于与外族人进行对外的、奢侈性或补充性商品进行交换的需要。

但是，直到当手艺人和商人在城堡周围建立起定居点或“郊区”时，我们才可以谈到所谓的中世纪城镇雏形。波希米亚和波兰变成了国家并且分别被波列斯拉夫一世（929～972年）和梅什科（960～992年）与波兰的勇敢者波列斯拉夫（992～1025年）在其当政时期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集权化，旧的地区城堡的形式被发展成一种新的形式。匈牙利的组织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类似。城堡由贵族和将士占领，他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必须通过大量的商品交易才能满足．这样他们的生活就与当地的市场息息相关。非常有趣的是，对周围农村的生产和服务潜力的开发导致了一个以王公城堡为中心的服务系统的建立。这是10世纪中期和12世纪晚期之间执政的君主酝酿的一个计划。手艺人和依附者之间可以分成40种不同职业，其中包括皮匠、厨师、采蜜人和海狸捕猎者，尽管他们往往还保留农民身份。次要职业中的劳动分工是由国家强加的，正是通过实施这种职业分工，契约服务才能完成，赋税[511]才能支付。

但是，这种分工仅利用了一部分可利用的生产能力和技能，并只把它们导入对国家机构最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它的低效不久就变得十分明显。尽管这种组织的痕迹在标志各种行业的地名中被保留下来，但是到12世纪中期它已十分衰微了。手工业部门最先消失，很久以后才是畜牧业和狩猎业。在11世纪，农民土地上的作物和牲畜剩余增加了，手工作坊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农民和工匠逐渐地加入了地方贸易的行列。

经济扩张的舞台最初在城堡和城郊，在波希米亚、波兰和附近国家后者与城堡一起可被视作城市生活的最初形态。国家为这些城堡提供更强大的防御工事、教堂和小礼拜堂、郊区和集市。在城堡主体的脚下（在当时的拉丁语中称城堡为 *castrum* 或 *castellum*）是郊区，它与城堡的分界线通常接近城墙。10、11世纪，城堡和郊区继续吸引农村工匠，这有助于使手工业变成永久性和技术性行业，从而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在保证充足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通过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把他们的产品销售出去。遗址考古证明到10世纪中期，制陶、制鞋、制革、骨器加工、黄金加工和生铁加工领域的职业和随之而产生的工匠地位改善是非常明显的。工匠居住和工作的环境仍然有些不太清楚，但后者的情形也许要依王公而定。实物税必须以手工业产品或服务来支付，而渔夫和农民则被迫以他们所生产的部分产品来供应城堡，即使城市居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农民。

由于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城堡和郊区的发展刺激了手工业的扩大和分工，尽管仍处于对国家依附的地位，手工业者仍然能够扩大他们所得到的经

济自由空间，这样就可从事物物交换来换取食物和其他的必需品。我们也已提到波希米亚和波兰的遗址，整个大陆的奢侈品转运和贸易都在那里进行。根据文字资料，集市及其设施首先出现在勇敢者波列斯拉夫统治时期，当时在波兰出现了公共交易场所，并受公爵领地法律的保护。

从什么时候起地方对食物交换和手工产品的需要使这样的集市活动比贵族的对外贸易和奢侈品贸易更重要呢？我们有两种手段来辨别早期波希米亚和波兰城镇生活的分水岭。第一条证据，前面已经指出，钱币学家的研究表明，在波希米亚布热季斯拉夫一世（约 1050 年）统治时期的改革包括铸造更小的第纳尔和积极的财政措施。在波兰，经济活动可以追溯到勇敢者波列斯拉夫（Boleslav the Bold）统治时期（约 1070 年），他第一次大规模发行金属货币。滞留在国内的货币开始投入了流通，这些货币盖有王公的印章，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交换媒介和价值标准。金属货币是商品交换市场所需要的，特别在地方市场，以一种名义价值的铸币形式出现。货币的流通加快了，铸币变得太贵重、太有用而不再被人们储藏，货币短缺导致了已描述过的那些货币代用品的出现。金属货币是万能的，但就 12 世纪的波兰而言，它的过境税和各种赋税，部分或完全是以铸币的形式支付的。另外一个标志是，1138～1146 年的波兰引入了一套经常强制更新铸币的制度，包括在王室铸币厂的监督下，旧的货币的撤出和新货币的发行使用。这种图利行为仅当铸币厂的铸币量足够大时才可行，而且也只有当金属货币在普遍而快速地流通时统治者才能获利。【512】

我们的第二个证据是特许状。有关市场（古罗马城镇的广场）的记载在 11 世纪后半期到 12 世纪变得更充分并不是一个偶然。这些市场在城堡和郊区或其他地方发展起来。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城堡都有一个市场：我们也知道许多王室的城堡从来就没有变成城镇中心。市场在满足农业腹地需求的地方产生并繁衍。12 世纪，仅在波兰就达到 250 个，包括当时与波兰相连的西波美拉尼亚。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市场的数目可能是波兰的一半。假如我们把那时手工业品和服务的进行交换地点与 10 世纪末的数目做一比较的话，那么这种增长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口的增长。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改变对市场中心发展的影响要比人口和城市发展对它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市场发展的动力不仅来自手工业的扩展，而且来自农业更高的生产率，这主要是耕作面积扩大和牲畜数量增加所导致。考古发掘证明，城市手工业的种类在 11 世纪后半期和整个 12 世纪明显增加。我们从波兰城镇的木结构【513】

中发现的许多特征表明，在 11 世纪末这种发展明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对格但斯克的考古分层中，地层中最晚的一个灌木棚屋估计在1090～1115年。从此之后，我们就仅发现房屋。归根结底，12 世纪及其后来的城市建筑在特征上更具里程碑的性质。

有一些行业——包括冶金和开矿——在农村仍被作为辅助性行业，但在城镇，考古学家能算出二十几种行业可称为职业性工作。对铁和有色金属的加工、制陶、制革、制鞋、骨或兽角的雕刻、造车、造船、造玻璃、采石和石刻等可以从在格涅兹诺、格但斯克、奥波莱和别处发现的作坊、工具和生产废料的残存中得到体现，加工使用的方法各种各样，而且对生产技能的要求很高。其中一些行业和其他行业合并在一起，并没有严格分开。

职业也导致了一种纵向的组织形式，这就是在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生产的各阶段中，他们只从事其中的某个阶段的生产。比如，在制衣和木车削或制桶业中就是这样。同时，水平分工制度的雏形也存在，比如，制革工人向制鞋工人以供应皮革。我们也能看到地域分工的最初级形式：城镇中金属贸易所用的铁和非铁金属是由农场从事辅助工作的农民开采和熔炼而成的(1136 年波兰提到过农村开掘出的银)。

我们对手工业者的社会状况有了更多的了解，虽然在许多观点上还有争议：特别是对 12、13 世纪的市场组织中庄园手工业生产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尤其如此。可能有一些手工业品是根据命令而生产的，也有证据表明领主在市场上出售征收的捐税以换取现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手工业者也在市场上直接出售自己生产的商品。令人信服的资料是考古学家发现了为大规模生产金属物品所使用的模具以及在我们所谈到的“市场上”所发现的大量半成

[514] 品、废料和原材料 (1177 年)。但很少有说明这些东西卖到了何处的信息：也许销售的程度依商品的种类和因社会不同而异的地方市场的需求而定。在这一点上，斯拉夫的中世纪历史学家能从研究非洲国家的人类学家那里学到许多。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能与商品和货币经济共存并相互影响很久；农村人口中的一些成员，主要是领主和骑士，可能经常广泛地利用市场；其他的人，也就是农民，只有在买刀或盐时才偶尔有限地进入市场。从 11 世纪后半期开始，领主积极着手扩大他们的地产，在王公城堡之外建立自己的庄园。

当商业的需求扩展时，原存在于郊区的市场的数量就显得不够了，从 11 世纪之交开始，对市场的需求更多了。除了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外（在

克拉科，12世纪似乎有好几个市场），开市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在什切青，12世纪初每周开市两次。12世纪形成了许多小的贸易中心，有些市场是由公爵热心主动建立起来的，其他一些则是由大封建领主建立的。但是，总体来说，国家的垄断仍然没改变。任何变化，比如把市场迁移到别处，都要征得君主的同意。统治者也保留了许多财政和司法上的权力，虽然这些权力逐渐地被各种豁免权，主要是教堂的豁免权所侵蚀。大城镇之间最初或作为王公要塞或作为郊区，其距离在人口稀疏的地方从50～60公里不等；但是新的中等或小规模中心把这种间隔距离缩短到一半或1/4，一些城市中心甚至出现在定居点的边沿上。它们经常位于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中间，提供——除了贸易外——少量非农业商品和服务。在接下来的时期里，他们之间的竞争导致了各种典型的中欧城镇类型的产生，从最小的市镇到都会城市。

一些新市场的名字来源于它开市的那天是星期几，例如托雷克（星期二）、斯罗达或斯罗达卡（星期三）、齐瓦特克（星期四）、派特克（星期五）、苏波塔或苏波特卡（星期六）。其他的名字像塔切克、塔戈维斯科、塔戈瓦戈拉（市场山）等都来源于 *targ* 这个词，它的意思是市场。其他地方为了表明它们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等级与旧式定居点不同，取了诸如Miejsce或Meszcze（来源于拉丁语的 *locus* 一词）之类的名字，在古波兰语中的意思是“城镇”（在现代波兰语中是 *miasto*）。这些名字也被用于一些 [515] 邻近城堡（波兹南的圣哥萨蒂市场）的定居点，而且在波兰也很流行（这如在波希米亚一样）；后来它代替了或者说是限制了单词 *grod*（城堡）的使用，直到被普遍接受用来表示一个城镇。

地方市场交换的各种商品主要是由更大的——当然有时候也由小得多的——社区所生产的。虽然直到13世纪初才听说“教堂前面的广场常年有市场”，我们可以假设在12世纪就已存在市场，它们服务于远程贸易。大众消费商品的进口意义可能更大，像从西欧进口的布——根据格但斯克的考古发掘——11世纪晚期就出现了；其他的产品还有波罗的海的鲱鱼——主要是盐腌的，至少在科沃布热格是如此——产于波美拉尼亚、库贾夫、鲁塞尼亚和克拉科的盐、条形铁和成品铁，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陶器、玻璃和黄金饰物等。城镇和市场用它们生产的器皿换得一些奢侈品，但所得到的主要是农产品（谷物、牛、猪）和森林产品，蜂蜜、蜂蜡和毛皮。曾有人尝试估算12世纪末西里西亚所需的食物量：显然，为了养活自己，这个城镇需要60个村庄，每个村庄有10个农场生产燕麦，并把其中的10%投入市场。

在这里还要补充的是，当时，即使更大城镇的居民也从事农业、牲畜饲养和捕鱼业。

仅仅拥有基础性手工业的市场和小镇的作用主要是作为客户和更大手工业生产中心的媒介。但是它们不仅仅依靠贸易而产生和存活，而且也发展了另一种重要的市场功能，即提供服务的功能。主要的服务机构之一是客栈业。客栈在11世纪初开始出现，之后在大城镇和小定居点上很快地发展起来。每个市场都有客栈（市场附带临时的帐篷）——一个供应啤酒、娱乐和住宿的地方，即使不开市时它也开放。它也被用来作收取赋税和过境费、铸币、出售盐和手工艺品的场所。有趣的是，据估算，11世纪初普沃茨克的20个客栈一周的经营总额是30银马卡（大约是7 200第纳尔），这可能代表了早期波兰城镇普遍的营业额和交易量。甚至小规模市场上的客栈，也用货币形式记录其收入，尽管当时有一些买卖肯定是以[516]食物的形式支付的，正如西波美拉尼亚客栈记录的收入所显示的那样，它们是以蜂蜡、日常农产品和家禽计算的。但是客栈不仅为普通人提供服务；因为它们的部分收入，甚至它们的所有生意可能属于公爵或宗教机构，它们常被用来监督贸易税收，也被作为从农民那里收上来的实物赋税的零售点。

城堡和市场也满足了农村人口的部分文化需要。教区的教堂通常建在市场的旁边，而城市的教堂通常把它们的势力扩展到周围部分农村。最终它也有了行政职权。农民不管获得了多大的自由，也还是生活在公爵通过城堡行使的权力范围下。从勇敢者波列斯拉夫统治时起，市场的开停给他提供了一个显示权威的机会。我们也应提到在这一时期末迅速发展的一些城市设施像屠户和面包师的货摊，它们有助于增加农村的消费。

这些地方的居民在社会和法律地位方面差异肯定很大，特别是在一些大城镇像什切青、弗罗茨瓦夫、格涅兹诺或克拉科，但是就各种人群的数量而言，历史学家并不清楚。这些人群依然极大地依靠公爵权威的代表，不管从社会—政治还是在经济的角度讲都是如此，但是手工业的发展和对地方市场的参与无疑给他们提供了极大的发展机会。

每个人，不问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只要他们是手工业者、商人和顾客，只要他们到市场来购买东西，他们就享有由王公的城堡主和代理人所担保的市场和平（波兰语的村社的和平女神一词，或主权之手 = *reka pańska*）与人身和财产安全。12世纪交易地点有一个单独的市场法官——除了司法外——可能还管理所有的或部分的财政事务，分担参加定期货币兑换的公爵

大臣的费用。

因为文字资料太少，我们不能肯定地说12世纪市场围绕着商人团体而建。这种团体在城市领主的控制下，这个时期的波兰领主通常都是公爵。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在12世纪的后半期甚至早在中期就已来到，从那以后我们对波兰城镇产生的研究就与中欧的大部分研究课题有了共同之处了。

在12世纪之交，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波兰的城镇较小的富裕集团——主要是商人——通过从城市领主也就是公爵或大主教那儿得来的各种特权而获得领导地位。这个小集团有可能从事投资并对城镇的其他居民施加经济影响。在波兰，它由公爵授权的管家或代理人领导，不太受地方财政长官的影响，并可能作为官方官员实施——正如我们在13世纪初所看到的情形那样——市场的司法管理和对不断发展的城市社区的行政管理。但这个社区不包括所有的永久性和暂住居民，仅仅包括市民（mercatores、cives、burgenses）和享受继承权的“客人”。从可以追溯的极少例证中，我们得知后者是本地人，其中一些是骑士的后代。难怪，在那时，正如1237年在普沃茨克所发生的一样，为了给这些客人找到合适的法律特权，他们被授予马佐维亚骑士的称号。然而，甚至在12世纪早期就偶尔可以遇到外国商人，尤其是德意志商人，在13世纪早期更多。这些人加强了那些大城镇居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如克拉科、弗罗茨瓦夫、波兹南或格但斯克，这些地方还获得了对本语言团体的单独豁免权。 [517]

12世纪末，作为对其固定租金的回报，市场和城镇开始拥有自由开市的权利，即所有买卖人不向公爵缴纳赋税就可进入市场，也不受城堡主的司法管辖；他们也免除了实物税和支付给国库和公爵官员的各项杂费。有迹象表明从13世纪的第一个10年开始，镇和乡镇这两个单词就被用来描述市场周围发展的社区。这些社区所享受特权的程度依各个城镇自身特定的角色而定。一些城镇开始慢慢地从市场法律的演变中形成自己的地方城镇法规。一些城镇，特别是小一些的城镇，继续在原来的经济和社会机构下发展，直到14世纪甚至15世纪都没有改变。它们大多在后来放弃了原来的结构而采用另一种类型的法律组织形式，这些法律组织从13世纪第二个10年起在西里西亚的城镇经受了考验并流行起来。这就是日耳曼法（条顿法）。 [518]

7.3.3 俄罗斯的手工业和内部贸易

我们可以从存留下来的少量文字记录中知道 10～13 世纪那些年月里俄罗斯的内贸和商品生产的一些情况；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个国家物质文明的更多信息。但是，对这些材料的解释，就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城市和农村经济的知识而言，仍然难下定论。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关于 13 世纪初城堡城镇（*gorod*，在古俄罗斯语中也叫 *grad*、*grod*）的数量和功能的：它们到底有多少？它们的功能怎样？有一个被引用的数据是高达 271 座，这似乎有些不大可能，因为把它与 16 世纪有关俄罗斯城镇的确凿数据做比较时，我们会发现这时的俄罗斯除西伯利亚外只有 220 座城镇。似乎这 271 个中世纪中心必须包括城堡、防御工事和设防面积不超过 1 公顷的农村定居点。其中只有 100 个可能有一个封闭的或更有可能是开放的郊区（古俄罗斯语 *posad*、*podol*、*predgradiye*），在那里居民集中于一个城堡（古俄罗斯语是 *grad*、*detinets*）之中，郊区的存在是一个城市定居点的必要前提，虽然有关资料与这一结论并不完全吻合，这种城镇的起源不会早于 10 世纪。它们在 8、9 世纪的前身是贵族和王公设防的定居点，那里既是官邸又是政权所在地，在那里收取实物税，10 世纪后工匠开始聚集在这些地方。即使在 11 世纪手工业者在城镇出现以后，农村零散的手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活跃。大约在公元 1000 年，农村定居点的主要特点——不管是被东斯拉夫人占领的土地上还是在这之外——都是地广人稀，人口密度大约为每平方公里 1.6 个人。这种定居点是一种在农村家庭基础上自给自足的经济，在这里面农村手工业发展起来了，商品生产既为满足庄园主的需求，也为满足邻近地区有限范围的需求。

根据我们的考古材料，一个 10～13 世纪农村陶工的产出可能在一个带有公共墓地定居点周围销售；这个陶工可能是一个农夫，只是在农业生产的空闲才做陶工。在俄罗斯——别处也是一样——金属匠的职业是专职的。[519] 他的产品可在一个直径为 5～15 公里的范围内发现，而且他的产品明显是为交换而生产，大多数可能是通过物物交换以换取谷物、肉类和鱼。女性衣服上的铜饰和银饰，是由农村作坊所生产的，这个作坊的顾客是方圆 15 公里内的居民。这个地区比例表明它的中心是一个地方市场，尽管我们没有有关永久性农村市场的信息。在古墓里我们不仅发现了本地产品，也发现了显然是城镇技术生产的装饰品，尽管这种情况在农村墓地里

很少发现。

另一方面，从 11 世纪开始到蒙古入侵，奥弗鲁奇附近沃尔西恩的许多村庄生产的由粉色石板做成的纺锤也广为销售。在 11 世纪的中期，它们广泛地存在于整个斯拉夫俄罗斯，代替了泥做的纺锤；它们也传播到波兰、伏尔加河岸和克里米亚。其他比较时髦的小玩意儿比如珠子、小型上釉的十字架和玻璃手镯也有类似分布；后两项产品似乎由基辅生产。对此所做的解释只能是它们是被小商人贩卖到那里去的，而小行商把这些玩意儿带到了农村；外国制造的商品从来就没在农村发现过。从有关乡村手艺人社会状况的一些信息，我们推断出 11、12 世纪他们主要依靠王公或是权贵拥有的大地产而生存，以自己制造的商品缴纳赋税；至于他们在经济上的积极性有多大我们还不甚清楚。

以上谈到的 100 个城镇分布于大约 55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它们在数量上显然不多，而且分布也不是均衡的。根据我们的材料，有些在 11 世纪已有数量不少的居民；特别是基辅已有几万人；诺夫哥罗德也在 11 世纪初有 10 000 人，到 13 世纪就有了 20 000 人。他们的食物供应是一个时时要考虑的问题。11、12 世纪，诺夫哥罗德的编年史对灾荒和食物昂贵的年代特别敏感。11 世纪，肉、蜂蜜、盐、谷物、蛇麻子、蔬菜、鱼、牛奶、面包、乳酪和黄油都能从基辅的市场上买到。这些商品来自哪里？是城镇附近某地区的农民运到市场上来卖，还是来自王公出售他从地产和采邑上所收的实物地租呢？文字材料表明一个城镇的基本食物供应来源于种地和饲养家畜的农场和居民的菜园，但是资料没告诉我们有关于食品生产的技术。城镇定居点 【520】 的特点是它覆盖面积的巨大，因为它的果园和菜园的面积很大。在诺夫哥罗德发现的写在白桦树皮上的信给我们描述了有关从一个村庄到它的城镇领主的实物供应的详细情况。我们也知道诺夫哥罗德腹地生产的粮食经常不够所需，切断它的食品供应是维拉蒂默、苏兹达尔王公手中操有的强大的政治武器。王公收到的作为贡物的谷物一定要交给发货人送到俄罗斯其他很远的地方甚至是国外。从城镇市场上有可能买到成衣、布匹、鞋子和武器；考古学家已鉴别出 40 多种不同的手工技术，它们加工出的产品有很高的技术水平甚至有统一的规格。

冶金方面的改进可从武器、手工工具和城市生活的日常用品中看出。铜、银和金的造型提供了从铃和大锅炉到珠宝的广泛商品种类，它们按定制要求或一般需求而生产，这由大规模生产的模具和铸件所证实：城市陶器的上釉和造型要比农村发现的丰富一些。木工、车工、木雕和毛皮工艺

显然有城市生产的特点，但纺织显然是一种由农民的小农场和采邑进行的农村手工业。亚麻和布匹被运到城市，在那里它们与为更高阶层消费而进口的商品竞争。玻璃的生产及用骨头、象牙和石头制成的奢侈品的遗迹也有所发现。一些城镇的工匠仍然依靠王公和贵族；他们使用的工具盖着基辅和其他俄罗斯南部城镇的印记就是证明；在王公的官邸人们也发现了手工作坊。

这些庄园的手工业者是否还生产他们的封建义务外的东西，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修道院也是一个庄园工艺的中心，在那里，人们——在像西方的行会一样的规矩管理下——为修道院也为他们自己还为市场进行生产。我们可从 11 世纪的资料中知道这点，从拉维拉·比特切斯卡亚来的僧人带着他们自己生产的商品——袜子和帽子——到基辅市场上换取粮食。在修道院中工作的偶像画家按订单进行生产，他们还请人帮忙。

所有其他的手工业者都要遵从王公的领导，尽管他们可以更自由地决定所生产的东西，他们遭受经济风险的影响也更大；1113 年的基辅和 1209 年的诺夫哥罗德的众多民众起义的原因之一就是拖欠了手工业者的工资，尽管我们对当时的具体环节所知不多。我们的资料表明他们的产品主要是为提供材料的顾客定做的。俄罗斯的工匠是否已达到组织成任何形式的公司的阶段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所知的是不同的工匠在基辅有他们自己的分区（制陶工人、制革工人和金属匠都有），在诺夫哥罗德也一样（制陶工人、制盾工人和一群群的木匠因特殊的工作而组织起来）。

[521]

这些在市场上买卖的商品分销的范围有多大？在这一点上考古学家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在两种物品上找到答案：一种是高档奢侈品，从基辅到俄罗斯各地都能发现；另一种是不很贵重的商品，仅在非常有限的城镇发现。从斯摩棱斯克买到的商品最远只到达半径大约为 200 ~ 250 公里的地区，在基辅公国，发现有两种不同装饰物的地区间的最大距离是 400 公里。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城市手工业行会制造的商品被运到其他的城镇销售，而很少运到周围的村庄。所有手工业者生产的各类产品的顾客都来自一个较高的社会消费者阶层。在这样的环境中，中欧地区市场的观念不适合于俄罗斯。11、12 世纪的俄罗斯城镇市场仍由统治阶级的需求所主导；他们的顾客范围很广但仅来自社会的一个阶层；他们组成的这个网络是纤细的，但有效地联系起彼此相隔很远的地区并把它们整合成一条条的国际贸易线路。城市网络很难联系得更紧密，因为农村人口和定居点的分布如此稀疏；而且，村庄由于庄园系统的运作而被隔绝在商品交换系统之外。

多亏有了编年史，我们可以借此知道商品交换在城市是怎么运作的。在基辅至少有两个那样的市场，一个在郊区的河边；一个在城市的台地上。一些市场每周一次；一些是每天一次。11世纪中期，战士商人（merchant-warrior）的年代结束了；我们知道那时他们的葬品中有特别多的武器，他们需要这些来保护他们的商品，即使是他们成群结伴旅行时也是如此（在这儿我们可以发现单词 tovarishch 的词源）。职业商人开始使用有月息的短期和长期的信贷来运作。罗斯法典（*Russkaya Pravda*）在它11、12世纪的三个版本中都很注意高利贷和贸易信贷问题；其他资料来源的证据表明在基辅1113年起义后利息从50%（这被认为是高利贷）降到20%甚至到6%，这 [522] 是由维拉蒂默·默诺马乔斯在起义后所实行的。当一项债务清算后，被支付的第一个债权人是外国商人，其次是王公，然后“其他的人去把剩下的分完”。也有谈及如何把商品委托给外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较短记录。诺夫哥罗德从12世纪中期起就有了商人行会；其中的一个会设在奥波基的圣约翰浸信会的教堂附近，依照12世纪的一部成文法典进行管理。有了这部法典的保障，他们的自治就得到了保证。它的成员是专门从事蜂蜡贸易的商人，他们垄断了度量衡和关税支付。行会有它自己的教堂和港口；它的当选领导人（*starosty*）在城镇中享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另外一个行会在帕拉塞维教堂（*Pyatnitsa*）附近，它的活动主要与海外贸易相关。

在俄罗斯和西斯拉夫的城镇最初出现时，自给自足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商品的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但俄罗斯完全不同的地理—历史条件意味着那里城市化的进度也不同，直到13世纪这一进程很少完全侵入到乡村生活，虽然它肯定有助于提高贵族操纵外贸的程度。蒙古入侵的灾难终止了城市经济活动向农村渗透的尝试性。即使在仍保持着大城市地位的诺夫哥罗德附近，农村都没有受到诺夫哥罗德及其卫星城镇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的影响，这些卫星城镇是建立在满足城堡统治阶级需要的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7.4 结　　论

对较大经济区形成的分析表明，这一过程是经济功能专门化的结果；或者是职业在空间上和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分野的结果；或者是虽小但有自己可交换剩余品的不同地区整合到一个更大经济区的过程，这一过程被政治

和制度性上层建筑所强化。

中世纪初期，斯拉夫地区很快就被长途奢侈品贸易整合成巨大的经济【523】区，这些经济区就它们本身的特点而言仍是弱小的，但它们有限的商业活动得到了第一个大国的担保。下一个阶段是另一个结构的缓慢而持续地发展。它建立在货币和商品交换经济的基础上，交易的双方，一方是城市的商人和工匠；另一方是农村里的耕夫和家畜饲养人。但它也依靠城镇间的经济联系，特别是当后者发展成城市中心的一个层级结构时尤其如此。因此，不论在本地还是在农村一级，经济区都已是雏形并且获得了划时代的政治上层建【524】筑的特点：显然，这就是封建的公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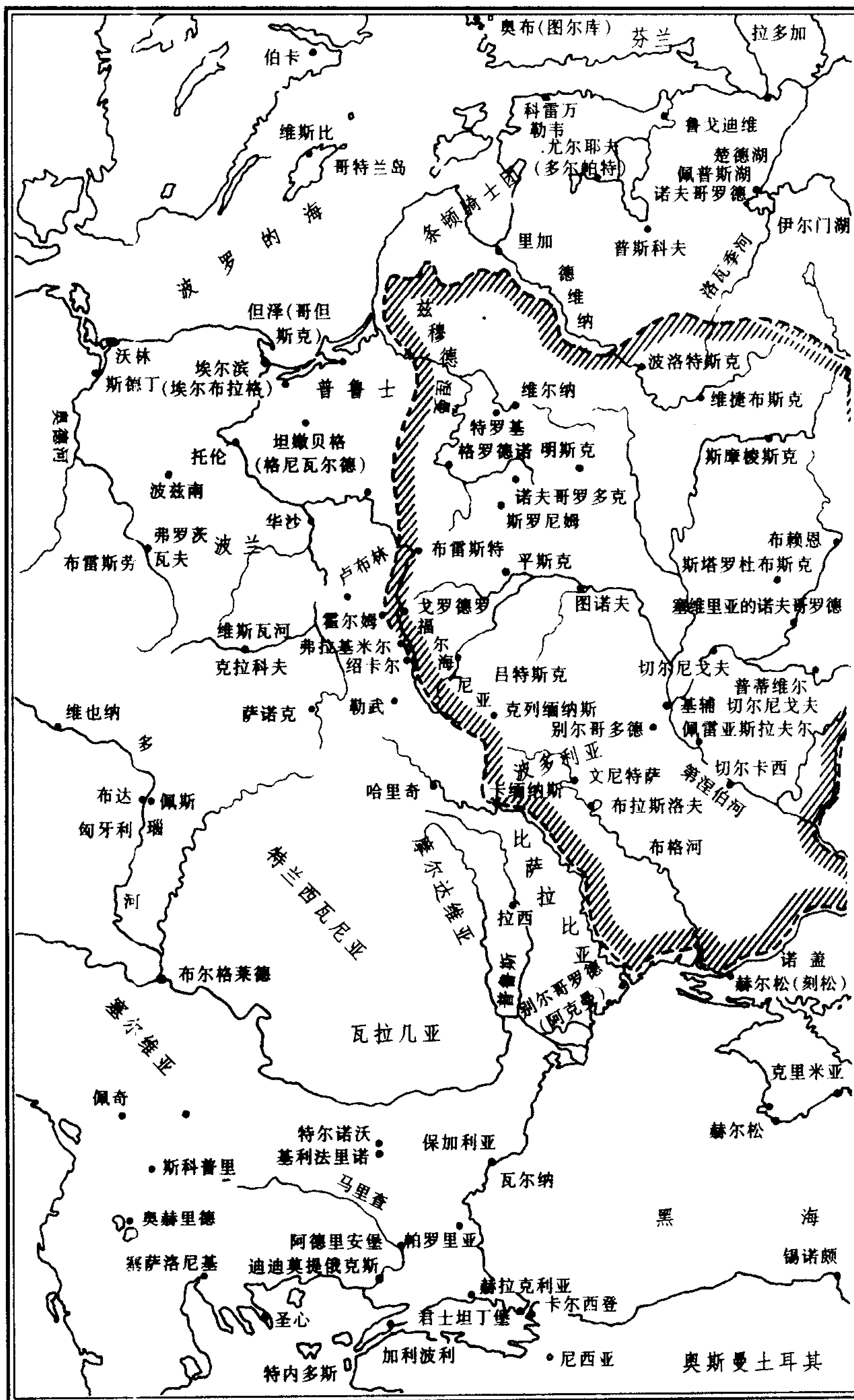
第八章

中世纪晚期东欧的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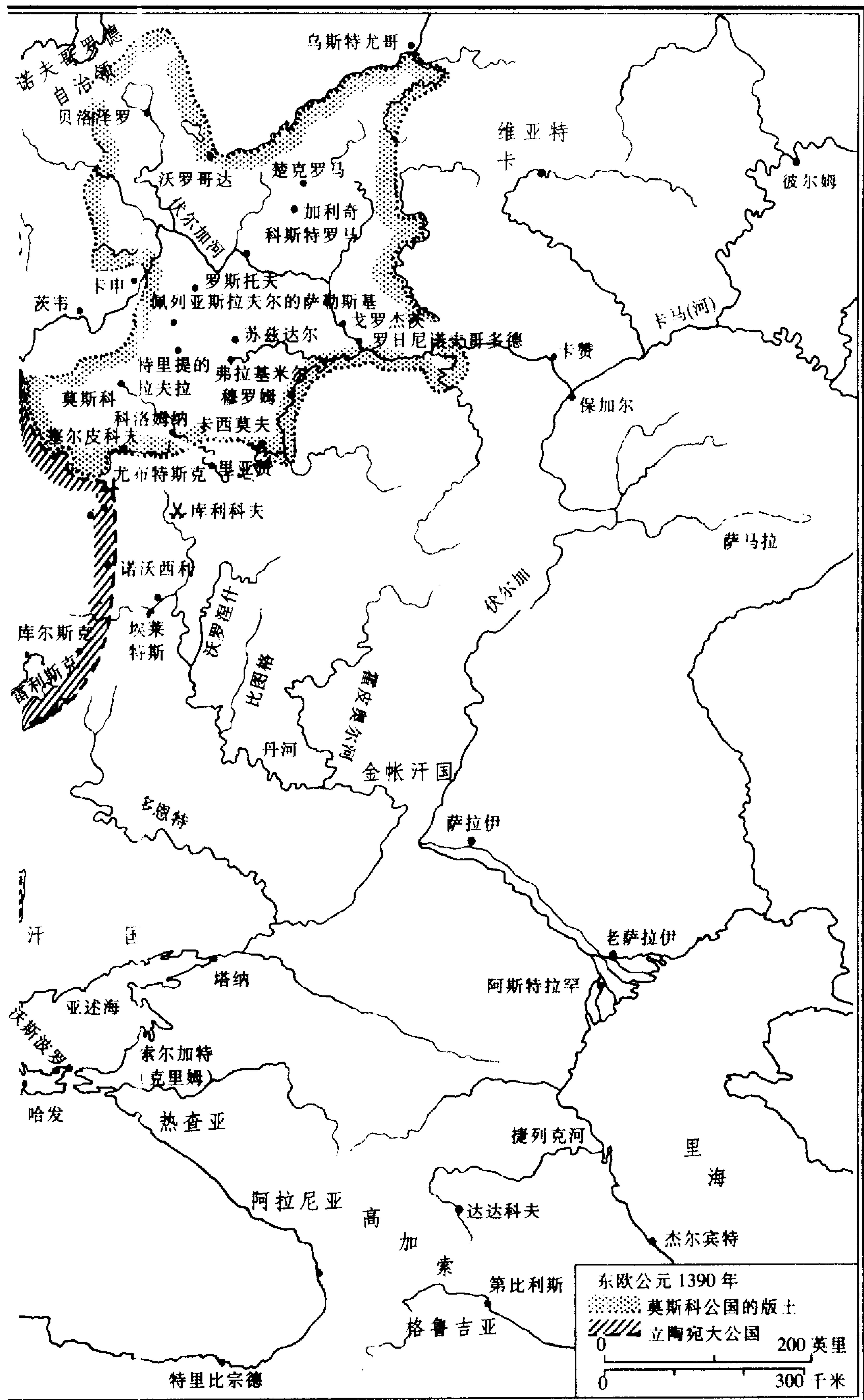
8.1 绪　　论

本章讨论的地区从奥德河、波希米亚森林向东延伸一直到里海；向北到波罗的海；向南沿喀尔巴阡山脉和特兰西瓦尼亚一直延伸到黑海。中世纪后期，这片广大地域各个部分的经济发展阶段并不完全一样，因而在变化的时间和进度上有很大区别。与当时欧洲其他地区一样，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比较大的经济单元。因此，当我们研究这个地区的贸易状况时，我们必须考虑到这各个地区的经济联系是偶然性的，因为东欧还没有任何一个城邦已创造了一个统一的经济组织，虽然那样的一些趋势早已存在，比如在波希米亚和波兰就是这样。

把这个地域分成两个主要的地区是有用的——西部包括波希米亚、波兰和匈牙利的斯洛伐克省；东部由现在的俄罗斯组成。西部地区到13世纪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波希米亚，这种快速发展到14世纪后期可能已经结束了，然而在其他地方仍在继续，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它一直延续到下一个世纪。另一方面，13世纪前半期蒙古人的入侵在东部大部分地区导


奥布(图尔库)
芬兰
拉多加
伯卡
维斯比
哥特兰岛
科雷万
勒韦
尤尔耶夫
(多尔帕特)
鲁戈迪维
楚德湖
佩普斯湖
诺夫哥罗德
伊尔门湖
条顿骑士团
里加
普斯科夫
洛瓦季河
波罗的海
德维纳
兹穆德
但泽(哥但斯克)
沃林
斯德丁
埃尔滨
(埃尔布拉格)
普鲁士
维尔纳
波洛特斯克
维捷布斯克
坦嫩贝格
(格尼瓦尔德)
托伦
特罗基
格罗德诺
明斯克
斯摩棱斯克
波兹南
诺夫哥罗多克
斯罗尼姆
华沙
弗罗茨瓦夫
波兰
布雷斯劳
卢布林
布雷斯特
平斯克
布赖恩
斯塔罗杜布斯克
图诺夫
维斯瓦河
霍尔姆
弗拉基米尔
绍卡尔
克拉科夫
吕特斯克
切尔尼戈夫
普蒂维尔
基辅
切尔尼戈夫
佩雷亚斯拉夫尔
维也纳
萨诺克
勒武
克列缅纳斯
别尔哥多德
多
波多利亚
文尼特萨
切尔卡西
布达
佩斯
匈牙利
哈里奇
布拉斯洛夫
布格河
特兰西瓦尼亚
摩尔达维亚
比萨拉比亚
拉西
诺盖
赫尔松(刻松)
布尔格莱德
别尔哥罗德
(阿克曼)
塞尔维亚
瓦拉几亚
克里米亚
赫尔松
佩奇
特尔诺沃
基利法里诺
保加利亚
斯科普里
马里查
瓦尔纳
黑海
奥赫里德
阿德里安堡
帕罗里亚
锡诺颇
萨洛尼基
迪迪奥提俄克斯
赫拉克利亚
圣心
君士坦丁堡
卡尔西登
特内多斯
加利波利
尼西亚
奥斯曼土耳其

地图 7　中世纪晚


乌斯特尤哥
诺夫哥罗德
自治领
贝洛泽罗
沃罗哥达
楚克罗马
加利奇
科斯特罗马
伏尔加河
罗斯托夫
卡申
茨韦
佩列亚斯拉夫尔的萨勒斯基
戈罗杰茨
苏兹达尔
罗日尼诺夫哥罗德
特里提的
拉夫拉
弗拉基米尔
穆罗姆
莫斯科
科洛姆纳
卡西莫夫
塞尔皮科夫
尤布特斯克
里亚赞
库利科夫
诺沃西利
库尔斯克
埃莱
特斯
雷利斯克
沃罗涅什
比图格
霍皮奥尔河
丹河
金帐汗国
维亚特
卡
彼尔姆
卡马(河)
卡赞
保加尔
萨马拉
伏尔加
萨拉伊
老萨拉伊
阿斯特拉罕
汗
国
塔纳
亚述海
沃斯波罗
索尔加特
(克里姆)
哈发
热查亚
阿拉尼亚
高
加
索
捷列克河
达达科夫
杰尔宾特
里
海
第比利斯
格鲁吉亚
特里比宗德
东欧公元1390年
莫斯科公国的版土
立陶宛大公国
0
200英里
0
300千米

[527]

期的东欧

致了经济上的严重倒退。可以证明经济恢复的有力证据仅存于14世纪后半期，因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相对加速，并且一直持续到以后的几个世纪。大立陶宛公国的广阔领土将这两个主要地区分开，从而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因为公国本身在经济上也是很复杂的，它既有东部的特点也有西部的特点。【525】

8.2 东欧南部的贸易

让我们从中欧的最西部开始讨论。注意力首先需要集中于这个地区意义深远的地区差别上，对这一点，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历史学家和学者或者简单地带过，或者完全将其忽视。因此，到13世纪，在包括波希米亚、斯拉斯克（西里西亚）、马洛波尔斯卡（小波兰）、北匈牙利和俄罗斯西南部的地区有着比以北地区更多的经济活动，这种活动不仅是经济的而且也是政治的和文化的。波兰中部发展的速度相对较慢，最活跃的经济活动发生于13世纪和14世纪的波罗的海地区，当时它成为日耳曼人向大陆心脏扩张的一个跳板。但到14世纪和15世纪初，这种趋势又逆转了。通过经济和政治上的不断扩展，波兰人、立陶宛人和俄罗斯人利用对其商品有利的市场条件，努力为他们自己开辟一条通过波罗的海到西方市场的道路。15世纪各种迹象表明出现了大的经济单元，虽然远没有完全成型。所有这些趋势都很明显，考虑到贸易时尤其如此，而且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东欧整个经济生活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与14世纪和15世纪部分时间里经历过严重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西欧国家不同，波兰、立陶宛和后来的俄罗斯在这一时期内发展相对快，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历史落后性。但波希米亚情形就不同了，14世纪末期一次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导致了革命和意义深远的变化。

苏台德区和喀尔巴阡山脉组成了中东欧最南部土地的轴心。12世纪，邻近地区是一幅定居和农业经济快速增长的景象，这一过程在13世纪的加速最终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这不仅体现在耕地的大量扩展上，而且还体现于喀尔巴阡山脉地区的家畜饲养和耕作技术都得到了发展，在农民的赋税方面也有很大的变化。【528】首先在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后来——虽然速度较慢——在小波兰（马洛波尔斯卡）都发生了从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变，当然其规模有限。这一过程——与所谓德意志法的传播相联系——既是在农村和城市市场已有大量可供出售的剩余商品的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与此同时，现存城镇的扩展加速了，形成了许多新的

手工业和贸易中心。波兰的研究普遍认为，按照德意志法典，定居是伴随着大量农民经济状况的显著改善而出现的。这些改善也是赋税稳定和农民获得对自己财产的继承权的结果。与此相反，一些捷克历史学家认为由于给农民加上了更多额外的苛捐杂税，地主的剥削使农民从新法的实施中和货币地租的逐渐贬值中所获得的利益化为乌有。[①] 这种假设似乎难以经得起验证，特别是当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时尤其如此：13、14 世纪在波希米亚迅速地发展起了一个固定的贸易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农民出卖他们的产品，买进加工品。如果农民的经济状况真的不如以前，这种现象就难以解释。在上述地域范围内，手工业的扩展也表明许多农民更加富裕了。必须强调，手工业在城镇的集中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地方集市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周围农村人口的需要。可以肯定地说、从 13 世纪开始，城镇和周围农村间的经济联系显著加强。因此，像在西方一样，商人和工匠获得了相对于农民的优势地位。波希米亚商人利用农民收获之前或缴纳应付赋税时的艰难处境，或者以低贱的价格买进谷物、酒或其他产品，或者给农民预付款以期在将来低价购买农产品。工匠也利用类似的办法，当他们想要通过规定一个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价格限制城镇农村人口的商业活动时就这样做。[②] 波兰 13、14 世纪的资料对这方面谈得很少；但可以假设波兰南部的情形也与此类似，虽然这里的城镇远不如波希米亚的城镇发达，但它们并没有像在波希米亚一样对农村人口施加很大的压力。毫无疑问的是，整个地区城乡间贸易都在发展，经济更加繁荣了。【529】

13、14 世纪这一地区快速而不平衡的增长刺激了农村经济的增长，但这两种现象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就是矿业的发展——这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以及一个新的非常有利的贸易干线系统。波希米亚由于其自然资源也处在一个非常幸运的地位，在这些资源中，银和锡是最重要的。从 13 世纪起，波希米亚在金属开采领域领导着欧洲的潮流。很明显，经济和政治发展刺激了这些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但充足的白银和一定数量的金、锡和铁的出现对经济活动也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同时也加速了货币经济的增长。从 13 世纪初开始，首先在伊赫拉瓦，接着是库特纳霍拉和更小的中心，都开始给波希米亚经济提供所需的白银，这部分说明了波希米亚格罗苏斯和弗罗林被引入流通的原因，而这又为邻近地区的货币制度提供了一个样板。波希米亚的白银和黄金矿的发展在 14 世纪末慢了下来。技术上的困难来源于

① F. 格劳斯（Graus）：*Dejiny venkovskeho lidu*（布拉格，1957 年），第 2 卷，第 171～188 页。【1】

② 上引书，第 106～113 页。【2】

浅层矿的耗尽和地下水的压力，这在波希米亚采矿业中特别是在15世纪时引发了一次严重的危机。

类似的状况在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省也存在，那里从13世纪中期起到14世纪，对铜、银和金（后者主要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开采规模比较大。然而，因为这里的经济发展水平比波希米亚差，这些金属对于对外贸易更重要。在这些地区，同样因为技术困难，在15世纪产量大幅度下降。这些困难只能由大量的投资才能克服，而这在波希米亚和上匈牙利（Upper Hungary）直到15世纪末才得以解决。

西里西亚矿业从13世纪开始得到了发展，小波兰和俄罗斯的西南部稍后。虽然后两个地区在矿藏的储量中贵重矿产比前面提到的地区要少。西里西亚，贝托姆（Bytom）地区从12世纪到14世纪后半期开采铅、银伴生【530】矿；在苏台德山脉的山脚下开采铁、铅和金的伴生矿。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开采是在13世纪末期，但甚至在14世纪的泽罗托亚（Zlotorya）、勒武韦克和米克拉乔维斯也偶有开采。另外，在泽罗第斯托克和奥帕瓦公国则开采黄金矿。伴随着开矿技术的改进，铁矿的提炼在14世纪末也开始了。自12世纪后，西里西亚的自然矿藏，特别是黄金，吸引了由西而来的定居者，特别是德意志来的定居者，这对该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①

小波兰盐矿开发的转折点发生在13世纪。在这之前人们仅从盐井里提取盐，但在这一时期，在伯克奈和威里卡，后来在加利西亚俄罗斯都有盐矿开采。这些事件的发生与波兰南部人民的需求普遍增长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小波兰的盐成为远程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与匈牙利和西里西亚的贸易中尤其如此。一个类似的现象——通常波兰历史学家不太重视——是对奥尔库什铅银矿的开采以及后来切比尼亚和切西尼（Chêciny）的铅银矿开采，在那里伴生银矿可能比在上面提到的国家里的更小。但是铅矿藏丰富是小波兰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里，服务于国内需要的铁矿开采也发展起来了。②

上述地区经济的普遍发展和对自然资源的突出开发，对中、东欧的远程贸易有着强大的影响，也对这一时期贸易路线服务性系统的建立有很大的影

---

① H. 奥宾（Aubin）：*Geschichte schlesiens*（布雷斯特，1938年），I，365；《西里西亚历史》（弗罗茨瓦夫弗罗茨瓦夫，1961年），第2卷，第100～106页；*Zarys dziejow hutrictwa na ziemiach polskich*（卡托维兹，1960），I，第120～130页。【3】

② D. 莫伦达（Molenda）：*Córnictwo kruszctwe na terenie złóż ślasko-krakowskich do polowy XVI wieku*（弗罗茨瓦夫，1963年），49页及以后；B. 赞塔拉（Zientara）：*Dzieje malopolskiegio hutnictwa żelaznego XIV-XVI wieku*（华沙，1954年）。【4】

响。某些有着重大意义的外部因素也发挥了作用。在13世纪后半期，重要的贸易中心在黑海、顿河下游和伏尔加河上崛起，如克里米亚的索尔达尼亚（苏达克）和卡发以及塔纳和萨来。它们都处于从中国和波斯到西方的商旅路线上的终点。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殖民地除与君士坦丁堡保持着联系外，也与特拉布宗和黑海其他海港保持着经常性往来，而这些黑海海港又与波斯湾和印度有联系。这样他们对所有的东欧国家甚至对更远的地区有着像磁铁那样强有力的作用。所有这些环境导致了新的道路系统的形成，对波兰【531】的南部、俄罗斯的西南部、匈牙利、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特别有利。我们将努力在本章的后半部分说明它的形成与整个大的交通路线系统一起，不仅对中、东欧远程贸易的增长有利，而且还对其他经济活动起了推动作用，特别是对在这个地区地位很重要的矿业尤其如此。

8.2.1 贸易路线

贸易路线集中在波希米亚平原与它的金属资源密切相关。这些贸易路线的交汇点在波希米亚首府布拉格，早在13世纪它就已经十分富裕和强大了。通过雷根斯堡稍后又通过纽伦堡，布拉格又与从布鲁日、科隆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巴伐利亚通往威尼斯的大道相联系。还有另一条路线，经由摩拉维亚的布尔诺（布鲁恩）[Brno（Brünn）]、维也纳和卡林蒂亚，尽管因为维也纳实施特产法，它对波希米亚的重要性要弱得多。到布尔诺的同一条道路向东南一直到布达，由此这条陆路一直伸向特兰西瓦尼亚和巴尔干以及多瑙河河口上的奇利亚。走陆路从布拉格经摩拉维亚的奥洛穆茨（奥尔缪兹）可以到达匈牙利的北部。但这条从西欧经波希米亚到黑海的路线，并不如它向北延伸的平行路线那样重要。这些路线从布拉格向北或东北到达上鲁撒蒂亚（劳济茨）北部的兹戈泽勒克（格里兹），或到西里西亚的弗罗茨瓦夫（布雷斯劳）。它们从荷兰的南部，或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或从纽伦堡经过爱尔特到弗罗茨瓦夫。从这几条线路再向东到达克拉科。从波兰的首府出发，它们首先经沃尔西尼亚的维拉蒂默，然后从利科夫和俄罗斯的南部大草原到达卡发和塔纳湖。14世纪末期，由于塔纳的衰落，这条路线进一步向东南经摩尔达维亚的苏恰瓦到达位于德涅斯特河河口的贝格罗德（阿克曼、莫罗卡斯特罗）。这个港口主要与克里米亚的卡发和其他城镇以及君士坦丁堡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长期以来就形成的一组平行的路线把以荷兰、德意志和意大利为一边和以黑海国家为另一边连接起来，它们在中世纪东欧的经济生

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成为这个地区对外贸易的主要枢纽。它们与波希米亚的联系在前面已经谈到。在不同的地方，特别在弗罗茨瓦夫和克拉科，来[532]自奥地利（Austria）、摩拉维亚和从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方向上来的路线与从南部来的东西贸易路线连接。再向北，这些路线通向波罗的海海滨，使得中—东欧北部和南部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

当我们考虑这个交通系统的意义时，必须强调并不是它本身决定了我们讨论的这个地区的贸易特点。这个地区不同部分的经济生活结构对商品交换起了更大的影响；准确地说是各地区经济生活显示了如此重要的差异性。

波希米亚以它发展良好的农业和矿业，毫无疑问成为13世纪经济上最发达的地区。波希米亚城市的发展也被认为走在其他东欧国家的前面。有相当一批城镇在13世纪和14世纪都有显著增长。到14世纪初，布拉格人口肯定达到了3万，从而使这个波希米亚首府位居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最大城镇之列。其他波希米亚城镇比这要小得多，居民数量一般不超过首府人口的1/3。[①]没有证据表明14世纪的鼠疫导致城市人口持续下降；也许这个缺口很快就被流入的农民填补了。13世纪和14世纪，布拉格、库特纳霍拉和许多其他城镇的大部分富人都是德意志人。正是这些富裕的商人团体——由于得到布热米斯里德王朝末期统治者的强有力支持，也得到卢森堡的约翰和查理四世的支持——统治着这些城镇。手工业者和大多数的穷人主要是波希米亚人。

13世纪和14世纪，波希米亚城镇的手工业基本上只满足地方和地区集市的需要；对外贸易没有吸引力。这是因为波希米亚的富裕商人大都只对进口贸易感兴趣，其成本则由货币形式的白银出口来支付。[②] 这种波希米亚金属是一种价值最高的商品，它引来了供这些富裕的贵族、僧人和市民消费的外国商品。但是，它在贸易中的作用却成了波希米亚本地手工业生产扩大和[533]改良的一个阻碍。

8.2.2 波希米亚的贸易

可以把中世纪后期波希米亚远程贸易的历史分成三个连续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3~14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开始，这一时期贸易发展很快。但在14世

① F. 格劳斯：*Chudinά mestska v době předhusitske*（布拉格，1949年），第116页。【5】

② F. 格劳斯：《14世纪和15世纪初波希米亚与德国及奥地利的贸易关系》，载《历史》第2期（1960年），第107~108页。【6】

纪末期繁荣崩溃了，这也许是普遍的社会—经济危机和金属产量下降所导致的。在胡斯革命期间（1415～1437年），波西米亚与西方和西南欧的经济联系严重削弱。富裕的日耳曼商人向外移民对矿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至少在最初的阶段是这样。日耳曼人被资本更少的波希米亚商人所代替。在这一时期，波希米亚和东欧和东南欧之间已经开始发展起一些经济联系。最后，随着这次革命的结束，与日耳曼人间的贸易联系又有所复苏，虽然比14世纪要弱得多。但是似乎波希米亚与东部邻邦的贸易增长了一些。

缺乏统计资料使我们无法对这三个阶段做一个适当的解释。捷克历史学家坚持认为波希米亚和荷兰、德意志诸邦（包括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比与东北欧和南欧之间有更多的贸易，在13世纪和14世纪尤其如此。这些论点似乎能得到充分地证明。荷兰、德意志和意大利在为波希米亚的富裕阶层供应商品的同时，它们自己也需要白银和其他金属。与这些国家的联系使得波希米亚获得许多普通的消费商品，比如食盐、鲱鱼等的供应。在波希米亚边界和他们与德意志和奥地利的交接地，交换也很重要：当远程贸易被胡斯革命严重中断的时候，这种交换特别活跃。但是，波希米亚与波兰的联系，甚至与匈牙利的联系，在13～14世纪显然只起着小得多的作用。

布匹无疑在波希米亚的远程贸易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从佛兰德来的织物可能早在12世纪就到了波希米亚，尽管波希米亚的资料只能证明这种进口始于13世纪末期，而这作为一个贸易的起始时间似乎太迟了点。根据早期学者及近代的格劳斯的观点，鲜红色的布在14世纪和15世纪从根特进口，但是【534】从伊普尔、波铂林赫和库特赖（Courtrai）进口的纺织品更重要。像14世纪欧洲的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布拉班特不仅仅是布鲁塞尔（Brussels）的布开始部分地超过佛兰德的产品。根据13世纪末期一份著名的外国商品进口清单，蜂蜡、锡和银经波希米亚运到布拉格。[1] 这些商品是城镇集市上商品清单里不变的项目，这一事实表明佛兰德和波希米亚之间的经济联系已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其他资料似乎表明佛兰德对波希米亚出口的主要交换物是波希米亚的白银。与此相类似，紧密的经济联系也在波希米亚和莱茵河流域和德意志西部之间发展起来：从13世纪开始，波希米亚从科隆从亚琛、美因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其他城镇大量进口了布匹。英格兰纺织品也在14世纪后半期出现在波希米亚市场上，但是这些进口品的发展，就来自尼德兰北部的

---

① F. 格劳斯：*Česky obchod se suknem ve 14, a počatkem 15. stoleti*（布拉格，1950年），13页及以后。【7】

供应一样，是后来的事。

西方布匹由陆路从佛兰德经科隆和其他莱茵河流域城镇，并从那儿经纽伦堡、安贝格（Amberg），毕尔森（比尔森）或海布（埃格尔）［Cheb（Eger）］到布拉格，或者走一条经雷根斯堡的不太直的路线。很早以来，雷根斯堡就与波希米亚和东欧远至基辅这样的城镇有着活跃的联系。这种贸易在13世纪后半期由于基辅的衰落和道路网的改变而遭到严重的削弱；但雷根斯堡、巴伐利亚城镇依然与波希米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14世纪，纽伦堡变得更重要了。由于它的金属及后来的纺织品生产及其与威尼斯和尼德兰的联系，纽伦堡商人把他们的贸易扩展到整个东欧，尤其是波希米亚、波兰和匈牙利。布拉格是在波希米亚销售西方布匹的主要中心。从那儿，可以前进到摩拉维亚的布尔诺，然后更进一步前进到那时还隶属于匈牙利的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从某种程度上讲，布尔诺得到经弗罗茨瓦夫一线从西欧而来的布匹和其他商品供应，而弗罗茨瓦夫的商品经波罗的海或西北而来。

我们没有有关西方向波希米亚出口布匹数量的确切统计数据。但是，似【535】乎无疑的是，它的进口在13世纪显著地增加了，这就是波希米亚的经济发展时期，它一直持续到随后的一个世纪。显然，只有相对富裕的那部分人口才能消费西方的纺织品，因此其数量必定是有限的。

波希米亚与意大利的经济联系较之与德意志的经济联系无疑要弱一些，虽然与威尼斯的贸易起着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波希米亚得到丝绸和香料，用来支付的肯定是它的白银，虽然也偶有提及波希米亚刀出口到威尼斯的情况。卢森堡的约翰和佛罗伦萨查理四世之间的货币交换，伴之以类似的白银流出；但显然，波希米亚基本上在14世纪没有进口佛罗伦萨的商品。

波希米亚、尼德兰和德意志的资料提供了波希米亚城镇，特别是布拉格商人积极参与远程贸易的证据。14世纪，也许更早，他们前往布鲁日，经常光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市场，在那里他们不止一次清理其债务。14世纪，他们也出现在威尼斯。尽管这样，外国人在远程贸易中更为活跃。来自莱茵河流域的商人在这个领域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以前到过波希米亚的佛兰芒人从这个地区消失了。给波希米亚供应来自德意志和尼德兰以及意大利和黎凡特商品的雷根斯堡和纽伦堡的商人特别活跃。与奥地利的联系虽然对波希米亚很重要，但它在远程贸易中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因为从13世纪中期起维也纳实施了严格的特产法。对他们到威尼斯的远征来说，波希米亚商人可能采用经雷根斯堡和斯特劳宾到亚德里亚海的路线，反之亦然。维

也纳肯定参与了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过境贸易。有一些意大利和法兰西葡萄酒，肯定也有一些来自威尼斯和黎凡特的其他商品经维也纳到了那里。但是，以波希米亚的粮食换奥地利的家畜的贸易在奥地利—波希米亚的关系中占有很大的分量，这对两个国家来说是最重要的。在 14 世纪，布尔诺的低质布出现在维也纳，那里也是奥地利向波希米亚大量出口葡萄酒的地点：这种以酒换物的贸易并不十分常见。通向摩拉维亚的道路是波希米亚王国的一部分，对维也纳人的贸易来说非常重要，因为通往东北欧特别是经波兰到波罗的海的路线从此经过。可是波兰和奥地利沿这条路线的贸易却没有获得更大的推动力，尽管在 14 世纪波兰做过很大的努力。而且无论如何，波兰【536】布是通过经布尔诺或奥洛穆茨的摩拉维亚路线到达维也纳的。

必须承认波希米亚对奥地利的粮食出口和它从奥地利的进口之间维持着大致的平衡，波希米亚沿这条路线流出的货币比向西方和西北流出的要少。

在波希米亚的远程贸易中巴伐利亚和萨尔茨堡的作用前面已经说过了。从早期开始，由萨尔茨卡默古特来的盐经帕索运到波希米亚。相应地，波希米亚供应的则是牛。波希米亚城镇普拉哈季采在这种边界贸易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本地和外国葡萄酒从巴伐利亚出口到布拉格。从加洛林时期起与波希米亚贸易的最重要城镇是雷根斯堡，但是奥格斯堡、慕尼黑、兰茨胡特、罗滕堡特别是纽伦堡也积极地加入。由巴斯蒂安（Bastian, F.）编辑的伦廷格公司 1383～1407 年账目中，包括有波希米亚前胡斯时代后期的宝贵资料。伦廷格公司最初主要从事把来自威尼斯的黎凡特商品、意大利丝绸、棉料（米兰的粗斜纹布）和香料，比如生姜、西班牙北部的藏红花粉等转运到波希米亚的生意，而从巴伐利亚和德意志北部来的商品在它的贸易中只起非常小的作用。① 伦廷格的账目显示了波希米亚银币对巴伐利亚的出口情况，当然这并不是伦廷格人对波希米亚感兴趣的惟一商品。在布拉格他们能得到西欧商人所十分喜欢的匈牙利货币。他们也通过布拉格与来自克拉科的商人联

① A. 迪德茨（Dietz）：《法兰克福贸易史》，第 2 卷（法兰克福，1910 年），第 30、31 页；格劳斯：*Česky obchod*，第 30、31 页；H. 西蒙斯菲尔德（Simonsfeld）：*Der Fondacho dei Tedeschi in Venedig und die deutsch-venetianischen Handelsbeziehungen*（两卷本，斯图加特，1887 年），第 1 卷，第 96、101 页；Z. 温特（Winter）；*Dejiny remesla a obchodu ve* 14. – 15. *stoleti*（布拉格，1906 年），第 357、358 页；F. 巴斯蒂安（Bastian）：*Das Runtingerbúch und verwandtes Material zum Regensburger-Südostdeutschen Handel und Münzwesen*（3 卷本，累根斯堡，1935～1940 年），第 1 卷，第 151、152 页。【8】

系。我们同意捷克学者的观点，即有很大一部分金属从波希米亚流到北德意志。但是，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因为仅从一个与威尼斯贸易有紧密联系公司的账目中进行归纳可能是不全面不明智的。[1] 可以假设，是那些社会地位更普通的巴伐利亚商人，特别是那些纽伦堡商人，而不是富有的伦廷【537】格人对德意志北部的粗斜纹棉布和金属商品更感兴趣，因为这种贸易只要求有较小的现金投入并且能满足一个比对奢侈品需求更大的人群。毫无疑问，更便宜的日常所需的商品在14世纪早期，即纽伦堡商人的扩展时期在波希米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正如它们在波兰所做的那样，商人通过圣温塞斯劳斯王室领地到达那里。他们肯定也从波希米亚带走了一些银币，但是他们也对铜、波希米亚的锡和其他某些商品感兴趣。根据以上因素，我们推断，从德意志、尼德兰和其他地方的商品进口，虽然未必价值昂贵，但必定会对波希米亚的工匠有一个消极的影响，因为他们既没有得到国家也没有得到统治城市的富裕商人的保护。因此，似乎可以说波希米亚与西方贸易的不利方面不应该只局限于金属的流出。我们必须考虑来自更高发展水平的上德意志手工业的竞争，他们显然从波希米亚吸引走了一些原材料。

与北方邻居的经济联系对波希米亚来说也很重要，尽管大量的波希米亚对外贸易流向西方。13世纪末期，波希米亚与像汉堡、什切青（斯特德丁）和吕贝克这样的遥远中心保持着联系，虽然后来的汉萨城镇除了托伦外，都对波希米亚不太感兴趣。根据格劳斯的观点，在德累斯顿（Dresden）和马格德堡生效的特产法，通过关闭易北河作为向北的门户而把波希米亚商人关在汉萨地区的门外。但这并没有阻止波希米亚的北部城镇与萨克森、迈森和劳济茨之间贸易的发展。这样，从利托梅日采城镇来的商人就到达马格德堡、扎泰茨、乔姆托夫（Chomutov）和其他的波希米亚中心也从事这种贸易。哈利食盐经莱比锡运来，因此就要经过易北河北部的地区。干咸鱼，包括波罗的海鲱鱼可以在皮尔纳、德累斯顿和迈森买到，在迈森还能买到蜂蜜、酒和其他的商品。尼德兰和德意志的布，劳济茨的毛料，特别是兹戈泽勒克、齐陶地区的毛料——这两地中等质量的布在14世纪得到大规模发展——由北方线路进入。也许早在14世纪已有少部分牛从北部边境赶到波【538】希米亚。作为回报，波希米亚运出粮食和金属，以及不多的布和啤酒。最近

---

① 巴斯蒂安，上引书，第1卷，第26~28，632~639页；第2卷，第52、53、57、61、62页及以后。【9】

大家的注意力已集中到这样的事实，即在波希米亚的北部和东北部的边界来自迈森的铸币被投入流通，正如在靠近波希米亚平原的德意志领土上波希米亚铸币经常出现在交易中一样。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波希米亚的贸易大体上是平衡的，但是另一种可能性仍存在，即这种状况对波希米亚不利，高质量货币从这个国家流出，而差的铸币却源源涌入。①

波希米亚与西里西亚的联系我们还不清楚。这个地区最初是波兰国家的一部分，14 世纪前半期处于波希米亚王室的统治下；同时，就如后面将要说明的一样，它在经济上也与波兰联系紧密。弗罗茨瓦夫（布雷斯劳）这个西里西亚重要的贸易中心由于波兰和德意志之间的贸易而最先、最快得到发展。但是，在这整个时期，重要的贸易路线都通过弗罗茨瓦夫，将布拉格与奥德河和维斯瓦河口联系起来。弗罗茨瓦夫向波希米亚供应一些从尼德兰运来的布。波罗的海鲱鱼，也许还有俄罗斯毛皮和其他来自汉萨贸易区的商品，经同样的路线到达布拉格。弗罗茨瓦夫在 14 世纪和 15 世纪与俄罗斯南部进行交易，经同样——路线还得到了塔纳湖和西班牙北部的黎凡特商品，然后把一部分卖到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进一步研究对整个问题的深入是有利的。弗罗茨瓦夫这个西里西亚的主要贸易城镇，紧紧地与兹戈泽勒克相联系，它极可能是它自己产的布和兹戈泽勒克布的出口中心；来自奥帕瓦和瑞士的布和啤酒——后者 14、15 世纪在这个地区特别流行——都经西里西亚运到波希米亚。经西里西亚从波兰进口牛——后来对波希米亚很重要——还不能为 14 世纪的资料所证实。至今还没有研究西里西亚从波希米亚进口状况的著作出版。毫无疑问，13、14 世纪它只局限于一些谷物、布匹、矿产和金属品，虽然在矿产和手工业领域，西里西亚不仅是自给自足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甚至还开始出口它自己的产品。14 世纪，直到胡斯革命的爆发，纽伦堡商人在东欧进行商业扩展的主要路线取道经过布拉格和弗罗茨瓦夫。意大利人在 14 世纪甚至在 15 世纪初也经由这条路线来到西里西亚和波兰。[539] 我们没有根据认为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经济联系的加强是波希米亚统治该地的结果。在 15 世纪胡斯革命时期，弗罗茨瓦夫著名的分裂主义政策是很明显的。显然，在革命期间它的社会和民族政策绝对不利于统治弗罗茨瓦夫的德意志和天主教的贵族。但是，在波迪波拉德的乔治（George of

① 格劳斯：《14 世纪及 15 世纪初波希米亚与德国及奥地利的贸易关系》，第 104、105 页。[10]

Podiebrad）统治时期，弗罗茨瓦夫和西里西亚商人对待温和的胡斯国王是有敌意的，他们倾向于波兰和匈牙利。认为这一时期西里西亚与波希米亚在经济上有紧密联系是经不起推敲的。德意志人的统治在 1404 年被推倒后，波希米亚国王瓦格拉夫四世（文泽尔）与许多德意志公侯国都有冲突，他们曾计划通过西里西亚和大波兰低地（大波兰）与普鲁士条顿骑士团进行大宗贸易。14 世纪末到 15 世纪初对这个骑士团的记载谈到普鲁士和布拉格间的一些条约；但是，这些条约也许并不重要。[1] 波希米亚革命和随后西里西亚不稳定的社会状况使得利用通过这些地区的路线很困难。

波希米亚和波兰在 13 世纪和 14 世纪的经济关系很不稳定。波兰的史料经常以完全闭口不提来对待这个问题。波兰出口便宜、光滑的染布。众所周知，它是所有纺织品中关税最低的。[2] 波兰布、铅也许还有盐的进口（盐可能是从小波兰经西里西亚到波希米亚的）平衡了波希米亚对波兰的商品出口。我们可以假设 14 世纪就已有一些刀具和其他的波希米亚金属品到达小波兰和大波兰，这些东西在 15、16 世纪的波兰文献中非常有名。波希米亚的葡萄酒不能在波兰找到市场，因为波兰从匈牙利和别的国家进口葡萄酒。在那些属于波希米亚王室的城镇中，只有弗罗茨瓦夫积极从事与俄罗斯西南部的贸易，并且间接地也与塔纳和卡法进行贸易。从 14 世纪起，波兰国家及其城镇的统治者努力阻止这种贸易，不过通常都没有获得成功。可能由于【540】沿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小波兰—西南俄罗斯这条路线贸易的结果，有限数量的波希米亚白银到达黑海地区，而 13 世纪或更早时候，一些工业产品比如奥尔努扎（Owrucz）附近生产的手纺石灰岩卷线杆却从对面的西南俄罗斯来到该地。我们不能肯定是否有任何数量的黎凡特商品经克拉科和弗罗茨瓦夫达到过波希米亚，那时它们与上德意志和威尼斯联系紧密。但很显然的是，其他资料证明上德意志商人带着威尼蒂安和东方的商品经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到达波兰。

我们承认波希米亚和波兰间很有限的贸易使波兰产生了贸易顺差。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 14 世纪和 15 世纪波希米亚银币流入波兰的原因。然而，当时肯定还有其他原因导致了白银如此的大量流入，但由于缺乏对 13 ~ 15 世纪波兰货币史的最新研究，目前我们还很难说这个原因具体是什么。

---

① C. 斯卡特勒（Scatter）：《日耳曼条顿骑士团的贸易关系》（莱比锡，1887 年），第 36、210、266 页。【11】

② 格劳斯：*Česky obchod*，第 46、47 页。【12】

波希米亚和匈牙利间的经济联系在特点上是不同的。中世纪的晚期，匈牙利像波希米亚一样，是金、银、铜和铁的重要产地；这些金属的窖藏在今日的斯洛伐克和特兰西瓦尼亚都有发现。但是匈牙利平原大量地饲养牛群。此外，在13世纪一股德意志人移民匈牙利的浪潮也导致了那里采矿业的发展。这样矿产品和牛很早以来就成为匈牙利的主要出口产品，它们主要出口到维也纳、德意志的北部和意大利。维也纳的特产法、从14世纪起来自纽伦堡和其他德意志南部的商人活动的不断增加，加上匈牙利的中产阶级的相对弱小，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对西方的出口贸易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波希米亚商人也努力在14世纪与匈牙利建立起联系，其中对波希米亚最有价值的商品是匈牙利的金和牛。波希米亚对匈牙利的出口与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很不相同。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人进行过研究，然而我们依然可以说波希米亚向匈牙利出口的是它自己和外国的加工品，后者来源于波希米亚的过境贸易。因此，尼德兰和德意志的布以及意大利的纺织品经波希米亚到达匈牙利。这种贸易不仅只由波希米亚人经营，莱茵河流域和德意志北部的商人，特别是 [541] (14世纪) 科隆和纽伦堡的后来者——途径布拉格、摩拉维亚的布尔诺、匈牙利北部的布拉迪斯拉发，都喜欢绕道维也纳。14世纪波希米亚商人到过布达，但他们没有再前进。匈牙利成了销售便宜的波希米亚布的市场。最迟到14世纪中期这种布被从匈牙利平原向南带到远至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 的地方。向东则被卖到特兰西瓦尼亚和摩尔达维亚。但是，很有可能是西里西亚的纺织品被误认为是波希米亚的布，前者在特兰西瓦尼亚、摩拉维亚和瓦纳几亚有很大的需求。没有证据证明这种出口占有很大比例，但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资料证明这种贸易确实存在；但它们对还不发达的波希米亚布业而言肯定是很重要的，这种布业即使在国内也很难抵挡外国的竞争。完全可以肯定有些从黎凡特来的商品经波希米亚到达匈牙利，尽管匈牙利有很多的商品来自于其他路线。匈牙利对波希米亚的主要出口品是牛和金币，后者很大一部分经波希米亚进入德意志。当然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之间的贸易，不能与经匈牙利和维也纳之间的贸易相比；但是，14世纪双方都对此开始加以重视。它的重要性可以从波希米亚国王、卢森堡的约翰和查理四世的政策中得到证明，他们都为波希米亚商人在匈牙利寻求特权，而匈牙利统治者也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关注。

这样，13、14世纪，波希米亚积极参与了远程贸易，而这一事实影响了城镇的发展，特别是对它的首都布拉格尤其如此。而对这种状况的评价，

德意志学者和捷克历史学家都是很片面的，因为他们都把这种增长归结为查理四世作为波希米亚统治者所起的异乎寻常的积极作用。他们指出，他对在德意志经商的波希米亚商人赋予无数的关税豁免权，在匈牙利保证给予波希米亚商人特权，而且还主动地重新开辟从布鲁日经布拉格到维也纳的主要贸易路线上。但是，最近的捷克研究恰当地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一事实，即卢森堡王朝的国王政策主要有利于波希米亚与德意志的经济联系，这间接地增加了白银的流出量，而这正是这种贸易的特点。捷克历史学家也指出，在波希米亚国王约翰和他的后来者为了资助他们的政策所积攒起来的大量金钱产生了重大而消极的影响：这导致了波希米亚通货的贬值，而且在 14 世纪末，导致了更大范围的经济和社会困难。王室对富裕商人的大力支持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他们中大部分人主要从事与西方贸易。波希米亚的手工业是这种政治经济政策的牺牲品。外国的竞争，缺乏保护，还有贵族和国家政府的财政压力，使它们不能发展。所有这些因素引起了更大的社会危机，并最终引发了胡斯革命。[①] 这次革命本身导致了德意志僧侣、贵族和城市贵族的大溃逃：在所有的大城镇，特别是在布拉格和库特纳霍拉，德意志贵族逐渐被波希米亚人所代替。但最初这些人手头拥有比德意志商人要少得多的财政资源。当贵族对手工业行会的控制被极大地削弱时，行会自身开始影响城镇的命运。这应该有利于手工业的扩展，但它们的增长被国内外的战争所扼杀。与早期学者所持的观点相反，詹纳塞克最近证明波希米亚与德意志国家的经济联系并没有完全停滞。的确，德意志北部的纽伦堡商人从布拉格撤退了，这对波希米亚来说是制造了一个障碍；但其中的一些商人比另一些商人更富开拓精神，他们渗透进胡斯国境特别是在边界上，因为他们并不想丢失获取白银的机会。天主教的毕尔森成为纽伦堡商人进入波希米亚的通道。同时，毫无疑问的是从前经常有商旅往来的贸易路线，即从巴伐利亚到匈牙利或东北欧这条路线，现在荒废了。绕过胡斯国土，纽伦堡商人走的是把萨克森和鲁斯蒂亚与天主教西里西亚或大波兰联系起来的这些道路路线。结果，弗罗茨瓦夫商人经天主教的摩拉维亚到达匈牙利的北部。这个新的道路网络在 15 世纪得到巩固。

[542]

最近，捷克学者注意到这一事实，即边界贸易在革命期间几乎没受影响，甚至还有所扩大。在南部和西部的一些波希米亚城镇像海布（埃格尔）、毕尔森（佩尔森）、多马兹里斯（陶斯）［Domažlice（Taus）］、塔霍

---

① 格劳斯：*Česky Obchod*，第 46 页及以后。【13】

夫（塔乔）和金特日丘维以及哈拉德克（诺哈斯）都从中受益：其中，许多城镇为向林茨、维也纳、布拉迪斯拉发、纽伦堡等出口而生产布的产量有所增加。与奥地利的边界贸易——其主要内容是进口波希米亚谷物——仍得 【543】 以保持。与迈森地区的边界联系似乎也得到了加强。再往后，即15世纪，由于波希米亚南部贵族地产上渔业的发展，对北德意志的鱼的出口也逐渐增加。詹纳塞克持这样的观点：即波希米亚人在革命期间并没有因缺乏进口商品而受很大影响，虽然偶尔会出现盐和香料的短缺。有人说当胡斯袭击西里西亚和其他邻近的国家时，他们抓走了很多的牲畜，这一事实正好说明外贸的中断导致了他们国家牲畜供应缺乏。

革命期间对从纽伦堡和德意志北部进口的普遍限制开辟了手工业满足基本需求的机会，特别是金属品和纺织品方面。有意思的是，波希米亚对便宜的波兰布的进口在15世纪停止了，这肯定是由于国内的产品代替了波兰布的原因。

在后革命时期（1437年后），波希米亚与东南欧的联系特别是与波兰和俄罗斯的联系加强了，这个过程可能在更早的时期就已开始。与此同时，它与其南部和西南部邻近地区的贸易增加了，波希米亚南部农业的扩大刺激了与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贸易，并推动了这种贸易增长。刀具和波希米亚布对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摩尔达维亚和瓦纳几亚（奥尔泰尼亚）的出口无疑得到了发展，虽然它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后来，在15世纪后半期，一些波希米亚纺织品和金属品出现在波兰和俄罗斯的西南部，但是这种贸易直到下一个世纪才变得很重要。[①] 与暂时控制着天主教西里西亚的匈牙利之间无休止的战争，使得与东北欧的贸易更困难了，但并没有完全中断。实际上，正是通过波兰，英格兰、荷兰还有一部分南尼德兰的布，从维斯图拉河河口到达波希米亚。确凿无疑的是这些布也经萨克森、迈森和鲁撒蒂亚从吕贝克和汉堡进口。15世纪，布业在兹戈泽勒克、迈森和鲁撒蒂亚地区发展很快。它们的产品在波希米亚也很流行。盐也是从萨克森（还从奥地利）买进，15世纪末，牛开始成为从波兰进口的一种固定产品。 【544】

纽伦堡和德意志北部的商人只是逐步地重建起与波希米亚旧有的联系，这其中的原因是从革命时期以来双方的互不信任，此外还有政治动荡和一直

① J. 詹纳希克（Janaček）：《15世纪下半叶波希米亚对外贸易》，载《历史》，第4期（1962年），第39页及以后。【14】

持续到1474年的战争。波希米亚银矿开采的下降也有部分的原因，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6世纪初北部的新富矿开始开采为止。应该注意到15世纪后半期，萨克森地区铜和银的增长把一直寻找这些金属的德意志承包人的注意力从波希米亚吸引开了。国王波迪波拉德的乔治，希望重建波希米亚外贸，制定了加强与威尼斯联系的计划，目的是利用经由小波兰、西南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到黑海上黎凡特的贸易中心，但事实是它们在15世纪后半期已经失去了早期的重要性。

以现阶段的研究，很难断定波希米亚商人是在胡斯时期还是在此之前更积极地从事外贸，但是肯定无疑的是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波希米亚的贸易结构。它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国内手工业在外国市场上的地位，但是它的主要影响仍然是在国内市场上。波希米亚贵族中下阶层——他们很大一部分是市民和富裕的农民——经济地位的改善，也许对国内的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而这种生产由于外国竞争逐步减弱而正在增长。行会的成员和政治影响极大地增加，完全能保持甚至扩大农村生产者所没有的特权。王室的城镇也获得了发展的动力，虽然一些独立的城镇像金特日丘维、哈拉德克和索贝斯拉夫的发展也非常迅速。这些新的商人在国内外商业活动中在某种程度上都依靠波希米亚的商品，这就使得这些商品到达南方和东南的外国市场成为可能。与前胡斯时期比较，这一时期波希米亚与这些地区的联系更强了，但是并没有导致金属的流出——这是这一时期非常有意义的一点，因为这时开采的白银更少了。波希米亚对邻近国家的谷物和葡萄酒的出口在继续，而对南部甚至有所增加。除了早期出口的谷物、蜂蜡和其他商品外，新的农村商品、主要是来自南部的鱼也出现了。国内与国外需求一起对波希米亚的城市和农村生产产生了较之14 [545] 世纪更大的推动。很显然，这个因为没有有关数据而不可能用统计方法来表现的过程肯定是很不平稳的。那场革命性的战争，匈牙利的压力和波蒂布拉德乔治的许多政治不幸，对这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乔治国王的继承人，软弱的贾杰伦·维拉蒂斯劳，完全屈服于强大的权贵的影响，不仅不能保护自己的城镇在相关贸易领域与权贵的竞争，而且无法对付依附于权贵的自由市镇的竞争。15世纪末，波希米亚南部的大贵族开始加固他们的地产。这个过程不久既威胁着农民也威胁着城镇的利益。但是，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内，这些破坏性的现象还相当不明显，肯定也没有产生大范围的影响。

8.2.3　西里西亚的贸易

西里西亚——在13世纪的后半期进入波希米亚的势力范围，在随后的一个世纪成为圣维克拉夫王室的一部分——在许多方面类似波希米亚。西里西亚从12世纪开始的矿业发展在前面也提到，虽然它的发展不能与波希米亚的矿业或自己发达的农业相比。它在很早就有了相当程度的城市化，这一过程在13世纪加速了。有些学者估计在14世纪中期西里西亚的城镇人口——根据当时征得的税收来计算——大约占整个人口的23.1%。这大概有49万人（根据其他的估计只有37.6万人），它在随后的世纪里很少增长。14世纪中期，弗罗茨瓦夫居民已在11 000~15 000人之间，到1403年就已接近2万人：格沃古夫［Glogow（Glogau）］有大约有11 000人而尼斯（莱萨）有大约6 000人。其余的绝大部分城镇的居民不超过一两千人。[1]西里西亚城镇的人口增长可由它在早期根据马格德堡法被授予了自治市的地位这一事实得到证明。泽罗托亚（戈尔德贝格）早在1211年就获得了特权宪章，勒武韦克（洛文堡）是在1247年，而弗罗茨瓦夫是在1242年首次获得的。这与外国人，特别是有钱的德意志商人、矿工和手工业者流入的时间相一致；甚至更早从尼德兰南部来的陌生人也已在西里西亚定居下来。他们【546】是被矿业开采尤其是金矿开采和迅速发展的农业吸引而来，当然还有它们为移民所展示的诱人前景。由于原材料的便利，西里西亚的布、亚麻和金属品生产飞快地增长起来。但与波希米亚相反的是，西里西亚城镇的生产并没有单单靠国内的原材料供应。远程贸易也在这种增长和原材料供应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也提供了一个销售手工业品的巨大市场。

前面已经描述过的贸易道路网对西里西亚极为有利，因为它与从德意志经波兰和俄罗斯到黑海，和从波希米亚和西南欧到东方和波罗的海的路线都有道路连接。

弗罗茨瓦夫和其他西里西亚大城镇的远程贸易由来自佛兰德、英格兰和德意志的工业品与在布鲁日或威尼斯所买到的黎凡特商品所组成，后者也从黑海到达西里西亚。西里西亚仅仅消费一部分从西方进口的商品。剩余的进

① J. 米特考斯基（Mitkowski）：*Uwagi o zaludnieniu Polski na poczatku panowania Kazimierza Wielkiego*（波兹南，1910年），第10章，第121~135页；W. 库拉："Stan i potrzeby badan nad demografia historyczna dawnej Polski"，in *Roczniki Dziejòw Spoleczanychi Gospodarczych*，第13章（1951年），第23~109页；《西里西亚史》，第2卷，第17、19页。【15】

口品与无数西里西亚商品一起被重新出口到波兰、西南俄罗斯或匈牙利。这就使得盐、农产品、牲畜、森林产品和某些黎凡特的商品的进口成为可能，因而使得西里西亚的食物和原材料供应在13、14世纪得到极大的扩展。由于弗罗茨瓦夫隶属于汉萨同盟，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从事海上贸易；但是，它在布鲁日—诺夫哥罗德路线上的活动并没有得到特别发展。然而，与汉萨同盟的联系，特别是与普鲁士的联系，使得西里西亚商人能参与对波希米亚、奥地利和威尼斯的布、鲱鱼和毛皮的出口。也许除了葡萄酒和意大利黎凡特的商品外，一部分白银也从波希米亚出口到西里西亚，但在这个方向上的贸易对西里西亚城镇而言是相当次要的。弗罗茨瓦夫与尼斯、莱格尼察（列格尼茨）和斯维德尼察（斯维德尼兹）之间的联系和它与佛兰德的联系都为13世纪的资料所证明，虽然它们可能更早就已存在。这一点可由几个方面予以证实，其中之一就是从佛兰德来的殖民者在老弗罗茨瓦夫甚至在1242年日耳曼法在这个城镇实施之前就已经在此出现。13、14世纪前半期，[547] 弗罗茨瓦夫的资料谈到从根特、伊普尔和许多其他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纺织品中心进口的布，经常提到的 *schonlaken* 可能正是佛兰德和布拉班特所生产的。这些布中有一部分是在弗罗茨瓦夫加工的。它通过德意志后来也通过维斯图拉河河口到达西里西亚，因为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实施的特产法使得西里西亚商人利用奥德河作为通向波罗的海的路线几乎不可能。13世纪末布鲁日进口商品的登记中，就已提到铜、银和来自波兰的黄金。上面所说的黄金，在这一时期主要产自西里西亚。在这个时期及随后的两个世纪内，西里西亚还是被叫做波兰，甚至在后来波兰省被转到波希米亚王室名下后亦如此。① 对白银而言，可能情况也是一样，弗罗茨瓦夫与布鲁日后来与安特卫普的贸易关系在整个中世纪的后期都很活跃。它的商人从那里取道前往英格兰，也许在14世纪后半期，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5世纪，他们从英格兰进口布。

这一时期，西里西亚与莱茵河流域和萨克森的经济联系很活跃。科隆、亚琛还有后来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兹戈泽勒克和许多其他中心产的布流入西里西亚的城镇，特别是弗罗茨瓦夫。14世纪更多的是在15世纪，劳济茨北部一个大纺织品中心兹戈泽勒克，就向弗罗茨瓦夫出口它自己的许多产品，有时则是为了再出口。相应地，它从西里西亚购买当地和波兰生产的羊

① M. 马洛维斯特（Malowist）：《13～14世纪法国与波兰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的发展》，载《比利时语言与历史评论》，第10期（1931年），第1020页及以后。【16】

毛、原材料和从东方进口的谷物和牛群。除了莱茵河、法兰西和意大利的葡萄酒外，特里贾的染料、金属品，意大利的丝绸、香料等都从德意志到达西里西亚。

弗罗茨瓦夫与西方的贸易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德意志商人经常光顾这些城镇，它自己的商人也经常到西方去旅行。14 世纪后半期他们去赶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市场。同一时期，从弗罗茨瓦夫、斯维德尼察和一些其他的西里西亚城镇而来的商人开始光顾威尼斯的方达科 · 戴 · 特德斯奇市场。[①] 毫无疑问，西里西亚商人在全欧进行活动，但外国商人肯定在它的贸易中起了很大的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

14 世纪，尽管在矿产方面有所下降，纽伦堡商人还是在西里西亚扩大了他们的活动．威尼斯人也许还有热那亚商人经常出现，前者偶尔还有在弗罗茨瓦夫定居的。对这些外国人而言，弗罗茨瓦夫成为一个与东欧联系的重 【548】要纽带，是通往东方道路上的一个节点。14 世纪后半期是西里西亚贸易的突出发展时期、对弗罗茨瓦夫来说尤其如此。它的商人长期以来与克拉科、小波兰和俄罗斯西南部的其他贸易中心、托伦（索恩）和但泽保持着紧密联系，这些领土上特别是在壳拉科夫无数的西里西亚人定居点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与那里关系虽然不友好但很紧密。波兰国家和俄罗斯西南部向西里西亚出口盐、铅和匈牙利的铜、羊毛、蜂蜡、酿造啤酒的蛇麻子、羽毛和毛皮。其中一部分商品有可能进一步运到西方和西南方。我们还不清楚，从 15 世纪起就很重要的食物和牲畜进口是从何时开始大规模进行的。尽管缺乏统计材料，还是有一些资料清楚地表明这一事实，即与西里西亚东部接邻的国家进口了相当数量的西里西亚和西方商品，这种进口是这些地区 14、15 世纪巨大的经济增长所刺激带动的。

15 世纪，西里西亚的经济地位变得更复杂了。严重农业危机的征兆开始出现。虽然胡斯革命并没有扩展到这一地区，却引发了持续的战争状态，而且常得到穷人支持的胡斯军队对农业和牲畜饲养产生了异常严重的破坏（因为波希米亚没有多少牲畜，军队带走了大量的牲畜）作用。15 世纪西里西亚农业生产的波动可能导致它从波兰进口谷物和牲畜的上升，而且这一因素的重要性不断增加。15 世纪尽管有政治上的不稳定和贵族间的战争，西里西亚特别是弗罗茨瓦夫商人仍保持着与克拉科和大波兰的紧密联系；通过

① 西蒙斯菲尔德：*Der Fondacho...*，第 2 卷，第 152、197、227、239 页；第 2 卷（原文如此——译者注），第 72 页。【17】

不断成长的华沙和维尔诺等城镇建立联系，他们经立陶宛到达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与波兹南、华沙和维尔诺（也许在那时比与克拉科的联系更多）之间经常而密切的联系为弗罗茨瓦夫商人——同时也间接地为来自其他西里西亚城镇的商人和生产者——提供了一条获得市场、食物、原材料以及整个东北欧的道路。一群群的牲畜经小波兰和摩尔达维亚被驱赶到布热格（布日格）[Brzeg（Brieg)] 和弗罗茨瓦夫，而后者的城镇成为重要的毛皮和牲畜国际贸易中心。其中一些商品要再出口到德意志、波希米亚甚至意大利，特别是到威尼斯。显然，到 15 世纪，西里西亚与整个波兰王国在经济上是紧密相连的。

[549] 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西里西亚在 15 世纪后半期也经历过一场矿业和冶金业的复兴。弗罗茨瓦夫和克拉科商人在该领域内大量进行投资。泽罗第斯托克黄金产量的上升刺激了其他地区开发金属矿藏的努力。铁矿开采增加了。在 15 世纪，金属品加工，特别是以向波兰出口为导向的农具生产发展起来了。在匈牙利国王科文努斯·马蒂亚斯统治西里西亚期间，它的商人就有了一条通往切申（特申）的道路，因而有了获得匈牙利北部自然资源的通道，并且承担了当地铜和银的出口。奥格斯堡、乌尔姆、纽伦堡和其他地方公司的大德意志公司的代理人利用这种便利，在弗罗茨瓦夫建立起商号。富格家族在那里的代理人在该世纪末很活跃。他们对西里西亚的矿藏很感兴趣，从事铜和从小波兰大量进口的铅的熔炼以及出口。

整个 14 世纪，但更多的是在 15 世纪，弗罗茨瓦夫和波兰王国城镇间激烈的冲突开始了，后者得到国王的支持，成功地把西里西亚商人阻挡在通往东方的道路之外。由于这场斗争，弗罗茨瓦夫在 15 世纪末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这就突出地说明了它对波兰经济的依赖是多么的严重。

我们还不清楚波希米亚在这一时期从对西里西亚的贸易中获利有多大。转口贸易掌握在富商手中，他们大量投资矿业、购置地产并统治着城镇。14、15 世纪许多城市富人甚至位居大贵族之列。社会等级中较低的一级是新贵，他们主要从事本地贸易和地区贸易。

弗罗茨瓦夫无疑是中东欧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像这个地区其他的城镇一样，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这里曾经存在过银行系统或商品得到了保险，甚至在 15 世纪经济困难有利于各种投机活动时这些都没有出现过。可能的情况是，不仅在西里西亚而且在邻近的国家里，对矿业投资和对城镇和农村地产的购买花掉了贸易中累积起的大量资金。在某些特定时期内，这会取得比

[550] 具有高度投机性质的银行交易或保险交易更可靠的利润。

8.2.4　小波兰的贸易

像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一样，小波兰在13世纪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既没有被蒙古入侵（从1241年起）也没有被14世纪的传染性鼠疫所影响。现代人对小波兰在14世纪前半期的人口估计，根据当时的税收所计算，是在25万居民到30万居民之间波动。在这一时期内，克拉科有大约1.4万居民，而其他的小波兰城镇很少有超过1 000人的。[①] 在努力评估15世纪的状况时，我们碰到了一个难题。此时农业、畜牧业和矿业的不断增长，它们向新地区的扩展，以及城镇显而易见的发展——虽然这些发展可能并不像前两个世纪那么快——某种程度上与比尔克的研究结论相冲突，他的结论来源于克拉科有关的价格史资料，而且可能并不完全正确。他发现虽然14世纪后半期制成品的价格水平很高，但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大约下跌了19%。[②] 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迹象表明15世纪的小波兰在人口和经济增长率方面比前一阶段有所下降。

现阶段的研究无法解释这些矛盾。我们只能假设随着波兰货币的贬值，贵族的货币收入下降了。但这根本没有危及农民的地位，因而也没有损害大多数小波兰居民的利益。证据是农民甚至出现在克拉科学院的学生中。从贵族的抗议来判断，农民青年也经常被送到城镇来学手艺，虽然这种花费很昂贵。农村穷人涌入城镇寻找工作甚至到邻近的国家去干季节工。这导致了15世纪末农村劳动力的价格上升，而这是后来刺激农奴进口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一时期采矿和冶金都在发展，虽然外来竞争不断加强，手工业也在扩展。从13世纪开始，主要是在14世纪和15世纪，来自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资本流入小波兰，这些国家富裕的新移民定居在一些城镇里，特别是在克拉科定居。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小波兰的经济是在增长而不是在停滞或倒退。可能比尔克的结论只适用于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而不是全部地区。它们是否只适用于小波兰的部分地区尤其是克拉科地区呢？外国商品包括手工业品的大量进口，可能导致了这部分产品的价格有些跌落。这个地区的农村人口非常密集，而且，甚至在15世纪，这里就已经历了为产品找市场的困难，【551】

---

① 米特考斯基：*Uwagi…*，第127页；库拉（Kula）："Stan i potrzeby"，第39页；《波兰史》（华沙，1957年），I，I，第509页。【18】

② J. 佩尔克（Pelc）：*Ceny w Krakowie w latach* 1369～1600年（利沃夫，1935年），第51页。【19】

这可能导致了对食物价格的负面影响。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假设。值得补充的一点是，在15世纪，农村定居点在沿小波兰东部边界比如肥沃的卢布林地区发展起来了。因此，根据城镇数量和大小的扩大，我们就可以假设可能在农村经济中并没有经历过严重的经济困难。从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变，从13世纪开始并在随后的一个世纪得到加强，它证明了城镇和农村经济联系的存在。手工业集中于城镇，虽然这个过程在整个中世纪并没有完成。小波兰的市民在限制农民自由从事贸易和手工业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虽然在大多数城镇都弱小的情况下，这种胜利并不是很有效。有一些证据可以假设在15世纪前半期城乡产品的价格比并不利于农村居民。但是没有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结论。市场可能充斥着农产品甚至牲畜，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些产品出口增长的原因。这些产品比如羊毛出口的结果，在15世纪末影响了整个波兰的布业。小波兰的采矿业也影响了远程贸易的扩展，正如在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和匈牙利北部一样，但由于小波兰的矿产品并不很抢手，所以它产生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前面描述过的大贸易干线网络，也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为矿业和其经济部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

由此可见，小波兰与波兰领土其他部分的经济联系是很微弱的，在14、15世纪尤其如此：只是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个领域才逐渐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开始，克拉科和小波兰的其他城镇与西里西亚和匈牙利的斯洛伐克地区经济联系非常紧密，而与弗罗茨瓦夫的贸易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使克拉科商人可以参与对西方和黑海地区的商品交换。相应的，克拉科和小波兰许多更小城镇的贸易主要是建立在与匈牙利紧密联系的基础上。尽管这样，像波兰研究的传统一样，把小波兰的远程贸易作为一个排他性的转口贸易去描述是夸张的。

[552]

因此，从13世纪起，小波兰从威里卡和伯克奈出口盐到西里西亚，因而获得了对那个市场的长期控制。当琴斯托霍瓦（Częstochowa）地区铁的产量上升时，其中的一部分被运到西里西亚。铅、羽毛、羊毛、毛皮、蜂蜡、木材，还有最迟从15世纪开始，产量不断上升的牲畜和谷物等，都成为长期的出口品，其中一些产品来自西南俄罗斯。13世纪，已有一些东方产品经由克拉科到达了西里西亚。它们最初在沃尔西尼亚地区的维拉蒂默买卖，但从14世纪起主要在里沃以及黑海地区的城镇进行。这样，小波兰就成为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布以及西里西亚或者劳济茨的中低档羊毛交易的市场，同时也是金属品和啤酒的交易市场；从斯维德尼察来的啤酒价格特别

高。黎凡特和主要来自威尼斯的意大利产品，从克拉科来到弗罗茨瓦夫。与西里西亚的经济联系导致了商人长期定居于克拉科。这些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富裕的克拉科商人更倾向于与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而不是与波兰其他地区实现政治统一。这种状况导致了波兰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复杂化。波兰与西里西亚的贸易联系在整个时期内都是很紧密的，波兰国家从14世纪起大力加强了商人的地位。

有关小波兰与匈牙利北部贸易的资料仅可以追溯到14世纪初，但实际上沿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肯定在上一个世纪就已经发展起来了。这种贸易对双方都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交易的双方是伙伴关系。喀尔巴阡山关口提供了一条相对比较容易的小波兰和匈牙利北部之间的交通路线。从奥尔库什和更小的矿区来的铅——可能从13世纪起但肯定的是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是小波兰对匈牙利的重要出口品。匈牙利的铜矿开采非常重要。虽然没有可以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任何数据，但很清楚，科希策这个克拉科承包人一次铅的交货量就达到4 000英担[①]。小波兰也出口盐到匈牙利。但是【553】匈牙利王室因有自己的盐矿，因此尽量把进口只局限于一些小的边界地区。小波兰也出口便宜的布到匈牙利，可能主要在克拉科和别奇制造的；另一方面，大波兰的纺织品也很可能深深地渗入匈牙利甚至远至特兰西瓦尼亚的城镇地区。克拉科向南方再出口西里西亚布也是如此。但所有这些，仅组成向匈牙利出口布、主要由克拉科出口布的一小部分。14世纪，从佛兰德来的布占统治地位，但后来到了15世纪初，就让位于从布鲁塞尔、马林、勒芬等地来的布了。英格兰粗绒布，后来还有荷兰纺织品的数量，在这时也有所增加。尼德兰的布也经常从克拉科运到匈牙利，它的数量比较大，有100～400段。除铅外，布是小波兰出口到匈牙利的主要商品。[②]

13世纪后半期和14世纪，铜业在斯洛伐克大规模发展，是匈牙利出口到小波兰特别是到克拉科的最重要物资。因而小波兰金属品的增长得到了很大的推动，毕竟匈牙利的铜是克拉科（也有一些更小的城镇像桑多梅日、伯克奈和萨茨）与普鲁士、布鲁日还有后来的安特卫普进行贸易的基本商品。铜的出口在15世纪下降了，它的产量下降主要因为浅矿的衰竭、地下

① 在英国等于120磅。——译者注

② S. 库尔茨巴（Kutrzeba）："Handel Krakowa w wiekach srednich", *Rozprawy Polskiej Adademii Umiejetności*, 第14期（1910年），第58～72页；J. 达布罗斯基（Dabrowski）："Kraków a wegry w wiekach średnich"（《克拉科和匈牙利的关系》），载 *Rosznik Krakowski*（克拉科，1911年），第218～222页。【20】

开采的排水问题以及来自向西方和威尼斯出口铜的纽伦堡商人的激烈竞争。有钱的克拉科商人在15世纪后半期对重建匈牙利北部的矿业很感兴趣，并准备到那儿投资。简·瑟佐是从匈牙利北部来的德意志人，也是克拉科的市民，他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大约1475年，他在克拉科附近的摩吉拉建立起一个巨大的金属工场，利用波兰铅从匈牙利铜中提炼白银。斯洛伐克的铜矿开采在弗格公司和特佐家族（1494年）加入后繁荣起来。这导致了向波兰出口铜的进一步增长，并从波兰再出口到波罗的海和安特卫普，尽管【554】小波兰商人从中的获利比以前要少得多。

从上匈牙利进口白银对小波兰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波兰铸币厂依靠的就是这种供应。匈牙利和波兰的学者曾论述过斯洛伐克向北方出口黄金的缺乏，虽然它供应小波兰一些高质量的铁，使得在匈牙利交通干线上的萨茨于16世纪中出现了一批制造小刀和镰刀的工匠。14、15世纪，马、蜂蜡、铅、毛皮和匈牙利葡萄酒的供应，相较于金属来说意义要小得多。而葡萄酒直到16世纪才变得重要起来。

在他们与上匈牙利的经济联系中，克拉科商人领先于他们的竞争者——主要是从科希策来的商人，还有一小部分巴戴维（Bardiov）商人。这些城镇的商人更多地在国内或在克拉科完成他们的交易而不打算走得更远。14世纪，克拉科人和普鲁士人共同在这个领域占主导地位，后来前者变得更重要起来。也是在14世纪，克拉科设法挫败了小波兰的一些小城镇成为匈牙利和波罗的海地区贸易中介的企图；后来他们利用自己的胜利成功地把普鲁士商人阻挡在喀尔巴阡山之外。

对小波兰与东方在中世纪后期贸易的任何讨论，都应该考虑到西南俄罗斯的贸易，因为这个地区在14世纪被波兰国王卡西米尔大帝（Casimir the Great, king of Poland）征服。控制通往黑海和顿河下游的交通路线的图谋，在这次领土扩张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不是惟一的作用。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克拉科和小波兰其他城镇在13世纪与沃尔西尼亚的维拉蒂默这个东方贸易中心有多大程度的经济联系。在这一地区，可清楚地感觉到鞑靼入侵与后来俄罗斯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为争夺这里所进行的战争的影响。在卡西米尔大帝获得对西南俄罗斯的控制后，他大力地鼓励在那里建立农村和城市定居点。他特别强调里沃的发展：这个城镇由于位于从西方和西北部通到黑海的便利的交通要道上，因而有着巨大的经济潜力。克拉科商人在14世纪后半期和15世纪千方百计想要到达塔纳湖特别是贝格罗德（阿赫曼）和西

班牙北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被迫限制通往里沃的远征，虽然这个城镇已变为这一地区最大的东西方贸易中心。当克拉科的商人在黑海，甚至在 [555] 奇奥斯和亚历山大地区积极活动时，里沃却相对地与世隔绝起来，但这并没有整体上阻碍历史的发展。来自东方的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希腊人在里沃非常活跃，某种程度上在俄罗斯西南部的一些小城镇亦然。他们在那里定居的人口相对较多，特别是在里沃，并且与在卡发、贝格罗德和黑海其他城镇生活的老乡有着联系。他们将胡椒粉、生姜、肉豆蔻、藏红花粉和其他香料以及珠宝、丝绸和棉织品还有希腊葡萄酒等产品进口到波兰。里沃的商人也与摩尔达维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4 世纪末他们在苏恰瓦建立了自己的仓库。大批的牛群——最迟从 15 世纪起已经成为对波兰出口的重要物品——就是来源于此地，这导致了波兰在皮革制品加工方面大发展。从摩尔达维亚和波多里亚（西乌克兰）来的一群群牲畜在波兰对西里西亚、德意志、波希米亚甚至意大利南部出口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15、16 世纪之交，单个商人驱赶的牲畜通常超过 1 000 头。雅罗斯拉夫和卢布林的市场成为波兰东部牲畜贸易的中心：在 15 世纪，卢布林由于发展迅速，也逐渐地参加到这种对南部和东北部的贸易来。

黎凡特供应的商品从东方出口到波兰，一方面为国内消费；另一方面也用于再出口。14 世纪，波兰商人经由陆路把它们出口到西方，但主要由普鲁士商人出口到普鲁士，其中一些经由海上到达波罗的海和布鲁日。15 世纪，这种贸易有了重要的改变，商品的流动从某种程度上说逆转了。这也许是由于普鲁士商人被阻止进入俄罗斯的缘故。可能是由于帖木儿侵入近东和同时发生的导致拜占庭帝国瓦解的战争，东方流到卡发的商品在一段时期内减少了，因此可能间接地缩小了它们流入波兰的数量，由此而来的结果是更多的商品在 15 世纪从威尼斯和布鲁日流入波兰。但是，克拉科在黎凡特商品贸易中确立的价格在这个世纪并没有偏离波兰首都普遍的价格水平很多。

关于中世纪后期从小波兰和俄罗斯西南部对东方出口的资料少而又少，因此我们不可能准确地估计它的量或者描述它发展的程度。应该注意的是那些经由西里西亚和普鲁士到达波兰的西方商品在这里是最重要的。从托伦到沃尔西尼亚的维拉蒂默和里沃的路线上一名私人顾客的财产清单中我们可以看到，从 14 世纪中期起就有根特、布鲁日和波铂林赫以及托伦本地产的廉 [556] 价纺织品出口。在该世纪末，条顿骑士团就从伊普尔、赫恩萨尔斯、图恩、

瓦兰西恩勒斯和马里尼斯出口布到里沃和卢布林。[1] 也许英格兰和荷兰的纺织品也在这一时期或稍后一个时期出现在里沃的市场上。虽然史料对此避而不谈，但是它们在那时的波兰各地确实是很流行的。1472 年给里沃颁发的一份准许他们开办市场的特许状中提到了作为重要贸易品的波兰和波希米亚的布。也许这些出口到东方的产品的数量在 15 世纪增加了，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想像它们居然曾经替代了西方的纺织品。从普鲁士和黑海城镇来的商人也把波罗的海琥珀和波希米亚与纽伦堡的金属品带到里沃和俄罗斯西南部的其他城镇。俄罗斯的蜂蜡、毛皮和胭脂也因此而从卡发出口到意大利的纺织品生产中心。在这个时期末，除了里沃和卢布林外，从布格和卡明尼克·波多尔斯基的布尔泽斯（布雷斯特）来的富裕商人也在从事与东方的贸易；基辅，尽管早期曾辉煌一时，但是在这一时期的贸易中只占一小部分。

可以假设，小波兰和俄罗斯西南部在与东方交易中可能处于逆差之中，就像它们在下一个世纪的情形一样。从 1466 年起，克里米亚市场上奴隶的数量增加了：他们是被鞑靼人从俄罗斯的西南部市场上带来的，后被卖给热那亚人和土耳其人，然后被带到埃及和叙利亚，可能也有一些奴隶被带到意大利和地中海其他的基督教国家。在这个时期和以后的时期内，热那亚人常常驱赶着从卡发和高加索买来的奴隶穿过俄罗斯西南部和小波兰，并且从 1461 年起，他们按人头给波兰国王支付过境税。[2]

没有理由说是因为卡发在 1475 年被土耳其人征服以及他们在 1481 年对贝格罗德和奇利亚的占领而使得波兰与东方的贸易陷入了长期萧条之中。里沃离君士坦丁堡更近了，后来离小亚细亚的贸易中心也更近了。也没有证据说明是因为葡萄牙人发现了通往东方的道路而导致了波兰与近东经济联系的急剧转型，虽然最近的研究表明当时在这个领域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

【557】 外国商人资本在 13 世纪开始积极地侵入波兰，但是这一过程的最高峰是在随后的两个世纪。这可能是小波兰和俄罗斯西南部——这个现象发生最显著的两个地方——在中世纪经历了一段快速发展时期的原因之一，而大量外国资本流入显然对此做出了贡献。西欧许多国家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阻碍使

---

① *Hansisches Urkundenbuch*（10 卷本，哈勒—慕尼黑—莱比锡，1876～1918 年），第 3 卷，第 559 页注；萨特勒：*Handelsrechnungen*，第 33 章，第 136、157 页。【21】

② L. 凯尔维佐娃（Charewiczowa）：*Handel średniowiecznego Lwowa*（利沃夫，1925 年），第 53、89 页；M. 马洛维斯特（Malowist）：*Kaffa-kolonia genueńska na Krymie i problem wschodni w latach* 1453～1475（华沙，1947 年），第 52～56 页、69 页及以后、76 页。【22】

得纽伦堡、德意志和意大利商人转到贸易飞速发展的波兰。这个国家给他们提供了许多便利，它既是一个手工业品的市场也是许多本地和东方产品的供应源地；它那不断发展的矿业还为很多想赢利的资本投资提供了许多机遇，而且，最后，与波兰的联系开启了通往黑海的门户。1365年，纽伦堡商人获得了特许状，准许他们只缴普通赋税就可以自由贸易。① 值得一提的是，纽伦堡的居民这一时期在西方和波希米亚享受了无数的关税豁免，他们不仅接受了波兰提供的条件而且极大地扩大了他们在波兰的活动规模。14世纪和15世纪初，纽伦堡小商人在小波兰和俄罗斯西南部十分活跃地供应着廉价金属品，比如针、剪刀、小刀等，但是除了这些外，他们也出售德意志和尼德兰的布、北德意志的粗斜纹棉布等。从纽伦堡1444～1445年的书信集和其他的资料来源可知，这种活动导致了波兰和普鲁士城镇手工业者的激烈反对。② 这些小商人是那些在15世纪后半期涌入波兰并在那里建立代理机构的北德意志富裕商人的先锋。在这一时期，他们主要给西里西亚、小波兰和俄罗斯供应西南德意志的商品，以及许多从威尼斯来的东方商品。在波兰他们购进羽毛、毛皮、蜂蜡、胭脂虫红③，后来还从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购买牲畜，而且这种交易的频度越来越快。④ 根据H. 安曼（Ammann，H.）的观点，14、15世纪纽伦堡商人也从小波兰和俄罗斯西南部到达黑海和君士坦丁堡；⑤ 但是，波兰的资料表明，在波兰使他们感兴趣的主要物品是波兰、俄罗斯和立陶宛的产品。在14世纪特别在15世纪期间，许多从纽伦 【558】 堡、德意志北部和阿尔萨斯来的富裕商人在克拉科长期定居。他们不仅把资本投放于贸易而且广泛地投放在铅、银和盐矿的开采上、城市房产和买田置地上。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像博内尔人、莫尔什滕人、伯尔人、基辛格人和许多其他地方的人，很快就波兰化了。其中的一些还在财政管理上取得了很高的地位并进入了贵族之列。

意大利人对波兰南部的渗透也有类似的特点。意大利人在13世纪出现

---

① J. 普塔斯尼克（Ptaśnik）："Akta norymberskie do dziejów handlu z Polska w XV wieku" in *Archiwum Komiski Historycznej Polskiej Akadmii Umiejetnoséi*（克拉科，1909～1913年），第10章，第296页。【23】

② M. 斯考茨—巴比斯克（Seholz-Babisch）：《1444年以后德国及波兰东部以商业汇票进行的上德意志贸易》，*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 Geschichte u. Alterthums Schlesiens*，第64期（1908年），第66、67页。【24】

③ 一种用雌胭脂虫的干体制成的红色染料。——译者注

④ 上引书，第61、62页。【25】

⑤ H. 安曼（Ammann）：《中世纪上德意志和波兰的贸易关系》，*Vierteljahhschrift f. Sozial- u. Wirtschaftsgeschichte*，第48期（1961年），第433～443页。【26】

在西里西亚和小波兰，他们当时的身份主要是与佛罗伦萨、阿斯提、卢卡和比萨的银行有关的教皇的收税人（这其中有巴第公司）。14 世纪收集来的赋税通过弗罗茨瓦夫的克拉科商人汇给意大利人在布鲁日开的贸易代理人。随着波兰南部到黑海的贸易路线的扩展，越来越多的佛罗伦萨人和威尼斯人、热那亚人访问波兰，甚至不断有人到那里定居。他们的兴趣也不仅仅局限于贸易。长期以来，他们租赁伯克奈和威里卡的王室盐矿，在奥尔库什和切比尼亚地区投资铅矿。一些人比如从热那亚来的冈弗雷多·法蒂南（Goffredo, Fattinanti）在克拉科定居；他承租王室的铸币厂，购置了许多城乡地产。15 世纪前半期，在波兰活动的热那亚人不那么多了，但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他们再度活跃起来，特别在里沃和俄罗斯西南部尤其如此。德·维勒塔里斯家族（De Veletariis family）的成员克里斯托夫罗·蒂·桑罗默诺、洛伦佐·罗梅里诺和其他人在俄罗斯西南部和小波兰大量投资于盐矿，购买了许多农村地产并获得了在里沃征税的特权。

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的流入是 15 世纪小波兰和俄罗斯西南部经济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佛罗伦萨人——经常与纽伦堡、弗罗茨瓦夫和克拉科的商人一起合作——经西南路线向弗罗茨瓦夫出口意大利和黎凡特的商品，他们大量买进胭脂虫红、立陶宛和俄罗斯北部的毛皮、羽毛和蜂蜡。他们也投资于盐矿和铅矿。他们还购置了许多地产——特别在克拉科夫——15 世纪后，意大利人在那里拥有的土地数量大大增加。[1] [559]

人们常常谈到尼德兰和英格兰的布在小波兰和俄罗斯西南部的贸易中的重要作用。佛兰德的许多产品，与德意志纺织品一起，在 13 世纪必定是经陆路从西里西亚渗透到维斯图拉河以北的地区的。13 世纪后半期，波兰南部和佛兰德之间的联系更经常了。这个世纪进口到布鲁日的商品名单——前面引用过——提到"从波兰王国运来了一船船的金、银、蜂蜡、灰色或花白的松鼠毛皮"。[2] 产于西里西亚或匈牙利的金银被出口到克拉科。蜂蜡和毛皮既可能产于波兰也——似乎更可能——产自匈牙利或俄罗斯。因此，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一事实，即在 13 世纪末一些金属和奢侈品从波兰出口到布鲁日；而这可能不仅仅是零星的少量贸易；否则这些商品就不可能在布鲁日出现的商品中经常被提到。

14、15 世纪，小波兰和俄罗斯西南部出口到佛兰德的商品种类得到了

---

① J. 普塔斯尼克：*Kultura wloska wieków średnich w Polsce*（第 2 版，华沙，1959 年），第 23～117 页。【27】

② *Hansisches Urkundenbuch*，第 2 卷（原文如此——译者注），第 264 页，注 1。【28】

极大地丰富。匈牙利的铜，还有部分的铁、毛皮、羽毛和波兰的铅成为固定的商品。最后，还有一小部分银可能经小波兰和普鲁士到达佛兰德。但是14世纪，经普鲁士从里沃和克拉科来的黎凡特东方商品对佛兰德的出口增加了。在该世纪末，克拉科商人出口棉花、丝绸、明矾、胡椒粉、生姜和藏红花粉到佛兰德。与此同时，主要在里沃——不过在卢布林也一样——所有这些商品也都可以买到，买主是来自普鲁士的商人和条顿骑士团商业代理机构的商人。在15世纪，东方商品从波兰到尼德兰的出口似乎稍微有些下降，这是由于黑海城镇供应减少的缘故。在14世纪甚至可能更早，少量木材经喀尔巴阡山出口到佛兰德，尽管这个地区的著名紫杉往往出口到英格兰，再在那里加工成十字长弓。林产品以及后来的谷物对尼德兰北部和英格兰的出口之所以能得到快速发展，依靠的不是波兰南部的资源而是这个国家中部和北部的资源。【560】

显然，布成了小波兰和俄罗斯西南部从佛兰德进口的大宗商品：最初，是根特、伊普尔和布鲁日昂贵的纺织品。后来到了14世纪末更多地则是从马林、布鲁塞尔和勒芬等地来的布出现在克拉科的集市上。14世纪从佛兰德小城镇和尼德兰南部其他地区进口的中等质量的布在波兰各地的重要性不断增加。14世纪末至15世纪，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纺织品逐渐地失去了顾客，分别让位于英国布和荷兰布。但这些商品间的竞争在15世纪后半期并没有最终结束。[①] 除了布以外，其他商品如法兰西和西班牙的水果和葡萄酒，也从佛兰德运到了小波兰和俄罗斯。

14世纪，克拉科参与对佛兰德贸易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从保存到现今的不少关于富裕的克拉科小商人长途跋涉到布鲁日去的记录中我们知道教皇收税人经常委托他们把钱转到那座佛兰德大城市。克拉科商人组成了特殊的公司以积极从事这种与佛兰德的贸易，虽然这都是相对短期的合同。[②] 那时克拉科被认为是汉萨同盟的成员，它虽从这种权威中获利，但它仍然没能完全认同联盟的政策。残酷的争斗在后面还要描述，从14世纪起，克拉科商人与托伦商人为此交战。但是似乎至少到15世纪初，托伦商人仍主导了波兰与西北欧的贸易。他们不仅渗透到克拉科、桑多梅日、里沃而且还到了匈牙利。15世纪，在这一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托伦逐渐地衰落了，

---

① 库尔茨巴："Handel Krakowa w wiekach średnich"，第26、27页；Ch. 维尔林顿（Verlinden）："Brabantsche en vlaamsche laken te Krakau op het einde der XIV eeuw"，in *Mededelingen van der konniklike Vlaamsche Akademie*（1949年），各处。【29】

② 马洛维斯特："Le Développement"，第1039、1040、1047、1049页。【30】

没有能力抵抗更强大、地理位置上更有利的格但斯克的竞争。该世纪的前半期，克拉科商人用船把他们的商品源源不断地从格但斯克运到佛兰德。与此同时，在争夺海上自由贸易的战争中，他们对王国内的其他城镇起着领导的作用。[1] 但是后来，他们从这种商业中撤退了，这可能是因为匈牙利铜对波兰的供应下降所致，这种金属成了从尼德兰向小波兰出口的替代物。波兰与西北欧的经济联系在那时已经有了全新的特点。

[561]

8.2.5 结论

对中东欧南部国家贸易的概略描述表明，13 世纪和 14 世纪这个地区内的商品交易有了显著的增长，尤以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为甚。14 世纪小波兰和俄罗斯西南部的贸易增长速度也加快了，而且在随后的一个世纪，当波希米亚王室遭到严重的倒退时，它们仍继续增长。直到 15 世纪后半期，波兰南部一些省份在贸易方面才显示出衰败的症状。

必须强调的是，正是在 14 世纪西方经历经济困难时，以苏台德和喀尔巴阡山脉为轴心的地区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这点在贸易领域有特别清楚的表现。我们所讨论的国家的经济结构显示了许多共性。因此，整个时期的特点是农村经济有相对快速而统一的增长并有逐步城市化的倾向。已经可以证明金属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开发对普遍的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商品交换也有积极的影响。我们也强调了这种庞大的贸易干线结构对整个地区的经济生活尤其对西里西亚、小波兰、匈牙利北部和后来发展起来的摩尔达维亚和瓦纳几亚的重要性。

苏台德—喀尔巴阡山地区的普遍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吸引了外国资本和拥有这些资本的商人，他们毫无疑问刺激了外国商品进口。我们知道这确实是 13、14 世纪的事情，但在小波兰和俄罗斯西南部，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随后的一个世纪。贸易和采矿的扩展因此加速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外国的竞争，本地手工业的发展遭到了严重的阻碍。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危害，因为市场能不断地消化这些供应。

[562]

欧洲这一部分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导致了 13 世纪强大统一的国家的形成。波希米亚成为一个重要的强国；波兰——在 14 世纪再一次统一——以南部地区为基地力量飞速增长。14 世纪和 15 世纪波希米亚和小波兰由于与

① 库尔茨巴：“Handel Krakowa”，第 39、44、45、47 页。【31】

意大利有紧密的联系也经历了文化方面的快速发展，同时尼德兰和德意志南部在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早期也对波希米亚和波兰的文化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8.3　中东欧北部的贸易：大波兰、波美拉尼亚、普鲁士和马索维亚

现在转向中东欧北部的贸易。应该强调的是，北方在许多方面与南方相比较要不利一些，在自然资源方面尤其如此，它的自然资源只局限于波美拉尼亚西部和库贾维的科沃布热格附近的盐矿及许多地方发现的低质铁矿。就贸易路线考虑，中世纪后期某种程度的转变反映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转型的过程。到13世纪，波罗的海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它是海上贸易的通道，而且也是人们向北部地区移民的重要路线。在某种程度上联系尼德兰、立窝尼亚（Livonia）和俄罗斯的贸易中心之间的滨海路线也一样重要。稍微往南，另一条平行的路线从佛兰德和科隆经威斯特伐利亚、萨克森南部、勃兰登堡、大波兰甚至远至维斯图拉河河口。但13世纪和14世纪这些陆上路线经济上的重要性却不能与南部地区的贸易路线相比。

P. 约翰森正确地注意到这一事实，即沿所谓的布鲁日—诺夫哥罗德轴心的贸易对沿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汉萨城镇的经济生活的影响在早期的史料里被强调得过分了。①这些城镇要是没有与各自巨大的腹地之间的联系，压根儿就不会繁荣起来。这不仅对汉堡和吕贝克是正确的——且这一事实最近被着重强调过——而且对波美拉尼亚西部和东部城镇也同样正确。【563】早在13世纪，就已有陆路联系奥德河和维斯图拉河河口和它们深广的腹地，使得这里与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小波兰、匈牙利和黑海地区的联系成为可能。14世纪中期起，对这些路线的控制成为波罗的海城镇和它们的南部竞争者和敌手之间苦苦相争的一个原因。水路，尤其是奥德河和维斯图拉河及其支流，在13世纪和14世纪的经济意义十分有限。因此，这一时期滨海地区和南部国家的商品交易中的大部分产品是适合于陆路航运的重量轻、价格贵的商品。经弗罗茨瓦夫把维斯图拉河河口和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奥地

① P. 约翰森（Johansen）：*Der hansische Russlandhandel, insbesondere nach Novgorod, in kritischer Betrachtung*（科隆—奥普拉顿，1962年），第45、46页。【32】

利联系起来和经克拉科、桑多梅日与匈牙利和俄罗斯西南部联系起来的陆路比维斯图拉河及其支流要重要得多。奥德河地区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不一样的。

这种状况的逐步改变直到14世纪末15世纪初才开始，最初是森林资源，接着是波兰中部和立陶宛不断增加的食物供应在这个地区的内外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这点上讲，发展水路的必要性上升了。在这些改变了的条件下，水路网络（主要是维斯图拉河及其支流，但还有尼曼和西戴维纳）非常有助于把波罗的海海滨和它的整个南部腹地的经济统一起来，尽管这一过程遇到了很大的经济和政治阻碍。

像南部地区一样，中东欧的北部地区在13世纪是一种典型的农村经济，农业经济得到广泛深入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进度在各处并不一样。在12世纪的波美拉尼亚西部和勃兰登堡东部，德意志新移民对农业定居点的迅速、密集开发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随后的一个世纪这种现象也扩展至波美拉尼亚东部和大波兰。但是在人口稀疏而落后的马索维亚并没有多少这样的定居点。必须指出14世纪在这一地区的最西部，定居点和农村经济出【564】现了灾难性的瓦解，一些现代学者把导致瓦解的原因归结为在波美拉尼亚西部和勃兰登堡薄土上使用了不合适的沉重农具。① 但是，在大波兰和维斯图拉河河口周围的农村定居点继续发展，不过从德意志来的移民完全停止了。对于15世纪初条顿骑士团领地出现的农村经济危机迹象我们还不能用纯粹的经济原因进行解释。正是在这一时期，马索维亚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不久立陶宛也赶了上来，它们刚刚摆脱了条顿骑士团的经常掠夺——他们曾在14世纪和15世纪初期不断地进行骚扰。

尽管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是发展中的农村经济的确在13世纪刺激了城镇的增长，当然，落后的马索维亚除外。波美拉尼亚西部旧城镇在11、12世纪的扩展和其他地区的城镇定居点数量相对众多足以证明这一点。城镇定居点的繁荣吸引了德意志移民，对波美拉尼亚和勃兰登堡而言更是这样，对大波兰就要差一些。马索维亚的城市化则来源于它的本地人口。

如前所述，从贸易的观点来看，大波兰和邻近的勃兰登堡地区在13世

① B. 齐安塔拉（Zientara）：*Kryzys agrarny w Marchii Wkrzańskiej w XIV wieku*（华沙，1960年），第181页。【33】

纪比位于苏台德山脉和喀尔巴阡山山脉附近的地区更差。缺乏自然资源和重要的贸易路线导致了这一时期这些国家的增长率速度比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和小波兰要慢得多。在这里，由日耳曼法导致的农村社会转型比南部波兰要慢得多。农民对其领主的实物地租向货币支付转变的过程也要慢许多。这表明城乡经济之间的联系要比南部弱一些。同时整个北部的城镇也相对较小。波兹南，这个15世纪初大波兰的主要城市，人口还不到4 000人，远远地落在克拉科和弗罗茨瓦夫的后面。[①] 根据目前十分有限的研究，现只可以这样假设，即13世纪和14世纪，大波兰和邻近的库贾维的城镇的发展，像勃兰登堡东部领土的那些城镇一样，完全是建立在农业耕作、庄园经济和森林活动的基础上。奥德河上的法兰克福是个例外，因为它位于从奥德河河口向南到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道路上，并且处在东西交通要道的焦点，位置比较独特。13世纪所谓的 *schonlaken*（也许是佛兰德的布）就已经在那里出现了。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法兰克福商人有时也到达布鲁日。大约1351年，霍科曼兄弟（Hokemann brothers）公司甚至往那里派遣了代表。[②] 波兹南在1253年就已采用了“马格德堡法”，后来它还获得了在整个公国的税收豁免权。它是大波兰最活跃的一个城市。尽管这样，它的发展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从它在1390年所获取的权力中受益，它在那时就已经获得了在波兰设计的“佛兰德大道”的特产权：这条道路计划经大波兰把小波兰与波美拉尼亚的西部港口联系起来，成为波兰与尼德兰贸易的可能起点。 【565】

我们对大波兰在13、14世纪的贸易了解甚微。王室于1283年给它颁发了特许令，指望着那些被描绘成 *panni nobiles et non nobiles* 的东西会有朝一日经过从西方到弗沃茨瓦韦克和波美拉尼亚的路线。[③] 这可能是指佛兰德的布和德意志的次等原料。在这个文件中提到在波兹南和格涅兹诺有外国商人在卖葡萄酒。但值得怀疑的是，这一时期的大波兰是否有能力进口任何较大数量的外国奢侈品，因为它可能缺乏支付能力。13世纪末，或者稍后一些时候，联系条顿骑士团的普鲁士和西里西亚、波希米亚以及奥地利的贸易路线可能对大波兰西部的经济繁荣有一些影响。这条道路通过大波兰和西里西亚的边界地区，这里有西里西亚初获发展的布业，虽然毫无疑问还很原始。

在这个问题上，波兰的资料中很少有相关的信息。现在由于有沃肖尔、

---

① 《波兰史》，I，I，第509页。【34】
② 马洛维斯特：《发展》，第1015页。【35】
③ 马洛维斯特：《发展》，第1056、1059页。【36】

格劳斯、H. 安曼和马扎克的研究结果，可以假设在14世纪的大波兰—西里西亚边界两面都存在布业的发展，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科希强、缅济热奇和维斯科瓦建立得更早。假如考虑到这些纺织品的大致产量，我们可以假设在【566】14世纪它们已开始制造，主要在大波兰的东部地区谢拉兹、布尔津尼（Brziny）和文奇察附近进行，后来这里的布业发展得很好，生产更便宜的所谓农民布。格劳斯认为“波兰布”这个词也包括便宜的西里西亚产品。但是必须提到在波兰本地，地方产品与西里西亚产品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很显然，14世纪前半期，波兰布是布拉格、库特纳霍拉和摩拉维亚的布尔诺和波希米亚城镇的主要贸易商品。可能在1335年左右它就从维也纳出口到了施蒂里亚、卡林蒂亚和威尼斯。14世纪中期，它出现在匈牙利的布达，并从那里转运到特兰西瓦尼亚。西比尤和布拉索夫（Brasŏv）在1412年的关税表提到这种商品。它从特兰西瓦尼亚出口到瓦拉几亚。15世纪后半期，对卡发的出口也要考虑在内。在西方，苏黎世1379年和1400年的关税税则中提到过它。这种布可能从14世纪的后半期被出口到普鲁士，该世纪末，普鲁士商人在把它出口到诺夫哥罗德时却遇到了吕贝克商人的抵制。这种灰色的波兰布在15世纪对普鲁士的出口中达到了相当大的比例，在随后的岁月里情况继续如此。在同一个世纪里，我们也发现它出现在萨克森、维也纳、布拉迪斯拉发和扎尔茨堡，同时它也从奥地利出口到威尼斯。①

我们可以从所有这些文献中推论出波兰布被归为最便宜的毛织物之列。它经常被描述成厚重的，灰色、白色或未染色，但是有时它似乎又是蓝色、红色等色。问题从中就产生了，即当运费如此之高时为什么要运如此质量低、如此便宜的布到远方去。可能的情况是，在中世纪后期有相当数量的穷人集中居住在城镇里，因而对这种劣质布的需求增加了。普鲁士资料清楚地指出，正是这一群体成为波兰布的顾客。② 也有可能出口商从14世纪波兰货币的剧烈贬值中获利：由此而来的买卖差价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可观的收【567】入。因为大波兰的商人在13世纪和14世纪无力竞争，布业贸易主要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特别是普鲁士和西里西亚人手中。在稍晚时期，波兹南富裕的犹太人在这种贸易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无论如何，远程贸易显然是大波兰布

---

① A. 沃斯乔尔（Warschauer）：*Geschichte der Provinz Posen in polnischer Zeit*（波兹南，1916年），第150页；格劳斯：*Česky obchod*，第105、106页；安曼："*Wirtschaftsbeziehungen*"，各处；A. 马克扎克（Maczak）：*Sukiennictwo wielkopolskie XIV - XVII wieku*（华沙，1955年），第200、201页，第222页及以后。【37】

② M. 马洛维斯特："Podstawy gospodarcze przywrócenia jedno śei panstwowej Pomorza Gdańskiego z Polska w XV wieku"，*Przeglad Historyczny*，第45期（1954年），第161、162页。【38】

业扩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刺激因素，因此，使该地区很便利地参与到这种贸易之中。

这些主要是流向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出口，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导致了银币流向大波兰。后者在 14 世纪的波兰国内占据次要地位，但在 15 世纪里逐步获得了相对重要的政治也许甚至还有经济上的权力。应该注意，至少从 15 世纪初起，纽伦堡商人带着他们的商品在大波兰出现，吸引他们的原因是：这个地区不仅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而且还是可以买到本地产品和立陶宛、俄罗斯产品的地方，关于后者我们在后面还有讨论（第 580 页）。① 更多的迹象表明 13、14 世纪沿波罗的海海滨的经济增长要比紧邻南部的内地快。德意志移民在这里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们在波美拉尼亚西部得到当地政权的支持，在东北部得到条顿骑士团的支持。只要加入了骑士团，德意志贵族的子孙就可以以其成员身份在波罗的海地区找到一份有利可图的活计。德意志的经济和政治扩张在波罗的海地区各地并不一样，但是它处处都以当地人口沦入更低的社会地位为代价。容里格毫无疑问夸大了吕贝克在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小商人定居点的组织作用，不过可取的是他强调了条顿骑士团的殖民化功能。13、14 世纪，他们握有重要的军事力量，因此不仅能比那些居住在被征服领土上的人民获得更多的安全保证和相对便宜的居住条件，而且还可以获得内地广泛的经济特权。条顿骑士团和它的臣属之间的经济竞争直到 15 世纪都没有导致暴力，虽然在更早的时期就有冲突的征兆。波罗的海城镇属于汉萨同盟的事实对它们的发展无疑很重要。但 A. 冯·布兰特（Brandt · A. von）正确地指出汉萨同盟是个很松散的组织，【568】它的成员甚至各城镇的利益差异也是十分严重的。② 冯·布兰特的观点可以解释他所揭示的这种差异，事实上，这种差异直到 14 世纪末才出现。但很显然，我们还不能把这个同盟当成同质的城镇单元。

在波美拉尼亚西部，以什切青（斯特德丁）为首的旧城镇受到了 12 世纪丹麦和日耳曼入侵的影响。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经济扩张的新时代开始了，日耳曼人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次扩张的基础是农村经济，尤其

① 斯考茨—巴比斯克："Oberdeutscher Handel"，第 59 ~ 62 页；L. 科克齐（Koczy）：*Handel Poznania do Polowy XVI wieku*，第 226 页及以后。【39】

② A. 冯·布兰特（Brandt）：《中世纪的汉萨城镇与北欧势力》（科隆，1962 年），各处。【40】

是波美拉尼亚西部农业的快速增长以及什切青商人在斯堪尼亚海滨的丹麦渔业基地获取的强有力地位。什切青也与佛兰德和英格兰建立了联系。齐恩塔拉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他认为吕贝克和其他汉萨城镇的商人因占有粮食供应而获得了对挪威经济的控制，这些粮食绝大部分原产于波美拉尼亚西部，也有部分粮食从那里运到佛兰德甚至可能到了英格兰。无论如何，什切青13世纪和14世纪深深地卷入了对粮食出口垄断的争夺中。它成功地利用了靠近奥德河河口的位置，而这对施塔加德和其他城镇来说则是一个严重的损害。那时什切青也是波罗的海鲱鱼和低地国家的布运到南方的重要中转站。科沃布热格一度是贸易和食盐销售的重要中心，在这一时期它的重要性降低了。它的盐场在波罗的海地区经济和人口增长时期产量太少，无法同吕贝克商人从吕纳堡（Lüneburg）周围地区进口的盐进行竞争，后来也不能同来自于布列塔尼（Brittany）的布尔讷夫湾盐进行竞争。

14世纪波美拉尼亚西部农业经济的崩溃对它的城镇是沉重打击。什切青和一些小贸易中心的地位在恶化，而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西部有权势的贵族甚嚣尘上、无法无天的行为使这种形势每况愈下。波美拉尼亚王公反对勃兰登堡小贩扩张的斗争也起了负面的作用。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在勃兰登堡统治者的支持下，利用特产权封锁了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道路。所谓[569]“新长征”的长期无政府状态使得与大波兰的交通更加困难。条顿骑士团在15世纪初获得了对“新长征”的控制，这打乱了1390年制定的计划即强迫波兰与佛兰德贸易沿着通往波美拉尼亚西部的港口进行的计划。我们必须假设15世纪前半期斯堪尼亚海滨对鲱鱼的捕捞也对波美拉尼亚西部城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它的较小的港口在15世纪成为海盗的避难所。但是此时已到该地购买粮食的荷兰人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农业的恢复。然而，这种状况距形势较大改观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幸的是，对波美拉尼亚西部历史的研究仍处在初级阶段，在未来将可能有许多令人惊奇的事情被发现，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图景是否会根本改变还不能肯定。

波美拉尼亚东部的情形大不相同。13世纪，就经济上来讲它远远落后于它的西部邻居，而与大波兰有那么一点类似。在该世纪，吕贝克商人开始出现在格但斯克，1298年他们从波美拉尼亚王公那里获得了建立一个贸易代理处的特权，甚至在更早的时候他就授权他们取道他的国家前往俄罗斯西南部和匈牙利。当时，从波兰中央区运来的一些粮食已经由维斯图拉河到达了格但斯克，可能主要用于国内消费，但是似乎科沃布热格的少量盐，从尼

德兰来的布、鲱鱼、葡萄酒等都被运到了相反的方向。

1230 年条顿骑士团在征服了切尔姆诺（库恩）［Chelmno（Kuhn）］地区之后，开始系统地征服普鲁士，同时还大力地改进日耳曼农村和城市的殖民化。这个地区不论是老城镇还是新建立的城镇，比如托伦（索恩）、爱尔布拉格（埃尔布隆格）、切尔姆诺（库恩）和其他一些城镇，在 13 世纪都开始发展起来。科尼格斯堡在普雷格尔河口逐步形成。在它的发展初期，条顿骑士团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库贾维这个物产丰饶的波兰边境邻省的供应。后来尽管在农业方面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条顿骑士团可能和其他的南部边界城镇仍然继续从邻近的波兰国土上获得牲畜、毛皮甚至还有部分粮食——这一点可完全为 15 世纪前 25 年的资料所证明。[1] 【570】

13 世纪后半期，托伦和爱尔布拉格积极从事海上贸易，托伦商人肯定已经渗透到了波兰和俄罗斯西南部，也许还到了匈牙利。1308～1309 年条顿骑士团控制了维斯图拉河河口地区。

尽管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的文字记载，但 13 世纪和 14 世纪前半期有关条顿骑士团统治下的普鲁士经济史仍不甚为人所知；所能得到的材料价值也不大。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在这个地区内，条顿骑士团国家的钱财最早、最广泛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生活在日耳曼法之下的农民以货币来缴纳他们的租税，而在波兰法的统治下生活的农民很快就效仿。支付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仅对生活在普鲁士法下的农民很重要。普鲁士城乡间确实有经济联系，这就解释了农民怎样赚钱缴纳货币地租。但是，还没解答的问题是普鲁士在自己几乎没有金属矿藏的情况下，从哪里获得了铸造优质货币的白银。对外贸易可能是为它供应金属的惟一来源，而这就表明了它在这个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确实，在条顿骑士团的统治下，普鲁士经济中货币基础性作用和广泛使用意味着我们必须假定远程贸易的支付平衡不可能长期处于逆差地位，到了 13、14 世纪大多是顺差。普鲁士货币流出的第一次严重经济危机是与它的贬值相联系的，这是 1410 年条顿骑士团军事失败所带来的后果，而这也正好与波兰和立陶宛的贸易遭到极大地破坏相吻合。

13 世纪，特别是 14 世纪，托伦、爱尔布拉格、格但斯克与布鲁日和伦敦既保持着直接的联系，也保持着间接的联系。它们先是从根特和布鲁日进

---

[1] 马洛维斯特："Le Développement，"第 1060 页；马洛维斯特："Podstawy...，"第 159 页。【41】

口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伊普尔、波铂林赫、库特赖和许多其他更小的佛兰德和布拉班特中心进口的布似乎占了主导地位。14世纪后半期从英格兰运来的粗绒布和其他英格兰布得到了广泛发展，随后大量的荷兰布也出现了。

13、14世纪，法兰西和西班牙的葡萄酒被从佛兰德出口到普鲁士，在这一时期末，普鲁士不断从布列塔尼大量进口盐，从普瓦图、加斯科涅和西班牙进口葡萄酒，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进口南方的葡萄酒和水果。14世纪末，[571] 普鲁士开始从里斯本进口少量的盐。但布无疑在进口中占主导地位。尽管本身也积极地参与经丹麦海峡对尼德兰和英格兰的海上贸易，普鲁士人这一时期还是在吕贝克和其他的“温迪西”城镇买卖许多的商品。吕贝克是普鲁士重要的贸易伙伴。普鲁士人从瑞典和丹麦买进鱼特别是鲱鱼、油脂、瑞典铁和一部分铜；但对于这两个国家，普鲁士人较之于吕贝克商人而言只起一种不太重要的作用。在诺夫哥罗德也一样，普鲁士贸易在14世纪不仅不能与吕贝克商人相比，甚至也不能与立窝尼亚商人相比。像汉萨同盟的其他成员一样，普鲁士人在俄罗斯向西方出口毛皮和蜂蜡中扮演着代理商的角色。在向立窝尼亚和诺夫哥罗德出口布和其他商品时所扮演的角色也一样。但到14世纪末，普鲁士人的重要性特别是作为条顿骑士团代理商的重要性，在俄罗斯市场上已经非常大；确实，就像勒斯尼科夫和克诺希克维奇所认为的那样，条顿骑士团在那时对诺夫哥罗德而言是主要的白银供应者之一。① 15世纪，格但斯克商人与波洛茨克、普斯科夫，尤其与诺夫哥罗德发展起了很积极的陆上贸易，这就激起了立窝尼亚和吕贝克商人更强烈的抗议。但完全有可能，特别在13、14世纪，正是地方商品和经波兰来的匈牙利和俄罗斯西南部商品构成了普鲁士远程贸易的真正基础。合理的假设是，在这一时期，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布从布鲁日向普鲁士的大量出口如果没有匈牙利的铜和在克拉科和里沃为布鲁日市场所获得的东方商品供应是不可想像的。条顿商人也可能在13世纪和14世纪初就已经到过俄罗斯的西南部、西里西亚和匈牙利，因为这时交通设施已经建立起来了。14世纪上半期在托伦所画的通往沃尔亚尼亚的弗拉基米尔和里沃的道路图通过区别新老道路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该图也提到根特、伊普尔和布鲁日的布和托伦的毛料（半

---

① M. P. 列森柯夫："Torgovye snoshenya V. Novgoroda s Tevtonskim Ordenom"，*Istoritscheskye Zapiski*，第39期（1952年），第262页；A. L. 霍洛斯柯维奇：*Torgovla V. Novgoroda s Pribaltikoy i Zapadnoy Evropoy*（莫斯科，1963年），第281页及以后。【42】

价）是对俄罗斯西南部出口的仅有物品。[1] 从许多其他的资料中我们知道胡椒粉、生姜和其他香料以及丝绸和棉料先是从维拉蒂默后是从里沃带到托伦；其中的一些还要再出口，主要是流入佛兰德。【572】

甚至在14世纪初，我们对普鲁士与匈牙利贸易的情况仍几乎一无所知。但匈牙利北部的铜和银在13世纪就已到达布鲁日，毫无疑问的是，普鲁士人在这种贸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克拉科肯定担心普鲁士的竞争，因为自1306年它就已获得了对匈牙利铜的特产权，虽然不久就被剥夺。在14世纪的最后几年，来自匈牙利的铜和一些银的进口是普鲁士贸易的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对托伦商人更是如此。普鲁士人还从匈牙利进口蜂蜡和毛皮，从小波兰进口铅、银、胭脂虫红，从喀尔巴阡山地区进口一些很贵重的紫杉。14世纪中期，波兰国王卡西米尔大帝（Casimir the Great）在征服了俄罗斯西南部后，可能与克拉科商人订立了秘密协定，试图封堵普鲁士和弗罗茨瓦夫商人使用的通往西方的道路。他极有可能想把他的首都克拉科变成一个东方和波罗的海地区之间的贸易中心，但这个计划从没有实现过，因为条顿骑士团获得了另外的一个为他们的臣民进行东方贸易的门户，虽然不那么方便。

在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自由贸易后，该世纪末情况开始改变。由于得到王室支持，克拉科从1372年确立了它自己的特产权。波兰在这一时期已获取了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不仅帮助它的商人争夺对匈牙利和东方贸易的主导权，而且也积极地为他们到西北欧的发展清理道路。其中之一就包括1390～1391年试图打通从克拉科到前述波美拉尼亚西部港口的“佛兰德道路”，尽管这个努力没有成功。托伦在条顿骑士团的支持下利用他们在1403年获得的特产权，完全地支配了从克拉科经格但斯克到佛兰德的贸易远征。这种贸易上的冲突与波兰对条顿骑士团的战争相互交织。1410年在格伦沃尔德（Grunwald）一役中波兰和立陶宛对条顿骑士团的胜利不仅对东北欧的政治重建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而且条顿骑士团及其臣民的贸易也被迫处于防守地位，托伦没有了条顿骑士团的帮助开始衰落。从那以后，格但斯克成为波兰在普鲁士的主要贸易伙伴，两个国家的经济联系获得了新的基础。【573】

13世纪特别是在14世纪，本地商品包括农林产品在普鲁士与西方贸易

① *Hansisches Urkundenbuch*，III，第559页注。【43】

中的重要性明显地增加。那是这一时期普鲁士经济和人口快速增长的结果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尤其如此。多亏有条顿骑士团保存完好的账目，以及其他有关城镇贸易发展的资料（其中对这一时期的记录恰好比其他时期更为详尽丰富），使得我们对这一点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普鲁士商品中最有价值的琥珀贸易，是由条顿骑士团垄断的。他们的代理人也就是所谓的谢弗哈森代理公司，与布鲁日和吕贝克的念珠制作者（rosary maker）行会缔结了长期协定，给他们供应琥珀。除此之外，他们还出口琥珀到其他的城镇，特别是到里沃和卢布林以及东方的贸易中心，在那里它被卖到当地商人和来自黑海各港口的来访者手里。

很难准确地说是在什么时候普鲁士开始出口农产品。14世纪末，这可能已经是其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物品。客户最初是英国人，后来主要是在普鲁士的荷兰商人。从15世纪初起他们也开始向挪威、英格兰和其他地区供应黑麦和小麦。[①] 佛兰德在这种贸易中不甚积极，因为它手中有大量的西方粮食。虽然有关从普鲁士粮食出口这一问题的直接资料甚少，但现存的证据仍然可以间接地证实这一点。因此，从14世纪末15世纪初开始，普鲁士商人就开始频频抗议条顿骑士团想要支配甚至垄断粮食出口的计划。这里所说的粮食可能主要是指由条顿骑士团从他们的臣民手中收集来的黑麦。但对在波兰肥沃的边境省库贾维的弗沃茨瓦韦克购买的粮食的事情，在条顿骑士团的账目中也有所提及。同一资料还谈到库贾维骑士对英格兰的小麦出口。普鲁士与库贾维的经济联系历史悠久。13世纪中期，库贾维的食品供应对条【574】顿骑士团国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库贾维和马索维亚毛皮、牲畜、肉类、油脂也许还有粮食的供应对托伦来说仍是必需的。这个城镇的手工业者在1425年清楚地强调了这个事实。[②]

在这整个时期，木材及其制品——树脂、柏油和木灰等——的出口对普鲁士来说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从条顿骑士团的账目和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以来的城镇记录中得出的结论是，这种木材仅有一部分来自普鲁士本土。在这一时期，普鲁士似乎就已进口与它自产的同样多甚至更多的木材，它们来自马索维亚和波兰其他地区，比如森林茂密的拉多姆地区。在我们讨论的这一时期内，从喀尔巴阡山来的木材供应已是次要的了。它的一些出口品是壁

---

① 萨特勒（Sattler）：《贸易结算》，第21、23、77、78、96、97、120、165、201页。【44】

② 萨特勒：《贸易结算》，第201页；M. 托班（Toeppen）：*Acten der Ständetage Preussens unter der Herrschaft des Deutschen Ordens*（5卷本，莱比锡，1874～1886年），I，第36页注，第79、81页，第82页及以后，第345页。【45】

板、松树和山毛榉木材，狭板、桅杆等，此外还有大量的树脂、柏油和白蜡树木材。条顿骑士团的代理人能定期获得这些商品的供应，他们经常给承包商预付一定数量的现金以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通常在春天）能到货，因为这时维斯图拉河和它的支流最适合航运这些商品。条顿骑士团的贸易伙伴大都是社会中低阶层，要不就是来自维斯图拉河及其支流、纳弗河和布格河中游一带的马索维亚城镇商人。他们当场做交易，谈好价钱并把货物转移到格但斯克，在那里，收到预先讲好的钱数的剩余部分。通常协议包括几次交货，而且往往是长期的。[①]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汉萨同盟商人在卑尔根和立窝尼亚使用相同的系统，这一系统在那个时期在欧洲许多国家都可见到。因此，许多波兰供货者在经济上依赖于他们的债权人，但是我们不能肯定地说他们自己是否感觉受到了剥削；我们也确实没听他们抱怨过。我们在这里应该补充的一点是，稳定的供应对那些买主来说是重要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普鲁士造船业提出了大量不断增长的需要，木材及其副产品的出口不断增加，目的地是英格兰、荷兰、佛兰德，稍后也到葡萄牙和西班牙，某种程度上还到了诺曼底；另一方面，马索维亚仍很原始的经济在14、15世纪迅速发展，但无疑它仍然极端缺乏商人资本。因此，普鲁士的信贷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一般的印象是条顿骑士团是与波兰的贸易系统的先锋，虽然在15世纪初就有托伦和格但斯克的商人在做生意，然而在开始的时候规模较小。[②] 【575】

15世纪初期，波兰农林产品在普鲁士市场上不断增加的原因是波兰和普鲁士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改变，再就是这一时期内国际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马索维亚——直到这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地区——大波兰和库贾维，在经济上远远落后于这个国家的南部各省，而在14、15世纪进入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时期。农村定居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了，在整个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城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可以肯定地说，国际贸易市场对这个地区农林产品的有利形势并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但是，它肯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特别对马索维亚的发展而言是这样。森林资源的需求导致了过分的森林破坏，这种状况一直延伸到邻省波得拉查中部，但因此而被开拓出来的土地可以用来耕作。由于14世纪初期它的人口分布仍较稀疏（大约有

① 马洛维斯特："Podstawy"，第150、151页。【46】
② 马洛维斯特："Podstawy"，第157、167页。【47】

58 000 人)，东马索维亚人口迅速增加的意义特别重要。[1] 可到了随后的一个世纪，不断增加的人口已经开始不仅在国内寻找扩展的土地，而且甚至到波得拉查和邻近的普鲁士未开垦的林地去寻找土地。农业生产已经达到的水平使得波兰中部的居民从这种对外贸易中获利。15 世纪，这一过程逐渐包括了整个维斯图拉河盆地和它的支流。[2] 维斯图拉河网络在这一时期内发展起来的广泛交通有了经济上的重要意义。

这种先是林产品后来是谷物贸易的增长，可以由 14 世纪末期的资料得到证实，其增长的原因可以从英格兰、尼德兰的北部，稍后也可以从殖民扩张的葡萄牙不断上升的需求中得到解释。这就是这些国家对波罗的海土地特别是对普鲁士土地感兴趣的原因。英国人和荷兰人 15 世纪初期已与普鲁士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最初的动机可能也与这种木材资源有关系。尽管有汉萨【576】同盟的禁令，在 15 世纪某些时候，他们也从普鲁士购买成品船因而可以从格但斯克不断增长的造船业中获利。除了木材外，提到谷物的频率也不断地提高。由于这一种关系，内地贵族在 15 世纪上半期为了获得直接向英国人、特别是向荷兰人出售格但斯克谷物的权力而进行着血腥的屠杀。[3] 普鲁士商人，主要是那些来自格但斯克的商人最终成为胜利者，但是普鲁士议会的农村代表几次宣称城镇对价格的垄断将会毁掉农村人；这也许仅仅是宣传。与此同时，商人和条顿骑士团间对这种谷物贸易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它的出口更是成败攸关。遗憾的是，我们目前还难以评估 15 世纪前半期从普鲁士出口的谷物的数量。

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波罗的海地区主要是普鲁士的木材和谷物供应，构成了尼德兰北部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14 世纪末期，普鲁士城镇尤其是托伦和格但斯克从波兰进口森林产品和一部分谷物。他们也利用前面描述过的预付系统。像条顿骑士团的代理机构一样，商人也提前订购，他们主要是用现金，但有时也用尼德兰或英格兰的布。在 1410 ~ 1436 年，在普鲁士领土上进行的波兰与条顿骑士团的战争对这个国家最肥沃土地上的农业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在有些年份，普鲁士人都没有足够的食物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更没有多少可供出口的了。从波兰进口谷物成为

① 见 546 页注。【48】

② M. 比斯科普 (Biskup)：*Zjednoczenie Pomorza Wschodniego z Polska w polowie XV wieku*（华沙，1959 年），第 95 ~ 106 页。【49】

③ M. 马洛维斯特：*studia z dziejów rzemiosla w okresie kryzysu feudalizmu w Zachodniej Europie w XIV i XV wieku*（华沙，1954 年），第 421 页及以后。【50】

不可或缺的补充。我们可以附带地提到导致货币从条顿骑士团向马索维亚和其他波兰领土上流动，这是普鲁士在1411年后发生严重货币危机的一个因素。在这种危机导致货币贬值的情况下，有人尝试通过增加农民的债务负担使他们沦为贵族和条顿骑士团地产上的契约劳力。

当时，格但斯克与波兰和立陶宛间的贸易明显加强了。14世纪末期，波兰和立陶宛准许普鲁士商人在科夫诺（考纳斯）建立一个汉萨同盟类型的加工场。格但斯克商人既从事木材及其加工品的出口，同时也从事把布雷【577】顿的盐和一些布及其他商品进口到立陶宛。与此同时，波兰领土上的农林产品贸易迅速扩展，格但斯克商人广泛地利用上面所描述的那种信贷交易系统。1448年，普鲁士贵族宣称波兰向格但斯克的谷物流入由于这个价格交换系统而对普鲁士商品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①] 在这里还应提到15世纪上半期的许多资料提到过这样的事实，即几个波兰城镇自行与格但斯克发展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是迅速发展的中心如华沙、比得哥什（Bydgosz）、比得哥煦、布拉迪斯特发和其他许多地方，但在争夺海上路线中则以克拉科为首。但是克拉科并不从事任何新的贸易，尽管这一时期匈牙利铜的流入对它与普鲁士的贸易有不利影响。波兰和立陶宛城镇在这时从它们的历任统治者强有力的支持中获利，这些人主要对他们的谷物和木材出口感兴趣。波兰的灰色布和啤酒对普鲁士的供应在这一时期也增加了，从马索维亚进口的牲畜也在15世纪不断增多。

正如上面所说，15世纪前半期普鲁士经济逐步与波兰领土上的国家联系起来了，在该世纪中期，这种联系导致了政治上的统一。[②] 条顿骑士团离开维斯图拉河河口的土地和普鲁士与波兰的统一使得这种已经起步的经济发展过程变得容易起来。15世纪后半期，整个维斯图拉河盆地都参与了格但斯克与波兰谷物、木材和其他商品的贸易，但老波兰领土上的居民没有能够充分地利用这种新形势。1442年，格但斯克已经阻止了他们与自己国土上的外国商人进行直接接触，而让自己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1453～1466年战争以后都没改变。波兰国王为了颠覆格但斯克重要的财政资源，在那个时候也不再支持与普鲁士进行商品贸易。正因为这样，格但斯克商人能加强他们对波兰和立陶宛契约人的控制（尽管科夫诺的汉萨【578】

---

① M. 马洛斯维特：*studia z dziejów rzemiosla w okresie kryzysu feudaizmu w Zachodniej Europie w XIV i XV wieku*（华沙，1954年），第421页及以后。【51】

② 马洛维斯特："Podstawy"，第164页；比斯科普：*Zjednoczenie*，第106页。【52】

同盟商号破产了)，他们保持这种地位达几个世纪之久。在15世纪末与弗罗茨瓦夫进行的经济战中他们只是由于有王室的支持才获得了重要的胜利。

很难估计波兰谷物和木材出口的规模，这在我们讨论的时代末期构成了海外贸易的基础。根据比斯库普（Biskup，M.）的计算，1463年，也就是在与条顿骑士团战争的末期，沿维斯图拉河运到格但斯克港口的谷物不超过690吨：1461～1465年包括这690吨在内是5 000吨，到1465年大约是5 750吨。但是作者强调这是最保守的估计。根据桑森诺维兹的数据，1470～1475年从格但斯克出口谷物（主要是棵麦）的数字与此类似。然而，出口量在1490～1492年明显上升了：1492年出口超过20 000吨，[①]虽然根据后来的估计这种巨大的波动是由于普鲁士和波兰其他地区的丰收年成所致，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地区的价格水平波动也起了一定作用。应该补充的是，波兰林产品的出口似乎在15世纪达到了它的顶峰。这个国家自身对木材及其加工品需求的增长，肯定还有对森林的毁坏，使得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成为波罗的海林产品的主要出口者，它与格但斯克一起和里加及凯里格斯堡进行这种贸易。

格但斯克对整个波兰经济的意义在整个15世纪显著地增强了。出口扩张刺激了进口的增长，除了传统的尼德兰和英格兰布、盐和鲱鱼等外，还包括直接由安特卫普供应或在阿姆斯特丹购买的香料。尽管这样，研究表明格但斯克的贸易收支逐渐变成了顺差。[②]虽然有人对这个问题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怀疑，但上述情况说明普鲁士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贸易顺差并不是新现象。格但斯克与其腹地的紧密联系和波兰在15世纪农林牧业的增长意味着一些货币已经由维斯图拉河河口流到这个国家，而且这种趋势在随后的年份里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579]

15世纪，新的重要因素在波兰长途陆上贸易中出现了，这一定程度上是格但斯克的垄断地位及其他一些普鲁士城镇和立窝尼亚在东西欧贸易中作为中介的结果，早些时候，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了整个波兰中部特别是大波兰、库贾维和马索维亚城乡经济的增长速度。在这里，像更早的时代一样，

① M. 比斯科普："Handel wi ślany wlatach 1454～1466"，*Rocziniki Dziejow Spolecznychi Gospodarczych*，第14期（1953年），第177～179页；H. Samsonowicz，"Handel zagraniczny GdaAńska w drugiej polowie XV wieku"，第346页。【53】

② H. 萨姆森诺维齐（Samsonowicz）：*Badania nad kapitalem mieszczańskim w Gdańsku w drugiej polowie XV wieku*（华沙，1960年），各处。【54】

外国商人觉察出这种贸易机会，开始渗入小波兰，并到了波兹南、格涅兹诺和华沙。他们往往是纽伦堡和北德意志商人公司的代理人，经常出现在哥但斯克——多是经陆路穿莱比锡到达的——那时该城与纽伦堡有紧密联系的经济。格但斯克的代理商和从弗罗茨瓦夫和北德意志来的移民在华沙也很活跃，往往在那里定居下来。但是，这并不是这个波兰中部城镇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来自西部更主要是来自意大利的商业资本在那里起的作用较之在小波兰似乎要小一些。商业资本局限在远程贸易领域，但在这个领域本地商人甚至更活跃。维斯图拉河盆地的城镇居民正是在这一时期越来越经常地从事出口农林产品的活动，他们也不断地进口一些商品。至少直到16世纪中期，他们都还保持着对地方贵族的明显优势，这些地方贵族只是逐渐地开始出卖他们自己地产上的产品。

但是到了15世纪，新的令人鼓舞的贸易前景出现了，这时波兰与立陶宛大公国实现了统一，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北和中部经济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大公国的城镇，主要是维尔诺、波洛茨克、维捷布斯克和斯摩棱斯克试图与西方购买毛皮、皮革和蜂蜡者建立起直接的联系。15世纪维尔诺商人成功地关闭了在科夫诺的汉萨商行，与格但斯克和科尼格斯堡发展起了一种积极的贸易关系，同时仍然与里加保持着旧有的联系；但在所有这些港口，本地商人阻碍了与西方新移民发展起直接的联系。这种情形在波洛茨克也是一样，在那里，汉萨商人直到15世纪末期仍然保持着他们的特权。波兰—立陶宛联盟使得这两个国家有了经常的经济联系——而且这种贸易也向东扩展到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最迟到14世纪末，在立陶宛和莫斯科大公国也有了贸易联系，这个地区的商品交换在随后几个世纪里明显地变得更活跃了。这种发展开辟了几条贸易路线，从莫斯科和白俄罗斯的城镇到维尔诺，然后经由快速发展的华沙和波兹南城镇到达弗罗茨瓦夫，后来绕过它达到莱比锡。其他不那么重要的东方路线从维尔诺或布雷斯特到卢布林，再向西到西里西亚和萨克森。 【580】

这样，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莫斯科商人就获得了一条直接通往西方市场的道路，那里对毛皮、皮革和蜂蜡的需求旺盛。相反，来自尼德兰和欧洲西北部的布、金属品还有白银也到了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15世纪后半期这部分贸易量占了相当的比重，但是几乎没有学者仔细地研究过。15世纪波兹南城镇丰富的记录和其他文件表明重要的交易确在进行。在所有这一切中，由波兹南、立陶宛的布雷斯特和其他一些城镇富有的犹太商人以及波兰、俄罗斯和德意志籍市民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萨克森和北德意志商人

肯定从事这种贸易。莱比锡实际上是它的终点站，因此，它的市场在国际贸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弗罗茨瓦夫也从中获利，正如波兹南、华沙和维尔诺一样。① 从立陶宛和俄罗斯进口毛皮在那时导致了波兰制革和毛皮加工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大胆的假设也只能是沿线贸易必定导致货币从西方和波兰流向立陶宛和俄罗斯。16 世纪这种现象就很明显了。

在我们讨论的这一时期，中东欧北部的贸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又与生产和财富的巨大增长相伴而来。最显著的特点是领土的各部分有了更紧密的经济联系。这种经济变化的政治后果是波兰重新获得了普鲁士的很大一部分土地，而且也有助于保持波兰和立陶宛间的统一。本地生产的商品在波【581】兰的内外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增加了，而这显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 15 世纪，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木材和其他的林产品、谷物、牲畜，虽然手工业品和矿产品也占一定的比例。某些在后来威胁到波兰经济发展的因素在那时还没有出现。这些因素之一就是重要原材料出口日益增长，比如羊毛，因为到 15 世纪末期羊毛的供应已开始短缺。此外，波兰的出口刺激了外国工业品的进口，人们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很广泛从而使得本地生产者难以发展起来。然而，15 世纪当经济增长陷入剧烈波动时，波兰的手工业并没有遭到严重的打击。在这里还要提到对波兰农产品和林产品需求的增长阻止了 15 世纪的农村经济可能发生的危机，并有助于保持国内市场吸收供应的能力。所谓使波兰农民和大多数城镇居民毁灭的“第二次束缚”浪潮直到稍晚时期一直没有发生。波兰经济在 13 世纪尤其在 14 世纪的最大特点就是外国资本不断流入。这也许与封建主义危机时期西方经济生活主流的薄弱相联系。显然，外国投资者看到在波兰他们有机会进行矿业、贸易和房地产等方面的有利投资。对德意志北部和普鲁士流入波兰的资本应该可以估算出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5 世纪，当时这种现象在波希米亚已经消失很久了。这种投资在加速波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这个国家内部产生了一种动力。从这点上来说外国商品流入波兰可能也与本地生产的商品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有关。波兰和那些早就发展起来的国家之间的差距在 13、14 世纪末迅速消失了。这些发展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政治和文化上的。

---

① 科克齐：*Handel Poznania do Polowy XVI wieku*（Poznań，1930 年），第 49 ~ 106、204 ~ 222、262 ~ 277 页；马洛维斯特：*Studia*…，第 440 页及以后。A. 沃夫尔齐恩克维奇（Wawrzynczyk）：*Studia z dziejów handlu Polski z W. Ksiestwem Litewskim i Rosja w XVI wieku*（华沙，1956 年），第 5 ~ 15 页。【55】

8.4　俄罗斯的贸易

12世纪、甚至更多的是在13世纪，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的经济状况比起波希米亚和波兰来要落后很多。与第涅伯河接壤的土地受到了基辅罗斯分裂[582]和随之而来的俄罗斯王公之间争夺的严重影响。在1164年和1182年，基辅这个主要的政治商业和加工业中心两次被混战的王公所抢劫。正如历史学家经常强调的，强盗控制了黑海大草原，这样就阻断了俄罗斯城镇与君士坦丁堡、高加索和波斯间的贸易。而且这种以意大利为一方，亚历山大和叙利亚城镇为另一方所组成的贸易不断增长，导致了连接拜占庭与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地区贸易路线的衰落。但在12世纪和13世纪早期，俄罗斯东北部的定居点有所增加，诺夫哥罗德的重要性迅速提高，成为国家的中心和贸易及手工业的核心。

蒙古入侵（1237～1240年）和沙皇对俄罗斯控制的加强给了这个国家特别是第涅伯河盆地、顿河和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及其城镇以毁灭性的打击。但是，鞑靼人从来就没有到达过诺夫哥罗德和俄罗斯的西北部，这个地区即使在遭受了鞑靼胜利的某些不利影响后也还是相对富裕。正是许多俄罗斯王公的软弱才使得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甚至波洛茨克、斯摩棱斯克、维帖布斯克得以发展起来，也正是在这些地区我们可能看到——比较而言——中世纪晚期人口有显著增长。正是13世纪的这种增长和经济发展才使得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能够抵挡住来自立窝尼亚集团和瑞典的压力。立陶宛的向东扩张运动在13、14世纪导致了对白俄罗斯（Byelorussia）的征服，但从经济角度看，它的危害性不大，因为胜利者并不希望改变它的现状。14世纪处于波兰和立陶宛统治之下的西南俄罗斯的命运上面已经描述过。

东北俄罗斯的重建和经济发展的后果到14世纪开始体现，特别是在奥卡和伏尔加河上游这些政治和经济中心得到发展的地区，其中最重要的是莫斯科。这个地区与鞑靼人征服的地区被广阔的森林隔开（它的名字“森林中的俄罗斯”正由此得来，——Rus Zalesska），正因为如此这个地区受鞑靼人的袭击要少得多，因而显然是人们定居的宝地。它的发展也可以归功于比诺夫哥罗德国家更有利的自然条件。西方学者往往过分强调蒙古入侵后所形成的贸易路线对欧洲经济特别是对东欧的积极影响。俄罗斯在被鞑靼人所摧[583]毁和掠夺之后，在从因其地理位置所产生的贸易中真正获益之前，还必须进

行最初的重建。参加对东方贸易毫无疑问要求大量的物质资源，而看起来最迟到14世纪中期这种资源问题得到了解决。伏尔加河上游盆地和奥卡那时特别适合于发展贸易，当然整体上也适合经济的发展。

对诺夫哥罗德来说——甚至对莫斯科国家也是这样——对北方领土经济渗入早在13世纪就已很有意义了，而且在14世纪更是有了增长。毛皮、蜂蜡和其他产于该地的商品是远程贸易中最重要的内容，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极大地加强了莫斯科的经济潜力，对诺夫哥罗德的影响也是如此，只是程度稍弱而已。

到14世纪末莫斯科已经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它逐渐地获得了对伏尔加河上游盆地和奥卡的控制，并因此获得了对诺夫哥罗德东南腹地的控制，这个国家乃至其贸易的维持依靠的就是那些地方的资源。诺夫哥罗德在与西方经济联系中的关键地位——这使得它得以利用它的俄罗斯邻居——对莫斯科的扩张而言是一个阻碍，而且诺夫哥罗德最终臣服于莫斯科公国应该被视作这种不利环境的不可避免的结局。这整个情形非常类似波兰与普鲁士统一时的状况，虽然最终莫斯科从这种统一中所得到的要比波兰所得到的要多。但阻止俄罗斯自由进入波罗的海海岸国家和经济障碍所导致的长期冲突不在本章的讨论范围之内。在我们感兴趣的这个时代末期，俄罗斯经济和政治扩展到伏尔加河中游的迹象已经显现出来了。

8.4.1 贸易路线

蒙古帝国在13世纪前半期的崛起和基辅罗斯在1238～1242年的最终衰落几乎没有影响到东欧这个地区的贸易路线。从中国和中亚经厄金恩和阿斯特拉罕到金帐汗国的首都——萨来—伯克（靠近现在伏尔加河上的诺夫哥罗德）——顿河上的塔纳湖（接近今日的亚速海），这条伟大的东方沙漠商旅路线的重要性增加了。我们知道，在13、14世纪，它向西继续通过俄罗斯西南部和波兰到达西欧。从萨来经顿河、亚速海和黑海到克里米亚、小亚细亚和君士坦丁堡的城镇也成为可能。而且，阿斯特拉罕还与通往波斯湾和印度的道路系统有海陆联系。这个不断扩大的交通系统在13世纪后半期直至14世纪都运作得很令人满意，尽管金帐汗国和艾尔汗波斯国家有冲突。但是，在这一时期末帖木儿毁灭性地入侵和因他的国家迅速解体所导致的长期战争，使贸易无法正常地进行了。毫无疑问，东方贸易集中于叙利亚港口特别是在亚历山大部分地导致了这条伟大贸易路线的

【584】

经济衰落，虽然北部沙漠商旅路线上的困难是主要原因。我们假定这些困难使得里海和东高加索作为东欧与波斯、印度之间的联系点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旧水路——沿着第聂伯河、顿河和伏尔加河——把黑海和亚里海地区即近东和中东地区与波罗的海地区联系起来，它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代开始时执行了一种比更早时期更为有限的功能。[1] 在随后的3个世纪里，这些河流主要作为连接黑海、亚速海、里海和伏尔加河上游地区之间商品航运的交通手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伏尔加河上游到北部德维纳河和伯朝拉河盆地的水陆交通发展使得这些道路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此外，13世纪还存在着联系波罗的海国家与西北俄罗斯的另一个巨大的交通系统。这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但在中世纪晚期它才出现巨大的发展。这主要是从波罗的海经涅瓦河到拉登瓦湖和沃尔科夫河到诺夫哥罗德的古老水路，但随着塔林的发展，经纳尔瓦河或者多帕特到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线路的始发点也出现了。这两个城镇也可能经里加的陆路到达，14世纪和15世纪还可以经格但斯克到达。这样诺夫哥罗德就成为通往水路的出发点，也是向东北到德瓦纳北部地区、到与西伯利亚接邻的伯朝拉河、向东南通往俄罗斯中心地带的起点。波罗的海海滨还有另一个从德国西部瓦纳河口通往白俄罗斯和波洛茨克的起点，虽然从13～15世纪它的重要性还不能与通往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的大道相比。[2] 【585】

这个复杂的交通系统直通伏尔加河上游的心脏地区，而到了13、14世纪只在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内使用。直到东北俄罗斯特别是莫斯科公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发展起来时，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变。

对俄罗斯贸易路线主要结构的描述显示了存在几个不同的地区，它们之间的贸易联系是很松散的。以下几个可能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地区：

（a）黑海和里海地区及俄罗斯中部的大草原；

（b）立窝尼亚和俄罗斯西北部，以诺夫哥罗德为主要贸易中心；

（c）伏尔加河上游盆地。

组成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的腹地的广阔东北地区将要在后面论及。中世纪的俄罗斯自然经济在各处都很盛行，因此，13世纪和14世纪各地的经济

---

① 参见第七章；F. 布伦斯（Bruns）和 H. 维克泽卡（Weczerka）：*Hansische Handelsstrassen*（魏玛，1968～1969年）。【56】

② W. 哥特茨（Goetz）：《中世纪德国—俄罗斯贸易关系史》（吕贝克，1922年），第195～245页；F. 布伦斯和 H. 维克泽卡：*Hansische Handelsstrassen*，*Atlas*，第36～40页。【57】

联系都很松散。

8.4.2 黑海、里海和西伯利亚大草原

13世纪后半期和14世纪在黑海和亚速海、里海周边地区的贸易非常活跃。这一点可由前几页中所讨论的道路系统所证实。但是，这里贸易的加强主要依靠其他的因素。蒙古人主要通过抢劫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同时鞑靼政权在俄罗斯的最终稳定促进了其臣属国商品的定期流出（包括奴隶），尽管【586】进程较以前更加缓慢。在金帐汗国发展中的其他经济因素是大草原上游牧民的牲畜饲养活动和阿斯特拉罕地区和彼列科普地峡的矿盐工程开发。这些因素，再加上它处于洲际大干线上的有利位置，使金帐汗国在13世纪和14世纪出现了强大的当地和远程贸易中心。这种发展的基本前提是有一个有效的能为商人提供安全保障的国家机器。这些有利的条件在14世纪后半期不复存在。流行灾疫的巨大影响由于金帐汗国内部激烈争夺而加重。在这个世纪末帖木儿的军事入侵带来了一股毁灭，后来他的帝国解体又使得整个地区陷入了长期的政治混乱中，这进一步导致了经济的崩溃。

我们对金帐汗国的第一个首都——位于伏尔加河中游的萨来—巴图——的命运知之不多。乌斯贝克汗（1312～1340年）把首都从萨来—巴图迁移到靠近现在的诺夫哥罗德的萨来—伯克。正是由于财富的聚集和有利的地理位置，它很快就成了与中亚、远东和近东积极发展贸易的中心。

我们也已注意到在顿河塔纳湖上的萨来和意大利的殖民地，它们在14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与中西欧的贸易是很有意义的。萨来，某种程度上是阿斯特拉罕和塔纳——不仅是买卖中国、突厥斯坦和波斯的丝绸和棉布的重要贸易中心，而且也是买卖西南亚香料的交易中心，虽然后者的交易规模相对较小。其他重要的交易物品是毛皮、皮革和谷物——主要来源于卡马和伏尔加河的保加尔人的土地——同时毛皮、海象牙、猎鹰也经这些地方从很远的北方带到南部的城镇。反过来，运到俄罗斯中心地带的商品大多是东方产品，可能是盐和来自西方的一些商品，包括意大利人经君士坦丁堡、克里米亚城镇和塔纳提供的布匹；有时候也有布从西方经陆路运来。[1]

我们在前面曾提过，金帐汗国和俄罗斯城镇间的贸易只是在后者从鞑靼

---

① B. 格雷科夫（Grekov）和 Ya. 雅库波夫斯基（Jakubovski）：*Le Horde d'or*（巴黎，1939年），第133～147页。【58】

入侵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以后才得以发展，而这个条件直到14世纪才具备。我们不能准确地推断出究竟是从何时起黑海和里海地区开始进口从伏尔加河上游和里海地区来的手工业产品——这正是16、17世纪俄罗斯和东方贸易的最大特点，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到15世纪这种进口开始出现，在这一时【587】期莫斯科手工业产品快速地增长。①

自从鞑靼人控制了大草原并把他们的统治扩展到俄罗斯之后，后者不仅被迫缴纳一笔很大的贡品，而且还遭到劫奴抢掠的严重损失。萨来和塔纳湖特别是后来的卡发，在14世纪成为鞑靼人从俄罗斯、高加索和大草原抓获来的奴隶重要的市场。金帐汗国城镇的贸易增长引来了意大利商人。热那亚人在卡发（费奥多西亚）的殖民地在13世纪后半期才建立起来，在随后的一个世纪它成了位于克里米亚、黑海海滨、亚速海和高加索西南部贸易据点的中心。在塔纳湖也有一个热那亚人的据点，虽然它比威尼斯人的据点要弱得多。热那亚人也与萨来保持着联系，后来还渗透到莫斯科公国，同时他们中还有一些人甚至远行至伯朝拉河地区，帮助它的开发。

14世纪后半期，金帐汗国的分裂和帖木儿的军事入侵给这个地区的内陆城镇以致命的打击。塔纳湖也陷落了，虽然意大利人的殖民地在那儿一直存留到1475年土耳其人入侵为止。15世纪中期威尼斯的参议院曾经不无遗憾地提到这个曾享誉一时的贸易据点的早期黄金时代。②

从15世纪中期起，这个地区最重要的贸易据点是卡发，它的主要居民是亚美尼亚人，但也有少量的希腊人、犹太人和鞑靼人，还有一个很小（2 000～3 000人）但很有影响的热那亚人团体。它代替了此前非常富裕的城镇苏达克（俄罗斯人称它为苏洛兹，而意大利人则称它为索尔达尼亚）而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中心。正如土耳其人在1475年征服这个城镇后编辑的一个数据表所显示的，卡发有大约8 000户人家和70 000～75 000居民；较早的繁荣时期，它的人口确曾达到了100 000人。③ 卡发对东方产品贸易的强有力控制，应该归功于将它与中东和远东直接联系起来的沙漠商队，但更应归功于它与参与波斯湾贸易的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高加索和波斯西部的联系。除了从这些地区进口一些产品外，卡发也发展了丝织品生产。14【588】世纪，卡发因它在东欧销售各种东方产品和它对西方的出口而著名。也有资

① M. V. 费勒（Fehner）：*Torgovla Russkogo Gosudarstva so stranami Vostoka v XVI veke*（莫斯科，1956年），第51～60页。【59】

② 马洛维斯特：*Kaffa*，第53、91页。【60】

③ 上引书，第18页、第21页及以后。【61】

料提到卡发的意大利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希腊人在贝格罗德、奇利亚、摩尔达维亚和小波兰的大量活动。卡发与莫斯科和伏尔加河上游其他城镇的联系对它的贸易非常重要，这一点我们以后会再提到。

15世纪东方产品流入克里米亚（Crimea）的数量似乎稍微有些减少，原因是中东没完没了的战争和局势的混乱。但是卡发继续与波兰、摩尔达维亚和俄罗斯进行贸易，虽然从这些国家到西欧的东方产品供应衰落了。15世纪特别是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热那亚人对克里米亚殖民地的兴趣也下降了。

卡发的经济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参与东方贸易。克里米亚城镇的发展也刺激了农业的发展。克里米亚葡萄酒的生产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彼列普地峡的海盐产量增加了。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对这些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并且使卡发能够以此为基础向君士坦丁、小亚细亚北部甚至热那亚出口谷物。可以预料，假如苏丹允许它们通过海峡的话，1465年可以有大约5 000～10 000莫第谷物从卡发转运到热那亚。谷物出口成为可能的另一个原因很可能就是谷物供应不仅来自克里米亚本土而且还来自摩尔达维亚的贝格罗德（阿赫曼）和第聂伯河河口地区；对这些都有翔实的文字记录。而且，当黑海地区的收成很差时，人们经常从远至意大利的地方运谷物。其他在卡发市场上出售的东西是：航运到君士坦丁堡和埃及的克里米亚木材；为了交换彼列普地峡蒸晒的海盐而在库班河河口购买的鱼；西方和波兰的布匹；当地的纺织品；基辅和里沃为意大利纺织业中心所用的洋红；从鞑靼和俄罗斯土地上来的销售到各地的毛皮和皮革。因此，克里米亚贸易中心刺激了非常广阔地区的经济生活。另外，他们的奴隶贸易对邻近地区造成了罄竹难书的灾难。

卡发在15世纪也是一个主要的奴隶市场，虽然附近其他许多城镇也有类似的小市场。15世纪后半期，克里米亚继任的大汗也努力鼓励在他们的城镇进行奴隶贸易，这大大地惹恼了热那亚人，因为他们在那时似乎比其殖民地上的任何其他居民都更积极地从事这种贸易。很确定的一点是，每年卡发的热那亚人都在高加索库班河河口上的拉克帕和苏呼米购买奴隶。他们甚至从卡发本土购买鞑靼人的奴隶，也在塔纳湖、克尔奇、因克尔曼（Inkerman）和其他地方购买奴隶，这自然刺激了游牧民抢劫俄罗斯和波兰居民的活动。贫穷的鞑靼农民的孩子也被当做奴隶卖掉。15世纪很多人都从事这种贸易，甚至卡发天主教主教也这样。奴隶主要是从俄罗斯、高加索［有资料经常提及格鲁吉亚人（Georgians）］中募集，还有少部分的波兰人，多

[589]

半是鞑靼人。大部分可能被送到埃及、叙利亚和土耳其去。许多资料都提到了奴隶是被航运甚至是被沿陆路（经摩尔达维亚和波兰）驱赶到意大利和其他地中海天主教国家。维林登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远至西班牙和法兰西的南部地区，在这些地区也出现了奴隶。我自己的早期研究也揭示了15世纪后半期在热那亚进行着大量的奴隶买卖，这些奴隶大多是被当作佣人的女人。出口到土耳其特别是到埃及和叙利亚的大多数奴隶可能是男人，他们主要将从事手工业和到军中服役。①

卡发和别的黑海城镇在1474年和1481年被土耳其人所占领，就经济而言这并不是灾难，虽然那些居民不得不忍受入侵者的勒索和残暴。

随后卡发和阿克曼逐渐成为鞑靼人的奴隶贸易市场，有时这种交易很明显是为了满足那些资助掠夺性远征的商人的需要。② 但是卡发不再从事黎凡特商品贸易了。这只是一个很早就开始的过程的延续。到15世纪末君士坦丁堡与奥尔泰尼亚和波兰国家的直接贸易加强了。但这时的卡发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虽然它还与快速发展的东北俄罗斯城镇保持着贸易联系。

8.4.3　立窝尼亚和西北俄罗斯

如前所述，13世纪中期西北俄罗斯人民比起这个国家其他地区的人民来遭受的苦难要小得多。他们成功地抵制了来自德意志人的压力，德意志人【590】从13世纪初开始征服立窝尼亚并逐渐地获得了对这些地方的控制权；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丹麦人的统治被逐出了爱沙尼亚。

毫无疑问，定居于立窝尼亚的德意志商人的主要动机是想在与邻国俄罗斯的贸易中分一杯羹。但不管怎样，立窝尼亚的农业经济不仅成了他们所定居的城镇不可缺少的存活前提，而且在适当的时候也开始甚至更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远程贸易。

立窝尼亚虽保存了大部分的自治权，仍成为条顿骑士团的一部分，但要比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要弱得多。直到15世纪末期，尽管它甚至设法把它的主权扩展到整个立窝尼亚地区，却还不得不与其他德意志封建贵族分享这种权力。实际上，这两个集团与城镇居民已经强大得足以把被征服的人口统

① 上引书，第48～94、157页；见本书第493页注2。【62】

② A. 德佐宾斯基（Dziubinski）："Handel niewolinikami polskimi i ruskimi w XVI wieku i jego organizacja"，载 *Przeglad Historyczny*，第57期（1966年），第36～49页。【63】

治和管理得服服帖帖，尽管从 13 世纪起他们开始了残酷的内部争夺。条顿骑士团与里加大主教和城镇之间的关系尤其如此。冲突的原因当然有贸易因素。就城镇和乡村之间的经济联系而言，贵族、条顿骑士团和市民的利益分野直到 15 世纪和 16 世纪才出现。在他们与俄罗斯人的交往中，条顿骑士团不能给立窝尼亚城镇像条顿骑士团给普鲁士臣民那样有效的帮助。13、14 世纪，立窝尼亚的条顿骑士团和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城镇之间的关系对在这些地方的德意志人较之对普鲁士的德意志人要不利得多。而且，正如在普鲁士所发生的一样，立窝尼亚商人遇到了来自条顿骑士团的贸易竞争。最终，条顿骑士团与俄罗斯城市共和国和立陶宛间之经常不断的战争妨碍了商人的活动，尽管事实上汉萨同盟和俄罗斯商人竭尽全力以特别协议来扫除交往障碍。许多立窝尼亚城镇，尤其是 3 个最大的城镇（塔林、里加和多尔帕特）都属于汉萨同盟并组成所谓的立窝尼亚分部，它们在 13、14 世纪屈服于维斯比和吕贝克的强大势力。14 世纪特别是 15 世纪，本地商人和吕贝克商人的利益差异逐渐变得异常尖锐，使得立窝尼亚和俄罗斯境内汉萨据点上的外国汉萨商人的权利受到了限制。

[591] 13 世纪末和 14 世纪初期，里加、塔林和多尔帕特已经是整个立窝尼亚地区巨大的地方性内贸中心。农民或直接向大的城镇市场供应他们的产品，或者由更小的城镇和为数众多的市场的居民把他们的产品航运到那里。内贸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里加和塔林商人为居住于城镇和农村的小承包人提供农产品预付款。这个系统到 15 世纪在普鲁士和波兰北部建立起来，在立窝尼亚的发展得则要早得多。从资料来判断，农民深受贵族和教士的高利贷行为所害。非常清楚的是，一些富裕农民也从这种贷款中获利，因为市民向他们提供这种贷款，而他们作为城市信贷者和大量贫苦农民的中间人从其中榨取利润。迈克维兹在 16 世纪后半期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出认为城镇商人和农村产品的富裕的供应者之间的永久性合同体制无疑也以相同的方式发展起来。14 世纪早期，城镇小贩向农民提供廉价的自产和进口手工业产品，特别是盐。他们在边远的农村地区很活跃。立窝尼亚城镇从来就没能够完全消灭农民所进行的独立贸易。其他从事这种贸易的人是所谓的运货人（carrier），即在这个国家内运输商品的人。在许多所谓的非法港口，农民与国外游客进行联系，这尤其激怒了市民。13 世纪末期，城镇外贸也受到积极参与的贵族和教士的威胁。这种贸易主要以农民缴纳谷物形式的赋税为基础，但从 16 世纪起，这种贸易逐步转向依赖于贵族和教堂地产上不断发展的农奴制。

农村向城镇供应谷物、亚麻、大麻、便宜的土产毛皮、皮革、蜂蜡、家畜和木材制品。其中一些商品也是以出口为目的的。出售立窝尼亚商品的外国市场有吕贝克、布鲁日、英格兰，从14世纪后半期起还有荷兰和葡萄牙。产于立窝尼亚和俄罗斯的亚麻需求很大，它们通过吕贝克，也许还有法兰克福的市场，甚至进入了士瓦本的纺织品中心（当然主要是使用本地亚麻）。在15世纪，对荷兰、英格兰和葡萄牙的木材、油漆和漆树木材出口增加了。史料中第一次提到谷物出口特别是立窝尼亚裸麦出口的资料是在13世纪。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部分爱沙尼亚裸麦也从塔林出口到西方。但是谷物在 【592】 15世纪从立窝尼亚到西方的贸易中并没有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不过它总是少量地供应给邻近的芬兰，偶尔还供应普鲁士、瑞典和诺夫哥罗德。①

从13世纪到15世纪末这一段时期，立窝尼亚的远程贸易主要以俄罗斯与中欧和西北欧之间的经纪业务为基础。立窝尼亚城镇塔林和多尔帕特主要与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结成伙伴关系，然而德维纳河盆地城镇——波洛茨克、维捷布斯克和斯摩棱斯克——的对外贸易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与里加的商人建立了联系。上面所述的贸易路线网络是决定受影响地区的决定性因素。吸引汉萨商人对俄罗斯贸易兴趣的地方是它巨大的毛皮和蜂蜜、蜂蜡的供应。诺夫哥罗德是毛皮的最主要供应者，而这些地区所产大部分蜂蜡能在普斯科夫和波洛茨克买到，而在这两个地方毛皮的买卖又很重要。

如上面所说，俄罗斯西北部在蒙古人入侵时并没有遭受到很严重的打击。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也设法抵挡住了德意志人的压力。但是，波洛茨克、斯摩棱斯克和维捷布斯克在13、14世纪却处于立陶宛的统治之下。对诺夫哥罗德历史的最新研究揭露了其贸易史的许多新事实。比如，现在我们可以说，尽管自然条件不利，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的农村人口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虽然渔猎也很重要。② 然而，考虑到它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的农业基础似乎并不是十分强大的。在我们讨论的时期内，土地差不多完全掌握在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和教士手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商人。农民以他们的农产品、畜产品、海产品和林产品向他们的领主缴纳赋税

---

① W. 尼特马（Niitemaa）："Der Binnenhandel in der Politik der livländischen Städte im Mittelalter"，*Annales Academiae Scientiarum Fennicae*，第76期（1952年），第52页及以后，第270页及以后；J. 阿赫文南怠（Ahvenainen）：*Der Getreidehandel Livlands im Mittelalter*（赫尔辛基，1963年），各处。【64】

② L. V. 丹尼罗娃（Danilova）：*Otcherki po istorii zemlevladeniya i hoziaystva v novgordoskoy zemle v XIV - XV vv*（莫斯科，1955年），第20页及以后，第45页及以后。【65】

到15世纪还以货币纳税；从这些地方来的毛皮和皮革主要被转手出卖。[①] 诺夫哥罗德商人的社会地位比起那些和他们有经济联系的贵族来要低得多。【593】但是商人中的某个集团特别是那些富裕的所谓"圣伊凡百人团"拥有很大的经济权力。考古研究已揭示出诺夫哥罗德也是一个重要的手工业加工中心。[②]

我们很难苟同约翰森有关外贸对西北俄罗斯在中世纪并不十分必要的观点。[③] 最近的苏联研究表明，西北俄罗斯没有足够的盐资源，甚至连最低质量的都没有；它们也几乎没有产盐基地和贵金属；它对基本食物（如谷物）供应也不很可靠。[④] 这种状况到15世纪稍微有些改善，那时遥远的东北地区得到了更广泛地开发。但是所产生的利益主要被莫斯科而不是被诺夫哥罗德所享有。这种状况迫使诺夫哥罗德和这个地区的其他俄罗斯城镇与汉萨商人保持经济上的联系，以期让他们供应自己所缺乏的商品。

列森柯夫（Lesnikov）和其他苏联学者最近注意到另一个重要因素。不管以往论点如何，他们证明诺夫哥罗德主要是作为一个廉价毛皮，尤其是松鼠毛皮的贸易中心，这些毛皮主要来自共和国的中心地区。实际上，12世纪和13世纪诺夫哥罗德已经把它经济影响的范围扩大到远至乌拉尔地区，并在这一时期内建立了殖民地。但是从被征服地区征收的毛皮量极不稳定，而且为收集毛皮而进行的远征并不像我们一向认为的那样成功，实际上他们经常无功而返。到13世纪，莫斯科大公开始把他们的影响扩大到德维纳河北部和伯朝拉河盆地，而这是以牺牲诺夫哥罗德为代价的。[⑤] 而且，中世纪俄罗斯供应贵重毛皮的主要地区是卡马河上保加尔人的土地（即现今的喀山），这必须要从诺夫哥罗德出发进行准掠夺性的远征才能达到，但不幸的是，共和国的经济影响在这里是非常微弱的。这样，贵重的毛皮，像紫貂和白貂，并没有在诺夫哥罗德的贸易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必须假设诺夫哥罗德毛皮的大量出口之所以可能——在14世纪可能一年达到了500 000张【594】——是因为它们的价格相对来讲异常的便宜。这是因为，难以想像中世纪欧

① 上引书，第97页及以后；Khoroshkevitch, *Torgovla*, 第53~68页。【66】

② B. A. 里巴科夫（Ribakov），*Remeslo drevney Rusi*（莫斯科，1948年），第594、611页，623页及以后；A. V. 阿特西克夫斯基：*Novgorodskie remesla*, 第6页。【67】

③ 约翰森：*Der hansische Russlandhandel*, 第40页及以后。【68】

④ 霍洛斯柯维奇：*Torgovla*, 第213~230、307~318、320~322页。【69】

⑤ M. P. 列森柯夫：*Ganzeyskaya torgovla pushninoy v natchale XV veka*（波将金研究院院刊，第13期，1954年），第61~93页；M. P. 列森柯夫："Torgovye snoshenia", *Istoritcheskye Zapiski*, 第39期（1952年），第259页及以后；Danilova, *Otcherki*, 第204~210页。【70】

洲的市场能在较长时间内这样大量地消化这种非常贵重的商品，更不用提汉萨顾客对这种商品的购买力了，他们没法与富裕的意大利人相比。值得一提的是，在诺夫哥罗德汉萨商人想要的只是没有加工过的毛皮，[①] 原因是他们担心成品将不可避免地要掺假，而且他们自己还想获取对最终顾客收更高价格所产生的利润。诺夫哥罗德出售的大量毛皮来源于农民上缴的赋税。那些贵族有可能把它们卖给本地商人，再由本地商人把它们卖给外国人。后者也可能直接向贵族购买毛皮，甚至还有可能向从国家中心地带来的商人直接购买，虽然诺夫哥罗德的商人反对这么干。俄罗斯农民直到 15 世纪才到诺夫哥罗德来出卖他们的毛皮。[②] 蜂蜡是诺夫哥罗德出口的第二重要的商品，但那并不是农民向他们的领主所缴纳的赋税。有可能是城镇商人直接从农民那里购买而来，因为农民也向城镇集市出售一定数量的蜂蜡。[③] 通过对诸如毛皮和蜂蜡等贵重商品、更不用说像皮革和其他不那么重要的商品供应的控制，更通过它们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地位远远优于来自西方的客商，普斯科夫的地位则比诺夫哥罗德稍逊一筹。然而，为了充分地利用它们的地理位置，它们必须有与远方来的顾客正常接触的通道，但在 13 世纪，汉萨商人设法把俄罗斯商人从与波罗的海北部海滨的海上贸易中驱逐出去。这样，来自俄罗斯的出口和诺夫哥罗德和其他俄罗斯城镇的进口都掌握在德意志商人手中。即使这样，德意志商人与俄罗斯人在 13、14 世纪经济和政治权力上的分野，对后者要比像大波兰城镇和马索维亚的市民对普鲁士商人的状况有利得多。汉萨商人 13、14 世纪在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是相当成功的，他们在诺夫哥罗德的工场或商号——那时是由维斯比和吕贝克的商人来控制——获得了广泛的法律和经济权力。虽然汉萨商人想法把俄罗斯限制在了立窝尼亚和诺夫哥罗德——从更大的范围上来讲，限制在了普斯科夫——但俄罗斯人实际上阻止了德意志人渗透到俄罗斯 【595】 中央地区，因为那是它非常重要的资源所在地。他们控制着德意志商人与他们巨大腹地之间的贸易。我们甚至也可以进一步说这两个伙伴之间的权力是平衡的，虽然是个不大稳定的平衡。考虑到这一结论，就不难接受列森柯夫的观点，即到 14 世纪末和 15 世纪初，布鲁日和诺夫哥罗德市场上的汉萨—俄罗斯贸易的商品价格差异在减去运费后相对是很小的，汉萨商人与诺夫哥

① 霍洛斯柯维奇：*Torgovla*，第 97 页及以后。【71】
② 上引书。【72】
③ 上引书，第 47～72 页。【73】

罗德贸易的纯利润不超过12%。[1] 列森柯夫的观点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证明，但是假如它被证明了的话，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推论认为俄罗斯商人相对于他们的伙伴有较大的权力并对价格结构产生了影响。

诺夫哥罗德给汉萨商人供应毛皮，主要是松鼠皮和其他便宜毛皮，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在14世纪50年代，维滕堡的吕贝克公司从诺夫哥罗德和立窝尼亚进口的毛皮价值在20万~50万吕贝克马克之间。那时在3个年头里，维滕堡大约平均每年要卖出2万张毛皮。1368年从塔林运一船毛皮到吕贝克大约有75 000~100 000张，装在17只桶中。1403年，英国海盗抢劫了两条从里加到佛兰德的航船，共劫得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毛皮142 268张。1398年条顿骑士团从诺夫哥罗德出口136 430张毛皮，但是在随后的几年中出口下降到不足这个数目的1/3。1441年诺夫哥罗德从汉萨商人那里没收了20万~28万张毛皮。

可以说，出口数量是巨大的。霍洛斯柯维奇（Khoroshkevitch）认为出口在14世纪开始增加，到15世纪初达到了顶峰，并在这个水平线上维持了一段时间。根据这个权威的观点，15世纪后半期诺夫哥罗德就已遭受资源衰竭的影响；它的狩猎基地进一步大规模向北转移，而这种转移的主要获利者是莫斯科而不是诺夫哥罗德商人。[2] 诺夫哥罗德所获得的蜂蜡，可能来自伏尔加河中游的森林、奥卡、卡马河上保加尔人的土地、里亚赞地区和卡雷里亚。但是，诺夫哥罗德的蜂蜡出口也不得不让位于西德维纳河盆地的城镇。难以估计每年出口到汉萨城镇的这种商品总额有多大。14世纪中期，有时一个德意志商人从诺夫哥罗德进口的蜂蜡就超过700~800公斤，虽然富裕的维滕堡每年出口大约6.6吨蜂蜡，但他们的情况是个特例。根据塔林1368~1369年的海关记录，在1368年大约有18.5吨蜂蜡从该港经过，可能主要是产自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产品。1393年，只有一只船往来于塔林和佛兰德之间，运来的蜂蜡大约是6吨。1399~1404年，条顿骑士团从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大约进口了43吨蜂蜡。[3] 我们有理由同意霍洛斯柯维奇的观点，即14世纪俄罗斯是欧洲市场蜂蜡的主要供应者，其中德国西部维纳河地区在这种出口中所起的作用要比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大得多。后来这种状况改变了，因为诺夫哥罗德成为从俄罗斯中部到中欧和西欧的转

【596】

① 见本书第498页，注4。【74】
② 霍洛斯柯维奇：*Torgovla*、第108~117页。【75】
③ 上引书、第134页。【76】

口贸易的主要中心。[①] 诺夫哥罗德的皮革产量也极大地增加了，虽然它主要满足俄罗斯的国内需要。

诺夫哥罗德进口的商品种类更繁多一些。毫无疑问，布的供应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盐和贵金属。诺夫哥罗德和俄罗斯其他城镇可能直到 16 世纪才有他们自己的城镇布业。这可能是因为它们的气候和他们饲养羊的数量较小的缘故。诺夫哥罗德进口西方布可以追溯到 12 世纪，后来增加了。到 14 世纪中期，诺夫哥罗德商人大量购买西方布匹；布匹进口更多的是通过里加而不是通过塔林和多尔帕特。诺夫哥罗德的进口总量还难以估量。根据霍洛斯柯维奇的观点，1410 年汉萨商人储藏了大约 80 000 米布；但是这只是他们每年进口总量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来自根特、布鲁日、伊普尔、阿拉斯和其他城镇的佛兰德布主导了诺夫哥罗德市场，但到 14 世纪和 15 世纪来自利斯流域几个中心被称为时尚织物的布开始出现，人们也可以买到波铂林赫的布了。这些昂贵的伊普尔布在俄罗斯得到了相当大的成功。它们不仅为诺夫哥罗德的富人而且也为俄罗斯中部的富人所享用。从 15 世纪开始，荷兰的原料进口——主要来自纳尔登，还有一小部分来自雷登、海牙（Hague）和阿姆斯特丹——极大地增加了。德意志、英国，还有少部分波兰布在诺夫哥罗德市场上起着次要作用，诺夫哥罗德似乎在纺织品的选择上是相当保守的。只是到了 15 世纪末期，英国布才在立窝尼亚获得了与佛兰德和荷兰纺织品一样的地位；可能在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②] 【597】

最近，苏联的研究表明诺夫哥罗德地区盐的产量很低。到 15 世纪，由于共和国境内的斯塔莱亚俄罗斯食盐开发的增长，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善。但是，15、16 世纪东北俄罗斯盐产量的极大增长并不意味着诺夫哥罗德有了更好的供应。自 13 世纪以来诺夫哥罗德，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从汉萨城镇进口食盐，而人口增长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需求。13 世纪来自科沃布热格周围地区的波美拉尼亚盐被进口到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但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从吕纳堡来的高价盐已经很普遍了。1368 年立窝尼亚的 3 个主要港口大约进口了1 500 吨盐，其中可能有 1/3 是进口到俄罗斯的。在随后的年月里，进口到立窝尼亚的盐数量波动很大，有时增长得也很大；在这一时期，更便宜的布雷顿盐在波罗的海东部和俄罗斯市场占据了明显的优势。15 世纪 30 年代单是塔林地区每年就有约 3 000 拉斯特盐（也就是大约有 6 500 ~7 000 吨）的进口。15 世纪

① 上引书，第 145 页。【77】
② 上引书，第 164、168 页。【78】

葡萄牙盐也来了，虽然仍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我们讨论的这一整个时期，立窝尼亚镇出口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盐的数量占了进口盐的绝大部分。供应诺夫哥罗德的盐有一部分完全有可能被再出口到俄罗斯中部地区。[1]

就铁的需求而言，诺夫哥罗德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但对铜、铅和锡的进口——尽管常由于军事原因被立窝尼亚公国所禁止——仍是必需的。尽管有这种禁令，汉萨商人特别是那些从吕贝克来的商人，仍然向俄罗斯供应这些金属，正如纽伦堡商人在15世纪渗透到立窝尼亚甚至可能还到了诺夫哥罗德这么远的地方一样。[2]

【598】在进口到诺夫哥罗德的其他许多商品中，我们应注意到有大量的葡萄酒和啤酒；鲱鱼和小贝类；从普鲁士来的木材；最后还有在俄罗斯年成不好的年月里进口的谷物。苏联近来的研究对这种物品的重要性很少关注，特别是13、14世纪更是是这样。以后时期诺夫哥罗德在稀缺年份主要从俄罗斯中部进口谷物。

诺夫哥罗德，可能还有普斯科夫持续而重要的白银进口，说明了从汉萨进口的商品虽然品种繁多，但通常抵不上俄罗斯毛皮和蜂蜡的出口价格。这一点可以从我们已提到过的14世纪中期以来吕贝克维滕堡公司账目中弄清楚。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大部分年月里，整个欧洲白银的严重短缺使得汉萨商人努力禁止这种金属对俄罗斯的出口，因而设法在诺夫哥罗德维持一种双边商品交易。他们的努力并没成功，特别由于有来自条顿骑士团的竞争。到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条顿骑士团代理商在诺夫哥罗德也很活跃——在这一时期，根据列森柯夫的推算，他们每年运送大约200公斤的白银到那里，这些白银可能主要来自匈牙利北部，但也有可能来自小波兰和西里西亚。15世纪后半期金属矿业在中欧的复兴可能影响到对诺夫哥罗德白银的供应。在我们讨论的这一时期内，白银主要以锭条的形式存在，但也有硬币的形式，虽然数量要少得多。金币，主要是英国金币，也作为一种合法货币在诺夫哥罗德为德意志商人所使用，然而比起银币来要少得多。最近苏联学者恰当地强调了中世纪后期贵金属进口特别是白银进口到俄罗斯的重要性，因为到那时为止贵金属还没有在它的国土范围内大规模开发。这些金属逐渐从诺夫哥罗德，渗入俄罗斯的中部，毫无疑问它对经济增长是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特别是对14世纪和15世纪货币系统的重建和传播很有意义，虽然

① 上引书，第216~262页。【79】
② 上引书，第308页及以后。【80】

俄罗斯被迫把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交给鞑靼人作为贡金。[1] 白银很快从中欧和西欧流入俄罗斯也说明了14世纪和15世纪前半期俄罗斯严重的货币危机是多么广泛。【599】

实际上，所有大的汉萨城镇都与诺夫哥罗德进行积极的贸易。好长一段时期以来里加、塔林和多尔帕特的势力十分弱小，根本不能利用它们有利的地理位置来减少吕贝克和其他强大的温迪西集团在诺夫哥罗德工业中的影响。但逐渐地，从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起，他们开始获得了一些成功，尤以塔林和多尔帕特（诺夫哥罗德的关系最密的伙伴）为最；里加在更早的时期就开始这么做了，它们的精力主要集中于与德国西部维纳河盆地的城镇开展贸易上。但在立窝尼亚的主要城镇，商人的任务并不那么简单。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与来自维堡和奥布（图尔库）［Äbo（Turku）］这些芬兰城镇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这些城镇得到瑞典大封建贵族的强有力支持，因为他们对这些城镇的增长和与俄罗斯发展贸易感兴趣。因此，德意志商人能够打破诺夫哥罗德的联合抵制并与俄罗斯人发展起一种积极的贸易，他们蜂拥入这些芬兰城镇，特别是在15世纪汉萨和诺夫哥罗德冲突连续不断时尤其如此。尽管汉萨尽力阻挠，但主要来自格但斯克的普鲁士商人还是经陆路到达了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这样他们也不仅削弱了塔林的地位，而且也削弱了吕贝克的地位，从而使他们的俄罗斯承销商拥有更大的优势。[2] 我们的印象是在15世纪，对与俄罗斯发展贸易感兴趣的人明显增多了。英国人和荷兰人也努力渗入俄罗斯的贸易中心，但由于来自塔林和里加的坚决抵抗，他们只能向立窝尼亚港口供应盐、布和其他不那么重要的商品，并从当地商人手中买走本地和俄罗斯生产的商品。但在立窝尼亚本地，3个大城镇并没有完全控制这种形势。纳尔维——某种程度上还有佩努——都不属于汉萨同盟，但是它们得到立窝尼亚集团的支持，成了商业中心，俄罗斯商人能在那里接触到远渡重洋而来的客商，尤其在汉萨同盟与俄罗斯人斗争时尤其如此。纳尔维的重要性在15世纪明显增加了。

所有这些缓解了汉萨同盟对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压力。遗憾的是，我们对俄罗斯城镇的商人知之不多。但是，有关诺夫哥罗德和汉萨商人做成大规模交易的史料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这一事实：即在15世纪诺夫哥罗德的商业资本积累相对而言是非常先进的，在这一方面诺夫哥罗德商人比起他们【600】

---

① 上引书，第268、271～305页；列森柯夫："Torgovye snoshenya"，第262页。【81】

② 戈茨（Goetz）：*Deutsch-russische Handelsgeschichte*，第95页及以后，第109页及以后，第135页。【82】

的立窝尼亚承销商来并没有落后许多。当时他们感觉到他们自己不断地被汉萨所施加的限制所束缚；他们也对汉萨商人在立窝尼亚活跃的贸易不满意，不断地要求汉萨保证他们在海上贸易的自由和安全。① 这样，我们发现，在俄罗斯发生的这一普遍现象，也发生在同一时期的英格兰、普鲁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并成为这些国家在这一时期的鲜明特征。立窝尼亚人们的反应也是一样的，他们不惜以任何代价来阻止在自己领土上由俄罗斯人和从西方来的客商进行直接贸易，他们同时断续地保持着对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特权。这两个共和国中没有一个强大到能打破德意志人在波罗的海东部海滨所设置的障碍，15 世纪它们在经济上对它们南部不断发展的腹地的依赖增加了，从那里他们能得到大量的谷物、毛皮和蜂蜡供应。1478 年诺夫哥罗德最终被莫斯科大公国所征服，这时的莫斯科公国已非常强大了，对向波罗的海发展贸易有着十分紧迫的需求。我们不该认为 1494 年诺夫哥罗德的汉萨加工场关闭仅仅是莫斯科对诺夫哥罗德贵族和商人的胜利，它同时也是莫斯科公国反对德意志商人在所有外国领地上包括在俄罗斯的特权——这简直是一个时代错误——斗争的结果。

人们对汉萨同盟与德国西部维纳河盆地城镇之间的贸易不像对它与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之间的经济关系史研究得那样仔细。13 世纪，主要来自里加的德意志商人与波洛茨克和维捷布斯克甚至更远的斯摩棱斯克发生了直接的联系。稍后，当整个地区都处于立陶宛的控制之下时，里加商人渗透到维尔诺以远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在 14 世纪末期和 15 世纪初期甚至更早的时候都是很活跃的。与同诺夫哥罗德的贸易一样，他们主要对毛皮和蜂蜡感兴趣。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蜂蜡成为里加贸易的最重要商品，从那里它们被出口到英格兰、佛兰德和其他地方。可是，从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购进的毛皮比【601】起在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购买的毛皮价值要低。对于在中世纪后期从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东部出口亚麻和大麻这一论点，苏联学者近来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些地区的发展到 16 世纪前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有剩余以供应国内外市场的程度，白俄罗斯林产品对里加的出口，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相当重要，然而它也只是在 15 世纪才发展起来。正因为这样，里加在这个世纪中期就已经出口了大量的白漆树和少量的木材。里加向白俄罗斯的出口在内容上也类似于汉萨同盟对诺夫哥罗德的出口，也就是主要由布和盐组成，后者

① 上引书，第 114 页及以后。【83】

可能在数量上相对大一些。但从整体上来看，汉萨同盟与白俄罗斯各城镇的贸易量——这些城镇的发展远比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要弱得多——要比德意志与后来任何一个城镇之间的贸易量都要小。14 世纪和 15 世纪，波洛茨克成为里加的主要承销商，而斯摩棱斯克东部与莫斯科的联系和西部与维尔诺和格但斯克的联系更紧密了。15 世纪的波洛茨克商人在立陶宛大公爵的支持下，也限制汉萨商人的行动自由，他们光顾里加的频率上升了，试图以此获得海上贸易的通道。他们获得了部分成功，但并不满足。它们一方面设法与格但斯克建立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来自西立陶宛和波兰的商人频频光顾波洛茨克的机会为自己牟利。我们应该把所有这些现象视为从俄罗斯经立陶宛和波兰到弗罗茨瓦夫和莱比锡这条陆上大道形成的原因之一。汉萨商人与俄罗斯和立陶宛的贸易能力因此被削弱了，而与白俄罗斯商人的贸易得到了加强。1498 年，毫无疑问是在后者的影响下，立陶宛的亚历山大大公爵给波洛茨克颁布了“马格登堡法”，再加上特产权，这样他就取消了汉萨商人的所有特权。[①] 我们必须承认他是被伊凡三世的榜样作用所指导而这样做的，而且，仅此一项举措，他就加强了边界城镇并获得白俄罗斯人们的支持。像 1494 年诺夫哥罗德所发生的一样，这并不意味着与立窝尼亚旧有的经济联系长期断裂。它只不过是使这些联系符合新的经济和政治结构。【602】

8.4.4　伏尔加河上游盆地

伏尔加河上游盆地土地的重建在 1240 年鞑靼人离开后立即开始了。[②] 但沦陷的俄罗斯领土上广大人民在被侵略期间所遭受的屠杀和掳掠使城镇和农村经济重建的成果只能在随后一个世纪的后半期才得以体现。14 世纪后半期横扫俄罗斯中部的灾疫无疑更延缓了重建的进程。

14、15 世纪，俄罗斯东北部的农业地区扩展得相当快。随之而来的谷物产量增长而促进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小规模贸易的农民群体的形成，比如收集野蜂蜜（这样就增加了对外贸易产品中蜂蜡的供应）、捕鱼、狩猎等。格雷科夫、维索洛夫斯基和切列普宁让我们注意到这一事实，即许多村庄具

① 上引书，第 512 页及以后；G. 霍利恩（Hollihn）：“Die Stapel-und Gästepolitik Rigas in der Ordenszeit 1201 – 1562”，载《汉萨历史论丛》，第 60 期（1935 年）。【84】

② A. M. 萨克哈罗夫（Sakharov）：*Goroda Severo-Vostotchnoy Rusi XIV – XV vv*（莫斯科，1959 年），第 45、47 页，第 60 页及以后。【85】

有地区商品交换中心的特点，而手工业者往往聚集在这样的定居点。[1] 14世纪末和15世纪的文献证实农民积极参与贸易活动。维拉蒂默、德米特列夫和贝卢泽罗城镇周围地区的一些农民把鱼和一些其他的东西从或近或远的邻居那里买来卖给城镇商人，而这些商人也到农村地区去买卖商品。[2] 农民出现在15世纪的各个市场中，甚至包括最大城镇的市场。尽管如此，苏联学者似乎确信这时的农民经济完全是自然形态的。为了支持他们的论点，他们指出了这一事实即农民的赋税几乎没有以货币缴纳的；但不能忽视的是中世纪后期，农民参与贸易有时甚至是远程贸易，这可以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立窝尼亚、有时还可以在俄罗斯看到，尽管货币并不总是他们的交换中介。这种现象的广泛足以证实一部分农民——可能由较富裕的成员组成——【603】已经先进到超过了自然经济或物物交换的界限了。所有国家包括俄罗斯都提到过农民的租役是以实物的形式支付的，它并不仅仅满足于领主的直接需要。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刺激了世俗和教会领主去从事贸易。这可在有关瑞典、芬兰、立窝尼亚和普鲁士条顿骑士团的资料中清楚地看出来。这些国家的商人、特别是瑞典、芬兰、丹麦和挪威的商人较之大封建领主相对弱小也可以给以解释；货币贬值妨碍了交换农民租役的过程也是一种解释；最后还可以从农民与城市经济依然有很微弱的联系中也是一个原因。

俄罗斯东北部的大土地贵族，特别是教会的贵族，在14世纪尤其是在15世纪非常积极地从事贸易。莫斯科的城市大主教和特罗伊兹—塞吉夫、西摩诺夫、基里罗—拜罗泽斯基这些大修道院的僧侣也是如此。15世纪俄罗斯北部和东部盐的出口大量增加有助于刺激这些修道院的商业活动。修道院经常从事盐、鱼有时还有谷物和毛皮等的贸易，并从王公那里获得各种赋税和市场费的减免。有些很大的市场在修道院周围崛起。俄罗斯许多建筑物属于教会机构，或者贵族王公并由其臣民或仆从居住的地皮，被用作交易场所或手工业加工地，这样也给它们的主人带来了很大的利润。[3] 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判断，教会机构和大修道院对贸易的参与比王公和贵族还要多，他们在14世纪和15世纪甚至可能主导了俄罗斯东北部

---

① B. D. 格雷科夫：*Krestyanye na Rusi s drevneishikh vremen do XVII veka*（莫斯科—列宁格勒，1945年），第556页及以后；L. V. 克列普宁：*Obrazovanye Russkogo Centralizovannogo Gosudarstva v XIV - XV vv*（莫斯科，1960年），第297页及以后。【86】

② 克列普宁（Tcherepnin）：*Obrazovanye*，第312～320页；Sakharov，*Goroda*，第160页。【87】

③ 格雷科夫：*Krestyanye*，第556页及以后；萨克哈罗夫：*Goroda*，第146～151页；M. N. Tikhomirov，*Srednevekovaya Moskva v XIV - XV vv.*（第2版，莫斯科，1957年），第107页及以后；克列普宁：*Obrazovanye*，第320页及以后，第346～363页。【88】

的贸易。他们导致了这个国家不同地区地理劳动分工的形成。虽然他们强大的经济权力某种意义上是这些城镇太弱而导致的结果，但这个事实无疑也同时阻碍了他们自身的继续发展，而且封建贵族自己拥有城镇地产阻碍了市民阶级作为一个社会和法律上统一的集团的产生。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情况与中欧其他国家的情况有些类似，但是它在东北俄罗斯的体现更加明显和直观一些。

14、15世纪，我们所讨论的这个地区的城镇数量和大小有显著的增长。【604】由A. M. 萨卡诺夫有意思的研究所引发的讨论表明，早期的观点即认为15世纪俄罗斯中部和东部有大约78座贸易和手工业中心城镇的观点是太过乐观了。但是，当他把数量减少到25座时，数目又太小了。[①] 俄罗斯东北部城镇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伏尔加河上游地区，远至尼查尼·诺夫哥罗德地区，特别是在与伏尔加河上游与奥卡河和吉拉兹马相邻的地区，那显的自然条件和战略条件都十分有利。这个地区有来自黑海和里海地区以及来自北方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路线到达。莫斯科在地理位置上特别有利，特维尔和尼查尼·诺夫哥罗德也是如此。北方领土的殖民化导致了像乌斯廷、贝卢泽罗（Byeloozero）和其他许多同类小城市中心的建立。[②] 城镇和市场在北德维纳河地区和伯朝拉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它们从一开始起就依靠外部食物的供应，尤其是粮食的供应，而主要来自伏尔加河上游的农业地区。进口成本由贵重毛皮、鱼和盐的出口收入来支付。这种依赖也许是为什么北方领土更倾向于莫斯科大公国而不是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的原因之一，因为诺夫哥罗德不能保证充足的食物供应。当我们考虑到莫斯科在14世纪和15世纪对诺夫哥罗德不断增长的政治和经济优势时，莫斯科与俄罗斯的东北部之间不断增长的紧密关系似乎也可归功于这一事实。正因为此，在这一时期，莫斯科逐渐地成为了一个豪华毛皮交易中心——紫貂、白貂、北极狐等——而诺夫哥罗德市场所交易的，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一样，则是便宜得多的毛皮。急于获得对北德维纳河和伯朝拉河地区控制权的莫斯科大公不仅支持在这些地区移民定居，还努力以武力根除诺夫哥罗德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免除北方商人的赋税。[③] 虽然他们的计划直到15世纪还没有完全实现，但莫斯科在上一个世纪的前半期已经在东北部获得了重要的成功。这极大地加强了

① 萨克哈罗夫：*Goroda*，第17页及以后；克列普宁：*Obrazovanye*，第329页及以后。【89】
② 萨克哈罗夫：*Goroda*，第65页及以后；提克霍米罗夫（Tikhomirov）：*Srednevekovaya Moskva*，各处。【90】
③ 萨克哈罗夫：*Goroda*，第198页。【91】

[605] 它在东方贸易中的地位。

所有的苏联学者都同意14、15世纪与东方的贸易在伏尔加河上游盆地的经济生活中起着比与西方贸易更大的作用。M. V. 费勒注意到即使在16世纪，俄罗斯使用的东方商品也要比中西欧商品广泛得多。① 我们以前曾提到过，在蒙古帝国时期，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大贸易中心就已发展起来了，意大利在克里米亚的重要贸易殖民地也已出现。令人怀疑的是，遭到蒙古人掳掠过的俄罗斯能否立即与黑海和里海地区建立起任何商业往来。但是，入侵者所带来的伤害逐渐得到了修补。标志俄罗斯西北和东北地区经济生活复苏的一个准确迹象是，自14世纪后半期起白银被引入流通领域，铸币厂的数量不断增多。到15世纪初，已经有21个铸币厂。② 尽管它们并没有同时运行或发行大量货币，它们的出现应该被视为经济对货币的需求显著增长的证据。

对14、15世纪俄罗斯贸易史的研究至今还不很深入，但是很清楚的是，萨来—伯克和阿斯特拉罕在其14世纪的黄金时期与保加尔人和卡马河流域保持着活跃的联系。喀山在这条河流入伏尔加河的汇合点发展起来，后来成为独立的鞑靼可汗富裕的首都。它从南方和东南方进口丝绸和棉料、山羊鞣皮、珍珠、宝石、香料和其他波斯、突厥斯坦、小亚细亚和印度商品。作为交换，它出口皮革、俄罗斯毛皮、遥远北方的蜂蜡、蜂蜜等。也有许多俄罗斯商人光顾喀山，特别是在它举行盛大市场的时候。③ 帖木儿入侵后萨来和阿斯特拉罕的衰落使15世纪喀山的发展进一步加速。可能是这个世纪与俄罗斯手工业生产增长相联系的某些变化影响了喀山的贸易结构。西罗奇科夫斯基和费勒认为该世纪末，俄罗斯城镇向这里出口大量俄罗斯皮革和其他皮[606]革制品、许多铁制品、武器后来还有火器。鞑靼人的领土、高加索、波斯和后来的突厥斯坦，成了俄罗斯出卖他们产品的巨大市场。④ 尼查尼·诺夫哥罗德，这个距离喀山最近的贸易中心，最早与喀山建立起贸易联系，虽然莫斯科和特维尔还有更小一些的城镇所占比重增长得很快。在15世纪，莫斯科由于其大量的人口（根据提克霍米罗夫（Tikhomirov）的观点，它大约有

---

① 费勒：*Torgovla*，第5页。【92】

② 雷巴柯夫（Ribakov）：*Remeslo*，第680页；G. B. 费德罗夫：*Dengi Moskovskogo Knyazhestva vremeny Dimitrya Donskogo*（1359～142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第162页；萨哈罗夫：*Goroda*，第172页；P. J. 雅斯滕科：*Istorya naradnogo hozyaystva SSSR*（莫斯科，1947年），I，第212页。【93】

③ 提克霍米罗夫：*Srednevekovaya Moskva*，第132页；Fehner，*Torgovla*，第44页。【94】

④ 费纳尔：*Torgovla*，第51页及以后。【95】

3 万～4 万居民)[①] 和大公、大主教、富裕的王公、贵族和教士的豪宅，尤其是它位于主要交通干线上这一特别有利的地理位置，成为与东方进行贸易的巨大中心。从莫斯科、特维尔、科洛姆纳和伏尔加河上游其他城镇来的商人，并不仅仅与喀山做生意，而是继续向前经伏尔加河和它的冲积平原到达阿斯特拉罕，并从那里经海上到达高加索和波斯。阿法纳西·尼吉廷是来自特维尔的商人，他在 1462～1472 年间到达印度，但他认为这个国家并没有任何与俄罗斯进行重大贸易的可能性。[②] 阿姆布罗吉奥·康塔里尼（Contarini，Ambrogio）和乔萨法特·巴巴罗在 15 世纪经伏尔加河到达莫斯科，他们注意到沿途进行着相当规模的交易。尽管商人沿途被游牧民和其他强盗所袭击的危险是存在的，但这种交通却还存在着。14 世纪后半期和 15 世纪初期，著名的诺夫哥罗德强盗乌兹库尼基（Uyhkuyniki）坐船到达喀山，抢劫了那里的居民和居住于此的商人。穿行于这些国家的俄罗斯和东方商人往往组成大型商人商队，他们多与在这些地区旅行的俄罗斯和鞑靼使团结伴而行。

14 世纪和 15 世纪，到伏尔加河及其大草原的贸易路线对俄罗斯而言可能要比进一步通往西部的大道稍重要些。但从北方到顿河，随后到亚速海和黑海以及到克里米亚和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可能差不多同样重要。[③] 14、15 世纪，莫斯科和伏尔加河上游其他大的中心与君士坦丁堡因为宗教和经济原因保持着活跃的联系。拜占庭的首都对许多俄罗斯商人和僧侣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它与克里米亚城镇的联系也很紧密：最初与苏达克（索尔达尼亚），后来则与卡发。俄罗斯购进产于这些地区的东方商品，可能也少量购进产于【607】意大利和西北欧洲的布。昂贵的毛皮和蜂蜡是它主要的出口品，也许还有皮革和大麻，再后来就是手工业品。与卡发的贸易联系在 15 世纪后半期特别活跃，在这座城市被突厥人攻占后这种贸易还成功地存活了下来。[④] 卡发并不依赖于这种贸易，它是鞑靼人在俄罗斯境内抓获的奴隶的主要贸易市场。到 15 世纪，莫斯科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城镇可能不仅与锡诺普和特拉布宗建立了联系，而且还与小亚细亚的其他贸易中心建立起了联系，这种联系后来

---

① 提克霍米罗夫：*Srednevekovaya Moskva*，第 67 页。【96】

② *Khozhenye za tri morya Afanasiya Nikitina* 1466～1472. Izdatelstvo Akademii Nauk SSSR（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 年），各页。【97】

③ V. E. 西罗奇柯夫斯基："Puti i uslovya snoshenyi Moskvy s Krimon na rubezhe XVI veka"，*Izvestya Akademii Nauk SSSR*，III（1932 年），第 194、195 页。V. E. 西罗奇柯夫斯基：*Gosti-Surozhanye*（莫斯科，1935 年），各页。【98】

④ 西罗奇柯夫斯基：*Gosti-Surozhanye*，各页。【99】

对双方都很重要。① 我们虽然无法得出任何明确的有关俄罗斯和东方贸易收支状况的结论，但考虑到双方都有许多的奢侈品要交易，我们认为可能或多或少是平衡的。

这个时期，一个与东方贸易有关的强大商人集团即所谓的 *Gosti Surozhanie*，在东北俄罗斯的较大城镇特别是在莫斯科出现了。② 人们对他们的称呼表明最初他们主要与克里米亚岛上的苏达克（俄文，苏洛兹；意大利文，索尔达尼亚）进行贸易。由于西罗奇柯夫斯基（Siroetch-kovski）、提克霍米罗夫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我们知道他们是从事远程贸易的最富有的商人集团。俄罗斯商人自己也从事远征，因此就有了 *gosti*（*hospites*）的得名。我们也知道他们肯定有大量的现金储备，因为他们经常对王公和贵族贷款。他们中的一些人，像莫斯科的霍夫林家族（Hovrin family）（后来是霍夫林一戈洛文王公），还购得了大面积的土地并逐渐进入了最高层贵族之列。③ 像那些通过仕途得到发展的人一样，富裕商人在俄罗斯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④ 联想到他们进口商品的种类，我们就能猜测出他们经常只为社会最富有成员的需求提供服务。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一组富裕商人——中世纪的典型——他们组成了当时社会结构的有机部分。那些 *Surozhanie* 可能从事经伏尔加河上游地区而来的东方商品的销售服务，并把其中的一部分转运到诺夫哥罗德。但是，俄罗斯西北部进口的大部分东方商品是通过汉萨同盟而来的。这【608】种状况直到 16 世纪似乎都还没有改变。在那些称作 *Surozhanie* 的人中，不仅有俄罗斯人，还有来自拜占庭以及卡发的希腊人，还有定居于莫斯科多年并逐渐俄罗斯化了的意大利人。德米特里·唐顿斯科伊大公（Dmitri Donskoy，1359～1389）把伯朝拉河上的地产赐给一个叫安德雷·弗莱辛（Andriei Friazin）的人，这在以前是赐给他本人或他妻子的叔伯马特维·弗莱辛（Matviei Friazin）⑤ 的。弗莱辛这个名字（复数是 Friagi）意指俄罗斯的意大利人。假设俚语弗莱辛并没有用来称呼与意大利殖民地做生意的人，那么在这里提到的两个弗莱辛应该是先后从意大利的黑海殖民地迁来的。这是否可能意味着他们是我们所知的既勇敢又富有冒险精神的热那亚人？提克霍米罗夫正确地观察到这两个名为弗莱辛的商人都急于组织从遥远的北方来的毛皮

① 费勒：*Torgovla*，第 68、69 页。【100】
② 见上文第 607 页注【98】。【101】
③ 提克霍米罗夫：*Srednevekovaya Moskva*，第 155 页。【102】
④ 上引书，第 160 页。【103】
⑤ 上引书，第 130 页。【104】

和大麻的出口。[1] 15 世纪后半期，一大群威尼斯人到达莫斯科：他们并不完全是商人；有一些可能是建筑专家等。与东方贸易相联系的亚美尼亚和鞑靼商人也有在莫斯科和其他城镇定居的。[2]

在 *Surozhanie* 之后，另一群叫做苏科尼基（布匹商人）的莫斯科商人出现了。他们应该与西方贸易相联系，因此被认为参与了布匹进口。与西方的贸易对 14 世纪和 15 世纪早期的东北俄罗斯仅有有限的重要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交易越来越重要了。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个事实，即 14 世纪和 15 世纪诺夫哥罗德越来越依赖东南俄罗斯的谷物供应。从东北俄罗斯进口的毛皮，特别是从卡马河和伏尔加河来的毛皮，对诺夫哥罗德是最重要的。这些毛皮经过的道路通过特维尔公国，这个公国上的 Torzhok（意为小市场）14 世纪后半期发展成一个与诺夫哥罗德贸易的中心。特维尔在早期与诺夫哥罗德的贸易中起着比莫斯科更大的作用。欧洲西北部的布、铜制品也许还有一些铁制品通过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到达伏尔加河上游。[3] 我们也认为 14、15 世纪流入俄罗斯中央地带的大部分白银和货币是经诺夫哥罗德而来的。这些白银和货币不仅来源于购买货物时的付款，而且来源于诺夫哥罗德居民被迫缴纳给特维尔统治者、后来是缴纳给莫斯科大公的贡物中的一部分。[4] 在 14 世纪，诺夫哥罗德对统一在莫斯科大公统治之下的领土的依赖，与它的贵族对莫斯科的敌对行为以及它本身在俄罗斯与西方贸易中的中间人特权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在 1478 年诺夫哥罗德被征服后，这个贸易中心最终屈服于俄罗斯经济的更广泛的利益。1494 年，关闭在诺夫哥罗德的汉萨工场只不过是这个城镇并入莫斯科公国的直接后果，目的是为了给俄罗斯贸易更大的行动自由。伊凡三世和他的继承者与立窝尼亚的竞争是出自同一个目的：伊凡在纳维河上建立伊凡哥罗德不仅是作为一个堡垒而且也作为俄罗斯对波罗的海的贸易中心。由于俄罗斯人没有能够突破通往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障碍，从 15 世纪起，莫斯科与白俄罗斯立陶宛城镇的贸易以及因此与维尔诺、华沙、波兹南、弗罗茨瓦夫和莱比锡贸易的重要性就更大了。15 世纪后半期，托伦和随后的格但斯克都受到俄罗斯、波兰和立陶宛商人在这些新大道上的活 【609】

① 上引书。【105】
② 上引书，第 205 ~ 220 页。【106】
③ 上引书，第 136 页及以后；萨克哈罗夫：*Goroda*，第 114、125、126 页；哥特茨：*Deutsch-russische Handelsgeschichte*，II，第 65、219 页。【107】
④ 霍洛斯柯维奇：*Torgovla*，第 271 页。【108】

动不断增加的影响，沿着这条道路，俄罗斯人可能一直前进到远至威尼斯的地方。同样，波兰和立陶宛商人也光顾莫斯科。他们贸易的主导活动是从尼德兰、英格兰和德意志进口布到俄罗斯，再把高质量的毛皮、蜂蜡和俄罗斯羽毛等出口到西方。①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有相当一部分货币沿着这些路线流到俄罗斯。但是，所有这些发展并没有削弱诺夫哥罗德作为一个贸易中心的意义。相反，它的这种地位一直保持到16世纪。

8.5 结　论

对中世纪后期东欧贸易发展轮廓的勾画充分地证明了最初有关各地经济条件间有很大差异的论断。13、14世纪，这一地区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集团，它由波希米亚、西里西亚、波兰和喀尔巴阡山脉脚下的斯洛伐克组成。除了不断发展的农业经济外，矿业的存在和有利的远程贸易路线在此交汇也大大【610】地影响了这里的发展。在这个时期，波希米亚毫无疑问是最先进的国家，到14世纪末期它出现了十分类似于该世纪早些时候西欧出现过的严重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迹象，这并不是偶然的。波希米亚危机引发了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混乱，尽管这些变化对英格兰和尼德兰来说并不那么深远。此外，矿业的萧条也阻碍了这个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在以前它是重要贵金属的出口者。

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的情况又有不同。波兰经济增长的最初和最急剧阶段是13世纪，虽然在随后的两个甚至三个世纪里它的经济也在继续发展，并且没有明显的停滞。立陶宛和俄罗斯在14世纪也是如此。与所有这些国家生机勃勃的经济特点相反，西欧国家在中世纪晚期显示出经济停滞的征兆，如果不算衰落的话，同时还伴随着某种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东西方经济增长的速度在14世纪和15世纪显然是不同的：后来这种差异就没有这么明显了，虽然仍然存在。所有这些发展都在那时的政治事件中得到了体现。

东欧国家的经济扩张刺激了商业资本的大量流入，并出现了一群商人，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移民。这个过程在14、15世纪的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被打断了，但随后两个世纪在波兰国土上它的速度又加快了，因而刺激了贸易

① L. V. 克列普宁：*Russkiye Fyeodalnye Arkhivy*（莫斯科，1948年），I，第231页；克列普宁：*Obrazovanye*，第402页及以后；霍洛斯柯维奇：*Torgovla*，第295页；提克霍米罗夫：*Srednevekovaya Moskva*，第138页及以后；沃尔齐恩希克：*Studia*，第14～29页。【109】

和矿业的发展。俄罗斯经济活动则没有这么明显，虽然外国商人从南方和东南方持续不断地涌来。但应该指出，资本的进入和商人的移入只是这种持续的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货币和人都在追求能赢利的投资机会。德意志人13～15世纪在东方的各种形式的殖民可能也是出于这种动机。

当波希米亚，从某种程度上讲还有西里西亚主要以货币形式出口自己的贵金属时，我们有理由认为大量的货币也从西方流入波兰的中部和北部、立陶宛和俄罗斯，这种流动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很难想像，如果没有从西方引进白银，这三个国家如何能引入货币制度，农民又如何能逐渐实现租役交纳形式的转换。【611】

早在14世纪之前，对外贸易就已经把大量西方手工业商品吸引到东欧，而到了14世纪，这些商品就不只局限于奢侈品了。这说明大众需求已经增长到当地手工产品难以满足的水平。在波兰和立陶宛，这种状况的潜在危险直到很久以后才出现，而这时经济增长已被长期的停滞和最终的衰落所代替。【612】

第九章

毛纺业

中世纪的欧洲和现在的欧洲一样因纺织品而闻名。这里的纺织品种类繁多，既有用本地出产的纤维（如羊毛、亚麻、大麻）或用主要靠进口的纤维（如丝绸和棉花）分别纺出的纺织品，也有综合采用这两类原料，比如用棉花与羊毛或亚麻一起混合的纺织品。在所有这些纺织品中，毛织品也许独占鳌头。欧陆各地都有生产，各个阶层都在使用，身份低下的乡巴佬穿着粗呢，身份高贵、讲究时髦的富人穿着像丝绸一样精美的细呢。毛织品是欧洲内部的主要贸易物，也是向亚洲、非洲以及一小段时间向美洲的主要出口品。11 世纪的北欧海盗曾带着毛织品冒险向西横穿大西洋到北美去换毛皮；13 世纪的意大利人千里迢迢跑到亚洲大可汗的宫廷，带去的礼物就是毛织品；中世纪末期，欧洲的毛织物在地中海的亚洲、非洲各个门户大量销售。虽然这一产业的地理分布十分广泛，但有三个大规模生产毛织品的地区尤其突出——意大利、英格兰以及拉丁术语所称的贝尔吉卡（Belgica），也就是位于萨默河和法国摩泽尔间的那一地区。对上述三个地区对这一庞大出口工业的发展进行研究，从时间上可以贯穿整个中世纪的 1 000 年，开始时比较模糊，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得清晰，直到出现与近几个世纪的发展类似的区位变迁和技术进步，以及与当今世界一样复杂的产业组织和同样动荡

不安的社会结构。一个工业社会需要面对许多问题，成千上万的工人既依赖遥远地区的消费，也依赖遥远地区的原材料供给，对此，佛兰德在13世纪、意大利在14世纪、英格兰在15世纪，就已相当熟悉。【613】

9.1 罗马世界

早在罗马时代，这些地区的织布业就作为供应远方集市的出口工业牢固地建立起来。尽管残存的可供考古学家研究的样品相对很少，但毫无疑问在帝国时期，它的发展与制陶业、金属业发展一样快，并在数量、区位和组织上显示出了同样明显的变化，尽管这些变化不易察觉。随着财富的增加、城市居民及军队需求的扩大，集市对布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了，而且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带来了自由贸易，改进了交通，保证了货币的稳定，减少了在河流、陆上和海上航运的风险，从而为原材料与成品的远距离交易创造了新的可能；这也促成了地区生产的高度专业化。而且，毛纺业是新兴行省发展的理想行业。毛料几乎在整个帝国都有着普遍的需求；它不易破碎，不易腐烂，非常适合远距离航运；它的发展可以从一个对资本需求相对少的已有家庭工业起步。在每个养羊的地区，布业就因之而繁荣，在某些地区它还享有国际声誉。它在帝国商业中的重要性，可以从有名的限定国内最高工资和价格的戴克里先法令中得到证实。

毫无疑问，原始的家庭工业即由家庭来纺纱织布自给自足的状况，在整个罗马帝国中大量存在，即便在今天的某些地区也是如此。但是，它逐步地让位于商业生产。满脑子都是陈旧观念的奥古斯都看到那时罗马人穿着华丽的服装感到非常吃惊，他试图逆转时代潮流，要求他的姐妹、妻子、女儿穿着家制的纺织品衣服，在皇室做出简朴生活的榜样。早期罗马帝国的许多贵族夫人、小姐——她们自己鄙视手工劳动——监督家庭奴隶、纺纱工、织布工和漂洗工加工布，就像罗马执政官斯塔蒂里乌斯·陶鲁斯家族坟墓的壁画里描绘的那样。但在城市，由于富人与穷人都从琳琅满目的纺织品商店中选衣料，家庭纺织很快就消失了。在农村地区，在农民以及自己生产羊毛的大家庭中，家庭纺织持续时间要更久一些。熟悉纺纱织布的女奴隶，在法律上被认为是家庭财产的一部分。在阴雨天气，寒冷时节，当不能在户外做农活时，她们就也有事可做了，就是用事先早就为她们梳理整齐并准备好的羊毛来织布。即使这样，某些特种纺织品的诱惑力还是非常大。哥伦米拉抱怨说【614】

妇人们鄙视家庭生产的产品，却荒唐地追求贵重的成衣，有时甚至为此花掉一整年的收入也在所不惜。由于奢侈和懒散，她们“不肯降低身份来承担加工羊毛的任务”，因此不得不安排女管家来代替她们监视工作。就像富人在集市上购买贵重毛料一样，穷人非常流行购买大规模生产的便宜毛料。对大户人家来说，甚至给普通奴隶使用家织布也太奢侈了。哥伦米拉说，主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可能会让管家、监工及地位稍高一点的奴隶使用家织布，但对于其他的奴隶来说，给他们使用从外面买来的布则更省钱。

早期罗马帝国的富人与穷人，大多从一个专业化的产业购买所需要的布料。这在某种程度上被描述成一种手工工业——假如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描述这样一个产业的话：由独立的、互不往来的手艺人从事，他们靠自己的产品生存，通常为佣金而直接为客人工作，经常加工顾客本人的原料。但是，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大规模产业，通常位于离罗马很远的地区，在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直接指导下经营，为出口到很远的集市而组织起来。我们这里关心的就是这个巨大的产业。

在文明程度比罗马更早的中东地区，那样一个巨大的工业已存在很久了。帝国贸易的发展无疑给它注入了新的活力，希腊与弗里吉亚的优质毛织品在罗马也有集市。在组织和技术方面都没有显著的发展或增强，或有惊人的改变，倒是其他纺织品使得这个地区特别有名。埃及是工业化程度相当高的一个地区，它富裕的原因不是因为毛织品而是因为亚麻、棉花和丝制品。埃及给索马里兰德居民大规模生产亚麻制品并把它们销售到印度；它还把用印度的棉花和中国蚕丝制成的产品往西运到罗马，以与制造宽外袍的那类老式毛织品竞争。

真正明显的进步出现在西方。首先发展起了大规模的羊毛工业的地区是意大利南部。它在帝国的第一个世纪快速工业化，毫无疑问这应该归于它与亚历山大和中东高度发达地区的紧密联系以及罗马集市不断扩展的需求。长[615]期以来，罗马人就穿着他们自己的绵羊毛织成的衣服，而在意大利南部，几乎每个农场都饲养绵羊；它们在亚平宁山脉的斜坡上异常繁盛，尤其是在阿普利亚区和卡拉布里亚区。在山脚下的小市镇，羊毛被卖给有鉴赏力的买主——他们很快就能区别出质量和质地的差异：如克努西厄姆的羊毛因比塔伦图姆的羊毛柔软而著名，但不如后者有光泽。在那里，如同在特勒西亚一样——城镇官员建立起了用于买卖或准备羊毛的羊毛作坊，而贝尼文图姆有自己的“羊毛记账员”。坎尼（Cannae）、科芬纽姆（Cofinium）、阿米特努姆（Amiternum），也集中了大批羊毛商，他们极可能是将羊毛分出去纺纱。因为

纺纱这一程序，在18世纪使用动力以前，实际上都交给妇女在自己家里完成。在织布的过程中，纺纱这一环节能非常有利地利用业余或全职劳动力，可以在乡下也可以在城镇进行，前提是羊毛的分发和收集以及成品毛线的称重都能得到妥善的安排，以求保质保量。这些城镇小集市因为羊毛与纱线的航运而兴盛起来。有时它们也成为加工城镇，将棉纱加工成布料，特别是比较便宜的毛料。克努西厄姆就是这样，它的耐用黄褐色布——“就像浑浊的蜂蜜酒的颜色”——1世纪时在罗马大量销售，主要是奴隶穿用，就像《武士》讽刺短诗所说的那些“穿着克努西厄姆羊毛，汗如雨下”的叙利亚人。

但是，有许多羊毛被以原毛、纱或未加工的网状织物等形式运到海岸，在那里漂洗、染色、磨光并以高价上市。如在庞贝，漂洗工用手来处理，他们还洗被弄脏的衣服；他们的工作在维特蒂宅第的壁画以及漂洗场的墙上有生动的描绘。首先，漂洗工用脚在槽中猛踩与水、肥皂和漂土混成一团的原材料织物。这是为了清洗并将其去油使其缩水并且更加结实，从而生成结实且不缩水的大致为原长2/3的布。然后在木架上拉抻晾干到合适的长度。最后，当绒布还没有完全干透时，用刺猬的皮或一个有芒刺（中世纪起绒机的前身）的设备将细细的毛挑起，干透后用剪刀将表面剪平滑，从而使压平后的布表面平滑甚至有些像丝绸。漂洗工作不仅仅需要技巧与一定数量的设备，还要有广阔的空间用于晾干以及干净新鲜水的充足供应。由于这个原【616】因，漂洗厂经常沿水设置，彼此相邻，并需要协调水的使用。这可能是中世纪时期罗马经常有漂洗行会形成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在庞贝，漂洗厂的老板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有钱人，不仅仅关注漂洗而且还关注销售，并且可能充当企业家组织生产。尤马恰娅（Eumachia）夫人在庞贝为漂洗工建造的大厅不太适合做一个漂洗场，但是它的大庭院及柱形走廊是做交易的绝好场所。我们有幸获得了意大利较小工业中心漂洗工交易的实物证据。在南意大利的其他地方，漂洗也可能一样重要，甚至可能更为重要。然而，除了知道在阿平尼厄姆（Arpinium）有城镇建造的漂洗厂以及在斯波雷丢姆（Spoletium）、法勒鲁姆（Falerium）和罗马有漂洗行会外，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很少。

再往南是塔伦图姆（Tarentum），它在1世纪以出产优质羊毛及黄褐色布而著名。当地中海的紫色渔场适应奢华毛料的需求而发展起来时，它的染织品更为著名；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够穿得起这样的紫色服装，因为用这种外在介质染的衣服，其成本是用来纺织这件衣服所用布的羊毛成本的将近100倍。当罗马帝国后期私人企业越来越让位于国有企业时，国家自己开始

大规模从事这项产业，在塔伦图姆建造了帝国染料厂（*bafia*），在南意大利的文努西亚（Verusia）和克努西厄姆（Canusium）建立了纺织场。

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脉也出产优质羊毛。在1世纪克里斯蒂时代波河盆地也有毛纺业，当时，帕塔维厄姆将大量的各式毛料送至罗马。2、3世纪这个产业继续繁荣，并且无疑受到多瑙河行省的发展和邻近多瑙河军队所在地两个因素的刺激，直到它大大地超过南部的毛纺业，从而使南部衰退变得更加明显。北部的大工业城镇，如帕尔马和穆蒂纳或阿尔廷努姆（Altinum）大量生产标准纺织品，那需要有相当职业化的劳动力和较高的组织水平。在布列克塞亚有梳羊毛者行会，在布列克塞卢姆有起毛工人行会。维罗纳因地毯而著名。帕塔维厄姆因结实的高萨帕起绒粗呢而著名。波兰提亚像克努西厄姆一样，用粗布交换奴隶。帝国后期当国有企业风行时 [617] 在这里也建立了加工场。在梅第奥拉纳姆和阿奎莱亚有帝国的女工工场（*gynaecia*），也许主要为边防军队而纺织，而且多瑙河附近的西缪姆和亚得里亚（Adriatic）海的萨罗那的女工工场也为满足这些军队的需求而生产。在罗马也有女工纺织场。

意大利纺织业如此活跃，以至于它最初依赖的国内羊毛供应很快陷入短缺，而且从公元1世纪起，帝国就开始从其他地区进口羊毛，尤其是从小亚细亚、西西里、西班牙、高卢进口羊毛。西班牙是最重要的原材料产地。西班牙的布一度在罗马拥有广大的集市。西班牙斗篷曾被征服的凯尔特王（Celtiberi）用作贡物，还有许多来自于贝蒂卡的布也是如此。但是，现在更需要的是羊毛而不是布。北方生产廉价羊毛，而南方却生产优质羊毛。所有这些中最好的是贝蒂卡牧场出奇漂亮的黑羊毛，罗马农民，如哥伦米拉的叔叔在那里科学饲养绵羊——他曾被送到非洲饲养公羊。这里生产一种令人喜爱的黑毛料，甚至可以和染有推罗紫（Tyrian purple）① 的塔伦廷（Tarentine）羊毛在市场上竞争，自夸为：

Non est Lana mihi mendax nec mutor aheno;

Sic placeant Tyriae：me mea tinxit ovis.

在西班牙的南部，罗马人也发展了染料生产，取得了红色染料如辰砂、赭石土，尤其是大量的胭脂虫红（kermes）。胭脂虫红是从一种以橡树为食物的地中海昆虫的干体中制成的。人们从小亚细亚和西班牙进口这种染料，

① 推罗紫是一种红紫色。推罗是古腓尼基的一个奴隶制城邦，这种紫色最初来自这一地区。——译者注

颜色猩红，亮丽持久，可以与一度完全占领西方的推罗紫染料相媲美，尽管它与植物染料比起来成本高，但比渔场中提取的紫色要便宜。按照戴克里先法令，染有尼西亚胭脂虫红的1磅羊毛价值1 500第纳尔；而染有苔类染料的1磅羊毛价值600第纳尔；染了推罗紫染料的1磅羊毛值16 000第纳尔。

因而，西班牙尽管继续自己生产布，但主要成为意大利工业原材料的供应者。地中海高卢也是如此。在塞文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山坡上放养了大量的绵羊——在罗马时期的墓石上仍可看到对这种盛况的描绘——羊毛从这里通过纳波港口运往意大利。在纳波和特罗也建有帝国的染料厂，从而组成了环西地中海的帝国工场链，除了包括在塔伦图姆海湾的工场外，还包括在非【618】洲行省和巴里阿里群岛的一些工场。但在高卢南部除了在阿雷拉德（Arelate）有皇家女工工场以及在罗恩河上游的鲁德冈努姆有另一工场外，没有任何其他大规模羊毛制造场的踪迹。在高卢西部的加龙河下游毛纺业似乎还有点发展，因为在戴克里先法令中，比图里吉斗篷被列在高价产品之列。

毛纺业最惊人的发展是在高卢北部，其速度比意大利北部更惊人。它是帝国时期工业中心分散化的一个典型——中心的重要性衰落了，而其外围的经济活动却加强了。毫无疑问，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一种生产向消费地区转移的趋势。但变化远不止如此。高卢北部与意大利北部一样，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出口区。其工业化程度可以由数量众多的毛纺业工人坟墓纪念馆看得出，只有在意大利才有与此相当的数目。这个制造地区径直穿过布拉班特国家，从萨默河延伸到摩泽尔河，穿过现代皮卡第、阿图瓦（Artois）、布拉班特西部、香槟和洛林——那时候被阿姆拜尼部落、阿特雷巴特斯、纳维、雷米、特里维里和梅蒂奥马特里西部落及其罗马化城市阿姆拜尼（埃米恩斯）、阿特雷巴特斯（阿拉斯）、图那坎（图尔奈）、雷米（兰斯）、奥古斯塔特里维诺鲁姆（特里尔）和奥古斯托顿诺（梅斯）所占领。

高卢的斗篷与羊毛在1世纪帝国的罗马找到了集市，但那时的羊毛粗糙、毛乎乎的，由它织造的纺织品更是不平整。因此，高卢的服装首先是普通人穿的，《武士》讽刺短诗说，它与罗马紫色服装的关系就像阿雷廷的陶器与优质水晶的关系。不过，它们变得越来越流行，因为这种坚实的斗篷带有一个很大的帽兜能保暖。因此，对这个产业进行投资是有利可图的。不久以后，罗马养羊人就成功地生产了大量的改良羊毛，结果布拉班特人就把高级羊毛和布料以很高的价格出口到意大利。羊毛生产的数量与质量一样引人注目，特别是阿特雷巴特斯地区。奥诺修斯述说，有一年羊毛夹着雨从天而降，无论这神话的起源是什么，毫无疑问它可以说明，4世纪这个地区的羊

毛是非常丰富而又优质的。在戴克里先价格表中，它的价格最高，比任何其[619]他羊毛都高许多，即使是塔伦图姆羊毛也不例外。时髦的罗马人不再嘲笑用它制成的衣服，而是将它们与最好的意大利服装相比。这些衣服不仅住在高卢的罗马人穿着，就是在意大利也非常流行。4世纪，一件阿特里巴特斯军大衣，对一个富裕的罗马人来说就像亚麻对于一个埃及人一样，必不可少。由戴克里先价格表可知，因斗篷价值高而闻名的地区还有阿特里巴特斯的近邻——阿姆拜尼、特里维里和内尔维。实际上，内尔维人的长兜帽斗篷（*birri*）也非常受人喜爱，以至于小亚细亚的人都模仿它。在一个拥有大量的优质羊毛并有熟练工匠的地区建立4个帝国的女工工场——在图那坎、雷米、奥古斯塔特里维诺鲁姆和奥古斯托顿诺——这一点也不令人惊奇。

除了这些国有工场外，关于贝尔吉卡工业组织的可靠信息很少。我们甚至不知道它在这个城市集中的程度。有些布也许以半成品形式出口，因为戴克里先法令提到过内尔维的新式带长兜帽的斗篷的漂洗价格。但桑斯一处墓葬表明，一部分漂洗和成衣的工作是在高卢完成的，它所显示的是漂洗工在槽中踩洗衣服，在槽子的上面是一把三英尺长的剪刀。在这里肯定也有了许多染色工作，尽管在这方面，高卢还无法与地中海地区竞争。这是因为，尽管他们也喜爱华丽的颜色，但他们既无推罗人的紫色也无猩红的胭脂虫红。不过，他们广泛地从植物中提取染料，普利尼说他们可以用这些染料模仿出所有颜色，甚至可以代替推罗人的紫色，只是不那么耐久，“不用冒险去海底找软体动物；无须花费很大的力气就可以增加娼妓们的吸引力”。在布料生产中心阿尔隆的墓碑上画着一些人在搅大桶，这曾使考古学家迷惑不解，但几乎没有疑问的是，他们代表的是染工。实际上，从墓碑上可以看出，染工与漂洗工的地位特别重要，比其他工人工资更高。这是因为，这两个工序不仅需要大量设备投资，而且与成品最后的外观紧密相关。地位最重要的是布商，因为他们对外国集市有专业知识，而外国集市正是这个产业赖以生存的命脉。塞坎蒂尼就是如此，特里尔附近的伊吉尔奢华的纪念碑就是用来纪念他的，在那里可以看到航运中成捆的珍贵毛料，首先是沿河由驳船航运，然后是放到骡背上，穿过高山，毫无疑问要沿莱茵河而上，跨过阿尔卑斯山[620]进到意大利本土。

不列颠是所有西方行省中发展最晚的一个，直到4世纪才开始生产出口布。但是到戴克里先法令颁布时，集市上有两种不同的不列颠床单或帘子（tapete）和一种不列颠长兜帽斗篷（birrus），它的价格适中，比坎努西亚（Canusian）斗篷贵，比内尔维斗篷便宜。在文塔也许在温彻斯特有帝国女

工工场。除此之外，我们能确切知道的有关不列颠在罗马时代的毛纺业就没有什么了。所有其他的只是猜测。已经在三个别墅中发现的水槽让人依稀记起在庞贝的漂洗工画上所描述的场面——在肯特的蒂塞和达伦斯，在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的切德沃斯——由于它们都紧邻漂洗工的泥床，于是就认为那里有漂洗场。但最近的发掘表明，切德沃斯（Chedworth）的水槽是两座建筑的复合体的一部分，对蒂特塞和达伦斯也可以做类似的解释。在西尔切斯特也许也有染场，但不能肯定。惟一能肯定的是，不列颠优质布的出口是存在的，尽管它的发展比贝尔吉卡慢，并且在罗马时代它从没有发展到可观的规模。

9.2　转变中的北方工业

帝国解体后，这个繁荣的产业及其在整个欧洲可能还有其他地区的商业联系又怎样了呢？最大的可能是它从未完全消失过，但由于缺乏记载，我们对它在罗马衰落后最初的几个世纪的命运所知甚少。可以肯定的是，绵羊仍在饲养，尽管规模减小了；仍有一些传统的生产技术保存了下来，织布仍在继续，不仅仅是满足家庭内部需要的家庭手工业，而且是作为一种专业手艺人的产业，他们如果不是为国际集市生产的话，至少也是为了地区集市而生产。在我们手中有关6世纪高卢的资料中，有关图尔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的部分，其中就谈到了独立手工业者靠着佣金谋生。这本书谈到一个手工业者（*artifex lanariae*）被召去加工皇室羊毛，还谈到一个面粉场的管理者在种田的同时还生产羊毛外衣。比德（Bede）[1] 的作品第一次展现了7世纪末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生活的清晰画面：羊群是这幅画面的一部分，库思伯特在晚上睁着眼躺在山坡上，看护着托给他照看的羊群，此时他的同伴正在睡觉，他看到的景象，不知不觉就把他吸引到了修道院。8世纪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习惯穿着羊毛斗篷与束腰外衣，这些衣服经海路送到在欧洲大陆的英国传教士手中，对那些不适应日耳曼中心地带严冬的人来说，这是最好不过的礼物。尽管圣卜尼法斯（Boniface）在弗里西亚（Frisia）的传教地点附近买了些衣服，但还特别想要英格兰的毛织品。他写 [621]

① 672～735年，盎格鲁—撒克逊神学家、历史学家，对自然科学也有相当研究，主要著作为《英格兰人教会史》。——译者注

信给沃尔茅斯的修道院说："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拜托寄给我们一件大衣，因为这对于我们的旅行将是莫大的宽慰。"他向修道院的院长说，这些衣服很舒服，减轻了他们的痛苦，尽管肯特的国王埃塞尔波特（Ethelbert）送给他们的包裹中有两件斗篷。在西欧和黎凡特到处都有英国传教士、商人、朝圣者、学者、大主教、修道士或修女的世纪里，在这些地方发现有英国毛织品应该毫不奇怪。

没任何理由认为，送给英国传教士的衣服是宗教团体自己而不是世俗工匠生产的。所有证据表明，事实正好相反。实际上，修女有时也纺织，如佛罗伦萨圣安德待的修女就用首领送给她们的羊毛为他织了5件结实的衣物。但她们似乎一般把纺织当成一种艺术，生产一些小的贵重物品，如祭坛布，而不是作为生产日常穿着产品的一种产业。因此，在整个中世纪，纺织仍然是一种女人愉快的消遣，无论是对世俗妇女还是宗教界的女人都是如此。7世纪，科尔丁汗姆（Coldingham）的几个修女遭到谴责，因为她们把闲暇的时间用来织衣服把自己扮成新娘而不是去修炼她们的灵魂。最初，日常服装通常在远离修道院的集市上就能买到，这一点修道院的规章可以清楚地说明。例如7世纪有规章规定，在他们旅行去购买衣服时，可以免除尔比和圣丹尼斯宗教机构成员的过路税，在英格兰与意大利对同样的机构无疑也有类似的规定。在这方面，宗教社会与大的世俗家庭一样，都为商业性布匹生产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市场。

因此，毫无疑问，7世纪及8世纪早期的西欧有一个相当大的毛纺业存在，在开放集市上买卖着大量的布匹。但有关这个产业的规模、结构和区位的情况，迄今为止还不太清楚，除了在英格兰，我们知道可以说它至少基本上满足了本地市场的需求。依靠目前可得的证据来评估这个产业的重要性显然会犯错误，因为工业史学习者所熟悉的像中世纪晚期那样的历史资料，在这一时期几乎不存在。

【622】

到8世纪末期，毛纺业的发展状况变得稍微清晰了些，我们可以清楚地辨析出所谓的北海产业中心是由英格兰诸王国和加洛林帝国的东北部（这是查理曼登基的地方）组成的。这里像在罗马时期一样，建立了一个非常稳固的优质高价斗篷出口产业，它的价高是因为羊毛质量比较好，而且颜色也好；明智的统治者如奥法（Offa）和查理曼促进了这项产业的发展。这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

尽管这一产业相当重要，但它的规模不应被夸大，因为当时的人们并不像今天这个世界的每个人一样，都要依靠它。农民继续在家里纺纱织布，需

要时可以很快地架起原始的织布机开始工作。和在罗马时期一样，至少有些大家庭现场加工羊毛，让他们的家内农奴梳理、纺织、漂洗和印染。这样，就如哥伦米拉指出的，采用这种方式，聪明的庄园管理者能在冬天或雨天不能在户外劳动时有效地利用大量劳动力。因此在查理曼帝国法令当中，乡村庄园管理者被命令一定要保证女工工场有充足的羊毛、亚麻、靛蓝、茜草、朱砂、羊毛梳、起绒草、肥皂、油脂及其他必需品。这些工场的产品在多大的程度上被集市化，在多大的程度上按照管理者的规定去努力提高庄园的收入，这些都不得而知。与奥古斯都一样，查理曼也相信只有穿家纺布做的衣服才是做人的美德，虽然按照爱因哈德（Einhard）的说法，这只是他为了防止女儿变得虚荣而采取的一种办法。更重要的是，他偏爱本国产的毛织品，而不喜欢外来的丝绸及其他在拜占庭与一个帝王的尊严相称的产品，这就鼓励了本地毛纺业的发展。由于他对外国服装的憎恨——无论这些服装多漂亮他都不穿，除非在罗马，而且即使在那里也只有在教皇的要求下他才穿——他开创了法兰克服装的风气之先，因为这对国内销售的刺激作用就像他赠送给远方的君主如哈伦·阿尔·拉西德等的礼物对国外市场的刺激一样大。

查理曼穿的弗里斯兰斗篷，在当时的国际商业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它的准确发源地，人们却有很多争议。它们是弗里斯兰生产的呢，还是别的地方如佛兰德斯或英格兰生产的呢？被称作弗里斯兰是不是因为弗里斯兰商人销售它们呢？皮伦尼认为，它们是低地或邻近地区出口工业【623】发展的证据，这也许是对的。无论如何，它们肯定说明了这个地区某地生产优质布，而且这种布都是经过染色和磨光的，在广大地区有大量需求。根据808年一次牧师会议的资料，希腊风衣卖得高价，尽管虔诚者路易嘲笑他父亲喜欢穿本地产衣服，并且在大宴会上赏给其皇宫里的最高级贵族们以丝绸，但希腊风衣对那些低一级的高官来说仍是足够地好，并且比那些给简朴佣人穿的普通服装要好得多。自从这些毛料沿着古老的商路到了黎凡特，并随着查理曼的大使到了巴格达之后，激起了哈里发臣民的极大需求。在本土，它导致了生机勃勃的交通航运发展，因为弗里斯兰人不仅仅经海沿着北海海岸航运，而且经陆地到达莱茵河，在那里以较高价格与南方的产品交易。在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流放在斯特拉斯堡的厄诺尔德·利·诺尔（Ernold le Noir）说，沃斯格人从弗里斯兰得到了他们以前从来不知道的各种颜色弗里斯兰的斗篷，他们用谷物和葡萄酒来交换，这些东西是他们沿着莱茵河到海边的路线出口的。

我们接受皮伦尼的结论并不反对英格兰把它作为一项出口产业的观点。

这种反对是不可能的。因为就我们所知，8 世纪前半期有大量的英格兰斗篷流入大陆。在 8 世纪的后半期它是加洛林帝国和麦西亚[1]（Mercia）这个英格兰重要政权外交交易的对象之一。查理曼给奥法写信说，他的大臣抱怨从英格兰送来的斗篷太大了，并要求这些服装应该“像以前一样”制作，这表明这种交易是长期稳定的，并且这个产业正在生产的标准化服装，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国家的管制。这些斗篷是卖给查理曼王国消费还是由法兰克商人发送到更远的地方，我们无法知道，但仿照哈伦·阿尔·拉西德铸造硬币的奥法（Offa），可能至少也曾梦想过，英国的毛织品能像弗里斯兰的一样到达巴格达宫廷。

因此，当 9 世纪初北欧海盗开始袭击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北海海滨时，他们突袭了这个工业和农业都繁荣的地区。他们对英国的布、谷物和酒一样贪[624] 心，因为他们的国家几乎没有绵羊，他们垂涎穿在外的优良毛织品的舒服，也贪图吃在内的葡萄酒的美味。作为强盗他们抢劫装满了布的船；作为和平的商人他们为此而讨价还价，用北方的鱼、皮革和毛皮来做交易。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10 世纪末 11 世纪初北海地区的毛织品出口到了挪威。埃吉尔的传奇（Egil' s saga）叙述了索罗尔夫怎样派大船到英格兰购买所需要的毛织品以及其他货品的。国王斯维里尔也非常感激那些给他的地区带来“小麦、蜂蜜、面粉和布料”的英国人。

如果挪威进口的布中有英国布和法兰克布，那么可能也有来自爱尔兰的布。爱尔兰商人 975 年带到剑桥的斗篷也许是爱尔兰制造的，也许不是。但有证据表明前加洛林王朝时代，爱尔兰布被送往布列塔尼，而且爱尔兰人肯定擅长纺织羊毛与亚麻，也擅长印染与刺绣。精美的产品都是一些大工场里的妇女制作的，其中有一些像查理曼的女工工场也生产自己的染料；在许多村庄，纺织业是副业，比如圣·布里吉德访问穷困寡妇芬格尔家时，她将织布机上的横木拆掉生火来煮她惟一的小牛；《权利书》（大约在公元 900 年）说明了毛纺业在这个国家经济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书中谈到了作为贡品的线、羊毛、斗篷以及有绒毛的斗篷。那样的斗篷往往绣得很精致，为挪威商人及住在冰岛的挪威居民所迫切向往。

这样，海盗们给自己穿上了西方的毛织品和东方丝绸锦缎，光彩夺目的衣服令旁观者羡慕不已。当他们冒险穿过大西洋时，他们是用红布去换取北美人的毛皮的。《弗拉泰书》中叙述到，土著人用一张优质毛皮只能换到一

---

① 中世纪早期英国七国时代的七国之一，位于今英格兰中部。——译者注

作布，而且当布快完时，古挪威人将布剪成越来越小的片，直到碎片的长度不到一指长。

毫无疑问，北欧海盗的扩张给了北海地区毛纺业巨大的动力，因为这些人的财富和暴发创造了新的需求，而且他们的长途商路促进了优质布在更广阔地区的交换，也促进了进口原材料并将布销售到很远的地方的职业制造中心的发展。11 世纪末 12 世纪初，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修道院教堂以及城堡周围聚集着小群工匠——就像 9 世纪漂洗工聚集在圣里奎尔一样——而且还可以看到织工及其他布业工人的大规模集中，他们对城市的发展，对自由机构的发展以及那个时代整个城市的复兴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625】

如果说 11 世纪这种北方产业的快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外部集市不断扩大刺激的话，那么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地区内部的发展，它的人口增加以及对自然资源开发的深入。这样的发展反过来又要依靠一个政治稳定的体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地区在这个时期迅速地一跃而冲到了前面，超过了所有竞争对手。这也正是在佛兰德斯伯爵的开明统治的结果。

佛兰德斯地区从阿拉斯延伸到斯凯尔特，有清晰的证据表明，11 世纪剩余人口使这个地区再也无法承受。许多佛兰芒人参加十字军，或报名参加诺曼人的军队去征服西西里或局势混乱的英格兰。其他一些人涌入城市，加入到不断膨胀的无土地工匠队伍之中，为这个巨大的城市产业供应劳动力，靠用制成品来换取食品为生。一些人则继续修坝、排涝以及清理沿海的废物来开辟新的耕地，用这样开发的新牧场养活成千上万只羊，并用其羊毛来满足不断发展的城镇工业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佛兰德人将自己工业化了。新的城镇崛起了，旧的城市得到复兴并且日益扩大，郊区到处是布业工人——织工、漂洗工、染工和其他工种的工人——延伸到其他乡村地区。实际上，佛兰德的每个城镇都是一个纺织城，并靠出口贸易为生。因此，为了购买食物和原材料以及出售成品布料的集市得到了发展。根特在该世纪初有一个很活跃的集市，当时图尔奈的阿德拉德（Adelard）满载羊毛与其他商品到达这里。在 1024 年和 1043 年阿拉斯和圣奥梅尔征税的商品中有羊毛、染料、起绒草。在集市上如索鲁特集市就有布匹买卖。商人行会主要关注食物与原材料的进口以及成品的销售，如瓦伦西恩勒斯的商人行会还有自己的布业大厅。11 世纪后半期，佛兰德布的声誉在特里尔诗人温里克的诗《羊毛与亚麻的冲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这里，佛兰德被描述为一个生产精致优美布的中心，生产的布远比邻近地区好，并出口到英格兰、法兰西与德意志。【626】

在佛兰德的布业城镇，我们逐渐发现那里不仅仅有商人协会，如瓦伦西恩勒斯的商人组织，而且还有工匠协会，他们因为有共同的利益、问题和需要而聚集在一起。这些组织的缘起仍然不清楚，也许永远只能猜测。但我们可以清楚地追溯到其早期发展的某些因素。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漂洗工人街和印染街，它们都在河边。这暗含了一个特定的工业因素。漂洗与染布都需要大量干净的水。因此行会间有必要达成一致协议以规范某段水流的使用，防止水受污染或被截流。往往有必要采取共同行动以从主人那里获取使用某段河流的权利，维护这种权利并对抗其他提出类似要求者；由于主张这些权利经常会产生争端，如1220年多埃的圣阿美修道会要求赔偿20第纳尔，理由是他们的谷物作坊的工作受到了印染工人扔在河上的秽物的影响。就像居住到一起是为了保护和规范调节行业的发展一样，工人们为了困难时期能相互救助，也形成自己具有博爱性质的兄弟会。12世纪有不少这样的兄弟会存在，虽然有关它们的现存法令最早只能追溯到13世纪。在手工业组织产生的过程中，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安全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宣扬说，这个社会存在的根本在于改善其成员的福利，这可以通过下述途径来实现，比如在他们的教区建一个小礼拜堂，或至少建造一个永久性的祭坛，教堂里的某个圣人可以充当他们的保护人，教堂的牧师定期到那里布道等。

12世纪的英格兰与佛兰德一样，毛纺业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尽管在前一世纪它有点落后了。诺曼国王的强有力统治，授予皇室领土上的城镇和商人以特权，国家政府的稳定制度的逐渐出现，所有这些都有利于羊毛工业的发展。随着诺曼征服而涌入的佛兰德手工业者也起了这样一种作用。在自然资源方面，英格兰蕴藏的矿产与佛兰德一样丰富。它也有优质的牧场，在末日考查（Domesdy survey）时代，那里放牧着成千上万只绵羊。它的漂洗土丰富，适合种植起绒草与染料植物，如染料用的茜草、黄木犀草、靛蓝等；11世纪行政官指令种植茜草和靛蓝表明它们的种植是相当普遍的。12【627】世纪末期，英格兰自己的染料不敷自用。没有什么比理查一世（Richard Ⅰ）统治时进口大量靛蓝更能说明其工业的发展了。织布显然是英格兰最重要的产业，尽管它仍然以农业为主，但其工业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它的布正在逐步占领欧洲集市，并且到这个世纪末成为这个国家立法的主题。1197年《度量衡法令》规定，印染布只能在城市以及大的自治城市生产；它还规定了统一的宽度标准，规定无论哪里产的布都应该保持90英寸宽，并且中间与周边的质量要一样。

不可避免的是，在英国也像在佛兰德一样，存在商人行会，它们最关注

的是保证纺织业原材料的供应及其产成品的销售。在这种商人行会存在的城市，所有有关布的交易以及布的染色和打光销售等都只能由行会成员来进行，也许正是他们促使了《度量衡法令》的产生。同时，聚集在城镇的许多手工业者也组成了自己的行会。当他们所在的城镇位于王室的领地之上时，他们也像商人一样寻求王室的特许权。在现存有关王室账目（1130～1131年）的最早记载中，有伦敦、温彻斯特、林肯、牛津、诺丁汉和亨廷登（Huntingdon）郡织工和温彻斯特漂洗工人向行会缴费的记录。数年后，约克郡的纺织者行会出现了，入会费用为10英镑。从为特权所支付的费用来看，这些行会很显然比其他行会要大而且更重要。

到12世纪，起源可追溯到过去很远的北海地区毛纺业以惊人的速度重新发展起来，达到了为远方集市大规模生产标准化纺织品的城市化阶段。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在东至斯拉夫西至爱尔兰的斯堪的纳维亚繁忙的贸易路线上，进行着非常活跃的交易。佛兰德布不仅闻名德意志，而且在远至东方的诺夫哥罗德也很有名，在那里，圣施洗者约翰商人兄弟会每年当主教在行业守护神日给他们做弥撒时，他们都要将一段伊普尔布送给主教。英格兰布闻名于莱茵河，并且在斯堪的纳维亚的需求量也很大。奥拉夫的儿子1171年在都柏林巡游时，从英格兰手中夺取了两艘装满英格兰布的船只。他凯旋回到奥克尼郡，向人们展示了他的战利品并把这些布缝在船帆上，后人称他的航行为“毛呢巡游”。【628】

然而，这条北方贸易通道已经开始逐步逊色于另一条数量与重要性都超过它的商路。意大利商人沿着阿尔卑斯山关口旅行，到12世纪初期已经渗透到佛兰德并穿过一道道关口到英格兰做生意。到12世纪的中期，他们经常到香槟集市做布匹生意。佛兰德商人也挺进到了意大利。一部分北方纺织品稳步向南推进到地中海各港口，有些销往意大利，但大多数最终销往非洲与黎凡特。与东方的贸易也变了样。布料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支付香料、丝绸、象牙以及宝石或硬币进口。不仅贸易收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而且进口也扩大了。伴随着自古以来就是贸易大宗的奢侈品而来的是布业原材料，尤其是染料。地中海贸易的扩张和北方纺织业的扩大不断地相互作用，在非洲以及近东培养成了一个欧洲大量生产的纺织品的巨大新集市，这又极大地增加了欧洲的购买力，创造了对东方奢侈品的新需求。

北方染工不再只是满足于本地药材，如靛蓝与茜草这些法兰克和撒克森先人曾用过的染料，由于有来自异域像亚洲和地中海的产品，他们极大地扩展了颜色的范围与品种。小亚细亚、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胭脂此时被叫做沙

粒，其在北方的使用就像罗马时代在南方的使用一样；它也被用来印染国王穿的昂贵猩红色衣裳。其他红色染料产于东方。如巴西红——此时大量用于英格兰和佛兰德——是从东印度来的一种树中提取的；根据马可·波罗的说法，质量最好的染料产于锡兰，他带来种子在威尼斯培植。巴西木经常是从黎凡特回程船的返程货物，而且更重要的是被大量运回的明矾，它是调定染料时的主要配料。北欧的明矾远不如南欧的好，现在它的主要的供应源是北非、小亚细亚和黑海，特别是菲凯亚的矿山——它已被希腊人开采了一千多年，如今为热那亚人所拥有。

因此，到12世纪末期，这种北方产业的原材料与产成品的市场都极大【629】地依靠遥远的地中海集市。这一事实对理解这段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对这一产业及其组织的发展都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地中海贸易从12世纪晚期到13世纪晚期达到高峰，同时这也是北方纺织业非常繁荣与稳定的时期，需求日益增加，工业向前发展，它们都是沿着既定的产品发展，并无任何中断。这种时间上的重合肯定不是偶然的。这一时期由于许多老工业中心的劳工斗争和工业萧条而结束了。与此同时，地中海集市日益萎缩，因为阿卡（Acre）已经落入基督教徒手中，与埃及的贸易被禁，而亚洲集市变得越来越不稳定，通往远东的直接贸易，尽管还继续存在，但规模却在不断收缩。

9.3 佛兰德的鼎盛时期：13世纪的资本主义

尽管对于在黎凡特销售的布的数量难以估计，但借助地中海港口如威尼斯、热那亚、马赛和巴塞罗那的记载，可以比较确定地估计出不同生产中心在这种出口贸易中的相对重要性。所有这些记载都强调了北方生产地区的首要地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如此。而且，在这个地区中占有最重要位置的是佛兰德以及紧邻地区。英格兰生产的布尽管在质量上尚可与之比，而在数量上则难以望其项背。而且我们第一次有了充分的资料来界定主要的生产区。

在所有这些地区中，最集中的产地在佛兰德，它是法国王室最富裕也是麻烦最多的地区之一。它位于坎纳切河（Canache，river）和茨温之间，东面是斯凯尔特河。在这里，差不多每个城市，无论大小，都忙于生产毛织品。至少有一打以上的工业中心生产的布赢得了自己独特的声誉，以至于它

们可以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以自己的名号销售布匹。在南方，法属佛兰德就像在阿特里巴特斯和内尔维时期一样，再一次因自己生产的布而闻名。处于头等地位的是五大布业城镇：阿图瓦的阿拉斯和圣奥梅尔——它们是12世纪末腓力·奥古斯都战胜佛兰德所获得的丰厚战利品；还有多埃、利勒和图尔奈。有自己明显特色且积极参与外贸的次要中心包括，阿图瓦、奥查斯和巴约勒（Bailleul）的埃丹（Hesdin）、亚耳河—苏—莱斯（Aire-sur-Lys）和贝蒂讷（Béthune）。再往北，产业声誉不很久远的佛兰芒佛兰德（Flemish Flanders）有3个重要中心——伊普尔、根特、布鲁日，另外还有许多次要中心，如波铂林赫、迪克斯迈德（Dixmude）、沃维克、库特赖和奥德纳尔德。伊普尔布在12世纪早期闻名整个北欧，到12世纪末期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品种上在南方集市上都超过了其他工业中心。尽管根特的纺织品也在那时出现在地中海集市，但直到该世纪末，它才与布鲁日的布一起与更南的城镇如伊普尔的布展开竞争。【630】

尽管佛兰德处于统治地位，但纺织区还是产生了重要的扩张，往南延伸至紧邻的法国蓬蒂乌以及韦曼多瓦，向东穿过帝国边界进入布拉班特、海因劳尔特和康布雷主教辖区。在韦曼多瓦，埃米恩斯和萨默河的圣昆廷以及再往南的比维斯处于头等地位，而科尔比（Corbie）是相当次要的中心。顺萨默河的蓬蒂乌往下则是阿布维尔，北面是梅尔河畔蒙特勒伊，两个都是重要的工业中心。更重要的是康布雷及其近邻海因劳尔特的瓦伦西恩勒斯——二者都大量出口各种颜色的布匹——尽管海因劳尔特还有其他的著名中心，如莫伯日和奇迈（Chimay）。布拉班特的工业发展远远落后于佛兰德，但13世纪期间变得越来越重要，它凭借着质地紧密的布鲁塞尔布——这种布甚至到12世纪晚期还没有在根特集市上出现过——在意大利开始为人所知，并且开始销往法兰西，就像勒芬布一样。马里尼斯，虽然从严格的政治意义上不是一个布拉班特城市，但它在这个领域发展得更早而且肯定更活跃；在该世纪的最后几年，这里的商人旅行到波罗的海，在香槟集市上有自己的大厅，并且把他们的布销往西班牙。

再往前，出了这些行省，还有其他外围的纺织城市。比如默兹河谷地——列日、那莱尔、哈伊和马斯特里赫特——出口布匹，而兰斯和香槟城市如马恩河畔沙隆（Châlons）、普罗万（Provins）和奥本顿（Aubenton），既是生产中心又是交易中心。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出口集市占首要地位的是佛兰德城市。到13世纪末期，布拉班特城市居于第二位。这些城市都是不久之后《巴黎集市的小故事》的作者特意提到的。在书中，作者详细列举了这些生产布匹并在圣

[631] 丹尼斯集市上展示其产品的城镇，说它们生产世上最精美的产品：

En mon dit, vous amenteuvrai
Gant et Ypres et puis Douay
Et Maalines et Broiselles;
Je les dois bien mommer com celes
Qui plus belles son a veoir.

这个巨大的工业区域，包括现代的布拉班特和法兰西的东北部，可被视为一个经济上和地理上的单元。它的主要产布城镇，尽管在政治上被划在许多不同的封建公侯国里，有些效忠于帝王，有些效忠于法兰西国王，但它们为了促进商业的发展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到12世纪末，它们组织成了一个商业行会，也就是"汉萨"，它在整个13世纪以"十七城镇"而闻名；当时，它的成员已经有两打左右，不过以后还有更多的城市加入，如根特和布鲁日等。这些城市主要关心的是调整它们与香槟集市的关系，因为那里是这段时期北方纺织品的首要的商业中心。它们一起决定应该去哪个集市；共同与集市官员举行谈判；对其商人实施共同的纪律。每个城市中，强有力商人行会都控制着城市赖以生存的商业活动，后来，这些行业联合形成了一个市际行会，以便制定与执行共同的出口政策。

如我们所知，北方纺织品流入东方和南方的规模因英格兰布匹的加入增加了。它在所有欧洲商人打交道的集市中都有很大的名声，就像它在罗马、梅罗文加和加洛林时期一样。但英格兰远不如佛兰德工业化程度高，它自身还从佛兰德大量进口布。但在这个国家的每个地区，从湖区和诺森伯兰郡往下到西南部，到处都有专业织工、漂洗工、印染工的有组织的团体，它们都在关注着布业的市场。许多城镇也从农村购买织好的原布，并把它们染色、加工后进行销售。比如，什鲁斯伯里章程（Shrewsbury's chart）严格限制议员购买原纱的权利，就像纽卡斯尔的议员从亨利一世（Henry I）那里获得[632] 染色织物专卖权一样。在13世纪西班牙与地中海贸易中，有名的优质毛料似乎全部来自东部平原低地，它主要是从林肯、斯坦福德、约克、贝弗利（Beverley）、罗斯、北安普顿和莱斯特延伸到亨伯和沃什湾（Wash）。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欧洲第二大重要的织布中心，一个范围可以和阿图瓦及佛兰德相比的地区，尽管它的工业化程度不高。林肯和斯坦福德非常有名。它们的高价布往往用猩红色的胭脂染成，在皇室及对国外君主的献礼方面需求甚大，并且经常出口。林肯布在国外的关税税则上是特别列出的一种商品，如1265年维也纳关税税则。不管在大陆上颇受欢迎的斯坦福德特斯

的名字是来源于斯坦福德，还是斯坦福德的名字来源于该词“结实的经纱”的含义，这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但毫无疑问，大量的布从斯坦福德出口，尽管许多打着斯坦福德旗号的布——比阿拉斯、伊普尔及别处还多——并不是在那里生产的。这个地区再往南是一系列生产优质布的工业城市，但这些布要便宜得多，如褐色布，主要供应本地集市，销售给穷人家庭，相当于古代坎努西亚地区的布。科尔切斯特、伦敦、牛津、温彻斯特等大城市主要进行褐色布的交易，但也有一些小中心如马尔伯勒、贝德温（Bedwyn）和托特尼斯在做同样的生意。

在12、13世纪，毛纺这个“大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欧洲各地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也不断增强。对此，没有什么比佛兰德和英格兰（程度稍逊）对来自其他地方原材料的严重依赖这一事实更能进行清楚地说明了。

就我们所知，毛纺业主要的原料羊毛在佛兰德和英格兰都有出产。但到了13世纪，英格兰是这两个国家羊毛的主要供应者。佛兰德进口羊毛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羊毛数量不足以满足快速增长的生产需要，还因为羊毛质量与英格兰相比越来越不令人满意。12世纪早期就有许多佛兰芒人到英格兰用现金购买羊毛。与拉昂的教士同行而来的商人也是如此；尽管受到海盗的威胁，他们不得不发誓所有的钱都是捐赠给拉翁夫人的，可一旦安全着陆他们就不顾承诺，“走遍全国各地”，将所有的钱都用来买羊毛。整个13世纪，佛兰芒布制造商签订了大量采购合同，或者通过代理人进行，或者直接从生产者那里购买。林肯郡的羊毛，尤其是来自林赛（Lindsey）地区的羊毛，因质量优异在佛兰德大受欢迎，就像在林肯郡各城镇极受欢迎一样；林肯郡的优质布与当地羊毛良好的质量实际上有很大的关系。但相当数量的羊毛被英格兰其他地区和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佛兰芒人买走。 [633]

至少到13世纪中期，西班牙也由于其快速增长的养羊业而给北方织布业供应一定数量的羊毛。13世纪末期，英格兰的伦敦和温彻斯特都在使用西班牙羊毛，毫无疑问，东南部制造区的其他地区也在使用。从本地来的低级羊毛与林肯郡的上好羊毛在特点上是不同的，相互不能混杂。限制彼此混纺的规定，在伦敦一些最古老的织工条例中，至今仍存。德意志的羊毛也到达了英格兰与佛兰德，虽然数量不多。

染料来自欧洲各地以及其他地区。我们知道，地中海地区生产最亮丽最昂贵的红色——胭脂，一种加入明矾混合许多染料而成的色，而热带地区则有另一种红色——巴西红。欧洲西北部生产茜草、靛蓝以及黄木犀草。茜草和靛蓝是所有染料中最常见的，可以产生深浅不同的蓝色与红色，是中世纪

挂毯的主要背景色，而靛蓝也可用于产生黑色。将它们按不同比例混合，可以产生深浅不一的紫色，比如紫罗兰、血红色和含有几成黑色的地榆色，而淡黄木樨草与靛蓝配合则可以产生绿色如“林肯绿”。黄色，只能从淡黄木樨草而来，需求量不大。所有蓝色中程度最深的是深紫，这是用靛蓝染成的一种特别深的颜色；这种颜色的布的价格几乎可与用胭脂红染成的布的价格相比，而淡蓝色如“浅蓝”和“蔚蓝”是所有颜色布中最便宜的。一些紫色染料——如芍药红和黑紫色——可用胭脂染料染，即用靛蓝与胭脂红而不是靛蓝和任何其他红色来染。

在整个中世纪，佛兰德和英格兰产布区一直在种植靛蓝和茜草，就像撒克逊和加洛林时代一样，罗马时期无疑也种植过，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两个国家都以本地供应为主。但是，那已经相当的专业化，特别是靛蓝生产方面，它是需求最大的颜料，因为它不仅仅是蓝色而且还是许【634】多颜色的基础。实际上，英格兰的供应完全靠进口。就像林肯郡发展养羊而不是种植靛蓝，因而在欧洲以羊毛而享有盛名一样，皮卡第（Picardy）也一样卓越，但它不是因为羊毛——而是作为一个靛蓝生产区给英格兰与佛兰德供应颜料。萨默河及其支流沿岸都在种植收获着靛蓝；叶子在作坊压浆，揉成球状在本地集市销售，在亚眠、科尔比和内勒尤其如此。这些城镇的商人联合起来推动它的海外销售，从萨默河河口将商品装船运往海外集市。比如说，1237 年他们联合起来与伦敦市达成一条协议，允许将货品存入市内的仓库，卖给外地人和市民，并享有一项非同寻常的特权，即他们可以自己带着靛蓝去这个国家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为这些特权他们每年得交 50 英镑，还要为城市用水累计交 100 英镑，这个事实说明他们的商业规模非常大。他们在其他地方，如诺里奇和布里斯托尔，也享有类似的特权。实际上，亚眠人的伟大是以靛蓝为基础的。靛蓝给最主要的家族创造了财富，他们垄断了这个行业。同样，靛蓝也使得埃米恩斯教堂富裕无比，教堂的几个窗户是由到英格兰贩卖货物的靛蓝商人所捐赠的，在那里，人们用那一座栩栩如生的雕塑来纪念那些带着靛蓝进入这个城市并在那里销售的人们：两个卖靛蓝的人站着，他们中间有个鼓鼓的靛蓝球袋。

虽然那时靛蓝的出口城市主要是皮卡第，但它的产地也延伸到了德意志中部的服装城镇，例如阿尔特马克（Altmark）以及法国西南部，后两个供应源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英格兰，它越来越依靠朗格多克的靛蓝，那里生产的大量靛蓝出口到图尔兹、阿尔比（Albi）和蒙托邦地区。靛蓝仅次于葡萄酒，是从波尔多和英格兰运到加龙河的主要商品；而英格兰，如愿

以偿地稳稳占据了加斯科涅之后，开始倾向于放弃种植靛蓝，正如它放弃葡萄的种植一样。另一方面，法兰西南部则越来越专门地种植这些农作物，而向北欧寻求食品供应。"皮卡第的靛蓝"与"图尔兹的靛蓝"是14世纪英国布商用得最多的两种染料。难怪英格兰要占据加斯科涅，同时还垂涎于旁泰厄（Ponthieu），因为其工业生产所依赖的重要染料都是通过这两个领地经过加龙河和萨默河的入口而来的。

欧洲很北的地方生产苔藓，如海石蕊是从挪威进口的，呈紫红色，波罗的海森林则生产钾碱。作为一种媒染剂，碱比明矾需求大，因为它一般要与靛蓝一起使用，中世纪所有的染色规则，无论是英国的还是佛兰德的都说明了这一点；这样，不仅仅调和蓝色需要它，其他许多以靛蓝为底色的颜色也需要它。由此，有专门的法令规定，比如说最优质的蓝黑色、深紫色只能用靛蓝，用在白色的羊毛上则以草木灰作媒染剂，不可将它放在茜草或明矾中或用于黑色或灰色的羊毛。这样，英格兰与佛兰德所需要的草木灰仅靠烧木头是不够的，就是把全部的树都烧了也不够，因而越来越需要从德国北部和波罗的海用航运来。它们经常列于13世纪中期的纳税货品之中，无论是在港口还是内地城镇如北安普顿（1251年）或温彻斯特均是如此，在那里它们被称为神奇的灰；几乎每种染料都需要它，针对购买和称量这种钾盐还通过了专门的法律，如1250年多埃（Douai）所做的那样。 [635]

磨光过程所需要的其他原材料主要由本地供应。英吉利海峡两岸都能找到有漂洗用黏土（fullers' earth）的土层。但它的挖掘受到控制，逐步成为所在城市或领主的赢利的项目，以保证充足的供应。用于提起细绒的起绒草在本地也有，而且它显然是作为一种经济作物而大规模种植的。12世纪的英格兰种植起绒草还需缴纳什一税，同一世纪在亚眠还得为它缴纳过路税，其数额都是数以千计。不时有人尝试用铁制的设备来代替天然起绒草，特别是14世纪初供不应求时尤其如此。但这样的尝试受到了抵制。英格兰和佛兰德城镇法令规定，禁止使用铁具起绒，中世纪末英格兰议会还重复了这样的规定。中世纪对起绒草的偏爱不是一种无理的偏见。时至今日英格兰西部的布商还在用它，他们认为起绒草比金属钩子的弹性好，不会破坏毛纺织品的精致纤维。

可见，13世纪英格兰与佛兰德的这个"大工业"不仅从西欧国家的田野与牧场获得原材料供应（因而极大地刺激了它的农业发展），而且也从东西印度群岛与波罗的海森林、中东矿山及地中海的橡树林得到原料供应，就如它在所有这些地区销售它的纺织品一样。因此，这也是一个既对国际环境 [636]

变化特别敏感又对某些主要产品产量改变敏感的产业，而且它还受到许多波动的影响，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这样一些波动往往与加工中心没有直接关系的那些遥远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引致的。

在林肯、多埃和其他许多城镇集市上销售宽幅布。很显然，这种布是许多不同工种共同完成的产品，每个工种都有它自己的专业技能。在讨论工业化纺织与这些手工业者的地位之前，最好是先简单说明一下这一加工过程中不同工序的不同作用。

在布的生产过程中，染色可以在每个阶段进行；可以在它还是毛时染，在它是毛线时染，或已成布时染。在布的整个生产过程中，染色是最复杂的，也是技巧性最强的。染工必须完全熟悉他所使用的各种材料的性能——羊毛、染料以及媒染剂——熟悉它们不同的数量不同的搭配不同的配置方法所产生的效果。他必须能鉴定出好与坏的明矾，新鲜与陈腐的茜草；必须知道怎样放置靛蓝或切割巴西木。由于这种复杂性，染色要分两种不同的工艺——使用靛蓝的染工和使用红色和其他颜色的染工。每种情况都需大量的圆染缸，在染缸的周围是染工或他的助手，手持长木棍翻转羊毛或布。这是很重的活，往往由男人做。

预备工作如分类、拍打、洗羊毛是最不需要什么技巧的，分别由专门的低级工人负责。接下来是为纺羊毛做准备工作，如果是短的就用抓的办法，如果是长的就细细地梳，这些工作通常由女人来做，并且效率受到木制设备的影响，这些设备有的是短金属钩（用来抓的），有的是长金属齿（用来梳理的）。羊毛需要适当加油，然后纺成纱。这差不多无一例外是由女人做的，她们有的仍然使用老式的拉线棒或是纺锤——在每种情况都要来回走动，边纺纱边照看自己的瓦罐或是自家的羊群——也有用新近发明的纺轮。纺轮可能是13世纪引入的，或许更早。它是纺织业中的一个重大发明，但目前我们对此知道不多。

【637】纺纱之后就是织布，除非中间要染色。织的准备工作经常是由与织工完全不同的工人来做——整经工人首先给经线上浆并缠起来，排列所要纺织长度所需的纱线数；卷轴工人将纬线绕在筒上以插到梭里。经线与纬线的纺织方法不一样，因为经线必须更结实一点。整经不是简单的工作，因为作为出口贸易大宗的全幅布包含有大约2 000～3 000根经线，漂洗前每根约30码长。纺织宽幅布比，如织这些约2码宽的细布，需要由两个工人来操作，通常是男人，他们肩并肩地坐在一台很宽的双人织布机上——比已知的加洛林时代织布机要复杂得多，因为已经沿用了2 000多年的垂直经编织机这时已

被踏板织布机所代替——踏板机是增加产量的又一项重大发明。在单梭织机上可以织窄布。在某些地方如温彻斯特，宽幅织机与窄幅织机的技术完全不一样；而在有些地方，一个织工也许同时拥有宽幅织机与窄幅织机。

漂洗是最累的、技巧性稍低的工作之一。在13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在主要布镇它通常是由乏味而累人的古罗马方法完成，即在槽中用脚踩的办法，尽管此时已经发明了水力漂洗车（见第616、669~670页）。因此，漂洗工通常是男人，并且是强壮的男人，按照阿拉斯规则一块布要3个人。即便如此，他们还要求加工资，理由是布的重量增加了，以至于他们无法正常加工它，"蒙受了太多的损失，被迫集体或个人远居他乡"。当布在槽中漂洗完毕并制成毡时，就晾在布架上风干；这是一幅竖直的木架，一幅幅布被无数的布架钩拉紧，这些布钩放在平行杆上，可以根据布的宽度进行调整。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将布准确拉抻到合适的长度与宽度，不多也不少。这个工作需要几个人来完成，因为整块细布太重，特别是湿的时候尤其如此。这通常由女人来做。实际上，纺织业中妇女的比例肯定与现在一样高，从女企业家如卑格斯·圣·温诺克（Bergues St Winoc）的贝金纳吉（Béguinage）大布商（drapers/*drapiers*）到低级纺纱工与分捡工，都是这样。

布张开以后，优质的宽幅细布就到了起绒与剪毛这最后一道工序了，我们可以生动地想像出塞默（Semur）的织工在窗前昏暗的灯光下正从事着这种劳动的情景。起绒是用起绒草来完成的，它被一排排地装在木架里，就像大铲刀。当湿布挂在一个木棒上的时候，细绒就被拉起。起绒这一过程要反复几次，有时先由漂洗工做，接着又在特别的打光作坊里做。最后就是修剪。这要在布干的时候才做，所用剪刀的形状与大小与羊毛剪不同，至少有3~4英尺长，并且是扁的，末端也不尖。要把剪刀的利刃磨成18英寸长，磨剪刀的人是需要许多技巧的，他要使剪刀又平整又锋利，以便修剪优质布的表面。磨得不好要赔偿，好的剪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甚至经常作为遗产留下来。优质布要反反复复修剪许多次，在每次重新打湿、起绒、晒干后，都要剪这么一下。剪完之后，布就被刷干净、压平整、折整齐。不同的生产阶段要求不同的辅助工作，如修补纺织时的缺陷，去掉扭节与杂质；这些也是专门的手艺，通常由妇女来做。

【638】

这项巨大产业运作的所有环境——广大而灵活的集市，对进口原料的依赖（尤其是佛兰德），劳动力的精细分工——这一切表明其组织只能描述成资本主义的，无论是用马克思的标准还是其他的标准都是如此。很显然，实际上很难由手工业者来完成直接与顾客相联系的各个工序，无论如何那不是

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的。多个工序的组合要求企业家出现，原材料的进口和布的销售也是如此。在每个工序都出现了企业家，有时是单个的人，有时是大的公司，它综合了从生产者那里购买原材料、把它们发放到不同的手工业者手中（一些人自己也是小规模的企业家）、出售成品这三种职能。无论这种组织的具体形式如何——甚至在同一个中心里也大不相同——这个“大工业”中的手工业者无论在何处都要屈从于企业家，至少从他为出口集市而工作这一点上讲是如此。

这一产业的巨头是琼·博伊纳·布洛克（Jean Boine Broke），他是多埃的布商，在13世纪后半期发了大财。作为一个有财有物的人，他自己拥有所有原材料以及加工设备。羊毛是他自己地产上生产的或从本地集市上购买的，但更多的是来自进口，尤其从英格兰进口，在那里，博伊纳·布洛克用【639】自己的钱从修道院手里购进，这些修道院包括林肯郡的纽波（Newbo）、坎伯兰（Cumberland）的霍尔缪尔特拉姆（Holmcultram）和诺森伯兰郡的纽明斯特（Newminster）。他也种植茜草，但更多的是买进，此外还购买靛蓝、明矾以及其他染料。博伊纳·布洛克的宅第集住家、办公室、货栈、指挥部为一体。那里既储存有原材料，也存有成品布——黑紫色、紫罗蓝色或白色——他通过代理人将其销售到国外；他的代理商中有些是家族成员，如博伊纳·布洛克就曾为他带过商品到苏格兰。在房子后面，沿河而下，他还拥有染房，并且不远处还有块张布地，上面还有许多的张布架。在这两座建筑中有许多地位与现在工厂的工人一样的手工业者，直接依靠雇主为生，签订定期合同并为固定工资工作。有些工人长期为布洛克服务：一个是洗羊毛工，工作1年；另外一个在染房服务3年；张布工莎拉在张布架边为他工作了12年多。布料完全有可能在布洛克自己的房间里梳理与修剪，因为我们知道他欠了一个磨剪工的债，似乎一些预备工作，如分类与拍打，要在那里完成。从某种程度上讲，只要有企业家，就有工作集中。至于其他工作则给独立的手工业者完成，他们从博伊纳·布洛克家里获得原材料，并且交回成品。有时，染色工作也是这样分派出去的。这些手工业者在自己家里工作，拥有他们自己行业的设备，他们自己也经常雇用工人。很普遍的一种情况是，由于他们住在企业家的房子里，因而与企业家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他们住在那里的条件是能够得到充分的原材料使他们至少可以赚够房租。由于这个工作在企业家房屋外做，不可避免地就要按件支付工资，而为了阻止对原材料的任何挪用，通常会认为工人按数量买下了他所接受的原材料——即使只是在纸面上——因此，如果他不能完全返还的话，他要对全部价值损失负责。

在英格兰也有类似的组织模式，那里的工业化也很发达，尽管范围还不够广。那里也出现了一个企业家阶层，他们拥有原材料，控制整个布的生产过程，并在集市上销售，那里英格兰的布商可与羊毛商竞争。如亨利·霍西尔（Henry Houhil）——兰切斯特的议员，与博伊纳·布洛克是同时代人——在自己的地产上染羊毛并织成布，然后分发出去漂洗，再由他本人带到波士顿集市上销售。在那里，他与其他兰切斯特布商一起拥有自己的一排货【640】摊，正好在羊毛商人对面。与此类似，伦敦也有商人雇用织工并实行计件工资制，国王从他们那里购买救济品施舍给穷人。中世纪世界那种独立手工业者拥有原材料和行业工具并直接把产品出售给消费者的传奇，再也不复存在了。在这一时代的主要产业中，那不是真实情况。所有那时有关主要布业中心的记载，无论是在佛兰德还是在英格兰，都提到了一个以赚工资为生的巨大手工业者阶级——织工、漂洗工以及其他工人——他们服从于资本主义布商的指挥。

企业家在其中的地位更牢固了，他们不仅能够运用经济实力，也能够运用政治权力。因为他们是贵族，是市政府的头面人物（博伊纳·布洛克9次当选为议员），也是商人行会的成员，而行会控制着城市贸易和工业，并且越来越贵族化；至少在13世纪初它们是严格排斥这个伟大产业中以工资为生的手工业者的。无论在佛兰德还是在英格兰，织工、漂洗工或染工的手都很脏，所以，他们的绰号是“蓝指甲”。他们这些人是不可能成为行会成员的。查郎尼家族的尼古拉斯加入兰切斯特的商人行会，条件是织的工作必须从他家里搬到外面去，后来他又被逐出了行会，因为他没有这样做。著名的贝弗利织工与漂洗工法律（大约在公元1200年）规定，任何织工和漂洗工如富裕了且想加入自由市民的行列，一定要放弃他的手艺，并将所有的工具放在他的房外；温彻斯特、牛津、马尔伯勒也有类似的法律。原材料的经营及成品布的销售都仅限于由商人行会的成员进行。因此，手工业者完全依靠企业家为生，其生活的每个细节都被雇主通过他们在市政府的有利地位牢牢控制着。

由于拥有全权，商人行会密切注视着自己的商业利益，在每个细节上控制着这个“大工业”，并随时都让它们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相当数量的工业立法从13世纪这个深受管制的经济部门中遗留下来，有些可以追溯到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年。许多立法与这个产业的技术有关。它规定了有关布的长度、宽度以及重量的精确标准，规定了织布方法，以及哪些材料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尽管佛兰德留下了更多的规则，并且佛兰德工业毫无疑问比英国工【641】

业受到的控制要完全，但是立法特征在两个国家非常类似，并且许多技术条款完全一致。例如，海峡两岸的许多工业城市禁止用细绒，禁止在同一支纱或一块布上混用不同的羊毛。布湿的时候才可用起绒草，干的时候只能修剪。深紫色只能用靛蓝或草木灰染成。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确保产品质量和标准的规定是生产分散的一个必然结果。企业家监督工人工作的任务因而得以简化，因为违犯规定受到的处罚起到了威慑的作用。另外，它通过保证不同类型布的统一大小与质量标准来维护这个城市商品在外国集市上的声誉。

为了保证遵守这些规则，管理者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几乎这一产业的每个部门都任命有巡视员，负责考察工场、市场以及集市。除了很少的几个例子外，他们都由市政当局任命，尽管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具有代表性，但是几乎无一例外都有商人位于其中。1250 年多埃的巡视员的官方名单包括染料巡视员，如 7 个巴西红巡视员中 3 个监督集市，4 个在多埃；也有手工业巡视员，如监督纺织与剪毛的巡视员，而英格兰与勃艮第的巡视员就在主要集市入口。这些巡视员有权在任何时候进入正在生产或交易的房屋，甚至可以进入纺羊毛者的家里。他们的责任是不仅要保证法规的执行，防止欺诈，还要把违法者提交市政当局，防止在资本家和工场主或工场主和其佣人之间的不协调和冲突，并对所有的争议进行干预。

巡视员最重要的作用是参与工资协商并且实施工资条例。几乎所有的工资都是固定的，在实施此类标准的地方，不允许有任何偏离标准等级的行为，不允许雇主与雇工单方面或联合起来改变工资等级，因为工资级别只有市政当局有权决定。工资应该由集市自行决定而且每个人都应努力争取工资的行为对 13 世纪人们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人们普遍认为，工资应该是“合理的”，这可解释为随着供与需的变化，更重要的是随着货币价值的变化，应该允许对工资做适当的调整。当货币便宜时，价格相应地就会高，工资就该提高；当货币价格贵时，价格就会下降，工资就会降低。工资实际上是与生活成本联系在一起的。在 14 世纪前半期，圣奥梅尔的记载里可以清楚说明这个原理是如何运用的：这里的织工、漂洗工、张架工以及修剪工的官方工资率不断波动，显然直接地与美男子腓力和查理四世的货币变革有关。但是，毫无疑问，这两个原则其他地方一个世纪以前就有了。例如 1229 年的多埃就规定，如果修剪工在需求上升时希望提高报酬，他们可以去请示巡视员，并由巡视员与两个修剪工前往市议会提出，最后由议会来决定。相反，如果工作减少或货币不充足，贵重金属的价值增加，企业家就试图降低工资，假如工人不同意，他们就会再次吁请市议会做出裁决。实物工

[642]

资是严格禁止的，尽管三番五次的重申似乎说明它并不总是能得到遵守。

很明显，固定工资只可能是雇主与雇工间冲突的一个结果，这种冲突通常会导致罢工，这时市政当局就会插手进来解决这一僵局。例如在1129年，多埃制定了根据比例相应增减的原则，明确禁止修剪工为涨工资而暴力反抗；在佛兰德与英格兰，经常有禁止工人联合起来要求提高工资的规定；1282年在布鲁塞尔制定的工资表中，还详细列出了漂洗工人的工资等级，据说这也是一个结束冲突的产物。当然，雇主可以通过他所拥有的权力来影响市政府，因而有最后的发言权，但协商的机制至少是存在的，手工业者无论如何也可以在涉及他们利益的问题上有一个听证权。情况最糟的是低级手工业者——打毛工人、刷毛工人、梳毛工人、纺纱工人以及类似的工人——他们经常在企业家的地盘上劳动，既没组织成自己的兄弟会，也没有在独立巡视员底下分成小组。由于没有讨价还价的地位，他们被迫接受市政府规定的工资。这种规定的工资不可能完全不合理。1296年布鲁塞尔的贝金纳吉在一场为纺织做辅助性工作的工人的工资争议后，市政当局同意统一的城镇工资率也适用于贝金纳吉，当城镇人口工资下降时他们的工资也跟着降；相应地，他们的日工资率在冬天是2.5便士，春天和秋天是3便士，夏天是4便士。 【643】

纺织、漂洗、张布、修剪、染色（当工作是在染工自己的家里进行时就是如此）都按件付酬。它们大多依材料种类的变化而变。织工按纱计酬；漂洗工按布计酬，依漂洗不同种类的布所需要的漂洗天数来计算。染工的工资则依所用的染料而定，并且染工必须在商店摆出标准样品，以表明各种不同颜色的固定的价格。

除了固定企业家给工头所付的工资率外，市政当局也规定了工头给他的贴身助手也就是熟练工人的工资率。工资有按天计算的，也有按件计算的。1283年布鲁塞尔规定，企业家付给漂洗工的价格，1/3归工头，其他给熟练工人。

在13世纪严格管制的经济中，工作日的长短像工资一样也是严格规定的，尽管在工业更密集的佛兰德地区比英格兰地区似乎更严格。人们的工作时间不能比法定工时多或少。决定工时的原理很简单——只要有日光就要继续工作，除了中午一个半小时的工间中断以外。尽管晚上在人工灯光下工作偶尔也是允许的，但人们普遍不赞同这样做，这与其说是由于经济原因，还不如说是怕火灾或为了避免产品质量不过关。因此，法规不仅规定了准确的工作时数而且还规定了准确的上班时间。日出工作，日落下班。为避免有任何不遵守工作时间的现象，白天敲4次钟，为此目的需要特别建一个钟塔，就像布鲁日在布业大厅所建的钟楼一样；天破晓敲第一次钟，然后是吃饭时间

敲一次，接着敲一次是再开工，最后是天黑的时候敲一次。因而大的纺织业城镇，如多埃、伊普尔或布鲁塞尔，实际上都像个大工厂。每天早上，成千上万的工人蜂拥而入资本家的工场或到织工、漂洗工、印染工或修剪工的工场去上班，只要铃一响，街道就变空了，他们就开始计时工作。工作时间随季节变化，冬天8小时，夏天13小时，相应地，工资也有类似变化（见上）。但是也有像16世纪早期的布鲁塞尔那样仁慈的条件，当夏天工作长时，允许[644]工人上午与下午有一个较长的工间休息。14世纪晚期时，法国一个国王忽视休息的经济价值，规定他的织工从早到晚要不停地工作，白天要他们自带面包，并且"假如他们想喝汤的话，也必须由他们的妻子送到他们工作的织布机处，以使工作不至于中断"，但一些法国城市显然并没有实施这些苛刻的命令。

周日或周六下午不允许工作，这样，正常的工作周就是夏天60多个小时。冬天约40个小时。但是在非常寒冷冰冻的冬天，市政当局也许停止所有的工作。假期也是常有的，因为所有圣日是义务休息日；甚至只过重要的节日，全年的假期也比现在要长，特别在每个中午午饭铃响宣告祷告的时间到了时，工作就得停止，多埃和圣奥梅尔为织工制定的法令就是这样规定的。13世纪早期阿拉斯的剪毛工人法令规定，在圣诞节休息4天，复活节8天，圣灵降临节也休息8天，但在该世纪末期伦敦织工法令禁止主显灵节（1月6日）到圣烛节（2月2日）劳动却遭到了雇主的反对。市政当局规定，每人在这一期间要像其他时间一样"勇敢"地工作。但在这里无法判明更长的假期是否反映了工作的短缺，于是试图靠假期来扩展它，或是通过限制工作机会的供应来提高劳动力的价格。

尽管可以而且实际上是必须将13世纪的这个大工业描述为资本主义的，但是认为所有的工人都是处于同样的依附状态就是错误的。他们之间的差异相当大。级别最低的是打毛工、清洗工以及从事其他预备工作的人，他们一般在企业家的地产上劳动，干着低下而报酬低廉的活，自己没有任何工具，显然在他们中间也没有任何组织形式。同样无组织的是刷毛工、梳理工和纺纱工，但他们稍微独立一点，因为他们大都在自己的家里劳动，并且有自己的设备——虽然不多——他们有权为多个工场主劳动，而且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可以雇人帮忙。级别再高一点的是织工、漂洗工、染色工以及剪毛工师傅。这些人大部分在自己的房屋里劳动，并且有自己比较值钱的资本设备，如织布机、漂洗工的槽以及张布架，染色工的染缸，剪毛工特殊的桌子和剪刀。因此，他们通常很有钱，并且必定是那些廉价劳动力的雇主，下面[645]有贴身助手或徒弟，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如果他们为出口集市加工巨大的宽

幅细布，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可能单独完成。为了改善他们的状况，他们互相合作——尽管这是不断禁止的——但由于市政当局为了便于控制而将他们组织在一起，实际上促进了他们间的联络，而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以宗教性和社会性兄弟会的形式联合起来。其中处境最好的也许是染色工以及剪毛工师傅了，他们的工作是所有工作中技巧性最强的，他们几乎总是维持一种相对独立的地位，接受许多雇主的委托而工作，而织工与漂洗工有时会陷入奴役状态，甚至向企业家抵押他们的工具。

9.4　意大利工业的复兴

经过整个12世纪一直到13世纪末期，北方工业的优势地位一直没有遇到真正的挑战。所有的历史和地理环境都有利于它的发展——优良的手工业和悠久的出口传统，本地优质羊毛的充分供应，一定程度的政治稳定保证了城市巨头较好地把自由和秩序结合起来——而这对它的商业特别有利——并且最重要的是它控制地理位置——它位于古代横跨西欧南北的交通线上，同时处于北海干线上，北欧海盗借此建立起了一个繁荣的商业帝国。整个北方地区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统一。如果用佛兰德布作原料，那俄罗斯帽子在挪威以及冰岛最为流行，尽管可以买得起斗篷的挪威人和冰岛人追求的是林肯郡的优质猩红色布。在地中海集市上，北方毛织品从数量、质量上和种类上都远超过了本地产品。1265年威尼斯海关税则中列举了30种不同的英格兰和佛兰德地区的布，意大利只不过大约10种；并且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便宜货；甚至最值钱的意大利布都不如伊普尔、多埃和康布雷或英格兰的斯塔福特斯布昂贵。

但是，如果说此时意大利的布生产远远落后于北方的话，那么它的商业是首屈一指的。随着北方纺织品流入南部的增加，它越来越集中于中央商路向下沿着朗恩河流域到利古里亚海岸或跨过阿尔卑斯山到达伦巴第平原，然后从意大利各港口到非洲海岸以及黎凡特各海岸。意大利，尤其是它北方的城市，在这种奢侈品的交易中处于关键地位，而且毫不奇怪意大利商人是主【646】要中介人，在香槟集市上购布到意大利、非洲或亚洲各地去销售，并且从这些地方买回北方工业主渴求的东方染料。因此，他们获得了对东方和地中海集市以及那里所需求布品种类的无可比拟的知识，获得了对更贵重的染料进口的控制性影响地位，获得了相当大的利润。这些财富，在他们用来发展自

已对北方布的印染和修剪产业时，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投资于染色、张布架和修剪商店。胭脂、巴西木和明矾多半是为本地使用而进口，而不是为了再出口。而且意大利再度专业于生产猩红、血红及紫红色染料，这是它在罗马时代就有名的。修剪技术非常复杂而完美；北方软而紧密的毡制的纺织品在染色后要反复地起绒和修剪，然后再投放到意大利集市或销到国外，与那些完全在英格兰或佛兰德制造的产品展开激烈的竞争。

在12世纪后期和13世纪早期，从事贸易的大部分北方城市出现了布加工产业。例如，在热那亚染色工到1222年就完全组织起来了，并有3个行会；加工北方布的修剪工也是如此。因朱砂闻名的卢卡，主要加工伊普尔的布。最有名的是佛罗伦萨的修剪业。到12世纪中期，佛罗伦萨加工北方布的业务非常繁忙。干这种活的商人在窄窄的小巷中有自己的商店，因为它是名声不好的地方，所以被称作卡里马拉（*Calimala*），他们已经联成卡里马拉行会，盾徽是一只鹰，爪中抓一捆布。这些行会是如此的富裕而又重要，以至于在某些时候（像在1182年）行会的领事会被委任为它所在社区领事的代表，就像他们被委托照看一些主要的城市建筑如旧洗礼池一样。到13世纪末期或之前，行会对加工北方布就像进口北方布一样关心了，它的成员成了染色和修剪工序的专家，就像佛兰芒人与英国人一样。

14世纪早期卡里马拉行会的一些法令和有关它的一些成员公司的书籍，如弗兰西斯科·德尔·本（Del Bene，Francesco）的书籍，不仅给了我们有关它的成员法令方面而且给了我们有关他们活动的生动描绘。加工的和尚未加工的布，都在香槟集市上或在产地由相关工场的人员销售，或通过另一公司的代理而销售。从这里，它们被用粗帆布包起来装在驮马上，经由陆地到普罗旺斯（Provence）港口，经过比萨到佛罗伦萨，需要长达4个月的陆上旅行。行会也在重要的路线上建有旅馆以保护商人和商品的安全，并且组织了邮政服务，在集市间进行信件投递，并可送到卡里马拉的商务处。行会作为一个单位去协商减少或废除沿途的通行税，并补偿成员在外国遭受的损失。一旦到达佛罗伦萨，已经加工好的布就在这里销售或再出口，而其他的布分发给染色工、修剪工和磨光工。这些手工业者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里干活，但也受行会的严格控制。他们也许无论如何都不能从事布的买卖，也不能在染色时在张布架上或磨光商店展示给未来的顾客看，除非布的主人在场。他们也许只为行会成员劳动，行会替他们的良好行为担保，确定他们的工资，禁止他们结盟，监督他们的工作，制定精确的技术条例，就像佛兰德所实施的一样，如不遵守，就遭重罚。尤其严格的是对珍贵猩红色布的监督。如果

[647]

发现一块猩红色的布没有完全用胭脂染色，而是加了些巴西木、茜草或海石蕊，肇事者则注定被罚款105英镑，如不能交付的话，就砍掉右手。

如果说卡里马拉行会控制和限制了从属于它的手工业者的活动的话，那么它也限制了它自己的商人企业家的活动。行会借助社区的帮助来保证所有经营阿尔卑斯山以北或英国布的人加入行会，可能并没有十分成功，但它的目的是确保它的控制有效，而且佛罗伦萨的行会成员的商店、仓库都受到严格的控制，尽管特派的“为法兰西王国的利益而战”的领事们监督他们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活动。行会禁止把手头上多余的布拿到集市上做交易。它制定了可以买卖的布的长度与宽度标准，不仅严格规定染色与漂洗，而且对布的销售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付款期限（在14世纪初）定为3个半月，外国人则为两个半月，还有一个星期的宽限，折扣和延期补偿也有规定，通常为每年10%。这些条件的具体实施可以从德尔·本丛书中看到，它告诉了我们整个商业活动的资金运转情况，从最初的采购和航运成本——平均约为最初成本的16%——直到染色、磨光和再销售。总的来说，减去企业的总开支后，那时一个卡里马拉公司，在把商品进行批发后，可期望实现的纯利润为12%。 【648】

与此同时，意大利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自己的毛纺业的国家。在许多城市有羊毛行会，它管理从制备羊毛开始的整个布的生产过程。佛罗伦萨的行会——以施洗者圣约翰的一只毛蓬蓬的小羔羊作为它的盾徽——其历史至少可追溯到13世纪早期，而在比萨提到羊毛行会是在1188年。在北意大利以及托斯卡纳，12世纪商业规模的毛纺业非常普遍，在13世纪则得到稳定发展。宗教界和世俗大众都在从事毛纺业。乌米里亚蒂也是如此，起初它是一个世俗的兄弟会，在1140年加入了本蒂可廷教团。与佛兰德的伯加兹（Bogards）和贝金勒斯一样，起初他们每天担负着织布的实际劳动，不同于世俗的手工业者的地方只是他们住在一起，为了宗教活动可以中断劳动，并且除了他们的社区外不受任何控制。但是后来，他们越来越专注于企业家性质的工作而把手工劳动留给雇工干。资本不仅通过利润再投资而获得，而且还从世俗投资者的贷款和那些虔诚的捐赠者手中获得，这些虔诚者图的是来世而不是当世的回报。13世纪中期，他们的工业活动达到了顶峰，但那以后就迅速衰落，到这个世纪末期几乎完全停止。1239年他们在佛罗伦萨的阿诺小岛上建了房子，但1277年他们将那里的业务卖了出去，在下一个世纪初他们又被免所有各项赋税，因为他们陷入了非常可怕的穷困中。

此时，乌米里亚蒂制作的布，就像那时差不多所有的意大利布一样，质

量低劣，价格便宜，这点我们可以从1265年威尼斯税则中看出来。由于更先进的北方地区纺织品的竞争，由于投资被导向非常有利可图的磨光与销售渠道，更重要的是，由于意大利生产者本国可支配的原材料匮乏，高档布生产的进步受到了阻碍。如果意大利布是用它自己的羊毛来生产的话，就不能指望意大利毛织品可与北方布质量相媲美，更不要说超过。但是意大利商业的巨大发展，导致了意大利人成为北方布的主要航运者和染色与磨光技术的完善者，也导致了他们从事羊毛生意。逐渐地，他们在13世纪开始与英格兰和佛兰德的制造商争夺欧洲最好的羊毛。西班牙、北非、法兰西、英格兰和苏格兰羊毛出口到意大利，在那里最好羊毛的价格是本地羊毛的3~4倍。最优质的是英格兰的高级羊毛，其优越性不仅显示在它本身的价格上，而且还因为用它织成的布能高价出售，从而足以补偿横穿欧洲所花的高昂的运费。不久以后，它们就因为能制造质量最好的布而超过其他地区的羊毛。意大利商人——由于身为罗马教皇在英格兰的收税人这一特殊地位而获利——他们走遍这个地区，收购教会及其周边地区的羊毛，而且经常是提前几年就购买，并且将罗马教皇的税收收入以羊毛的形式转到意大利。14世纪初，他们成了英国羊毛的主要经营者，一举胜出了曾主宰这种贸易的佛兰芒人，并且开始供应佛兰德集市。在意大利本土，加工高级布的进口羊毛远远超过本国羊毛来，但是生产优质的南部羊毛仍是值得的，而北方羊毛生产在许多地方都放弃了，在波河平原曾经放养着大量的绵羊，如今则全力种植靛蓝。

[649]

意大利的商人极大地促进了意大利制造商的成功，这些商人也得到了一系列有利环境的帮助，特别是佛兰德生产者所面临的困境。从1269年起，佛兰德与英格兰之间的贸易往来经常因贸易禁运和财产充公而中断，因此对佛兰德制造商的羊毛供应是断断续续和不稳定的；与此同时，佛兰德布的主要出口地香槟集市，由于与法兰西国王不稳定的关系以及他对货物和信贷的查封，而变得越发不稳定。除这些政治困难以外，还有严重的劳工问题——到该世纪末期，累积成工人针对长期统治佛兰德工业和政治的商人资本家阶级的普遍起义。这样的冲突，正如后面我们将要看到的，严重地损害了佛兰德工业的地位，时时都从内部威胁着它；而此时，意大利人正在把欧洲最好的羊毛转向自己的国家，从而从外部威胁着它。这些因素直接促成了意大利的成功。当佛兰德条件恶化时，越来越多的布业工人迁移出来，有自愿的，也有被政府驱逐的。许多人去了意大利正在崛起的工业城镇，那里越来越需要技术工人，也需要技术指导，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比如在博杜瓦，1265年法律规定进入这个城市布业的外国人可免除通行税和关税，后来也免除了

[650]

个人税；14世纪早期又重申了类似的特权，允许他们免税进口羊毛、染料与设备和出口成品，尽管他们的所有赢利也是免税的。

意大利服装城开出的诱人条件是为了吸引穿过阿尔卑斯山而来的工人，但更多的可以说是为了吸引来自邻近地区的工人。实际上，这些条件在许多方面组成了自发地向着发展民族工业而努力的财政制度的一部分，使得本地的民族工业可以受北方制造商的冲击，更不受自己最近的竞争对手的冲击。城市与城市间的竞争，要比两个拥有不同政治实体的地理地区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因此，13世纪后期，威尼斯的商人寡头一方面小心翼翼不使这个城市的血液即北方布的海上贸易受到伤害，另一方面采取措施保护它自己的新生工业不受意大利竞争者的冲击。关税制度逐渐地建立起来，不仅对邻近的城市来的布收税，如对博杜瓦、维琴察和曼图亚，而且还对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的布收税；对从罗马涅和阿普利亚进口的羊毛征收禁止性出口关税，以控制原材料流入对手城市，而威尼斯百姓则不允许去博杜瓦或特雷维索的毛纺业工作。

由于得到欧洲上好的羊毛和来自东方与地中海的染料，以及来自各地的劳动力和意大利商人的巨大财富所提供的资本的充足供应，加之从佛兰德生产者所面临的困难中获得的有利形势，意大利工业突飞猛进，独领风骚，14世纪上半叶达到高峰。如果说14世纪初卡里马拉行会仍在佛罗伦萨行会中居首要地位，那么仅仅几十年后它就被对手羊毛行会超过了；因为尽管1138年佛罗伦萨每年仍进口约10 000匹布，但据说它的产量每年可达到80 000匹。

意大利毛纺业的发展是快速的而且在地理范围上分布广泛。在整个波河平原，在无数伦巴第和威尼斯的城镇里，毛织品的生产成了主要产业。曾长期为满足本地消费生产粗布的城镇，如今也开始为外地集市生产优质布了。[651] 米兰、布雷西亚、维诺纳、博杜瓦和帕尔马都因其毛织品而著名，就像在罗马时期一样。在许多其他地方如科莫、蒙扎、贝加莫、维琴察、特雷维索、曼图亚和克里蒙纳还有出口贸易。威尼斯生产的货物的质量有显著进步，并且工业极其繁荣，尽管占第一位的仍然是丝绸业。在罗马涅的波洛格纳，在翁布里亚的佩鲁贾都有一个重要的生产中心。如果说在伦巴第和威尼斯就像贝尔吉卡一样，这样的繁荣只不过是1000年前的工业复兴的话，那么对托斯卡纳来说则史无前例，其工业化完全是一种中世纪现象。但是如今，因为拥有几个服装重镇如比萨、皮斯托亚、卢卡和佛罗伦萨，它也像波河平原一样成为重要的生产区，而且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尤其重要。卢卡在1285年

就享有盛名，当时它不仅给威尼斯送去便宜的白色、灰色和朱红色的伊普尔布匹，而且还因为它自己生产的朱红色宽幅细布——这是在 1265 年威尼斯海关税则提到的惟一的高价意大利布。但到 14 世纪初，所有其他的托斯坎纳城镇都被佛罗伦萨超过，它的光辉业绩将历史学家的目光从虽不是那么辉煌、却也是成绩斐然的地方吸引过来。正如当代历史学家维兰尼自豪地评论的，佛罗伦萨的毛纺工业每年生产 80 000 匹布，雇用约 30 000 人口。在奥尔特拉诺郊区旁特·维奇奥的庄园上，1200 年时仅有几间房子，如今则居住着成千上万的羊毛工人，还有许多羊毛行会企业的总部。

在所有这些城镇，其工业结构都是高度资本主义的，并且基本上类似于佛兰德。意大利羊毛加工销售商（*lanaiuolo*）像英国和佛兰德布商一样，是企业家，负责提供资本与技艺指导，雇用几个到几百个手工业者，并且与同行一起加入羊毛行会——这种行会严格控制布的生产，其严格程度就像北方的商业行会一样。他经常与家族成员或别人结成商业伙伴；这样可由一个或更多的人实行管理或者委托给一个支薪管理者——这个人有时也参股。按照维兰尼的说法，在佛罗伦萨 1338 年有 200 个这样的羊毛加工企业，每个企【652】业平均雇用了 150 个劳动力，如果我们按维兰尼所说的总数的话。在该世纪末米兰有 363 家企业；几乎每个都在波塔诺维的附近的某个教区设有总部，因为这里也像别处一样是一个布匹制造商的聚集地。

在一个方面，14 世纪意大利工业组织与 13 世纪的北方明显不同。在这里，每个城市的毛纺商人联合在他们自己的排他性行会——羊毛行会里；而在北方，他们是更综合性的商人行会的成员。制造商与外国商人实际上分野明显，尽管个别商人可以在加工企业持股，如布拉托的弗朗西斯科·蒂·马可·达蒂尼——他的账目和文件给我们提供了工业的实际过程和加工成本的许多细节。羊毛加工销售商不像北方的商人，他很少或者实际上毫不涉及这一产业的出口业务或对外贸易，他显然也不像同时代的大国际商人和银行家那样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影响。本地销售的布可能直接卖给零售商，但面向外国集市上的布通常卖给出口企业；羊毛加工销售商自己只偶尔从事出口业务，而且保证出口产品在抵达外国之前一直拥有所有权。在某些情况下，他完全就被排除在海外贸易之外。比如在米兰——那里的制造商正像威尼斯一样，似乎被外国商人控制——1396 年，它的社区立法仔细地分清商人和加工优质羊毛商人的区别；由于禁止出售超过一定价值——除了短期信贷外——的布，那些人最终被有效地排除在与外国集市的交易之外。同样地，意大利羊毛加工销售商自己很少进口羊毛，通常从大的进口商社或通过中间人购得。

随着这一“大工业”集约程度的提高，它越来越集中在一些大企业手中，无论是进口商、出口商还是制造商，而且也越来越倾向于消灭小资本家、独立的手工业者和中间人。按照维兰尼的说法，在 1308～1338 年间迅速的扩张时期，佛罗伦萨制造企业的数量从 300 家减为 200 家，但是每年的总产值却从 60 万弗罗林增到 120 万弗罗林。我们还看到，在这一时期的佛罗伦萨，那些从事购买原毛，雇人清洗、拍打，然后将其卖给集市或羊毛加工销售商的小资本家开始逐渐消失。经营纱线的小企业遭受了同样的命运。[653] 他们最初是有自主权的小企业家，从羊毛加工商那里购买清洗、拍打、梳理过的羊毛，加工成纱后再送到羊毛加工销售商那里。但是到 14 世纪末期他们成了羊毛加工销售商的雇工，负责监督乡下的整个纺纱工作，包括羊毛以及纱的往返航运。

意大利和佛兰德的大工业劳动分工非常类似，实际上与今天英国西部的宽幅绒面呢工厂没有多大的差别。14 世纪毛纺织业大约分出了两打专业工种。几乎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记载在佛兰德的文献上，在那里也有几个专业名称无法确认，还有一两个在意大利找不到相匹配的工种，如绕线工（*espouleresse*）。当时大康采恩的工作不可避免要更加专业，而在小企业里不止一个工种的活要交给同一个工人来做；而只有非常大的加工店才能雇得起专职压平技工。

我们发现这里的工人，同北部的一样，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这种差别表现在对资本的控制，对企业主的经济依赖、生活标准以及政治权力等方面。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许多手艺人是自愿依附于大工业企业的话，那么后来他们这样做就是迫不得已了，因为在羊毛行会的控制下，他们发现自己难以获得原材料或出卖成品。

佛罗伦萨的历史也许最清晰地展示了无产阶级的状况，在那里，这个成员毫无疑问比同时期意大利其他任何城市都多。像在佛兰德一样，那些从事预备过程如拍打、清洗、梳毛、刷毛的工人更加无法独立。这些人甚至没有拥有他们行业的生产工具；他们大多数在企业主的中心工场工作，在工头的严密监督下工作。既无财产也无权力，没有行业领事的同意，他们不允许聚集在一起或组成自己的兄弟会，即使为了宗教目的也不行，他们必须服从行会的规定，但却没有对行会领导人的选举权。经济萧条时期他们受到大规模失业与饥饿的威胁，在经济兴旺或劳动力缺乏时期，他们的命运在物质方面可能会有所改善。例如黑死病之后，由于劳动力缺乏，他们的处境比较有 [654] 利，可索取高工资，这导致行会第一次插足他们的事务，废除合同自由，建立一个由 8 个羊毛加工销售商组成的委员会以决定工资。由于大多数工作按

小时或天计酬，他们的就业没有保障。但是，如果说经济萧条时期雇主出于自身的利益而不愿负担剩余劳动力的话，那么在经济繁荣时期，出于必要他必须有能力控制这些工人使他们无法离开他到竞争对手的企业中服务。这样，雇主经常以商品或货币预支工资，而得到的是劳动。这样一种做法对有较大资本的企业主有利，行会对这种做法的态度依它对该产业向大企业集中的态度不同而不同。14 世纪早期，贷款是禁止的，但往往遭到反对，这个禁令很快作废。后来，企业主对工人的控制被一条命令加强了，命令禁止用劳动来偿还这种预支。

14 世纪纺纱工人完全处于依附地位，并且经常依附于某一企业主，他们只能纺他一个人提供的羊毛。但是对纺工的监督是一个麻烦的事，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家里劳动，遍布城乡，往往离公司的总部很远。羊毛加工销售商也许会以短斤少两和拖延支付工资来欺骗他们，尽管通过了保护他们的法令，但是他们也有机会进行坑蒙拐骗和不合作。因此，雇主向教堂与法律寻求帮助，并对佛罗伦萨和菲索尔的主教施加压力，要他们让牧师每年在讲经台上布道 3 次，命令织工服从命令，违反规范（*stamaiuoli*）者要驱逐出教。

织布大多在城市进行，在一个意大利、德意志和佛兰德组成的大都会群中进行，并通常在妻子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帮助下完成。他们越来越处于依附地位，经常在羊毛加工销售商的直接监督下劳动。他们甚至不再拥有自己的工具。因为在困难时，他们往往被迫典当自己的织机，而这种典当又往往是以一种对他们来说是毁灭性的而对债权者人来说又是十分有利的利率进行，以至于一个活跃地从事这种形式的投资行业发展起来了；如果说有些投资者满足于 50% 的利率的话，其他的人像艺术家吉奥托一样却收取 120%。

即使是漂洗工和染工也越来越受控于羊毛加工销售商。因为尽管这些部[655]门要求有更多的资本，而且往往建立独立企业以完成这些工序并服务于多个企业家，但行会自己也经常投资于此并获得了压倒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实际上成了许多漂洗工和张布工的主人，把一部分活分发出去——一两个水槽和一些木架——各个漂洗工及张布工都给一些，因此与织布机落入雇主手中的织工一样，他们也落到了需要依附别人才能生存的地步。13 世纪的染工似乎有自己的组织，但到 14 世纪实际上被合并到羊毛纺织行会（*Arte della Lana*）里了。他们比其他工人拥有更多的权利——因为他们是羊毛纺织行会的成员。但因为属于少数派（*membra minora*），羊毛纺织行会仍被多数派（*membra majora*）所控制，他们不得不接受别人为他们制定的工

资标准。他们也没能找到办法以弥补分期付款带来的损失，这样的付酬方法使他们的报酬有时会被拖延达5年之久——这个习俗往往也使他们更加依赖企业主。14世纪，他们两次恢复自己的行会，但每次都归于失败，尽管他们不同于其他工人，被允许保留宗教兄弟会——这至少给了他们一点结社的权利。

只有磨光工没有完全处于羊毛加工销售商的控制下，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磨光商店以及自己的工具，尽管他们经常在企业主的庄园里工作，但他们继续与顾客也与主人打交道。

由于羊毛加工销售商将他们对这个产业的控制稳步扩展到几乎每一个分支部门，羊毛纺织行会——在其中他们联合起来并且只有他们自己是全权成员——的权力与威望也逐步增加，实际上非常像一个卡特尔。行会不满足于纯粹的管制职能，它还从事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它不仅投资于染色作坊、张布架院以及漂洗场，即使不是所有者，也会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伙伴；它还沿着阿尔诺河建立了许多漂洗场，控制着一个靛蓝中心商店，并且在染料供应不稳定时还从事大批量的进口活动。

行会一度热衷于推动海外销售，热烈欢迎外国购买者，给他们提供经纪人并带着他们参观，非常的大方友好。为了让客户对佛罗伦萨的布放心，它禁止使用劣质工具、方法和材料，并以此努力保证较高的工艺水平，同时还规定统一的尺寸与重量标准。只有迫切需要帮助时，它才干预成员与其雇工间的纠纷。比如对经济上强大的染工，它严格地控制工资；而对于无助的梳理工的工资；直到黑死病导致劳动力缺乏时它才进行干预。通过使工人处于从属地位，剥夺他们集会和结社的权利，行会总是在努力防止工人制造麻烦。 [656]

行会行使权力的手段令人生畏。它经常安排许多巡视员，检查是否有人违反规则。为了防止违法者，行会有自己的警察，羁押罪犯的监狱和它自己的审判法庭。法庭的能力如此之广，以至于羊毛加工销售商与外部人的案件都可以在那里审理。而且，假如必要的话，它甚至能调用社区来实施它的判决。它所允许的惩罚是非常重的。罚款——经常以拖延工资的形式进行——这算最轻的；更严重的是剥夺工作，使之破产或驱逐出境。这样一些规则在欧洲所有布镇中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程度最深也最无情的佛罗伦萨，这些手段都是不用的，那里经常采取的方式是野蛮的体罚，从鞭打、砍手到杀头都有。例如，梳毛工辛托·布兰蒂尼（Cinto · Brandini）在1345年被告发举行公共聚会并规劝工人联合起来，当晚他与他的两个儿子就被同时逮捕，尽管他的梳毛工和刷毛工伙伴举行了一个抗议罢工，但是他

还是被处以绞刑。当14世纪前半期的繁荣受到这个世纪末日益增加的问题与困难的威胁时，佛罗伦萨的工业生活就像政治生活一样充满了血腥味。

9.5 北方的危机与转型

1. 佛兰德

在意大利工业逐渐走向全面繁荣的时候，佛兰德的工业最先达到成熟期，不过，它也越来越清醒地感受到困扰工业社会的问题。对支配其资本主义组织的外国原材料产地和集市的依赖使它处于剧烈的波动中，结果引起了普遍的劳动力骚乱。内部困境与外部麻烦相互作用，动摇了其工业基础，在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后，随之而来的是频频爆发的危机、重新调整和逐步衰落。

[657] 在人口密集的佛兰德布镇，劳资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冲突，即便现代欧洲的帝国主义时期也无法与之类比。到13世纪，这种分歧变得十分突出。曾有一度，所有从事工业与商业的人团结起来把他们的城市从共同的敌人封建领主手中解放出来。由此，在1077年，康布雷的织工与漂洗工与城市市民联手从大主教手中获得了自由。12世纪，织工的这种独立精神——在市政当局眼中总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在反对教会既定教条的叛乱中得到了体现。当时，他们拥护被佛兰德和英格兰通常被称为“织工异端”的思想。但是，到13世纪，他们对神学纷争的兴趣下降了，越来越被吸引到关注物质生活状况提高的斗争上来。这时，这个“大工业”中的手艺人在各处均沦为依附于企业家的命运。手工业者为工资而劳动，而企业家则获得剩余利润，当这种剩余利润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贫富差距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社会很明显地分为重要和次要，多数与少数，富人与穷人；那些拥有大量物质财富的人数量少，而没有或拥有较少物质财富的人却成千上万。

少数阶层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工资问题上，不仅仅是工资的数额，而且还有其他一些剥削方式，比如发放实物工资等。但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远不止于此，有时会采取朦胧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形式，像1225年瓦朗谢纳的织工和漂洗工占领市政府，剥夺富豪，建立公社（Commune）。这样的剥夺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掠夺战利品的欲望所鼓动起来的。正如编年史学家

菲利普·莫斯克特（Philippe Mousket）所言：

Povre gent, telier et foulon
Estoient si privet coulon;
Et li meliour et li plus gros
En orent partot mauvais los.
Et dissoient la povre gent
Qu' il en orent or et argent.

毫无疑问，手工业者既受那时在织工中间广泛流传的神秘思想的影响，也受一些行游修道士说教的影响，后者宣扬贫穷和卑贱的美德，也无意识地劝导人们藐视和仇恨富人。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被说服，相信只有通过颠覆强势人物的宝座才能获得物质生活的改善。因为，如我们所知，手工业者是 [658] 完全被雇主排除在商人行会之外的，而行会是雇主的后台，正是这些行会控制了市政府，规定工资与工作条件，控制羊毛的进口与布的出口，同时禁止手工业者未经允许结社和集会。经济与政治权力集中于雇主之手，也正因如此才使工人力求通过建立民主政府或至少参与所在城市的政治生活来打破这种局面。

1280年佛兰德群众运动达到高峰。经过一个多世纪断断续续的商业斗争、罢工、停工之后，终于在这一年迎来了革命的总爆发。这场革命几天之内就扩散到了布鲁日、伊普尔、多埃和图尔奈。推翻会社寡头的政治特权是手工业者的主要目标，正是这一点使他们起初既与那些被排除在行会之外的小商人和布商联合起来，也与正想减少其强大臣民权力的伯爵联盟。于是，在向伯爵的陈情书中，他们要求废除商人行会的特权，废除世袭的等级制，在市政委员会中设置手工业者代表，任何人都有进口羊毛的自由。但是，这三者之间的联盟并没有维持多久，虽然那些曾与平民大众为共同事业而奋斗的小市民很快就认识到，如果说伯爵想要摧毁寡头的权力，那只是因为他想最终破坏城市的独立，使自己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心。他们认为城市自治权比民主更为重要，于是最终决定放弃手工业者，站到贵族的一边。

因此，问题显然仍出现在手工业者与企业间，雇主与雇工间。正如手工业者绕过他们的顶头上司去求助于伯爵一样，雇主则绕过他们的顶头上司去求助于他们的宗主国（Suzerain）。为了获得法兰西国王的帮助，他们允许国王派一个“保护者”到城里来，并宣布放弃对伯爵的效忠，然后从他们的钟楼上挥动百合花旗，并由此而获得了叛变者（*Leliaerts*）的绰号。他们这样做威胁了国家的自由。因为当伯爵支持手工业者时，他是为了摧毁贵族的权威，

让自己充分拥有对城市的所有权力，而国王支持贵族只是为了控制和贬抑伯爵，他的重臣，并使自己成为佛兰德的主人。因此，拥护民主事业的手工业【659】者，也是在拥护佛兰德的自由，为了民主事业，为了自由事业，他们坚持不懈。法兰西国王对佛兰德的入侵与吞并是织工联合所有大众举行普遍起义的信号。在布鲁日，漂洗工、织工与修剪工以及实际上是所有无产阶级都在织工皮埃尔·康宁克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根特工人紧随其后。人们到处都在夺取政权，屠杀或强迫法国人和叛变者逃走。科特赖克一役（1302 年）决定了他们的最后胜利。当时一队从手工业者队伍中征召来的步兵，手持长矛，在大约仅 30 名骑兵的帮助下，一举击溃了法兰西骑兵，从而为战役画上了句号。令欧洲人惊奇的是，佛兰德是由其工人的果敢意志解放的。

在库特赖、城市民主也取得了成功。商人行会的权力被摧毁，手工业者参与了政府，他们有权结成自己的行会。但是手工业者的胜利是一种错觉，是不可靠的。工人的福利最终要靠工业的繁荣。没有阶级冲突可能是这种繁荣的一个条件，但同时也是繁荣的结果。其他条件是原材料的充分而正常的供应和集市的充足。手工业者确实可以通过限制资本家权力的办法来解决无产阶级的问题并且似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更多的问题却是更复杂更不容易控制的。13 世纪末期的不满与悲惨与其说是这种产业在一定时候必然要遭受灾难的一个原因，还不如说是一种预兆。

羊毛的缺乏是这个时期的重要问题。尽管产量增加，英国羊毛是一种能制造高级布的优质原料，却不足以满足需要。现在开始快速发展自己的高级毛织品生产的意大利，越来越想得到英国羊毛。到 13 世纪晚期，意大利商人在英国毛纺业中独占鳌头；尽管由他们出口的一些羊毛卖给了佛兰德人，但越来越多的羊毛还是流入意大利供它自己的纺织机所用。因此，无论怎样，对佛兰德的羊毛供应是不稳定的。政治发展使情况更加恶化。当该世纪末期英格兰与法兰西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时，双方往往使用经济武器。英格兰通过使用停止出口羊毛的威胁使法兰西处于非常尴尬的困境，甚至迫使法国【660】最强大的领地佛兰德采取中立，如果不是积极支持的话。法兰西则以不向英国羊毛开放集市以及夺取英国羊毛商和缴获货物来报复，但代价是摧毁了佛兰德并把它拱手相让给了英格兰。从 1269 年开始，由于持续的货物禁运与财产充公，贸易被迫中断，并且不时地使工业完全处于停滞，雇主破产，使手工业者处于悲惨和贫困的境地，成群结队、饥肠辘辘地游荡于乡间，靠乞讨为生。据说，在 1297 年佛兰德羊毛饥荒时期，佛兰德地区可谓一座空城，只是“因为人民不能得到英格兰羊毛”。因此，毫不奇怪此时爱德华一世的

策略是成功的。不久以后，曾反对法兰西国王支持佛兰德贵族的伯爵，与英格兰签订了签订了盟约；英格兰一国就可以保证其人民的生活。

如果羊毛稀缺的话，那它就会非常昂贵，虽然价格昂贵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产量稀少。据当时的议会宣称，英格兰的羊毛相当于“整个大陆产值的将近一半”。因此，爱德华战争的财政需要不可避免地导致征收羊毛税，1275 年第一次征收出口税。最初为每袋 0.5 马克（6 先令 8 便士），1294 年由于采取了“特别征税”报复措施而猛涨到 5 马克，1297 年为 3 马克。这些税负的一部分以降低支付的形式转到英国饲养者手中，但也有一部分必然转到大陆购买者手中。1303 年对外国出口商进一步征税，整个新税的负担也全部转移到前两者手中，因为在与英国生产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外国人与英格兰的商人展开了竞争。

外国制成品价格由于英国征收出口关税而急剧上涨。它们上涨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佛兰德货币对英国货币的弱势地位，因为这种贬值是法兰西国王美男子腓力所采取的处理财政困境的主要补救措施之一，这使法兰西的君主政体受到重创，其程度不亚于英格兰。因此，为了满足不断增强的提高工资的要求而实行的通货膨胀政策，不仅提高了生活成本而且提高了原材料的价格，因而使得雇主更难以满足这些要求，假如他们的布要在国际集市上有竞争力的话。

如果说原材料是佛兰德制造商所遇到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市场也是。如我们所知，意大利的竞争力稳步增强，这威胁着他们在地中海集市上的销售。与此同时，佛兰芒人在英国曾经培育起来的繁荣市场也时常被彻底关闭，因为外交原因，英格兰和佛兰德之间的贸易常被禁止。佛兰德布的主要 [661] 出口地是销往香槟集市，当 1285 年香槟实际上成为法兰西王国领土的一部分时，这一集市经常被中断。佛兰德的布匹出口贸易太多地受到法兰西国王外交和财政需要的影响，正如它的羊毛出口受到英格兰国王的影响一样。佛兰芒人与国王之间不仅在边境收税站方面有争端——因为对国王来说，新的领地事关国库补充的切身利益——而且从那时起，作为对佛兰芒人的一个外交武器，所有边境贸易常常都被全部禁止。1297 年，佛兰德成为英格兰的盟友，所有在法兰西的佛兰德商人都被逮捕，他们的货物与现金被没收，他们的营业大厅被占领。

因此，到了 13 世纪末期，政治困难威胁着佛兰德工业的两条生命线，即穿越海峡两岸的羊毛路线，以及跨越边境到香槟大集市和到意大利的布匹贸易路线。而正在此时，其他地方布商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两条生命线

被切断，以及货币贬值所带来的生活费提高，工人的不满进一步加剧，激起了他们对高工资的要求，尽管此时，雇主不可能满足这些要求，因为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停工时的企业的一般管理费用仍在继续支出，而利润又非常不稳定。

这样的环境使得手艺人的成功变成了一种惨胜，实际上标志着佛兰德布业衰落的开始。库特赖战役也许让织工有了政治权利，但这并没有解决繁荣是靠外国集市、原材料、工艺以及资本家的企业精神等相互作用的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变得愈加尖锐，工业冲突继续存在。因为尽管手工业者通过打破商人行会的垄断权并将羊毛和布业全部开放来获得政治与经济权利，但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仍是依附于资本家的无产阶级，为其他人工作，因为这种"大工业"需要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他们的状况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虽说是稍有改善。如果不重新建立羊毛的进口与布的出口，他【662】们的生活水平是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改善的。沿用老办法不可能使经济起死回生。意大利工业在这个世纪的前几十年发展非常快，对英格兰羊毛的需求与日俱增。而此时，英格兰与法兰西的冲突正势不可挡地朝着最后的破裂即百年战争的方向迈进，英格兰与佛兰德的羊毛与布贸易再一次被中断。而且，法兰西国王的目的仍然是要吞并佛兰德，尽管佛兰德人民对自治的观念仍然有很深的感情；因此在和平时期，当贸易以毫不减弱的势头重新开始时，公开的战争与完全的禁运却又是交互发生。因此，失业继续存在。市民战争也是如此：随着工人阶级幻想的破灭，阶级仇恨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这个世纪前25年的一系列起义于1324年达到了高峰——当时伊普尔和布鲁日织工与漂洗工加入农民的行列，与他们一道反抗富人，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次叛乱最后只是由于法国人的干预而被镇压，他们在卡塞尔（1328年）城墙外一举击溃了农民与手工业者组成的武装部队，并对这个城市进行血腥的报复。

14世纪早期，这类内部或外部冲突使佛兰德纺织工人一次又一次拿起武器。可无论是反对法国人还是寡头政治，或他们自己人，都没有完全摧毁这个"大工业"，尽管他们大大地伤害了它的优势与稳定性。但这确实导致了这一产业在区位、组织、产品销售方面的深远改变。

佛兰德重要的加工地区如今已退到莱斯以北的沿海地区。13世纪中期，北方中心变得比南方越来越重要了；而14世纪早期这种趋势得到了加强。1312年，佛兰德通过将沃伦地区割让给法国而换取了几年的和平，该地区有几个布镇如多埃、利勒和奥查斯。这些曾经著名的纺织中心，如今成了法

国军队的通道，工业萧条衰落，就像一度是北方工业与商业大都市的阿拉斯一样——当时阿图瓦在12世纪末期割让给法国。如今主要的加工城市成了伊普尔、布鲁日和根特，它们的生命力与重要性，以及它们距离法兰西较远这一点，才使它们得以维持下去免受吞并的厄运，尽管代价是惨重的。

在这三个工业城市内，三个贸易的部门中有两个由外国资本取代了本国资本，主宰了原材料的进口以及成品布的出口，留给佛兰德资本家的只是不同生产工序的组织。像琼·博伊纳·布洛克那样能够综合三个功能的大企业家时代已经结束了。随着商人行会的被压制以及商人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废除，佛兰德企业更趋向于中等规模。佛兰德的船只如今离开了大海，佛兰德商人也放弃了外贸；他们不再成群结队地到大集市去卖布或旅行到英格兰收购羊毛；“汉萨十七镇”只不过是徒有虚名。佛兰德布商仍然将羊毛分发给纺纱工、织布工、漂洗工以及其他工人，但他们从外国进口商手里购进羊毛，主要是意大利人；而通常是通过本国的经纪人出售自己的布，将布卖给出口企业，许多也是意大利人的企业。有时布商自己就是纺织师傅，因为如今也允许手工业者购买羊毛并且销售布。 [663]

如果说“汉萨十七镇”的衰落是佛兰芒商人统治阶级衰落的一个象征的话，那么这种衰落也是出口贸易重新定位的标志。法国再不是佛兰德纺织品的主要商业中心。旧时通向香槟集市的陆上贸易路线，由于在边境不断遭到新的关税壁垒与法国军队的阻拦，人烟越来越稀少。集市的城镇街道上杂草丛生，佛兰德商人的商业大厅如今沦为废墟。伊普尔、根特和布鲁日的布如今通过布鲁日港口找到了海上出口，尽管有些布仍然经由陆路到达德意志和中欧。当阿拉斯处于它发展的第一阶段时，布鲁日——虽然商业仍比工业更重要——成了北部纺织品的主要集散与出口中心。在那里，佛兰德布装满如今挤满港口的外国船——自13世纪末期以来就开辟了从意大利到北方的直接海上路线的意大利大帆船与平底大船；还有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的船；最重要的是德国汉萨坚实的小船。这一时期是它的顶峰时期，它们将佛兰德布运到波罗的海地区的新殖民地上，从那里带回佛兰德工业城市所需要的谷物和钾碱。

2. 布拉班特

13世纪末期和14世纪初，佛兰德纺织中心所遭受的困境给与其相邻的布拉班特公国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佛兰德富人和穷人的生活越来越没保障，

[664] 工厂由于原材料缺乏和集市不景气而悄无声息，而且不断遭到血腥暴乱或外国侵略的破坏。相反，布拉班特取得了惊人的稳定与繁荣。作为帝国的封地，它享有半独立权，就像两个世纪前佛兰德所享有的一样。相继统治该公国的几个能干公爵采取了十分明智的政策，既保证了它的自治而同时与邻国保持友好关系，并且使贸易的通道保持畅通。约翰一世本人及其儿子和孙子，都深受布拉班特商人与人民的爱戴。他们拒绝过分地卷入佛兰德和法国或法国与英国之间日趋激烈的纷争，但是它又时不时地与各方谈判，以自己的加盟甚至保持中立为要挟来获取更大的利益。如在 1294 ~ 1297 年的英法战争中，英格兰所有羊毛出口都被禁止，只有布拉班特商人例外，因为，公爵此时正在积极敦促佛兰德伯爵与英格兰国王结盟。但几年以后，他又充当法兰西国王的代理人让佛兰芒人回到谈判桌上来，作为回报，他们签订了一个商业协议，给布拉班特商人在法国集市上最优先的权利。

这样，由于公爵精明的治国才能，布拉班特羊毛供应几乎未被中断过，它与莱茵河流域以东的集市保持甚至加强了旧有的商业联系，又与西方发展了新的联系，与此同时还加强了它在法国集市的贸易地位，而这正是佛兰芒人放弃了的集市。

公爵们同样成功地控制了社会冲突的发展，而这些社会冲突虽然不比佛兰德的猛烈和持久，但也威胁到了布拉班特的和平。他们在支持贵族反对无产阶级时从没有动摇过。就贵族而言，他们从没有背离过对公爵的忠诚，因为他们知道公爵是他们镇压平民动乱的惟一可能的保护人。13 世纪的工业骚乱导致了间歇性的但不成功的战争。在布拉班特，就像在佛兰德一样，手工业者没有集会结社的权利，他们完全受贵族的商业行会的控制，而所有手工劳动者都被排除在这种行会之外。1302 年，佛兰德起义的成功是普遍大起义的先兆。在织工和漂洗工的领导下，布鲁塞尔、勒芬、安特卫普和列奥工人进行了武装起义，赶走贵族，夺取城市政权，废除了商人行会。但公爵

[665] 亲自指挥贵族军队反对他们。在维尔福德（1106 年）战役中，他最终击败了起义军，残酷镇压了起义。许多战争中最积极的织工与漂洗工被放逐；有些极有可能被活埋。商人行会得到重新恢复，它们的权力得到加强；从此以后，只有它们可以给漂洗工、织工、染色工、刷毛工和纺纱工制定规则。工人再次被禁止罢工，不允许集会结社或携带武器；在布鲁塞尔，宵禁信号发出后，工人就应该呆在城墙外专门用来隔离工人的“工人区”，如发现谁还在城墙内，就判死刑。

如果说平民运动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公爵与贵族的紧密联盟的

话，那么这同样也可以归结为商人行会强大的生命力，它在布拉班特持续的活力与那时佛兰德的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种活力本身毫无疑问既是布拉班特工业稳定的原因，也是布拉班特工业稳定的结果。由于可以自由而不受干扰地发展商业，布拉班特商人可以乘机利用佛兰德处于困境的机会。直到此时，布拉班特的纺织业还是落后于佛兰德。12 世纪阿拉斯和伊普尔的布行销整个欧洲时，它还无足轻重。尽管 13 世纪中期它的产品也销往莱茵河，但只是在 13 世纪以后它才大规模地出现在香槟集市。在“汉萨十七镇”中最古老（13 世纪的中期）城市的关税税则上，布拉班特的城市完全不存在。但到了 1285 年，勒芬和马里尼斯出现了，几年后，布鲁塞尔、尼韦勒和迪斯特（Diest）都被提及。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它们在保持对东方贸易的同时又极大地扩大它们在整个中欧和波兰的销售量，从而稳步地加强了它们在西方的地位。

布鲁塞尔、马里尼斯和勒芬布的声誉日趋显赫，尤其是布鲁塞尔布的质量非常好。这也许可以通过 1298～1328 年间阿图瓦伯爵夫人的家庭购买情况可以看出。无论是在香槟集市还是在加工区，布鲁塞尔布是她买得最多的，接下来就是马里尼斯与勒芬的布。这三个城市布的总量超过了佛兰德。14 世纪早期在巴黎，布拉班特布的销量逐渐赶上了佛兰德的布；商业活动是如此兴旺，商人不断寻找新的地方展示他们的商品，在这股时代潮流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在那里租到了一部分自圣·路易时代以来多埃商人拥有的商业大厅。毫无疑问，正是通过这些法国路线，一些布拉班特布在 14 世纪早期开始进入地中海，然后渗透到黎凡特。在这里，也就是佩古洛蒂编他的手册时，布鲁塞尔、勒芬、马里尼斯和安特卫普的布出现在君士坦丁堡的集市。但有些布也通过更直接的贸易路线销往南方，很少受到中断与阻挠。通过 12 世纪末期热那亚公证人的一系列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有关北方布的一些知识，布拉班特布首次出现是在 1310 年。从那以后，很明显，不仅仅是热那亚代理商而且他们的船都开始进入布拉班特，在安特卫普“寻找布以及其他物品”。凭着精明的判断，约翰三世授予他们特权，鼓励他们经常来这个迅速发展的港口。这样，布拉班特布得到了第三个销售通道，而这个通道可能比东部或西部的陆地路线危险更少。【666】

3. 英格兰

英格兰的工业就像低地国家的工业一样，13、14 世纪之交是它的危机与转型期，尽管在这种转型中孕育着的是进步而不是衰退的种子。英格兰的

工业发展仍落后于佛兰德，尽管布的生产不可忽视，但它仍主要是佛兰德以及意大利羊毛的最重要供应者，并且它本身就是外国布的巨大市场——当爱德华一世需要新的税收时，他对羊毛而不是布的出口征税。因此，英国布镇相对于伊普尔或根特来说规模是很小的。然而，这里也有工业冲突的迹象，虽然性质不如佛兰德那样严重。工资的数目、严格限制的惯例、集会结社的权利都是雇主与雇工间激烈争论的话题。在 1275 年，兰切斯特的漂洗工遭到法庭传唤，因为他们在没有行会商人出场的情况下举行了非法会议。1264 年，织工"制定了一条关于反对行会商人集团的条款"。1293 年，诺里奇漂洗工被指控组织了非法的行会。1280 年，林肯郡织工与漂洗工和雇主关系紧张。至少在 12 世纪早期，伦敦织工就在王室的特许下组织了自己强大的行会，这就使他们在反抗雇主时处于有利地位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破坏他们的行会的企图被证明是徒劳的。当市政府给约翰国王大批资金以求废除[667]宪章时，织工则给他一笔更大的资金来恢复他们的权利。到 13 世纪末，他们处理物价上涨的问题是采取提高工资的办法，假如他们的雇主即粗呢工场主可信的话，刚开始纺织一匹布报酬是 2 先令，后来就是 2 先令 6 便士，甚至为 3 先令 4 便士，而这以前他们仅满足于 1 先令 4 便士或 1 先令 6 便士。在必要时他们通过罢工来达到要求。与此同时，工场主们抱怨说，行会还限制织布机数，从 380 台减到 80 台，并且规定一匹布不可以在 4 天之内织好；他们延长假期，并且休超过一个月的寒假，时间是从圣诞节到 2 月 2 日。

这些伦敦织工们都非常乐意遵从这种限制性做法，其实这也暗示当时他们没有足够的工作可做。商业实际上在衰落，不仅在伦敦如此，而且在许多其他老工业中心也是如此。据说，牛津到 1290 年只有 7 个织工；到 1323 年这 7 个人都病死了，再也没人取代他们的位置。据说，一度以猩红布著名的林肯城根本就没有织工了；1322 年的兰切斯特只有一个漂洗工并且"是一个穷人"；到 1279 年，织工已经放弃了北安普顿；而到了 1334 年曾经有 300 个布业工人居住的房子据说全倒塌了。温彻斯特织工行会发现，以收集上缴王室的年金越来越难，行会自己解释说是因为大量的布工离开了这座城市；约克、林肯和牛津的行会也陷入严重的债务深渊中。如果说我们不能够过于重视这些抱怨——因为它们大都是关于请求减免税务——的话，那么我们同时也不能过于轻视他们，因为其发生的范围是如此之广，而且时间也如此集中。

英格兰东部低地的这种倒退，部分地可归因于外国竞争的加强。13 世纪早期，到英格兰买羊毛的佛兰德船只也带来优质的佛兰德布，它们都是用

同样的英国羊毛加工的，后来越来越多的时髦男女购买外国布，尽管不时有禁令发布。海峡两岸巨大的纺织业城镇，缓慢而又无情地争夺着奢侈品集市，直到在取消贸易禁令时每年带到英格兰的布足以做 24 000 套完整的长袍。与此同时，英国通过出口原毛而变得更加富有，这些出口羊毛吸走了英国工业的血液，因为从 13 世纪晚期开始，布拉班特人，甚至更多的是意大利制造商为了发展自己的产业而买走了越来越多的羊毛。英格兰羊毛供应的缺乏使得那些地方的布商把目光转向了进口西班牙与德意志羊毛，而据说在 【668】 14 世纪早期，英国的原材料如漂洗砂、起绒草，甚至靛蓝都曾一度被外国商人抢购光了。优质英国布往往不仅丧失了国内的奢侈品集市，而且在外国集市甚至原材料供应上都一败涂地。

但是，这些城市工业中心只不过是整个英国毛纺业的一个非常小的组成部分。就像无处不在的羊一样散布于这个国家的是另一个不那么显眼却并非不重要的产业，它更多不是在城市而是位于乡村、部落以及小城镇，主要用于满足其邻近地区的需要。1197 年，“城市和大都市的城区”想通过《度量衡法令》（第 628 页）及其自己的宪章来反对的这种乡村工业。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取得自己所渴望的那种垄断地位的成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感到外部的竞争力量威胁着他们廉价布的销售，就像外国毛织品威胁着他们优质布的销售一样。

如果说乡村工业一开始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满足本地需求的话，那么 13 世纪它越来越步入了大工业的轨道。在这方面，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是集市的繁衍，这是 12 世纪晚期和 13 世纪英国经济的一个明显特征。这使得每个乡下人很容易到达集市把剩余产品卖给商人，而这些商人又与港口或城市相联系。这也为获得原材料创造了新的机会；该世纪末期的亚眠商人不仅在林肯或伦敦这样的城市做生意，而且其活动范围也涉及了星罗棋布的遥远小镇如威斯特摩兰（Westmorland）的阿普尔比。更重要的是由于引进了漂洗机而在这一产业的主要分支部门发生了一次技术革命——这是纺织业中第一次使用机械代替人力。

中世纪漂洗的机械化与 8 世纪纺纱和 18 世纪织布的机械化一样是决定性的革命，但我们不知道它是在何时何地发明的，更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找到的证据都说明，12 世纪时它就在西欧普遍使用。已经为人所知的最早提到的漂洗机的文献是 11 世纪诺曼底的圣旺德里勒宪章，它的成书时间为 1086～1087 年。宪章中谈到安讷贝（奥恩河）[Annebecq（Orne）] 的一台漂洗机。没有进一步发现 1145 年前任何的线索。但从

[669] 那以后到12世纪末，法兰西北部的漂洗机就很多了；那时，从诺曼底西部到香槟的沙隆这一地区，有记录的漂洗机都不止29台。英格兰已知的最早记载是1173年帕克斯顿（亨特斯）的漂洗机。仅有其他4台可上溯至12世纪，包括两台出现在1185年特姆普拉斯庄园上——约克郡的纽斯翰和巴托——但从那时起，有关这种漂洗机的资料越来越多了。术语上的两个重大改变证实了我们的想法，即从12世纪晚期开始，它开始广泛地代替老式的漂洗工场，旧的单词“漂洗工场”在早期资料中很常见，这清楚地表明这种设施与罗马时期（参考第616页）的设施没什么区别，而这时这个词渐渐消失了，被“漂洗机（*molendinum fullericum*）”取而代之。原先当提到水磨时通常要加以说明，但这一点到现在也没必要了，不管是用来磨谷物的还是做别的用途的都是如此。

在这个“大工业”中，新式装置至少比那种用脚在槽中踩的老式费力的办法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在漂洗机中，人的双脚被两个锤子代替。在倾斜的落锤系统中，通过转动连接水轮的纺锤盘，锤子交替地上升与下降，击打在布上。因此通过简单的设计，水力代替了人力，并且运转一系列的锤子，只需要一个人站在上面照看布，并保证它在槽中正确地运动就可以了。

新办法大幅度地减少了所需劳动力，这个事实意味着它的使用要受到布镇旧式漂洗工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生计的威胁，因此强烈反对漂洗机，并像18世纪的手织工人一样，夸大机器劳动的缺点以及它所导致的失业。1298年，伦敦人是这样抱怨的，他们叹息被送入里河（Lea）边上的斯坦福德漂洗机漂洗的布说：“对主人的布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破坏，而且对城市用漂洗机的人来说也是极大的破坏。”

尽管遭到城市漂洗工的反对，但到此时，只要有水力可用的地方，整个英格兰的各地都在普遍使用漂洗机。到14世纪初，它们的使用就很普及了。伦敦制造商经常将布送到斯坦福德漂洗，以后又送到10英里远的旺兹沃思以及恩菲尔德（Enfield）。布里斯托尔的布制造商加工“内地”漂洗的布。[670] 脚洗到处都在让位于漂洗机，人力正在被水能代替。漂洗工业在工场而不是在家里进行，它极大地依赖需要花费相当资本的装置，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漂洗作坊招徕了如此多的生意以至于它们成了一种投资的形式，它吸引了来自土地和贸易的资本。在农村地区，这样的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不仅因为大量城市纺织好后的布被送到漂洗工场漂洗，而且因为漂洗机——就像谷物磨房、烤炉、榨汁机器或染盘一样——逐渐被认为是佃户所必须适应的一种庄园垄断装置。乡下人被迫将布拿到领主的漂洗场漂洗，而不是在自家用

脚漂洗，即使他们的纺织品仅是为自己使用也是如此，就像他们不得不把谷物拿到领主的风车或水磨加工而不是在自家用手磨一样。因此，经常有庄园上的领主——不论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积极地投资于建设漂洗工场。如温彻斯特的大主教在1208～1209年在他的布莱特威尔（Brightwell）庄园花了9英镑多建了一处漂洗场，在汤顿花了16英镑，还给他的新自治市唐顿（Downton）和威特尼各提供一台机器。一旦漂洗场建立起来，漂洗机就经常出租出去，尽管机器的操作工通常是由场主委派的。从中获得的利润因吸引的生意数量和求助漂洗场的农奴的数量不同而不同；因此在肯德尔，半个股份漂洗机的利润为10马克，而到了1274年只有8马克，因为在斯泰夫利河的上游又建立了一处漂洗场而且肯特米尔的农奴更喜欢使用的新漂洗机，因为到这里只走4英里而不是带着他们的布沿着肯特流域走8英里。

就像欧洲大陆一样，英格兰领主在庄园的垄断权利保证了他们在投资上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这自然遭到了平民百姓的反对，到处爆发公开的起义。比如，在圣奥尔本斯修道院花了不少于100英镑建起了谷物加工厂和漂洗工场后，坚持即使最小的布片都必须拿到那里去漂洗。圣奥尔本斯的人民认为这是没有理由的掠夺，继续在家里免费漂洗衣服。当1274年修道院派人去查房并扣压他们的布时，他们用武力起来进行反抗，并设立一笔斗争基金，到国王法院论理——当然这是徒劳的。

漂洗机的快速发展不仅决定性地影响了英国工业的技术和组织，也影响了它的区位，从而为乡村地区的发展创造了机会。有些城市的确也建立了自己的漂洗工场，尽管很多人反对这项创新，认为它会使许多人失业。但建设漂洗工场所需要的特定空间以及必要的河流分支通常不是要有就有的条件。大多数城市地处河流的下游，水流慢，不如快速的上游水更符合这一要求，因为上游可轻易有效地利用上射式水车。因此，漂洗越来越多地在城外进行，往往是在偏远的高山峡谷，而且在乡村地区发展某一产业部门的趋势给那里的工业整体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刺激。 [671]

然而更重要的是，英格兰山区的水力最容易获得。由于水像19世纪的煤一样成为了决定因素，那么亨伯和沃什湾东部平原地带的工业往往就趋于衰落——那里曾是主要的工业中心——现在发展的中心转到了西部与北部及南部，尤其是在那些羊毛好，有水能和纯净漂洗水的地方。特别是在约克郡的西里丁，威尔士的南部边界，科茨沃尔德丘陵，门蒂普斯，威尔德郡和伯克郡（Berkshire）丘陵之间的峡谷地区，这些地区的发展速度惊人地快。虽然湖区、德文和康沃尔（Cornwall）的发展也不逊色，但在这些地方，生产

的是更粗的布。在所有这些地方，水力在 14 世纪初期就开始得到利用，尽管直到后来它才得以充分的开发。

城市徒劳地努力反对乡村不断增强的竞争力。它规定不允许将布送到城外漂洗，也不允许在城外雇用手工业者。但是这样的一些条例，即使可以阻止城市制造商与城外工人打交道，也不能阻止一个独立的产业在农村繁荣发展。有些城市因此制定宪章，使自己在某一区域垄断染色和磨光布的制造活动。例如，约克的居民在 1304 年请求说，尽管 1164 年的宪章规定这样的布仅限于约克本身及其他自治城市制造，但如今"各种人在农村的不同地方，而不仅仅是在这个城市和其他城镇，制造染布和磨光的布"。他们向国王的陈情的确导致了一次官方调查并颁布了一道命令，即在所有非法地点从事这【672】种工作的行为都应该强迫停止，但这样的命令不能成功有效地把工业限定在城墙之内，更不能阻止它在英格兰偏远地区的发展。

很明显，在 13、14 世纪的转折时期，在城市建立布业的优势比起乡村相对来说就不像以前那么大了。乡村的制布商如今也想进入本地区外的集市，并且很容易得到进口的原材料，他也能充分利用封建领主所建的漂洗机。而且在庄园主建立集市的地方，他们也常常建立一个自治市，那里的居民享有更大范围的个人自由。正是这些享有特权的封建自治市——虽然在开始时很小，如利兹——成为未来的工业增长点。

与此同时，在早就建立工业的城市，那里的限制既多又烦琐。劳动力往往难以控制并且比雇主所期望的要组织得更好，更重要的是，手工业者与企业主的税收都是十分繁重。比如在温彻斯特，13 世纪晚期市政府每年对每台粗呢织机征收 5 先令的税，而在城市司法权以外的主教辖区内不用每年纳税，仅一次性地缴纳架起一台织机的执照费即可。毫不奇怪，织布机从城市的街道上消失了，建到了主教享有法权的郊区街道上。据说，"人们富裕了发财了，因为他们无需再为各类赋税以及其他与国王和城市相关的负担而苦恼"。在兰切斯特和北安普顿，重税据说也是导致工业远离城市的重要原因。在牛津，不管什么原因，离开城市到乡下对某些企业主来说利益是很明显的，这些企业主 13 世纪末期在考利和伯克斯利（Bexley）建立了织布场并且雇用了织工。据说，这就是牛津城织工业衰落的原因，因为织工无法为他们的行会而是给国王缴纳巨额税金。

这样的衰竭——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只能加剧了老纺织城市的困境。当 14 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开始压过它的对手时，人们发现它的增长点——除了少数的例外——都在那些著名的纺织城市之外。而且，它们主要

不是位于低地，而是在丘陵地区，因为随着漂洗机的到来，那些拥有水力的地方同时拥有重要的工业优势。【673】

9.6　英国工业的成功

英国毛织业的巨大进步及其以后长期享有的突出地位，是中世纪晚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到15世纪末期，这种成功被进一步巩固下来；曾一度强大的佛兰德以及意大利城市工业，由于都无法解决其工业社会问题，都处于分裂的阵痛中，被各种纷争和困难搞得分崩离析，而英格兰则从一个原材料主要出口国变成了工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国。

漂洗机的发展所提供的新的内在可能性，加上极为充足的水力，使英格兰相对于佛兰德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佛兰德像林肯郡一样，总的来说使用的是风磨而不是水磨。除了南部之外，即便有可能，在那里建立任何大规模的漂洗机都很困难，即使这种活动没有受到比英国的行会更加保守且非常强大的城市行会的限制。现在所知的证据表明，13、14世纪从没人进行过这样的尝试。在阿图瓦（Artois）、布拉班特、列日（Liège）当时建立了漂洗场，但在那里也像在法国北方一样，它们的使用受到了传统工业中心强烈而且整体上非常成功的反对，借口是产品质量难以令人相信。到了16世纪，新的技术才在低地国家取得成功，那时主要是在丘陵地带，特别是在布拉班特、缪塞和韦德尔峡谷以及沿莱斯一带的佛兰德南部，那里的主要产品是廉价以及中等价格的毛织品。此外，在伊普尔仍普遍用脚漂洗。在这方面意大利的地位比佛兰德更为有利。例如在托斯卡纳，亚诺河和其他从亚平宁发源的支流提供了充分的水力，足以使佛罗伦萨邻近地区的许多漂洗场维持运转，至少在13世纪早期佛罗伦萨的布就送到这些漂洗场漂洗。与佛兰德的城市不同——那里的每座城市都有明显区隔，试图将工业限于城墙内，努力反对周围农村和其他城市对手的竞争——佛罗伦萨则利用周围的农村寻求发展，它在那里占据统治地位。建立漂洗场既有可能是个人制造家也有可能是公司性质的行会出资，后者逐步控制了大部分漂洗场。

在原材料方面，英国相对意大利和佛兰德都有优势，因为它自己生产的大量欧洲最优质的羊毛供应可以满足自己制造商的需求，而其支付的价格远低于外国人所支付的价格。据我们所知，外国购买价不仅要考虑航运费，而且在1275年以后还要考虑出口税。在14世纪30年代，这些税收增长了6【674】

倍多然后达到了一个新的持久性水平；从百年战争开始到中世纪末期，对英格兰的出口商而言，从没少于过 40～50 先令/袋，而外国出口者有时则超过 4 英镑/袋。更低的原材料价格降低了生产的相对成本，使英国制造商可将布以比外国人低的价格投放到国内外市场。因此，英国羊毛国内外价格的巨大差距为幼稚产业提供了有效的保护。毫无疑问，它比零星的出口禁令更能刺激它的增长，而且出口禁令常被特殊的许可证绕过。这一产业因为对布所征的出口税相对较轻而受益。13 世纪末期，与羊毛不同，布可以完全免税从英格兰运走。1303 年的第一次出口关税只对外国商人有效，直到 1347 年才对本地商人收税。即使在那时，所缴的布税不到 2%，而羊毛为 33% 左右。它的出口也没受到任何特产制度的限制。因此，各种刺激因素都有利于布而不是羊毛的出口。

上面所描述的由于技术和金融所带来的崭新的有利机会把资本和劳动力都吸引到英格兰的布业中来。在农村地区，人们越来越多地雇用兼职劳动力，因为许多佃农的时间并不都花在他们那块小保留地上，或者由于庄园义务相对较轻，他们可以将纺织当副业，就像妇女自古以来就从事刷毛、梳毛和纺纱劳动一样。毫无疑问，许多曾经耕作新开土地的年轻人如今可以工业为生。这样的乡村劳动力往往比城市劳动力便宜，不仅因为它完全不受保护与不受控制，没有集体讨价还价的机会，而且还因为乡下生活消费低，很容易获得食物、薪柴以及其他必需品。这是英国企业发展的又一有利因素。

新的推动力，也推动了外国工人的移人，特别是来自纺织中心佛兰德的【675】熟练手艺人。这种迁移并不是新鲜事。据吉拉尔杜斯·坎布伦西斯（Giraldus Cambrensis）的说法，12 世纪由亨利一世在彭布鲁克郡建立的佛兰德殖民地成员据说特别精通于纺织羊毛制品。但从 13 世纪晚期起，由于英格兰与法兰西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他们的鼓励就成了一种外交政策手段。当羊毛的出口和布的进口被禁止时，为了给佛兰德伯爵或他的领主法兰西国王施加压力，英格兰却总是利用这个机会以有利条件邀请佛兰德手艺人到英格兰，并且还命令英国公众只穿英格兰布。一般认为，这些手段也许为英国养羊者的羊毛提供了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销路，英国消费者消费自己国内的布而不是外国布。国内市场的兴盛还吸引佛兰德手艺人带着在佛兰德禁用的手艺来到了英格兰。例如，1271 年禁运期间，亨利三世规定“所有毛纺业工人，无论男女，凡是来自佛兰德或其他地方的，都可放心地来到我们国家，在这里生产布”，并且给他们提供 5 年免税的自由。尽管开始时禁止穿外国衣服这一命令不适用于上层阶级，但随着外交关系日趋紧张并几近破裂，这

一禁令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当1337年爱德华三世采取极端措施宣布自己是法国国王时，他的所有臣民"无论什么身份"都穿英格兰布，不允许进口外国布或出口英国羊毛，并且"所有的制造商无论是哪个国家的"都受国王的保护。据16世纪的历史学家富勒（Fuller）分析，爱德华的代理人毫不犹豫地向佛兰芒人指出了低地国家的悲惨生活与英格兰玫瑰色前景间的天壤之别。无论这是不是真的，许多人利用这种邀请，离开常导致失业、内乱和外国入侵的土地，来到这一片拥有充足的原材料、相对不受束缚的自由、也基本上没有冲突的土地，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事情。自愿移民再加上政治难民，导致移民的人数逐渐膨胀。如在卡塞尔战败后，伊普尔大约有500名织工和500名漂洗工被逐出佛兰德，1 344个波铂林赫织工明确地被放逐到英格兰。现在无法评估这些移民的规模和进程。其中有些人的确是为了个人安全而离开那些与英格兰至少在名义上进行战争的领土，更多的人到英格兰来仅仅是为了寻求这种保护措施，而这些在官方文献中没有留下【676】任何记录。大多数移居过来的人曾经是富裕的手艺人——主要是织工，也有漂洗工和染色工——他们带有自己的徒弟；但他们中也有企业家如"根特的市民约翰·布鲁因（John Bruyn），如今他在阿宾顿定居，在那里加工羊毛并在自己的领地内经营其他商品，他还有自己的随从和仆役"。还有一些人去了西部，比如有个织工到了伍尔德畔斯托；还有的到了约克郡的西赖丁（West Riding）。但大多数定居在英格兰东部和南部，所以他们也许对新工业区贡献很小。他们的到来是有意义的，与其说这种到来是英国企业发展的原因，还不如说是其发展的象征。

正是在英国工业史的这一时期，我们第一次获得了有关其发展的一些量化数据。由于1347年不仅对本国而且还对外国布船实施征税的规定，王室国库的海关账目就开始逐年记载全部出口的布和羊毛。巨大的转型由此而揭示出来了。14世纪中期，英格兰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原材料出口者，每年向国外输出30 000多袋羊毛，就像它在这个世纪初期一样。这些羊毛足以加工至少120 000多件宽幅绒面布。1347～1348年米迦勒节所记载的布出口仅为4 423件（是最大的宽幅绒面呢），尽管武断地把某年的数字作为黑死病之前的一般出口水平是很不可靠的。但在紧随黑死病到来的大萧条之后，它们发展得非常神速，在1366～1368年间，每年制造14 000匹布，加工这些布需用3 700袋羊毛。在该世纪最后20年的第二个重大发展时期，布的产量几乎是1347～1348年的10倍——在1392～1395年平均约为43 000件，相当于11 000袋羊毛。与此同时，羊毛出口降为平均19 000袋。毫不奇怪的

是，英格兰的乔叟（Chaucer）——他经历了英格兰经济的显著发展的这个时期，而且他自己就是一名征税人——在他的《坎特伯雷朝圣者》中提到了一个富有活力的西部呢商——巴斯（Bath）附近富有旅行经验的好妻子——他这样描述她：

像加工布一样，她穿梭往返，

她从伊普尔和根特的边缘穿过。

[677] 这种惊人的发展速度并没有维持下去，不过工业仍在继续发展，尽管慢了下来。到15世纪中期，布的出口增加到平均每年约54 000匹，相当于12 500袋羊毛，而此时羊毛出口减少到8 000袋，这样就达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英格兰此时主要是一个毛织品出口者而不是原材料出口者。到这个世纪末，由于约克和兰开斯特战争的结束，发展的动力再一次增加了；到爱德华四世末期，毛织品出口约为每年63 000匹。在头两个都铎国王的统治下，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尽管中间有暂时的倒退，到亨利八世（Henry VIII）早期更达到84 000匹，而到他统治的末期突破了120 000匹的记录。

海关税收账目不仅载明了英国羊毛制品出口的增长，实际上也载明了外国羊毛制品进口的实质性终结，除了某些特殊情况外，英格兰羊毛制品在整个14世纪占领了英格兰市场。但是除了进口下降外，无法估计国内需求的变化；因此，生产的趋势也无法进行令人满意的估量。从1353年起，对所有在英格兰销售的布都要征税。乍一看，我们似乎有了非常宝贵的生产数据，它就记载在王室顾问官的账目上，他负责收税，也负责测量布以保证它们符合《度量衡法令》所规定的长度与宽度标准。但报告是零碎的，其价值也令人怀疑。14世纪末期的数字提供给我们的也许只是总产量的大概数字，但用它们来估计各年的产量是不可靠的。15世纪的数据也不尽如人意；大多数顶多只是二手数据编汇，其准确性令人可疑，最糟的则是随意编造；它们也许大致上说明了在某一时间点上不同生产区的相对重要性，但提供的该世纪末时全国总产量的数字肯定是太低了，因为它们居然比出口量还少；生产者的姓名和产布的数量还有准确的相互对应，可以看出，其中有些完全是凭空杜撰。

到15世纪末期，产业革命使英国从原毛出口者变成了毛制品的主要出口者，与此同时，很大程度归功于由于漂洗机的发明和使用，英国同时也完成了产业布局的革命。现在有关林肯、罗斯、斯坦福德或兰切斯特的布我们[678] 所知不多；约克与贝弗利的工业正在慢慢地消失。英格兰最重要的生产区在西部。15世纪末期，它生产了整个国家近一半的布，并且生产了几乎所有的宽幅绒面呢，随后就是“斯特劳德流域、科茨沃尔德丘陵、卡斯蒂勒库

姆（Castiglione）和西部人的布"，它们在欧陆上的声誉就如林肯猩红布曾经享有的名声一样。优质宽幅绒面呢的制造、染色、磨光主要集中于南部的科茨沃尔德、斯特劳德流域以及埃文（Avon）河上的布拉德福（Bradford）特及其支流．那里盛产优质羊毛，水力和漂洗砂充足。几乎每个村庄都从事纺织；从河谷一直到山上满是漂洗场；以前那里荒无人烟，如今则沿溪流建起了新的居住点。例如斯特劳德和查尔福特（Chalford）从一无所有发展为兴旺的工业城市，尽管顺河而下做生意的富裕磨房主死后都埋葬在旧时高地上的教堂——明钦汉普顿、罗德波拉夫和比斯莱（Bisley），因为其下既无教堂也无独立教区。据说，沿河而建的卡斯蒂勒库姆居住着 70 个手工业者——织工、漂洗工和染色工——每个都有徒弟和帮工，庄园领主约翰·法斯托尔弗爵士（John，Fastolf Sir）每年从那里购买价值 100 英镑的红布和白布，为在百年战争服役的人做衣服。沿着科茨沃尔德丘陵南部边境也出现了其他一些繁忙的工业中心：维克沃、德斯利（Dursley）、埃奇下的沃顿、巴斯、特罗布里奇、埃文河上的布雷德福特（Bradford-on-Avon），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马尔姆斯伯里及其他地方。在阿冯河以南，萨默塞特以其"门蒂普斯（Mendips）"而闻名。再向西，通过布里奇沃特（Bridgwater）和汤顿，穿过德文（Devon）到巴恩斯特珀尔（Barnstple）、蒂弗顿、卡伦顿（Cullompton）、埃克塞特和托特尼斯，这里也发展成了一个工业区，不是生产严重依赖漂洗的绒面呢，而是生产粗绒布和其他一些便宜轻便的纺织品。同样有名的粗绒布地区在威尔德郡和伯克郡的南部，特别是沿着怀利流域到索尔兹伯里一带（一个主要中心之一）以及沿着肯尼特河谷穿过马尔博罗夫和纽伯里到雷丁的地区，而通过汗普郡到萨里和肯特的粗绒布带就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说英格兰西部作为宽幅绒面呢的生产者绝不输给任何地方的话，那么作为粗绒布和类似的产品的生产地，它在约克郡和英格兰的东部就有竞争对手了。艾塞克斯（Essex）和萨福克布业的历史很长。正如我们所知，科尔切斯特曾因生产便宜的黄褐色土布而著名。当 13 世纪末期伊普斯维奇（Ipswich）编写《末日书》（Domesday Book）时，莫尔登、科吉舍尔（Coggeshall）、萨德伯里和其他农村地区的布正被运销海外。到 15 世纪，工业沿着斯陶尔集中发展，那个加工区的产量可与科茨沃尔德丘陵相比，并且自收复以来就享有从未有过的繁荣。在斯陶尔的艾塞克斯和萨福克河岸几乎所有的村庄——从戴德姆汉和东贝格霍尔特（East Bergholt）经过斯特拉特福德和内兰到萨德伯里、朗梅尔福德、格勒姆福特（Glemsford）、卡文迪什 [679]

(Cavendish) 和克拉再到黑弗里尔 (Haverhill) ——此时都因布业而富裕起来，那里矗立的辉煌的教堂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斯陶尔支流上的服装中心如哈德利 (Hadleigh)、克赛、拉文纳姆、博克斯福特 (Boxford)，以及大小瓦尔德林菲尔德也毫不逊色。除了这些中心以外，还有远一些的中心如布里·圣·爱德芒兹 (Bury St Edmunds)、霍尔斯特德 (Halstead)、布伦特里 (Braintree) 和科吉舍尔。

在诺福克，至少从13世纪后期就开始确立其高质量轻布制造中心的地位，它用长毛加工而成，用梳子而非用刷子硬刷，并且几乎不需要漂洗。在英格兰和国外，这种布被大量用来做宗教仪式所需的夏装——许多经海路送到圣约翰骑士团和圣殿 (Templar) 骑士团那里——用来装饰教堂和住房，特别是用作床单与华盖，而这是中世纪床上的两样必需品。它先是被称作哔叽，后来逐渐被人们称作“精布 (worsted)”——获得这个名称最可能是因为它主要产于沃斯特德 (Worstead) 和周边紧邻的一些非常不显眼的村庄，像霍宁 (Honing)、滕斯蒂德、斯科汤等而得名；诺里奇既是生产中心又是销售中心。15世纪，这个产业似乎处于衰退状态，精纺毛纱仅占英格兰出口的一小部分；尽管出于真实的地方情感主义，约翰·帕斯通在做他的紧身上衣时“为了表示对诺福克的敬意全用那里产的精纺毛纱”，并且从伦敦写信给离沃斯特德不到5英里的诺福克老家，要求他的妻子询问“威廉·帕斯通是在哪里买到像丝绸一样的优质精纺毛纱披肩的”。

居于第三位的是约克郡的西里丁，那里主要生产粗绒布。这里的山涧从奔宁山脉的沼泽地淙淙而下，滋养着大群健壮的羊群。13世纪这里到处都建立了漂洗工场（或者就如北方所称的水磨）。在随后的世纪里，由于苏格兰人和瘟疫的破坏，发展受阻。但是到了15世纪后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繁荣的工业正在集中于亚耳 (Aire) 河的上游和如今是英格兰毛织品主要基地的科尔德。利兹、布雷德福特、韦克菲尔德和哈里法克斯 (Halifax) 就像现在一样是头等重要的中心。阿尔蒙伯里 (Almondbury) 也很重要，几乎每个村庄和住宅中的人们都利用工业利润来贴补以农业为主的贫穷生计。约克城本身已被西里丁远远超过，它的工业与整个英格兰的工业一起，在14世纪后期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和扩张，增长非常迅速，但从15世纪中期开始出现持续并且逐渐明显的衰落。在约克郡的其他地方，在里彭和巴恩斯利 (Barnsley) 及其周围的地区也生产相当数量的布。

【680】

除了这三个主要中心之外，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也生产出口布。有一两个中心这里要特别提到。威斯特莫兰德以生产便宜而耐用的“肯德尔斯

(Kendals)”而闻名，它使用游牧于莱克兰荒野的强壮绵羊的羊毛制成。在这里，它一直快速发展到中世纪结束。毛纺业的发展至肯德尔和肯特流域以远地区，渗透到罗塞和布拉塞（Brathay)，那里有充分的水力和便宜的土地，贫瘠而满是岩石，不适合耕种，但适合建造拉抻与晾晒的张布架。单是在格拉斯米尔（Grasmere）教区，代替14世纪早期庄园手工漂洗作坊的是至少20个这样的漂洗场，其中有些远在斯蒂克尔塔恩和伊斯达尔·塔恩(Easedale Tarn）奔流而下的小溪边。再往南，拉纳克郡生产特别便宜而又粗糙的布。威尔士生产大量的起绒粗呢，但它的马奇兹南部羊毛甚至比科茨沃尔德丘陵的还要好，而价格为约克郡的两倍。拉德洛也生产一些更好的布。在沃里克郡，有一个重要的生产中心因其蓝色而著名，这就是考文垂(Coventry)，而北安普顿还没有完全丧失它悠久的名声。

尽管许多布在当地集市上销售以供家庭消费，但越来越多的布都用二轮马车、驮马、驳船或沿河滑行的船只运往港口。布里斯托尔——边省港口中最大的一个——如果将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腹地工业活动的话，那反过来它也一定刺激了工业的发展。凭着它良好的内陆交通和沿大西洋海岸历史悠久的联系——从爱尔兰到布列塔尼、加斯科涅、西班牙、葡萄牙和地中海——它适合作为整个英格兰西部和考文垂以及威尔士马奇兹的主要商品集散中心。埃克塞特也在西部积极从事着商贸活动，主要是对法兰西、西班牙和葡萄牙。南安普顿的商业很繁荣——集中了许多威尔德郡的商业——主 [681] 要是意大利帆船和平底大船的集散中心，每年冬天这些船从那里装载大量来自英格兰各地的毛织品启程向南抵达意大利、非洲和黎凡特。赫尔这个“北方的咽喉”是约克郡各山谷的天然出口，它的布不仅向东运至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还由船队向西运到加斯科涅以换取它的葡萄酒。但是到15世纪后期，它已经衰落了。越来越多的商业就像英吉利东岸港口那样被吸引到了伦敦，伦敦如今成了整个英格兰最重要的布业中心。庄严肃穆的史密斯菲尔德教堂的庭院集市如今是英格兰有名的布市，每年在圣巴托罗美节前夕开市。每年都有来自各地的制造商，在那里将商品摆在租赁或自己购买的货厅里展示。另外，在布莱克韦尔（Blackwell）大厅每周还有布市，这是由市长和大众在1396年买下的；在这里，也仅仅是在这里，乡下人从星期二到星期六中午，都可以展示并出售自己生产的布。

布业中心从港口运回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佛兰德的茜草和起绒草；波罗的海草木灰；加斯科涅、皮卡第、布拉班特、德意志和意大利的靛蓝；小亚细亚以及从教皇在托尔法新开发的矿藏来的明矾；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来

的粮食。它们从布里斯托尔被分销到整个英格兰西部及其以远的地区——从塞文然后到拉德洛或考文垂，再经海用小船运到威尔士和德文，从那里运回黑色起绒粗呢和粗绒布。在南安普顿，热那亚帆船运来一桶一桶的靛蓝和明矾，这些船只经过英格兰南部和西部甚至行进到更远的地方；有些甚至在强壮的勒克兰搬运工的带领下远至肯德尔。他们每年冬天都要为了意大利平底船的到来而带着布向南冒险，带回来维斯特摩兰家庭主妇冬天用的奢侈品——橘、坚果、葡萄酒和干果——还有工业原料。

英格兰的这个“大工业”的结构在中世纪末期不可避免地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正如13世纪一样。在这个产业的每个阶段，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特征都是很明显的——提供原材料，综合不同的加工过程，成品销售。有时单个企业家集这三个功能于一身，如博伊纳·布洛克在多埃所做的那样。更经常的情况是，生产与销售这两个环节是分开的，就像在意大利那样。[682]

尽管在英格兰，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分包制度都不是什么新现象，但是，15世纪的“呢绒商”（就像英国的造布商现在被称作的一样）与他的前辈——佛兰德的布业加工者（drapier），英格兰的布商（draper）和意大利的羊毛商（lanaiuolo）——还是有着根本的不同。这并不仅仅体现在名子上，他们完全是一个新的并且是英格兰特有的产物。与过去英格兰严格控制和当时仍在其他地区通行的严格控制相比，对这里的经营条件最恰当的称谓就是自由企业式的。

此后，英格兰的毛纺业超过了它的对手，在欧洲集市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像佛兰德和意大利在它们的黄金时代那样高度集中于城市。尽管一度在许多的古老自治市也繁荣过——织工、漂洗工、染色工和布商都集中在城墙内，自由而又安全地从事着他们的商业活动，免受城市之外封建成员所承受的限制与义务——城市从未赢得对自己的控制地位。因为英格兰的城市，从未像佛兰德和意大利的城市那样，占有如此大的比例或赢得那样大的自治程度；如果不是因为英格兰在发展先进工业和商业经济时较慢而在发展有效的中央君主集权制时较快的话，情况可能就会完全不同。当英格兰工业达到它的成熟期时，城市或乡下发展的相对有利与不利条件就与从前完全不同了。封建社会解体了；农奴制消失了；有城堡的城市就像庄园宏大的城堡一样都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它的自由曾是少数人的特权，它的经济比起领地经济来越来越受到僵化的控制，税收也越来越苛重。尽管控制稍微放松了些——如织工不再被排除在商人行会之外，古代谚语“城市空气自由”对于15世纪后期的英国人已经没有意义，至少对那些急于进入工业界的先

锋人物来说确是如此。

进步的制造商经常——尽管并不总是——远离城市，在农村无限制地发展他们的产业，同时将总部设在一些小集镇或村庄。那些地方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经常是以一种偶然的形式，不受管束地在庄园领主而不是在自治市的庇护下发展。新工业中心的模式显然不同于旧时。没有城墙来限制它，是一种分散的发展，仅在中心集市和统治它的华丽教堂集中——教堂起初是为较小乡村教区而建立的，如今需要经常重建以满足工业社会的需要，同时也为了显示它的财富。宽阔的街道和两层低楼代替了狭窄的小巷和高耸拥挤的楼房，许多市议员都喜欢住在这种楼房里，房子的三楼和四楼凸出在空中，几乎能相互碰到。庄园的房子考虑的是舒服而不是显赫。当然，呢商房客的家有点简陋，就像科吉舍尔的佩科克一家所住的那样；实际上，庄园的房屋经常被划开，一部分给布商，一部分给手工业者及其成员住。新的工业城镇很少是孤立分开的，而是几乎不知不觉地合并成一些相邻的城镇；西里丁这个加工布的地区就由半径为 7 英里的许多城镇组成，包括利兹、布拉德福特、哈里法克斯和韦克菲尔德；萨福克、卡文迪什、朗梅尔福德、哈里法克斯分布在沿斯陶尔河的一段 6 英里河岸上，戴德姆（Dedham）、斯坦福德和卑格尔德（Bergholt）相互间隔不到 1 英里。 [683]

庄园的少量存留对工业发展并无大碍。无论什么地方，特别是在教会地产上，仍保留了垄断性的漂洗磨房，但绝大多数领主不仅愿意既出租庄园的漂洗机又出租其他可用于另建漂洗磨房的水段。因此，那些仍然是农奴的佃户并没有被剥夺从事某一职业或致富的权利。威廉·海恩斯（Haynes, William）——卡斯蒂勒库姆的一个佃农布商——为了把女儿嫁到庄园外而需要申请许可，但到他死时，他控制着三处漂洗房和许多房屋，并且拥有羊毛、染料、布、黄金、白银、家具、债权和各种各样的流动资产，有个本地法官估计其价值 300 马克，而最初领主官员估计为 3 000 马克。他的财富如此之多，以至于他的遗孀因拥有他的流动资产并得到许可可以享有他的不动产并再嫁的条件是要缴纳总共 140 英镑的罚金。遗产税也很高，但乡村布商不同于城市布商，无须不断地消耗自己的资金以支付地方税、庆典、制备服装和其他公共负担的花销。他也不会受到城市制造商所受到的工业限制。他可自由雇用他想要的工人，无论是城内的还是区外的；支付什么样的工资都可以，只要他能雇用得到；如果自己愿意的话还可从事劳动，也可以随心所欲地用任何方法。他的确必须遵守到集市上销售的布必须符合长度与宽度标准的法令，尽管有许多例外，并且许多地方还可以保留自己的特色。但是他的 [684]

布的质量是不受管制的，除了政府偶尔努力保证某种基本标准以外，比如禁止过分加大布的长度，禁止使用废弃的和劣质的羊毛——这些法律都反映了市民约定俗成的一些规则，而且从未完全生效过，因为它们只是由临时委员会负责实施，并无任何规范的国家监督制度。

实验探索的自由一直是乡村工业的特征。在商业扩张时期，进步的制造商青睐新的机械化方法，因为投放一次资本可使他减少成本开支并且不用增加劳动力就可提高产量。15世纪早期——如果不是之前的话——人们发明了第一套磨光、起绒的机械化方法，这时英格兰西部的呢商正把“起绒机”用于生产宽幅绒面呢。取代单调地把布面不断往前送的起绒过程的是，现在布匹经过一个装有起绒草的滚轮，而它由于与旋转水轮的轴连接在一起而不断旋转——这个装置本质上与今天所用的非常相似。1435年，卡斯蒂勒库姆的威廉·海恩斯死后留下遗产中就有这样的一台起绒机。由于它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它也招来了像对漂洗机一样多的反对，这可由向议会（爱德华四世）提交的一份要求禁用起绒机的请愿书中看出——这种抗议就像反对漂洗机一样是没有用的，因为16世纪人们仍在用起绒机。15世纪人们也进行了剪毛机械化的试验——这也是让莱昂纳多·达·芬奇着迷的许多问题之一——但人们普遍使用的仍然是长而重的剪毛刀。

这样一个经济个人主义时代有利于组织和技术的多样化。实际上，工业结构差异如此之大几乎无法进行分析。布商中什么人都有——一些来自该产业内，他们开始是织工、漂洗工、印染工或剪毛工；有些来自产业外，来自养羊人、客栈老板、屠夫、乡绅或其他人。在呢商与手工业者之间并无决然分开的界限，就像这个“大工业”曾在城市发展时一样，如果某人想要“加工呢绒”卖布的话，没有任何法律强迫他放弃他的行业。如约克郡有个小布商，他本身就是一个织工，在他的小屋里拥有一两台织布机，并雇了他的家族成员也许还有一两个其他的人来承担梳理、刷净、纺纱、织布；他自己也漂洗织物或送到漂洗房让别人漂洗，特别是它们很重时尤其如此；他时不时地在本地集市上销售自己的产品。由于他支配的资本很少，生产很不稳定，但比在城市还是要好些，因为他还部分依赖自己的小小保有地上的产品为生。往往他不仅织布，还从事耕作以及其他一些的行业，比如开磨房或屠宰。这样的一种混合经济——非常像近代斯凯岛上的小佃户——是中世纪晚期大大小小英格兰布商的共同特征。大规模制造商往往是大地主，拥有大量的地产并且从事畜牧业与农耕。就像法国人在《先驱论坛》中所指出的：“英格兰布商居住在农村的大农场上，他们在家里既织布又耕种，还放牧饲

[685]

养绵羊和牛。”在他们的地产上生产一些他们所需的羊毛，尽管他们主要从饲养者和羊毛中间人那里直接购买。

大的布业企业主与小布商手工业者正好相反，他们只从事管理。这类企业主通常拥有大量的设备，就像13世纪的布镇先辈一样，他既赞同发包制也赞同工场制度。他的“总部”既有住家也有办公室，那里储藏着他的羊毛、染料和成品布。分类和拍打这些预备工作通常在他的庄园上做。与总部相邻的通常是染房，它也是布商的财产并在他的监督下用自己仔细制备的材料，由他的雇员来从事这项复杂的染毛工作。他经常拥有一座漂洗房，还有拉抻布和晒布用的张布架：拉文纳姆有名的布商托马斯·斯普林——死于1486年，他拥有许多农场和庄园——在遗嘱中，就像拉文纳姆的约翰·亨特一样，不仅把他的张布架作为遗产，而且还遗赠给他的张布工人。但有时优质宽幅绒面呢的染色和磨光以及其他像起绒、剪毛等工序都托付给专业的独立企业承担。如斯特劳德河谷和卡斯蒂勒库姆的染坊、漂洗坊和磨光坊因它们的“布里斯托尔红”而闻名，经常为西部的布商加工布。在最后出口前布被送到港口及其附近的专业作坊染色和修剪是常事；这种加工业在几个集散中心，如布里斯托尔、埃克塞特、伊普斯维奇，尤其是伦敦，非常繁荣。在南安普顿，人们经常把布送到拉姆西或温彻斯特去染色和加工，有的甚至送到伦敦。

剩下的工序包括刷毛、梳理、纺纱和织布，这些有时是在布商自己的庄园上完成的，但更多的是分发出去，分给许多地方上的手艺人由他们在自家去做，这些手艺人都靠布商来提供就业机会。雇主与被雇用人之间的关系经常是亲密友好的，这从许多布商的遗嘱中可以看出。托马斯·斯普林特别给他的织工、染色工和张布工遗留了礼物；科吉舍尔的托马斯·佩科克（死于1518年）除了将自己的私人遗产留给指定的织工和漂洗工，并给“我所有的织工、漂洗工、修剪工每人12便士”外，而且还给“那些给我干了很多活的人每人3先令4便士”；并留下4英镑分给梳理工、刷毛工和织工。织布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城镇，而纺纱则散布于农村各地——就如在托斯卡纳一样。格勒姆福特的约翰·戈尔丁（John Golding）给他的纺纱工每人留下了12便士，“城外与城内都一样”。由于这个原因，无论在英格兰还是在意大利，监督工作都是一个困难的问题。黑心的布商发包时给出的份量不足，黑心的纺工则有时扣留一部分羊毛做非法交易，用油和水加到剩下的布中以补足重量。 [686]

这些欺骗行为在织工与纺工中都有，这就促使一些富有的布商把大多数

的工作放在最容易监督的地方来做。在布商地产上集中织布要比集中纺纱更容易组织，因为纺纱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兼职，是许多家庭妇女从事的一种副业。而织布需要一定的资本开支来购买织布机，甚至那些曾经拥有织布机的手工业者有时也会因为生活困难的需要而被迫将织机转手；出租织布机在英格兰和国外一样是很常见的。对于一个15世纪的布商来说，在自己的店里拥有多台织布机并不是很稀奇的事，布里斯托尔的托马斯·布兰克特（Thomas · Blanket）早在此前1个世纪就这样做了，这种做法在16世纪初变得越来越普遍，但遭到了织工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相对独立性的一个威胁。有关纽布里的富有布商杰克·温奇库姆的传奇说——他死于1519年（但这真假难辨）——有1 040个人在他的地产上、染坊里、漂洗房从事着分类、刷毛、纺纱、织布和修剪工作。没有理由不相信目击者莱兰德的叙述，他在修道院解散后不久旅行到马尔姆斯伯里时，发现那里修道院的住房被"一个极富的呢绒商斯图姆普"变成了一家工厂。"现在"，他写[687]道，"这个属于斯图姆普的巨大办公房的每一个角落都塞满了织布的人"。我们也知道斯图姆普计划接管奥思莱修道院的空建筑并雇用2 000个熟练工人，尽管这个计划从未实现过。但是一般来说，织布工和纺纱工一样是在自己家里工作，尽管织布机是从呢绒商那里租借来的，并且房子也是由雇主建造并租给他们的。

在这些年轻的工业城镇——它们大多数在庄园或小集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手艺人与他们的帮手和徒弟群体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我们常可在庄园的卷帧中注意到对不守规矩和骚乱滋事的因素采取的控制措施。如在卡斯蒂勒库姆通过法令禁止赌博；禁止在商店呆得很晚；命令房客禁止他们的仆役和徒弟偷窃庄园的鱼塘。在卡斯蒂勒库姆派了两个看守人监管染工和漂洗工，两个或更多的监管织工，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看守人的作用有多大。庄园法庭处理债务案例、合同、不正当扣留货物、怂恿徒弟、不诚实工作等问题。在周日，任何地方都不允许运转漂洗机，但除此之外，似乎没有任何控制时间的努力，更不用说工资或工序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之风至高无上。

如果说市场繁荣物价上升时，工人就富裕，那么在经济萧条时期，他们的命运就不是那么令人羡慕了。工资下降，工人失业，像佛兰德这个新的工业社会就经历了大规模的失业与贫困。许多手工业者都加入社会宗教兄弟会，但面对这样一个整体灾难兄弟会也无能为力。16世纪初，时常阻塞贸易主动脉的外交危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繁苛的战争税，像1525年那样，

势必削弱毛织品产业。当问及谁是4 000个武装起义的头目时，萨福克叛乱的发言人说道“他的名字是贫困，因为他和他的舒适的必需品使我们今天沦落到这样的地步”。“制布商们”，他继续说道：“使得所有这些人以及其他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

就如无助的劳动者自己所说，“我们活着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这个国家的有钱人，”呢绒加工者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要靠商人来生存。很少呢绒加工者自己出口商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把产品卖给布料商人——他的代理人在这个国家到处收购布——或直接卖给在港口的商人——给汉萨同盟的人，给意大利人，但更多的是给商人股份公司。因为当布业贸易扩张时，在它的各个主要港口从事布匹贸易的英格兰商人组织了一个商人股份公司——称为“股份公司”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不是以前来往于加来（Calais）[1] 路线上的那种羊毛生意，而是在为英国制造商寻求新的销路。他们在中世纪末所拥有的财富与强大影响本身就是英国工业发展的有力证据。在他们集中的低地国家的大国际性商业中心，这些英格兰商人冒险家在每个中心开业时都走在威风的行列中，来到他们自己富丽的小礼拜堂，这时他们就像佛兰德商人曾在伦敦占据重要地位时一样，因为英格兰的布和它的出口企业都是独一无二的。【688】

英国货在欧洲集市上带来的竞争压力不断增长，与此同时，意大利与贝尔吉卡内部的动乱却是异常的严重，这导致了它们经济的逐步转型。在人口密集的布业城镇，劳工骚乱不断增加，在14世纪的意大利达到了高峰。1378年，佛罗伦萨刷毛工的大起义被无情地镇压，而在第二年，伊普尔、根特和布鲁日的织工再次暴乱，夺取了政权，并将佛兰德拖入血腥的内战，成千上万的工人被屠杀。布拉班特城市也未能幸免。1360年，布鲁塞尔的起义使100个织工与漂洗工被流放，而在这个世纪的最后25年，马里尼斯和勒芬也有动乱，并有大量的织工被流放。雇主与雇工的分歧与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行业与行业的纷争交织在一起。这些纷争是曾经强大的贝尔吉卡和托斯卡纳工业衰落的征兆与原因，而这种衰退可以从当时保存下来的工业生产数字得到充分的证明。英格兰并没有从他们的灾难中获利并加重他们的灾难。在中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德意志，更多的是荷兰的毛纺业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意大利、贝尔吉卡和英格兰一样，税负较轻的小中心——即这些既得利益者和保守势力不那么强大的地方——正在通过试验新方法和

---

① 法国北部海港城市。——译者注

使用新材料满足顾客需要来调整自己，进而成功地向老中心的垄断地位发起【689】挑战。托斯卡纳的小城镇——如今记载较少——以自己的毛织品而致富，而伦巴第和威尼斯等下一级的城镇则一下就跃居前列，生产佛罗伦萨人不喜欢的便宜布。因此，许多小的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城镇甚至村庄都用来自西班牙的羊毛生产一种较轻的布，生意做得蒸蒸日上。生产从大中心向小中心转移，从英国羊毛向西班牙羊毛转变，这是15世纪的突出特征，尽管无法用数据衡量。我们也无法估计整个意大利或贝尔吉卡的生产趋势，甚至英格兰的出口贸易趋势。然而，尽管有短暂的恢复——特别是15世纪——尽管仍有一些大的生产中心幸存，尤其是像佛罗伦萨这样的中心，还有许多更小的城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但给人的印象仍然是，这两个地区商业在缓慢收缩。英国的工业，尽管发展时有中止，然而直到中世纪末却肯定是一直向前的，它遥遥领先，处于不可动摇的突出地位。如果伊拉斯谟（Erasmus）的话可信，英格兰生产的毛织品与欧洲任何其他地区相比，不仅数量更多，【690】而且质量更好。

第十章

中世纪文明中的采矿和冶金

大自然赋予欧洲异常丰富多样的矿产资源。西方人对地下财富的征服与近几个世纪人们对物质世界获得的史无前例的力量密不可分。①

这种力量源于早期文明从未遇到的严重技术问题的解决，人们在早期文明中从来没有那么严肃地面对过这些问题。许多最早变得尖锐的问题都是与采矿和冶金有关。举三个例子就足够了。正是由于要寻找排干煤坑的适当方法，才导致了对蒸汽动力的实际使用，才导致了蒸汽机的发明。随着从地下挖出的矿物日益增多，人们的智慧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要努力去发现廉价的水陆航运方法。所以，正是用四轮马车沿着粗糙潮湿的地面拖拉矿物和煤的艰难，才导致了铁路的发明和发展。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对金属的大量需求都迫使人们发现新的方法去减少分离与提炼金属时的劳动和浪费。也正是西欧人一直坚持利用早期人的发现②——当火足够热的时候，铁矿就能够熔化——人们才能够从铁花的飞流中生产大量的金属。

---

① 有关地理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关系，参见J. U. 内夫（Nef）：《工业文明的兴起和现代世界》（巴黎，1954年），第83~104页。【1】

② 参见J. 卡顿·弗兰特（Friend）：《铁和古代社会》（伦敦，1926年），第92~93页；对普利尼的解释见《自然史》，第34卷，第41章。【2】

现代工业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丰富的金属资源。如果没有鼓风炉，20世纪的欧洲人也许仍然会用铁环作为订婚标志，就像普利尼所说的，这是1世纪富裕的罗马世界沿用的风俗。[1] 使用煤的创新性不亚于铁的大量生【691】产。要不是煤燃料的广泛应用，重工业的扩展或许根本无从谈起。

工业的发展对矿产需求所产生的新技术问题激起了自然科学家的兴趣。现代采矿与冶金给他们提供了思考和实验的新材料。现代的采矿和冶金也是使他们的思想转向至今还未开展的新研究方向的缘起。现代社会的工业技术让人们痴迷和癫狂，如果不是一次次的科学发现提供理论基础，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不可能的。[2] 因此，采矿与冶金工业的发展间接或直接促进了工业文明的胜利。

17世纪早期培根和笛卡儿曾梦想有一个物质丰富的人间天堂。没有天然的地下宝藏和它们对人类的吸引力，这些梦想到20世纪早期都无法实现。

亚洲和北美洲及西欧丰富的矿产资源对人类的智慧提出了挑战。除非有人接受挑战，否则这些挑战毫无用处。地球上的大量矿物已存在几千年了。如本卷第一章所说，基督教时代以前世界上有些地方就已经沿用它们几千年了。但对极其丰富的铁矿与煤的需求甚少，这在罗马征服后都没改变。

对铁矿和煤矿供应产生更深刻冲击的是在亚洲。宋朝（960~1127年）时中国人在采煤过程中首先发明了新的技术。他们发明并广泛使用鼓风炉，将煤炼成焦炭。许多产品的生产都使用矿物燃料，如明矾和盐的生产。[3]

欧洲煤炭和铁冶炼技术的大步前进比中国约晚了500年。但与16、17世纪大不列颠的领先发展不同，[4] 中国的发明没有任何直接后果。没有证据【692】表明西方相应的技术创新是以亚洲经验为基础的，这些技术出现非常之晚，并且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对现代欧洲的影响更主要是在对巴洛克式商品经济和精神的演进[5]上，它的起源首先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在与

---

① 《自然史》，第33卷，第1章。【3】

② 参考J. U. 内夫：《物质世界的征服》（芝加哥，1964年），第7章。【4】

③ 罗伯特·哈特维尔（Robert Hartwell）：《经济史杂志》，第26卷，1966年，第29~58页。【5】

④ J. U. 内夫：《英国煤炭工业的崛起》（伦敦，1932年），第1、2部分；内夫：《物质世界的征服》，第3、4章，参见本书第704页。【6】

⑤ 参见欧尼斯特·伦南（Ernest Renan）：《全面的工作》，亨利里特·西加利（Henriette Psichari）主编（巴黎，卡曼—列维，无日期），第2章、第244~245页。【7】

亚洲频繁的交往时引入的多种多样的印刷和雕刻品。到这个时期，宋朝时期史无前例地使用铁和煤的热潮已经渐渐平息。13 世纪马可·波罗旅行到亚洲，提到燃烧的黑石头是一种奇迹，值得报告给意大利，实际上意大利没有煤矿，但到此时为止，中国煤的生产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与西方相比，在那些纯粹的技术领域里，虽然中国在 11 世纪时曾一时领先，但至少一直到近代，中国还是很落后的。

早期的欧洲居民和北美洲人，就像古代世界高度文明的人一样，很少有人愿意挖掘地下财富。它们的存在是工业化主义成功的条件而不是原因。为什么最先是西欧人欣然接受这个大自然的挑战呢？为什么他们比早期人们更想探寻地下财富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首先研究几千年来欧洲尽力开发矿物资源并最终以变革结束的历史。中世纪欧洲工艺技能与经济企业发展的程度使现代采矿业和冶金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了，但这两个因素中哪个是工业文明崛起的基本要素呢？

10.1　古典时期的工业

欧洲成千上万的地方都含金、银、铜、锌、锡、铁以及煤，这些物质露出地面或隐藏在地下浅层，以至于建筑者挖地基时就能发现它们，除非已经被耕作的人翻掉。

在罗马征服以前就有人开始开发这些矿物了。随着人们对矿层价值以及地表下层认识的深化，矿工挖井挖得更深以发现这些地下财富。公元前 4、5 世纪，成千上万的工人——大部分是奴隶——受雇在雅典附近洛里昂山著名的含银铅矿中进行开采。有些矿井深达 300 英尺。邻近的山坡和山谷处都有人冲洗敲打和制备矿物或将银从铅矿中分离出来。2、3 世纪希腊时期，人们竞相在地中海周围陆地开采。因此，罗马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地方都建立了冶金企业。【693】

无法断定罗马征服和罗马帝国的建立是否减缓了开采过程。不管怎样，从金属产量几乎连续几代以来都在增长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过程一直在延续。在西班牙、不列颠、高卢和多瑙河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建立了许多矿井。所缺乏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挖矿井的热情，而这种热情最终占据了西方人的心。和希腊人一样，罗马人也没有采矿的基本知识。许多受过教育的人认

为它们像植物一样生长,[①] 甚至18世纪欧洲的知识界都一直持这种观点。1709年法国里昂的监督官安慰执行长官说，圣埃廷内（St Etienne）表层煤炭的枯竭“可以再生”。[②]

古典时期人们认为采矿业是一种比农业差得多的职业。公元前2世纪后，罗马帝国通过了一条法令，禁止在意大利开采矿物。现代权威人士并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条特别法令的颁布另有其因。但它确实反映了古典时期的人们不喜欢地下劳动而更偏向于农业。

年复一年，地中海炎热漫长的夏日生活着百万种迥异的生物，而矿物又极易暴露在表面，这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大部分地区矿物的枯竭。这就使得【694】人们更不喜欢这项又累又枯燥的工作。挖井、抽水、拖拉矿物到地层表面，所有这些困难交织到一起。古典时期的人们虽然在设计机器方面往往很有天分，但他们在利用畜力和流动的溪流方面很落后（受干旱气候的影响，这些很稀少），他们甚至不知道利用风来运转机器。毫无疑问，矿上的劳动让人越来越难以忍受。囚犯与基督教徒被驱逐去操作这些机器。[③] 结果，由于获取矿产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人工采矿的成本——即使是使用奴隶劳动——抬高了矿产和加工成的金属的价格，限制了它们的广泛运用。

对那些见过一堆堆黑土的比利时、南威尔士或宾西法尼亚煤矿，或见过英格兰中部地区的鲁尔，或印度西北部鼓风炉冒出的几英里长的滚滚烽烟的现代欧洲人与美洲人来说，罗马帝国的矿井和铸炉没什么奇怪的，它们与采石场一起“构成了田野和牧场海洋中的一个个小岛”。[④]

按照现代欧洲人的标准，所有金属都缺乏。金属是许多雕塑的材料，但从不用它来造船、建水管、公共剧院或体育馆。在用于制造工具和机器时也尽可能地节省。通常需要长而耐心的加热并多次反复在砧上敲打才能得到铁。小规模的经营是可能的，矿物中蕴藏的许多铁损失在炉渣和铁屑中。这个过程要花费大量的资金，主要是木材、炭和劳动力的开支。当铅可代替铁时，人们更喜欢铅，因为铅的生产不需要太多燃料。青铜和黄铜是从铜、

---

① 莫里斯·贝斯尼尔（Maurice Besnier）：《意大利的采矿禁令》，载《考古学评论》，第5辑，1919年，第37~38页。【8】

② A.M.德·博伊斯里森（de Boisisle）：《总监督官与州长的往来书信》（巴黎，1897年），第3卷，第496页。【9】

③ 这一证据可以从早期的故事中得到印证，就好像已故的厄恩斯特·坎特诺维茨（Ernst Kantorowicz）教授所给我们讲述的一样。【10】

④ M.罗斯托维泽夫（Rostovtzeff）：《罗马帝国的社会经济史》（牛津，1926年），第296页。【11】

锡、锌及其矿物中获得的，所有这些物质所需要的熔化热量都低于铁矿物。古典时期工业最大的发展是在地中海边界地区，这个地方的煤炭资源远不如北欧和北美洲，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除了在罗马和不列颠外，[1] 没人试图用煤代替木炭做家用燃料或工业燃料。由于人口不断增长和工业的扩张引起木材价格上涨，那些需要用煤的冶金业与其他工业的发展都减缓下来。如果没有煤、油和水力发电，也不从北欧和美洲茂密的森林中大规模地开采木材，类似12世纪中期之前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那种工业变革就不可能发生。【695】

10.2　生产进程：公元300～1300年

3世纪欧洲的金属产量开始下降。一开始也许稍微下降，但这持续了几百年。6世纪末期直到10世纪末期的矿井远不如古代那样深。用的方法更加原始。人们使用长竖井，如西班牙卡塔赫纳（Cartagena）邻近的矿井深度达五六百英尺。人们也打一些40英尺或更深的矿坑，这在2世纪非常普遍。罗马帝国西部有潜力的矿井最终被全部放弃了。它们从本地村民的眼中消失了，只在最近上百年才被现代考古学家的发掘重新发现。由于3世纪开始欧洲人口的下降、城镇的衰落、商业的衰竭和耕地面积的减少，当地原住居民的后代及定居在那里的日耳曼人侵者对这些矿井很为满足，因为村庄附近以前留下来的剩余物，不用打井就能得到。至少有一段时间没人愿意去挖掘深矿井，罗马时期被砍伐的森林在许多地方又重新长了出来。

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铁矿非常丰富且易于开采。它在西方历史初期起的作用似乎比在古代时期更大一点。从3～8世纪，即使在欧洲南部，铁矿产量的减少都比其他金属慢。木工和农民仍需用铁来制斧头、刀和铲，甚至在一些仍沿用罗马耕种方法的地方还用铁来做犁头。最重要的是，需要用铁来做武器，因为铁是中世纪矿物中矿藏最丰富的物质，比起开采含银、铅、铜、锡的矿物来更为容易。在高卢的许多地方，莱茵河沿岸，萨克森，波希米

① R. G. 科林伍德（Collingwood）和 J. N. L. 迈尔斯（Myers）：《罗马时代的不列颠和英国定居点》（牛津，1937年），第231～232页。【12】

亚，托斯卡纳，特别是在西班牙，也许还有东阿尔卑斯山的山坡和峡谷，[1]【696】整个梅罗文加时期（公元500～800年）[2] 都出产少量的铁。在洛林，那时铁的冶炼似乎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8世纪后，随着马、骑兵的发展和马镫的发明，铁的需求量几乎在欧洲的每个地方都增加了。[3] 欧洲也成为远东的铁供应基地。9世纪末期，东阿尔卑斯山的铁矿已经成了欧洲与近东主要交易港口威尼斯的几种主要出口品之一，[4] 在阿尔卑斯山及其以远地区铸铁所需的木材储量非常丰富。很久以前就有剩余松树运到埃及，那里主要依靠海运而来的木材。

因此，有证据表明，到10世纪时铁的产量大大增加。

相比之下，6世纪初到10世纪末期，有关铜矿开采的历史记录很少。黄铜是铜和菱锌矿的合金，似乎直到15世纪，阿尔卑斯山和欧洲北部菱锌矿发现之后才开始被利用。青铜是一种以铜为主要成分的合金，是历史上被广泛运用的最古老金属。它与铁在同时代用于同一目的。中世纪的资料表明，铜的缺乏使铁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铜。但如果就此假设人们很长一段时间不需要青铜或黄铜，或假定中世纪欧洲不再开采供应两种金属的铜矿物，也是没理由的。

按照塔西伦的观点，1世纪中期克劳狄族人（Claudian）入侵英格兰的动机之一就是因为它的矿物资源。也许帝国没有任何地方的采矿像罗马时代的不列颠那样在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他的行省也有大量的矿藏。但在不【697】列颠这个工业化程度不是很高的行省，采矿的相对重要性与帝国整体水平比较起来是非常之高。在不列颠，对含银铅矿的开采似乎比其他任何矿产都多。古代康沃尔的锡矿到3世纪才被罗马人恢复起来。在什罗普郡和威尔士

---

① 对铁矿是否在阿尔卑斯山的东部连续开采有一些争论。对施蒂里亚的铁矿开采的权威学者认为，当6、7世纪斯拉夫人在这一地区定居后，开采铁矿的工作就被放弃了［L. 比特纳（Bittner）：《Innerberg-Eisenerz 的冶铁业》，载《奥地利历史档案》，第89期（维也纳，1901年），第458～459页］。但后一作者在研究卡尼诺拉的铸铁工业时，对这一结论提出了似乎是很有分量的反对意见［阿尔冯斯·穆纳尔（Alfons Müllner）：《*Krain*，*Görz* 和 *Istrien* 的冶铁史》（维也纳，1909年），第112～113页］。【13】

② 参见路德维克·贝克（Ludwig Beck）：《铁的历史》，第2版（布劳恩斯维格，1890～1903年），第1卷，第703页以后，第728～739页。【14】

③ 根据的是林恩·怀特（Lynn White）博士对我的提示。也可参见 E. 萨林（Salin）和 A. 弗兰斯一兰诺德（France-Lanord）：*Le Fer à l'époque mérovingienne*（巴黎，1943年）。【15】

④ H. 皮伦恩（Pirenne）：《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史》（由 I. E. 克莱格翻译，纽约，1937年），第18页。【16】

有铜；许多地方都有铁。似乎有许多浅层煤田都在采掘丰富的煤炭资源。[1]

尽管5、6世纪萨克森人侵不列颠明显造成了铜与煤矿的倒退，但不列颠没有放弃锡矿，也没有放弃铅矿。当宗教信仰占据所有欧洲人的思想时，由于铅被经常用来建筑或修理教堂顶部，即便在野蛮人入侵之后，英格兰和大多数大陆国家仍或多或少地继续需要铅的供应。

尽管仍然少量地应用金属，但在9世纪初期穆斯林征服之后，欧洲金、银、铜、铅和锡的产量减少到以前数字的一小部分。如果哈德良统治时期的矿山税承包人在加洛林之后的7世纪重生的话，他们会吃惊地发现这些金属的产量如此之低。繁荣时期名重一时的矿区几乎成了沙漠。尽管普利尼也许会称赞古代人们不愿开采在他看来主要滋生罪恶和奢侈的地下财富，但他也许会为自己曾对自然历史不感兴趣而感到后悔，因为它部分地与古代人们的采矿与冶金活动联系在一起。

即使不是更早的话，至少在9世纪末，东阿尔卑斯山的铁产量开始增加。随后到10世纪后半期，采矿与冶金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德国尤其如此。在那里发现了许多新矿井。最著名的是曾经密密麻麻长满树木的拉梅尔斯堡铜矿与含银铅矿，这座美丽的山比哈尔茨的戈斯拉尔（Goslar）城市大约高1 200英尺。在德语中登山家与采矿者是同一个词。在11世纪和12 【698】世纪，采矿成了阿尔卑斯山的一个主要职业。在哈尔茨、孚日和侏罗，特别是东阿尔卑斯山脉，开采金、银、铅、锡、铁矿越来越重要。12世纪中期之后开采的进程加快，采矿扩大到其他地区。

西方矿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开采期开始于1170年左右，那年在萨克森的弗雷堡发现了高品位的含银矿。这一高潮一直延续到14世纪。如果有出口统计数字的话，它会表明在这150年左右，欧洲的矿物和金属产量只有几十年没有大幅度增加。

在文化和知识方面，这段时期是欧洲编年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精美的罗马风格和哥特式教堂建筑是中世纪成就的集中表现。这些纪念馆表达了欧洲人普遍的崇拜方式，当时他们的生活以宗教为中心。12、13世纪就像8、9世纪一样是充满巨大希望的时代，也是欧洲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时代。这种希望是与众不同的，而且早期前进的方向更少有物质的东

① 已故教授科林伍德接受现代考古学家的证据，以此作为煤在罗马时代的不列颠广泛使用的证据。[R. G. 科林伍德和J. N. L. 迈尔斯：《罗马时代的不列颠和英格兰定居点》，第2版（牛津，1937年），第231～232页]。没有其他学者给予罗马时代的煤这样的重要地位［参见罗斯托维泽夫：《希腊世界的社会和经济史》（牛津，1941年），第3卷，第1615页］。【17】

西。12、13世纪欧洲人民的努力以大教堂达到高潮，其中有一些——特别是在北方——教堂的螺旋尖似乎直穿云霄。但即便这些结构有某种象征意义，就像教堂象征着人类命运的理念超脱，它也需要许多混凝土材料来建设。它们的墙比后来建的更厚更结实。

一个时代的各个方面都是交织在一起的。银、金和价值稍低的金属产量（还有一部分从穆斯林流入欧洲的金）增加对财富的增长起了作用，部分地是因为它们增加了货币供应，而主要是因为它们增加了工业用的材料。农业和工业产量的巨大增加与商业惊人的增长一起改变了11世纪晚期到14世纪欧洲的经济面貌。矿产财富的增长有助于解释13世纪的人们是如何用石头建造起如此辉煌而又昂贵的纪念馆，以及后来用玻璃和金镶嵌于其中的同样优美的作品的。财富的增长同样也使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这促进了作【699】为中世纪大学主要成就的哲学思想的发展。

10~11世纪期间，采矿业与冶金业对欧洲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多大影响呢？对大多数中世纪的人来说，这种影响是间接而又遥远的。当时的著作很少提到金属。德国人阿尔伯塔斯·马格努斯是惟一较多谈到同时代冶金发展的思想家。他以极大的热情谈到了他出生之前在弗雷堡大矿山发现的优质白银。所有采矿业中特别是含银矿中最惊人的进步都是在西方文明的边缘地区发生的，远离主要的文化和经济生活中心。巴黎和法兰西岛是13世纪文化的辐射中心，得天独厚。但它们的财富是在地表而不是地下。采矿业的进步是中世纪欧洲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然而，在带有神秘色彩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因和果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源于自然科学的现代思想中有关它们的实证理论无法道出真相。

驱动矿井发现和矿业发展的动力是人口增长以及耕种、贸易与工业的成长。直到1759年也许是1785年以后，西欧人口数量才像12、13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那样快速增加。到处都是耕地与牧场，特别是在树林丛生、多山且至今还人烟稀少的农村地区。耕夫的犁耙经常触及欧洲北部大量露出地面的丰富铁层或煤层。在森林里，在阿尔卑斯山谷，甚至在高峰的山坡上，大自然的风吹雨打使更有价值的矿藏地点暴露出来。当雪融化时，水流急泻到岸上，会将表面泥土冲走，露出地下财富。当大风将树根拔起，当闪电将岩石劈开，当雪崩沿山坡倾泻而下时，丰富的矿藏也会暴露无遗。随着居民与旅行商人不断地深入高地和森林，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这些奇异的景象，因而促使勘探者探测矿物。对物质世界越来越好奇和农业、商业、工业、艺术对金、银、铅、锡、铜及其合金的需要不断增加使人们渴望探测地下财富，研

究和利用他们发现的物质。一直到了宗教改革前夕，当居民掀起向同一地区 【700】蜂拥的浪潮时，另一相当规模的勘探与开发运动才出现。

这种新近产生的好奇心解释了12世纪后期弗雷堡银矿快速发展的原因。带着盐的商人碰巧遇到了被春天的潮水冲去尘土的含银铅矿。他们将样品带到戈斯拉尔，与著名的拉梅尔斯堡铅矿比较。他们的矿石样品含银量高，而且白银的质量也好。当他们这一发现的消息传开后，大批冒险者带着镐和铲赶到弗雷堡。他们具有冒险精神，这完全像19世纪中期美国人迁移到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时期的情形。

12世纪末期和13世纪，各地的商人和殖民者都在寻找矿山，特别是含银或金的矿山。浅地表有许多丰富的矿物等着他们去发现，主要是在中欧。这些极易开采的矿山在多瑙河北部的萨克森、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和匈牙利特别丰富。大部分矿山都位于罗马帝国边境之外。毫无疑问，某种程度上这里在罗马时代矿山相对较少。中世纪这些地区与奥地利、哈尔茨和黑林山(Black Forest)居于支配地位，就像古代西班牙半岛在给所有欧洲国家提供银、铜和少量金方面占有主导地位一样。东阿尔卑斯山斜坡和峡谷，喀尔巴阡山，克鲁什内山脉茂密的森林提供了充足的木材，可用作建筑、生火及为熔矿炉准备矿物和将矿从与它们混在一起的无用物质中熔炼分离出金属所必需的炭。这些地区大量水流湍急的小溪与木头一样也很有用。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它们提供了压和敲打矿物或用于鼓风的动力。从一开始，丰富的水流就为洗去脏物与杂质提供了方便。矿物被封装在漂亮的容器里面，目的是使较重的矿物质沉淀以去除较轻的表岩物质。

德国的移民——有些人擅长开采——涌到在对东部和东南部的伟大殖民运动中被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占据的地区，这就将瓦伦人和佛兰芒人带入萨克森，将法兰西人带入西莱茵兰。德意志人不仅在德国的东部和南部而且几乎在中欧的所有地方的采矿中都起着重要作用。殖民运动与采矿运动是同时 【701】进行的。对德国定居者最有吸引力的是某些闪光的贵金属。

含金和银的浅层矿在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以西则较少而且开采量也不大。部分地由于自然因素，使得12～16世纪是德国人而不是其他西方人在采矿与冶金中占主导地位。到法国、英格兰和低地旅行的商人和采矿者也都急于发现含贵金属的矿藏。西欧的国王、王公、大主教和其他大地主在激励开采者方面也丝毫不落后。在发现像德文和阿尔萨斯那样的银矿的地方，都像在中欧一样得到大规模的开采。

中世纪后期欧洲人以特别的兴趣搜寻贵金属，但人口、工业、贸易的迅

速增长使得人们对各种矿物的需求都与日俱增。矿业的发展扩展到了基础金属矿铜、铅、锡、铁甚至煤矿。在煤矿和非铜基本金属矿中，德国人就不像在银和金的开采中一样占主导地位。甚至在14世纪的铜矿开采中，在德国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瑞典斯托拉·科佩堡矿也成为拉梅尔斯堡的竞争对手。英国在索默塞特、杜拉谟、坎伯兰、什罗普郡、弗林特郡（Flintshire），尤其是德贝郡的明矾矿在13世纪越来越繁荣，而且铅的出口贸易也发展并繁荣起来。英格兰的铅产量与中欧形成竞争。欧洲大陆依靠德文、康沃尔获得锌的供应，就像它依靠萨克森和波希米亚的金和银一样。12世纪后半期英格兰西南部，主要是德文的锡年产量几乎增加了5倍。14世纪早期是另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康沃尔，那里1338年的产量比1301年增长了一倍多。14世纪30年代这两个地方的总产量在丰收年份达到了700吨。自从12世纪中期起几乎增长了10倍。14世纪30年代的产生数字直到17世纪后半期才被超过。①

由于铁矿的供应不像稀有矿那样只局限于某个特定地区，因此它的周围【702】不像一些含银铅矿、铜矿、锡矿一样人口集中。但从12世纪早期到14世纪早期，中世纪人们需要大量的铁用于哥特式建筑。对铁的需求比以前更大，用于犁铧和其他农用工具，用于工具、斧头及大工业时代的其他一些附属物，造船用的锚、龙骨和钉子，因马的使用扩大而来的马蹄铁、马嚼、马镫，以及我们祖先在那残忍的暴力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年代的无数次战争中使用的盔甲、刺刀和短剑。整个欧洲制铁业都很发达。铁的国际贸易也发展起来了。施蒂里亚、卡林蒂亚、比斯开的巴斯克行省和西班牙的吉普斯夸（Guipuzcoa），是主要的出口国家，其次是匈牙利、瑞典和威斯特伐利亚。马背、四轮马车和河船、海船将铁运到欧洲人口最多，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意大利、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

所有这些地区都有铁矿，因此进口铁仅用于补充本地供应。意大利所需要的铁大部分自己生产，其他则是从厄尔巴岛（Elba）通过水路从富饶而又人口众多的托斯卡纳运来，在13与14世纪之交，那里的建筑业与工业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发展得快。在英格兰和构成现代法兰西的各省，为了满足邻近城镇和村庄的需要，小铸造厂成倍地增加，尤其是在长满树木的高地。这些小作坊仅需要极少的资本。一旦烧制木炭用的木材稀少，制铁者就会毫不困难地收拾设备转移到新的林地之中。另外还有几个较为重要的有很大铸造

① G. R. 路维斯（Lewis）：《锡矿山》［剑桥（马萨诸塞），1907年］，第252～255页。【18】

厂的生产中心如皮德蒙特、迪安森林、北部香槟、洛林、道菲安。熟铁从这里通过远距离的航运以供应形形色色的铁匠和工匠之需。

尽管制铁业日益繁荣，甚至在14世纪初就开始大量生产铁，但其产量相对于伟大的现代钢铁时代几乎可忽略不计。欧洲主要制铁中心斯泰利亚所有炼铁炉的年产量还不超过2 000吨。① 这个数字对20世纪初的小企业来说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难怪美国钢铁公司的总裁在最近提交给股东的报告中说："钢铁现在比垃圾都便宜!" [703]

按现代标准，中世纪欧洲的铁和钢是相当匮乏而又值钱的物品，人们首先试图用新的制铁技术主要用来增加产量，但这并不是发生在欧洲而是11世纪的中国。最近有人指出，在从998年到1078年这80年间，随着鼓风炉的普遍使用，铁的年产量在中国增加了近4倍，到1078年达到125 000吨。② 而整个欧洲直到1530～1540年铁产量才达到相当的水平。

尽管接下来的150年中欧洲的铁产量增长相当慢，但在改革之后，首先在不列颠然后在瑞典，铁的产量迅猛增长，③ 1620年后，瑞典除供应本地需要外，还向英国工业出口大量的铁。大约1540～1620年英格兰鼓风炉及铁产量的增长可与11世纪中国在990～1078年的进步相比。从1540～1620年的这80年的后期，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产量大约增长了5倍。到17世纪20年代，每年的总产量达35 000吨，④ 而整个不列颠（这个地区的铁由瑞典和苏格兰提供）不到当时中国宋朝北方人口的1/5。在宗教改革后的一百年间，不列颠鼓风炉的发展和人均消费增加似乎比任何同等长度的时期世界上任何的其他地方都更突出。

伊丽莎白一世和斯图亚特早期制铁业的蓬勃发展成为数量经济发展的起点，这又注定会导致工业文明的胜利。在宗教建筑的伟大时期，特别是在相对和平的13世纪和14世纪早期，大量的城市技工开始学习利用每种可得并用于设计宗教形象和其他艺术品的新材料的新方法。很自然，像这种在炭火中制备的优质铁，不仅耐用而且有光泽，非常稀罕，不论是出于艺术目的还是出于实用目的，其需求量都很大。优质铁被用于建造隔栅和其他装饰工作，尤其是教堂、修道院以及新兴城镇、老村庄和许多新定居点的重要建 [704]

---

① 在直到150年后，也就是15世纪60年代，产量不会超过这个数字。【19】

② 哈特维尔：《经济史杂志》，第26卷，1966年，第32～34页。【20】

③ 内夫：《战争和人类进步》，（伦敦，1951年），第35、80～81、442页。【21】

④ 内夫：《英格兰铁的生产》，《政治经济学杂志》，第44期（1936年），第398～403页。【22】

筑。熟练的技工还用铁来制作优质窗架、钥匙和箱子的门环及装饰品。正如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解释的，铁被用来制造驱走罪恶灵魂的吉祥物。

对12世纪早期成长起来的那代人来说，欧洲铁的产量为几百吨是司空见惯的，相比于铁13世纪煤的使用就不那么突出了。跟铁不一样，在基督教时代的前3个世纪期间，对地中海周围的人来说，煤的使用几乎是新鲜事儿。虽然古典时期人们知道煤可以燃烧，但似乎除了罗马时期的不列颠外，这段时期没有任何进行挖煤的系统性的尝试。自此之后直到12世纪最后的几十年没发现欧洲有用煤的真正记录。这与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后1 500年间的中国形成对比，也与11世纪中国的部分地区大量将煤作为工业燃料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

几乎到13世纪才有文献资料表明欧洲开始采煤。没证据表明那时欧洲人长期以来认为是基本矿物的煤的新兴趣与早期中国的煤矿有重要关系。中世纪后期欧洲用煤的少量增长表明了人口的增长和12、13世纪以及14世纪初期的经济繁荣。这导致了对金属和其他工业品的需求的持续增长。满足这种需求使用作燃料和建筑材料的欧洲木材供应紧缺。12世纪后很多材料证明，煤在当时被用作燃料，在很大程度上来讲这是由于建筑业和铸铁业的大发展。煤的燃烧会排放有毒的气体这让它招致反对，尽管如此，但当木炭和木材变得紧缺时，烧制石灰者（他们的产品用于砂浆和建筑用灰），就像制作粗铁器的铁匠一样，当可以从附近露出地面的岩石层中获得煤时，这些人就转向使用煤。在许多地方都发现了煤矿。13世纪在英格兰、苏格兰和低【705】地国家以及亚琛周边地区、以及弗朗什孔泰大区（Flanch-Comté）、里昂山、福雷山（Forez）、阿莱斯（Alais）和安茹（Anjou）的几乎所有煤田，当地居民都开始挖井采煤。

采煤的主要中心在低地国家的列日、莫斯和英格兰北部。纽卡斯尔"取之不尽的煤矿资源"的传统声誉即由此时而起。偶尔也有人把煤装船通过泰恩河运走，中世纪的船只往往用煤代替沙袋作为压载物。伦敦的铁匠和石灰工可以消费一部分煤，沿着英格兰东南部海岸以及欧洲大陆的北海岸，特别是低地国家，也可以销售一部分。13世纪末期那里工业的繁荣仅次于托斯卡纳和意大利北部，而佛罗伦萨和其他意大利城镇的繁荣并没有得益于煤炭燃料。

10.3 中世纪采矿的法律与习俗

矿场与冶金场的位置由可开采的矿井所决定，在较小程度上由牧场和湍急的河流决定。12～14世纪早期采矿与冶金的组织所呈现的特征表明，这些工业脱离了其他正在兴起的中世纪工艺，这也决定了采矿与冶金。通常只有城镇热衷于织布业和皮革业，而采矿与冶金则影响每个政治机构和从帝王到最穷的农奴的每个有土地的人。

几乎所有世俗的或教会的统治者都感到有必要增加收入，这促使他们把自己领土上的矿藏向所有前来的开采者敞放，并试图在产出中占有尽可能多的份额。通过建立铸币厂（先是银币后是金币）和命令采矿区按他们的利益行事，一些王公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财富和政治权力。

封建时代，西欧的国王、皇帝、教皇、主教和其他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拥有政治权力。要求将位于自己管辖土地上的矿藏占为己有的最初缘由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这不是罗马式的而是封建式的。封建主对矿藏的支配权就像它对银币的支配权一样，直到10世纪或11世纪才获得认可。新的权力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也许与采矿的惊人发展有关，特别是与用于铸币的银矿的发展有关。由于封建主的支配权通常是，特别在13世纪之后，被限制在含金【706】和银的矿产中，所以现在有一个假设，认为导致封建主争取支配权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作为最优秀的人，封建主应该享有一种特权，使他可以支配他领地之内的任何最好的东西。这种观念后来在1566年又有人提出，以拥护英国地主在“矿产案”中的权利。[①]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有更可靠的证据表明矿井的王权至少部分地是产生于封建主要求支配废地或“藏起来的财富”。[②]

12～13世纪期间，欧洲的封建主在开采金银矿井权利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展。随后，又在含银的矿层出产的铅矿方面赢得了不小的胜利，有时候他们的权利还延伸到了锡矿和铜矿。这些矿藏有的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有的在他们臣民的土地上。当矿井开始开采后，他们占有一定比例的产出。比例一般固定在矿物或金属的1/10。通常封建主除了承担铸币权外，还有

---

① 埃德蒙·普洛登（Edmund Plowden）：《评论或报告》（1818年），第310页以后。参见约翰·佩特斯爵士（Sir John Pettus）：*Fodinae Regales*（1670年），第28～29页。【23】

② 参见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第2卷，第一章。【24】

权力优先购买最好的金属，如有权力以比开放集市更低的价格收买全部的金属。但因为矿井按他们的利益开采，他们很少冒险承担运作中的风险，其要求实际上是有限的。他们付不起过高的资金，因为矿工下井开采、排水和通风成本的增加，他们的收入经常降低。

12 世纪后半期，或许更早一点，德国国王的权力在理论上来说是非常大的，国王对帝国所有产银或金的矿施加压力，要求享有税收权。在龙卡格里亚，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1155～1189 年）要求将王权作为帝国特定的特征。[①] 罗马法律的恢复是将帝国权力归属于封建条件下的基础，因为每个地方的封建主都从属于国王。虽然遭到了反对，国王们努力使矿山开采权成为一个独立的王权，就像在铸币权上所做的那样。[②] 他们试图建立条例，【707】保证对含稀有金属的矿藏的特许权只属皇帝所有。正如通常解释的，这个原则迫使国王不得不建立一套帝国管理机构，以稳定劳动力和那些拿着铲和镐来碰碰运气的自由人的生活。国王把这个原则应用于采矿与管理，同时要求从矿井中获取税收以作为独立权力的象征，表示与房地产的占有权不同。按照这条原则，土地拥有人未经国王同意不允许在他的土地上开采有价值的矿井，如果国王将权力授予领主，则采矿要得到领主的允许。

巴巴罗萨死后，整个罗马帝国尤其是德国国王的政治权力减小了。领土独立权在几个主要封臣中越来越分开。正如查理四世 1356 年在他的著名的《金色训喻》中所说的，一旦国王们放弃王权，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对矿井的权利，这种权利是随着对领地的所有权而存亡的。这并没有妨碍领地王公将特权赐封于他的某些封臣甚至他的后来的封臣。当他保留封建领土总权力时，就能这么做。这样他可避免监督许多地区矿井的义务，因为曾有一度，矿井作坊成倍地快速增长。波希米亚的皇帝、西里西亚公爵和帝国的其他王公都利用这个机会将采矿权委托给下级。在中欧，这样施加王权的封建主数量不断增加。宗教改革前夕，有许多主教、公爵、伯爵、侯爵和独立市拥有这些权利。

粗率者可能会认为帝国王公的王权比实际的情形更大。14 世纪很少有王权拥有者成功地提出在私人领土上进行矿产开采的要求。但是必须有人对

---

① P. W. 芬斯特沃尔德（Finsterwalder）："Die Gesetze des Reichstags von Roncalia von II November 1158" *Zeitschrift der Savigny 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Germanistische Abteilung*，第 61 期（1931 年），第 43～45、62～69 页，坎特诺维茨教授的提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衷心地谢谢他和迈克维恩教授，因为他们帮助我理解了采矿的好处。假如我没有理解事实的真相，责任全在我。【25】

② F. 冯·施罗特（Schrötter）：《钱币学词典》（柏林，1930 年），第 430～432 页。【26】

有序开采和解决采矿者冲突承担责任。曾一度，采矿主要是结成小组的劳动者的事，由于他们所用技术的先进和付出的劳动，他们要求对矿井有一定的所有权。在私人土地上开采的基础矿井上，土地拥有人经常取代土地的领主(territorial lord)。如土地的领主一样，他建立采矿管理机构并有权分享矿井的出产和收入。【708】

煤炭总是土地领主的财产，而铁只在多数情况下才是。在包括弗赖贝格矿井的迈森伯爵地，领主未经伯爵的允许也可开采锡铅和铜矿。波希米亚的国王一般仅限制对含许多银或金的矿的开采。因此12世纪和13世纪许多矿井都是在王权之外进行的。

这里我们经常会因为一个合理的表面现象而忽视其实际情况。土地的领主通常也是私人封建主。在他掌管司法权的地区，房地产直接归他所有。正如所发生的一样，13世纪中欧开采的大部分矿井位于山区和荒区及无人居住的地方。领土王公将这些土地宣称是他们所有土地的一部分。作为私人封建主，这给了他们充分的权力处理基础矿井，就像他们借助于独立权处理含稀有金属的矿井一样。

当地主土地上的矿产被他的领主开采时，那些不占有一定领地的王公的私人封建主的地位如何呢？他的义务相当多，但相应的他经常因此享有某种特权。这样的地主必须允许从他的领主哪里获得同意的矿工和冶炼工人进入矿井。必要的时候，他必须给这些劳工提供住宿、冶炼场和铸造场。而且，他的部分土地往往被送给这些工人，用来耕地或放牧。工人们还可以利用这里的溪流清洗矿物和驱动风车。他们一般可从采邑或领主那里至少获得一部分木材用于建筑，并获得窖和炉的燃料。

矿工和冶炼工人得为这些特权付钱，地主从土地的使用中获得补偿，并可从土地的损失中获得补偿。有时他们与君主共同享有含稀有金属的采矿品权。如在波希米亚就有这样的事，那里的地主派自己的采矿官员来保证他们自己的利益。有两套行政机构管理采矿：一套是领土君主；另一套是土地地主。

要求行政、立法和司法解决的采矿问题实际上几乎是无穷尽的，采矿与冶金的许多工作都是在由佃农耕种地主的土地上完成的。当采矿与冶金涉及这些佃户的可耕地和放牧用地时，他们有权获得补偿。中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生活等几乎没有一个方面不受工业扩张的影响。【709】

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大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采矿权的法律与习俗类似于罗马帝国。但是12世纪后独立权的划分是中欧的特征，绝不是中

世纪的规则。

在法兰西，这个过程正好相反，法国王室作为最高政治当局在整个王国的实际权力在不断增长。随着罗马法律的恢复，使私生子合法化被认为是统治者的，即皇帝的权力。如 1205 年，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宣布，这种法律权属于法兰西国王。不久以后，律师开始将这条法令作为法兰西国王是其所在王国皇帝的证据——“Rex est imperator in regno suo”。①

在腓力·奥古斯都当政期间及其后，法兰西国王不断侵蚀独立的政府机构，即大封建主。当与古代司法权赋予封建主的处理采矿物的权力相冲突时，法兰西国王一般谨慎行事。与皇帝、大日耳曼王公和英国国王相比，法兰西国王在对封臣领地上的矿产行使王权要慢些。他们坚持在皇室领土之外的矿井经营中行使王权方面也要慢些。

法兰西国王之所以如此谨慎，部分是因为一些更大的贵族拥有很大权力，其中最突出的是勃艮第公爵（*Burgundy*，*dukes of*），他已经开始对矿井行使王权。② 要从那些长期行使这一权力的法兰西封建主那里获得王权有许多困难。也许有人要问，如果法兰西含银矿井与中欧一样丰富，这样的一种政策是否就可尽快实行。法兰西国王也许有必要像皇帝一样将权力下放。像法兰西这样的一个大王国，行政机构由调节许多地方采矿的职员、技术专家[710]和法官组成，它超出了中世纪的统治者所能调配的人员的能力。因此，法兰西国王似乎等待了很久，直到哥特时代采矿与冶金的蓬勃发展结束以后才开始展开大规模的行动。15 世纪早期，他们开始剥夺法国封建主采矿的权力。1413 年通过了一条皇室法令，除国王外，任何君主收取矿区使用费都是非法的。③ 随着法兰西王室权力的增加，到中世纪末和现代早期，行政、立法、司法权力越来越集中，国王因而能够慢慢地集中矿井王权。

1066 年诺曼征服之后接下来的两个世纪，英格兰政府比任何大陆国家都更早实行集权。除了几个地区，如杜拉谟的巴拉丁领地以外，英格兰国王无可争辩地是完全独立的。13 世纪他在采矿业中行使的王权不比皇帝或皇帝所代表的重要王公少。与中欧王公不同，英国国王丝毫没有兴趣将采矿区习俗法编成法典，可他们却成功地获得了处理其臣民土地上含金和银矿产品及收

---

① J. 雷维尔（Rivière）：*Le Problème de l'église et deA l'état*（Louvain，1926），第 424～430 页，我要感谢坎特诺维茨教授的另一个提示。【27】

② 亨利·博恩（Henri Beaune）：“Note sur le régime des mines dans le duché de Bourgogen”，*Mém. de la Société des Antiquairesde France*，第 31 期（1869），第 114～115 页；*Inventaire sommaire des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Hérault*，第 3 章（1887 年），第 258 页。【28】

③ *Recueil général des anciennes lois françaises*（巴黎，1825 年），第 7 卷，第 386～390 页。【29】

取土地使用费的权力。尽管很少有人试图将王权用在碱矿中——如果有的话，也不成功——但他们有效地控制了繁荣的德文和康沃尔的锡矿。13 世纪在中欧、托斯卡纳和撒丁岛领土王公施加于锡矿的王权几乎无不实现。矿井的勘探者和发现者的特权至少与那些允许他们到陆地上的人一样。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通过作为公爵的威尔士王公，或稍晚通过康沃尔公爵，只有王公有权力授予矿井的发现者和其他矿工在未封闭的康沃尔土地和封闭的德文上寻找锡的权力。采矿者不用经封建主同意就可以在这些土地上寻找锡。① 王室从铸币和锡的买卖中获得相当一部分税收，由于他有权力，这使他可以优惠价买进锡。国王作为土地的主人，对一些最富的铅矿，尤其是对国家铅矿中心德比郡②，也有类似的权力，他显然不是作为君主做到这一点的。【711】

在 13 世纪，迪安森林的矿井也许是含铁最丰富的。③ 王室成功地控制了所有铁矿和煤矿产品的一部分，这显然是因为许多土地都是王室的采邑。在英格兰的许多地方，许多人私自在自己的土地上独立地开采铁矿和煤矿。

13 世纪的英格兰，主要矿井都在皇权庇护下经营，国王可从中获取税收。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也因为一些矿井就在皇室的土地上，他本来就拥有直接的所有权。直到百年战争之后的中世纪末，欧洲大陆的封建采矿权才与英国有了重大的区别。13 世纪与王权有关的情况在所有欧洲国家都一样。英国国王对自己土地上的矿藏拥有的权力并不亚于任何基督教王国的王公。

尽管在某些方面（如度量衡）差别相当大，但 12 世纪后期以及 13 世纪的欧洲社会基本上是个大一统。每个地方劳动与生活的基本方式是类似的，他们推崇的行为也一样。采矿与冶金的状况也不例外。无论矿井是受皇帝、国王、王公或封臣、教主管理，或由得到授权的城市理事会管理，还是归非神职的或教士的采邑地主来管理，④ 整个欧洲的采矿权都差不多。至于

---

① 参见路维斯：《锡矿山》（Stannaries），第 158～160 页；A. K. H. 詹金（Jenkin）：《康沃尔的矿工》（伦敦，1927 年），第 32 页。【30】

② 参见《维多利亚郡史：德贝郡》第 2 卷，第 325～327 页。【31】

③ 里斯·詹金斯（Rhys Jenkins）：《迪安森林的造铁》，纽科门学会译，第 6 期（1925～1926 年），第 46 页。【32】

④ 有几个地区，特许权和采矿权既不是授予一个拥有王权的王公也不是授予土地的某个主人。萨默塞特的门蒂普的铅矿就控制在 4 个显赫的地方贵族手中，他们每个人控制的地区都有他们各自的办事员、采矿法规以及矿区法庭［J. W. 高夫（Gough）主编：《门蒂普的采矿法和森林边界》，1931 年］。在海劳尔特西部的煤矿和采银矿区一样，矿山的所有权是与土地的所有权分开的，特许权授予管理司法的地方官员——the *seigneurs haut-justicers*［G. 阿莫德（Arnould）：《蒙斯地层中的煤矿》（蒙斯，1877 年），第 22 页；G. 德坎普斯（Decamps）：《蒙斯煤炭业的起源与发展史论文集》第 58 页及以后］。【33】

基本原则、采矿或熔炼工与代表君主的官员之间的关系，在每个地方也大致相似。

矿井的发现者通过向领主的重要官员——在中欧的德意志人采矿区被普[712]遍称为矿长（*Bergmeister*）——申请采矿权后就对矿井标桩立界。这位官员或他的代表对矿山投放一定数量的资本，以便长期有权利用某块土地上的某些矿层、开采某些矿物。在许多地区尤其是中欧，将表面岩层分成许多小块是习以为常的事，经常被划成方形并依照本地习俗所描述的尺寸。领主自己的官员会把新发现的那片区域赐给发现者，有时还会附加一小块土地作为奖赏。其余的一些部分则领主保留，或在他的直接监督下运作或租给别人去经营，其情形与领主将一部分土地出租给佃户耕种类似。矿层余下的每部分都会授权给一个矿主，通常是给第一个申请人。矿主得保证不断开采，交付土地使用费并遵守君主官员推行的采矿习俗，矿主完全有权同官员们讨价还价。

只要矿井的挖掘和运作重要到足以雇用许多矿工和熔工，这些地方就会形成小的采矿地区。这些区域与本地农民耕地分开。这样的一些地区在12世纪末和13世纪的欧洲增长得尤其快，它们有自己的法律和习俗，在挖矿井和熔炼金、银、铜、铅等方面都占统治地位。但在制铁方面却不这样。仅在迪安森林的低地有这样的煤矿。因为煤和铁矿不像许多有价值的矿井那样固定，只有几个地方如列日、施蒂里亚的埃尔泽堡，那里有相当多的人既从事采煤，也从事制铁。其他大部分地区则是由农民不正式地开采煤矿，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开采和熔炼铁矿物。这些农业或者为自己劳动，或者为一些地主劳动，通常是在他们不耕作的时候，他们遵守与田地和森林劳动有关的本地一般的法律和习俗。

在远至巴尔干——这一德国主要的殖民地——的中欧，封建主一般对所有寻找矿井的来客开放，他们采矿并从矿物提炼金属。其他地方，一般是西[713]欧的许多县，这样的权力只给本地人，他们形成类似于城镇行会一样的封闭体系。这样的一些拥有专权的群体明显更适合本地行省的人，而不是来自不同地区的远离故乡的殖民者。拥有独家采矿权的组织在制铁业非常普遍，特别是在法兰西，那里其他一些依赖大量木材作燃料的产业也形成了同样的组织，如毛玻璃器皿制造业等。在艾伦康周围树木丛生多山的乡村，在佩尔什和诺曼底的上游，一群本地矿产主、世俗和教会的领主，素以矿产大王著称，是惟一享有开采铁矿、建立铸铁厂的权力者。木炭和铁的劳动人手实际

上由矿产主的公司控制。只有它的成员的儿子或女婿才有采矿权。[1]

其他情况下，开采权只限于居住在特定区域的人。在东比利牛斯山，不允许有人在兰塞山上寻找或开采铁矿，除非他是维克德索斯峡谷的居民。[2]至少在一个英国矿区也存在类似的限制。只有出生于圣巴里亚维尔斯分区并且已在此用镐工作了一年零一天的人，才准许在从国王的迪安森林开采铁矿或煤矿。[3]

不管这些地区是否是独一无二的，矿工和冶金工人的社会地位与正在兴起的城镇居民一样高。12、13 世纪城镇居住区提供了避免成为农奴的一条出路。在人口增长的年代，农民既可自由采矿，也可以从事技工或经商。实际上采矿区与城市的形成可以认为是工业运动和商业发展的两部分。也有的地方这二者合而为一。13 世纪列日的煤炭工人组成了极其重要的都市行会。在默兹河流经的这一河湾，自然界的偶然事件赋予了人口密集的低地国家以丰富的煤炭资源，那里的煤矿实际上成了都市工业。还有些地方发现了稀有金属特别丰富的矿井，新的区域实际上大到足以形成城镇，如弗赖堡、伊格劳和匈牙利的谢姆尼兹。在这些地方同时形成了城市立法和采矿法律。[4] 【714】

无论采矿区是不是城镇的一部分，它一般是国中之国，有自己的法律和规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适合成员某种特殊需要和情况。[5] 在这些地方，首先工人拥有特权和相当的自治。只要矿工或金属制造者有利于自治王公的财富，他们就不用缴纳附加税。他们一般有权安排自己的劳动。有关下井和支撑井的方式、将矿物运到表层的方式、工作日，赢利和亏本的分配等规定都由代表矿工和冶金的君主官员决定。在某些法庭还审判过有关采矿与铸造的案件，它代表劳动人民，而劳动人民总是大多数。

采矿区的人民必须尊重罗马教皇，传教士与居民形影不离。他们必须遵守管辖区内独立政府的法律与规则。但这样的一些机构总是限于传统与习俗，实际上有助于限制政治高度独立。当劳动力单位非常小的时候，如在开

---

① H. 德·福姆维尔（de Formeville）：*Les Barons fossiers et les férons de Normandie*（卡昂，1852 年），第 1～7 页，及各处。【34】

② 亨利·劳佐德（Henri Rouzaud）：*Histoire d'une mine au mineur*（图卢兹，1908 年），第 11～12、23～30 页。【35】

③ T. 霍格顿（Houghton）主编：《迪安森林矿工的法律和习俗》（1687 年）；H. G. 尼古尔斯（Nichols）：《迪安森林的造铁》（1866 年），第 71～82 页；Exchequer Depositions by Commission（公共记录署，伦敦），13Charles I，Mich. 42。【36】

④ 关于伊格劳（Iglau）可参见阿道夫·齐查（Adolf Zycha）：《源自伊格劳矿山法的中世纪波希米亚矿山法》（柏林，1900 年），第 1 卷，第 43～44 页。【37】

⑤ 参见《康沃尔的维多利亚郡的历史》，第 1 卷，1906 年，第 523 页。【38】

采与冶金刚开始的时候，工人参与政治机构是具体而又迫切的现实，现代工业的工人不容易感受到这一点，即便是这些工业在政府手中，劳动人民也有权选择政府。12、13 世纪的矿工无权改变封建主，但他们经常强烈影响封建主派来监督和管理采矿者的当地领导者们的决定。

10.4 中世纪采矿法律与习俗的起源

【715】 许多采矿地区特别是中欧，法律与习俗最终体现在书写完整的章程中。章程由有王权的领主颁布，如矿物财产与土地相关，则由地主颁布。我们有直接证据的第一部章程（code）是关于蒂罗尔（Tyrol）南部特伦特（Trent）的是 1185 年由特伦特地区的主教颁布的。从那时起，法律与习俗的编撰开始流行起来。在中欧和斯堪的纳维亚，有些章程起初在一个地方流行，后来成为其他许多地方的样式。最有影响的章程显然是波希米亚国王为伊格劳矿工颁布的，其中第一部可追溯到大约 1249 年。① 13 世纪后期和 14 世纪期间，伊格劳条例（regulation）成为所有与含银矿井有关的全部成文的波希米亚法律（law）的基础。这些章程在德国、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威尼斯共和国的矿区还有残存。②

断言所有中世纪的采矿法和习俗起源相同，那是错误的。最普遍的习俗不是某个法律制定者或某个种族的产物，而是整个欧洲 12、13 世纪共同的产物。

在更早的历史中也可发现这些法令的先例。在公元前 4～6 世纪的阿提卡，在私人土地上有权处置有价值的矿井是高度自治的特征，这条原则的建立明显与洛里昂银矿有关。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条原则成为了宏大的罗马法律的一部分，但后罗马帝国时期的大多数矿井属于帝国财产或者皇帝。③ 皇帝也对私人拥有的矿井征 1/10 的税。12、13 世纪法理学家所研究的罗马法令中提到了这个税种，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激励了中世纪的王公征收同样的

---

① 齐查：上引书，第 1 卷，第 49 页。【39】

② 参见 J. A. 托马斯查克（Tomaschek）：《伊格劳矿山法的年代》（因斯布鲁克，1897 年）。【40】

③ 我们仍然必须认为亨利·弗兰科特（Henri Francotte）的文章［《古希腊的手工业》（布鲁塞尔，1900 年），Ⅱ，第 183～191 页］关于在阿提卡有私人拥有矿山的观点没有充分的证明［G. M. 卡尔豪恩（Calhoun），《古代雅典的采矿》，载《经济和商业史杂志》第 3 卷，（1931 年），第 341～344 页］。【41】

税，这有点类似皇帝和后来的法国国王重新以罗马法律作为提出对矿山享有排他权的法律基础。

现代考古学家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中世纪人民不知道的古典历史知识。已经证明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政府对维斯帕斯卡（现在的葡萄牙）附近的某些土地颁布了书面的采矿业规则。这些规则公布于阿尔茹什特雷尔（Aljustrel）石板上，非常类似于中世纪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采矿区的习俗。君主与矿井持有人之间同样有利益的划分，君主的官员对矿井同样采取控制。矿井工人们组成了同样的小公司，拥有可转换股票，同样在普通法庭之外设立了特别的机构以处理有关采矿的争议。2世纪的葡萄牙就有这样的规则，甚至更早，在东地中海至少可追溯到希腊时代。【716】

这些采矿管理的知识不可能通过在12世纪复兴罗马法而且归到中世纪的欧洲，因为在查士丁尼法典，帝国法律更早的编汇中以及古代法律条约中没有发现有这样规则的迹象。但在从未被永远放弃的采矿地区，这个系统仍然保留许多个世纪还是可能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世纪英格兰这种采矿管理几乎绝对与铅、锡矿有关，这些矿是萨克森时期留下的惟一的矿井。而且这样的法律与习俗据我们所知在罗马人占领英国时鼓励采矿的地方就出现了。

乍一看、很难理解罗马帝国的这法规怎么会对中世纪矿业法与习俗的重要中心萨克森和波希米亚产生影响。也许与在不列颠不一样，罗马人并没在这些国家采矿。罗马也许曾对所有这些地区有间接影响。12世纪末到13世纪这期间，波希米亚采矿的惊人发展据说是由德国南部矿工移民带来的，特别是来自蒂罗尔与东阿尔卑斯山其他地区的移民。① 在东阿尔卑斯山比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有更多的证据表明，罗马与中世纪采矿有联系。②

因此，我们对2世纪葡萄牙的采矿管理与中世纪采矿地区广泛应用的法律与习俗有了很强的背景知识。但为什么西欧人运用这种特殊的古代采矿管理而不用其他方法呢？尽管孟德斯鸠和许多现代作家错误地认为古代采矿的劳力完全是奴隶，但奴隶也许是采矿中最常见的劳动力。【717】

在古典时期的历史上，某段特定时间内奴隶劳动也许几乎非常普遍。偶

---

① 曾经认为波希米亚最初的德意志采矿者来源于德意志的西部，从哈茨和莱茵河流域而来。但是齐查给出的证据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他们来源于阿尔卑斯山［阿道尔夫·齐查：*Das bömische Bergrecht des Mittelalters*（1900年），第1卷，第17～33页］。【42】

② 参见克来莫·纽伯格（Clamor Neuburg）："Der Zusammenhang zwischen römischem und deutschem Bergbau", in *Festgaben für Wilhelm Lexis*（Jena，1907），第278、298～299页。【43】

尔也有挣工资的矿工，他们比18世纪和19世纪工厂挣工资的工人更不能自己支配自己。古典时期挣工资的采矿者有时被私人公司雇用，有时被国家雇用，有时与国家签订合同，有时候则被一些提供公共税收的农民雇用。没有理由认为公元2世纪古代葡萄牙的不同体制在晚期罗马帝国扎下了根。罗斯托弗泽夫教授已经指出，皇帝越来越干预不同种类的经济、商业财政和工业作坊。作为此项政策的一部分，罗马帝国机构占领了许多以前以不同方式租给私人的矿场，政府直接管理，有时将囚犯雇为矿工。这在古代历史上有许多先例。中世纪采矿精神中没有什么比这种将工作当作一项处罚更标新立异的了。据说从代表帝国财政当局的特权机构获得采矿权的独立采矿团体在2世纪后逐渐变得不再重要。野蛮人征服前夕当帝国作坊显然被地方贵族领导下的一些小矿产所代替时，我们不能肯定它是否复兴了。① 无论怎样，罗马历史的发展趋势都不会向着自由矿业地区发展。几千年来由于采矿在古典文明的经济中相当重要，这似乎极为特别。

最迟到11世纪后，发明创造是西欧人的一个特征。知道利用什么，如何利用，是发明的一个基本部分。与西方历史其他任何时候相比，也许是与【718】所有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在下等人中，天才、渴望、技能等创造巧妙作品必不可少的东西，在11世纪甚至12世纪和13世纪初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晚期罗马和哥特式的欧洲式建筑物又体现了人们吸收、融合和组织不同材料的同样的天分。

王公与君主，俗人与传教士保证本国城镇法律，保证农奴及其儿子的自由。当发现有价值的矿井时，有权处理它们的王公与君主不得不召集人们进行开采。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得不给那些允许住在城市的人同样的特权。

采矿区的劳动者不仅拥有讨价还价的权力，而且还获得了一些与他们的生存环境相关的特权和独立。采矿本身有助于新的自由——尽管这似乎有点矛盾——也有利于那些名义上对帝国忠诚的少数政治统治者实施新的权力。

相对恶劣的采矿条件为手工劳动者们增加了一点小小的声望，特别是从事教堂与修道院建筑与装饰的工匠。早期的采矿者和熔炼工特别是萨克森、阿尔卑斯山、中欧其他地区的勘探者，甚至进入森林的攀登者，冒险进入深深的峡谷并且沿山边攀岩。这些地区的德国殖民者们几乎不知道农奴制的存在。因此采矿者实际上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由地位。② 其工作环境的神秘使人

---

① 我们也没有与这些企业形式相关的证据（参见纽伯格：上引书，第29页）。【44】

② 参见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企业的历史发展》，载《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学年鉴》，第15期（1891年），第677页。【45】

们常常把他当作先驱者，而不是奴隶。

与此同时，中世纪采矿和冶金业与高原和林区的联系有助于王公、俗人与传教士控制采矿，而不受封建主的控制。12、13世纪之前，在几乎无耕地和居民相对少的地方也发现了新的矿层。在这些地区，私人对土地拥有的权利比某些人口密集的地方要弱，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从罗马时期已经被系统开采，几乎无人打扰。阿尔卑斯山中世纪采矿业的特征不同于现代与古代，它促进了表层使用权与矿产拥有权的分离，这是中世纪法律的特征。因【719】为封建地主往往倾向于对阿尔卑斯山山区和森林保持无限制特权，比起那些传统上对房地产持很大权力的封建主来，地下的矿井更容易为君主所占有。① 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农民经常赶着成群的牛羊到处转，一般到冬天才离开。牲口主人的权利并不等于拥有某些土地。就像经常发生的，如果一些牲口掉进了矿井，牧羊人会非常恼火。他们会要求赔偿，但并不是说他们就有权拥有矿井。这就使得领土王公、俗人与传教士有极好机会将矿工与冶金工人置于他们的管理之下，有一个时期，他们保证工人有很大的独立性，并且欢迎他们参与本地政府。

比利牛斯山、诺曼底、英格兰、威尔士、低地南部和莱茵河地区以及阿尔卑斯山和克鲁什内山脉早期历史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君主和地主可对成百上千采矿与冶金地区授予类似的特权，应用类似的规定和类似的管理手段。这就像有一个无形的法律制定者将同一种是非观念同时灌输到欧洲各地的矿工、地主和领主的头脑里，而且这种概念融人了习俗和法律。有一段时期（在有些地区这个短暂的时期几乎在13世纪末期就结束了），西欧人试图将矿工的自由与部分自治的政府统一起来。西欧乡村与城镇的工业状况有助于加强对本地区其他一部分半独立小作坊的控制。这种权力与欧洲人自远古继承而来的中央政府和统一教会的权力并存。

就像哥特式拱形和大教堂的螺旋一样，自由矿工社区是西欧人的一种创造。就像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和邓斯·斯各特（Duns Scotus）的哲学著作《神学大全》（*Summae*）一样，它是12、13世纪欧洲人天才的体现。这种天分在于为了新奇想法，他们追求，并且有能力利用各种形式和原理，包括早期先进人物提出的工业化组织形式，并概括这些想法、形【720】式和原理，使之为所有人所用。这种为了西方基督教的整体利益，将小单位归纳成整体的权力赋予了这个时期特殊的统一性。显然，这种统一性所达到

① 参见施莫勒，第676、679页。【46】

的高度在过去是未曾有过的，而且统一性和各小单位间相互补充相互增强并不是相互对立和蚕食。

10.5 14世纪繁荣的衰落

平衡是非常微妙的。就采矿与冶金而言，随着中世纪的衰落，它变得越来越不完善。12、13世纪期间作坊的条件某种程度上与自然资源有关。这些丰富的资源位于高原峡谷和山丘边缘附近，很容易被并无多少资本的冒险家发现。但是，这些表层资源显然有限。

14世纪期间，作为前几代欧洲大部分地区共同特征的，矿物与金属产量快速增长的时代终结了。除了几个有名的地区，如著名的法兰科尼亚，也许还有波希米亚，采矿者在这个世纪之初或至少在中期面临着困难，此时腺鼠疫在欧洲很大部分地区流行。法兰科尼亚和波希米亚受到的威胁稍微弱些。它们免受灾难也许与14世纪第三个25年波希米亚银矿业的复兴有关。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和匈牙利的金产量也有所增长。[1] 但14~15世纪期间的中欧并没有处于繁荣期。总体上，欧洲金和银的产量实际上减小了。从拉【721】梅尔斯堡著名的铜矿和同样著名的德文和康沃尔的锡矿来看，铜和锡的产量都有所减少。尽管频繁的战争对钢与铁的要求不断，但主要产铁区的铸造业并不繁荣。在许多地方制铁炉的数量在缩减。从英格兰到欧洲大陆的海上煤炭航运也没有增加。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延续了几代人时间的长期衰落呢？采矿与冶金的繁荣与整个时代的繁荣有关。采矿业的萧条是困扰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与政治困境的反映。至少在飞速增长的200年之后，人口增长总的来说很慢。农民是每个乡村的大多数，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很难提高。大多数城镇的技工数量或工业产量无明显增长。除了几个由勃艮第伯爵（Burgundian）

---

① 参考卡斯帕·斯滕伯格（Kaspar Sternberg）：*Umrisse einer Geschichte der böhmischen Bergwerke*（布拉格，1838年），第1章，第2节，第32~34页。E. J. 哈米尔顿（Hamilton）：《1351~1500年的瓦伦西亚、阿拉贡和纳瓦拉的货币、价格和工资》（剑桥，马萨诸塞，1936年），第195页。但是在整个14、15世纪，西里西亚的矿业总体而言处于一种萧条的状态［康拉德·伍特科（Konrad Wutke）："Die Salzerschliessungs—versuche in Schlesien in vorpreussischer Zeit", in *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ür Geschichte und Altertum Schlesiens*, XXVIII (1894), 107］。14世纪晚期欧洲用来发展铸币的一些黄金来源于苏丹，这从12世纪起就是一个供应源［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货币与文明》，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第1期（1946年），第2期］。【47】

即好人腓力普（Philip the Good）（1419～1967年）统治下的低地，其他地方的经济直到15世纪后几十年都没有持续增长。因此就没几个地方对金属的要求增加。欧洲王公之间，法兰西和英格兰之间兴起的民族战争与政治争端比13世纪越来越频繁而且更具破坏性。它们干预所有产品包括金属的增长。有时军队侵略矿区和铸造地区，用土以及垃圾填井，毁坏熔炉及鼓风机，屠杀矿工以及熔炼工。15世纪早期（1415～1426年）胡斯战争使科滕堡、艾尔、德意志布罗德的波希米亚城镇变为废墟。

采矿的繁荣总体上与经济和政治条件有关。同时经济进步又与采矿的繁荣有关。14世纪和15世纪大部分时间，特别是1375年，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都缺乏金和银。除了在王公将铸币金银含量降低或轻微下降的地区以外，这个时期金银的价格稳定或轻微下降。部分地由于商业无利可图，工业与商业受影响，停滞不前。领土王公、俗人与传教士提供的集市关闭。萧条的原因之一是王公经常征税的矿井和铸币产量不高。来自于王公，更多来自于教堂——教皇及无数大大小小的教堂的工业用品的订单遍及欧洲各地，这是一个连现代人都难以解决的大麻烦。【722】

在萨克森和哈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瑞典、阿尔萨斯和德文，一些产量最丰富的含银矿14世纪已经耗尽。其他地区的矿工在很深处工作，他们在水涌出之前被迫逃离，否则就会被摇摇欲坠的墙壁的倒塌活埋在巷道里。进步取决于新矿层的发现和开采，以及提出好的支撑墙的方法，也取决于从矿物中提炼珍贵金属的新而廉价的生产程序。

10.6 工业技术的进步

如果矿井要挖得更深并装配更多的机器，那么则要花大量的资本。中世纪早期的挖银潮中，采矿方法极为原始。最近有关罗马帝国时期工程技巧的落后性著作很多。但考古学家证明实际上罗马人在12、13世纪期间比欧洲人更广泛地使用了更为天才的机器设备。如果哥特时代的矿工知道在罗马时代，人们就已经能够将井打到600英尺深，将1英里深的水排出，用廉价的人力水轮和耳蜗式抽水机器的话，那么他们对古人技术工艺的敬仰程度将不亚于学者们对最伟大的古典哲学家的钦慕。13世纪末期以前的中世纪欧洲未发现这么深的矿井，当时的矿工也不像古代人那样有胆量驱除井中的积水。

大多数煤矿和原矿是由探采或挖的一个坑，然后从底下拓宽，像钟或圆锥一样，基底离表面仅几英尺。直到13世纪末期中欧开采富含银的矿物时，竖井开采才变得普遍。即使是在银矿的开采中，竖井很少挖到地表以下很深【723】的地方。在开采银矿时，通常的步骤是沿一个斜面打孔，挖几十个很浅的坑。一旦挖到水，就放弃这个坑。采用这种方法，有时几年里要在一小块面积上挖几百个坑。有些坑离得很近，人一跳就能跳过。①

最初排水的方法有两种。从矿井底部到山谷挖一条很短的露天壕沟。用卷扬机吊着橡胶水桶从井中将水打起或者在井的斜面固定站人，一个接一个将水运走。在一些地区，这样的排水方法可追溯到13世纪甚至更早。如对矿物的要求增加很快的话，这样的方法是延续不了几年的。中世纪的采矿深度很久以前就可与罗马帝国时期相比，这样一些原始排水方法无法对付洪水。阿尔卑斯山和其北部国家的土地比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土地都潮湿。在60~100英尺的地下，洪水可能比希腊或罗马帝国时代更为危险。

解决以上困难的惟一方法是不断大量地、连续地将水运走，这就需要在挖排水沟和装机器上花费重金。13世纪末期或14世纪初，在波希米亚首先进行了横坑实验。有些横坑得挖到地下1英里多深才能到达矿井底部水线或污水坑以下的矿层，那里存积着渗透进矿坑里的污水。因为很少有人维修横坑，它们很快就被堵住了，水又重新流到了井中。

13世纪在波希米亚以及晚一些的萨克森、哈尔茨、巴瓦里亚的南部，有人用水力和马力机器从井底吸水并从深的盐井中运盐水。水力和马力机械运用于冶金和其他一些地表工业。但如果马力机械对排放深井中的水有效的话，更重要的轮轴和齿轮则是必不可少的。早期用于漂洗、将破布砸成浆以【724】及冶金中驱动风和锤子的机器都没有装备将水从井中运出以防止地下洪水的强有力的轮子。13世纪的一些欧洲人比罗马人更明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机械。但这种认识并未在接下来的200年中带来任何重要结果。

13世纪在矿物的制备、熔炼和提炼方面大多数地区使用的机械方法并不比采矿有效。洗、碎、压通常是在户外手工完成。熔炼工为处理不同种类和质量的矿物而设计的炉床、沟、锅、火炉显示出丰富的想像力。尽管这些铸场和作坊外观看起来很复杂，但它们并不大也不昂贵。有时熔炼是在山边的火炉中靠风来扇火，比如在制铅的时候。更为经常的，则是通过用脚或水拴的水箱扇风来冶炼，比如对铁矿石的处理。投资于这种铸炉的资本还不如

① 施莫勒：《企业的历史演化》，第664页。【48】

工匠建立作坊所需要的资本多。在矿区附近的草木丛生地带，铸炉与锤子几乎与矿井和挖到矿井的工地数量一样多。它们可以被轻易地放弃。

冶金与采矿一样，最早的庞大投资也与银有关。要从许多银矿中提炼出这种美丽的金属是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成本要远远高于铁和基本金属。矿物从井中挖出以后要冲洗，然后砸碎压扁再熔化。含铅的矿物将继续放在炉中氧化以便除去铅或岩石，剩下来的银矿石单独在风箱熔炉中提炼。12 世纪用于砸和压的锤子，轧和加热的风箱都是用手或脚操作的，就像公元前 5、4 世纪雅典时代的洛里昂一样。但原始的水力驱动机器在冶金中比在采矿中排水更有效。在许多水力资源丰富的地方，工业发展起来了。水流沿着斜坡急泻，穿过中欧涌入希腊干涸的土地和地中海盆地。到 13 世纪第一个 10 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在特伦特，南蒂罗尔银矿建造了水车，用于驱动铁锤和风箱。100 年后在主要的含银矿区，人们经常用水力机器砸压矿【725】物，也用来吹风。

主要的制铁地区也引入了类似的水力驱动的风箱和锤子，如施蒂里亚、卡林蒂亚、波希米亚、洛林、道菲勒。有些风箱非常巧妙，甚至超过了古时熔炼金属时所用的风箱。现代心形的有着活动阀的风箱在希腊或罗马时代还从未被广泛使用过，据说在 12 世纪前就已经出现了。14 世纪早期，已经有了用两个非常复杂的风箱产生连续的而不是阵歇的气流。① 新式的、更长的水力驱动风箱所产生的更热的火焰可制造出比用古代方法更大的金属块。因此就要设计许多大炉子来装填矿物和燃料，而在附近的磨房中需要能源驱动的斜锤则把结块加工成铁。

14 世纪，三种类型的炉子取代了老式长筒炉子。加泰罗尼亚（Catalonia）铸炉是古代的一大创造，主要在比利牛斯山和西班牙与法国交界的地方使用；奥思芒德炉在斯堪的纳维亚使用；还有一种在德国称为灰熳炉。灰熳炉是这三种炉子中最高而又最有效的，主要用于中欧，东部法兰西和二者之间的阿尔卑斯山地区。不像树木丛生地带仅高三四英尺的长筒炉子，灰熳炉是由砖头或石头建造的，非常结实。这种炉子通常建造在溪流附近以便用水。大约 10 英尺高，由一个圆筒或柱体构成，其顶端和底部直径大约有 2 英尺，而中间则加宽到直径 5 英尺左右。这种炉子年产铁 4 050 吨，大约是原始长筒炉子的 3 倍。

---

① 卡尔·苏德霍夫（Karl Sudhoff）：《论中世纪的外科学》（莱比锡，1914 年），插图 31，在这里我要感谢林恩·怀特博士的提示。【49】

就如银矿中用排水长沟和水动机器一样，这些改良的制铁方法在欧洲出现100年后才得到广泛的应用。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水力风箱和锤子比排水机器或沟的使用范围更大。除几个发达中心以外，使用效果较差的小筒【726】式炉子的制铁方法仍占统治地位。

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矿工、冶炼工和金属提炼工仍应用古代人的挖井和处理矿物的方法。14世纪和15世纪初期的欧洲人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学习状态都不像哥特时代一样有利于探索和发现。大学里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教条式地学习老师和古代哲学家的观点，根本没有想过要去重新检验这些理论，其实那些著名的学者们自己是非常希望后人这样做的。尽管实际经验告诉他们这些权威并不完全可信，但学者们由于害怕与同事或教堂发生冲突而保留意见。

15世纪后半期是普遍探察新矿区和采矿与冶金技术取得显著进步的新时期。这也是导致发现海洋之外新陆地和自然科学进展的同一种力量的体现。中欧的大矿井与冶金基地成了实验室。偶尔也有知识渊博的人参与，如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年）、阿格里科拉（Agricola）（1494～1555年）和冶金技工师傅比林古西奥，他们一生的相当时间致力于科学与工程，帮助打破了中世纪期间技工与思想家之间的障碍。中世纪等级体制中自由艺术与附属性艺术之间的分离就像现代大学两个系之间的分隔一样彻底。认为中世纪从事物品加工的附属人员与随后在矿井和工场中挣工资的劳动者地位同等卑微是错误的。但正是这种广为接受的中世纪传统使人们认为物品加工是附属性艺术，而更抽象的智力劳动则属另一类。对材料的发展和现代科学的兴起来说，这种传统的衰落是极为有利的。这种传统一直维持到16世纪，但采矿与冶金的发展使之有所削弱，因为这种发展使技术专家和一些学者们有了接触。

15世纪后半期和16世纪的前几十年，矿工和冶金工人的努力得到了结果。在许多地区都发现了矿物丰富的岩石层。特别是在13世纪因矿井著名的那些中欧地区，尤其如此。勘探者发现了有价值的朱砂、水银矿和明矾。【727】真正的黄铜与青铜不同，它是石灰和铜的合金。经过几个世纪的忽视后，它生产非常普遍。在蒂罗尔和卡林蒂亚，特别是亚琛附近莫尔森特发现的丰富的石灰石导致了德国和低地国家黄铜的广泛生产。这也明显增加了铜的需求。

在铜矿的发展中，15世纪中期一项技术发明比石灰石的处理远为重要。人们发现中欧的富铜矿中如果加入铅则可成功地将银分离出来。这种新的方法似乎在11世纪的中国就已经有了（在那里已经被遗忘了），大约在1451

年才由一个叫约翰逊·芬肯（Johannsen Funcken）引入到萨克森。因为将银从铜矿中分离用于生产青铜十分困难，所以在这以前的丰富铜矿开采特别少。宗教改革前夕中欧采矿与冶金的发展中没有什么别的发明比处理铜的新技术更有刺激性。

正像这项技术大大利于深层铜矿的开采一样，强有力的排水机器的发明与更为技巧的排水沟的结合，使得排放更深层的水成为可能。更好的通风方法也使排掉地下一些有毒和爆炸性气体成为可能。

最富有创造性的新机器显然建造于匈牙利和萨克森。其中，最惊人的是在喀尔巴阡山的谢姆尼兹。最底层的水在到达足够高度流入排水沟以前要抽升3节，每个泵都由大轮子驱动。带动这些轮子的牲口在一个倾斜的螺旋形斜井中转动，这些井的斜度与现代汽车的主人将车停在拥挤区的斜坡类似。这一工作需要96匹马，在3个水车中轮流使用。[①] 古代人显然未曾设计过如此强有力的排水机。

比中世纪末期采矿和冶金中排水的重要性稍逊，但最终对近代工业文明【728】起了重要作用的是鼓风炉（blast furnace）的重新发明。制铁中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巨大金属浪费限制了它在早期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应用。一旦铁矿可廉价地变成金属，大量的人就可以用带有火药和其他爆炸品的武器、马车、坦克武装起来，船和飞机上放武器，机器和各种各样用于和平时期传送商品的工具以及用于建筑的新建筑材料钢铁可以大量生产。尽管鼓风炉不是近代金属时代的惟一发明，但却是必要的发明，因为铁资源几乎是无穷无尽的。鼓风炉的广泛应用和机械发展为铁和钢产量的革命性提高开辟了道路。鼓风炉为金属的大量生产提供了捷径。

更仔细地考虑一下中世纪欧洲的历史，我们会发现鼓风炉的发明纯属偶然。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更易熔于铁矿。中世纪晚期，12世纪早期或更早些，将经过强热而炼出的铜锌液体混合物浇入地上挖好的洞中，可以使液体按预计的形状固化。用这种方法可以将铜制成教堂的钟和本地餐具。古代哥特式建筑教堂上的塔都是用铜造的。第一次用铜制枪的过程还是从钟和雕像的制造者那里借鉴过来的。人们难以想像早年的铜像雕塑者居然会跨越国界，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有威力的武器之一的发明。[②]

---

① 参见乔治朱斯·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De re metallica*（胡佛版，伦敦，1912年），第194～195页。【50】

② 查尔斯·福尔克斯（Charles Ffoulkes）：《英格兰的枪炮创始人》（剑桥，1937年），第2页。【51】

强有力的水力风箱至迟是在13世纪引入的。火力很大，难熔的铁矿石变得入火即熔，连制铁师傅都感到惊奇。人们已经知道吹风炼铜，很自然这种方法也可用于吹风炼铁。第一次吹风炼铁的时间还不确定，但显然是在15世纪初或许更早些。铁制的加农炮15世纪中期以前就在勃艮第领土生产【729】了，意大利稍晚些。这些加农炮非常笨重，效率不高。直到宗教改革时期人们才能大量制造加农炮，效率也提高了，不仅大陆而且英格兰东南部也有制造。当时主要是熟铁制造的加农炮，它在15、16世纪之交使战争艺术发生了革命性变化。①

到此时为止，或许更早些，在法兰西东部和意大利北部建造了都附有锻铁炉的鼓风炉。② 但直到中世纪末总共也没有几台。

在有鼓风炉的几个地方，生铁代替熟铁成为主要产品。矿石在大火中长时间与碳结合形成熔点比纯金属低很多的合金铁。熔化的金属留在炉子里，周期性地穿过孔进入铸模，凝固成称为沟铁的片。随着炼铁产量的增加，产生了一个称为生铁的分支，这个名字表明了它与沟铁的亲缘关系。产品的熔化有利于有效地冶炼矿石中的铁，大量生产的生铁可用于制成许多新的产品——如枪、标、背壁、柴架、厚板——但它不适合制备由熟铁制成的产品，如工具、武器、盔甲。为了除碳，必须对生铁做进一步的处理，包括在氧气中反复加热。这种新的迂回过程不仅减少了劳动力的使用量，促进了铁的大量生产，还减少了制备过程中造成的损失。带有辅助铸炉的鼓风炉比施蒂里亚、卡林蒂亚和中欧其他地区的灰墁炉都大，装有强有力的风箱和锤子。它们的建立需要在以下方面投资：土地、建筑机器和其他设备。

【730】在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宗教改革之前的两三代欧洲人几乎没有利用廉价钢铁促进经济发展。那时许多技工仅仅把铁当成时髦饰物的加工材料——装饰用的锁钥和雕刻用的钢具（如錾刀），除此之外，印刷术的广泛普及和欧洲文艺复兴视觉艺术的兴盛，都影响了技工从事铁器制作和冶铁的技术方法。对大多数艺术家和工匠来说，熟铁比生铁更合适。宗教改革前夕，欧洲人鼓风炉使用发展非常缓慢，这主要不是因为技术不熟练，而是因为发明技巧未被应用到火器领域之前，生产是朝向质量与外观而非数量和效

① 赖斯·詹金斯：《苏塞科斯铁业的崛起和衰落》，纽科门学会的学报，第5套丛书，第1卷（1920~1921年），第17页；欧内斯特·斯特雷克（Ernest Straker）：《威尔登铁业》（伦敦，1931年），第38~40页，第141页及以后；V. 伯林古西奥：*Pirotechnia*，塞里尔·S·史密斯（Cyril S. Smith）主编（纽约，1942年），第226页。【52】

② 斯特雷克，上引书，第40~43页；伯林古西奥，上引书，第146~148页。【53】

率方向进展的。有人会怀疑是不是对艺术的类似偏见阻止了中国更早批量生产和发展鼓风炉。另一方面，也有人会尝试寻求欧洲人先于中国人就朝着更为现代的经济目标发展的原因。无论是什么因素，欧洲这个曲折的广泛发展过程只是从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早期才开始，似乎先是在低地诸国，然后是大不列颠，其后才是瑞典。

无论它们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与冶金和铁制器皿的时髦有关的发明并不是15、16世纪矿工与冶金工的惟一兴趣。这些年以来机械发明并非没有进展。在一些冶金地区，人们广泛应用了水力机器。人们还建立了蓄水水坝以运转体积更大、功能更强的水车。

所有欧洲人都对这些技术发明做出了贡献。各国之间有许多技术交换，在制铁方面，是意大利和法国而不是德国，为宗教改革前夕大公司的建立开辟了道路。普遍认为16世纪初英国人在技术上比较落后。他们的落后不是素质上的落后。在中世纪早期，他们不仅接受了外国人的技术，还给别人输出技术。即便在15世纪，他们也并不是没有对欧洲大陆的采矿业造成影响。1444年，选帝侯（elector）腓特烈（Friedrich）二世将一个著名的英格兰采矿师傅带到萨克森帮助寻找矿层。但是机械知识则以中欧为发源地朝着反方向流动。【731】

一般说来，是匈牙利、波希米亚、低地、蒂罗尔、萨克森的专家促进了采矿与冶金的发展。德国血统的矿工和机械师傅是新方法尤其是银、铜、锌工业的发明者和传播先驱。在中欧发明的新方法传到斯堪的纳维亚、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17世纪初萨默瑟·帕森的儿子托马斯·科里埃特在游历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后写道："没有什么地方比德国有更好的机器和技术了"。当时德国已经失去了在欧洲的领先地位。主要是15世纪后期16世纪早期德国人和斯拉夫人的勤劳使它有了如此显赫的发展。

中世纪末期的发明对采矿与冶金方面的进步是十分关键的。在低地国家的煤矿或者某些英国北部矿井里，采矿变得越来越普遍；深度都达到了150英尺左右。更深的坑道——在卡尼奥拉的伊德里亚（Idria）和西班牙的阿尔马登（Almadén）都挖到了400英尺深，为的是采集朱砂。[①] 萨克森、波希米亚和匈牙利铜矿的最大深度约为600英尺，在这个深度的水只有通过排水沟和泵才能排掉。

尽管中世纪晚期的发明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在采矿方面并没有取得革

---

① P. 希茨恩格尔（Hitzinger）：*Das Quecksilber—Bergwerk Idria*（Laibach，1860年），第16页；K. 哈伯勒（Häbler）：*Die Geschichter der Fugger' schen Handlung in Spanien*（魏玛：1897年），第98页。【54】

命性的突破。虽然如此，矿产量仍有大幅度增加，尽管不那么显著，因为新的浅矿层仍然不断地被发现。只是当表层矿藏被耗尽以后，人们才开始求助于使用新的方法。铜矿几乎无一例外地装配了马力和水力机器。大多数地方仍旧沿用13世纪的老方法。尽管引入了矿井采矿法开采锡和铅矿，但在宗教改革前夕这种矿中大多数非常浅，只有50英尺深，仅仅是进行表层作业。【732】中欧煤矿和铁矿的开采完全只集中在表层矿脉层，是通过露天工程或坑道开采的。在开采铁矿砂的过程中使用一个手动的辘轳提吊都是罕见的事。

在非常先进的地区，甚至在地表以下开采含银矿石的矿井都很少。在曼斯菲尔德——宗教改革前夕的主要采矿中心之一——采矿一开始在地表矿层进行，由于需求的原因，这个矿层一直未被开采。这些早年被忽略的矿脉，现在无须大量投资就已经很有经济价值了。除了萨克森的施内贝格堡矿井似乎普遍深达200英尺外，[①] 中欧铜矿大多在75英尺或80英尺左右。许多矿井都没有马力和水力或长的排水横坑。在位于施瓦茨（Schwaz）的艾因（Inn）谷地——蒂罗尔重要采矿中心和欧洲银或铜的最大采矿中心——人们在1537年仍在用吊桶从斜井中打水。那是1522年施瓦茨普遍使用的方法，此时有人首次尝试引进昂贵的水泵。尽管装了一些水泵，这次尝试是否成功还未证实。[②]

与技艺有关的神话和迷信仍然在矿工中流行。[③] 几个有神眼的专家拿着古代神圣的叉状棍子漫步于山上，在矿工前面领路，当他们穿过隐藏的矿层时棍子会发生扭曲。采矿地区仍然靠这些神秘人领路，除非大自然偶尔将矿层暴露于他们的眼前。

冶金和采矿一样，重要的方法变化只局限于银和铜的生产方面。在宗教改革时期，水力还未取代压、熔、锤子或铅矿中使用的手工与脚力，也许德国的几个地方除外。即便使用水力驱动风箱，铸炉一般来说很小。制铅与锡要求的火不像铁那样炽热。尽管在法兰西东北部，[④] 在皮德蒙特、莱茵河和穆斯河流域以及苏塞科斯建造了鼓风炉，但在这些地区，大部分铁仍直接从【733】铁矿石获取。在德国南部和东阿尔卑斯山，尽管鼓风炉还显然不为人知，但在主要的制铁区如施蒂里亚、卡林蒂亚，已经普遍用水力来驱动风箱和锤

---

① 奥斯沃尔德·霍普（Oswald Hoppe）：《1500年以前施内贝格堡的银矿开采》（弗赖贝格，1908年），第158～159页；参见第92～93页。【55】

② M. R. 冯·沃尔夫斯齐格—沃尔夫斯克朗（von Wolfstrigl-Wolfskron）：*Die Tiroler Erzbergbaue*，1301～1665（因斯布鲁克，1903年），第39～41页。【56】

③ 参见阿格里科拉：*De re metallica*，第37～41页。【57】

④ 马塞尔·布拉德（Bulard）：《马恩省的煤矿业》，载《地理学年鉴》，第8卷（1904年），第232页。【58】

子，那里的灰墁炉的应用非常广泛。但在不那么发达的地区脚和手力驱动仍占主要地位。

16世纪早期欧洲人的采矿与冶金技术绝对不像早期罗马古代人那样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但他们发现了前人所未利用过的东西。其中鼓风炉和高炉①是明显的例子。他们比希腊人或罗马人更广泛地使用水力驱动机器，矿工作为先驱者所享有的敬重，加上他们的职业在12、13世纪拥有的自由与尊贵，使得采矿业和冶金业部分解除了他们在早期社会中的污名。难道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因为中世纪后期的欧洲人不愿意像古代人那样无情地开采地下资源才使他们全心全力地开动脑筋寻找便宜的采矿与冶金方法吗？

到宗教改革时期，人们比古代更加关注机械。写于1世纪的普利尼(Pliny)的37卷本的《自然史》中有两卷与金属有关。其他的希腊罗马著作也讨论过金属问题，但我们是通过第二手资料知道这一情况的。显然，采矿与冶金吸引古典作家②专心关注的程度，从未像16世纪早期对人们的吸引程度那样深刻，尤其是对德国的乔吉斯·阿格里科拉和意大利的文诺乔·比林古西奥来说，更是如此。前者写了几篇有关的论文，其中最著名的是*De re metallica*；后者在长篇巨著*Pirotechnia*中除了采矿与冶金外几乎没有涉及其他内容。两部著作尤其是*Pirotechnia*很大程度上抛弃了迷信的内容。无论是阿格里科拉还是比林古西奥都没太把那个探矿棒当回事，而意大利人也瞧不起炼金术的伪魅力。③ 他们几个同时代的作者都写了有关同一主题的论文，但这些书现在已被人们遗忘。这种专门、准确论述采矿和冶金业崭新趋势的著作，标志着西方人对古代人不喜欢、不愿意干的采矿业的尊重。而以前，矿工的地位如此卑微，人们都不愿意去涉及这个领域，甚至连想都不愿去想那个地下的世界，所有人都设法避开与采矿劳动有关的一切。【734】

10.7 采矿与冶金的蓬勃发展：1460～1530年

15世纪晚期16世纪早期，许多欧洲大陆建筑按文艺复兴的风格而建。

---

① 想要一个较详细的描述，可见后面的第746页（原文页码——译者注）。【59】

② 参见M. 罗斯托维泽夫：《希腊世界的社会和经济史》（牛津，1941年），第2卷，第1212页。【60】

③ 塞里尔·S·史斯密的*The Pirotechnia*的绪论（纽约，1942年），第15页。他所编辑的绝好篇章极大地丰富了工业史的知识。【61】

工业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特别是在意大利北部，西班牙某些地方，低地国家南部和德国的东部与南部。采矿与冶金首先在中欧的工业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在一些铅矿如萨克森的施内贝格堡，矿产量在 15 世纪 80 年代达到了顶峰。其他地方如弗雷堡矿产量在 16 世纪也达到了顶峰。大多数采矿地区在1515～1540 年间繁荣起来，当时阿格里科拉和帕拉切尔苏斯达到成熟，杜尔（1471～1528 年）和霍尔贝因（Holbein）（1497～1543 年）画出了许多无与伦比的杰作，路德（1483～1456 年）、茨温利（1484～1531 年）和其他宗教改革者的教义煽起了德国人新的宗教热情。1462 年与 1530 年间，中欧地区的银产量增加了 5 倍多。在 1526～1535 年间达到最大，每年生产近 300 万盎司，这个数字在 19 世纪都未曾达到。① 铜的产量增加速度至少与银相当。到 16 世纪 30 年代，每年总产量为几千吨。

德国的银、黄铜和青铜财富对其他欧洲人来说简直是奇迹。产量最高的地区是克鲁什内山脉［施内贝格堡、安纳贝格（Annaberg）和约阿希姆斯塔尔］、匈牙利的诺伊索尔地区以及曼斯菲尔德——当路德的父亲移居到这里以采矿谋生时，路德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部分童年。每个地方都召集几千个【735】劳动力运材料，准备木炭，熔解、分离和提炼矿物与金属。② 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一起组成了居民区，几乎与莱比锡和采矿繁荣时期兴起的德国南部与东部的其他大城市相当。③ 查理大帝五世称 1525 年有 10 万人在帝国各地采矿与冶金，这也许并没有夸张。④

采矿的快速增长不仅仅限于中欧。在瑞典和阿尔萨斯，尽管银产量小于萨克森、波希米亚、匈牙利、蒂罗尔、甚至西里西亚，但增长速度几乎与它们相当。16 世纪前半期西班牙阿尔马登的矿物产量几乎与卡尼奥拉的伊德里亚相当。⑤ 意大利在新兴的明矾制造工业中领先，主要作坊分布在教皇国西维塔附近的托尔法。⑥ 1462 年，教皇议院税收委员会的总监约翰·德·卡斯特罗（Castro，John de）发现了丰富的明矾矿藏。十年以后，在 1471 年，

---

① J. U. 内夫：《中欧的白银生产》，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 49 期（1941 年），第 584～586 页。【62】

② 参见齐套：《中世纪波希米亚的矿山法》，第 2 卷，第 299 页；沃尔夫斯齐格—沃尔夫斯特朗：*Die Tiroler Erzbergbaue*，第 45、66～67 页。【63】

③ 参见恩斯特·克罗科尔（Ernst Kroker）：《莱比锡和萨克森矿山》，莱比锡历史学会丛书，第 9 卷（1909 年），第 26～27、32～33 页，还有散见各处的。【64】

④ 雅各布·斯奇德尔（Jakob Strieder）：《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历史研究》（第 2 版，慕尼黑，1925 年），第 3～4、376～377 页。【65】

⑤ 哈伯勒：*Fugger' schen Handlung in Spanien*，第 102 页；希茨恩格尔：《伊德里亚的水银矿》。各页。【66】

⑥ 让·德鲁米（Jean Delumeay）：《15～19 世纪罗马的明矾》（巴黎，1962 年）。【67】

托尔法的明矾产量达 1 000 多吨，几乎是卡斯特罗发现前夕从近东热那亚进口的两倍，热那亚是当时欧洲的主要进口中心。[①] 卡斯特罗预言在他的指导下为主教建立的巨大工厂将使欧洲长期摆脱对近东的明矾的依赖，从而打败异教徒。托尔法的明矾工厂实际上是 16 世纪欧洲单一经理管理下的最大工业基地之一。它在 1557 年雇用了 711 个劳动力。[②] 明矾是染布的基本元素，纺织业雇用的劳动力曾一度比任何其他工业都多。16 世纪早期，明矾制造业以相当大的规模扩散到欧洲的其他地方。在西班牙南部卡塔赫纳附近和中欧发现了新的明矾资源。到 1549 年，波希米亚国王认为波希米亚的明矾已经足以供给全国人民使用。[③] 教皇工厂遇到了新的竞争，虽然教皇竭力想通【736】过强迫信徒仅购买他的明矾来扭转局面，但却没有什么结果。但事实证明卡斯特罗有关摆脱对近东的依赖的预言是正确的，他的发现可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到 16 世纪中期欧洲实际上已经能完全在明矾上自力更生。

在整个欧洲大陆，钢铁的生产增长非常快，足以满足许多发展工业的需求。主要是由熟铁制造的加农炮第一次得到广泛的应用，因为国王与王公为他们将要进行的争夺权力和领土的战争储存了军火，并且还试用过大炮，特别是意大利不停的战争使得许多地方充满了血腥。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制盐工业发展迅速。很多地方都安装了带铁泵的抽水机以及长宽相当于一个大房间的大铁盆，以抽取并储存弗朗什孔泰大区和洛林盐水。在那里的萨林和迪约兹（Dieuze）建有新的封闭盐场，每个场地都雇用了许多劳动力，属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仅次于威尼斯的军火场和托尔法的明矾场。[④] 采矿和冶金，造船和所有建筑业都比以前更需要工具、机器齿轮及其他机械部件和铁器。铁产量在 15 世纪和 16 世纪 30 年代翻了 4 倍，每年达8 000 多吨。[⑤]

在施蒂里亚，这种发展的取得并不是因为使用了鼓风炉这种提高产量最多的技术，因此，有理由认为铁产量的如此增加绝不是个别例外。分散在阿

---

① 上引书，第 124 页。【68】

② 上引书，第 76 ~ 77 页。【69】

③ 卡斯佩·斯滕伯格（Kasper Sternburg）：*Umrisse einer Geschichte der böhmischen Bergwerke*（布拉格，1836 年），第 1 卷，第 2 部分，第 83 ~ 84 页。【70】

④ 内夫：《物质世界的征服》，第 43、51 ~ 52、89 ~ 90、104 ~ 106 页。【71】

⑤ L. 比特纳（Bittner）：《英内堡—埃森内斯的铁业》，见《奥地利历史档案》第 89 卷（维也纳，1901 年），第 628 ~ 629 页。这些产量的统计只是关于英内堡—埃森内斯的。在那里，产量从 1466 年的大约 1 300 吨增加到 1536 年的大约 5 000 吨。在符腾堡（施蒂里亚的另一个产铁的县），1535 ~ 1537 年间的年产量据说达到了 3 000 吨。（上引书，第 490 页）。我认为，在 1466 年，符腾堡的产量超过 1536 年英内堡—埃森内斯产量的一半。【72】

登（Ardenne）和穆斯峡谷的作坊数字表明16世纪其工业发展至少与施蒂里亚一样快。卡林蒂亚、卡尼奥拉（Carniola）、威斯特伐利亚、哈尔茨、洛林、香槟、道菲勒和尼韦奈、托斯卡纳、比利牛斯山东部和西班牙巴斯克也呈现【737】出与施蒂里亚和低地地区一样的发展特征。铁匠们离开了林木茂盛的高地，转向了水源充足、水力强劲的地区。他们建立了更大的作坊，在同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较长，不像以前那样移动频繁了，因为那时他们的铸造场完全要依靠茂密的树林而建，而树木很快就被砍伐烧成木炭。新的节省劳力型机器使四轮马车与马运送木材和木炭更为经济。因此，即便没有鼓风炉，服务于单一制铁企业的地区数量增加了，在那里，建立了许多花高价建立的永久性铁工厂。

河谷地区里的农民抱怨新的鼓风炉、铸炉、作坊使以往安静的村庄成了乱哄哄的场地。当水从新建的水库流下带动木轮转动时会发出"轰轰"的声音。庞大的水锤有时重达200磅，甚至更重，其撞击声响彻整个山野与森林。因为建设大的铁场时使用强大的风箱，空气中经常弥漫着恶臭和烟雾，使旅行者与本地居民烦恼不已。据村民说，在某些地方铸炉和火炉中的废物污染河流使许多鱼死亡。

欧洲许多地方的采矿与制铁的增长与繁荣使森林遭到了破坏。各种木材都被用于支撑矿井，制造机器，建造房子和商店、水坝及小型制铁场。对木材与木炭的需求与铁产量一样剧增。由于大多数新炉子与作坊无法节约燃料，每年都要导致毁灭数千英亩的树木和灌木。①

对木材需求的压力引起人们对煤炭的新兴趣。法国南部和中部的几个省，特别是在里昂和福雷，煤矿露出地面。在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萨克森、西里西亚，16世纪初开始雇用比以前更多的本地农民开采煤矿。有些人把黑炭与碎石装到麻袋里，用马驮到附近的城镇，如有水路可行就用平板【738】船。这种很肮脏的燃料在离矿井较远的地方开始涨价，那里的石灰工和擅长生铁加工的铁匠对煤炭需求量日增。但大多数挖煤与运煤的农民还有其他工作，通常是耕地，采煤只是副业。

只是在列日诸侯国，采煤业才真正是重要工业，雇用大量熟练的矿工。宽阔而平坦的默兹河非常有利于廉价大宗商品从东到北的几乎90度角的航运。14、15世纪列日的煤产量比欧洲大陆的任何地方都更值得一提。凶残的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Charles the Bold）命令他的士兵从地图上铲除这个

---

① A. 梅斯特（Meister）：《边境地区伯爵领地的铁业的发端》，载《多特蒙德和边境领地历史论丛》，第37期（1909年），第140页。【73】

城市，甚至它的名字都不让恢复。然而在 1477 年，对他之后的欧洲王公来说列日却成了大军火库之一。煤产量增长了 3 ~4 倍，以满足这个城市和上下游许多地方的金属和武器工业对燃料的需求。列日的煤甚至连供应纽卡斯尔的富余都没有。实际上，卢伊克的燃料在加来及其他海峡港口与泰恩河的海煤相互竞争。在列日设有很长的排水沟以排除煤矿中的水，并且互相连接给这个城市供水。矿井两边堆起的黑土不亚于螺旋式的教堂尖塔。对西方人来说，它们比许多欧洲城市大量兴起的城市大厅、审判法庭和商业区更为壮观。

10.8　资本与劳力的分离

长排水沟、排水机器和使用马力和水力驱动机器的最大的新鼓风炉和作坊的建立、维持与运作成本很高。这大大地增加了采矿与冶金所需的资本。甚至当工业技术没有任何重大改进也可满足对矿石与金属需求的增长时，这种需求的增长往往使得扩大公司的规模更加有利可图。在技术进步和市场扩张的刺激下，在许多采矿地区，特别是德国的南部和东部，波希米亚、匈牙利和东阿尔卑斯山区，资本与劳动开始产生了明显分离。【739】

尽管采矿与冶金常常需要一定资本，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比建筑业以外的其他中世纪工业更容易经营，但认为工人组织一开始就是现代矿场和工厂的工人组织的缩影是错误的。12 世纪晚期和 13 世纪早期，在同一矿层中矿石的发现者与相邻矿井的同行结成同盟是常见的。作为一个单独的产业，他们拥有许多规则，就像农民共同在其保留地上耕地与播种一样。因此矿工的公司由许多区块组成，有时多达 32 个区块。这些区块可由父亲传给儿子，也可以交换或卖掉，有时还可以出租。

在 13 世纪，在生产、熔炼、分离与提炼矿物与金属中的这种劳动伙伴关系是众所周知的。有时由矿工自己提供铸炉与锤子。有时，特别是银的生产，冶金企业属于制造货币与授予采矿权的王公。14 世纪德国的鼓风炉主要用于从铅矿中分离银，以及制备银、铅和铜，这种炉子通常租给工人师傅，租期通常很短，大多在 1 年左右。我们已经知道，铁厂往往属于本地的地主。这些地主经常将熔炉或建造熔炉的地基租给主要的佃户或者租给附近城市的金属商人。许多情况下，早期的铸炉、锤子、作坊是邑产，就像磨面坊或葡萄酒场一样。本地村民根据协议或为工资而工作，这些村民有小块土地，部

分时间种地。因为13世纪晚期很少有四五个人同时在一个矿井工作的情况，所以在冶金工业中四五个人同时在一个铸造厂中工作的情况也是罕见的。

在欧洲的许多地方甚至到宗教改革前夕，在采矿和冶金方面，雇用不到12个村民的小采邑作坊仍然是最普遍的形式。挖煤与此类似，如杜拉谟和诺丁汉郡南部就是这样，但低地诸国除外。在许多普遍使用铸炉制铁的地【740】区，铁的采矿与提炼也是如此。通常锡与铅的采矿也是如此，除了中欧的几个地方，银是从丰富的铅矿中提取的。

哪里对矿物与金属的需求剧增，哪里的矿工或熔工的独立合伙企业就处于被动防守地位。由于采矿与熔炼支出的增加，矿工与熔工被迫借钱负债经营。他们经常向商人借钱，而这些人常与他们签订合同购买他们的煤、矿物和金属。这些债务使债权人处于有利的地位，这几乎是经济史上的普遍规律。中世纪，当工人在规定时间不能还债或由此产生的利息时，他们就接管公司。也许债权人以后自己经营采矿。但更经常的是，他们雇用专家来管理公司，或将公司出租给有资金并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无论如何一度独立的创业者成了挣工资的雇工。

到1520年左右，在列日煤矿工人的独立合伙制企业几乎完全被城市商人合伙拥有和管理的小资本企业代替了。更往西与蒙斯（Mons）邻近的地方，开采煤矿与卖煤已经延续几个世纪了。由于类似的压力，工人合伙制企业已经开始解体。在英格兰，泰恩河对面的纽卡斯尔南面和诺丁汉郡附近的特伦特有一些新型的资本主义式的有组织的船队。

在欧洲大陆的几个主要制铁区，一些主要企业都由许多挣工资的人组成，从事挖、运煤烧制木炭以及负责操作鼓风炉、铸炉和锤子。制铁旋转工艺的引入增加了协调作业的数量，同时增加了每道工序所需资本设备的数量。通常地主持有铁矿的股份。但他们经常将企业短期租给附近城镇的商人，这些商人也许组成可转换股份的小熔炼公司，如南赫西的斯马尔卡尔登。

在开采水银、铜和所有其他白银伴生矿物的过程中，以及在银、铜、黄铜、铅的冶炼中，矿工合伙企业和小采邑企业，这一13世纪采矿与冶金业【741】的典型特征，差不多已完全（特别是中欧的工业地区）让位于要求更大资本量的新企业形式。铜矿尤其需要大量资本。因此，中世纪末期，含银铜矿开采业的发展有助于打破13世纪采矿企业的类型特征，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扩大生产的压力下，国家授予了更大的采矿权。单个矿工想完成所有这些

几乎是不可能的。[1] 无论如何，为了更有效地管理，经常将几种采矿权合在一起。

由于对资本的需求不断增长，12 世纪末期和 13 世纪普遍存在的旧式矿工公司被异地股东的新公司所代替。分块数量越来越大。它们被卖给本地贵族和本地绅士、修道士、商人，有时也卖给政府，甚至大学。到 16 世纪初，萨克森和波希米亚的铜矿和银矿被划分为 128 份是常见的事，还有的被划成 256 份、384 份、640 份（至少有一例）。[2] 甚至这些数量惊人的分块有时被进一步细分。

筹集到原始资本后，所有合伙人可共同承担任何附加开支。股息有时以矿石支付，它们在矿井附近被分成不同规模的小堆，每个合伙人一堆。当公司卖掉矿石，或将矿石熔炼为金属卖掉时，股息则以现金支付。企业实际朝着经理和工头管理的方向发展。他们雇用砍柴工、推车工和风箱工在矿井中工作，付给他们工资并监督他们劳动。随着合伙人数量和住在离矿井很远地方的合伙人数量成倍增加，股东要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政策事宜，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15 世纪晚期和 16 世纪早期，每周会议改为双周一次或月会、季会甚至每半年一次会议。有些合伙人甚至连这些不频繁的会议都不来。他们委托一个当地的代理人代表他们的权益并与其他管理人打交道。

尽管允许这种不在产权和矿股广泛分布，但实际上即使在主要的银矿区，规模很大的企业也不多。每个地区一般都有许多彼此竞争的企业。在约阿希姆斯塔尔，主要公司的支薪名单上一般只有 16～32 个工人。实际上还有只有四五个工人的小企业。就目前所知，在宗教改革时期即便最大的采矿公司，与1世纪后大不列颠的大型运煤船队相比也只有少量劳动力，这个时期恰值 1575～1640 年间英国与苏格兰煤炭工业的大扩张时期之后。 【742】

然而，由于资本与劳力的分离，铜矿矿工和一些锡和铅矿的矿工到 16 世纪中期时已经丧失了 12、13 世纪王公与地主给予他们的特权。采矿公司的小矿区的所有者与新采矿技术专家继承了这种特权，只要这些特权继续存在，只要新开发的矿山还能得到新的优惠政策。一些城市由于排除手工业者进入匠师（mastership）行列导致了熟练工人行会的形成。类似地，大量挣工资矿工的产生导致了矿工协会的形成，以维持工资和合适的工作环境。这

① 参见 E. 哥特恩（Gothein）：《论黑林山的矿山史》，载《上莱茵历史杂志》，无赞助，第 2 期（1887 年），第 435～436 页。【74】

② 参见霍普：《施内贝格堡的银矿》，第 149～156 页。【75】

样的协会在弗雷堡15世纪早期就有，16世纪在克鲁什内山脉主要采矿地区也有。约阿希姆斯塔尔和施内贝格堡深感不满的矿工举行了罢工。新的联盟与罢工表明欧洲人在12世纪和13世纪经济发展的第一次浪潮中所形成的产业工人社团已所剩无几。

由此得出斯特里德有关现代资本与劳力的斗争开始于15、16世纪转折时期这一结论未免过于简单。此时采矿社区的分化路径不是两种而是三种。除了挣工资的人和资本家雇主外，还有王室特权持有者。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第三集团在宗教改革前夕获得了巨大的实力和信心。就采矿企业而言，它维持了权力平衡，尽管对冶金企业而言程度有所不同。尽管王公并不能代表挣【743】工资的矿工来反对其雇主，但他们也不愿意私人公司在采矿社区强大起来。王公（希望自己更强大）将那种强势保留给自己。

王公和其他王室特权地主有义务召集有钱的商人或金融家以求帮助。排除井水和除去地下有毒气体和爆炸气体是这些地主的事。他们发现，这些问题交给各团体分别处理比泛泛地交给许多特权团体处理更理想：人们认识到矿井排水实际上只是单一的任务，由单一的排水系统处理起来更为有效。一些文艺复兴时期非常富有的商人给掌握王权的地主（regalian lord）提供帮助以满足其开支。这些富人赞助杰出的艺术家，借钱给国王、教皇和皇帝，提供了驱动长排水沟和建设昂贵的排水机器所需要的大部分资本。富格、韦尔泽和奥格斯堡、纽伦堡、莱比锡以及其他繁荣的德国城市的其他重要商业家族都曾参与了中欧地区的这种创业活动。他们将投资扩大到西班牙和瑞士。相应地，他们从资助排水的矿业公司中接受股份。

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资本与劳力之间产生分离后，大多数繁荣地区矿工的状况如何呢？尽管他们失去了经济独立，德国的矿工仍保持中世纪早期与职业有关的尊贵地位。1556年——当时中欧的工人斗争已经持续了两代——出现了阿格里科拉的著名论文，其中写到"即便是普通工人也不低下"。他掌握了萨克森和波希米亚西部人口最稠密的高度发展的采矿地区的第一手资料。他在约阿希姆斯塔尔做了很长时间的内科医生，那里矿工与雇主的分歧也许和欧洲其他任何地区的一样大。

在高山和峡谷之间，在一些世界上最奇特的风景之间，采矿活动仍然在继续，而且比13世纪更多，并且继续保持传奇色彩，甚至有种征服大自然的魅力。山里人（德国称为矿工）的劳动，也激发了一种勇气和才智，这【744】在战争中被证明是异常宝贵的，也为这样一个好战的民族所特别推崇。在挖掘地下通道的经验的帮助下，1529年从东阿尔卑斯山银矿抽调来保卫维也

纳的矿工与土耳其人进行了较量，并且最终战胜了试图从地下挖隧道进入城市的土耳其人。①

再晚一些，在17世纪的英格兰，一位负责为海军征兵以与荷兰人作战的英格兰关税官员拒绝那些来自纽卡斯尔附近的往船上装煤的船工，说"装这些恶心的东西在战船上弊大于利"②。这样一种对德国采矿居民的态度在宗教改革前夕几乎是不可想像的。在征兵时，德国军官喜欢矿工而不是城市人，甚至农民都不如矿工。中世纪欧洲对银矿的寻找没有将工人团体搞得声名狼藉或使他们像以后的煤矿工人一样被社会遗弃。许多矿工享有星期六晚上的淋浴，特别规律，我们认为这与德国人有关。银本身是一种非常好的东西。采银仍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很光荣的谋生手段。阿格里科拉评论道："矿工的意见比为利润而经商的商人的意见更有地位和尊严。"③

法国和德国的王公往往认为矿主不能与同时代最伟大的富人相提并论。在没收了当时法国最富技能的商人杰奎斯·科尔在里昂和博若莱的含银铅铜矿后，查理七世面临着复兴这些企业的任务。出于这个目的，皇室官员在1454年召集了许多矿工，其中有一些是非常熟练的德国人。他们住着豪华的房子，吃的是各种肉、葡萄酒和水果。20世纪最有野心的工会领导人如果尝过19世纪欧洲富人中非常普遍的美食，都会羡慕不已。④

一些大规模私人企业似乎是在冶金而不是采矿上取得了惊人的进步。生产银和铜的主要企业建筑物与劳力的集中程度显然要比任何单个的采矿公司【745】强。分离铜与银的新方法的发明导致了许多著名冶金工场的建立。这些冶炼场在萨克森、图林根、蒂罗尔、克恩滕都有建立。阿格里科拉在De re metallica中描述了其中之一。它由四面平行的墙组成，最长的为100米，中间有道横墙将它们分成许多不同大小的房间，并有不同价格的设备。这些设备包括许多炉床、鼓风炉、风箱、锤子和锤打机器（大多数由水力）和许多工具与埚，用于金属制备的不同阶段。⑤ 在图林根的格奥尔根塔尔附近的霍

---

① 沃尔夫斯齐格—沃尔夫斯克朗：*Die Tiroler Erzbergbaue*，第393页；列奥波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萨拉·奥斯汀译，伦敦，1905年），第582~583页。【76】

② 内夫：《不列颠的煤炭工业》，第2卷，第151页。【77】

③ *De re metallica*（胡佛版）第24页。比林古西奥也采取同样的观点，即矿工在道德上优越于商人。【78】

④ S. 卢斯（Luce）："De l' exploitation des mines et de la condition des ouvriers mineurs en France au XVe siècle"，载《历史问题评论》，第21期（1877年），第192~195页。【79】

⑤ *De re metallica*（胡佛版），第491~535页。【80】

恩科钦，富格家族建有一个这样的工场，雇用了几十个工人。[1] 在亚诺尔德斯坦，该家族在比亚奇附近还建有另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工场。[2] 银色矿名从几百里以外匈牙利的诺伊索尔运到这些企业冶炼。

也许在欧洲其他地方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的资本和劳力集中程度比得上这些冶炼场，除了托尔法的教皇明矾工场，还有像弗朗什孔泰大区的萨林那样的盐井——那里的房子与淘盘围成封闭的圈，其规模与一个比较大的中世纪村庄一样大——[3]以及船坞，特别是著名的威尼斯军火库。与主要的明矾场、盐场以及大的造船场不同，大的冶炼场是由私人资本家拥有和经营的，而不是由王室统治者拥有或指导。与矿石联系在一起的王权在这些遥远的矿山上几乎是不可能实现。

10.9 王公权力的增长

在主要采矿区没有什么能够像不断增长的王室地主的权威那样更多地限制私人资本家的权力了。中世纪晚期，中世纪的立宪制瓦解。马基雅弗利【746】(Machiavelli) 时代是一个专制的时代。与马基雅弗利同时代的法兰西国王、西班牙国王和皇帝，与意大利和中欧的其他世俗或教会王公一道，开始牺牲所有独立的当局来增加他们自己的权力。矿区越来越实行家长制控制，甚至专制。资本家以及工人必须服从王公及其官员的法律与命令。

采矿公司和紧密依赖采矿的冶金公司的独立性与13、14世纪比起来，更加受到复杂而严格的管理规则的限制。16世纪的前40年，采矿法的颁布达到一个顶点。[4] 任命了更多的采矿官员并且他们的权力不断扩大。1509年，萨克森公爵为新开发的安纳贝格矿场颁布了萨克森法，并且成为德国东部与北部采矿法律的基础。德国南部和中欧的法规一般没有如此全面。但是所有地方的新法规都抑制了私人投资者对采矿、铸造和加工厂投资的积极

① 厄恩斯特·科奇（Ernst Koch）："Das Hütten—und Hammerwerk der Fugger zu Hohenkirchen bei Georgenthal in Thuringen, 1495～1549"，《图灵根历史学会期刊》，无赞助，第26期（1926年），第296～306页。【81】

② F. 多贝尔（Dobel）："Ueber den Bergbau und Handel des Jacob und Anton Fugger in Kärnten und Tirol, 1495～1560"，载《施瓦本和诺伊堡历史学会期刊》，第9期（1882年），第194～196页。【82】

③ 内夫：《物质世界的征服》，第104～106页。【83】

④ 参见施莫勒：《企业的演变》，第979～982页。【84】

性，1517 年的奥地利法规尤其如此。

与王公经常资助的挖长排水沟有关的问题，为王公监督所有的采矿经营找到了借口。[1] 任何排水或通风的计划和挖矿井时用炸药的计划书必须经过王公采矿法官的允许。由王室地主任命的总工程师全权管理。每隔 13 天左右其中一位主要官员就会在一群技术专家的陪同下视察每个采矿公司，以保证法令以及中央矿业管理机构颁布的补充法的实行。矿工和冶金工人的工资和工时由政府制定。为采矿公司和铸造师傅工作的经理与工头需要经过王公官员的同意才能任命。他们可以不经雇主的同意就解除经理和工头的职务，但股东不经王公官员同意不能解除他们自己的经理与工头。

在 13、14 世纪，王室地主任命的官员经常参与合伙制企业。但为了保【747】证这些官员的忠诚，新的规则禁止他们在采矿公司持股。这些官员数量不断增加，因为王公的管理工作扩大了。有的时候，如在波希米亚的科滕堡，官员的数量几乎与采矿区的矿工数量差不多。[2] 许多王公利用采矿公司和购买矿石者对当地私人冶炼厂老板的不满，趁机把所有作坊集中在他们手中。[3] 他们为矿工和熔炼工提供教堂，以及保证所有工人的健康和宗教活动。通过了禁止在工业区卖淫的规则。禁止发誓，这也许是因为惧怕发誓的后果的缘故。

王公和其他王室地主加强了对不断扩大的矿区的控制。真正的指挥机构不再是个别企业，而是统治者的行政机构。到宗教改革时期许多统治者把这些企业视为他们自己的财产，不仅包含稀有金属的矿石还有矿井。[4] 有些企业如位于曼斯菲尔德和戈斯拉尔的企业实际上成了国有企业。

政治统治者对采矿的行政控治不限于德国。这在整个欧洲大陆都是常见的。中欧丰富的银矿资源使得它在这方面尤其突出。法兰西国王也正朝着同一方向进展。15 世纪晚期和 16 世纪早期他们开始在整个王国控制采矿企业。比起中欧的小王国，这里的控制稍难些。地域的大小是有效管理的一个大障碍。而且，法兰西国王还面临着回收并由自己掌握由被分封地主实施的王权的问题，而在德国是分封地主吞没了王权。

但是最终在法国形成了一个皇家采矿管理机构。其大体特征类似中欧较

① 上引书，第 972、976 页。【85】
② 上引书，第 973 页。【86】
③ 参见施莫勒，上引书，第 692 ~ 693 页。【87】
④ 参见 A. 齐查：《13 世纪前德国矿业法》（柏林，1899 年），第 157 页；施莫勒，上引书，第 1018 页。【88】

小领主的采矿管理机构。尽管允许私人土地主在自己的土地和佃户土地上挖矿，但1471年路易十一颁布的法令要求他们在发现矿物的40天之内向他报【748】告，并且说明开采的计划。如果他们不遵守这项规定或者他们不愿意建立自己的企业，皇室采矿管理机构则要将其租出去或直接开采。所有采矿活动，即使地主在自己土地上开采都受皇家采矿管理机构的监督。王公不经主人同意可派专家在私人土地上寻找矿物，他们发现的所有矿井都交由皇家采矿管理机构处理。按照法令，如果王公直接在私人土地上采矿，或租给别人，那么私人地主可得到土壤破坏的补偿费。他们将得到一定比例的回报，超过王公所获收益的1/10。王室特许采矿权的拥有者和他们的工人可免除一般的税收。所有矿区的争端除非涉及地主的财产，都不由法庭解决而由国王的主要采矿官员或由其副职解决。①

尽管1476年巴黎议会对法令稍微做了改变，但主要宗旨没变。在随后的70年里，皇家采矿管理机构偶尔直接组织控制银矿的开采。更通常的情况是将开采权租给王室的亲信，或像德国那样，将公司的股份卖给商人或中间商来筹集采矿的资金。② 结果当然是合并，毫无疑问主要是因为法兰西的银矿比中欧相对少些，部分是因为在中世纪欧洲大国的边远地区监督采矿活动存在着管理困难。但是这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国王对其领土内所有有价值的矿井拥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这一原则的确立。

到16世纪中期法兰西国王对比利牛斯山东部、西班牙内瑟兰德的西部、洛林、弗郎什孔泰大区和阿尔卑斯山都行使王权。在这个王国的每个地方，只有王室才能授予开采权，尽管并非所有的法兰西贵族都愿意允许王室对他们的土地拥有开采权。③ 洛林和弗朗什孔泰大区不是法兰西的一部分，当地【749】统治者也像法兰西一样控制与监督有采矿权者的开采活动。在洛林，公爵对所有来客都开放采矿权，就像中世纪中欧的统治者一样。④

随着欧洲大陆上领土政治权力的增长，王室努力将王权扩大到基础矿物。中欧的几个领主成功地将铁、铅、锡矿与含银或金的矿归为同一类。施蒂里亚、奥地利、上哈尔茨的制铁公司向施蒂里亚公爵、皇帝和不伦瑞克公爵纳税，规则和监督与银矿地区类似。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François*）一

① *Recueil général des anciennes lois francaises*，第10卷，第626~627页。【89】

② 国家档案，巴黎，Minutier central，fonds XIX，liasse 152（与波希米亚的安德列·德·罗赞波克和布鲁塞尔的尼古拉斯·赫尔曼有关的文件，他们是法国国王的管家和金银匠，1539年）。【90】

③ 国家档案，XI A8624，第271~274页（关于矿山及其开采，1560年）。【91】

④ 国家档案，K.876，第14号，洛林矿业，1520年。【92】

世（1515～1547 年）对铁的生产也感兴趣。1542 年，他对整个王国所有铸炉与鼓风炉征税，由王室采矿管理机构征收。

15 世纪晚期和 16 世纪早期法兰西和其他大陆国家对罗马法律的接受有助于统治者扩大王权，这既是因为大部分矿区在罗马帝国晚期属于国有，也因为在所有金属都很稀缺的时候曾经无一例外地对私人土地上的矿产品征收什一税。[①] 这里我们对 12 世纪古典复兴和中世纪晚期的复兴之间的区别作一说明。古代经验的一个方面——通过几个世纪的风俗与传统流传下来的几个地区的行政管理惯例——使哥特时代的欧洲人几乎把相当民主化的自由矿工团体普遍化。古代经验的另一个方面——正式的罗马法，就像法律和帝国文摘记载的——使政治权威增强的时代晚期的欧洲统治者几乎把国家对所有采矿活动的税收权普遍化。

随着文艺复兴时期采矿与冶金对资本需求的增加，特别是银和铜的生产方面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点，即只有精于货币与债务管理的特别富有的商人或者其政治权力和地位源自继承的国王、王公和领主，才能负担得起矿业经营成本。欧洲的采矿与冶金业比其他大工业都更早面临着是由私人资本统治还是由主权当局统治两种选择。在欧洲大陆，至少主要的采矿企业还是由主权当局统治。【750】

这个事实被某些富有商人所占据的显赫地位所掩盖，其中历史学家对奥格堡的富格家族最为关注，至少从一个世纪以前米什莱（*Michelet*）写下有关“银行”的篇章时就是如此。中世纪末期，维持采矿管理的成本耗尽了主权政治当局的资源。他们有时求助于富有商人的钱袋，其中富格家族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借了很多钱的领地王公，不得不通过保证给债权人一定年限内在王室领地上一定比例的税收权来还债。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他们甚至让商人完全负责矿业管理，有责任也有特权，包括有权授予采矿权。这在西里西亚的赖兴斯坦因都曾发生过，在那里王权属于明斯特尔贝格—奥尔斯大

---

① 就如我们现在所知的，罗马法并没有剥夺私人土地所有者对他们土地上矿山的所有权（这点我们可以在上文的第 706 页（原文页码——译者注）上看到）。乍一看，认为中世纪末罗马法的复兴有助于欧洲王公扩展他们的王权以包括基础矿产是相互矛盾的。但是这却是真实的。罗马法的这种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的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在阿肯巴克的著作出版前，欧洲的法理学家大都想当然地认为在罗马帝国，矿产权是与地权分开的。中世纪，那样的观点可能也被法学人士普遍坚持。而这种错误由于伦巴第的注释家对《西奥多西亚民法》和《查士丁尼民法》中有关道路的解释而进一步加强了（参见路维斯：《锡矿山》，第 66～68 页）。而且，罗马法也可以合理地被援引来把基础金属矿和贵金属矿一样对待，因为罗马皇帝对矿产品征收的税收都是没有差别的。参见阿尔冯斯·穆纳尔：《克林、古尔茨和伊斯特伦的铁业历史》，第 195～196 页。【93】

公。[1] 另外一度在罗马帝国起重要作用的阿尔马登水银矿曾租给富格家族经营4年。[2]

因为上述原因，政治统治者对矿井的最终控制很少有人质疑。如果商人失宠，王公总是有可能没收他的财产。1453年法兰西国王查理七世（*Charles VII*, *king of France*）没收了属于15世纪最有名的商人、布尔日的杰奎斯·科尔在里昂山和博若莱山的3个采矿公司，在19世纪的人看来，查理七世的所作所为肯定会被认为是专权、武断的。[3]

[751] 王公、俗人、传教士欢迎商人参与采矿。他们向商人借钱以履行他们的特权。他们甚至与商人分享对矿业管理的控制权。但欧洲大陆的历史发展进程并不利于商人当权，就像18世纪末和19世纪一样注定只能红火一时。至于较量的结果，是残酷的王公而不是商人持有决定权。在一个残暴当政的年代——这种时代在以后的历史中也有出现——王公可以最残暴的方式行使暴力。只是在艺术领域里，人们才可以谈得上有一点真正的独立。所有一切物质的东西都属于王公，那个时候，与西方历史上以往任何时代相比，物质的存在远比思想、信仰、行为等更重要。兰克在有关阿方索二世治下的费拉拉的论著中对王公施加于社会整体以及经济存在的绝对权威进行了令人难忘的描述。公爵将每一点财富都集中在王宫，这个国家非常贫困。他对整个工业的控制扩展到了食物，包括面粉和面包等基本必需品。即便是贵族的狩猎权也受到限制。有一天，6个人的尸体被倒挂在集市上，展示他们的脚上挂着死去的野鸡，据说这些罪犯是在公爵的自留山地上偷猎时被打死的。[4] 在欧洲大陆，不断增长的专制王权使政治统治者的采矿管理机构中商业资本行使的控制权转瞬即逝。到中世纪末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是政治统治者掌管主要采矿公司。

中世纪后期，英格兰与苏格兰采矿资本的独立权在没有以上障碍的情况下建立起来了。亨利八世保留了他的先辈在12、13世纪行使的王室特权。他从王室的矿井中收税并继续派官员看管与保护王室的采矿权。但王室持有

---

① E. 芬克（Fink）："Die Bergwerksunternehmungen der Fugger in Schlesien"，载《西里西亚古代史学会期刊》，第28期（1894年），第308页。【94】

② 康拉德·哈伯勒：*Die Geschichte der Fugger' schen Handlung in Spanien*（魏玛，1897年），第93～95页。【95】

③ 参见皮埃尔·格勒蒙特（Pierre Clément）：《雅奎斯·库尔和査理七世》（巴黎，1866年），第147页及以后，第342～344、420～426页。【96】

④ 利奥波德·兰克（Leopold Ranke）：《罗马教皇的神职和政治史》；列奥波德·兰克：《罗马教皇的教会和政治史》（萨拉·奥斯汀译，伦敦，1841年），第6册，第7章（萨拉·奥斯汀，伦敦，1841年），第7章。【97】

的股份并未扩大，也没有像瓦洛瓦国王那样引入国家采矿管理机构。既没有通过像法兰西1413年颁布的那种允许王室在境内对所有的矿产品征收矿区使用费的法律，也没有通过像法国在1471年通过的那种允许王室派专家去私人领地上探矿的法律。当中欧国家采矿法的颁布达到高峰时，英国没有发布新的采矿法。也未做任何努力去控制从王室获得开采权的私人公司的开采活动。尽管王室对王室领地上的珍贵金属和矿井有控制权，尽管它保留了王室家族对德文郡和康沃尔郡锡矿区的控制权，但在其他地方基础金属矿井和矿物却由私人地主处理。 【752】

大不列颠的金银矿资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6世纪晚期以及17世纪，王室卖掉了许多皇室邑地。英国矿井在欧洲采矿历史上再也不像中世纪一样占统治地位。由于以上三个原因，英国王室在采矿问题上的权力越来越小，尽管它曾扩大到整个欧洲大陆。12、13世纪，英国国王对采矿的控制权力大于法国王室，而在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时，实际上远弱于法国。

中世纪英国与欧洲大陆采矿历史的这些差异对现代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它们有助于使得与英语国家相关的自由经济企业体制成为可能。如何解释15世纪晚期及16世纪期间英国国王效仿许多大陆统治者采取的措施并且试图增加采矿权力的失败呢?①

大不列颠缺乏含大量贵金属的矿石和矿井——被普遍认为是王室财产——这一事实毫无疑问成了绊脚石。中欧丰富的稀有金属矿井使得王公能够对许多地区的矿井进行控制。当有机会将王权扩大到基础金属矿井时，行政管理的形式是相当容易的。再有英格兰的规模也是个不利因素。尽管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大不列颠是个小岛，但16、17世纪英格兰与威尔士的面积比中欧大部分王国都大。中世纪后期帝国内部的主权分割使这里比英格兰更容易强化随主权而来的王权。在那个旅行和交通缓慢使统治遥远地区更加困难的时代，这种分割使国土面积缩减至可以管理的规模，使得一个单一统治者能够对矿井施加控制，并可相对容易地维持一支由服从命令的官员组成的管理队伍来实施他的权力。 【753】

但对英格兰与欧洲大陆采矿王权的历史差异，这样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幅员比英格兰大，稀有金属比英格兰缺乏，但这些都没有阻止法兰西加强王权。两种法律情况的差异对英格兰在中世纪晚期采矿法的发展中占

---

① 对这一课题的展开，可参见J. U. 内夫:《1540~1640年的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工业和政府》(伊萨卡，纽约，1957年)，第5~12页。【98】

有的特殊地位给予了更恰当的解释。英格兰的君主政府比任何欧洲大陆国家都更早地集权化，皇室企图占为己有但未得逞的臣民个人财产通过英国议会获得了更大的豁免权，此时英国议会的效力比欧洲大陆任何一个统治机构都大。

11世纪后期及12世纪，中世纪的立宪制非常强大时，在英格兰完成了最高统治权的集中。这使得代表商人利益的中世纪议院在英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成为政府机构的基本部分。在中世纪法官有效地恢复帝国罗马法允许替代那套体制以前，早期的中央集权已经使得有必要建立一套适合整个王国的法律原理体系。[①] 在威严的罗马法律中，君主的政治权威比11、12世纪欧洲的法律惯例更具有支配地位。

英国王室早期的权力有限，行使王权有固定的限制，与大多数欧洲大陆统治者的王权相比，他们的权力更不灵活。部分是因为普通法的发展，英国国王无法利用15世纪后期以及16世纪早期罗马法的复归，像许多欧洲大陆统治者那样对所有的矿产行使王权。在欧洲，大封臣地在封建时代的权力一般比中世纪后期的大。英国议会和英国普遍法的早期权力有助于地主保持他们的财产权。

如果英格兰采矿与冶金的重要性发展得与大陆一样快，如果都铎国王亨利七世和八世不是面对着一个由律师与富人组成的议会——抵制侵犯他们所代表的财产权——他们也许像法兰西的国王一样，倾注精力，将权力扩大到【754】矿井。早期的都铎诸王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力时表现出极大的技巧，当时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认为国王的意志在处理政务时是至高无上的。按西班牙大使的说法，亨利七世表达了“使臣民低下，因为财富使他们傲慢”的愿望。[②] 即使英格兰商人的价值与中欧商人一样明显，他也不可能比其他欧洲大陆统治者给商人更多的自由去支配矿井。他的儿子亨利八世外出尽力筹集资金。如果他不参与采矿的话，极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参谋们认为那并不重要。在处理产权问题时，他遇到了议会的强烈阻挠。而且，议会的反对并非没有效果，就像它在1536年成功地反对解散小修道院以及在1539年使国王提出的《法律声明（Statute of Proclamations）》尽管最终是得以通过实际上变得毫无效力一样。

稀有金属在中世纪16世纪以前仍是欧洲采矿和冶金的主要对象。大不

① 参见C. H. 麦克维恩（McIlwain）：“中世纪的庄园”，《剑桥中世纪史》（剑桥，1932年），第7卷，第709~714页。【99】

② 《1485~1509年的西班牙国家日志》，第177页。【100】

列颠缺乏稀有金属，但贱金属（*base* metal）与煤都很丰富。也许部分地是因为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英国采矿的发展非常慢。宗教改革前夕，在德国矿工帮助下探寻银矿的结果让人失望。1470～1540年英国锡的产量仅增长60%或70%，[①] 而中欧的金属产量却增加了4～5倍。这种微量的增长难以补偿15世纪前半期英格兰产出的下降。德文和康沃尔的锡在中世纪的欧洲大陆市场上保持的统治地位受到西班牙、波希米亚、巴伐利亚和萨克森锡矿发展的威胁。约1518年，仅萨克森生产的锡就是英格兰的1/3。英格兰铅在海外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539年托马斯·克伦威尔的一个信使将英格兰的铅矿描述为"死矿"。[②] 直到修道院解体以后，采矿与冶金主【755】要由小公司进行，这些小公司采用了13～14世纪欧洲大陆流行的采矿方法。在许多欧洲国家冶金业大发展的时候，英国冶金业的这种萧条有助于保持矿山向不受政府干预的私人采矿公司开放，虽然此时国王非常强大。之后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英格兰的煤炭工业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到那时为止，王室权威已经如此脆弱，以至于国家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这种控制，虽然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内行之有效，但对此时的英国已没有什么可行性了。[③]

英国国王仍然持有早期继承的相当大的采矿权。当王权的扩大以牺牲英格兰有效的政治权力为代价时（其牺牲程度比欧洲大陆更严重），许多条件都阻止这种权力的膨胀。[④] 当煤矿与铁矿代替金和银成为主要地下财富时，英国国王利用中世纪法律而获得的资源顿时化为虚有。

10.10　向现代的转变

在中世纪末期，欧洲大陆采矿与冶金业的快速发展显示出一种病态。美洲南部和中部富银矿的发现，特别是1546年玻利维亚著名的波托西矿井的开挖对欧洲银矿工业是个极大的冲击。在工艺纯熟的德国、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工程师与技术专家的帮助下，新世界的财富可用笨重的西班牙帆船运往欧洲，相比之下，萨克森、波希米亚、蒂罗尔、匈牙利、西里西亚的熟练矿工

① G. R. 路维斯：《锡矿山》［剑桥（马萨诸塞），1907年］，第253页。【101】
② 高夫：《蒙蒂普的矿山》（牛津，1930年），第65页。【102】
③ 内夫：《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工业和政府》，第149页及以后。【103】
④ 也可参见内夫在《不列颠的煤业的崛起》第1卷，第267～285页中的讨论。【104】

开采熔炼矿石并运送所制成的金属的成本要高得多。尽管西里西亚、弗雷堡和德国戈斯拉尔的几个采矿区在16世纪中期继续繁荣，但中欧大部分地区以及阿尔萨斯和瑞典的金银产量开始下降。

50年后，这种稀有金属产量的下降非常之多。"三十年战争"（1618～【756】1648年）几乎使中欧采矿一度陷入僵局，银的年产量也许不到16世纪20、30年代的1/3。[①]即便在瑞典——与大多数中欧国家不同，它在宗教改革之后的几百年战争中不衰反盛——17世纪中期最好的年份银的产量也几乎不到16世纪40年代的一半。[②]

中世纪末期，欧洲大陆采矿业的发展停留在12、13世纪银矿繁荣期的水平上。欧洲白银市场的瓦解使得铜矿和铅矿大幅贬值。其他矿业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16世纪末期以前，欧洲大陆铁的生产与煤矿业的快速发展期结束了。[③] 因此，事实证明，中世纪末期工业革命的迹象仅是假象而已。矿业产量的显著增长和一些重工业的发展仅在百年战争与16世纪中期的宗教战争开始之间持续了较短时期。直到200多年以后，欧洲大陆工业的发展才与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一样快。

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有导致那种使富有的工业文明注定要主宰19世纪整个欧洲大陆的矿业和冶金业的发展呢？为什么在相当深度的铜矿井用来排水的新机器和通风机没有在欧洲大陆的锡、铜特别是煤矿中广泛采用，就像16世纪末和17世纪在大不列颠那样？

宗教改革之后欧洲大陆上的战争更具毁灭性，对重工业越来越具有破坏性。[④] 英国修道院和其他宗教基础的解体有利于急于探索矿物资源的私人地主和商人。[⑤] 但在欧洲大陆的采矿区，宗教斗争的过程有所不同，并且教堂【757】占有很大一部分土地财产。一些宗教人物因政治权力而拥有王室特权。教主比起世俗地主来更不大愿意投资于采矿与冶金，不愿意像他们那样以有利的条件租出去。再一次，山区交通的自然困难及无数的税收和通行税阻止了欧

---

① J. U. 内夫：《1450～1618年中欧的白银生产》，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49期，第4号，1941年，第589页。【105】

② 伊来·F·赫克歇尔（Heckscher）：《瑞典经济史》（斯德哥尔摩，1936年），第2卷，第439页。【106】

③ 在施蒂里亚，铁产量在16世纪欧洲大陆中期几十年达到了一个顶点。1601～1625年英内堡—埃森内兹每年的生产比1536～1560年的平均产量要低得多（比特尔："Das Eisenwesen"，第490、629～629页）。在齐格兰德，铸造场到16世纪晚期减少了一半。［理查德·乌奇（Richard Utsch）：《齐格兰德的铁矿和冶铁业的发展及其经济意义》（古尔利茨，1913年），第34页］。【107】

④ 参见内夫：《战争和人类进步》，特别是第1部分。【108】

⑤ 内夫：《物质世界的征服》，第5章。【109】

洲大陆采矿的发展。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统治者在中世纪末期确立的对矿井与矿业公司的庞大权力阻碍了私人公司的发展。

宗教改革时期，在为采矿和冶金提供指导方面，政治考虑往往超过经济考虑。尽管这有助于欧洲统治者加强他们对其臣民的统治，但总体来说不利于工业发展，至少不利于像铁和煤这样的产品产出的增长，① 而现代工业文明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它们的充裕供应的基础之上。② 只是到了 18 世纪和 19 世纪，法兰西和德国先后修订了矿业法律使得政治环境更利于私人资本家创业之后，③ 两国的矿产量才再一次出现迅速增长。

在开采白银资源方面，欧洲人的先辈曾经开采了西班牙和所有地中海的表层矿藏，后人仅仅是跟着他们的步伐前进。如果欧洲人像古代人一样没有开采铁矿和煤矿，或像中国人一样在开采煤和铁的初期就放弃了，他们就几乎不能创造 19 世纪晚期的工业世界，这样一个世界为那些以物质衡量幸福的人似乎送来了太平盛世的味道。【758】

如果没有美洲，没有拥有丰富的矿业资源和勤劳的北欧地区人民，世界将会怎样呢？这个问题似乎超出了我们研究历史的范围。④ 但可以肯定，现代早期重工业的发展并不是发生在那些领导中世纪文明生活趋势的欧洲国家里。这种文明化过程在瑞典、荷兰，尤其在大不列颠都发生了。所有这些国家因种种原因都未遭受宗教斗争和实际的战争。所有这些国家部分地由于这些有利条件，都确立了立宪制政府的传统，而这促进了在开发自然资源方面的私人兴趣。⑤

---

① 参见内夫：《工业和政府》，第 68 ~ 76 页。【110】

② 已故的斯特赖德教授做了许多的努力，试图在德意志王公与商人之间建立一种合作关系，以此作为解释德意志和中欧在 15 世纪晚期和 16 世纪早期采矿和冶金极大扩展的一个因素（《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发展史》，第 2 版，第 362 ~ 363 页）。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有点本末倒置。正如伊纳马—斯特雷格（Inama-Sternegg）所指出的，就早期德意志造盐业的进步而言，不是王公的控制导致了这种扩展，而是这种扩展导致了王公加强了对它们的控制。"Soist schliesslich mehr von einer Beforderung des Regalitätsgedanken durch die Entwicklung der Salinen, als von einer Beförederung des Salinen wesens durch die Entwicklung der Regalitätzu sprechen." [K. T. 冯·伊纳马—斯特雷格："Zur Verfassungs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alinen im Mittelalter"，《皇家科学院会议报告》，第 111 期（1866 年），第 578 页]。奥托·修（Otto Hue）发现这些评价适用于德意志的采矿业。"Dieselbe Wechselwirkung vollzog, sich auch zwischen der Bergbauentwicklung und der Ausdehnung de Bergregal anspruche" [《矿工》（斯图加特，1910 年），第 1 卷，第 93 页]。【111】

③ 马歇尔·罗夫（Rouff）：《法国的煤矿》（巴黎，1922 年），尤其是第 1 部分第 2、4 章和第 63 ~ 64 页；施莫勒：《企业的演进》，第 1027 ~ 1028 页。【112】

④ 对这个主题的考察，可以参见内夫的《工业文明的起源与当代世界》，第 4、5 章。【113】

⑤ 参见内夫：《工业和政府》，尤其是第五章。大不列颠的地理孤立及和平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可参见内夫：《战争和人类进步》第 1 部分，至于宗教改革和教会财产转到私人手中的影响，可参见内夫：《物质世界的征服》第 5 章。【114】

许多节省劳动力的发明都是在中世纪 8 到 16 世纪这一时期内在欧洲发明的。[①] 尽管中世纪技术进步提高了效率，但我们不应忽视中世纪欧洲人以惟美为目标的技术创新理念。现代人们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在工业产品的多用途上，因为通用性是中世纪欧洲技术的特点。艺术与工艺的杰出性作为发明的主要目标在宗教改革时代又一次得到证实。莱昂纳多·达·芬奇（1452～1519 年）以及卡帕乔、吉乔吉翁、蒂希安时代和拉斐尔、米开朗琪罗、杜尔和年轻的霍尔贝因时期，以及弗兰克斯·克劳特、老皮特·勃鲁盖尔（1520～1569 年）时期人才辈出，天才的发明层出不穷，促进了印刷、雕刻和其他观赏艺术以及各种各样的装饰工艺品的出现。1460～1540 年间，由于欧洲人开始在全球所有大陆殖民，他们为一个物质丰富、极端享乐的经济奠定了基础，而这在巴洛克时代达到顶峰。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16 世纪中期的北欧尤其是大不列颠即将迈进一个煤炭业经济。这种经济在 16 世纪晚期和 17 世纪人们才认识到。[②] 它伴之以并继之以中国曾经开始但没有继续下来的技术革命。与早期中国人的努力不同，现代不列颠的早期工业革命导致了对物质世界的惊人征服，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仍在挑战着人类。

【759】

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使用和增加铁产量的技术发明（这明显已被中国人忘记了）以后很久，欧洲人从他们祖先放弃追求的地方重新起步，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一段很复杂的历史，我们仅知道其中的片段。但提几点看法并非是毫无根据，因为这个课题如此引人兴趣，而且如我们的看法所显示的，我们这章所讨论的采矿与冶金的历史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

在知识与文化史中，至少有三项改革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工业化的到来，因为在中国及其他早期社会中并没有发现类似的东西。在大不列颠工业革命早期即 16 世纪晚期和 17 世纪，所有这些发展在其开始发端时人们就认识到了。在 200 年后的 18 世纪末期，[③] 产出和人口的增长率以几何级数跳跃增加，它从大不列颠等地开始，然后遍及整个世界。第一就是一种定量思维（quantitative mentality）开始在欧洲人当中出现，它比任何早期社会都强烈。[④] 第二是这种定量思维导致的现代科学的崛起以及新的科学调查方法的

---

① 参见林恩·怀特：《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改变》（牛津，1962 年）。【115】
② 参见内夫：《不列颠煤炭业的崛起》（1966 年重印）。【116】
③ 参见内夫：《战争和人类进步》，第 15 章。【117】
④ 参见内夫：《工业文明的文化基础》，尤其是第 1、2 章。【118】

诞生。这些新方法[1]揭示了物理和生物世界的新方面，随后这种新知识的实际应用导致了医药和外科学的革命性发展以及工业技术、交通运输技术的改革。第三个发展是文明行为（gentle manners）与漂亮的家具和装饰品及其他舒适的用品（从餐具到乐器）逐渐进入了欧洲人的家庭。政局的风云变幻（其中包括有限的战争），导致了中世纪作家创造了“文明”这个词来描绘这个世界。这种发展有助于在一些高智力而又有影响的欧洲人中间产生新的乐观主义，这些人在历史上第一次达成这样的信念：人性的善可以战胜恶。乐观主义使科学家相信，只要有良知他们可以把每一个革命性的科学发【760】现的实际用途利用到极致。[2]

现代早期的这些发展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国家。它们遍及欧洲，而且这种乐观主义将在整个北美洲的居民中散播。然而，尽管 17 世纪后期和 18 世纪的欧洲人在某种程度上不断有着新的理性的憧憬和希望，尽管主要起源于欧洲大陆的巴洛克商品经济促进了它们的发展，但宗教改革之后大不列颠煤炭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这个孤岛成为技术革命的策源地，而早期社会曾与之失之交臂。如果说 8 世纪到 16 世纪欧洲人展示的发明技能导致人们对物质世界的征服，那么数量目标必须预先进入人们头脑中，人们也必须比以往更加努力地致力于减少生产、航运、交通的成本，以及致力于延长人的寿命的发明。在采矿和冶金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的欧洲大陆，在中世纪末期，不像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时代的大不列颠那样有利于这种优先地位和集约开采。

如果没有采矿与冶金业所导致的变化，欧洲的工业化能否取得成功呢？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但同样肯定的是，采矿与冶金所导致的改变为工业化的成功开辟了道路。【761】

---

① 参见内夫：《物质世界的征服》，第 7 章。【119】

② 参见内夫：《美国和文明》修订版（芝加哥，1967 年），第 2 章，第 4 页；《文化的基础》，第 5、6 章；《文明、工业社会和爱》，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桑塔·巴巴拉（Santa Barbara），加利福尼亚，1961 年。【120】

第十二章

中世纪西欧的石材建筑

自沃纳·松巴特（Werner Sombat）呼吁人们开始研究建筑经济史以来已过去好多年了，其间虽然有一些关于特定的建筑和国家的引人注目的研究，但把中世纪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① 一个主要的困难是重要资料的匮乏，尤其是中世纪早期的资料。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虽然有用，但是它们只不过是提出了考察者必然要问的那些问题，此外并无更多作用。而解答这些问题需要的是有关建筑方面开支的必要记录。遗憾的是，那些与重要建筑相关的资料，比如，14 世纪早期法国皇室和教会的大型建筑的资料，很多已经不复存在了。② 有关各国风格不同的建筑的大量数字只是零星地残存下来；也许现存的最充分的系列资料是关于英国王室的一些工程的数字。它非常宝贵，因为不仅仅包括简要账目——从中所得到的信息相对较少——还包括详细记录，甚至一些周报表，在给工人支付工资时也谈到了他们的名字以及有关采购的丰富细节。理想的资料汇集——它们非常珍稀——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伦敦桥的账目；它对在几个世

---

① 《近代资本主义》（慕尼黑和莱比锡），第 2 卷（1921 年），第 772 ~ 773 页。【1】

② 参见兰洛伊斯（Langlois），第 5 章，载 E. 拉维塞（Lavisse）主编：《法兰西历史》（巴黎，1901 年），第 3 章，第 2 节，第 417 页。【2】

纪里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一个月一个月的活动都有记载，有同一机构有关工资和价格变化的宝贵记录。其他的记录——在缺乏账目的情况下尤其珍贵——是出资者和工人之间的合同，是世俗当局和教会权力机关为他们的雇工立下的规则。

对从13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丰富完整的账目的研究表明，不管建筑风格怎样变化，与建筑有关的基本经济问题和管理它们的组织，在西欧的主要国家都非常相似。显然，像存在于13世纪的凯纳文城堡（Caernarvon Castle）、【762】14世纪的博韦斯（Beauvais）、15世纪的伊顿（Eton）的这种组织与许多中世纪工业中盛行的组织有所不同，后者的生产一般受资源和各自国家的手工业者或城市行会控制的集市的限制。我们将努力通过依次考察以下几个问题来弄清这个行业的特点：（1）建筑的动力；（2）一些重要的技术改变；（3）主要的供应问题；（4）管理系统；（5）师傅和主要建筑行业普通工人即砖石匠的组织和状况。

11.1 对建筑业的需求

封建状况对建筑业是一个重要的刺激，不论是直接地通过其自身还是间接地通过试图改善或推翻这种状况的努力。每一个有采邑需要保护的人都需要一个设防的地方，其数量虽然无法准确地知道，但肯定达到数以千计。无疑许多据点都容易被摧毁，在君主强大时封建据点也有可能减少；但它们极易再次建设起来。而且，它们的存在意味着攻击的武器和防守技术之间连续不断的竞争，在这一过程中，防护墙必须越建越高，手法必须越来越复杂，防卫范围越来越大，城墙和塔楼在形状方面不断改变并且越造越坚固。比如，兰雷斯（Langres）城堡的城墙有21英尺厚。[1] 君主为了对付邻国或是强大的封臣或是为了扩展他们的领土，需要类似的措施。因此，瑞士人在谢弗哈森（Schaffhausen）建立起了一些强有力的棱堡，北威尔士人建立起巨大的爱德华（Edwardian）城堡，为了保卫诺曼底，在勒斯·安德莱斯勒斯（Les Andelys）建立起宏大的理查·科尔·德·莱恩（Richard Coeur de Lion）工事，这个工程包括横穿半岛的4 000码防卫墙及2英里的塔楼。[2] 国

---

① 瓦奥莱特—利—杜克（Viollet-le-Due）：《军事建筑》，（英译本，牛津和伦敦，1879年），第185页。【3】

② 瓦奥莱特—利—杜克的计划：上引书，第82、85页。【4】

王和封侯，不管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所在的城镇必然要加上防御工事。这些城镇许多最初是由建立它们的领主用围墙围起，有些——像在法兰西南部的许多城堡一样——并不很大。比如，爱格斯—莫特斯（Aigues Mortes）和卡尔卡索纳（Carcassonne）方圆不超过1英里。富裕的自治市需要得更多一些；【763】14世纪的维罗纳（Verona）城防延伸了2.5英里。① 在同一世纪，纽伦堡（Nuremberg）变得那样富饶而人口繁盛以至于它的两个大教堂不得不扩大，新的防卫城墙也得重新建设，这就是延伸了4英里的双层城墙护卫。总之，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和德意志几百个城镇的军事需要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对砖石工程的需求。

中世纪对建筑业的第二个巨大刺激是宗教。每个教区都需要有教堂，往往是石头建的。此外，还有修道院以及附属教堂、宿舍和其他建筑物，正如9世纪圣高尔计划所显示的一样，有时是一种非常大规模的建筑。随着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其他入侵的停止，形势对重建被毁教堂和扩展修道院有利，尽管这种活动有时受到圣伯纳德（St Bernard）道德原则的限制，但最终甚至在西多会（Cistercians）修士那里，也一样搞得规模巨大甚是辉煌。从11世纪开始——但更多地在12世纪——主教不遗余力地重建和扩大他们的教堂。教堂建设也为城镇蒸蒸日上的商人阶级提供了一个花钱的渠道和获得精神美德并显示地方自豪感的机会。布商托马斯·斯柏林的第二代、第三代对拉文汗尖塔的捐献就是这种慷慨的例子。在这之前，在低地国家、汉萨同盟和意大利北部的城镇，他的同行就已多次以比这或大或小的规模都这样做了。在城镇，也像在城外一样，建筑风格的改变为建筑工匠创造了很多的工作机会。一旦哥特式风格流行开来，大主教和其他人就较容易被说服——再加上急于从事新的工作的师傅从旁协助——相信那种老式教堂是不安全的。那样的话它就很可能被拉倒，重新翻盖，使之像13世纪的奥克塞雷（Auxerre）大教堂一样，极具漂亮和时髦的特点。②

其他影响建筑需求的因素是人口的上升以及城镇和其他富裕阶级对舒适的渴求。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建一座房子所需的时间相对就很少，而且一个地方木匠茅屋匠就足以担此重任。而为城镇居民盖房就是一个慢活儿，这可以从巴扎斯（Bazas）、索沃泰（Sauveterre）（吉让德）和一些其他的城堡式的城镇的规章中得到证明，它们要求每个居民在第一年完成他的住房的1/3，

---

① A. M. 艾伦（Allen）：《维罗纳的历史》（伦敦，1910年），第229页。【5】

② V. 莫特特（Mortet）和P. 德萨姆普斯（Deschamps）：《与建筑等历史有关的资料汇编》（巴黎，1911年，1929年），第2章、第15章第203页。【6】

第二年完成2/3。① 在其他一些更大的城镇，为了满足人口增长和维修的需要，无论如何必须有一个工匠组织；但在许多城镇更多的是需要木匠和抹灰匠而不是砖石匠。多埃（Douai）的城市记录就经常提到 *Plakeurs* 即粉刷匠，他们不仅受雇为家庭住宅工作，而且也要为公共建筑工作。② 在卡昂（Caen）这个采石中心，15 世纪和 16 世纪早期盖的都是木头房子。③ 在汉堡，石头房子在 1350 年前很少见，直到 1460 年石板才开始代替茅草。④ 【764】

在农村，并不是每座住宅都是一个堡垒。加洛林（Carolingian）贵族喜欢农村的住宅，虽然这些住宅在 9、10 世纪的入侵中被毁坏，但这种偏好却保留了下来。英格兰和在法兰西的几个地区有很多大庄园的宅第，虽然形势不利，但它们仍然建立了起来，而且从 12 世纪开始，人们更多地考虑住房的舒适和方便而不是安全防卫功能。到 15 世纪，大庄园的宅第数量更多了，在它们的正视图上，门和窗占了更大的空间；到 16 世纪，尽管护城河和塔楼仍作为装饰和富贵的象征，但是它们仅是名义上的城堡了。⑤ 城市住房由城墙保护，可以更少地考虑安全问题。确实，在法国的一些城镇仍有设防的贵族豪宅，⑥ 意大利北部城市满是私人城堡——据说维罗纳一度有 700 座城堡，小城圣吉米格纳诺也不下 300 座——形状如塔，有时高 200 英尺，是由住在城里相互厮杀的贵族修建的。⑦ 在别处，贵族和高级教士住房首先要考虑舒适，虽然他们也会考虑到雅致。除了城墙、居住区和教堂外，城市也需要公共建筑，特别是市政厅，它的底层通常作为集市，上几层被用于行政、司法和社会目的。钟楼往往在同一建筑上。在低地国家、法兰西、德意志特别是在意大利［比如 1289～1309 年建的锡耶纳（Siena）市镇大厅］至今尚存的建筑表明市中心通常是人们引以自豪的建筑物。【765】

---

① T. F. 陶特（Tout）：《中世纪城镇规划》，载《论文集》（曼彻斯特，1932～1934 年），第 3 卷，第 71 页。【7】

② C. 恩拉特（Enlart）：《法国考古手册》，第 2 章（军事与民用建筑）（巴黎，1902～1916 年），第 186 页。【8】

③ H. 普伦陶特（Prentout）：《卡恩和巴约》（1921 年），第 48～49 页。【9】

④ W. 莫林（Möring）："Die Wohlfahrtspolitik des Hamburger Rates im Mittelalter"，载《中世纪和近代史论文集》，第 45 章，第 57～58 页。【10】

⑤ 恩拉特：上引书，第 2 卷，第 189～195 页。【11】

⑥ 莫特特和德萨姆普斯：《著作汇编》第 1 章，第 52 节。【12】

⑦ M. V. 克拉克（Clarke）：《中世纪城市共和国》（伦敦，1926 年），第 60～61 页。【13】

第十一章　中世纪西欧的石材建筑

11.2 技能及其变化

在各种建筑的需求得以满足之前，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有关经济和行政的方面的问题将在后面讨论，先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些技术问题上，而历史材料对这个问题几乎没有涉及。就我们所知，中世纪的建筑家和工程师并没有成文的概要和手册就有关材料力度和其他有关事项作一广泛而准确地说明，而这现在被认为是专业课程的必要部分。但是，毫无疑问，技术知识的主体是存在的，想成为建筑师的人也很可能要向专家们咨询请教。例如，1416年在赫罗纳（Gerona）大教堂召开的全体会议，就曾召集从其他教堂来的11位专家来探讨一个石匠师傅提出的建设单跨的没有侧廊列柱支持的中堂的方案。所有专家都同意这个计划在安全性能方面的可行性，并且其中的4位专家同意这位师傅的意见，认为这样做比另一种方案更合适。主教和教士大会，在讨论了这些回答后，决定建一单跨的中堂。① 由于中世纪建筑师对打桩奠基的知识十分熟悉，因此在建筑地址选择和建筑安全性方面也咨询他们的意见。② 虽然在操作中也会犯错误，有时也会对教堂的中心塔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砖石匠和采石工人懂得石头裂开的纹理及如何将石头嵌入建筑物中的知识，他们也懂得垂直穿过与墙同厚的柱石的必要性。建筑工人也知道用滑车和辘轳来提升东西，③ 他们能按照需要在施工架上建一个倾斜的车道，重石由此就可以被滚上工程的顶端。④ 基本的测量和计算能力也被广泛掌握，在测量和选址，奠基，准备计划、估计和验证工程中得到广泛地使用。因此西蒙师傅（Master Simon）这个几何学专家——大约在1200年负责阿德拉斯（Ardres）城堡的初期工作——为市政大厅方形基座的建筑工作忙个不停。约在1164年彼得——这个安德雷斯的修道士——在建筑中亲自参加伐木和砌石等涉及到几何符号的工作。⑤ 窗饰和圆拱顶的建筑要求用现代

【766】

---

① 该文献来源于，G. E. 斯特里特（Street）：《西班牙的哥特式建筑》（伦敦和多伦多，1914年），第2卷，第319页及后。【14】

② 莫特特和德萨姆普斯：《著作汇编》，第2卷，第204、237、269页。【15】

③ 一个13世纪的图解复制于D. 努普（Knoop）和G. P. 琼斯（Jones）：《卡那封和比马里斯的城堡建筑》见 *Ars Quatuor Coronatorum*，第45期，1932年，第17页；有可能的话，参见 *ingenium ad levandum lapides*，包括了一个1298年卡尔卡松（Carcassonne）的财产清单（莫特特和德萨姆普斯：《著作汇编》，第2卷，第327页及以后）。【16】

④ 瓦奥莱特一利一杜克：《军事建筑》，第112页。【17】

⑤ 莫特特和德萨姆普斯：《著作汇编》，第1卷，第390页；第2卷，第190页。【18】

的词来说有几何学方面的知识，不论在设计和执行都是这样，而且无疑中世纪建筑师有绘制必需的几何图的能力。[1] 这是可以证明的，因为有支付给工程师制图费的记录，同时也有关于木地板、砖和板条上对角线的记录，其目的为了精确地安放砖石匠和木工完成的部件。从13世纪开始在羊皮纸上绘制的建筑图案就有遗留下来的；其中的22件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教堂保存着。

当建筑师们不断地把注意力从木材转向石头时，建筑业的重要变化开始了。石头建筑的艺术并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而完全消失。工匠们在7世纪的西班牙为韦西哥特（Visigothic）国王建了一座漂亮的教堂。[2] 在遥远的维尔茅斯（Wearmouth），本尼狄克·比肖普（Benedict Biscop）大约于675年利用从高卢来的工匠盖了一座他喜欢的罗马风格的教堂。[3] 但是在西欧，一般地说那时石头不是主要的甚至不是一种普遍的建材。在许多地方木材仍堆积如山；砍伐和加工木材比去采集和凿打石头更容易；而且，至少在日耳曼移民中，使用木材是长期沿袭下来，有许多石头不能取代的用途。因此，它被用于工场、桥梁、防御工事、教堂和贵族的厅堂，其中有些厅堂相当巨大，比如在1060年在阿德拉斯所建的那种厅堂。[4] 为了这些目的，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利用木材，而且在不同的国家让位于石头的时间也不一样。在法兰西，这种代替在10世纪最后25年才开始大规模进行。[5] 11世纪，石头逐渐地不仅用于建造教堂也用于建造城堡。[6] 英格兰的发展与法兰西同步，但在偏远的苏格兰木建城堡直到15世纪才完全让位于石建城堡。[7] 应该注意的是，尽管出现了这种转变，人们仍然需要大量木材，用于脚手架、建构拱形结构、门、屏风和隔离物；在不采用穹隆顶的地方，则用于横梁和屋顶的其他部分。【767】

另一种变化其影响也很深远，那就是穹隆顶的改良，这一发现在法语中称作 *la voûte sur croisée d' ogives*，是哥特式风格的主要特色。像早期的穹隆顶一样，它的优点在于不需要木材作原料因而也减少了发生大火的危险，而

---

① 对中世纪的绘图，可参考C. 恩拉特：《建筑学手册》，第1章（宗教建筑），第65页。【19】

② B. 比文（Bevan）：《西班牙建筑史》（伦敦，1938年），第10、11页。【20】

③ 普卢默（Plummer）主编：*Bedae Venerabilis Opera Historica*，（牛津，1896年），第1卷，第368页。【21】

④ 莫特特和德萨姆普斯：《著作汇编》第1卷，第183页及以后。【22】

⑤ 上引书，第33页。【23】

⑥ 上引书，第33章。【24】

⑦ W. M. 麦肯齐（Mackenzie）：《苏格兰中世纪的城堡》（伦敦，1927年），第4页。【25】

且这些改变使建筑的革命成为可能。它能横跨的空间极大地增加了；穹隆顶的中心能够顶到很高的高度；而且有可能安全地提供更多的窗户空间，因此建筑采光也更充足。实际上，由于巧妙地利用拱壁，石头建筑在13世纪后半期被法兰西的建筑师推到了极限，比如博韦斯的圣彼得教堂唱诗班的席位提高到150英尺。如M. 朗格卢瓦所指出的，这一高度只有现代采用钢铁的建筑才能超越。[①] 新式穹隆在12世纪早期的达勒姆（Durham）大教堂和在1100～1120年某个时候的格洛斯特已开始使用。与此同时，它在诺曼底、皮卡第和法兰西岛也广为人知，在那里得到可能的完善，从而使哥特式风格真正地被建立起来。[②] 在1160年和1180年间，这种新的风格在勃艮第的弗泽莱（Vézelay）得到完整的体现，在1220年前它传到了图卢兹和意大利的卡萨马里（Casamari）。对德意志而言——在那里它被称作哥特艺术——它的出现要晚一些，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263年海德堡附近的温普芬教堂建筑。但是法兰西的影响传播到比这更远的地方；在布尔戈斯、托莱多、科隆、班贝格和瑙姆堡，甚至还有乌普萨拉和塞浦路斯都可以见到；至少对其中有一些地方而言，这种扩展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法国建筑师和工匠移民。

11.3 材料和劳动力的供应

除了对任何一件建筑工程必须做出的安排外，那些负责中世纪建设工作的人还得应付下列因素所带来的特殊困难，那就是偏远、紧急状态和规模。比如，修道院一般建在偏远的地方；堡垒，就如英国人在威尔士或苏格兰修的那样，往往建在不仅人烟稀少而且充满危险的地方。假如是这样，建筑时必须考虑速度——比如在查特奥盖拉德修建的理查·科尔·德·莱恩的巨大工事，据说只用一年就建成了[③]——在13世纪的晚期这只能通过雇用大量【768】劳力才有可能完成，比如在博马里斯（Beaumaris Castle）雇用了400名砖石匠和1 200名其他的工人。那样的话，管理者必须面对着食物供应和住宿供应的问题，这与在19世纪铁路承包商面临的问题一样，而且就住宿而言，

---

① 收入拉维塞（Lavisse）：《法兰西历史》，第3章，第1节，第423页。【26】

② 对哥特式风格的传播，可参考恩拉特：《宗教建筑》第1卷，第435页及以后；Langlois第5章，收入拉维塞的《历史》，第422页；特别是G. 德西奥（Dehio）和G. 范·贝佐尔德（Von Bezold）：《西方教会建筑艺术文献》（斯图加特，1892年），第2卷。【27】

③ 瓦奥莱特—利—杜克：《军事建筑》，第87页。【28】

解决方法差不多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住木屋。与建筑韦尔皇室修道院有关的账目中较前的项目是关于搭建砖石匠和其他工人的住所的开支。大量的流动人口在远离城镇的地方短期会集的另一个特点是，假如存在组织的话，普通行会作为一个组织机构是不适应这种情况的。

11.3.1　材料的供应

中世纪建筑者一般都用当地的石头，即使当地石材并不十分符合要求时也是如此，因为运输成本很高，而且极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整修和装饰的工作尽可能地放在采石场进行。但是，只要资金允许，石材也可以从远处运来：比如，为了建桑斯教堂，不仅从离建筑工地 30 英里的奥克塞雷运来，而且从远在 100 英里以外的伊夫里（Ivry）地方运来。① 石头甚至从海上出口；伊斯特里亚的石灰石，很容易经亚德里亚海航运到意大利，比如在 5 世纪的拉文纳和 11 世纪的威尼斯广泛地使用。② 从 11 世纪后，卡昂的石灰粒岩在英格兰也得到广泛使用。相对便宜的水上运输对克桑滕的圣维哥特教堂来说是一个便利，石头由里珀河、鲁尔河和莱茵河运来，但是部分好处由于缴纳关税而丧失了。1405 年，建造圣维哥特时为了获得德拉亨（Drachenfels）和安德纳赫（Andernach）的石头，仅在采石场就花费了 140 基尔德（gulden）；还要加上 44 基尔德过路税，88.5 基尔德用于航运到伯克码头，从码头运到教堂花了 4.5 基尔德，用于与运石头相关的官员旅费 31.5 基尔德，这样有接近 55% 的成本是用于运输、过路税和旅费。相比较而言，科隆和美因茨教堂由于便利的地理位置而获利。③ 自然，高运费总是花在装饰【769】性石头上，比如在林肯和别处发现的图尔奈洗礼盆；墓碑比如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的墓碑是 1329 年在巴黎造好后出口到苏格兰的；15 世纪，德比郡切拉斯通（Chellaston）的雪花石膏是大量地进口而来并且部分是加工好之后运到诺曼底。④ 像石头一样，木材也主要从当地获取；但是因为中世纪的木匠偏向于只用木材的中心部分，而且别的方面也需要木材，所以供应有时短缺，因而也得使用进口木材。比如，爱尔兰的木材就在 14 世

① 有关材料航运，参见恩莱特：《宗教建筑》，第 1 卷，第 77 页及以后。【29】

② J. 沃特森（Watson）：《英国和外国的建筑石料》（剑桥，1911 年），第 203 页。【30】

③ S. 贝塞尔（Beissel）：《中世纪的建筑管理》（弗赖贝格，布里斯哥），第 2 卷，第 44 页。【31】

④ P. 利·卡丘克斯（Le Cacheux）：*Rouen au temps de Jeanne d'Arc*，第 96 卷。【32】

纪的卢浮宫使用，丹麦的木材在14、15世纪被用于法兰西国王和勃艮第公爵的建筑工程里。① 砖在11世纪时很有名，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差不多完全被放弃使用，除了那些在没有较好石材供应的地方，比如朗格多克（Languedoc）、佛兰德、德意志北部和意大利北部。但从15世纪起，砖被单独使用或者与石头一起使用，因而其使用变得普遍起来。例如，在贝弗利酒吧、伊顿学院（Eton College）以及塔特舍尔（Tattersall）和柯比拜·缪克斯罗（Kirby Muxloe）的坚固宅第都大量使用砖。

中世纪建筑师主要有两条途径获得石头供应，即拥有或租赁采石场，或者从采石场主那里买石头。对英格兰而言，有可能列出几个大规模出卖修整好石头的地方，但是，虽然王室或其他建筑师经常购买石头，另一种供应方式可能更普遍。采石场的礼物，比如1205年赠给拉昂大主教和他的大教堂的礼物，在法兰西和英格兰是一种常见的虔诚的捐献形式，② 木材也可用作捐赠礼物。关于石头、木材和其他建材的航运，建筑工程管理者或者雇用马车和马车夫——只要必需，还雇船只和水手——或者拥有自己的运输工具，普遍的方法是两者兼而有之。因此，在许多中世纪的建筑工程中，采石、造砖和砍伐木材等都在一个管理人员的指挥之下，并且被作为大型的和具有某种程度的综合性的企业来看待，在规模大小和工程的种类方面能与工业革命【770】早期的公司相媲美。

11.3.2 劳动力的供应

在大规模的建筑工程中要求的劳动力，除了熟练的砖石匠、木匠、铁匠、水管工和玻璃工外，还包括有无数的小工，③ 也就是挖土工、拌泥灰工、推车工和其他的挑夫。那些非熟练的劳动力能很容易在邻近地区找到。在西欧的封建采邑上不可能找不到那样的建筑劳动力，因为为领主建筑、维修厅堂、采邑的磨房或面包房，或为这些建筑建屋顶，是农奴的普通义务；④ 除了非熟练和准熟练的工人外，在封建庄园里有时也有砖石匠和木匠。而且假如缺乏男劳力的话，女人，像一些中世纪事例所显示的一样，也

① 恩拉特：《宗教建筑》，第1卷，第78~79页。【33】
② 莫特特和德萨姆普斯：《著作汇编》，第2卷，第201页注4。【34】
③ 努普和琼斯：《比马里斯和卡纳封的城堡建筑》第15页；参考当时法国的《劳工手册》。【35】
④ 如要德意志或其他的国家的例子，可参考松巴特的《近代资本主义》，第1章，第1节，第81~84页。【36】

是可以作为劳动力使用的。

至少，有时，迸发于虔诚信仰的宗教义务，或者是一种可歌可泣的狭隘爱国主义，为负责建筑工程的人缓解了这个问题。这正如1463年法国的一份合同书所展示的，① 合同的一方是一个修理教区教堂的砖石匠，合同说明师傅利用了上述附近教区居民的这种封建义务。1469～1472年为了修理博德名（Bodmin）教区教堂，该城镇居民不仅通过行会和自行按等级集资而且无偿提供劳力。同样，11世纪后半期建设列日附近的圣特隆教堂时，无数的人赶去搬运石头和其他材料如石膏、砖等，这样就免除了相应的开销；② 1194年查特教堂经历了灾难性的大火之后，各阶层的人都参加了重建工作。③ 至于其他建筑工程，因为没有提供获得美德的机会，所以不能期望获得那样的热情，但是可能利用公共权力来达到目的。在9世纪的德意志，据说路易二世利用罗马"公共建设"的传统而颁布法令强迫他的臣民参加重修工程。④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就像在后面要叙述的一样，本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必要时能通过王室强行征用并提供伙食来得到缓解。

12世纪以后建筑活动所必需的熟练劳动力的供应和培训是个更为困难的事。许多砖石匠和其他手艺人在与修道院和教堂相关的作坊里学会了手【771】艺，尽管有些作者像黑德罗夫等相信修道院机构（比如属于有名的爱伯特·威廉时期（1069～1091年）的科罗斯特赫希奥修道院）作为手艺人培训学校的重要性，⑤ 以及一些僧人和世俗圣职人员以建筑甚至手工业方面的技能而著称这一毫无争议的事实。就我们所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僧人或世俗的人在教人使用比如斧和锯或者木槌和凿子等这种实际技能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确实十分注重使那些新手在建筑工程中培养出熟练技能。比如，圣奥宾德安琪儿修道院在1082～1106年的某个时间内同意给一个叫福克的农奴——作为对他作漆匠和装玻璃工的回报——授予自由和土地，但是除非他有一个儿子能为修道院干同样的活，否则在他死后土地得

---

① G. 费格涅茨（Fagniez）：《关于工业史的文献》及其他著作（巴黎，1877年），第2卷，第258～260页。【37】

② 莫特特和德萨姆普斯：《著作汇编》第1卷，第158页。【38】

③ 莫特特和德萨姆普斯，上引书，第2章，第14章。【39】

④ 松巴特：《近代资本主义》，第1章，第1节，第84页。【40】

⑤ 《中世纪德国的砖石匠工会》：其根据大部分来自于15世纪一个并不重要的作家约翰·特里斯缪斯。关于加泰罗尼亚的教会和寺院建筑的有关证据以及关于里波尔修道院（在11世纪奥立弗院长时期是建筑学研究的中心）的重要性，可参见J. 布伊格·卡达法克，A. 德法尔吉奥和J. 吉蒂·伊卡索斯：*L'Arquitectura Romànica a Catalunya*（巴塞罗那，1919～1921年），第2卷，第59页及以后。人们还应该注意对文献中的 fabricavit, erexit, struxit 等词语和其他类似词语不要太拘泥于字面理解。【41】

还给修道院。[1] 同样，在 1497 年雇用一个砖石匠时，库帕修道院（Cupar, abbey）记录说“托马斯接受这一切并告诉教堂我们或我们的后代将继续从事砖石匠的工作或从事任何其他能干的活。”[2] 一般而言，中世纪的熟练艺人是世俗民众，而且除了早期的几个世纪外，建筑师也是如此。随着从木材到石头的转变，砖石匠的数量和技术水平都有所提高。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军事工程中也表现在教会建筑中，认为被要求来建筑石头据点的人大都接受了修道院训练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他们自己在建筑工地上从师傅那里学习手艺，砖石匠的培训基地迄今为止还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但它并非不重要，这主要就是采石场。最初，砖石匠和采石工人的行业分工并不十分明显；一些英国砖石匠在他们的一生中的某个时期是做采石工人的；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那些打造并装饰好石头的买卖人也都是在他们的雇工生涯中学会了砖石匠技术，[3] 这就足够他们以此营生了，虽然他们在采石场外不能做镶嵌【772】师傅，但可以做砌墙工。

手艺人是如何被那些需要他们服务的人雇用的呢？对此我们并不清楚。在他们的工作小规模地进行的时候，或者是只进行修理而不是新的建设时，就雇用必要的砖石匠或木匠，或者由师傅按协议价格从事工作。当工作的规模很大并且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时，保持一定数量较固定的工人可能是比较方便的，由一个师傅或一个看守人或者两者共同负责管理每座重要建筑边的工匠小屋。那样的一个群体在有特殊活动时能够扩大，在没有活动时可以减到最小。在欧洲大陆，未结婚的熟练工人在一地的工程完成后非常愿意转到别的地方去。“赴法旅行”组织在现代早期或在这之前的建筑工人中间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机构，同类的德国工人在 15 世纪也是流动的，1493 年当乌尔姆教堂的塔楼处于即将坍塌的危险中时，不少于 117 个德国砖石匠到这里维修。[4] 1175 年，伦巴第的砖石匠也许旅行到加泰罗尼亚的厄格尔；[5] 1287 年，法国的砖石匠来到遥远的乌普萨拉。[6] 砖石匠的这种长距离迁移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愿的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在大多数国家，市政当局无疑在需要时试图利用其权力征召工匠。因此，图卢兹的伯爵雷蒙德五世，虽然没有明确

① 莫特特和德萨姆普斯：《著作汇编》第 1 卷，第 264～265 页。【42】

② C. 罗格斯（Rogers）：《丘帕和安古斯的租金簿》第 1 卷，第 310 页。【43】

③ 关于从图尔奈（Tournai）地区的石头切割者那里购买石头，可参见莫特特和德萨姆普斯，《著作汇编》，第 2 卷，第 298～299 页。【44】

④ 《德国城市编年史》，第 23 章（奥格斯堡，第 4 节），第 420 页。【45】

⑤ 莫特特和德萨姆普斯：《著作汇编》，第 2 卷，第 129、130 页。【46】

⑥ 上引书，第 2 卷，第 305～306 页。【47】

宣称拥有在和平时期派砖石匠离家到远方去服役的权力，但是在1187年条例中确定了这条义务，① 即要求尼姆的砖石匠师傅，假如伯爵手头正有工程建设，每周为伯爵工作一天，而这一天伯爵只提供食物，其余的日子可以得到工资。当他们参军时，他们必须带着自己的工具，伯爵提供运输，并提供食物，当防御工事被毁坏时伯爵也提供一定数额的补偿。在同一个世纪早期的阿奎塔尼亚，砖石匠似乎有被强征的危险，因为1127～1137年间公爵威廉八世的一个特许状②明确规定官员无权把工匠从一个工地抓到另一个工地。在英国的档案记录中有大量材料表明对建筑工人的征召，这无疑表明王室的权力在13世纪通过郡长得到了广泛的利用，在中世纪其余时期则主要是通过师傅和行政官员来进行，比如1390年的杰弗里·乔叟就是这样，他是温莎圣乔治小礼拜堂工程的教职人员。征召的砖石匠有时数以百计，但这个系统的运转显然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有时可能征集太多，但有时也可能就很少；人们总是无法防止他们在路上或到达时逃跑；官员把他们从一个工地转到其他地方可能会妨碍其他工程的进展。义务也可能会与教会、市政的和私人的工程相冲突，因为官员极有可能在那些地方找到他们需要的人。因此，1441年一个叫奇切来的大主教希望得到一个王室的命令，把为万灵学院工作的人从被迫为伊顿进行的工作中解救出来；而1479年他又要求为完成马格达兰学院的工匠不该再被调往温莎而是继续为这所大学工作。 [773]

11.4　大型建筑工程的管理

我们所知建筑管理的最简单安排是1175年与加泰罗尼亚的乌格尔的圣玛丽教堂相关的一份文件。③ 为该工程而筹集的所有资金，包括租金和其他来源筹集的基金，均交给伦巴第人雷蒙管理，显然他是砖石匠的头领。他答应给教堂加盖屋顶，盖一个圆屋顶，起一个塔楼，他需要花7年时间完成这个工作，雇用另外4个伦巴第人，并且在需要的时候雇用其他的砖石匠。在他生命中的这7年及以后的岁月雷蒙将享有议事司铎的职位。这个条款可以与1374年生效的德意志克桑滕的圣维克多的合同相比拟；在那份合同里，

① 上引书，第2卷，第156页。【48】
② 上引书，第1卷，第379页。【49】
③ 上引书，第2卷，第129～131页。【50】

砖石匠师傅拥有一份与牧师同样的薪水并与之享有同等的地位。[1] 这个从 13 世纪后开始普遍采用的制度与乌格尔合同不同，它把同一工程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财政和行政性的；另一方面是技术和建筑的，并派不同的人分别管理。因此，在克桑滕的圣维克多宗教财产管理委员会，工程负责人（*Werkmeister*）负责管理资金，而砖石匠师傅管理建筑工作。同样，在 14 世纪和 15 世纪的西班牙，学院和教堂的财政和管理职能委托给被称为 *canonicos fabriqueros*、*obreros* 或 *operarii* 的教士或其他教职人员，而把建筑业务留给被称为 *lapicida et magister operis* 的建筑师或砖石匠师傅[2] 管理。在法兰西和英格【774】兰，有关教堂、王室、市政和私人建筑，实际上也存在类似的分工。国王利用财政官员——教堂利用其管理人员或其他执事——大学利用它的职员——大贵族利用他们的办事员来处理账目、财产清单和类似事务，而让师傅或建筑师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直接与其建筑艺术有关的事务中。两类主要官员的相对重要性因时间和建筑工程的不同而不同，而且这种分野并不总是非常严格的；但这种制度可能带来了专业分工的便利，而且对大规模建筑工程而言又是十分必要的。这也与建筑师和师傅们的专业自豪感相一致。当他对红衣主教马尔切罗说："您的职责是搞到钱并照看好不让小偷得到它，至于建筑的设计工作就交给我好了"[3] 时，米开朗琪罗可能表达了与他的先辈们同样的信念。当同一雇主同时在几处开工时或者同时维修几处建筑时——就像英、法王室一样，或者权势再弱一些的，像王公和其他大贵族那样——那么由一个工匠总监来发号施令就可以得到比较统一的管理；一般是由监管人和附属的师傅管理各项工程。因此，举例来说，1421 年亚历山大·D·伯尼维尔（Alexander de Berneval）在整个鲁昂的城防建筑过程中[4] 就是作为工程总监履行职责的。英格兰从 1256 年开始就有了建筑工程中央办公室，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它还有了自己的屋子，[5] 在威斯敏斯特，它包括材料仓库

---

① 贝塞尔（Beissel）：《中世纪德国的 Bauführung》，第 1 卷，第 96、97 页。关于一般的区分，可参见德西奥（Dehio）和冯·贝佐德（Bezold）：（Die Kirchliche Baukunst）第 2 章，第 24 页。【51】

② 斯特里特：《西班牙的哥特式建筑》，第 2 卷，第 267、321 页。对早期工程的行政管理工作，参见普伊格·Y·卡达法尔齐（Puig y Cadafalch）、法尔格拉（Falguera）和戈戴·Y·卡萨尔斯（Goday y Casals）：《罗马尼亚的建筑》，第 2 卷，第 47 页。【52】

③ J. 福斯特（Foster）：《最著名的画家在瓦萨里的生活》（伦敦，1892 年），第 5 章，第 304 页。【53】

④ 有许多学者提到亚历山大·D·伯尼维尔，可参见 *Le Livre de comptes de Thomas du Marest*（鲁昂，1905 年）【54】

⑤ 约翰·H·哈维（Harvey）：《中世纪的工程机构》，收人《英国建筑协会杂志》，1941 年。【55】

和绘图室，并且逐渐发展成一个庞大的技术和管理人员队伍，其中包括一些巡游官员。

建筑财务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之外，因此抛开像威克姆的威廉这样的官员——虽然他的职责与此相关——我们必须考虑他们的技术同事，即工匠师傅们。关于他们，流行着一些不太正确的观念。一般认为他们像手艺人一样比文艺复兴的继承者更缺乏个性；他们的工作多是匿名的；在负责建筑设计的艺术家和把这种设计付诸实现的砖石匠和木工之间并没有区别。① 现在我们都知道中世纪的手艺人都对他们的个人杰作十分自豪；那些著名的名字包括斯特拉斯堡的欧文·冯·斯坦巴克和兰斯的休格斯·利伯吉尔等不下数【775】打。我们也知道早在13世纪就有一种建筑师，他们在薪金和地位方面与在他的监视下工作的手艺人很不一样。比如，14世纪早期在卡那封城堡工作的普通砖石匠薪金是每周2先令6便士，而师傅赫雷福德的沃尔特一天就可以得到2先令，这种差别是很明显的。这种建筑师被称为砖石师傅或木工师傅，但是他们一般通过被冠以一个官员头衔或加上一个形容词 *Principalis*（主要的）或 *capitalis*（首席的）等以便与其他人相区别。与他们相关的传记性细节很难收集，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们中名气大一些的人显然具有专业素质。这些素质包括测量某件已完成工程的数量并评估其质量的能力，可能还包括估算任一工程必需之材料的能力；制图和制定工程进度的能力；安排和监督某时某地的大量劳工的能力。这在像英格兰王室建筑通用的那种制度下特别必要，在那里，大规模的活动通常被作为一个单元来直接统一管理，所有的工人都由王室雇用和支付薪金。有些工程实际上被分为几个合同也就是契约，但这样就要求必须有一个能够整体规划一座建筑、监控分管各部分的师傅。可以用1387年在博韦斯建设的一所学院作为说明这种制度的一个典型案例，② 这座学院就是在师傅雷蒙·杜神庙的整体监督下完成的。他首先对这座大厦的形状、用材、顺序和重点做了一个计划，并让他的办事员把它照抄了几份。然后，他当着有能力承担部分工作的工匠的面朗读了一遍并且让他们传阅，在一阵讨价还价后与两个巴黎砖石匠签订了砌石合同，随后又与其他工匠签订了木工、铅管工以及类似工作的合同。雷猛师傅经常来检查工程的进展，有时带着他的秘书，"秘书写下雷猛师傅所点出的每一个细节"。他对细节设计的关心从韦尔金王冠可以得到证明——他的雕像装

---

① 松巴特：《近代资本主义》，第2章，第2节，第773页。类似的观点在马丁·S·布雷格的《历史上的建筑师》中得到纠正。【56】

② 费格涅茨（Fagniez）：《文献》等，第2卷，第128页及以后。【57】

饰着这所学院——虽然是由金属匠马歇尔制造，但是确实是按照雷猛师傅的设计去做的。

有关此类建筑师的培养和兴趣爱好的最著名事例可能就是13世纪维拉德·德·霍尼考特（Villard de Honnecourt）的一本素描。[①] 他也许是沃塞斯西多会的一个被保护人，曾经旅行到匈牙利那样遥远的地方，在那里，西多会的修士于1235~1250年正在紧张地施工。[776] 除了图像、素描和建筑制图以外，他的这本书还描述了他对机械和13世纪科学的其他感兴趣的事，他显然懂一点拉丁语。虽然，不能依凭他与之有关的建筑的特点而被列入当代最伟大的建筑师之列，但他显然不仅受了专业训练而且还有点文学素养，这就超出他同时代的手艺人很远了。

11.5 砖石匠的合同

雷蒙·杜神庙普尔和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亨利·耶维尔是我们能引用来说明建筑师的两个特例，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仅是设计者而且是整个建筑工程的承包人，在中世纪结束前甚至同一时代有几个这样的人。再进一步的发展，即建筑师或师傅自己承包整个建筑或者某座建筑的相当大部分，在15世纪的意大利已经实现了（在1450年前后很活跃的瓦雷泽的贝尔特拉莫·蒂·马蒂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6世纪的法兰西也是这样。[②] 这种合同制度的确有可能只是在中世纪末期开始成为主流，但是涉及相对比较大数目的钱和由承包人供应材料的建筑合同在15世纪之前就已经存在。埃莉诺女王（Eleanor，queen）的一些十字架在13世纪后半期就是由这样一些承包人制作的，大约在1380年，威廉·萨恩哈尔在考灵城堡（Cowling Castle）承担一项工程价值达到465英镑——这相当于65个砖石匠一年的薪金。[③]

残存的各种建筑合同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在有限的篇幅内只能做一个大概的总结。最简单的合同形式是确定块石工每日的任务（*opus ad tascam*），在这种合同中一个人或一组人可以为其整修石头或类似容易从量上进行估计的工作得到一定数额的现金。事实上，与这种合同相伴实行的是

① 想要欣赏可参见：兰洛伊斯第5章，收入拉维塞的《历史》，第414~416页。【58】
② 松巴特：《近代资本主义》，第2章、第2节，第774页。【59】
③ 对英格兰的合同，可参考D. 努普和G. P. 琼斯：《砖石匠承包人的崛起》，R. I. B. A杂志，第63卷，1936年。【60】

计件薪金制，几个人完成某项工作，按工序进行分工。普遍的合同类型是一个手艺人从事某件建筑，他自己仅提供劳力。比如1224年比蒙特·利·罗格的尼古拉同意为德鲁勒斯伯爵建一座城堡，伯爵提供石头、沙、石灰、木材并负责运输，当工作完成后他还能保留由承包人做的施工架。① 其他类型【777】的合同一般规定，承包人要提供——除了工匠外——材料或运输或两者兼而有之。承包人有时是想尝试得到更高薪金的普通工匠，但是负责一座建筑的师傅完全了解，应该就与之相关的工作或其他不同的工程来签订合同。比如亨利·耶维尔②——他是为王室提供服务的师傅，也是王室成员和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师傅和伦敦桥的监护官——就揽了相当多的合同。不仅提供人力而且提供原料的承包商极有可能自己就是这方面的商人或是供应物资的所有者。贝尔特拉莫·蒂·马蒂诺被认为是采用这种新建筑制度的先锋人物，他在罗马拥有屋瓦窑和石灰窑；托马斯·克朗普（Crompe, Thomas），是70年前考灵城堡的一个大承包商，也许还是一个采石场主；他著名的同时代人亨利·耶维尔是因大规模从事石头和屋瓦生意而闻名的大商人，可能一度在波贝克开发出一个大理石采石场。

建筑合同在1350年后数量不断上升，因而为各种级别的砖石匠和木匠提供了获得更大收入的机会，但是，它不是手工艺人获得比他这一行业其他普通人更高的地位的惟一途径。假如他喜欢相对安全的领取薪水的职位而不是签订合同的投机性活动，他可以寻求成为一个工头或者大工程的监护人，或是教堂建设的主管以及最终成为服务于大贵族、市政府或大教堂的师傅。假如这样的话，他一般要接受一个几年期限或者终生合同的制约，这个合同一般会规定他的薪金和待遇，③ 限制或阻止他们未经教堂或修道院同意而缺席去做其他的工作，有时还分给他住宅，在年老体弱时也保障他享有部分薪金和赡养费。至少有一份合同包括旨在消除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的条款；西班牙卢戈的主教和教士在1129年同意师傅每年的薪金应为200休尔多（*sueldo*），但是假如货币价值变动的话，他应该得到6马克银和各种以实物支付的报酬。④【778】

① 莫特特和德萨姆普斯：《著作汇编》，第2卷，第234～235页。【61】

② 有关此人的情况参见D. 努普和G. P. 琼斯的《亨利·耶维尔和他的合作人》，R. I. B. A杂志，第42期，1935年。【62】

③ 这在1261年法兰西的一份合同中有详细的说明。复印件可见莫特特和德萨姆普斯的《著作汇编》，第2卷，第288～290页。【63】

④ 斯特里特：《西班牙的哥特式建筑》，第1卷，第171～172页。【64】

11.6 劳工的状况

无法准确地发现中世纪有多大比例的建筑工匠成功地依靠上面描述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达到并保持了与同伴截然不同的地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人很少，大部分人在他们的一生中仍以赚取工资为生。因此，直到近来他们也很少为历史学家所关注。账本是研究他们的状况的主要依据，但是大部分资料散失了或者说难以找到，而且即使有所发现，它们也不够详细；但是现在有足够的证据使我们不仅可以弄明报酬的比例和变化，而且也可以搞清楚一些问题，比如工作时间的长短，假期的数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知道雇用的连续性。

在直奔这些问题的答案之前，最好是先描述一下中世纪砖石匠，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其他建筑工匠，他们不同于其他行业同时代人的一些方面。第一就是他们有了更大的流动性。这是因为，不仅在农村而且在许多城镇里，大部分房子是用木材、板条和灰泥建造的，对许多地区来说都不太可能在他们自己的村庄持续地大量雇用砖石匠，除非是在像图尔奈这样的巨大采石地区，在那里，大量雕好的石头、柱子和半成品雕塑都是为出口而生产的。无论如何，中世纪欧洲的大城堡和教堂建设只有从一个广阔的地区集中数百手工艺人才可能完成。这很容易安排，因为砖石匠和木匠并不像织工一样固定在一台织机上，而是可以把他们的工具包在一个小包袱里带着上路的，而且直到现代他们仍是这样做的。必要时建筑工程的管理人员甚至可以为他们提供工具，而且，管理人员一般要为磨砺和加硬工具付费，他们为此通常雇用一个或几个铁匠来做这种工作而且还要雇用一个“配带斧插的匠人（*porteh-ache*）”在铁匠铺和工地之间搬运这些工具。砖石匠和其他手艺人比如织工、裁缝、鞍工的第二个不同在于，他们少有机会获得——即使只是少量地获得——他们使用的材料。结果，他们更有可能处于只是靠出卖劳力和技能的地位。第三，与大多数独自工作或在小作坊里工作的中世纪手艺人不同，砖石匠通常是在与现代工厂或工场出现前不久的工业企业相似的状况下就业的。他们要遵守秩序和纪律——虽然在操作中没那么严厉——在本质上类似于19世纪加在兰开夏和阿尔萨斯并不心甘情愿的棉花工人头上的限制。在建造伊顿学院的过程中，砖石匠不仅因为他们打架而受罚，而且因为搬弄同事的是非和阻挠他们的工作以及不守时而遭罚款。 [779]

砖石匠行业由两个分支部门组成，这种手艺分别由打石匠（*cementarius*，*lathomus*）和砌墙工或安装工（*positor*，*cubitor*）来承担，但是这种分别并不严格，许多砖石匠在某种程度上在两个分支部门中都很在行。打石的工作（hewing）被认为更高级一些，因为它的顶级形式包括雕塑、雕饰窗格和柱冠的花纹以及类似的很难、很复杂的工作，但是它也包括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对用于墙体中心或内侧的石头进行粗糙的成型和修整——只有外墙才需要被打造光滑的方正石头。像玫瑰窗这样的工作是由雕刻匠完成的；粗加工石头的定型也许是由砌墙工完成的。墙面的石头（包括模制和其他的切割）一般是在小屋里加工，完工后，负责加工的砖石匠在每块石头上标上他的标记，但是有时这种雕刻在石头砌好后很久才完成。[①] 砖石匠的工作是用直尺和模具以确保表面和侧面的角度或图案的正确，而砌墙工则是用铅垂线测量以把石头放在一个正确的接合处。打石和砌墙之间的差别与独立砖石匠和“初雕砖石匠”或“敷墙匠”的差别相当，尽管并不完全一致——后面这个词有时可能用作“砖匠”。

打石和敷设需要不同技能的事实，可以部分地解释在某些大型建筑工程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工资差别。1278～1280 年在皇家维尔修道院工作的 131 个砖石匠收到了不少于 18 种不同等级的工资。在 14 世纪早期的卡那封和博马里斯城堡工作的工人有 22 级工资。这种差别并不是仅有的特例，这可从 1371 年约克敏斯特大教堂建筑中雇用了 29 个砖石匠而工资却分成 5 个不同等级这一事例中得到证明，还可以从 1359～1360 年在伊利（Ely）的 10 个工匠分成 8 个不同等级这一事例中得到印证。不管这种多样性的原因是什么，事实表明一个工人的工资可能是个人独自讨价还价的结果，并不仅仅是由习惯或行会那样的机构来决定。随着中世纪向前发展，这种多样性趋向于减少，部分也许是由于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就是 1350～1500 年——【780】砖石匠在技能上比以前更接近于相似水平。如果我们考虑到，类似的工程特别是建筑城堡需要雇用大量的工人，而且标准化也随着垂直式建筑风格的出现而逐渐形成，这一切就不奇怪了。

有关城乡工资差别方面的信息并不多，尽管有足够的资料表明，就整体而言，伦敦的工资要比农村高 1/6 到 1/3。有清楚的证据表明中世纪的工资在一年中普遍随季节不同而变化。因此，在 1228 年的维罗纳，砖石师傅在夏天每天的报酬是 4 苏尔多（*soldi*），在冬天则是 3 苏尔多，因为冬天的工

① 恩拉特：《宗教建筑》第 1 卷，注 14。【65】

作日短一些。[①] 对1300年贝扬附近的达克斯（Dax）的木匠来说差别要小一些，他们的工资在3月1日~11月1日固定在每天12德涅尔，从11月2日~3月1日为10德涅尔。[②] 在克桑滕的圣威克多，[③] 冬天是从11月11日~2月22日，其工资是夏天的2/3；1356年与师傅在那里工作的两个熟练工匠夏天一日得薪12~14德涅尔，冬天是9~10德涅尔；赫尔曼·范·奥芬堡和蒂尔曼·冯·科尔恩在1436年和1437年夏天每天得到36 $\frac{1}{2}$德涅尔，冬天则是24 $\frac{1}{3}$德涅尔。而在伦敦，根据1275~1296年定的条例，砖石匠每年从复活节开始到米加那节每天得到5便士，从米加那节到11月11日每天得到4便士，从11月11日到第二年的2月2日得到每天3便士，此后到复活节得到4便士。

一个更重要但对西欧普遍而言更难以解答的现象，是世俗的变化。1300年后英格兰的工资变化趋势可以清楚地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从1300年到黑死病时，砖石匠和同类工匠的工资大约在每天4便士左右波动；第二，从1350年或1366年上升到5便士或6便士，而且一直以显著的稳定性和统一性维持到16世纪初；第三，此后工资直线上升，到1560年达到10便士，到伊丽莎白统治末期是12便士，到文艺复兴时是18便士。没有理由认为其他国家建筑工人的普通工资在黑死病之后没有和其他职业的工资一样上升，比如在克桑滕的圣威克多，[④] 熟练砖石匠的工资从1350~1359年的14德涅尔上升到1360~1369年的21德涅尔，再到1370~1389年的36德涅尔和【781】1390~1399年的42德涅尔，在同一工程中其他手艺人工资的变化规律也差不多一样。在这里，这种上升只是比英格兰慢一些而已；而且，在1400~1409年达到高峰后，克桑滕的工资并没有保持在那个水平而是下降了，而且在15世纪后半期比前半期下降的快得多，从1400~1409年的50德涅尔下降到1510~1519年的25德涅尔。像在14世纪一样，16世纪的工资上升，在克桑滕比英格兰来得更慢但它们遵循着类似的规律：1560~1569年的一个熟练工匠的工资是54德涅尔；1590~1599是115德涅尔；1650~1659年是168德涅尔。虽然很难把这种变化与生活水平的改变联系起来，但可以肯

---

① 艾伦：《维罗纳的历史》，第38页。【66】
② 莫特特和德萨姆普斯：《著作汇编》，第2卷，第336页。木匠的部分工资以食物支付。【67】
③ 贝塞尔：*Die Bauführung*，第2卷，第150、153、157页。【68】
④ 关于克桑滕的工资，可参见贝塞尔，上引书，第2卷，第149页及以后。【69】

定的是在黑死病后的一段时期实际工资确实提高了。对英格兰而言，在1350～1510年货币工资提高了大约42%，同期食品价格上升了33%，这种情形比贝塞尔对克桑滕进行仔细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更令人乐观。货币工资，如果用小麦、大麦和裸麦来计算，在1350年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趋向于下降，1350～1359年16天的工资可购买的粮食量在1370～1419年只用13天的工资买到，但是在接下来的40年里又上升到16天，在1460～1499年甚至上升到19天，到1500～1539年就是25天了。因此，即使在克桑滕，虽然程度比在英格兰轻一些，至少在表面上中世纪后期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对建筑行业的手艺人来说也许是一个大体充足的时期；在那里，肯定像在英格兰和法兰西一样，相对于随之而来的动乱和灾难而言是很繁荣的。①

但是，在法兰西和英格兰，政府和地方当局都在努力阻止黑死病后的这种工资上涨。在前一个国家，1351年的一个法令的目的就是降低巴黎熟练工人的地位，采取的手段不仅包括限制他们的工资，固定他们职业，而且还包括废除行会限制学徒数目的规定，把雇用外国工匠地方性限制也加以废除；但是这种努力并不成功，于是在1354年和1350年又进一步颁布条例加以限制。在英格兰，市政府有关砖石匠工资的规定可以上溯到1212年，14世纪、15世纪和16世纪又反复发布有关这个问题的法令和补充立法，主要目的是为了确定工作日和固定最高工资数额。官方关于工作日的立场差不多在所有国家都一样。1351年的法国法令要求熟练工人从日出到日落忠实地尽义务，与【782】两个世纪后英国对手工业者的立法中有关工作日的界定差不多，即在9月中旬到3月中旬，工作时间都是"从早上天一亮一直到晚上"。这种限制也许来源于会馆（lodges）传统，虽然砖石匠像其他的手工艺人一样也是晚出早归，并且尽量延长休息时间用来吃饭和喝水。这一条例的第二个目的没有完全达到，即使在努力把这些规定付诸实施并期望取得最大成果的地区也一样。在首都中心，15世纪早期的伦敦桥看守官对限制砖石匠最高工资的法律不屑一顾，而是在冬天减少他们的工资；在假日不发工资。在14世纪王室的建设工地上，成百上千的工匠所得到的报酬也要高出法律允许的范围。

尽管我们认为政府没能成功地阻止工资的上涨，但在我们更多地了解他们每年的收入的资料之前，我们不能肯定中世纪的建筑工人享受着像黄金时代一样的待遇。他们获得工资的天数可能因以下几方面的因素而缩短：建筑资金被耗尽以至于建筑工作不得不停止；中世纪教堂坚持保留相当长时间的

① 关于法兰西的实际工资下降，参见H. 塞伊：《法国经济史》（巴黎，1939年）。【70】

圣徒和霜冻日；天气不好也是造成这种中断的普遍原因。冬天建筑工作肯定要慢下来，有可能完全停止；1387 年的博韦斯账目记载当严寒逼近时砌墙季节也就过去了。许多教堂的教士大会和其他雇主可能会做出类似 1399 年冬天克桑滕所做的安排，当时它将砖石匠的人数从 12 人减少到 6 人，他们用稻草覆盖石建筑以防冬日的寒冷和霜冻，用草覆盖他们的木房子以防寒，然后着手做他们冬日的工作，打凿唱诗班席位的柱石。有些建筑有时会停工数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些砌墙工仍然可以找到其他的工作来做，但许多人肯定存在季节性的失业。关于他们的工作时间也许可以从 1368 年罗切斯特城堡的账目中得到一些资料：被那里雇用的大多数砖石匠每年得到 252 天的报酬，但是没有一个砌墙工的付酬时间超过 180 天。即使在天气好的情况下，中世纪砖石匠每周也很少工作 6 天。庆祝圣徒纪念日的天数以及他们自己纪念日的天数因各项建筑工程和年月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每月至少在 3 天以上。罗切斯特 1368 年的账目可与克桑滕 1356 年和 1495 年的记录做一[783] 比较：前者有 49 个星期，包含了 250 个工作日；后者 53 周，累计 270. 5 个工作日，平均每年 265 天。正如已有证据表明的，如果砖石匠的工资相当于他们肉和酒花销的 3 倍，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在北欧的环境下，每年所赚工资相当于 810 天的生活开支将是很幸运的。这会使单身汉有相当多的剩余，但对一个有妻子和孩子的砖石匠而言，除了食物花费外，所剩不到 27 天的收入要满足其他的所有花销，除非——实际上情况也是这样——砖石匠的家人也能对生活开支做点贡献。

砖石匠偶尔也有机会靠着额外劳动增加收入，当要求工作进度快时甚至他们会在夜间加班，就像 1399 年克桑滕的工匠们和伦敦桥的砖石匠在 15 世纪那种特别的环境下所做的那样；但是系统性的超时工作，据我们所知，直到 16 世纪仍不普遍，当时这样做有助于填补工资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差距。雇主和被雇用的工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可以从特殊节日或某件特殊工程完成后的特别礼物中得到体现。在 1387 年的博维那，据记载，按照习惯，在狂欢节的日子里技工为了表示礼貌要敬献一定的礼物，于是他们就坐上牛车动身到城里买适量的羊肉。礼物的最普通形式是酒，比如伦敦桥看守人在忏悔礼拜二和 6 月 24 日的雷根斯堡教士大会所发放的礼物就是酒。克桑滕的教士更为慈善，他们每周给砖石匠的小额津贴差不多相当于他们收入的 2%。

11.7 工匠的组织

像中世纪的其他的工匠一样，建筑行业的手艺人通常也有某种程度的组织，这或者是相关雇主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或者是他们自己自愿组织的；但是，因为这一行业的情况与许多别的行业不同，建筑工人的组织形式尤其是砖石匠的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很特别。一般说来，文献记载他们有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第一种是市行会；第二种是根据比普通行会或宽或窄的基础组成的协会。砖石匠的行会组织出现的时间并不早，范围也不广，主要的原因也许是在大多数城镇砖石匠的数量太少。在1450年的考文垂，603个手艺人中仅有7个是砖石匠；同年在诺里奇可能有20个，而在此前60年的牛津可能有23个或24个。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许多市行会比较有名的地方，【784】砖石匠加入到其他的手工业者组织之中。13世纪，在佛罗伦萨组织了普通技工行会，正像1475年爱丁堡（Edinburgh）的砖石匠和工人所做的那样。15世纪安特卫普的库图尔科罗纳蒂行会除了砖石匠外还包括盖瓦工人和铺路工人，在布鲁日的行会还包括泥水匠和制砖工人。[①] 实际上，伦敦有足够多的砖石匠，他们自己就可以组成一个行会，在1356～1376年间终于组成了这种行会。在中世纪的巴黎，建筑工人的数量是相当大的，[②] 砖石匠和木匠都单独组织行会。后者在1268年隶属于王室任命的福尔克斯·杜神殿总监，它也对手艺人收取会费，并对木材行业所有的工人行使实际上的司法权，每个单独的行会有他们自己的规矩。砖石匠与砖石匠、泥水匠和灰浆匠一起，都隶属于国王的砖石匠师傅管理，他努力公正地管理着这个行业，“为穷人也为富人，为弱者也为强者”。虽然这4个行业的工人各有他们自己的习俗和规矩，并以圣布来斯这样一个兄弟会的形式联系起来，但他们并不享有垄断地位，因为任何熟练工人在巴黎都可以自由地从事他们的职业。行会的目的是管理学徒、短工的雇用和材料的检验和工作资格的验证，同时在成员内部提高诚信和促进良好的伙伴关系。向垄断发展的趋势很容易被代

---

① 戈布勒特·达尔维拉伯爵（Count Goblet d' Alviella）：《比利时的夸图尔·科让来蒂》，第8卷，1900年，第78页及以后。【71】

② 1300年有122个砖石匠、108个木匠、22个泥水匠和6个灰浆匠。在巴黎，关于这一行业的情况可参考法格涅茨：（《工业和劳工阶层研究》）（巴黎，1877年），尤其是第191页及以后。【72】

表公共利益的市政当局阻止。因此，佛罗伦萨的市政当局控制了建筑材料的价格，并且按照14世纪早期的一个条例允许外地来的手艺人在城市里工作，而不需要加入行会，甚至也不需要交纳费用。① 同样，1458年安特卫普制定了条款规定在需要时引进外国工人。

比建筑行会的存在更广泛的是砖石匠的会馆，与每一座大型建筑有联系的至少有一个砖石匠会馆，不管在城镇还是农村，西欧每一座这样的会馆都拥有比市政当局所需要的更多的砖石匠。一般会馆主要是作为作坊，但有时也用于用餐或在其中工作的人午间休息的地方，他们无疑也会讨论他们的报【785】酬和艰辛，逐渐培养起团结的意识，如果某人对外人泄露"他们在会馆和行会的会议厅所开的大会内容"，会被视为不忠。② 从雇主的角度看，为会馆起草一些规则或认可现存的一些习俗是一件很好的事；1352年、1370年和1408～1409年约克郡会馆的规章都存留了下来，而且可以认为类似规则在其他地方和国家也一样存在。也可以认为，砖石匠流动性的行业特点使得许多手艺人较熟悉不同地方会馆的规则，这也使得在行业风俗方面会产生某种统一性。克桑滕的会馆有时不仅包括来自邻近地区的工匠而且包括来自多埃、荷兰（厄特里奇特、克兰伦堡）、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威斯特伐利亚［波肯（Borken）、明斯特］、莱茵兰（杜塞尔多、科隆、美因茨、特里尔）甚至纽伦堡的工匠，毫无疑问其他会馆也存在一个类似的多样性。这种状况很容易在各会馆之间发展起一个组织来保护砖石匠的整体利益。

这个阶段德国在1459年就达到了，甚至更早。最早的独立砖石匠③规章宣布了被认为是好的行业传统，并得到了当年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举行的大会的一致通过。在1462年的文献中，这些规章据说又为来自马格德堡、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希尔德斯海姆和其他地方并在托尔高（Torgau）聚会的师傅所接受。这些规章在1498年和1563年得到了帝国的同意。英国的砖石匠在14世纪可能有一个类似的组织，因为有两份与这一行业相关的文献描述了一个集会，砖石匠必须要参加这个集会，它还有着立法和司法功能。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这一权力实际上得到了正规而系统的执行，但是法令禁止砖石匠集会确实表明类似的集会发生过。英国的文献没有

① A. 多伦：《佛罗伦萨的行会组织》（斯图加特和柏林，1908年），第122页。【73】

② D. 努普，G. P. 琼斯和D. 哈默：《两个最早的砖石匠行会的手稿》（曼彻斯特，1938年），第121页。【74】

③ 关于它的原本和翻译，参见F. 詹纳（Janner）：*Die Bauhütten des deutschen Mittelalters*（莱比锡，1876年），第294页及以后；古尔德（Gould）：《自由砖石匠的历史》，第1卷，第134页及以后。【75】

提到像德意志那样的地区性组织，就像德意志规章所描述的，在每个区都有自己的总部；但是在它们的总的信条和精神中，英国人和德国人的规章是类似的；它们承认行业中存在三个等级，即学徒、帮工和师傅，并且把重点放在学徒上；他们禁止一个师傅没有理由地僭越另一名师傅，并夸大砖石匠的忠诚、美德和他们对行业荣誉的维护。概而言之，他们努力调和领主也就是雇主和师傅、监工以及大批短工的利益。【786】

在中世纪的法兰西是否存在这样的组织是令人怀疑的，虽然M. 马丁·圣里昂认为协会（*compagnonnages*）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与12、13世纪的教堂相联系的会馆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① 正如我们从后来的记载中所知道的那样，协会是适合流动短工要求的组织，他们要求在他们到达的城镇求职，或者在途中得到招待。在德意志，毫无疑问像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一样，需要“接待并珍惜来自异乡的砖石匠并给他们工作”，否则就要“给他们提供到另一个会馆去的花费”；在法兰西、德意志和苏格兰有一种秘密的握手或其他暗号作为联系方式，据此，就可以把可享受这种服务的内部人和假冒者区别开来；但是法国的组织——假如它们在中世纪的确存在的话——与别处流行的很不相同，因为它排除了师傅而只是考虑短工的利益。在欧洲大陆，局限于一个行业等级的组织在其他行业非常普遍，在英格兰也并非没有，那里的年轻木匠在1468年的伦敦有一个兄弟会。除了导致这种组织产生的手工艺人的流动特点外，这种组织的一般因素是行会日益增强的排他性和越来越少地获得独立地位的机会。当短工形成自己的组织时，他们采用了自己熟知的模式，即在行业、宗教和娱乐等各个方面效仿师傅行会；他们认为自己和师傅一样，是行业荣誉和传统的监护人。因此，在建造所罗门教堂时，协会把他们自己作为行业传统的继承人；但是不管他们的传奇有多么古老，他们的组织都是建立在一个原则的基础之上：这个原则对一些立法权力机关来说除了带来麻烦外没有别的。无论如何，协会保存下来了，而且在19世纪异常地活跃。可以假定，大约在中世纪结束后出现的价格上涨和大规模建筑承包人重要性的上升，并没有改变这一中世纪行业的一个主要特点，即它对大量以赚取工资为生的手艺人的依赖性。【787】

① E. M. 圣里昂（Saint-Léon）：《行会》（巴黎，1901年），第15页。【76】

第十二章

铸币和通货

12.1 罗马和野蛮时代的历史中断*

西罗马帝国的衰落持续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因此其铸币不可能出现任何大的变化。在铸币上非常剧烈的变化或长期的停顿只发生在英国。在罗马军队离开以及英国和帝国其他地区的行政联系中断后，再没有硬币进入英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到大约公元435年，英国已经不再使用硬币作为交换的媒介。直到7世纪下半叶，硬币在英国才又一次被作为货币使用，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是用作珠宝、礼物以及赔偿。在西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硬币的使用一直被延续了下来。

罗马帝国晚期的硬币体系反映出其经济的衰退。一方面，有一种在309年由君士坦丁大帝引进的价值很高的纯金币——苏勒德斯币（solidus），以及有它一半重量的半西斯（semissis）和1/3重量的特西斯（tremissis）或特

---

* 在此我要感谢剑桥大学和布鲁塞尔大学教授菲利普·格里尔森，他阅读了此章的草稿并给予我一些非常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雷斯（triens）。苏勒德斯币重24里尔（carat）（相当于现在的4.48克）。另一方面，有一种很重的弗林斯（follis）铜币，是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在498年将其作为40纳米（nummi）的货币重新发行的，大致等同于一个那莱尔斯币（nummus）。在这两者之间还零星发行一种银币，被收藏家们称为斯力克币（siliquae），24个斯力克值一个苏勒德斯。金币可以充当皇家礼物和向皇室“联盟”支付津贴，例如莫里斯·提比略（Maurice Tiberius）曾在584年向切尔帕里克支付5万苏勒德斯。它在帝国内的主要作用是支付土地税。发行量较大的低面值铜币只能用来进行各种各样小额的本地支付。自从4世纪末以来，帝王们很少发行银币，在查士丁尼时代（527～565年），东欧地区就已停止流通银币。同一时期银币在西欧也已消失。银币的衰落和消失常被用来论证那一时期贸易的衰落和消失。 【788】

野蛮的外邦人尽管没有自己的铸币传统，但接管了罗马帝国的铸币厂，并继续以罗马皇帝的名义铸造货币。我们并不知道野蛮人接管罗马铸币厂的确切日期，但这可能发生在法兰克人统治时的克洛维国王（484～511年）时期，以及西哥特人统治时的阿拉里克二世（Alaric II）（484～507年）时期。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高卢北部的墨洛温诸王和西哥特诸王，以阿纳斯塔修斯、查士丁和查士丁尼的名义，在诸如图卢兹这样的铸币厂发行了苏勒德斯金币和特里特币，但没有说明它们真正的发行人。①

在5世纪末、6世纪初，高卢开始少量仿铸罗马后期从瓦伦泰大帝时期到阿纳斯塔修斯大帝时期的银币。留存下来的银币重量从0.3～0.91克不等。但它们可能想模仿的是半斯力克币（half-siliquae），尽管半斯力克币重量是从1.04～1.25克不等。

野蛮人的统治者也以他们自己的名义铸造了数量有限的银币。在意大利，从西奥多里克（493～526年）到特杰（552～553年，查士丁尼大帝再一次征服德意志之前的最后一位东哥特国王）时期的德意志国王，在罗马、拉维那和帕维亚发行了斯力克银币。这些东哥特国王发行的货币数量非常少，相比之下，查士丁尼在其意大利铸币厂铸造的皇室斯力克币的数量倒较为可观。然而在伦巴第人于568～570年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多数领土后，意大利留存下来的、在拉维那和罗马帝国铸币厂铸造的银币数量也大大减少。在拜占庭帝国的其他省份已经完全停止铸造银币。当伦巴第人入侵时，流通

---

① P. 勒·让蒂约姆（Le Gentihomme）：《5～7世纪西方野蛮人王国的铸币和货币流通》，载《古货币学评论》，第5系列，第7期（1943年），第46～112页；以及第8期（1948年），第13～59页。【1】

的为数不多的货币大多是由查士丁尼和查士丁二世（565～578年）发行的。在伦巴第人统治早期，他们仍旧继续铸造并发行这样的斯力克币。在高卢，法兰克人从谢尔里一世（511～534年）到西吉伯特一世（561～575年）的墨洛温国王，继续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发行先前以帝王名义发行的银币。这些银币可能是被打算用作半斯力克币，因为它们模仿的是查士丁尼时代（527～565年）重得多的半斯力克币。在6世纪中期，以查士丁尼的名义发行的银币在莱茵兰也有出现，在那里，意大利斯力克币像东哥特时期的银币一样，流通范围非常有限。[①]

【789】 这样有限的发行根本不能满足商业需求，尽管除了莱茵兰还有其他地方也在铸造这样的货币。6世纪第三个25年以后，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都停止发行银币，这可能意味着古代世界贸易的最后终结。从商业活动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可能是“黑暗世纪”中“最黑暗”的时期。

铜币的铸造结束得比银币还早。它曾以很多野蛮人时期帝王的名义发行，如勃艮第的歌德马大帝（524～534年），奥地利的西奥多伯特大帝（534～548年），以及巴黎的切尔德伯特大帝（Childebert of Paris，barbarian king）（511～558年）。这些小额铜币的发行大约在6世纪中期宣告结束。在15世纪末之前，除了13世纪的匈牙利，西欧再未铸造过青铜币或纯粹的铜币。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执政官努力在该地区发行一种劣质的铜币，但到了8世纪，这种铜币也停止使用了。只有西西里能继续适应拜占庭帝国中心省份的货币模式，因为那里的拜占庭执政官铸造了大量铜币，并把它传给了其继承者，甚至传给了12世纪征服该岛的诺曼人。[②] 铜币的主要作用是为城市生活中大量的小额付款提供支付工具，但在纯粹的乡村社会，铜币的作用就不大了。农村人的交易要比市民的交易少得多，而且数额普遍较大。农村人按蒲式耳买卖谷物，而城里人则按条买卖面包；农民买卖整只动物，而城里人则买卖切块肉。在真正的城市环境中才需要大量的小额零钱。只有西西里还使用必要的铜币这个事实，可能说明了城市社会的崩溃。在西方的其他地方，古代大城市已经日渐衰落。

铜币和银币消失后留下的是金币，它的声誉要远远高于它的效用。第一个大胆地将自己的名字刻在金币上的野蛮人首领，是奥地利（Austrasia）的

---

① J. 韦尔纳（Werner）：《根据考古学和古货币学研究所了解的东方墨洛温的远程贸易和自然经济》，*Settimine di studio del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 alto medioevo*，第8卷（斯普拉托，1961年），第557～618页。【2】

② P. 格里尔森（Grierson）：《7～11世纪意大利拜占庭统治下的货币》，载《中世纪货币》。【3】

西奥多伯特一世，这个举动招致了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在 *De Bello Gothico* 一书中的严厉批评。他的两个继承人没有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发行货币，尽管以西奥多伯特的名义发行的部分苏力第币和特里特币实际上是由他们发行的。然而，从西吉伯特及其兄弟冈特兰统治时期开始，在铸造货币上刻上实际发行人的名字在高卢北部的法兰克王国内成为惯例，尽管以罗马皇帝的名义发行硬币在普罗旺斯一直持续到赫拉克留斯时期（610～641年）。直到580年左右的利奥维吉尔德（572～586年）为止，西哥特国王并没有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发行特里特币。在568年征服意大利后维持了意大利铸币厂运转的伦巴第国王之间也有一个相同的时间差，但在坎宁普特国王（680～700年）之前没有人以自己的名义发行硬币。所以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期内，各个野蛮人统治者都努力维持这样的神话，即西欧仍旧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这之后才敢于在他们的金币上宣称他们已经创建了新的独立王国。 【790】

野蛮人所继承的金币基本上都不被用作商业用途。他们的苏力第币，不管是以帝王的名义还是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发行，最初无论如何都和那些受帝国直接控制的铸币厂铸造的金币一样优质，并且被用于同样的目的，即贵重礼物和贡品，例如6世纪末，伦巴第人每年断断续续支付给法兰克人12 000枚苏力第金币。[①] 在6世纪中期被放弃之前，他们的铜币和银币比罗马帝国原型币的质量差，而且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商业用途。在铜币和银币消失后，甚至金币的数量也开始下降。没有银币和铜币，而仅凭不断减少的金币能维持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呢？除了统治者的活动外，我们几乎没有直接证据来说明当时货币的用途，但至少在7、8世纪，在伦巴第地区金币显然被用作资本支出，如购买农业用地，尽管这些土地上的地租是用实物或服务支付的。[②]

在6世纪的后半期，更常见的是铸造特里斯币（triens），而不是苏勒德斯币（solidus）。最晚从利奥维吉尔德统治开始（568～586年），东哥特便再未铸造过苏力第币。在7、8世纪的意大利，伦巴第国王在波河河谷和托斯卡纳的铸币厂铸造的也是特里特币（trientes），尽管在南方贝尼文托（Benevento）的伦巴第公爵受拜占庭帝国的影响较深，也铸造苏力第币，例

① P. 格里尔森：《黑暗世纪的贸易：证据评析》，载《皇室交易史》，第5系列，第9章（1959年），第132页。【4】

② E. 贝尔纳雷吉（Bernareggi）：*Il sistema economica della monetazione dei Longobardi nell'* Italia superiore（米兰，1960年）。【5】

如意大利和西西里留存下来的拜占庭铸币厂。

有两个硬币窖藏进一步说明了苏勒德斯币用途的下降。塞维尔的一个6世纪中期窖藏至少有40枚苏力第币和仅仅18枚特里特币，而奈梅亨附近埃斯查伦（Escharen）的一个窖藏——是在半个世纪后约600年贮藏的——则有54个特里特币，而只有11个苏力第币，其中5个苏力第币还是拜占庭时期铸造的，而不是野蛮时期铸造的。

【791】

我们今天用拜占庭苏勒德斯币作参照将7世纪野蛮人后期的金币称为特里特币，尽管从技术上来说是正确的，但仍有理由假定当真正的苏勒德斯币在西方不再流通时，这些特里特币在当时被称为苏力第币，或先令。

波恩铸币厂留存下来的所有特里斯币样品都是由同一对模块铸造的，这说明这些货币的发行量非常小，有些铸币厂只铸造几千枚硬币。然而，铸币厂的数量却在增加。除了从罗马人手里继承来的铸币厂外，法兰克人还修建了新的铸币厂。尽管王国各处都有铸币厂，但铸币厂逐渐向那些贸易开始复兴的地方集中，如默兹河谷和莱茵河谷。这些河谷不仅位于法兰克人居住区的中心地带，而且是贸易的新领袖弗里斯亚商人常常光顾的地方。弗里斯亚自己也铸造特里特币。这是硬币向一个先前从未铸造过硬币的地区的初次延伸。在其他地方，铸币被限制在曾经是罗马帝国疆域的地区，而且正如硬币窖藏和零散硬币所显示的那样，硬币的发行很少超出旧罗马疆域。

除了特里斯币，弗里斯亚人和墨洛温人也开始在7世纪铸造一种新的德纳利斯币，重量与特里斯币相同，但是银币而不是金币。未来大有前途的是德纳利斯银币，而不是逐渐衰落的特里斯金币，因为这种德纳利斯币成为加洛林时期德涅尔币和整个中世纪便士币的前身。

金币在西方消失了长达5个世纪。除了意大利，特里特币的发行在7世纪末宣告停止。墨洛温王朝在达戈伯特二世（674～679年）时期便停止铸造金币，而硬币窖藏提供的证据说明东罗马帝国金币的流通在墨洛温时期的高卢早已停止。一代人以前刚刚在英国东南部恢复使用硬币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大约在7世纪末也停止铸造金币。西班牙阿基拉二世（Achila II）（710～714年）发行了最后一批特里特币，在这之后征服西班牙的乌姆亚德人只发行了非常少量的第纳尔币。[①] 在10世纪前西班牙再

【792】

① G.C. 迈尔斯（Miles）：《西班牙西哥特人时期的硬币：莱奥维希尔德大帝到阿基拉二世》，载《美国货币学协会》（纽约，1952年）；G.C. 迈尔斯：《西班牙 Muliik al-Tana'if 的硬币》，载《美国货币学协会》（纽约，1954年）。【6】

未铸造任何金币。只有意大利继续铸造金币，而且只是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发行，即便在那里，黄金的普遍缺乏也使政府不可能再铸造足金硬币。

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和托斯卡纳，伦巴第人和查理曼发行的特里特币在8世纪大多数时期，到781年被禁止流通时它们的含金量已经大大下降，从几乎是纯金降到1/4纯金加3/4合金。迟至8世纪中期，意大利北部还有拜占庭帝国直接发行的金币，因为拉维纳直到751年才被伦巴第人攻占。

在意大利中部，拜占庭在罗马发行的金币的质量同北部伦巴第人发行的金币的质量同时下降。到8世纪中期，它们只有1/3的黄金和2/3的合金。在8世纪70年代阿德里安一世（Adrian Ⅰ）教皇接管铸币厂之前，拜占庭在罗马铸造的最后一批硬币只是镀金铜币。

在意大利南部——那里的部分地区在11世纪前仍被掌握在拜占庭帝国手中——金币的使用始终没有中断。西西里在落入穆斯林手里之前，一直向拜占庭省份提供硬币，这之后拜占庭从未停止过铸造苏力第金币。最初4世纪的质量和重量标准甚至一直保持到11世纪。在9世纪，至少有一个不受拜占庭帝国统治的意大利南部铸币厂（可能是那不勒斯铸币厂）大量仿铸这种金币。① 另外，直到9世纪中期，贝尼文托的伦巴第国王继续以自己的名义铸造苏力第币和特里米斯币，尽管他们铸造的金币质量非常差。现代分析显示其中最差的金币只含有8%的黄金，而含有92%的合金。

在西西里，在拜占庭帝国位于锡拉丘兹的铸币厂878年关闭之前，就一直在流通苏力第金币。穆斯林侵占这个岛国后，开始铸造类似于北非的塔里金币（taris）或1/4第纳尔币。

另一方面，从8世纪开始的500年里，西欧一直只铸造银币，但几种特殊金币除外，这些金币是由像加洛林皇帝虔诚者路易、麦西亚的欧法国时期和英国的忏悔者爱德华这些统治者发行的，只供皇室发放救济金，恩泽天下。【793】

然而，金币在西方最终消失之前，7世纪时期墨洛温高卢金币和银币之间有一个短暂的关联，1镑（作为银的重量）相当于20个旧先令（现在我们称其为特里特币），相当于240个新便士（德纳里尔银币）。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了我们熟悉的镑、先令和便士的关系，并在西欧普遍使用，直到中世纪最后两个世纪开始使用货币十进位制。由于特里斯金币（先令）不再作为货币使用，以及德纳里银币（便士）重量的下降，240个便士的重量不

① P. 格里尔森：《拜占庭帝国的硬币》。【7】

再是1磅，但这种关系依旧固定地作为计算银便士的便捷方式。1先令是12便士，1磅则相当于240个便士。[1]

当金币最终消失后，西方所盛行的硬币既不像东方拜占庭帝国存留下来的硬币，也不像罗马帝国末期的硬币。硬币历史在这一时期完全断裂。以银便士为基础的硬币体系完全不同于古代的硬币体系。硬币体系被完全改变了。并不是野蛮人给罗马世界带来了新鲜血液，这种改变发生在野蛮人进入罗马世界之后。硬币的演进历程同古代发生了完全的断裂，但并不是像日耳曼民族于403年穿越莱茵河疆域时发生的那种革命性断裂，而是一种历经两个世纪才完成的进化性变革。古代货币体系的消失，就像罗马领主贵族的消失一样，经历了很多年。这是一次较为完全的变革。[2]

12.2 德涅尔币

银便士或德涅尔币的铸造开始于7世纪的短暂贸易复兴期，并持续了500多年。它不仅是西欧的代表性硬币，而且实际上是惟一通用的硬币。

7世纪发行量最大的货币是英国和弗里西亚的便士，常被货币收藏家们错误地称为“西塔币”或“西斯币”。它们在7世纪末到8世纪中下叶大量【794】铸造，与同时期墨洛温的法兰克德涅尔币的重量和图案基本相同。很难区分哪些硬币是盎格鲁—撒克逊王国铸造的，哪些硬币又是在北海的弗里西亚海岸铸造的。然而，一些较为普通的硬币似乎主要是在弗里西亚铸造的，如720~740年铸造了上百万枚的“豪猪”型币。据我们现在判断，“弗里斯亚人”占据的海岸线是从北部的维斯尔河口延伸到南部的茨温河口——那里后来建起了布鲁日——或者可能甚至延伸到坎纳切河口——那里后来建立了昆托维克。弗里斯亚的贸易不仅沿海岸发展，而且穿越北海，沿莱茵河直上到达科隆、波恩和美因茨。如果这样，弗里西亚贸易的中心点便是莱茵河口，那是海洋、海岸和河流交通汇聚之处。莱茵河主要支流的航线要比现在更靠北，因此占据它中心位置的不是欧罗巴波特—鹿特丹，而是离乌特列特不远的多城，乌特列特是弗里西亚——公爵的“首都”，弗里斯亚主教的教区。弗里西亚人的主要铸币厂可能就在多城，甚至是法兰克人在8世纪30

---

① P. 格里尔森：《查理大帝时期的货币和铸币》，载《伟大的卡尔：终身事业和永恒之作》(H. 博伊曼编)，第1卷（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1965年），第501~536页。【8】

② 要了解这一时期的整体情况，参见登在《中古世纪货币》上的一系列文章。【9】

年代名义上征服该地之前。从留存下来的硬币证据来看，在8世纪末多城是发行量最大的铸币厂所在地，以及法兰克王国在迅速成为一个帝国过程中最重要的贸易中心。

墨洛温德涅尔银币同盎格鲁—弗里斯亚便士的关系较为密切，但在弗里斯亚征服之前似乎并没有大量发行这种银币，尽管我们只是根据数目非常有限的硬币窖藏得出的这个结论。① 这些货币的发行似乎主要集中在高卢北部的铸币厂，这个地方离盎格鲁—弗里斯亚的贸易路线最近。除了由阿奎泰赖的卡里伯特二世（629～631年）发行的一部分之外，这些硬币完全是由当地的公司和官方在墨洛温王朝崩溃时期发行的。大多数发行者是教职人员，包括主教——如里里昂的圣兰博主教（680～690年）——以及修道院——如圣丹尼斯修道院和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但是也有世俗发行者，如尼特拉宫市长埃布罗恩（Ebroin）（659～681年）以及安塞德特（Ansedert）和马赛的两个贵族，马赛是7、8世纪贸易的另一个中心点。

7世纪中后期的德纳利斯银币是完全仿照特里斯金币铸造的，只能根据铸造它们的金属加以区分。8世纪初，这种硬币上的图案只剩下铭文和发行人名字的首写字母。留存下来的样品显示墨洛温时期的德涅尔币或者是以240:1磅银的比率铸造的（即每枚重1.36克），或者更常见的是以264:1磅银的比率铸造的（即每枚重1.24克）。当然，240:1磅银的比率持续时间最长，在那之后的13个世纪里一直保持不变。 [795]

7世纪时金币停止使用使很多个铸造金币的铸币厂关闭，而那些既铸造金币也铸造银币的铸币厂则一直保留到加洛林时期。这个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因为这些德涅尔币大多数都未标出具体发行人，而仅仅是例如“克莱蒙主教”或“圣马克森蒂斯修道院”等，因此很难给它们确定时间。

在7世纪，银币不仅在墨洛温时期的高卢和盎格鲁—弗里斯亚海岸重新使用，而且在伯克特里特（678～688年）统治时的伦巴第人占据的意大利地区和乌姆亚德西班牙也再次复兴。与弗里斯亚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厚而窄的德涅尔银币相比，乌姆亚德西班牙的迪拉姆银币是以较薄、较宽的模型铸造的，而且这种货币样式逐渐被其他地方所接受。里奥三世大帝（717～740年）在拜占庭用这种较薄、较宽的模型铸造他的米利亚里森币（miliaresion），加洛林国王丕平（Pepin）也在755年为他扩张的法兰克

---

① J. 拉福里（Lafaurie）：《7～8世纪墨洛温王朝的银币》，《货币学杂志》，第6系列，第11期（1969年），第98～129页。【10】

王国铸造了同种类型的硬币。

丕平在755年的硬币改革中还恢复了暂时有所下降的硬币重量，明确规定1磅银最多能铸造22枚苏币（即264枚德涅尔币）。丕平的改革主要适用于那些受皇室控制的铸币厂但由教职人员控制的非皇室铸币厂很快从铸造小型硬币转向铸造较宽的德涅尔币，并依然以皇室名义发行他们的硬币。这种由地方政府控制铸币厂但承认国王对硬币的最高权威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查理大帝统治初期。然后，它被一种更为中央集权化的制度所代替，在这种制度下整个帝国铸造发行相同的硬币。继多城之后，发行量最大的铸币厂位于波依托地区的梅勒，该地附近有丰富的银矿。除了从墨洛温时期继承下来的铸币厂外，加洛林时期也建立了越来越多的新铸币厂。较宽、较薄的德涅尔币【796】的发行并不仅限于高卢地区。帝国各个地区都在铸造这种硬币：在西班牙，如巴塞罗那和阿姆普里亚斯（Ampurias）的铸币厂；在意大利，如伦巴第人时期非常活跃的卢卡铸币厂；米兰及帕维亚铸币厂，在罗马，国王同教皇共同发行了一种硬币，在贝尼文托，国王同伦巴第王侯共同发行硬币。莱茵兰东部被征服的日耳曼地区还尚不具备发行硬币的条件。然而，加洛林帝国的铸币厂主要集中在奥地利法兰克人的中心地带，与加洛林帝国的家族地产主要集中在首都亚琛的周围正好巧合。除了亚琛的巴拉丁铸币厂，莱茵河畔的科隆和伯恩、默兹河畔的马斯特里赫特、哈伊和那慕尔也有重要的铸币厂，在圣托让德、通格雷斯和列日也有一些小铸币厂。①

在英国的大部分地区，8世纪时硬币并不作为货币流通。它的货币用途似乎只限于南部和东部海岸的部分地区。在英国东南部，约775~780年肯特郡的赫伯特和伊格贝特（Ecgbehrt）在坎特伯雷建立了一个铸币厂，新的宽便士开始代替笨重的盎格鲁—弗里斯亚“西塔”便士，约783~784年默西亚国王欧法（Offa）接管了这个铸币厂。792年欧法改革了硬币体系，使其与查理曼大帝的硬币体系一致。正是这种薄而宽的新德涅尔币，而不是小而厚的“西塔”便士，充当了后来所有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便士的模型——除了诺森布里亚，那里在9世纪20年代开始铸造较小较厚的老式硬币。

就在欧法将他的硬币体系调整到同查理大帝的硬币体系相一致后，后者又开始改革自己的硬币。作为对重量和度量的全面改革的一部分，他大幅度

---

① A. 祖勒（Suhle）：《从公元元年到15世纪德意志的货币史》（第2版，柏林，1964年），第42页（图1显示，铸币厂的分布）。【11】

地增加了德涅尔银币的重量。法兰克福政务会（Frankfurt，Council of）在794年5月责令全国接受新的德涅尔币。它们依旧非常薄，但比先前的硬币更宽，直径从15毫米变为20毫米。重量超过1.7克。9个新德涅尔币等同于12个旧德涅尔币。查理曼的继任者在整个9世纪都试图维持这样的硬币重量。德国西部，意大利北部，以及基督教西班牙和现在的法国都采用它作为普通标准，不管这种便士被称为芬尼、德纳里、德纳罗还是德涅尔。因此，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衡量欧洲不同地方统治者发行的硬币的退化程度。【797】

查理曼大帝对硬币进行改革之后，整个帝国硬币的统一反映出皇室对硬币的控制程度。这与他统治初期货币上的多样性形成鲜明对比。较早前的德涅尔币尽管以他的名义发行，但制作得较为粗糙，给人的印象是根据个别钱商的品味铸造的。经过改革的重的德涅尔币设计较为精细，只是铸币厂的名字各不相同，而且意大利铸造的硬币上还另有“伦巴第国王”的字样。一度还有这样的意见，即通过在亚琛的一个巴拉丁铸币厂铸造所有硬币，来进一步实现皇帝对硬币的控制。

查理曼之子，虔诚者路易在即位后不久就命令将他父亲执政期间铸造的流通硬币收回重铸。硬币窖藏提供的证据说明他的命令得到了严格的遵守。这个命令的成功实施说明了皇室对查理曼大帝建立起来的硬币的控制程度，也说明了流通硬币的数目之小。尽管当时流通硬币的数量小到能够执行这样的命令，但它仍比先前的硬币数量大得多，并且继续增加到9世纪中期，当时需要大量硬币作为“丹麦金”支付给北欧军队。问题在于铸币所需银两从何而来。有人猜测从伊斯兰世界进口，但文献资料和银币窖藏都未显示有大量伊斯兰白银进入欧洲西部的迹象。这一时期的贸易总格局使历史学家认为贵金属是离开欧洲，而不是进入欧洲。北方“贸易”也显示加洛林白银沿着弗里西亚贸易路线从帝国进入英国和波罗的海地区。对于这个银币来源惟一可信的解释是，它是在帝国内部通过挖掘窖藏和开新矿而得到的，如波依托的梅勒银矿和“日耳曼梅勒”的银矿。

硬币窖藏提供的证据显示硬币在帝国内自由流动是事实，尽管这同内部贸易和货物的自由流动之间有多大关系是另一回事。货物的流动既可能比硬币的活动小得多，也可能大得多。“小得多”是因为硬币能够因为行政原因在集权帝国内四处流动，而没有相应的货物流动。“大得多”是因为货物交易没有硬币也可以进行。那时不仅有在特别地点的物物交换，也有远距离的“礼物交换”。有证据显示野蛮人“交换礼物”的传统在加洛林时期持续了【798】

很长一段时间。[①] 然而，当然也有货币和贸易间的相互联系。多城挖掘出来的一个窖藏发现了大量的零散德涅尔币，显然货币在那里公开流通了很长时间。但是多城的状况有多大的典型性呢？833 年虔诚者路易授权在维塞尔的科尔维建立一个公共铸币厂，“quia locum mercationis ipsa regco indigebat”。[②] 在授权者的头脑里，无论如何，铸币厂是和集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加洛林帝国的中心地带似乎就奉行这样的政策，尽管在莱茵兰以东地区建立铸币厂的权利并不十分有用。

加洛林时期的欧洲还是一个地道的农业社会，在农村，尽管“货币”经济的曙光即将到来，货币的流通还是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限制。圣日耳曼一德一普拉修道院在艾尔明翁院长时期（806～829 年）编纂的登记册详细地记录了修道院地产上获得的收益，这些地产大多位于巴黎盆地，那里货币就像在加洛林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自由流通。从附属份地获得的收益中只有 3% 是以银币的形式缴纳的。其他都是用实物或服务来抵偿。另一方面，自由份地上收益的 24% 都是用货币支付。[③] 其中一些收益在先前显然是用服务支付的——例如，圣乔治新域的一个自由份地支付 4 个苏的银币（48 个德涅尔币）来代替军事服役。自由农民越来越多地在这些地产上使用硬币，但是硬币在加洛林欧洲，或甚至巴黎盆地占多大比例还不清楚。在加洛林帝国远离经济和政治中心的地方，货币的使用有时受到的限制更多。显然货币并不总是容易得到，事实上，契约和租赁给出了其他可供选择的支付方式。圣加伦修道院位于通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的一条主要路线附近，在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814～840 年），这条线路上的丘尔镇有一个铸币厂。然而，就在这时，836 年，修道院的一个附属地选择每年支付它“3 maldros sive 6 denarios vel *precium* 6 *denariorum* in fenamentis qualecumque ex his tribus faeiluis invenire possimns”。[④] 同样的选择在租赁合同中持续达几【799】个世纪。

因此，在 9 世纪，货币的使用在整个加洛林帝国并不统一。铸币厂和硬币窖藏的分布说明货币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弗里斯亚、法兰克中心地带及通往

---

① 格里尔森：《黑暗世纪的贸易》，第 136～139 页。【12】

② W. 耶瑟（Jesse）：《中世纪货币史原始资料集》（哈雷—萨勒，1924 年），文件号：44，第 14～15 页。【13】

③ 《艾尔明翁院长时期的登记册》，B. 格拉尔德（Guérard）主编（巴黎，1844 年），第 892～897 页。【14】

④ A. 多普施（Dopsch）：《世纪史上的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维也纳，1930 年），第 138 页。【15】

阿雷拉德和伦巴第的“落撒林（Lotharingian）”走廊。[1] 在这条走廊以东，货币的使用尤其受到限制。

莱茵兰一直有加洛林铸币厂，但莱茵河东岸直到10世纪才开始大量铸币。只是在那时准许科尔维（Corvey）建立铸币厂的特许令才开始生效。莱茵河东岸直到817年才出现铸币厂，那一年“日耳曼人”路易（即路易二世）在他的父亲虔诚者路易扶植下成为“巴伐利亚国王”，并且在多瑙河畔雷根斯堡定居。雷根斯堡成为继“日耳曼人”路易之后的东法兰克国王的主要行宫之一。他在雷根斯堡的铸币厂的产量却非常之少。[2]

接下来的发展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局面。以莱茵河口为中心的弗里西亚贸易区向北超出弗里斯亚领土到达易北河口及连接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地峡，即现在基尔运河所在地。一开始是弗里斯亚商人携带硬币来到这个地区，接着这个地区也开始铸造硬币。到大约825年，这个地峡开始出现一个或几个铸币厂，可能是在赫德拜（海撒布），这个地方后来变得非常重要。起初，这个或这些铸币厂甚至无法仿制加洛林硬币，更不用说铸造它（们）自己的硬币了，但它却可以仿铸北部弗里西亚人仿照查理大帝和虔诚者路易时期多城的德涅尔币铸造的硬币。这种迂回方式很令人奇怪，因为这个地区的确发现过查理大帝统治初期的德涅尔币，如发现于霍尔斯坦的科林克堡的一个硬币窖藏。在大约834年，汉堡似乎也建立了一个铸币厂，[3] 汉堡和地峡货币的发行一直持续到9世纪中期才结束。这个开端并未导致德意志北部继续发行硬币，因为845年霍里克（Horik）国王统治下的丹麦洗劫了汉堡，使它的铸币厂停止了运转。大约同时地峡的铸币厂也被迫关闭。

这时其他铸币厂也因同样原因被关闭。甚至在弗里斯亚人时期、墨洛温时期和加洛林时期发行量都很大的多城铸币厂在经过北欧海盗的再次劫掠后也于863年关闭。诺森布里亚王国新近建立的硬币体系在仅仅存在了40年【800】后，就被北欧海盗中断。斯堪的纳维亚在9世纪上半期正处于创造它自己的硬币的边缘，但入侵者不仅将这种可能性完全打破，而且相当大地减少了西欧其他一些地区的硬币铸造。[4]

---

① 参见K. F. 莫里森和H. 格林塔尔：《加洛林时代的铸币》，载《货币史专论》，第158期，美国货币史协会（纽约，1967年）。【16】

② 格里尔森：《查理大帝时期的货币和铸币制度》，第501～536页。【17】

③ 祖勒：《德意志货币史》，第42页。【18】

④ 关于北欧海盗时代，参见N. L. 拉斯穆松（Rasmnsson）和L. O. 拉格奎斯特（Lagerquist）主编的 *Commentationes de nummis saeculorum IX – XI in Suecia repertis*，第2卷（斯德哥尔摩，1961～1968年）。【19】

与先前庄园社会相对应的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正是在9世纪帝国权威崩溃之后建立的。铸币控制权的分散化自然与这一时期王室权威的分崩离析有关。查理大帝曾明确规定，铸币是王室的特权。当加洛林帝国西部在9世纪出现政治分裂时，很多铸币厂落入伯爵手中。其职责是保护帝国或皇室利益的伯爵，转而开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铸造硬币。他们起初自然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发行硬币，也没有允许他们的德涅尔币偏离要求保持的为人周知的统一质量和重量标准。后来他们这两者都做了。这些后加洛林或亚加洛林时期的德涅尔币中很多都是匿名发行的，上面既没有皇帝的名字，也没有领主的名字。其他的则刻着某个去世已久的皇帝或国王的名字，而不是当时皇帝或国王的名字。例如，波依托伯爵从9~12世纪始终在梅勒以勇敢者查理（840~877年）的名义铸造硬币。因为铸币至少在理论上仍然是帝国和皇室的特权，那些控制私人铸币厂的领主自然很长时间不会在他们发行的德涅尔币上使用他们自己的名字，而只是发行匿名硬币或以去世国王的名义发行硬币。这之后有些人才开始以国王和他们自己的名义发行硬币。这无异于宣布他们篡夺了或得到了皇室的铸币权。早在876~880年，萨克森公爵布鲁诺（Bruno）以他自己以及路易国王的名义发行了一种硬币。很快其他人更诚实地宣布他们的德涅尔币完全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发行。例如，雨果（Hugh），里昂伯爵（Lyonnais），在936~948年铸造的德涅尔币上就完全省略了国王的名字，只使用自己的名字。就像野蛮人王国的独立硬币在5、6世纪的初期发展一样，伯爵们对铸币厂的实际接管和在硬币上正式明确这个行为之间也有一个相当大的时间差。【801】

在这种情形下，社会自然鼓励长期继续发行同类硬币。5、6世纪西部的野蛮人王国这样做了，9~12世纪比利牛斯山和莱茵河之间的“封建”社会也是如此。为了使硬币类型保持不变，人们盲目地仿照先前使用过的硬币来制作新的硬币模块，在这个过程中，硬币逐渐退化。典型的加洛林硬币的反面刻着国王姓名的交叉字母，在西法兰克各个地区直到11世纪或12世纪的德涅尔币上仍继续出现这种字母，只是越来越难以辨认，而硬币正面的国王头像则因为反复复制而变得千奇百怪。在11世纪沙特尔及其附近铸币厂铸造的德涅尔币上，查理大帝的头像已经演变成令人厌恶的点和线的抽象组合。

长达3个世纪的政治权力分裂，并未引起各个层次上铸币权的分裂。它们当然也被分化，但没有像政治权力的其他方面那样彻底。各任国王当

然还铸造硬币，西法兰克的大领主、佛兰德侯爵、巴黎伯爵、勃艮第和阿奎那的公爵及布列塔尼和安茹的伯爵也都这样做。封建等级的下一个级别附属伯爵并不都拥有铸币厂，在他们之下只有极少数的小领主曾被授予或篡夺铸币权。通常他们的这种行为直到相对晚些时候才变得明显。除了世俗等级，相当多的教会领主也拥有铸币权。很多主教以及拥有大片土地的修道院也铸造自己的硬币，如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或利摩日的圣马歇修道院。①

尽管铸币权有所分散，但在9世纪末10世纪初，加洛林货币体系还是在逆境中得到很大改善。尽管一些主要铸币厂不得不关闭，如多城和昆特维克主要港口的铸币厂，但9世纪后半期到10世纪上半期，在西法兰克农村仍可以用德涅尔银币缴纳丹麦金。在份地上征收“丹麦金”需要大量的德涅尔币，而且在845年开始增加到一个相当大的数字，那年秃头查理支付了7 000英镑（150多万枚德涅尔币）来使斯堪的纳维亚的一支军队离开塞纳河口。政府于是大量开采银矿，并在当地建立了几十个新的小铸币厂，以铸造用于支付丹麦金的德涅尔币。② 【802】

9世纪末10世纪初是北欧海盗扩张活动的大分水岭，他们不仅进入了西欧，跨越了弗里斯亚、诺曼底和英格兰，而且进入了东欧。它们以这种方式同中亚建立了商业联系。“俄罗斯人”在今天的俄国境内收集黑貂皮和其他毛皮，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作为贡品献给入侵的北欧海盗的。这些商品连同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蜂蜜、蜡和琥珀，就像远古时期这个地区盛行的奴隶贸易一样，被运送到伏尔加河中段保加尔的穆斯林商人手中。穆斯林商人用所谓的来自美索不达美亚库发的“库发”德拉姆币支付货款，实际上这些硬币大多数是河间地带（Transoxiana）的萨莫尼德德拉姆币，这种硬币在10世纪中期尤其丰富。它的丰富部分是来源于对萨莫尼德省的富饶银矿的开采，尤其是沙舍（即现在的塔什肯特）银矿和发现于9世纪后半期的阿富汗彭贾里银矿。这些德拉姆币以这种方式进入了斯堪的纳维亚的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内陆以及与波罗的海接壤的其他地区。到目前为止，北欧、中欧和西欧的硬币窖藏中已发现和记录的有200 000枚德拉姆币，其中斯堪的纳

---

① F. 波埃·达旺（Poey D' Avant）：《法国封建时代的货币》，第3卷，（巴黎，1858～1862年），再版（格拉兹，1961年）以及E. 卡伦（Caron）：《法国的封建货币》（巴黎，1882年）。【20】

② E. 约兰松（Joranson）：《法国的丹麦金》（伊利诺斯州，岩石岛，1924年）和A. 德恩斯（d' Hoenens）：《9世纪诺曼底人对法国的入侵》，《中世纪诺曼第人在欧洲的扩张》（斯波莱托，1969年），第233～298页。【21】

维亚发现85 000枚，如今的波兰（主要是沿着波美拉尼亚地区的波罗的海沿岸）发现25 000枚。其他大多是在俄国发现的。[1]

正是在890年以后，这种毛皮贸易达到鼎盛时期，而东临俄国的瑞典的伯卡更是最为活跃的地区。"库发"德拉姆币从瑞典向西沿着贸易路线，经过赫达拜，穿过北海到达不列颠诸岛上的斯堪的纳维亚控制区。正因为如此，约克郡的戈尔兹伯拉夫（Goldsborough）发现的一个年代大概在925～930年的窖藏有37枚硬币和其他银制品，其中有35枚德拉姆币，而在这35枚德拉姆币中至少有28枚是萨莫尼德出产的，是在895～911年间例如萨马克坎这样的铸币厂铸造的。[2]

同这个窖藏一样，很多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硬币窖藏中也发现有银饰品或银饰品残片，以及有意砸碎的银块和被割开的德拉姆币，因此可以推知北【803】欧海盗按重量将银作为一种交换方式，而硬币仅仅被作为银的一种形式使用。这个观点得到了从民间传说中发现的证据以及斯堪的纳维亚自己从未铸造过正规硬币这个事实的印证。因此，当这些德拉姆币在10世纪进入俄国、瑞典、丹麦、波兰或英国北部地区时，是否被用作严格意义上的货币还不能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在贸易的推动下它们的确在一些地方流通。一个来自穆斯林西班牙埃布罗河畔托尔托萨的犹太人在965年曾旅行经过美因茨，他评论说他在那里发现集市上不仅出售当地的谷物和葡萄酒，还有印度芳香剂和香料——甘松香油、胡椒、丁香和姜。他还写道，通用的德拉姆币是在萨马克坎在萨莫尼德·纳河·阿罕莫德（913～943年）统治时期铸造的。[3]这是中世纪历史上惟一一次，非欧洲硬币——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以一种相当引人注目的方式成为欧洲通货的一个部分。

这个插曲在965年左右突然结束。在波兰发现的一个10世纪后半期的硬币窖藏不再有大量伊斯兰德拉姆币。相反，它反映出有大量西欧硬币（尤其是德意志芬尼）进入该地。其他西欧硬币还到达俄国北部。那里发现的从11世纪上半期开始储藏的窖藏，藏有越来越多的德意志芬尼和盎格鲁—撒克逊便士。同样，从10世纪末到11世纪中期的斯堪的纳维亚硬币窖藏里，几乎都是德意志芬尼和英格兰便士，伊斯兰的德拉姆币失去了踪影。

---

① P.H.索耶（Sawyer）：《北欧海盗时代》（伦敦，1971年）。【22】

② 要了解这个及其他英国硬币窖藏，参见J.D.A.托马森（Thomson）的《公元600～1500年英国硬币窖藏详细目录》，《皇室货币学协会》（伦敦，1956年）。【23】

③ A.米克尔（Miquel）：《西欧同阿拉伯的关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编年史》，第21卷（1966年），第1048～1064页。【24】

这既反映了斯堪的纳维亚人们生活的一个新方向，也反映出奥特曼德意志和盎格鲁—撒克逊英国在10、11世纪日趋繁荣。

德意志和英国增加的财富，至少部分地，被用政治手段而不是商业手段转移到了瑞典。从991～1051年，英国人断断续续向斯堪的纳维亚人支付了大笔贡金和军人工资。如果那几年的资料所言属实的话，这笔费用是西法兰克人在9世纪末10世纪初支付的“丹麦金”的10倍。法兰克人在9世纪支付的贡金数量和英国人在11世纪支付的贡金数量之间的变化，可能反映出在西欧（尤其是在德意志和英国）流通的货币数量的增长。

在斯堪的纳维亚内部，对待硬币的态度似乎也发生了变化。被砸碎的银块和硬币碎片不再是那时的硬币窖藏特有的组成部分了。这可能意味着银币不再被仅仅作为承载一定重量的银的一种方式。斯堪的纳维亚内部也开始铸造硬币，说明人们对银币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最初模仿的是最容易获得的硬币，特别是英国爱特尔雷德二世发行的便士。通过模仿英国便士，斯堪的纳维亚铸造的硬币或者带有英国国王的名字，或者带有错误和不连贯的文字，但这是创造真正的本土硬币的一大进步，尽管是以其他国家的硬币图案为基础的。① 【804】

铸币活动向斯堪的纳维亚的延伸仅仅是铸币厂在地理分布上大扩张的事例之一。10世纪意大利北部、法国和英国东南部的铸币规模越来越大。先前几乎停止铸币的莱茵兰和尼德兰南部，也开始恢复铸币。它从上莱茵兰经过巴伐利亚延伸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从中莱茵兰经过萨克森延伸到易北河和一段时间内的波兰，从莱茵河河口沿着北海海岸延伸到丹麦和一段时间内的瑞典和挪威，从英国东南部进入约克和切斯特，以及一段时间内的爱尔兰。铸币区域的大范围延伸自然伴随着用英镑和先令计算它们的制度的延伸。

流通硬币数量的增加与银矿的开采尤其有着直接关系。对留存下来的以阿德莱德王后（Adelaide，empress）的名义铸造的芬尼币的各种成分所做的摄谱仪分析说明，其中大多数是用哈尔兹山脉戈斯拉尔镇的拉梅尔斯堡开采的银铸造的。阿德莱德在951年嫁给奥托（Otto）大帝，他们俩人的名字出现在在她陪嫁过来的土地上铸造的芬尼上。后来她的名字跟她的儿子奥托二世及孙子奥托三世的名字一起出现在硬币上，公元999年去世时她是她孙子的摄政王。尽管戈斯拉尔的银矿开采开始于10世纪60年代，至少通过用它

① B. 马尔默（Malmer）：“Nordiska Mynt före år1000”，*Acta Archaeologica Lundensia*，第4章（伦特—波恩，1966年），有英文摘要。【25】

铸造的"阿德莱德—奥托"芬尼来看，它的发展一直很缓慢，直到奥托三世（983～1002 年）统治时期，戈斯拉尔铸币厂才有能力发行大量的"阿德莱德—奥托"芬尼。[1] 拉梅尔斯堡的"古老矿藏"只是哈尔兹山脉银矿中的第一个银矿。除此之外，10 世纪末 11 世纪初在德国其他地方又开发出许多新的银矿。因此，从 10 世纪后半期开始，西欧用于铸币的银储量大为增加。奥托一世曾不得不熔炼中亚的德拉姆币，以便在马格德堡铸造他自己的芬尼。11 世纪初的皇帝已不再需要这样做了，因为有足够的德意志白银可供使用。【805】

在 10 世纪的德意志和英国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是，有大量"城镇"获得了帝国或皇室的特许权，例如被授予建立集市和开办铸币厂的双重权利。但仍不确定的是，城镇是在获得特许权后才开始发展商业，还是它们的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皇室才给予他们特许权以表示许可和鼓励。可以确定的是铸币厂和集市常常并行发展。建立集市并不主要是为了以货易货，而是用货币买卖货物，要提供这个手段，当地铸币厂必不可少。

到了法兰克尼亚的康拉德（Conrad）大帝统治时期（911～918 年），除了东法兰克的"首府"雷根斯堡有铸币厂外，莱茵河东岸的德意志仍没有其他铸币厂，而且，除康拉德家族领地的中心美因茨尚有铸币厂外，莱茵兰加洛林时期的大量铸币厂都已关闭。美因茨和雷根斯堡的铸币厂发行量都不大。康拉德的继承者、萨克森地区的亨利皇帝（918～936 年）在马格德堡附近拥有家族地产，可能就是在这里他铸造并发行了芬尼币。亨利之子"奥托大帝"（936～973 年）统治时期正值戈斯拉尔发现银矿和德意志铸币厂开始转变之时。在他统治后期，他不仅在马格德堡，而且在其他 12 个位于莱茵河畔或莱茵河东岸的铸币厂铸造硬币。其中科隆铸币厂是最重要的。除了直接控制的铸币厂外，奥托大帝还向其他人（主要是教士）授予开办铸币厂的权利。奥托二世（973～983 年）和奥托三世（983～1002 年）又开办了大约 17 个铸币厂，而且向其他人（依旧主要是教士）授权开办了约 40 个铸币厂。到奥托三世统治末期，"德意志"有 80 多个铸币厂，而仅仅六七十年前的康拉德统治时期还只有两个铸币厂。这些新铸币厂大多位于莱茵河东岸，沿着从科隆到马格德堡的主要贸易路线集中在萨克森地区。在马格德堡，这条线路穿过易北河进入斯拉夫地区。在科隆，它穿过莱茵河进入在加洛林时期铸币厂最密集的地区。[2]【806】

---

① E. 克劳梅（Kraume）和 V. 哈兹（Hatz）：《奥托—阿德莱德芬尼及其重铸》，载《汉堡货币学论文集》，第 15 期（1961～1963 年），第 13～23 页及附录。【26】

② 祖勒：《德意志货币史》，第 157～158 页。【27】

在英国，继诺森布里亚尝试铸币的努力被北欧海盗中止后，这个国家东南部以外的地方直到10世纪初才开始铸币。直到10世纪70、80年代，那里的铸币活动才有大规模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同一时期，如同奥托统治下的德意志以及德意志的其他部分一样，新铸币厂开始同“市镇”和集市联系起来。在1000年，如同在莱茵兰和萨克森地区一样，货币开始在整个英国低地普遍流通。用来铸造这些硬币的银的来源也能说明一些问题。10世纪初在维塞克斯铸造的这些硬币，就像马格德堡的硬币一样，是通过熔炼中亚的德拉姆币铸造的，在斯堪的纳维亚控制的英国部分地区曾发现过这种德拉姆币窖藏。在10世纪最后30年，在英国流通的硬币数量有了真正大幅度的增长，但是英国却没有出现类似德意志银矿开采那样大的进展。有人坚信是德意志白银为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英国大量发行的便士提供了原材料，而且因为英国享有贸易顺差，白银从德意志流到英国。这种观点认为，受到新开采的德意志白银支持的大陆需求，刺激英国出口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羊毛和布匹。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在10世纪末，英国就开始有效控制欧洲的羊毛生产，并将对它的控制权维持了好几个世纪。[①] 到11世纪上半期，硬币的铸造和流通向英国各地的蔓延说明白银的大量进入非常大地促进了货币交换。甚至较发达地区以外的普通农民都可以（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硬币支付地租，而土地所有者则用硬币支付捐税。

盎格鲁--撒克逊晚期的英国可能是欧洲对德涅尔币或便士控制最为严密的地方。[②] 在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对英国劫掠期间，各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铸币都被迫停止，只有维塞克斯的铸币被保留下来。很快英国北部出现了各种寿命短暂的丹麦便士和爱尔兰—挪威便士，式样基本相同。随着西萨克森人再次征服英国，整个英国流通同一种硬币，各地区间仅有微小差异，如西北部的铸币厂。有铸币厂的城镇原本数量稀少，大量硬币在坎特伯雷和伦敦发行，但在10世纪硬币数量急剧增加，铸币厂的数目也相应增加。在爱特尔斯坦（Æthelstan）国王统治时期，国王规定每个市镇要有一个铸币厂，但这并不意味着铸币权的极端分散。皇室对铸币保持着非常严格的控制，因为整个国家的铸币模型或者在一系列地区作坊刻制出 【807】

---

① P. H. 索耶：《英国在11世纪的财富》，《皇室交易史协会》，第5系列，第15章（1965年），第145～146页。【28】

② 要了解这方面及有关盎格鲁—撒克逊晚期铸币的其他方面内容，参见《盎格鲁—撒克逊硬币》中的论文，R. H. M. 多利（Dolley）编写（伦敦，1961年）。【29】

来，或者在温彻斯特或伦敦的某一个中央作坊刻制出来。在接下来的一代人时间里，铸币厂的数量有了大幅增加，但每个市镇有一个铸币厂的目标却从未实现，尽管钱商时刻准备在相邻的市镇开办铸币厂。从 1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皇室对铸币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因为在每一个固定的期限里——大概为 6 年——所有货币都要收回重铸，而将先前发行的硬币作废。硬币窖藏提供的证据表明，这个宏伟政策的确被付诸实施了，在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期，硬币的寿命进一步缩短到 3 年。同西法兰克的封建硬币体系（feudalised coinages of West Frankia）（即连续 3 个世纪发行同一种货币，并且质量每况愈下）相比，这样的硬币体系是令人吃惊的。先前只有加洛林时期尝试过统一硬币体系，但即使那时也没有定期更新货币。后来欧洲其他地方也开始定期铸币，例如帝国统治崩溃后德意志的一些教会公国以及 12 世纪的波兰。然而，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在 10、11 世纪对货币的控制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统治者，甚至包括奥托皇帝，都没有太大能力来操纵硬币。事实证明，英国大量铸币厂的存在对于这样的定期重铸是非常重要的，有证据表明政府曾努力保证任何人离铸币厂不超过 15 里。盎格鲁—撒克逊便士重视表面价值，而不是内在价值，也说明了皇室对铸币【808】所拥有的至高权威。这些便士的重量和含金量在每次发行时都会发生变化，但它们的价值似乎一直保持不变，因为是国王规定它们的价值，而不是它们的固有价值决定其价值。在西欧其他地方，德涅尔币的价值完全由它的含银量或假定的含银量来决定的。

诺曼人全盘吸收了盎格鲁—撒克逊的硬币体系。这个体系继续发挥功能，仍旧三年一变，并以皇室信誉为基础，尽管在亨利一世统治之前铸币厂的数量日渐减少。在斯蒂芬统治时期，英国历史上惟一一次出现了封地硬币，皇帝信誉也开始坍塌。小规模的封地硬币成为苏格兰的国家硬币。[①] 斯蒂芬统治结束后，再不可能靠皇室的权威和信誉来维持硬币的效用。亨利二世（Henry II）放弃了恢复铸币三年一变的希望，并允许固定的硬币系列持续很多年。他注意到，如果便士要以其固有价值为基础，那它就必须是优质的、人民认可的和稳定的。12 世纪 70 年代开始，英国用于铸币的白银数量激增帮了亨利二世的忙。英国财政部逐步不按面值数量接受硬币，反映出以固有价值决定便士价值引发的态度变化。1 便士之所以是 1 便士，不再是因

---

① 关于苏格兰的硬币，参见 I. H. 斯图亚特：《苏格兰的铸币体系》，第 3 版（伦敦，1967 年）。【30】

为国王发布了这样的命令，而是因为，也仅仅因为，它含有价值1便士的银。因此，财政部更常凭重量接受硬币，或偏爱白色硬币。

将英国的西萨克森和诺曼国王的中央政府和货币体系与法国卡佩国王的中央政府和货币体系做比较，结果是惊人的。同法兰克的公爵一样，巴黎的卡佩伯爵像其他任何一个加洛林时代晚期的主要领主那样，都铸造德涅尔币。他们在10世纪获得的国王头衔，对他们发行硬币并没有什么影响。不像盎格鲁—撒克逊同时代君主，卡佩王朝早期的国王并不能控制他们整个王国内的铸币，而仅在他们自己的领地铸造与他们的封建邻居（feudal neighbours）一模一样的德涅尔币。在12世纪中叶之前，他们甚至不能保证他们所控制的几个为数不多的铸币厂发行同样的货币。

12世纪后半期白银供应量有所增加，使一些较为成功的地方封建硬币在12世纪末成为法国大部分地区的主要硬币。① 普罗万（Provis）的德涅尔币在法国东部盛行，梅尔格尔的德涅尔币在法国南部盛行，巴黎德涅尔币在法国北部、图尔德涅尔币在法国西部盛行。【809】

在法国东部地区，香槟四大集市城镇之一的普罗万德涅尔币不仅仅在普罗万斯邻近地区流通，而且在更远的地方出现，先是击垮了特鲁瓦的货币，接着逐渐成为记账货币的基础，成为不仅是香槟及其所有集市，而且是沙隆、巴罗伊斯（Barrois）及洛林的标准硬币。从香槟的亨利一世统治开始（1152～1180年），随着香槟集市赢得国际地位，普罗万的德涅尔币也从地区货币上升为国际货币。通过集市这个媒介，普罗万的铸币厂得到大量白银，部分是由商人以银锭的形式从德意志带进来的。普罗万德涅尔币在集市上沿着贸易路线向外流通，特别是到意大利。在12～13世纪初它们在意大利流通非常广泛，以致罗马几任元老院议员都模仿它们铸造了普罗万德纳里币。即使香槟停止发行普罗万德涅尔币很长时间后，普罗万德纳里币依旧是罗马的基本货币。②

在法国南部，由马格朗主教以及梅尔格尔或莫吉奥伯爵发行的梅尔格尔德涅尔币控制了朗格多克海岸平原的整个贸易。它们不仅成为附近发展迅速的蒙彼利埃城的官方硬币，而且流通广泛，使西部地区的伯齐斯和卡尔卡松，东部地区的乌泽斯、尼姆斯及罗讷河三角洲上的圣吉尔不再独立发行硬

---

① 要了解法国的封建铸币体系，参见A. 布朗谢（Blanchet）和A. 迪厄内多（Dieudonné）：《法国货币学手册》，第4册，《法国封建货币》（巴黎，1936年）。【31】

② P. 图贝尔（Toubert）：《9～12世纪中世纪拉丁地区的结构》，载《雅典和罗马法国学派丛书》，第221章（罗马，1973年）。【32】

币。所有这些都在13世纪初结束了，当时梅尔格尔德涅尔币已成为从图卢兹到普罗旺斯（Provence）的公共货币，甚至流通到远至巴塞罗那的地方。[①]

在12世纪初，卡佩王朝的（Capetians）巴黎德涅尔币还仅仅是巴黎的货币，但路易七世关闭了皇室领地中的其他大多数铸币厂，使巴黎德涅尔币成为整个法国的通用货币。在腓力二世·奥古斯都（Philip Ⅱ Augustus）统治时期（1180～1223年），法国开始大规模铸造巴黎德涅尔币，并使其成为法国北部大部分地区的通用货币。腓力二世下令，不仅在巴黎【810】而且在当时重要的海港城市梅勒河畔的蒙特勒伊铸造巴黎德涅尔币。当他于1191年继承了阿图瓦和佩罗讷后，也在阿拉斯、圣奥梅尔和佩罗讷铸造这种硬币。很快圣波尔、普休和布罗格尼伯爵，以及韦曼多瓦女伯爵都仿铸了巴黎德涅尔币。波万、拉昂和努瓦永主教独立发行的硬币到1220年停止使用，因此，在13世纪前25年，从奥尔良到佛兰德都普遍利用巴黎德涅尔币作为付账货币和记账货币。

直到13世纪，法国才真正拥有一种国家货币。[②] 1204年，腓力·奥古斯都从英国国王安茹的约翰手里得到了诺曼底和金雀花王朝在法国西部的大片土地，从而极大地扩充了他的王权范围。腓力并未强行在他新获得的法国西部土地上发行巴黎德涅尔币，而是默认该地区已经流通的较为成功的硬币，即由圣马丁修道院在图尔铸造的德涅尔币，在13世纪前半时期这种硬币曾被大量铸造。腓力废除了曼恩（Maine）和安茹的独立铸币权，并将图尔的铸币厂归入他的直接统辖之下。从此以后，图尔德涅尔币和巴黎德涅尔币都受皇家控制，后来由于人们偏爱较轻的图尔币，因此图尔币就成为法国的国家硬币，不仅仅在图尔铸造，而且在整个法国越来越多的皇家铸币厂中铸造。即使在法国北部，图尔币也代替了巴黎币。在法国东部，在1210年或可能1224年对普罗万斯德涅尔币做出修改，以使其与图尔德涅尔币保持一致。13世纪末，当法国国王迎娶香槟女继承人后，香槟也开始铸造图尔币，代替了普罗万币。在法国南部，离蒙彼利埃几里远的索米耶尔建立了一个皇家铸币厂，铸造图尔德涅尔币，有意同逐渐在朗格多克失去主导优势的梅尔格尔德涅尔币展开竞争。[③] 1282年，皇室颁布

① M. 卡斯坦—西卡尔（Castaing-Sicard）：《10～13世纪朗格多克的封建货币和货币流通》，《图卢兹马克·布洛克联盟手册》，载《法国南部历史研究》，第4册（图卢兹，1961年）。【33】

② A. 布朗谢和A. 迪厄内多：《法国货币学手册》，第2册，《从休·卡佩到大革命时期法国皇室的货币》（巴黎，1936年）。【34】

③ T. 比森（Bisson）：《圣路易统治时期朗格多克的铸币和皇室货币政策》，《中古世纪知识宝鉴》，第32章（1957年），第443～469页。【35】

了一道法令，将梅尔格尔德涅尔币的流通限制在梅尔格尔教区，从而有效地摧毁了梅尔格尔德涅尔币作为贸易货币的地位。采用同样的方式，其他“封建”硬币的流通也被从理论上限制在发行人的领地上，而皇室硬币却可以在整个王国内自由流通。皇室在 1293 年获得蒙彼利埃后，就将索米耶尔的铸币厂搬到了那里。中世纪末，蒙彼利埃铸币厂是除巴黎外法国发行量最大的两家铸币厂之一。马格朗主教从理论上保有铸币权，但 14 世纪图尔币已成为朗格多克的公共货币。到 14 世纪中叶，梅尔格尔德涅尔币甚至在蒙彼利埃被停止作为记账货币使用。在 14 世纪 30 年代，法国国王从一些封建领主手里买回了铸币权。因此，在中世纪末期，在法国惟一有效的非皇室硬币是那些并不受皇室控制的最大的、近乎自治的王侯发行的硬币，如布列塔尼公爵，或同时也是英国国王的吉耶纳公爵。[811]

尽管卡佩王朝努力在封建割据中建立一种国家硬币，而且英国也以适当的重量和含银量为基础重建硬币体系，帝国的铸币体系却几乎完全落入地方首领手中。随着 12、13 世纪萨利王朝的结束，帝国权威也开始衰落。在德意志，可以与 13 世纪“强大的”法国和英国政府相提并论的不是帝国政府，而是王侯政府。很多 13 世纪的德意志王侯很早就对他们的侯国实施了中央集权式控制，尽管这些侯国的面积并不十分大，或它们的经济还未得到高度发展。在这个诸侯割据期，发行了两种不同硬币。帝国南部和西部地区的地方统治者（意大利、罗纳河谷、巴伐利亚、洛林、莱茵兰、弗里斯亚及弗朗索瓦和斯瓦比部分地区）继续发行普通的德涅尔银币。另一方面，约从 1130 年开始，东部的地方统治者（波罗的海沿岸、萨克森、图林吉亚及弗朗索瓦和斯瓦比剩余地区）则铸造像纸一样薄的芬尼，或通常称为布莱克蒂斯德涅尔币。它们是用非常薄的银片铸造的，只在正面有图案。这种银币比普通的德涅尔币轻得多，固有价值也非常小。12 世纪末 13 世纪初，在波兰、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布莱克蒂斯德涅尔币的铸造也代替了较重的德涅尔币的铸造。在博拉四世统治（1235～1270 年）下的匈牙利，布莱克蒂斯德涅尔币同样代替了较重的德涅尔币。在很多地方，流通的布莱克蒂斯芬尼币总是隔一段时间就完全收回重铸，但与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及诺曼时期英国的做法不同。① 在当时，这意味着对该地区不是很发达的经济有着一个相对强大的中央控制。布莱克蒂斯芬尼由于缺乏固有价值而变得不重[812]

① S. 苏霍多尔斯基（Suchodolski）：《12 世纪波兰的货币改革》，载《Wiadomosci 货币学》，第 5 章（1961 年），第 57～75 页。【36】

要了，因为它的价值只是表面价值。我们可以认定人们用银锭或较好的银币支付长途交易的货款。布莱克蒂斯芬尼的弱点也并不重要，因为它们只是在有限地区、有限时间内流通。在最极端的案例中，银币在流通仅仅半年后就被全部收回重铸。

在13世纪四分五裂的帝国内，硬币发行者的数目似乎多得无法计算，而其中很多人只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就像后加洛林时期法国铸造"封建"德涅尔币的浪潮一样。在发行德涅尔币的混乱中，很多是在模仿英国的便士，尤其是13世纪10、20年代的威斯特伐利亚和13世纪中期的莱茵兰。前者模仿的是英国窄幅便士，与约翰献给奥托四世的贡金有关，而后者模仿的是英国的宽幅便士，与康沃尔的理查为皇帝宝座的出价有关。[①]

理论上属于帝国疆域但实际上有很大独立性的低地国家，铸币同样是一派纷乱的状态，尽管低地国家里较大的公国，如佛兰德（只有部分领土在帝国内）或布拉班特垄断了大多数铸币。低地国家是一个尤其容易模仿"外国"硬币或低地国家内其他侯国的硬币的地方，这个现象在后来发行大额银币或金币时期变得更加明显。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一度流行仿铸英国的斯特林便士。

在意大利，也是在帝国内部，12、13世纪同样出现了大量的铸币厂。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用于铸币的白银相对匮乏后，发行的德纳里币的数量也有大幅增加。然而，意大利的新铸币厂并非像帝国其他地方那样掌握在世俗领主或教士手中，而是掌握在城镇手中，这自然反映出那里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例如在托斯卡纳，除了位于卢卡的旧的皇室铸币厂外，1150～【813】1250年间又增加了5个新的市镇铸币厂。1151年，托斯卡纳的海港比萨建立了一个铸币厂，通过这个铸币厂进口了新的撒丁银块；1165年在沃尔泰拉建立了铸币厂；1193年，有银矿的锡耶纳建立了一个发行量不大的铸币厂；1236年，佛罗伦萨和阿雷佐也建立了铸币厂。[②]

尽管在10、11世纪的法国或德意志，12、13世纪的低地国家和意大利，在德涅尔币的发行上都出现了如此大的分裂，但不能认为在欧洲的每个政治边疆以内通货都会发生变化。除了边疆概念是个时代错误这个事实外，还必须强调的是，每个小领地有不同硬币并不意味着每个领地都有一

---

① P. 贝格豪斯（Berghaus）：《威斯特法伦、莱茵兰及低地国家的斯特林时期》，载《汉堡货币学论文集》，第1期（1947年），第34～53页。【37】

② D. 赫利希（Herlihg）：《1150～1250年比萨铸币及托斯卡纳货币的发展》，载《美国货币学协会·博物馆文集》，第4卷（纽约，1954年），第143～168页。【38】

种不同通货，只有英国相对成功地保证了"国家"通货只包括"国家"硬币。从腓力·奥古斯都开始的法国国王可能尝试这样做，但他们都未成功，其他地方就根本未做过这样的尝试，只有那些实行定期更新整个通货政策的地方除外。任何公国或城市的通货通常既包括本土硬币，也包括来自邻近地区和城市的大量的德涅尔币，以及来自远方地区的一些硬币。

12.3　商业革命：银马克、格罗特银币和弗罗林金币

在整个13世纪，贵金属开采量的大幅度增长，使欧洲硬币的变化成为可能。这一时期最先占据重要地位的银供应来源是1168年在迈森的弗赖贝格发现的银矿。[①] 它在12世纪最后30年取得的显赫地位一直保持到了13世纪。早在12世纪20年代就发现的卡林西亚州弗里萨赫银矿产量到13世纪初才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另一方面，13世纪20年代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边境伊格劳发现的银矿开发得非常迅速，代替了在13世纪后半期产量有所下降的弗赖贝格和弗里萨赫银矿。从13世纪50年代开始，比萨人开始大规【814】模开发沉寂了至少一个世纪的撒丁区伊格莱西亚斯（Iglesias）附近的银矿，很快就成为中欧银矿的竞争对手。[②] 13世纪欧洲开发的主要银矿储藏中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银矿，是1298年波希米亚的库特纳霍拉（科腾堡）银矿。[③] 各种估算显示，在14世纪的前40年，库特纳霍拉银矿年产量为20吨，但就像所有银矿一样，它也很快枯竭了。撒丁区的银矿似乎也是在14世纪40年代开始衰落的。从12世纪70年代起，正是那些最富有的银矿储藏为欧洲日益增加的货币提供了一个半世纪的原料。欧洲其他的小银矿也有不同程度的开发，从英国的贝尔奥尔斯顿到塞尔维亚的布拉斯科夫，从锡耶纳附近的

---

① W. 赫尔曼（Herrmann）：《采矿和文化》，载《弗赖贝格研究》，D系列，第2期（1953年），第7~22页。【39】

② R. S. 洛佩斯（Lopez），"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lle miniere argentifere di Sardegna"，载《卡利亚里大学经济学研究》，第24期（1936年），第7~13页。【40】

③ K. 卡斯特兰（Castelin）：《布拉格格罗索币》，载《萨克森土地文物保护论文及研究报告》，第16~17期（1967年），第665~675页。以及B. 荷曼（Homan）："La circolazione delle monele d' oro in Vngheria dal X a XIV secolo e la crisi europea dell' oro nel secolo XIV"，Rivista Italiana di Numismatica，第2系列，第5章（1922年），第132页。【41】

蒙泰里到艾费尔高原上的梅谢尼希，从卡拉布里亚到西里西亚，都是如此。① 但这些银矿，甚至那些在特兰西瓦尼亚或黑森林的银矿，都无法与弗赖贝格、弗里萨赫、伊格劳、伊格莱西亚斯和库特纳霍拉的银矿相媲美，正是这些银矿轮流占据着欧洲银产量的优势地位。尽管这些小银矿单个说起来都不重要，它们中的一些甚至使开采人陷入极大的财政困难中，但它们整体上增加了欧洲白银的数量。

统治者或大贵族本人很少直接开采这些银矿。作为惯例，王侯要抽取开矿收益的1/8或1/10，② 但他们常常与矿主做各种各样的个人交易，在支付了教会的什一税后，③ 大多数金属都掌握在矿主自己手中。在一些地方（例[815]如伊格莱西亚斯），采矿组织迅速从自由矿主发展为有匿名股东的开采公司。而在其他地方仍保留着原始的做法，开矿人继续独立小规模地在他自己的地界上采矿，他们向地区王侯缴纳数额不等的税，如迈森侯爵、萨尔茨堡主教、比萨城，以及最后的布热米斯里德国王及波希米亚早期的卢森堡国王。这些收益使王侯们能够实施广泛的政治扩张。掌握在矿主和银矿股东手中的大部分白银直接通过贸易进入流通领域，从而使矿区很快成为良好的集市，聚集了来自意大利北部和尼德兰东部这些欧洲发达地区的商人。在13世纪，银矿主似乎没有义务将他们开采的银在当地铸成硬币。当波希米亚的瓦茨拉夫四世在1300年向库特纳霍拉的银矿主提出这样的要求时，人们都很意外，自然不可能严格执行。因此，从采矿区运往欧洲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大多数新银不是硬币，而是含银量固定的银条或银锭。有证据表明它们通常重1马克，尽管马克的重量标准地区间各有不同。1204年春天，帕索主教沃尔格前往罗马。④ 他的财务管理人带了大量银条，沿路换成当地货币以

---

① 比尔·阿尔斯顿（Beer Alston）：《1261～1264年的保密案卷》，第187、227页；《1258～1266年的专利登记簿日历》，第249、253、304页，《1260～1267年的开放案卷日历》，第246页。L. F. 萨尔兹曼（Salzman）：《中世纪的英国工业》（第2版，1923年），第52～63页。A. 萨波里（Sapori）：*La compagnia dei Frescobaldi in Inghilterra*（佛罗伦萨，1947年），第19～20页及39页及以后；布拉斯科夫-D. 科夫斯韦（Brskovo-D. Kovacevic）：《中世纪塞尔维亚和波希米亚的金矿和银矿》，载《经济、科学、文化年鉴》，第15卷（1960年），第248～258页。蒙帝里-L. 西蒙尼（Montieri-L. Simonin）：《中古世纪托斯卡纳的矿产开发》，载《矿产年鉴》，第5系列，第14卷（1858年），第557～615页；梅彻里奇-F. H. 贝施拉格（Mechernich-F. H. Beyschlag）以及其合作者：《有用的矿物质和岩石储藏地：矿藏》（1909年，英文译文，伦敦，1914～1916年），第702页。Calabria-F. B. Pegolotti, La Pratica della Mercatura, ed. A-Evans. Medieval Acadomy of America (Cambridge, Mass., 1936). 291。【42】

② 霍曼："La circlazione delle monete d'oro in Vngheria"，第109～156页。【43】

③ 埃伯哈徳·戈特恩（Eberhard Gothein）：《德国黑林山经济史》，第1卷，（施特拉斯堡，1892年），第630～631页。【44】

④ 耶瑟：《货币史研究》，文件号370，第249～252页。【45】

支付主教一行的花费。在穿过塔维斯关口进入意大利和罗马所发生的13次交易中，有11次财务管理人拿出的银条的重量正好是几马克，这显然说明他所携带的大多数银条重1马克或正好是几个整数马克重。1265年，香槟锡耶纳银行家安德烈·托勒米记录了在特鲁瓦的“冬天”集市上，来自弗赖贝格的重几马克的银条同当地货币的兑换比率。① 1300年左右，布鲁日和佛兰德的其他城镇建立了专门的市政机构来提炼并检验白银，那里发行的银条盖有检验章以保证其质量。② 在威尼斯和热那亚，是铸币厂行使这个功能，在硬币模块上盖章，以使它们能够被大众所接受。③ 威尼斯或热那亚银【816】条没有存留到现在，但发现的为数不多的银条上面的标记，可以被解释为城市检验标记。对于大额交易，未铸成硬币的银块（假设已知其含银量）要比银币方便，因为几千枚银币必须一个个数出来，或一个个地称重量。这些银块中有很多最终在欧洲铸币厂被铸成硬币，但有一些经由欧洲货币体系进入非洲或亚洲。1311年左右在威尼斯编纂的《运河手册》记录了小亚美尼亚（Armenia, Lesser）和叙利亚的哈马（Hama）铸币厂有威尼斯银条。佩格罗蒂在他写于14世纪40年代的笔记中记录了在那不勒斯及突尼斯铸币厂撒丁区银块的兑换率。他提到在威尼斯、亚历山大、塞浦路斯的法马古斯塔（Famagusta）及小亚美尼亚的拉贾佐的“日耳曼”银块，并解释了欧洲银条如何在佩罗和君士坦丁堡被熔化，并被重铸成适合亚洲贸易需要的含银量不同的新银条。他还提到，克里米亚、亚佐海沿岸的塔那及前往中国的路线上的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银条，在边境地区，它们被兑换成纸币。④

当13世纪这些新银的供应量开始增加时，它们被铸造成（如果被铸造的话）已经铸造了几个世纪的同一种德涅尔银币或银便士，但数量更多。留存下来的硬币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在塞巴斯第安·齐亚尼和恩里科皮埃罗·马尔派诺（1172～1178年和1179～1192年的威尼斯总督）统治的20年里，威尼斯铸币厂所铸造的德纳里币要远远多于前一个世纪铸造的全部硬币。在法国腓力二世统治时期（1180～1223年），巴黎德涅尔币不仅成为巴黎的通用货币，而且是法国北部大多数地区的通用货币，并且开始大规模铸造。在英国，亨利二世于1180年开始发行的所谓“窄幅”便士也很早

① A. 绍布（Schaube）：《社会经济史杂志》，第5期（1897年），第248～308页。【46】

② R. 德·卢弗（de Roover）：《布鲁日中世纪时的货币、银行和售货》（1948年），第230页，G. 彼格伍德（Bigwood）：《中世纪比利时白银贸易的司法和经济体制》，第1卷（1921年），第422～425页。【47】

③ 佩格罗蒂（Pegolotti）：*La Pratica della Mercatura*，第291页。【48】

④ 佩格罗蒂：La Pratica della Mercatura。【49】

就开始大规模铸造。到13世纪20年代，两个主要的英国铸币厂，坎特伯雷铸币厂和伦敦铸币厂，一年铸造400多万枚便士。[1]

铸币扩张的第一阶段自然是铸造更多的同一种硬币，即各式各样的传统便士。第二个阶段才是铸造各种大额硬币。这个变化发生在13世纪初到14世纪中期的某个时间，视欧洲各个地区的经济需要而定。第二时期最早开始的地区自然是意大利北部地区，不仅因为那里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且大量新出产的白银都向那里流动，而且因为那里传统便士的含银量要比欧洲其他地方便士的含银量低得多。加洛林时期的德涅尔币重1.7克，而12世纪70年代帕维亚和威尼斯的德纳里币分别重0.2克和0.1克。相比较而言，英国便士仍保持了1.3克多的含银量。显然，要解决硬币的含银量下降这个问题，必须尝试用更好的新德纳里币代替旧的德纳里币。1155～1161年间，腓特烈一世大帝做了这样的尝试，在伦巴第开始铸造新的更好的帝国德纳里币。这种硬币的含银量不低于0.5克，因此价值是先前帕维亚和米兰的德纳里币的两倍。尽管新的帝国德纳里币很快代替了旧的德纳里币，但并没有解决关键问题。它仅仅是将伦巴第的德纳里币的标准提高到与托斯卡纳德纳里币相同。[2]

【817】

发生关键性变化的时期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多数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十字军将士同意为他们的海上交通付给威尼斯人51 000马克白银。其中多数是支付给造船木工及正在威尼斯兵工厂修造备用船只的工人的工资，还有出发后为船队提供给养及水手的费用。要支付这些工资和满足国内商业交易的需要，显然需要一个介于德纳里和价值2 400个德纳里的银马克条之间的货币单位。银条适用于远程贸易和大额交易，但对地租、工资等这些当地小额交易却毫无用处，而德纳里币价值又太小，也无法满足这些小额交易的需要。正是为了支付运送十字军战士的船员的工资，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达罗（Dandalo, Enrico）于1201年下令铸造大额硬币，即格罗斯币（grossi），[3] 每个格罗斯币值24个旧的德纳里币。这并不是说用新的格罗斯币代替了旧的德纳里币，因为旧的德纳里币（很快被称为皮克里币，piccoli）还继续与新的格罗斯币一起铸造。但货币体系中的的确确多了一个新成员。新的格罗斯

① C. E. 布伦特（Blunt）和 J. D. 布兰德（Brand）：《亨利三世时期的铸币厂产量》，《英国货币学杂志》，第39期（1970年），第61～66页。【50】

② C. M. 奇波拉（Cipolla）：*Le avventure della lira*（米兰，1958年）。【51】

③ M. 达·卡纳勒（da Canale）："Cronace Venta"，*Archivo storico italiano*，第8章（1845年），第320页。【52】

币不仅重约 2.2 克，比西欧自远古以来铸造的任何银币都重，而且几乎是纯银铸造，含银量为965/1 000。① 这与仍旧用1/4 银和 3/4 合金铸造的旧德纳里币形成了鲜明对比。 [818]

威尼斯在地中海贸易上最大的竞争对手热那亚也在 13 世纪初开始铸造格罗斯币，同热那亚关系密切的马赛也开始于 1218 年铸造同一种硬币。在 13 世纪 20、30 年代，铸造格罗斯币的风气很快蔓延到例如维洛那（地位刚刚被威尼斯超越，但仍是意大利东北部地区主要的铸币城市）、帕尔马、博格纳、费拉拉及亚平宁莱斯北部的雷焦这些城市。米兰在这一时期当然也在铸造格罗斯币，而且可能早在 12 世纪 90 年代就这样做了。亚平宁莱斯南部的锡耶纳（当时托斯卡纳第二大城市）于 1231 年开始铸造格罗斯币。当时托斯卡纳最大的城市比萨在几年后也开始这样做。发展迅速的佛罗伦萨在 13 世纪后期超过了锡耶纳和比萨，到 1237 年也开始铸造格罗斯币，大约同时卢卡和阿雷佐也如法炮制。②

托斯卡纳的这些格罗斯币在一开始可能重量一致，但北方各个城镇格罗斯币的重量则不尽相同，尽管它们的大小一致，而且价值明显不同于已经在意大利北部地区流通的皮克里币。它们都是（至少最初是）由优质白银铸成，重量从博格纳和费拉拉格罗斯币的 1.4 ~ 1.5 克，到热那亚、维洛那和托斯卡纳城镇份量较重的格罗斯币，再到米兰和威尼斯格罗斯币的 2.2 克。它们同先前旧的皮克里币的兑换率在各个城市都有所不同，当然不仅要看格罗斯币的重量，而且要看皮克里币的重量和含银量。在热那亚，最早的格罗斯币仅值 4 个旧热那亚德纳里币，但在维洛那，格罗斯币值 20 个旧的维洛那德纳里币。在托斯卡纳，13 世纪 40 年代格罗斯币作为 12 个德纳里币的等值货币流通。换句话说，锡耶纳、比萨和佛罗伦萨的苏力第币已经成为（至少暂时的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而不仅仅是方便的计量单位了。③ 相当值得注意的是，先令已经作为计量单位存在了半个世纪，而未能成为真正的货币。早在 8 世纪托斯卡纳就有苏都币，后来它成为一种金币；到 13 世纪它被再次使用时，则是一种银币。 [819]

与旧德纳里币不同，大多数新格罗斯币的重量或含银量长期内都未发生变化。例如在威尼斯，格罗斯币或威尼斯人所谓的玛特潘币的价值从1201 ~

① P. 格里尔森："La Moneta Veneziana nell' economica mediterranea del trecento quattrocento"，*La Civilita Veneziana del Quattrocento*. Fundazione Giorgio Cini（佛罗伦萨，1957 年），第 77 ~ 97 页。【53】

② 赫利希（Herlihy）：《比萨的铸币》，第 143 ~ 168 页。【54】

③ 奇波拉：*Le avventure della lira*，第 37 ~ 38 页。【55】

1379年保持不变。同时，皮克里币则不断贬值（尤其是13世纪中叶以后）因此格罗斯币相对于皮克里币的价值有所增长。当最初铸造玛特潘币时，其价值被定为2个苏力第币，或24个皮克里币。在13世纪上半期，它的价值长期是26个皮克里币。然而，在13世纪下半期，它相对于皮克里币的价值迅速上升。1265年它值27个皮克里币，1269年值28个，1282年则值32个。①

因此，1201～1237年，罗马北部各个重要的意大利铸币厂都开始铸造重量约为2克的格罗斯币。② 但这种重2克的格罗斯币并未成为中世纪末期的标准银币。更大的硬币（也叫做格罗斯币）出现了，大小是先前格罗斯币的两倍。这种货币最早出现在1253年的罗马，是布兰卡洛纳德·安多洛统治时期（1252～1255年和1257～1258年的元老院议员）。③ 它最初也被作为苏都币使用，值12个罗马德纳里币或普罗万斯币（provisini）。在安多洛（Andolo）去世后，罗马元老院和安茹的查理（1263～1266年，1268～1278年，1281～1284年的元老院议员）继续发行这种格罗斯币。当查理于1278年暂时失去对罗马的控制后，便在他当时的首都那不勒斯铸造相同大小的硬币，被称为卡利尼币（carlini）。当霍恩斯陶芬王朝的康斯坦丝及其丈夫阿拉贡的比德罗于1282年从查理手中再次夺回西西里岛时，也为西西里岛铸造了重的格罗斯币，被称为皮埃里币（pierreale）。卡利尼币和皮埃里币的寿命都很长，一直铸造到中世纪末。即使在意大利北部（13世纪初小型格罗索币的诞生地），也开始铸造这种较大的格罗斯币，例如米兰当时铸造的格罗斯币，因为其正面有圣安布罗斯端坐的图像，而被称为安布罗斯币。

铸造格罗斯银币的风气逐渐越过阿尔卑斯山渗透到日耳曼地区。重2克的维洛那格罗斯币成为埃切流域（Etsch，valley）或阿迪杰山谷贸易路线沿线地区争相仿铸的对象。特伦特主教从13世纪30年代开始，蒂罗尔伯爵到【820】1271年，用从蒂罗尔开采的白银在伯岑和梅兰（波兰扎诺和梅兰诺）铸造硬币，值20个维洛那旧德纳里币。因为发行它们的地区语言各不相同，因

---

① G. 卢扎托（Luzzato）："L'oro el'argento nell politica monetaria veneziana dei secoli XIII – XIV"，*Rivista Storica Italiana*（1937年），重印于*Studia di Storia Economica Veneziana*（帕多瓦，1954年），第261～263页。【56】

② P. 塔里尔森：《意大利格罗索币和金币的由来》，载《货币学杂志》，第7期（1971～1972年），第33～48页。【57】

③ P. 格里尔森：《1253～1258年罗马议院发行的格罗斯币》，载《意大利货币学概要》，第58期（1956年），第36～69页。【58】

此有很多种称谓，如因其价值而被称为二十币（zwanziger），或因其来源地而被称为蒂罗尔币，而在意大利因其背面图案为鹰而被称为鹰币，在德意志因其正面图案为双十字架而被称为十字架币。这种银币在如今的奥地利、瑞士和德国南部广为仿铸。① 正如意大利在铸造了重2克的格罗索币后不久，又铸造了重4克的格罗索币一样，北方铸造银币的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最先铸造了重2克的格罗生币或十字架币，后来又铸造了重4克的格罗生币。在这些大额格罗生币中，波希米亚的布拉格格罗生币发行量最大，这种从1300年开始在银矿镇库特纳霍拉铸造的硬币重约3.8克。最初它值12个先前的芬尼。② 不久迈森侯爵也在弗赖贝格发行了相同重量的硬币。尽管波希米亚格罗生币和迈森格罗生币也在附近地区（如西里西亚、劳希兹和勃莱登堡）流通，但欧洲这部分地区不出产白银，并不具备铸造此类大额银币的条件。甚至奥地利公爵此时也未尝试铸造此类大额的格罗生币，尽管有大量白银经过维也纳进入意大利。14世纪中期，卡西米尔大帝试图在波兰的科兰考发行大额格罗生币，但未成功，他的继承人只好继续发行类似小格罗斯币的夸特尼克币（kwartniks）。波兰低迷的经济使大额银币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波希米亚格罗生币似乎在意大利获得极大成功。它们自由地向南经过维也纳进入意大利来交换意大利人能够提供的商品，不仅在意大利北部地区通用，而且还在海外的威尼斯商人必经的东部贸易路线上流通。根据佩格罗蒂的记录，它们以波希米亚布米尼币的名称在很多地方出现过。因此，当布拉格格罗生币最初发行时，主要在已经接受大额格罗斯币的地方流通。若干年以后，它们才对德意志和中欧的货币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在1329年（比波希米亚晚了二三十年）的匈牙利，安茹查理一世之孙查理·罗伯特废除了前半个世纪的布莱克蒂斯币，引进了一种新的格罗生币。他从库特纳霍拉引进了一些工人（可能是意大利人），利用从他领地银矿开采出来的银铸造硬币。这些硬币在样式上模仿的是意大利的硬币，即自罗伯特祖父时代就在那不勒斯铸造的吉格拉蒂币（qiqliati）。【821】

欧洲其他地方则逐渐开始使用大额银币。安茹的查理的长兄圣路易早在1266年就开始为法国铸造重4克的硬币，而查理本人也于次年为普罗旺斯铸造这样的硬币，阿拉贡的詹姆斯一世于1272年为蒙彼利埃铸造了这种硬币。圣路易的图尔格罗斯币（gros tournois）起初似乎发行量并不大。就像

---

① 祖勒：《德意志货币史》，第157~158页。【59】

② K. 卡斯特兰（Castelin）：《布拉格格罗索币，1300~1547年布拉格格罗生币及其分支》，第2版（布伦斯威克，1973年）。【60】

早期的布拉格格罗生币一样，它们似乎在意大利比在它们本土的用处更大。与其他很多“大额”硬币类似，它们最初价值12个德涅尔币。因此在发行后的第一个25年，图尔格罗斯币就是图尔苏银币，但1290年腓力四世减少了图尔德涅尔币的重量，而格罗斯币的重量保持不变，从而结束了它们先前的对等关系。从那时起，同其他很多“大额”硬币一样，图尔格罗斯币同法国两种记账货币图尔德涅尔币和巴黎德涅尔币的价值比率始终在发生着变化，因为这两种银币及以它们为依托的记账体系也时常发生变化，而且往往越变越差。

在同意大利有着密切的商业和政治联系的巴塞罗那，很早就开始使用“大额”硬币。早在1268年，年轻的佩德罗以他父亲阿拉贡的詹姆斯一世的名义提议铸造一种普拉特格罗索币（grosso de plata），但受到阿拉贡城的反对而不得不收回这项提议。1284年，已经成为国王的佩德罗开始在西班牙铸造第一批“大额”硬币系列，同时他也开始在西西里发行相同大小的里尔币（reales）。这些普拉特格罗索币，或后来被称为格罗特币的硬币，最初价值为12个特纳尔第纳罗币（dineros ternales），即巴塞罗那的苏都币（sueldo），但因为它们的重量和含银量保持不变，而第纳罗币却未能保持这种稳定，因此格罗特币相对于第纳罗币的价值逐渐上升。

与意大利联系没有这样紧密的卡斯蒂尔情况则完全不同。它从1258年开始发行13世纪欧洲最大的银币：重6克的普拉特马拉弗迪币（Maravedis de plata）。如此大的银币在卡斯蒂尔早期的经济形势下并无多大用处。它的发行很快被停止，但在停止之前已有非常多的马拉弗迪币进入流通领域，以至于这种马拉弗迪银币取代了旧的马拉弗迪金币成为后来卡斯蒂尔记账体系的基础。很快，马拉弗迪银币不再单指一种大额银币，而是指10个卡斯蒂尔第纳罗币的货币单位。一个世纪后在佩德罗一世统治时期（1350～1369年），才成功地确立了卡斯蒂尔中世纪末期的标准“大额”硬币。这便是里【822】尔币，一种显然仿照卡斯蒂尔的同盟国法国的图尔格罗斯币铸造的硬币。[①]

初看上去，铸造大额银币的风气并没有更迅速地蔓延，特别是没有蔓延到当时欧洲第二大经济发达地区尼德兰南部，这一点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那里的货币状况与在13世纪初引进格罗斯币的意大利的货币状况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布鲁塞尔发现了一个有着140 000多枚德涅尔银币的硬币窖藏，说明了布拉班特1264年时的货币状况。这个重量超过2英担（相当于100公

① O. 吉尔·法雷斯（Gil Farres）：《西班牙货币史》，第2版（马德里，1976年）。【61】

斤）的硬币窖藏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中世纪硬币窖藏之一，也说明了在引进格罗特银币和金币之前人们所使用的硬币之多。这个窖藏中有两种主要货币：英国的便士和布拉班特自己的德涅尔币。前者是一种大额硬币，完全不同于意大利的旧德涅尔币。事实上，意大利较小的新格罗斯币并没有英国斯特林币重，英国斯特林币重约1.5克，由优质白银铸成。因此，那里并没有像意大利北部地区那样迫切需要一种新币。

这一地区最早出现的大额银币是双斯特林币，是由佛兰德和埃诺女伯爵君士坦丁堡的玛格丽特在1269年发行的。因其正面图案是一个骑着马的骑士而被称为保皇币。这种硬币重约2.5克，在接下来的40年里被整个低地国家广为仿铸。[①] 就像意大利和其他出产白银的地区一样，尼德兰南部使用大额银币的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使用保皇币二三十年后，1310年左右这个地区终于准备使用重4克的格罗斯币。在此之前，从1285年开始，图尔的铸币厂为法国国王铸造了大量的图尔格罗斯币，而当地王侯如布拉班特的约翰一世（到1294年）、荷兰的弗洛伦斯五世（到1296年）、列日沙隆的休（到1301年）及佛兰德那慕尔的约翰（到1303年），则仿照法国的图尔格罗斯币铸造了一些格罗顿币（grooten）。然而，在13世纪80年代的阿图瓦，图尔格罗斯币仅被用于远途商业交易及伯爵同他在锡耶纳的意大利银行家之间的业务往来。[②] 在这一地区发现的13世纪90年代的硬币窖藏只有为数很少的图尔格罗斯币。[③] 重4克的格罗斯币金额仍然太大，无法在北方内部使用。英国也是同样情形，1279年爱德华一世试图发行一种重达6克的大硬币或格罗特银币，但没有成功。直到1351年，英国才具备发行格罗特币的条件。

【823】在14世纪，莱茵兰一些王侯（如科隆大主教）开始铸造重4克的图尔格罗斯币。然而，尽管巴伐利亚的路易四世和卢森堡的查理四世也发行这种银币，但德意志并未发行过这种银币。甚至北方的汉萨城市都没有铸造过，只有吕贝克在14世纪60年代曾做过一次最终还是失败了的尝试。这些地区内部的商业活动和城市生活的规模不足以发行这种大额硬币。直到14世纪后半期，它们才有足够的实力铸造威顿币，一种同英国银便士大小相同的4

① A. 恩格尔（Engel）和R. 塞鲁尔（Serrure）：《中世纪货币学的特点》，第3卷（巴黎，1905年），第1431～1432页。【62】
② C. 里什贝（Richebé）：《10～14世纪阿图瓦的封建货币》（巴黎，1963年）。【63】
③ 《瑞士货币学评论》（1963年），第67页。【64】

芬尼币。[1] 在威尼斯发行首批格罗斯币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波罗的海地区的通货还几乎完全由银条和非常轻的银芬尼组成。

这清楚地说明了欧洲不同地区间从便士发展到格罗特币的时间进程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异。这立即引发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条件决定一个地区可以使用大于银便士的货币单位。有时候，一些地区还未具备条件就试图发行这种大额银币，如卡斯蒂尔的阿方索十世（Alfonso X）、波兰的卡西米尔大帝、英国的爱德华一世及上面提到的吕贝克，但都失败了。当英国于1279年发行格罗特币失败时缺乏什么条件？当1351年成功时又具备什么条件？英国1279年的货币数量可能比1351年的要多。而英国对外贸易量1279年和1351年一样多。国际交易量的变化不可能是造成货币变化的有效原因。这便对人们常常做出的假说提出了怀疑，这种假说认为“大额”硬币，如格罗斯银币、格罗生银币或格罗特银币主要用于远程贸易。图尔格罗斯币在低地国家13世纪80年代并未广为流通，因为它金额太大，而不能用于国内日常交易，二三十年后它的用途仍极为有限，直到佛兰德的布匹生产和出口开始衰落后才有所好转。

13世纪的远程贸易付款主要通过汇兑工具进行。在缺乏汇兑工具的时期和地方，依旧用银条进行交易，偶尔用银币作补充，直到意大利以外地区再次出现金币。图尔格罗斯币可以充当国际付款的补充方式，但这并不足以【824】成为它存在的理由。对这种大额硬币的需求关键在于内部，而不是外部。

当威尼斯首次发行格罗斯币时，专门用它支付工资。工资的支付和花费是普通硬币最常见的用途。当由于货币贬值或工资水平上涨而使基本硬币金额太小时，没有大额银币就显得很不方便了。在1279年的英国，便士足以支付工资，格罗特币则因金额太大而用起来很不方便，但1351年的工资水平正在倍增的过程之中，这便急需新的格罗特银币和半格罗特币。

城市租金和工资（不管是日工资，还是布匹贸易上的计件工资）决定着对大额银币的需求，这本身就说明了“商业革命”时代城市和工业复杂性的增加。贸易习俗和商业技巧的改变并没有直接引起水平仍很低的货币体系发生任何变化。商业习俗的变化所带来的副作用之一是贵金属不再像先前那样被作为付款的惟一方式。

在一些主要的商业城市中，货币兑换商将他们的业务从手工换钱拓展到接受储蓄，然后根据储户的口头命令把钱从一个账户划到另一个账户上。在可能最早实行这种本地银行业务的中心城市热那亚，古列莫·卡西尼斯

① W. 耶瑟：《温迪施的货币联盟》（吕贝克，1928年）。【65】

(1190～1192年)的公证登记表说明，本地交易不仅可以通过同一银行内的转账付款，还可以通过城镇中不同银行间的转账付款。到14世纪，有几个城市的商人已习惯于尽可能委托银行通过账户付款。① 通过提供信贷和让他们的现金储量少于总存款量，这些地方银行家不仅使付款更为方便，而且增加了货币的供应。14世纪可转让票据的出现也增加了货币供应，如城市公债票据，但仍限于几个城市，如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

远程贸易同样也减少了人们对贵金属的依赖。旅行商人不再需要随身携带若干马克银或若干盎司金（视贸易区域而定），而坐商则可以通过汇票向他的代理人或代理处汇款，或收到他们的汇款。到13世纪末汇票似乎已经成型。它的发展开始于100年前。留存下来的热那亚公证登记表中有12世纪末的汇票，大多与热那亚和香槟集市间的交易有关。13世纪香槟集市似乎是欧洲的主要货币集市及发展汇票的最佳场所。在14世纪前半期，西欧大部分城市常常通过汇票支付商业款项。商人—银行网络集中在意大利北部的大贸易城市，特别是托斯卡纳地区的城市及阿维尼翁（Avignon）的教廷。这个网络向西延伸到蒙彼利埃、巴塞罗那、瓦伦茨、塞维尔及里斯本，向北延伸到香槟集市（在它们失去重要性之前）、巴黎、布鲁日和伦敦，向南到那不勒斯和巴勒莫。② 即使在这些城市之间，尽管大多数交易能够通过汇票进行，任何最终的收支不平衡都必须通过金或银来解决。当收支严重失衡时，汇率就会上升（或下降）到打破黄金输出（入）点。换句话说，运送金银块（包括随之发生的费用和风险）在一段时间内比购买汇票便宜。一些国际政治款项，如为长期驻扎的军队支付的军饷，或向外国盟友支付的昂贵补助金，或皇室成员被俘需缴纳的赎金及出嫁的嫁妆，都因金额过于巨大而无法用普通的商业体系处理，而必须大部分或全部用黄金或白银支付。

[825]

在这些城市以外，更多的普通国际款项仍然主要用金银块支付。在这种情况下，买方给予卖方、或卖方给予买方的赊欠通过延期付款增加了货币供应，并达成更多交易。在贸易收支长期严重失衡的地方，如欧洲的采矿中心和商业发达地区之间，汇兑体系没有太多的发展机会。14世纪波兰的教廷财产管理人仍不得不携带金银块前往布鲁日和威尼斯，后来才利用西欧的银行体系通过汇票汇款给教廷。在15世纪前，即使德意志最著名的贸易城市，

---

① R. 德·卢弗：《商业、银行和经济思想》，《R. 德·卢弗论文选编》，朱利斯·柯什纳（Julius Kirshner）编，（芝加哥，1974年）。【66】

② R. 德·卢弗：《14～18世纪汇票的发展》（巴黎，1953年）。【67】

[826] 如吕贝克，也始终游离在这个汇兑体系之外。

在基督教欧洲、穆斯林北非和黎凡特之间，尽管贸易量很大，而且很早就有了经理、搬运工和代理人这样的劳动分工，汇票的使用却几乎没有什么发展。这不仅与它们长期贸易失衡，而且与这三个地区赋予金、银的价值之间的很大差异有关。

北非西部地区和西欧之间的贸易收支似乎有利于欧洲，总是用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西非黄金结算。基督教欧洲和黎凡特之间以及穆斯林北非和黎凡特之间的贸易收支有利于黎凡特，总是以欧洲白银和非洲黄金结算。近东在同中东和远东的贸易收支中处于劣势，因此很多非洲黄金和欧洲白银流入亚洲。因为欧洲出产白银而非洲出产黄金，因此白银的价值在欧洲比在非洲低，而黄金的价值非洲比欧洲低。当这种价值的不成比例大到足够抵消穿越西地中海航行的风险和费用时，有时携带欧洲白银前往非洲购买黄金就有利可图。① 人们常常在携带普通货物的同时也会携带多余的白银南下和多余的黄金北上。在既有欧洲白银又有非洲黄金的黎凡特、金和银之间的关系变化更多。有时候威尼斯人携带中欧的白银前往亚历山大返回时带上黄金很有利可图，而有时候热那亚人携带新从北非得到的黄金而不是新从香槟得到的白银去亚历山大，能获取很高的利润。

在13世纪交易量增加之前，西欧以外地区缺乏白银，而西欧内部缺乏黄金，只有西西里、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除外，那里一直用黄金作货币，在整个中世纪早期一直在铸造金币。那里发现了一些数量有限的拜占庭金币苏力第币和伊斯兰第纳尔金币，但这些金币的使用范围尚无法确定。

阿尔卑斯山以外地区很少使用苏勒德斯币，甚至有理由认为它的用途比资料显示得更为有限。苏勒德斯币名下的钱款常常用白银支付。例如，[827] 1178～1179年的英国财政部档案（卷筒卷宗，Pipe roll）显示，20苏勒德斯币的债务可支付40先令，即480个银便士。第纳尔币的用途比苏勒德斯币的用途更小。10世纪后伊斯兰金币才开始流通，当时来自西非的黄金在西班牙和西西里再次掀起铸造金币的热潮。13世纪法国南部的一些款项就是用第纳尔币支付的，但在其他地方它们不被用作货币。在13世纪的英国，硬币（大多数来源于西班牙）被用于珠宝收藏和救济穷人等非商业目的，如虔诚的捐赠人向圣坛捐赠硬币。

---

① A. M. 沃森（Watson）：《重新使用金银》，《经济史评论》，第2系列，第20章（1967年），第1～34页。[68]

欧洲地中海地区情况则有所不同。在穆斯林统治时期，西西里铸造了与北非硬币类似的塔里币或1/4第纳尔币，这些硬币在长期习惯使用拜占庭金币的意大利南部基督教地区也有流通。10世纪的阿墨尔菲宪章显示，人们常用塔里金币购买土地、房屋和奴隶。因此萨勒莫从11世纪中期到12世纪末一直在铸造塔里币，而阿墨尔菲也从11世纪中期到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铸造塔里币。1231年，腓特烈二世在墨西拿铸币厂和布林迪西铸币厂发行了著名的奥古斯都币。事实证明，奥古斯都币是西欧中世纪末金币的先驱，而不是原型。只有安茹的查理接管了腓特烈的西西里王国后，对这种式样古典的精美硬币进行了仿铸。西欧金币模仿的是贸易城市的硬币，而不是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王侯”的硬币。

除了9世纪以外，穆斯林西班牙一直在铸造金币。基督教西班牙又在11世纪在巴塞罗那发行了曼卡斯奥罗币（mancusi de oro），12、13世纪在卡斯蒂尔、莱昂和葡萄牙发行了第纳尔币和双第纳尔币。

长期铸造金币的不仅有北非，而且还有西班牙（伊斯兰西班牙和基督教西班牙）、意大利南部地区以及西西里，地中海西部海域周围的国家大多发行第纳尔币。因此，大部分在地中海西部进行贸易的城市，诸如热那亚、比萨及后来的佛罗伦萨，自然大量使用第纳尔金币。12、13世纪，第纳尔币不规范的标准给这些贸易城市带来了问题，因此它很快不能再用于商业用途。需要发行新的硬币代替第纳尔币。以盎司为单位的金末或金叶开始用于商业交易，但不是很方便。花哨的奥古斯都币也被证明不实用。然而，热那亚开始为它的海上贸易发行格诺威金币（genovino），同一年佛罗伦萨也开始发行弗罗林币。格诺威币和弗罗林币都重3.5克，比同时期阿尔莫哈德的第纳尔币重很多，而且都是用足金铸成，而第纳尔币的含金量已大大降低。 【828】

格诺威币和它的1/4即塔罗币（quartarolo）似乎被广泛应用于地中海西部的商业交易中，尤其是那些使用第纳尔币和塔里币的省份，尽管也被用于黎凡特。在13世纪，弗罗林金币的流通范围还十分有限，但到14世纪，它沿着日益重要的贸易路线进入北欧和西欧，并成为欧洲后来大多数金币的原型。

与此同时，在地中海东部，拜占庭帝国的苏勒德斯金币也越来越无法满足商业需求。它最初的重量和含金量一直保持到11世纪，但在此后迅速下降。11世纪末（1092年）人们试图提高它的标准，结果出现了一种“纯金”的苏勒德斯币，即海披伦币（hyperperon），据说是纯金，但实际上含金量不超过85%。这种苏勒德斯币被意大利人称为伊波佩罗币（iperpero），

而其他欧洲人称其为珀佩币（perper）。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在1204年后没有铸造珀佩币，尽管被流放的拜占庭王朝继续在尼西亚铸造金币。最后一批“纯金”的珀佩币是由约翰三世（1222～1254年）在尼西亚铸造的。尼西亚后来铸造的海披伦币和君士坦丁堡铸造的海披伦币在巴勒罗杰德1261年复辟后质量已非常之差，无法再满足商业需要。从安德洛尼克斯二世（1282～1328年）开始，这种金币的发行量已非常小，最后一批苏勒德斯币是在1341年铸造的，这离君士坦丁堡最初引进这种货币单位已有100年了。1341年后铸造的海披伦币根本不再是金币，而是银币。[1] 受海披伦币的衰落和消失影响最深的西方人是威尼斯人。在13世纪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的商业交易依赖的不是黄金，而是来自中欧的白银，以银块或格罗斯币的形式流通。然而，1269年“大委员会（Great Couneil）”在雷阿托附近建立了一个【829】官方炼金厂，并规定在威尼斯出售的黄金必须满足一定的含金量（23 $\frac{1}{4}$ 里尔＝0.979含金量）要求。这时期的大多数黄金仍来自西非，并通过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到达威尼斯，或直接来自柏柏里（Barbary），或甚至通过拜占庭和黎凡特到达威尼斯，但仍有小部分来自阿尔卑斯山。1284年，官方生产的金条被赛西尼币（zecchini）或杜卡金币所代替（与玛特潘币或杜卡银币相对应）。它们比格诺威币和弗罗林币稍重一些，也是由足金铸成。

当西欧缺乏黄金时，伊斯兰近东同时缺乏白银。但这一点在13世纪发生了变化，因为12世纪末一家又一家的铸币厂开始铸造银币，如大马士革是在1174～1175年这样做的。这些白银似乎来自基督教欧洲，那里当时正在开采银矿以增加白银产量。大多数白银是通过贸易到达近东的，但除此之外，十字军将士也带来他们国内惯用的货币结构，以及用来铸造硬币的白银。因此，铸造德涅尔银币的十字军国家的货币体系在12世纪进入使用金币的巴勒斯坦。13世纪又以同样方式进入使用金币的希腊。例如，在13、14世纪，法国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硬币就有直接仿照法国图尔德涅尔币铸造的德涅尔币。

总之，中世纪的货币史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7～12世纪的货币时代，根据使用语言的不同，这些银币被称为便士、德涅尔币、德纳里币或芬尼。第二个时期是从13世纪开始的较为复杂的大额银币时代，因为与便士相比它们较“大”，因此被称为格罗特币、格罗生币或格罗斯币。在第

① T. 贝尔特勒（Bertelé）：《1261～1453年拜占庭帝国发行的伊波佩罗币》，载《意大利货币学评论》，第59期（1957年），第70～89页。【69】

一时期西欧很少流通金币，但在第二时期，金币自黑暗世纪消失后又首次被定期发行。在第一时期除了银便士外，一定量的白银也以含银量固定的银锭或银条的形式流通，而有些款项更是以货品支付而不是银币，例如胡椒粉。在第二时期除了有格罗特银币和弗罗林金币外，西欧较发达的商业中心之间使用汇票估算，在其中最发达的商业中心还可利用银行转账。【830】

12.4　金币的胜利

在14世纪中叶，欧洲从主要使用银币转入主要使用金币时代。尽管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从13世纪后半期就开始铸造金币，但它的用途主要限于地中海地区，而且重要的黄金储藏都位于欧洲以外地区。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因为在中世纪扩张时期最后一个大规模开发的贵金属储藏是匈牙利的金矿，主要在科雷姆尼兹周围，约于1320年时开始开采。

1320年前匈牙利就开发过金矿，但在1320年开采规模发生了极大变化。13世纪和14世纪初只有少量黄金被送往威尼斯，但到1324年或1325年，匈牙利国王安茹的查理·罗伯特拥有大量黄金，足以让他在阿尔卑斯山外首次开始大规模铸造金币。[①] 他下令铸造同佛罗伦萨弗罗林币和威尼斯杜卡币相同重量和含金量的硬币。他第一次发行的硬币甚至还模仿了佛罗伦萨弗罗林币上的图案。

这些金币在欧洲不同地区不同时期被称为弗罗林币、杜卡币和金盾。在后来的发行中，匈牙利国王用他们自己的圣拉迪达斯的图像代替了佛罗伦萨守护神圣施洗者约翰的图像，并用他们自己的盾形纹章代替了佛罗伦萨百合。但从14～16世纪他们保持了佛罗伦萨弗罗林币的重量和含金量标准，直到金矿关闭。

意大利自从1252年引进弗罗林币和格诺威币后，黄金相对于白银的价格一直在上涨。14世纪20年代黄金数量突然激增，足以满足需求，同时1327年波希米亚国王和匈牙利国王签订了一项协议，不再往意大利输入白银。[②] 黄金相对于白银的价格在上升了3/4个世纪后，终于开始下降。威尼斯的黄金价格在1328年达到最高值后就开始下降，到1335年下降得十分厉

---

① 霍曼："La circolazione delle monette d' oro in Ungheria"，第128、131页。【70】
② 霍曼："La circolazione"，第123～125页。【71】

【831】害。在热那亚金价于1325~1327年达到最高值，佛罗伦萨是在1326~1331年间、锡耶纳是在1329年、那不勒斯是在1326~1327年金价达到最高值。[①] 1328年的硬币改革标志着威尼斯的基本货币从银币转向金币，而且从那时起，铸造杜卡金币远远比铸造格罗斯银币更为重要，以至于1343年一个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铸币机构，以便处理相关的数量问题。[②] 威尼斯一直是欧洲主要的银币出口国，向黎凡特输送银币。如今它成为金币的主要出口国，从14世纪中叶开始，杜卡金币成为整个中东的主要贸易货币，如马穆鲁克统治下的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的土耳其酋长国、希腊及爱琴海沿岸的小基督教国家。地中海东部的基督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自然大力仿铸这种硬币，杜卡币沿着贸易路线一直流通到远至南印度的地方。

与此同时，不仅仅威尼斯，意大利其他地方的黄金数量也有所增长。到14世纪30年代末，佛罗伦萨铸币厂每年铸造的弗罗林金币不少于350 000枚，有时会达到400 000枚。[③] 杜卡币从意大利向外扩散到黎凡特，而弗罗林币从意大利向外扩散到西欧，并在西欧被广为仿铸，标志着它流通范围之广，仿铸它的地区有阿拉贡、法国、低地国家、莱茵兰及吕贝克。

先前意大利以外地方也曾试图发行金币，但只有极少数成功。例如，1257年亨利三世在英国发行了一种金便士。当时英国拥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但被作为商品而不是货币对待。人们从西非的西班牙属地进口黄金让金匠加工成饰品是惯常之事，黄金也常被严格用于非商业目的，如国王向贫民提供救济。[④] 在这样的情形下，亨利三世发行金币的努力宣告失败。1270年左右圣路易在法国发行了一种埃索金币，但同样未获成功。北欧基本上尚未准备【832】使用（更不用说发行）金币。圣路易之孙腓力四世在几经周折后建立起了第一种成功的国家金币。1303年他引进了一种足金的西斯币，其最初的重量相当于两个佛罗伦萨弗罗林币的重量。他用白银高价从意大利购买黄金以铸造金币。因此，黄金从意大利流入法国，而白银从法国流出购买黄金。到约1310年，法国铸币厂总管估计法国已经出口了400 000马克白银（约100

① F. C. 拉内（Lane）："Le Vechie Monete di Conto Veneziane ed il ritorno all' oro"，Atti del Instituto Veneto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第117卷（1959），第72~75页。【72】

② F. 蒂里耶（Thiriet）：《威尼斯委员会关于货币的决议》，第1卷（巴黎，1966年），496、497号文件，第201页。【73】

③ 《乔瓦尼·韦莱尼编年史》，第11卷，第114章。【74】

④ P. 格里尔森："Oboli de Musc"，《英国历史评论》，第66期（1975年），第75~81页；P. 格里尔森：《13世纪英国的穆斯林硬币》，载《近东货币学、画像学、铭文学和历史》，D. K. 库姆耶编（Kouymjian）（贝鲁特，1974年），第387~391页。【75】

吨)，包括铸成硬币和未铸成硬币的白银。自1305年起，教皇居住在罗讷河谷，自1316年起住在阿维尼翁，这使一定量黄金越过阿尔卑斯山到达罗马教廷。14世纪20年代，罗马教皇、维也纳皇太子及勃艮第公爵都铸造过仿照佛罗伦萨金币的弗罗林币，但没有一个真正成功。

1327年后，波希米亚国王和匈牙利国王签订的协议中明确说明波希米亚白银不会再通过奥地利直接进入意大利，意大利北部部分地区便开始出现白银短缺。波希米亚白银供应路线的改变使威尼斯人深受其害，威尼斯格罗斯银币的铸造大大减少。波希米亚白银依旧向西经过德意志到达低地国家和法国，意大利人不得不以黄金作交换，间接从法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白银。

14世纪30年代法国人开始抱怨缺乏白银，估计白银都被出口到了意大利。但30年代末法国有大量黄金，足够腓力四世在百年战争爆发之际用他自己的埃索币向低地国家的盟友支付补助金。他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都在1336年、特别是1337年为应付战争需要而在低地国家收买同盟者。爱德华三世缺乏其法国对手那样丰富的资源，身负重债，可能从佛罗伦萨银行家那里借了多达150万弗罗林金币。这笔贷款中多数是用黄金从佛罗伦萨运给爱德华三世在瓦伦切纳的财政管理员。[①] 当这些巨大的政治津贴用黄金支付给低地国家时，欧洲西北部地区也开始铸造金币，而不再使用银块付款，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巧合。

在低地国家，佛兰德、布拉班特、埃诺、康布雷（Cambrai）及格维尔德斯首次于1336年和1337年开始铸造金币。在图案上，这些金币模仿的要么是佛罗伦萨弗罗林币，要么是法国埃索币这两种通过英国和法国补助金进入该区域的货币。因此，布鲁日城检验银块并盖章保证质量的制度在14世纪中叶后就销声匿迹了。[②] 莱茵河和美因河上游也很快开始使用金币。巴伐利亚的路易（爱德华三世的补助金的另一个接受者）第一个于1339年在他位于法兰克福的帝国铸币厂开始铸造金币。四大莱茵兰选帝侯（科隆、美因茨和特里尔大主教及巴拉丁伯爵）在接下来的15年里也如法炮制。[③] 然而，除了吕贝克外，14世纪德意志金币的使用只限于莱茵河谷和美因河谷。英国则于1344年才开始铸造金币。 【833】

① M. 麦基萨克（Mckisack）：《14世纪》（牛津，1959年），第119~132页。【76】

② R. 德·卢弗：《中世纪布鲁日的货币、银行和信贷》（剑桥，1948年），第230~231页及244页。引用G. 彼格伍德：《中世纪比利时白银贸易的司法和经济体制》，载《比利时皇室科学院论文集》，社科类，第14期（第2系列，布鲁塞尔，1921年），第422~425页。【77】

③ P. 贝格豪斯：《14世纪初德意志金币和格罗生币的扩展》，载《斯波尼克货币学》，第12期（布拉格，1971~1972年），第213~216页和223~225页。【78】

在那些尚未使用金币的北欧地区，利用银锭支付大额款项的传统做法存在的时间相对较长；例如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德意志北部大部分地区及波兰。苏格兰直到1400年左右才成功发行金币；汉堡和吕纳堡直到约1440年才开始发行金币；丹麦直到1490年、波兰直到16世纪20年代才发行金币。在其他地方从14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开始，金币已成为国际商业业务和政治业务的主要付款方式，这些业务不能用汇票进行，同时金币也被用来支付大额款项，如购买土地。

14世纪法国金币的图案一直在发生着变化。腓力六世的埃索币是腓力四世的西斯币的变体。加冕国王的图案在14、15世纪的法国和尼德兰被广泛使用。腓力六世的西斯埃索币不同于其他同种类型的硬币，其图案上国王王座的左侧出现了一个带有法国国徽的盾牌。法国在1337～1339年间可能铸造了多达150万枚这种埃索币，每个价值1个图尔里弗赫币，其数量远远多于法国先前发行的金币。存留下来的法国铸币厂的账目非常不完整，很难确定各种硬币的发行规模，但似乎此前最大的一次发行是1311～1326年间阿格纳币的发行，数量总数不超过50万枚，而且发行时间长达16年。阿格纳币或莫顿币（又称羊币）的名字来源于它们的图案——逾越节宰杀的【834】羊——而且，同西斯币和克林科特币一样，在14世纪末非常盛行，在15世纪不仅是皇室发行的硬币种类，而且被广为仿铸，尤其是在低地国家。第三种广泛流通的法国皇室硬币是保皇币或骑士法郎，由法国国王从1360年开始铸造发行。这种货币最初同为救出约翰二世国王而向英国支付赎金有关，重量是英国贵族币的一半。这种硬币不仅在14世纪极为流行，而且在15世纪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统一尼德兰后又再次发行了这种货币。在经过诸多变化、尝试过诸多种类（其中这三种硬币发行量最大）后，法国最终在1385年确定了标准的皇室金币，即皇冠埃索币，一种不断修改一直发行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硬币。金币图案是刻有法国国徽和皇冠的盾牌。这种埃索币或皇冠币最初重4.08克，由足金铸成，但后来其重量和含金量逐渐下降。从1421～1449年，法国兰开斯特王朝的国王亨利五世和亨利六世发行了萨卢币，该币由足金铸成，重量为英国贵族币的一半。它的发行量远远大于瓦洛瓦发行的埃索币，短期内似乎有替代它的趋势。随着战争运势和政治形势转而有利于瓦洛瓦，埃索币作为法国国家金币的主导地位再次被确定下来。

英国确定国家金币的时间较晚。在鲁莽地发行弗罗林币和豹币却夭折后，爱德华三世1344年下令开始铸造纯金的贵族币。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金币的价值一直保持在6先令8便士斯特林（半马克斯特林，或1/3镑斯

特林），并在1344～1619年一直保持着相同的含金量，尽管其重量在这期间下降了1/5。其正面图案是国王站在一艘船上，因而往往被认为同英国海军1340年在斯鲁伊斯（Sluys）取得的胜利有关。贵族币是中世纪最大的金币之一，甚至比法国国王试图铸造的两个弗罗林币大小的硬币还大。在欧洲西北部它以优质闻名，被很多地区仿铸，主要是15世纪初以及16世纪后半期的低地国家。自创造贵族币后，英国的货币体系在14世纪后半期发生变化，并于1412～1414年重铸货币。在重铸的货币中，金币占总价值的97%，银币只占3%。而70年前，这个国家的所有货币都是银币。

在罗马帝国，莱茵兰选帝侯（科隆、美因茨和特里尔大主教及巴拉丁伯爵）都是弗罗林币的最大发行者。选帝侯们——有时其他莱茵王侯也参与——通过一系列货币协议联合发行图案、含金量和重量都相同的弗罗林币。根据1354年订立的第一个这种协议，他们协商发行含23 $\frac{1}{2}$里尔金的弗罗林币，1科隆马克可以铸造66个这样的弗罗林币。实际上其标准同佛罗伦萨弗罗林币的标准相同。这些莱茵兰弗罗林币或者说莱茵盾的含金量迅速下降，但在1419～1490年固定在19里尔。尽管该币的含金量在15世纪保持不变，其重量却继续缓慢下降。当1626年最终停止发行这种盾币时，它们只含有18 $\frac{1}{2}$里尔金，1科隆马克可以兑换72枚盾币。① 在15世纪，不仅莱茵河河谷，而且整个低地国家和德意志部分地区的商业都广泛使用莱茵盾。帝国自由城市如法兰克福和讷德林根以西吉斯蒙德和腓特烈三世这些皇帝的名义发行的弗罗林币就是仿照莱茵盾铸造的。 [835]

低地国家尽管是欧洲第二大商业发达地区，但并未创造出它们自己独特的金币。法国、英国、莱茵兰及意大利北部的金币自由进入阿图瓦、那慕尔、图尔奈、佛兰德、布拉班特、埃诺、列日、卢森堡、荷兰、乌特列特及格尔德斯这些自由公爵领地、郡和主教教区，而各个公爵、伯爵及主教又都发行模仿佛罗伦萨弗罗林币、法国莫顿币和西斯埃索币、英国贵族币及莱茵兰选帝侯盾币铸造的一系列硬币。布鲁日没有产生本土金币与作为西欧大商业货币的弗罗林币相抗衡，大概是因为布鲁日是一个来自欧洲各个地区人士光顾的大集市，而佛罗伦萨是一个人们由此出发前往欧洲各地区的巨大生产和银行中心。弗罗林币随着佛罗伦萨人向外流通，很多生产各种弗罗林币的铸币

① W. 迪彭巴赫（Diepenbach）：《莱茵兰货币协会》，载《莱茵兰地区的文化和经济》，A. F. 纳普—齐恩（Napp-Zinn）和M. 欧彭海姆（Oppenheim）编（美因茨，1949年），第89～120页。【79】

厂事实上是由佛罗伦萨官员经营。布鲁日不向外输送它自己的硬币，但吸收来此贸易的人们的硬币，并仿照这些硬币铸造当地货币。佛兰德在14世纪30年代铸造佛罗伦萨式样的弗罗林币，在14世纪50、60年代铸造法国式样的莫顿币和骑士法郎，在14世纪90年代铸造英国式样的贵族币。当低地国家在15世纪通过政治联盟形成新的勃艮第“国”时，首次有机会发行一种“国【836】家”硬币。1433年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在佛兰德、布拉班特、荷兰、埃诺和那慕尔同时发行腓力金币，尽管在那慕尔的发行从未变为现实。就像70年前的骑士法郎、腓力币上的图案是国王策马疾驰，因此也被称为保皇币或骑手币。与腓力在由他控制下的法国铸币厂同时发行的萨卢币一样，腓力币的重量和含金量标准同威尼斯杜卡币和佛罗伦萨弗罗林币的标准基本相同。①

与此同时、在意大利，三大商业城市继续大量铸造重量和含金量相同的格诺威币、弗罗林币和杜卡币，其他一些城镇也开始铸造相同标准的金币。1380年博洛格纳开始铸造自己的弗罗林金币。此前数年，加勒佐二世维斯康第，巴纳珀·维斯康第各自以及联合在米兰和帕维亚发行了弗罗林币，这种币一直流通到15世纪，其正面图案与约翰二世的法国骑士法郎的正面图案一模一样。

金币连同纸币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银条，被广泛用于国际交易、大额支付、政府交易、土地买卖等等，但必须区分国家硬币和国际硬币的不同。国家硬币，如英国贵族币或法国埃索币，是为在一个国家内部使用而设计的，除了低地国家外，相对很少在外国发现。国王们常常试图强行将进入他们国家的外国硬币重铸，并禁止他们自己的硬币出口。英国人在这一点上做得比大多数国家成功，因为他们有岛国这个优势。设在坎特伯雷(Canterbury)和伦敦的皇家兑换所、加来的铸币厂以及在如桑韦奇这些海港的地方搜查员警惕地杜绝了大量（尽管不是全部）外国货币进入英国流通领域。这一制度有时也会失效，因为它无法抵挡大量仿斯特林币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如洪水般涌入英格兰。当然，也无法杜绝一些苏格兰和爱尔兰硬币进入英格兰。② 另一方面，国际硬币（例如弗罗林币和杜卡币）是专为远程贸易设计的，被广泛用于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城内外。尽管在中世纪末期欧洲各地区流通的金币种类很多，但在欧洲两个商业最发达区即意大

① P. 斯普福德（Spufford）：《勃艮第时期尼德兰1433～1496年的货币问题和政策》（莱顿，1970年）。【80】

② P. 斯普福德：《中世纪末英国的大陆货币》，载《英国货币学杂志》，第32期（1963年），第127～139页。【81】

利北部和尼德兰南部金币的流通种类可能最多。尽管如此，当时人们通过多【837】种途径处理货币的多样性问题。

因为很多金币并不是用金粉或金块直接铸成，而是通过重铸外国货币或当地以前的货币得到的，因此各个铸币厂必须编纂并及时更新极其准确的所有可能进入流通领域的硬币目录，以及它们确切的含金量和把它们重铸成硬币所花费的代价。通过参考铸币厂列出的目录及上面的硬币价值，国王再列出一个短得多的清单，规定允许自由流通的外国硬币或古代硬币的官方价值。因为铸币厂的主要供应商是货币兑换商，因此这些人手里也有这样的清单，它们往往是根据铸币厂目录或官方目录制作的。公众接受的硬币价值的基础是货币兑换商那里的硬币相对于本地货币的价值，这与官方规定的流通价值常有略微差异。甚至收税官也以集市价值而不是国王规定的官方价值收税。对我们而言，这种硬币种类和价值差别很大的状况似乎很令人迷惑，但对当时的人而言，这却是非常平常之事，很容易处理。商人常会在笔记本上记下某个城市中流通金币的清单，并注出它们的含金量，有时他会直接从当地铸币厂获得这样的清单。偶尔他还会注出它们相对于本地货币的价值，这种信息由于硬币价值时有波动而不是十分有用。而笔记本上给出的价值是官方价值还是集市价值并不明确。这类笔记本从 13 世纪末就被保留下来，威尼斯、佛罗伦萨、比萨和热那亚的还公开出版过。[①] 它们的编写者在其职业生涯中到达远至布鲁日、塞维尔或法马古斯塔这些地方，并记下有关这些地方流通货币的详细信息。初入行的年轻人在开始编写自己的笔记时，常抄写年长者笔记的章节，因此我们一直无法辨明当编写这本笔记时，上面列出的硬币是否还在流通。例如佩格洛蒂的笔记记录了他在 1310～1340 年活跃的职业生涯，但他上面列出的硬币似乎更可能是在 13 世纪末流通。

后来，当发明印刷术后，人们很快利用印刷文字发布有关货币价值的信息。印刷的官方价值公告取代了手写目录和耳口相传，商人也开始编写并印【838】刷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有时来自当时的商人笔记。

利用金币进行国际交易的一个副作用是银币被减少到只供地方使用。在金币取得胜利之前，一些银币和银块都在国际上流通。例如在 12 世纪和 13 世纪前半期，普罗万斯德涅尔银币沿着贸易路线从香槟进入意大利，在那里流通非常广泛，以至于成为在罗马铸造的普罗万斯德纳里银币的原

---

① 参见本书后面的参考文献，第 948～949 页。【82】

型。13世纪末，图尔格罗斯币与银块一起流通到意大利，托斯卡纳在13世纪90年代发行的大部分银币就是用它们铸造的。14世纪中叶以后，只有金币在尚未占优势的地方，银币和银锭才有广泛的流通量。中欧及莱茵兰东部德意志大部分地方，仍旧使用银条，布拉格格罗生币在这一地区也有广泛的流通。在其他地方，用金币进行远程贸易使银币只在一些史学家们称为“硬币省”的地方流通。人们通常是根据经济和地理形势来界定这些“硬币省”。在每个“省”内，所有铸币厂都发行银币（不管以什么人的名义），并一起流通。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德涅尔时代的残余，除非来自外部的银币（如果的确进来的话）被严格地重铸。有些“硬币省”就是政治上统一的地区，有些“硬币省”则不是这样。在这些地区，一般会形成一个货币联盟，通过这个联盟，各个国王或城市协商铸造相同重量、含银量和价值的硬币。从13世纪20年代末开始，托斯卡纳各城市联合铸造相同重量和含银量并且图案相似的德纳里币及后来的格罗斯币。从1354年开始，莱茵兰选帝侯联合铸造相同重量和含银量而且图案相似的威斯芬尼或奥巴币，莱茵兰其他统治者也很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从1379年开始，6个“温迪什联盟”城镇，汉堡、吕贝克、吕纳堡、罗斯托克、斯特拉尔桑德和维斯马，以同样的方式联合起来为汉萨同盟的中心地带发行了统一的银币。①

12.5 记账货币

在中世纪末欧洲的大部分地方，以及直到18世纪甚至19世纪的很多地方，货币具有两种功能。一方面，记账货币是一种价值尺度；而另一方面，【839】真正的货币是交易的媒介和储存财富的工具。

记账货币的名称来自它的功能。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它几乎只被用于记账目的，大多数资金交易都首先通过记账货币进行确定和表达，尽管付账是用现金来完成，货币本身也具有由记账货币表示的商品的价值，而且就像其他任何一种商品，其价值常常会发生变化；这种用记账货币表示的货币价值变化是人们对记账货币的本质产生混淆的原因。这种混淆导致每位作家在写到中世纪货币时，对记账货币的概念有各自不同的解释。

---

① 耶瑟：《温迪什的货币联盟》。【83】

随着11世纪和12世纪“德涅尔币”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程度退化时，在各个地方流通的各种“德涅尔币”需要一种新的参考标准。像香槟这样的地方，因为拥有集市，更是迫切感受到这样的需要。随着在13世纪优质格罗特银币和弗罗林金币的发行，再加上德涅尔币常常退化，就需要有一种公共尺度来表达金、银及合金币时常变化的价值。记账货币同时满足了这两种需求。①

尽管直到12世纪或13世纪才出现对记账货币的需求，但记账货币所采取的形式却很早就已出现。早在8世纪，或有可能7世纪，人们就已经使用了镑和先令制度。随着各地进行的修订，12个德涅尔币或便士值一个苏币或先令的比价，以及20个先令值一个里弗赫币或镑的比价，逐渐在整个西欧建立了起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实际上是一个记账货币制度，而不是货币体系。1先令意味着一打硬币，而1镑即意味着240个硬币。马克·布洛克认为，苏币和里弗赫币在13世纪前仅仅是计量单位。② 这个制度在巴伐利亚及其附近的奥地利出现了一些变化，那里1先令指30枚硬币，而1芬德或塔兰特（talent）则指240枚硬币。在英国，重2/3镑的马克被变成了计账单位2/3镑斯特林，并可自由使用。在科隆和吕贝克，马克也成为记账单位，分别代表12个先令和16个先令。【840】

在有些情况下，新货币完全取代大量旧德涅尔币的过渡阶段促进了记账货币的发展。佛罗伦萨和罗马最早的格罗斯币、最早的图尔格罗斯币和布拉格格罗生币原来都是要作为苏力第币、苏币或先令使用的，含银量是它们各自德涅尔币的12倍，但它们很快停止发挥这个功能。同样，佛罗伦萨的弗罗林币和法国的埃索币原本是要代表佛罗伦萨里拉和法国图尔里弗赫币，但两者的价值很快就被高估了。英国贵族币通过时不时地减少所含黄金的重量保持了其价值的稳定，即半马克斯特林或1/3镑斯特林。

以打来计算硬币的习惯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当一种新货币同先前的大量旧货币不能完全等同时，一种新的镑、先令和便士的体系就自动以新货币为基础建立起来。③ 威尼斯在创造了玛特潘币之后，使用的是两

---

① H. 冯·韦沃克（Werweke）：《记账货币和真正货币》，载《比利时文献学和历史学评论》，第13期（1934年），第123～152页，《中世纪杂集》有重印（根特，1968年），第133～158页。【84】

② M. 布洛克（Bloch）：《欧洲货币史概论》，《编年史手册》，第9册（巴黎，1954年）。【85】

③ 以下段落中的例子大多取自于P. 斯普福德的《中世纪兑换手册》（伦敦，1986年）。【86】

种并行的货币体系：一种是以旧的小德涅尔币（皮克里币）为基础；另一种是以新的大德涅尔币（格罗索币）为基础。这两种记账体系之间并没有固定关系，因为皮克里币体系的质量日益下降，并于15世纪末期成为完完全全的铜币，而格罗索币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自己的质量和重量。佛罗伦萨在创造弗罗林银币或格罗索币后，法国在创造了图尔格罗斯币后，同样也并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记账货币体系。当威尼斯和法国不再发行格罗索币或格罗斯币的几十年后，这两种货币不再流通，以大额硬币为基础的记账体系自然消失。在卡斯蒂尔，尽管马拉弗蒂币作为大银币的寿命非常短暂，但作为记账单位它存在了两个多世纪，等于10个小的卡斯蒂尔第纳罗币。

在其他地方，新的格罗斯币完全取代了旧的德涅尔币，因此以德涅尔币为基础的记账方式要么停止，要么以废弃的德涅尔币和现存的格罗斯币之间名义上的关系为基础继续使用。这种情况发生在14世纪初的佛兰德，当时新的格罗特便士取代了佛兰芒铸造的法国巴黎德涅尔币和英国斯特林币。新【841】的格罗特币价值3个旧的佛兰芒斯特林币和12个旧的佛兰芒巴黎德涅尔币。佛兰芒以格罗特币、斯特林币和巴黎德涅尔币为基础的记账体系就以这种关系固定下来。所有这三种记账货币事实上都与格罗特币密切相关。同样，向新的大额币过渡不仅发生在附近的布拉班特——那里也发行了它的格罗斯币——而且还发生在远至那不勒斯和波希米亚的这些地方，那里的记账货币分别是吉格拉蒂币（qiqliati）和布拉格格罗生币。最初重1马克的白银能铸造60个布拉格（和迈森）格罗生币，因此马克和这些格罗生币之间存在着非常方便的倍数关系。甚至当它们不再以1马克比60的比例铸造时，为方便起见它们还是以60的倍数来计算。以60计算硬币的方式有时也扩展到其他领地，并在15世纪中期进一步确定下来，当时60个迈森格罗生币暂时值1个帝国金盾。

中世纪不仅有利用大额银币（如德纳里币或苏力第币）建立的新的记账货币体系，而且还有利用像里拉那样的新金币建立的其他记账货币体系。佛罗伦萨的弗罗林金币、法国法郎和选帝侯莱茵盾都成为记账货币。不幸的是，这三种硬币都一度停止发挥记账这个功能。

在佛罗伦萨，弗罗林金币在以皮克里币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中充当里拉，而格罗索币或弗罗林银币依旧是苏都币。因此弗罗林金币起初等同于弗罗林银币或20个苏力第币。因为皮克里币和格罗索币的发展趋势不同，弗罗林金币相对于格罗斯币和皮克里币的价值便出现了差异。1279年当停止铸造

弗林诺（fiorino）银币时，这种关系宣告结束。当时弗罗林金币值29个弗罗林银币（29个苏力第币）。弗罗林银币一直流通到1296年。以里拉、苏力第币和德纳里币为基础的记账货币体系并不像其他大多数以大额银币为基础的记账体系那样随着格罗索币的出现而消失，而是继续使用到14世纪，因为它已有效地以弗罗林金币而不是弗罗林银币为基础，比率固定在29个苏力第币等同于1个弗罗林金币。[①]

法国的情况则简单得多。金法郎最初发行时价值1个图尔里弗赫币。随着银币的贬值，它的价值不断上升。但是价值更高的金法郎无论在流通时，还是停止流通后很长时间，金法郎一词仍是图尔里弗赫币的另一个别称。【842】

在尼德兰，莱茵兰选帝侯的弗罗林金币在15世纪40年代作为40个佛兰芒格罗特币具有广泛的商业用途，在15世纪50年代官方承认了这个比价，因此人们将它等同于40个格罗特币。在尼德兰流通的主要银币勃艮第斯图弗（stuiver）币或帕塔币，金额自然比它小，价值2个格罗特币。尽管到1467年莱茵金盾的官方价值为42个佛兰芒格罗特币，到1488年为90个佛兰芒格罗特币，盾币直到16世纪依然被称为40个格罗特币。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固化体系，但它依旧通过同佛兰芒格罗特币的固定关系发挥货币功能。

同样固化的体系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在法国，以巴黎德涅尔币为基础的里弗赫币、苏币和巴黎德涅尔币体系在1365年消失以前已经使用了一个半世纪，14世纪中期通过与图尔德涅尔币5∶4的固定关系发挥实际效用。在佛兰德，他们的里弗赫币、苏币、巴黎德涅尔币的体系通过佛兰芒巴黎苏币和佛兰芒格罗特币之间长期的等同关系发挥现实效用。1433年以后，布拉班孔没有独立的货币，但它的记账货币继续使用，它依旧像1433年时那样，通过同佛兰芒记账货币建立固定关系（即3个布拉班孔里弗赫币相当于2个佛兰芒里弗赫币）发挥实效。从那以后，布拉班孔的记账货币就以佛兰芒格罗特币为基础。

中世纪末常常不恰当地用“虚钱”一词称呼记账货币，也许是因为记账货币所依赖的真正货币初看上去并不明显，就如我们在前面所举的例子那样。要解开中世纪末记账货币的种种谜团，不是本章篇幅所能做到的，但若仔细研究，还是会为每一种记账货币的存在找到合理的历史解

① M. 贝尔诺基（Bernocchi）：《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货币》，第3卷，载《文献资料》（佛罗伦萨，1976年）。【87】

释，而这样的历史解释会告诉我们货币体系是依附在哪一些真实货币上继续发挥效用的。

对于某一个“国家”内的交易，自然是用当地记账货币记账，而且除非委托银行付款，一般款项都是用当地硬币支付，至于是用金币、银币还是合金币，则视交易的规模而定。然而，对于跨越国界的交易，这些硬币就不够用了。必须在不同货币间寻找一个共同的标准。因为最常关注这种“国际”交易的人是教廷官员和意大利商人，自然应该用意大利货币作为共同的标准，而人们最常使用佛罗伦萨弗罗林币，因为佛罗伦萨弗罗林币是托斯卡纳的优质金币。无论如何，正是托斯卡纳商人提供了四通八达的商业和银行网络，使很多交易得以进行。教廷财政大臣及教廷收税官常常利用来自佛罗伦萨、卢卡和锡耶纳小圈子里的经纪商人在整个欧洲调配资金，不管是从14世纪英国的收税所运到阿维尼翁的教廷，还是从阿维尼翁运到佩鲁贾的出纳所，来支付教廷在意大利中部军队的军饷。因此，新当任的约克大主教应向教廷缴纳的费用是用弗罗林币计算的，尽管当时是用斯特林币支付给负责转运这笔资金的银行家。在记录把英国羊毛运往托斯卡纳的波托比萨诺进行布匹生产的费用时，佩格洛蒂标出沿路按当地计账货币真实支付的各笔费用，但接着又把它们都转换成佛罗伦萨弗罗林币来结算账目。为了比较不同国家间货币价值的不同，例如欧洲各地区的铁价，我们最好系统列出中世纪真实记账程序中的一条主线。846～849页的表1意欲以50年为间隔给出佛罗伦萨弗罗林币相对于西欧各主要记账货币的价值。

我们必须以极端谨慎的态度使用这个表格，因为尽管在货币保持稳定的时间和地方，汇率可能几十年大致相同，但在货币波动时期，一个年代的汇率不能适用于另一个年代。例如，腓力四世对抗英国和佛兰德的战争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百年战争初期发生的货币贬值，意味着用1300年和1350年给出的法国图尔币相对于佛罗伦萨弗罗林币的价值数字，并不能作为几十年的普遍参考。当货币突然发生剧烈波动时，汇率会在数日内发生大幅度改变。

另外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汇率都是同一种类。有些是皇帝法令规定的官方汇率，有些是货币兑换商提供的金币兑换银币的汇率（理论上这可以作为官方汇率，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还有一些是用汇票将钱从一地区转到另一地区的汇率。后者当然在各个地区不尽相同——在威尼斯用威尼斯杜卡币购买汇票得到的英国斯特林币的数量，肯定多于在伦敦用斯特林币反方向买进的威尼斯杜卡币的数量。它们之间的差额代表着在一个地方出具汇票

[843] [844]

和在另一个地方结算汇票的时间内消耗的利息。

中世纪商人使用汇票的不同方式进一步加深了汇票中汇率价值的复杂性。汇票当然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并继续主要用作地区间资金的汇兑，但它们也可以通过兑换和再兑换体系作为隐蔽的贷款。再兑换利用汇率的差异产生利息，为最初的出票者创造利息。汇票的价格也会受到那些在汇票上投机的人的影响，这些人希望能从他们预见到并投机的汇率的变化上牟取利润。甚至本地货币兑换商的汇率也可能隐含着贷款利息。金币在柜台上实物换成银币的汇率，显然与当时以信贷方式兑现银币3个月后才支付金币的汇率大不相同。

在阅读846～849页上的表1时，还应注意到，尽管大多数汇率是用苏力第币或先令报价的，但它们也以德纳里币或便士为基础，因此，价值为66先令3便士的弗罗林币，其价值也可表述为795德纳里或3里拉6先令3便士。

简单审视此表，就会发现一些问题。13世纪中期，不仅德涅尔币和苏币在各地的发展不尽相同，而且在接下来的两个半世纪里，它们还继续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德涅尔币越贬值，对应弗罗林币的数目也就需要越多。托斯卡纳、威尼斯和罗马德纳里币的质量在13世纪就已经比米兰或热那亚德纳里币的质量差，在以后的世纪依旧如此，尽管后者到1500年已降为其相对价值的1/9和1/8。德涅尔币如此大规模贬值，说明它实际上已不含白银，而且在一些地方如佛罗伦萨，德涅尔币的固有价值非常之小，以至于铸造它们已失去现实意义。相反，价值4个德纳里币的夸特里尼币（quattrini）事实上是面值最低的硬币，它们只含有1%或2%的白银。这种硬币被称为"黑钱"。这个表同样说明，14世纪末期在一些地方（如法国）不再用格罗斯币计算物品价值。在其他地方，如佛兰德，格罗斯币的价值显然也非常小。到14世纪末，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优质的格罗斯银币已不复存在。代替它成为标准硬币的是半银硬币，即法国的布莱币、德意志的威斯芬尼或威【845】顿币、意大利的皮格纳币以及尼德兰的帕塔币。这些半银币通常被称为"白钱"，区别于质量不如它们的合金"黑钱"。"白钱"同在它之前出现的优质格罗斯银币一样，主要被用于支付日常生活中的大额款项——例如工资和租金——或少量的半奢侈品——如按镑称的黄油或蜡烛——或大量的较普通商品——按蒲式耳称的奶酪或苹果。"黑钱"则用于城市生活中最普通的买卖——一条面包、一块肉、一品脱葡萄酒或啤酒。

[846]

表 1

欧洲中世纪货币汇率①

年　份	1252	1300	1350	1400	1450	1500
图斯坎尼						
佛罗伦萨（用佛罗伦萨皮克里币表示的弗罗林金币）	20 先令	46 先令 6 便士	64 先令（1351 年）	77 先令 11 便士	96 先令	140 先令
卢卡（用卢卡币表示的弗罗林金币）	20 先令 veteri	38 先令 6 便士 novi（1292 年）				
比萨（用比萨币表示的弗罗林金币）	20 先令	42 先令（1299 年）	64 先令（1348 年）	70 先令（1396 年）	（归佛罗伦萨控制）	
锡耶纳（用锡耶纳币表示的弗罗林金币）	20 先令	50 先令（1302 年）	63 先令	78 先令	95 先令（1451 年）	128 先令 8 便士（1499 年）
图斯坎尼之外的意大利地区						
西西里（用皮埃尔币表示的弗罗林金币）		18（1315 年）	$11\frac{1}{2}$（1344 年）	12（1403 年）	14	$25\frac{1}{3}$（1506 年）
那不勒斯（用吉格利托币或卡利尼币表示的弗罗林金币）	12（1280 年）	$13\frac{1}{2}$	12	10（1404 年）	10	12（1497 年）

① 这里给出的价值来自于 W. Y. 威尔金森小姐在英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支持下于最近编写的中世纪欧洲汇率列表（《中世纪欧洲汇率列表》，基尔，1977 年）。括号中所给日期是 1977 年所知价值的最近日期。【88】

续表

年　份	1252	1300	1350	1400	1450	1500
罗马						
（用罗马议会的普罗万币表示的弗罗林金币）	20 先令	34 先令	47 先令	73 先令（1403 年）	98 先令 8 便士（1452 年）	130 先令
博洛尼亚						
（用博洛尼亚币表示的弗罗林金币）	24 先令（1264 年）	40 先令（1298 年）	32 先令	36 先令（1392 年）		
（用博洛尼亚币表示的博洛尼亚金币）				36 先令	49 先令	70 先令
威尼斯						
（用威尼斯皮克里币表示的杜卡金币）	48 先令（1284 年）	64 先令（1310 年）	64 先令	93 先令	116 先令（1452 年）	124 先令
维洛那蒂罗尔						
（用格罗斯币或十字币表示的杜卡金币）		33（1303 年）	36（1356 年）	36（1411 年）	49	80
米兰						
（用皇室币表示的弗罗林金币）	10 先令	17 先令 3 便士	32 先令	36 先令	65 先令	91 先令
热那亚						
（用热那亚货币表示的格诺威金币）	8 先令	17 先令 2 便士	29 先令	29 先令 9 便士（1402 年）	44 先令	64 先令（1498 年）
萨瓦伊						
（用维恩诺币表示的弗罗林金币）	12 先令 6 便士（1275 年）	18 先令（1298 年）	24 先令（1349 年）	36 先令 6 便士（1384 年）		
意大利以外地区						
法国						
（用图尔币表示的弗罗林币）	8 先令（1265 年）	19 先令	25 先令	22 先令（1398 年）	25 先令	38 先令 9 便士

【847】

续表

年　份	1252	1300	1350	1400	1450	1500
（4巴黎镑=5图尔镑）						
（1图尔镑=1香巴尼普罗万镑）						
（用图尔格罗斯币表示的弗罗林币）	9（1274年）	$11\frac{1}{2}$	10	14（1390年）		
伊比利亚半岛						
巴塞罗那						
（用巴塞罗那货币表示的弗罗林币）	11先令（1276年）	11先令（1310年）	12先令	15先令3便士	17先令1便士（1447年）	20先令（1480年）
阿拉贡						
（用埃卡货币表示的佛罗伦萨弗罗林币）	9先令（1280年）	11先令6便士（1320年）	11先令			22先令（1479年）
卡斯蒂尔						
（用马拉弗蒂币和第纳罗币表示的弗罗林币）		5马克8便士（1291年）	20马克（1358年）	66马克	150马克	375马克（1497年）
（1马拉弗蒂=10第纳罗）						
低地国家						
佛兰德						
（用佛莱芒格罗特币和米特币表示的弗罗林币）		13格令 3马克（1317年）	16格令 20马克（1348年）	33格令 12马克	49格令（1453年）	80格令
（1格罗特=24米特）						
英国						
（用英镑表示的弗罗林币）	2先令6便士（1277年）	2先令8便士（1301年）	3先令$\frac{1}{2}$便士	3先令（1405年）	3先令7便士	4先令7便士
（1马克斯特林=13先令4便士）						

续表

年　　份	1252	1300	1350	1400	1450	1500
德意志帝国						
科隆						
（用科隆货币表示的弗罗林币）	2 先令 6 芬尼 （1277 年）	6 先令 8 芬尼 （1301 年）	22 先令 5 芬尼 （1349 年）	42 先令	42 先令 （1423 年）	
（1 科隆马克 = 12 先令）						
吕贝克						
（用吕贝克货币表示的佛罗伦萨弗罗林币）	8 先令 （1288 年）	12 先令 （1317 年）	8 先令 （1345 年）			
（用吕贝克货币表示的吕贝克弗罗林币）			8 先令 6 便士	15 先令 6 便士 （1402 年）	32 先令 （1449 年）	32 先令 （1483 年）
斯瓦比/纽伦堡						
（用海勒币表示的弗罗林币）	10 先令 （1265 年）	12 先令 （1308 年）	17 先令 6 海勒 （1351 年）	25 先令	26 先令	28 先令
波希米亚						
（用布拉格格罗生币表示的弗罗林币）		12 （1316 年）	13 （1343 年）	$29\frac{1}{4}$ （1405 年）	$45\frac{1}{2}$ （1442 年）	
（1 舒克 = 60 格罗生）						
奥地利						
（用维也纳货币表示的弗罗林币）	60 芬尼 （1262 年）	$66\frac{2}{3}$芬尼 （1298 年）	94 芬尼 （1354 年）	150 芬尼	222 芬尼	330 芬尼 （1498 年）
（1 芬德 = 8 先令）						
（1 先令 = 30 芬尼）						

随着流通中“银币”的重量普遍逐渐下降，纯银相对于银币的价格不断攀升。一段时间后甚至超过了最高价，以至于铸币厂买不起银块来铸造新的硬币，除非减少欲铸银币的重量或含银量。因此，必须每20年左右稍稍减少新铸硬币的重量，以弥补流通中硬币损耗所造成的损失。如果不这样做，货币兑换商和其他供应商就不会给铸币厂再提供任何银块。到那时将无法铸造新的银币，铸币厂自然不得不关闭，直到王侯同意也愿意铸币减少足够的含银量。没有新币连续供应会导致一系列不方便。原本应该重铸的“外国”货币仍保持流通，尤其是那些质量最差的硬币。另一方面，存留下来的最好的硬币也不再流通，常被出口到能够提供最高买价的国家的铸币厂。反过来，更多的劣质“外国”硬币被带了回来。硬币的质量因此迅速下降。这一时期，流通的硬币的数量也令人吃惊地迅速下降。这似乎很难解释，但储藏硬币无疑是造成其数量下降的一个原因。

硬币贬值或重量减少的程度远远超过为抵消损耗而必须做出的减轻重量的幅度。846～849页的表1列出了很多货币价值迅速下降的事例。这些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只是为了给通常因为战争而处于财政困境的统治者迅速提供额外的财政来源。【850】例如，法国货币的贬值就与腓力四世对抗英国和佛兰德的战争、[1]腓力六世和约翰二世时百年战争初期以及查理六世统治末期、查理七世统治初期百年战争的最后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发生大幅度贬值的短暂危机时期之间是漫长的相对稳定时期，而且事实上，一旦危机过去，费用恢复到和平时期较为正常的水平，政府就会用尽各种方法恢复铸币，即使不是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至少也要比危机时最黑暗时期的状况要好。腓力四世在同英国修好后恢复了铸币制度，查理五世在从约翰二世手中接管朝政后也做了同样的事，查理七世甚至在将英国人完全赶出法国之前也这样做了。表1中弗罗林币的价值有很多种。1300年和1350年战争时期的数字只能作为非常时期的数字看待，不能用作长时期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1265年、1398年和1450年的那些数字是稳定时期的数字，可以安全地用作长期的价值标准。

---

① A. 朗德里（Landry）：《腓力四世到查理七世统治时期古代法国货币变化之评论》，载《古代科学、历史及文献学研究丛书》，第187章（巴黎，1910年，1969年再版），第203～206页。【89】

12.6　中世纪晚期出现的银荒

除了各个国家汇率存在巨大差异之外，用来铸币的黄金和白银的供应关系所反映出来的变化，整个欧洲还存在着其他许多长期趋势。

在13世纪随着白银供应量的增加，白银相对于黄金的价值相应下降。当14世纪20年代后黄金供应量增加时，黄金相对于白银的价值又降了下来（见上文831～834页）。自1390年起的大约20年和1435年起的大约30年间，白银的供应极为有限，它相对于黄金的价格又相应上升，当15世纪60年代白银供应较为宽裕时，它的价格再次下降。从14世纪20年代到15世纪60年代，黄金一直占主导地位，曾有学者撰文探讨过这一时期黄金用途增加的问题。白银用途的减少，甚至15世纪中期在有些国家几乎完全消失，是一个独立的（尽管与黄金使用的增加密切相关）现象。[851]

西欧白银储量并不是第一次减少。6世纪白银就在西方难觅踪影，到7世纪当便士币开始风行时，白银才有了崭新的开始。9世纪和11世纪，白银储量也有所缩减，但证据不够明确，而且每次白银的储量很快又迅速增加——10世纪末来自戈斯拉尔银矿、12世纪末来自弗赖贝格及其他地方的银矿。就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14世纪末和15世纪的银荒似乎比7世纪以来发生的任何银荒都严重。另外，中世纪晚期发生银荒时的经济比11世纪或先前世纪的经济都复杂，那时人们对货币的依赖程度要远远超过他们的前辈。有些因素与以前相同——货币供应依赖开发新矿或关闭旧矿，依赖流通货币的损耗，依赖聚藏银币和打开硬币窖藏，依赖货币在使用和重铸中的亏损，依赖同欧洲以外世界各地的贸易收支状况。然而，中世纪晚期的经济在一些方面与先前又有所不同。货币供应不再只包括银币，还包括大量与日俱增的金币及数量不在少数的银行货币和可流通的各种票据。而且那一时期社会上也有了更多的文字记录，因此，我们有更多证据来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

当英国在1278～1280年全部重铸货币时，爱德华一世重铸了几百吨银币，而且还有大量未铸白银以银锭和其他形式支付大额款项。硬币窖藏提供的证据说明，先前的货币都未逃过铸币厂的熔炼炉。尽管有一定量的外国白银币由于重铸进入英国，这几百吨白银增加了当时英国的银币供应量。而当英国于1412～1414年同样重铸货币时，亨利四世（Henry IV）只能重铸约2

吨银币，另外还有价值相当于70吨银币的一些金币。人们不再使用银锭。因此，亨利四世重铸币后的前两年里，新铸成的硬币数量还不到一个多世纪前的3/4。从一系列长期重大战争中断断续续支付和收到的大笔费用和利润【852】以及贸易发生的变化这个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并不令人惊讶。令人吃惊的是银币用于普通交易数量的减少，从非常小的买卖到支付工资和地租都是如此。

英国比起欧洲其他国家来说是幸运的，因为它在15世纪初还拥有这么多银币。当15世纪中叶第二次更严重的银荒发生时，英国的处境仍算不错，当时欧洲很多铸币厂因为缺乏银块而被迫连续关闭20年。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显然大量白银被换成了黄金。在某些情况下，如英国、低地国家或法国北部的货币重铸，向一个方向运送一种金属货币而向相反的方向运送另一种金属货币非常有利可图，因为不同国家间白银和黄金的购买价比率不同。

货币明显贬值的一个奇怪结果是，很多人都能从中受益。王侯自然首先从硬币铸造税中获利，重铸硬币的领主也从中获利，增加了他们的日常购买力。那些从国外带入金属的人也能够获利，其前提是铸币厂提供的价格超过运送金属的成本和风险。货币贬值的国家货币供应量明显增加，其周边国家货币供应量也有所增加，因为在交换中它们得到了在它们地区相对更值钱的另一种贵金属。在短期内出口商和生产商也会从货币贬值中获利，在长期内任何支付固定赋税的个人（事实上是大量佃农）也都从中受益，只是地主的利益受损。14世纪末及15世纪地租的部分下降并不是因为人口下降和缺乏佃农所致，而是因为货币贬值对实际地租造成的侵害。毫无疑问，贵族体制有利于坚挺货币的保存和维持，关于这一点尼古拉斯·奥雷斯莫是一个称职的代言人。①

尽管当货币贬值不能令用金币直接兑换银币的交易获利，各地黄金和白【853】银的集市价值比率常存在微小差异。这就使得在一个地方用一种金属货币付账，而在相反方向用另一种金属货币付账有利可图。这不仅适用于商业款项，也适用于政治款项。如英国爱德华三世的战争费用或由英国财政资源资助的那部分费用是用白银支付的，而战争利润，特别是法国约翰二世的赎金是向英国支付黄金。甚至一个“国家”内也可能发生硬币的“政治”流动或“行政”流动。大约在1440年，勃艮第“国”、荷兰和佛兰德之间的金

---

① 尼古拉斯·奥雷斯莫（Nicholas Oresme）：《货币》，C. 约翰逊，拉丁文本英文翻译（伦敦，1956年）。【90】

银比率不同——黄金在北方更贵，而白银在南方更贵——公爵的财产管理人账目上有一节谈到公爵如何在一个地方收取赋税而在另一个地方花费并从中谋利的事情。这些货币流动的方向常因为集市条件或政府行为而时有变化。例如，在15世纪中早期，从低地国家向英国支付银币和从英国向低地国家支付金币都较为有利，反方向则不行。

一般模式是萨克森和（更重要的）波希米亚银矿的白银向西穿过德意志经过法兰克福进入莱茵兰购买商品。白银又从莱茵兰流入低地国家和法国，并在那里交换黄金。在低地国家和法国之间，白银一般向南流动，而黄金向北流动，而在法国和意大利之间，黄金从意大利流入法国，而白银从法国流入意大利。匈牙利和非洲的黄金也进入意大利购买商品。意大利（特别是威尼斯）根据威尼斯和亚历山大的相对比率向黎凡特既出口黄金也出口白银。地中海世界其他的白银资源来自撒丁岛、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但除了极少数例外，这并没有影响到意大利以外的欧洲。阿拉贡人控制着行将衰落的撒丁岛银矿，威尼斯人在15世纪把塞尔维亚的白银送往英国，购买那里的羊毛和羊毛制品。

在相反方向流动的黄金和白银是否均衡等，取决于贸易收支和“政治”及“宗教”收支平衡。这些收支的平衡整体上对南欧有利，而对北欧不利。一般来说，意大利出售给其他地区的商品和服务要多于其他地区出售给意大利的。而其他地区的人如德意志人、普罗旺斯人、阿拉贡人、波希米亚人及匈牙利人在意大利的军事开支多于他们在意大利的财政收益。流向教廷的款项尽管与商业或军事费用相比数额较小，但都进入阿维尼翁或罗马，而且常常又从阿维尼翁流入教皇国，尽管教廷就设在阿维尼翁。教廷来访者和朝拜者给阿维尼翁和罗马带来大量金钱，远远多于教廷征收到的赋税。这种收支不平衡从意大利继续向东延伸。意大利人进口的矾、丝绸、胡椒、其他香料和奴隶以及谷物、油和葡萄酒远远超过他们出口的亚麻和羊毛制品，这种贸易差额就必须用黄金或白银弥补。定期前往西奈或圣地的朝拜者更是加重了这种不平衡。14世纪50年代前往爱琴海、1396年前往尼科波利斯（Nicopolis）这样一些偶尔的十字军东侵以及战后的赎金支付，都起着同样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建立在一个假说的基础之上，即中欧银矿的源源不断的白银是支付这些款项的主要来源。14世纪末、15世纪的问题是，贵金属（特别是白银）供应已不能再满足需求。在整个13世纪，人们相继发现了弗赖贝格、伊格劳和库特纳霍拉大银矿，因此当一组银矿开始枯竭时，另一组银矿又会投入生产。然而，继库特纳霍拉银矿后，在15世纪60年代前再没有发现新的大

[854]

银矿。14 世纪后半期，库特纳霍拉银矿的生产逐渐衰落，并于 15 世纪初胡斯战争期间停产。① 白银继续沿着贸易路线外运而没有来自银矿的补充，西欧在漫长的 13 世纪中积累的白银储量逐渐被继续出口和缺乏进口或内部新银的出产而耗尽。

在某些方面，来自匈牙利的新的黄金供应弥补了白银供应的减少。对于大规模交易，银行转账、汇票和金币都远比银币方便，但它们不适合绝大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需要。15 世纪 30 年代，甚至勃艮第的尼德兰或英国南部建筑业的一个熟练技工都必须连续工作 7 ~9 天，以挣得一个骑手金币或半个贵族币。② 当人们意识到金币在很多方面无法替代银币时，银币匮乏对社【855】会的负面影响就显得更加明显。黄金供应本身在 14、15 世纪也并非十分稳定。尽管匈牙利的黄金生产在 15 世纪 70 年代前并未减少，但有时也会暂时中断对意大利的供应。来自西非的黄金供应更是变化多端。③ 从 14 世纪 90 年代到 15 世纪 20 年代，欧洲似乎一度缺乏黄金，而在有些地方这种缺乏又持续了 20 年。15 世纪 40 年代，黄金再次短缺，但不清楚这是否是银荒的副产品，或这是否是由于西非或地中海世界缺乏新出产黄金所致。

国际收支失衡和银矿的枯竭本身足以导致欧洲白银匮乏危机，但另外两个因素使其进一步恶化了：即损耗和恐惧。

对 14 世纪末英国理查二世（Richard Ⅱ）统治时期和 15 世纪中期尼德兰鲁莽的查理统治时期所做的估测表明，在约 30 年内，银币的重量因为损耗而减少 1/5 或 1/6。这些估测数字说明，即使没有其他因素作祟，15 世纪 60 年代的银币重量也只是 100 年前银币重量的一半多一点。白银供应量的确在减少，而损耗本身则不断要求有新的白银以重铸银币。

另一个使形势恶化的因素是恐惧。对乱世的恐惧使人们窖藏硬币。无法使资产即时变现的恐惧使人们更愿意保留流动资产。对货币贬值和不稳定的恐惧使人们更喜欢以器皿的形式保留白银，这里面当然也有炫耀的成分。正好重 1 马克的银杯④成为人们储存财富的一种便利方式。所有这些储藏白银

---

① 卡斯特兰（Castlin）：《布拉格格罗索币》。【91】

② E. H. 费尔普斯布朗（Phelps Brown）和 S. V. 霍普金斯：《建筑业工资在 7 个世纪里的状况》，见《经济学》（1955 年），E. M. 卡勒斯—威尔逊（Carus-Wilson）：《经济史论文》有重印，第 2 期（伦敦，1962 年），第 168 ~ 178 页。【92】

③ 约翰·戴（John Day）：《15 世纪的金银大匮乏》，《过去和现在》，第 79 号（1978 年）。【93】

④ P. 沃尔夫（Wolff）：《图卢兹的贸易和商人》（约 1350 ~ 约 1450 年）（巴黎，1954 年）。【94】

的方式，从穷人放入陶制器皿中的数千枚银币到身居高位的人（从法国总管和戈特那儿的约翰开始）藏在地底下的一大批银器皿，都使很多白银无法进入流通领域。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白银匮乏的后果，但它们同时又使匮乏形势进一步恶化。最后，无法得到偿还的恐惧使人们尽量减少放贷。这既是货币短缺的后果，又是使货币短缺进一步加重的原因。当货币可以自由获 [856] 得时，贷款也极其方便；当货币难觅踪影时，贷款也很难得到。[1] 15世纪地方储蓄银行常有"挤兑"现象发生，并使这些银行随之破产。因此，利用银行账户付款的可能性也随之减少，或换句话说，可供使用的银行货币的数目也随之减少。

白银稀缺初见端倪是在14世纪50、60年代。撒丁岛阿金特里亚（Argenteria）银矿在一段反常的长使用期后产量急剧下降，并于1365年左右完全停产。[2] 这一时期不仅撒丁岛的铸币厂完全停工，热那亚也没有铸造出任何银币。大约同时库特纳霍拉银矿的供应量也开始减少，而且白银的供应问题首次引起英国议会的关注。这些仅仅是白银长期短缺的开始，14世纪90年代银荒达到高潮。在欧洲商业最发达的两个地区意大利北部和尼德兰南部，也感受到白银的极度短缺。马林斯在1392年停止铸造银币，佛罗伦萨在1393年、卢万在1394年也都不再铸造银币，同时白银匮乏也引起了米兰的高度关注。只有威尼斯人部分逃脱了这场银荒浩劫，因为他们有塞尔维亚银矿和波斯尼亚银矿，这两个银矿从14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向威尼斯供应白银。[3] 1379年威尼斯还能够重新开始铸造格罗斯银币。即使如此，威尼斯也未能免受14世纪90年代白银短缺的影响，1396年它也开始采取措施限制白银出口。因为来自欧洲的白银供应枯竭，埃及也于1397年停止铸造德拉姆币。热那亚在1400年、布鲁日在1401年都制定了应付白银长期短缺的法规。同时，意大利和尼德兰以外地区也同样出现了银荒，如法国和英国。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来自塞尔维亚的白银数量不断增加，至少暂时极大改变了意大利的面貌。1402年佛罗伦萨又开始铸造格罗斯银币，甚至还在1401年铸造了些皮克里币。1404年热那亚也恢复铸造银币，1407年威 [857]

---

① F. C. 斯普纳（Spooner）：《1493～1725年的国际经济和法国的货币流动》（巴黎，1956年；英国版，剑桥，1972年）。【95】

② 约翰·戴：《货币经济的衰落：中世纪末期的撒丁岛》，载《费代里戈·梅里斯纪念文集》，第3章（那不勒斯，1978年），第155～176页。【96】

③ D. 科瓦切维奇（Kovaceric）：《中世纪的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年鉴》，第15期（1960年），第248～258页。【97】

尼斯已经有了足够的白银，便放松了对其出口的限制。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从东方经过威尼斯进口的商品大部分是用威尼斯格罗斯银币支付的，这种银币一度成为叙利亚和埃及的公共硬币。在意大利以外地区，银荒结束得较为缓慢。直到 1410 年佛兰德才恢复铸币，而英国在 1412 ~ 1414 年间用于货币重铸的少得可怜的白银前面已经讨论过了（第 852 页）。

来自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白银数量一直增长到 15 世纪 20 年代，然后又开始下降。一些银矿早在 1420 年就已枯竭。威尼斯总督托马苏·莫森尼戈在 1423 年的临终演讲中声称，威尼斯铸造的新银币中有 3/4 被立即送出欧洲。只有 1/4 留在欧洲，留在威尼斯的就更少。[①]如果这些数字是正确的，而且莫森尼戈依据的是当时详细的统计报表的话，来自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银矿白银供应量的任何减少都会立即对威尼斯产生影响。莫桑尼戈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正是银荒短暂缓和后再度严重的时候。到 1429 年，巴尔干半岛显然再没有白银供应给威尼斯了。已经很难找到足够的白银送往黎凡特，而且向亚历山大、贝鲁特（Beirut）和爱琴海支付的款项大部分是用杜卡金币支付的。甚至在莫森尼戈还活着的时候，欧洲其他西方国家向威尼斯支付的款项很多也是用金币支付的。在其临终演说中，莫森尼戈也为大量欧洲黄金被带到威尼斯而感到满意。

贵重金属的持续外流使白银长期短缺、黄金时而短缺，最终到 15 世纪 30 年代末、40 年代初，黄金和白银都面临匮乏。此时西欧很多铸币厂因为缺乏金银块而被迫关闭，不仅仅关闭几周、几月或几年（像 14 世纪 90 年代银荒时期那样），而是关闭了几十年。勃艮第设在布鲁塞尔的铸币厂在 1437 年后关闭长达 29 年，根特铸币厂在 1439 年后的 27 年里关闭了 17 年，而在另外 10 年里也只铸造极少量的银币。英国设在加来的铸币厂在 1439 年后近乎停产，1442 年则永久关闭。法国设在图尔的铸币厂在 1435 年后的 32 年里有 7 年只铸造极少量银币，另外 25 年则完全停产。1440 ~ 1443 年莱茵兰[858]大选帝侯被迫逐一关闭他们的铸币厂。法国北部主要港口之一迪耶普在 1446 年后的 30 年里甚至没有足够的货币维持一个钱商的业务。[②] 在欧洲西北部只有英国设在伦敦塔的皇家铸币厂在 1440 年后的 25 年里继续铸币，但即使那里铸造的银币数量也微乎其微。在欧洲其他地区，情形大致相同。

---

① M. 萨努托（Sanuto）：《Vite de Duchi di Venezia》，穆托拉里（Muratori）主编，第 960 页。【98】

② M. 莫拉（Mollat）：《中世纪末法国沿海地区的贸易》（巴黎，1952 年）。【99】

1447年朗格多克的铸币厂关闭了好几年,[①] 并没有重新开业的迹象。巴塞罗那的铸币厂依旧营业，但几年来只铸造极少量的硬币，1447年它的城市委员会也承认遇到了缺乏金银块这个普遍问题。[②] 1451年有两艘木船驶入瓦朗茨港口，一艘属于法国查理七世的财政大臣雅克·库尔，另一艘来自佛罗伦萨。两艘船的货物都没有卖出去，因为瓦朗茨城中没有人有钱购买。[③] 1455年在德意志南部一次讨论如何解决金银块的长期匮乏问题的会议上，甚至奥地利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缺乏铸造硬币的原料。

自从15世纪20年代以来，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金银产量逐年下降。15世纪50年代土耳其人侵占了这两个国家，它们的贵重金属便不能再到达西方。威尼斯格罗索银币的漫长生命也在1462年宣告结束。总督科里斯诺菲诺·莫诺最后铸造的格罗斯币的重量还不到1202年欧洲第一批格罗斯币重量的一半。1462年后再没有铸造格罗斯币，1465年威尼斯也遭受了其他欧洲城市已遭受30年的命运。曼图亚侯爵的代理人向侯爵报告说，叙利亚木船运走了威尼斯所有的流动货币，使威尼斯城资财耗尽、暂时瘫痪。[④] 第二年据报告说，在当时延伸至米兰门口的威尼斯租地上只流通"黑钱"，即成色很差的皮克里币和夸特里尼币。这是金银荒30年里最后也是最糟糕的阶段。

在金银荒的最后几年，甚至"黑钱"也开始像白银和黄金一样消失。这可能是它们被运出欧洲、储藏、丢失和损耗所致。初看上去这似乎不可能，但事实的确如此。雅克·库尔曾被指控犯有这些罪行。林堡、图尔、巴黎、巴塞罗那、荷兰，甚至威尼斯都相继宣称缺乏"黑钱"。[⑤] 【859】

因此，随着白银、黄金甚至"黑钱"的匮乏，金银荒在15世纪60年代达到顶点，而且到那时为止，欧洲经济由于缺乏付款方式已经紧缩达30年，白银的缺乏已经持续一个多世纪了。

---

① 沃尔夫：《图卢兹的贸易及商人》。【100】

② C. 卡雷尔（Carrère）：《巴塞罗那，1380～1462年的经济中心》，第2卷（巴黎，1967年）。【101】

③ C. 卡雷尔（Carrère）：《巴塞罗那，1380～1462年的经济中心》，第2卷（巴黎，1967年）。【102】

④ F. 布罗代尔：《地中海》，第1卷（英文译文，伦敦，1972年），第378页。【103】

⑤ 关于图尔（Tournai）的情况，参见P. 斯普福德：《1433～1496年勃艮第尼德兰的货币问题和政策》（莱顿，1970年）；关于巴黎的情况，参见F. 德·索西：《从腓力二世到弗朗索瓦一世法国货币厂文件汇编》，第4册（巴黎，1879年和1892年）；关于巴塞罗那，参见卡雷尔的《巴塞罗那》；关于荷兰，参见斯普福德《货币问题及历史》，第201页。【104】

12.7 价格革命前夕的货币

15世纪60年代中期，新的银矿资源的开发使缺乏硬币和信贷造成的大难题突然消失。新发现的一系列银矿位于阿尔卑斯山和克鲁什内山脉，尤其是蒂罗尔的施瓦茨和萨克森的施内贝格堡。同时，一系列技术改革使重新开发旧银矿也变得有利可图。这些被再度开发的银矿包括波希米亚的库特纳霍拉银矿、萨克森的弗赖贝格银矿和哈尔兹的戈斯拉尔银矿，这些银矿都是欧洲最富有的银矿。多年无米下锅的欧洲铸币厂以最快的速度消耗掉了这些白银。勃艮第尼德兰铸币厂在1466年重新开业，在库特纳霍拉银矿重新开发一年后，[①] 波希米亚铸币厂在1469年也重新开业。法兰克福和米兰成为贵金属贸易的两个中心。正是通过法兰克福，一大批新白银被送往北欧和西欧的铸币厂。1472年科隆城一边同皇帝协商争取铸造自己的货币的权利，一边同法兰克福的一个金银块中间商协商供应用于铸币的白银。[②]

在欧洲的白银储量几乎削减为零的漫长的100年里，个别银币也变得越来越轻，成色也越来越差。[③] 随着白银储量的恢复，人们也开始铸造更大更好的硬币。最初只是恢复过去的水平。【860】1466年勃艮第尼德兰开始铸造足银的双帕塔币（patard），含有约3克银。它们获得极大成功，很快代替了半银的单帕塔币，成为该地区的标准硬币。同一时期在米兰、加里佐、玛利亚、斯福扎也开始铸造新的格罗斯银币（grossida 5 soldi），代替了上个世纪的标准硬币半银的皮格纳币（pegione）。这种新硬币的含银量与13世纪末期的安布罗斯格罗斯币的含银量大致相同。

又是意大利先行一步开始铸造比以往任何硬币都重的银币，其含银量甚至超过13世纪末、14世纪初最重最好的格罗斯币。1472年威尼斯总督尼古罗·特让下令铸造价值1个威尼斯里拉的硬币，含有6克新开采的蒂罗尔白银。这是在来自匈牙利的黄金供应停止后立即进行的。在这种形势下，事实证明银里拉非常实用，它极方便地代替了更为昂贵又越来越少的杜卡金币。

---

① 卡斯特兰：《布拉格格罗索币》，第701～702页。【105】

② B. 库斯克（Kuske）编：《中世纪科隆贸易交通史原始资料汇编》，第2册（波恩，1917年），第291～292页。【106】

③ R. 冯·乌特文（Uytven）：《价格革命前低地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Bijdragenen Mededelingen betreffende de 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en*，第87章（1972年），第61～65页。【107】

1474 年米兰公爵加里佐·玛利亚·斯福扎也如法炮制，命令铸造一种重 9 克多的米兰银里拉。由于其正面图案是公爵的侧面头像，使这种币有了一个绰号，即“头像币”。阿尔卑斯山的其他统治者和阿尔卑斯山与亚平宁之间地区的公爵们也都争相效仿威尼斯和米兰。① 尽管“头像币”的大规模发行长时间以来只限于这些地区，但这些硬币却像金币那样在整个欧洲流通。自从金币在 14 世纪赢得优势地位，银币通常只在发行它们的“硬币省”中流通。尼德兰、英国和法国分别于 1487 年、1504 年和 1514 年发行了少量的蹄形币（hoofdstukken）和头像币，但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欧洲西北部却没有一个地方定期铸造这种大额银币，因为这一地区并不缺乏黄金，受马扎尔金矿产量减少的影响并不大。

现在，商人和冒险家直接从西非海岸通过里斯本将一定量的西非黄金运到欧洲。在那里，从 1457 年开始，葡萄牙国王下令将黄金在里斯本铸造成杜卡币大小的克伦达币（cruzado）。这种金币进入了西欧的广大地区，如通过陆路进入卡斯蒂尔，或通过海路进入热那亚，并由此进入米兰和蒂罗尔，或从 15 世纪 60 年代开始进入布鲁日，并由此进入英国和法兰克福。【861】

这种葡萄牙金币是否代表着从西非抵达欧洲的黄金数量的增加，或仅仅改变了传统的运送黄金方式，不再是靠骆驼商队穿越撒哈拉沙漠，这一点还尚待明确。有迹象表明，15 世纪末每年进入葡萄牙的黄金总量约为 1 500 ~ 1 800 千克，这与半个世纪前经过西吉玛萨到达摩洛哥港口的黄金数量不相上下。②

除了葡萄牙及其克伦达币，其他一些国家也在此时更新了自己的金币。1464 年英国的爱德华四世用一种较重的硬币代替了贵族币，这种新币便是莱伊币（ryal）或玫瑰一贵族币，有时在低地国家被称为太阳一贵族币，其价值为 10 先令斯特林，重 7.78 克，是贵族币的变体。英国同时又铸造了一种新的硬币——天使币，其价值 6 先令 8 便士斯特林，与早先的贵族币价值相同。16 世纪玫瑰一贵族币成为尼德兰地区最通用、最常被模仿的金币之一。黄金同样流入法国，那里的金价也较高。1475 年路易十世修改了长期以来作为法国标准金币的皇冠埃索币，发行了稍重的太阳埃索币（重 3.5 克）。这个重量是 15 世纪其他很多硬币的标准重量。这是古老的国际杜卡

① P. 格里尔森：《16 世纪的货币格局》，载《皇室交易史协会》，第 5 系列，第 21 章（1971 年），第 53 ~ 55 页。【108】

② P. 维拉尔（Vilar）：*Oro y Moneda en La Historia* 1450 - 1920（巴塞罗那，1969 年），第 45 ~ 56 页。【109】

金币的标准，13 世纪以来的佛罗伦萨弗罗林币、热那亚格诺威币及威尼斯杜卡币也都遵循这个标准，14 世纪以来的匈牙利杜卡金币及 15 世纪初的普兰塔根特斯—法国萨卢币、勃艮第骑手币和马穆鲁克的阿什拉菲币也都采用这个重量标准。葡萄牙的新克伦达币和阿拉贡在 1475 ~ 1476 年发行的杜卡多达罗币（ducado d' oro）也都使用这个标准。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 1497 年将杜卡多币引入卡斯蒂尔，他们的新埃斯伦金币（excelente）就是双杜卡金币。在 15 世纪大多数时期，英国贵族币也是双杜卡币。所有这些货币都几乎由纯金铸成、含 23 $\frac{3}{4}$ 里尔金。德意志盾为铸造金币提供了第二个标准。德意志盾的重量与前面那些币相同，但含金量较低，只有 19 里尔。除了莱茵兰选帝侯和帝国城市的盾币，勃艮第尼德兰从 1466 年开始发行的安德烈盾（andriesgulden）也是按这个标准铸造的。这也是弗格家族（Fugger family）认同的盾币标准。

【862】 到 15 世纪 60 年代中期，“黑钱”也普遍缺乏，这为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小额交易支付带来极大困难。王侯和城市都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试图不计代价地至少保证铸造一些“黑钱”，但白银的极度匮乏使得这些努力都成为泡影。① 正是在这个白银匮乏时期，即 1463 年，威尼斯人尝试铸造纯铜币，用一点不含银的铜币代替含 1% 或 2% 银的银币。② 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首批纯铜币的铸造不是在银荒期，而是在那之后的 10 年里，即又有足够的白银可以铸造传统银币的 1472 年。首批这样的铜币并不是在威尼斯——当时阿尔卑斯山和喀尔巴阡山不断发展的铜贸易在欧洲的主要贸易中心——铸造的，③ 而是在那不勒斯铸造的。威尼斯紧跟其后，在 1473 年铸造了纯铜币巴加蒂尼币（bagattini）。从“黑钱”到真正铜币的变化并不具有革命性（至少在刚开始不具有革命性），因为威尼斯人坚持声称，他们的新铜币的价值应该以其含铜量计算，而不是以铸造它们的真实费用来计算。这条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传统的、几乎完全用铜铸造的“黑钱”。在意大利以外地区，纯铜币的使用扩展得极为缓慢，因此没有必要区分“黑钱”和铜币之间的不同。正是这两者提供了（或未能提供）城市日常生活所需要的

---

① G. 勒萨热（Lesage）：《15 世纪后半时期法国的货币流通》，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年鉴》，第 3 卷（1948 年），第 315 ~ 316 页。他把黄金的流入视为对贸易顺差的证据。【110】

② W. 耶瑟（主编）：《中世纪货币史论文集》（哈尔，1924 年，1968 年再版），第 292 号，第 158 ~ 159 页。【111】

③ H. 冯·德·韦（van der Wee）：《安特卫普集市的发展和欧洲经济》，第 1 卷（海牙，1963 年），第 523 页。【112】

零钱。小面值铜币引起的通货膨胀问题是后来时代才出现的问题。15 世纪的问题依然是 13 世纪城市大发展以来面临的问题，即找到足够的零钱满足流通需求。[1]

因此，在价格革命前夕，欧洲金币的总储量或多或少大体保持不变，尽管分布区域常发生变化；优质银币的数量有迅速增长，尽管到 15 世纪末仍远未达到 14 世纪初的水平；而零钱（旧的“黑钱”或新的铜币）的数量则趋向丰富，足以满足欧洲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863】

① C. M. 奇波拉：《小硬币的大问题》，载《地中海世界的货币、价格和文明》（普林斯顿，1956 年），第 27 ~ 37 页。此文为 17 世纪人们对铜币引起通货膨胀的恐惧提供了有用并有趣的证据，并说明了 14 世纪人们具有的同样恐惧，只是没有相关证据。【113】

附录

中世纪钱币一览表

此表包括中世纪最常用的硬币及其发行国家及最早的发行日期，它们的重量和含金量、最初的价值以及发行时的名称等详细情况。

重量　中世纪文件中提到的硬币通常是按标准重量铸造的，其重量单位一般是磅或马克，但有时也有较小单位，如盎司或洛特（lot）。这些重量自然随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尽管其中一些如科隆或特罗鲁瓦的马克用途长久而普遍。有时也用里尔或格令表示重量。里尔或斯立克（角豆荚树籽）是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基本标准重量单位，并被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继续使用。但在日耳曼西部，它于6、7世纪被停止使用。在新建立的体系中，谷物格令成为基本单位。大麦格令（后来被称为特洛伊格令）和小麦格令（后来被称为巴黎格令）都开始使用。前者重0.065克，而后者重0.053克。墨洛温时期最后发行的金币特里特币和最早发行的德涅尔银币因此被描述为重20大麦格令，或者被描述为重24小麦格令。在此表中，所有重量都用克标出。

成色　在中世纪文件中通常用早期的重量体系进行表达。对银币而言，整个中世纪使用的体系都是以格令为单位的重量，如德涅尔币在其流通的第一个世纪那样。在那时候，一个苏勒德斯币或先令，指12个德涅尔银币，

在关键时期每个德涅尔币重24格令（一个本尼威特—dwt）。这种联系结束后，纯银币或更接近纯银的标准银币，成色被描述为12德涅尔。同样，半银币和半合金币的成色为6德涅尔，如此等等。因此，成色为4德涅尔18格令的银币含有$4\frac{3}{4}$的白银和$7\frac{3}{4}$的合金。波罗的海周围地区使用的另一种体系用洛特描述成色。1马克重量被分为16洛特。因此，纯银币的成色是16洛特；半银币和半合金币的成色为8洛特，等等。当西欧再次使用金币时，采用了拜占庭帝国的货币体系。这里苏勒德斯币依旧是金币，重24里尔。纯金币的成色因此为24里尔等等。因此，成色为$19\frac{1}{2}$里尔的金币含有$19\frac{1}{2}$的黄金和$4\frac{1}{2}$的合金。中世纪金币的成色要远远高于现代珠宝的成色。18里尔的成色对金币而言很差，而对珠宝而言已相当优质。在此表中，现代硬币的成色用十进制表达。单一币这里指纯金属。

帝国金币

苏勒德斯（Solidus）币或奥苏勒德斯币（拉丁文名称）或诺米斯玛币（Nomisma）（希腊文名称）	拜占庭帝国——公元309～963年，名义上是足金，最早至少0.98的含金量，重4.48克。 主要铸币厂：君士坦丁堡，一半＝半西斯币，1/3＝特里斯币（1.49克）
苏勒德斯曼卡币或曼卡币（Mancus）或曼根币（Mangon）	拜占庭在意大利和西西里铸造的轻苏勒德斯币。查士丁尼二世统治时期（685～711年），重4.2克。
特塔特伦币（Tertarteron）①	轻诺米斯玛币，君士坦丁堡于963～1092年铸造。
希斯塔米农币（Histamenon）	963～1092年的标准诺米斯玛币，最初的重量和成色一直保持到11世纪才突然下降。
海披伦币（Hyperperon）或伊波佩罗币（iperpero）或珀佩币（perper）	1092～1341年重新恢复的诺米斯玛币。最初纯度为0.85，13世纪开始退化；最后一次发行量非常少。

【864】

① 字母拼法和正文不同。参见边码163页。——译者注

野蛮人统治时期的金币

西哥特王朝（Visigoths）

苏勒德斯币（Solidus）和特里斯币（Triens）	以安纳斯塔修斯，查士丁和查士丁尼皇帝的名义发行；从阿拉里克二世（484～507年）到里奥维格德（568～586年）一直发行。
特里斯币（Triens）	以从里奥维格德（从约580年开始）到阿奇拉二世（710～714年）诸王的名义发行。

默洛温王朝（Merovingians）

苏勒德斯币和特里斯币	以安塔斯塔修斯，查士丁和查丁尼尼大帝的名义发行；由克洛维（481～511年）发行，在高卢北部使用到奥地利的西奥德伯特一世（534～548年）时期，在普罗旺斯，使用到赫拉克留斯（610～641年）时期。以从西奥德伯特一世到达戈贝特二世（674～679）间诸王的名义发行。 6世纪时有两个重量标准：苏勒德斯币重4.48克和3.92克，特里斯币重1.49克和1.31克；留存下来的7世纪的特里斯币大多重1.15～1.3克。大多数苏力第币来自普罗旺斯。

伦巴第

特里斯币	从571年开始以皇帝名义发行。以从库宁伯特（680～700年）到查理大帝（781年前）间诸王名义发行。含金量和重量起初接近于拜占庭特里斯币，但到查理时代时含金量0.39，重0.97克。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特里斯币或蒂姆萨币（Thrymsa）	主要是7世纪最后25年里在坎特伯雷和伦敦铸币厂发行。残存样品重1.25～1.35克。价值1先令。

伊斯兰地区

第纳尔币（Dinar）	由乌姆亚德和阿伯西德·卡利发在大马士革铸币厂发行的标准金币。名义上是足金；重4.25克，默西亚的欧法发行的第纳尔币（774年后）重4.28克。

第纳尔币或曼卡币（Mancus）	由乌姆亚德在西班牙发行，以及从阿伯拉曼三世到苏拉曼（928～1013年）的诸王发行。留存的第那尔币的成色和重量有很大不同；含金量0.79～0.98；重3.43～4.71克。
仿铸品	贝伦加尔·雷蒙德一世和雷蒙德·贝伦加尔一世以及巴塞罗那伯爵发行的曼卡达罗币（1018～1076年）。
第纳尔币或摩拉伯蒂诺币（Morabetino）	由奥尔摩拉维兹在北非和西班牙发行（约1085～约1170年），重3.88克。 由卡斯蒂尔、莱昂及葡萄牙国王发行摩拉伯蒂诺币（1172～约1221年）。
多博拉币（Dobla）	由马兹穆达或奥默赫兹在北非和西班牙发行的双第纳尔币或马兹穆迪纳币，在阿卜杜勒穆明（1129～1162年）到格拉纳达失守（1492年）之间发行。重4.60克。
仿铸品	从斐迪南三世（1217～1252年）开始的卡斯蒂尔国王发行的多博拉币。
塔里币（Tari）	在乌姆亚德统治下的西班牙、北非及穆斯林西西里发行的1/4第纳尔币。
仿铸品	萨莱诺（1050～1194年）和阿默菲（1050～1220年）的塔里斯币。
迪拉姆币（Dirhems）	乌姆亚德卡利发和从中亚到西班牙的后继王国发行的标准银币。重量和成色逐渐降低。在8世纪初的西班牙，含银量0.95～0.99，重2.81克。10世纪末、11世纪初的西班牙，含银量0.73～0.78，重3.11～3.13克。在奥默拉维德统治下的西班牙（1085～1170年）重2克，在奥默赫德统治下的西班牙重1.5克。

[865]

便士币

便士＝芬尼＝德纳利斯币（denarius）＝德纳罗币（denaro）＝德涅尔币（denier）＝第纳罗币（dinero）＝第赫罗币（dinhero）

半便士＝奥波勒斯币（obolus）＝奥波尔币（obole）＝梅德利尔币（medaglia）＝梅勒币（maille）

1/4便士＝弗林币（ferling）＝博格萨币（pogesa）＝博格兹币（pougeoise）

12 便士 = 先令 = 西林币（scilling）= 斯吉林币（skillingr）= 苏勒德斯币（solidus）= 苏币（sou）= 苏都币（soldo）= 苏尔都币（sueldo）（而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 30 芬尼 = 1 先令）

240 便士 = 英镑 = 镑（pfund）= 镑（pond）= 里伯亚（libra）= 里弗赫尔（livre）= 里拉（lira）

墨洛温时期的高卢

德涅尔币或德纳利斯币	在7世纪及8世纪上叶以阿奎特恩的卡利伯特二世（629～631年）及很多教职人员和世俗封建领主的名义发行。留存下来的样品大多重 1.2～1.3 克，可能是以 1.3 克为标准。

盎格鲁—撒克逊和弗里斯亚海岸

便士和芬尼	从7世纪末到8世纪中后期发行，被误称为西特币或西塔币。

加洛林帝国

德涅尔币	从755年开始代替了墨洛温时期的德涅尔币和弗里斯亚便士，794年重 1.7 克。加洛林时代结束后，以固定样式在一些地区继续发行，直到11世纪。加洛林帝国灭亡后，封建德涅尔币继续在法兰克西部发行。

[866] ## 法国

普罗万斯德涅尔币	以特鲁瓦伯爵和香槟伯爵的名义（10 世纪末～1265 年后）在普罗万斯铸造。是香槟、巴鲁瓦和洛林记账货币的基础。从 1210 年开始同图尔德涅尔币标准相同。
仿铸品	罗马参议院发行的普罗万斯德纳罗币。
梅尔格尔德涅尔币	梅尔格尔伯爵发行，接着由马格洛恩主教发行（10 世纪～1282 年以后）。1125 年：含银量 0.42，重 1.10 克。1215 年：含银量 0.33，重 1.09 克。
巴黎德涅尔币	路易七世～查理五世和路易七世（1137～1180年）的法国国王发行：残存样品重 0.85～1.28 克。查理五世（最后一次发行是 1365 年）：含银量 0.16，重 1.28 克。从10 世纪末卡佩王朝也发行了当地德涅尔币。
图尔德涅尔币	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从 10 世纪～1204 年发行。重量减少到

1.2~0.95克。法国国王发行（1204~1649年）。腓力·奥古斯都（1223年）时期的残存样品重0.78~1.01克。查理八世（1483年发行）时含银量0.08，重1.02克。

罗马帝国

意大利

德纳里币（Denari）　以加洛林国王、意大利本土国王及从奥托一世（962年）开始的德意志皇帝的名义发行。按查理大帝时的最初标准，794年重1.7克，但不断下降。伦巴第的主要铸币厂在帕维亚；托斯卡纳的主要铸币厂在卢卡。

伦巴第

皇室德纳里币　改革后的德纳里币，从约1155~1161年开始由皇帝及后来米兰和帕维亚的统治者发行。最早由腓特烈一世发行双德纳里币，含银量0.5，重1克。

威尼斯

德纳里币　从9世纪开始由威尼斯城发行。从约1170年开始以威尼斯当任总督的名义，而不是去世已久的皇帝的名义发行。

托斯卡纳（Tuscany）

德纳里币　由设在卢卡的皇室铸币厂发行，后来由城市新的市政铸币厂接管，在比萨约1151年，在沃特拉约1165年，在锡耶纳约1191年。托斯卡纳各城的德纳里币由货币会议维持同样的含银量和重量。12世纪后半期重0.6克，13世纪前半期重0.25克。【867】

罗马

德纳里币　从里奥三世和查理曼大帝到10世纪末，由教皇和帝王共同发行。

普罗万斯德纳里币　从12世纪末由参议院发行。与查理曼大帝的普罗万斯德涅尔币的图案相同。

德意志

芬尼　理论上按查理大帝的标准铸造的帝国芬尼，即1磅铸240枚，重1.7克，或从12世纪开始，1科隆马克铸160枚，每枚重1.46克。实际上：特里尔芬尼1160年重0.97克，卢森堡芬尼13世纪初重0.73克，明登芬尼在1265年含银量0.8，重0.67克。

匈牙利	
德纳尔币（Denar）	从斯蒂芬一世开始（1008～1038年），从贝拉四世（1235～1270年）到奥托（1305～1307年）发行布莱克蒂斯德纳尔币。
英格兰	
便士或斯特林币（Sterling）	从775～780年开始由肯特国王黑伯特和埃伯特发行，从783～784年由默西亚国王欧法、所有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约克的北欧海盗王国及诺曼国王发行。在1156～1157年前成色和重量随每次发行有很大的差异，重量一般在1.0～1.8克之间。1156/1157～1279年：纯度为0.925；重1.46克： “蒂比”币（1156/1157～1180年）； 窄幅便士（1180～1247年）； 宽幅便士（1247～1278年）。 从1279年开始，纯度为0.925；重量下降：爱德华一世时是1.44克；亨利七世时是0.78克。
仿铸品	斯堪的纳维亚，尤其是阿瑟雷德二世时，大量仿铸盎格鲁—撒克逊的便士。
西班牙	
巴塞罗那	
第纳罗币（Dinero）	从11世纪初开始由巴塞罗那伯爵发行。成色和重量不断下降。11世纪中期时：成色0.33，重1.14克。12世纪中期时成色0.2，重0.66克。约1174～1177年，阿方索二世改革此币：成色为0.33，重1.08克。1256年时成色为0.25，重1.08克。
阿拉贡（Arogon）	
艾森西斯第纳罗币或雅可第纳罗币	由桑丘·拉米雷兹（1063～1094年）国王开始在雅可及其他铸币厂发行。在（巴塞罗那）阿方索二世统治时期即1175年，含银量0.33，重1.08克。
卡斯蒂尔（Castile）	
【868】 第纳罗币	由费南多一世（1035～1065年）国王开始发行。

大额银币

格罗萨斯德纳勒斯币（Grossus denarius）= 大硬币 = 格罗索币（grosso）= 格罗斯币（gros）= 格罗生币（groschen）= 格鲁特币（groot）= 克罗特币（croat）= 格罗特币

(groat)。从此旧便士成为小硬币，如皮克里币、帕维币、小币、微小币等。

威尼斯

格罗索币或银杜卡托币（Ducato）或玛特潘币（Matapan）	最初是由恩里克·丹多罗总督发行的，1201年时含银量为0.965，重2.18克。最初价值可能为24便士=2苏力第币。

热那亚

格罗索币（Grosso）	可能是在13世纪初发行，重1.4克，最初价值可能为4便士。
格罗索币	可能是在13世纪20年代发行，重1.7克。最初价可能为6便士。

维洛那（Verona）

格罗索币或阿基里诺币（Aquilino）	最早是在13世纪20年代发行，重1.7克，价值20便士，因此有时也称为二十币。
仿铸品	特伦托主教从13世纪30年代开始仿铸，蒂罗尔伯爵从1271年开始仿铸，也称十字币、二十币或蒂罗利诺币。

锡耶纳（Siena）

格罗索币	最早是在13世纪20年代发行，重1.7克。最初价值为12便士=锡耶纳苏都币

比萨（Pisa）

格罗索币	最早在13世纪20年代发行，重1.7克。最初价值12便士=比萨苏都币。13世纪末发行比萨格罗斯币，也称阿基里尼币，在托斯卡纳广泛流通；不要将它与在意大利东北部广泛流通的维洛那和蒂罗尔阿基里尼格罗斯币混为一谈。

佛罗伦萨

格罗索币或银弗里诺币（Fiorino）	最早在13世纪30年代发行，重1.7克，最初价值为12便士=佛罗伦萨苏都币

米兰

格罗索币或阿布罗西	发行到13世纪中叶，可能是从12世纪90年代开始发

诺币（Ambrosino）	行。最初价值可能为 12 帝国便士 =1 米兰苏都币

罗马

格罗索币或罗马币（Romanino）	最早由布莱卡雷纳·安德罗（1253~1255 年的元老院议员）在 1253 年发行，重 3.5 克。最初价值为 12 便士 =1 罗马苏都币

那不勒斯

[869]

格罗索币或卡利诺币（Carlino）	最早由安茹的查理一世于 1278 年发行，含银量 0.93，重 3.34 克。
格罗索币或吉格利托币（Gigliato）	法国的查理二世（从 1302 年开始）到路易十二（1501~1504年那不勒斯国王）发行。最初含银量 0.93，重 4 克，重量相当稳定。残存路易十二时的样品仍重 3.4~3.6 克。
仿铸品	普罗旺斯从那不勒斯的罗伯特（1309~1343 年）开始仿铸。在阿维尼翁，这些格罗斯币被记录为伊哈蒂币。塞浦路斯从亨利二世（1288~1324 年）开始发行。匈牙利从 1329 年（那不勒斯的查理·罗伯特）开始发行。曼特施酋长国和小亚细亚的爱丁也仿铸此币。

西西里

里尔币（Reale）或皮埃尔币（Pierreale）	从阿拉贡的比德罗（1282~1285 年）开始发行。最初含银量 0.93，重 3.34 克。

西班牙

巴塞罗那（阿拉贡）

普拉特格罗索币（Grosso de Plata）或克罗特币（Croat）	最早由佩德罗三世在 1284 年发行。含银量 0.96，重 3.24 克，最初价值 12 便士 = 巴塞罗那苏都币。同样重量和成色的克罗特币发行到 16 世纪。

卡斯蒂尔

普拉特马拉弗蒂币（Maravedi de plata）	阿方索十世在 1258 年发行。残存样品重 5.4~6.0 克。

里尔币（Real）	最早由佩德罗一世（1350～1369年）发行。直到15世纪末标准未变，含银量0.93，重3.48克。最初价值3马拉弗蒂币。

法国

图尔格罗斯币（Gros tournois）	从圣路易到查理六世发行，含银量0.96。1266～1322年重4.22克，1329～1364年重量下降为2.55克。1266～1290年价值与图尔苏相当。
仿铸品	1267年的普罗旺斯、整个14世纪的法国、低地国家及莱茵兰各公国。

低地国家

埃诺（Hainault）和佛兰德	
保皇币（Cavalier）	从1269年开始由君士坦丁堡的玛格丽特发行的双斯特林，瓦朗茨的图案为骑士（保皇党人），根特图案为狮形盾，阿洛斯特图案为鹰，重约2.6克。
仿铸品	1320年前低地国家的很多公国。
佛兰德	
格罗斯币	图尔格罗斯币的变体，从那慕尔的让（1302～1303年）开始发行了20年。
格鲁特币（Groot）	从讷韦尔的路易（1322～1346年）开始发行的本土币。最初重3.6克，价值3个佛兰德斯特林。

【870】

波希米亚（Bohemia）

布拉格格罗索币（Grossus pragensis）或布拉格格罗生币（Prager-Groschen）或布拉格格罗特币（Prague Groat）	从1300～1547年发行。最初含银量0.93，重3.97克；价值12便士。后来标准逐渐降低：起初缓慢，1378年含银量为0.89，重3.62克；此后迅速退化，1405年含银量为0.67，重2.7克。

英格兰

格罗特币（Groat）	爱德华一世于1279年独立发行，含银量0.925，重5.77克。爱德华三世时期从1351年开始，含银量0.925，重

	量降低：1351 年重 4.67 克、亨利七世时重 3.11 克。价值 4 个英国斯特林。
仿铸品	苏格兰从 1357 年开始仿铸。

金 币

意大利

西西里	
奥古斯都币（Augustale）	腓特烈二世于 1231 年在墨西拿（Messina）和布林迪西（Brindisi）铸币厂发行，含金量 0.854，重 5.3 克。
佛罗伦萨	
弗罗林币或弗里诺金币	1252～1533 年发行，近似足金，最初价值 1 里特拉，重 3.54 克。1252～1422 年称为斯特拉托弗里诺金币，1422～1533 年称为拉戈弗里诺金币。
仿铸品	罗恩峡谷、低地国家、莱茵兰、奥地利、匈牙利、阿拉贡。
热那亚	
格诺威币（Genovino）或格罗诺币	从 1252 年开始发行，近似足金，重 3.53 克，最初价值 8 便士。也称为 1/4 弗罗林币（参见塔里币或 1/4 第纳尔币），及 1/8 弗罗林币。
威尼斯	
杜卡托（Ducato）金币或杜卡币或泽西诺币或西昆币（Sequin）	1284～1840 年发行，近似足金（经检验含金量为 0.997），重 3.56 克。
仿铸品	罗马、拉丁东方区、穆斯林黎瓦特、印度。

佩鲁贾（Perugia）（约 1259 年）、卢卡（Lucca）（到 1275 年）、米兰（13 世纪末之前的阿姆布罗西诺达罗币）和博洛尼亚（Bologna）（博洛尼罗币，1379 年重 3.55 克）也都发行弗罗林金币。

罗马教廷

财政弗罗林币	从 1322 年开始在阿维尼翁铸造，后来在罗马铸造。

西班牙

卡斯蒂尔

德博拉币（Dobla）	从费南多三世（1217～1252年）到1497年发行，近似纯金，重4.6克。也有倍数德博拉币，如双倍、10倍、20倍甚至40倍。除了优质德博拉币，约翰二世和恩里克四世（1406～1474年）也发行劣质的科达德博拉币，含金量只有0.79，重量仍然是4.6克。最初天主教国王的埃斯伦币也是双德博拉币，重9.2克。
仿铸品	葡萄牙从佩德罗一世（1357～1367年）开始仿铸此币。【871】

阿拉贡/巴塞罗那

弗罗林币	从1369年（佩德罗四世）到1475～1476年（约翰二世）。含金量0.75，重3.48克。
杜卡多（Ducado）金币	1475/1476～1535年。含金量0.99，重3.54克。
仿铸品	卡斯蒂尔在1497年仿铸的杜卡多币，近似足金，重3.5克。新埃斯伦币是双杜卡多币，重7克。

葡萄牙

克伦佐多币（Cruzado）	从1457年发行，含金量0.99，重3.78克。

法国

埃索币（Écu）	圣路易从1266年发行，近似足金，重4.2克，最初价值10图尔便士。
小皇室币（Petit Royal）或弗罗林	腓力四世从1290年发行，近似足金，重3.55克。
西斯币（Chaise）或克林科特币（Clinkaert）	腓力四世从1303年发行，是双皇室币或双弗罗林。
莫顿币（Mouton）或阿格纳币（Agnel）	腓力四世从1311年发行，他的继承者也继续发行。
埃索金币或西斯埃	腓力四世和约翰二世从1337～1351年发行，重4.53克；

索币	含金量不断下降，1337 年还近似纯金，1351 年含金量为 0.75。
骑士法郎或保皇币	约翰二世从 1360 年发行，近似纯金，重 3.89 克，即半英国贵族币。
埃索币	查理六世～路易十四发行，1385 年：近似纯金，重 4.08 克。1388～1475 年发行皇冠币：近似足金，1388 年重 3.99 克。从 1475 年发行太阳（soleil）埃索币：含金量 0.96，1475 年重 3.5 克。
萨卢币（Salut）	查理六世～亨利六世：近似足金，1421～1423 年重 3.89 克，1423～1449 年重 3.5 克。

匈牙利

圣拉迪劳斯（Ladislaus）弗罗林币或杜卡币	从查理·罗伯特（1308～1342 年）开始发行，近似足金，重 3.54 克。

德意志帝国

帝王	从巴伐利亚的圣路易开始发行皇室盾或弗罗林币（1314～1347年）。
波希米亚	从 1325 年发行弗罗林币、杜卡币或盾币。
吕贝克	
盾币（Gulden）或杜卡币	1340～1801 年发行。最初近似足金，重 3.59 克。不受温迪什货币协议的控制。汉堡（1435 年后）和吕纳堡（1440 年后）发行同帝国盾币和莱茵盾币相同成色和重量的盾币。

莱茵兰

莱茵盾、莱茵弗罗林、选帝侯弗罗林、选帝侯盾	由选帝侯和其他莱茵王侯根据 1354～1626 年签订的一系列协议铸造发行，重量和成色逐年下降。1354 年：含金量 0.98，重 3.54 克。1419 年：含金量 0.79，重 3.51 克。1626 年：含金量 0.77，重 3.24 克。

[872]

英格兰

金便士	亨利三世于 1257 年独立发行，近似足金，重 2.92 克，2 个银便士的重量；价值 20 便士斯特林。

贵族币	爱德华三世～詹姆斯一世发行。近似纯金。1344～1464年价值为6先令8便士斯特林，1344～1346年重8.97克；1346～1351年重8.33克；1351～1412年重7.78克，1412～1464年重7.0克。从1464年开始发行玫瑰—贵族币或莱伊币，价值10先令斯特林。1464年重7.78克。
天使币	从1464年发行，价值6先令8便士斯特林，近似纯金，重5.18克。

勃艮第或勃艮第尼德兰

腓力币或保皇币或骑手币（Rider）	好人腓力1433～1451年发行，1433年价值4先令佛兰德格鲁特币。含金量0.99，重3.63克。
狮币（Lion or Leeuw）	好人腓力从1454～1460年发行；1454年价值5先令佛兰德格鲁特币，含金量0.96，重4.25克。
圣安德鲁弗罗林或圣安德烈盾币	好人腓力到美男子腓力1466～1496年发行。1466年价值为3先令5便士佛兰德格鲁特币，含金量0.79，重3.4克，与莱茵盾相同。

布莱币

白钱——布莱币、奥巴币、威斯芬尼、布莱卡币。

法国

布莱币（Blanc au K）	1365～1380年发行，纯度0.32，重2.55克。
布莱币或格纳币（Guenar）	1385～1413年发行，最初纯度为0.48，重3.26克，后来标准缓慢下降。1413年，纯度为0.4，重3.06克，价值为10图尔先令。
皇冠布莱币或帕佩罗币（Parpaillole）	1436～1515年发行，最初成色为0.4，重3.06克，标准缓慢下降，1507～1515年成色为0.36，重2.85克，1436～1488年价值10个图尔便士，1488年后价值12个图尔便士。
仿铸品	布列塔尼、勃艮第及萨瓦伊公爵。

勃艮第尼德兰

帕塔币（Patard）或斯蒂弗币（Stuiver）或弗兰德尔币（Vierlader）	从1433年到16世纪发行。最初成色为0.48，重3.44克。

莱茵兰

威斯芬尼或奥巴币（Albus）	由选帝侯和其他莱茵王侯根据1354年签订的一系列协议铸造发行。

汉萨城市	6个温迪什城市联合铸币——吕贝克、汉堡、吕纳堡、罗斯托克、施特拉尔松德和魏玛——根据1379年开始的一系列货币协议发行芬尼、威顿币（4芬尼）及塞斯林格币（6芬尼）。
先令	从1432年到16世纪发行。最初成色为0.625，重2.54克。

【873】

参考文献

编者注

正如第一版一样，为了与剑桥史系列的传统保持一致，本参考文献是选择性的和不完全的。目的不在于开列与主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出版物，而是为了使读者能够更详细地研究主题。原则上，已有更新的出版物和论文不再收录，与个别章节之主题仅间接相关的一般性论文尽量少收录。由于大多数章节并非新的研究，而是对第二手文献中已有知识的概括和阐释，因此，原始文献或不予收录，或仅限于收录最重要的和包含最关键史实的。在上述原则的限度内，各撰稿人被赋予自由编排他们认为最佳文献表的权力。因此各章的参考文献式样各异，而其前面的文字将对其特殊性做出说明。 [874]

第一章　从野蛮欧洲到罗马时代的贸易和工业

I. 贸易和经济的人类学研究

BAILEY, F. G. *Caste and the Economic Frontier*. Manchester, 1957.
BICCHIERI, M. G. (ed.). *Hunters and Gatherers Today*. New York, 1972.
BOHANNAN, P. and DALTON, G. (eds.). *Markets in Afric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2.
DALTON, G. (ed.). *Tribal and Peasant Economies*. New York, 1967.
FIRTH, R. *Economies of the New Zealand Maori*, 2nd edn. Wellington, 1959.
——(ed.). *Themes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London, 1967.
GOODY, J. R. 'Inheritance, Property and Marriage in Africa and Eurasia.' *Sociology*, III (1969), 55–76.
HARDING, T. G. *Voyagers of the Vitiaz Strait: a study of the New Guinea trade system*. Monographs of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44, 1967.
KAPLAN, D. 'The Formal-Substantive Controversy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reflections on its wider implications.'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XXIV (1968), 228–51.
LEE, R. B. and DEVORE, I. (eds.). *Man the Hunter*. Chicago, 1968.
MALINOWSKI, B.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London, 1922.
POLANYI, K., ARENSBERG, C. M. and PEARSON, H. W. *Trade and Markets in the Early Empires*. New York, 1957.
SERVICE, E. R.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1966.

II. 与经济组织有关的建筑学理论

BINFORD, L. R. (ed.). *For Theory Building in Archaeology*. New York, 1977.
CLARKE, D. L. *Analytical Archaeology*. London, 1968.

——(ed.). *Models in Archaeology*. London, 1972.
HIGGS, E. S. (ed.). *Papers in Economic Prehistory*. Cambridge, 1972.
RENFREW, A. C. (ed.). *The Explanation of Cultural Change*. London, 1972.

III. 关于史前贸易和经济的一般著作

CHILDE, V. G. 'Trade and Industry in Barbarian Europe till Roman Times.' Chap. I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 1ST edn. Cambridge, 1952.
CLARK, J. G. D. *Prehistoric Europe*. London, 1952.
EARLE, T. K. and ERICSON, J. E. (eds.). *Exchange Systems in Prehistory*. New York, 1977.
HIGGS, E. S. (ed.) *Palaeoeconomy*. Cambridge, 1975.
JOCHIM, M. A. *Hunter-Gatherer Subsistence and Settlement*. New York, 1976.
LAMBERG-KARLOVSKY, C. C. and SABLOFF, J. A. (eds.). *Ancient Civilization and Trade*. Albuquerque, 1975.
SIEVEKING, G. de G., LONGWORTH, I. M. and WILSON, K. E. (eds.). *Problem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Archaeology*. London, 1976.
UCKO, P. J. and DIMBLEBY, G. W. (eds.). *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London, 1969.
[875] UCKO, P. J., TRINGHAM, R. and DIMBLEBY, G. W. (eds.). *Man, Settlement and Urbanism*. London, 1972.

IV. 欧洲史前史的一般著作

CHILDE, V. G.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6th edn. London, 1957.
COLES, J. M. and HIGGS, E. S.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an*. London, 1969.
COLLINS, D. (ed.). *The Origins of Europe*. London, 1975.
PIGGOTT, S. *Ancient Europe*. Edinburgh, 1965.
RENFREW, A. C. *Before Civilization*. London, 1973.

V. 采集—渔猎及农业经济（第2、3部分）

BALIN, P. G. 'Seasonal Migration in South-West France during the late Glacial Period.'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IV (1977), 245-57.
BORDES, F. *The Old Stone Age*. London, 1968.
BUTZER, K. W. *Environment and Archaeology*. 2nd edn. Chicago, 1971.
CLARK, J. G. D. 'Traffic in Stone Axe and Adze Blad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II (1965), 1-28.
CLARKE, D. L. 'Mesolithic Europe: the economic basis.' In SIEVEKING, G. de G. *et al. Problem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Archaeology*. London, 1976, 449-81.
DE SONNEVILLE BORDES, D. *Le Paléolithique Supérieur en Périgord*. Bordeaux, 1960.
FLANNERY, K. V. 'The Ecology of Early Food Production in Mesopotamia.' *Science*, CXLVII (1965), 1247-56.
JAZDZEWSKI, K. *Poland*. London, 1965.
LEROI-GOURHAN, A. 'Les Fouilles d'Arcy-sur-Cure (Yonne).' *Gallia Préhistoire*, IV (1961), 3-16.
MELLAART, J. *Earliest Civilizations of the Near East*. London, 1965.
MOUTON, P. and JOFFROY, R. 'Les Gisements Aurignaciens des Rois à Mouthiers (Charents).' *Gallia*, Supplement IX (1958).
NANDRIS, J. 'Lepenski Vir.' *Science Journal*, Jan. 1968, 64-70.
PHILLIPS, P. *Early Farmers of West Mediterranean Europe*. London, 1975.
PILBEAM, D. *The Ascent of Man*. New York. 1972.

PRADEL, L. 'La Grotte Périgordienne et Aurignacienne du Fontenioux, commune de Saint-Pierre-de-Maillé (Vienn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Préhistorique Française*, XLIX (1952), 413–32.
SHACKLETON, N. J. and RENFREW, A. C. 'Neolithic Trade Routes Re-aligned by Oxygen Isotope Analyses.' *Nature*, CCXXVIII (1970), 1062–5.
SIELMANN, B. 'Die Frühneolithische Besiedlung Mitteleuropas.' In SCHWABEDISSEN, J. (ed.). *Die Anfänge des Neolithikum vom Orient bis Nordeuropa, Teil Va (Westliches Mitteleuropas)*. Cologne, 1972, 1–65.
TRINGHAM, R. *Hunters, Fishers and Farmers of Eastern Europe*. London, 1971.
VERTES, L. 'Das Moustérien in Ungarn.' *Eiszeitalter und Gegenwart*. X (1959), 21–40.
VITA-FINZI, C. and HIGGS, E. S. 'Prehistoric Economy in the Mount Carmel Area of Palestine: site catchment analysis.' *Proc.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XXXVI (1970), 1–37.
WATERBOLK, H. T. 'Food Production in Prehistoric Europe.' *Science*, CLXII (1968), 1093–1102.

VI. 爱琴海和迈锡尼交通网（第3、4部分）

BASS, G. F. *Archaeology under Water*. London, 1966.
—— 'Cape Gelidonya: a Bronze Age Shipwreck.'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LVII (1967), part 8.
BOTTERÓ, J., CASSIN, E. and VERCOUTTER, J. (eds.). *The Near East: the Early Civilizations*. Trans. by R. F. TANNENBAUM. London, 1967.
BRANNIGAN, K. 'Wessex and Mycenae: some evidence reviewed.' *Wiltshire Archaeological Magazine*, LXV (1971), 89–107.
CASSON, S. *Ancient Cyprus*. London, 1937. [876]
CHILDE, V. G. *The Danube in Prehistory*. Oxford, 1929.
EBERT, M. *Reallexikon der Vorgeschichte*. Berlin, 1924–32.
GARDIN, J. C. 'Reconstructing an Economic Network in the Ancient East with the Aid of a Computer.' In D. HYMES (ed.). *The Use of Computers in Anthropology*. The Hague, 1965, 378–91.
HOOD, S. *The Minoans*. London, 1971.
HUTCHINSON, R. W. *Prehistoric Crete*. Harmondsworth, 1962.
LLOYD, S. *Early Highland Peoples of Anatolia*. London, 1967.
MELLAART, J. 'The Royal Treasure of Dorak.'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28 Nov. 1959.
PALMER, L. R. *The Interpretation of Mycenaean Greek Texts*. Oxford, 1963.
Ren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 XXIII, 1976. *Trad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Iraq*. XXXIX (1977).
RENFREW, A. C. 'Wessex without Mycena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LXIII (1968), 277–85.
——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 London, 1972.
SHERRATT, A. 'Resources, Technology and Trade in Early European Metallurgy.' In SIEVEKING, G. de G. *et al. Problem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Archaeology*. London, 1976, 557–81.
SNODGRASS, A. 'Mycenae, Northern Europe and Radiocarbon Dates.' *Archaeologica Atlantica*, I (1975), 33–48.
TAYLOUR, Lord William. *The Mycenaeans*. London, 1964.
VENTRIS, M. G. F. and CHADWICK, J. *Documents in Mycenaean Greek*. Cambridge, 1956.

VII. 殖民地网络和帝国（第5、6部分）

ALEXANDER, J. A. *Yugoslavia*. London, 1971.
ARRIBAS, A. *The Iberians*. London, 1967.
BARFIELD, L. H. *Northern Italy*. London, 1971.
BOARDMAN, J. *The Greeks Overseas*. Harmondsworth, 1964.

——*Preclassical Greece*. Harmondsworth, 1967.
CARPENTER, R. *Discontinuity in Greek Civilization*. Cambridge, 1966.
FILIP, J. *Celtic Civilization and its Heritage*. Trans. R. FINLAYSON-SAMSOUR and I. LEWITOVA. 2nd rev. edn. Prague, 1976.
GIMBUTAS, M. *The Balts*. London, 1963.
——*Bronze Age Cultur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Hague, 1965.
HACKMAN, R. *The Germanic Peoples*. London, 1971.
HARDEN, D. *The Phoenicians*. London, 1962.
HATT, J.-J. *Celts and Gallo-Romans*. London, 1970.
JOFFROY, R. *Le Trésor de Vix*. Paris, 1962.
KIMMIG, W. 'Early Celts on the Upper Danube: the excavations at the Heuneburg.' In BRUCE-MITFORD, R. (ed.). *Recen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Europe*. London, 1975, 32–64.
MEGAW, J. V. S. 'The Vix Burial.' *Antiquity*, XL (1966), 38–44.
MOSCATI, S. *The 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London, 1968.
MÜLLER-KARPE, M. *Beiträge zur Chronologie der Urnenfelderzeit*. Berlin, 1959.
NEUSTUPNY, E. and J. *Czechoslovakia*. London, 1961.
PALLOTINO, M. *The Etruscans*. Trans. J. CREMONA, ed. D. RIDGWAY. London, 1974.
PIGGOTT, S., DANIEL, G. E. and MCBURNEY, C. B. M. (eds.). *France Before the Romans*. London, 1974.
PLEINER, R. 'The Iron Age: a notion in history.' In EHRICH, R. W. (ed.). *The Flagstaff Symposium*. 1969, 13.
POWELL, T. G. *The Celts*. London, 1967.
SANDARS, N. K. *Bronze Age Cultures in France*. Cambridge, 1957.
STENBERGER, M. *Sweden*. London, 1962.
SULIMIRSKI, T. *Prehistoric Russia*. London, 1970.
TALBOT-RICE, T. *The Scythians*. London, 1954.
[877] VON MERHART, L. *Hallstatt und Italien*. Vienna, 1968.

第二章　西罗马帝国晚期的贸易和工业

下面是本参考文献中使用的省略语：

Act. arch.	*Acta archaeologica* (Copenhagen)
AJP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ANRW	*Aufstieg und Nei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ed. H. Temporini and W. Haase. Berlin-New York, 1972–
BCH	*Bulletin de correspondance hellénique*
BSA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CAH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lass. Journ.	*Classical Journal*
Class. Phil.	*Classical Philology*
CMedH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Cod. J.	*Codex Justinianus*
Econ. H. 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JR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Mon. ant.	*Monumenti antichi pubblicati per cura della reale Accademia dei Lincei*
Num. Chron.	*Numismatic Chronicle and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PBSR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P. Oxy.	*Oxyrhynchus Papyri*, ed. Grenfell and Hunt *et al.* London, 1898–
REA	*Revue des études anciennes*
Rom. Econ.	A. H. M. Jones, *The Roman Economy: Studies in ancient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history*, ed. P. A. Brunt. Oxford, 1974.

TAPA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I. 古代资料

文献

关于罗马帝国早期，斯塔博、普里尼的《自然史》和佩特尼奥斯的 *Cena Trimalchionis* 可以由包括马提奥和尤文纳尔在内的很多其他作者的零散作品作为补充。关于公元2~3世纪的情况，阿里斯蒂德和迪奥・克里斯的各种演讲提供了宝贵史料；而《奥古斯都历史》尽管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对公元4世纪情况的反映（参看 N. H. BAYNES, *The H. A., its date and purpose.* Oxford, 1926; A. D. MOMIGLIANO, *Secondo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 Rome, 1960, 105-43; R. SYME, *Ammianus and the Historia Augusta.* Oxford, 1968; *Emperors and Biography*, Oxford, 1971），但若谨慎使用仍很重要。关于晚期西罗马帝国的两部主要著作是：*the Expositio totius mundi*(ed. Riese in *Geographici latini minores*, 105~26; MÜLLER, *Geographici graeci minores*, *II*, 513~28; SINKO, *Archiv f. lateinische Lexicographie u. Grammatik*, XIII. 1904, 531~71)，这部著作可能是康斯坦丁堡统治后期编纂的；另一部是 Notitia dignitatum(ed. O. Seeck, 1876)，此书成书于公元5世纪早期，但包含有更早时期的材料(参看 A. H. M. 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III, app. 2. 347-80 for bibliography)。教会历史学家和教父也记录了很多对经济史学家颇有价值的资料。

法典

这些法典极为重要，特别是 Theodosian Code (Theodosiani libri XVI Cum constitutionibus Sirmon dianis, ed. MOMMSEN-MEYER. Berlin, 1905; Translation: C. PHARR,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Princeton, 1952; reprint, Westport, 1970)，它对于社会及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同样重要的还有加斯提安（Justinian）法规汇编的各部分。 [878]

这些文献包含所有最重要的材料，其中有 Mine-Law of Vipasca in Portugal (Dessau, 6 891) 和戴克里先（Diocletian）的“价格敕令”（见下面）。古写本尽管都来自罗马帝国东部（主要是埃及），却同样具有关于西罗马帝国的内容。最后，有西罗马帝国各省出土文物及货币的资料。

下面的参考文献以 *CAH* 第十、十一和十三章（特别是第十章944~945页和第十二章750~754页关于 Oertel 的内容），*CmedH.* 第一章（特别是第688页以后）及 Frank's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作为补充；关于货币，请参看 Mattingly in *Num Chron.* 6, VI(1946), 111~20 中所列书单；the three last volumes of *The Roman Imperial Coinage*, ed. C. H. V. SUTHERLAND and R. A. G. CARSON: VI, *From Diocletian's reform, 294, to the death of Maximian, 313*, ed. SUTHERLAND(1967), VII, *Constantine and Licinius(313-337)*, ed. P. M. BRUUN(1966) and VIII, *The Family of Constantine I*(337-364), ed. J. P. C. KENT(1981); and the bibliography added by M. H. CRAWFORD to A. H. M. JONES's article on 'Numismatics and History' reprinted in *The Roman Economy*, 80-1. In general, ROSTOVTZEF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passim*, and PIGANIOL, *L'Empire chrétien*, pp. VII-XVI. There is also a useful survey in G. WALSER and T. PEKÁRY, *Die Krise des römischen Reiches. Bericht über die 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3. Jahrh. (193-284 n. Chr.) von 1939 bis 1959.* Berlin. 1962.

the Edictum Diocletiani de pretiis 的标准文本现在为：S. LAUFFER, Diokletians Preisedikt. Berlin, 1971. 下列著作中有关于该书的讨论：

BINGEN, J. 'Notes sur l'édit du maximum,' *BCH*, LXXVIII (1954), 349.

BÜCHER, K. *Die Diokletianische Taxordnung vom Jahre 301*. (Tübing. Beiträge z.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22), 179ff. Originally appeared in *Zeitsch f.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 L (1894), 188–219).

CAPUTO, G and GOODCHILD, R. 'Diocletian's Price-Edict at Ptolemais (Cyrenaica).' *JRS*, XLV (1955), 106–15.

CRAWFORD, M. H. and REYNOLDS, J. 'The Publication of the Prices Edict: a new inscription from Aezani.' *JRS*, LXV (1975), 160–3.

DUNCAN-JONES, R. *The Economy of the Roman Empire*. Cambridge, 1974. App, 17, pp. 366–9, 'Diocletian's Price-Edict and the Cost of Transport.'

ERIM, K. T. and REYNOLDS, JOYCE. 'The Copy of Diocletian's Edict on Maximum Prices from Aphrodisias in Caria.' *JRS*, LX (1970), 120–4.

—— 'The Aphrodisias Copy of Diocletian's Edict on Maximum Prices.' *JRS*, LXIII (1973), 99–110.

GRASER, E. R. 'The Edict of Diocletian,' ed. and transl. in Vol. v of Frank's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305–421.

—— 'The significance of two new fragments of the Edict of Diocletian.' *TAPA*, LXXI (1940), 157–74.

GUARDUCCI, M. 'Il primo frammento scoperto in Italia dell'editto di Diocleziano.' *Atti della Pontificia Accademia Romana di Archaeologia: Rendiconti*, XVI (1940), 11–24.

JACOPI, G. 'Gli scavi della missione archaeologica italiana ad Afrodisiade nel 1937.' *Mon. ant.* XXXVIII (1939), 130–52, 159.

MACMULLEN, R. 'Diocletian's Edict and the *castrensis modius*.' *Aegyptus*, XLI (1961), 3–5.

MICHELL, H. 'The Edict of Diocletian: a study of price fixing in the Roman Empire.' *Canadian Journ. of Econ. and Pol. Sci.*, XIII (1947), 1–12.

NAUMANN, RUDOLF and FRIEDERIKE. *Der Rundbau in Aezani mit dem Preisedikt des Diokletian und das Gebäude mit dem Edikt in Stratonikeia. Istanbuler Mitteilungen*, Beiheft 10. Tübingen, 1973.

SEECK, O. 'Die Schatzungsordnung Diokletians.' *Zeitschr. f. Sozial-u. Wirtschaftsgesch.*, IV (1895), 275–342.

SEGRÈ, A. See the articles listed under § V below.

WEST, L. C. 'Notes on Diocletian's *Edict*.' *Class. Phil.*, XXXIV (1939), 242–4.

—— 'The Coinage of Diocletian and the Edict of Prices.' *Studies in Rom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ed. P. R. COLEMAN-NORTON). Princeton, 1951, 290–302.

[879]

YEO, C. A. 'Land and Sea Transportation in Imperial Italy.' *TAPA*, LXXVII (1946), 221–44.

II. 一般性著作

AUBIN, H. *Vom Altertum zum Mittelalter*. Munich, 1949.

BALDACCI, P. 'Negotiatores e mercatores frumentarii nel periodo imperiale.' *R. Instituto Lombardo di Scienze e Lettere, Rendiconti*, CI (1967), 273–91.

BARROW, R. H. *Slavery in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1928.

BAYNES, N. H. 'M. Pirenne and the Unity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JRS*, XIX (1929), 230–5.

BERNARDI, A. 'Tendenze di fondo nell'economia del tardo impero romano.' *Studi giuridici e sociali in memoria di E. Vanoni*, Pavia, 1961, 257–321.

BESNIER, M. 'L'Empire romain de l'avènement des Sévères au concile de Nicée.' *Histoire romaine*, IV, I. Paris, 1938.

BOAK, A. E. R. *Manpower Shortage and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 Ann Arbor, 1955.

BRATIANU, G. I. *La Distribution de l'or et les raisons économiques de la division de l'empire roma-*

in. Paris, 1938.

Bréhier, L. 'Colonies d'orientaux en occident au commencement du moyen âge.' *Byzantinische Zeitsch.*, XII (1903), 1ff.

Burford, Alison. *Craftsmen in Greek and Roman Society*. London, 1972.

—— 'Heavy Transport in Classical Antiquity.' *Econ. H. R.*, 2nd ser. XIII (1960-1), 1-18.

Bury, J. B. *History of the late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A. D. 395-A. D. 565)*. 2 vols. London, 1923.

—— 'Rome and Byzantrium.' *Quart. Rev.*, CXCII (1900), 129-55.

Charanis, P. 'Observation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 in the Third Century.' *ANRW*, II, 2, 551-9.

Charlesworth, M. P. *Trade Routes and Commerce of the Roman Empire*, 2nd edn. Cambridge, 1926.

Chastagnol, A. 'Le Ravitaillement de Rome en viande au Ve siècle.' *Rev. Historique*, CCX (1953), 13-22.

Coleman-Norton, P. R. (ed.). *Studies in Rom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in Honour of A. C. Johnson*. Princeton, 1951.

D'Arms, J. H. *Commerce and Social Standing in Ancient Rome*. Cambridge, Mass., 1981.

——and Kopff, E. C. (ed.). *The Seaborne Commerce of Ancient Rome*.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36.) Rome, 1980.

de Laet, S. J. *Aspects de la vie sociale et économique sous Auguste et Tibère*. Brussels, 1944.

Dill, S. *Roman Society in the last Century of the Western Empire*, 2nd edn. London, 1899.

Dopsch, A. *Wirtschaftliche u. soziale Grundlagen der europäischen Kulturentwicklung aus der Zeit von Cäsar bis auf Karl den Grossen*. 2 vols. 2nd edn. Vienna, 1923-4. (A condensed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appeared a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sation*. London, 1937.)

—— 'Frühmittelalterliche u. spätantike Wirtschaft.' *Verfassungs-u. Wirtschaftsgeschichtedes Mittelalters*, 219-34. Vienna, 1928.

Duncan-Jones, R. P. *The Economy of the Roman Empire: quantitative studies*, 2nd edn. Cambridge, 1982.

Finley, M. I. *The Ancient Economy*. London, 1973.

——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Ancient World.' *Econ. HR.*, 2nd ser. XVIII (1965), 29-45.

—— (ed.). *Slaver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1960.

Foxhall, L. and Forbes, H. A. 'Sitometreia. The role of grain as a staple food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hiron*, XII (1982), 41-90

Frank, T. *Economic History of Rome*, 2nd edn. Baltimore, 1927.

—— (ed.).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5 vols. and index. Baltimore, 1933-40.

—— 'Notes on Roman Commerce.' *JRS*, XXVII (1937), 72-9.

Friedlander, L. and Wissowa, G. *Darstellungen aus der Sittengeschichte Roms*. 10th edn, 4vols. Leipzig, 1919-23.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from 7th edn as *Roman Life and Manners under the Early Empire*. London, 1910-13. [880]

Garnsey, P. (ed.). *Non-Slave Labour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Supplement Volume 6.) Cambridge, 1980.

Garnsey, P., Hopkins, K. and Whittaker, C. R. (eds.). *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 London, 1983. (See especially Garnsey, P., 'Grain for Rome', 118-30; Pleket, H. W., 'Urban Elites and Business in the Greek Part of the Roman Empire' 131-44; Carandini, A., 'Pottery and the African Economy', 145-62; Whittaker, C. R., 'Late Roman Trade and Traders', 163-80.)

Garnsey, P. and Whittaker, C. R. (eds.). *Trade and Famine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Supplement Volume 8.) Cambridge, 1983. (See especially Morel, J.-P., 'La Céramique comme indice du commerce antique', 66-74; Middleton, P., 'The Roman Army and Long Distance Trade', 75-83; Hopkins, K., 'Models, Ships and Staples', 84-109;

WHITTAKER, C. R. 'Trade and 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 110-27.)
GELZER, M. 'Das Römertum als Kulturmacht.' *Hist. Zeitsch.*, CXXVI (1922), 189-206.
—— 'Altertumswissenschaft u. Spätantike.' *Hist. Zeitsch.*, CXXXV (1927), 173-87.
GUMMERUS, H. *Der römische Gutsbetrieb als wirtschaftlicher Organismus nach den Werken des Cato, Varro und Columella. Klio*, Beiheft 5. Leipzig, 1906.
——*Die Fronden der Kolonen* (Öfversigt af Finska Vetenskaps-Societetens Förhandlingar, L. 3). Helsinki, 1907-8.
—— 'Die römische Industrie.' *Klio*, XIV (1914), 149ff; XV (1918), 256ff.
HARMAND, L. *Le Patronat sur les collectivités publiques des origines au Bas-Empire.* Paris, 1957.
HARRIS, W. V. 'Towards a Study of the Roman Slave Trade' in D' Arms and Kopff, *Seaborne Commerce*, 117-40.
HARTMANN, L. M. *Ein Kapitel vom spätantiken und frühmittelalterlichen Staate.* Stuttgart, 1913.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notes by H. LIEBESCHÜTZ as *The Early Medieval State: Byzantium, Italy and the West.* London, 1949.
HAYWOOD, R. M. *The Myth of Rome 's Fall.* New York, 1958.
—— 'Some Traces of Serfdom in Cicero' s Day.' *AJP*, LIV (1933), 145-53.
HEDEAGER, L.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oman Imports in Europe North of the *Limes* (0-400 A. D),' in KRISTIANSEN, K. and PALAUDAN-MÜLLER, C. (eds.), *New Directions in Scandinavian Archaeology.* Lyngby, 1977. 191-216.
HEICHELHEIM, F. M.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vom Paläolithikum bis zur Völkerwanderung der Germanen, Slaven und Araber*, 2 vols. Leiden, 1938.
—— 'Welthistorische Gesichtspunkte zu den vormittelalterlichen Wirtschaftsepoken.' *Schmollers Jahrb.*, CVI (1933), 994ff.
HOPKINS, K. 'Taxes and Trade in the Roman Empire.' *JRS*, LXX (1980), 101-25.
JONES, A. H. M.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3 vols., Oxford, 1964.
——*The Roman Economy: studies in ancient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history*, ed. P. A. BRUNT. Oxford, 1974.
——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History*, XL (1955), 209-26.
——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Towns of the Roman Empire.' *Recueil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 VII (1955), 161-92 (= *Rom. Econ*, 35-60).
—— 'The Cloth Industry under the Roman Empire.' *Econ. H. R.*, 2nd ser, XIII (1960), 183-92 (= *Rom. Econ.* 350-64).
KATZ, S. *The Decline of Rome and the Rise of Mediaeval Europe.* Ithaca, 1955.
KIECHLE, F. *Sklavenarbeit und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im römischen Reich.* Wiesbaden, 1969.
KÖSTER, A.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antiken Seewesens. Klio.* Beiheft 32. Leipzig, 1934.
KORNEMANN, E. *Weltgeschichte des Mittelmeerraumes von Philipp II von Makedonien bis Muhammed*, II. Munich, 1949.
—— 'Die unsichtbaren Grenzen des römischen Kaiserreichs', on pp. 96ff of *Staaten, Völker, Männer*, Leipzig, 1934.
LANDRY, A. 'Quelques aperçus concernant la dépopulation dans l' antiquité.' *Rev. Hist.*, CLXXVII (1936), 1-33. [881]
LA PIANA, G. 'Foreign Groups in Rome during the First Centuries of the Empir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XX (1926), 183-403.
LEFEBVRE DES NOETTES, *L' Attelage: le cheval de selle à travers les âges.* Paris, 1931.
——*De la marine antique à la marine moderne.* Paris, 1935.
LOPEZ, R. S. 'Mohammed and Charlemagne: a revision.' *Speculum*, XVIII (1943), 14-38.
—— 'Silk industry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Speculum*, XX (1945), 1ff.
LOT, F. *La fin du monde antique et le début du moyen âge.* Paris, 1927.
MACMULLEN, R. 'Market Days in the Roman Empire.' *Phoenix*, XXIV (1970), 333-40.
MAZZA, M. *Lotte sociali e restaurazione autoritaria nel terzo secolo d. C.* Catania, 1970.
MAZZARINO, S. *Aspetti sociali del quarto secolo: ricerche di storia tardo-romana.* Rome, 1951.
MEIGGS, R. *Roman Ostia*, 2nd edn, Oxford, 1973.

MICKWITZ, G. 'Der Verkehr auf dem westlichen Mittelmeer um 600 n. Chr' *Festschrift Dopsch*, 1938, 74ff.

MILLER, J. I. *The Spice Trade of the Roman Empire*, *29 B.C.-A.D. 641*. Oxford, 1969.

MOMMSEN, Th, 'Die Provinzen von Caesar bis Diokletian.' *Römische Geschichte*, 4th edn, v. Berlin, 1894.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The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Caesar to Diocletian*. London, 1909.

OERTEL, F. 'The Economic Unifica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industry, trade and commerce,' *CAH*, x(1934), 382-424(bibl. 944-5).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Empire.' *CAH*, XII(1939), 232-81 (bibl. 750-4) (cf. 724-5; note on 'Inflation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centuries').

PARKER, H. M. D. *A. 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A.D. 138-337*). London, 1935.

PARVÂN, V. *Die Nationalität der Kaufleute im römischen Kaiserreich*, Breslau, 1909.

PASSERINI, A. *Linee di storia romana in età imperiale*. Milan, 1949.

PERSSON, A. W. *Staat und Manufaktur im römischen Reiche*. Lund, 1923.

PIGANIOL, A. 'L'Empire chrétien(325-95).' *Histoire romaine*, IV, 2. Paris, 1947.

——'La Crise sociale au bas-empire.' *Journ. des savants*(1955), 5-15.

PIRENNE, H. *Mahomet et Charlemagne*, 3rd edn. Paris, 1937.

POLANYI, K., ARENSBERG, C. and PEARSON, H. W. (eds.).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conomic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hicago, 1957.

POMEY, P. and TCHERNIA, A. 'Le Tonnage maximum des navires de commerce romains.' *Archaeonautica* II(1978), 233-51.

PICKMAN, G. R. *The Corn Supply of Ancient Rome*. Oxford, 1980.

ROBLIN, M. 'Citès ou citadelles? Les enceintes romaines au bas empire d'après l'exemple de Paris.' *REA*, LIII(1951), 301-11.

ROSTOVTZEFF, M.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2nd edn revised by P. M. FRASER. 2 vols. Oxford, 1957.

——*Caravan Cities*. Oxford, 1932.

——'The Decay of the Ancient World and its Economic Explanations.' *Econ. H. R.*, 11(1929-30), 197-214.

ROUGÉ, J. *Recherches sur l'organisation du commerce maritime en Méditerrannée sous l'Empire romain*. Paris, 1966.

——'La Navigation hivernale sous l'Empire romain.' *REA*, LIV(1952), 316-25.

RUGGINI, L. *Economia e società nell'Italia annonaria. Rapporti fra agricoltura e commercio dal IV al VI sec. d. Cr.* Milan, 1961.

——'Ebrei e orientali nell'Italia settentrionale fra il IV e il VI secolo d. Cr.' *Studia et documenta historiae et iuris*, XXV(1959), 186-308.

——'Stato e associazioni professionali nell'età imperiale romana.' *Akten der VI. interat. Kongr. f. griech. u. lat. Epigraphik*. Munich, 1972, 137-47.

STE-CROIX, G. E. M. de. *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from the Archaic Age to the Arab Conquest*. London, 1981.

SALMON, P. *Population et dépopulation dans l'empire romain*. Collection Latomus. Brussels, 1974.

SCHAAL, H. *Vom Tauschhandel zum Welthandel*. Leipzig, 1931.

——'Flusschiffahrt und Flusshandel im Altertum.' *Festschrift f. die 400. Jahr-Feier des Alten Gymnasiums in Bremen, 370*ff. Bremen, 1928.

SCHMIDT, A. *Drogen und Drogenhandel im Altertum*. Leipzig, 1924. [882]

SEECK, O. *Ges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Welt*. 4th edn, 2 vols. and 2 vols. of notes. Stuttgart, 1921.

STEIN, E. *Geschichte des spätrömischen Reiches*, I. Vienna, 1928.

——*Histoire du bas-empire, II: de la disparition de l'empire d'Occident à la mort de Justinien (476-565)*. Bruges, 1950.

SÜNDWALL, J. *Weströmische Studien*. Berlin, 1915.

THÉVENOT, E. 'La Population des villes gallo-romaines.' *Rev. archéologique de l'est et du centre-*

est. III(1952),121-2.
——'Le Peuplement rurale de la Gaule.' *Ibid.*, IV(1953),78-85.
TOUTAIN, J.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1930.
VAN BERCHEM, D. *Les Distributions de blé et d'argent à la plèbe romaine sous l'empire.* Geneva, 1939.
VAN SICKLE, C. E. 'Diocletia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Municipalities.' *JRS*, XXVIII(1938), 9ff.
VÁRADY, L. *Késörómai hadügyek, etc.* (*Late Roman Military Affairs and their Social Basis: the last century of the Roman Empire, 376-476*). Budapest, 1961.
VINOGRADOFF, P. *The Growth of the Manor*, 2nd edn. London, 1911.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fourth century.' *CMedH*, I, 2nd edn. 1924, 542-67(bibl. 688ff).
WALBANK, F. W. *The Awful Revolution.* Liverpool, 1967.
WEBER, M. *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 III. Abteilung: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2nd edn. Tübingen, 1928.
WEST, L. C. 'The Economic Collapse of the Roman Empire.' *Class. Journ.*, XXVIII(1932-3),96ff.
WESTERMANN, W. L. *The Slave Systems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y.* Philadelphia, 1955.
——'On Inland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Antiquity.' *Pol. Sci. Quart.*, XLIII(1928), 364.
WHITE, K. D.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in the Roman Empire. A study of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activity in the Roman Empire.' *Acta classica*(Cape Town), 11(1959),78-89.
WHITTAKER, C. R. 'Labour supply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Opus*, I(1982),171-9.
WIPSCYCKA, E. 'Das Textilhandwerk und der Staat.' *Archiv für Papyrusforschung*, XVIII(1966), 1-22.
YEO, C. A. 'Development of Roman Plantations and Marketing of Farm Products.' *Finanzarchiv* (Tübingen), XIII(1952),321-42.

III. 技术；特别机构；行会组织

ALFÖLDY, G. 'Collegium-Organisationen in Intercisa.' *Acta Archaeolog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I(1958),177-98.
BINAGHI, R. *La metallurgia ai tempi dell' impero romano.* Rome 1946.
BLOCH, M. 'Le Moulin à eau.' *Ann. d'hist. écon.*, VII(1935),538ff.
CASSON, L. *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 Princeton, 1971.
——*Travel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1974.
——'The Size of Ancient Merchant Ships.' *Studi in onore di A. Calderini e R. Paribeni*, I. Milan, 1956, 231-8.
CLAUSING, R. *The Roman Colonate.* New York, 1925.
CUMMINGS, A. D., CHALMERS, W. R., and MATTINGLY, H. B. 'A Roman Mining Document.' *Mine and Quarry Engineering*(1956),339-42.
DAVIES, O. *Roman Mines in Europe.* Oxford, 1935.
DE ROBERTIS, F. M. *Il diritto associativo romano.* (Storia delle corporazioni, 1, 1.) Bari, 1938.
——*Il fenomeno associativo nel mondo romano dai collegi della reppublica alle corporazioni del basso impero.* Naples, 1955.
[883] DRACHMANN, A. G. *Ancient Oil Mills and Presses.* Copenhagen, 1932.
ELIOT, C. W. J. 'New Evidence for the Speed of the Roman Imperial Post.' *Phoenix*, IX(1955),76-80.
FELDHAUS, F. *Die Technik der Antike u. des Mittelalters*, Potsdam, 1931.
FORBES, R. J. *Studies in Ancient Technology*, vols. 1-9. Leiden, 1955-1964.
GORCE, D. *Les Voyages, l' hospitalité, et le port des lettres dans le monde chrétien des IVe et Ve siècles.* Paris, 1925.

GROAG, E. 'Collegien u. Zwangsgenossenschaften im III. Jahrhundert.' *Viertel-jahrsch. f. Sozial-u. Wirtschaftsgesch.*, II(1904), 481ff.

HARDEN, D. B. *Roman Glass from Karanis.* Ann Arbor, 1936.

HOLMBERG, E. J. 'Zur Geschichte des Cursus Publicus' (Dissertation). Uppsala, 1933.

JONES, A. H. M. 'The Roman Colonate.' *Past and Present*, XIII(1958), 1-13.

LANDELS, J. G. *Engineering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Berkeley-Los Angeles, 1978.

MICKWITZ, G. *Die Kartellfunktionen der Zünfte.* (Societas scientiarum Fennica; com-mentationes humanarum literarum, VIII, 3.). Helsinki, 1936.

MITCHELL, S. 'Requisitioned Transport in the Roman Empire: a new inscription from Pisidia.' *JRS*, LXVI(1976), 106-31.

MORITZ, L. *Grain-mills and Flour in Classical Antiquity.* Oxford, 1958.

PFLAUM, M. 'Essai sur le *cursus publicus* sous le Haut-Empire romain.' *Mém. présentés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XIV(1940), 189-390.

STE-CROIX, G. E. M de. 'Greek and Roman Accounting.'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ccounting.* London, 1956, 14-74.

——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Maritime Loans' in EDEY, H., YAMEY, B. S. (eds.). *Essays in Honour of W. T. Baxter.* London, 1974.

SCHÖNBAUER, 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Bergbaurechts.* Münch. Beitr, z. Pap.-Forsch. u. ant. Rechtsgesch. XII. Munich, 1929.

SINGER, C., HOLMYARD, E. J., HALL, A. R. and WILLIAMS, T. J.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Vol. 2: *The 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 and the Middle Ages, 700 B. C. - A. D. 1500.* Oxford, 1956.

STÖCKLE, A. *Spätrömische und byzantinische Zünfte. Klio*, Beih. 9. Leipzig, 1911.

TACKHOLM, U. *Studien über den Bergbau der römischen Kaiserzeit.* Uppsala, 1937.

WALTZING, J. P. *Étude historique sur les corporations professionelles chez les Romains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la chute de l'Empire de l'Occident.* 4 vols. Louvain, 1895-1900.

IV. 特定地区

AUBIN, H. '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römischen Deutschlands.' *Hist. Zeitsch.*, CXLI(1930). 1ff.

BEDFORD, O. H. 'The Silk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Roman Empire.' *China Journ.*, XXVIII(1938), 207-16.

BELL, H. K. 'The Economic Crisis in Egypt under Nero.' *JRS*, XXVIII(1938), 1-8.

—— 'Roman Egypt from Augustus to Diocletian.' *Chronique d'Egypte*, XIII(1938), 347-63.

BENOIT, F. 'Un Port fluvial de cabotage. Arles et l'ancienne marine à voile du Rhône.' *Ann. d'hist. sociale*. II(1940), 199-206.

BLANCHET, A. *Les rapports entre les dépôts monétaires et les évènements militaires.* Paris, 1936.

BOEHNER, K. 'Die Frage der Kontinuität zwischen Altertum und Mittelalter im Spiegel der fränkischen Funde des Rheinlandes.' *Trierer Zeitschrift.*, XIX(1950), 82-106.

BOLIN, STURE. *Fynden av romerska mynt i det fria Germanien.* Lund, 1926.

BONNARD, L. *La Navigation intérieure de la Gaule à l'époque gallo-romaine.* Paris, 1913.

BROGAN, O. *Roman Gaul.* London, 1953.

—— 'Trad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Free Germans.' *JRS*, XXVI(1936), 195-222.

BROUGHTON, T. R. S. *The Romanization of Africa Proconsularis.* Baltimore, 1929.

CARANDINI, A. 'Produzione agricola e produzione ceramica nell'Africa di età imperiale. Appunti sull'economia della Zeugitana e della Byzacena.' *Studi miscellanei*, XV(1970), 95-124.

CHARLESWORTH, M. P. *The Lost Province or the Worth of Britain.* Cardiff, 1949. [884]

CHENET, G. *Fouilles et documents d'archéol. antique en France. I. La Céramique gallo-romaine d'Argonne du IVe siècle et la terre sigillée décorée à la molette.* Mâcon, 1941.

CHILVER, G. E. F. *Cisalpine Gaul: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from 49 B. C. to the Death of Trajan.* Oxford. 1941.

COLIN, J. *Les Antiquités de la Rhénanie.* Paris, 1927.

COLLINGWOOD, R. G. 'Roman Britain.' In Frank's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III. Baltimore, 1937.

——(with J. N. L. MYRES). *Roman Britain and the English Invasions*, 2nd edn, Oxford, 1937.

D'ARMS, J. H. 'Puteoli in the second century of the Roman Empire: 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 *JRS*, LXIV (1974), 104-24.

DOBSON, D. P. 'Roman Influence in the North.' *Greece and Rome*, V (1936), 73ff.

DRAGENDORFF, H. *Westdeutschland zur Römerzeit*, 2nd edn. Leipzig, 1919.

DRINKWATER, J. F. 'Die Sekundinier von Igel und die Woll-und Textilindustrie in Gallia Belgica: Fragen und Hypothesen.' *Trierer Zeitschrift*, XL-XLI (1977-8), 107-25.

ECKHOLM, G. 'Zur Geschichte des römisch-germanischen Handels.' *Act. arch.*, VI (1935), 49ff.

EGGER, R. 'Das Leben der kleinen Leute: neue Ergebnisse der Ausgrabungen auf dem Magdalensberg.' *Anzeiger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Wien*, Phil.-Hist. Klasse, XC (1953), 139-41.

EGGERS, H. J. *Der römische Import im freien Germanien.* Hamburg, 1951.

FILLIOZAT, J. 'Les Échanges de l'Inde et de l'empire romain aux premiers siècles de l'ère chrétienne.' *Rev Hist.*, CCI (1949), 1-29.

FRANK, T. 'On the export tax of Spanish harbours.' *AJP*, LVII (1936), 87-90.

——'Rome and Italy of the Empire,' in his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v. Baltimore, 1940.

FRERE, S. *Britannia, a History of Roman Britain.* London, 1967.

GREN, E. *Kleinasien und der Ostbalkan in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der römischen Kaiserzeit.* Uppsala-Leipzig, 1941.

GRENIER, A. *Manuel d'archéologie* (ed. Déchelette), v and VI; *Archéologie gallo-romaine.* Paris, 1931-4

——'La Gaule romaine.' In T. Frank's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III. Baltimore, 1937.

GUMMERUS, H. *Die südgallische Terrasigillata-industrie nach den Graffiti aus La Graufesenque* (Comm. hum lit. III). Helsinki, 1932.

HAVERFIELD, F. and MACDONALD, G. *The Romanization of Roman Britain*, 4th edn. Oxford, 1923.

HAYWOOD, R. M. 'Roman Africa,' in T. Frank's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IV. Baltimore, 1938.

HERTLEIN, F., PARET, O. and GOESSLER, P. *Die Römer in Württemberg*, 3 vols. Stuttgart, 1928-32.

JOHANSEN, R.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Roman North Africa.' *Class. Journ.*, XLIX (1953-4), 157-60.

JONES, A. H. M. *The Greek City 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 Oxford, 1940.

——'Asian trade in antiquity.' *Rom. Econ.*, 140-50.

JULLIAN, C. *Histoire de la Gaule*, VII and VIII. Paris, 1926.

KAHRSTEDT, U. *Das wirtschaftliche Gesicht Griechenlands in der Kaiserzeit.* Berne, 1954.

——*Die wirtschaftliche Lage Grossgriechenlands in der Kaiserzeit.* Wiesbaden, 1960.

KOEPP, F. *Die Römer in Deutschland*, 3rd edn. Bielefeld-Leipzig, 1926.

LAMBRECHTS, P. 'Le Commerce des Syriens en Gaule.' *L'Antiquité classique*, VI (1937), 34-61.

LEDROIT, J. *Die römische Schifffahrt im Stromgebiet des Rheines.* Kulturgeschichtlicher Wegweiser durch das röm.-germ. Zentralmuseum, no. 12. Mainz, 1930.

LEWIS, P. R. and JONES, G. D. B. 'Roman Gold-Mining in North-West Spain.' *JRS*, LX (1970), 169-85.

[885] LOANE, H. J. *Industry and Commerce of the City of Rome (50 B. C.-A. D. 200).* Baltimore, 1938.

MAGIE, D. *Roman Rule in Asia Minor*, 2 vols. Princeton, 1950.

NIERHAUS, R. 'Kaiserzeitliche Südweinexport nach dem freien Germanien.'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XXV (1954), 252-60.

NORLING-CHRISTENSEN, H. 'Danish Imports of Roman and Roman Provincial Objects in Bronze and Glass.'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49*, Durham, 1952, 74-9.

PANCIERA, S. *Vita economica di Aquileia in età romana.* Aquileia, 1957.

PIGEONNEAU, H. 'L'Annone romaine et les corps de naviculaires particulièrement en Afrique.'

Rev. de l'Afrique française, IV (1886), 220-37.
RICKARD, T. A. 'The Mining of the Romans in Spain.' *JRS*, XVIII (1928), 129-43.
SCHIPPSCHUH, O. *Die Händler im römischen Kaiserreich in Gallia, Germania and den Donauprovinzen Rätien, Noricum und Pannonien.* Amsterdam, 1974.
SCHULZ, S. 'The Roman Evacuation of Britain.' *JRS*, XXIII (1933), 36ff.
SCHUMACHER, K. *Siedelungs-und Kulturgeschichte der Rheinlande. II: Die römische Periode.* Mainz, 1923.
SCRAMUZZA, V. 'Roman Sicily.' In T. Frank's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III. Baltimore, 1937.
SELIGMAN, C. G. 'The Roman Orient and the Far East.' *Antiquity*, XI (1937), 5-30.
SHERWIN-WHITE, A. N. 'Geographical Factors in Roman Algeria.' *JRS*, XXXIV (1944), 1-10.
SPERBER, D. 'Costs of Living in Roman Palestine IV.' *Journ.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XIII (1970), 1-15.
STAEHELIN, F. *Die Schweiz in römischer Zeit*, 3rd edn. Basle, 1948.
STANFIELD, J. A. and SIMPSON, G. *Central Gaulish Potters.* Oxford, 1958.
THOUVENOT, R. *Essai sur la province romaine de Bétique.* Paris, 1940.
TOVAR, A. and BLÁZQUEZ, J. M. *Historia de la Hispania Romana.* Madrid, 1975. (Especially pp. 192-348 with bibliography.)
VAN NOSTRAND, J. J. 'Roman Spain.' In T. Frank's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III. Baltimore, 1937.
VAN SICKLE, C. E. 'The Public Works of Africa in the Reign of Diocletian.' *Class. Phil.*, XXV (1930), 173-9.
VERCAUTEREN, F. 'Notes sur la ruine des villes de la Gaule d'après quelques auteurs contemporains des invasions germaniques.' *Mélanges Bidez*, II (1934), 955-63.
WAGNER, F. *Die Römer in Bayern*, 4th edn. Munich, 1928.
WARD PERKINS, J. B. 'Tripolitania and the Marble Trade.' *JRS*, XLI (1951), 89-104.
WARMINGTON, B. H. *The North African Provinces from Diocletian to the Vandal Conquest.* Cambridge, 1954.
WARMINGTON, E. H. *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 Cambridge, 1928.
WEST, L. C. *Roman Britain: the Objects of Trade.* Oxford, 1931.
——*Roman Gaul: the Objects of Trade.* Oxford, 1935.
——'The cost of living in Roman Egypt.' *Class. Phil.*, XI (1916), 293-314.
——'Commercial Syria under the Roman Empire.' *TAPA*, LV (1924), 159-89.
WHEELER, R. E. M. 'Roman Contact with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Essays presented to O. G. S. Crawford.* London, 1951, 345-81.
——*Rom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 London, 1954.
WHEELER, R. E. M., GHOSH, A. and DEVA KRISHNA, K. 'Arikamedu, an Indo-Roman Trading Station on the East Coast of India.' *Ancient India*, 1946, 17-124.
WHITTAKER, C. R. 'Land and Labour in North Africa.' *Klio*, LX (1978), 331-62.
WIELOWIEJSKI, J. 'L'Échange commercial entre la Pologne méridionale et l'empire romain.' *Archeologia* (Warsaw), VIII (1956), 76-103.
WILKES, J. J. *Dalmatia.* London, 1969.
WILLERS, H. *Neu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römische Bronzeindustrie von Capua und von Nieder-Germanien.* Hanover-Leipzig, 1907.
WILSON, F. H.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Ostia.' *BSA.* XIII (1935), 41-68; XIV (1938), 152-62. [886]

V. 铸币和财政：税收

ALTHEIM, F. and STIEHL, R. *Finanzgeschichte der Spätantike.* Frankfurt, 1957.
BOAK, A. E. E. 'Early Byzantine Tax Receipts from Egypt' (on *adaeratio*). *Byzantion.* XVII (1944-5), 16-28.

BOLIN, S. *State and Currency in the Roman Empire to A. D. 300*. Stockholm, 1958.

——'Der solidus.' *Acta instituti Romani regni Sueciae*, ser. 2, I (1939) (Δρᾶγμα *Nilsson*), 144ff.

BRUNT, P. 'The *Fiscus* and its Development.' *JRS*, LVI (1966), 75-91.

CALLU, J.-P. *La Politique monétaire des empereurs romains*. Paris, 1969.

——'La Fonction monétaire dans la société romaine sous l'empire.' *Ve Congrès internat. d'histoire économique*. Leningrad, 1970.

CRAWFORD, M. H. 'Money and Exchange in the Roman world.' *JRS*, LX (1970), 40-8.

DE LAET, S. J. *Portorium, Étude sur l'organisation douanière chez les romains surtout à l'époque du Haut Empire*. Bruges, 1949.

DÉLÉAGE, A. *La Capitation du Bas-Empire*. Mâcon, 1945. (Cf. review by Piganiol, *Journ. des Savants* (1946), 128-39).

DOPSCH, A. *Naturalwirtschaft und Geldwirtschaft in der Weltgeschichte*. Vienna, 1930.

ERIM, K. T., REYNOLDS, JOYCE and CRAWFORD, M. 'Diocletian's Currency Reform: a new inscription.' *JRS*, LXI (1971), 171-7.

GIESECKE, W. *Antikes Geldwesen*. Leipzig, 1938.

GRANT, M. *Roman Imperial Money*. London. 1954.

HEICHELHEIM, F. M. 'Zur Währungskrise des romischen Imperiums im 3. Jahrhundert n. Chr.' *Klio*, XXVI (1933). 96ff.

——'New Light on Currency and Inflation in Hellenistic and Roman Times.' *Econ. Hist.* (Suppl. to *Econ. Journ.*), Feb. 1935.

HENDY, M. 'Mint and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Diocletian, his Colleagues and his Successors, A. D. 305-324.' *JRS*. LXII (1972), 75-82.

JONES, A. H. M. 'Inflation under the Roman Empire.' *Econ. H. R.*, 2nd ser. V (1953), 293-318. (Expanded version in *Rom Econ.*, 187-227.)

——'Numismatics and History.' *Essays presented to Harold Mattingly*. Oxford, 1956. (*Rom. Econ.*, 61-81 with bibliography by M. H. Crawford.)

——'*Capitatio and iugatio*.' *JRS*, XLVII (1957), 88-94. (= *Rom. Econ.* 280-92.)

——'Over-Tax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 *Antiquity*, XXXIII (1959), 39-49 (= *Rom. Econ.* 82-9.)

KARAYANNOPULOS, J. *Das Finanzwesen des frühbyzantinischen Staates*. Munich, 1958.

KUBITSCHEK, W. 'Der Übergang von der vordiokletianischen Währung ins vierte Jahrhundert: Randbemerkungen zu Schriften von G. Mickwitz.' *Byzantinische Zeitsch.*, XXXV (1935), 340ff.

LIEBESCHÜTZ, W. 'Money Economy and Taxation in Kind in Syria in the Fourth Century A. D.' *Rheinisches Museum*, CIV (1961), 242-56.

MATTINGLY, H. *Roman Coins*. London, 1928.

——'The Monetary Systems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Diocletian to Theodosius I' (with full bibliography). *Num. Chron.* 6, VI (1946), 111-20.

——and SYDENHAM, E. A. (and others). *The Roman Imperial Coinage*. 8 vols. London, 1923-81.

MICKWITZ, G. *Geld und Wirtschaft im römischen Reich des IV. Jahrhunderts nach Chr.* (Comm. hum. lit. IV, 2). Helsinki, 1932.

——*Die Systeme des römischen Silbergeldes im IV. Jahrhundert*. (Comm. Hum. lit. VI, 2). Helsinki, 1935.

——'Le Problème de l'or dans le monde antique.' *Ann. d'hist. économique et sociale*, VI (1934), 239ff.

——'Ueber die Kupfergeldinflationen in den Jahren der Thronkämpfe nach Diokletians Abdankung.' *Trans. Internat. Numism. Cong. 1936* (Oxoford, 1938), 219ff.

MILLAR, F. 'The Fiscus in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JRS*, LIII (1963), 29-42.

[887] MOMMSEN, Th. *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Münzwesens*. Berlin, 1860 (reprinted Graz, 1956).

PASSERINI, A. 'Gli aumenti del soldo militare da Commodo a Massimino.' *Athenaeum*, N. S. XIV (1946), 145-59.

——'Sulla pretesa rivoluzione dei prezzi durante il regno di Commodo.' *Studi in onore di Gino*

Luzzatto. Milan, 1949, 1-17.
PEARCE, J. W. E. 'The *vota*-legends on the Roman coinage.' *Num. Chron.*, 5, XVII(1937), 112-23.
—— 'Gold coinage of the reign of Theodosius I.' *Num. Chron.*, 5, XVIII(1938), 205-46.
PEKÁRY, T. 'Studien zur römischen Währungs-und Finanzgeschichte von 161 bis 235 n. Chr.' *Historia*, VIII(1959), 443-89.
PIGANIOL, A. 'Le Problème de l'or au IVe siècle.' *Ann. d'hist. sociale*(1945), 47ff.
—— 'La Capitation de Dioclétien.' *Rev. hist.*, CLXXVI(1935), 1-13.
SEDGWICK, W. B. 'The gold supply in ancient and mediaeval times, and its influence on history.' *Greece and Rome*, V(1936), 148ff.
SEECK, O. 'Die Münzpolitik Diokletians u. seiner Nachfolger.' *Zeitsch. f. Numismatik*, XVII(1890), 63ff.
SEGRÈ, A. *Metrologia e circolazione monetaria degli antichi.* Bologna, 1928.
—— 'Infl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early Byzantine times.' *Byzantion*, XV(1940-1), 249-79.
—— 'The *annona civica* and the *annona militaris.*' *Byzantion*, XVI(1942-3), 393-444.
—— 'Note sulle monete romane dal I sec. d. Cr. all' età byzantina.' *Maia*, XVI(1964), 265f.
SPERBER, D. '*Denarii and aurei* in the time of Diocletian.' *JRS*, LVI(1966), 190-5.
STRACK, P. L. *Untersuchungen zur römischen Reichsprägung des zweiten Jahrhunderts*, 3 vols. Stuttgart, 1931-7.
SZILAGYI, J. 'Prices and wages in the western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XI(1963), 325-89.
VAN BERCHEM, D. 'L'Annone militaire.' *Mém. de la soc. nat. des antiqu. de France*, LXXX(1937), 117-202.
VÁRADY, L. 'Contributions to the late Roman military economy and agrarian taxation.' *Acta archaeolog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XIV(1962), 403-38.
WALLACE, S. L. *Taxation in Egypt from Augustus to Diocletian.* Princeton, 1938.
WEST, L. C. *Gold and Silver Coin Standards in the Roman Empire.* (Numismatic notes and monographs, 94.) New York, 1941.
—— 'The Roman Gold Standard and the Ancient Sources.' *AJP*, LXII(1941), 289-301.
WEST, L. C, and JOHNSON, A. C. *Currency in Roman and Byzantine Egypt.* Princeton, 1944.
WHITTAKER, C. R. 'Inflation and the Economy in the Fourth Century A.D.' in KING, C. E. (ed.). *Imperial Revenue, Expenditure and Monetary Policy in the Fourth Century A. D.* B. A. R. Suppl. 76, 1-26. Oxford, 1980.
Valuable material will be found in the following articles in the *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ed. PAULY-WISSOWA-KROLL-ZIEGLER): *Adaeratio* (Seeck), Berufsvereine (Suppl. -B. IV: Stöckle), *collatio lustralis* (Seeck), *collegium* (Kornemann), *colonatus* (Seeck), Domänen(Suppl. -B, IV: Kornemann), *fabri*(Kornemann), *fabricenses*(Seeck), *follis*(Seeck), *frumentum*(Rostovtzeff), Industrie u. Handel(Gummerus), Inflation(suppl. -B, VI: Mickwitz), Kapitalismus(Sigwart), Monopol(Heichelheim), Münzkunde(Regling), *navicularii*(Sigwart), *siliqua* (Regling), Sklaverei(Suppl. -B. VI: Westermann). [888]

第三章 拜占庭的贸易和工业

I. 原始资料

注：相关材料可以从所有拜占庭编年史学家和作者那里找到。参看《剑桥中世纪史》第2、第4卷及《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五章的参考书目。下面是专门关于拜占庭贸易和工业的资料。

(1) 资料汇编

Corpus der Griechischen Urkunden des Mittelalters. Ed. F. Dölger. Munich/Berlin, 1924-(in pro-

gress).
Jus Graeco-Romanum. Ed. K. E. Zachariae von Lingenthal. 7 parts. Leipzig, 1856-84.
Jus Graeco-Romanum. Ed. J. and P. Zepos. 8 vols. Athens, 1931.
MIKLOSICH, F. and MULLER, J. *Acta et Diplomata Graeca Medii Aevi*. 6 vols. Vienna, 1860-90.
SATHAS, C. N. Μεσαιωνική Βιβλιοθήκη (Medieval Library). 6 vols. Venice, 1872.
TAFEL, G. L. F. and THOMAS, G. M. *Urkunden zur älteren Handels-und Staatsgeschichte der Republik Venedig mit besonderer Beziehung auf Byzanz und die Levante von 9ten bis zum Ausgang des 15ten Jahr.* 3 parts in *Fontes Rerum Austriacarum*, 2nd sect. vols. XII-XIV. Vienna, 1856-7.

(2) 个别资料

BENJAMIN OF TUDELA. *Itinerary*. Ed. M. N. Adler. London, 1907.
CODINUS. *De Officialibus Palatii Constantinopolitani et de Officiis Magnae Ecclesiae*.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 Bonn, 1839.
CONSTANTINE VII PORPHYROGENNETUS. *De Ceremoniis Aulae Byzantinae*. 2 vols. *De Thematibus et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I vol. Bonn, 1829-40.
COSMAS INDICOPLEUSTES. *Christian Topography*. Ed. O. Winstedt. London, 1909.
'Επαρχικὸν Βιβλίον: *Le Livre du Préfet*. Ed. with Latin transl., by J. Nicole. Geneva, 1893.
——Ed. in English under title of *Roman Law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by E. H. Freshfield. Cambridge, 1938.
LEO VI SAPIENS. *Les Nouvelles de Léon VI le Sage*. Ed. P. Noailles and A. Dain. Paris, 1944.
TIMARION. Ed. Hase, in *Notes et Extraits*, vol. IV, 2me partie. Paris, 1813.

II. 现代著作

AHRWEILER, H. 'Fonctionnaires et bureaux maritimes à Byzance.' *Revue des études byzantines*, XIX (1961), 239-52.
——'Nouvelle hypothèse sur le tétartèron d'or et la politique monétaire de Nicéphore Phocas.' *Zbornik de l'institut byzantin de l'Academie Serbe*, VIII (1963), 1-9.
ANDREADES, A. 'Ιστορία της Ελληνικής Δημοσίας Οικονομίας' (History of Greek Political Economy). Athens, 1918.
[889] ——'Byzance, paradis du monopole et privilège.' *Byzantion*, IX (1934), 171-81.
——'Deux livres récents sur les finances byzantines.'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XXVIII (1928), 287-323.
ANKORI, Z. *Karaites in Byzantium*. New York, 1959.
ANTONIADES-BIBICOU, H. *Recherches sur les douanes à Byzance*. Paris, 1963.
——*Etudes d'histoire maritime de Byzance*. Paris, 1966.
——'Problèm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de Byzance au XIe siècle.' *Byzantinoslavica*, XXVIII (1967), 255-61.
ASHTOR, E. 'Essai sur l'alimentation des diverses classes sociales dans l'orient médiéval.'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XXIII (1968), 1017-53.
BELAIEW, N. 'The Daric and the Zolotnic' (in Russian with English résumé). *Seminarium Kondakovianum*, IV (1931), 179-204.
BOISSONADE, P. *Le Travail dans l'Europe Chrétienne au Moyen Age*. Paris, 1921.
BRAND, C. M. 'Two Byzantine Treatises on Taxation.' *Traditio*, XXV (1969), 30-60.
BRATIANU, G. I. *Recherches sur le commerce Génois dans la Mer Noire au XII siècle*. Paris, 1929.
——'Une Expérience d'économie dirigée: le monopole du blé à Byzance au XIe siècle.' *Byzantion*, IX (1934), 643-62.
——*Études byzantin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Paris, 1938.
——*Privilèges et franchises municipales dans l'Empire byzantin*. Paris/Bucharest, 1934.
BURY, J. B. *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IXth Century*. London, 1911.
CARANDINI, A. 'Produzione agricola e produzione ceramica nell'Africa di età imperiale. Appunti sull'economia della Zeugitana e della Byzacena.' *Studi miscellanei*, XV (1970), 95-124.

CHARANIS, P.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fe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London, 1973.
——'Observations on the demograph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Thi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Byzantine Studies, *Main Papers*, XIV. Oxford, 1966, 445-63.
CICOTTI, E. *Il tramonto della schiavitù nel mondo antico.* Turin, 1899.
CIPOLLA, C. M. *Money, Prices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5th to 7th century.* Princeton, 1956.
CONSTANTELOS, D. J. *Byzantine Philanthropy and Social Welfare.* New Brunswick, 1968.
DIETERICH, K. 'Zur Kulturgeographie und Kultur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Balkanshandels.'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XXXI(1931), 37-57, 334-49.
DÖLGER, F.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Finanzverwaltung.' Byzantinische Archiv, IX. Leipzig/Berlin, 1927.
——'Das Αερικόν'.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XXX(1929-30), 450-7.
——'Beitrage zum Geschichte des byzantinischen Finanzverwaltung besonders des 10 und 11 Jahrhunderts.' *Byzantinische Archiv*, IX, 2 auflage(1960).
DUNLOP, D. M.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Khazars.* Princeton, 1954.
EBERSOLT, J. *Constantinople byzantine et les voyageurs du Levant.* Paris, 1919.
——*Les Arts somptuaires de Byzance.* Paris, 1923.
FRANCES, E. 'L'État et les métiers à Byzance.' *Byzantinoslavica*, XXIII(1962), 231-49.
——'La Disparition des corporations byzantines.' *Actes du XII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Études Byzantines*, II. Belgrade, 1964. 93-101.
GORYANOV, B. T. 'The Byzantine Town, 11th to 15th centuries' (in Russian). *Vizantiiskii Vremennik*, XIII(1958), 162-83.
GRIERSON, P. 'Nomisma, tetarteron et dinar: un plaidoyer pour Nicéphore Phocas.' *Revue Belge de Numismatique*, C(1954), 75-94.
——'The Debasement of the Bezant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XLVII, 2 (1954), 379-94.
——'Notes on the fineness of the Byzantine solidus.'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LIV, 1(1961), 91-9.
——'Coinage and Money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498-c. 1090.' *Settimani di Studio del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 alto medioevo*, VIII(1961), 411-23.
GUILLAND, R. *Recherches sur les institutions byzantines*, 2 vols. Berlin /Amsterdam, 1967.
HENDY, M. F. *Coinage and Money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1081-1261.* Dumbarton Oaks, 1969. [890]
——'Byzantium, 1081-1204: an economic reappraisal.' *Trans. Roy. Hist. Soc.* ser. 5, XX(1970), 31-52.
HERRIN, J. 'The Collapse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the Twelfth Century: a study in mediev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istorical Journal*, XII(1970), 186-203.
HEYD, W. *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2 vols. (rev. edn in French). Leipzig, 1936.
HROCHOVÁ, V. *Byzanska Města ve 13-15 stoleti.* Prague. 1967.
JACOBY, D. *Société et démographie à Byzance et en Romanie Latine.* London. 1975.
JEANSELME, E. and OECONOMOS, L. *Les Oeuvres à assistance et les hopitaux byzantins.* Antwerp, 1921.
KARAYANNOPULOS, J. *Das Finanzwesen des frühbyzantinischen Staates.* Munich, 1958.
——'Fragmente aus dem Vademecum eines byzantinischen Finanzbeamten.' *Polychronion: Festschrift F. Dölger.* Heidelberg, 1966, 318-34
KAZHDAN, A. P. 'Corporations and Government workshops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9th and 10th centuries' (in Russian). *Vizantiiskii Vremennik*, VI(1953), 132-55.
KAZHDAN, A. P. and CONSTABLE, G. *People and Power in Byzantium.* Washington, Dumbarton Oaks, 1982.
LAIOU-THOMADAKIS, A. E. *Peasant Society in the late Byzantine Empire.* Princeton, 1977.
LOMBARD, M. 'L'Or Musalman du VIIe au XIe siècle.' *Annales: Economies, Societes, Civilisations*, No. 2(1947).
LOPEZ, R. S. *Byzantine Studies.* New Haven, 1968.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New Haven, 1971.
——*Byzantium and the World around it.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London, 1978.

——'Mohammed and Charlemagne, a revision.' *Speculum*, XVIII (1943), 14–39.

——'Silk Industry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Speculum*, XX (1945), 1–43.

——'La Crise du besant au Xe siècle et la date du livre du Préfet.' *Annuaire de l' Institut de Philologie et d' Histoire Orientales et Slaves*, X (Brussels, 1950), 403–18.

——'Harmenopoulos and the downfall of the Bezant.' *Tomos Constantinou Harmenopoulou* (Thessalonica, 1952), 111–25.

MACRI, C. M. *L' Organisation de l' économie urbaine dans Byzance.*' Paris, 1925.

MANGO, C. *Byzantium: the Empire of New Rome.* London, 1980.

MEIGGS, R. *Roman Ostia*, 2nd edn. Oxford, 1973.

MENDL, B. 'Les Corporations byzantines.' *Byzantinoslavica*, XXXII (1961), 302–19

MICKWITZ, G. *Geld und Wirtschaft im römischen Reich des 4ten Jahrh.* Helsinki, 1932.

——'Byzance et l' occident médiévale.' *Annales d' 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VIII (1936), 21–8.

MILLET, G. 'Sur les sceaux des commerciaires byzantins.' *Mélanges G. Schlumberger.* Paris, 1924.

MONNIER, H. *Les Nouvelles de léon le Sage.* Bordeaux. 1923.

OIKONOMIDES, N. 'Quelques boutiques de Constantinople au Xe siècle: prix, loyers, imposition.' *Dumbarton Oaks Papers*, XXVI (1972), 345–56.

OSTROGORSKY, G. 'Lohne und Preise in Byzanz.'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XXXII (1932), 293–333.

——'Byzantine C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Dumbarton Oaks Papers*, XIII (1959), 47–66.

PATLAGEAN, E. *pauvreté économique et pauvreté sociale à Byzance, 4e-7e siécles.* Paris/The Hague, 1977.

PIGULEWSKAJA, N. *Byzanz auf den Wegen nach. Indien.* Berlin/Amsterdam.

SEGRÈ, A. 'Infl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Early Byzantine times.' *Byzantion*, XV (1941), 249–80.

——'Essays on Byzantine Economic History.' *Byzantion*, XVI (1942–3), 393–445.

SOUTZO, M. 'Les Origines du sesterce et du miliarense et leur continuité jusqu' au temps Byzantins.' Académie Roumaine, *Bulletin de la Section Historique*, XIII (1927), 54–9.

SPULBER, C. A. *L' Écloque des Isauriens.* Cernauti, 1934.

STARR, J. *The Jews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Athens. 1939.

STEIN, J.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 Stuttgart, 1919.

STÖCKLE, A. *Spätrömische und byzantinische Zünfte. Klio*, IX. Leipzig, 1911.

[891] SVORONOS, N. 'Recherches sur le cadastre byzantin et la fiscalité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le cadastre de Thebes.' *Bulletin de Correspondence Hellenique*, LXXXIII (1959), 1–145, 800, 806–25.

——'Société et organisation intérieure dans l' empire byzantin au XIe siècle: les principaux problèmes.' Thi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Byzantine Studies, *Main Papers*, XII, Oxford, 1966, 373–89.

TAFRALI, O. *Thessalonique au quatorzième siècle.* Paris, 1913.

——*Thessalonique des origines au XIVe siècle.* Paris, 1919.

TEALL, J. L. 'The Grain Supply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Dumbarton Oaks Papers*, XIII (1959), 89–139.

VASILIEV, A. A.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Byzantium and Russia.'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IV, 2 (1932), 314–34.

VASILIEVSKY, V. 'Material for the Internal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Russian). *Journal of the Russian Ministry of Public Instruction*, CCII (1879), 160–232, 368–438; CCX (1880), 98–170, 355–440.

VERLINDEN, C. *L' Esclavage dans l' Europe médiévale: Italie, Levant latin, Empire byzantin.* Ghent, 1977.

VRYONIS, S. 'The Question of the Byzantine Mines.' *Speculum*, XXXVII (1962), 1–18.

——'Byzantine *democratia* and the Guilds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Dumbarton Oaks Papers*, XVII (1963), 287–314.

WALZING, J. P. *Etude historique sur les corporations professionelles chez les romains*, 4 vols. Louvain, 1895–1900.

ZACHARIAE VON LINGENTHAL, K. E. *Geschichte des griechisch-römischen Rechts*. Berlin, 1892.
ZAKYNTHINOS, D. 'Crise monétaire et crise économique à Byzance du XIIIe au XVe siècle.' *L'Hellenisme Contemporain*, I, 2(1947), 162-92; II, 2(1948), 150-67.
—— 'La Ville byzantine.' *Diskussions-beitrage zum XI Internationalen Byzantinistenkongress*. Munich(1958), 43-57.
ZORAS, G. *Le Corporazioni Bizantini*. Rome, 1933.

[892]

第四章 中世纪欧洲的贸易：北方

Annales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and Annales (Économic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EconH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EHR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HG *Hansische Geschichtsblätter*
BMHG *Bijdragen en Mederdeelingen van het Historisch Genootschap*
RBPH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TRH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SW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I. 印刷品资料

FAGNIEZ, G. *Document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l'industrie et du commerce en France (au moyen âge)*, 2 vols. Paris, 1898, 1900.
GREGORY OF TOURS. *The History of the Franks*, I and II (transl. by O. M. Dalton). Oxford, 1927.
HÖLBAUM, K., KUNZE, K. and STEIN, W. *Hansisches Urkundenbuch*. Verein für Hansische Geschichte. Halle and Leipzig, 1876-1907.
KOPPMANN, K. *Die Recesse und Andere Akten der Hansetäge, von 1236-1340*, I-VIII. Die Historische Kommission bei der Königl. Akad. der Wissenschaften. Leipzig, 1870-97.
KUNZE, K. *Hanseakten aus England, 1275 bis 1412, Hansische Geschichtsquellen*, VI. Verein für Hansische Geschichte. Halle, 1891.
KUSKE, B.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Kölner Handels und Verkehrs im Mittelalter*. 3 vols. Gesellschaft für Rheinische Geschichtskunde. Bonn, 1918-23.
LANGE, C. C. A., UNGER, C. R. and others. *Diplomatarium Norvegicum*, vols. I ff. Oslo, 1847. etc.
LAPPO-DANILEVSKY, N. *Recueil des document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la Neva*. Petrograd, 1916. (Edition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LECHNER, G. *Die Hansischen Pfundzollisten des Jahres 1368*. Quellen z. Hansisch. Gesch., N. F. vol. x. Lübeck, 1935.
NEALE, E. W. W. *The Great Red Book of Bristol*. Text (pt. I). Bristol Record Society's Publications, vol. IV, 1937.
POELMAN, H. A. *Bronnen tot de Geschiedenis van den Oostzeehandel*, I. Rijks Geschiedenkundige Publicatiën. The Hague, 1917.
POSTHUMUS, N. W. *Bronnen tot de Geschiedenis van de Leidsche Textielnijverheid, 1333-1795*. Rijks Geschiedenkundige Publicatiën. The Hague, 1910-22.
ROPP, G. VON DER. *Hanserecesse 1431-76*. Zweite Abteilung, I-VII. Verein Für Hansische Geschichte. Leipzig, 1876-92.
SEVEREN, L. GILLIODTS VAN (ed.). *Cartulaire de l'ancienne Estaple de Bruges*. 4 vols. Société d'Emulation. Bruges, 1904-6.
SMIT, H. J. *Bronnen tot de Geschiedenis van den handel met Engeland, Schotland en Ierland, 1150-1485*. Rijks Geschiedenkundige Publicatiën. The Hague, 1928.
SNELLER, Z. W. and UNGER, W. S. *Bronnen tot de Geschiedenis van den handel met Frankrijk*, I. Rijks Geschiedenkundige Publicatiën. The Hague, 1930.

THOMAS, A. H. *Calendar of Early Mayor's Court Rolls of the City of London, 1298–1307*. Cambridge, 1924.
——*Calendar of Plea and Memoranda Rolls of the City of London*. 2. vlos, *1323–64, 1364–81*. Cambridge, 1926, 1929.
——*Calendar of Select Pleas and Memoranda of the City of London. 1381–1412*. Cambridge, 1932.
[893] UNGER, W. S. *De Tol van Iersekeroord: documenten en rekeningen, 1321–1572*. The Hague, 1939.
——*Bronnen tot de Geschiedenis van Meddelburg in het landsheerlijken tijd*. Rjiks Geschiedenkundige Publicatiën. The Hague, 1923.
WARNER, G. (ed.). *The Libelle of Englyshe Polycye*. Oxford, 1926.

II. 二手资料

ABEL, W. 'Bevölkerungsgang und Landwirtschaft im Ausgehenden Mittelalter in Lichte der Preis-und Lohnbewegung.' *Schmoller's Jahrbücher*, 58 Jahrg., 1934.
——*Agrarkrisen und Agrarkonjunktur im Mitteleuropa*. Berlin, 1935.
——*Die Wüstungen des ausgehenden Mittelalters*, 2nd edn. Stuttgart, 1955.
AGATS, A. *Der Hansische Baienhandel*. Heidelberg, 1904.
ARENS, FRANZ. 'Wilhelm Servat von Cahors zu London.' *VSW*, 1904.
ARUP, E. *Studier i Engelsk og Tysk Handels Histoire, etc. 1350–1850*. Copenhagen, 1907.
AVENEL, G. DE.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propriété, des salaires, des denrées et de tous le prix*. 6 vols. Paris, 1886–1920.
BÄCHTOLD, H. *Der Norddeutsche Handel im 12. und beginnenden 13. Jahrhundert*. Abhandlungen zur mittleren und neuen Geschichte, hrsg. von. G. v. Below, H. Finke und F. Meinecke, Heft 21. Berlin and Leipzig, 1910.
BAHR, C. *Handel und Verkehr der deutschen Hanse in Flandern während des vierzehnten Jahrhunderts*. Leipzig, 1911.
BAKER, J. L. N. *Medieval Trade Routes*. Historical Association Pamphlet, no. III. 1938.
BEARDWOOD, ALICE *Alien Merchants in England 1350–1377. Their Legal and Economic Position*. Cambridge (Mass.), 1931.
BECK, L. *Die Geschichte des Eisens*. 4 vols. Brunswick, 1891–9.
BELOCH, J. 'Die Bevölkerung Europas im Mittelalter.' *Zeit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 III, 405. Freiburg i. B., 1894.
BELOW, G. VON. *Aus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Stuttgart, 1928.
——*Probleme der Wirtschaftsgeschichte*. Tübingen, 1920.
BENS, G. *Der deutsche Warenfernhandel im Mittelalter*. Breslau, 1926.
BEVERIDGE, W. 'Wages in the Winchester Manors.' *EconHR* (1936), VII, no. I.
——'Yield and Price of Corn in the Middle Ages.' *Economic History* (Suppl. to *Econ. Journ.*), no. 2 (1927).
BIGWOOD, G. 'Les Financiers d'Arras.' *RBPH* (1924).
——'La Politique de la laine en France sous les règnes de Phillipe le Bel et de ses fils.' *RBPH* (1936).
BLOCH, M. 'Le Problème de l'or au Moyen Age.' *Annales* (1933).
BLOCKMANS, Fr. *Het Gentsche Stadspatriciaat tot Omstreeks 1302*. Antwerp, 1938.
BOUQUELOT, G. *Les foires de Champagne*. 2 vols. Mémoires d'Académie des Sciences et Belles Lettres. Paris, 1938.
BOUTRUCHE, R. *La Crise d'une société: seigneurs et paysans du Bordelais pendant la Guerre de Cent Ans*. Paris, 1947.
BOUVIER, R. *Un Financier Colonial au XV Siècle. Jacques Coeur*. Paris, 1928.
BOYER, H. *Histoire de l'industrie et du commerce à Bourges*. Bourges, 1884.
BRUNS, F. (ed.). *Die Lübecker Bergenfahrer und ihre Chronistik*. Hansische Geschichtsquellen, N. F., Bd. II. Verein für Hansische Geschichte. Berlin, 1900.

BUCHER, K. *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2 vols. Leipzig, 1920.
BUGGE, A. *Den Norske Traelasthandels Historie*, I. Skien, 1925.
——'Handelen mellem England og Norge indtil Begyndelsen af det 15de Aarhundrede.' *Historisk Tidskrift*, Raekke III, Bind 4, pp. 1-149. Oslo, 1898.
——'Die nordeuropäischen Verkehrswege im früheren Mittelalter.' *VSW*, IV(1906).
——'Der Untergang der Norwegischen Seeschiffahrt.' *VSW*, 1904.
CARUS-WILSON, E. M. (ed.). *The Overseas Trade of Bristol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Bristol Record Society's Publications, VII(1936).
DAENELL, E. R. *Die Blütezeit der deutschen Hanse. Hansische Geschichte von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XIV. bis zum letzen Viertel des XV. Jahrhunderts*. 2 vols. Berlin, 1905-6.
DEROISY, ARMAND. 'Les Routes terrestres de laines Anglais vers la Lombardie.' *Revue du Nord*, XXV (1939). [894]
DES MAREZ, G. *Etudes sur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dans les villes du Moyen Age et spécialement au Flandre*. Université de Gand. Recueil des travaux publiés par la Faculté de Philosophie et Lettres, 1898.
DION, R. 'Orléans et l'ancienne navigation de la Loire.' *Annales de Géographie*, XLVII(1938).
DOPSCH, A.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sation*. (Transl.) London, 1937.
——*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der Karolinger Zeit*. 2 vols., 2nd edn. Weimar, 1922.
EBEL, W. 'Das Rostocker Transportgewerbe.' *VSW*(1938).
ECK, A. *Le Moyen Age Russe*. Paris, 1933.
ESPINAS, G. *La Vie urbaine de Douai au Moyen Age*, I-IV. Paris, 1914.
——*Les Origines du capitalisme*. 2 vols. Lille, 1933, 1936.
FEAVERYEAR, A. E. *The Pound Sterling*. Oxford, 1931.
FLOWER, C. T. *Public Works in Medieval Law*, I and II. Selden Society Publications, 1923.
DE FREVILLE. *Mémoires sur la commerce maritime de Rouen*. 2 vols. Rouen and Paris, 1857.
GILLIARD, CH. 'L'Ouverture du St Gothard.' *Annales*(1929).
GIRY, A. *Histoire de la ville de Saint-Omer*. Paris, 1877.
GOETZ, L. K. *Deutsch-Russiche Handel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Hansische Geschichtsquellen, N. F., Bd. v. Lübeck, 1922.
GRAS, N. S. B. *The English Customs System*. Cambridge(Mass). 1918.
——*The 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Corn Market*. Cambridge(Mass.), 1915.
GRAY, H. L. 'The Production and Exportation of English Woollens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EHR*, XXXIX(1924), 13-35.
GRIERSON, P. 'The Rel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Flanders before the Norman Conquest.' *TRHS*, 4th ser. XXIII(1941).
GUIRAUD, L. *Recherches et conclusions nouvelles sur le prétendu rôle de Jacques Coeur*. Paris, 1900.
HÄNSELMAN, L. 'Braunschweig in seinen Beziehungen zu den Harz-und Seegebieten.' *HG*(1873).
HAPKE, R. *Brugges Enwicklung zum Mittelalterlichen Weltmarkt*. D. Schaffer's Abhandlungen zur Verkehrs-und Seegeschichte, no. 1. Berlin, 1908.
——*Der Deutsche Kaufmann in Niederlanden*. Hansische Pfingsblätter, no. 7. Lübeck, 1911.
——*Der Untergang der Hanse*. Lübeck, 1923.
HARTWICH, C. *Die menschlichen Genussmittel*. Leipzig, 1911.
HAYEM, J. *Mémoires et documen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commerce et de l'industrie en France*. Paris, 1922.
HENAUX, F. *Fabrique d'armes de Liège*. Liège, 1858.
HEWITT, H. J. *Medieval Cheshire*. Manchester, 1929.
HIRSCH, T. *Danzigs Handels-und Gewerbsgeschichte unter der Herrschaft des deutschen Ordens*. Leipzig, 1858.
HOOPT, C. G. T. *Het ontstaan van Amsterdam*. Amsterdam, 1917.
HUVELIN, P. *Essai historique sur le droit des marchés et des foires*. Paris, 1897.
IMBERTIN, F. 'Les routes médiévales.' *Annales*(1939).
INAMA-STERNEGG, K. T. VON. *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3 vols. Leipzig, 1899.

JASTROW, IGNAZ. 'Über Welthandelstrassen in d. Geschichte d. Abendlandes.' *Volkswirtschaftliche Gesellschaft, Volkswirtschaftl. Fragen*, Jahrg. VIII. Berlin, 1887.

JENKINSON, H. 'A Money-lender's Bonds of the Twelfth Century.' *Essays in History presented to R. L. Poole*. Oxford, 1927.

JOHNSEN, O. ALBERT. *Norgesveldets Undergang, et Utsyn og et Opgjør Nedgangstiden*. Oslo, 1924.

JULLIAN, C. *Histoire de Bordeaux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en 1895*. Bordeaux, 1895.

KENDRICK, T. D. *A History of the Vikings*. London, 1930.

KETNER, F. *Handel en Scheepvaart van Amsterdam in de Vijftiende Eeuw*. The Hague, 1936.

KEYSER, E. 'Der bürgerliche Grundbesitz der Rechtsstadt Danzig im 14. Jahrhundert.' *Zeitschrift d. Westpreussischen Geschichtsverein*, Heft LVIII (1918).

[895] KIESSELBACH, G. A. 'Schleswig als Vermittlerin des Handels zwischen Nordsee und Ostsee vom 9. bis in das 13. Jahrhundert.' *Zeitschrift für Schleswig-Holsteinischen Lauenburgische Gesch.*, 1907.

KLETTLER, P. *Nordwesteuropas Verkehr, Handel und Gewerbe im frühen Mittelalter*. Deutsches Kultur, Historische Reihe, geleitet von A. Dopsch. Vienna, 1924.

KÖSTER, G. 'Die Entwicklung der nordostdeutschen Verkehrstrassen bis 1800.'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ssischen Gesch.* Bd. 48 (1936).

KOSTER, A. *Schiffahrt und Handelsverkehr des Östlichen Mittelmeeres*. Leipzig, 1924.

KOWALEWSKY, M. *Die ökonomische Entwicklung Europas bis zum Beginn der kapitalistischen Wirtschaftsform*. 8 vols. Berlin, 1901–14.

KROCKER, E. *Handelsgeschichte der Stadt Leipzig. Die Entwicklung des Leipziger Handels und der Leipziger Messen*. Vol. VII of von Schulte's and Hoffmann's *Beiträge zur Stadtgeschichte*.

KULISCHER, J. *Allem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Neuzeit*. 2 vols., 2nd edn. Munich, 1958.

——*Russ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I. Jena, 1925.

LAMPRECHT, K.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Französischen Wirtschaftslebens im XI. Jahrhundert*. Leipzig, 1878.

LAPSLEY, G. T. 'The Account Roll of a Fifteenth-Century Iron Master.' *EHR*, XIV (1899).

LAUFFER, V. 'Danzigs Schiffs-und Waarenverkehr.' *Zeitschr. d. Westpreussischen Geschichtsvereins*, Heft XXXIII. Danzig, 1894.

LAURENT, H. *Un Grand commerce d'exportation au moyen âge: La draperie des Pays Bas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Mediterranéens, XII-XVe siècle*. Paris, 1935.

——*Choix de documents inédi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expansion commerciale des Pays Bas en France au Moyen Age (XIIe-XVe siècle)*. Brussels, 1934.

——'Marchands du palais et marchands d'abbayes.' *Revue Historique*, CLXXXIII (1938).

LESTOCQUOY, J. *Les Dynasties bourgeoises d'Arras du XIe au XVe siècle (Patriciens du moyen-âge)*. Arras, 1945.

——'Les Etapes du développement urbain d'Arras.' *RBPH* (1944).

LEVASSEUR, E. *Histoire du commerce de la France*, I. Paris, 1910.

——*Histoir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et de l'industrie en France avant 1789*. 2nd edn. Paris, 1901.

——*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avant 1789....* 3 vols. Paris, 1889–92.

LEWIS, G. R. *The Stannaries, a study of the English tin mines*. Cambridge (Mass.), 1908.

LOT, F. *L'État des paroisses et des feux de 1328*. Paris, 1929.

LOT, F. and FAWTIER, R. *Le premier budget de la monarchie francaise (1202)*. Paris, 1932.

LUNT, W. E. *Financial Relations of the Papacy with England to 1327*. Cambridge (Mass.), 1939.

LUZZATTO, G. *Storia del Commerzio*. Florence, 1914.

MAGNUSEN, F. 'Om de Engelskes Handeel og Foerd paa Island i det 15de Aarhundrede.' *Nordisk Tidskrift for Oldkyndighed*, II. Copenhagen, 1833.

MALOWIST, M. 'Le Développement des rapports économiques entre la Flandre, la Pologne et les pays limitrophes du XIIIe au XIVe siècle.' *RBPH*, X (1931).

MARQUANT, R. *La Vie économique à Lille sous Philippe le Bon*. Paris, 1940.

MICKWITZ, G. *Die Kartellfunktionen der Zünfte*. Helsingfors, 1936.

MOERMAN, H. J. 'Bijdragen tot de Economische Geschiedenis van Kampen in de Middeleuwen.' *Economisch Historisch Jaarboek*, 1920.

NAUDE, W. *Getreidehandels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Staaten, XIII. – XVIII. Jahr.* Berlin, 1901.

NEF, J. U. 'Silver Production in Central Europe, 1450–161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 XLIX (1941).

NETTA, GHERON. *Die Handelsbeziehungen zwischen Leipzig und Ost-und Südosteuropa bis zum Verfall der Warenmessen.* Zurich, 1920.

NEUBURG, C. *Goslars Bergbau bis 1552.* Hanover, 1872.

NEUMANN, G. *Heinrich Castorp.* Lübeck, 1932.

NIERMEYER, J. F. *De Wording van onze Volkshuishouding.* The Hague, 1946.

NÖE, ALBERT. *De Handel van Noord-Nederland op Engeland in de XIIIe Eeuw.* Haarlem, 1918. [896]

OCHENKOWSKI, W. VON. *Englands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im Ausgange des Mittelalters.* Jena, 1879.

PIGEONNEAU, H. *Histoire du Commerce de la France.* I. Paris, 1885.

PIRENNE, H. *Histoire de Belgique*, vol. I, 5th edn. Brussels, 1929 and vol. II, 3rd edn., Brussels, 1922.

——*Medieval Cities. Their origins and the revival of trade.* Princeton, 1925.

——*Mahomet et Charlemagne.* Paris, 1937.

——'Un Contraste économique: Mérovingiens et Carolingiens.' *RBPH*, II (1923).

——'Les Périodes de l'histoire sociale du capitalisme.' *Bulletins d'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no. 5 (1914).

POSTHUMUS, N. W. *De Geschiedenis van de Leidsche Lakenindustrie*, I. The Hague, 1908.

POWER, E. E. 'The English Wool Trade in the reign of Edward IV.' *Camb. Hist. Journ.* II. Cambridge, 1926.

——*The Wool Trade in English Medieval History.* Oxford, 1941.

POWER, E. E. and POSTAN, M. M.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 1933.

PÖSCHEL, A. *Das Anwachsen der deutschen Städte in der Zeit der mittelalterlichen Kolonialbewegung.* Berlin, 1910.

RENOUARD, YVES. *Les Hommes d'affaires Italiens du Moyen Age.* Paris, 1949.

REYER, E. *Zinn: eine geologisch-montanistisch-historische Monographie.* Berlin, 1881.

REYNOLDS, R. L. 'The Market for Northern Textiles in Genoa, 1179–1200,' *RBPH*, VIII (1929).

——'Merchants of Arras and the Overland Trade with Genoa, XIIth Century.' *ibid.*, IX (1930).

RHODES, W. E. *The Italian bankers in England and their loans to Edward I and Edward II.* In *Owens College Essays* (eds. T. F. Tout and J. Tait). Manchester, 1902.

ROGERS, J. E. THOROLD.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Oxford, 1866–1902.

RÖRIG, F. *Hansische Beiträge zur Deutsch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Breslau, 1928.

——*Der Markt von Lübeck. Topographisch-statistische Untersuchung zur deutschen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Leipzig, 1922.

——*Mittelalterliche Weltwirtschaft.* Jena, 1933.

RUDING, R. *Annals of the Coinage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840.

RUINEN, J. *De Oudste Handelsbetrekkingen van Holland en Zeeland met Engeland.* (Dissertation.) Amsterdam, 1919.

RUSSELL, J. C. *British Medieval Population.* Albuquerque, 1948.

RUTKOWSKI, J.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Pologne avant les partages.* Paris, 1927.

SABBE, E. 'L'Importation des tissus orientaux.' *RBPH* (1935).

SALZMAN, L. F. *English Trade in the Middle Ages.* Oxford, 1931.

SAPORI, A. *Studi di Storia Economica (Secoli XIII-XIV-XV).* 2 vols. Florence, 1955.

——*La Crisi delle Compagnie Mercantili dei Bardi e dei Peruzzi.* Florence, 1926.

SCHÄFER, D. *Die Hanse.* Monographien zur Weltgeschichte, no. XIX. Bielefeld and Leipzig, 1903.

——*Das Buch des Lübeckschen Vogts auf Schonen.* Hansische Geschichtsquellen, IV. Halle, 1887.

SCHANZ, G. *Englische Handelspolitik gegen Ende des Mittelalters,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Zeitalters der beiden ersten Tudors, Heinrich VII und Heinrich VIII.* 2 vols. Leipzig, 1881.

SCHEFFEL, P. H. *Verkehrsgeschichte der Alpen*. 2 vols. Berlin, 1908–14.

SCHREINER, J. *Pest og Prisfall i Senmiddelalderen*. Oslo, 1949.

SCHULTE, A. *Geschichte der grossen Ravensburger Handelsgesellschaft*. 3 vols. Stuttgart and Berlin, 1923.

SCHULZ, F. *Die Hanse und England von Edwards III bis auf Heinrichs VIII Zeit*. Abhandlungen zur Verkehrs-und Seegeschichte, v. (ed. D. Schäfer.) Berlin, 1911.

SÉE, H. 'Peut-on évaluer la population de l'ancienne France?' *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 [897] 1924.

SEEGER, H.-J. *Westfalens Handel und Gewerbe*.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Wirtschaft und Geisteskultur. Bd. I. Berlin, 1926.

SMIT, H. J. 'De beteekenis van den Noordnederlandschen in t bijzonders van den Hollandschen en Zeeuwschen handel in de laatste helft der 14er eeuw.' *BMHG*, Utrecht, 1930.

—— 'Handel en Scheepvaart in het Noordzeegebied gedurende de 13e eeuw.' *Bijdragen voor Vaderlandsche Geschiedenis en Oudheidkunde*, 1928.

SNELLER, Z. W. 'De Hollandsche Korenhandel in het Sommegebied in de 15e eeuw.' *BMHG* (1925).

—— 'De entwikkeling van den handel tusschen Noord-Nederland en Frankrijk tot het midden der vijfteinden eeuw.' *BMHG* (1922).

—— 'Wijnvaart en wijnhandel tusschen Frankrijk en de Noordelijke Nederlanden in de tweede helft der 15e eeuw.' *BMHG* (1924).

SÖDERBERG, T. *Storra Kopparberget ander Medeltiden*. Stockholm, 1932.

—— 'Det Svenska Bergsbrukets uppkomst.' *Historisk Tidskrift* (1936).

SOMBART, W.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3rd edn., I. Munich and Leipzig, 1913.

STEIN, W. 'Die Hanse und England beim Ausgang des hundert-jährigen Krieges.' *HG*, XXVI (1921), 27–126.

STEINHAUSEN, G. *Der Kaufmann in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 Jena, 1912.

STERCK, J. F. M. 'De opkomst van Aemstelredam godsdienstig en economik.' *Tijdschrift voor Geschiendenis* (1926).

STIEDA, W. *Hildebrand Veckinchusen*. Leipzig, 1921.

—— 'Uber die Quellen der Handelsstatistik im Mittelalter.' *Abhandlungen d. Königl. Preussischen Akad. der Wissenschaften* (1903).

STURLER, J. DE. *Les Relations politiques et les échanges commerciaux entre le duché de Brabant et l'Angleterre au moyen âge*. Paris, 1936.

SWANK, J. M. *History of the Manufacture of Iron in All Ages*. Philadelphia, 1892.

TYLER, J. E. *The Alpine Passes*. Oxford, 1930.

UNGER, W. S. 'De Hollandsche graanhandel en graanhandelspolitiek in de middeleeuwen.' *De Economist* (1916).

UNWIN, G. (ed.). *Finance and Trade under Edward III*. Manchester, 1918.

—— *The Gilds and Companies of London*. The Antiquary's Books, ed. J. C. Cox, 1908.

——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7.

USHER, A. P. *The History of the Grain Trade in France*. Cambridge (Mass.). 1913.

VERCAUTEREN, F. *Étude sur les Civitates de la Belgique Seconde*. Brussels, 1934.

VOGEL, W.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eeschiffahrt*, I. *Von der Urzeit bis zum Ende des XV. Jahrhunderts*. Berlin, 1915.

—— 'Ein seefahrender Kaufmann um 1100.' *HG* (1912).

VOLLBEHR, F. *Die Holländer und die deutsche Hanse*. Jena, 1930.

WALSH, A. *Scandinavian Relations with Ireland during the Viking Period*. Dublin and London, 1922.

WILLARD, J. F. *Parliamentary Taxes on personal property 1290–1334*. Cambridge (Mass.), 1934.

—— 'Inland Transportation in England during the Fourteenth Century.' *Speculum*, I (1926).

ZYCHA, A. *Das Recht des ältesten deutschen Bergbaues bis ins 13. Jahrhundert*. Berlin, 1899.

III. 补充书目

ADELSON, H. L. 'Early Medieval Trade Routes.' *American Hist. Rev.*, LXV (1960).

AMMANN, H. 'Deutschland und die Tuchindustrie Nordwesteuropas im Mittelalter.' *HG*, LXXII (1954).

BAUTIER, R. H. 'Notes sur le commerce de fer en Europe occidentale du XIIIe au XVI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de la Siderurgie*, I, part 4, 1966.

BOLIN, S. 'Mohammed, Charlemagne and Ruric.' *Scandinavian Econ. Hist. Rev.*, I (1953).

BRANDT, A. VON. *Die Hanse und die nordischen Mächte im Mittelalter.* Cologne, 1962.

BRANDT, L. (ed.). *Die deutsche Hanse als Mittler zwischen Ost und West.* Cologne, 1963. [898]

BRULEZ, W. 'Brugge en Antwerpen in de 15e en 16e eeuw: een tegenstelling?' *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 LXXXIII (1970).

CARUS-WILSON, E. M. 'La Guède francaise en Angleterre: un grand commerce du moyen âge.' *Revue du Nord*, XXXV (1953).

——*Medieval Merchant Venturers.* 2nd edn. London, 1967.

CARUS-WILSON, E. M. and COLEMAN, O. *England's Export Trade 1275–1547.* Oxford, 1963.

CHILDS, W. R. *Anglo-Castilian Trad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Manchester, 1978.

CHRISTENSEN, E. 'Scandinavia and the Advance of the Hanseatics.' *Scandinavian Econ. Hist. Rev.*, V (1957).

COORNAERT E. *Les Français et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 à Anvers.* 2 vols. Paris, 1961.

CRAEYBECKX, J. *Un Grand commerce d'importation: les vins de France aux anciens Pays Bas, XIIIe-XVIe siècles.* Paris, 1958.

DE LAET, M. 'De Vlaamse actieve handel op Engeland in de erste helft de 14e eeuw, aan de hand van de Customs Accounts.'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Belgique*, I, Brussels: Archives Générales du Royaume, 1972.

DE ROOVER, R. *The Bruges Money Market around 1400.* Brussels, 1968.

DOEHAERD, R. *Études anversoises.* 3 vols. Paris, 1962–3.

DOLLINGER, P. *La Hanse (XIIe-XVIIe siècles).* Paris, 1964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ULT, D. S. and STEINBERG, S. H., *The German Hansa.* London, 1970).

ENNEN, E. *Die europäische Stadt des Mittelalters.* Göttingen, 1972.

FRYDE, E. B. *Studies in Medieval Trade and Finance.* London, 1983.

GADE, J. A. *Hanseatic Control of Norwegian Commerce during the Late Middle Ages.* Leyden, 1951.

GRIERSON, P. 'Commerce in the Dark Ages: a critique of the evidence.' *TRHS*, 5th ser., IX (1959).

HANHAM, A. (ed.). *The Cely Letters, 1472–88.* London, 1975.

HATCHER, J. *English Tin Production and Trade before 1550.* Oxford, 1973.

HEERS, J. *L'Occident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et sociaux.* Paris, 1963.

HILDEBRAND, W. 'Der Goslarer Metalhandel im Mittelalter.' *HG*, LXXXVII (1969).

HIMLY, F. J. 'Y a-t-il emprise musulmane sur l'économie des états Européens du VIIIe au Xe siècle?' *Schweizerisch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e*, V (1955).

HOLMES, G. A. 'Florentine Merchants in England, 1346–1436.' *EconHR*, 2nd ser., XIII (1960).

JAMES, M. K. *Studies in the Medieval Wine Trade*, ed. E. M. VEALE. Oxford, 1971.

JANKUHN, H. 'Der fränkische-friesische Handel zur Ostsee im frühen Mittelalter.' *VSW*, XL (1953).

JAPPE ALBERTS, W. *De Nederlandse Hansesteden.* Bussum, 1969.

JELLEMA, D. 'Frisian Trade in the Dark Ages.' *Speculum*, XXX (1955).

JOHANSEN, P. *Der hansische Russlandhandel, insbesondere nach Novgorod, in kritischer Betrachtung.* Cologne/Opladen, 1962.

KAEUPER, R. W. *Bankers to the Crown: the Riccardi of Lucca and Edward I.* Princeton, 1973.

——'The Frescobaldi of Florence and the English Crown.' *Studi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History*, Lincoln: Nebraska, X (1973).

KELLENBENZ, H. 'Die Aufstieg Kölns zur mittelalterlichen Handelsmetropole.' *Jahrbuch der Kölner Geschichtsvereins*, XLI (1967).

KERLING, N. J. M. *Commercial Relations of Holland and Zeeland with England from the late Thirteenth Century to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Leyden, 1954.

LATOUCHE, R. *Les Origines de l'économie occidentale(IVe-XIe siècle).* Paris, 1956.

LESNIKOV, M. 'Lübeck als Handelsplatz für osteuropaïsche Waren im 15. Jahrhundert.' *HG*, LXXVIII (1960).

LEWIS, A. R. *The Northern Seas: shipping and commerce in Northern Europe, A. D. 300–1100.* Princeton, 1958.

LLOYD, T. H. *Alien Merchants in England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Brighton, 1982.

——*The English Wool Trade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1977.

[899] LOMBARD, M. *Espaces et réseaux du haut moyen âge.* Paris, 1972.

LOPEZ, R. S. 'Majorcans and Genoese on the North Sea route in the 13th century.' *RBPH*, XXIX (1951).

LOPEZ, R. S. and MISKIMIN, H. A. 'The Economic Depression of the Renaissance.' *EconHR*, 2nd ser., XIV (1962).

LÜTGE, F. *Strukturwandlung im ostdeutschen und osteuropaïschen Fernhandel des 14. bis 16. Jahrhunderts.* Munich, 1964.

MALLETT, M. E. 'Anglo-Florentine Commercial Relations, 1465–1491.' *EconHR*, 2nd ser., XV (1962).

——*The Florentine Galley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Oxford, 1967.

MALOWIST, M. *Croissance et régression en Europe, XIVe-XVIIe siècles.* Paris, 1972.

——'Pologne, Russie et commerce occidental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Past and Present*, no. 13 (1958).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Baltic countries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ies.' *EconHR*, 2nd ser., XII (1959).

——'The Problem of the Ine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urop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EconHR*, 2nd ser., XIX (1966).

MOLLAT, M. *Le Commerce maritime normand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Paris, 1951.

——(ed.). *Le Rôle du sel dans l'histoire.* Paris, 1968.

MUNRO, J. H. *Wool, Cloth and Gold: the struggle for bullion in Anglo-Burgundian trade, 1340–1478.* Toronto, 1973.

NIERMEYER, J. F. (ed.). *Bronnen voor de economische geschiedenis van het Beneden-Maasgebied*, I (1104–1399). The Hague, 1968.

PERROY, E. 'Le Commerce Anglo-Flamand au XIIIe siècle: la Hanse Flamande de Londres.' *Revue Historique*, CCLII (1974).

POSTAN, M. M.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 in BARRACLOUGH, G. (ed.).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70.

——*Medieval Trade and Finance.* Cambridge, 1973.

RENOUARD, Y. 'Le Grand commerce des vins de Gascogne au moyen âge.' *Revue Historique*, CCXXI (1959).

——'Les Cahorsins, hommes d'affaires français du XIIIe siècle.' *TRHS.*, 5th ser., XI (1961).

——(ed.). *Histoire de Bordeaux*, III: *Bordeaux sous les rois d'Angleterre.* Bordeaux, 1965.

RÖRIG, F. *Wirtschaftskräfte im Mittelalter: Abhandlungen zur Stadt-und Hansegeschichte*, ed. KAEGBEIN, P. Cologne/Graz, 1959.

RUDDOCK, A. A. *Italian Merchants and Shipping in Southampton, 1270–1600.* Southampton, 1951.

SPROEMBERG, H. 'Die Hanse in europaïscher Sicht.' *Annales de la Société Royale d'Archéologie de Bruxelles*, L (1961).

THIELEMANS, M. R. *Bourgogne et Angleterre: relations politiques et économiques entre les Pays-Bas bourguignons et l'Angleterre, 1435–1467.* Brussels, 1966.

TOUCHARD, H. *Le Commerce maritime breton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Paris, 1967.

VAN DER WEE, H.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fourteenth to sixteenth centuries).* 3 vols. The Hague, 1963.

VAN HOUTTE, J. A. 'Anver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expansion et apogée.' *Annales*, XVI (1961).

——'Bruges et Anvers, marchés "nationaux" ou "Internationaux" du XIVe au XVIe siécle.' *Revue du Nord.* XXXIV (1952).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Köln und den Niederlanden vom Hochmittelalter bis zum Beginn des Industriezeitalters.' *Kölner Vorträge zu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 I (1969).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arket of Bruges.' *EconHR*, 2nd ser., XIX (1966).

VAN WERVEKE, H. *Miscellanea Mediaevalia: Verspreide Opstellen ove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schiedenis van de Middeleeuwen.* Ghent, 1968.

VEALE, E. M. *The English Fur Trad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 1966.

VERHULST, A. *Der Handel im Merowingerreich.* Ghent, 1970.

WARNKE, C. *Die Anfänge des Fernhandels in Polen.* Würzburg, 1964. [900]

WATSON, W. B. 'The Structure of the Florentine Galley Trade with England and Flander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RBPH*, XXXIX - XL (1961-2).

WYFFELS, C. 'De Vlaamse handel op Engeland vóór het Engels-Vlaams konflikt van 1270-74.' *Bijdragen voor de Geschiedenis de Nederlanden*, XVII (1962). [901]

第五章　中世纪欧洲的贸易：南方

本章的初稿写于1946年，发表于1952年，在将近30年时间中它是惟一一篇对中世纪南欧贸易作整体性研究的文章。作者最近把他的最新观点写入一本涉及整个中世纪欧洲经济史的小书——《中世纪的商业革命》（第2版，剑桥，1976年）——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把他年轻时的作品抛弃。因为那篇文章是他盛年时作品的雏形。修订本章的最佳办法似乎是新增加导论部分［I（I）；II（I）；III（I）］和对旧文本的有限但必需的订正。近30到50年来学术出版物的激增使得重印所有旧作或增加同样篇幅的新内容并不现实。下面仅是1946年后一些代表性作品，按字母顺序排列，它们或具创见，或方法独特，或内容不凡，或其参考文献有价值。为填补裂痕并与时俱进，请读者参阅最重要的专门期刊、国际会议的论文集和纪念性论文汇编。

BABEL, A.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Genève.* 2 vols., Geneva, 1963.

BAER, J.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Christian Spain.* 2 vols., Philadelphia, 1961-6.

BARATIER, E. and REYNAUD, F. *Histoire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 II. Paris, 1951.

BAUTIER, 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Europe.* London, 1971.

BECHTEL, H. *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 Deutschlands: Wirtschaftsstile und Lebensformen.* Munich, 1967.

BERGIER, J. F. *Problèmes de l'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Suisse.* Berne, 1968.

BERNARD, J. *Navires et gens de mer à Bordeaux.* 3 vols., Paris, 1968.

BOWSKY, W. M. *The Finance of the Commune of Siena, 1287-1355.* Oxford, 1970.

BRAUDEL, F.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 XVe - XVIIe siècles.* Paris, 1967.

BRUCKER, G. *Florentine Politics and Society, 1343-1378.* Princeton, 1967.

BURKE, P. *Economy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1972.

CAMERON, R. (ed.). *Essays i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Homewood, Ill., 1971.

CARRÈRE, C. *Barcelone, centre économique à l'époque des difficultés.* Paris, 1967.

CASTER, G. *Le Commerce du pastel et de l'épicerie à Toulouse.* Toulouse, 1962.

CIPOLLA, C. M. *Lite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Harmondsworth, 1969.

——*Money, Prices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Princeton, 1956.

——(ed.). *Storia dell'economia italiana*, I. Turin, 1959.

Constructions civiles d'intérêt public dans les villes d'Europe au Moyen Age. Bruxelles, 1971.

COORNAERT, E. *Les Corporations en France avant 1789.* Paris, 1949.

CORTAZER, J. A. G. *Vizcaya en el siglo XV.* Bilbao, 1966.

CRACCO, G. *Società e stato nel medioevo veneziano.* Florence, 1967.

De Roover, 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edici Bank.* Cambridge, Mass., 1963.
Dion, R. *Histoire de la vigne et du vin en France.* Paris, 1959.
Doehaerd, R. *Le Haut moyen âge occidental : économies et sociétés.* Paris, 1971.
Essays in Memory of Robert L. Reynolds. Kent, Ohio, 1969.
Ferguson, W. (ed.). *The Renaissance : Six Essays.* New York, 1962.
Fichtenau, H. *Das Karolingische Imperium.* Zurich, 1949.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 . London, 1972.
Fossier, R. *Histoire sociale de l' Occident médiéval.* Paris, 1970.
Fournial, E. *Les Villes et l' économie d' échange en Forez, XIIIe et XIVe siècles*, Paris 1967.
Fourquin, G.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 Occident médiéval.* Paris, 1969.
Gimpel, J.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1976.
[902] Gioffré, D. *Il mercato degli schiavi a Genova nel secolo XV.* Genoa, 1971.
Glénisson, J. and Day, J. *Textes et documents d' histoire du moyen âge*, I, Paris, 1970.
Godinho, V. M., *L' Économie de l' empire portugai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Paris, 1969.
Guide international d' histoire urbaine, I, Paris, 1976.
Hale, R. J. (ed.). *Renaissance Venice.* London, 1973.
Handlin, O. and Burchard, J., (eds.). *The Historian and the City.* Cambridge, Mass., 1963.
Havighurst, A. (ed.). *The Pirenne Thesis.* Lexington, Mass., 1958.
Heers, J. *L' Occident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et sociaux.* Paris, 1966.
Herlihy, D. *Pisa in the Early Renaissance.* New Haven, 1958.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Pistoia.* New Haven, 1967.
Higounet, C. (ed.). *Histoire de Bordeaux*, II - IV. Bordeaux, 1963-6.
Kedar, B. *Merchants in Crisis, 1270-1400.* New Haven, 1976.
Krekic, B. *Dubrovnik in the XIVth and XVth Centuries.* Norman, Okla., 1972.
Lach, D.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I. Chicago, 1965.
Lane, F. *Navires et constructeurs à Venise pendant la Renaissance.* Paris, 1965.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Baltimore, 1973.
Le Goff, J. *Marchands et banquiers du Moyen Age.* Paris, 1956.
Leighton, A. C.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Newton Abbot, Devon, 1972.
Lestocquoy, J. *Les Villes de Flandre et d' Italie sous les patriciens.* Paris, 1952.
Lopez, R. S. *The Birth of Europe.* London, 1966.
——*Il ritorno all' oro nell' Occidente duecentesco*, Naples, 1955.
——*Su e giù per la storia di Genova.* Genoa, 1975.
——*The Three Ages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1970.
Lopez, R. S. and Raymond, I. *Medieval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New York, 1955.
Lütge, F. *Deutsche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Berlin, 1966.
Luzzatto, M. *Giovanni Villani e la compagnia dei Buonaccorsi.* Rome, 1971.
——*An Economic History of Ital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XVIth Century.* London, 1961.
——*Storia economica di Venezia dall' XI al XVI secolo.* Venice, 1961.
——*Studi di storia economica veneziana.* Padua, 1954.
Martines, L.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Florentine Humanists.* Princeton, 1963.
Mélanges en l' honneur de Fernand Braudel. 2 vols., Toulouse, 1974.
Melis, F. *Aspetti della via economica medievale.* Siena, 1962.
——*Documenti per la storia economica dei secoli XIII - XVI.* Florence, 1972.
Milano, A. *Storia degli Ebrei in Italia.* Turin, 1963.
Miskimin, H. *The Economy of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Cambridge, 1975.
Miskimin, H. and Udovich, A. L. (eds.). *The Medieval City : in honor of R. S. Lopez.* New Haven, 1977.
Molho, A. *Florentine Public Finances in the Early Renaissance.* Cambridge, Mass., 1971.
Mollat, M. *Le Rôle du sel dans l' histoire.* Paris, 1968.
Mols, R. J. *Introduction à la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des villes d' Europe.* Louvain, 1954.

Moneta e scambi nell' alto medioevo(XII Settimana,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 alto medioevo). Spoleto, 1961.
PEYER, H. C. *Zur Getreidepolitik oberitalienischer Städte in 13. Jahrhundert.* Vienna, 1950.
RAU, V. *A exploração e o comercio do sal de Setúbal.* Lisbon, 1951.
RAU, V. and MACEDO, J. *O açucar da Madeir aos fins do século XV.* Funchal, 1962.
RENOUARD, Y. *Études d' histoire médiévale.* Paris, 1968.
——*Les hommes d' affaires italiens du Moyen Age*, rev. edn., Paris, 1968.
REYNOLDS, R. L. *Europe Emerges.* Madison, Wis., 1961.
ROMERO, J. L. *La revolucion burguesa en el mundo feudal.* Buenos Aires, 1967.
RUIZ MARTIN, F. *La banca en España hasta 1782*, s. d.
SAPORI, A. *Le Marchand italien au Moyen Age.* Paris, 1952.
——*Studi di storia economica.* 3 vols., Florence, 1956-65.
SCHNYDER, W. *Handel und Verkehr über die Pässe in Mittelalter*, I. Zurich, 1973.
SHATZMILLER, J. *Recherches sur la communauté juive de Manosque.* Paris, 1973. [903]
Sociétés et compagnies de Commerce en Orient et dans l' Océan indien(VIII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 histoire maritime). Paris, 1970.
SPRANDEL, R. *Das Eisengewerbe im Mittelalter.* Stuttgart. 1968.
Storia di Milano(Fondazione Treccani). Milan, 1953-66.
Studi dedicati a Franco Borlandi. Bologna, 1977.
Studi in onore di Gino Luzzatto. 4 vols., Padua, 1949-50.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2 vols., Milan, 1957.
TANGHERONI, M. *Politica, commercio, agricoltura a Pisa nel Trecento.* Pisa, 1973.
VALDEAVELLANO, G. *Sobre los burgos y los burgueses de la etad medieval.* Madrid, 1960.
VALERI, N. (ed.). *Storia d' Italia*, I. Turin, 1965.
VERLINDEN, C. *L' Esclavage dans l' Europe médiévale*, I. Bruges, 1955.
VICENS VIVES, J.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Princeton, 1969.
VIOLANTE, C. *La società milanese nell' eta precomunale.* Bari. 1953.
WALEY, D. *The Italian City-Republics.* London, 1969.
WHITE, L.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1962.
WOLFF, P. *Commerces et marchands de Toulouse, 1350-1450.* Paris, 1954.
WOLFF, P. and MAURO, F. *Histoire générale du travail*, I. Paris, 1961.
ZIEGLER, P., *The Black Death*, London, 1969. [904]

第六章 亚洲、非洲及中世纪欧洲的贸易

下面是本书目中所使用的缩略语：

EcH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EI² *Encyclopaedia of Islam*, 2nd edition. Leiden
ITA *Islam and the Trade of Asia: a colloquium*, D. S. Richards(ed.). Oxford, 1970
JAH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JESHO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J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CCO *Sociétés et compagnies de commerce en Orient et dans l' Océan indien. Actes du huitièm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 histoire maritime (Beyrouth, 1966)*, M. Mollat (ed.), Paris, 1970.
SCI *Settimane di studi del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 alto medioeve*
SEH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the present day*, M. A. Cook(ed.). London, 1970.
VSW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I. 一般性著作

ARNE, T. J. *La Suède et l' Orient : études archéologiques sur les relations de la Suède et de l' Orient pendant l' age des Vikings.* Uppsala, 1914. (= Archives d' Etudes orientales, VIII.)

ASHTOR, E. *Les Métaux précieux et la balance des payements du Proche-Orient à la basse époque.* Paris, 1971.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76.

——' Quelques problèmes que soulève l' histoire des prix dans l' Orient médiéval'. M. Rosen-Ayalon (ed.). *Studies in Memory of Gaston Wiet*, Institute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1977, 203-34.

——' The Jews in the Mediterranean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Wirtschaftskräfte und Wirtschaftswege*, I: *Mittelmeer und Kontinent. Festschrift für Hermann Kellenbenz* (= *Beitra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IV). Nuremberg, 1978, 441-54.

——' Il regime portuario nel Califfato', *SCI*, XXV: *La navigazione mediterranea nell' alto medioevo.* Spoleto, 1978, 652-88.

——' Gli Ebrei nel commercio mediterraneo nell' alto medioevo (sec. X - XI)'. *SCI*, XXVI: *Gli Ebrei nell' Alto Medioevo.* Spoleto, 1980, 401-87.

BLOCH, M. ' Le Problème de l' or au moyen âge', *Annales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V (1933), 1-34 and in: *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 London, 1967.

CAHEN, C. ' L'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 Orient musulman médiéval'. *Studia islamica*, III (1955), 93-115.

——' Quelques problèmes concernant l' expansion économique musulmane au haut moyen âge', *SCI*, XII (1965), 391-432.

——' Quelques mots sur le declin commercial du monde musulman à la fin du Moyen Age', *SEH*, 31-6.

COOK, M. A. (ed.).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1970.

DE PLANHOL, X. *Les Fondements géographiques de l' histoire de l' Islam.* Paris, 1968.

DESOMOGYI, J. *A Short History of Oriental Trade.* Hildesheim, 1968.

FISCHEL, W. J. ' The Origins of Banking in Medieval Islam', *JRAS* (1933).

GOITEN, S. D. *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institutions.* Leiden, 1966.

——' The Main Industries of the Mediterranean Area as Reflected in the Records of the Cairo Geniza', *JESHO*, IV (1961), 168-97.

——' Mediterranean Trade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some facts and problems', *SEH*, repr. from *Diogenes*, LIX (1967).

[905] HINZ, W. *Islamische Masse und Gewichte.* Leiden, 1955.

HODGES, R. and WHITEHOUSE, D. *Mohammed, Charlemagn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 London, 1983.

JACOB, GEORG. *Der nordisch-baltische Handel der Araber im Mittelalter.* Leipzig, 1887.

LAMBTON, A. K. S. ' The Merchant in Medieval Islam'. *A Locust' s Leg. Studies in honour of S. H. Taqizadeh.* London, 1962, 121-30.

LAPIDUS, I. M. *Muslim Citie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Cambridge, Mass., 1967; new edn, Cambridge, England, 1984.

LEVY, R.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Islam.* Cambridge, 1965.

LIEBER, A. E. ' Eastern Business Practice and Medieval European Commerce', *EcHR*, 2nd ser., XXI (1968), 230-43.

LØKKEGAARD, F. *Islamic Taxation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Copenhagen, 1950.

LOMBARD, M. *The Golden Age of Islam*, transl. Joan Spencer. Amsterdam—New York—Oxford, 1975 (transl. from *L' Islam dans sa première grandeur.* Paris, 1971).

RABINOWITZ, L. I. *Jewish Merchant Venturers.* London, 1948.

RICHARDS, D. S. (ed.). *Islam and the Trade of Asia : a colloquium.* Oxford, 1970.

RODINSON, M. *Islam and Capitalism.* (Eng. transl.) London, 1974.
—— 'Le Marchand musulman', *ITA*, 21-35.
——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histoire des classes sociales dans le monde musulman', *SEH*, 139-55.
SABBE, E. 'L'Importation des tissues orientaux en Europe occidentale au Haut Moyen Age (IXe et Xe siècles)'.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XIV (1935), 811-48 and 1261-88.
SCHAUBE, A. *Handels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Völker des Mittelmeergebiets bis zum Ende der Kreuzzüge.* Munich - Berlin, 1906.
SERJEANT, R. B. 'Material for a History of Islamic Textiles up to the Mongol Conquest'. *Ars islamica*, XIII - XIV (1948), 75-117.
SIMONSEN, D. 'Les Marchands juifs appelés "Radanites"',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 LIV (1907), 141-2.
UDOVITCH, A. L. *Partnership and Profit in Medieval Islam.* Princeton, N. J., 1970.
—— 'At the Origins of the Western *Commenda*: Islam, Israel, Byzantium?' *Speculum*, XXXVII (1962), 198-207.
—— 'Credit as Means of Investment in Medieval Islamic Trad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LXXXVII (1967), 260-4.
—— 'Labor partnerships in medieval Islamic law', *JESHO*, X (1967), 64-80.
—— 'Commercial Techniques in Early Medieval Islamic Trade'. ITA, 37-65.
WATSON, A.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in the Early Islamic World.* Cambridge, 1983.
—— 'Back to Gold-and Silver', *EcHR.* 2nd ser., XX (1967), 1-34.

II. 埃及和叙利亚

ALLMENDINGER, K.-H.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Kommune Pisa und Ägypten im hohen Mittelalter. Eine Rechts-und Wirtschaftshistorische Untersuchung. VSW*, Beiheft no. 54. Wiesbaden, 1967.
AMARI, M. 'Nuovi ricordi arabici su la storia di Genova', *Atti della Società ligure di storia patria*, V (1873).
ASHTOR, E. *Levant Trad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Princeton, N. J., 1983.
—— 'L'Exportation de textiles occidentaux dans le Proche Orient musulman au bas Moyen Age (1370-1517)'. *Studi in memoria di Federigo Melis*, II, Naples, 1978, 303-77.
—— 'The Karimi Merchants', *JRAS* (1956), 45-56 and in *Studies on the Levantine Trade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Variorum), 1978.
—— 'New Data for the History of Levantine Jewrie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Jewish Studies* (London), III (1975), 67-102.
—— 'The Volume of Levantine Trad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1370-1498)',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V (1975), 573-612, and in *Studies...* (*Supra*).
ATIYA, A. S. *Egypt and Aragon. Embassies and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between* 1300 *and* 1330 *A. D. 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XXXIII, 7. Leipzig, 1938. [906]
AUBIN, J. 'La Mine de Siraf et les routes du Golfe Persique', *Cahiers de civilisation médiévale*, X - XII (1959), 287-99.
AYALON, D. 'The System of Payment in Mamluk Military Sociery', *JESHO*, I (1958), 37-65 and 257-96.
BALOG, P. *The Coinage of the Mamluk Sultans of Egypt and Syria.* New York, 1964.
BARTHOLD, W.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E. J. W. Gill Memorial Series, n. s., v.). London, 1968.
BLAKE, R. P. 'The Circulation of Silver in the Moslem East down to the Mongol Epoch',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II (1937), 291-328.
CAHEN, C. 'Un Text peu connu relatif au commerce oriental d'Amalfi au Xe siècle', *Archivio storico per le provincie napoletane*, N. S. XXXIV (1953/54).
—— 'Douanes et commerce dans les ports mediterranéens de l'Egypt medíévale après le *Minha-*

dj d' al-Makhzumi', *JESHO*, VII (1964), 217-314. Cf. 'Un Traité financier inédit de l'époque Fatimide-Ayyubide', *ibid.*, V (1962), 139-59.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impots dans l'Egypte médiévale', *ibid.*, V (1962), 244-78.

—— 'Le Commerce musulman dans l'océan Indien au Moyen Age', *SCCO*, 179-93.

DARRAG, A. *L'Égypte sous le règne de Barsbay 825-841/1422-1438.* Damascus, 1961.

DE BOÜARD, M. 'Sur l'évolution monétaire de l'Égypte médiéval'. *L'Égypte contemporaine*, XXX. Cairo, 1939.

EHRENKREUTZ, A. 'Studies in the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in the Middle Ages', *JESHO*, II (1959), 128-61; VI (1963), 243-77.

—— 'Monetary Aspects of Medieval Near Eastern Economic History'. *SEH*, 37-50.

FISCHEL, W. J. *Jews i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fe of Medieval Islam*, Royal Asiatic Society monographs, XXII. London, 1937.

—— 'Uber die Gruppe der Karimi-Kaufleute.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Orienthandels Ägyptens unter den Mameluken).' Fr. ROSENTHAL, G. von GRÜNEBAUM, W. J. FISCHEL, *Studia Arabica*, I (*Analecta Orientalia*, XIV), 67-82. Rome, 1937.

—— 'The Spice-Trade in Mamluk Egypt', *JESHO*, I (1958), 157-74.

GOITEIN, S. D.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India: documents on the trade to India, South Arabia and East Africa from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Speculum*, XXIX (1954), 181-97.

—— 'New Light on the Beginnings of the Karimi Merchants', *JESHO*, I (1958), 175-84.

—— 'Letters and documents on the India trade in medieval times', *Islamic Culture*, XXXVII (1963), 188-205.

——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the Jewish communities of the Arab world as portrayed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Cairo Geniza.* I: *Economic Foundations.* Berkeley - Los Angeles, 1967.

HEYD, W. *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au moyen âge*, édition française de Furcy Raynaud, 2 vols., Leipzig, 1885-6.

LABIB, S. Y. *Handelsgeschichte Ägyptens im Spätmittelalter (1171-1517)*, *Vierteljahrschrift fu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Beiheft nr. 46. Wiesbaden, 1965.

—— 'Egyptian 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Middle Ages', *SEH*, 63-77.

—— 'Geld und Kredit. Studien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Ägyptens im Mittelalter'. *JESHO*, II (1959), 225-46.

—— 'Les Marchands Karimis en Orient et sur l'Océan Indien', *SCCO*, 209-14.

—— 'Karimi, *EI*[2], IV, 640-3.

LAPIDUS, I. M. 'The Grain Economy of Mamluk Egypt', *JESHO*, XII (1969), 1-15.

LEWIS, B. 'The Fatimids and the Route to India', *Revue de la Faculté des sciences économiques de l'Université d'Istambul*, XI (1949/50).

NAURA, R. 'Les Karimis aux Archives de Venise' (lettre). *JESHO*, I (1958), 333.

POPPER, W. *Egypt and Syria under the Circassian Sultans, 1382-1468 A. D. Systematic notes to ibn Taghri Birdi's chronicles of Egypt.* 2 vols., Berkeley-Los Angeles, 1955 and 1957.

RABIE, H.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Egypt, A. H. 564-741/A. D. 1169-1341.* London oriental series, XXV. London, 1972.

—— *The size and value of the iqta' in Egypt, 564-741/1169-1341. ' SEH.*

[907] RILEY-SMITH, J. 'Government in Latin Syria and the Commercial Privileges of Foreign Merchants', in D. Baker (ed.), *Relation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the Middle Ages.* Edinburgh, 1973.

SHAKED, S. *A Tentative Bibliography of Geniza Documents.* Paris - The Hague, 1964.

SOBERNHEIM, M. 'Das Zuckermonopol unter Sultan Barsbai',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und verwandte Gebiete*, XXVII (1912).

STERN, S. M. 'An original document from the Fatimid Chancery concerning Italian Merchants', *Studi orientalistici in onore di G. Levi della Vida*, II (1956), 529-38.

—— 'Ramisht of Siraf, a merchant millionair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JRAS* (1967), 10-14.

WIET, G. 'Les Marchands d'épices sous les soultans mamlouks', *Cahiers d'histoire égyptienne*, VII (1955), 81-147.

ZIADA, N. *Urban Life in Syria under the Early Mamluks.* Beirut, 1953.

III. 北非和撒哈拉

ABDUL-WAHAB, H. H. 'Deux dinars normands de Mahdia', *Revue tunisienne*, N. S., I (1930), 215-18.

ABULAFIA, D. S. H. *The Two Italies: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 and the northern communes.* Cambridge, 1977.

—— 'L'attivita genovese nell'Africa normanna: la citta di Tripoli', *Atti del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sulla Sicilia normanna.* Palermo, 1973.

—— 'Maometto e Carlomagno: le due aree monetarie italiane dell'oro e dell'argento', *Storia d'Italia: Annali*, VI: *Economia naturale, economia monetaria*, ed. R. ROMANO and U. TUCCI. Turin, 1983, 223-70.

ABUN-NASR, J. M. *History of the Maghrib.* Cambridge, 1971.

AMAR, E. *La Pierre de touche des fetwas*, 2 vols. (= *Archives marocaines* XII - XIII, Paris, 1908-9 (al-Mi'yar of al-Wansharishi)).

AMARI, M. *I diplomi arabi del R. Archivio Fiorentino.* Florence, 1863.

BOVILL, E. W. *The Golden Trade of the Moors*, 2nd edn, rev. by Robin Hallett. London, 1968, cf. I st edn, 1958; cf. *Caravans of the Old Sahara*, 1933.

BRAUDEL, F. 'De l'Or du Soudan à l'argent des Ameriques', *Annales* (1946).

BRETT, M. 'Ifriqiya as a Market for Saharan Trade from the 10th to the 12th Century A. D.', *JAH*, X (1969), 640-51.

—— 'Problem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light of some recent publications'. *JAH*, XIII (1972), 489-506.

BRUNSCHVIG, R. *La Berbérie orientale sous les Hafsides.* 2 vols., Paris, 1940, 1947.

COURTOIS, C. 'Remarques sur le commerce maritime en Afrique au XIe siècle', *Mélanges G. Marçais*, Algiers, 1957, II, 51-9.

DE MAS LATRIE, L. *Traités de paix et de commerce et documents divers concernant les relations des Chrétiens avec les Arabes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au Moyen Age*, 2 vols. Paris, 1866, 1872.

DUFOURCQ, C. E. *L'Espagne catalane et le Maghrib au XIIIe et XIVe siècles. De la bataille de Las Navas de Tolosa (1212) à l'avènement du sultan merinide Abou-l-Hasan (1331).* Paris, 1965.

GOITEIN, S. D. 'Sicily and Southern Italy in the Cairo Geniza Documents', *Archivio storico per la Sicilia orientale*, LXVII (1971).

GOLVIN, L. *Le Magrib central a l'époque des Zirides, recherch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 Paris, 1957.

HAZARD, H. W. *The Numismatic History of Late Medieval North Africa.*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Numismatic Studies No. 8. New York, 1952.

IDRIS, H. R. *La Berbérie orientale sous les Zirides, Xe-XIIe siècles*, 2 vols.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d'Études orientales,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d'Alger, no. XXII. Paris, 1962.

IMAMUDDIN, S. M. *Some Aspects of the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Muslim Spain, 711-1492 A. D.* Leiden, 1965.

JOHNSON, M. 'The Cowrie Currencies of West Africa', *JAH*, XI (1970), 331-53.

JULIEN, C. A. *History of North Africa, to* 1830. London, 1970. [908]

KIRKMAN, J. S. 'The Coast of Kenya as a Factor in the Trade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Ocean', *SCCO*, 247-53.

KRUEGER, H. C. 'Genoese Trade with Northwest Africa in the Twelfth Century', *Speculum*, VIII (1933), 377-95.

—— 'Wares of exchange in Twelfth-Century Genoese - African Trade', *Speculum*, XII (1937), 57-71.

LEVTZION, N. *Ancient Ghana and Mali*, Studies in African History, VII. London, 1973.

——'Ibn Hawqal, the Cheque and Awdaghust', *JAH*, IX (1968), 223-33.

LOPEZ, R. S. 'Back to gold, 1252', *EcHR*, 2nd ser. IX (1956), 219-40.

MAGALHAES GODINHO, V. *O Mediterraneo saariano e as caravans de ouro.* São Paulo, 1956.

MAUNY, R. *Les Siècles obscurs de l'Afrique noire: histoire et archéologie.* Paris, 1970.

OLIVER, R. (ed.). *The Middle Age of African History.* London, 1967.

PACHA (née SOUISSI), N. *Le Commerce du Maghreb du XIe au XIVe siècles.* Faculté de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de Tunis, Quatrième serie: Histoire, XVII. Tunis, 1976. (French & Arabic texts.)

SAYOUS, A. E. *Le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à Tunis depuis le XIIe siècle jusqu'à la fin du XVIe.* Paris, 1929.

STERN, S. M. 'Tari', *Studi medievali*, 3rd ser. XI (1970), 177-207.

IV. 东非

CHITTICK, N. 'East African Trade with the Orient', *ITA*, 97-104.

DUYVENDAK, J. J. L. *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 London, 1949.

FILESI, T. *Le relazioni della Cina con l'Africa nel Medio Evo.* Milan, 1962 (also Eng. transl. London, 1972, *China and Africa in the Middle Ages*).

FREEMAN-GRENVILLE, G. S. P.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Coast of Tanganyika.* London, 1962.

KIRKMAN, J. S. *Monuments and Men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London. 1964.

——'The Coast of Kenya as a Factor in the Trade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Ocean', *SCCO*, 247-53.

WHEATLEY, P. 'The Land of Zanj-Chinese knowledge of E. Africa', *Geographers and the Tropics: Liverpool Essays.* London, 1964.

V. 印度洋

CARSWELL, J. 'Archaeology and the Study of Later Islamic Pottery', *ITA*, 63-5.

DIGBY, S. 'The Maritime Trade of India',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I (*1200* - C. *1790*). Cambridge, 1982, 125-59.

GROSSET-GRANGE, H. 'Les Procédés arabes de navigation en Océan Indien au moment des grandes découvertes', *SCCO*, 227-46.

HOURANI, G. F.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 Princeton, N. J., 1951.

POUJADE, J. *La Route des Indes et ses navires.* 1949.

MOLLAT, M. (ed.). *SCCO.*

RICHARD, J. 'Les Navigations des Occidentaux sur l'Océan Indien et la Mer Caspienne (XIIe-XVe siècles)', *SCCO*, 353-63.

SERJEANT, R. B. 'Maritime Customary Law off the Arabian Coasts'. *SCCO.* 195-207.

VERIN, P. 'Les Éstablissements islamiques sur les côtes de Madagascar', *SCCO*, 225-9.

VI. 印尼和马来西亚

BASTIN, J. and ROOLVINI, R. (eds.). *Malayan and Indonesian Indies: essays presented to Sir Richard Winstedt.* Oxford, 1964, (Wheatley, Wang Gungwu, etc.)

COEDÈS, G. *Les États hindouisées d'Indochine et d'Indonésie*, 3rd edn. Paris, 1964. *The Indianized* [909]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trans.* S. B. Cowing, ed. W. F. Vella. Honolulu, 1968.

ARMANDO CORTESÃO and TOMÉ PIRES (eds.). *The Suma Oriental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Hakluyt Soc., 2nd ser. LXXXIX&XC. 2 vols., London, 1944.

DI MEGLIO, R. R. 'Arab Trade with Indonesia and the Malay Peninsula from the 8th to the 16th

century', *ITA*, 105–35.

FERRAND, G. 'L'Empire sumatranais de Çrivijaya', *Journal Asiatique*, xx, (1922).

JOHNS, A. H. 'Sufism as a Category in Indonesi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Unpublished: typewritten copy in the Sociological-historical seminar for S. E. Asia of the Univ. of Amsterdam. 1955.

KROM, N. J. *Hindoe-Javansche Geschiedenis.* 'sGravenhage, 1926.

MEILINK-ROELOFSZ, M. A. P. *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 The Hague, 1962.

—— 'Trade and Islam in the Malay-Indonesian Archipelago prior to the Arrival of the Europeans', *ITA*, 137–57.

SCHRIEKE, B. J. O. *Indonesian Sociological Studies*, vols. I and II. The Hague – Bandung, 1955, 1957.

TIBBETTS, G. R. 'Early Muslim Traders in S. E. Asia',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stic Society*, xxx (1957), 1–45.

TICHELMAN, FRITJOF.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donesia: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and its legac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The Hague – Boston – London, 1980.

VAN LEUR, J. C. 'On Early Asian Trade'; 'The World of S. E. Asia'; in: J. C. VAN LEUR,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Essays in Asi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 Hague – Bandung, 1955, 2nd edn, 1967.

WANG GUNGWU, 'The Nanhai Trade',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xxxi (1958), 31–61, 118–23.

——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 E. Asia',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ed. J. K. FAIRBANK. Cambridge, Mass., 1968, 34–62.

WHEATLEY, P. *The Golden Kherso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Malay Peninsula before A. D. 1500.* Kuala Lumpur, 1961.

WOLTERS, O. W. *Early Indonesian Commerce.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Srivijaya.* Ithaca, 1967.

—— *The Fall of Śrivijaya in Malay History.* London, 1970.

VII. 中国

DI MEGLIO, R. R. 'Il commercio arabo con la Cina dalla Gahiliyya al X secolo'. *Annali dell'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di Napoli* (1964), 539–40; and 'Il commercio arabo con la Cina dal X secolo all'avvento dei Mongoli', *ibid.* (1965), 89–95.

FERRAND, G. *Relations de voyages et textes géographiques arabes, persans et turks relatifs à l'Extrême-Orient du VIIIe au XVIIe siècles* (Documents historiques et géographiques relatifs à l'Indochine). Paris, 1914.

HIRTH, F. and ROCKHILL, W. W. *Chau Ju-Kua.* St Petersburg, 1911.

HUDSON, G. F. 'The Medieval Trade of China', *ITA*, 159–67.

LO JUNG-PANG, 'Chinese Shipping and East-West Trade from the Ten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SCCO*, 167–76.

NEEDHAM, J. 'Abstract of Material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History Commission at Beirut'. *SCCO*, 139–65.

ROCKHILL, W. W. '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s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XIVth century'. *T'oung Pao*, XVI (1915).

ROGERS, M. 'China and Islam—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 the Mashriq', *ITA*, 67–80.

SATO, K. 'On the Form of Maritime Trade and Commerce in the Near East and the Far East from the 20th to the 13th century C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Taipei, 1962.

SCANLON, G. T. 'Egypt and China: trade an imitation', *ITA*, 81–95.

SPULER, B. 'Trade in the Eastern Islamic Countries in the Early Centuries', *ITA*, 11–20. [910]

WANG GUNGWU, '"Public" and "Private" Overseas Trade in Chinese History', *SCCO*, 215–26.

VIII. 土耳其

CAHEN, C. *Pre-Ottoman Turkey*. London, 1968.
—— 'L' Alun avant Phocée, un chapitr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islamo-chétienne au temps des Croisades'. *Revu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LI (1963), 433-47.

[911]

第七章 1200年以前东欧的贸易和经济

下面是本书目中所使用的缩略语：

AESC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EcH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KHKM *Kwartalnik Historii Kultury Materialnej*
SSCI *Settimane di Studio del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 alto medioevo*
VI *Voprosy Istorii*

I. 导论

GIEYSZTOR, A. 'Les Structures économiques en pays slaves à l'aube du Moyen Age jusqu' au XIe siècle et l' échange monétaire.' *SSCI*, IX. Spoleto, 1961. 455-518.
—— 'Local Markets and Foreign Exchanges i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 before 1200.' *KHKM*, XIV (1966) (= *Ergon*, v), 761-77.
—— 'Villes et campagnes slaves du Xe au XIIIe siècle.' *Deu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Aix-en-Provance 1963*, Paris, 1965, II, 38-105.
GRIERSON, PH. 'Commerce in the Dark Ages.' *Trans.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 IX (1959), 123-43.
Istoriya kultury drevney Rusi, I, Moscow, 1948 (History of the Old Russian Civilisation). (Contributions by P. N. TRETYAKOV, B. A. RYBAKOV, N. N. VORONIN and B. A. ROMANOV.)
MANTEUFFEL, T. and GIEYSZTOR, A. (eds.). *L' Europe au IXe-XIe siècles. Aux origines des États nationaux.* Warsaw, 1968. (Contributions by H. BULIN, A. V. SOLOVIEV, H. ŁOWMIAŃSKI, R. KIERSNOWKSI.)
Słownik Starożytności Słowiańskich-Lexicon Antiquitatum Slavicarum. Summarium historiae, cultus humanitatis Slavorum. I-III (A-I), Wrocław, 1961-7. (Contributions by G. LABUDA, H. ZIOŁKOWSKA, A. GIEYSZTOR, WŁ. KOWALENKO, T. LEWICKI, T. WASILEWSKI, A. POPPE, H. CHŁOPOCKA and R. KIERSNOWSKI.)
Studien zu den Anfangen des europäischen Städtewesens. Reichenau-Vorträge, 1955-6.
Vorträge und Forschungen, ed. Th. Meyer, IV. Lindau-Konstanz, 1958. (Contributions by W. SCHLESINGER, B. SCHWINEKÖPER, H. JANKUHN, P. JOHANSEN and H. LUDAT.)
WIDERA, B. 'Waren-Geld Beziehungen, Silber- und Silberbergbau im frühen Mittelalter in Osteuropa im Lichte neuer Literatur.' *Jahrb.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II (1961), 321-31.

II. 8~12世纪中东欧的远程贸易

(1) 一般性著作

AGUS, I. A. *Urban Civilization in pre-Crusade Europe. A Study of Organized Town-life in Northwestern Europe during the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 based on the Response Literature.* 2 vols., Leiden, 1965.
BLAKE, R. P. 'The Circulation of Silver in the Moslem East down to the Mongol Epoch.'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II (1937), 291-328.
BLUMENKRANZ, B. *Juifs et chrétiens dans le monde occidental 430-1096.* Paris-The Hague, 1960.

BOLIN, S. 'Mohammed, Charlemagne and Ruric.'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 (1953), 5-29.

CAHEN, C. 'Quelques problèmes concernant l'expansion économique musulmane au haut Moyen Age.' *SSCI*, XII. Spoleto, 1965, 391-432.

CIPOLLA, C. 'Sans Mahomet, Charlemagne est inconcevable.' *AESC*, XVII (1962), 130-6.

DAVIDOVITCH, E. A. 'Gorod, remeslo i denezhnoe obrashchenie v sredney Azii perioda tak nazyvaemogo "serebrianogo krizisa" XI-XIII v.' (Town, craft and money circulation in middle Asia during the so-called silver crisis, XI-XIII centuries). [912]

Materialy Vtorogo soveshtchania arkeologov i etnografov sredney Azii. Moscow, 1959.

GRIERSON, P. 'The Monetary Reforms of Abd al-Malik." *J. Econ.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III (1960), 241-64.

HENSEL, W. *Słowiańszczyzna wczesnośredniowieczna. Zarys kultury materialnej* (The Slav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Outline of their material civilization), 3rd edn. Warsaw, 1965.

HIMLY, FR. 'Y a-t-il une emprise musulmane sur l'économie des états européens du VIIIe au Xe siècle?' *Rev. suisse d'histoire*, V (1955),

KIERSNOWSKI, R. *Pieniadz kruszcowy w Polsce wczesnośredniowiecznej* (Metallic money in early medieval Poland). Warsaw, 1960.

KUPFER, FR., and LEWICKI, T. (eds.). *Zródła hebrajskie do dziejów Słowian i niektórych innych ludów srodkowej i wschodniej Europy* (Hebrew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Slav nations). Wrocław, 1956.

LEWICKI, T. *Zródła arabskie do dziejów Słowiańszczyzny* (Arabic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Slavs), I. Wrocław, 1956.

—— 'Les Sources hebraïques consacrées à l'histoire de l'Europe centrale et orientale, et particulièrement à celle des pays slaves de la fin du IXe siècle au milieu du XIIIe siècle.'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II (1961), 228-41.

LIEBER, A. E. 'Easter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Medieval European Commerce.' *EcHR*, 2nd ser., XXI (1968), 230-43.

ŁOWMIAŃSKI, H. *Podstawygorspodarcze formowania się państw słowiańskich* (Economic basis of Slavonic states). Warsaw, 1953.

—— 'La Génèse des états slaves et ses bases sociales et économiques.' *La Pologne au 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à Rome*, Warsaw, 1955, 29-53.

Mezhdunarodnyie svyazi Rossii do XVII v. (Russia's international ties up to the 17th century). Moscow, 1961. (Contributions by B. N ZAKHODER. M. V. FEKHNER, J. A. LIMONOV, A. V. FLOROVSKY and V. M. POTIN.)

NOVOSELTZEV, A. P. and PASHUTO, V. T. *Vneshnaya torgovlya drevney Rusi (do serediny* XIII v.) (Foreign trade of old Russia until the mid-13th century), *Istoriya SSSP*, v. 3 (1967), 81-107.

SZTETYŁŁO, J. 'Handel a wymiana. Z problemów spornych ekonomiki starożytnej i wczesnośredniowiecznej.' (Trade and exchanges. Some controversial problems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economy). *KHKM*, IX (1961), 809-18.

WATSON, A. M. 'Back to Gold-and Silver.' *EcHR*, 2nd ser., XX (1967), 1-34.

(2) 斯堪的纳维亚和中亚之间的东欧

ARTAMONOV, M. I. *Istoriya Khazar* (History of the Khazars). Leningrad, 1962.

BIRNBAUM, H. 'An Old Russian and Old Scandinavian Legal Language.' *Scando-Slavica*, VIII (1962), 115-40.

HRBEK, J. 'Vývoj a dnésni stav studiů arabských prámenů o slovanstvu' (Past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tate of studies on Arabic sources about the Slavs). *Vznik a počatký slovanů* (Prague), V (1964), 26-95.

LEWICKI, T. 'Il commercio arabo con la Russia e con i paesi slavi d'Occidente nei secoli IX-XI.' *Annali dell'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di Napoli*, N. S. VIII (1959), 47-61.

—— 'O cenach neiktórych towarów na rynkach wschodniej Europy w IX-XI w' (Prices of certain goods in East European markets in the 9th-11th centuries). *KHKM*, V (1953), 113-32.

Łowmiański, H. *Zagadnienie roli Normanów w genezie państw słowianskich* (Problem of the Norman role in the origins of the Slav states). Warsaw, 1957.

—— 'Critique de la théorie de l' origine normande des états slaves.'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Milan, 1957, I, 149.

Markov, A. *Topografiya kladov vostoc nykh monet* (*sasanidskikh i kufitcheskikh*) (Topography of eastern(Sassanid and kufic) coin hoards). St Petersburg, 1910.

Minorsky, V. F. *Istoriya Sirvana i Derbenta X-XII vv* (History of Shirvan and Derbent). Moscow, [913] 1963.

Sawyer, P. H. *The Age of the Vikings.* London, 1962.

Zajączkowski, A. 'Khazarian and its inheritor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ae*, xii(1961), 299-307.

(3) 地中海地区的斯拉夫奴隶

Hoffman, J. 'Die östliche Adriaküste als Hauptnachschubbasis für den venezianischen Sklavenhandel bis zum Ausgang des ii. Jh.'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lv (1968), 165-81.

Lewicki, T. 'Osadnictwo slowianskie i niewolnicy slowianscy w karjach muzulmanskich wedlug średniowiecznych pisarzy arabskich' (Slavonic settlements and Slavonic slaves in the Muslim countries in medieval Arabic writings). *Przegląd Historyczny, Warszawa*, xliii (1952), 473-91.

Verlinden, *C. L' Esclavage dans l' Europe médiévale.* i, *Péninsule Ibérique-France.* Bruges, 1955.

(4) 拜占庭的召唤

Antoniadis-Bibicou, H. *Recherches sur les douanes à Byzance. L'* octava, *le* kommerkion *et les commerciaires.* Paris, 1963.

Dujcev, I. 'Rapporti economici fra Bisanzio e gli Slavi.' *Bollettino dell' 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il Medioevo*, lxxvi(1964), 1-30.

Grierson, P. H. 'Byzantine Coinage as Source Material.' *Thi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Byzantine Studies. Main Papers*, x. Oxford, 1966.

Kropotkin, V. V. *Klady vizantiyskikh monet na territorii SSSR* (Hoards of Byzantine coins in USSR territory). Moscow, 1962.

Levtchenko, V. M. *Otcherki po istorii russkovizantiyskikh otnoshenii*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Byzantino-Russian relations). Moscow, 1956.

Litavrin, G. G., Kazhdan, A. P. and Udaltsova, Z. V. 'Otnosheniya drevney Rusi i Vizantii v xi-pervoy polovine xiii v' (Contacts of old Russia with Byzantium, 11th-mid-13th century). *Thi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Byzantine Studies, Main Papers*, iii. Oxford, 1966.

Pošvar, J. 'Die byzantinische Wahrung und das grossmährische Reich.' *Byzantinoslavica*, xxvi, 2 (1965), 308-17.

Stender-Peterson, A. 'Das Problem der ältesten byzantinisch-russisch-nordischen Beziehungen.'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Relazioni*, iii. Florence, 1955, 165-88.

(5) 巴尔干贸易和斯拉夫民族

Arbmann, H. *Schweden und das karolingische Reich. Studien zu den Handelsverbindungen der 9. Jh.* Stockholm, 1957.

Christiansen, A. E. 'Scandinavia and the Advance of the Hanseatics.'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58), 89-117. *IX-XI in Suecia repertis.* Stockholm, 1961. *Commentationes de nummis saeculorum.*

Hoffmeister, A. *Der Kampf um die Ostsee vom 9. bis 12. Jh.*, 3rd edn. Lübeck, 1960.

Jankuhn, H. *Haithhabu. Ein Handelsplatz der Wikinger.* 4th edn, Neumünster, 1963.

Johansen, P. 'Novogorod und die Hanse.' *Städtewesen und Bürgertum als geschichtliche Kräfte. Gedächtnisschrift für F. Rörig.* Lübeck, 1953.

Kmietowicz, F. 'Drogi napływu srebra arabskiego na południowe wybrzeza Bałtyku i przynależnośc

etniczna jego nosicieli' (The routes of the flow of Arabic silver to the southern coast of the Baltic and the nationalities of its carriers). *Wiadomości Numizmatyczne*, XII (1968), 65-86.

LABUDA, G. *Zródła skandynawskie i anglosaskie do dziejów Słowiańszczyzyzny.* Excerpta e fontibus gentium septentrionalium atque Anglo-Saxonum. Warsaw, 1961.

LEWICKI, T. 'Ecrivains arabes du IXe au XVIe s. traitant de l'ambre jaune de la Baltique et de son importation en pays arabes.' *Folia Orientalia*, IV (1962), 1-40. [914]

LEWIS, A. *The Northern Seas. Shipping and commerce in northern Europe A. D. 300-1100.* Princeton, 1958.

MAŁOWIST, M. 'Z problematyki dziejów gospodarczych strefy bałtyckiej' (Some problems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Baltic zone). *Roczniki Dziejow Spolecznych i Gospodar Lizych*, X (1948), 81-120.

SLASKI, K. 'Ekonomitcheskiye otnosheniya zapadnykh Slavyan so Skandinavyey i drugimi pribaltiyaskimi zemlami v - XI vekach' (Economic contacts of western Slavs with Scandinavia and other Baltic countries in 6th-11th centuries). *Skandinavskiy Sbornik*, VI (1963), Tallin, 61-93.

STENBERGER, M. *Die Schatzfunde Gotlands der Wikingerzeit*, I-II, Stockholm, 1958.

ŻAK, A. *Studia nad kontaktami handlowymi społeczenstw zachodnio-słowianskich ze skandynawskimi od XI do XIII w. n. e.* (Studies on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West Slavs and Scandinavia from the 11th to 13th centuries). Poznan, 1964.

ZBIERSKI, A. *Port gdański w X-XIII wieku* (The port of Gdańsk in the 10th-13th centuries). Gdańsk, 1964.

ZIÓŁKOWSKA, H. 'Pomorze a handel bałtycki w okresie wczesno-sredniowiecznym' (Pomerania and the Baltic trad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Przegląd Zachodni*, 1-2 (1951), 45-52.

(6) 斯拉夫与西欧之间的陆上贸易

ALBRECHT, G. *Das Münzwesen im niederlothringischen und friesischen Raum vom 10. bis zum beginnenden 12.* Jh. Hamburg, 1959.

ALEKSANDROWICZ, St. 'Stosunki handlowe polsko-ruskie do roku 1240' (Commercial ties between Poland and Russia until 1240). *Zeszyty Naukowe Uniwersytetu A. Mickiewicza, Historia*, 3 (1958), 21-67.

FLOROVSKY, A. V. *Tchekhi i vostotchnyie slavyane* (Czechs and East Slavs), I Prague, 1935.

La Grande Moravie. Tradition millénaire de l'état et de la civilisation. Prague, 1963 (Contribution by J. POAULIK).

LÁSZLÓ, G. 'A magyar penzyeres kezdebreiröl' (Origins of the Hungarian mint). *Szdzadok*, 97 (1963), 382-97.

LEWICKI, T. *Polska i kraje sąsiednie w świetle Ksiegi Rogera geografa arabskiego* (Poland and its neighbours in Roger's book of the 12th-century Arabic geographer, al-Idrizi), I, Cracow, 1945; II, Cracow, 1954.

——'Znaczenie handlowe Drohiczyna nad Bugiem we wczesnym średniowieczu i zagadkowe plomby ołowiane znalezione w tej miejscowości' (Commercial importance of Drohiczyn on the Bug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lead seals found in this locality). *KHKM*, IV (1956).

——'Certaines routes commerciales de la Hongrie du haut Moyen Age.' *Slavia Antique*, XIV (1967), 15-29.

ŁOWMIANSKI, H.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Early Feudal Polish State.'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III (1960), 7-40.

MORRISON, K. F. 'Numismatics and Carolingian Trade. A Critique of the Evidence.' *Speculum*, XXXVIII (1963), 403-32.

SKALSKY, G. 'Česky obchod 10. a 11. stolêti ve svêtle nalezů minci' (Czech trade in the 10th and 11th centuries and the coin-finds). *Numismatický Sbornik*, Prague, I (1953), 13-42.

SZEKELY, G. 'Wallons et Italiens en Europe centrale aux XIe-XVIe s.' *Annales Universitatis Budapestinae*, VI (1964), 3-71.

Szymański, W. *Kontakty handlowe Wielkopolski w IX-XI wieku*(Commercial contacts of Great Poland in the 9th-11th centuries). Poznan, 1958.

Timme, F. 'Schessel an der Wümme und das Diedenhoferer Capitulare vom Jahre 805. Zur Frage nach Lage und Aufgaben der karolingischen Grenzkontrollorte von der Elbe bis zum Donau.' *Blätter fur deutsche Landesgeschichte*, c(1964), 122-44.

Wallace-Hadrill, J. M. (ed.). *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le of Fredegar with its continuations.* London, 1960.

[915] Warnke, C. *Die Anfänge des Fernhandels in Polen 900-1025.* Würzburg, 1964.

Widera, B. 'Wirtschaftlich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der Kiever Rus,' *Zeitschrift fur Geschichtsu issenschaft*, I(1954), 5-22.

III. 8~12世纪中东欧地方集市和手工制品生产

Aristov, N. *Promyschlennost' Drevney Rusi*(Crafts in Old Russia). St Petersburg, 1866.

'L'Artisanat et la vie urbaine en Pologne medievale.' *Ergon*, III(1961), fasc. suppl. *KHKM*, X. (Contributions by A. Gieysztor, W. Hensel, G. Labuda, K. Tymieniecki, H. Ziolkowska, T. Lalik and others.)

Brankačk, J. *Studien zur Wirtschaft und Sozialstruktur der Westslawen zwischen Elbe, Saale und Oder aus der Zeit vom 9. bis zum 12. Jh.* Bautzen, 1964.

Danilova, L. V. and Pashuto, V. T. 'Tovarnoe proizvodstvo na Rusi(do XVII v.)' (Commodity production in Russia until the 17th century). *Voprosy is storii*, I(1954), 121-7.

Francastel, P. (ed.) *Les Origines des villes polonaises.* Paris-The Hague, 1960.

Gieysztor, A. 'Aux origines de la ville slave: ville de grands, ville d'état aux IXe-XIe siècles.' *Cahiers Bruxellois.* XII(1967). 97-106.

——'From Forum to Civitas: Urban Changes in Poland in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 *La Pologne au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à Varsovie*, Warsaw, 1965.

Goroda feodalnoy Rossii. Sbornik statey pamyati N. V. Ustiugova (Towns of the feudal Russia. Studies in honour of N. V. Ustiugov). Moscow, 1966(Contributions by A. L. Khoroshkevitch, V. K. Yatsunskiy and V. T. Pashuto.)

Hołubowicz, W. *Opole w wiekach X-XII*(Opole in the 10th-12th centuries). Katowice, 1956.

Jakobson, A. L. *Srednevekovy Krym*(Medieval Crimea). Moscow-Leningrad, 1964.

Kaminska, J. and Nahlik, A. *Włokiennictwo gdańskie w X-XIII w.* (Textile production in Gdańsk, 10th-13th centuries). Łódź, 1958.

Karger, M. K. *Drevniy Kiev*(Old Kiev), I-II. Moscow-Leningrad, 1958.

Kiersnowski, R. 'Coin finds and the Problem of Money Hoarding in the Early Medieval Poland.' *Polish Numismatic News*(1961), 67-90.

——*Wstep do numizmatyki polskiej* (Introduction to Polish Medieval Numismatics). Warsaw, 1964.

Korzukhina, G. F. *Russkiye klady IX-XIII v. v*(Russian hoards in the 9th-13th centuries). Moscow-Leningrad, 1954.

Kostrzewski, J. *Kultura prapolska*(Proto-Polish civilization), 3rd edn. Warsaw, 1962.

Kulisher, M. *Istoria russkoy torgovli*(History of Russian trade). St Petersburg, 1923.

Kultura drevney Rusi(Civilization of Old Russia. Studies in honour of N. N. Voronin). Moscow, 1966. (Contributions by A. V. Arcikhovskiy, T. N. Nikolskaya and G. V. Fedorov.)

Leciejewicz, L. *Miasta Słowian północnopołabskich* (Towns of the North Elbe Slavs). Warsaw, 1968.

Mikhalevsky, F. I. *Otcherki istorii deneg i denezhnogo obrachtcheniya*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money and money circulation), I. Moscow, 1947.

Modzelewski, K. 'La Division autarchique du travail à l'échelle d'un état: l'organisation *ministériale* en Pologne médiévale.' *AESC*, XXII(1964), 1125.

Poppe, A. *Materiały do słownika terminów budownictwa staroruskiego*(Materials for a Dictionary of Old Russian Building-terms). Wrocław, 1962.

——*Materiały do dziejów tkaniny staroruskiej. Terminologia źrodeł pisanych*(Materials for the history of Old Russian textiles. Terminology of written sources). Wrocław,1965.

POTIN,V. M.'Nekotorye voprosy torgovli drevnej Rusi po numizmatičeskim dannym'(Some Problems of the Ancient Russian Trade in the light of numismatic evidence). *Vestnik Istorii Mirovoy Kultury*. no. 4(1961),67-79.

RABINOVITCH,M. G.'Iz istorii gorodskikh poselenii vostotchnykh Slavyan'(On the history of urban settlements of eastern Slavs). *Istoriya, kultura, folklor i etnografiya slavyanskikh norodov*, VII. *Mezhdunarodny syezd slavistov*. Moscow,1968,130-48. [916]

RAPPORPORT,P. A.'Die altrussische Burgwälle.' *Zeitschrift für Archaelogie*,I(1967),61-87.

——'O tipologii drevnerusskikh poselenii'(On the typology of old Russian settlements). *Kratkiye soobshchtcheniya Instituta Archaeologii*, AN SSSR, CX(1967),3-9.

RYBAKOV,B. A. *Remeslo drevney Rusi*(Crafts in Old Russia). Moscow,1948.

SPITSYN,A. *Torgovyye puti Kievskoy Rusi*(Trade roads of Kievan Russia). St Petersburg,1911.

STĚPKOVA,J.'Über das Wesen und die Funktion der Dirhambruchstücke.' *Charisteria Orientalia* (1956),329-35.

STRUVE,K. V.'Die baltischen Burgen in Wagrien.' *Offa*, XVII/XVIII(1959/61),57-108.

SUCHODOLSKI,S. '*Renovatio monetae* in Poland in the 12th century.' *Polish Numismatic News* (1961),57-71.

SZTETYŁŁO,J.'Czeski i morawski pieniadz pozakruszcowy wczesnego średniowiecza'(Czech and Moravian non-metallic mone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KHKM*, XI(1963),505-20.

TABACZYNSKI,S.'Quelques aspects principaux de la circulation monétaire dans les villes polonaises du haut Moyen Age.' *Archeológia Polona*, VII(1964),165-79.

——'Les Fonctions pécuniaires des trésors.' *AESC*, XVII.II(1962),223-31.

TIKHOMIROV,M. N. *Drevnerusskiye goroda*(Old Russian Towns),2nd edn. Moscow,1956.

VORONIN,N. N. and RAPPOPORT, P. A.'Arkheologitcheskiye izutcheniya drevnorusskogo goroda'(Archeological studies on the old Russian towns). *Kratkyie soobshchtcheniya Instiuta Archeologii*, AN SSSR, XCVI(1963),3-17.

WIDERA,B.'Novgorods Beziehungen zu Ural und Westsibirien in der Vorhansezeit.' *Hansische Studien. Festschrift H. Spromberg*. Berlin,1967,388-89.

YANIN,V. L. *Denezhno-vesovyie sistemy russkogo srednevekovya. Domongolskiy period*(Coins and weight systems of the Russian Middle Ages. Pre-Mongol period). Moscow,1956.

——'Les Problèmes généraux de l'échange monétaire russe en IXe-XIIe siècle.' *SSCI*, VIII. Spoleto,1961,485-509. [917]

第八章　中世纪晚期的东欧贸易

下面是本书目中的缩略语：

HGbl Hansische Geschichtsblätter

I. 波希米亚

AHLHORN,J.'Die Nürnberger Fernkaufleute Markus und Matthäus Landauer und deren Handelsbeziehungen zum Osten im 15. Jahrhundert.' *Zeitschrift f. Ostforschung*, XIX,2(1970),303-21.

AMMANN,H.'Deutschland und die Tuchindustrie Nordwestdeutschlands im Mittelalter.' *HGbl*, LXXII (1954).

BACHMANN,A. *Geschichte Böhmens*. 2 vols., Brünn,1899-1903.

BASTIAN,F. *Das Runtingerbuch* 1383-1407 *und verwandtes Material zum Regensburger-Südostdeutschen Handel und Münzwesen*. 3 vols. Deutsche Handelsakten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Neuzeit, VI-VIII. Regensburg,1935-44.

BRETHOLZ,B. *Geschichte der Stadt Brünn*. Brünn,1911.

CASTELIN, K. *Česka drobna mince doby předhusitské a husitské 1300–1471* (Bohemian small coins before and during the Hussite period). Prague, 1953.

Dejiny Slovenska (The History of Slovakia). Bratislava, 1961.

FLOROVSKI, A. V. *Česke sukno na vychodoevropskym trhu v XIV až XVIII véku* (Bohemian cloth on the east European markets from the 14th to the 18th centuries). Prague, 1947.

——*Česko-ruske obchodni strky v minulosti X–XVIII stoleti* (Bohemian trade with Russia in the past: from the 10th to the 18th centuries). Prague, 1954.

GRAUS, F. *Chudina městska v době předhusitske* (Poor people in Bohemian cities in the pre-Hussite period). Prague, 1949.

——*Česky obchod se suknem ve 14 a počatkem 15 stoleti* (Bohemian cloth trade in the 14th and beginning of the 15th century). Prague, 1950.

——*Dejiny venkovského lidu v Čechach v době předhusitske* (The history of the peasants in Bohemia before the Hussite period). Prague, 1957.

——'Die Handelsbeziehungen Böhmens zu Deutschland und Österreich im 14 und zu Beginn des 15. Jahrhunderts.' *Historica* (Prague). II (1960).

JANAČEK, J, *Dejiny obchodu v předbelohorske Praze* (The Trade of Prague in the period before the battle of Bela Hóra). Prague, 1961.

——*Remeslna vyroba v českych městech v* 16 *stoleti* (Crafts in Bohemian cities in the 16th century). Prague, 1961.

——'Der böhmische Aussenhandel in der zweite Hälfte des 15. Jahrhunderts.' *Historica* (Prague), IV (1962).

JURITSCH, G. *Handel und Handelsrecht in Böhmen bis zur hussitischen Revolution.* Leipzig–Vienna, 1907.

KAVKA, F. 'Česky a slovensky obchod s textilnimi vyrobky v rumunskych zemich' (Bohemian and Slovakian cloth trade in Romania). *Sbornik Historicky* (Prague), V (1957).

KORAN, J. *Dejiny dolování v rudnim okrsku Kutnohorském* (The history of mining in the Kuttenberg basin). Prague, 1950.

——*Přehledne dejiny československeho hornictvi*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Czechoslovakian mining). Prague, 1955.

LEMINGER, E. *Královská mincovná v Kutné Horé* (The Royal Mint in Kuttenberg). Prague, 1912.

LIPPERT, J. *Sozialgeschichte Böhmens in vorhussitischer Zeit ausschliesslich aus Quellen*, 2 vols. Prague–Vienna–Leipzig, 1896–8.

MACEK, J. *Tabor v husitském revolucnim hnuti* (Tabor during the Hussite revolution), 2 vols. Prague, 1952–3. [918]

MAJER, J. *Težba cinu ve Slovenskom Lese v* 16 *stoleti* (Tin exploitation in the region of Slovensky Les in the 16th century). Prague, 1970.

MAYER, T. *Der auswärtige Handel des Herzogtums Österreich im Mittelalter.* Innsbruck, 1909.

MENDL, B. *Vývoj remesel a obchodu v městech prazskych* (The development of crafts and trade in the cities of Prague). Prague, 1947.

MIKA, A. 'Feodalni velkostatek v jižnich Čechach (XIV-XVII stoleti)' (The great estate in southern Bohemia in the 14th–17th centuries). *Sbornik Historicky*, I, 1953.

——'Česke rybnikařstvi a problem počatku akumulace kapitalu v českych zemich' (Boheumian fishing and the question of primary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Bohemia). *Česky Časopis Historický*, II (1954).

Přehled Československých Dějin (Outline of Czechoslovakian history). Prague, 1958.

REINCKE, H. 'Machtpolitik und Wirtschaftspläne Kaiser Karls IV.' *HGbl*, XLIX (1924).

SCHENK, H. *Nürnberg und Prag.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Handelsbeziehungen im 14. und 15. Jahrhundert.* Wiesbaden, 1968.

SCHULTE, A.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lichen Handels und Verkehrs zwischen Westdeutschland und*

Italien mit Ausschlus von Venedig. Leipzig, 1900.

SIMONSFELD, H. *Der Fondacho dei Tedeschi in Venedig und die deutsch-venetianische Handelsbeziehungen.* Stuttgart, 1887.

SKALSKY, G. *Strucny přehled vyvoje českeho mincovnictvi*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Bohemian minting). Prague, 1937.

VON STROMER, W. *Oberdeutsche Handelsfinanz (1350–1450)*, I. Wiesbaden, 1970.

WERUNSKY, E. *Dějiny řemesel a obchodu v Čechnach v XIV–XV stoleti* (The history of crafts and trade in Bohemia in the 14th–15th centuries). Prague, 1906.

VLACHOVIČ, J. *Slovenska méd v XVI a XVII storoci* (Slovakian copper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Bratislava, 1966.

II. 波兰

AHNSEL, K. O. *Thorns Seehandel und Kaufmannschaft um 1370.* Marburg on Lahn, 1961.

AMMANN, H. 'Wirtschaftsbeziehungen zwischen Oberdeutschland und Polen im Mittelalter.'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VIII, 4 (1961). 433–43.

ASSMANN, E. *Stettins Seehandel und Seeschiffahrt im Mittelalter.* Kitzingen on Main, 1950.

AUBIN, H. *Geschichte Schlesiens*, I. Breslau, 1938.

BISKUP, M. *Zjednoczenie Pomorza Wschodniego z Polska w polowie XV wieku* (Poland's union with eastern Pomerania in the middle of the 15th century). Warsaw, 1959.

—— 'Handel wislany w latach 1454–1466' (Trade on the Vistula in 1454–66). *Roczniki Dziejow Społecznych i Gospodarczych* (Annal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Poznan), XIV (1953).

BOGUCKA, M. *Gdańsk jako ośrodek produkcyjny XIV–XVII w.* (Danzig- centre of industry in the 14th–17th centuries). Warsaw, 1962.

BÖHNKE, W. 'Der Binnenhandel des Deutschen Ordens in Preussen und seine Beziehungen zum Aussenhandel um 1400.' *HGbl*, LXXX (1962).

GHAREWICZOWA, L. *Handel średniowiecznego Lwowa* (The trade of Lvov (Lemberg) in the Middle Ages). Lwów/Lvov, 1925.

D'OLIVEIRA, MARQUES. *Hansa e Portugal na idade media.* Lisbon, 1959.

ENGEL, E. and ZIENTARA, B. *Feudalstruktur, Lehn–Bürgertum und Fernhandel im spätmittelalterlichen Brandenburg.* Weimar, 1968.

GIEYSZTORAWA, I. 'Research into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Poland.' *Acta Polaniae Historica*, XVIII (1968), 49–68.

GUMOWSKI, M. *Handbuch der polnischen Numismatik.* Graz, 1960.

HERBST, ST. *Toruńskie cechy rzemieślnicze* (The craft corporations of Toruń). Thorn/Toruń, 1933.

HIRSCH, T. *Handels- und Gewerbsgeschichte Danzigs unter der Herrschaft des Deutschen Ordens.* Leipzig, 1858.

[919]

Historia Ślaska (The History of Silesia). 2 vols. Wrocław/Breslau, 1961.

HOSZOWSKI. S. 'The Polish Baltic Trade in the 15th–18th Centuries.' *Polan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in Stockholm 1960.* Warsaw, 1960, 117–55.

KEHN, W. *Der Handel im Oderraum im 13. und 14. Jhrdt.* Cologne–Graz, 1968.

KIERSNOWSKI, R. *Wstep do numizmatyki polskiej wieków średnich* (Introduction to Polish numismatics in the Middle Ages). Warsaw, 1964.

KOCZY, L. *Handel Poznania do Polowy XVI wieku* (The trade of Poznań to the middle of the 16th century). Poznań, 1930.

KUTRZEBA, S. 'Handel Krakowa w wiekach średnich' (The trade of Cracow in the Middle Ages). *Rozprawy Polskiej Akademii Umiejętności* (Transactions of the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Cracow), XLIV (1903).

—— 'Handel Polski ze wschodem w wiekach średnich' (Poland's trade with the East in the Middle Ages). *Przeglad Polski* (Polish Review), 148–50, Lwów (1903).

KUTRZEBA, S. and PTAŚNIK, J. 'Dzieje handlu i kupiectwa krakowskiego' (The History of the Cracow

merchants). *Rocznik Krakowski*(Cracow's Annals), XIV(1910).

LABUDY, G. (ed.). *Historia Pomorza*(History of Pomerania), I. Poznań, 1969.

ŁADOGORSKI, T. *Studia nad zaludnieniem Polski XIV w.*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Poland's population in the 14th century). Wrocław/Breslau, 1958.

LOEWE, K. 'Commerce and Agriculture in Lithuania, 1400–160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 ser. XXVI(1973).

MALECZYYŃSKI, K. (ed.). *Dzieje Wrocławia*(History of Wrocław), I. Wrocław/Breslau, 1948.

MAŁOWIST, M. *Kaffa – kolonia genueńska na Krymie i problem wschodni w latach 1453 – 1475* (Caffa – Genoese colony in the Crime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in 1453–1475). Warsaw, 1947.

——*Studia z dziejów rzemisła w okresie kryzysu feudalizmu w Zachodniej Europie w XIV i XV wieku*(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rafts during the crisis of feudalism in the 14th and 15th centuries). Warsaw, 1954.

——*Wschód a Zachód Europy w XIII–XVI wieku*(Eastern Europe and the West in the 13th–16th centuries). Warsaw, 1973.

——'Le Développement des rapports économiques entre la Flandre, la Pologne et les pays limitrophes du XIIIe au XIXe s.'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X(1931).

——'Podstawy gospodarcze przywrocenia jednosci państwowej Pomorza Gdańskiego z Polskç w XIV wieku' (The economic premises of Poland's union with eastern Pomeranian in the 15th century). *Przeglad Historyczny*(Warsaw), XLV(1954)).

——'Über die Frage der Handelspolitik des Adels in den Ostseeländern in 15. und 16. Jahrh.' *HGbl*, LXXV(1957).

——'Groissance et régression en Europe XIVe–XVIIe siècles. Recueil d'articlees.' *Cahiers des Annales*, XXXIV(1972).

MAÇZAK, A. *Sukiennictwo wielkopolskie w XIV–XVII wieku*(The woollen industry of Great Poland, 14th–17th centuries). Warsaw, 1955.

MASCHKE, E. *Die Schäffer und Lieger des Deutschen Ordens in Preussen.* Hamburg, 1966.

MENDL, B. 'Breslau zu Beginn des 15. Jahrhunderts.' *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ur Geschichte Schlesiens*(Breslau), LXIII(1929).

MOLENDA, D. *Górnictwo kruszcowe na terenie złóz ślasko-krakowskich do połowy XVI w.* (Metal mining in the Silesia–Cracow region). Wrocław, 1963.

NISTOR, J. *Die auswärtigen Handelsbeziehungen der Moldau im XIV, XV und XVI Jahrh.* Gotha, 1911.

PELC, J. *Ceny w Krakowie w latach 1369–1600*(Prices in Gracow 1369–1600). Lwów, 1935.

POSTHUMUS, N. W. *De Oosterse Handel te Amsterdam* (The Baltic trade in Amsterdam). Leiden, 1953.

PTAŚNIK, J, *Italia Mercatoria apud Polonos saeculo XV ineunte.* Rome, 1910.

——*Miasta i mieszczaństwo w dawnej Polsce*(Towns and townspeople in the old Poland), 2nd edn. Warsaw 1949.

——*Kultura włoska wieków średnich w Polsce*(Italian culture in medieval Poland), 2nd edn. Warsaw, 1959. [920]

RENKEN, F. *Der Handel der Königsberger Grossschäfferei des Deutschen Ordens mit Flandern.* Weimar, 1937.

SAMSONOWICZ, H.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Danziger Bürgerkapital in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15. Jahrhunderts.* Weimar, 1969.

——'Handel zagraniczny Gdańska w drugiej połowie XV wieku' (Danzig's foreign trad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5th century). *Przeglad Historyczny* (Historical Review, Warsaw), LIII (1962/4), 695–715.

——'Über Fragen des Landhandels Polens mit Westeuropa im 15/16 Jahrhundert.' *Neue Hansische Studien*, Berlin, 1970.

——'Recherches polonaises sur l'histoire de la Baltique au déclin du Moyen Age (XIVe–XVe siècle).' *Acta Poloniae Historica*(Warsaw), XXIII(1971), 150–61.

SATTLER, C. *Handelsrechnungen des Deutschen Ordens.* Leipzig, 1887.

SCHIMSCH, A. *Die Handelsbeziehungen zwischen Nürnberg und Posen im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verkehr des 15. und 16. Jahrhundert.* Wiesbaden, 1970.

SCHIPPER, J. *Studia nad stosunkami gospodarczymi Żydów w Polsce podczas wieków średnich*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Jews in Poland in the Middle Ages). Lwów, 1911.

SCHOLZ-BABISCH, M. 'Oberdeutscher Handel mit dem deutschen und polnischen Oster nach Geschäftsbriefen von 1444.' *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ür Geschichte und Alterthum Schlesiens* (Breslau), LXIV(1908).

TOPOLSKI, J. *Rola Gniezna w handlu europejskim od XV do SVII w.* (The city of Gnesen in European trade from the 15th to the 17th centuries). Poznań, 1962.

TOPOLSKI, J. (ed.). *Dzieje Wielkopolski*(History of Great Poland). Poznań, 1969.

WAWRZYŃCZYK, A. *Studia z dziejów handlu Polski z Wielkim Księstwem Litewskim i Rosja w XVI wieku*(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Poland's trade with the Great Duchy of Lithuania and with Russia in the 16th century). Warsaw, 1956.

WENDT, H. *Schlesien und der Orient.* Darstellungen und Quellen zur Schlesischen Geschichte, XXII. Breslau, 1916.

WYROBISZ, A. *Szkło w Polsce od XIV do XVII wieku*(The glass industry in Poland from the 14th to the 17th centuries). Wrocław, 1968.

WYROZUMSKI, J. *Państwowa gospodarka solna w Polsce do schyłku XIV w.* (Polish state economy in the salt mines until the end of the 14th century). Cracow, 1968.

——*Tkactwo małopolskie w późnym średniowieczu*(The woollen industry in Little Po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Cracow, 1972.

Zarys dziejów górnictwa na ziemiach polskich(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mining in the Polish territories), I, Katowice, 1960.

ZIENTARA, B. *Dzieje małopolskiego hutnictwa żelaznego XIV–XVII wieku*(The history of iron smelting in Little Poland 14th–17th centuries). Warsaw, 1954.

——'Rola Szczecina w odrzańskim i bałtychim handlu zbożem w XIII i XIV wieku' (Stettin in the corn trade on the Oder and in the Baltic zone). *Przeglad Historyczny*, LII(1961).

III. 俄罗斯和立沃尼亚

AHVENAINEN, J. *Der Getreidehandel Livlands im Mittelalter.* Helsinki, 1963.

ALEKSEYEV, YA. G. *Agrarnaya i sotsialnaya istorya severo-vostotchnoy Rusi v XV–XVI vv. Pereyaslavski Uyezd*(Agrarian and social history of north-western Russia in the 15th–16th century. The District of Pereyaslavl). Isdatels tvo Nauka, Moscow–Leningrad, 1966.

AMBURGER, E. 'Zur Geschichte des Grosshandels in Russland: die Gosti.' *Zeitschrift f.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VI(1959).

ARTSIKHOVSKI, A. V. *Arkheologitscheskye izutchenye V. Novgoroda*(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Novgorod the Great). Moscow, 1956.

BAHRUSHIN, S. V. *Vautchnye Trudy*(Historical Researches). I: *Otcherki po istorii remesla, torgovli i gorodov Russkogo Centralizovannogo Gosudarstva XVI– natchala XVII vv.*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rafts, trade and cities in the Russian Centralized State in the 16th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17th centuries). Moscow, 1952. II: *Stati po ekonomitcheskoy, sotsialnoy i polititcheskoy istorii Russkogo Centralizovannogo Gosudarstva XV–XVII vv.* (Studies on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Russian Centralized State). Moscow, 1954. III: *Izbrannye raboty po istorii Sibiri v XVI–XVII vv.* (Selected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Siberia in the 16th–17th centuries). Moscow, 1955. [921]

BERINDEI, M. and VIENSTEIN, G. 'La Tana–Azaq de la présence italienne à l'emprise ottomane(fin du XIIIe–milieu du XVIe siècle).' *Turcica*(Paris-Strasbourg) VIII/2(1976), 110–201.

BERNADSKI, V. N. *Novgorod i Novgorodskaya Zemla v XV veke*(Novgorod and its territory in the 15th century). Leningrad, 1958.

DANILOVA, L. V. *Otcherki po istorii zemlevladenya i khozyaystva Novgoroda i Novgorodskoy zemli v XIV i XV vv.* (Studies in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Novgorod and its territory). Moscow, 1955.

DOVNAR ZAPOLSKI, U. M. *Torgovla i promyshlennost Moskvi v XVI i XVII veke* (Trade and industry in Moscow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Moscow, 1910.

FEDOROV, G. B. *Dengi Moskovskogo Knyazhestva vremery Dimitrya Donskoyste i Vasylya Dimit-ryevitcha (1359-1425)* (The mints of the Moscow Principality during the reign of Dimitri Donskoy and Vasili Dimitryevitch (1359-1425)). Moscow-Leningrad, 1949.

FEHNER, M. V. *Torgovla Russkogo Gosudarstva so stranami Vostoka v XVI veke* (Russian trade with the East in the 16th century). Moscow, 1956.

GOEHRKE, C. *Die Wüstungen in der Moskauer Rus. Studium zur Siedlunds- Bevolkerungsund Sozial-geschichte.* Wiesbaden, 1968.

GOETZ, L. K. *Deutsch-russische Handels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Lübeck, 1922.

Goroda feodalnoy Rosii. Sbornik Statey (The cities of feudal Russi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Moscow, 1966.

GORSKI, A. D. *Otcherki ekonomitcheskago polozhenya krestyan severo-vostotchnoy Rusi v XIV-XV vv* (Essays on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peasants in north-eastern Russia in the 14th-15th centuries). Moscow, 1960.

GREKOV, B. D. *Krestyanye na Rusi s drevneyshikh vremen do XVII veka* (Russian peasants since the earliest times up to the 17th century). Moscow-Leningrad, 1945.

GREKOV, B. D. and YAKUBOVSKI, YA. *La Horde d'or. La Domination tatare au XIIIe et au XIVe siècle de la Mer Noire.* Paris, 1939.

Istorya Sibiri (The History of Siberia). 2 vols, Leningrad, 1968.

JOHANSEN, P. 'Novgorod und die Hanse.' *Gedächtnisschrift für F. Rörig.* Lübeck, 1953.

——*Der hansische Russlandhandel, insbesondere nach Novgorod, in kritischer Betrachtung.* Cologne-Opladen, 1962.

KHOROSHKEVITCH, A. L. *Dogovory Polotska 1405-1406 kak istotchniki po istorii yego vneshney torgovli i torgovoy politiki* (The treaties of Polotsk 1405-1406 as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its internal and foreign trade). Arkheologitcheski Ezhegodnik za 1962 god. (Archeological Annals, 1962). Moscow, 1963.

——*Torgovla Velikogo Novgoroda s Pribaltikoi i Zapadnoy Evropoi v XIV-XV vv.* (Novgorod's Trade with the Baltic Countries and the West in the 14th-15th centuries). Moscow, 1963.

KOPPE, W. 'Schiffsverkehr und Seehandel in den Jahren 1378/1384.' *HGbl*, LXIV (1940).

KOZAKOVA, N. A. *Russko-livonskie i russko-ganzeyskie otnoshenya. Konec XIV-natchalo XVI veka* (The relations of Russia with Livonia and the Hanse from the end of the 14th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16th centuries). Moscow, 1975.

LESNIKOV, M. P. 'Niderlandy i Vostotchnaya Baltika v natchale XV veka'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eastern Baltic countri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5th century). *Izvestya Akademii Nauk SSSR* (Transactions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SSR), v, 1951.

——'Torgovye snoshenya V. Novgoroda s Tevtonskim Ordenom v konce XIV i natchale XV veka' (Trade relations of Novgorod with the Teutonic Order at the end of the 14th and beginning of the 15th centuries). *Istoritcheskye Zapiski* (Historical Notes), 39 (1952), 259-78. [922]

——*Ganzeyskaya torgovla pushninoy v natchale XV veka* (Hanseatic fur trad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15th century). Zapiski Ped. Instituta V. P. Potemkina (Publications of the V. P. Potemkin Institute). XIII, 1954.

——'Die livländische Kaufmannschaft und ihre Handelsbeziehungen zu Flandern am Anfang des 15. Jahrhunderts.'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958), 285-303.

——'Lübeck als Handelsplatz für osteuropäische Waren im 15. Jahrhundert.' *HGbl*, LXXVIII (1960), 37-66.

——*Die Handelsbücher des hansischen Kaufmanns Veckinghusen.* Forschungen zur mittelalterlichen Geschichte, Bd. 19. Berlin, 1973.

LEVTCHENKO, M. V. *Otcherki po istorii russko-vizantiyskich otnoshenyi*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relations with Byzantium). Moscow, 1956.

LYASHTCHENKO, P. Y. *Istorya narodnogo khozyayastva SSSR* (Economic History of USSR), I. Moscow, 1947.

MANKOV, A. Y. *Tseni i ikh dvizhenye v Russkom Gosudarstve XVI veka* (Prices and their movements in Russia in the 16th century). Moscow-Leningrad, 1951.

Mezhdunarodnye Svyazi Rossii do XVII veka (Rus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the 17th century). Moscow, 1961.

MICKWITZ, G. 'Aus Revaler Handelsbüchern.' *Societas Scientiarum Fennica*, IX, 8 (1938).

MIKHALEVSKI, F. Y. *Otcherki istorii deneg i denezhnogo obrashtchenya*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oney and monetary circulation). Leningrad, 1948.

NASONOV, A. N. *Mongoli i Rus* (The Mongols and Russia). Moscow-Leningrad, 1948.

NIITEMAA, W. 'Die undeutsche Frage in der Politik der livländischen Städte im Mittelalter.' *Annales Academiae Scientiarum Fennicae*, LXIV (1949).

—— 'Der Binnenhandel in der Politik der livländischen Städte im Mittelater.' *Annales Academiae Scientiarum Fennicae*, LXXVI (1952).

NIKITSKI, A. Y. *Istoria ekonomitcheskogo bita Velikogo Novgoroda*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Great Novgorod). Moscow, 1893.

Otcherki istorii SSSR XIV-XV vv.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USSR, 14th-15th centuries). Moscow, 1953.

POKROVSKI, S. A. *Vneshnaya torgovla i vneshnaya politika Rossii* (Foreign trade and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 Moscow, 1947.

RENKEN, F. *Der Handel der Königsberger Grosschäfferei des Deutschen Ordens mit Flandern.* Weimar, 1937.

RIBAKOV, B. A. *Remeslo drevney Rusi* (The crafts in Russia in the past). Moscow, 1948.

SAKHAROV, A. M. *Goroda Severo-vostotchnoy Rusi XIV i XV vv.* (The cities in north-eastern Russia in the 14th and 15th centuries). Moscow, 1959.

SASS, K. H. *Der Hansische Einfuhrhandel in Reval um 1430.* Marburg on Lahn, 1955.

SIROETCHKOVSKI, V. E. 'Puti i uslovya snoshenii Moskvi s Krimom' (The routes and conditions of Moscow's trade with the Crimea). *Izvestya Akademii Nauk SSSR*, III (1932).

——*Gosti-Surozhanye* (The merchants called Surozhanye). Moscow, 1935.

SKRSHINSKAYA, E. C. 'Storia della Tana.' *Studi Veneziani*, X (1968). Florence, 1969.

SMIRNOV, P. P. *Posadskie lyudi i ikh klassovaya borba do seredini XVII veka* (The 'burghers' and their class struggle to the middle of the 17th century). Moscow-Leningrad. 1947.

SPASSKI, I. G. *Russkaya monetnaya sistema* (The Russian monetary system), 3rd edn. Leningrad, 1962.

STIEDA, W. *Revaler Zollbücher und Quittungen des 16. Jahrhunders.* Halle, 1887.

——*Hansisch-Venetianische Handelsbeziehungen im 15 Jahrhundert.* Rostock, 1894.

——*Hildebrand Veckinghusen.* Leipzig, 1922.

TCHEREPNIN, L. V. *Russkie feodalnye arkhivi XIV i XV vv.* (Russian feudal archives). 2 vols. Moscow, 1948-50.

——*Obrazovannye Russkogo Centralizovannogo Gosudarstva* (The 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centralized state). Moscow, 1960.

TIKHOMIROV, M. N. *Drevnerusskie goroda* (The old Russian cities), 2nd edn. Moscow, 1956.

——*Srednevekovaya Moskva* (Medieval Moscow), 2nd edn, Moscow, 1957. [923]

——*Srednevekovaya Rossia na mezhdunarodnikh putyakh* (Medieval Russia in international life). Moscow, 1966.

VERLINDEN, C. *L'Esclavage dans l'Europe médiévale*, I. Bruges, 1955.

—— 'La colonie vénitienne de Tana, centre de la traité des esclaves au XIVe et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 *Studi in onore di Gino Luzzatto*, II. Milan, 1950, 1-25.

—— 'Le Commerce en Mer Noire des débuts de l'époque Byzantine au lendemain de la conquête de l'Egypte par les Ottomans (1517).' *XI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Moscow, 1970, 1-11.

VESOLOVSKI, S. B. *Selo i derevnya v Severo-Vostotchnoy Rusi XIV-XV v.* (Town and village in north-

eastern Russia in the 14th–15th centuries). Moscow–Leningrad, 1936.
——*Feodalnye zemlevladenye v Severo-Vostotchnoy Rusi XIV–XV vv.* (Feudal agriculture in north-eastern Russia in the 14th–15th centuries). Moscow–Leningrad, 1947.
[924] ZABELIN, J. E. *Istoria goroda Moskvi*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of Moscow), 2nd edn. Moscow, 1905.

第九章 毛纺业

下面的书目包括从本章原稿中摘取的一般著作以及迄今已有的重要文献的选录。这是以 1977 年去世的 Carus-Wilson 教授生前所编的若干草稿为基础的。本书目不包括她所使用的原始资料，但包括少量与毛纺业关系密切的印刷资料汇编。本书目也不包括任何未出版的论文和学者间的讨论。然而，本章的修订稿对上述资料（不论是否公开出版）利用颇多。本书目只限于那些与本章所涉及的地区有关的著作，以及那些着重探讨呢绒及其原料的著作（也有少量例外）。每种著作只著录一次，尽管有些著作可能与多个题目均有牵涉。

尽管自 1952 年本章初稿问世以来出现了很多作品，而且其中一些——有关于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也有关于英国的——是直接受到了它的启发，但这些现代著作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并不均衡。Carus-Wilson 教授本人关于英国呢绒业的著作是 1965 年在福特基金会所作的演讲，尽管堪称大手笔，可惜却未能付梓。在 1983 年 N. B. Harte 和 K. G. Ponting 主编的为纪念作者而编的《中世纪欧洲的纺织品及服装》中，也有一些涉及本领域的作品。

下面是本书目中使用到的略语：

Annales	*Annales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and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ES	*Economia e Storia*
EconH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JEBH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RBPH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 Histoire*
RHES	*Revu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RN	*Revue du Nord*
TH	*Textile History*
VSW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I. 一般性著作、技术和原材料

BAUTIER, A. M. ' Les Plus anciennes mentions de moulins hydrauliques industriels et de moulins à vent. ' *Bulletin philologique et historique du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 (Paris), II (1960).
BORLANDI, F. ' Note per la storia della produzione e del commercio di una materia prima. Il guado nel medio evo. ' *Studi in onore di Gino Luzzatto.* Milan, 1950.
CAHEN, C. ' L' Alun avant Phocée: un chapitr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islamo-chrétienne au temps des Croisades. ' *RHES*, XLI (1963).
CARUS-WILSON, E. M. ' La Guède francaise en Angleterre: un grand commerce du moyen âge'. *RN* XXXV (1953).
DAVIDSOHN, R. ' Garbowolle und Garbotuch. ' *Historische Vierteljahrschrift* (Leipzig), VII (1904).
DELAMEAU, J. *L' Alun de Rome, XVe–XIXe siècle.* Paris, 1962.
DE POERCK, G. *Esquisse d' une histoire de la draperie: introduction historique.* Ghent, 1968.

——*La Draperie médiévale en Flandre et en Artois: technique et terminologie.* Bruges, 1951.
ENDREI, W. 'Changements dans la productivité de l'industrie lainière au moyen âge.' *AESC*, xxvi (1971).
——*L'Évolution des techniques du filage et du tissage.* Paris, 1968. [925]
GERVERS, V. (ed.). *Studies in Textile History.* Toronto, 1977.
HEERS, M. L. 'Les Génois et la commerce de l'alun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RHES*, xxxii (1954).
HEYD, W. *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au moyen âge*, 2 vols. Leipzig, 1923.
HOFFMAN, M. *The Warp-Weighted Loom.* Oslo, 1964.
HURRY, J. B. *The Woad Plant and its Dye.* London, 1930.
KLEIN, J. *The Mesta; a study in Spanish economic history, 1273–1836.* Harvard Economic Studies, xxi. Cambridge, Mass., 1920.
LEMON, H. 'The Development of Hand Spinning Wheels.' *TH*, i (1968).
LIAGRE, L. 'Le Commerce de l'alun en Flandre au moyen âge.' *Le Moyen Age*, LXI (1955).
LLOYD, T. H. *The English Wool Trade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1977.
——*The Movement of Wool Prices in Medieval England. EconHR*, Suppl. vi, 1973.
LOMBARD, M. *Les textiles dans le monde musulman, VIIe–XIIe siècles.* Paris, 1978.
MUNRO, J. H. 'Wool-Price Schedules and the Qualities of English Wool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c. 1270–1499.' *TH*, ix (1978).
——'The Medieval Scarlet and the Economics of Sartorial Splendour.' N. B. HARTE and K. G. PONTING (eds.). *Cloth and Clothing in Medieval Europe.* London, 1983.
NAHLIK, A. 'Les Techniques de l'industrie textile en Europe Orientale du Xe au XVe siècle à travers les vestiges de tissus.' *AESC*, xxvi (1971).
——'The Wool of the Middle Ages: some results of the searching of the textiles excavated i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 *La lana come materia prima.* Florence, 1974.
PIPONNIER, F. *Costume et vie sociale: la cour d'Anjou, XIVe–XVe siècle.* Paris–The Hague, 1970.
POWER, E. *The Wool Trade in English Medieval History.* London, 1941.
RAMSAY, G. D. 'The Merchants of the Staple and the Downfall of the English Wool Export Traffic.' *La Lana come Materia Prima.* Florence, 1974.
RYDER, M. L. *Sheep and Man.* London, 1983.
——'The Origin of Spinning.' *TH*, i (1968).
SAVARY DES BRUSLONS, J.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commerce.* 3 vols. Geneva, 1742.
SCHULTE, A. 'Garbo und Florenz. Zur Geschichte der Wollproduktion im Mittelalter.'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Tübingen), LVIII (1901).
SPALLANZANI, M. (ed.). *Produzione Commercio e Consumo dei Palmi di Lana (nei Secoli XII–XVIII).* Instituto Internationale di Storia Economica 'F. Datini', Prato. Florence, 1976.
——*La lana come materia prima: i fenomeni della sua produzione e circolazione nei secoli XIII–XVII.* Instituto Internationale di Storia Economica 'F. Datini', Prato. Florence, 1974.
VAN UYTVEN, R. 'Cloth in Medieval Literature of Western Europe.' N. B. HARTE and K. G. PONTING (eds.). *Cloth and Clothing in Medieval Europe.* London, 1983.
WECKERLIN, J. B. *Le Drap 'escarlate' du moyen âge. Essai sur l'étymolgie et la signification du mot écarlate, et notes techniques sur la fabrication de ce drap de laine au moyen âge.* Lyons, 1905.
ZIPPEL, G. 'L'Allume di Tolfa e il suo commercio.' *Archivio della Reale Societa Romana di Storia Patria*, xxx (1907).

II. 罗马帝国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12 vols. Cambridge, 1928–39.
CAPUTO, G. and GOODCHILD, R. 'Diocletian's Price-Edict at Ptolemais, Cyrenaica.'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XLV (1955).
CHARLESWORTH, M. P. *Trade Routes and Commerce of the Roman Empire*, 2nd edn. Cambridge, 1926.
ESPÉRANDIEU, E. *Recueil général des bas-reliefs, statues et bustes de la Gaule romaine*, 10 vols. Paris, 1907–28. [926]

Fox, G. E. 'Notes on some probable traces of Roman fulling in Britain.' *Archaeologia*, LIX (1904).
Frank, T. and others (eds.).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5 vols. Baltimore, 1933–40.
Jones, A. H. M. 'The Cloth Industry under the Roman Empire.' *EconHR*, 2nd ser XIII (1960).
Mau, A. *Pompeji in Leben und Kunst*, 2nd edn. Leipzig, 1908.
Moeller, W. O. *The Wool Trade of Ancient Pompeii.* The Hague, 1976.
Rostovtzeff, M. I.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1926.
Vercauteren, F. *Étude sur les civitates de la Belgique Seconde.*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Classe des Lettres et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Brussels, 1934.
West, L. C. *Roman Britain: the objects of trade.* Oxford, 1931.
——*Roman Gaul: the objects of trade.* Oxford, 1935.
Wild, J. P. *Textile Manufacture in the Northern Roman Provinces.* Cambridge, 1970.

III. 低地国家

Ammann, H. 'Deutschland und die Tuchindustrie Nordwest-Europas im Mittelalter.' *Hansische Geschichtsblätter.* LXXII (1954).
——'Die Anfänge des Aktivhandels und der Tucheinfuhr aus Nordwest-Europa nach dem Mittelmeergebiet.' *Studi in onore di A. Sapori.* Milan, 1957.
——'Maastricht in der Mittelalterlichen Wirtschaft.' *Mélanges Félix Rousseau. Etudes sur l'histoire du pays Mosan au moyen âge.* Brussels, 1958.
Anould, M. A. 'La Ville de Chièvres et sa draperie (XIVe–XVIes.).' *Bulletin Scientifique de l'Institut Supérieur de Commerce de la Province de Hainaut.* II (1954).
Aymard, M. 'Production, commerce et consommation des draps de laine du XIIe au XVII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CCXLVI (1971).
Bautier, R. H. 'La Place de la draperie brabançonne et plus particulièrement bruxelloise dans l'industrie textile du moyen âge.' *Annales de la Société royale d'archéologie de Bruxelles*, LI (1966).
Bonenfant, P. 'Achats de draps pour des pauvres de Bruxelles aux foires d'Anvers de 1393 à 1487.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s petites draperies).' *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und Stadtgeschichte: Festschrift für Hektor Ammann.* Wiesbaden, 1965.
Brulez, W. 'Engels lakert in Vlaanderen in de 14e–15e eeuw.' *Handelingen van het Genootschap 'Société d'Emulation' te Brugge*, CVIII (1971).
Coornaert, E. 'Draperies rurales, draperies urbaines. L'évolution de l'industrie flamande au moyen âge et au XVIe siècle.' *RBPH*, XXVIII (1950).
——*L'Industrie de la laine à Bergues-Saint-Winoc.* Paris, 1930.
——*La Draperie-sayetterie d'Hondschoote (XIVe–XVIIIe siècles).* Paris, 1930.
Derville, G. A. 'Les Draperies flamandes et artésiennes vers 1250–1350.' *RN*, LIV (1972).
De Sagher, H. E. 'L'Industrie drapière à Bruges.' *Revu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n Belgique*, LIII (1910).
De Sagher, J. H., Van Werveke, H. and Wyffels, C. (eds.). *Recueil de document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l'industrie drapière en Flandre. IIe pt: le Sud-Ouest de la Flandre depuis l'époque bourguignonne*, 3 vols. Brussels, 1951, 1961, 1966.
Des Marez, G. *L'Organisation du travail à Bruxelles au XVe siècle.* Mémoires couronnés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es Lettres et des Beaux-Arts de Belgique, LXV. Brussels, 1904.
Doehaerd, R. *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ntre Gênes, la Belgique et l'Outremont d'après les archives notariales génoises aux XIIIe et XIVe siècles.* Institut historique belge de Rome; Étud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4 vols. Brussels, 1941.
Espinas, G. 'Essai sur la technique de l'industrie textile à Douai aux XIIIe et XIVe siècles (1229–1403).'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antiquaires de France*, LXVII (1909).
——*La Vie urbaine de Douai au moyen âge.* 4 vols. Paris, 1913.
——*La Draperie dans la Flandre francais au moyen âge.* 2 vols. Paris, 1923.

——'La Draperie rurale d'Estaire(1428-1434).' *RHES*(1923). [927]
——'Une Petite correspondance de drapiers de Douai et de Paris en 1313.' *Mélanges d'histoire offerts à Henri Pirenne*. 2 vols. Brussels, 1926.
——'La Confrérie des tisserands de draps de Valenciennes(1337).' *Annales*, II(1930).
——'L'Organisation corporative des métiers de la draperie à Valenciennes, 1362-1403.' *Annales de la Société scientifique de Bruxelles*, LII(1932).
——*Les Origines du capitalisme*. I. *Sire Jehan Boinebroke, patricien et drapier Douaisien*. Bibliothéque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du droit des pays flamands, picards et wallons (Lille), VII, 1933.
——G. and PIRENNE, H. *Recueil de document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l'industrie drapière en Flandre*, 4 vols. (Additions in *Bulletins de la Commission royale d'histoire*, XCIII (1929). Brussels, 1906-23.
FAVRESSE, F. *Études sur les métiers bruxellois au moyen âge*. Brussels, 1961.
JORIS, A. 'Une création hutoise: la draperie d'Yvois(1304)'. *Mélanges Félix Rousseau. Études sur l'histoire du pays Mosan au moyen âge*. Brussels, 1958.
——*La Ville de Huy au moyen âge*. Paris, 1959.
LAURENT, H. *Un Grand commerce d'exportation au moyen âge: La draperie des Pays-Bas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méditerranéens(XIIe-XVe siècle)*. Paris, 1935.
MALOWIST, M. 'Le Développement des rapports économiques entre la Flandre, la Pologne et les pays limitrophes du XIIIe au XIVe siècle.' *RBPH*, X(1931).
MARQUANT, R. *La Vie économique à Lille sous Philippe le Bon*. Paris, 1940.
MELIS, F. 'La Diffusione nel Mediterraneo occidentale dei panni di Wervicq et della altre città della Lys attorno al 1400'.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III. Milan, 1962.
MUNRO, J. H. A. *Wool, Cloth and Gold: the struggle for bullion in Anglo-Burgundian Trade, 1340-1478*, Brussels-Toronto, 1972.
MUS, O. 'De verhouding van de waard tot de drapier in de Kortrijkse draperie op het einde van de 15e eeuw.' *Annales de la Société d'Emulation de Bruges*, XCVIII(1961)
PIRENNE, H. 'Draps de Frise ou draps de Flandre? Un petit problème d'histoire économique à l'époque carolingienne.' *VSW*, VII(1909).
——'Draps d'Ypres à Novgorod au commenc-ement du XIIe siècle.' *RBPH*, IX(1930).
——*Histoire de Belgique*. I. *Des origines au XIVe siècle*, 5th edn. Brussels, 1929. II. *Du Commencement du XIVe siècle à la mort de Charles de Téméraire*, 4th edn. Brussels, 1947. III. *Dè la mort de Charles le Téméraire à l'arrivée du duc d'Albe dans les Pays-Bas*, 4th edn. Brussels, 1950.
POSTHUMUS, N. W. *De Geschiedenis van de Leidsche lakenindustrie*. I. *De Middeleeuwen*. The Hague, 1908.
——*Bronnen tot de Geschiedenis van de Leidsche textielnijverheid*. Rijks Geschiedkundige Publicatiën 8, 6 vols. The Hague, 1910-22.
REYNOLDS, R. L. 'The Market for Northern Textiles in Genoa, 1179-1200.' *RBPH*, VIII(1929).
——'Merchants of Arras and the Overland Trade with Genoa.'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IX(1930).
——'Genoese Trade in the late Twelfth Century.' *JEBH*, III(1931).
VÁCZY, P. *La Transformation de la technique et de l'organisation de l'industrie textile en Flandre aux XIe-XIIIe siècles*. Budapest, 1960.
VAN DER WEE, H.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3 vols. The Hague, 1963.
——'Het sociaal-economisch leven te Lier in de Middeleeuwen.' *'t Land van Ryen*, II (1952, 1953).
——'Die Wirtschaft der Stadt Lier zu Beginn des 15. Jahrhunderts.' *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und Stadtgeschichte: Festschrift für Hektor Ammann*. Wiesbaden, 1965.
——'Structural Changes and Specialisations in the Industry of the Southern Netherlands, 1100-1600.' *EconHR*, 2nd ser., XXVII(1975).

VAN HOUTTE, J. A. ' Stadt und Land in der Geschichte des flandrischen Gewerbes im Spätmittelalter und der Neuzeit. ' *Wirtschaft, Geschichte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Festschrift für F. Lütge*. Stuttgart. 1966.

[928]

VAN UYTVEN, R. ' La Flandre et le Brabant, "terres de promission" sous les ducs de Bourgognes? ' *RN*, XLIII(1961).

—— ' Stadsfinanciën en stadsekonomie te Leuven de XIIe tot de XVIe eeuw. ' *Verhandelingen van de Koninklijke Vlaamse Academie van België. Klasse der Letteren*, XLIV(1961).

—— ' De omvang van de Mechelse lakenproduktie vanaf de 14e tot de 16e eeuw. ' *Noordgouw, Cultureel Tijdschrift van de Provincie Antwerpen*, III(1965).

—— ' The Fulling Mill: Dynamic of the Revolution of Industrial Attitudes. ' *Acta Historiae Neerlandica*, V(1971).

—— ' La Draperie brabançonne et malinoise du XIIe au XVIIe siècle: Grandeur éphémère et decadence. ' *Produzione Commercio e Consumo dei Panni di Lana*. Florence, 1976.

VAN WERVEKE, H. ' De koopman-ondernemer en de ondernemer in de Vlaamsche lakennijverheid van de middeleeuwen. ' *Mededelingen van de Koninklijke Vlaamse Academie voor Wetenschappen, Letteren en Schone Kunsten van België, Klasse der Letteren*, VIII(1946).

—— ' De Omvang van de Ieperse Lakenproductie in de veertiende eeuw. ' *Ibid.*, IX(1947).

—— ' Industrial Growth in the Middle Ages: the cloth industry of Flanders. ' *EconHR*, 2nd ser., VI (1954).

—— ' Die Stellung des Hansischen Kaufmanns dem flandrischen Tuchproduzenten gegenüber. ' *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 und Stadtgeschichte: Festschrift für Hektor Ammann*. Wiesbaden, 1965.

VERELLEN, J. R. ' Lakennijverheid en lakenhandel van Herentals in de XIVe, XVe en XVIe eeuw. ' *Taxandria*, XXVII(1955).

VERHULST, A. ' La Laine indigène dans les anciens Pays-Bas entre le XIIe et le XVIIe siècle. ' *Revue Historique*, XCVI(1972).

—— ' La Laine indigène dans les anciens Pays-Bas entre le XIIe et le XVIIe siècle. Mise en oeuvre industrielle, production et commerce. ' *La lana come materia prima*. Florence, 1974.

VERLINDEN, C. ' L' Expansion commerciale de la draperie flamande dans la Péninsula ibérique au XIIIe siècle. ' *RN*, XXI(1935).

—— ' Draps des Pays-Bas et du Nord de la France en Espagne au XIVe siècle. ' *Le Moyen Age*, ser. 3, VII(1937).

—— ' Brabantsch en Vlaamsch laken te Krakau op het einde der XIVe eeuw. ' *Kon. Vlaamse Academie voor Wetenschappen, Letteren en Schone Kunsten van België, Klasse der Letteren*, V, 2 (1943).

—— ' Paños belgas en fuentes literarios españoles medievales. ' *Cuadernos de Historia de Espana* (1959).

—— ' Draps des Pays-Bas et du Nord-ouest de l' Europe au Portugal au XVe siècle. ' *Annuario de Estudios Medievales*, III(1966).

—— ' Deux pôles de l' expansion de la draperie flamande et brabançonne au XIVe siècle: la Pologne et la péninsula ibérique. ' *Kwartalnik Historii Kultury Materialnej* (Warsaw), XVI (1968).

—— ' Marchands ou tisserands? A propos des origines urbaines. ' *Annales*, XXVII, 2(1972).

—— ' Aspects de la production, du commerce et de la consommation de draps flamands au Moyen Age. ' *Produzione Commercio e Consumo dei Panni di Lana*. Florence, 1976.

WYFFELS, C. ' De oorsprong der ambachten in Vlaanderen en Brabant. ' *Verhandelingen van de Koninklijke Vlaamse Academie van België. Klasse der Letteren*, XIII, 12(1951).

IV. 意大利

BAUTIER, R. H. ' Marchands siennois et "draps d' outremont" au foires de Champagne, 1294. ' *Annuair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 histoire de France*(1947).

BENSA, E. *Francesco di Marco da Prato. Notizie e documenti sulla mercatura italiana del sec. XIV.* Milan, 1928. [929]

BINI, T. *I Lucchesi a Venezia. Alcuni studi sopra i seoli XIII e XIV.* Lucca, 1853–6.

BRUN, R. 'A Fourteenth Century Merchant of Italy: Francesco Datini of Prato.' *JEBH*, II (1930).

BYRNE, E. H. 'Commercial Contracts of the Genoese in the Syrian Trad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XXI (1916–17).

CESSI, R. 'La corporazioni dei mercanti di panni e della lana in Padova fino a tutto il secolo XIV.' *Memorie del R. Instituto Veneto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 (Venice), CXXVIII (1908).

CIPOLLA, C. 'L'economia milanese: i movimenti economici generali 1350–1500.' *Storia di Milano*, VIII (1957).

DAVIDSOHN, R. *Geschichte von Florenz.* Vol. IV, *Die Frühzeit der Florentiner Kultur*, pt. II, *Gewerbe, Zünfte, Welthandel und Bankwesen.* Berlin, 1925.

—— 'Blüte und Niedergang der Florentiner Tuchindustrie.'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Tübingen), LXXXV (1928).

DE ROOVER, R. 'A Florentine firm of cloth manufacturers; management and organisation of a sixteenth century business.' *Speculum*, XVI (1941).

DOREN, A. *Studien aus der Florentiner Wirtschaftsgeschichte*, I. *Die Florentiner Wollentuchindustrie vom XIV. bis zum XVI. Jahrhundert.* Stuttgart, 1901.

——*Italien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I. Jena, 1934.

EDLER, F. *Glossary of Medieval Terms of Business, Italian Series 1200–1600.* The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Cambridge, Mass., 1934.

FANO, N. 'Richerce sull'arte della lana a Venezia nel XIII e XIV secolo.' *Archivo Veneto*, ser. V, nos. 35–36 (1936).

GRUNZWEIG, A. 'Les Soi-disant statuts de la Confrérie de Sainte-Barbe de Florence.' *Bulletin de la Commission Royal d'Histoire* (Brussels), XCVI (1932).

HERMES, G. 'Der Kapitalismus in der Florentiner Wollenindustrie.'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Tübingen), LXXII (1916).

HOSHINO, H. 'The Rise of the Florentine Woollen Industry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N. B. HARTE and K. G. PONTING (eds.). *Cloth and Clothing in Medieval Europe.* London, 1983.

LIAGRE-DE STURLER, L. *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ntre Gênes, la Belgique et l'Outremont d'après les archives notariales génoises, 1320–1400*, 2 vols, Brussels-Rome, 1969.

LOPEZ, R. *Studi sull'economia genovese nel medio evo*: II. *Le origini dell'arte della lana.* Turin, 1936.

LUZZATTO, G. *Enciclopedia Italiana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 Istituto della Enciclopedia Italiana fondata da Giovanni Trecanni*, sub. voc, 'Lana'. Rome, 1933.

MAZZAOUI, M. F. *The Italian Cotton Indus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1100–1600.* Cambridge, 1981.

MELIS, F. 'La formazione dei costi nell'industria laniera alla fine del trecento.' *ES*, I (1953).

—— 'Mercanti-imprenditori italiani in Fiandra alla fine del trecento.' *ES*, V (1958).

—— 'Uno sguardo al mercato dei panni di lana a Pisa nella seconda metà del trecento.' *ES* (1959).

——*Aspetti della Vita Economica Medievale: studi nell'Archivio Datini di Prato*, I. Siena, 1962.

MIRA, G. 'Provvedimenti viscontei e sforzeschi sull'arte della lana in Como 1335–1535.' *Arch. Storico Lombardo*, II (1937).

RENARD, G. *Histoire du Travail à Florence*, 2 vols. Paris, 1913.

RODOLICO, N. 'The Struggle for the Right of Association in Fourteenth Century Florence.' *History*, VII (1922).

—— 'Proletariato operaio in Firenze del secolo XIV.'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I (1943).

——*I Ciompi. Una pagina di storia del proletariato operaio.* Florence, 1945.

SAPORI, A. 'Una compagnia di Calimala ai primi del Trecento.' *Biblioteca storica toscana*, VIII (1932).

SILVA, P. 'Intorno all'industria e al commercio della lana in Pisa.' *Studi Storici* (Pisa), XIX

(1911).

[930] TRASSELI, C. 'Ilmercato dei panni a Palermo nella prima metà del XV secolo.' *ES*(1957).

ZANAZZO, G. B. 'L' arte della lana in Vicenza.' *Miscellanea di storia Veneta*, ser. 3, VI(1914).

ZANONI, L. *Gli Umiliati nei loro rapporti con l' eresia, l' industria della lana ed i comuni nei secoli XII e XIII, sulla scorta di documenti inediti*. Milan, 1911.

ZERBI, T. *Aspetti economico tecnici del mercato di Milano nel trecento*. Como, 1936.

V. 英国

ARMITT, M. L. 'Fullers and Freeholders of the Parish of Grasmere.' *Transactions of the Cumberland and Westmorland Antiquarian and Archaeological Society*, N. S., VIII(1908).

ASHLEY, W.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English Woollen Industry*. Baltimore, 1887.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 vol, 1, pt. 1, *The Middle Ages*, 3rd edn. London, 1894; pt. II,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 4th edn. London, 1906.

BRIDBURY, A. R. *Medieval English Cloth Making: an economic survey*. London, 1982.

CARUS-WILSON, E. M. and COLEMAN, O. *England' s Export Trade, 1275-1547*. Oxford, 1963.

CARUS-WILSON, E. M. 'The Aulnage Accounts: a criticism.' *EconHR*, II(1929).

——'The Trade of Bristol.'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Ed. E. POWER and M. POSTAN. London, 1933.

——'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EconHR*, XI(1941).

——'The English Cloth Industry in the late Twelfth and Early Thirteenth Centuries.' *EconHR*, XIV(1944).

——'The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Merchant Adventurers' Organisation in London.' *EconHR*, IV(1933).

——'Trends in the Export of English Woollens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EconHR*, 2nd ser., III (1950).

——*Medieval Merchant Venturers*. London, 1954; 2nd edn, 1967. (This volume reprints all the above articles by Professor Carus-Wils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ecular Sculptures in the Lane Chapel, Collompton.' *Medieval Archaeology*, I(1957).

——'Evidences of Industrial Growth on Some Fifteenth-Century Manors.' *EconHR*, 2nd ser., XII (1959); reprinted in E. M. Carus-Wilson (ed.).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II. London, 1962.

——'The Woollen Industry before 1550.' *Victoria History of the Counties of England: Wiltshire*, IV. London, 1959.

CONSITT, F. *The London Weavers Company*. I,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 to the clos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Oxford, 1933.

DE SAGHER, H. 'L' Immigration des tisserands flamands et brabançons en Angleterre sous Edward III.' *Mélanges d' histoire offerts à Henri Pirenne*, 2 vols. Brussels 1926.

FRYDE, E. 'The English Cloth Industry and the Trade with the Mediterranean, *c*. 1370-*c*. 1480.' *Produzione Commercio e Consumo dei Panni di Lana*. Florence, 1976.

GRAY, H. L. 'The Production and Exportation of English Woollens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XXIX(1924).

HARVEY, P. D. A. 'The English Trade in Wool and Cloth, 1150-1250: some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Produzione Commercio e Consumo dei Panni di Lana*. Florence, 1976.

HEATON, H. *The Yorkshire Woollen and Worsted Industries*. Oxford, 1920; 2nd edn, 1965.

JENKINS, J. G. (ed.). *The Wool Textile Industry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1972.

KERLING, N. J. M. *Commercial Relations of Holland and Zealand with England from the late 13th Century to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Leyden, 1954.

LENNARD, R. 'Early English Fulling-Mills: Additional Examples.' *EconHR*, 2nd ser., III(1951).

LIPSON, E.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Woollen and Worsted Industries*. London, 1921.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I. *The Middle Ages*, 7th edn(revising much that is in pre-

vious editions and in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Woollen and Worsted Industries* above). London, 1937.

McClenaghan, B. *The Springs of Lavenham and the Suffolk Cloth Trade in the XV and XVI Centuries.* Ipswich, 1924. [931]

Miller, E. 'The Fortunes of the English Textile Industry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EconHR*, 2nd ser., xviii (1965).

Ponting, K. G. *The Woollen Industry of South-West England.* Bath, 1971.

Power, E. *The Paycockes of Coggeshall.* London, 1920.

Prevenier, W. 'Les Perturbations dans 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anglo-flamandes entre 1389 et 1407. Causes de désaccord et raisons d'une réconciliation?' *Mélanges Edouard Perroy: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Série Études*, v (1973).

Pritchard, F. A. 'Late Saxon Textiles from the City of London'. *Medieval Archaeology*, xxviii (1984).

Ramsay, G. D. *The Wiltshire Woollen Industr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Oxford, 1943; 2nd edn, London, 1965.

Rogers, J. E. Thorold.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7 vols. Oxford, 1866–1902.

Salzman, L. F. *English Industries of the Middle Ages*, new edn. Oxford, 1923.

Sellers, M. 'The Textile Industries.' *Victoria History of the Counties of England: Yorkshire*, ii. London, 1912.

Székely, G. 'Niederländische und Englische Tucharten im Mitteleuropa des 13–17 Jahrhunderts.' *Annales Universitatis Scientiarum Budapestensis, Sectio historica*, viii (1966).

Thornton, G. A. *A History of Clare, Suffolk.* Cambridge, 1930.

Unwin, G. 'Woollen Cloth – the Old Draperies.' *Victoria History of the Counties of England: Suffolk*, ii London, 1907.

——*The Gilds and Companies of London*, 3rd edn. London, 1938.

Von Roon-Basserman, E. 'Die Handelsperre Englands gegen Flandern, 1270–74, und die lizenzierte englische Wollausfuhr.' *VSW*, l (1963).

Wolff, P. 'English Cloth in Toulouse, 1380–1450.' *EconHR*, 2nd ser., ii (1949–50). [932]

第十章 中世纪文明中的采矿和冶金

下面是本章书目中所使用的缩略语：

Annales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and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EconH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JEBH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ZSSR	*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ZVGAS	*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ür Geschichte und Altertums Schlesiens*

I. 原始资料

Agricola, Georgius. *De Re Metallica.* Transl. from the Latin edition of 1556 by H. C. and L. H. Hoover. London, 1912.

Biringuccio, Vannoccio. *De la Pirotechnia.* Transl. from the Italian edition of 1540 and edited by Cyril S. Smith and M. T. Gnudi. New York, 1942.

Ercker, Lazarus. *Beschreibung allerfürnennstett mineralischen Ertzt und Berckwercksarten.* Prague, 1574. Transl. from the German edition of 1580 by A. G. Sisco and Cyril S. Smith. Chicago, 1951.

Ermisch, Hubert. *Das sächsische Bergrecht des Mittelalters.* Leipzig, 1887.

Laws and Customs of the Miners in the Forest of Dean. Ed. T. Houghton, 1689.

Louvrex, M. G. de. *Recueil contenant les édits et règlements faits pour le pais de Liège et comté de*

Looz. 4 vols. Liège, 1749–52.

Mathesius, Johann. *Sarepta Darinnen allerlei Bergwerck und Metallen.* Munich, 1571.

Mendip Mining Law and Forest Bounds (ed. J. W. Gough). Somerset Record Society Publications, XLV (1931).

Paracelsus (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 *Von der Bergsucht und anderen Bergkrankheiten (1533–34?).* Dillingen, 1567. (Engl. transl. in *Four Treatises of Paracelsus.* Ed. Henry E. Sigerist. Baltimore. 1941.)

Plowden, Edmund *The Commentaries or Reports.* 1818 edn.

Recueil général des anciennes lois françaises. Par MM. Jourdan, Decrusy, Isambert. 28 vols. Paris, 1822–33.

Wutke, Konrad. *Schlesiens Bergbau und Huttenwesen – Urkunden und Akten (1529–1740). Codex Diplomaticus Silesiae*, XX and XXI. Breslau, 1900–1.

Zivier, E. *Akten und Urkunden zur Geschichte des Schlesischen Bergwesens.* Kattowitz, 1900.

Zycha, Adolf. *Das böhmische Bergrecht des Mittelalters auf Grundlage des Bergrechts von Iglau.* 2 vols. Berlin, 1900.

II. 现代著作

(1) 总论

Allemagne, Henry René d'. *Ferronnerie ancienne.* 2 vols. Paris, 1924.

Arndt, Adolf. *Bergbau und Bergbaupolitik.* Leipzig, 1894

Bauerman, H. *A Treatise on the Metallurgy of Iron*, 5th edn. London, 1882.

Beck, Ludwig. *Die Geschichte des Eisens in technischer und kulturgeschichtlicher Beziehung.* 5 vols., 2nd edn. Brunswick, 1890–1903.

Beckmann, Johann. 4 *History of Inventions, Discoveries and Origins.* (Transl. by Wm. Johnston, 2 vols., 4th edn. London, 1846.)

Bennett, Richard. and Elton, John. *History of Corn Milling.* London, 1898–1904.

Braudel, Fernand. 'Monnaies et Civilisations: de l'or du Sondan à l'argent d'Amérique.' *Annales*, I (1946), 10–21.

[933] Braunstein, P. 'Le Fer et la production du fer en Europe de 500 à 1500.' *Annales*, XXVII (1972).

Clement, Pierre. *Jacques Coeur et Charles VII.* Paris, 1866.

Ehrenberg, Richard. *Das Zeitalter der Fugger, Geldkapital und Greditverkehr im 16. Jahrhundert.* Jena, 1896. (Transl. in Part as *Capital and Finance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by H. M. Lucas. London, 1928.)

Feldhaus, Franz M. *Die Technik der Antike und des Mittelalters.* Potsdam, 1931.

Gille, B. 'L'Organisation de la production du fer au moyen âge.' *Revue d'Histoire de la Sidérurgie*, IX (1968).

Heckscher, Eli F. *Sveriges Ekonomiska Historia fran Gustav Vasa.* 2 vols. Stockholm, 1935–6.

Jars, G. *Voyages métallurgiques ou recherches et observations sur les mines... en Allemagne, Suède, Norvège, Angleterre et Ecosse.* 3 vols. Lyons, 1774–81.

Lejeune, Jean. *La Formation du capitalisme moderne dans la principauté de liège au XVIe siècle.* Liège, 1939.

Lestocquoy, J. 'The Tenth Century.' *EconHR*, XVII (1947).

Lexis, W. 'Beiträge zur Statistik der Edelmetalle.'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XXXIV (1879), 361–417.

Lombard, M. *Les Métaux dans l'ancien monde du Ve au XIe siècle.* Paris, 1974.

——*Monnaie et histoire d'Alexandre à Mahomet.* Paris, 1971.

Mçilwain, C. H. 'Medieval Estates.'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II (1932), 664–715.

Nef, J. U. *The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 Parts 1 and 2 and Part 3 (chap. 7). Chicago, 1964.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Industrial Civilisation*, Chapters 1, 2 and 3. Cambridge, 1958.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in France and England ,1540 – 1640*. New York ,1957.
——*La Naissance de la civilisation industrielle et le monde contemporain*. Paris,1954.
——*The United States and Civilisation*,2nd edn. Chapters 2,3 and 4. Chicago,1967.
——*War and Human Progress* Part 1. London,1951.
PERCY,JOHN. *Metallurgy*,II. London,1880.
PIRENNE,HENRI.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New York. 1937. (Transl. by I. E. Clegg. London,1936.)
—— *Histoire de Belgique*,I-III,3rd edn. Brussels,1909,1922,1923.
POSTAN,M. M. in *Congrès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Paris,1950,230–31.
POWER,EILEEN E. 'Peasant Life and Rural Conditions.'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II(1932).
SMITH,J. RUSSELL. *The Story of Iron and Steel*. New York,1908.
SOETBEER,ADOLF. *Edelmetall-Produktion und Werthverhältnis zwischen Gold und Silber seit der Entdeckung Amerikas bis zur Gegenwart*. Gotha,1879.
SOMBART,WERNER.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4th edn. 4 vols. Munich and Leipzig,1916.
SPRANDEL,R. *Das Eisengewerbe im Mittelalter*. Stuttgart,1968.
——'La Production du fer au moyen âge.' *Annales* ,XXIV(1969).
STRIEDER,JACOB. 'Werden und Waschsen des europäischen Frühkapitalismus.' *Propyläen Weltgeschichte*,IV. Ed. Walter Goetz. Berlin,1932.
—— *Zur Genesis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 Leipzig,1904.
SWANK,JAMES M. *History of the Manufacture of Iron in All Ages*,2nd edn. Philadelphia,1892.
USHUR,ABBOTT PAYSON. *The Early History of Deposit Banking in Mediterranean Europe*. Cambridge,Mass.,1943.
——*A Histor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s*. New York,1929.
WEBER,MAX.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Transl. by F. H. Knight.) London,1927.
WHITE,LYNN.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1962.

(2) 古代欧洲及古代中国的采矿和冶金

ARDAILLON,EDOUARD. *Les Mines du Laurion dans l' antiquité. Paris*,1897.
BESNIER,MAURICE. 'L' Interdiction du travail des mines en Italie sous la république.' *Revue Archéologique*,ser. 5,X(1919),31–50. [934]
——'Le Commerce de plomb a l'époque romaine.' *Revue Archéologique*,ser. 5,XII(1920),211–44;XIII(1921),36 – 76;XIV(1921),98–121.
CALHOUN,G. M.' Ancient Athenian Mining.' *JEBH*,III(1931),333–61.
COLLINGWOOD,R. G. and MYERS,J. N. L. *Roman Britain and the English Settlements*,2nd edn. Oxford,1937.
DAVIES,OLIVER. *Roman Mines in Europe*. Oxford,1935.
FRANCOTTE,HENRI. *L'Industrie dans la Grèce ancienne*. 2 vols. Brussels,1900–1.
FRANK,TENNE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ome*,2nd edn. Baltimore,1927.
FRIEND,J. NEWTON. *Iron in Antiquity*. London,1926.
HARTWELL,ROBERT.' A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Iron and Coal Industries during the Northern Sung,A.D. 960–1126.'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II(1962),153–62.
——'A Cycle of Economic Change in Imperial China:coal and iron in Northeast China,750–1350.'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966).
——'Markets,Techn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venth-Century Chines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XXVI(1966),29–58.
HAUDRICOURT,A. G.' La Fonte en Chine.' *Techniques et Civilisations*, II(1952),37–41.
MISPOULET,JEAN-BAPTISTE. *Le Régime des mines à l' époque romaine et au moyen âge d' après les tables d' Aljustrel*. Paris,1908.
NEEDHAM,JOSEPH.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1954.
NEUBURG,CLAMOR.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Bergbaus.'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LVI(1900).
NEUBURGER,ALBERT. *Die Technik des Altertums*. Transl. by Henry L. Brose. *The Technical Arts and*

Sciences of the Ancients. London, 1930.

ROSSIGNOL, JEAN PIERRE. *Les Métaux dans l'antiquité.* Paris, 1863.

ROSTOVTZEFF, M. 'Geschichte der Staatspacht in der römischen Kaiserzeit bis Diokletian.' *Philologus*, Suppl., IX (1904)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Kolonates.* Leipzig, 1910.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3 vols. Oxford 1941.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1926.

(3) 中欧和意大利

ACHENBACH, H. *Das französische Bergrecht und die Forbildung desselben durch das preussische allgemeine Berggesetz.* Bonn, 1869.

——*Das gemeine deutsche Bergrecht.* Bonn, 1871.

——'Geschichte der Cleve-Märkischen Berggesetzgebung und Bergverwaltung bis zum Jahre 1815.' *Zeitschrift für Bergrecht*, XXXIII (1887).

AMRHEIN, AUGUST. 'Der Bergbau im Spessart unter der Regierung der Churfursten von Mainz.' *Archiv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von Unterfrankenund Aschaffenburg*, XXXVII (1895).

ARNDT, AD. *Zu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Bergregals und der Bergbaufreiheit.* Halle, 1878.

——'Noch einmal der Sachsenspiegel und das Bergregal.' *ZSSR*, Germanische Abt., XXIII (1902).

——'Einige Bemerk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Bergregals.' *ZSSR*, Germanische Abt., XXIV (1903).

BERNHARD, LUDWIG. 'Die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der Gedingeordnungen im deutschen Bergrecht.' *Staats-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en.* Ed. G Schmöller, vol. xx, no. 7. Leipzig, 1902.

BITTNER, L. 'Das Eisenwesen in Innerberg-Eisenerz.' *Archiv. für o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LXXXIX (ii). Vienna, 1901.

BOYCE, HELEN. *The Mines of the Upper Harz from 1514 to 1589.* Menasha, Wisconsin, 1920.

BRUCHMÜLLER, W. *Der Kobaltbergbau und die Blaufarbenwerke in Sachsen bis zum Jahre 1653.* Crossen a. O., 1897.

CSALLNER, ROBERT. 'Alte deutsche Bergwerkskolonien im Norden Siebenbürgens.' In *Studium Lipsiense*, by Karl Lamprecht. Berlin, 1909.

[935] DELUMEA, JEAN. *L'Alun de Rome XVe-XIXe.* Paris, 1962.

DOBEL, FRIEDRICH. 'Ueber den Bergbau und Handel des Jacob und Anton Fugger in Kärnten und Tirol, 1495-1550.' *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für Schwaben und Neuburg*, IX (1882), 193-213.

FINK, E. 'Die Bergwerksunternehmungen der Fugger in Schlesien.' *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ür Geschichte und Altertum Schlesiens*, XXVIII (1894).

FÖHRENBACH, OTTO. *Der badische Bergbau in seiner wirtschaftlichen Bedeutung vo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bis zur Gegenwart.* Zell im Wiesenthal, 1910.

GOTHEIN, EBERHARD.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Bergbaus im Schwarzwald.'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Oberrheins*, N. F. II (1887), 385-448.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Schwarzwaldes und der angrenzenden Landschaften.* Strasbourg, 1892.

GRÉAU, E. *Le Fer en Lorraine.* Nancy, 1908.

HASSLACHER, A. '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des Steinkohlenbergbaues im Saargebiete.' *Zeitschrift für Bergbau, Hütten und Salinenwesen im preussischen Staate*, XXXII (1884).

HASSLER, FRIED. 'German Miners in Foreign Land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Research and Progress*, March/April, 1939.

HILLEBRAND, W. 'Der Goslarer Metallhandel im Mittelalter.' *Hansische Geschichtsblätter*, LXXXVII (1969).

——'Von den Anfangen des Erzbergbaus am Rammelsberg bei Goslar.' *Niedersächsisches Jahrbuch für Landesgeschichte*, XXXIX (1967).

HITZINGER, PETER. *Das Quecksilber-Bergwerk Idria.* Laibach, 1860.
HOPPE, OSWALD. *Der Silberbergbau zu Schneeberg bis zum Jahre 1500.* Freiberg, 1908.
HUE, OTTO. *Die Bergarbeiter. Historische Darstellung der Bergarbeiterverhältnisse von der ältesten bis in die neueste Zeit*, 2 vols. Stuttgart, 1910, 1913.
HÜLLMAN, KARL D. *Geschichte des Ursprungs der Stände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an-der-Oder, 1806.
INAMA-STERNEGG, K. T. von . *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10. bis 12. Jahrhunderts.* Leipzig, 1891.
JACQUOT, E. ' Notice sur la fabrication de la fonte, du fer et de l' acier dans la Thüringerwald et le Frankenwald.' *Annales des mines*, ser. 4, II(1842).
JÄGER, ALBERT. ' Beiträge zur Tirolisch-Salzburgischen Bergwerksgeschichte.' *Archiv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LIII(1875), 337–456.
JANAČEK, J. ' L' Argent tchèque et la Méditerranée, XIVe et XVe siécles' . *Mélanges en l' Honneur de Fernand Braudel*, I. Paris, 1973.
JANSEN, MAX. *Jakob Fugger der Reiche.* Studien zur Fugger-Geschichte, 3. Heft. Leipzig, 1910.
KOCH, ERNST. ' Das Hütten-und Hammerwerk der Fugger zu Hohenkirchen bei Georgenthal in Thüringen, 1495–1549.' *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ür Thüringische Geschichte*, N. F., XXVI(1926).
KROKER, ERNST. ' Leipzig und die sächsischen Bergwerke.'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die Geschichte Leipzigs*, IX(1909).
LANGER, JOHANNES. ' Der ostelbische Bergbau im und am Gebiet der Dresdner Heide und der sächs. Schweiz.' *Neues Archiv für sächsische Geschichte und Altertumskunde*, I(1929), 1–66.
MANNEL, GOTTFRIED. *Die Eisenhütten und Hämmer des Fürstentums Waldeck.* Leipzig, 1908.
MEISTER, A. ' Die Anfänge des Eisenindustrie in der Grafschaft Mark.'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ortmunds und der Grafschaft Mark*, XVII(1909).
MUCK, WALTER. *Der Mansfelder Kupferschieferbergbau in seiner rechts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2 vols. Eisleben, 1910.
MÜLLNER, ALFONS. ' Die historische Entwicklung des Bergbaues in den österreichischen Alpenländern.' *Berg u. huttermännisches Jahrbuch*(1906).
——*Geschichte des Eisens.* Erste Abteilung. In *Krain, Görz und Istrien.* Vienna, 1909.
NEF, J. U. ' Silver Production in Central Europe, 1450–1618.' *Journ. of Political Economy*, XLIX (1941), no. 4.
NEUBURG, GLAMOR. *Goslars Bergbau bis 1552.* Hanover, 1892.
——' Der Zusammenhang zwischen römischem und deutschem Bergbau.' *Festgaben für Wilhelm Lexis.* Jena, 1907.

[936]

OPET, OTTO. ' Das Gewerbschaftsrecht nach den deutschen Bergrechtsquellen des Mittelalters.' *Zeitschrift für Bergrecht*, XXXIV(1893).
PETER, KARL. ' Die Goldbergwerke bei Zuckmantel und Freiwaldau.' *ZVGAS*, XIX(1885).
PFLUG, KARL. ' Zur Geschichte des Bergbaues im Waldenburger Berglande.' *ZVGAS*, XLIII(1909).
SCHMÖLLER, GUSTAV. ' Die 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der Unternehmung.'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 XV(1891).
SCHNÜRLEN, MATHILDE. *Geschichte des Württembergischen Kupfer-und Silbererzbergbaus.* Berlin, 1921.
SIMONIN, L. ' De l' exploitation des mines et de la métallurgie en Toscane pendant l' antiquité et le moyen âge.' *Annales des mines*, ser. 5, XIX(1858), 557–615.
STEINBECK, AEMIL. *Geschichte des schlesischen Bergbaues.* Breslau, 1857.
STERNBERG, KASPAR. *Umrisse einer Geschichte der böhmischen Bergwerke.* 2 vols. Prague, 1836, 1838.
STODDART, ANNA M. *The Life of Paracelsus.* Philadelphia, 1911.
STRIEDER, JAKOB. *Studien zur Geschichte kapitalistischer Organisationsformen*, 2nd edn. Munich, 1925.
TOMASCHEK EDLER VON SRADOWA, J. A. *Das alte Bergrecht von Iglau.* Innsbruck, 1897.
UTSCH, RICHARD. *Die Entwicklung und volkswirtschaftliche Bedeutung des Eisenerzbaues und der*

Eisenindustrie im Siegerland. Görlitz, 1913.

Westermann, E. *Das Eislebener Garkupfer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en europaïschen Kupfermarkt, 1460–1560.* Cologne, 1971.

Weyhmann, Alfred. *Geschichte der älteren Lothringischen Eisenindustrie.* Metz, 1905.

Wick, Wilhelm. *Die landesherrlichen Eisenhütten und Hämmer im ehemaligen Kurhessen bis zum Ende des XVII. Jahrhunderts.* Cassel, 1910.

Wolfstrigl-Wolfskron, M. R. von. *Die Tiroler Erzbergbaue, 1301–1665.* Innsbruck, 1903. (This is the only comprehensive work on mining in the Tyrol during the Middle Ages, but it has not been well received by scholars. It is rather unintelligently and clumsily put together, and it is said by Stephan Worms to contain many errors of fact and of interpretation.)

Worms, Stephan. *Schwazer Bergbau im fünfzehnten Jahrhundert.* Vienna, 1904.

Zychá, Adolf. *Das Recht des ältesten deutschen Bergbaues bis ins 13. Jahrhundert.* Berlin. 1899.

—— 'Zur neuesten Literatur über die Wirtschafts-und Rechts-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ergbaus.'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v(1907); vi(1908).

(4) 法国、西班牙和低地国家

Arnould, G. *Le Bassin houiller du couchant de Mons.* Mons, 1877.

Bardon, Achille. *L'Exploitation du bassin houiller d'Alais sous l'ancien régime.* Nîmes, 1898.

Beaune, Henri. 'Note sur le régime des mines dans le duché de Bourgogne.' *Mém. de la société des antiquaires de France*, xxxi(1869).

Borlase, W. C. *Tin Mining in Spain,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1898.

Bouchayer, Auguste. *Les Chartreux maîtres de forges.* Grenoble, 1927.

Bouzy, Alf. 'Essai hist. sur l'ancien mandement d'Allevard.' *Bull. de la soc. de statisique de l'Isère*, i(1839).

Bulard, Marcel. 'L'Industrie du fer dans la Haute-Marne.' *Annales de geographie*, xiii(1904), 223-42, 310-21.

Chabrand, Ernest. *Essai historique sur la métallurgie du fer et de l'acier en Dauphiné et en Savoie.* Grenoble, 1898.

Chazaud, A. M. 'Les Mines de houille de Charbonnier (Puy-de-Dome) au XVe siècle.' *Bulletin de la soc. d'émulation du dépt. de l'Allier*, x(1868).

Clément, Pierre. *Jacques Coeur et Charles VII.* Paris, 1866.

Corbier. 'Notice sur les forges impériales de la Chaussade.' *Bull. de la soc. nivernaise des lettres, sciences et arts*, ser. 2, iv(1869). [937]

Couffon, Oliver. *Les Mines de charbon en Anjou.* Angers, 1911.

Décamps, G. 'Mémoier historique sur l'origine et les développements de l'industrie houillère dans le bassin du couchant de Mons.' *Société des arts et des lettres du Hainaut, publications*, ser. 4, v(1880); ser. 5, i(1889).

Destray, P. 'Note sur les anciennes forges du prieuré de la Charité.' *Mém. de la soc. acad. du Nivernais*, xvii(1913).

—— 'Les Houillères de la Machine (Nivernais) au 16e siècle.' *Mémoires et documen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commerce et de l'industrie en France* (ed. Julien Hayem). Ser. 4. Paris, 1916.

Febvre, Lucien. *Phillippe II et la Franche-Comté.* Paris, 1912.

Finot, J. 'La Seigneurerie de Ronchamp et l'origine de l'exploitation des houillères de cette localitè, 1220-1789.' *Rev d'hist. nobilliaire et d'archéol. héraldique*, 1882.

Formeville, A. de. *Les barons fossiers et les férons de Normandie.* Caen, 1852.

Gérin, Richard, H. de. 'Mines et mineurs autrefois et aujourd'hui. Etude économique sur les charbonnages de Provence du 15 au 19 siècle.' *Soc. stat. de Marseille*, xlvii(1906-7).

Giraud, J.-B. *Documen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rmement au moyen âge*, i. Lyons, 1895.

—— *Documents pour l'histoire de l'armement au moyen âge et à la renaissance*, ii. Lyons, 1904.

Goris, J. A. *Études sur les colonies marchandes méridionales à Anvers de 1488 à 1567.* Louvain, 1925.

GRAS, L. J. *Essai sur l' histoire de la quincaillerie et petite métallurgie à Saint-Etienne et dans la région stephanoise comparée aux régions concurrentes.* Saint-Etienne ,1904.
—— *Histoire économique générale des mines de la loire.* Saint-Etienne,1922.
HÄBLER, KONRAD. *Die Geschichte der Fugger' schen Handlung in Spanien.* Weimar,1897.
HAMILTON, EARL J.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501–1650.* Cambridge, Mass.,1934.
——*Money, Prices and Wages in Valencia, Aragon, and Navarre, 1351–1500.* Cambridge, Mass., 1936.
HAUSER, HENRI. *Ouvriers du temps passé.* Paris,1899.
HENAUX, F. *Fabrique d' armes de Liège.* Liège,1858.
LAMÉ-FLEURY. *De la législation minérale sous l' ancienne monarchie.* Paris,1857.
LECORNNU, L. ' Sur le métallurgie du fer en Basse-Normandie. ' *Mém. de l' acad. nat. des sciences, arts, et belles-lettres de Caen*,1884.
LEJEUNE, JEAN. *La Formation du capitalisme moderne dans la principauté de Liége au XVIe siècle.* Paris,1939.
LEROUX, MAURICE. *L' Industrie du fer dans le Perche.* Paris,1916.
LEVAINVILLE, J. *L' Industrie du fer en France.* Paris,1922.
LOPEZ, ROBERTO.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lla miniere argentifere di Sardegna.* Milan,1936.
LUCE, SIMÉON. ' De l' exploitation des mines et de la condition des ouvriers mineurs en France au XVe siècle. ' *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 xxi(1877).
MALHERBE, RENIER. ' Historique de l' exploitation de la houille dans le pays de Liège jusqu' à nos jours. ' *Mémoire de la société libre d' émulation de Liège*, N. S., ii. Liège,1862.
MASSÉ, ALFRED. *Monographies nivernaises.* Nevers,1913.
MIGNERON, M. ' The Mining Laws of France. ' *Trans. Roy. Geog. Soc. Cornwall*, vi,239 –58.
NIMAL, H. DE. ' La Métallurgie à l' exposition de Charleroi en 1911 avec des notes historiques sur la forgerie. ' *Livre d' or de l' exposition de Charleroi.* Charleroi,1913.
PAGÉ, CAMILLE. *La Coutellerie depuis l' origine jusqu'à nos jours.* 6 vols. Chatellerault,1896–1904.
PIRENNE, HENRI. *Histoire de Belgique*, i - iii. Brussels,1900 – 32.
PRINET, MAX. *L' Industrie du sel en Franche-Comté avant la conquête française.* Besançon,1900.
ROUZAUD, HENRI. *Histoire d' une mine au mineur. La mine de Rancié depuis le moyen âge jusqu' à la Révolution.* Toulouse,1908.
SAINT SAUD, COMTE DE. ' Privilèges concernant les maîtres de forges. '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archaéologique du périgord*, xxvii(1900).

[938]

SALIN, EDOUARD. ' Un Aspect de la civilisation mérovingienne. ' *Annales*, ii(1955). 161–72.
SALIN, EDOUARD and FRANCE – LANORD, ALBERT. *Le Fer a l' époque mérovingienne.* Paris,1943.
SCLAFERT, THÉRÈSE. *L' Industrie du fer dans la région d' Allevard au moyen âge.* Grenoble,1926.
VASQUEZ DE PRADA, V. ' Las antiquas ferrarias de Vizcaya,1450–1800. ' *Mélanges en l' honneur de Fernand Braudel*, i. Paris 1973.
VERNEILH, BARON DE. ' Notes sur les anciennes forges du Périgord et du Limousin. ' *Revue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ser. 6, iv(1876).
VILLEFOSSE, HÉRON DE. *De la richesse minérale.* 3 vols. Paris,1810,1819.
YERNAUX, Y. *La Métallurgie liègeoise et son expansion au 17e siècle.* 1939.

(5) 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

ABRAHAMS, ISRAEL. ' Joachim, Gaunse: a mining incident in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 *Jewish Hist. Soc. Trans.*, iv. London,1899–1901.
ASHTON, T. S. *Iron and Steel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nchester,1924.
ATKINSON, STEPHEN. *The Discoverie and Historie of the Gold Mynes in Scotland, written in* 1619. Edinburgh (Bannatyne Club),1825.
AWTY, B. G. ' Continental Origins of Wealden Ironworkers. ' *EconHR*, 2nd ser., xxxiv(1981).
BLAKE, J. B. ' The Medieval Coal Trade of North East England: some fourteenthcentury evidence. ' *Northern History*, ii(1967).

BLANCHARD, I. S. W. 'The Miner and the Agricultural Community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Agricultural Hist. Rev.*, XX (1972).
—— 'Seigneurial Entrepreneurship: the bishops of Durham and the Weardale iron industry, 1406-1529.' *Business History*, XV (1973).
—— 'Derbyshire Lead Production, 1195-1505.' *Derbyshire Arch. Jnl.*, XCL (1974).
—— 'Labour Productivity and Work Psychology in the English Mining Industry'. *EconHR*, 2nd ser, XXXI (1978).
CHILDS, W. R. 'England's Iron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XIV (1981).
CUNNINGHAM, A. S. *Mining in the Kingdom of Fife.* Edinburgh, 1913.
FFOULKES, CHARLES. *The Gun-Founders of England*, Cambridge, 1937.
GALLOWAY, ROBERT L. *A. History of Coal Mining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1882.
——*Annals of Coal Mining and the Coal Trade.* London, 1898.
GOUGH, JOHN W. *The Mines of Mendip.* 2nd edn. Oxford. 1967.
HAMILTON, HENRY. *The English Brass and Copper Industries to 1800.* London, 1926.
HATCHER, J. *English Tin Production and Trade before 1550.* Oxford, 1973.
—— 'Myths, Miners and Agricultural Communities.' *Agricultural Hist. Rev.*, XXII (1974).
HECKSCHER, ELI F. *Sveriges Ekonomiska Historia fran Gustav Vasa.* 2 vols. Stockholm, 1935-6.
—— 'Un Grand chapitre de l'histoire du fer: le monopoe suédois.' *Annales*, II (1932), 127-39, 225-41.
HOUGHTON, THOMAS. *The Compleat Miner; or a Collection of the Laws, Liberties, ancient Customs... and Privileges of the several Mines and Miners in the Counties of Derby, Gloucester and Somerset.* 3 pts. London, 1687-88.
JENKIN, A. K. HAMILTON. *The Cornish Miner.* London, 1927.
JENKINS, PHY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ussex Iron Industry.' *Newcomen Soc. Trans.*, I (1920-1).
—— 'Iron-Making in the Forest of Dean. '*Newcomen Soc. Trans.*, VI (1925-6).
LAPSLEY, G. T. 'The Account Roll of a Fifteenth-Century Iron Master.' *Engl. Hist. Rev.*, XIV (1899).
LARSON, HENRIETTA M. 'Notes and Documents: a medieval Swedish mining company.' *JEBH*, II,
[939] 545-59. Cambridge, Mass., 1930.
LEADER, R. E. *History of the Company of Cutlers of Hallamshire*, I. Sheffield, 1905.
LEWIS, E. A.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Wales during the Middle Ages.' *Trans. Roy. Hist. Soc.* N. S., XVII (1903), 121-73.
LEWIS, G. R. *The Stannaries.* Cambridge, Mass., 1907.
LLOYD, G. I. H. *The Cutlery Trades.* London, 1913.
LOWER, MARK ANTONY.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Notices of the Iron Works of the County of Sussex.' *Sussex Arch. Collections*, II (1849), 169-220.
MACADAM, I. 'Notes on the Ancient Iron Industry of Scotland.' *Proc. Soc. Antiq. Scot.*, XXI (1886-7).
NEF, J. U.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2 vols. Reprinted London, 1966.
—— 'Note on the Progress of Iron Production in England, 1540-1640.' *Journ. Political Economy*, XLIV (1936), 398-403.
NICHOLL, JOHN. *Some Account of the Worshipful Company of Ironmongers*, 2nd edn. London, 1866.
NICHOLLS, HENRY GEORGE. *Iron-Making in the Olden Times as instanced in the Ancient Mines, Forges, and Furnaces of the Forest of Dean.* London, 1866.
PATRICK, ROBERT W. C. *Early Records Relating to Mining in Scotland.* Edinburgh, 1878.
RAISRICK, A. and JENNINGS, B. *A History of Lead Mining in the Pennines.* London, 1965.
SALTZMAN, LOUIS FRANCIS. *English Industries of the Middle Ages*, 2nd edn. Oxford, 1923.
SOPWITH, THOS. *An Account of the Mining Distrects of Alston Moor, Weardale and Teesdale in Cumberland and Durham.* Alnwick, 1833.
STRAKER, ERNEST. *Wealden Iron.* London, 1931.
Victoria County History of: Cornwall, Derby, Durham, Gloucestr, Lancaster, Nottingham, Shrop-
[940] *shire, Warwick, York.*

第十一章 中世纪西欧的石材建筑

本书目针对的建筑是在经济学意义上的，而非是一种艺术活动，它专注于组织而非风格、建筑而非设计。在一个美学目的和工艺手段联系非常密切的时代，两者的区分只是人为的。下面的书目是对有关中世纪欧洲建筑的浩繁文献的侧重于经济学方面的选录，就此而言，Pelican 艺术史相关各卷的参考文献表，可作为一种方便的指南。关于对本章主题进一步的文献指南请特别参看下面所列出的 Aubert、Binding 和 Nussbaum、Du Colombier、Knoop 和 Tones(1967)、Maier、Shelby 和 Sosson 的著作。

I. 总论

BINDING, G., (ed.). *Beiträge über Bauführung und Baufinanzierung im Mittelalter.* Cologne 1974.
CHENEY, C. R. 'Church-building in the Middle Ages.'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xxxiv, 1951.
GEM, R. 'A recession in English architecture during the early eleventh century, and its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manesque style.' *Journal of the British Archaeological Association*, 3rd ser., xxxviii(1975).
JOHNSON, H. T. 'Cathedral Building and the Medieval Economy', in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Spring 1967.
LOPEZ, R. S. 'Economie et architecture médiévale. Cela a-t-il tué ceci?' *Annales*, vii(1952).
MUSSET, L. 'Les Conditions financières d'une réussite architecturale; les grandes églises romanes de Normandie', in *Mélanges offerts à René Crozet.* Poitiers, 1966.
VERPLAETSE, A. 'L'Architecture en Flandre entre 900 et 1200.' *Cahiers de civilisation médiévale*, viii(1965).
WARNKE, MARTIN. *Bau und Überbau, Soziologie der Mittelalterlichen Architektur nach dem Schriftquellen.* Frankfurt, 1976.

II. 原始资料

BAR, M. *Der Koblenzer Mauerbau Rechnungen 1276-1289* (Publikationen des Gesellschaft für Rheinische Geschichtskunde, Leipzig, 1888).
COLVIN, H. M. *Building Accounts of King Henry III.* Oxford, 1971.
ERSKINE, AUDREY M. *The Accounts of the Fabric of Exeter Cathedral, 1279-1353.* 2 vols. Devon & Cornwall Record Society, N.S. xxiv and xxvi, 1981-3.
GÜMBEL, A. 'Baurechnungon vom Chor von St. Lorenz zu Nürnberg 1462-1467.' *Repertorium für Kunstwissenschaft*, xxxiii(1910).
LEHMANN-BROCKHAUS, OTTO. *Lateinische Schriftquellen zur Kunst in England, Wales und Schottland, vom Jahre 901 bis zum Jahre 1307.* 5 vols. Munich, 1955-60.
MORTET, V. and DESCHAMPS, P. *Recueil de textes relatifs a l'histoire de l'architecture et à la condition des architectes en France au Moyen Age*, 2 vols. Paris, 1911, 1929.
RAINE, JAMES. *The Fabric Rolls of York Minster*(Surtees Society, 1859).
SIMPSON, W. DOUGLAS. *The Building Accounts of Tattershall Castle 1434-1472.* Lincoln Record Society, LV, 1960.
STHAMER, EDUARD *Die Bauten der Hohenstaufen in Unteritalien: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Kastelbauten Kaiser Freidrichs II und Karls I von Anjou.* 2 vols. Leipzig, 1912, 1926.

III. 建筑业组织

(1) 皇室及其他国家机构

Brown, R. A., Colvin, H. M. and Taylor, A. J.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Works*, vols. 1-2: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63.

Canat de Chizy, N. 'Etude sur le service des travaux publics et spécialement sur la charge de maîtres des oeuvres de Bourgogne sous les ducs de la race des Valois (1363-1477).' *Bulletin Monumental*, LXIII (1898).

Favreau, R. 'Les Maîtres des oeuvres du roi en Poitou au XVe siècle,' *Mélanges offerts à René Crozet*, II (1966).

(2) 市政机构

Braunfels, W. *Mittelalterliche Stadtbaukunst in der Toscana*. Berlin, 1959.

Fowler, Angus. 'Der Stadhof und die spätere Stadtbaumschule am Grün 1428-1803,' in *Vom 'Staithobe' zum Bauhof der Stadt Marburg*, Marburger Stadtschriften zur Geschichte und Kultur 5. Marburg, 1982.

Knoop, D. and Jones, G. P. 'London Bridge and its Builders: a study of the municipal employment of masons mainl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Ars Quatuor Coronatorum*, XLVII (1934).

Lloyd, T. H. *Some Aspects of the Building Industry in Medieval Stratford-upon-Avon*. Dugdale Society Occasional papers No. XIV, 1961.

Salvi, G. *L'Operarius del Porto di Genova: Architetto o Amministratore?* Genoa, 1934.

Sosson, J. P. *Les Travaux publics de la ville de Bruges XIVe-XVe siècles*. Brussels, 1977.

Swanson, Heather. *Building Craftsmen in late medieval York* (University of York, Borthwick paper No. LXIII, 1983).

(3) 教会机构

Assier, A. *Comtes de l'Oeuvre de l'église de Troyes ou nouvelles recherches sur la construction des églises et sur les usages du Moyen Age*. Troyes, 1855.

Biget, J. L. 'Recherches sur le financement des cathédrales du Midi au XIIIe siècle,' in *La Naissance et l'essor du gothique méridional au XIIIe siècle* (Cahiers de Fanjeaux, IX. Toulouse, 1974).

Brutails, J. A. 'Deux chantiers bordelais 1486-1521.' *Le Moyen Age*, XII-XIV (1899-1901).

David, M. 'La Fabrique et les manoeuvres sur les chantiers des cathédrales de France jusqu'au XIVe siècle'. *Études de droit, d'histoire du droit canonique dédiées à Gabriel Le Bras*, II. Paris, 1965.

De Mely. 'Nos Vieilles cathédrales et leurs maîtres d'oeuvre.' *Revue Archéologique*, 5th ser., XI (1920) and XIII (1921).

Du Colombier, P. *Les Chantiers des cathédrales*, 2nd edn. Paris, 1973.

Gimpel, J. *Les Batisseurs des cathédrales*. Paris, 1959; *The Cathedral Builders*. London, 1983.

Jusselin, H. 'La Maîtrise de l'oeuvre à Notre Dame de Chartres.'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archéologique d'Eure-et-Loir*, XV. Chartres, 1921.

Kraus, Henry. *Gold was the Mortar. The Economics of Cathedral Building*. London, 1979.

Quicherat, J. 'Notice sur plusieurs registres de l'oeuvre de la cathédrale de Troyes.' *Mélang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 I. Paris, 1886.

Roothoff, G. *Organisation und Finanzierung des Xantener Dombaues in 15 Jahrhundert*. Xanten, 1973.

Swartwout, R. E. *The Monastic Craftsman*. Cambridge, 1932.

Vroom, W. H. *De financieriering van de kathedraalbouw in de middeleeuwen: in het bijzander van de dom van Utrecht*. Maarsen, 1981.

(4) 砖石匠行业及其就业状况

AUBERT, MARCEL. 'La Construction au Moyen Age. Loges d' Allemagne, Maçons et Francs-maçons en Angleterre.' *Bulletin Monumental*, CXVI(1958), CXVIII(1960), CXIX(1961).

BAULANT, M. 'Le Salaire des ouvriers du bâtiment à Paris, de 1400 à 1726.' *Annales*, XXVI (1971).

GIMPEL, J. 'Le Liberté du travail et l' organisation des professions du bâtiment a l' époque des grand constructions gothiques.' *Revu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XXIV(1956).

HARVEY, JOHN. *The Mediaeval Architect.* London, 1972.

KNOOP, D. and JONES, G. P. *The Mediaeval Mason*, 3rd edn. Manchester, 1967.

RIBAULT, Y. 'Chantiers et maîtres d' oeuvre à Bourges durant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e siècle. *Actes du 93e Congrès national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section d' archéologie.* Tours, 1968 (Paris, 1970).

IV. 建筑技术

ANDREWS, D. D. 'The Medieval Masonry of Northern Lazio', in *Papers in Italian Archaeology*, ed. H. MCK. BLAKE, J. W. POTTER, D. B. WHITEHOUSE *et al.* Oxford, 1978.

BINDING, G. and NUSSBAUM, N. *Der mittelalterliche Baubetrieb nördlich der Alpen in zeitgenössischen Darstellungen.* Darmstadt, 1978.

BOOZ, R. *Der Baumeister der Gotik.* Münster-Berlin, 1956.

BUCHER, FRANÇOIS. 'Medieval Architectural Design Methods, 800-1560.' *Gesta*, XI(2)(1972).

CLASEN, K. H. *Deutsche Gewölbe der Spätgotik.* Berlin, 1961.

CSEMEGI, J. 'Die Konstruktionsmethoden den mittelalterlichen Baukunst,' in *Acta historiae Artium*, II (Budapest, 1954-5).

DENEUX, H. 'Signes lapidaires et épures du XIIIe siècle à la cathédrale de Reims.' *Bulletin Monumental*, LXXXIV(1925).

FITCHEN, JOHN. *The Construction of Gothic Cathedrals, a study of vault erection.* Oxford, 1961.

FRIEDRICH, K. *Die Steinbearbeitung vom 11 bis zum 18 Jahrhundert.* Augsburg, 1932.

JAMES, JOHN. *Chartres les constructeurs.* Société archéologique d' Eure-et-Loir, 1977; *The Contractors of Chartres*, 2 vols. Mandorla Publications, Wyong, New South Wales, 1979, 1981.

KIMPEL, D.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taille en série dans l' architecture médiévale et son rôle dans l' histoire économique.' *Bulletin Monumental*, CXXXV(1977).

LEEDY, W. C., JR. *Fan Vaulting.* London, 1980.

LEISTIKOW, D. 'Aufzugsvorrichtungen für Werksteine im mittelalterlichen Baubetrieb: Wolf und Zange.' *Architectura*, XII(Munich)(1982).

MAIER, KONRAD. 'Mittelalterliche Steinbearbeitung und Mauertechnik als Datierungsmittel, Bibliographische Hinweise.' *Zeitschrift für Archäologie des Mittelalters*, III(1975).

MARK, ROBERT. *Experiments in Gothic Structure.* Massachusetts, 1982.

PLAT, G. *L' Art de bâtir en France des Romains à l' an 1100.* Paris, 1939.

SALZMAN, F. *Building in England down to 1540.* Oxford, 1952.

SHELBY, LON R. *Gothic Design Techniques: the fifteenth-century design booklets of Mathes Roriczer and Hanns Schmuttermayer.* S.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7.

TAYLOR, H. M. *Anglo-Saxon Architecture*, III. Cambridge, 1978.

VIOLLET-LE-DUC, E. M.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 architecture française du XIe au XVIe siècle*, lo vols. Paris, 1858-68.

[943]

V. 采石矿和建筑石材

ARKELL, W. J. *Oxford Stone.* London, 1947, and review by E. M. Jope in *Oxoniensia*, XIV(1949), 90-8.

CAMERMAN, C. and ROLLAND, P. *La Pierre de Tournai.*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belge de géologie, de paléontologie et d'hydrologie, N. S. (4°) I. Brussels, 1944.

COURTOY, F. 'Le Travail et le commerce de la pierre à Namur avant 1500.' *Namurcum*, XXI (1946).

JOPE, E. M. 'The Saxon building-stone industry in southern and midland England.' *Medieval Archaeology*, VIII (1964).

KLAPISCH - ZUBER, C. *Les Maîtres du marbre, Carrare 1300-1600.* Paris, 1969.

KNOOP, D. and JONES, G. P. 'The Medieval English Quar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38).

PIETRESSON DE SAINT-AUBIN, P. 'La Fourniture de la pierre sur les grands chantiers troyens du Moyen Age et de la Renaissance.' *Bulletin Archéologique* (1928-9).

WARD-PERKINS, J. B. 'Quarries and Stoneworking in the Middle Ages: the heritage of the ancient world.' *Settimane di studio del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 alto medioevo*, XVII (2). Spoleto, 1971.

【944】

第十二章 铸币和通货

下面是本章书目所使用的缩略语:

Annales	*Annales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and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et Civilisations)*
BNJ	*British Numismatic Journal*
EconH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JE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NS	*Numismatický Sborník*
NZ	*Numismatische Zeitschrift*
RN	*Revue Numismatique*
RIN	*Rivista Italiana di Numismatica*
RBPH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 Histoire*
TRH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I. 总论

标准书目是 PHILIP GRIERSON 编写的 *Bibliographie numismatique*, 第 2 版, 布鲁塞尔, 1979 年, 以下书目则可以作为补充:

MARTIN PRICE and others. (eds.). *A Survey of Numismatic Research 1978-1984. I.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Numismatics.* International Numismatic Commission, London, 1986. Similar bibliographical surveys are published every six years, which bring the literature up to date.

从经济史学家的观点看, 最新的货币史通论是 MARC BLOCH 不完整的遗著 *Esquisse d'une histoire monétaire de l'Europe.* Cahiers des Annales, 第 9 卷, 巴黎, 1954 年; 此外还有简明而有启发性的系列讲座: CARLO M. CIPOLLA, *Money, Prices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普林斯顿, 1956 年; 现在还可参看 P. SPUFFORD, *Money and its Uses in Medieval Europe*, 剑桥, 1986 年; 从古钱币学家的观点看, 最好的入门性著作是: JOHN PORTEOUS, *Coins in History*, 伦敦, 1969 年; 经济史学家和古钱币学家于 1975 年联合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议, 该会议的论文汇编已出版: *La Moneta nell' Economia Europea Secoli XIII-XVI-*

II. Settima Settimana di Studio, 1975, Istitut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a Economica 'Francesco Datini'. Prato, ed. V. Barbagli Bagnoli Florence, 1982.

关于中世纪欧洲铸币的标准文献是 A. Engel and R. Serrure, *Traité de numismatique du moyen âge* (3 vols., Paris, 1891-1905. Reprinted 1964)。但是它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而从很多方面来讲应该先参看讲述精彩的单卷本：Philip Grierson, *Monnaies du Moyen Age* (Fribourg, 1976)，并参看该书的注释。其他有用的参考资料有文献汇编：Wilhelm Jesse (ed.), *Quellenbuch zur Münz-und Geld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Halle, 1924, Reprinted 1968) 以及辞典：F. von Sohrötter, *Wörterbuch der Munzkunde* (Leipzig, 1930)。把古钱币学作为历史学附属学科加以介绍的一篇有趣文章是 Philip Grierson, Numismatics', in Powell, J. M (ed.), *Mediev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Syracuse, N. Y., 1976, 103-50)。

当前关于古钱币学的标准著作有：Philip Grierson, *Numismatics* (Oxford, 1975) 但它仍然不能完全取代 A. Luschin von Ebengreuth, *Allgemeine Münzkunde und Geldgeschichte* (2nd edn., Munich, 1926. Reprinted 1969).

有一个专家研讨会的论文汇编是关于古钱币工艺的最新专门论述：E. T. Hall and D. M. Metcalf (eds.), *Methods of Chemical and Metallurgical Investigation of Ancient Coinage* (Royal Numismatic Society, London, 1972). Particularly useful is D. M. Metcalf, 'Analyses of the Metal Contents of Medieval Coins', 383-434.

[945]

II. 野蛮时代的中断

Bernareggi, Ernesto. *Il sistema economico della monetazione dei Langobardi nell' Italia superiore.* Milan, 1960.

Doehaerd, Renée. *Le Haut moyen âge occidental: économies et sociétés.* Paris, 1971.

Grierson, Philip. 'Commerce in the Dark Ages: a Critique of the Evidence.' *TRHS* 5th ser., IX (1959), 123-40.

Lafaurie, Jean. 'Essai sur le monnayage d' argent franc des Ve et VIe siècles.' *Annales de Normandie*, XIV (1964), 173-222.

Latouche, Robert. *The Birth of Western Economy.* English translation London, 1961.

Le Gentilhomme, Pierre. 'Le Monnayage et la circulation monétaire dans les royaumes barbares en Occident Ve-VIIIe siècles.' *RN*, 5th ser., VII (1943), 46-112 and VIII (1948), 13-59.

Miles, G. C. *The Coinage of the Visigoths of Spain: Leovigild to Achila II.*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New York, 1952.

Moneta e scambi nell' alto medioevo. Settimane di studio del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 alto medioevo, VIII. Spoleto, 1961.

Tomasini, W. H. *The Barbaric Tremissis in Spain and Southern France. Anastasius to Leovigild.* Numismatic Notes and Monographs, CLII.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New York, 1964.

Wroth, W. *Catalogue of the Coins of the Vandals, Ostrogoths and Lombard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11.

III. 拜占庭帝国

Bertelè, T. 'L' iperpero bizantino dal 1261 al 1453', *Rivista Italiana di Numismatica*, LIX (1957), 70-89.

—— 'Lineamenti principali della numismatica bizantina', *RIN*, LXVI (1964), 33-118.

GRIERSON, PHILIP. Introductions to BELLINGER, A. R. and GRIERSON P. *Catalogue of Byzantine coins in the Dumbarton Oaks Collection and in the Whittemore Collection 491–1081.* 5 vols. Dumbarton Oaks Center for Byzantine Studies, Washington, 1966ff.

——*Byzantine Coins.* London, 1982.

HENDY, MICHAEL F. *Coinage and Money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1081–1261.* Dumbarton Oaks Studies. XII. Washington, 1969.

——*Studies in the Byzantine Monetary Economy, c. 300–1450.* Cambridge, 1985.

——'Byzantium 1081–1024: An Economic Reappraisal', *TRHS*, 5th ser. xx (1970), 31–52.

IV. 从德涅尔的起源到加洛林王朝

GRIERSON, PHILIP. 'Money and Coinage under Charlemagne', in *Karl der Grosse: Lebenswerk und Nachleben*, ed. W. Braunfels. I. Dusseldorf, 1965. 501–36.

LAFAURIE, JEAN. 'Monnaies d'argent mérovingiennes des VIIe et VIIIe siècles', *RN*, 6th ser., XI (1960), 98–219.

MORRISON, KARL F. 'Numismatics and Carolingian trade: a critique of the evidence', *Speculum*, XXXVIII (1963), 403–32.

MORRISON, KARL F and GRUNTHAL, HENRY, *Carolingian Coinage.* Numismatic Notes and Monographs, CLVIII,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New York, 1967.

V. "北欧海盗时代"

BLUNT, CHRISTOPHER E. 'The Coinage of Athelstan 924–939. A Survey'. *British Numismatic Journal*, XLII (1974), 35–160.

[946] DOLLEY, R. H. M. (ed.). *Anglo-Saxon Coins: studies presented to F. M. Stenton.* London, 1961.

——*Anglo-Saxon Pennies.* London, 1964.

——*Viking Coins of the Danelaw and of Dublin.* London, 1965.

DUMAS-DUBOURG, FRANÇOISE. *Le Trésor de Fécamp et le monnayage en Francie Occidentale pendant la seconde moitié du Xe siècle.* Paris, 1971.

GRIERSON, PHILIP. 'The Volume of Anglo-Saxon Currency', *EconHR*, 2nd ser., XX (1967), 153–60.

HATZ, GERT. *Handel und Verkehr zwischen dem Deutschen Reich und Schweden in der späten Wikingerzeit.* Lund, 1974.

KRAUME, EMIL and HATZ, VERA. 'Die Otto-Adelheid Pfennige und Ihre Nachprägungen', *Hamburger Beiträge zur Numismatik*, New Ser., XV (1961–3), 13–23 and appendixes.

MALMER, BRITA. *Nordiska Mynt före år 1000.* Acta Archaeologica Lundensia in 8°, IV. Lund-Bonn, 1966. (With English resumé.)

METCALF, D. M. 'How Large was the Anglo-Saxon Currency?' *EconHR*, 2nd ser., XVIII (1965).

PETERSSON, H. and BERTIL A. *Anglo-Saxon Currency, King Edgar's Reform to the Norman Conquest.* Lund, 1969.

RASMUSSON, N. L. and LAGERQVIST, L. O. (eds.). *Commentationes de nummis saeculorum IX-XI in Suecia repertis.* 2 vols. Stockholm, 1961–8.

SAWYER, P. H. 'The Wealth of England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TRHS*, 5th ser., XV (1965). 145–64.

——*The Age of the Vikings*, 2nd edn. London, 1971.

SUCHODOLSKI, S. 'Études sur la monnaie polonaise de la fin du Xe et du début du XIe siècle', *Archaeologia Polona*, XI (1969), 91–129.

YANIN, V.. 'Les Problèmes généraux de l'échange monétaire russe aux IXe-XIIe siècles', *Moneta e Scambi nell'alto medioevo.* VIII. Settimane di studio del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alto medioevo. Spoleto, 1961, 485–505.

VI. 乡村地区的货币使用

BLOCH, MARC. 'Natural economy and money economy: a pseudo-dilemma', in *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 London, 1967. 230-43.

DOLLINGER, PHILIPPE. *L' Évolution des Classes Rurales en Bavière*. Paris, 1949.

DUBY, GEORGES. *Rural 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Medieval West*. Paris, 1961. (English translation, 1968.)

——*Guerriers et paysans VIIe-XIIe siècles*. Paris, 1973.

FOSSIER, ROBERT. *La Terre et les Hommes en Picardie jusqu' a la fin du XIIIe siècle*. Paris-Louvain, 1968.

HERLIHY, DAVID. 'Treasure Hoards in the Italian Economy. 960 - 1139', *EconHR*, 2nd ser., x (1957), 1-14.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in Southern France and Italy 801-1150', *Speculum*, XXXIII (1958), 23-41.

MEUVRET, J. 'Circulation monétaire et utilisation économique de la monnaie dans la France du XVe et du XVIIe siècle', *Études d' 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I (1947), 15-28. Reprinted in *Études d' Histoire Économique*. Cahiers des Annales, XXXII. Paris, 1971, 127-37.

POSTAN, M. M. 'The Chronology of Labour Services', *TRHS*, 4th ser., XX (1937). ——'The Rise of a Money Economy', *EconHR*, XIV (1944), 123-34.

VII. 贵金属矿的开采和贸易

AGRICOLA, GEORGIUS. *De veteribus et novis metallis*. Basle, 1546. English translation in Georgius Agricola, *De re Metallica*, trans. and ed. HOOVER, H. C. and L. H. London, 1912.

ALBERTUS MAGNUS. *Book of Minerals*. Trans. and ed. WYCKOFF, DOROTHY. Oxford, 1967.

CIPOLLA, CARLO M. 'Argento Tedesco e Monete Genovesi alla find del quattrocento', *RIN*, LVIII (1956), 100-7. [947]

HERRMANN, WALTHER. 'Bergbau und Kultur', *Freiberger Forschungshefte*, series D, II (1953), 7-22.

HILLEBRAND, WERNER. 'Der Goslarer Metallhandel im Mittelalter', *Hansische Geschichtsblätter*, LXXXVII (1969).

KOVACEVIC, DESANKA. 'Dans la Serbie et la Bosnie médiévales: les mines d' or et d' argent', *Annales*, XV (1960), 248-58.

NEF, J. U. 'Silver Production in Central Europe 1450-161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XLIX (1941), 575-91.

VIII. 商业革命中的货币

BARNARD, F. P. *The Casting-counter and the Counting-Board*. Oxford, 1916.

CASTELIN, K. *Grossus Pragensis. Der Präger Groschen und seine Teilstücke 1300-1547*, 2nd edn. Brunswick, 1973.

CIPOLLA, C. 'Currency Depreciation in Medieval Europe', *EconHR*, 2nd ser., XV (1963), 413-22. Reprinted in THRUPP, SYLVIA (ed.). *Change in Medieval Society*. New York, 1964, 227-36.

COURTENAY, WILLIAM J. 'Token Coinag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Poor Relief during the Later Middle Age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III (1972), 275-95.

DE ROOVER, R. *Business, Banking and Economic Thought: Selected Studies*, ed. KIRSHNER, J. Chicago, 1974.

GRUNZWEIG, A. 'Les Incidences internationales des mutations monétaires de Philippe le Bel', *Moyen Âge*, LIX (1953), 117-72.

HERLIHY, DAVID. 'Pisan Coinage and the Monetary Development of Tuscany, 1150-1250',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Museum Notes*, VI (1954), 143-68.

HOMAN, BALINT. 'La circolazione delle monete d'oro in Ungheria dal x a xiv secole e la crisi europea dell'oro nel secolo xiv', *RIN*, 2nd ser., v (1922), 109-56.

HOMER, SIDNEY. *A History of Interest Rates.* Rutgers, 1963.

KOCH, BERNHARD. 'Goldgeld und Groschen-münzen im österreichischen Geldverkehr des Mittelalters', *NZ*, LXXXI (1965), 3-13.

LANE, F. C. 'Le vecchie monete di conte Veneziane ed il ritorno all'oro', *Atti del Istituto Veneto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 CXVII (1959) 51-78.

LOPEZ, R. S. 'Back to Gold, 1252', *EconHR*, 2nd ser., IX (1956), 219-40.

—— 'Prima del Ritorno all'oro nell'occidente duecentesco: i primi denari grossi d'argento',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IX (1967), 174-81.

NAGL, ALFRED. 'Die Goldwährung und die handelmässige Geldrechnung im Mittelalter', *NZ*, XXVI (1894), 41-258.

NOHEJLOVA-PRATOVA, E. (ed.). 'Les Commencements de la grosse monnaie et de la monnaie d'or en Europe Centrale (1250-1350)', special number of *NS*, XII. Prague, 1971-2.

SPUFFORD, PETER. 'Le Rôle de la monnaie dans la révolution commerciale du XIIIe siècle', in DAY, JOHN (ed.). *Études d'histoire monétaire.* Lille, 1984.

WERVEKE, HANSVAN. 'Monnaie, lingots ou marchandises? Les instruments d'échange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Annales*, IV (1932), 452-68. Reprinted in *Miscellanea Mediaevalia.* Ghent, 1968, 191-208.

—— 'Monnaie de compte et monnaie réelle', *RBPH*, XIII (1934), 123-52, Reprinted in *Miscellanea Mediavalia.* Ghent, 1968, 133-58.

ZERBI, TOMMASO. *Moneta effectiva e moneta di conto nelle fonti contabile di storia economica.* Milan, 1955.

A great deal of information about money is to be found in merchauts' notebooks. The following are arranged in the order of the date of their compilation:

ORLANDINI, V. (ed.). *Tarifa zoe Noticia dy Pexi e Mexure di Luogi e Tere che s'adovra Mercandantia per el mondo.* Introduction by R. Cessi. Reale Instituto superiore di scienze economiche e commerciali di Venezia. Venice, 1925.

STUSSI, ALFREDO (ed.). *Zibaldone da Canal, Manoscritto Mercantile del sec. XIV.* Fonti per la Storia di Venezia. Venice. 1967. 【948】

PEGOLOTTI, FRANCESCO BALDUCCI. *La Pratica della Mercatura.* EVANS ALLEN (ed.).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Cambridge, Mass., 1936, together with: EVANS, ALLAN. 'Some Coinage systems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c and Business History*, III (1931), 481-96, and GRIERSON, PHILIP. 'The Coin List of Pegolotti',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I. Milan, 1957. 483-92.

CIANE, CESARE (ed.). *La 'Pratica di Mercatura' Datiniana.* Milan, 1964.

BORLANDI, ANTONIA (ed.). *Il Manuale di Mercatura da Sanminiato de' Ricci.* Genoa, 1963.

BORLANDI, FRANCO (ed.). *El Libro di Mercatantie et Usanze de' Paesi.* Turin, 1936.

PAGNINI della VENTURA, G. F. (ed.). 'La Pratica della mercatura scritta de Giovanni di Antonio da Uzzanno', *Della Decima e delle Altre gravezze*, IV. Lisbon-Lucca, 1766.

IX. 国际货币市场

CIPOLLA, CARLO M. *Studi di Storia della moneta*, I. *I Movimenti dei Cambi in Italia dal Secolo XIII al XV.* Pavia, 1948.

DE ROOVER, RAYMOND. *L'Évolution de la lettre de change XIVe-XVIIIe siècles.* Paris, 1953.

—— 'Le Marché monétaire au moyen âge et au début des temps modernes. Problèmes et méthodes', *Revue Historique*, CCXLIV (1970).

EINZIG, PAUL. *The History of Foreign Exchange.* London, 1962.

FAVIER, JEAN. *Les Finances pontificales á l'époque du grande schisme d'Occident 1378-1419.*

Bibliothèque des écoles Françaises d'Athènes et de Rome, ccxi (1966).
LUNT, W. E. *Papal Revenues in the Middle Ages.* 2 vols. New York, 1934.
PIQUET, J. *Des banquiers au moyen âge. Les Templiers. Étude de leurs opérations financières.* Paris, 1935.
RENOUARD, Y. *Les Relations des papes d' Avignon et des compagnies commerciales et bancaires.* Paris, 1941.
SCHÄFER, H. *Die Ausgaben der apostolichen Kammer unter Johann XXII.* Vatikanische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Päpstlichen Hof-und Finanzverwaltung, 1316-1375, II. Paderborn, 1911.
SPRANDEL, ROLF. 'Exkurs über Geld', *Das Eisengewerbe im Mittlelalter.* Stuttgart, 1968.
SPUFFORD, PETER. *Handbook of Medieval Exchange.* London, 1986.
USHER, A. P. *The Early History of Deposit Banking in Mediterranean Europe.* Cambridge, Mass., 1943.

X. 西欧的货币流通和金银进出口

ASHTOR, ELIYAHU. *Les Métaux precieux et la balance des payements du proche-orient à la basse époque.* Paris, 1971.
BACHARACH, JERE L. 'The Dinar versus the Duca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IV (1973), 77-96.
BAUTIER, R-H. 'L'Or et l'argent en occident de la fin du XIIIe siècle au début du XIVe siècle',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1951), 169-74.
BLOCH, MARC. 'The problem of gold in the middle ages', *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 London, 1967, 186-229.
BRAUDEL, F. 'Economies: Precious Metals, Money and Prices',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I. 2nd edn. Paris, 1966. English translation, London, 1972, 462-542.
CAHEN, CLAUDE. 'Quelques problèmes concernant l'expansion économique musulmane au haut moyen âge', *L'Occidente e l'Islam nell'alto medioevo.* Settimane di studio del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alto Medioevo, XII. Spoleto, 1965, 391-432.
DUPLESSY, JEAN. 'La Circulation des monnaies arabes en Europe occidentale du VIIIe au XIIIe siècle'. *RN*. 5th ser., xv■ (1956), 101-63. [949]
GOITEIN, S. D.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The Jewish communities of the Arab World as portrayed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Cairo Geniza*, I. *Economic Foundations.* Berkeley, 1967.
HEYD, WILHELM VON. *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au Moyen Âge.* 2 vols. Leipzig, 1885-6.
MALOWIST, MARIAN. 'Quelques observations sur le commerce de l'or dans le soudan occidental au moyen âge'. *Annales*, xxv (1970), 1630-6.
RICHARDS, J. F. (ed.). *Precious Metals in the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s.* Durham, North Carolina, 1983.
SCHLUMBERGER, G. *Numismatique de l'Orient Latin.* Paris, 1878. Supplement, 1882. Reprinted, Graz, 1954.
WATSON, ANDREW M. 'Back to Gold - and Silver,' *EconHR*, 2nd. ser., xx (1967), 1-34.
WEE, HERMAN VAN DER and PEETERS, THEO. 'Un Modèle dynamique de croissance interséculaire du commerce mondial XIIe-XVIIIe siècles', *Annales*, xxv (1970), 100-26.

XI. 铸币机构

BAILHACHE, J. 'Chambre et cour des Monnaies XIVe, XVe, XVIe siècles. Aperçu historique', *RN*, 4th ser., XXXVII (1934), 63-99, 175-97; XXXVIII (1935), 67-89; and XXXIX (1936), 157-79 and 327-45.
BEARDWOOD, ALICE. 'The Royal Mints and Exchanges', in *The English Government at Work 1327-1336.* WILLARD J. F. and MORRIS, W. A. (eds.). III. Cambridge, Mass., 1950. 35-66.

CARSON, R. A. G. (ed.). *Mints, Dies and Currency*. London, 1971.
CRAIG, JOHN. *The Mint*. Cambridge, 1953.
LOPEZ, ROBERTO S. 'An Aristocracy of Mone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Speculum*, XXVIII (1953), 1-43.
MATE, MAVIS. 'A Mint of Trouble 1279-1307', *Speculum*, XLIV (1969), 201-12.
REDDAWAY, T. F. 'The King's Mint and Exchange in London 1343-1543',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XXII (1967), 1-23.

XII. 货币和政府

BISSON, T. *Conservation of Coinage*. Oxford, 1979.
BLOCKMANS, WILLEM P. 'La Participation des sujets flamands à la politique monétaire des ducs de Bourgogne 1384-1500', *Revue Belge de Numismatique*, CXIX (1973), 103-34.
BOLIN, STURE. 'Tax Money and Plough Money',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 (1954), 3-21.
CAMPBELL, JAMES. 'Observations on English Government from the Tenth to the Twelfth Century', *TRHS*, 5th ser., XXV (1975). 39-54.
SPUFFORD, PETER. 'Assemblies of Estates, Taxation and Control of Coinage in Medieval Europe', *Studies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y of Representative and 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s*, XXXI. Louvain-Paris, 1966, 115-30.
—— 'Coinage, Taxation and the Estates General of the Burgundian Netherlands', *Standen en Landen*, XL (1966), 61-87.
—— 'Mint Organization in the Burgundian Netherland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BROOKE, C. N. L. and others (eds.). *Studies in Numismatic Method presented to Philip Grierson*. Cambridge, 1983.
—— and MAYHEW, N. J. (ed.). *Late Medieval Mints: Organis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Techniques*. [950] Oxford, 1986.

XIII. 货币理论

BABELON, ERNEST. 'La Théorie féodale de la monnaie',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XXXVIII (first part) (Paris, 1908), 279-347.
BIEL, GABRIEL. *Treatise on the Power and Utility of Moneys*. Trans. and ed. R. BURKE. Philadelphia, 1930.
BRIDREY, E. *La Théorie de la monnaie au XIVe siècle, Nicole Oresme*. Caen, 1906.
DE ROOVER, R. 'L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des scolastiques: à propos du traité sur l'usure d'Alexandre Lombard', *Revue d'Histoire Ecclesiastique*, LIX (1964), 854-66.
GORDON, BARRY. *Economic Analysis before Adam Smith*. London, 1975.
IBANES, J. *La Doctrine de l'Église et les réalités économiques du XIIIe siècle. L'interêt, le prix et monnaie*. Paris, 1967.
MONROE, A. E. *Monetary Theory before Adam Smith*. Harvard, 1923.
ORESME, NICHOLAS. *De Moneta*, ed. and trans. CHARLES JOHNSON. London, 1956.

XIV. 中世纪晚期的银荒

DAY, JOHN. 'The Decline of a Money Economy: Sardinia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Studi in memoria di Federigo Melis*, III. Naples, 1978.
—— 'The Great Bullion Famin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No. 79 (1978), 3-54.
GIRARD, A. 'Un Phénomène économique: La Guerre Monétaire (XIVe-XVe siècles)', *Annales*, II

(1940),207-218.
GRAUS, FRANTISEK. 'La Crise monétaire du 14e siècle', *RBPH*, XXIX(1951), 445-54.
HEERS, JACQUES. 'Il commercio nel Mediterraneo alla fine del sec. XIVe nei primi anni del XV',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CXIII(1955).
——*L' Occident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et sociaux*, 2nd edn. Paris, 1966.
MISKIMIN, HARRY A. *Money, Prices and Foreign Exchange in Fourteenth Century France.* Newhaven, Conn., 1963.
——'Monetary Movements and Market Structure: Forces for Contraction in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 *JEH*, XXIV(1964), 470-95.
MUNRO, JOHN H. *Wool, Cloth and Gold. The Struggle for Bullion in Anglo-Burgundian Trade 1340-1478.* Brussels-Toronto, 1973.
PERROY, E. 'À l' origine d' une économie contractée: les crises du XIVe siècle', *Annales*, IV(1949), 167-82.
——'Wage Labour in Franc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EconHR* 2nd ser., VIII(1955), 232-9. Reprinted in THRUPP, SYLVIA(ed.). *Change in Medieval Society.* New York, 1964, 237-46.

XV. 价格革命前夕的货币

EHRENBERG, R. *Das Zeitalter der Fugger. Geldkapital und Kreditverkehr im 16 Jahrhundert*, 3rd edn, Jena, 1922. Shorter English version *Capital and Finance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London, 1928.
GRIERSON, PHILIP. 'The Monetary Pattern of Sixteenth-Century Coinage', *TRHS*, 5th ser., XXI(1971), 45-60.
LESAGE, GEORGES. 'La Circulation monétaire en Franc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e siècle', *Annales*, III(1948), 304-16.
SPOONER, F. C.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Monetary Movements in France 1495-1725.* Harvard, 1972.
VILAR, P. *Oro y Moneda en la Historia 1450-1920.* Barcelona, 1969.

[951]

XVI. 货币与商业——总书目（按国家编排）

意大利各城市国家

BERNOCCHI, MARIO. *Le Monete della repubblica fiorentina*, I. *Il Libro della Zecca.* Florence, 1974. II. *Corpus Nummorum Florentinorum.* Florence, 1975. III. *Documentazione.* Florence, 1976. IV. *Valuti del fiorino d' oro.* Florence, 1978.
CESSI, ROBERTO(ed.). *Problemi Monetari Veneziani.* Documenti Finanziari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4th series, I, Reale Accademia dei Lincei. Padua, 1937.
CHIAUDANO, MARIO. 'La Moneta di Genova nel Secolo XII',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I. Milan, 1957. 189-214.
CIPOLLA, CARLO M. *Le avventure della lira.* Milan, 1958.
——*Storia dell' economia italiana. Saggi di storia economica*, I. Secoli VII-XVII. Turin, 1959.
Corpus Nummorum Italicorum. 20 out of 21 volumes published. Rome, 1910 onwards.
DAY, JOHN. *Les Douanes de Gênes 1376-1377.* Paris, 1963.
——'La circulation monétaire en Toscane en 1296', *Annales*, XXIII(1968), 1054-66.
DE ROOVER, 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edici Bank 1397-1494.* Cambridge, Mass., 1963.
GNECCHI, F. AND E. *Le Monete di Milano.* Milan, 1884.
GRIERSON, PHILIP. 'La Moneta Veneziana nell' economia mediterranea del trecento e quattrocento', *La Civilta Veneziana del Quattrocento.* Fundazione Giorgio Cini. Florence, 1957, 77-97.
——'I Grossi "senatoriali" di Roma, parte I, dal 1253 al 1282', *RIN*, LVIII(1956), 36-69.
——'The Origins of the Grosso and of Gold Coinage in Italy', *NS*, XII(1971-2), 33-48.
HEERS, JACQUES. *Gênes au XVe siècle: activité économique et problèmes sociaux.* Paris, 1961.

HERLIHY, DAVID, LOPEZ, ROBERT S., and SLESSAREV, VSEVOLOD. *Economy, Society and Government in Medieval Italy. Essays in Memory of Robert L. Reynolds.* Kent, Ohio, 1969.
LANE, FREDERIC C. *Venice and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Baltimore, 1966.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Baltimore, 1973.
——and MUELLER, REINHOLD C. *Money and Banking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Venice*, I. Baltimore, 1985.
LA RONCIÈRE, CHARLES DE. *Un changeur florentin du trecento, Lippo di Fede del Sega 1285 env.-1363 env.* Paris, 1973.
——*Florence. Centre économique régional au XIVe siècle.* Aix-en-Provence, 1976.
LUZZATTO, GINO. *Studi di Storia Economica Veneziana.* Padua, 1954.
PAPADOPOLI, N. *Le Monete di Venezia.* 4 vols., Venice, 1893-1919.
PESCE, G. AND FELLONI, G. *Le Monete Genovesi.* Genoa, 1975.
SAMBON, G. *Repertorio generale delle monete coniate in Italia*, I. Paris, 1912.
SAPORI, A. *Studi di storia economica medievale.* 3 vols., Florence, 1956-67.
SCHULTE, ALOYS.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lichen Handels und Verkehrs zwischen Westdeutschland und Italien mit Ausschuss von Venedig.* Leipzig, 1900.
TRASELLI, CARMELLO. *Note per la Storia dei Banchi in Sicilia nel XV secolo.* I. *Zecche e Monete.* Palermo, 1959. II. *I Banchieri e i loro affari.* Palermo, 1968.

伊比利亚半岛诸王国

CARRÈRE, CLAUDE. *Barcelone, Centre Economique 1380-1462.* 2 vols., Paris, 1967.
GIL FARRES, OCTAVIO. *Historia de la Moneda Espanola*, 2nd edn, Madrid, 1975.
HAMILTON, EARL J. *Money, Prices and Wages in Valencia, Aragon and Navarre 1351-1550.* Cambridge, Mass., 1936.
MACKAY, ANGUS. *Money, Prices and Politics in Fifteenth-Century Castile.* London, 1981.
MAGALHÃES-GODINHO, VITORINO. *L'E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Paris, 1969.
MILES, GEORGE C. *The Coinage of the Umayyads of Spain.*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New York, 1950. [952]
——*The coins of the Spanish Mulūk al-Tawā'if.*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New York, 1954.
TEIXEIRA DE ARAGÃO, A. C. *Descripção general e historica das moedas cunhadas em nome dos reis, regentes e governadores de Portugal.* 3 vols., Lisbon, 1874-80.

法国

BARATIER, E. and REYNAUD, F. *Histoire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 II. *1291-1480.* Paris, 1951.
BISSON, T. 'Coinages and Royal Monetary Policy in Langeudoc during the Reign of Saint Louis', *Speculum*, XXXII (1957), 443-69.
BLANCHARD, LOUIS. *Essai sur les Monnaies de Charles I Comte de Provence.* Paris, 1868.
BLANCHET A. and DIEUDONNÉ, A. *Manuel de numismatique française*, 4 vols. Paris, 1912-1936. II. *Monnaies royales françaises depuis Hugues Capet jusqu'à la Révolution. Paris*, 1916. IV. *Monnaies féodales françaises.* Paris, 1936.
CARON, E. *Monnaies féodales françaises.* Paris, 1882.
CASTAING-SICARD, MIREILLE. *Monnaies féodales et circulation monétaire en Languedoc Xe-XIIIe siècles.* Cahiers de l'Association Marc Bloch de Toulouse, Études d'Histoire Méridionale, IV. Toulouse, 1961.
CASTELLANI, C. 'Le Rôle économique de la communauté juive de Carpentras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 *Annales* XXVII (1972), 583-611.
CAZELLES, R. 'Quelques réflexions à propos des mutations de la monnaie royale française, 1295-1360', *Le Moyen Âge*, LXXII (1966), 83-105 and 251-78.
——La Stabilisation de la monnaie par la création du franc (décembre 1360)-blocage d'une société', *Traditio*, XXXII (1976), 293-311.
COMBES, JEAN. 'Les Commercants et les capitalistes de Montpellier aux XIIIe et XIVe siècles', *Re-*

vue Historique, CLXXXIX (1940), 341-77.

DE ROOVER, R. 'Le Marché monétaire à Paris du règne de Philippe le Bel au début du XVe siécle', *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1968), 548-58.

DUBOIS, HENRI. *Les Foires de Chalon-sur Saône et le commerce dans la vallée de la Saône à la fin du Moyen Age*. Paris, 1975.

EMERY, R. W. *The Jews of Perpignan in the XIII Century*-New York, 1959.

FAVREAU, ROBERT. 'Les Changeurs du royaume sous le règne de Louis XI',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CXXII (1964), 216-51.

FOURNIAL, ETIENNE. *Les Villes et l'économie d'échange en Forez aux XIIIe et XIVe siècles*. Paris, 1967.

GANDILHON, RENÉ. *Politique économique de Louis XI*. Rennes, 1940.

GIARD, JEAN-BAPTISTE. 'Le Florin d'or au Baptiste et ses imitations en France au XIVe siècle',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CXXV (1967), 94-141.

GUERREAU, ALAIN. 'L'Atelier monétaire royal de Mâcon (1239-1421)', *Annales*, XXIX (1974), 369-92.

GUILHERMOZ, P. and DIEUDONNÉ, A. 'Chronologie des documents monétaires de la numismatique royale des origines à 1330 et 1337', RN, XXXII (1929) and XXXIII (1930).

LAFAURIE, JEAN. *Les Monnaies des rois de France*. I. Paris, 1951.

LANDRY, A. *Essai économique sur les mutations des monnaies dans l'ancienne France de Philippe le Bel à Charles VII*.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IV, Scienc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 CLXXXV. Paris, 1910, reprinted 1969.

NAHON, GERARD. 'Le Crédit et les juifs dans la France du XIIIe siècle', *Annales*, XXIV (1969), 1121-48.

POEY D'AVANT, FAUSTIN. *Les Monnaies féodales de la France*, 3 vols., Paris, 1858-62. Reprinted, Graz, 1961.

REY, MAURICE. *Le Domaine du roi et les finances extraordinaires sous Charles VI 1388-1413*. Paris, 1965.

——*Les Finances Royales sous Charles VI. Les Causes du Déficit 1388-1413*. Paris, 1965. [953]

RICHEBÉ, CLAUDE. *Les Monnaies féodales d'Artois du Xe au début du XIVe siècle*. Paris, 1963.

ROLLAND, HENRI. *Monnaies des Comtes de Provence, XIIe-XVe siècles. Histoire monétaire, économique et corporative*. Paris, 1956.

SAULCY, F. DE. *Recueil de documents relatifs a l'histoire des monnaies frappées par les rois de France depuis Philippe II jusqu'à François Ier*. 4 vols., Paris, 1879-92.

WOLFF, PHILIPPE. *Commerces et Marchands de Toulouse (vers 1350-vers 1450)*. Paris, 1954.

低地国家各公国

BIGWOOD, GEORGES. *Le Régime juridique et économique du commerce de l'argent dans la Belgique du moyen âge*. Brussels, 1920-1.

CHALON, R. *Recherches sur les monnaies des comtes de Hainaut*. Brussels, 1848. Supplements 1852, 1854, 1857 and, by A. DE WITTE, 1891.

CHAUTARD, J. *Les Imitations des monnaies au type Esterlin*. Nancy, 1871.

CHESTRET DE HANEFFE, J. DE. *Numismatique de la principauté de Liège*. Brussels, 1890.

CHIJS, P. O VAN DER. *De Munten der Nederlanden van de vroogste tijden tot aan de Pacificatie van Gend (1576)*. 9 vols., Haarlem, 1851-66.

DE ROOVER, R. *Money, Banking and Credit in Medieval Bruges*. Cambridge, Mass., 1948.

——*The Bruges Money Market around 1400*. Brussels, 1968.

DESCHAMPS DE PAS, L. 'Essai sur l'historie monétaire des comtes de Flandre de la maison de Bourgogne', *RN*, N.S., VI (1861), VII (1862), XI (1866), XIV (1869), XV (1874), and *Revue Belge de numismatique*, XXXII (1876).

DE WITTE, A. *Historie monétaire des comtes de Louvain, ducs de Brabant*. 3 vols., Antwerp, 1894-9.

ENNO VAN GELDER, H. *De nederlandse Munten*. Utrecht-Antwerp, 1966.

——and HOC., M. *Les Monnaies des Pays-Bas Bourguignons et Espagnols*. Amsterdam, 1960. Sup-

plement, 1964.

GAILLARD, VICTOR. *Recherches sur les monnaies des comtes de Flandre... jusque' à l' avènement de la maison de Bourgogne*, 2nd edn. Ghent, 1857.

GHYSSENS, J. *Les Petits deniers de Flandre du XIIe et XIIIe siècles.* Brussels, 1971.

GRIERSON, PHILIP, 'Coinage in the Cely Papers', *Miscellanea Mediaevalia in Memoriam Jan Frederik Niermeyer.* Groningen, 1967, 379 - 404.

HOC, M. *Histoire monétaire de Tournai.* Brussels, 1970.

KETNER, F. 'The Utrecht Monetary System' in POSTHUMUS, N. W.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Prices in Holland*, II. Leiden, 1964, p. 12-30.

LAURENT, H. *La Loi de Gresham au Moyen Age. Essai sur la circulation monétaire entre la Flandre et le Brabant à la fin du XIVe siècle.* Brussels, 1933.

SPUFFORD, PETER. *Monetary Problems and Policies in the Burgundian Netherlands 1433-1496.* Leiden, 1970.

VAN UYTVEN, RAYMOND. 'La Flandre et le Brabant, "Terres de Promission" sous les ducs de Bourgogne', *Revue du Nord*, XLIII (1961), 281-317,

—— 'What is new socially and economicall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therlands', *Acta Historicae Neerlandicae*, VII (1975), 18-53.

WERVEKE, HANS VAN. 'De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volgen van de muntpolitiek der graven van Vlaanderen 1337-1433', *Annales de la Société d' Emulation de Bruges*, LXXIV (1931), 1-15. Reprinted in *Miscellanea Mediaevalia.* Ghent, 1968, 243-54.

—— 'Currency Manipul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The Case of Louis de Male, Count of Flanders', *TRHS*, XXXI (1949), 115-27. Reprinted in *Miscellanea Mediaevalia.* Ghent, 1968, 255-67.

不列颠诸岛

BLUNT, C. E. and BRAND, J. D. 'Mint Output of Henry III', *BJN*, XXXIX (1970), 61-6.

CHALLIS, C. E. *The Tudor Coinage.* Manchester, 1978.

CRUMP, C. G. and JOHNSON, C. 'Tables of Bullion coined under Edward I, II and III', *Numismatic Chronicle*, 4th ser., XIII (1913), 200 - 45. [954]

DOLLEY, MICHAEL. 'Anglo-Irish Monetary Policies, 1172 - 1637', *Historical Studies*, VII. London, 1969, 45-64.

FEAVERYEAR, A. E. *The Pound Sterling.* 2nd edn, Oxford, 1963.

FRYDE, E. B. 'Financial Resources of Edward I in the Netherlands, 1294 -98', *RBPH*, XL (1962), 1168-87.

—— 'Financial Resources of Edward III in the Netherlands, 1337 - 1340', *RBPH*, XLV (1967), 1142-1216.

—— 'Parliament and the French War 1336 -40', *Essays in Medieval, History presented to Bertie Wilkinson*, ed. T. A. Sandqvist and M. R. Powicke. Toronto, 1969, 250 - 69. Reprinted in FRYDE, E. B. and MILLER, EDWARD (eds.).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English Parliament*, I. Cambridge, 1970, 242-61.

HARVEY, P. D. A. 'The English Inflation of 1180 -1220', *Past and Present*, LXI (1973), 3-30.

IVES, HERBERT E. *Foreign Imitations of the English Noble.* Numismatic Notes and Monographs, XCIII.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New York, 1941.

MATE, MAVIS. 'Monetary Policies in England 1272-1307', *BNJ*, XLI (1972), 34 -79.

—— 'High Prices in Early Fourteenth-Century England: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EconHR*, 2nd ser., XXVIII (1975), 1-16.

MAYHEW, N. J. 'Numismatic Evidence and Falling Prices in Fourteenth-Century England', *EconHR*, 2nd ser., XXVII (1974), 1-15.

—— (ed.). *Edwardian Monetary Affairs (1279-1344).*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36. Oxford, 1977.

NORTH, J. J. *English Hammered Coinage.* 2nd edn. London, 1975-80.

OMAN, CHARLES. *The Coinage of England.* Oxford, 1931.

PRESTWICH, MICHAEL. 'Edward I's Monetary Polici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EconHR*, 2nd ser.,

XXII (1969) ,406-16.
RUDING ,R. *Annals of the Coinage*,3 vols. 3rd edn,London,1840.
SPUFFORD,PETER. 'Continental Coins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BNJ*,XXXII (1963) ,127-39.
——'Burgundian Double Patards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BNJ*,XXXIII (1964) ,110 -17.
STEWART,I. H. *The Scottish Coinage*, 3rd edn. London,1967.
STOKES,ETHEL. 'Tables of Bullion Coined from 1377 to 1550',*Numismatic Chronicle*,5th ser., IX (1929) ,27- 69.
Sylloge of Coins of the British Isles. British Academy. London,1958 onwards.
THOMPSON,J. D. A. *Inventory of British Coin Hoards AD 600-1500*. Royal Numismatic Society. London,1956.

德意志诸邦国

BASTIAN,F. (ed.). *Das Runtingberbuch 1383-1407 und verwandtes Material zum Regensburger-südostdeutschen Handel und Münzwesen*. 3 vols.,Regensburg,1935 - 44.
BERGHAUS,PETER. 'Die Münzpolitik der deutschen Städte im Mittelalter', *Finances et Comptibilité Urbaines du XIIIe au XVIe siècle*. Pro Civitate,Collection Histoire in 8°,VII. Brussels,1964, 75-85.
——'Die Perioden des Sterlings in Westfalen,dem Rheinland und in den Niederlanden',*Hamburger Beiträge zur Numismatik*,I (1947) ,34 -53.
——'Umlauf und Nachprägung des Florentiner Guldens Nördlich der Alpen',*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Numismatica*,II. Rome,1965,595-607.
BERGHAUS,P. and HATZ,G. (eds). *Dona Numismatica-Walter Hävernick zum 23 Januar 1965 dargebracht*. Hamburg,1965.
CAHN,JULIUS. *Der Rappenmünzbund*. Heidelberg,1901.
DIEPENBACH,W. 'Der Rheinische Münzverein', *Kultur und Wirtschaft im Rheinischen Raum. Festschrift zu Christian Eckert*,ed. A. F. NAPP-ZINN and M. OPPENHEIM. Mainz,1949,89-120.
HÄVERNICK,WALTER. *Der Kölner Pfennig im 12 und 13 Jahrhundert*. Stuttgart,1931.
METCALF,D. M. *The Coinage of South Germany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London,1961. [955]
SCHULTE,A. *Geschichte der Grossen Ravensberger Handelsgesellschaft 1380-1530*. Stüttgart-Berlin, 1923.
STROMER,W. VON. *Oberdeutsche Hochfinanz 1350-1450*.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Beiheft,LV-LVII. 1970.
SUHLE,A. *Deutsche Münz-und Geldgeschichte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15 Jahrhundert*. 2nd edn. Berlin,1964.

北欧

BENDIXEN,KIRSTEN. *Denmark's Money*. Copenhagen,1967.
GALSTER,G. *Coins and History*. Copenhagen,1959.
JENSEN,J. S. 'Danish Money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Mediaeval Scandinavia*, VI (1973), 161-71.
JESSE,WILHELM. *Der Wendische Münzverein*. Lübeck,1928.
LAGERQVIST,L. O. *Svenska mynt under Vikingtid och Medeltid ca. 995-1521 samt Gotländska mynt ca. 1140-1565*. Stockholm,1969.
MAŁOWIST,MARIAN. *Croissance et régression en Europe XIVe-XVIIe siècles: recueil d'articles*. Cahiers des Annales. XXXIV. Paris,1972.
SPRANDEL,ROLF. *Das Mittelalterliche Zahlungs-system nach Hansisch-Nordischen Quellen des 13-15 Jahrhunderts*. Stuttgart,1975.

中欧及东欧

BAUMGARTNER,EGON. 'Die Blütezeit der Friesacher Pfennige',*NZ*,LXXIII (1949),LXXVIII (1959), LXXIX (1961).
CASTELIN,K. *Česka drobná mince doby předhusitské a husitské 1300-1471*. Prague,1953. With

resumé in French.

GRAUS, F. 'Die Handelsbeziehungen Böhmens zu Deutschland und Österreich in 14 und zu Beginn des 15 Jahrhunderts', *Historica*, II (1960).

GUMOWSKI, M. *Handbuch der polnischen Numismatik*. Graz, 1960.

KIERSNOWSKI, R. *Wstep do numizmatyki polskiej wieków srednich*. Warsaw, 1964.

LÖHR, A. *Österreichische Geldgeschichte*. Vienna, 1946.

METCALF, D. M. *Coinage in South-Eastern Europe, 820–1396*. London, 1979.

PROBSZT, GUNTHER. *Quellenkunde der Münz-und Geldgeschichte der ehemaligen 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n Monarchie*. Graz, 1953. Supplements, 1960 and 1963.

RÉTHY, L. (ed.). *Corpus Nummorum Hungarie. 1899–1907*. German translations, Graz, 1958.

SPASSKIJ, I. G. *The Russian Monetary System*. Amsterdam, 1967.

SUCHODOLSKI, STANISLAW. 'Renovatio Monetae in Poland in the 12th. century', *Wiadomosci Numizmatyczne*, V (1961), 57–75.

[956]

索　　引

---

① 英文版页码,即中文版的边码,下同。—— 译者注
② 该页并无此词,疑为改版致误。此误后文亦有,恕不一一琐指。——译者注
③ 正文中为 Company,此种不一致后文亦有,恕不一一琐指。——译者注

① 应为18页,疑为改版致误。此误后文亦有,恕不一一琐指。——译者注

② 该词除257页外,其他处也有使用,如244~245页,可能是只举要者所致。此情况后文亦有,恕不一一琐指。——译者注

① 英文版正文中无此词,疑因索引无前后文而加词强调。此情况后文亦有,恕不一一琐指。——译者注

① 192 页为 Alsatians 应为 Alsace 的形容词形式,778 页无。此种失误后文亦有,恕不一一琐指。——译者注

[961]

① bows 的首字母原为大写,据正文改。——译者注

① 并参见原文第793页。——译者注

译 后 记

本卷译稿汇集了许多人长时间的心血，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由翻译者、校译者和编辑共同完成的。本卷内容涵盖广泛的地理空间和年代跨度，涉及的非英语文献年代久远，可资参考的资料相对较少，翻译工作难度极大。加之译稿曾辗转多位译者之手，无形之中进一步加大了译校工作的困难。先后有多位译者参与本卷的翻译工作，其中第1～11章由张四齐、钟和、晏波、邓瑶萍、南楠等翻译，最后由钟和统稿，第12章和附录由张金秀负责翻译。译稿校订工作主要由赵海波博士（第1～6章）和王春法博士（第7～12章）承担。由于校订者对译稿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而且很多时候还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组织了语言，因此，除译者外，本卷译稿的文责应由翻译者和校订者共同承担。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剑桥欧洲经济史》中文版的出版策划人，卢元孝先生为本卷译文的定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卢先生不仅亲自校订并改正译文中的错误，而且许多优美的汉语表达也都出自他的手笔。应该说，卢先生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已经完全超出了一般编辑工作的正常范围，他对本卷译稿的贡献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最后，译校者还要感谢他们的家人以及为本卷出版做出贡献的其他朋友。在出版的准备过程中，译校者和编辑都曾多次向同事和师友请教并征询意见。虽然有些地方至今我们仍然没能找到更为完美的汉语表达方式，但是，我们还是要对这些朋友提供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译者的水平，本卷译文难免存在误译和疏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钟 和

2004年12月